经纬度系列

（套装共8册）

经纬度丛书 · 秦制两千年：封建帝王的权力规则+
菊花王朝：两千年日本天皇史+大国战略：世界是如何被统治的
+大国霸权：5000年世界海陆空争霸
世界史就是一部货币史+新金融帝国:智能时代全球金融变局
黑暗时代：帝国的崩溃与欧洲的新生+帝国经济风暴：大清帝国最后70年



浙江人民出版社

VISIT…

LANZAROTE Caliente.com

总　目　录

秦制两千年：封建帝王的权力规则

菊花王朝：两千年日本天皇史

大国战略：世界是如何被统治的

大国霸权：5000年世界海陆空争霸

世界史就是一部货币史

新金融帝国：智能时代全球金融变局

黑暗时代：帝国的崩溃与欧洲的新生

帝国经济风暴：大清帝国最后70年


经纬度
秦制两千年
沿袭两千年外儒内法
成就数百位帝王霸业
拆穿中国封建帝王
只做不说的权力规则真相
谌旭彬◎著
封建帝王的权力规则
刘勃
余世存
胡赳赳
王五四
联袂推荐
腾讯历史公众号"短史记"主编
谌旭彬 重磅作品！
解答秦制在古代中国长久存在的根源
揭开历史伪善面纱　直达秦制的本相
浙江人民出版社

秦制两千年



封建帝王的权力规则

谌旭彬◎著

浙江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秦制两千年：封建帝王的权力规则/谌旭彬著．—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21．7

ISBN 978-7-213-10149-6

Ⅰ．①秦…　Ⅱ．①谌…　Ⅲ．①封建制度—研究—中国—秦代　Ⅳ．①D69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21）第090625号

本书中文简体版由北京行距文化传媒有限公司授权浙江人民出版社有限公司在中国大陆地区（不包括香港、澳门、台湾）独家出版、发行。

秦制两千年：封建帝王的权力规则

谌旭彬　著

出版发行：浙江人民出版社（杭州市体育场路347号　邮编：310006）

市场部电话：（0571）85061682　85176516

责任编辑：方　程

特约编辑：魏　力

营销编辑：陈雯怡　赵　娜　陈芊如

责任校对：朱　妍

责任印务：刘彭年

封面设计：人马艺术设计·储平

电脑制版：北京尚艺空间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印　　刷：杭州丰源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710毫米×1000毫米　1/16

印　　张：20.25

字　　数：235千字

插　　页：4

版　　次：2021年7月第1版

印　　次：2021年7月第1次印刷

书　　号：ISBN 978-7-213-10149-6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市场部联系调换。

前言

先说三则故事。

一

西汉河平二年（公元前27年），汉宣帝的第四个儿子东平王刘宇来到长安，向他的侄子汉成帝“上疏求诸子及《太史公书》”，希望皇帝可以将宫中所藏诸子百家之书与太史公所写《史记》赐一份给自己，让自己带回封地慢慢研读。

汉成帝找来舅舅王凤商议此事。王凤坚决反对赐书给东平王，理由是“诸子书或反经术，非圣人，或明鬼神，信物怪；《太史公书》有战国纵横权谲之谋，汉兴之初谋臣奇策，天官灾异，地形厄塞：皆不宜在诸侯王。不可予”。[(1)]意思是，诸子百家之书与朝廷宣扬的主流经义、褒奖的圣人行迹是唱反调的，《太史公书》记载了战国时期隐秘的纵横家权谋，披露了本朝开国的秘事，这样的书籍不能赐给诸侯王。

汉成帝采纳了舅舅的意见。他告诉叔父，“‘五经’圣人所制，万事靡不毕载”，好好读朝廷推荐的“五经”就行了，那里面记载了天底下所有的事情。

皇帝拒绝赐书给诸侯王的背后潜藏着自秦汉至明清始终袭用的古老统治术，即公开宣扬的历史脉络与运行逻辑往往并不是真实的历史脉络与运行逻辑。王凤所谓的“汉兴之初谋臣奇策”，直白点说就是“刘氏夺取天下的真实手段”。真实的手段大多诡诈而残酷，无法拿上台面。只有“其先刘媪尝息大泽之陂，梦与神遇。是时雷电晦冥，太公往视，则见蛟龙于其上。已而有身，遂产高祖”

这样的虚无故事与“四方归心”[(2)]之类的空洞言说，才可以写进官修史书。

东平王刘宇对诸子百家之书与《史记》的兴趣，换回的是汉成帝对他的更严密监视。

二

唐武后永昌 元年（公元689年）闰九月，检校纳言魏玄同被酷吏周兴诬陷。武则天勒令他在家中自尽，由监刑御史房济现场监督执行。

闰九月十五日，魏玄同奉武后之命即将自裁。房济素来钦佩他的德行，忍不住劝他：“丈人何不告密，冀得召见，可以自直。”意即，您可以说有事要向太后告密，太后一定召见（武则天几乎会召见所有告密大臣），如此就可以得到当面辩解、自证清白的机会。

魏玄同拒绝了房济的好意。他说：“人杀鬼杀，亦复何殊，岂能做告密人邪！ ”[(3)]被人杀死，被岁月杀死，没什么区别。我魏玄同岂 能做一个告密之人？

武后时期，构陷与杀戮当道，坚持不做告密者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暗无天日的时代始于五年之前，也就是唐睿宗文明元年（公元684年）。那年春天，“有飞骑十余人”在洛阳坊间饮酒，其中一人喝醉了发牢骚，说早知道支持太后并无额外的赏赐，当初还不如支持李显（年初，唐中宗李显被武则天废黜帝位）。其中一人当即离座，去洛阳宫告密。酒未喝完，众人已被羽林卫捕获，发牢骚者被处斩，同饮者以知情不报之罪遭绞杀，举报者赐官五品。宋朝历史学家司马光说，武后时期的告密之风“自此兴矣”。

为了鼓励天下人告密，武则天制定了详细的法律条文来优待告密者。比如，不许任何官员盘问告密者。地方官府须给告密者准备马匹，并负责将他们安全送到女皇跟前，途中按五品官的标准供给饮食（每日细米两升、面两升三合，酒一升半，羊肉三分，瓜两颗）。告密的内容若合武则天心意，告密者可以越级升官；若有不实，也不会受到惩罚。于是，“四方告密者蜂起，人皆重足屏息”。[(4)]

告密时代不需要正人君子。因为统治者追求的不是真相，而是恐惧。只有那些没有廉耻的人，才能源源不断地供给令人战栗的素材，让天下人胆战心惊，继而陷入思想与行为的自我审查中。所以，武则天重用的酷吏侯思止、来俊臣等都是些地痞流氓。侯思止“贫，懒不治业”，沦落到给人做家奴，告密时代一开始，就飞奔入京诬告本州刺史谋反。来俊臣的亲爹与养父都是赌徒，他成年后终日游手好闲、为非作歹，是告密之风将他从牢狱中“解救”了出来，他在狱中叫嚷要去京城告密，无人敢阻拦。

风潮所及，许多人的行为出现了扭曲。鱼保家本是一名发明家，却在告密时代的第三年选择了职业转型，决定将自己的发明天赋用在更有“前途”的告密事业上。鱼保家设计了一种叫作“铜匦”的工具，献给未来的女皇。这件四方形的器物分为东、南、西、北四格：东面的青色格子写着“延恩”，供人为女皇歌功颂德，求取功名，也可提出促进农业和人民福利的设想和计划；南面的红色格子写着“招谏”，供人对朝政提出批评；西面的白色格子写着“伸冤”，供有冤情者诉说冤屈，要求公正；北面的黑色格子写着“通玄”，供人报告自然灾害的消息和机密。简言之，它是一个意见箱，也是一件鼓励告密的利器。

未来的女皇武则天很满意这件作品，下令将它安放在朝堂之上。她要的是众人面对铜匦时的战战兢兢。

但鱼保家并没有迎来他预期中的光明前途。铜匦中很快就出现了一封针对他的告密信，信中说鱼保家给李敬业的叛军制造过兵器。不需要查证，也不需要审判，鱼保家被直接交给了酷吏索元礼。索元礼是一个胡人，在大唐全无根基，他的荣华富贵全系于武则天一身。为了配合告密时代，索元礼兢兢业业发明了许多惨绝人寰的刑具，有“凤凰展翅”“驴驹拔橛”“仙人献果”“玉女登梯”等多种名号。其中有一种铁圈，先套在头颅之上，再往圈中打入木橛，可致“脑裂髓出”。索元礼刚拿出他的刑具，鱼保家就招了供，认了罪，只求速死。

发明断头台的人死于自己的断头台，发明铜匦的鱼保家也死于自己的铜匦。对武则天而言，铜匦是有用的，鱼保家的死也是有用的，它们能带来恐惧，恐惧能带来自我审查。但活着的鱼保家没什么用。这是鱼保家想要加入告密者的队伍，求取功名利禄，却被告密时代吞噬的主要原因。

然而，在永昌元年，魏玄同用自己的死，否定了武则天一手构筑的黑暗时代。他以一句“岂能做告密人邪”，让那个时代仍存留着最后的道德底线，而没有堕落成百分之百的人间地狱。

三

北宋崇宁二年（1103年），宋徽宗赵佶在位，权臣蔡京当道。在赵佶的授意下，蔡京亲笔书写，将司马光、苏轼、秦观、黄庭坚等三百余人列入了“奸党”名单。这么做的原因是这些人反对“新法”，批评朝廷以搜刮民财为要务。宋徽宗与蔡京“敕令诸州据以刊石”，命各州县根据名单刻成“元祐党籍碑”，即“奸党碑”，立遍全国。

要刻石碑，自然就需要石匠。

长安有一位石匠叫作常安民。朝廷让他刻碑，他接到任务后，跑去见负责此事的地方官。常安民说："民愚人，不知朝廷立碑之意。但元祐大臣如司马相公者，天下称其正直，今谓之奸邪，民不忍镌也。"[(5)]意思是，我常安民是个老百姓，理解不了朝廷立碑的深意，但像司马光这样的大人，大家都称赞他正直，如今朝廷却说他们是奸邪，我不忍将他们的名字刻在"奸党碑"上。

地方官闻言大怒，要治常安民的罪。常安民于是说："被役不敢辞，乞不刻安民镌字于碑，恐后世并以为罪也。"他的意思是，自己只是一介草民，不敢推辞朝廷的任务，但是请求朝廷不要将自己的名字刻在碑上，告诉后世"奸党碑"是自己刻的。

常安民的故事最早见于《邵氏闻见录》，这本书的作者邵伯温生活在两宋之际。邵伯温在他的书中说，他愿意把这个庶民的故事写下来，是因为"一工匠耳，尚知邪正，畏过恶，贤于士大夫远矣"。意思是，石匠尚且知道是非和善恶，比许多士大夫强多了。

常安民是一位真实存在的陕西石匠。迄今仍有史料可查、署名由常安民镌刻的石碑尚有六七块之多，如《奉天县新修浑武忠公祠堂记》《宋故清河县君张氏夫人墓志铭》《京兆府学移石经记》《游师雄墓志铭》《孙昭谏墓志》等。[(6)]

常安民不是唯一不愿助纣为虐的石匠。江西九江的石匠李仲宁开了一间"琢玉坊"，崇宁二年，九江的地方官让他去刻"元祐党籍碑"。李仲宁委婉地拒绝了官府的征召："小人家旧贫窭，止因开苏内翰、黄学士词翰，遂至饱暖。今日以奸人为名，诚不忍下手。"[(7)]意思是，他告诉地方官，自己以前很穷，谋了份石匠的营生，将苏轼、黄庭坚的诗文刻在石碑上，才勉强得以温饱。今日朝廷要我把他们的名字刻在"奸党碑"上，想到自己从前的工作，实在下不了手。

1970年出土的《中书舍人曾巩墓志铭》与1972年出土的《刘元周妻易氏墓志铭》证明了李仲宁确有其人。他的故事出自《挥麈录》，这本书的作者王明清生活在南宋初年。王明清说，地方官很佩服李仲宁，满足了他的愿望，而自己也很佩服李仲宁，所以把他的故事记录下来。

四

讲以上三则故事，是因为本书的内容大体相当于对这三则故事的一种回应。

今人常引用一句俗语说：“历史给人的唯一教训，就是人类从未在历史中吸取过任何教训。”这话其实错得离谱。普通人见不到“战国纵横权谲之谋，汉兴之初谋臣奇策”，依赖不完整乃至错误的信息加工出来的往往会是“假的历史教训”。拿了“假的历史教训”去比对前人的言行，自然会常常生出“秦人不暇自哀，而后人哀之；后人哀之而不鉴之，亦使后人而复哀后人也”这样的感慨。而对汉高祖刘邦、光武帝刘秀、唐太宗李世民、明太祖朱元璋等“肉食者”而言，是存在着另一种“真的历史教训”的，他们也切切实实地吸取了那些“真的历史教训”的精髓。光武帝们反思西汉及新莽亡国，成果是“三纲”的出炉。唐太宗反思隋亡的教训，得出的结论是“百姓无事则骄逸，劳役则易使”。朱元璋亲眼见识了元末流民组织成起义军的摧枯拉朽之势，得出的结论是“朕收平中国，非猛不可”，“猛”的极致是利用“知丁法”将明帝国的社会活力全部抽干，将每一个人重新打回原子状态。

遗憾的是，统治者对“真的历史教训”的精髓的吸取往往意味着普通人的灾难。所以，站在文明史的角度，魏玄同、常安民与李仲宁等人物其实远比秦皇汉武、唐宗宋祖更为重要。美国历史学家海斯有一段论述：“凡爱抽象的人类，而侮辱具体的个人者，或出

口便是对人类应负的责任，而无暇为其邻居服务者，这类的人，我们有充足的理由不相信他。”[(8)]苏联教育家瓦西里·亚历山德罗维奇·苏霍姆林斯基也有类似的感慨：“没有对人的同情心，就不可能有仁爱精神。爱全人类容易，爱一个人难。去帮助一个人，比宣称‘我爱人民’要困难得多。”[(9)]宏大词汇里的慷慨激昂未必能够推动时代进步，具体而微的坚守与抗争才是文明生生不息的重要根源。

最后，感谢为此书从酝酿到出版过程中提供帮助的所有人。感谢我的家人，尤其感谢我可爱的女儿谌大猫，她是我努力想要写一点有价值的文字的动力。

---

(1) 班固：《汉书·宣元六王传》，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3324—3325页。

(2) 班固：《汉书·高帝纪上》，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1、46页。

(3) 司马光：《资治通鉴》卷二百四，中华书局1956年版，第6460—6461页。

(4) 司马光：《资治通鉴》卷二百三，中华书局1956年版，第6439页。

(5) 邵伯温：《邵氏闻见录》，三秦出版社2005年版，第208页。

(6) 罗昌繁：《大历史与小人物：北宋晚期党争视域下的官私石工考察》，《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3期。

(7) ［宋］王明清：《挥麈录》，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版，第157页。

(8) ［美］海斯著，蒋廷黻译：《族国主义论丛》，新月书店1930年版，第322页。

(9) ［苏］B．A．苏霍姆林斯基著，赵玮、王义亮、蔡兴文、纪强译：《帕夫雷什中学》，教育科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242页。

目　录

前言

第一章　“理想国”与“理想民”

一、商鞅的“理想国”：国富而贫治，民愚则易治

二、韩非子的“理想民”：五蠹与六反

第二章　胡亥亡国的技术分析

一、秦政的残暴在于制度化伤害

二、秦二世而亡的变量一：官吏集团“苦秦”

三、秦二世而亡的变量二：未及驯化的新秦民

第三章　“白马之盟”的玄机

一、西汉建国的游侠底色

二、军功集团的权利与义务

三、百姓用脚投票奔向王国

第四章　游士消亡与秦制回归

一、遍地皆是失业游士

二、“求贤诏”里的规训

三、寄主的非正常死亡

第五章　西汉知识界对秦制的批评

一、贤良文学大战桑弘羊

二、寄望以“天命”约束皇权

第六章　天下归心与天人共弃

一、表演赢得万民拥戴

二、改革诱发土崩瓦解

三、光武帝君臣的反思

第七章　皇权、宦官与士人

一、曹腾巨额财富的由来

二、宦官与士人争夺人事权

第八章　如何自群雄中胜出

一、战胜豪强的另一面

二、直百五铢钱的奥秘

三、皇权缘何“破浮华”？

第九章　控制与汲取的“进化”

一、科举重塑官僚集团

二、增收变法花样百出

三、减负改革中途夭折

第十章　王朝的盛世潜流

一、“贞观之治”的民生疾苦

二、心照不宣的纳谏游戏

三、唐长安城的畸形繁华

四、“怀柔远人”的两笔账

第十一章　另一个造极之宋

一、赵匡胤的“百代之利”

二、仁宗时代亦无仁

三、开封城的吸血游戏

第十二章　明太祖猛于虎

一、以“猛”治官

二、以“猛”治吏

三、以“猛”治民

四、以“猛”治《孟子》

第十三章　东林挽歌

一、东林党批判皇权暴政

二、东林兴衰与明朝之亡

三、乾隆为何痛恨东林党？

第十四章　雍正密折治国

一、正面榜样与反面教材

二、全面侮辱打击科举出身的官员

三、以密折困锁群臣而自困

第十五章　同光中兴的逻辑

一、咸丰的外交与肃顺的内政

二、恭亲王奕䜣与慈禧太后的改革

三、同治中兴的含金量

第十六章　清王朝灭亡的原因

一、太后“西狩”大损中央权威

二、新政改革直指地方督抚

三、谘议局造就士绅组织化

返回总目录

第一章
“理想国”与“理想民”

自秦汉至于明清，是为中国的“秦制时代”，或谓“秦政时代”。

“秦制”“秦政”皆是由来已久的词语。宋人欧阳修曾言：“秦既诽古，尽去古制。自汉以后，帝王称号，官府制度，皆袭秦故，以至于今虽有因有革，然大抵皆秦制也。”[(1)]至近代，则有谭嗣同在《仁学》中畅言：“二千年来之政，秦政也，皆大盗也。”[(2)]

所谓“秦制”，是一种古代东西方皆有的政治制度，而以中国延续的时间最为长久，发育最为成熟。它有两个基本特征：

1．以官僚集团而非封建贵族作为政权统治的基础。封建贵族有可能与皇权正面博弈，形成较为稳固的契约或类契约关系，进而有可能诞生私有产权之类的概念。但官僚集团一方面是皇权的工具，另一方面又有自己的利益诉求，他们与皇权之间的冲突几乎不可能形成稳固的契约或类契约关系。秦制所追求的是“莫非王土”和“莫非王臣”。

2．皇权与官僚集团在施政中的主要诉求，是尽可能提升汲取人力与物力的强度与总量。为了做到这一点，他们致力于消灭一切有影响力的人与组织（包括控制、消灭官僚集团内部的“朋党化”），追求散沙化与原子化的扁平社会结构。

秦制的萌芽、成型与西周分封制的衰落、崩溃大致同步。秦制的基本观点至迟可以追溯到《管子》。《管子》中记载了管仲的这样一种政治思想：

> 利出于一孔者，其国无敌；出二孔者，其兵不诎；出三孔者，不可以举兵；出四孔者，其国必亡。先王知其然，故塞民之养，隘其利途。故予之在君，夺之在君，贫之在君，富之在君。故民之戴上如日月，亲君若父母。[(3)]

这段话的大意是：财富的流出渠道必须单一，必须由政府控制，也就是“利出一孔”，不能让百姓有多余的钱，不能让他们有发财的渠道。政府做到了“利出一孔”，就可以“予之在君，夺之在君，贫之在君，富之在君”，恩赐与剥夺、贫困与富有全由君王决定，百姓才会视官府为日月，爱君王如父母。

不过，作为齐国“稷下之学”的产物，《管子》一书带有强烈的杂烩气息。比如，它提出了“利出一孔”这样典型的秦制理念，但也强调“政之所兴，在顺民心。政之所废，在逆民心”[(4)]。提倡“利出一孔”，显然不能说是“顺民心”；提倡“顺民心”，就应该反对“利出一孔”。

秦制的成熟是由商鞅与韩非子完成的。

一、商鞅的“理想国”：国富而贫治，民愚则易治

商鞅的出身，历史资料的记载不够详尽，大略可以知道的是：商鞅姓姬，公孙氏，原是卫国贵族的远支，成年后投到魏国相国公叔痤门下，世称公孙鞅、卫鞅。商鞅是他在秦国受封于商后才有的称呼。

据说，公叔痤临终前，曾向魏王推荐商鞅，让他接替自己做相国。且告诫魏王，如果不能用之，就杀之。这大约不是史实，更像是商鞅入秦之后，为推销自己而编造出来的谎言。公叔痤死后，商鞅在魏国丢了饭碗。同时，新即位的秦孝公发布了招贤公告：“宾

客群臣有能出奇计强秦者，吾且尊官，与之分土。”[(5)]商鞅遂决意西行，去碰碰运气。

商鞅在秦国两年时间毫无进展，直到通过贿赂秦王的宠臣景监，才见到了秦孝公。据《史记·商君列传》记载，商鞅三见秦孝公，分别谈了帝道、王道与霸道，秦孝公的选择是霸道。对于秦孝公的选择，《史记》保留了一段商鞅的“自述”：

> 吾说君以帝王之道比三代，而君曰：“久远，吾不能待。且贤君者，各及其身显名天下，安能邑邑待数十百年以成帝王乎？”故吾以强国之术说君，君大说之耳。然亦难以比德于殷周矣。[(6)]

大意是：我先拿出来献给秦君的是儒家的“帝王之道”，但秦君追求生前“显名天下”，不愿等待“数十百年”，于是我换了一套“强国之术”，获得秦君青睐。秦君的选择虽佳，却也将导致其国之“德”难以与尊奉“帝王之道”的殷周相提并论。

这段“自述”的来历相当可疑。“帝王之道”与“强国之术”的分野是汉儒喜欢讨论的话题，“难以比德于殷周”的感慨更像是事后诸葛亮刻意将自己的观点挂靠在了商鞅身上。

其实，商鞅是一个所学庞杂、并无固定思想体系之人。君王喜好“帝王之道”，他就献上“帝王之道”；君王喜好“强国之术”，他就提供“强国之术”。他可以在道、术之间自由切换，毫无思想压力。秦王选择霸道，于是就有了商鞅变法。

严格来说，商鞅变法其实有先后两次。第一次始于公元前356年，也就是商鞅见到秦王后的第三年。这一年商鞅荣升左庶长，颁布了自己的第一份变法令，史书中一般称作“变法初令”。第二次

是在公元前350年，这一年商鞅升任大良造，相当于国相，借迁都之机再次推行变法。

前后两次变法，主旨上并无太大差异。据《史记·商君列传》记载，第一次变法时颁布的“变法初令”主要内容包括：

1．将民众编为什伍，实施连坐之法。具体的办法是“不告奸者腰斩，告奸者与斩敌首同赏，匿奸者与降敌同罚”。即不举报奸人者腰斩，举报奸人者获赏等同于斩敌首，藏匿奸人者受罚等同于投敌。

2．“民有二男以上不分异者，倍其赋。”即家中有两个成年男性却不分家者，双倍征收赋税。

3．鼓励公斗，按军功的大小授爵；禁止私斗，按情节轻重量刑。努力耕种、纺织之人可以免除本人的劳役和赋税，因懒惰而贫困者没为奴隶。

4．宗室也得靠军功来谋取富贵，“宗室非有军功论，不得为属籍”。制定明确的爵位和俸禄制度，田宅与奴隶的多少与爵位直接相关。有军功才有社会地位，无军功之人再怎么富有也无法提高政治身份。

有说法认为，商鞅的变法措施打击了“顽固腐朽的秦国旧贵族势力”，为底层平民提供了一条上升的通道。

这样的效果或许确实是有一些，但商鞅的本意并不在此。强化对民众的控制（什伍、连坐与告奸），将有力量的大家族打散为无力量的小家庭（民有二男以上不分异者，倍其赋），打击阻碍国家直接管理百姓的封建贵族，将人的社会地位与军功直接挂钩。这一

套变法措施的核心目的，都是提升秦国对资源（包括人力与物力）的汲取能力。

秦国致力于消灭国内的贵族。秦民存在的目的就是提供人力物力，给国家添砖加瓦。按《商君书》（该书虽未必是商鞅亲笔所写，却属于商鞅思想、言论的汇编无疑）的说法，要让百姓更好地为国家添砖加瓦，首要之务是消灭“六虱”。

“六虱”的概念见于《商君书·靳令》，具体是指六种危害国家的东西：礼乐、诗书、修善孝悌、诚信贞廉、仁义、非兵羞战。这些东西在今人眼中属于最基本的人类文明，但在商鞅眼中，却构成了对国家强盛的威胁。商鞅另有一套强国的逻辑：

> 国贫而务战，毒生于敌，无六虱，必强。国富而不战，偷生于内，有六虱，必弱。[7]

大意是：国家贫穷，多搞扩张战争是有益的，既可以损害敌国的利益，也可以保证本国没有“六虱”，国家必强；反之，国家富足，却不对外扩张，百姓生活安逸了，就会追求诗书礼乐，就会讲究孝悌、诚信，就会倡导仁义，反对战争，“六虱”全跑了出来，国家必弱。

《商君书》还解释了国家为什么应该制定告密制度，让百姓互相监视：

> 刑加于罪所终，则奸不去；赏施于民所义，则过不止。刑不能去奸而赏不能止过者，必乱。故王者刑用于将过，则大邪不生；赏施于告奸，则细过不失。治民能使大邪不生、细过不失，则国治。国治必强。[8]

大意是：罪行发生后，再对犯罪者实施刑罚，不能起到“去奸”的效果；义举发生后，再来奖赏当事人，也起不到“止过”的作用。刑罚不能“去奸”，奖赏不能“止过”，国家就会乱。所以，统治者必须在百姓违法之前，提前实施刑罚，如此才不会出现“大邪”；统治者必须赏赐告密的百姓，如此才不会忽略“细过”。统治百姓，能够做到“大邪不生”“细过不失”，国家就会强盛。

针对上述思想，商鞅有一句简练的总结：“杀刑之反于德，而义合于暴。”[9]——仁义只会抵达“暴”，杀戮反而会归于“德”。

在中国历史上，商鞅变法是第一次将“告密”纳入国家制度，也是第一次将“事前惩罚”制度付诸实施的变法。这种体制化的告密之风与秦国的兴亡相始终，直到汉文帝时代才得以改变。据《汉书·刑法志》记载：

> 及孝文即位……惩恶亡秦之政，论议务在宽厚，耻言人之过失。化行天下，告讦之俗易。吏安其官，民乐其业……选张释之为廷尉，罪疑者予民，是以刑罚大省，至于断狱四百，有刑错之风。[10]

汉文帝与众臣吸取秦朝灭亡的教训，以宽厚为务，以告密为耻，上行下效数十年，才使得“告讦之俗易”，社会上的告密风气得到纠正。事前惩罚制度也不再存在，取而代之的是“罪疑者予民”（近似于疑罪从无）。

商鞅的变法思想里还有一条叫作“国富而贫治”，原话是这样说的：

民贫则力富，力富则淫，淫则有虱。故民富而不用，则使民以食出，各必有力，则农不偷。农不偷，六虱无萌。故国富而贫治，重强。(11)

百姓贫穷，就会有求富的上进心（力富）；富有之后，就会放纵、贪图安逸（淫），然后国家有“虱”，就不能强盛。所以，百姓富裕了，就不易役使，那就让他们拿出粮食来顶替外出服役。他们重新陷入贫穷，就不会怠惰，“六虱”就不会产生。所以，让国家富有，使百姓保持贫穷的政策，可以让国家强上加强。

也就是说，商鞅主张将百姓的生活水准控制在最低限度的温饱线上。

上面这段话里的“虱”，前文已经说过，指的是礼乐、诗书、修善孝悌、诚信贞廉、仁义、非兵羞战六种危害国家的弊端。至于“淫”，《商君书》中有一段解释：

奚谓淫道？为辩知者贵，游宦者任，文学私名显之谓也。(12)

“淫”即淫逸。按商鞅的理解，“淫道”包括了靠能言善道得到富贵，靠游散求官进入体制，靠著书立说获取名声。也就是说，只有靠军功和耕作来获取社会地位才是正道，其他靠智慧、人脉资源、学识来提升阶层的做法都属于邪道，都对国家有害——尽管商鞅自己正是依靠着辩智和游宦而得到秦君的重用。

将国家与百姓对立起来，强调国家的富强必须建立在百姓的愚昧与贫穷之上，这是商鞅变法的核心理论。百姓越弱、越愚昧，国家就越强、越稳定，这是商鞅变法的核心逻辑。对此，《商君书》中有大量的陈述和解释。试举几例：

“昔能制天下者，必先制其民者也；能胜强敌者，必先制其民者也。”[(13)]过去能够控制天下的人，一定是首先制服他的民众的人；能够战胜境外强敌的人，一定是首先制服他的民众的人。

“朴则强，淫则弱。弱则轨，淫则越志。弱则有用，越志则强。”[(14)]“朴”是“淫”的反义，意思是没有知识、人脉、温饱之外的追求。这句话的意思是：百姓甘于“朴”国家就强，追求“淫”国家就弱。百姓弱，就安分守己；百姓强，就会逾越本分，对抗朝廷（越志）。

“无以外权爵任与官，则民不贵学问，又不贱农。民不贵学则愚，愚则无外交；无外交，则勉农而不偷。民不贱农，则国安不殆。国安不殆，勉农而不偷，则草必垦矣。”[(15)]如何引导百姓不去追求知识，是商鞅在改革过程中深入思考过的问题。他给出的答案是：不要在战功与农耕的收成之外，以任何理由赐予官爵，尤其不可让百姓有机会通过知识来提升阶层。久而久之，百姓就会很自然地鄙视学问、专心务农。百姓不重视学问，就会愚昧。百姓愚昧，就不会与外界有过多的思想交流。没有过多的思想交流，百姓就会一心务农。百姓一心务农，国家就会强盛。

“国之大臣、诸大夫，博闻、辨慧、游居之事，皆无得为，无得居游于百县，则农民无所闻变、见方。农民无所闻变、见方，则知农无从离其故事，而愚农不知，不好学问。愚农不知，不好学问，则务疾农。”[(16)]国家不许大臣与士大夫去做任何展示其博学多闻、能言善辩的事情，不准外出游历、寄居他乡。这样的话，农民就没有机会听见“变”（通“辩”，论辩）与“方”（学问、道理）。“知农”（聪明的农民）没有机会结识大臣、士大夫，也就没有机会放弃农业生产；“愚农”无知，不喜欢学问，也就会积极务农。

为了彻底贯彻“民愚则易治”的理念，商鞅在变法过程中的一些做法相当极端。据《史记·商君列传》记载：

> 秦民初言令不便者有来言令便者，卫鞅曰“此皆乱化之民也”，尽迁之于边城。其后民莫敢议令。[(17)]

百姓反对变法时，商鞅曾把他们抓起来坐牢，甚至砍头；百姓转变立场，称赞变法，又被商鞅抓起来流放边关。反对不可以，歌颂也不可以，目的是造成一种“民莫敢议令”的氛围。百姓不能议论，就会减少思考。百姓只需要遵守变法推行的政策，不需要思考政策的好坏。

公元前338年，秦孝公去世，太子驷继位，是为秦惠文王。商鞅的生命也走到了尽头。对此，商鞅本人是有预感的。他的变法帮助秦孝公极大地提升了秦国的资源（人力与物力）汲取能力，但这种提升是以打压秦国的封建贵族为前提的——秦孝公想要掌控更多的人力、物力，就需要秦国的封建贵族吐出更多的人力、物力。如今，新君即位，首要之务不在汲取资源，而在君位的巩固。君位的巩固需要获得国内政治力量足够的支持，其中自然也包括势力仍盛的封建贵族。而取悦封建贵族、获取他们支持的最佳办法就是诛杀商鞅。

为了保全性命，秦孝公一死，商鞅就自请隐退，回归封地，希望利用封地的武装保护自己（削弱贵族力量恰恰是商鞅变法的核心诉求），并联络魏国权臣，欲以秦国的利益为筹码换取魏国的帮助（但魏国无意为了商鞅与秦国开战）。最终，秦军攻入商地，“灭商君之家”，商鞅被杀，他的尸体被带回秦都咸阳，公开车裂。

商鞅虽死，但他的强国之道保存了下来，被历代秦君奉为治国的圭臬。

二、韩非子的“理想民”：五蠹与六反

商鞅之后，将弱民、贫民、愚民之道进一步具体化，使之具有极强的可操作性的人是韩非子。

与商鞅一样，韩非子也是反民智的。他曾说过这样一段话：

> 民智之不可用，犹婴儿之心也。夫婴儿不剔首则腹痛，不揊痤则浸益。剔首、揊痤，必一人抱之，慈母治之，然犹啼呼不止。婴儿子不知犯其所小苦致其所大利也。今上急耕田垦草以厚民产也，而以上为酷；修刑重罚以为禁邪也，而以上为严；征赋钱粟以实仓库，且以救饥馑、备军旅也，而以上为贪；境内必知介而无私解，并力疾斗，所以禽虏也，而以上为暴。此四者，所以治安也，而民不知悦也。夫求圣通之士者，为民知之不足师用。昔禹决江浚河，而民聚瓦石，子产开亩树桑，郑人谤訾。禹利天下，子产存郑，皆以受谤，夫民智之不足用亦明矣。(18)

韩非子说：民众的认识跟婴儿的心智一样靠不住。给婴儿剃头、剖疮，因为慈母抱在怀里的婴儿并不知道自己受的一点小苦将给他带来很大的好处，所以啼哭不休。如今国君勒令百姓去垦荒，他们认为太残酷；制定严刑峻法，他们觉得太严厉；征收赋税钱粮，他们认为太贪婪；要他们去服兵役，他们觉得太暴虐。其实，这些政策都是为百姓好，但百姓不领情、不高兴。以前的大禹、子产也有过类似的遭遇。所以，民智是靠不住的。

在《忠孝》篇里，韩非子还发过这样一番感慨：

> 古者黔首悗密蠢愚，故可以虚名取也。今民儇诇智慧，欲自用，不听上。(19)

大意是：上古之民好糊弄，随便鼓动几句就去流血、流汗；今天的百姓有了智慧，懂得为自己的利益盘算，不肯听从君主的命令。

那怎么办呢？

韩非子说，常规的办法是“劝之以赏”，即用利益来诱惑百姓；“畏之以罚”，即用刑罚来恐吓百姓。但这样做还远远不够，在《五蠹》《六反》等篇章里，韩非子建议，应该对百姓实施改造。具体的改造方法如下：

首先，需要清除五种人。

这五种人是：学者（相当于战国末期的儒家）、言谈者（相当于纵横家）、带剑者（相当于游侠）、工商之民（商人和拥有各种技艺的人）和患御者（害怕承担耕役而去充当贵族的门客或权力掮客的人）。(20)

这些人或聚众讲学，或游走四方，他们有知识，也有资源，还懂得社会体制的运作规则，对国家是有害的。韩非子把他们合称“五蠹”，即五种会蛀蚀树心的虫子。

其次，有六种人需要被教育。

这六种人是：畏死远难之人、学道立方之人、游居厚养之人、语曲牟知之人、行剑攻杀之人、活贼匿奸之人。(21)

若仅从“畏死远难”等词语来看，上述六种人似乎算不得好人。但要注意的是，“畏死远难”等字眼只是韩非子个人的价值判断。为了让统治者更方便地分辨出这六种人，韩非子在文章中还写下了普通百姓对这六种人的看法。在百姓的眼中，他们依次是：贵生之士（珍惜自己性命的人）、文学之士（追求学问的人）、有能

之士（相当于能出门远游、在外谋生的人）、辩智之士（相当于能用智力、口才谋生的人）、磏勇之士（相当于能提剑杀人的人）、任誉之士（敢违逆朝廷禁令，收容犯人的人）。

如此也就不难理解韩非子的逻辑了：这六种人有自己的追求，懂得维护自己的利益，对追求最大限度汲取人力、物力的秦制政权而言是有害的。

最后，有六种人必须得到奖赏、表彰，要树为模范。

这六种人是：赴险殉诚之人、寡闻从令之人、力作而食之人、嘉厚纯粹之人、重命畏事之人、挫贼遏奸之人。[22]

若仅从“赴险殉诚”等词语来看，上述六种人似乎都是极好的人。但要注意的是，“赴险殉诚”等字眼也只是韩非子个人的价值判断。根据韩非子的记载，普通百姓对这六种人的看法依次是：失计之民（只知道为官府去死的蠢人）、朴陋之民（见识短浅，服从权力的愚民）、寡能之民（除了种地没别的本领的人）、愚戆之民（没有智慧，逆来顺受的人）、怯慑之民（不敢反抗，只懂尊上的人）、谄谗之民（给官府充当耳目的人）。

这六种人吃进去的是草，挤出来的是奶，被汲取疼了也不会叫唤，是韩非子心目中最理想的国民。

韩非子对百姓的筛选与改造，与商鞅的理念高度吻合。在商鞅看来，合格的秦民不应该具有思考的能力。所以，他先是杀了一堆反对变法者，后又流放了一批“有来言令便者”（跑来赞颂新法好的人），造成了一种“民莫敢议令”的氛围，从此再没人敢议论新法的好坏。反对者被杀，歌颂者被流放，看似矛盾的做法实质上正是不让百姓思考变法推行的政策好坏。反对是一种思考，歌颂同样需要动脑子。百姓动脑子，不管是往哪个方向动，商鞅都不喜欢。

但百姓毕竟不是工蚁。正常情况下，正常智力的百姓绝不会主动愿意去做失计之民、朴陋之民、寡能之民、愚戆之民、怯慑之民与谄谗之民。那又该怎么办呢？

在《韩非子·说疑》篇里，韩非子提供了一套办法：“太上禁其心，其次禁其言，其次禁其事。”(23)禁事、禁言大致相当于不许游学经商和著书立说。“禁心”的意思，韩非子的解释是“远仁义，去智能”，具体说来就是一手控制资讯，一手灌输错误逻辑，二者结合可以做到无往不利。比如，东汉时期用五斗米道统治汉中的张鲁就深谙韩非子所述的“远仁义，去智能”的手段。五斗米道发展信徒的办法是让信徒“有病自首其过”(24)，但张鲁不会告诉信徒有些病是可以自愈的——这就是在控制资讯。只要有人在自我反省后病愈，单纯的先后关系就可以被张鲁渲染成因果关系。病好了是五斗米道的神力，病没好是自己反省不够，这就是在灌输错误的逻辑。

按《史记》的说法，秦始皇读到韩非子所写的《孤愤》与《五蠹》后，曾长叹道：“寡人得见此人与之游，死不恨矣！”(25)《三国志》也记载，刘备在遗诏中嘱咐太子刘禅，闲暇时要多读《商君书》，多向丞相请教《申子》《韩非子》《管子》中的道理。(26)及至北魏，又有博士公孙表，因向道武帝进呈《韩非子》而获赏。(27)再往后，则如明朝学者赵用贤所云：“三代而后，申、韩之说常胜。世之言治者，操其术而恒讳其迹。”(28)

用商鞅、韩非之道治国而讳言自己是商鞅、韩非的信徒，是中国两千年秦制时代的常态。

---

(1) 欧阳修：《欧阳修集编年笺注》第三册，巴蜀书社2007年版，第278页。

(2) 谭嗣同：《谭嗣同全集》下册，中华书局2007年版，第278页。

(3) 管仲：《管子·国蓄》，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版，第424页。

(4) 管仲：《管子·牧民》，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版，第2页。

(5) 司马迁：《史记·秦本纪》，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202页。

(6) 司马迁：《史记·商君列传》，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2228页。

(7) 商鞅：《商君书·靳令》，上海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第43页。

(8) 商鞅：《商君书·开塞》，上海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第32—33页。

(9) 商鞅：《商君书·开塞》，上海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第33页。

(10) 班固：《汉书·刑法志》，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1097页。

(11) 商鞅：《商君书·弱民》，上海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第66页。

(12) 商鞅：《商君书·外内》，上海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第71页。

(13) 商鞅：《商君书·画策》，上海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第57—58页。

(14) 商鞅：《商君书·弱民》，上海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第66页。

(15) 商鞅：《商君书·垦令》，上海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第5页。

(16) 商鞅：《商君书·垦令》，上海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第8页。

(17) 司马迁：《史记·商君列传》，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2231页。

(18) 韩非：《韩非子·显学》，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版，第561—562页。

(19) 韩非：《韩非子·忠孝》，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版，第567页。

(20) 韩非：《韩非子·五蠹》，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版，第552页。

(21) 韩非：《韩非子·六反》，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版，第503页。

(22) 韩非：《韩非子·六反》，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版，第503页。

(23) 韩非：《韩非子·说疑》，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版，第485页。

(24) 陈寿：《三国志·魏书·张鲁传》，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263页。

(25) 司马迁：《史记·老子韩非列传》，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2155页。

(26) 陈寿：《三国志·蜀书·先主传》，裴松之注引《诸葛亮集》“载先主遗诏”，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891页。

(27) 魏收：《魏书·公孙表传》，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782页。

(28) 《管韩合刻四十四卷·韩非子书序》，见陈奇猷：《韩非子集释附录》，中华书局1964年版，第1197页。

第二章
胡亥亡国的技术分析

《史记·陈涉世家》里，陈涉说过一句话：“天下苦秦久矣。”[(1)]

这里的“苦秦”一般解释为“苦于秦”“为秦所苦”，即在秦的统治下深感痛苦。其实，“苦”的原义是一种味苦的野菜，在秦汉时代的引申义并非痛苦，而是厌恶与憎恨。典型的例子如《史记·李将军列传》里的“士卒亦多乐从李广而苦程不识”（士兵们喜欢追随李广而厌恶程不识），苦对应乐，即是憎恶、厌恶之意。[(2)]陈涉其实是在说：天下人痛恨秦帝国已经很久了。刘邦后来入关中说“父老苦秦苛法久矣”，也是相同的意思。

从商鞅变法算起，秦的统治者孜孜不倦，以汲取与控制为要务，将百姓牢牢地捆绑在耕种和战争的战车上，让他们挣扎在生存线的边缘，已有百余年之久。但在这漫长的时光里，秦民之恨并没有给秦王造成多少困扰。相反，秦国稳如泰山，且在与东方六国的战争中无往不利，不断开疆拓土，终至统一全国。陈涉与刘邦的“久矣”二字也足以说明，秦民之恨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对秦王朝（国）的稳固并不构成真正的威胁。

然而，随着秦二世胡亥在公元前210年登基，原本看起来强盛无敌的秦王朝竟在短短三年之内就土崩瓦解了。

从统治之术的角度来审视，胡亥究竟做错了什么？

一、秦政的残暴在于制度化伤害

秦朝（国）是一个以商鞅之道与韩非之术为基础构筑起来的国家。它对内施政的核心诉求可以简单归纳为三点：1．强化管控；

2．增加汲取；3．减少乃至回避义务。

对于前两个核心诉求，即针对秦民的高强度管控与汲取，主要依赖两种手段——国家授田制度和与之配套的繁杂、细密的律法。

商鞅变法之后，秦国开始实施严格的国家授田制度。土地的所有权被国家垄断，秦民只能由国家赐予土地的使用权，而不能获得土地的所有权。“文献和出土资料都说明，秦朝的土地制度并非如董仲舒所云是土地私有制，而是土地国有制。全国统一实行授田制，农民有名于上即有田于下，基本标准是每户百亩，有军功爵者按照爵位高低增加授田。”(3)

国家授田制度的核心是将秦民牢牢地束缚在土地上，确保官府可以对秦民实施严苛的人身控制。该制度与其他律法条文配套，比如“令民为什伍，而相牧司连坐。不告奸者腰斩，告奸者与斩敌首同赏，匿奸者与降敌同罚”，就可以将秦民日常的生活、交往与生产全面置于官府的监控之下。正如湖北省云梦县睡虎地出土的秦国《田律》里规定，庄稼是否按时受到雨水的浇灌，被浇灌的田亩有多少，受到旱灾、涝灾、虫害的损伤有多少，秦民均需及时报给官府，且设置了报告文书的递送方法和日期。云梦龙岗秦简中写到的律法也规定：农民必须按照规定的时间从事生产活动，按时出门，按时归来，否则将会受到惩罚；基层官吏必须经常对不同种类和用途的土地进行登记、管理，若有某块土地因人力不足而耕种不到位，导致国家的收成减少，基层官吏的考核会受到严重影响，前途堪忧。(4)

正因为核心的谋生工具，也就是田地，被控制在国家手里，秦民并无所有权，所以睡虎地秦简《封诊式》中记载官府查封某里士伍甲的家产，将他的“室、妻、子、妾、衣器、畜产”全部详细记

录在册，连一条“牡犬”也没有漏下，却无只字提及他的田产。不提，自然是因为田产不属于他，没有提的必要。[(5)]

国家授田制度之下，秦民大体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自耕农，这些人通过向官府“立户著籍”来换取官府的授田，而“户”和“籍”正是官府向他们汲取赋税和劳役的依据。另一类是完全丧失了人身自由，只能在由政府直接管理的田地中耕作，他们是国家的直接农奴，从住宅、衣食到耕作用具全部由官府分配，常年过着饥肠辘辘的生活。前者的地位虽然稍好，但其耕作同样要受到官府的严格考核。《史记》中说得很明白：“事末利及怠而贫者，举以为收孥”[(6)]，不好好耕种政府授予的田地，去干别的或在家里偷懒，最后导致贫穷者，全家都会从自耕农降为奴隶。如何算“贫”？自然是官府说了算。可想而知，若一个自耕农家庭交完官府摊派下来的种种赋税之后无法维持生计，或根本就无法缴足官府的摊派，官府必然会剥夺这个家庭的授田资格，将之打入农奴的行列，也就是由国家的间接农奴降格为国家的直接农奴。故此，当代史学家刘泽华将秦的国家授田制度概括为：“国家通过‘受田’把一部分土地分给农民耕耘，农民要负担沉重的赋税和徭役、兵役。这些农民都被详细地登记在户籍里，并派有专门的官吏管理，没有任何行动自由，如逃亡被捉住要施以严重的刑罚”，“‘受田’制下的农民就是农奴”。[(7)]

自商鞅变法至秦始皇统一六国，这一百余年是一个秦民无处逃遁的时代。皇（王）权通过土地国有建立起严密的户籍制度，再通过官吏系统层层传递，将控制与汲取的意志输送到底层，最后由“啬夫”之类的基层官吏负责将之落实。“啬夫”等乡官拥有相当大的权力，他们代表国家主持辖下土地的重新分授，负责辖下国有田地的经营，管理着基层的公共粮仓与生产设备（比如铁制农具和耕牛是国有的），监督辖下自耕农和官府奴隶的耕作是否卖力，并

严防他们逃走成为脱离官府控制的“野人”。那是一个没有大地主、官僚、贵族来大搞兼并，也没有大地主、官僚、贵族可供自耕农抛弃所有土地、寻求庇护的时代。一个个原子化的秦民必须直面强大的秦朝（国）。一如历史学家张金光在其名著《秦制研究》中所言：

> 当时并不存在传统的所谓新兴地主阶级……国家完全控制着土地所有权，而且控制着与土地所有权相应的一切利益……最高统治者及其下属官僚群体，即大大小小的治民的统治主，构成了统治阶级，他们同时构成了剥削阶级……他们永远在运用官僚专制主义政治体制下权力转变为财富的不替之律，从国家、社会和直接生产者那里摄取到尽可能最大化的包括经济利益在内的各种利益……国家（政府）—社会—民对立的格局是当时社会阶级结构的基本特点。[8]

就经济成本而言，这是一种大利于皇（王）权，而大不利于底层百姓的制度设计。贾谊在《新书》中说：“秦不能分尺寸之地，欲尽自有之耳。输将起海上而来，一钱之赋耳，十钱之费，弗轻能致也，上之所得者甚少，而民毒苦之甚深，故陈胜一动，而天下不振。”[9]意思是：秦的皇（王）权之下只有治民的官吏集团，再无诸侯之类相对独立的政治实体作为缓冲。这对皇（王）权的稳固自然是极为有利的，但对百姓来说，他们向皇（王）权缴纳赋税的成本大大增加了，一钱的赋税往往需要十钱才能送到皇帝（王）的手里（注：贾谊谈的主要是物资输送的距离成本，其实更大的成本来自官吏集团的层层盘剥）。皇帝（王）的所得不多，但百姓受到的剥削已是极深。陈胜一声呼喊，天下群起响应，即是这个缘故。

为了让上述制度顺畅运转，秦律相当繁杂细密，追求凡事“皆有法式”。用《盐铁论》中的话说就是“秦法繁于秋荼，而网密于

凝脂”[(10)]，无论秦民干什么说什么，总有一款秦律适合你。睡虎地秦简的记载证明了《盐铁论》的总结是对的。

按现代人的常识，若其具体条文充分考虑到了事理和人情，法律细密是件好事。但秦朝（国）的情况与现代不同，秦政推崇“民愚则易治”，百姓的受教育程度极低，繁杂、细密的法律条文对秦民而言等同于巨大的知识屏障。而且秦朝（国）的政权自上而下并无独立的监察制度，无法约束秦吏用法律公正地治理秦民，秦民也不可能如现代人一般寻求独立的法律援助。所以，秦朝（国）的法律条文越是繁杂、细密（哪怕每一条在字面含义上都切近事理和人情），秦民就越容易陷入动辄触法的困境。

当然，秦朝（国）也并非完全没有针对秦吏的监督机制。《商君书》中提供过一种制度设计：

> 诸官吏及民有问法令之所谓也于主法令之吏，皆各以其故所欲问之法令明告之。各为尺六寸之符，明书年、月、日、时、所问法令之名，以告吏民。主法令之吏不告，及之罪，而法令之所谓也，皆以吏民之所问法令之罪，各罪主法令之吏。即以左券予吏之问法令者，主法令之吏，谨藏其右券木柙，以室藏之，封以法令之长印。即后有物故，以券书从事。[(11)]

这项制度的大意是：百姓向主管法令的官吏询问法律条文，官吏须如实解答，并留存档案（符）。档案里要写明询问日期及所询问的法律条文，然后将档案（符）的左片交给询问者，档案（符）的右片由官府归档保存，作为日后抽检官吏执法、百姓守法情况的依据。

遗憾的是，这项制度不可能产生效果。理由很简单，为打散聚族而居的宗族势力，秦律规定百姓不得聚族而居，让底层的社会结构趋向原子化，以保证由秦吏组成的基层政权在统治底层百姓时拥有组织优势。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由一群秦吏去监督另一群秦吏，秦民必然只剩下被秦法狠狠修理的命运。律法越是繁杂细密，秦吏从中谋利的机会就越多。更何况秦律本就只是秦王朝（国）统治者单方面的立法。

这也正是秦朝（国）内政真正的残暴之处。所谓的“天下苦秦久矣”，重点并不在焚书坑儒、修长城等突发性的暴行，而在于“秦法繁于秋荼，而网密于凝脂”的制度化伤害。只有明白了制度化伤害的严重性，才能理解刘邦入咸阳后的首要之务为何是公开与“父老”约法三章：“杀人者死，伤人及盗抵罪。”[(12)]“父老”是秦政所不喜欢的民间有组织能力的人物。尽废繁杂细密的秦法，代之以极其简单的三条约法，正是为了回应百姓因动辄触刑而积累的对秦法的深重怨恨。当然，待到夺取天下，刘邦又抛弃“三章”，重新拾起了萧何制定的改良版秦律。

秦政的第三个核心诉求——减少乃至回避义务，往往也是通过繁杂细密的律法来实现的。“以法治孝”就是一个非常典型的案例。

在秦朝（国），“孝”是一种绝对义务。皇（王）室内部的斗争常常会把孝拿出来作为武器。秦始皇（那时候他还没有成为始皇帝，称秦王）车裂了“假父”嫪毐，迁太后于咸阳宫后，曾遭到齐人茅焦的批评：“陛下车裂假父，有嫉妒之心……迁母咸阳，有不孝之行。”秦王政不得已，只好“自迎太后归咸阳”[(13)]。秦始皇死后，赵高矫诏令扶苏自杀，所用的名义也是“扶苏为人子不孝”[(14)]。

秦律针对不孝的惩罚很细致，也很严厉。睡虎地秦简《法律答问》记载："免老告人以为不孝，谒杀，当三环之不？不当环，亟执勿失。"(15)

问：60岁以上的老人（免老）告发儿子不孝，请求判处其死刑，应该执行"三环"（一种具体含义尚存争议的法律复核、宽宥程序）的程序吗？答：不应该执行，要赶快将他抓起来，别让他跑了。

在处罚不孝之人时，秦律常以被告父母的意见为准。睡虎地秦简《封诊式》记载："士五（伍）咸阳才（在）某里曰丙，坐父甲谒鋈其足，（迁）蜀边县。令终身毋得去（迁）所，论之。迁丙如甲告，以律包。今鋈丙足，令吏徒将传及恒书一封诣令史，可受代吏徒，以县次传诣成都，成都上恒书太守处，以律食。"(16)士伍咸阳某里人丙，其父甲请求将他断足，流放到蜀郡边远的地方，令他终生不得离开流放地。官府按甲所告将丙流放，并依法命其家属同往，将丙断足，命吏和徒隶携带通行的凭证及恒书一封送交令史，逐县解送丙到成都，到成都将恒书上交蜀郡太守，依法给予饭食。

如此，就有了一个很有意思的冲突：《商君书》将礼乐、诗书、修善孝悌、诚信贞廉、仁义、非兵羞战列为危害国家的"六虱"。认为只有铲除这六虱，百姓才会保持愚昧，才会乐于为国君所用，国家才会强盛。但现实中的秦朝（国）似乎并没有铲除孝悌的观念，还为它加上了法律保障。

这个冲突是否意味着秦王朝（国）的执政者摒弃了《商君书》中铲除"六虱"的政治理念？答案当然是否定的。对统治者而言，礼乐、诗书之类的东西容易铲除，但孝悌关系到秦民的养老，而养老又关系到社会的稳定，所以它是一个需要特别考量的事情。

为了强化对百姓的管控与汲取，商鞅用律法破坏了秦民聚族而居的传统，如一家有两个男丁而不分家，田赋加倍，导致大家族消亡，小家庭遍地。这个变化导致了两种后果：

1．小家庭面对官吏及其所属机构的盘剥，严重缺乏抵抗能力。面对变故，比如灾荒、疾病，抵御能力比不上聚族而居的大家庭。同时，秦政又推崇“民愚则易治”，走“国富而贫治”路线[(17)]，致力于使小家庭长期生活在温饱线上。这会促使小家庭尽可能地将财富留在手上，而不是慷慨地拿出来供养已分家的父母。

2．上行下效。上位者鄙弃修善孝悌、诚信贞廉、仁义等，将之视作必须清除的“六虱”，普通秦人的道德观念也会很自然地随之下降，进而影响到秦人的家庭伦理，使之不愿意供养父母。

对于这两种后果，贾谊有很具体的描述：

> 商君遗礼义，弃仁恩，并心于进取，行之二岁，秦俗日败。故秦人家富子壮则出分，家贫子壮则出赘。借父耰鉏，虑有德色；母取箕帚，立而谇语。抱哺其子，与公并倨；妇姑不相说，则反唇而相稽。其慈子、耆利，不同禽兽者亡几耳。[(18)]

贾谊说：自商鞅变法，秦国抛弃礼义、仁恩，一门心思集中于通过耕战进取，不过两年时间，秦国的社会风俗就败坏了。秦人家庭富有的，儿子长大后就分家单过；家庭贫穷的，儿子长大后就入赘别家。儿子借给父亲农具，会流露出施恩的表情；母亲拿了簸箕和笤帚，儿子就站在那里斥责。儿媳给孩子哺乳，不回避公公；媳妇与婆婆不睦，就反唇相讥。秦人宠爱孩子、贪图财利，他们的行为与禽兽已没多少区别。

汉初的另一位政论家贾山也在为汉文帝回顾前朝的历史教训时提到秦朝有一大弊政是“亡（无）养老之义”(19)，提醒汉文帝不可重蹈覆辙。

养老问题关系到社会稳定，秦朝（国）的统治者自然是知道这一点的。而现实是：1．秦政府只对汲取民力感兴趣，无意承担责任，也就是并不想承担贾山所谓的“养老之义”。2．愿意或能够承担养老责任的聚族而居的大家庭，已被秦法拆散成了不愿或无力承担养老责任的小家庭。那怎么办？站在秦朝（国）统治者的立场，最好的办法自然是将“孝”写入法律，强迫那些贫弱的小家庭去承担他们承担不起的给父母养老的责任。

然而，一个社会没有了孝的风气，绝不会只是百姓的道德素养出了问题，也绝非用法律强制百姓孝顺父母就可解决问题。秦人不孝的根源在于秦制的汲取与控制太过厉害，在于其弱民、贫民的政策太过残酷。不改变政策，寄希望于用法律手段强制秦人尽孝，实属缘木求鱼。

事实也证明了这一点。尽管秦法严苛，但秦人不孝的风俗并未扭转，而是一直延续到了汉初。贾谊感慨过秦人不孝，他对汉文帝说，汉朝建立之后，“汉承秦之败俗，废礼义，捐廉耻，今其甚者杀父兄”(20)。意思是，不讲礼义、捐弃廉耻的秦代旧俗延续到了汉代，且变本加厉，人们不但不愿赡养父母，甚至还常常发生杀害父兄的事情。贾谊的话有可信度，因为他不至于当着汉文帝的面，恶意贬低汉文帝治下的社会道德水准。

其实，对秦朝（国）而言，秦民的不孝之风是否有所改观并不重要，重要的是通过把孝写入法律，将事关社会稳定的养老的负担成功转嫁在秦民身上。如此，活不下去的年迈秦民成为不稳定的社会因素时，他首先想到的将是前往官府状告儿女，一如睡虎地秦简

里记载的那些养老官司，老无所依的父母出来状告儿女，而非要求官府救济自己。“以法治孝”的律法条文只是在为秦政对百姓的严苛控制与疯狂汲取打补丁。

在制度化的严苛控制与疯狂汲取之下，秦民长期处于一种衣不蔽体、食不果腹的困境之中。尚在攻伐六国之时，秦国就在“咸阳北阪上”大造豪华宫殿。秦始皇统治时期，赋税已收到全国百姓生产总量的三分之二，“男子力耕不足粮饷，女子纺绩不足衣服”[(21)]。胡亥继位后又征发天下“材士”五万人屯守咸阳，且朝廷不提供吃喝，“皆令自赍粮食，咸阳三百里内不得食其谷”[(22)]。秦民千里迢迢向北河前线输送粮食的结果，是“率三十钟而致一石”[(23)]，平均每消耗掉一百九十二石粮食，才能勉强将一石粮食送到前线。汉人严安后来这样描述秦始皇统治的时代：“丁男被甲，丁女转输，苦不聊生，自经于道树，死者相望。”[(24)]男丁被征去征战，女丁被调去参与后勤和运输，许多人不愿活得生不如死，路上随处可见自杀吊死在树上的尸体。

严安的话并非夸张。云梦睡虎地4号墓出土的木椟记载了一名士兵向家中急索衣物与钱财，其中有“室弗遗，即死矣，急急急”（家里再不送衣服、送钱来，我就要冻死了，急急急）的字样。这名士兵当时正在前线参加公元前224年的王翦攻陈之役。[(25)]秦政孜孜于控制与汲取，而无意履行哪怕最低限度的义务（如给前线士兵提供衣服），于此可见一斑。

但这样的事情其实是秦朝（国）自商鞅变法至秦始皇统一六国那百余年里的常态。如果不是秦二世统治的时代出现了另外两个致命变量，秦朝的伟业或许仍将在“天下苦秦久矣”的轨道上继续稳定运转，乃至发展壮大。

二、秦二世而亡的变量一：官吏集团“苦秦”

秦二世胡亥上台后，做了两件大事。

第一件事是带着丞相李斯“东行郡县”，效仿秦始皇巡幸天下。

胡亥这么做的原因是担忧“朕年少，初即位，黔首未集附”[(26)]，担心天下人（主要是指生活在六国故地的新秦民）不能像畏惧始皇帝那般畏惧自己。所谓的“东行郡县”其实就是向六国故地的新秦民挥拳头、亮肌肉，结果并没有什么大的作用，此事留待后文再说。

第二件事是对中央和地方的人事作大规模的调整。

胡亥这么做的原因是担忧“大臣不服，官吏尚强，及诸公子必与我争”[(27)]，他觉得旧班子里的大臣与地方官不可能像畏惧始皇帝那般畏惧自己。这样的不自信与胡亥年轻、得位不正（至少存在这种传言）、在朝廷与军中都没有亲信力量有很直接的关系。赵高对胡亥讲：“先帝之大臣，皆天下累世名贵人也，积功劳世以相传久矣。”[(28)]始皇帝时的那些大臣富贵世代相传，权势盘根错节（比如李斯，史载其家族中“长男由为三川守，诸男皆尚秦公主，女悉嫁秦诸公子”），这些人当然不可能像敬畏始皇帝那般敬畏二世皇帝。胡亥和赵高担忧他们与其他皇子（诸公子）勾结起来挑战皇权，倒也不是杞人忧天。

那怎么办呢？赵高给胡亥出了两个主意：

1．“案郡县守尉有罪者诛之，上以振威天下，下以除去上生平所不可者。”[(29)]——对地方官员（郡县守尉）实施大清洗。

2．“灭大臣而远骨肉……尽除去先帝之故臣，更置陛下之所亲信者近之。”[(30)]——对朝中大臣和皇族进行大屠杀，全换成胡

亥的亲信。

于是，胡亥大刀阔斧，大开杀戒。“杀大臣蒙毅等，公子十二人僇死咸阳市，十公主矺死于杜，财物入于县官，相连坐者不可胜数。”[(31)]

这么做的后果，是在秦帝国的官吏集团中造成了一种普遍的恐怖气氛，正所谓“群臣谏者以为诽谤，大吏持禄取容”[(32)]——敢提意见就会被定为诽谤罪，人人只求取悦胡亥保住俸禄；“自君卿以下至于众庶，人怀自危之心，亲处穷苦之实，咸不安其位”[(33)]——官吏人人自危，庶民穷困潦倒，个个感觉朝不保夕。

胡亥的官场大清洗也不是没有遭遇阻力。作为始皇帝时代的既得利益者，李斯就很不满胡亥的做法。“法令诛罚日益刻深，群臣人人自危，欲畔（叛）者众”之际，李斯多次进谏抗议，反被胡亥摊派了任务。胡亥说帝王富有天下，他想“长享天下而无害”，希望天天纵欲、享乐还不会亡国，李斯是丞相，让他来想办法，助皇帝实现这个愿望。同时，胡亥还以李由（李斯长子）抵御陈胜义军不力为由，“诮让斯居三公位”，威胁要整垮李斯家族。[(34)]

为了身家性命，李斯只好拿出法家在研究秦制方面的看家本领，献上那篇著名的《行督责书》，以迎合秦二世的想法。

所谓“督责”，简而言之，就是关于如何完全控制臣属，让他们为帝王做牛做马，乃至献出生命而不敢有半句怨言（“臣不敢不竭能以徇其主”）的权术。李斯提供给胡亥的“督责”之术，主要是两条：

1．实行“深督轻罪”。——有一点过错就往死里整。

2．摒弃“俭节仁义之人”“谏说论理之臣”“烈士死节之行”。——官吏系统只用坏人、不用好人。[(35)]

史载，胡亥读了《行督责书》，颇为满意，“于是行督责益严，税民深者为明吏……刑者相半于道，而死人日成积于市。杀人众者为忠臣”[(36)]。胡亥依照李斯的“督责”术，对官吏系统的整顿更加严酷，盘剥手段厉害的、杀人多的才是朝廷眼里的好官，路上到处是受刑之人，街市中被杀害者的尸体堆积成山。

当然，秦二世没有忘记除掉李斯，他下令将李斯腰斩，灭其三族。毕竟，李斯不除，所谓的“尽除去先帝之故臣”的目标就算不得真正完成。

秦帝国奉行“以吏治国”，官吏集团是它的统治基础。秦二世从中央到地方如此清洗他们，相当于破坏了“利益共同体”，严重动摇了秦帝国的根基。在中央，大清洗之后，秦二世遇事皆与赵高独断，“公卿希得朝见”[(37)]，朝臣沦为虚设。在地方郡县，先是陈胜起事攻陈，“陈守令皆不在”[(38)]；后又有会稽郡守殷通找来项梁，商议响应起兵，发出“天亡秦之时”[(39)]之语；武臣北伐，范阳令开城投降，赵地“不战以城下者三十余城”[(40)]。在最基层，刘邦起事，其核心团队中的许多人正是沛县当地的“吏”。

这些秦帝国的官吏之所以如此普遍而轻易地加入反秦力量之中，是因为他们与秦帝国之间的利益纽带已被秦二世的大清洗切断。他们在人力、物力的汲取方面有着丰富的经验，这些“技术官僚”的加入极大地提升了反秦力量的素质。

三、秦二世而亡的变量二：未及驯化的新秦民

不过，官吏“苦秦”并不会必然导致秦帝国的覆灭。

清洗了旧的官吏集团之后，只要再给胡亥一些时间，他就可以重建自己的统治基础，也就是赵高所说的“更置陛下之所亲信者近之”[(41)]，自上而下重新构筑一个亲胡亥的新官吏集团。

但胡亥低估了另一个变量：来自从前六国的新秦民。

胡亥并非没有重视这个群体，他也采取过一些措施。如前文所说，登基的第一年，因为担忧“黔首未集附”，担心天下人不能像畏惧始皇帝那般畏惧自己，胡亥就带着李斯，效仿秦始皇巡幸天下，“东行郡县”。他想要威慑的对象主要是生活在六国故地的新秦民，更具体地说，是想要威慑原六国遗留的“豪杰”[(42)]——那些有组织能力和活动能力的六国旧人。

但重视归重视，在胡亥的工作序列里，清洗旧的官吏集团远排在整顿从前六国的新秦民之前。这与秦始皇末年的工作序列是大不相同的。

这些新秦民与荀子见过的约三四十年前的老秦民有着明显的区别。据荀子的描述，老秦民的基本特征是：“其百姓朴……甚畏有司而顺。”[(43)]——很愚昧，害怕官府，相当顺从。自然，这种特性是秦国官府逾半个世纪的驯化结果——自商鞅变法至荀子入秦有约八十年的时间。

新秦民对秦国普遍怀有抵触情绪。“秦尝攻韩，围邢丘，困上党，上党之民皆反为赵，天下不乐为秦民之日久矣。”[(44)]这是纵横家苏代在公元前259年冬天对秦相范雎所说的话。苏代见范雎的三年之前，秦军进攻韩国的上党。眼见陷落已是定局，韩国的上党郡守冯亭派人前往赵国求助，其用来打动赵王的理由之一也是上党百姓“其民皆不欲为秦，而愿为赵”[(45)]。苏代见范雎之后两年，公元前257年，又有齐人鲁仲连发出了“义不帝秦”的誓言。鲁仲

连说，秦国乃弃礼义之地，专以权术驱策士人，以虏囚对待百姓。若秦国一统天下，“则连有赴东海而死耳，吾不忍为之民也”。[(46)]鲁仲连宁愿跳东海而死，也不肯做秦国的百姓。

大略同期，还有一篇由秦国的大臣撰写、呈递给秦王阅读的文章，被误收在了《商君书》里，即其中的《徕民》（这篇文章提到了长平之战，当然不可能是商鞅的作品）[(47)]。这位秦国的大臣说：秦国幅员辽阔，人口不足；韩、魏等国土地狭小，人口相当稠密。老百姓想要的无非是耕地和住宅，秦国有多余的耕地和住宅，韩、魏等国的耕地和住宅非常紧张，但韩、魏等国的百姓没人愿意迁来秦国，因为在秦国做“士”很惨，做“民”太苦，正所谓“民不西者，秦士戚而民苦”[(48)]。

苏代也好，鲁仲连也好，那位不知姓名的秦国大臣也罢，他们共同指出了一个问题：在秦国军威赫赫的年代里，东方六国的百姓鲜少有人愿意主动投奔秦国的怀抱，因为做秦民实在太苦。也就可想而知，在秦二世的时代，那些被纳入秦帝国时日尚浅的“新秦民”仍存有对昔日时光的怀念。他们体验过更多的自由、更轻的赋役、更松散的控制，见识过更好的生活，他们的记忆还没有完全消失。

公元前230年，秦灭韩；公元前228年，灭赵；公元前226年，灭燕；公元前225年，灭魏；公元前223年，灭楚；公元前221年，灭齐。秦国只用了短短10年时间，就消灭了六国，这是令人惊叹的速度。但这么快的速度也使始皇帝没有足够的时间，来将施加在旧秦民身上的那套驭民体系全面移植到新秦民身上。他还没有来得及摧毁新秦地上的一切有组织的“中间力量”，进而使所有百姓以原子化的形态直接面对国家的汲取，或者说他还没有来得及在六国之地造就出“一个强大到极点的政府、一个萎缩到极点的社会以及一群沉默到极点的个人”[(49)]。

所以，当陈胜于公元前209年，也就是楚国灭亡后的第14年，在楚国故地起事时，他得到了诸多昔日豪杰的响应，其中包括了春申君门下的游侠周文、信陵君门下的游侠张耳。由《史记·张耳陈馀列传》不难看出，张耳这样的人物尽管在入秦之后失去了效仿信陵君广纳门客的现实条件，甚至落魄到做“里监门”、被“里吏”鞭笞的地步，但他并不是一个原子化的存在。与张耳为刎颈之交的陈馀自称“尝游赵，知其豪杰及地形”，即是这些人社会活动能力犹在的明证。[(50)]

刘邦起事前的经历也显示了旧秦地的驭民体系尚未能够在新秦地完全铺开。刘邦年轻时曾是张耳的门客。公元前225年，秦军水灌大梁城，灭了魏国，张耳成为朝廷的通缉犯，不得不仓皇出逃。刘邦也只能结束门客的生活，返回故里。[(51)]次年，秦军攻楚，尽收淮北之地，刘邦从楚人变成了秦民，但他早年作为游侠构筑起来的社会关系和活动的力量并未因此而消散。在体制内，他可以得到萧何、曹参等沛县之吏的维护；在体制外，他有樊哙这样的爪牙（史载“与高祖俱隐”）。他口称以万钱作为贺礼，实则不带一钱，成功与“善沛令，辟仇，从之客”[(52)]的吕公（他显然不是一般的平民）结交，进而成为姻亲，这个过程也是典型的游侠行为模式。

刘邦至咸阳见始皇帝而感慨：“嗟乎，大丈夫当如此也！”[(53)]项羽于会稽见始皇帝而发出豪言：“彼可取而代也。”[(54)]“新秦民”中非原子化、有社会活动力量的六国的旧贵族与豪杰、游侠的这种心态远不是一场东巡可以消灭的。始皇帝不能，胡亥自然更不能。

也就是说，当秦二世胡亥在公元前210年登基，他所面临的现实是：秦已消灭六国，但还没有来得及消化六国残余的贵族、游侠、豪杰、文士（如持孔门礼器投奔陈胜的鲁地之儒）和宗族势

力，尚未将他们变成原子化的个体。而“天下苦秦久矣”是自商鞅变法的时代开始，已经延续了130余年的一种常态。

这个时候，胡亥开始清洗秦帝国的统治基础——官吏集团。于是，秦帝国的统治基础分崩离析，再加上外部又出现了有组织的武装力量，亡国就成了一件顺理成章、水到渠成的事情。

---

(1) 司马迁：《史记·陈涉世家》，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1950页。

(2) 夏麟勋：《“天下苦秦久矣”别解》，《山东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1991年第3期。

(3) 臧知非：《社会冲突的制度史考察：以秦汉土地赋役为例》，《史学月刊》2015年第12期。

(4) 臧知非：《龙岗秦简“行田”解：兼谈龙岗秦简所反映的田制问题》，《秦汉研究》2007年第1期。

(5) 宋敏：《试论秦的土地国有制》，《求是学刊》1980年第4期。

(6) 司马迁：《史记·商君列传》，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2230页。

(7) 刘泽华：《八十自述》，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7年版，第361页。

(8) 张金光：《秦制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版，第109—110页。

(9) 贾谊：《新书·属远》，见《贾谊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76年版，第59页。

(10) 桓宽：《盐铁论·刑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第113页。

(11) 商鞅：《商君书·定分》，上海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第80页。

(12) 司马迁：《史记·高祖本纪》，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362页。

(13) 司马迁：《史记·秦始皇本纪》，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229页。

(14) 司马迁：《史记·李斯列传》，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2551页。

(15) 《睡虎地秦墓竹简》，文物出版社1978年版，第195页。

(16) 《睡虎地秦墓竹简》，文物出版社1978年版，第263页。

(17) 商鞅：《商君书·去强》，上海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第16页。

(18) 班固：《汉书·贾谊传》，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2244页。

(19) 班固：《汉书·贾邹枚路传》，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2333页。

(20) 班固：《汉书·礼乐志》，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1030页。

(21) 班固：《汉书·食货志上》，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1126页。

(22) 司马迁：《史记·秦始皇本纪》，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269页。

(23) 司马迁：《史记·平津侯主父列传》，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2954页。

(24) 司马迁：《史记·平津侯主父列传》，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2958页。

(25) 杨宽：《战国史料编年辑证》下册，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第1261—1262页。

(26) 司马迁：《史记·秦始皇本纪》，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267页。

(27) 司马迁：《史记·秦始皇本纪》，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268页。

(28) 司马迁：《史记·秦始皇本纪》，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268页。

(29) 司马迁：《史记·秦始皇本纪》，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268页。

(30) 司马迁：《史记·李斯列传》，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2552页。

(31) 司马迁：《史记·李斯列传》，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2552页。

(32) 司马迁：《史记·秦始皇本纪》，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268页。

(33) 司马迁：《史记·秦始皇本纪》，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284页。

(34) 司马迁：《史记·李斯列传》，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2553—2554页。

(35) 司马迁：《史记·李斯列传》，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2554—2557页。

(36) 司马迁：《史记·李斯列传》，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2557页。

(37) 司马迁：《史记·秦始皇本纪》，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271页。

(38) 司马迁：《史记·陈涉世家》，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1952页。

(39) 司马迁：《史记·项羽本纪》，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297页。

(40) 司马迁：《史记·张耳陈馀列传》，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2575页。

(41) 司马迁：《史记·李斯列传》，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2552页。

(42) 司马迁：《史记·项羽本纪》中有项梁“部署吴中豪杰为校尉、侯、司马”的记载，《史记·陈涉世家》中有陈涉起事占据陈县后“号令召三老、豪杰与皆来会计事”的记载，分别见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297、1952页。

(43) 荀况：《荀子·强国》，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版，第95页。

(44) 司马迁：《史记·白起王翦列传》，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2335页。

(45) 刘向：《战国策·赵一》，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版，第368页。

(46) 刘向：《战国策·赵三》，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版，第422页。

(47) 仝卫敏：《〈商君书·徕民篇〉成书新探》，《史学史研究》2008年第3期。

(48) 商鞅：《商君书·徕民》，上海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第48页。

(49) 李若晖：《郡县制时代：由权力建构与社会控制论秦至清的社会性质》，《文史哲》2011年第1期。

(50) 司马迁：《史记·张耳陈馀列传》，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2571—2573页。

(51) 《史记·张耳陈馀列传》载："高祖为布衣时，尝数从张耳游，客数月。"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2572页。又，《史记·魏公子列传》载："高祖始微少时，数闻公子贤。及即天子位，每过大梁，常祠公子。"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2385页。

(52) 司马迁：《史记·高祖本纪》，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344页

(53) 司马迁：《史记·高祖本纪》，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344页

(54) 司马迁：《史记·高祖本纪》，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296页。

第三章
“白马之盟”的玄机

公元前206年建立的西汉王朝是在反秦战争中诞生的，带有浓重的反秦制色彩。所以，在最初的五十年里，它的统治模式与商鞅、韩非设计的秦制存在着一定程度的偏离。这种偏离主要体现为西汉建立之初五十年尊奉黄老之学的“无为而治”。

“无为而治”这一政治主张来自《老子》。《老子》是一本写给统治者，也就是书中称呼的“圣人”看的书。《老子》呼吁的“无为”并非后世道家所宣扬的宗教意义上的与世无争，而是希望统治者收敛自己的理想与欲望。书中写得明白，“圣人欲不欲，不贵难得之货”——统治者应该收敛自己的欲望，别动不动就要什么稀世珍宝；“（圣人）以辅万物之自然而不敢为”——（统治者）要顺应自然规律去行事，不要为所欲为。《老子》还给“圣人”分出了等级：

> 太上，不知有之；其次，亲而誉之；其次，畏之；其次，侮之。

最好的统治者会让百姓感觉不到他的存在（因为他完全不搞事）；一般的统治者会让百姓喜欢他、赞誉他（做一些对百姓有好处的事）；坏的统治者会让百姓畏惧他（以严刑峻法压迫百姓）；最坏的统治者会让百姓恨他、骂他、诅咒他（以暴力控制、榨取、迫害百姓）。(1)

但西汉初年皇帝的“无为而治”与《老子》的本意有着相当大的差距。实际上，是“白马之盟”确立刘姓为王的“准契约”构筑出的一种特殊的权力结构与统治基础，迫使汉初的皇权不得不以“无为”自居，对自己的野心与欲望加以约束。“白马之盟”是汉

高帝刘邦与诸侯王、重臣三方共同见证而立下的盟誓，所以可以称之为契约；但这个盟誓的具体内容并未形诸文字、公开刊行，所以加一个“准”字。

一、西汉建国的游侠底色

今人常以史书中有“无赖”一词，误会刘邦是个地痞流氓，其实不然。“无赖”一词见于《史记·高祖本纪》中刘邦的自述。当时，未央宫建成，刘邦大会诸侯、群臣宴饮，席间向老父敬酒，有这样一段说辞：

> 始大人常以臣无赖，不能治产业，不如仲力。今某之业所就孰与仲多？[(2)]

在《说文解字》中，“赖，利也”。刘太公指责刘邦“无赖”，是说他没有正经营生，不能像刘仲那般“治产业”，并非指责刘邦是个地痞流氓。

其实，青年刘邦的自我期许乃是做一名游侠。

刘邦只比秦始皇小3岁。他的童年是如何度过的，史料没有记载。关于他的少年时代的记载也相当匮乏，只在《汉书·韩彭英卢吴传》中有一鳞半爪：

> 卢绾，丰人也，与高祖同里。绾亲与高祖太上皇相爱，及生男，高祖、绾同日生，里中持羊酒贺两家。及高祖、绾壮，学书，又相爱也。里中嘉两家亲相爱，生子同日，壮又相爱，复贺羊酒。[(3)]

少年刘邦“学书”期间与卢绾意气相投，能获得乡里父老的“羊酒之贺”，他应是个追求上进之人。刘邦成年后不甘庸碌，离

乡背井，踏上游侠之路，与他的上进心多少应有些关系。

信陵君魏公子无忌是青年刘邦的偶像。刘邦其实没有见过信陵君，他踏上游侠之路时，信陵君早已去世。但他居住的沛郡丰邑乃是战国末期楚、魏两国的边境地带，从当地的魏国移民口中，想必刘邦听过不少关于信陵君和他三千门客的故事，比如城门下的侯嬴、屠宰场里的朱亥。

对信陵君这位将战国时代游侠之风推向巅峰的人物，刘邦终生怀有崇敬之情。汉高帝十二年（公元前195年），也就是刘邦人生的最后一年，他征伐黥布归来，路过大梁，祭祀过信陵君墓，意识到自己时日无多，还特意为信陵君留下五户人家为其守墓，命其世代奉祀。[(4)]

刘邦游侠生涯的顶点是做了张耳的门客。张耳原是信陵君的门客，信陵君去世后，张耳回归江湖，恢复游侠身份，后在外黄遇到一桩姻缘，继承了妻子家的财富，从此以外黄为基地，自为门主。他以信陵君的后继者自任，网罗天下游侠，其影响力引起了魏王的注意，又做了外黄县令。外黄大致在今天的河南商丘，丰邑大致在今天的江苏丰县，两地相距大约一百多千米。刘邦何时来到外黄，如何成为张耳的门客，已不得而知。《史记·张耳陈馀列传》仅如此记载："秦之灭大梁也，张耳家外黄。高祖为布衣时，尝数从张耳游，客数月。"[(5)]

张耳与刘邦是战国时代的最后一批游侠。公元前230年，刘邦27岁，秦灭韩。前228年，刘邦29岁，秦破赵。前226年，刘邦31岁，秦陷燕都蓟城。前225年，刘邦32岁，秦军水灌大梁，魏国灭亡。刘邦的游侠生涯就此走到了终点。

秦国以法家思想为治国准则，凭借“繁于秋荼，密于凝脂”的律法和高效的官吏体系，在人力与物力的汲取上优于山东六国。在秦始皇的政治版图里，没有体制外的势力存在的空间。所以，魏国灭亡后，游侠领袖张耳就成了秦国通缉名单上的重点人物。张耳出逃，刘邦只好返回家乡。但家乡沛郡丰邑已容不下游侠。公元前223年，秦军六十万进攻楚国，楚将项燕兵败，淮北之地入秦，沛郡也在其中。亡楚归秦，刘邦的人生发生了重大转折。

公元前223年前后，刘邦参加秦国地方小吏选考合格，被任命为沛郡泗水亭亭长。这一年，他34岁。公元前210年，刘邦47岁，负责押送黔首前往骊山服徭役。因逃亡者众，他干脆趁夜将押送的黔首全部释放，抛弃了秦帝国体制内小吏的身份，遁入芒砀山中，回归游侠的身份。

刘邦自身的游侠底色与西汉政权的游侠底色是一致的。日本学者守屋美都雄在《关于汉高祖集团的性质》一文中详细考察了刘邦政治集团中的客、中涓、舍人与卒，得出结论，认为他们在秦末乱世中选择与刘邦结合是基于一种平等的信任关系。这种信任关系的来源正是刘邦的“任侠仗气”。其中一个显著的表现是刘邦入蜀之时，其他诸侯中仰慕并跟从他的人多达数万，与信陵君门下的食客三千颇为相似。[(6)]

刘邦的游侠底色也体现在集团成员的行为模式上。张良作为韩王的信使出使刘邦，恰逢汉军战败，岌岌可危，人劝张良速速离去，以免受池鱼之殃，结果被张良以汉王与我相交，此时“亡去不义”的理由拒绝。[(7)]楚汉之争进入关键时刻，蒯通劝第三方的关键力量韩信乘机三足鼎立，当年的游侠、如今的齐王韩信拒绝这一提议的理由同样是“汉王遇我甚厚”。韩信还说：“（汉王）载我以其车，衣我以其衣，食我以其食。吾闻之，乘人之车者载人之患，衣人之衣者怀人之忧，食人之食者死人之事，吾岂可以乡利倍义

乎！”[(8)]这是一段典型的游侠之间的信任关系。刘邦将自己的车让给韩信坐，将自己穿的衣服送给韩信穿，将自己吃的食物拿给韩信吃，这是一种典型的游侠之义。作为反馈，韩信想要“载刘邦之患”“怀刘邦之忧”“死刘邦之事”，也是一种典型的游侠之义。

稍加留意，其实不难发现，以游侠为底色在秦末乱世中取得成功的并非只有刘邦一人。刘邦待之如兄长的王陵以游侠身份聚众数千人，成为一股不容忽视的反秦力量。[(9)]英布、彭越等人均以游侠起家，为众豪杰所推举。[(10)]刘邦曾经的门主张耳更不必说，乃是反秦运动中极著名的游侠领袖。秦帝国扩张太快，严密的法家网络尚未来得及消灭隐匿在民间的游侠力量，当乱世来临，山东六国的游侠们乘势而上，极大地影响了历史的进程。

这样的建国背景很自然地使得游侠之风在汉初的社会生活中相当盛行。代国相国陈豨门下游侠、食客如云，一度“从车千乘”[(11)]。朱家收留亡命游侠季布，还设法为季布向刘邦求情。所谓“得黄金百斤，不如得季布一诺”，正体现了汉初社会对游侠精神的认同。司马迁在《史记》中为游侠单独立传，其深意也正在于此——无《史记·游侠列传》，不足以解释西汉建国的背景。

二、军功集团的权利与义务

正因为西汉建国有这样一种游侠底色，所以刘邦称帝后与下属形成的并非后世通常所言的君臣关系，而更近似于一种平等的契约关系。

这种关系见于西汉初年的财富分配与权力分配。

先说财富分配。

高帝五年（公元前202年）十二月，刘邦召集汉及其他诸侯国的军队在垓下与项羽决战，获胜。同年五月（汉初继承秦制，以十月为岁首，故高帝五年十二月在前、五月在后），刘邦发布诏书，解散军队，命其归家。诏书的核心内容是谈如何优待爵位高者，重新分配社会财富，具体来说就是给参与楚汉之争的“军吏卒”分配田宅。

据李开元的推算，这场社会财富的重新分配大约涉及六十万“军吏卒”。若将六十万“军吏卒”的家庭人口也算在内，则大约涉及三百万人口，占汉初总人口的16%—20%。根据汉代军法，第五等爵位——大夫应授予500亩土地和25亩住宅地。如此，六十万“军吏卒”应授予的耕地总量约为3亿亩，住宅地总量约为1500万亩，占全国耕地总量的40%左右。[(12)]

这个规模是相当惊人的。刘邦自然也很清楚，要将全国四成左右的耕地拿出来，重新分配给六十万“军吏卒”，在操作上是一件相当困难的事情。但他选择这样做，也有不得不为的理由——西汉帝国是在反秦、反项羽的战争中建立起来的，内部组织带有浓厚的游侠色彩。刘邦要想坐稳帝位，首要之务是与助他建国的功臣“共享胜利成果”。西汉立国之初，社会财富重新分配的目的是在汉帝国内部形成一个新的既得利益集团——军功集团。这个集团是西汉立国的基础，也是刘邦统治的基础。

再说权力分配。

高帝五年二月，也就是前述社会财富重新分配开始的三个月前，刘邦在定陶汜水之北即皇帝位。由汉王升为皇帝，刘邦即位与后世的皇帝登基大不同，既没有改元，也没有改制，连采用了何种仪式，史书也没有记载。但史书详细记载了刘邦何以有资格做皇帝。

据《汉书·高帝纪》，刘邦做皇帝是诸侯王一致推举的。西汉初年的推举与后世的劝进很不一样。曹丕代汉、赵匡胤取代后周，虽有群臣的劝进、表章，但只是堆砌辞藻，走个形式。相比之下，在高帝五年二月，楚王韩信、韩王信、淮南王英布、梁王彭越等诸侯王的劝进文章不但用词质朴，陈述的汉王刘邦理应登基为帝的理由也极实在。

总结起来，诸侯王们的意见共有两点：

1．刘邦在诸侯王中功最高，所以地位应该比诸侯王高一些，可以做皇帝。这里的功指的是灭秦与灭项羽，即所谓“起于细微，灭乱秦，威动海内”（灭秦）与“以辟陋之地，自汉中行威德，诛不义”（灭项羽）。诸侯王一致认为，在灭秦与灭项羽的战争中，刘邦的功劳最大。

2．刘邦在诸侯王中德最高，所以地位应该比诸侯王高一些，可以做皇帝。这里的德指的是恢复诸王和封赏功臣，即所谓“存亡定危，救败继绝，以安万民”（恢复各诸侯王因项羽“暴虐”而失去的王位）与“立有功”“功臣皆受地食邑”（论功行赏）。[(13)]

根据这两个理由，诸侯王们认为刘邦“德施四海，诸侯王不足以道之”，诸侯王的名号不足以匹配他，“居帝位甚实宜”，他应当做皇帝。

显然，刘邦的帝位与秦始皇的帝位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秦始皇的帝位意味着至高无上、不容置疑的权力，是一种绝对权力；刘邦的帝位仅仅意味着他的功与德相对其他诸侯更大、更高一些，是一种相对权力。

相对权力的边界非常模糊，所以汉初的高层政治中充满了试探与杀戮。高帝十二年三月，自觉时日无多的刘邦终于决定妥协，试

图通过颁布诏书，将权力的边界固化下来。在这份被称作“高帝十二年三月诏”的诏书里，刘邦这样写道：

> 吾立为天子，帝有天下，十二年于今矣。与天下之豪士贤大夫共定天下，同安辑之。其有功者上致之王，次为列侯，下乃食邑。而重臣之亲，或为列侯，皆令自置吏，得赋敛，女子公主。为列侯食邑者，皆佩之印，赐大第室。吏二千石，徙之长安，受小第室。入蜀汉定三秦者，皆世世复。吾于天下贤士功臣，可谓亡负矣。其有不义背天子擅起兵者，与天下共伐诛之。布告天下，使明知朕意。(14)

首先，刘邦在诏书里确认，汉帝国的天下是自己“与天下之豪士贤大夫”共有之天下，因为是众人一起打下来的。其次，刘邦谈及坐天下的原则是按照功劳的高低排列，功劳最高者做皇帝，次高者做诸侯王，再次者做列侯，又次者可以食邑，依次往下。

颁布这份诏书时，刘邦的病情已经恶化。一个月后，刘邦去世。

“高帝十二年三月诏”其实可以视为“白马之盟”的具体成果。

白马之盟的具体时间，史书没有明文记载，大体可以推断是在高帝十二年二月到四月间——盟约的主要内容之一是“非刘氏不得王”。刘邦废除燕王卢绾，完成“非刘氏不得王”的实际格局，是在高帝十二年二月，刘邦去世是在四月。也就是说，白马之盟与“高帝十二年三月诏”大体是同时完成的。

关于白马之盟的具体内容，史书记载相当零散。搜集、整理起来，可以总结如下：

1．王与侯的分封只能由皇帝进行；

2．只能在刘氏皇族内封王；

3．只能对有功者封侯；

4．若违反上述约定，天下共击之。[(15)]

当日参加盟誓的有刘邦和众多立有军功的老臣，可以确定在场的有王陵、周勃与陈平等人。内容涉及刘姓诸侯王，他们中的某些人理应也参与了盟誓。也就是说，结盟者是三方力量：代表宫廷力量的刘邦、代表王国力量的刘姓诸侯王，以及代表军功集团力量的列侯——刘邦称帝之后，军功集团逐渐转移到了以丞相为首的汉帝国政府当中，代表军功集团利益的陈平、周勃等人此时控制着汉帝国政府的日常运作。

三方力量在盟约中各有权利和义务。

先说权利。对军功集团而言，“非有功不得侯”，可以保证现存军功列侯的权益不会被皇权随意稀释；对诸侯王而言，“非刘氏不得王”，可以保证现存诸侯王的权益不会被权臣侵犯；对皇帝而言，在遵守上述限制的前提下，王与侯的分封大权仍操于己手。

再说义务。对诸侯王而言，必须维护刘氏皇权，防范军功列侯侵犯皇室权益；对军功列侯而言，也必须维护刘氏皇权，防范诸侯王侵犯皇室权益；对皇帝而言，必须恪守“非刘氏不得王，非有功不得侯”的规则，保证诸侯王和军功列侯的权益。

西汉初年宫廷（皇帝）—政府（军功列侯）—王国（诸侯王）三足鼎立的权力分配明显是“反秦制”的。

“高帝十二年三月诏”与“白马之盟”对汉帝国核心权力的分配是理解刘邦死后诸多政治现象的重要背景。比如，从汉高帝刘邦到汉景帝，依次担任汉帝国政府首脑，也就是丞相职务的分别是：萧何—曹参—王陵—陈平—审食其—吕产—周勃—灌婴—张苍—申屠嘉—陶青—周亚夫—刘舍—卫绾。从萧何到申屠嘉都是汉初军功集团第一梯队的元老（只有吕产牵涉平定诸吕之乱的政变，是个例外）。从陶青到刘舍，已是汉景帝时代，第一代军功集团的元老死亡殆尽，这三人属于军功集团的第二代。卫绾是汉代第一个非出身于军功集团的丞相。

这份西汉初年历任丞相的名单可以说是白马之盟的直接结果。管理政府（朝廷）的权力是军功列侯的权益所在，所以按惯例丞相由军功列侯担任，无功者不得为相。即使第一代军功集团死光了，也须由第二代军功集团继任。此外，汉初，丞相的人选往往也直接取决于军功的高低，而非皇帝的意志。汉帝国的第一任丞相萧何，军功在列侯当中排名第一；第二任丞相曹参，军功在列侯当中排名第二。据《汉书·曹参传》记载，曹参在齐国相国任上，听到萧何去世的消息，“告舍人趣治行，‘吾将入相’。居无何，使者果召参”(16)。萧何一死，诏令未到，曹参就收拾行装，准备去长安继任丞相，其自信正源于自己的军功排名第二，按照白马之盟，丞相非他莫属。

再如，所谓的“诛吕安刘”也与白马之盟确立的权力分配体系被打破有直接关系。

吕后时代，皇权有意削弱军功列侯的权力。汉惠帝曾经在朝会上责问丞相曹参为何对政事少有举措。曹参反问惠帝：“陛下自察圣武孰与高帝？”曹参问：“陛下自比先帝（高帝刘邦）如何？”惠帝回答：“朕乃安敢望先帝乎？”我如何敢与先帝相提并论？曹参又问：“陛下观臣能孰与萧何贤？”陛下看臣和萧何相比，谁更

有能力？惠帝回答："君似不及也。"朕觉得你不如萧何。曹参遂说："陛下言之是也。且高帝与萧何定天下，法令既明，今陛下垂拱，参等守职，遵而勿失，不亦可乎？"他说，陛下所言甚是，高皇帝与萧何一起定下治理天下的制度，陛下只要垂拱无为，臣等尽职尽责，遵循成例即可。此番责难与反驳之后，惠帝即不再过问政事。这一著名的萧规曹随典故的实质是皇权有意过问并干涉朝政，军功列侯抗拒皇权过问并干涉朝政。[(17)]

曹参死后，吕后将丞相之职一分为二，以王陵为右丞相，陈平为左丞相，也是为了削弱军功列侯掌控朝政的权力。王陵的军功在列侯中排名第十二，陈平排名第四十七。尽管陈平与吕后在个人关系上较为亲近，但王、陈二人均属军功列侯，这一人事变动仍在军功集团的容忍范围之内。

危机出现在吕后去世之后。临终之际，吕后对朝廷的高层人事做了一番安排，"以左丞相审食其为帝太傅"，"以吕王产为相国"[(18)]——吕产是吕后兄长吕泽之子，从吕后临朝称制起，一直执掌南军，负责宫廷的警备工作。吕产以外戚身份出任相国，打破了汉初以来只有军功集团人士能够担任丞相的惯例，破坏了"白马之盟"确立的权力分配原则，被军功列侯视作宫廷势力向朝廷的渗透。

于是，公元前180年，以周勃、陈平为首的军功集团发动政变，诛杀了以吕产为首的吕氏家族，并捏造"安刘必勃"的刘邦遗言，将整个事件粉饰成了"诛吕安刘"。[(19)]

这样的粉饰很值得玩味。一方面，军功集团不惜诉诸武力，也要维护"白马之盟"划定的属于自己的利益范围；另一方面，军功集团又不能打出维护"白马之盟"的旗号，而是要用"诛吕安刘"这样的说辞来隐藏事件的真相，说明"白马之盟"在当时的汉帝国

是一个尴尬的存在——当初盟誓时，既未将具体的盟约内容刊刻石碑，也未能制成文件公布天下（也就是没有制度化、公开化），这直接导致军功集团无法以维护白马之盟为理由，来为自己铲除吕后外戚集团辩护。

汉文帝即位后，吸取诸吕之乱的教训，将宫廷势力从朝廷撤出，恢复了丞相只能由军功列侯担任的惯例。丞相一职也由两人改回一人。先是在列侯中军功排名第四的周勃，再是排名第九的灌婴担任丞相。灌婴死后，由排名第六十五的张苍继任。张苍为相15年，退休后由申屠嘉继任。申屠嘉的出身与之前的军功列侯稍有不同——虽同样拥有军功，但申屠嘉是从普通士兵一步步爬上去的。文帝之所以选中申屠嘉，也是迫不得已。据《汉书·张周赵任申屠传》记载，“张苍免相，文帝以皇后弟窦广国贤有行，欲相之，曰：‘恐天下以吾私广国。’久念不可，而高帝时大臣余见无可者，乃以御史大夫（申屠）嘉为丞相”[(20)]。文帝中意窦广国之才，但窦广国出身外戚，而非军功集团，这使文帝犹豫不决。最后，即使高帝时代的大臣所剩无几——建国四十余年，高帝时代的军功列侯几乎死亡殆尽，文帝仍谨慎地选择了建国之时立有军功的申屠嘉。

西汉初年皇权的谨小慎微于此可见一斑。

三、百姓用脚投票奔向王国

刘姓诸侯王也参与了白马之盟这一准契约的订立。军功列侯与皇权之间发生过“诛吕安刘”的血腥政变，刘姓诸侯王与皇权之间则发生过更为残酷的战争，即汉景帝时代所谓的“七国之乱”。

“七国之乱”这个词是典型的皇权本位。常见的表述中，所谓“七国之乱”是这个样子的：

> 景帝时，诸侯王势力膨胀，威胁到中央的统一。为削弱诸侯王势力，晁错建议景帝查诸侯王之罪，削其封地，收其枝郡，引起了诸侯王的不满。景帝三年（公元前154年）正月，吴、楚、赵、胶西、济南、淄川、胶东等七诸侯王以“诛晁错，清君侧”为名，联合发动叛乱。景帝乃遣大将军窦婴、太尉周亚夫将兵平定叛乱。[(21)]

阅读这段文字的人难免会被“膨胀”“叛乱”“平定叛乱”等带有强烈价值判断色彩的词汇影响，进而觉得吴王刘濞等七个诸侯王全是反面人物，汉景帝则代表了绝对的正义。而其实，这不过是一种文字技巧营造的错觉。贾谊当年对汉文帝说过这样一段话：

> 今淮南地远者或数千里，越两诸侯，而县属于汉。其吏民徭役往来长安者，自悉而补，中道衣敝，钱用诸费称此，其苦属汉而欲得王至甚，逋逃而归诸侯者已不少矣。其势不可久。[(22)]

贾谊说：淮南由中央直接控制的广阔土地上横亘着梁和淮南两个王国。中央直属之地的吏和民为了负担徭役往来于长安，他们用尽自己的家产置办衣装，但往往才到半路衣服就破了。做中央的百姓，他们感到非常痛苦，很殷切地想要投奔王国，去做梁王、淮南王的子民。时下抛弃田宅，投奔诸侯王之人已经不少，长此以往，不是好事。

也就是说，在贾谊看来，王国之所以会膨胀，之所以能够吸引到更多的人力，进而产出更多的资源，一个重要原因是中央的压榨太厉害，百姓不愿再做中央的子民。他们用脚投票，抛弃家园故土，主动跑到王国去了。

贾谊之言不是孤证。汉文帝给匈奴单于写过一封长信，其中提到："言和亲已定，亡人不足以益众广地，匈奴无入塞，汉无出塞，犯约者杀之，可以久亲，后无咎，俱便。"[(23)]咱们两家已经和亲，那些逃往匈奴的百姓并不足以增长匈奴的力量。从今以后，匈奴人不进来，汉朝人不出去，有人违反了约定就杀掉他，两国自然可以长久地和平相处。

汉文帝说的"亡人不足以益众广地"，实在是"此地无银三百两"。若用脚投票，逃往匈奴的汉朝人数量真的极为有限，这件事就不足以拿出来在汉帝国和匈奴的最高统治者之间讨论。汉元帝时的郎中侯应也说，长城以南的汉的"边人奴婢"大多生活愁苦，常想着越过长城逃跑，还经常发出"闻匈奴中乐，无奈候望急何"[(24)]这样的感叹。

《史记·吴王濞列传》里也说："其居国以铜盐故，百姓无赋。卒践更，辄与平贾。岁时存问茂材，赏赐闾里。佗郡国吏欲来捕亡人者，讼共禁弗予。"[(25)]大意是：吴国出产铜和盐，国内百姓没有税赋的负担；对那些要去负担徭役的人，会给予相当数量的薪资；逢年过节，慰问人才，赏赐平民；不允许朝廷和其他王国派人来吴国抓捕逃亡之人。《盐铁论》里也说："君有吴王，专山泽之饶，薄赋其民，赈赡穷乏。"[(26)]刘濞对辖下百姓征收的赋税较轻，还愿意救济穷困之人。

结果就是，那些本属中央管辖的百姓不愿再承担朝廷苛刻的盘剥，用脚投票，抛弃故土家园，遁入吴国，成了刘濞的子民，也成了景帝、袁盎和桑弘羊口中的"天下亡命"（逃亡者）[(27)]、"无赖子弟"（生计无所依赖之人）[(28)]和"山东奸猾"[(29)]。

也就是说，七国之乱这个故事存在两个版本。第一个版本是：王国势力膨胀→想要叛乱→中央出兵平叛→王国战败→百姓拍手称

快。第二个版本则是：中央横征暴敛→百姓用脚投票，遁入王国（王国也汲取民力，但百姓可以两害相权取其轻）→王国力量壮大→中央深感不安，率先发难→王国战败，被肢解→百姓失去用脚投票的机会。

前者是由“膨胀”“叛乱”“平叛”等一系列带有强烈价值判断色彩的词汇刻意构筑的，灌输的是汉景帝本位思维，但对百姓而言，站在孟子的“民本”立场，后一个版本才是更有思考价值的历史真相。对普通百姓而言，秦制之下的“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与白马之盟约定的体制下的可以用脚投票、可以两害相权取其轻，究竟孰优孰劣，是一个非常耐人寻味的问题。遗憾的是，白马之盟没有固化为稳定的制度，它只维系了不足五十年。

---

(1) 陈高傭：《老子今解》，商务印书馆2016年版，第61—62页。

(2) 司马迁：《史记·高祖本纪》，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387页。

(3) 班固：《汉书·韩彭英卢吴传》，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1890—1891页。

(4) 司马迁：《史记·魏公子列传》，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2385页。

(5) 司马迁：《史记·张耳陈馀列传》，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2571—2572页。

(6) [日] 守屋美都雄：《中国古代的家族与国家》，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版，第103—141页。

(7) 司马迁：《史记·项羽本纪》，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311页。

(8) 司马迁：《史记·淮阴侯列传》，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2624页。

(9) 《史记·陈丞相世家》载：“王陵者，故沛人，始为县豪，高祖微时，兄事陵。陵少文，任气，好直言。及高祖起沛，入至咸阳，陵亦自聚党数千人，居南阳，不肯从沛公。”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2059页。

(10) 《汉书·韩彭英卢吴传》载：“泽间少年相聚百余人，往从（彭）越”，“骊山之徒数十万人，（英）布皆与其徒长豪桀交通”。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1878、1881页。

(11) 班固：《汉书·游侠传》，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3698页。

(12) 李开元：《汉帝国的建立与刘邦集团：军功受益阶层研究》，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0年版，第52—54页。

(13) 劝进疏及诸侯王陈词，见《汉书·高帝纪》：“楚王韩信、韩王信、淮南王英布、梁王彭越、故衡山王吴芮、赵王张敖、燕王臧荼昧死再拜言大王陛下：‘先时，秦为亡道，天下诛之。大王先得秦王，定关中，于天下功最多。存亡定危，救败继绝，以安万民，功盛德厚。又加惠于诸侯王有功者，使得立社稷。地分已定，而位号比拟，亡上下之分，大王功德之著，于后世不宣。昧死再拜上皇帝尊号。’汉王曰：‘寡人闻帝者贤者有也，虚言亡实之名，非所取也。今诸侯王皆推高寡人，将何以处之哉？’诸侯王皆曰：‘大王起于细微，灭乱秦，威动海内。又以辟陋之地，自汉中行威德，诛不义，立有功，平定海内，功臣皆受地食邑，非私之地。大王德施四海，诸侯王不足以道之，居帝位甚实宜，愿大王以幸天下。’”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52页。

(14) 班固：《汉书·高帝纪》，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78页。

(15) “白马之盟”的相关记载，散见于《史记》与《汉书》。如《史记·吕太后本纪》载：“王陵曰：‘高帝刑白马盟曰“非刘氏而王，天下共击之”。今王吕氏，非约也。’”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400页。《史记·汉兴以来诸侯王年表》载：“高祖末年，非刘氏而王者，若无功上所不置而侯者，天下共诛之。”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801页。《汉书·张陈王周传》载：“亚夫曰：‘高皇帝约“非刘氏不得王，非有功不得侯。不如约，天下共击之”。今信虽皇后兄，无功，侯之，非约也。’”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2060—2061页。《汉书·外戚恩泽侯表》载：“汉兴，外戚与定天下，侯者二人。故誓曰：‘非刘氏不王，若有亡功非上所置而侯者，天下共诛之。’”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678页。

(16) 司马迁：《史记·曹相国世家》，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2029页。

(17) 司马迁：《史记·曹相国世家》，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2030页。

(18) 司马迁：《史记·吕太后本纪》，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402页。

(19) 吴仰湘：《汉初“诛吕安刘”之真相辨》，《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1998年第1期。

(20) 班固：《汉书·申屠嘉传》，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2100页。

(21) 张大可、丁德科主编：《史记论著集成》第7卷，商务印书馆2015年版，第183页。

(22) 贾谊：《请封建子弟疏》，见《汉书·贾谊传》，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2261页。

(23) 司马迁：《史记·匈奴列传》，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2903页。

(24) 班固：《汉书·匈奴传》，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3804页。

(25) 司马迁：《史记·吴王濞列传》，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2823页。

(26) 桓宽：《盐铁论·禁耕》，上海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第11页。

(27) 汉景帝诏书称“吴王濞倍德反义，诱受天下亡命罪人，乱天下币，称病不朝二十余年”。见司马迁：《史记·吴王濞列传》，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2833页。

(28) 袁盎对汉景帝称“吴所诱皆无赖子弟、亡命铸钱奸人，故相率以反”。见司马迁：《史记·吴王濞列传》，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2830页。

(29) 桑弘羊称“吴王擅鄣海泽，邓通专西山。山东奸猾咸聚吴国”。见桓宽：《盐铁论·错币》，上海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第10页。

第四章
游士消亡与秦制回归

“白马之盟”是一种对秦制的偏离，因为它没有能够形成稳固的皇帝—贵族—平民（农奴）式的封建体制。皇权天然追求一家独大，军功列侯与诸侯王未能成功制约皇权扩张的野心。汉文帝运作“列侯就国”，迫使在长安无职务的军功列侯回到自己的封地，不再允许他们长久地驻留长安，极大地削弱了军功集团对长安政治的影响力，使他们再无力串 联，发动类似“诛吕 安刘”的政变。[(1)] 再之后，汉景帝在所谓的“七国之乱”中取得胜利，王国势力自此衰微。

秦制的回归是在汉武帝时代正式实现的，它的回归带给西汉百姓的影响可以参考汉宣帝时的御史大夫萧望之劝谏皇帝的一段话。萧望之说：我从前有一个下属叫作徐宫，他的老家在东莱，靠近海边。据他讲，往年朝廷一增加海租，海鱼就不出现了，当地的长老还说：“武帝时县官尝自渔，海鱼不出，后复予民，鱼乃出。”[(2)] 说的是汉武帝时，朝廷垄断海场，搞起了官营捕鱼，结果鱼都消失了。后来恢复民营，允许百姓自行捕鱼，鱼才再次出现。

鱼当然不会凭空从海里消失。让海鱼消失的是秦制皇权“莫非王土”的贪婪和“无远弗届”的迷信。而为了实现其贪婪与迷信，变“白马之盟”的有限皇权为秦始皇的无限皇权，汉武帝必须彻底抛弃军功列侯，重塑官僚集团作为自己的统治基础。

一、遍地皆是失业游士

高帝三年（公元前204年），楚汉争霸正在要紧关头，谋士郦食其给刘邦出了个主意。他说，秦朝残忍无道，伐灭六国，使六国

后人无立锥之地。陛下如能够复兴六国，扶立其后人，他们必感念陛下的仁义，愿做陛下的臣子，誓死效命。

但张良认为这是个馊主意。他提醒刘邦："天下游士抛妻弃子，背井离乡，跟从陛下，无不日夜盼望胜利后能获得尺寸之地的分封。陛下今天扶立六国后裔，游士明天就会一哄而散，各归旧主。陛下还依靠谁去夺取天下？"[(3)]

张良的话既点明了汉立国的基础是游士（游侠），也道出了以游士为立国基础的严重弊端：游士是依附于诸侯的流动资源，其流动性与自主性，与君主集权体制天然对立。

景帝时代，游士之风仍遍及汉帝国的方方面面。游士的心中没有君臣之道，朝廷对他们而言不存在什么神圣性。齐地游士邹阳就是典型的例子。客游位于中原的梁国时，邹阳遭谗言下狱，他在狱中写给梁孝王的书信很直接地道出了他的游士心态：

> 今人主诚能用齐、秦之义，后宋、鲁之听，则五伯不足称，三王易为也。[(4)]

邹阳说：若梁孝王能采纳战国的齐国、秦国的王霸之道，远离宋国、鲁国的文儒之训，则"五伯"（春秋时期的五个诸侯之长）之流不值一提，上古"三王"的伟业也不难达成。

显然，邹阳不承认景帝与朝廷的权威。他游说梁孝王信士、养士、用士，以成为"五伯""三王"，这正是朝廷与诸侯王政治博弈的体现。

皇权不会喜欢诸侯有这样的想法。汉武帝诛杀游侠郭解，正是为了杀鸡儆猴。但仅凭杀戮无济于事，《史记》中说，郭解被杀之后，仍然"为侠者极众"。其中，"关中长安樊仲子，槐里赵王

孙，长陵高公子，西河郭公仲，太原卤公孺，临淮兒长卿，东阳田君孺，虽为侠而逡逡有退让君子之风”，“北道姚氏，西道诸杜，南道仇景，东道赵他、羽公子，南阳赵调之徒，此盗跖居民间者耳”。[(5)]不难推想，在郭解被武帝诛杀之前，汉帝国的游士（侠）之风是何等繁盛。

立国五十年，汉帝国仍遍地游士是有原因的。

游侠（士）意味着一种自由。比如，枚乘因劝说吴王刘濞不要举兵而获得景帝赏识，受召出任弘农都尉。但，多年游士生涯让他难以在“天子守臣”的位置上长期待下去——“乘久为大国上宾，与英俊并游，得其所好，不乐郡吏，以病去官”[(6)]。恣意放肆、任意来去的自由对游士枚乘有着很大的吸引力。

而更重要的原因在于：汉帝国的建立有着深厚的游侠背景，诸侯王及军功集团的势力极为强大，巨大的市场需求刺激了游士数量的激增。及至文帝、景帝两代，皇权以政治谋略和军事手段打击了地方上的诸侯王和朝廷中军功集团的势力，游士的市场萎缩，汉帝国却没有能够给“失业”的游士提供就业、上升的机会。

东汉光武帝建武六年（公元30年），儒生朱浮上了一道奏疏，特别提及西汉初年的一个重要社会现象。朱浮说：“大汉之兴，亦累功效，吏皆积久，养老于官，至名子孙，因为氏姓。”[(7)]意思是说：西汉初年，官吏久任不换，在某个职位上做到老死的人不在少数。很多职位父子相继，官职的名称成了他们家族的姓氏。

朱浮谈到的这种现象，西汉人王嘉也注意到了。王嘉是汉哀帝时期的丞相。他对哀帝回顾了文帝时代的官员任用情况：“孝文时，吏居官者或长子孙，以官为氏，仓氏、库氏则仓库吏之后也。其二千石长吏亦安官乐职。”[(8)]意思是说：文帝时代的官吏都是终

身制和世袭制的，以至于管仓库的官吏干脆让自家姓仓、姓库，这种情况在两千石以上的大员里也相当普遍。

朱浮和王嘉所言触及了西汉初年的一道“国策”——“非有功不得侯”。根据这一国策，自高帝时代开始，在长安，军功老臣长期把持着朝廷；在地方，军功吏卒长期把持着基层政权。换言之，西汉开国的前五十年，官僚系统被军功集团控制，知识分子没有正规的上升渠道，去做游侠，去给诸侯王、军功列侯做门客，就成了他们相当普遍的人生选择。

然而，随着军功列侯与诸侯王的势力受到皇权压制，逐渐走向衰弱，游士的生存空间也在变窄。到了景帝时代晚期，邹阳、枚乘等著名游士已经发出了“鸷鸟累百，不如一鹗”[(9)]这样的感慨。“鸷鸟”即地方诸侯王，“一鹗”即长安未央宫里的皇帝。

时代变了，游士们明显感觉到有能力的寄主已经屈指可数。他们甚至不再游说自己的寄主“有所为”，而是劝他们“有所不为”——当吴王刘濞准备起兵反抗朝廷时，枚乘悲观地说“举吴兵以訾于汉，譬犹蝇蚋之附群牛”[(10)]，拿吴国的军队与朝廷对抗，无异于驱赶蚊蝇去吞噬牛群。

二、“求贤诏”里的规训

公元前141年，48岁的汉景帝去世，太子刘彻登基，随即发布了一道“求贤诏”。诏书的大意是让丞相、御史、列侯、中二千石、二千石等重臣向朝廷举荐贤良方正、直言敢谏之士。

五十多年前的公元前196年，刘邦也下过一道“求贤诏”。诏书中说：“今天下贤者智能，岂特古之人乎？患在人主不交故也……贤人已与我共平之矣，而不与吾共安利之，可乎？贤士大夫有肯从我游者，吾能尊显之。布告天下，使明知朕意。”[(11)]

比较高帝和武帝的两份诏书，可以明显看到时代的变化——刘邦在“求贤诏”里说，希望“贤士大夫”能够“从我游”，这三个字带有浓重的游侠色彩，反映出刘邦与“贤士大夫”之间的关系，与其说是皇帝与臣僚，更像是寄主与门客。刘彻的“求贤诏”里就完全没有这样的游侠色彩。他下令征召“贤良方正”，且亲自策问下面推荐上来的人才，是典型的君王选拔臣僚的做派。

刘彻清楚汉帝国游士之风盛行的原因。这些游士或属儒家，或属法家，或属阴阳家，原本积极出入于诸侯王和军功列侯的府第。需求刺激供给，诸侯王与军功列侯的规模有多大，汉帝国的游士就有多少。如今，汉帝国致力于打压诸侯王与军功列侯的势力，需要重塑统治基础，如何改造游士自然也是汉武帝推行变革应有的重要内容。

刘彻颁布“求贤诏”的核心目的是打破军功集团在官职上的久任制和世袭制，也就是打破朱浮与王嘉提及的“以官为氏”“养老于官，至名子孙”的现象，进而将游士纳入官僚系统中来。这样做，既可以吸引知识分子投入朝廷的怀抱，也可以削弱诸侯王（譬如梁孝王）与朝廷勋贵（譬如窦婴）的势力——游士们都是“理性经济人”，跟着朝廷有前途，还是跟着诸侯王与朝廷勋贵有前途，在汉武帝时代，并不是一件很难判断的事情。

“求贤诏”颁布后，反响强烈。丞相卫绾上奏：“所举贤良，或治申、商、韩非、苏秦、张仪之言，乱国政，请皆罢。”[(12)]卫绾奏请武帝：那些搞法家和纵横之学的知识分子只会把国家政务搞乱，请求皇帝下达圣旨，不要再任用他们。刘彻同意了卫绾的请求，颁下新的规定：除儒学外，贬黜诸家，不用其为治国之术。这就是著名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

打开上升渠道，让游士有机会进入朝廷，又选择性地排斥“治申、商、韩非、苏秦、张仪之言”的游士，这恰是西汉中期选官制度的一体两面。这种一体两面，扼要来说便是：

1．秦制政权追求社会的散沙化（不喜欢百姓有组织）与静态化（不喜欢百姓自由迁徙、流通），追求对百姓的严格控制。所以，作为社会不安定因素的游士需要被最大限度地控制与肃清。于是，暴力诛杀（比如对待郭解）与提供进入官僚系统的机会就成了刘彻控制与肃清游士的两大核心手段。相较之下，又以后者为重。

2．刘彻要抛弃军功集团，重塑官僚系统作为自己的统治基础。但官僚系统的容量有限，不可能收纳所有游士，且秦制政权对官僚的价值观、人生观有特殊的要求（苏秦、张仪等搞纵横之术的人就不符合秦制官僚系统的需要），所以，必须引导乃至诱导游士在思想、学术上进行自我转型。而最能起到引导、诱导作用的手段莫过于体制规定的知识分子选拔标准，有了选拔标准，就可以“批量生产相同规格的知识分子”。刘彻独尊儒术，是为了让游士尊儒，他自己是不必尊儒的（事实上他也从未服膺儒学）；刘彻排斥“治申、商、韩非、苏秦、张仪之言”的游士，是为了让游士自愿远离“申、商、韩非、苏秦、张仪之言”，他自己却是熟知“申、商、韩非”之道的。

当然，用儒家官僚取代王侯贵戚来作为新的统治基础，涉及权力的重新洗牌和利益的重新分配，绝不会和平过渡。建元元年（公元前140年）的改革风波就是刘彻遭遇到的一次严重挫折。

这一年，刘彻对长安的高层人事做了一次极为大胆的变更——任命窦婴为丞相，田蚡为太尉，赵绾为御史大夫，王臧为郎中令，桑弘羊为侍中（主司财计）。除桑弘羊外，窦、田、赵、王都有儒学背景。在建元元年的七八月间，刘彻提议设立明堂。

刘彻设立明堂的动机至少有二：

1．设立明堂有助于皇帝巩固个人权位。按《逸周书》的解释，明堂乃周公的创造，是周天子接受诸侯朝见的场所，用以彰明尊卑。刘彻年少登基，各诸侯王多为其兄长、叔伯乃至叔祖，朝见时往往蔑其年少而不尊。修筑明堂有重申上下尊卑之义的政治含义。而且，这一时期，刘彻实施了一系列打压诸侯王势力的手段，比如勒令列侯回归封地，不许在长安逗留；勒令列侯拆除封地关卡，各诸侯国须实现交通上的自由、开放等。[13]

2．明堂关系到朝廷的权力分配。明堂是儒家的礼仪性建筑，按孟子的说法，“明堂者，王者之堂也”，是君王“行王政”的标志性建筑。西汉开国的前五十年，统治者长期尊奉道家黄老的无为而治（当然并非真信黄老，而是诸侯王与军功集团势力强大，皇权不得不顾及“白马之盟”划定的权力范围，不得不无为。与之对应，军功集团与诸侯王也必须无为，也就是严守“白马之盟”划定的利益边界，彼此之间才能维持权力平衡，相安无事）。如今，军功集团和诸侯王已不再被皇权视为统治基础，且皇帝欲用新的儒家官僚集团取而代之，黄老之学自然成了累赘。设立明堂大有宣告新时代到来的意味。关键是，窦太皇太后（汉景帝之母，汉文帝的皇后）信奉黄老。建造明堂相当于向汉帝国公开宣布：朝堂之上已是刘彻说了算。所以，刘彻之母王太后深感忧虑，曾如此埋怨刘彻：“汝新即位，大臣未服。先为明堂，太皇太后已怒。”[14]显然，窦太皇太后也深知明堂背后潜藏的政治奥义。

同时开罪诸侯王、军功集团与窦太后的结局自然是悲惨的。刘彻的亲信赵绾、王臧被下狱，不久两人自杀；刘彻本人也自汉帝国的权力舞台的中心消失长达六年，《史记·孝武本纪》对刘彻在这六年里的活动无一字记载，仅以一种意味深长的笔调写道：

后六年，窦太后崩。其明年，上征文学之士公孙弘等。[(15)]

三、寄主的非正常死亡

窦太皇太后去世，刘彻复出，重启儒家官僚系统为统治基础的改革。消弭游士之风再次被列为施政的重中之重。大批知名游士或寄主，如窦婴、灌夫、刘安、郭解等在这场改革中非正常死亡。

窦婴是儒生，是刘彻在建元元年改革中的亲密战友；反儒学人士、信奉黄老之学的淮南王刘安是觊觎过刘彻皇位的人。二人与刘彻的关系迥异，但死因是一样的。

窦婴之死，表面上看是卷入了与田蚡、灌夫之间的冲突。灌夫是平定七国之乱的功勋武将，素与丞相田蚡不和。窦太后死后，窦婴已是过气外戚，田蚡正炙手可热。田蚡对窦婴的欺辱（强占田地）本是新旧外戚之间的矛盾（窦婴是窦太皇太后的侄子，田蚡是王太后的同母异父弟）。灌夫素与窦婴交好，也卷入纠纷之中，官司最终打到了刘彻跟前。刘彻裁决外戚的纠纷，权衡的是政治上的得失，而不管是非对错。田蚡指责灌夫在民间横行不法，窦婴则指责田蚡与淮南王谋逆。决定纠纷结果的则是田蚡的这段话：

天下幸而安乐无事，蚡得为肺附，所好音乐、狗马、田宅，所爱倡优、巧匠之属，不如魏其、灌夫日夜招聚天下豪桀壮士与论议，腹诽而心谤，卬视天，俯画地，辟睨两宫间，幸天下有变，而欲有大功。臣乃不如魏其等所为。[(16)]

这番话击中了刘彻的要害。关于窦婴养士，史载“游士宾客争归之。每朝议大事，条侯、魏其，列侯莫敢与亢礼”[(17)]。至于灌夫，本身具有强烈的游侠色彩，“不好文学，喜任侠，已然诺。诸

所与交通，无非豪桀大猾。家累数千万，食客日数十百人”[(18)]。多年后，卫青在总结自己的保身之道时，顺带提及了窦婴之死的真相：“自魏其、武安之厚宾客，天子常切齿。彼亲待士大夫，招贤黜不肖者，人主之柄也。人臣奉法遵职而已，何与招士！”[(19)]

窦婴与灌夫的死是一个信号——新时代来临了，朝廷勋贵、军功列侯与诸侯王的好日子已经到头了，彰显其相对于皇权的独立性、壮大组织力量的养士行为是新时代绝不容许的。新时代要的是一个个原子化的儒家官僚与一个个原子化的庶民。

淮南王刘安的死也是因为同样的政治原因。刘安是诸侯王层面的游士寄主代表。元狩元年（公元前122年），刘彻以“阴结宾客，拊循百姓，为畔逆事”[(20)]的罪名，派兵进入淮南国，从刘安家中搜出了准备用于谋反的攻战器械和伪造的玉玺、金印（或许真有，或许是栽赃），自知不免一死的刘安选择了自杀。刘安是否想要谋反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他既然招贤纳士，就必须死——杀鸡儆猴，刘安之死为西汉的诸侯王广纳门客的风气画上了句号。曾经，诸侯王是游士最乐于依附的寄主，几乎所有的王国里都能找到游士的踪迹。如梁孝王治下的梁国，“招延四方豪桀，自山以东游说之士，莫不毕至，齐人羊胜、公孙诡、邹阳之属”，梁孝王招揽的人才甚至可以和朝廷相抗衡。[(21)]以修撰《淮南子》为由，刘安的王府上招纳的门客太多，以至于查抄之日，“所连引与淮南王谋反列侯、二千石、豪杰数千人，皆以罪轻重受诛”[(22)]。

铲除庙堂上有组织力量的勋贵与诸侯王的同时，元朔二年，刘彻还下诏迁徙了一大批“郡国豪杰”及家产超过三百万钱的富户充实茂陵（位于长安周边，汉武帝为自己修建的陵寝）——这是为了消灭民间的组织力量，使民间社会变成扁平的原子化结构。游侠郭解也在迁徙的名单中。郭解不愿迁徙，刘彻之母王太后也亲自出面为其求情，结果仍遭刘彻拒绝。同年，郭解被捕，灭族。[(23)]作为

底层游士的代表，郭解之死意味着朝廷已全面开启对民间社会的原子化改造。

游士退出，儒术上位，无为的时代已经过去。一个以官僚集团为统治基础、对百姓实行严格控制和高效汲取的新国家已经成形。秦制回来了！

---

(1) 汉文帝运作“列侯就国”事，见司马迁：《史记·孝文本纪》，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422、424—425页。

(2) 班固：《汉书·食货志上》，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1141页。

(3) 郦食其的原话是：“今秦失德弃义，侵伐诸侯社稷，灭六国之后，使无立锥之地。陛下诚能复立六国后世，毕已受印，此其君臣百姓必皆戴陛下之德，莫不乡风慕义，愿为臣妾。”张良的原话是：“天下游士离其亲戚，弃坟墓，去故旧，从陛下游者，徒欲日夜望咫尺之地。今复六国，立韩、魏、燕、赵、齐、楚之后，天下游士各归事其主，从其亲戚，反其故旧坟墓，陛下与谁取天下乎？”见司马迁：《史记·留侯世家》，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2040—2041页。

(4) 司马迁：《史记·鲁仲连邹阳列传》，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2473页。

(5) 司马迁：《史记·游侠列传》，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3188—3189页。

(6) 班固：《汉书·贾邹枚路传》，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2365页。

(7) 范晔：《后汉书·朱冯虞郑周传》，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1142页。

(8) 班固：《汉书·何武王嘉师丹传》，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3490页。

(9) 班固：《汉书·贾邹枚路传》，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2340页。

(10) 班固：《汉书·贾邹枚路传》，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2362页。

(11) 班固：《汉书·高帝纪》，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71页。

(12) 班固：《汉书·武帝纪》，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155—156页。

(13) 明堂的政治意义，见徐复观：《两汉思想史》（二），九州出版社2014年版，第22—31页。

(14) 司马光：《资治通鉴》卷第十七，中华书局1956年版，第559页。

(15) 司马迁：《史记·孝武本纪》，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452页。

(16) 班固：《汉书·窦田灌韩传》，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2389页。

(17) 班固：《汉书·窦田灌韩传》，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2376页。

(18) 班固：《汉书·窦田灌韩传》，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2384页。

(19) 班固：《汉书·卫青霍去病传》，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2493页。

(20) 司马迁：《史记·淮南衡山列传》，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3081页。

(21) 司马迁：《史记·梁孝王世家》，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2083页。

(22) 司马迁：《史记·淮南衡山列传》，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3093页。

(23) 司马迁：《史记·游侠列传》，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3187—3188页。

第五章
西汉知识界对秦制的批评

汉武帝再造秦制，以儒术为粉饰，以官僚集团为统治基础，对整个汉帝国实施高压控制与高效汲取，造成的直接后果是西汉儒学家夏侯胜所言“天下虚耗，百姓流离，物故者半”(1)。

夏侯胜的话并非虚言，《汉书·昭帝纪》说的也是“海内虚耗，户口减半”(2)。《史记·酷吏列传》里也说，汉武帝晚期，天下百姓走投无路，只能群聚为盗，“南阳有梅免、白政，楚有殷中、杜少，齐有徐勃，燕赵之间有坚卢、范生之属。大群至数千人，擅自号，攻城邑，取库兵，释死罪，缚辱郡太守、都尉，杀二千石，为檄告县趣具食；小群以百数，掠卤乡里者，不可胜数也”(3)。

正是天下百姓的群聚为盗迫使刘彻停下了无休止的对外战争，将注意力转向内政。他颁布了严酷的“沈命法”，若有地方官的辖区内出现盗贼，而他不去捕剿，或捕剿了却没有成功，那么“二千石以下至小吏主者皆死”，辖区内的地方官自上而下全部得死。但是，高压政策丝毫无助于解决问题。底层官吏趋利避害，从此“虽有盗不敢发”，因担心无法剿灭而受到诛杀，他们干脆不再报告境内盗匪的情况。州郡官员同样怕受牵连，乐于与底层官吏合谋，隐瞒所有关于盗匪的情报。于是“盗贼浸多，上下相为匿，以文辞避法焉”，真实的世界已然鼎沸，奏疏里的世界处处太平。如此恶性循环的结果便是，刘彻在位的54年里，“人口能保持正常增长率（约每年增长0．7%）的只有7年，低于正常增长的有21年，而人口减少或毫无增长的有26年”(4)。

所以，当刘彻去世，高压消失，西汉知识界针对秦制的批评也随之到来。

知识界对武帝时代的批评曾直指汉帝国的经济政策，桓宽留下了伟大的《盐铁论》；他们也曾直指汉帝国的“天命”，促使汉哀帝上演了一出自己推翻自己的闹剧。

一、贤良文学大战桑弘羊

汉昭帝始元六年（公元前81年），长安城发生了一场影响深远的思想交锋。交锋的对象一方是以御史大夫桑弘羊为核心，包括御史、丞相史等在内的官僚集团；另一方是三辅、太常举荐的“贤良”和各郡国察举的“文学”，也就是来自底层的中小知识分子。

按帝制运行的正常轨迹，这两群人——公卿与布衣本无可能聚到一起，就国家的经济路线，从核心理念到具体政策，面对面地唇枪舌剑。官僚集团一贯懒得理会底层知识分子的批评，底层知识分子的声音也一贯难以抵达庙堂。

契机始于后元二年（公元前87年）。这一年，汉武帝死了。

武帝死后，受遗诏辅政的大将军霍光与御史大夫桑弘羊分据内廷与外朝，呈对峙之势。桑弘羊在朝任职六十年，掌财政近三十年，以其为核心结成的利益集团盘根错节，轻易难以撼动。霍光遂施展手段，于庙堂之上给予不满桑弘羊经济路线已久的底层知识分子（即贤良与文学）发声渠道，对桑弘羊实施打击。

始元六年二月，六十余名贤良、文学终于首次有机会站到汉帝国经济政策的制定者面前，对其提出尖锐的批评。这场贯穿了恐吓与力争的论辩史称“盐铁会议”。

汉帝国官方从未就盐铁会议发布过任何官方文件。《汉书·食货志》中的记述非常简单，不足百字，仅扼要地总结了辩论双方的核心观点——贤良、文学要求废除盐铁官营、国家均输，希望政府

从商业活动中抽身，“毋与天下争利”；桑弘羊则回应，官营产业乃“国家大业”，不可废除。[(5)]

盐铁之议的具体内容能够流传至今，得益于一位叫作桓宽的儒家学者。时为辩论发生后约三十年，桓宽搜集了当时参加盐铁会议的贤良、文学存于民间的多种记录，“序其次第，饰其语言，增其条目”[(6)]，编成《盐铁论》一书，还原了这场辩论的大致情状。

据《盐铁论》记载，在辩论的过程中，以桑弘羊为首的官僚集团始终在恐吓贤良、文学。

比如，桑弘羊给贤良、文学讲典故：“日者，淮南、衡山修文学，招四方游士，山东儒、墨咸聚于江、淮之间，讲议集论，著书数十篇。然卒于背义不臣，使谋叛逆，诛及宗族。”[(7)]

以上这段意思是：“儒、墨”之徒当年依附淮南王刘安与衡山王刘赐，结果二王被定为谋逆之罪，“儒、墨”之徒也祸及宗族。潜台词是说霍光如同刘安与刘赐，不会有好结果，你们和霍光搅在一起，要当心脑袋。

丞相史也反复给贤良、文学讲古：“……此颜异所以诛黜，而狄山死于匈奴也。处其位而非其朝，生乎世而讪其上，终以被戮而丧其躯，此独谁为负其累而蒙其殃乎？”[(8)]

以上这段意思是：大司农颜异反对武帝发行“白鹿皮币”，死于腹诽之罪（对君王心怀毁谤之罪）；博士狄山反对攻击匈奴，被武帝送去前线，被匈奴人砍了脑袋。据此，丞相史严厉警告贤良、文学，“处其位而非其朝，生乎世而讪其上”，诽谤朝廷和皇帝，最后恐将命丧黄泉。

桑弘羊在讲古中特别喜欢提“主父偃以其舌自杀”[(9)]之类因言获罪的故事，以之威胁贤良、文学。他还以秋蝉为例做了一番可怕的比喻：“诸生独不见季夏之螇乎？音声入耳，秋至而声无。者生无易由言，不顾其患，患至而后默，晚矣。”[(10)]

以上这段意思是：桑弘羊威胁贤良、文学：你们见过夏末叫得欢的蝉吗？秋风一来就全没了声息。你们现在口不择言，等到祸患临头，再想闭嘴，可就晚了!

除了恐吓，以桑弘羊为首的官僚集团还在辩论的过程中一再攻击贤良、文学出身低贱，说他们没有资格议论朝廷的大政方针。在桑弘羊看来，具有管仲那般智慧的人不会做卑贱的厮役，能像陶朱公范蠡那般谋算的人不会身陷贫困。据此，官僚嘲笑文学：“文学能言而不能行，居下而讪上，处贫而非富，大言而不从，高厉而行卑，诽誉訾议，以要名采善于当世。”[(11)]官僚们说：你们这些文学能说不能做，身为下民却讥笑上官，穷困潦倒却非议富人，别有用心地称颂与诽谤，信口开河地言谈与议论，不过是沽名钓誉，想要博取世人的称道。官僚还嘲笑贤良：“夫禄不过秉握者，不足以言治；家不满檐石者，不足以计事。儒皆贫羸，衣冠不完，安知国家之政，县官之事乎!　”[(12)]官僚们说：俸禄不足一把米的人不配谈论治国之道，家中存粮不到一石的人没资格商议天下大事。你们这些儒生穷困潦倒，衣冠尚且难以齐全，哪里懂得国家之政、州县之事!

丞相史也运用了相同的逻辑来攻击贤良、文学：“饭蔬粝者不可以言孝，妻子饥寒者不可以言慈，绪业不修者不可以言理。居斯世，行斯身，而有此三累者，斯亦足以默矣。”[(13)]他说：给父母吃粗茶淡饭，不能算是孝敬；让妻子、儿女挨饿受冻，不能算是慈爱；自己的事业还没有头绪，不能算是拥有理政的能力。立身处世，这三点做不好，你们还是给我闭嘴吧。

桑弘羊等官员赤裸裸的威胁并未吓阻住贤良、文学。

比如，丞相史警告贤良、文学，说他们“处其位而非其朝，生乎世而讪其上”，恐将落得命丧黄泉的下场。贤良、文学的回答是：“塞士之涂，壅人之口，道谀日进而上不闻其过，此秦所以失天下而殒社稷也。故圣人为政，必先诛之，伪巧言以辅非而倾覆国家也。今子安取亡国之语而来乎？……悲夫！”(14)他们说：堵塞百姓上升的渠道，禁锢他们的言论自由，每日里阿谀奉承，皇帝从来听不到批评之词，这是秦灭亡的原因。所以圣人执政，必先杀掉花言巧语倾覆国家之人。如今你们竟然用亡国之言来吓唬我们，实在是太可悲了!

再如，桑弘羊嘲讽儒生穷困潦倒，衣冠尚且难以齐全，没有资格谈论国事。贤良、文学的回应是：“夫贱不害智，贫不妨行……公卿积亿万，大夫积千金，士积百金，利己并财以聚；百姓寒苦，流离于路，儒独何以完其衣冠也？”(15)他们说：身份低贱，不妨碍有才智；贫困潦倒，不妨碍有德行。你们只知道敛财，公卿积亿万钱，大夫积千金，士积百金。百姓饥寒交迫，路上全是流民，我们儒者的衣冠难以齐全，有什么好奇怪的!

盐铁会议期间，贤良、文学不断地重申藏富于民的理念，将批评矛头集中指向了盐铁官营、国家均输等政策，即由朝廷直接经营或间接控制工商业。桑弘羊等官员则不断强调，正是自己藏富于国的经济政策造就了武帝时代的辉煌。

贤良、文学毫不留情地戳破了桑弘羊口中武帝盛世的真面目。

比如，桑弘羊拒不承认铁器官营对民生有害，还说该政策有助于增长百姓对耕作的信心。贤良、文学却如此描述他们在基层的所见所闻：

县官鼓铸铁器，大抵多为大器，务应员程，不给民用。民用钝弊，割草不痛，是以农夫作剧，得获者少，百姓苦之矣。[(16)]

官府铸造的铁农具都是些大家伙，官吏只求完成上级布置的铸造任务，完全不考虑农民使用是否便利。农民拿着官府铸造的钝刀，草都割不断。农民花了更多的精力，收获却减少了，真是痛苦不堪。

贤良、文学还说：以前老百姓可以自己铸造农具的时候，铁器又便宜又好用。现在官府铸造的铁器多数质量低劣、成本高昂。以前那种几家人合作的民营铁器作坊一心想着打造好的农具，他们珍惜自己的信誉，质量不好就不愿意拿到集市上出售。农忙的时候，他们还愿意推着车子，把农具运到田间小路上，方便农夫购买，使他们不耽误农时。既收钱，也可以用粮食换，还可以拿破损的农具添一些钱粮，以旧换新，甚至接受赊欠。如今呢？盐铁官营了，价格统一了，只收钱了，也变贵了。官府生产出来的铁器大多数是残次品，购买者没有了选择的自由。农民牺牲农时，大老远跑进城来，还常碰上主管铁器专卖的官员不在，只得一趟两趟地跑。于是，穷困潦倒的百姓只好回归到用木棒耕地、用手除草的时代。粮食减产了，吃不起官营的高价盐，百姓就只好吃淡食。以前私营时，农民不必离开耕地，也有充足的好农具可以挑选，如今铁器官营，但官营铁器作坊里的役夫和囚徒没有生产积极性，常常完不成上级布置的生产任务，农民不但买不到适用的好农具，自己还会被抓去无偿打铁。而一旦劣质农具出现积压，卖不出去，官员又会强制摊派，将它们卖给百姓。[(17)]

再如，汉武帝元封元年（公元前110年），桑弘羊在汉武帝的支持下在全国范围内开始推行均输法。按官方定义，均输法即均输官在甲地以低价买进某种特产，再转运至不出产该商品的乙地高价

出售，赚取差价。在盐铁会议上，桑弘羊坚称，自己搞均输是一件“平万物而便百姓”[(18)]、利国利民的大好事。

贤良、文学却毫不留情地指出，他这是赤裸裸的谎言：以前向百姓征税，只征收他们出产的东西，不征他们没有的东西。农夫缴纳农产品，妇女缴纳纺织品。现在，均输法名义上是在当地征收特产，但均输官为了牟取更大的利润，其实际做法是不收当地出产的东西，改为索取当地无法生产的东西。老百姓只好贱卖掉自己的产品，去市场（实际上也是由官府经营）上购买均输官要求的东西。最近我们听说，有的地方在命令百姓生产布絮，还包括齐、阿的细绢，蜀、汉的麻布等产品。官府对他们任意刁难，用欺诈手段强行以低价收购，农民翻倍受苦，重复纳税，根本看不到均输的意义何在。官府滥发命令，关闭城门，垄断市场，什么东西都强行用低价收购，囤积居奇，造成物价飞涨，等市场严重缺货时再高价出售，牟取暴利。官府经商，以低价购入、高价出售，也根本看不到平准的意义何在。[(19)]

换言之，所谓的均输法不过是朝廷以其“无远弗届”的权力在经济领域造成全方位的垄断，操纵物价，贱买贵卖，以牟取暴利。自此，西汉的国家机器自上而下全面商业化、逐利化，民营经济则彻底萎缩、集体退场（据《盐铁论》的记载，与官府合作囤积居奇的商人仍部分存在）。

贤良、文学用事实说话，恼羞成怒的桑弘羊只好诉诸人身攻击：所谓的“文学高第”（即被选为贤良文学的儒生）在才智上必须能够阐明和实施先王的治国之道。不出仕，必须为人师表；出仕后，必须以身作则，供人效仿。你们这群所谓的“文学”谈论治国之道，只会一会儿说尧舜，一会儿说孔子、墨子，真让你们去处理政务就手足无措，可谓嘴上头头是道，现实一事无成，穿着异于乡民的衣冠，能力上无异于凡人。你们被选为贤良、文学，只不过运

气好，并不代表有真实的处理政务的水平，我本来就不该和你们讨论治国之道。[(20)]

贤良、文学的回应是："文学不中圣主之明举，今之执政，亦未能称盛德也。"[(21)]——我们的能力确实有限，但如今庙堂之上执政的官员，能力也高不到哪里去。

在盐铁会议上，桑弘羊多次提及管仲与商鞅，以他们的理念为自己辩护。显见他是管仲和商鞅的忠实信徒。管仲说过，治理天下的首要之务是必须做到"利出一孔"，让百姓只有一条获利渠道。只有做到"予之在君，夺之在君，贫之在君，富之在君"[(22)]，对百姓的恩赐与剥夺、百姓的贫困与富有全部操纵在官府、君王之手，百姓才会视官府为日月，爱君王如父母。商鞅完全继承了管仲的思想。《商君书·弱民》明言"民弱国强，国强民弱，故有道之国，务在弱民"，具体的做法则是"利出一孔，则国多物；出十孔，则国少物。守一者治，守十者乱"。[(23)]

桑弘羊推行的盐铁官营、国家均输正是管仲、商鞅"利出一孔"思想下的产物。

尽管贤良、文学在论辩中将桑弘羊批评得体无完肤，但盐铁会议仅象征性地废除了一项酒类国营专卖政策——打倒了桑弘羊的霍光同样对"利出一孔"怀有浓厚兴趣。他不喜欢桑弘羊，但他喜欢桑弘羊设计的盐铁官营、均输政策，正如他喜欢贤良、文学对桑弘羊的批评，但不喜欢贤良、文学展开批评所依赖的政治、经济理念。

所以，终霍光之世，这场由他推动发起的中国思想史上的伟大辩论始终没有形成任何官方文件，也未被载入任何官方档案；参与论辩的六十余位贤良、文学，也几乎连姓名都没有留下，全部消失

无踪——盐铁会议过去了约三十年后，桓宽在搜集资料，编纂《盐铁论》时，只寻到了四位留下了名或姓的贤良文学，他们是：茂陵唐生，鲁国万生，中山刘子雍，九江祝生。[24]

较之管仲与商鞅，人们将他们遗忘得实在太过迅速。

二、寄望以“天命”约束皇权

与贤良、文学大战桑弘羊大略同期，庙堂与江湖之上另有一批知识分子也正以“天人感应”理论为武器，致力于批判西汉帝国的施政方向。

所谓的“天人感应”理论须回溯至元光元年（公元前134年）。那一年，年过四旬的董仲舒响应朝廷征召贤良的诏书，给汉武帝呈上三篇策论，得到了汉武帝的激赏。[25]他的三篇策论史称《天人三策》。

《天人三策》谈了三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天命”，也就是王朝的合法性。董仲舒说，谁获得天下是由“天命”决定的。灾异是天与人之间的一种对话。国家无道，上天就降下灾害来谴责皇帝和朝廷；屡次谴责、警告无效，上天就会改变初衷，把天下交给其他人，天命就会发生变化。反之，国家有道，上天也会降下祥瑞来表彰皇帝和朝廷。第二个问题是汉帝国的国策，也就是选择黄老之学还是选择儒学。董仲舒支持的是融法家、黄老之学、阴阳家于其中的“新儒学”。第三个问题是教育与选举，也就是如何打通体制外的知识分子进入官僚集团的渠道。董仲舒攻击了现行的三种官员选拔机制：1．郎选，皇帝的近卫、侍臣任期到了可以升迁为官；2．任子，二千石及以上高级官员有资格推荐自己的子弟为官；3．资选，也就是花钱买官。董仲舒认为，现有的三种办法选出来的官

僚“未必贤”，他主张建立一种新的官员选拔机制，由地方每年推荐人才给朝廷，由朝廷量才授官。

围绕着这三个问题，董仲舒提出了五条实质性的建议：

第一条，建立明堂，重塑礼制，以约束贵族（尤其是诸侯王）。

第二条，建立太学，培养官僚。同时从民间选取贤良，为体制外的知识分子开辟入仕通道，重塑汉帝国的统治基础。

第三条，推行天人感应，塑造汉帝国的合法性。

第四条，限制豪绅占田，节制土地兼并。

第五条，以“新儒学”解释儒家经典，以儒家经典统一思想，建立官方意识形态。

第一、二条，刘彻早已在付诸实施。第四条打击参与土地兼并的“官二代”“官三代”，与汉武帝着手打造新的统治基础，也就是变军功集团为官僚集团，可以说是直接相关。至于第三条和第五条，刘彻只喜欢其中的“君权天授”。其余内容，比如董仲舒将民意等同于天意，声称天降灾异即意味着朝廷的统治违背了民意、出了问题，进而试图给皇权套上缰绳。对这些理论，刘彻是没有兴趣的。

董仲舒最终未获刘彻重用，与他试图给皇权套上缰绳有直接关系。祭祀刘邦的高帝庙发生火灾，董仲舒在文稿里说，火灾之所以发生是由于当今圣上不修德，放任田蚡、刘安等权贵横行霸道。主父偃盗取董仲舒的文稿呈给刘彻。刘彻阅后大怒，将文稿交给朝中的御用儒生评议，董仲舒的弟子吕步舒不知文稿出自董仲舒之手，

迎合刘彻，给了一个“大愚”的恶评。刘彻遂抓住“师徒之词迥异”这个把柄，以妄言诽谤之罪，将董仲舒扔进了监狱。[(26)]

刘彻要的只是君权天授。相比孔孟的儒学，他更喜欢用法术、刑名来控制朝廷。但君权天授是一把双刃剑。讲君权天授，必然得讲天人感应；讲天人感应，就得承认上天既会降下祥瑞，也会降下灾异。如此，褒贬现实政治的权力就会不可避免地被下放到知识分子手中。所以，不管刘彻如何选择性地取用董仲舒的理论，最终的结果都会大体相似：汉帝国获得了意识形态上的合法性，知识分子拥有了利用灾异之说“合法”批评现实政治的手段。

“天人感应”的双刃效应在刘彻死后迅速表现了出来。围绕着“君权天授”，皇权与知识分子之间进入了紧张状态，甚至有部分知识分子喊出了要求皇帝禅位的声音。汉昭帝元凤三年（公元前78年）正月，泰山有巨石立起，长安上林苑有枯卧多年的老柳树发出新芽。于是，董仲舒的学生、符节令眭弘跑去跟汉昭帝说：“石头与柳树是草民的象征。泰山是皇室受禅、祭天的地方。如今大石自立、枯柳复生非人力所为，这昭示着必将有匹夫成为天子。先师董仲舒说过，即便是明君，也不可妨碍圣人接受天命。陛下应昭告天下，搜求贤人，承顺天命，将帝位禅让给他，效法殷周，退位为百里之国的诸侯。”[(27)]

眭弘口中的匹夫指的是流落民间的戾太子刘据（汉武帝的太子，死于巫蛊之祸）的后人。朝廷可以用妖言惑众的罪名杀害眭弘，但无法消灭类似的声音。到了“以霸王道杂之”的汉宣帝时代，又有名儒盖宽饶上奏说：“如今儒学衰微，陛下将通刑名之学的人当成周公与召公，拿严刑峻法代替《诗》《书》。《易传》里说过，三皇五帝拥有天下，犹如四季运转，时候到了就要换季。不合天命之人是不能强行占据帝位的。”[(28)]盖宽饶的上奏与其说是劝谏，不如说更像警告和威胁。他的结局是被逼自杀。

到了汉成帝时期，又有名为甘忠可之人，创作了《天官历》和《包元太平经》，书的主旨是“汉家逢天地之大终，当更受命于天，天帝使真人赤精子，下教我此道”。这显然是在公开宣扬汉帝国的天命已经走到了尽头。史载，甘忠可拥有很多信徒，有平民，也有在朝显贵。甘忠可本人遭到了皇权的打击，被下狱，病死。但《包元太平经》仍在民间流传，经他的信徒不断增补、扩充，到东汉顺帝时期，已集成一百七十卷的《太平清领书》。东汉末年声势浩大的黄巾起义即与《太平清领书》有关。(29)

甘忠可并不孤单，与他大略同时代的名儒谷永也曾当着汉成帝的面说道：“天意从来不会独钟一姓，因为天下是天下人的天下，不是某个人的天下。陛下即位以来，忤逆天意，倒行逆施，导致灾难频生，万物夭伤。臣要提醒陛下，若不悔改，依旧实行恶政，天意将会抛弃汉室，另择有德之君！”(30)

皇权不遗余力地打击这些“大逆不道”的言论。但随着时间的推移，说的人多了，皇帝也终于慢慢失掉了自信，开始怀疑甚至默认自己的天命已经走到了尽头。汉哀帝刘欣就是那个失掉了自信的皇帝。

绥和二年（公元前7年），汉成帝暴亡，没有留下子嗣。18岁的刘欣（汉成帝的侄子）被拥上帝位。建平元年（公元前6年）夏，也就是刘欣登基的第二年，一个叫作夏贺良的人跑到长安对他说：“汉朝气数已尽，改朝换代在所难免。刘氏要想继续做皇帝，必须再接受一次天命，必须改纪元、换国号，才能逃过此劫。”夏贺良自称是甘忠可的弟子，他还警告刘欣：“从前成帝不肯接受现实，不愿重新受命，还杀害了我的老师，后来他就绝了后。如今，陛下年纪轻轻，一直疾病缠身，这正是上天对陛下的警告。只有更改纪年，重定国号，改朝换代，才能让陛下延年益寿，早育皇子。”(31)

刘欣被说服了。很快，汉帝国的百姓就看到了这样一份诏书：汉朝建国二百余年，气数已尽。皇天庇佑，又给了我们刘氏一次再受天命的机会。朕无德无能，岂敢抗拒！现在宣布改元更号。建平二年改做太初元年，朕自此成为“陈圣刘太平皇帝”。[(32)]

这份诏书的意思是刘欣自己“推翻”了自己。这是汉帝国的最高统治者破天荒地主动承认自己的王朝气数已尽。随后，围绕着“陈圣刘太平皇帝”出现了各种各样的流言。有人说，陈国是舜帝后裔，刘氏是尧帝后裔，尧传位给舜，而外戚王氏（汉成帝的母亲，孝元皇后王氏的家族）正是陈国后裔。到了太初元年八月，民间对诏书议论纷纷，夏贺良承诺的“嘉应”，也就是祥瑞，却迟迟没有出现。天灾此起彼伏，刘欣的病情也不见好转。为了卸责，夏贺良将问题归咎于朝廷没有更换新的大臣，并向刘欣推荐了几位自己的心腹，建议由他们接任丞相、御史大夫等要职。醒悟过来的刘欣用一道新的诏书取消了“陈圣刘太平”王朝，改回建平二年，并处决了夏贺良。[(33)]

在接下来的一年多时间里，刘欣忙得手忙脚乱。他要把全国被废弃的700多座刘氏神祠重建起来。为了求得先祖的原谅，他还要在这一年里，对着上苍和神祠祷告37000多次。而汉帝国天命已尽的说法已经因为皇帝的闹剧得到了极大的普及。[(34)]

汉帝国“天命已尽”说法的普及让遭刘欣放逐的权臣、外戚王莽（王太皇太后的侄子）看到了机遇。汉哀帝元寿元年（公元前2年）正月，借着日食的机会，亲王莽的政治势力掀起了一场为王莽鸣冤的运动。他们声称，按照天人感应理论，日食出现的原因正是哀帝放逐了王莽这样的“贤人”。压力之下，汉哀帝不得不以年迈的太皇太后王政君需要照顾为由，将王莽召回了朝堂。[(35)]

王莽回归朝堂的第二年，刘欣去世。

(1) 班固：《汉书·眭两夏侯京翼李传》，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3156页。

(2) 班固：《汉书·昭帝纪》，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233页。

(3) 司马迁：《史记·酷吏列传》，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3151页。

(4) 葛剑雄：《夏侯胜与汉武帝“庙乐”之争》，《万象》2000年第1期。

(5) 班固：《汉书·食货志下》，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1176页。

(6) 徐复观：《两汉思想史》第二册，九州出版社2014年版，第116页。

(7) 桓宽：《盐铁论·晁错》，上海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第18—19页。

(8) 桓宽：《盐铁论·论诽》，上海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第54页。

(9) 桓宽：《盐铁论·利议》，上海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第60页。

(10) 桓宽：《盐铁论·散不足》，上海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第65页。

(11) 桓宽：《盐铁论·地广》，上海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第37页。

(12) 桓宽：《盐铁论·地广》，上海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第37—38页。

(13) 桓宽：《盐铁论·论诽》，上海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第56页。

(14) 桓宽：《盐铁论·论诽》，上海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第54—55页。

(15) 桓宽：《盐铁论·地广》，上海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第38页。

(16) 桓宽：《盐铁论·水旱》，上海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第79页。

(17) 《盐铁论·水旱》载贤良、文学之言：“卒徒工匠！故民得占租鼓铸、煮盐之时，盐与五谷同贾，器和利而中用。今县官作铁器，多苦

恶，用费不省，卒徒烦而力作不尽。家人相一，父子勠力，各务为善器，器不善者不集。农事急，挽运衍之阡陌之间。民相与市买，得以财货五谷新币易货；或时贳民，不弃作业。置田器，各得所欲。更繇省约，县官以徒复作缮治道桥诸发，民便之。今总其原，壹其贾，器多坚，善恶无所择。吏数不在，器难得。家人不能多储，多储则镇生。弃膏腴之日，远市田器，则后良时。盐、铁贾贵，百姓不便。贫民或木耕手耨，土耰淡食。铁官卖器不售或颇赋与民。”上海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第79—80页。

(18) 桓宽：《盐铁论·本议》，上海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第4页。

(19) 《盐铁论·本议》载贤良、文学之言：“古者之赋税于民也，因其所工，不求所拙。农人纳其获，女工效其功。今释其所有，责其所无。百姓贱卖货物，以便上求。间者，郡国或令民作布絮，吏恣留难，与之为市。吏之所入，非独齐、阿之缣，蜀、汉之布也，亦民间之所为耳。行奸卖平，农民重苦，女工再税，未见输之均也。县官猥发，阖门擅市，则万物并收。万物并收，则物腾跃。腾跃，则商贾侔利。自市，则吏容奸。豪吏富商积货储物以待其急，轻贾奸吏收贱以取贵，未见准之平也。盖古之均输，所以齐劳逸而便贡输，非以为利而贾万物也。”上海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第4页。

(20) 《盐铁论·相刺》载桑弘羊之言：“所谓文学高第者，智略能明先王之术，而姿质足以履行其道。故居则为人师，用则为世法。今文学言治则称尧、舜，道行则言孔、墨，授之政则不达，怀古道而不能行，言直而行枉，道是而情非，衣冠有以殊于乡曲，而实无以异于凡人。诸生所谓中直者，遭时蒙幸，备数适然耳，殆非明举所谓，固未可与论治也。”上海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第48页。

(21) 桓宽：《盐铁论·相刺》，上海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第49页。

(22) 管仲：《管子·国蓄》，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版，第424页。

(23) 商鞅：《商君书·弱民》，上海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第66—67页。

(24) 桓宽：《盐铁论·杂论》，上海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第125页。

(25) 《天人三策》全文，见董仲舒《春秋繁露·天人三策》，岳麓书社1997年版，第303—324页。

(26) 班固：《汉书·董仲舒传》，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2524页。

(27) 《汉书·眭两夏侯京翼李传》载眭弘之言：“先师董仲舒有言，虽有继体守文之君，不害圣人之受命。汉家尧后，有传国之运。汉帝

宜谁差天下，求索贤人，禅以帝位，而退自封百里，如殷、周二王后，以承顺天命。”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3153—3154页。

(28) 《汉书·盖诸葛刘郑孙毋将何传》载盖宽饶之言：“方今圣道浸废，儒术不行，以刑余为周、召，以法律为《诗》《书》。”又引《韩氏易传》言：“五帝官天下，三王家天下，家以传子，官以传贤，若四时之运，功成者去，不得其人则不居其位。”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3247页。

(29) 班固：《汉书·眭两夏侯京翼李传》，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3192页。

(30) 《汉书·谷永杜邺传》载谷永之言：“垂三统，列三正，去无道，开有德，不私一姓，明天下乃天下之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也。王者躬行道德，承顺天地，博爱仁恕，恩及行苇，籍税取民不过常法，宫室车服不逾制度，事节财足，黎庶和睦，则卦气理效，五征时序，百姓寿考，庶草蕃滋，符瑞并降，以昭保右。失道妄行，逆天暴物，穷奢极欲，湛湎荒淫，妇言是从，诛逐仁贤，离逖骨肉，群小用事，峻刑重赋，百姓愁怨，则卦气悖乱，咎征著邮，上天震怒，灾异娄降，日月薄食，五星失行，山崩川溃，水泉踊出，妖孽并见，茀星耀光，饥馑荐臻，百姓短折，万物夭伤。终不改寤，恶洽变备，不复谴告，更命有德。”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3467页。

(31) 班固：《汉书·眭两夏侯京翼李传》，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3192—3193页。

(32) 《汉书·哀帝纪》载哀帝的诏书：“汉兴二百载，历数开元。皇天降非材之佑，汉国再获受命之符，朕之不德，曷敢不通！夫基事之元命，必与天下自新，其大赦天下。以建平二年为太初元年。号曰陈圣刘太平皇帝。”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340页。

(33) 班固：《汉书·哀帝纪》，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340页。

(34) 班固：《汉书·郊祀志下》，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1264页。

(35) 班固：《汉书·王莽传上》，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4043页。

第六章
天下归心与天人共弃

汉成帝元延元年（公元前12年）正月初八，家住张掖郡觻得县北乡义成里的百姓崔自当想要前往居延县买一些生活用品。居延汉简记录下了他此次出行得以实现的经过：

1．崔自当向当地政府提交申请。

2．一位叫“忠”的基层官员受理了他的申请，他审查了崔的经济状况（逃税、漏税）与犯罪记录，确认其有出行资格。

3．觻得县丞“彭”出具相关文件，发往崔前往居延县必经的两个城关，该文件同时需要有县掾“晏”和令史“建”的附笔（签字）才能生效。[(1)]

所有这些手续，都是为了确保生活在边境地区的崔自当不会逃往匈奴。审查崔的经济状况和犯罪记录，是为了确保他没有逃亡的动机，而且崔只能在居住地和特定的目的地之间流动。毕竟，只有将人口控制在汉帝国的疆域以内，汉帝国才是真正的帝国。

小民崔自当出门的故事，显示了汉帝国对自己在边境地区的统治并无自信。新莽政权正是在汉帝国丧失自信，知识界也在激烈批判汉帝国、说它天命已尽的背景下诞生的。王莽登上帝位之时，可谓前所未有的天下归心。但仅仅过了十五年，新莽政权就从天下归心走向了天人共弃，王莽也丢掉了自己的脑袋。

从统治术的角度来审视，王莽究竟做错了什么？

一、表演赢得万民拥戴

王莽能够得到知识分子的认可，与他近乎变态的政治表演有直接关系。比如，在遭汉哀帝逐出京城、在封地闲居期间，王莽曾逼迫儿子王获自杀，原因是王获杀死了一名家奴。这样极端的做法给王莽带来了极高的声望。史载，王莽在封地闲居的三年里，“吏民上书冤讼莽者百数”，有上百人给朝廷递陈情书，认为王莽遭受到了不公正待遇，要求皇帝将他召回朝堂。[(2)]

同行的衬托也让闲居期间的王莽形象变得更加高大。汉哀帝刘欣为重塑皇权，驱逐已故汉成帝的王氏外戚，提拔重用与自己有姻亲关系的丁氏、傅氏。结果，丁、傅两家外戚皆以不学无术与贪得无厌闻名。两相比较，汉帝国的知识分子很自然地怀念起了遭驱逐的王莽。也是因为这个缘故，王莽才能在元寿元年，趁着发生日食的机会运作舆论，成功迫使汉哀帝将自己召回朝堂。

汉哀帝去世后，太皇太后王政君第一时间移驾未央宫，部署王氏子弟控制朝廷中枢，急派使者召王莽入宫，掌控兵权。属于王莽的表演时代就此全面开启。

汉平帝元始四年（公元4年），王莽奏请重修了明堂、辟雍和灵台等礼仪性建筑。明堂、辟雍和灵台是存在于儒家经典中的建筑。明堂是上古帝王宣扬政教的所在，辟雍是上古帝王设立在京城的最高学府，灵台是上古的天文台，是天子直接与上天交流的地方。这些缥缈的礼仪性建筑是上古时代圣人的标志。大约同期，王莽还奏请为长安城的儒生修筑了舒适的高级住宅和用来聚会、发表演说的广场。他还在太学恢复了《乐经》，增加了博士的名额，征召天下学者前往长安参与重制礼乐……[(3)]

王莽的举措高度契合了儒家知识分子的政治理想。所以，只要王莽稍加运作，长安城内就出现了对朝廷汹涌澎湃的批评。元始五年（公元5年）正月，未央宫里堆满了来自“民间”的抗议信。写

信者既有支持王莽的“普通百姓”，也有许多王公、列侯与刘氏宗亲。写信的缘由是王莽推辞了朝廷奖赏的田地，引发了“百姓”的极度不满，他们批评王莽的作风太过谦让，又批评朝廷对王莽的赏赐太过迟缓、太过微薄。史载，“吏民以莽不受新野田而上书者前后四十八万七千五百七十二人”。[(4)]

堆积如山的抗议信将年幼的汉平帝吓坏了。王莽继续表演，再次拒绝了“百姓”的要求。“百姓”的情绪配合着他的拒绝，随之达到了高潮。他们要求朝廷直接将王莽认证为当代周公。以富平侯张纯为首的公卿大臣、士大夫、博士、议郎等高级知识分子，共计九百零二人，浩浩荡荡前往皇宫请愿，要求对“功过伊、周”的王莽速速执行九锡之赏，意即赐予王莽介于皇帝与诸侯王之间的崇高地位。[(5)]

此时的王莽是执掌“宰衡”大权的安汉公，权力已至巅峰。九锡之赏的有无并不影响他对汉帝国的实际控制，但王莽没有拒绝九锡之赏，因为这是《周礼》记载的终极荣誉，只有周公这样的伟大人物才有资格得到。成为当代周公对王莽而言意义非凡。元始五年（公元5年）五月，王莽在一场盛大的仪式上接受了传说中的九锡之赏，无人知晓仪式是否合规，因为六百多年前的礼仪规矩早已失传。

同年秋天，王莽派出去巡视天下风俗的“八方使者”陆续回到了长安。他们带回了“天下风俗齐同”的好消息，说民间的风俗已在王莽的引领下回归纯朴，百姓的生活也在王莽的关怀下走向美满。他们还带回了“百姓”赞颂王莽的诸多歌谣，总计达三万余字。

也是在这一年，王莽提出了自己的终极政治理想：“市无二贾，官无狱讼，邑无盗贼，野无饥民，道不拾遗，男女异路之制，

犯者象刑。”[(6)]

根据天人感应理论，王莽创下了如此伟大的功业，上天理应赐下相应等级的祥瑞。于是，南方的越裳氏献上了白雉，东方的黄支上贡了犀牛，北方的匈奴变更了首领的称呼以示归顺。西方迟迟未见动静，王莽就自己动手来弥补遗憾。他派人带着黄金贿赂一位羌族酋长，将他带到了长安。这位拿人手短的酋长告诉汉帝国的百姓，他们感激安汉公（王莽）的英明神武，甘愿退回深山老林，献出现在拥有的肥沃土地。“四夷宾服”之后，王莽在羌族故地设立新郡，且根据《周礼》的记载，将汉帝国的行政区域重新划分为十二州，以宣示西周盛世得到了复兴。[(7)]

如此种种，让诸多对“以霸王道杂之”的汉帝国心存不满的儒生热血沸腾。

扬雄就是其中之一。这位患有严重口吃的大学者在40岁那年离开蜀地，来到京城。他没有任何背景，历经三朝，仍是个小小的黄门侍郎，多年来清心寡欲，埋头于自己的学术研究。元始四年，蜀中的一位大富豪听说扬雄正在撰写新著《法言》，带上十万钱来到长安，希望能够在书中留下自己的名字与事迹，却被扬雄拒绝。[(8)]这样耿直的扬雄却在《法言》一书中为王莽留下了一段极尽歌颂之能事的文字：

> 周公以来，未有（安）汉公之懿也，勤劳则过于阿衡。汉兴二百一十载而中天，其庶矣乎！辟雍以本之，校学以教之，礼乐以容之，舆服以表之。复其井、刑，勉人役，唐矣夫。[(9)]

在扬雄的眼里，王莽是周公之后当之无愧的“圣人”。他勤于政务，建辟雍、立学校、制礼乐、定舆服，恢复井田和象刑，引导

汉帝国走向中兴，实在是堪比尧、舜的伟大人物。这些话大概率是扬雄的肺腑之言，因为扬雄不是一个谄媚之人，也因为同时代的其他儒生，比如治《春秋》的权威左咸、治《诗》的权威满昌、治《易》的权威国由、治《书》的权威唐昌、治《礼》的权威陈咸、治《乐》的权威崔发也都对王莽有过相似的认同。[10]

所以，一切都显得水到渠成。公元8年腊月，王莽在一片欢呼声中被拥上了帝位。新莽取代了汉，长安城变成了欢乐的海洋。没人在意王莽受禅前夕的那些弄虚作假（比如盲流哀章伪造了受禅天命），那些都是无足轻重的细节。重要的是，上古的禅让终于重现，一个“内圣外王”的领袖终于诞生，一个有别于“以霸王道杂之”的时代即将到来。

一支由“五威将”领导的宣传队伍迅速组织了起来，被派往了新朝的各个角落。他们的任务是宣传王莽做皇帝是如何的天命所归，如何的无可推辞。

二、改革诱发土崩瓦解

新莽政权存在的十五年里，王莽启动了一系列改革，具体包括：

1．恢复井田制。王莽在诏书中写道：天下田地全部更名为王田，不得买卖。家中男丁不足八人、田地超过一井者，多余的田地须分给九族、邻里和乡党。以前没有田地的按制度去领取田地。有敢于非议井田制、惑乱群众者，参照舜帝当年的成例，抓起来流放四夷。[11]

2．释放奴婢。作为一种私有财产，奴婢的数量在西汉极为庞大，共约有官、私奴婢230万之多（西汉末年的数字可能要更高一些），其中绝大多数是私奴婢（汉元帝时朝廷有“诸官奴婢十万余

人”）。对一个约有5800多万编户人口的国家而言，这个比例其实是很高的，会严重影响到朝廷征收税赋、徭役与兵役的体量。[(12)]

3．改革币制。王莽的货币改革算的不是经济账，而是政治账。政治账有两笔，第一笔见于王莽的诏书：我当年为了挽救大汉，而推出以刀币取代圆钱的币制改革。然而如今刘汉已亡，天命在我。“刘”（繁体字为“劉”）乃卯、金、刀的组合，所以金刀钱已经不符合天意和民心，应该彻底废除。[(13)]第二笔见于某个不知姓名之人的上书，说什么“古者以龟贝为货，今以钱易之，民以故贫”[(14)]——放弃贝壳，改用铜钱是百姓贫困的根源，这番谬论还得到了大臣师丹的认同。对王莽来说，铜钱是不是导致百姓贫困的原因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他认定周公时代使用的钱币就是龟、贝，而自己要做的正是当代周公。所以，龟、贝在退出货币系统数百年之后，再次在新莽时代粉墨登场。

4．盐、铁、布帛等商品生产、销售的国有化，其理论依据依然是儒家经典著作。比如，新莽的羲和（大司农）鲁匡主张国家控制酿酒业的理由有二：第一，据《诗经》记载，太平年代酿酒业是控制在官府手里的。孔子说过，衰乱之世酿酒业才操纵在百姓手里。第二，酒水官营才有质量保证，放开民营一定会造成质量低劣。[(15)]这两条理由，一是硬凑教条，二是想当然的胡说八道。

5．官名、地名改革。在王莽看来，一个伟大的盛世必须要配以众多伟大的名称，才能名副其实。而那些伟大的名称包括官职名称和地理名称，都存在于《周礼》《礼记》等古代圣贤的名著里。王莽需要做的就是把那些光怪陆离的官职名称和地理名称从古籍中翻查出来，古籍中找不到的，则以吉利的政治寓意为第一位。比如将琅玡郡改名“填夷郡”、陇西郡改名“厌戎郡”、天水郡改为“填戎郡”、雁门郡改为“填狄郡”、代郡改为“厌狄郡”、诸暨

县改为“疏虏县”、黟县改为“愬虏县”、武都县改为“循虏县”……[16]

王莽的五项改革当中，改官名、改地名给百姓的日常生活造成了极大的麻烦；盐、铁、布帛生产、销售的国有化也极大地增加了百姓生产、生活的负担；货币改革更是让百姓回到了以物易物的上古时代。但对王莽的权位来说，这些都无关紧要，因为受到损害的主体是百姓而非权贵、官僚集团，后者才是王莽的统治基础。

而让新莽政权短命夭折的是王莽的前两项改革——恢复井田和释放奴婢。后者很容易理解——奴婢是权贵、官僚的私产。释放奴婢可以增加朝廷编户民的数量，增加朝廷的纳税户和徭役户，就等于从权贵、官僚手里抢钱。恢复井田的情况则要稍微复杂一些。

按王莽的说法，恢复井田的目的是为了抑制兼并。土地兼并对秦制政权而言，自然不是好事，因为它会直接导致两种后果：1. 朝廷直接控制的土地和人口减少，进而影响到赋税收入和兵役、徭役的数量。2. 田主，也就是大宗土地的拥有者，有可能变成割据势力，变成在全国有影响力的门阀世族。两种后果都不利于政权稳定。故而，“直至宋以前，土地兼并一直不为国家所认可，且为历代政府重点打击的目标”[17]。

至于王莽所宣传的抑制土地兼并是为了普通百姓，他的话是否成立，要分情况来看。中国历史上存在两种土地兼并，一种是自耕农主动将土地卖给他人，一种是豪族利用手中的政治权力将自耕农及其土地吞并。后者不必赘言，历史上凭借政治权力而拥有大量土地的豪族数不胜数。直到近代也还有很多依赖枪杆子而起的军阀地主。豪族的土地兼并自然是坏事，说打击它们有利于普通百姓，自然是成立的。但第一种土地兼并未必全然对百姓有害。

自耕农主动卖地有多种原因，其中最重要的一种是为了逃避官府的剥夺。清乾隆时期，做过广东学政的李调元写过一篇文章，叫作《卖田说》，是讲自耕农卖地的经典文章。

李调元是罗江（今四川省德阳市罗江区）人。《卖田说》记录了他家乡的一位自耕农王泽润卖掉耕地后的愉快心情。王泽润给李调元算了一笔账，来解释自己为何卖了地，做了佃农，还非常高兴。王说：卖田之前，自己是一个有十亩地的自耕农，十亩地的出产可以支持一个十口之家的生计。当地官府按田亩分摊赋税，“每十亩征银三分。每分加平三分三厘，则一钱矣”，交完赋税，还可以勉强维持全家的生计。但是偶尔遇上大事，官府会加征赋税，“每钱加至一两”，他家的生活凑合过得去。但问题是，官府不是偶尔加征一次，而是每年加征十次、二十次，搞得他苦不堪言。官府的诸多开支，乃至官老爷请客吃饭的酒席钱，也要按田亩向百姓征收。正如李调元在文中总结的：“十亩之田，不足以食十口家。如有五子而十亩五分，各耕不过二亩，亩之所入，不敌所出，故不如卖田以佃田。”

农户卖了田，给地主做佃户，能更好地维持生计吗？

王泽润告诉李调元，他每亩田卖了“五十千缗”，卖掉十亩，可以得到“五百千缗”。他用卖田的钱做压佃的本钱，他还说：“每五千缗可压田一亩，五百千缗可压田一百亩，既足食，以免家室之饥寒；又无粮，以免官役之追呼。”（注：压田，一般又做“押田”，是当时流行的一种以低于田地实际价格的费用获取田地使用权的方式。）卖了自家的田换来的一百亩押田足够王泽润一家温饱，还可以免除官府的税赋。他种田的产出和田主平分，减去成本，留下一小半。他和家人干农活闲暇的时候，还可以织布，养一点鸡鸭，积攒下钱，还可以买牛犊、养牛，生活确实比种自家的田给官府缴纳田赋好得多。

王泽润这么一说，李调元也不想种自己的地，打算卖了田，做佃户，押田来种。王泽润告诉他："君曾为达官，有直声，官犹待以礼也。租有家丁代完，粮差不敢迫也。又例免差徭，里正不敢及门也。所冀者，须世世子孙读书有官耳。若一日无官，诚恐亦与我辈等也。"官员不仅可以免除徭役，税赋还有家丁代劳前去缴纳，官府的粮差、里正不敢催促、逼迫。李调元一听，送走王泽润，赶快告诉他的子孙，要勤奋读书，将来考取功名，保住官员的身份。因为没有了官员的身份，就会变成和王泽润一样，日子想过得好一点，只能卖掉自家的田，租种地主的田。(18)

李调元在《卖田说》中描述的皇权（及其代理人）、豪族与自耕农之间的"压榨—逃亡—庇荫"游戏贯穿了中国的整个秦制时代。自耕农主动把田地卖给豪族的土地兼并相当于给了自耕农一条逃避皇权（及其代理人）残酷压榨的生路。当然，这里并不是要赞颂豪族兼并。自耕农遁入豪族寻求荫庇，只是一种两害相权取其轻，迫不得已的谋生手段。

回到西汉，如前文所言，秦制时代的土地兼并有两种情况，一种是自耕农主动卖地，一种是被迫卖地。同样，在秦制时代，有能力参与土地兼并的也有两类人。一类是循正规途径，通过耕作、经商致富的人，用金钱购买田宅，成为大宗土地的拥有者，可以称之为"经营性田主"。一类是手中握有政治权力的人，以权力寻租，成为大宗土地的拥有者，可以称之为"寻租性田主"。

这两类人对皇权构成的威胁是大不相同的。

秦制政权"普天之下莫非王土"，不保障任何人的私有财产，随时可以用政策将私人财产收归国有。"经营性田主"没有政治后盾，面对朝廷汲取，往往形同蝼蚁，一碾即碎。司马迁在《史记·货殖列传》中说："皆非有爵邑奉禄弄法犯奸而富，尽椎埋去就，

与时俯仰，获其赢利，以末致财，用本守之。”[19]汉初有许多没有爵位和俸禄，凭借舞文弄墨、作奸犯科致富的人，他们靠经商发了财，购买田宅，经营农业成了大宗土地拥有者。汉武帝对付这类人有的是办法。比如，征收算缗，鼓励告缗，即以收资产税（商业性收入）为名，鼓励百姓举报未纳税的有钱人，搞到“杨可告缗遍天下，中家以上大抵皆遇告”“商贾中家以上大率破”[20]的程度。再比如，推行均输、平准政策，由官府全面垄断民间商业，直接切断了经营性田主的致富之路。

但是，真正能够对皇权造成威胁的是那些寻租性田主。史载，自汉武帝中晚期开始，寻租性田主即成了土地兼并的主力军。朝廷为了解决流民问题（主要是皇权的横征暴敛造成的流民问题，《汉书》中有多处记载称武帝时代“天下户口减半”，可见流民问题之严重）而拿出来分给流民耕种的公田也多遭寻租性田主霸占，造成一种“豪民侵陵，分田劫假，厥名三十，实什税五”[21]的顽疾——为吸引流民重新成为朝廷的编户民，他们耕种的公田只需要按三十税一缴纳税赋，而寻租性田主利用手中的政治权力把朝廷的公田控制在自己手里（比如让亲属伪装成流民或编造并不存在的流民来认领公田），再租给真正的流民，向他们榨取高达50%的田租。《盐铁论》把以上顽疾总结为：“公家有障假之名，而利归权家。”[22]——皇权只得了个虚名，真正的利益和财富全被权贵和豪族拿走了。

汉武帝可以轻松碾碎“经营性田主”，但直到他死之日，始终拿“寻租性田主”没有办法。因为这些人构成了他的统治基础。抑制土地兼并固然有助于维护皇权，但若因此开罪权贵和豪族，开罪皇权的统治基础，那就得不偿失了。所以，终西汉之世，权贵、豪族对土地的兼并始终没有能够得到有效抑制。

王莽代汉后，雄心勃勃地想要解决土地兼并的问题，进而使皇权掌握更多的土地和编户民，故强硬推出了“王田制”。按王田制，天下所有耕地收归国有，不许买卖，家中男丁不超过八人、拥有土地却超过一井（可能相当于900亩）的须把多余的土地交出来，分给其他没有田的人。王莽改革的初衷是巩固皇权，增加皇权可汲取的财富和人力，但他改革的手段直接损害了新莽政权的统治基础，也就是权贵、豪族与官僚的利益。

与自己的统治基础作对是一件风险非常高的事情。在王莽的新政之下，“坐卖买田宅、奴婢，铸钱，自诸侯、卿大夫至于庶民，抵罪者不可胜数”[(23)]，大批权贵、豪族因为王田制而获罪。于是这些曾经拥护王莽称帝的权贵、豪族纷纷弃他而去，成了推翻新莽政权的核心力量。比如，魏成大尹李焉与卜者王况的造反理由之一即王莽登基之后，“民田奴婢不得卖买……百姓怨恨”[(24)]；出身陇右大族的隗嚣起兵的檄文里也把“田为王田，卖买不得”[(25)]直接列为王莽的罪状。

同时，号称要让每户自耕农都拥有土地的王田制推行下去之后，却加剧了流民问题。王莽地皇二年（公元21年），左将军公孙禄曾面对面批评王莽和他的王田制，其中提到：“明学男张邯、地理侯孙阳造井田，使民弃土业……宜诛此数子以慰天下！”[(26)]张邯、孙阳搞出井田，使百姓不得不抛弃土地，沦为流民，应该诛杀他们以谢天下。公孙禄自然不至于当着王莽的面子虚乌有地污蔑他。赤眉、铜马等流民集团也确实出现在王田制颁布之后。

为什么一项旨在让自耕农人人有地的政策会导致自耕农集体变成流民？

道理并不复杂。不搞王田制，当小自耕农无法承受来自皇权及其代理人的剥削时，至少还能投入寻租性田主的怀抱寻求荫庇；搞

了王田制，小自耕农的荫庇没有了，他们无法承受皇权及其代理人剥削的时候，就只能选择抛弃土地，去做流民。多一种可以用脚投票的次坏选择总比只有一种最坏选择要好——当然，这并不是要赞美那些寻租性田主。

王莽地皇四年（公元23年）秋天，起义军逼近长安。不知所措的王莽再次遵循《周礼》的指示——“国有大灾，则哭以厌之”，率领群臣来到南郊，集体向天地哭诉。这个白发苍苍、年近七旬的老人颓然跪在祭坛上，絮絮叨叨地回忆、诉说着自己获得帝位的前后经过，最后悲愤地仰天质问：“皇天既命授臣莽，何不殄灭众贼？即令臣莽非是，愿下雷霆诛臣莽！”[(27)]王莽捶胸大哭，几乎昏厥。

这年十月，王莽在长安死于乱军之中，他留在史书上的最后一句话是：“天生德于予，汉兵其如予何！”[(28)]他那白发苍苍的头颅，被送到宛城高高悬挂起来，成了当地百姓“提击”的目标，还有人偷偷割走了他的舌头。

三、光武帝君臣的反思

汉光武帝建武元年（公元25年），刘秀在新莽的废墟上建立了东汉王朝。自建国伊始，刘秀和他的大臣们就一直在思考两个问题：1．西汉为什么会被王莽和平取代？2．万民拥戴的新莽政权为何会短命而亡？

君臣的思考结果化为历史教训，历史教训再化为现实政策。为避免重蹈西汉与新莽的覆辙，刘秀推行了两项改革。

第一项改革是在学术领域支持今文经学，疏远古文经学。这两派的区别，简单说来就是：古文经学主张回归儒家经典本身，今文经学更看重后人对经典的诠释。具体到汉代的政治思想领域，相比

古文经学，今文经学更重视谶纬，也就是依据天人感应之说从儒家经典中寻章摘句来言说天命吉凶。自汉武帝以降，西汉所有的皇帝都喜欢今文经胜过古文经，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今文经学与怪力乱神的谶纬之学纠缠在一起，玩的是割裂文辞、牵强附会的游戏，不像古文经学那样动辄拿出孔孟之言来对社会问题展开批判。支持今文经学，既可以用谶纬来强化皇权的合法性，也可以削弱知识分子的批判意识。刘秀登基初期，为笼络在野知识分子，曾一度将古文经《左氏春秋》立为官学。待他权位稳固，又将《左氏春秋》从官学里剔除，理由是搞古文经的学者不懂谶纬，不能为东汉王朝的合法性添砖加瓦。[(29)]

对那些不认同今文经学、不愿意玩谶纬游戏之人，刘秀是极不喜欢的。桓谭是一位古文经学家，“遍习《五经》，皆诂训大义，不为章句”，做学问只重视书中表达的思想主旨，不玩割裂章句、附会谶纬的把戏。而且，他非但自己不玩，还两次冒死上奏，劝谏光武帝也不要玩。他在奏章里说：先王、先贤的著述均以仁义正道为本，不妄谈怪力乱神。圣人也难以参透天道，从贤者子贡而下已无人得闻天道，后世那些浅薄的儒生就更不要奢望。如今那些妄谈谶纬的都是小人，陛下要远离他们。他们偶然说对了，也不过如同猜数字的单双，只是运气所致。刘秀读了桓谭的奏章之后很不高兴。稍后，刘秀想要修一座灵台，故意询问反对谶纬的桓谭：“我想用谶来做决定，你以为如何？”如其所料，桓谭梗着脖子回答：“臣不读谶。”刘秀遂借机给桓谭扣了一顶“非圣无法”的帽子，欲将他下狱，斩杀。70岁的桓谭“叩头流血”，良久才免于一死，被逐出了京城。[(30)]另一位大儒郑兴也是古文经的拥护者。刘秀曾与他谈论郊祀之事，问道：“我想用谶来决定祭祀的方案，你以为如何？”郑兴回答：“臣不为谶。”刘秀同样当场翻脸，逼问他：“你不为谶，难不成你是反对谶？”郑兴被吓了个半死，跪下，诚惶诚恐地解释：“臣于书有所未学，而无所非也。”他说自己只是

没有学会谶纬之术，并没有任何反对谶纬的意思，才保住了一条性命。[(31)]

刘秀的第二项改革是颁布官修典籍，由朝廷来垄断谶纬的解释权。这主要为了防止谶纬失控，走向对东汉王朝不利的方向。所谓谶纬是谶书和纬书的合称，谶是秦汉间方士化儒生编造的预示吉凶的隐语，纬是汉代神学迷信附会儒家经义衍生出来的谈论天命的书籍。因为刘秀的提倡，谶纬在东汉被视为“内学”，正经的儒家经典反沦落成了“外学”。自起兵反抗新莽到成为东汉的开国皇帝，刘秀长期使用谶纬作为工具来为自己的军事、政治活动服务。他可以因某些人的姓名与谶纬相合，就起用他们为官，也可以与割据蜀地的公孙述展开谶纬之战，来回辩论天命究竟在谁身上。所以，史称“帝（刘秀）方信谶，多以决定嫌疑”[(32)]。为了将谶纬的解释固定下来，刘秀将谶纬定为洛阳太学的必修课程，大力征召全国通晓谶纬的儒生前来洛阳校订谶纬典籍。建武中元元年（公元56年），也就是刘秀去世的前一年，整理谶纬典籍的工作终于大功告成，朝廷下诏“宣布图谶于天下”[(33)]。官方颁布了《河图》《洛书》（合45篇）及七经之《纬》（合36篇），总计81篇，作为解读谶纬的经典。皇权由此彻底垄断了对谶纬的解释权，任何私造谶纬的行为都不再被允许。

刘秀的两项有关谶纬的政策分别针对西汉知识分子的社会批判意识和西汉末年以天命约束皇权的思想潮流。刘秀希望以“怪力乱神”的今文经学来弱化前者，以皇权垄断谶纬的解释权来消弭后者。他也确实部分达成了自己的目的。但对皇权有利并不意味着对社会有利。在朝廷尊儒政策的引导下，东汉社会长期处于一种“全民好学”的氛围。官学繁盛自不必说，开设私学的名师的弟子多至数百，乃至数千人也是常态，还出现了不少几代人专门研读一部经书的世家大族。但好学的气氛又非常诡异，因为绝大多数人学习的

内容是怪力乱神的谶纬儒学——不但官学如此，私学也一样。谶纬与知识分子个人的上升渠道捆绑在一起，若不教谶纬之学，私学就会收不到学生。结果是大量的读书人被方士化了，虽名为儒生，但并没有成为真正的知识分子，全民向学，却什么也没有学到。

光武帝之后，规模最大的一次对西汉灭亡和新莽短命而亡的反思来自汉章帝。建初四年（公元79年）冬天，汉章帝召集一干学者，在皇宫内的白虎观举办了一场学术会议，会议的主旨是要以思想立法的形式，来规范百姓方方面面的行为。会议的成果由班固等人编成《白虎通》一书，在全国发行。中国秦制时代臭名昭著的"三纲"——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就此正式成为官方认定、强制推行的意识形态。

根据《白虎通义》中的要求，合格大臣的基本标准是"善称君，过称己。臣有功，归于君"，功劳是皇帝的，过错是自己的。好儿子的基本标准是只要父亲活着，就"不得许友以其身，不得专通财之恩"，也就是说，儿子不能自己决定自己的事情，也不能自由支配自己的财产。还有"父子一体而分，无相离之法"，父子不可以分开，即使父子之间发生了不可调和的矛盾。更甚的是《白虎通义》对女性的要求。女性必须拥有"顺德"，即柔顺的美德，在家扮演女儿，出嫁扮演妻子的角色，都要对家中的男性——父亲、丈夫、儿子唯命是从。[(34)]针对女性，《白虎通义》还特别制定了"妇人无爵"的规定："妇人无爵何？阴卑无外事，是以有'三从'之义：未嫁从父，既嫁从夫，夫死从子。"什么是"妇人无爵"？就是女性作为"阴卑"之人，没有社会属性（"无外事"），只有"三从"（"未嫁从父，既嫁从夫，夫死从子"）的家庭属性。这相当于是用法律的形式将女性定义为男性的附属品。[(35)]

汉章帝召集学者在白虎观召开学术会议，针对的是西汉知识分子公开批评朝廷政策的风气，以及西汉末年太后常常成为皇权代理人、进而导致外戚坐大的现象。“君为臣纲”的目的是消灭知识分子的批判之声，“夫为妻纲”“妇人无爵”的目的是消灭太后与外戚势力，“父为子纲”则是汉帝国以孝治天下的具体化。

皇帝希望参与制定三纲之人成为遵守三纲的楷模。受了三纲之害的贵戚、朝臣和知识分子则更乐见制定三纲之人带头违反三纲，陷入罗网。于是，在众人的审视下，负责将白虎观经学会议的结果编撰成书的班固和他的家人就成了三纲的第一批受害者。班固早年特别欣赏屈原，在文章里说过“和氏之璧，千载垂光，屈子之篇，万世归善”[36]这样的话。三纲出炉后，班固只好另写文章，违心批判屈原不该“露才扬己”，不该“责数怀王”，不该“沉江而死”，实在不是一个标准的忠臣。[37]班固的妹妹班昭，即使自身才华横溢，也不得不在婆家谨小慎微地过着低眉顺眼、低人一等的生活。她后来在《女诫》里说，自己嫁到曹家后，“战战兢兢，常惧绌辱，以增父母之羞，以益中外之累”，在夫家四十多年，熬到公公、婆婆、丈夫都死了，“乃知免耳”，才稍稍过了几天轻松的日子。[38]

---

(1) ［日］大庭修著，林剑鸣等译：《秦汉法制史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487页。

(2) 司马光：《资治通鉴》卷三十五，中华书局1956年版，第1114页。

(3) 班固：《汉书·王莽传上》，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4069页。

(4) 班固：《汉书·王莽传上》，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4070页。

(5) 班固：《汉书·王莽传上》，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4072页。

(6) 班固：《汉书·王莽传上》，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4076页。

(7) 班固：《汉书·王莽传上》，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4077页。

(8) 《论衡·佚文》：扬子云作《法言》，蜀富人赍钱千万，愿载于书。子云不听："夫富无仁义之行，圈中之鹿、栏中之牛也，安得妄载？"

(9) 扬雄：《扬子法言译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212页。

(10) 班固：《汉书·王莽传中》，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4127页。

(11) 《汉书·王莽传中》载王莽的诏书："今更名天下田曰'王田'……皆不得卖买。其男口不盈八，而田过一井者，分余田予九族邻里乡党。故无田，今当受田者，如制度。敢有非井田圣制，无法惑众者，投诸四裔，以御魑魅，如皇始祖考虞帝故事。"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4110—4111页。

(12) 尚新丽：《西汉人口数量变化的社会因素》，《河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3年第3期。

(13) 《汉书·王莽传中》载王莽的诏书："予前在大麓，至于摄假，深惟汉氏三七之厄，赤德气尽，思索广求，所以辅刘延期之术，靡所不用，以故作金刀之利，几以济之……赤世计尽，终不可强济。皇天明威，黄德当兴，隆显大命，属予以天下。今百姓咸言皇天革汉而立新，废刘而兴王。夫'刘（劉）'之为字'卯、金、刀'也，正月刚卯，金刀之利，皆不得行。"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4112页。

(14) 班固：《汉书·何武王嘉师丹传》，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3506—3507页。

(15) 《汉书·食货志下》载鲁匡之言："酒者，天之美禄，帝王所以颐养天下，享祀祈福，扶衰养疾。百礼之会，非酒不行。故《诗》曰'无酒酤我'，而《论语》曰'酤酒不食'，二者非相反也。夫《诗》据承平之世，酒酤在官，和旨便人，可以相御也。《论语》孔子当周衰乱，酒酤在民，薄恶不诚，是以疑而弗食。今绝天下之酒，则无以行礼相养；放而亡限，则费财伤民。"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1182页。

(16) 邢艺谡、李建雄：《地名改易所见王莽时期的民族问题研究》，《衡阳师范学院学报》2017年第4期。

(17) 王家范：《权力背景下"土地兼并"辨》，见王家范：《中国历史通论（增订版）》，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2年版，第126页。

(18) 李调元：《卖田说》，见李调元：《童山文集》卷十一，商务印书馆1936年版。

(19) 司马迁：《史记·货殖列传》，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3281页。

(20) 司马迁：《史记·平准书》，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1435页。

(21) 班固：《汉书·食货志上》，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1143页。

(22) 桓宽：《盐铁论·园池》，上海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第30页。

(23) 班固：《汉书·王莽传中》，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4112页。

(24) 班固：《汉书·王莽传下》，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4166页。

(25) 范晔：《后汉书·隗嚣公孙述列传》，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516页。

(26) 班固：《汉书·王莽传下》，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4170页。

(27) 班固：《汉书·王莽传下》，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4187—4188页。

(28) 班固：《汉书·王莽传下》，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4190页。

(29) 汉章帝时，古文经学家贾逵在给皇帝的上书中说："至光武皇帝，奋独见之明，兴立《左氏》《穀梁》，会二家先师不晓图谶，故令中道而废。"见范晔：《后汉书·郑范陈贾张列传》，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1237页。

(30) 《后汉书·桓谭冯衍列传上》载桓谭之言："观先王之所记述，咸以仁义正道为本，非有奇怪虚诞之事。盖天道性命，圣人所难言也。自子贡以下，不得而闻，况后世浅儒，能通之乎！今诸巧慧小才伎数之人，增益图书，矫称谶记，以欺惑贪邪，诖误人主，焉可不抑远之哉！"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959—960页。

(31) 范晔：《后汉书·郑范陈贾张列传》，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1223页。

(32) 范晔：《后汉书·桓谭冯衍列传上》，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959页。

(33) 范晔：《后汉书·光武帝纪》，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84页。

(34) 徐广东：《三纲五常的形成和确立：从董仲舒到〈白虎通〉》，黑龙江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103—127页。

(35) ［日］西嶋定生：《二十等爵制》，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92年版，第320页。

(36) 《奏记东平王苍》，见范晔：《后汉书·班固传》，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1331页。

(37) 王逸、洪兴祖、朱熹：《楚辞章句补注·楚辞集注》，岳麓书社2013年版，第49页。

(38) 班昭：《女诫序》，见范晔：《后汉书·列女传》，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2786页。

第七章
皇权、宦官与士人

就统治技术而言，秦制王朝的亡国原因，总结起来无非三条：

1．外敌的压迫或入侵；

2．内部利益集团（也就是统治基础）发生分裂；

3．底层民众脱离原子化状态，变成有组织的力量。

第一条大体属于不可抗力，第二、三两条大体属于统治技术问题。具备其中任何一条，都有可能导致秦制王朝的灭亡；如果同时具备两条、三条，灭亡的概率更大。秦朝的灭亡主要缘于第二、第三条：胡亥整肃、屠杀官吏集团，六国旧人在民间尚有组织能力。西汉的灭亡主要缘于第二条：九百余名公卿大臣、士大夫、博士、议郎联名要求赐予王莽九锡之赏，可知西汉帝国的统治基础已经集体抛弃了刘氏。新莽的灭亡也缘于第二、第三条：王莽的土地改革严重损害了官僚集团的利益，流民的大规模出现则将原子化的百姓变成了有组织的集体。

东汉王朝的灭亡原因也大体如此。由宦官曹腾的发迹切入，可以清晰地看出其中关窍。

一、曹腾巨额财富的由来

按《后汉书》的说法，曹操的祖父曹腾可谓特别的“出淤泥而不染”：

> 腾用事省闼三十余年，奉事四帝，未尝有过。其所进达，皆海内名人，陈留虞放、边韶，南阳延固、张温，弘

农张奂，颍川堂谿典等。时蜀郡太守因计吏赂遗于腾，益州刺史种暠于斜谷关搜得其书，上奏太守，并以劾腾，请下廷尉案罪。帝曰："书自外来，非腾之过。"遂寝暠奏。腾不为纤介，常称暠为能吏，时人嗟美之。[(1)]

曹腾侍奉四代皇帝，没出过纰漏。他举荐给朝廷的人才都是虞放、边韶、张温等海内知名的人物。有一次，蜀郡太守派人持信拿钱贿赂曹腾，信落在益州刺史种暠手里，种暠上奏弹劾，要求将曹腾下狱治罪。皇帝说："信自外头送来，不是曹腾的错。"皇帝没有理会弹劾，曹腾也不记恨，常常赞扬种暠是个称职的好官。当时的人都说曹腾真是个好宦官。

可是别忘了，他的养子曹嵩可以拿出十亿钱（汉代一亿等于十万）来买太尉之职。"嵩灵帝时货赂中官及输西园钱一亿万，故位至太尉。"[(2)]

这么多钱当然不会是勤劳致富所得。东汉中后期，宦官普遍聚有巨额财富。这些财富主要来自三个途径：

1．皇帝的赏赐。有人统计："顺帝以后，宦官食封人数和食封户数迅速增加。顺帝时，孙程等宦官总计食封人数为八万九千二百户。而据《汉书·食货志》载，当时五口之家'其能耕者不过百亩'，依此推算，宦官至少分食了国家八百九十二万亩土地的赋税收入。桓帝、灵帝时，单超等'五侯'与侯览、曹节、张让等'十常侍'集团食封更多。据统计，有记载的东汉的宦者侯有食邑的共三十七人，占已知宦者侯数量的十分之六，其食邑总共十七万一千二百户，平均每一宦者侯约食四千六百三十户。"[(3)]

2．掌控朝廷人事升迁大权，进而以权力寻租。张让等高级宦官在灵帝的授意下在西园公开卖官鬻爵就是其中的典型案例。其

实，在此之前，汉安帝、汉桓帝都卖过官。只不过，安帝、桓帝拿出来卖的主要是关内侯、羽林郎、五大夫、官府吏、缇骑营士等低级官爵[(4)]。灵帝不同，在他的授意下，宦官几乎可以出售汉帝国的一切官爵。二千石（相当于郡太守）的价格是二千万钱，四百石（相当于一万户以下的县的县长）的价格是四百万钱，关内侯的价格是五百万钱。公卿不方便明码标价，就让宦官们去私下勾连。[(5)]

3．将亲友子弟安插于州郡，直接从民间汲取利益。比如，宦官侯览的兄长侯参做益州刺史的时候，“民有丰富者，辄诬以大逆，皆诛灭之，没入财物，前后累亿计”[(6)]，当地谁家有钱，他就找谁家的麻烦，吞并他家的财富。

曹腾的巨额财富也是这么来的。

皇权的赏赐自不必说，曹腾拥戴汉桓帝即位，有“定策之功”。权力寻租一节，传记里说得委婉，其实也不难理解，若非察举、征辟的升迁路径操控于宦官之手，虞放、边韶、张温等士人是断不会自贬身份，由宦官曹腾帮他们“进达”；蜀郡太守给曹腾送钱，自然也是因为给曹腾送钱管用。曹腾之兄曹褒官至颍川太守，侄子曹炽做过侍中，另一个侄子曹鼎在河间相任上遭人弹劾“臧罪千万”[(7)]，则是高级宦官安插亲友子弟于州郡掠夺民脂民膏的实证。

二、宦官与士人争夺人事权

包括曹腾在内的宦官如此发迹，不可避免地会造成东汉帝国统治集团的内部分裂。分裂发生的具体逻辑简述如下：

秦制时代，与利益分配直接相关、最重要的权力莫过于人事权。东汉建国，以察举、征辟取士，人事权本由皇权和世家大族共享，大体的操作流程是后者举荐、前者盖章。

但皇权与世家大族之间存在着天然的隔阂，缺乏信任，后者的组织化与社会动员能力素来被视为对皇权的一种威胁。世家大族对朝廷人事权的分享又进一步扩张了他们的势力，尤其为皇权所忌惮。于是，从汉和帝时代起，皇权即致力于利用外戚和宦官来制约世家大族，重点就是瓜分他们的人事权。比如，在窦太后（汉章帝皇后，汉和帝即位后，曾临朝称制四年）临朝的时期，窦氏外戚及其党徒遍布州郡，征辟、察举都得走窦氏的门路。[(8)]

然而，对皇权而言，外戚也是有缺陷的。为尽可能长久地维持权势，外戚经常游走于皇权和世家大族之间，既充当皇权的代理人，又操弄经学以结交世家大族（比如汉顺帝皇后之兄梁冀结交袁氏、窦武熟习经学），两端渔利。倘若遭逢幼主，他们甚至会成为皇权的心腹大患。

剩下的最能信任的就只有舍皇权无处依附的宦官了。在皇权的支持下，宦官于汉顺帝时期正式取得察举之权。不过，当时的宦官羽翼未丰，直接与世家大族争夺人事权的仍是以梁冀为首的外戚。比如，河南尹田歆曾对外甥王谌感叹：“今当举六孝廉，多得贵戚书命，不宜相违，欲自用一名士以报国家。”[(9)]他对王谌说，自己手上有六个孝廉的名额，权贵们纷纷捎话来预定，自己只好把五个名额用来应付权贵的请托，只留下一个名额用来举荐真正的人才。

到了桓帝、灵帝时代，宦官在人事权的争夺中获得了优势地位，许多原本围绕在世家大族周围的士人转而选择投靠宦官以谋取仕进的机会。这对世家大族的政治利益造成了巨大的实质性打击（门人的萧条），也直接影响到了他们的经济利益（子弟出仕变得困难，需要向宦官行贿）。双方的矛盾遂一发不可收拾，最终演变成一场“互相杀全家”的残酷竞赛。

宦官如何追杀代表世家大族利益的士人，有“党锢之祸”四字留存于史册，已无须浪费笔墨。但士人群体对宦官集团的杀戮颇有略作介绍的必要。且以两次党锢之祸的导火索为例，可以略见当年这场政治斗争的残酷程度。

第一次党锢之祸的导火索是士人领袖、河南尹李膺杀死了张成的儿子。张成是算命的，“以方伎交通宦官”，他的弟子弹劾过李膺，说他结党诽谤朝廷。据《后汉书》记载，李膺杀张成之子的始末如下：

> 河内张成善说风角，推占当赦，遂教子杀人。李膺为河南尹，督促收捕，既而逢宥获免，膺愈怀愤疾，竟案杀之。(10)

张成善于算卦，算出朝廷即将颁布大赦，于是让儿子出去杀人。李膺作为地方官，抓了张成之子。随后朝廷果有大赦。李膺气愤不过，无视赦令，坚持杀了张成之子。

这段记载显然是有问题的。朝廷政令岂能靠算卦预知？装神弄鬼骗人也就罢了，哪有神棍自己也信的道理？张成父子间的杀人密谋，李膺一个外人又怎会知晓？更合理的解释应该是：张成之子杀人，李膺把他抓了，不久朝廷大赦，李膺于是疑心张成通过与宦官的关系，早就知道了会有大赦，才让儿子去杀人。但他的疑心没有证据（虽然有可能是事实），李膺不想放过张成之子，于是就杜撰了“算卦杀人”的荒唐说辞。在政治立场面前，讲求证据已经不重要了。宦官集团如此，士人群体也是如此。

第二次党锢之祸的导火索是士人张俭和宦官侯览的冲突。据《后汉书·党锢列传》（后简称《党锢列传》）的记载，张俭与侯览结怨，是因为他上奏举报侯览及其家属的罪行，请朝廷诛杀他

们。但是张俭的奏章不幸被侯览看到，被其扣押了下来。“中常侍侯览家在防东，残暴百姓，所为不轨。俭举劾览及其母罪恶，请诛之。览遏绝章表，并不得通，由是结仇。”(11)

只看《党锢列传》中关于张俭的记载，得出的印象是张俭按程序办事为民除害，结果与宦官交恶，惨遭迫害。但《党锢列传》里还有一段关于苑康的记载：“是时，山阳张俭杀常侍侯览母，案其宗党宾客，或有迸匿太山界者。”(12)意思是，张俭递送至朝廷的奏报没有回应，他于是自作主张杀了侯览之母，且对侯览家人及门客进行了肃清，其中某些人不得不逃往其他州郡藏匿。另一位士人代表、泰山太守苑康积极配合张俭，将逃入泰山的侯览余党一网打尽。

这里当然不是说张成之子无罪，也不是说侯览及其家人、门客不该受到惩处，而是想要说明东汉末年的士人群体与宦官集团之间的斗争白热化到了何种程度。宦官集团利用手中的权力对士人群体赶尽杀绝，士人群体也抓住各种机会对宦官集团展开肃清。类似的记载在同时代的知名士人传记中随处可见。比如，黄浮做东海相，对宦官徐璜之兄徐宣的家属“无少长悉考之”(13)，不分男女老幼，全抓起来审讯、拷打。荀昱、荀昙兄弟做地方官，对辖区内宦官的宾客“纤罪必诛”(14)，稍有犯法即予诛杀。史弼做平原相，有举孝廉的任务，侯览派某太学生来找他疏通关系，结果被史弼“楚捶数百……即日考杀之”(15)，先是痛打一顿，然后直接给杀了。王宏做弘农太守，“考案郡中有事宦官买爵位者，虽位至二千石，皆掠考收捕，遂杀数十人，威动临界”(16)，王宏清查辖区内向宦官买过官爵之人，即使他们是二千石的高官也不放过，逮捕、诛杀了数十人之多……

介绍以上内容，不是为了证明宦官集团其实挺冤，士人群体也不是好人。士人群体中有反秦制的，宦官集团中也有洁身自好的。

但若将二者作为整体来审视，则士人群体也罢，宦官集团也好，都是统治集团的一分子。他们之间的惨烈杀戮，究其实质是统治集团内部发生了严重分裂。而宦官领袖张让是承认这一点的，他非常不满士人群体站在道德高地对宦官发出批判。他曾如此责问以士人群体为依托的外戚何进："卿言省内秽浊，公卿以下忠清者为谁？"[17]

张让的责问只是自我粉饰的遁词，宦官集团协助皇帝敛权、敛财，对东汉政治的全面败坏负有非常直接的责任。但这一遁词也确实道出了以士人为主体的官僚集团同样非常腐败（不过，士人集团中尚有许多怀有政治理想、不甘堕落者，而宦官集团中这样的人则极少见）。廓清了上述利益关系，也就不难理解为何汉末诛杀宦官最积极的会是"四世三公"（四代人里出了五位三公，即当时地位最显赫的官员）"门生故吏遍天下"的袁绍、袁术兄弟。宦官崛起后，原本由世家大族组成的垄断今文经学的"学阀"丧失了察举、选拔官员的人事权，这对他们百年来经营的门生故吏之恩私、门当户对之联姻实在是极为沉重的打击。若不能从宦官手中夺回人事权，则所谓的门生故吏在袁氏家族这里找不到出路，必四散另作他谋。利益纽带既断，"四世三公"的富贵也将化为泡影。有道德为外衣，有利益为驱动，袁绍兄弟于是冲在了诛杀宦官的最前线。

廓清上述利益纠葛，也有助于加深对曹腾之孙曹操早年行迹的理解。比如，他做洛阳北部尉时，"灵帝爱幸小黄门蹇硕叔父夜行，即杀之"[18]。汉律规定，夜行并非死罪，曹操这么做其实是对当时流行于士人群体中的、针对宦官及其家属和门人"无少长皆考之""纤罪必诛""虽位至二千石，皆掠考收捕"的一种效仿。这实际上是身为"宦官三代"的曹操在努力向士人群体靠拢。

廓清上述利益纠葛，也有助于加深对曹操文化取向的理解。虽然他努力想要挤进士人群体，但与袁绍等世家大族子弟操弄经学不

同，曹操以文学诗词见长。他的文化取向正是宦官集团与世家大族争夺人事权的产物。灵帝时期，在皇权的支持下，由宦官集团开设的鸿都门学以文学、艺术为教学内容，开设了辞赋、小说、尺牍、字画等课程，旨在确立一种与世家大族把持的经学教育截然不同的新的教育标准。而以“大学阀”弘农杨氏为代表的士人群体曾两次在朝堂上对鸿都门学发起猛烈攻击，试图逼迫皇帝取消鸿都门学士子做官的资格，但都被汉灵帝驳回。为昭示人事权已尽握于皇帝之手，汉灵帝甚至下旨为新进的鸿都门学士子绘像——在汉代，这是只有立下了卓越功勋的人才能享有的殊荣。鸿都门学如此受皇帝重视，且由宦官集团负责，作为“宦官三代”的曹操自幼受家学熏染，重辞赋而轻经学，也就成了很自然的事情。[(19)]

另外，袁绍欲引董卓入京诛杀宦官，而曹操并不积极，也与二人的出身直接相关。针对曹操的不积极，官修王沈《魏书》里，有一段解释：

> 太祖闻而笑之曰：“阉竖之官，古今宜有，但世主不当假之权宠，使至于此。既治其罪，当诛元恶，一狱吏足矣，何必纷纷召外将乎？欲尽诛之，事必宣露，吾见其败也。”[(20)]

曹操的话其实只是粉饰。宦官是皇权的代理人，袁绍诛杀宦官，实质是逼迫皇帝将人事权还给世家大族，进而恢复乃至扩大世家大族的政治利益。杀一个宦官自然是“一狱吏足矣”，但要逼迫皇权重新分蛋糕，引入军事力量进行威慑才是合乎常理的做法。官修《魏书》的记载看似是在替曹操解释，彰显曹操的政治智慧，实际上是修史的人依据自己的认知将曹操塑造成了一个愚夫。陈寿撰写《三国志》不选用这段记载，实具慧眼。

---

(1) 范晔：《后汉书·宦者列传》，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2519页。

(2) 范晔：《后汉书·宦者列传》，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2519页。

(3) 杜婉言：《佞幸：中国宦官与中国政治》，东方出版社2017年版，第162—163页。

(4) 范晔：《后汉书·孝安帝纪》，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313页。范晔：《后汉书·孝桓帝纪》，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309页。

(5) 司马光：《资治通鉴》卷五十七，中华书局1956年版，第1849页。

(6) 范晔：《后汉书·宦者列传》，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2523页。

(7) 范晔：《后汉书·党锢列传》，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2209页。

(8) 范晔：《后汉书·窦融列传》，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819页。

(9) 范晔：《后汉书·张王种陈列传》，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1826页。

(10) 范晔：《后汉书·党锢列传》，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2187页。

(11) 范晔：《后汉书·党锢列传》，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2210页。

(12) 范晔：《后汉书·党锢列传》，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2214页。

(13) 范晔：《后汉书·宦者列传》，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2522页。

(14) 范晔：《后汉书·荀韩钟陈列传》，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2050页。

(15) 范晔：《后汉书·吴延史卢赵列传》，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2111页。

(16) 范晔：《后汉书·陈王列传》，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2177页。

(17) 范晔：《后汉书·窦何列传》，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2251页。

(18) 陈寿：《三国志·魏书·武帝纪》裴松之注引《曹瞒传》，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3页。

(19) 王永平：《汉灵帝之置“鸿都门学”及其原因考论》，《扬州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1999年第5期。张朝富：《曹操“尚文辞”与“鸿都门学”》，《扬州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1期。

(20) 陈寿：《三国志·魏书·武帝纪》裴松之注引王沈《魏书》，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5页。

第八章
如何自群雄中胜出

《三国志·魏书·董二袁刘传》中的“袁绍传”是非常有意思的文本。

袁绍的传记用了超过一半的篇幅，将曹操的大敌袁绍塑造成了一个大蠢货。凸显袁绍之蠢的核心手段是浓墨重彩地渲染田丰与沮授之智。按书中的说法，田丰与沮授给袁绍出了许多好主意，却被袁绍几乎全部拒绝，最终落了个败亡的下场。袁绍的拒绝共计有八次之多，具体如下：

1．沮授劝袁绍把汉献帝接到邺城来，袁绍“不从”。2．袁绍让长子袁谭执掌青州，沮授劝他别这样干，袁绍“不听”。3．曹操东征刘备，田丰劝袁绍攻击曹操后方，袁绍“不许”。4．袁绍计划南征曹操，田丰、沮授强烈反对，袁绍“疑”而不听。5．沮授对袁绍说颜良“促狭”不可重用，袁绍“不听”。6．袁绍想要亲自率军过黄河，沮授劝阻，袁绍“弗从”。7．袁绍与曹操在官渡对峙，沮授劝他与曹操打持久战，袁绍“不从”。8．沮授劝袁绍派部队攻击曹操的游击部队，以保护粮草运输，袁绍“复不从”。[(1)]

这八条一路捋下来，直观感觉就是：从汉献帝建安元年（公元196年，献帝迁都许昌）到建安七年（公元202年，袁绍病故），袁绍几乎没做对过一件关键的事，可谓昏聩到了极致。由裴松之的注释可以知晓：这八个“不听”“不从”的来源是《魏书》。王沈的《魏书》是曹魏官修史书，其中的《献帝传》使用了诸多曹魏的官方文书档案，整理文书档案也是魏明帝时期官修史书工作的一部分，其编撰和整理的核心主旨是构建曹魏皇权的正当性与合法性。

显然，这是胜利者有意想要证明一个结论：胜利来自胜利者的雄才大略。

即使这八条“不听”“不从”全部为真[(2)]，它们也不是曹操从汉末群雄中胜出的核心原因。相对于个人的雄才大略，能否建立起比其他豪强更稳定、更有效的汲取体制，进而汲取到更多的人力与物力，才是在乱世争霸中更重要的东西。也就是说，谁对百姓的汲取能力更强、控制能力更强，谁的胜算往往也就更大。

只不过，这样的成功经验并不适合写入官修史书。

一、战胜豪强的另一面

《三国志·蜀书·先主传》里说，曹操进攻荆州，有十余万荆州百姓愿意拖家带口跟着刘备跑路。“琮左右及荆州人多归先主，比到当阳，众十余万，辎重数千辆，日行十余里。”[(3)]这件事情乍看之下很不合常理，一个人再怎么仁义，也无法驱动十余万人跟着自己背井离乡。但那个时代这是有可能发生的。只不过，促成其发生的原因不在刘备之“仁”，而在曹操之“恶”。

汉末军阀当中，曹操最喜欢屠城。仅见于史书者就有：攻张超屠雍丘，征徐州两屠彭城，征乌丸屠柳城，征关中、陇右屠兴国、枹罕、河池，征侯音屠宛城，攻袁绍坑杀降卒八万。其中，又以“徐州大屠杀”最为丧心病狂。据《后汉书·刘虞公孙瓒陶谦传》记载，初平四年（公元193年），曹操征讨陶谦：

> 破彭城傅阳……过拔取虑、睢陵、夏丘，皆屠之。凡杀男女数十万人，鸡犬无余，泗水为之不流，自是五县城保，无复行迹。初三辅遭李傕乱，百姓流移依（陶）谦者皆歼。[(4)]

《三国志》对“徐州大屠杀”有许多粉饰。《武帝纪》选择轻描淡写，仅留下“所过多所残戮”[(5)]六个字。《二公孙陶四张传》则移花接木，说“谦兵败走，死者万数，泗水为之不流”[(6)]。只有《荀彧荀攸贾诩传》里留下了荀彧力劝曹操不要再攻徐州的一条理由：“前讨徐州，威罚实行，其子弟念父兄之耻，必人自为守，无降心，就能破之。”[(7)]“威罚实行”“子弟念父兄之耻”等字眼，清晰地表现出这场屠杀规模甚大，在徐州百姓当中造成了极大的恐怖。

因为“围而后降者不赦”的屠城法令的存在，曹操大概率还有更多的屠城劣迹，只不过没有被载入史册。该法令见于《三国志·魏书·张乐于张徐传》和《三国志·魏书·程郭董刘蒋刘传》。《三国志·魏书·张乐于张徐传》记载，建安十年（公元205年），于禁斩杀投降的昌豨时，说过这样一句话：“诸君不知公常令乎！围而后降者不赦。夫奉法行令，事上之节也。”[(8)]于禁说：各位应当知道，主公有一道“常令”，叫作“围而后降者不赦”，遵令行事是我等的义务。《三国志·魏书·程郭董刘蒋刘传》记载，建安十六年（公元211年）曹操征马超，留曹丕镇守后方。田银、苏伯于河间起兵反抗曹氏的统治，将军贾信带人平定起义后，欲援引“围而后降者不赦”的法令杀投降的俘虏，程昱出面劝曹丕不要这样做，理由是：“诛降者，谓在扰攘之时，天下云起，故围而后降者不赦，以示威天下，开其利路，使不至于围也。今天下略定，且在邦域之中，此必降之贼，杀之无所威惧，非前日诛降之意。”[(9)]他想告诉曹丕的是：以前和其他军阀争夺天下，为了威慑敌人，让他们不敢负隅顽抗，所以制定了“围而后降者不赦”的法令；如今天下大致在手，杀自己境内的投降者，已经没有什么意义了。

综合《三国志·魏书·张乐于张徐传》与《三国志·魏书·程郭董刘蒋刘传》可以知道，“围而后降者不赦”这道法令是曹操制定的一道“常令”，曾被曹魏的将领们长期付诸实践。另据《三国志·魏书·袁张凉国田王邴管传》的记载，还可以知道，这道法令针对的并非只是敌军官兵，包括城内百姓在内的其他投降者也在“不赦”之列。《三国志·魏书·袁张凉国田王邴管传》里有这样一段文字：

> 田银、苏伯反河间，银等既破，后有余党，皆应伏法。渊以为非首恶，请不行刑。太祖从之，赖渊得生者千余人。破贼文书，旧以一为十，及渊上首级，如其实数。太祖问其故，渊曰：“夫征讨外寇，多其斩获之数者，欲以大武功，且示民听也。河间在封域之内，银等叛逆，虽克捷有功，渊窃耻之。”太祖大悦，迁魏郡太守。[10]

田银、苏伯在河间起兵造反，被镇压后，按法令他们的余党也都要被斩杀，国渊认为这些人不是首恶，向曹操求情不要屠杀他们，救了一千多人的性命。“后有余党，皆应伏法”一句显示了“围而后降者不赦”其实是一道屠城法令。

从初平四年的“徐州大屠杀”，到建安十六年程昱劝阻曹丕不要再执行“围而后降者不赦”的屠杀令，曹操屠杀了无数的无辜降兵和无辜百姓。曹操的制度性屠杀也许连以残暴著称的董卓都要甘拜下风。荆州百姓对曹操的屠杀法令深感恐惧，听闻曹军南下，赶紧收拾家当南逃，可以说是情理中事。毕竟，天知道刺史、郡守会不会抵抗，天知道会不会有围城，天知道自己会不会成为“不赦”的一分子。总之，稳妥起见，还是先跑了再说。

秦制时代的军阀混战有一个非常寻常的道理：谁的手段越狠，谁就越有能力从百姓身上榨取到更多的人力、物力资源，谁就最有

可能胜出。曹操正是汉末、三国时代的那个手段最狠的人。屠城只是他“狠”的一隅，更狠的政策是所谓的摧抑豪强与兴办屯田。

1．摧抑豪强。

“豪强”两个字是曹魏（本文的“曹魏”字样是一种广义指称，既包括曹操控制下的东汉时期的政权，也包括曹丕称帝后的魏王朝）对地方上有力量的大族的一种统称，带有强烈的贬义。“摧抑豪强”四个字组合起来，也很有维护社会公平的味道。曹操在建安九年（公元204年）九月下达的《抑兼并令》也是在高喊“不患寡而患不均”[(11)]的口号，说要打击“豪强”，为“下民”伸张正义。

伸张正义大体只是口号。曹魏所垂涎的是地方上有力量的大族控制的土地与依附人口，将他们的土地变成曹魏所有，将他们的依附人口变成曹魏的编户民，曹魏才能汲取到更多的人力与物力。反之，若放任地方上有力量的大族存在，那就相当于给了编户民用脚投票的机会。当百姓无法承受来自曹魏及其代理人的剥削时，就会两害相权取其轻，投入地方上有力量的大族的怀抱，以寻求庇护。在豪强的庇护下，百姓也许需要缴纳更高额度的田租，但可以免除更痛苦的徭役、兵役。

细察汉末各路军阀的命运，可以发现一条规律：凡致力于对内摧抑豪强的，对外往往也会表现出强烈的侵略性，比如曹操与孙策。凡对内选择与豪强合作的，对外扩张的欲望也要稍逊一筹，比如袁绍。有些军阀甚至于近乎没有对外扩张的欲望，比如刘表与刘璋。

这条规律的成因也不复杂。对内摧抑豪强，消灭了地方上的豪强，百姓被原子化，军阀就可以用低成本来加重剥削，有效汲取到

更多的人力与物力，这些人力与物力就可以支撑起他们对外扩张的野心。反之，那些依赖与豪强合作而形成的军阀集团，比如单骑入荆州后选择与蔡氏、蒯氏合作的刘表，他们可以汲取到的人力与物力就要少很多，汲取难度也高，而且豪强大多不愿牺牲自己掌控的人力、物力来支持军阀的对外扩张。于是，依赖与豪强合作的军阀即使有对外扩张的野心，也很难有付诸实行的机会。

也就是说，曹操所谓的摧抑豪强，本质上是在追求更强有力地榨取自耕农和自由民的税赋。摧抑豪强与租调制配套运作，“曹魏的户调较之汉代的口钱和算赋（两种人头税），大约加重了四倍”[(12)]；同时，百姓承担的田租达到了亩产的七分之一（考虑到亩产有限，这个比例其实是很高的），较之汉代通行的三十分之一，也高出了四倍有余[(13)]。若放任地方上豪强存在，百姓用脚投票，寻求庇护，如此强的榨取力度是无法长期维持的。

2．兴办屯田。

曹魏的屯田分民屯和军屯两种。民屯本质上近似于一种农奴制度。一旦成为曹魏的屯田民，就将终身被束缚在屯中，不能随意迁徙，也不能变成由郡县管辖的编户民，只能世代受军事化管制。做曹魏的农奴，不但没有人身自由可言，还须将50%（不使用官牛）或60%（使用官牛）的产出交给官府，同时无条件从事诸如垦荒、修路、造屋、输租等各种徭役，包括给长官做家奴，非常时期还得参与战事。[(14)]用张大可先生的话说就是，“屯民所处地位是军事管制下的农奴，每一个屯田点就是一座劳役集中营”[(15)]。

自然，屯田的暴政经常会造成“民不乐，多逃亡”[(16)]的现象。公元213年，曹操南征孙权，下令将江淮一带的编户民移往内地，结果“江、淮间十余万众，皆惊走吴”[(17)]。曹魏的百姓深刻

了解做屯田民有多悲惨，遂纷纷逃往江南，投入孙吴政权的怀抱，总计多达十余万人。

而军屯的奴役远比民屯残酷。为尽可能控制住屯田兵，驱策他们战时流血，平时流汗，曹操建立了一套以胁迫为核心的“士家制度”。屯田兵被称作“士”，其子孙被称作“士息”，其妻被称作“士妻”，其家被称作“士家”。只要做了“士”，就世世代代不能再做自由民，子子孙孙都是曹魏的兵奴兼农奴。“士”死了，他的妻子也不能改嫁给自由民，只能服从官府分配改嫁给其他的“士”。“士”的子女同样只能婚配其他“士”的子女。而且，“士”在边境屯田，他的妻子和儿女会被朝廷当作人质，集体控制在他处从事生产。[(18)]

为防止“士”的反抗，曹操还制定了严厉的《士亡法》。若有屯田兵选择逃亡，官府会杀死他们的家属，后来修改为籍设逃亡“士”的家属为官奴婢。但是即便如此，“太祖患犹不息，更重其刑”[(19)]，让曹操头疼的逃亡现象仍不断发生，可见对百姓压榨之严重。

《晋书·文苑传》里的赵至就是曹魏政权下的一个“士息”，也就是屯田兵的儿子。他和母亲作为人质被官府从家乡代郡迁至河南缑氏，与其他屯田兵家属共同生活。赵至不甘心像父亲那样一辈子做毫无自由的奴隶，想要逃跑，又怕家人遭到官府的报复，于是在15岁的时候开始装疯，经常假装走出三五里找不到回家的路，然后被人寻回；他还拿火烧自己的身体，烧伤十多处。一年后，觉得基层的监管者真的已经相信自己疯了，他才正式出逃，最后在遥远的辽西用假身份洗掉了低贱的“士息”出身，成为可以做官的自由民。[(20)]

所以，曹魏之所以能够在汉末、三国的乱世之中胜出，核心原因并不仅仅在于曹操、曹丕个人如何雄才大略，而是他们的手段够狠、够硬、够有效，建立起了比其他军阀更强大的人力、物力的汲取机制。下文还会提到，与之鼎立的蜀汉也是相似的情形。

二、直百五铢钱的奥秘

建安十九年（公元214年）的益州百姓大概会很怀念刘璋。因为他们发现，益州的新主人刘备上台后干的第一件大事是建立一套强大的新汲取机制，对益州的百姓进行搜刮。

新的汲取机制来自刘巴与诸葛亮等人的设计。据《三国志·蜀书·董刘马陈董吕 传》的裴松之注记载，刘巴在建安十九年曾就如何有效敛财向刘备献计："军用不足，备甚忧之。巴曰：'易耳，但当铸直百钱，平诸物贾，令吏为官市。'备从之，数月之间，府库充实。"(21)刘备苦于军用不足，刘巴建议实施两条政策，第一条是铸造"直百钱"，也就是铸造一种新货币，一枚新币的面值相当于一百枚过去蜀地的五铢钱；第二条是由官府接管市场、控制物价，不许价格发生不利于官府的波动。刘备采纳刘巴的建议，蜀国的国库很快丰盈。

刘备发行的"直百五铢钱"出土甚多，绝大多数重8—9克，钱上的文字显示，它们或在成都铸造，或在犍为郡铸造。而刘璋父子统治益州时铸造的蜀地的五铢钱的重量一般在2—3．7克左右，以2．5克较为常见。(22)也就是说，刘备铸造的新钱的重量仅相当于旧钱的3—4倍，法定面值却是旧钱的100倍。他一手铸钱，一手控制市场与物价，空手套白狼，迅速从百姓手中汲取了30倍上下的财物。

保障蜀汉的高强度汲取政策顺利推行的是由严刑峻法构筑起来的高压统治。

建安十九年，在刘备的授意下，诸葛亮、法正、刘巴、李严、伊籍五人共造“蜀科”(23)，亦即在汉律的基础上，专门制定了一套针对益州百姓的法律。蜀科的具体内容已经失传，但对它的大致面貌，《三国志·蜀书·诸葛亮传》的裴注中有载：“亮刑法峻急，刻剥百姓，自君子小人咸怀怨叹。”(24)意思是：诸葛亮制定了严刑峻法来保障对百姓的盘剥。益州的百姓，上至豪族、士人，下至庶民、奴婢，都心怀怨言。

参与制定蜀科的法正起初未能理解严刑峻法的必要性，他跑去跟诸葛亮提意见：“昔高祖入关，约法三章，秦民知德，今君假借威力，跨据一州，初有其国，未垂惠抚；且客主之义，宜相降下，原缓刑弛禁以慰其望。”(25)法正建议诸葛亮，学学汉高帝刘邦入关的做法，约法三章，不要搞大部头的律典。毕竟刘备是外来的政治势力，应该先用宽大政策来笼络本土的势力，获得他们的支持。

诸葛亮的回答深得商鞅、韩非之道，他说：“君知其一，未知其二。秦以无道，政苛民怨，匹夫大呼，天下土崩，高祖因之，可以弘济。刘璋暗弱，自焉已来有累世之恩，文法羁縻，互相承奉，德政不举，威刑不肃。蜀土人士，专权自恣，君臣之道，渐以陵替；宠之以位，位极则贱，顺之以恩，恩竭则慢。所以致弊，实由于此。吾今威之以法，法行则知恩，限之以爵，爵加则知荣；恩荣并济，上下有节。为治之要，于斯而著矣。”(26)

诸葛亮的意思是：我们现在面临的局面和汉高帝当年不同。秦实行暴政，征敛无度，豪族与庶民都活不下去，所以匹夫振臂一呼，天下响应，汉高帝必须顺应当时的潮流。但是刘璋父子统治益州的手段是与豪族合作，与他们共享权力与利益，结果导致刘璋父

子与豪族之间已不存在“君臣之道”。有刘璋父子的宠信在前，我们再拿官职、爵位、财富笼络他们，就显不出区别，没有意义，他们也不会感恩。我们需要的是严刑峻法，用刑罚来威吓他们。被律法狠狠地修理过，他们才会知道什么叫君王的恩典；用地位来诱惑他们，被阶层难以提升的忧虑折磨过，他们才会懂得获得的官爵有多么荣耀。简言之，益州的豪族与庶民之前的日子过得太舒服，我们要把政策变一变。

不过，蜀汉的高压统治也会因人而异。在诸葛亮心中，什么人可以无法无天，什么人不可以乱说乱动，有一本明明白白的账。法正在蜀郡“一餐之德，睚眦之怨，无不报复，擅杀毁伤己者数人”，有人跑到诸葛亮那里，求他主持公道，他告诉那个人从前主公落魄，多亏法正襄助才有今天，“如何禁止法正使不得行其意邪”，反问那个人，为何不能让法正随心所欲。(27)另一位因得庞统、法正推荐而得刘备重用的彭羕“宣传军事，指授诸将，奉使称意，识遇日加”，他也想随心所欲，于是“形色嚣然，自矜得遇滋甚”，却被诸葛亮打了小报告，对刘备说他“心大志广，难可保安”，导致其失宠。(28)

法正可以乱说乱动，是因为他来自雍州，是一位客居者。纵容他乱说乱动，不会妨害蜀汉政权针对益州的汲取政策。彭羕不可以乱说乱动，因为他是益州本地人，纵容他乱说乱动，等同于增强他在益州本地豪强中的声望，等于将他推上“益州本土利益集团代言人”的地位。二人身份的差别是理解法正与彭羕命运迥异的关键。对刘备和诸葛亮而言，一切都得为汲取让位。是否能够维持高强度的汲取机制，是蜀汉政权能否存在下去的关键。

因史料匮乏，今人已无法还原蜀汉的民力汲取机制全貌。幸好出土文物不但发现了汉昭烈帝（刘备）时代铸造的“直百五铢钱”，还发现了诸葛亮辅佐刘禅时铸造的“太平百钱”“定平一

百”等。由出土的蜀汉钱币可以推断，以敛财为目的的滥铸货币是蜀汉长期实施的一项基本国策。诸葛亮在建兴六年（公元228年）有能力出兵北伐，也与滥铸货币的政策有很直接的关系。据出土文物提供的信息，至迟在此之前一年，太平百钱已在蜀国铸造发行。相比刘备时代重约8—9克的直百五铢钱，太平百钱的重量从8克下跌至1克，极端的甚至不足1克。[29]

重量的下降意味着蜀汉敛财力度的加重。为了维持敛财力度，除了用严刑峻法构筑高压统治，诸葛亮还有一个袭自商鞅、韩非的诀窍——平等的贫穷。所谓平等的贫穷，简言之就是在百姓当中制造一种印象：社会不富裕，但社会是平等的。下层百姓每日只能吃一顿干饭，上层官僚每日也只能吃一顿干饭。他制造的平等契合了百姓“不患寡而患不均”的心理，可以极大地消解他们内心因遭到压迫、受到剥削而感到的不满。诸葛丞相家中只有“桑八百株，薄田十五顷”，很容易让大多数人忘了直百五铢钱与太平百钱对自身带来的伤害，一如陈寿在《三国志·蜀书·诸葛亮传》里所写的那样：

> （诸葛亮）开诚心，布公道……刑政虽峻而无怨者。[30]

遗憾的是，诸葛亮死后，刘禅放飞自我，开始大兴土木修建宫苑[31]。“平等的贫穷”破产，那些满脸菜色的百姓[32]开始怀念诸葛丞相，“遂因时节私祭之于道陌上”[33]。

三、皇权缘何“破浮华”？

何晏活跃于曹魏，他的祖父是东汉末年的大将军何进。何晏的父亲早逝后，母亲尹氏被曹操收为妾，他遂与曹丕等人一并在魏王宫中成长。成年后，何晏又“尚公主”，做了曹操的女婿。

何晏一生经历了曹操、曹丕、曹叡、曹芳四个时代，死于司马懿发动的高平陵政变。在曹操时代，何晏是一个非常注重学识和修养的人。他“少以才秀知名，好老庄言，作道德论及诸文赋著述凡数十篇”[(34)]，且对兵书也有独到的见解，《何晏别传》里说曹操“读兵书有所未解，试以问晏，晏分散所疑，无不冰释”[(35)]。《何晏别传》里还说，何晏在魏王宫与曹氏子弟相处时，“坐则专席，止则独立。或问其故，答曰：‘礼，异族不相贯坐位。’”[(36)]在曹魏的第三位皇帝曹芳时代，也就是何晏人生的末年，他位列朝堂，也是一个有“大儒之风”（清代史学家钱大昕的评语）的人。比如，鉴于皇宫内大搞装修，大玩舞乐、饮宴，骑马射箭，何晏曾劝谏曹芳“所与游必择正人，所观览必察正象。放郑声而弗听，远佞人而弗近”[(37)]，淫乱的声音不要去听，奸佞的小人也不要去亲近。

这样重学识、讲修养、有大儒之风的人物在曹丕、曹叡父子主政的时代却穿起了女装，闹得洛阳城中无人不知。史载，何晏不但“好服妇人之服”，被人斥为“妖服”[(38)]，还“动静粉白不去手，行步顾影”[(39)]。

这样的反差与何晏的政治抱负不为皇权所容、长期遭受政治打压与思想管控有直接关系。作为一个身份尴尬的边缘“官二代”，何晏在仕途上很不得志。曹丕不喜欢他，故“黄初时无所事任”[(40)]，未能进入官场。曹叡也不喜欢他，故“颇为冗官”[(41)]，只担任了一些无足轻重的职务。曹丕的不喜欢，可能与何晏被曹操收养却又不肯做曹操的养子有关。曹叡的不喜欢，则缘于何晏的政治思想与皇权的需求背道而驰。

何晏、王弼与夏侯玄一干人等是开魏晋玄学先河的知识分子。他们的政治思想，按顾炎武的说法，是“蔑礼法而崇放达。视其主之颠危若路人然”[(42)]。简单说来就是：曹魏以法家权术为治国手

段，辅以儒学礼教作为粉饰；何晏、王弼、夏侯玄等人则尊孔子为圣人，且援老庄之说入儒，试图用自然秩序来规范政治秩序（本质上仍不脱离董仲舒用天命来约束“皇权”的思路），主张君主抛弃严刑峻法、退而无为，将治理天下的责任交托给官僚集团。这些人不具备《白虎通义》定义的那种无条件的忠君思想，如见皇帝有难就像碰上路人遭厄而无动于衷。

这样的主张自然不会为曹魏皇权所容。魏明帝即位次年，就下诏警告“浮华交游”之风，针对的便是何晏、夏侯玄这类人物。太和四年（公元230年），又有司徒董昭上书魏明帝，请求皇帝对浮华交游之徒采取更具实质性的惩治措施。董昭在奏章中攻击何晏等人，说他们不用心钻研学问，专爱交游，聚在一起褒扬彼此、批评他人（主要是批评朝政）。董昭说：“凡此诸事，皆法之所不取，刑之所不赦！”[(43)]随后，魏明帝下诏：“浮华不务道本者，皆罢退之！”[(44)]

知识分子旨趣相投，彼此来往，交流议论时事，本无任何过错，给他们扣上一顶“浮华交游”的帽子不过是曹魏打压舆论的惯用手段。建安年间，孔融曾对曹操推行的政策多有批评，曹操即写信恐吓孔融，说自己“破浮华交会之徒”的办法，也就是镇压异己的手段，是相当多的。这封信由曹操的幕僚路粹起草，原文是：“孤为人臣，进不能风化海内，退不能建德和人，然抚养战士，杀身为国，破浮华交会之徒，计有余矣。”[(45)]

据《三国志》中的蛛丝马迹，魏明帝“破浮华交游”后，诸多与何晏旨趣相投的知识分子，如邓飏、李胜、诸葛诞、夏侯玄等，“凡十五人……皆免官废锢”[(46)]。“废锢”即免除官职、监视居住。魏明帝本有意如曹操杀孔融一般制造一场文字狱，且已将李胜等人逮捕，后因牵涉之人太多，其中还有夏侯玄、何晏这样的“官二代”名士，为免造成政局震荡，才改以“废锢”作为惩罚。

或许是因为“尚公主”之类的原因，何晏未被列入“废锢”名单，但现实的高压也让他不得不屈服。“破浮华交游”的同一年，魏明帝巡幸许昌，大兴土木修筑景福殿，命何晏作《景福殿赋》。何晏在赋的末尾写了这样一段话：“圣上……招忠正之士，开公直之路。想周公之昔戒，慕咎繇之典谟。除无用之官，省生事之故。”(47)“除无用之官，省生事之故”指的正是“破浮华交游”的思想禁锢与言论打压。为求自保，何晏不得不违心赞颂魏明帝做得好、做得对，其英明神武直追传说中的周公。

大约在同期，何晏爱穿女人衣服、喜欢涂脂抹粉的特殊癖好传入了魏明帝耳中。为验证真假，魏明帝做了一次实验：“何平叔（何晏）美姿仪，面至白。魏明帝疑其傅粉，正夏月，与热汤饼。既啖，大汗出，以朱衣自拭，色转皎然。”(48)何晏仅存的两首《言志》诗，一首说自己“常恐夭网罗，忧祸一旦并”，一首说自己“且以乐今日，其后非所知”(49)，其惴惴不安、朝不保夕、今朝有酒今朝醉的心态可以说是相当明显。涂脂抹粉，穿上“妖服”，成了何晏自污求存的无奈手段。

从何晏开始，魏晋南北朝时期，诸多名士抛弃了阳刚之美，转走阴柔路线。皇权既然以集权为阳刚，追求阴柔的审美也就自然成了臣僚寻求政治安全的常规路径。在西晋，有潘岳“妙有姿容”(50)，与夏侯湛合称“连璧”(51)；有裴楷号为“玉人”(52)，卫玠号为“璧人”(53)，王衍“容貌整丽”(54)，手润如玉。东晋则有杜弘治“面如凝脂，眼如点漆”(55)；王恭身材婀娜，唐朝时人称赞他“春风濯濯柳容仪”(56)。进入南北朝，皇权愈加残暴，朝堂之上的阴柔之风更盛。何炯“白皙，美容貌”(57)；韩子高“容貌美丽，状似妇人”(58)；谢晦“眉目分明，鬓发如墨”，被皇帝赞为“玉人”(59)。这些阴柔的美男子均闻名于世。《颜氏家训》里也

说，“梁朝全盛之时，贵游子弟，多无学术……无不熏衣剃面，傅粉施朱”。(60)

个体审美异于常人是一件应该得到充分理解的事情，集体审美异于常人则往往意味着社会出了毛病，魏晋南北朝时期朝堂上的阴柔之风正是如此。西晋建国后，很快就走向了上有晋惠帝“何不食肉糜”，下有“八王之乱”蹂躏、屠杀天下百姓的丛林社会。南北朝的情况也大体相仿。理想无处安放，有志者遭逆向淘汰，留存在权力游戏之中的人为了让皇权（或皇权的代理人）放心，也只好“熏衣剃面，傅粉施朱”，以阴柔之态表示自己胸无大志。

---

(1) 陈寿：《三国志·魏书·董二袁刘传》，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194—201页。

(2) 这八条“不听”“不从”多数并非事实，详见拙文《胜利者撰修官史的丑陋嘴脸》，“史料搬运工”公众号2019年7月6日。

(3) 陈寿：《三国志·蜀书·先主传》，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877页。

(4) 范晔：《后汉书·刘虞公孙瓒陶谦传》，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2367页。

(5) 陈寿：《三国志·魏书·武帝纪》，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11页。

(6) 陈寿：《三国志·魏书·二公孙陶四张传》，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249页。

(7) 陈寿：《三国志·魏书·荀彧荀攸贾诩传》，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309—310页。

(8) 陈寿：《三国志·魏书·张乐于张徐传》，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523页。

(9) 陈寿：《三国志·魏书·程郭董刘蒋刘传》裴松之注引《魏书》，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429页。

(10) 陈寿：《三国志·魏书·袁张凉国田王邴管传》，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339页。

(11) 陈寿：《三国志·魏书·武帝纪》，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26页。

(12) 余鹏飞：《三国经济史》，河南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277页。

(13) 周国林：《曹魏西晋租调制度的考实与评价》，《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1982年增刊。

(14) 王仲荦：《曹魏屯田制度的几个问题》，见郑欣：《魏晋南北朝史探索》，山东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196—215页。高敏：《再论关于曹魏屯田制的几个问题》，《史学月刊》1991年第4期。

(15) 张大可：《三国史》，商务印书馆2013年版，第302页。

(16) 陈寿：《三国志·魏书·袁张凉国田王邴管传》，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334页。

(17) 陈寿：《三国志·魏书·程郭董刘蒋刘传》，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450页。

(18) 唐长孺：《〈晋书·赵至传〉中所见的曹魏士家制度》，见《魏晋南北朝史论丛》，商务印书馆2017年版，第27—33页。

(19) 陈寿：《三国志·魏书·韩崔高孙王传》，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684页。

(20) 房玄龄等：《晋书·文苑传》，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2377—2379页。

(21) 陈寿：《三国志·蜀书·董刘马陈董吕传》裴松之注引《零陵先贤传》，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982页。

(22) 朱活：《古钱小辞典》，文物出版社1995年版，第50—52页。

(23) 陈寿：《三国志·蜀书·许麋孙简伊秦传》，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971页。

(24) 陈寿：《三国志·蜀书·诸葛亮传》裴松之注引《蜀记》，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917页。

(25) 陈寿：《三国志·蜀书·诸葛亮传》裴松之注引《蜀记》，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917页。

(26) 陈寿：《三国志·蜀书·诸葛亮传》裴松之注引《蜀记》，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917页。

(27) 陈寿：《三国志·蜀书·庞统法正传》，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960页。

(28) 陈寿：《三国志·蜀书·刘彭廖李刘魏杨传》，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995页。

(29) 曾维华：《蜀汉是“太平百钱”的铸主》，见《中国古史与文物考论》，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183—186页。安剑华：《蜀汉钱币探微：以武侯祠馆藏蜀汉钱币为例》，见《成都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6期。

(30) 陈寿：《三国志·蜀书·诸葛亮传》，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934页。

(31) 《三国志·蜀书·杜周杜许孟来尹李谯郤传》，载谯周劝谏刘禅，有“四时之祀，或有不临，池苑之观，或有仍出……愿省减乐官、后宫所增造，但奉备先帝所施，下为子孙节俭之教”之语。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1028页。

(32) 《三国志·吴书·张严程阚薛传》裴松之注引《汉晋春秋》，载有吴国使臣薛翊自蜀国归来后，给吴主孙休的汇报：“主暗而不知其过，臣下容身以求免罪，入其朝不闻正言，经其野民皆菜色。”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1255页。

(33) 陈寿：《三国志·蜀书·诸葛亮传》裴松之注引《襄阳记》，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928页。

(34) 陈寿：《三国志·魏书·诸夏侯曹传》，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292页。

(35) 李昉：《太平御览》卷三八五引《何晏别传》，中华书局1995年版，第1779页。

(36) 李昉：《太平御览》卷三八五引《何晏别传》，中华书局1995年版，第1817页。

(37) 陈寿：《三国志·魏书·诸夏侯曹传》，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122—123页。

(38) 房玄龄：《晋书·志第十七·五行上》，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822页。

(39) 陈寿：《三国志·魏书·诸夏侯曹传》裴松之注引《魏略》，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292页。

(40) 陈寿：《三国志·魏书·诸夏侯曹传》裴松之注引《魏略》，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292页。

(41) 陈寿：《三国志·魏书·诸夏侯曹传》裴松之注引《魏略》，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292页。

(42) 顾炎武：《日知录集释》，岳麓书社1994年版，第1012页。

(43) 陈寿：《三国志·魏书·程郭董刘蒋刘传》，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442页。

(44) 陈寿：《三国志·魏书·明帝纪》，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97页。

(45) 范晔：《后汉书·郑孔荀列传》，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2273页。

(46) 陈寿：《三国志·魏书·王毌丘诸葛邓钟传》裴松之注引《世语》，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769页。

(47) 萧统编：《文选·何平叔景福殿赋》，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第537页。

(48) 刘义庆撰，刘孝标注，龚斌校释：《世说新语校释》下册“容止第十四”，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版，第1191页。

(49) 陈祚明评选，李金松点校：《采菽堂古诗选》，上海古籍出版社2019年版，第216—217页。

(50) 刘义庆撰，刘孝标注，龚斌校释：《世说新语校释》下册“容止第十四”，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版，第1196页。

(51) 刘义庆撰，刘孝标注，龚斌校释：《世说新语校释》下册“容止第十四”，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版，第1198页。

(52) 刘义庆撰，刘孝标注，龚斌校释：《世说新语校释》下册“容止第十四”，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版，第1200页。

(53) 刘义庆撰，刘孝标注，龚斌校释：《世说新语校释》下册“容止第十四”，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版，第1204页。

(54) 刘义庆撰，刘孝标注，龚斌校释：《世说新语校释》下“容止第十四”，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版，第1197页。

(55) 刘义庆撰，刘孝标注，龚斌校释：《世说新语校释》下“容止第十四”，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版，第1216页。

(56) 刘义庆撰，刘孝标注，龚斌校释：《世说新语校释》下“容止第十四”，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版，第1229页。

(57) 姚思廉：《梁书·孝行列传·何炯》，中华书局1973年版，第655页。

(58) 姚思廉：《陈书·韩子高传》，中华书局1972年版，第269页。

(59) 李延寿：《南史·谢晦传》，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522页。

(60) 颜之推撰，王利器集解：《颜氏家训集解》“勉学第八”，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第145页。

第九章
控制与汲取的“进化”

自秦汉而至于明清，“百代皆行秦政”。但秦制并非始终停留在商鞅、韩非子设计的模样一成不变，它也是有所“进化”的。

秦制的“进化”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1．完善对自身的统治基础（也就是官僚系统）的扁平化、原子化控制——新莽以打击土地兼并为名整肃官僚集团，东汉以宦官主持鸿都门学来削弱世家大族的势力，都是出于这个目的。2．寻求更有效的方法，控制更多的百姓，汲取更多的人力、物力——商鞅变法“民有二男以上不分异者，倍其赋”，曹操以屯田为名对百姓实施暴虐的农奴制度，都是出于这个目的，而且都相当成功。这两方面中，第一个方面是重点，也是难点，新莽和东汉的做法都没有取得成功。第二个方面相对容易，因为与官僚系统相比，散沙化的底层百姓面对皇权花样百出的汲取手段，几乎很难有什么像样的抵抗。

科举取士与历次变法是秦制最成功，也最重要的“进化”。

一、科举重塑官僚集团

自隋炀帝大业元年（公元605年）创设进士科，到清德宗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清廷废除科举，科举取士在中国实行了一千三百余年。作为秦制最重要的一次完善，科举制度给了普通读书人一种“我有机会进入体制，成为统治集团的一分子”的幻象。这种幻象极为坚固，以至于清廷取消科举之后，很多读书人对新的教育体制充满了抵触情绪。

山西太谷县的读书人刘大鹏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刘是山西太原县赤桥村人，生于清文宗咸丰七年（1857年），逝于1942年。光

绪二十年（1894年）中举，之后三次入京会试，均落榜而归，没能进入官场。为了谋生，他在太谷县某富商家中担任坐馆教师，一做就是二十年。1905年10月，废除科举的消息传到该县，刘大鹏深受打击，在日记中写下了“甫晓起来心若死灰，看得眼前一切，均属空虚”[(1)]的文字。

他的“心若死灰”，既是哀叹自己再无机会通过科举进入官僚集团，也是在哀叹自己私塾教师的职业将要不保，往后将生计艰难。刘在日记中说，科举废了，“有子弟者皆不做读书想”（1905年10月15日）[(2)]，再没人要送孩子来私塾读四书五经；“昨日在县，同人皆言科考一废，吾辈生路已绝”（1905年10月23日）[(3)]，县里做私塾教师的同行都在哀叹马上就要失业；“科考一停，同人之失馆者纷如，谋生无路，奈之何哉”（1905年11月3日）[(4)]，同行们纷纷丢了工作，可怎么办；“去日，在东阳镇遇诸旧友借舌耕为生者，因新政之行，多致失馆无他业可为，竟有仰屋而叹无米为炊者”（1906年3月19日）[(5)]，又在路上碰到因失业而无米下锅的老同行……

到了1914年，刘大鹏仍在日记中对科举的废除耿耿于怀：“予之幼时，即有万里封侯之志，既冠，而读兵书，及至中年被困场屋，屡战屡踬，乃叹自己志大而才疏，不堪以肩大任。年垂四十，身虽登科，终无机会风云，不得已舌耕度日。光绪季年，国家变法维新，吾道将就渐灭，迨宣统三年，革命党起，纷扰中华，国遂沦丧，予即无舌耕之地，困厄于乡已数年矣，年垂六十，遭逢世乱，无由恢复中原，不才孰甚焉，俨具七尺之躯，毫无补于时艰，不亦虚生矣，予惭仄曷极！”（1914年11月2日）[(6)]

“万里封侯之志”“不堪以肩大任”“无机会风云”等词句饱含着未能进入清帝国官僚系统的遗憾；“国遂沦丧”“无由恢复中原”等词句则饱含着对新时代的敌意和对旧时代（清朝）的怀念。

刘大鹏的遗憾、敌意与怀念其实都源于他相信：只要科举的上升通道存在，自己作为士，就有机会实现阶层跃升，进入统治集团。

遗憾的是，他似乎并不了解，官僚集团虽然是清帝国的核心统治基础，但科举取士并不是官僚的主要来源。何炳棣的研究认为，“在1871年七品至四品的地方官中有51．2%是捐的官”[(7)]，也就是拿钱买官的比例已经超过了科举（剩余的48．8%的官员也并非全部来自科举）。另一项针对湖北和山西太谷、安泽、虞乡三县的统计显示，只有3%—4%的“士”（生员）能通过科举取士完成从体制外向体制内的流动。[(8)]

科举之于清帝国，既在于造就一个由士构成的统治基础，也在于给士制造一种幻象，让他们觉得自己“永远有机会进入统治集团”。这种幻象没有年龄限制，每三年举行一次。无论落第多少回，只要还活着，似乎就仍有成功的机会和希望。换句话说，与其说它是一条上升通道，不如说更像是安慰剂，成功地让“天下英雄尽入吾彀中”。1905年之前，包括刘大鹏在内的上百万读书人（以获得“生员”资格为准），就安安静静地活在这样的幻象里。

清代官僚的主要来源不是科举取士，其他朝代也不是。

齐陈骏估算过唐代的情况，他的结论是：“唐代每30年为一代的官僚总数是19000人，而每30年科举出身的有3100人，那么科举出身的官僚仅占整个官僚集团的16%，另外80%以上都是非科举出身。如果我们将胥吏（基层的办事人员）包括在内，则科举出身的连1%也不到了。”[(9)]宋代号称“与士大夫治天下”，但依据南宋嘉定六年（1213年）的统计，科举出身的官员只占到了全部官员的26．1%，远比不上占比56．9%的“恩荫出仕”。这一统计只包括了官，没有将吏计算在内，否则科举出身者所占比例会更低。[(10)]

元代统治者对中原王朝的秦制不甚了解，虽也开科取士，但只学了形式，未能真正制造出“永远有机会成为统治集团的一分子”的幻象。所以，元末明初人叶子奇曾言：“（元代）科目取士，止是万分之一耳。”元代立国近一个世纪，科举出身的官员占官员总数的比例不超过3．88%。[(11)]至于明代，据郭培贵的考证：“明朝选官除科举外，还有荐举、学校和吏员等途径，而以数量论，洪武年间荐举一度成为选官制度的主体……洪武至景泰间，‘七卿’中的57．6%来源于以荐举为主的非科举出身者。而永乐、宣德以后，国子监生入仕在数量上也远远超过科举，科举只是在选任重要和高级官员中占据绝对，甚至垄断优势。”[(12)]

其实，清朝之所以废除科举，重要目的之一就是将读书人从“永远有机会进入统治集团”的幻象中解放出来。只有读书人得到了解放，抛弃了八股，转而与近代制度文明、科技文明接轨，国家才有自强的希望。很可惜，读了一辈子书、教了一辈子书的刘大鹏并不明白这个道理。

除了给读书人制造幻象，科举还有一重功能，那就是重塑官僚集团。

秦制的要义是废除分封制，以官僚系统而非诸侯、贵族为统治基础，以求最大限度满足皇权的独大欲望，进而最大程度实现对人力和物力的汲取。所以，秦制政权在做制度设计时，最核心的诉求是约束官僚集团，避免其向诸侯、贵族的方向演进。基于最基本的人性，每一个秦制官僚都会追求从制度上巩固自己的社会地位与财富，并将之传给后代。这样的追求若不加以遏制，官僚集团就会变成新的诸侯、贵族，就会挑战“普天之下莫非王土”，进而寻求“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寻求与皇权之间的契约关系，而不再甘于奴仆的身份。这是皇权绝对不愿意看到的，皇权希望社会扁平化、散沙化，不但百姓如此，官僚也应如此。

皇权欲控制官僚集团，使之成为忠实的奴仆，首要之务是控制进入官僚集团的路径。然而，无论是常规的察举、征辟（两汉），还是非常规的唯才是举（曹魏），选拔人才的政策虽然出自皇权（或那些架空皇权的强者），但具体选拔仍受制于世家大族。士人要想获得被察举、征辟的机会，首要之务是与有组织、有影响的世家大族建构起良好的关系。汉末汝南许劭、许靖兄弟的“月旦评”之所以炙手可热，是因为它相当于一张进入官僚集团的门票；汝南袁氏之所以能够“门生故吏遍天下”，也是因为袁家“四世三公”，其组织力和影响力可以助人进入官僚集团。袁氏也乐意这么做，因为这样可以巩固乃至壮大袁氏家族在统治集团中的实力。袁绍在汉末能够成为最大的军阀，与他的家族“门生故吏遍天下”这一背景有着直接的关系。即使是曹操的“唯才是举”，刻意想要重用寒族士人，但仍须依赖世家大族发掘寒族士人。只要依赖无法消除，“唯才是举”就无法长久。于是到了曹丕时代，历史又回到了“九品中正制”，终究还得由世家大族来组成官僚集团。

科举的出现改变了这种局面。皇权自此有了稳定可控的选拔工具，用来更新官僚集团。皇权不在乎官僚集团中究竟有多少人出自科举，它在乎的是进入官僚集团的路径必须控制在皇权手里——如前文所述，据南宋嘉定六年（1213年）的统计，科举出身的官员只占到了全部官员的26．1%，远不及占比56．9%的“恩荫出仕”。但科举也好，恩荫也罢，选拔人才的路径均控制在皇权手里，这才是最重要的。站在皇权的角度，唯有如此才能防范门阀的出现，才能让官僚集团扁平化、原子化。而且，相较于消灭拥有紧密血缘关系的世家大族，消灭松散的所谓“科举朋党”要容易得多。换言之，科举取士完全改变了官僚集团的生态，极大地提升了秦制政权的安全系数。

二、增收变法花样百出

秦制的另一重“进化”是通过变法来不断提高政权的汲取能力。

细察中国古代历次变法的诉求，不难发现，它们大多是以解决财政问题为中心的变法。变法的核心目的是增加朝廷收入，而非解决民生疾苦、实现税负公平。

试举几例。商鞅变法前文已有述及，不再赘言。

第一，来看汉武帝刘彻的改革。

自元狩四年（公元前119年）开始，为增强对人力、物力的汲取，刘彻的改革至少使用了三种“空手套白狼”的手段。第一种手段是在当时流通的半两钱之外，发行一种奇怪的新货币“白金三品”。它并不是真的白金，而是用银和锡混合铸造，原因是皇家库房里银和锡最多。“三品”是三种大小与纹刻不同的钱，代表不同面值，一种上面刻着龙，一种上面刻着马，再一种上面刻着龟。白金三品不是真金，但刘彻强行给它定了一个比真金还离谱的面值。离谱到什么程度？刘彻规定：一枚龙纹钱值3000钱，一枚马纹钱值500钱，一枚龟纹钱值300钱。汉代银价贱，每两不过50钱。一枚龙纹钱的标准重量是8两，用银价换算，等于400钱，龙纹钱中还掺杂了大量更廉价的锡。也就是说，一枚龙纹钱的实际价值其实连100钱也不到，货币面值是货币实际价值的30倍。刘彻滥发货币的实质是利用通货膨胀疯狂敛财。[(13)]

不过，刘彻忽略了一点，白金三品仿造起来不难。老百姓不是傻子，官府造，我也造，结果刘彻敛财的目的没达到，国家的货币体系反而崩溃了。刘彻不得不出台严酷的法律，凡盗铸者，不论情节轻重，数额多寡，发现后一律处死。结果，“自造白金五铢钱后五岁，赦吏民之坐盗铸金钱死者数十万人。其不发觉相杀者，不可

胜计。赦自出者百余万人。然不能半自出，天下大抵无虑皆铸金钱矣”[(14)]。刘彻时代的全国人口总数在3000万—4000万之间。这意味着，为了打击盗铸之风，不得不把天下至少三十分之一的人关进监狱，多少人因此掉了脑袋则未可知。

第二种手段是向全国百姓征收“财产税”。鉴于国家对基层的控制能力太弱，无法切实调查每户人家的资产，刘彻发动了一场声势浩大的“算缗告缗”运动。“缗”指的是百姓财产中来自非农业收入的部分，“算缗”就是对这部分收入征收财产税，比例是6%；特殊人群可享受优惠，比例是3%。“告缗”就是鼓励百姓举报一切认识的人的资产。刘彻规定：凡告发他人隐匿资产或呈报资产不实，查证确凿后，被告资产全部没收，没收资产的一半作为对告发人的奖励。告缗令传达下去之后，一场持续四年之久的全民大告密运动就此启动。

算缗告缗到底卷入了多少百姓？刘彻究竟从中掠夺到了多少财富？司马迁给出的答案是：“告缗遍天下，中家以上大抵皆遇告……治郡国缗钱，得民财物以亿计，奴婢以千万数，田大县数百顷，小县百余顷，宅亦如之。于是商贾中家以上大率破，民偷甘食好衣，不事畜藏之产业，而县官有盐铁缗钱之故，用益饶矣。”[(15)]商人、中产以上的家庭全都破产，百姓从此满足于得了钱就吃掉、喝掉、花掉，不敢再有任何积累财富的欲望。官府的钱多到花不完。

第三种手段是消灭民间商人，让官府成为唯一的经商者，也就是“利出一孔”。最先启动的是盐铁官营。为了生存，百姓必须吃盐；为了有效率地耕种，百姓必须买铁农具。官府垄断盐、铁等于向所有百姓变相征税，结果是百姓不但必须花高价才能购到盐、铁，而且买回的还是劣质货。刘彻死后，来自基层的贤良、文学控诉这一政策造成了如下恶果：“今县官作铁器，多苦恶，用费不

省，卒徒烦而力作不尽……盐、铁贾贵，百姓不便。贫民或木耕手耨，土耰淡食。”(16)盐、铁卖得那么贵，质量又那么差，走半天山路进城去买，还经常碰上不营业。用不起铁器，老百姓只好退化到用木头农具耕地，用手去除草；吃不起食盐，老百姓只好退化到吃那些有点咸味的土和草梗。

尝到盐铁官营的甜头后，刘彻又采纳了桑弘羊的均输法，将整个汉帝国变成了一台商业机器。所谓均输法，简单说来，就是官府包揽商品的购买与销售。官府在甲地廉价买进当地土特产，然后由均输官运输到不出产该商品的乙地高价出售。整个政策的核心是由官府垄断国内的主要商业活动。百姓想卖哪些商品、想买哪些商品都只能去官府在各地开办的收购点和销售点。

以上种种掠夺民财的政策，造成的结果是汉帝国的百姓大量破产、逃亡。司马迁因此评价武帝“俯观嬴政，几欲齐衡”，可与暴君秦始皇相提并论。

第二，来看北魏孝文帝的均田制改革。

这场改革的核心驱动力同样是增强朝廷在人力、物力方面的汲取能力。自魏晋以来，战乱频繁，一方面，人口大量死亡，出现了许多空地、荒地；另一方面，中原豪强聚族自保，许多人口依附（或被控制）到了他们名下，时人称“民多隐冒，五十、三十家方为一户”(17)。北魏旧的赋税征收方式是按户计算。50户、30户人口隐蔽在一户豪强名下，意味着朝廷只能征收到一户的赋税。面对这种状况，孝文帝不愿放任自流，于是就有了均田制。

均田制的内容很简单：1．土地归朝廷所有。2．朝廷将土地按标准分配给农民耕种。该政策之所以能够从豪强手中抢夺百姓与赋税，关键在于朝廷掌握了大量荒地。因为荒地总量太大，以至于不

仅仅是人丁，每头牛也可以从朝廷手里分配到30亩耕地。当然，如果仅仅是分配土地，对依附于豪强名下的百姓来说吸引力还是不够，毕竟人口锐减之后，土地资源并不紧张。于是，朝廷又制定了新的租税征收方式，将按户计算改成了按“一夫一妇”计算，且额度低于豪强向依附农户征收的私租。如此一来，依附豪强的农户权衡利弊，就会很自然地倾向于脱离豪强，转而投入朝廷怀抱。

为避免豪强的抵制与反抗，北魏朝廷还制定了还授政策。先将豪强的耕地名义上收归朝廷，再由朝廷“还授”给他们，实际上等于没动。朝廷还给豪强的私家奴婢分配土地，形同于增加了他们的资产。如此，国家与豪强之间成功达成妥协，和平分割了百姓的租税。百姓脱离豪强，看似减轻了负担，实则隐性损失更大，不但名下土地的所有权归了朝廷，自己只保留了使用权，一个个原子化的个体面对强大的皇权及其代理人，其政策层面的“议价能力”也远不如面对豪强。尤其是北魏官员的俸禄发放与赋税征收挂靠在一起，使得北魏的官僚系统长期倾向于最大限度压榨那些脱离了豪强的自耕农，其结果便是“均田制施行后小农的经济负担并没有减轻，反而在敲骨吸髓的征收方式下，走上破产流亡、沦为依附豪族的佃农的道路”(18)。

第三，唐德宗的两税法。

唐德宗时的宰相杨炎在建中元年（公元780年）推行的两税法改革，目的也是为了增强朝廷对人力、物力的汲取能力。

所谓两税法，简单说来就是将过去的田税、户税并为一税，每年分春、秋两季征收。过去的“租庸调”是按户征，新的“两税”是按地征税、量出制入、折钱纳物。具体说来就是：资产和田地越多，征税就越多；财政上有多大的开支，就征多重的税；农产品必须卖成钱或者按官方制定的市值折算成钱来缴纳。

按官方说法，两税法改革之后，以前那些“租庸杂徭”就全免了，百姓只需要交正规的两税。但实际情况是：不但以前的租庸调变成了两税，租庸调之外那些无法律依据的苛捐杂税，如唐代宗搞的“青苗钱”“地头钱”“夏税”“秋税”以及双倍的庸和调，也全部并入了两税。所谓免去“租庸杂徭”，不过是把苛捐杂税的名目取消，实际征敛的量并没有减少。而且，很快那些被并入了两税的苛捐杂税又会以其他名目再次出现。所以，对两税法的本质，王夫之有一段沉痛的批评：

> 盖后世赋役虐民之祸，杨炎两税实为之作俑矣……两税之法，乃取暂时法外之法，收入于法之中……人但知两税之为正供，而不复知租、庸、调之中自余经费，而此为法外之征矣。既有盈余，又止以供暴君之侈、污吏之贪，更不能留以待非常之用。他日者，变故兴，国用迫，则又曰：“此两税者正供也，非以应非常之需者也。”而横征又起矣。(19)

大意是：后世那些虐待百姓的“赋役之祸”（王夫之后文提到了宋代的“庸外加役”与明代的“一条鞭法”），始作俑者是杨炎的两税法。所谓两税法是将征租庸调时那些临时性的没有法律依据的苛捐杂税一并收进两税之中。自此，百姓只知道两税是正税，再也意识不到其中还包含许多“法外之税”。两税带来的财政盈余也全被暴君和贪官污吏挥霍一空，并不会存留下来，以供非常时期应急使用。真到了非常时期发生了变故，财政不够用了，朝廷又会跑出来说：“两税是征税，不包括应对变故的经费。”于是，新的横征暴敛又开始了。

对百姓来说，两税法还有一件要命之事。过去的租庸调用实物支付，两税须用货币支付。在农业国家，用钱纳税往往等同于变相大幅加重农民负担。必须用钱纳税导致市场上农产品的供求体量巨

大，进而直接导致农民在交易过程中没有了议价能力。而且，市场上农产品增多，还会直接引发钱荒。再者，官府究竟参考何种物价来制定赋税额度，农民也没有任何发言权。所以，两税法推行之后，唐代农产品和日用品的价格即呈现出暴跌之势，一路跌得百姓胆战心惊，家破人亡。

两税法实施的前一两年，一匹绢可以卖3000—4000文钱；到唐德宗贞元十二年（公元796年），只能卖1500多文；到贞元二十一年（公元805年），已跌到800多文了。米价也是一样，唐代宗大历五年（公元770年）前后，正常年景的米价是每斗1000或800文；到了贞元元年（公元785年）前后，正常年景的关中地区的糙米只能卖30多文一斗，好米最多也只能卖70文一斗；到唐宪宗元和五年（公元810年）前后，若遇丰收，米价甚至跌到2文钱一斗。大体而言，因为钱重物轻，两税法实施的第8年，百姓的负担已然“倍输”（唐人陆贽之言），也就是翻了一倍；实施到第30个年头，“纳税户的实际负担加重了四倍”；实施到第40个年头，“纳税户实际负担几乎增加为原来的五倍”。[(20)]

简言之，两税法的推行越得力，百姓生产出来的农产品价格就越低，遭受到的实际盘剥就越多，从而出现了白居易与韩愈这两位两税法的激烈反对者。当然，他们的反对是没有用的，相比白居易在诗里哀叹百姓因“岁岁输铜钱”而“岁暮衣食尽，焉得无饥寒”，唐德宗和重臣杨炎等更喜欢用两税法将国库装得盆满钵满。唐朝灭亡之后，宋、元、明、清各代仍对两税法情有独钟，也是相同的道理。

第四，来看北宋的王安石变法。

这次变法争议甚多，但其本质不在“均税”而在“增税”，这个结论是没有疑问的。

越穷越纳税，越富越不纳税，税赋不均的现象自北宋开国之时就已经很严重。范仲淹曾试图通过“方田均税”（清查、丈量每户人家的实际耕地，按实际耕地的数量征税）来解决这个问题，但阻力重重，结果是不了了之。王安石变法也曾高举“方田均税”的旗帜。但旗帜归旗帜，实操归实操。按理说，宋代对人口和土地的控制能力远超前代，清查土地的实际占有情况较之前代要容易一些，而且当时设计的“方田”办法即使在今天看来也还算实用。然而，方田均税法在宋神宗熙宁五年（1072年）颁布，拖到熙宁七年才开始实施，搞了一个月，就以天旱为由停了下来。之后，干一阵停一阵，到元丰八年（1085年），朝廷干脆把方田均税法取消了。虽然折腾了十余年，但毫无成效。

方田均税搞不起来，原因其实很简单：宋神宗对税负公平的兴趣不大，他更在意如何通过变法征敛到更多的财富，填满自己的国库。这也是为什么除了方田均税之外，那些可以增加财政收入的变法项目，如青苗法、免役法、市易法等，均被执行得异常坚决、异常彻底。以青苗法为例，官方文件说得好听，青黄不接时百姓可以向官府借“青苗钱”，贷款利率比民间高利贷的利率低，如此朝廷能多收些利息钱，老百姓也能少受高利贷的盘剥。这项看起来似乎很好的政策在实际操作中却变成了“抑配”——挨家挨户按资产多少进行摊派，无论缺或不缺粮食，都要向官府“借”青苗钱。越有钱的人家，必须“借”得越多。这实际上形同官府强行向百姓集体放高利贷。民间高利贷的利率虽然高，但百姓不到万不得已是不会去借的，借民间高利贷的百姓数量终究有限；青苗钱的利率虽低，受到祸害的却是全民。市易法也是类似的情况，它实际上相当于汉武帝消灭民间商人的翻版。官府贱买贵卖，“尽收天下之货，自作经营”，最后连水果之类的商品都被朝廷设置的市易司给垄断了。[21]

第五，明朝万历年间张居正的“一条鞭法”。

这次变法的核心驱动力仍然是明朝政府的钱不够用了。

钱为什么会不够用？自然是因为朝廷的开销没有节制，一年多过一年。朱明皇室疯狂生子，朝廷供养他们的费用以几何级数递增。百姓不堪重负，不断逃去依附官僚地主。朝廷能够征税的户口基数越来越少，开支的费用却越来越大，那么平均摊派到每户头上的赋税就只能越来越重。结果就成了恶性循环。

一条鞭法本该终止这种恶性循环，但实际结果恰恰相反。明朝百姓的税负分为按田亩计算的“赋”和按人丁计算的“役”两部分。百姓大量跑去依附官僚地主，让明朝政府在役这个部分损失巨大。一条鞭法解决这个问题的方式是将赋和役合并到一起，按田亩征收，缴纳银钞。这种改变对朝廷是大好事，役的收入大增，对百姓却是灾难，因为被合并为一条鞭（编）的，不仅仅是正规的赋和役，还包括大量不合法但已形成惯例的苛捐杂税。合并之后，那些苛捐杂税的名目很快又在一条鞭之外再度出现，被施加在了百姓的头上。一条鞭法可谓与唐代的两税法如出一辙。[(22)]

当然，百姓也有自己的应对智慧。为了摆脱沉重的负担，许多人选择卖掉田产。因为一条鞭法将丁役挂靠在田亩之上，有土地才需要纳丁役。也就是说，放弃田产去经商、从事手工业，是可以免役的。于是，湖广湘乡的士绅洪懋德当年观察到，一条鞭法推行后，他的家乡发生了巨变：

> （民田）十年而五六易其主，且就荒焉。民无十世之族，而散于四方，皆自此起。

> （民）视田如荼毒，去之唯恐不速……于是而世业之田皆归于无籍之豪民。[(23)]

为了逃避负担，百姓开始卖田，听任土地荒芜，选择离开土地去外乡谋生，聚族而居的风俗开始消失。土地被视为一种有害的东西，许多人将世代耕种的土地卖给了那些拥有不必纳税特权的豪族。

洪懋德的描述并非个案。湘潭人李腾芳在他的家乡也看到了相似的情形，“一望数百里而尽弃之，素封大家化为逃亡”。地方史料证实，明神宗万历四年（1576年），长沙府、茶陵州及攸县推行一条鞭法后，“土地的易手较前频繁，且多集中于志在规避赋役的新的豪强、地主的手里”(24)。

再往后，清代的“摊丁入亩”也是大体相似的情形。它的内容与一条鞭法相似，是把按人丁征收的“丁银”合并到按田亩征收的田赋当中。它造成的结果也与一条鞭法基本一致，各种不合法的苛捐杂税被摊丁入亩正规化后，新的苛捐杂税很快又以相同的名目再度出现。雍正曾自诩摊丁入亩是大德政，但现实是雍正至乾隆时期，百姓以卖田、流亡来逃避赋税的现象愈演愈烈。

三、减负改革中途夭折

自秦汉至明清的绝大多数变法是奔着为朝廷增收而去的，但范仲淹主持的“庆历新政”是其中一个难得的异数。这场北宋建国八十余年后启动的改革，主要目的不在敛财，而是想要缓解民生疾苦、整顿腐朽的官僚系统。

庆历三年（1043年），范仲淹奉命向宋仁宗“条陈十事”，列举了十条亟须改革的问题，其中有八条涉及对官僚系统的整顿。

第一条叫作“明黜陟”。废除文官三年升一次官、武官五年升一次官的论资排辈旧例。只有做出了“大功大善”的官员，才能得到升迁。

第二条叫作“抑侥幸”。减少官二代、官三代靠着恩荫制度，不必参加任何选拔、考核就可以直接做官的比例。南宋嘉定六年（1213年）的统计显示，宋代靠着恩荫出仕的官二代、官三代占到了官僚总数的56.9%（在宋真宗时代，比例可能更高）。

第三条叫作“精贡举”。科举考试要公正、要加大选拔难度。

第四条叫作“择官长”。建立一套从中央到地方的针对官僚的监察、举荐制度。

第五条叫作“均公田”。整顿官员名下的“职田”（用作俸禄之用，离职时交回朝廷），多的吐出来，少的补上去。

第六条叫作“厚农桑”。发展经济，改善民生。

第七条叫作“修武备”。恢复府兵制以加强国防力量。

第八条叫作“减徭役”。具体的做法是合并行政区（比如合五县为一县），以减少官吏的总量，进而减少百姓负担。

第九条叫作“覃恩信”。严格考察官僚对朝廷恩惠（“赦书中及民之事”）的执行情况。

第十条叫作“重命令”。严格考察官僚对朝廷命令（“宣敕条贯”）的执行情况。[(25)]

除了第七条，其余九条全部获得了宋仁宗的认可，“皆以诏书画一颁下”[(26)]。被写入诏书之中，成了庆历新政的改革内容。

在秦制时代，要推动这样一场以整顿官僚集团为核心目的、严重损害官僚利益的改革，无疑只能依赖皇权。宋仁宗最初是愿意支持这场改革的。

官僚是北宋王朝的统治基础，但官僚的利益与皇权的利益并不完全一致。皇权希望官僚尽职尽责，替自己运作人力、物力的汲取体制，维持统治的稳定，但官僚往往更在意任内不出事和捞足钱。论资排辈，官二代、官三代直接上位的规则很符合官僚的利益，但未必符合宋仁宗的利益。这些规则带来了“冗官”（人员严重超编）、“冗费”（财政不堪负荷）和玩忽职守（反正熬够时间就可以升迁），对宋仁宗追求的统治稳定显然都是不利的。这是宋仁宗支持范仲淹改革的主要原因。

但宋仁宗对改革的支持只维持了一年时间。原因是宋仁宗发现在整顿官僚集团的过程中，范仲淹等改革派以“君子”自居，公开肯定“朋党”，抱成了一团。而在皇帝眼里，官僚中的好人（君子）抱团是比坏人结党更有害的事情。后者为了腐败、怠政、升迁，言行上往往选择迎合皇帝的喜好，前者却相反，为了政治理想常常会走到要求制约皇权的道路上去。

对好人抱团这件事，宋仁宗毕生存有极高的警惕。早在宝元年间（1038—1040年），他就问过大臣张士逊：“君子小人各有党乎？”张士逊回答：“有之，第公私不同尔。”君子和小人都有朋党，不过公私不同，好人抱团为公，小人结党为私。宋仁宗没有正面评价张士逊的回答。他转而强调“法令必行，邪正有别，则朝纲举矣”——所有的官僚都应该遵守、执行朝廷的法令。[27]

到了庆历四年（1044年）四月，当主持庆历新政的范仲淹因损害了官僚集团的利益而被指责搞朋党时，宋仁宗对着范仲淹又提出了相同的问题：“自昔小人多为朋党，亦有君子之党乎？”

皇帝提出这个问题，并不是真的在提问，答案早已在他心中。他希望朝中君子个个“退无私交，非公事不言”，一盘散沙才好。皇帝只是在以提问的方式，希望范仲淹体察到他心中的答案，并希

望范仲淹遵照这个答案去修正自己的言行——上个月，皇帝刚刚在迩英阁向部分官员出示了一份“御书十三轴”，里面列有“治政要目”三十五项，其中有一项正是“辨朋比”。但范仲淹的回答令宋仁宗非常失望，他说：“臣在边时，见好战者自为党，而怯战者亦自为党，其在朝廷，邪正之党亦然，唯圣心所察尔。苟朋而为善，于国家何害也？”意思是，我在边境带部队的时候，好战者会结党，怯战者也会结党。朝廷中也是一样，好人会结党，坏人也会。结党做好事，对国家能有什么害处呢？[(28)]

二人的对话其实并不在同一维度上。范仲淹觉得朝中好人团结起来有益，对国事有益。宋仁宗觉得臣僚们抱成一团有害，对皇权有害。

同月，范仲淹的支持者欧阳修又自诩“朋党”，公开撰文《朋党论》，为好人抱团正名，且将文章送到了宋仁宗眼前。文章说，朋党是个很正常的东西。自古以来，君子与君子“以同道为朋”，小人与小人“以同利为朋”。皇帝应该做的，不是禁止朋党，而是“退小人之伪朋，用君子之真朋”。[(29)]如此，宋仁宗就更不高兴了。

不高兴的后果是终止改革。庆历四年六月，改革的反对者捏造了一则流言，说范仲淹有意废黜宋仁宗，另立新君。流言很蹩脚，毫无可信度，但宋仁宗已不愿再表达对范仲淹等改革派的信任——他只信任散沙式的范仲淹，而非与人抱团的范仲淹。为求自清，范仲淹只好以外出巡守为名，离开中央，去地方做陕西、河东宣抚使，另一位改革旗手富弼也离开了中央，去地方做河北宣抚使。

庆历四年九月，靠着恩荫进入体制的官二代陈执中被宋仁宗任命为参知政事（大体相当于副宰相）。限制官二代、官三代靠恩荫

上位是庆历新政的核心内容。皇帝如此任命新的宰相，等于变相宣告废除新政。

十一月，又发生了“进奏院狱”。一班官员用卖废纸的公费会餐，饮酒作诗，召妓相陪，席间的某些言辞（如“醉卧北极遣帝扶，周公孔子驱为奴”）被有心人记下，成了弹劾他们的罪状。宋仁宗并不在意他们的酒后狂言，但参加聚餐的多有支持改革者。皇帝遂借题发挥，下了一份严厉的诏书，大谈盛世之下只应有贤君和明臣，绝不该存在朋党，痛斥了知识分子交游往来的风气，命令相关部门“采察以闻”，对类似行为进行监视、汇报。[30]

诏书指向明显，宋仁宗的立场已然明确。心领神会的范仲淹随即辞去了参知政事一职，庆历新政至此彻底归于失败。

---

(1) 刘大鹏：《退想斋日记》，山西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146页。

(2) 刘大鹏：《退想斋日记》，山西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146页。

(3) 刘大鹏：《退想斋日记》，山西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147页。

(4) 刘大鹏：《退想斋日记》，山西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147页。

(5) 刘大鹏：《退想斋日记》，山西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149页。

(6) 刘大鹏：《退想斋日记》，山西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198页。

(7) ［美］费正清：《剑桥晚清中国史》上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518页。

(8) 王先明：《近代绅士：一个封建阶层的历史命运》，天津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656—657页。

(9) 齐陈骏：《枳室史稿·唐代的科举与官僚入仕》，甘肃文化出版社2005年版，第245页。

(10) 方健：《北宋士人交游录》，上海书店出版社2013年版，第3页。

(11) 冯尔康：《中国社会结构的演变》，河南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772页。

(12) 郭培贵：《二十世纪以来的明代学校与科举研究》，《明史研究论丛》2014年第2期。

(13) 胡诚：《白金三品之管见》，《考古与文物》1994年第5期。

(14) 司马迁：《史记·平准书》，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1433页。

(15) 司马迁：《史记·平准书》，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1435页。

(16) 桓宽：《盐铁论·水旱》，上海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第80页。

(17) 魏收：《魏书·李冲传》，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1180页。

(18) 薛海波：《论北魏均田制下的国家、豪族与小农》，《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010年第1期。

(19) 王夫之：《读通鉴论》卷二四《德宗》，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711—712页。

(20) 刘玉峰、钊阳：《试论唐代两税法的制度缺陷和执行弊端》，《唐史论丛》2013年第2期。

(21) 邓广铭：《北宋政治改革家王安石》，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7年版，第145—155、175—183页。

(22) 邝士元：《中国经世史》，上海三联书店2013年版，第40—41页。

(23) 《同治湘乡县志卷三下赋役志》，见杨国安：《明清两湖地区基层组织与乡村社会研究》，武汉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56—157页。

(24) 梁方仲：《梁方仲文集》，中山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98—99页。

(25) 范仲淹：《范仲淹全集·答手诏条陈十事》，四川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523—538页。

(26) 脱脱等：《宋史·范仲淹传》，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10274页。

(27) 脱脱等：《宋史·张士逊传》，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10218页。

(28) 毕沅：《续资治通鉴》，岳麓书社2008年版，第612页。

(29) 欧阳修：《欧阳修全集·朋党论》，中华书局2001年版，第297页。

(30) 李强：《北宋“进奏院狱”的政治文化解读》，《江苏社会科学》2008年第2期。

第十章
王朝的盛世潜流

> 忆昔开元全盛日，小邑犹藏万家室。稻米流脂粟米白，公私仓廪俱丰实。

这是杜甫在唐代宗广德二年（公元764年）前后写下的《忆昔二首》中第二首的开头部分，也是后世赞颂唐玄宗“开元盛世”的核心材料之一。

但诗人的赞颂当不得真。写这首诗的时候，杜甫正在安史之乱的大动荡中过着风雨飘摇的生活，距离潦倒去世只有数年时间。“稻米流脂粟米白”其实是一个饥荒中人对往日太平生活的事后美化。十多年前的杜甫眼中并无什么“开元盛世”，他的《兵车行》《丽人行》讽刺的是唐玄宗与杨贵妃的骄奢淫逸。他的“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入门闻号啕，幼子饥已卒”描述了另一个真实的玄宗时代。

那是一个百姓纷纷脱离朝廷控制的时代。武周时代，宰相韦嗣立说的是“今天下户口，亡逃过半”。唐玄宗在开元九年（公元721年）的诏书里也承认百姓“逃亡未息”。天宝十四载（公元755年），杜佑撰《通典》中又说天宝年间“所在隐漏之甚也”，许多百姓将自己藏了起来，躲避朝廷，原因是“有司不以经国驭远为意”，朝廷的政策只顾眼前的汲取，没有更长远的考虑。[(1)]

自秦汉至明清的所谓“盛世”大体如此。当然，有地方可以逃亡来躲避朝廷，终究要好过无处可逃、只能去做盗贼的时代。这也是开元盛世何以成为杜甫怀念对象的重要原因。下面再以“贞观之治”为例，对盛世（或曰治世）的含金量略做管窥。

一、“贞观之治”的民生疾苦

先来看一组数字：西汉初年，全国的人口约为1400万—1800万[(2)]。东汉光武帝刘秀去世时，全国人口约为2100万[(3)]。晋武帝司马炎太康元年（公元280年），全国人口约为1616万[(4)]。唐朝贞观初年，全国人口约为1235万[(5)]。

在这组数字的背后是一串璀璨夺目的名词：文景之治、光武中兴、太康之治与贞观之治。

再来看另一组数字：秦灭六国后，全国人口接近4000万[(6)]。汉平帝元始二年（公元2年），全国人口约为5959万[(7)]。汉桓帝永寿二年（公元156年），全国人口约为5648万[(8)]。隋炀帝大业五年（公元609年），全国人口约为4602万[(9)]。

在这组数字的背后是另一串黯淡无光的名词：秦末流民、绿林赤眉流民、黄巾流民与隋末流民。

有些时候，历史是会符合数学逻辑的。从秦汉到隋唐，近千年的漫长时光里，人口的生殖力与土地的生产力之间一直在做着殊死搏斗。朝廷控制下的大多数人口长期集中在古老的黄河流域。耕地面积没有大幅度的增长，农作物的亩产量也没有质的飞跃，无论先民们如何披星戴月，6000万人口似乎一直是这块土地所能承载的极限——这承载既包括满足百姓免于饥寒，也包括满足统治集团的横征暴敛。

其实，横征暴敛是秦制下的一种常态。“王朝建立初期政治清明，后来才逐渐腐败”只是后人脑补出来的一种幻象。比如西汉初年的文景之治，常见的描述是汉文帝如何节俭，可谓政治清明，但实际情况是“守县官财物而即盗之”（也就是监守自盗，挪用本该上交给朝廷的财富）的情况非常严重，以至于自吕后到文帝均在不

断出台政策，或制定严厉的法律，或派遣御史前往地方监察。缺乏制度性约束的官僚系统敢于贪墨皇帝的财富，自然更敢于侵夺底层百姓。所以，贾谊呈给汉文帝的奏疏里说：“汉之为汉几四十年矣，公私之积犹可哀痛。失时不雨，民且狼顾；岁恶不入，请卖爵、子。既闻耳矣。”[(10)]大意是：我大汉建国四十年了，长安的国库是空的，民间也没有积蓄。气候失调、雨水失常，百姓就要饿肚子、逃荒、卖儿卖女。为什么国库是空的，民间也没有积蓄？当然是因为官僚系统贪污腐败，不受约束。类似的情况也见于汉景帝时代。汉景帝在诏书中给出的对时代的诊断是：“吏或不奉法令，以货赂为市，朋党比周，以苛为察，以刻为明，令亡罪者失职。”[(11)]整个官僚系统腐败透顶，烂到根了。所谓文景之治尚且如此，其他历史时期也就可想而知了。

因此，秦制下的太平盛世可以粗略地简化为一个公式：

朝廷汲取量+人口生存必须量≈土地出产总量。

一旦朝廷汲取量激增（如皇帝有了对外扩张、宣示武力的欲望），或人口增长至一个比较高的水准，“盛世”就要出问题（如出现流民），如果再发生外敌入侵或统治集团内部分裂，王朝就有可能崩盘。当然，前文提到的6000万人口并不是一个绝对上限。新作物的引进、种植技术的变化、水利工程的修筑、南方山地的开发等都会对可供养的人口上限有所提升。同样，如果朝廷对人力、物力的汲取超出了一般水平，急速增加，也不必等人口达到6000万，王朝同样有可能崩盘。隋朝亡于流民和统治集团内部分裂，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传统的历史叙述对皇权有着浓厚的仁政情结，认为治世、盛世一定是仁政的结果，实则是一个典型的认知误区。当中国土地上的人口从6000万锐减至1000多万，任何智力正常的君主，只要他没有

丧心病狂，都可能实现所谓的文景之治或光武中兴。贞观之治也是同样的情形。生殖力与生产力之间紧张的关系突然缓和下来，偌大的唐帝国只剩下不足300万户，总人口已不及隋炀帝时代的四分之一。人均耕地的大幅度增加既意味着百姓物质条件的极大改善，也意味着对劳动力的迫切需求。于是，生产力和生殖力迅速攀升。十年生聚，十年教训。自唐高祖李渊晚年社会渐渐安定，到唐太宗贞观八年（公元634年）前后人丁繁庶、家给人足，“盛世”的到来恰恰用了二十来年。一切不过是自然调节的结果，既不必说贞观之治有多伟大，也不必谬赞李世民有多英明。

下面再具体说一说贞观之治下的民生。按唐朝户籍制度，百姓有“课户”与“不课户”两类。前者主要指家中有男丁、需要承担赋役的自耕农和半自耕农，后者主要指享有免赋役特权的官僚及其部曲、奴婢。官僚吃饱吃好自然不成问题，部曲、奴婢是官僚的私有财产，为了保值，也不会随随便便就被饿死。所以，要判断贞观之治的含金量，主要得看自耕农和半自耕农过得怎样。

这方面，学术界已有许多的研究可供参考。

比如，学者晏金铭的考据结论是，贞观年间的百姓至少需要拿出收成的四分之一交给朝廷：“一家‘课户’如能拥有耕地五十亩，全年生产粮食（粟或稻米）五十石，每年须无偿地将其中的十一石二斗贡纳给国家，占收获总量的22%，再加上各种杂徭、附加税，则在25%以上，这是就正常年景而言的。如遇水、旱、蝗虫等自然灾害，粮食歉收，那就不是25%了。至于那些‘受田’二三十亩乃至十亩、五亩的贫下户……他们的赋役负担，则不是全年农业生产收入的百分之二十几，而是百分之三四十，甚至五十以上。这样苛重的赋役剥削显然远远地超过了农民的实际负担能力……贞观年间‘课户’的负担竟高达全年收获总量的四分之一以上。难得的‘治世’尚且如此，其他时代就更不用说了。”[12]

学者王士立的考证也得出了近似的结论。他认为，余粮只够百姓维持最低的生活水准和最简单的再生产需求，也就是较之隋末乱世遍地饿殍，贞观年间的百姓终于过上了饿不死的日子：“贞观时期……宽乡农民受田百亩，如都种粮食，中常年景一年可得粟百石左右。但是这百石的收获约有四分之一要交给国家……以一家五口计算，岁食米三十六石或粟六十石。除去口粮尚余粟十五石，加上其他副业收入，大致可维持全家穿衣，修理和购置炊具、农具，送往迎来和养生送死等费用。这只是维持最低的生活水平和最简单的再生产需求。若遇丰稔，其境况可能要好一点；如遇凶歉，则境况还要差些。受田三十亩的狭乡农民，中常年景只能得粟三十石，加上其他副业收入，除去租调，即使不以庸代役，也只能是糠菜半年粮的生活了。”(13)

历史学家韩国磐研究敦煌和吐鲁番的出土文献，得出结论：“天宝时的农民生活并不像旧史所渲染的那样美满，根据敦煌和吐鲁番发现的关于物价资料的探讨，好的只能勉强维持生活，差的必至破产流亡。”(14)开元盛世尚且如此，贞观之治自然也不会好到哪里去。

《中国赋税史》中计算得出的结论也大体差不多：“均田、租庸调制下农民生活的真实情况如何呢？贞观年间唐太宗到灵口时，见到这里农民一丁授田三十亩，敦煌户籍残卷中各丁授田的平均数也在三十亩左右或略多，我们按一丁授田三十亩计算。当时的粮食产量……亩产一般为一石，三十亩共收三十石。丁男为户主的一夫一妇五口之家主要就是靠这三十石来生活的。这三十石中……按唐代规定……所缴租庸调、户税、地税共为七石七斗五升。三十石收获物在上缴租税外，还余二十二石二斗五升。一夫一妇的五口之家所需口粮，据《唐六典》卷六《尚书刑部》所载……全家五口每日需口粮七升二合，全年共需口粮二十五石九斗二升。但缴纳租税后

只剩下二十二石二斗五升，还缺少三石六斗七升，也就是说每年还缺少一个月以上的口粮。何况农民除吃饭以外，还需要种子、农具、肥料等生产资料和衣物等日常必不可少的开支，那就更加入不敷出了……至于像敦煌户籍残卷中记述的那样，贫苦农民授田数额还要低于三十亩的平均数，如果一户只能授田十亩、五亩，那是连租调也缴不起的。”[(15)]总结一下就是：农民吃不饱也饿不死的日子从贞观之治一直延续到了开元盛世。

学者吴章铨也研究过唐朝初年的民生，他的结论是：“（唐初）平常人家耕地三十余亩，可以养活三四口，家庭人口再多，便要忍饥耐寒了。如果耕的是上好田地，土地生产力好，那就宽裕些，如果是贫瘠田，就很难支持。”[(16)]

其实，贞观时期的君臣自己也很清楚贞观之治的含金量。

贞观四年（公元630年），李世民“狩于鹿苑，见野人多褴褛”[(17)]，发现很多穷人连衣服都穿不起。

贞观五年（公元631年），李世民拟修造洛阳宫，民部尚书戴胄上奏，批评朝廷赋役繁重，沉痛说道：“九成作役，余丁向尽……乱离甫尔，户口单弱，一人就役，举家便废。入军者督其戎仗，从役者责其糇粮，尽室经营，多不能济。”[(18)]戴胄说：陛下修筑洛阳宫，就等于把征兵役剩余的民间壮丁全征完了。百姓家中有一个人去服役，全家生计就要陷入困顿，服兵役还要自己准备器具，服徭役还要自己准备粮食，举全家之力，许多百姓也无力置办齐备。

贞观六年（公元632年），李世民心痒难耐要去泰山封禅，魏徵极力劝阻，理由是从伊水与洛水往东，一直到泰山与东海，“苍茫千里，人烟断绝，鸡犬不闻，道路萧条，进退艰阻”[(19)]。远不

是什么天下大治的景象。贞观十一年（公元637年），李世民往怀州游猎。有人上奏批评说，朝廷长期勒令“山东众丁”营造宫苑，还说如今的徭役可与暴隋相比，怀州、洛阳以东“残人不堪其命”，老百姓都要活不下去了。李世民对着侍臣发怒，说这样的批评是在诋毁君王，“有似咒诅”。[(20)]同年，还有侍御史马周上奏说，本朝人口不及隋朝的十分之一，但征发徭役不遑多让，“供官徭役，道路相继，兄去弟还，首尾不绝，远者往来五六千里，春秋冬夏，略无休时”，老百姓被朝廷的徭役折磨得死去活来，“臣每访问，四五年来，百姓颇有怨嗟之言，以陛下不存养之”[(21)]——我去基层访查，百姓对朝廷怨声载道，认为陛下根本不在乎他们的死活。

贞观十四年（公元640年），侯君集平高昌，李世民执意在其地置州县，当地百姓全都遭了殃。用褚遂良的话说，是“飞刍挽粟，十室九空，数郡萧然，五年不复”[(22)]，百姓或死于徭役，或为逃避徭役而成为流民，十室九空。也是在前一年，魏徵上奏批评李世民的爱民之心不能有始有终，“顷年以来，疲于徭役，关中之人，劳弊尤甚……脱因水旱，谷麦不收，恐百姓之心，不能如前日之宁帖”[(23)]，百姓已被朝廷的徭役弄得筋疲力尽，关中的百姓尤其惨，如果遇上水旱之灾，作物歉收，吃不上饭，恐怕会有人造反。也是在这一年，吴楚、巴蜀之地共二十八州因久旱出现了“饥人相食”[(24)]的惨剧。

贞观十五年（公元641年），房玄龄、高士廉路遇少府少监窦德素，询问为什么又在修太极宫北门。窦把二人的询问上报给李世民，李世民大怒，对着房玄龄、高士廉大骂“何预君事”[(25)]（关你屁事），自此“朝臣都不论事”[(26)]，众人缄默不言。

贞观十六年（公元642年），李世民下发诏书：“‘自今有自伤残者，据法加罪，仍从赋役。’隋末赋役重数，人往往自折支

体，谓之‘福手’‘福足’，至是遗风犹存，故禁之。”[(27)]皇帝下令：从今往后，再有百姓胆敢弄断自己的手足，以逃避朝廷的赋役，不但要依法治罪，赋役也不能因为残疾而免除。李世民在诏书中把百姓自残归咎于“隋末遗风”，纯属狡辩。如吕思勉所言：“是时役苟不重，民安肯自伤残？”[(28)]如果不是朝廷的赋役逼得百姓活不下去，谁会狠下心来自残？如果不是百姓自残的现象已经很严重，李世民也不至于下这样的诏书。

贞观二十二年（公元648年），李世民准备第二次进攻高丽，征发剑南道百姓造船，百姓欲用钱来代替劳役，结果“州县督迫严急，民至卖田宅、鬻子女不能供，谷价踊贵，剑外骚然”[(29)]。卖房子、卖田产、卖儿女，也没法缴足朝廷规定的役钱，只有外逃一途。百姓外逃，土地无人耕种，粮价随之暴涨，社会陷入动荡。同年，因不堪赋役，眉、邛、雅三州百姓起来造反。次年夏，李世民去世。

简言之，终贞观之世，百姓始终处于一种相当困顿的境遇之中。他们的困顿与李世民所信奉的“百姓无事则骄逸，劳役则易使”的理念直接相关。贞观十三年，魏徵在进谏时说：“陛下这些年来一直滥用民力，忘记了谦逊节俭的美德，而且还振振有词，说什么不给百姓找事干他们就会骄逸，多给百姓派劳役他们会更容易驱使。自古以来，从来没有因为老百姓安乐悠闲而导致亡国的事例。”[(30)]

其实，魏徵的谏言并不准确。在李世民之前，早已有商鞅与韩非子阐述过“百姓无事则骄逸，劳役则易使”的驭民之道。

商鞅的话是“民贫则力富，力富则淫，淫则有虱……故国富而民治，重强”[(31)]——百姓贫穷，就会有求富的上进心；富有之后，就会有更多的想法，追求更多的东西，然后国家有“虱”，就

不能强盛。所以，百姓富裕了，钱财没地方消耗，就该制定制度促使他们拿出粮食来换取爵位。他们重新陷入贫穷，就不会怠惰，将精力全用在耕作上，不会有过多的想法，追求过多的东西，“六虱”就不会产生。让国家富有，让百姓保持贫穷，可以让国家强上加强。

韩非子的话是“凡人之生也，财用足则隳于用力……君人者虽足民，不能足使为君天子，而桀未必为天子为足也，则虽足民，何可以为治也”[(32)]——人的本性是财富充裕后就想要别的东西，在生产上变得懒惰。君主再如何满足百姓的欲望，也不能让他们做皇帝，而且像桀那样的人做了君主也未必满足，所以，满足百姓的欲望，不是治国的正确路径。

二、心照不宣的纳谏游戏

史书上的“贞观之治”有两个重要标签：民生丰足与从谏如流。民生丰足的含金量已如前文所述，下面再说一说从谏如流的含金量。

贞观二年（公元628年），秋雨已至，暑热未去。宫中炎热潮湿，大臣们联名上奏李世民，请求陛下营建一座干燥、避暑的阁楼。李世民说：“朕有哮喘病，确实不适合长期住在潮湿的地方。不过若答应你们的请求，花费恐怕会很多。当年汉文帝珍惜十户中人之家的资产，而放弃修建露台。朕的德行不及汉文帝，如果花费比汉文帝还多，哪里有资格做百姓的父母？”[(33)]

贞观四年，李世民又对身边的侍臣说：“大造宫殿、池苑、台阁是帝王喜欢的，却是老百姓不喜欢的……朕贵为帝王，富有四海，凡事都取决于朕。但朕能够自我控制，只要百姓不喜欢，朕一定会顺从他们的意愿。”[(34)]魏徵在边上接话，称赞陛下英明：

“陛下本怜百姓，每节己以顺人。臣闻：‘以欲从人者昌，以人乐己者亡。’隋炀帝志在无厌，惟好奢侈，所司每有供奉营造，小不称意，则有峻罚严刑。上之所好，下必有甚，竞为无限，遂至灭亡。”[35]魏徵说：陛下能够怜爱百姓，克制自己的欲望让百姓过得更好，而隋炀帝就是个惨痛的教训。

但李世民并不是一个能够自我控制的人。同样是在贞观四年，与说出上面那番自夸的话大略同期，他也曾下诏大兴土木，营建东都洛阳的皇宫。大臣张玄素对此极为不满，上奏说：“陛下以前去东都，把那些华丽的建筑拆了，以示节俭，天下人交口称颂。如今又去重建，这算什么？陛下天天说巡幸不是什么要紧事，只会浪费钱财。如今国库空虚，陛下又要营建宫殿，这又算什么？当日太上皇要烧毁东都多余的宫殿，陛下觉得如果不烧，拆下来的瓦木还有用，可以赐给贫民。虽然太上皇没有采纳，但天下人都称赞陛下仁德。事情才过去五六年，陛下却又要大兴土木，这又算什么？”[36]

张玄素的挤对没留余地，李世民很尴尬，只好回头对房玄龄“解释”说：“洛阳土中，朝贡道均，朕故修营，意在便于百姓。今玄素上表，实亦可依，后必事理须行，露坐亦复何苦？”这句话的意思是：朕营建东都的本意是因为洛阳处在国家的中央，可以方便各地州府前来朝贡。玄素既然这么说了，日后朕去洛阳，就算露天而坐，也不会觉得苦。房玄龄当然知道“方便朝贡”是个蹩脚的借口，但皇帝自己给自己找了个台阶下，他也只好附和一句“陛下圣明”。[37]

士大夫希望君王寡私欲而好仁德。李世民善于纳谏、勇于改过的事迹史不绝书，其“镜鉴论”与“水舟关系论”深入人心，看起来也很符合寡私欲以弃巧利的圣君标准。不过，如何说是一回事，如何做又是另一回事。就在魏徵激赏张玄素阻止李世民营建洛阳的

皇宫，有“回天之力”的不久之后，贞观五年，刚刚建完仁寿宫的李世民突然再次将营建洛阳宫提上了日程。民部尚书戴胄 再三劝谏，李世民称赞了戴胄 的直言，并提升了他的官爵，也没忘了兴建洛阳宫，且极为奢华，“凿池筑山，雕饰华靡”。[38]

徘徊在物质欲望与仁德表演之间，李世民深受煎熬。出于私欲，他一心想要修筑洛阳宫；为了那众人称颂的仁德，他又屡次接受大臣们的劝谏，放弃修筑。当屈从物欲而不顾一切把华丽的洛阳宫修筑起来之后，他似乎又受不了满朝士大夫的议论。最终，洛阳宫问题变成了一场闹剧。李世民痛骂了负责工程的官员，将其免职，然后狠心把刚刚落成的宫殿拆了。

这样的煎熬长期伴随着李世民。贞观六年正月，他准备从皇宫搬往新落成的九成宫居住。九成宫距离京城三百多里，著作郎姚思廉觉得皇帝跑去那里，处理政务会不方便，于是极力劝阻，但李世民坚持要去，理由是自己患有“气疾”——李世民似乎忘了，贞观二年有大臣提议给他修一座避暑阁楼时，他的表演式回应是为了不加重天下百姓的负担，自己可以忍受气疾。当然，若真是气疾严重，倒也可以理解。只不过，李世民决定搬去九成宫是在正月，与需要避暑的气疾并无关系。他之所以想去九成宫，是因为新落成宫殿的居住条件远好于现在的寝宫。姚思廉的劝阻让李世民暂时留在了京城。三月份，长安春暖花开，李世民还是去了九成宫，一直在那里待到十月份，冬天将至，实在无暑可避，才回到长安。[39]

在贞观年间漫长的“进谏—纳谏”游戏之中，李世民与他的臣僚变得越来越形式主义。大臣频繁进谏，极力想要压抑李世民的私欲，将他纳入“内圣外王”的轨道。李世民则几乎逢谏必纳，对进谏者几乎无不大加赏赐，行动上却又几乎没有什么改观。奖赏了谏臣后，他想去游猎，仍然会去，他想修筑新的别宫，也仍然会修。

即便是形式主义的游戏，玩久了难免会有失控的时候。贞观八年（公元634年），中牟丞皇甫德参进谏说：“陛下往日修筑洛阳宫，耗费民力；收取地租，过分征敛；民间女子都喜欢梳高髻，也是跟宫里学的。”李世民听了大怒，对着房玄龄发飙：“这个皇甫德参是不是国家不征用一个劳动力，一斗地租都不收，朕的宫女都剃光头，他才满意？”[(40)]李世民还曾对长孙皇后说，要找机会杀了魏徵这个“田舍汉”。也是在贞观八年，魏徵敏感地察觉出了李世民心理上的微妙变化，他直言不讳道：“陛下如今不再喜欢直言了。虽然还勉强接受，却早已没有了往日的豁达。”[(41)]贞观十年（公元636年），魏徵开始以“目疾”为借口，屡屡“求为散官”。[(42)]

追溯起来，唐太宗君臣形式主义的“进谏—纳谏”游戏实始于玄武门事变之后。彼时的李世民急于打造自己帝位的合法性，遂与怀有“内圣外王”理想的士大夫们一拍即合，开启了一场从谏如流的表演秀。李世民不断纳谏，不断奖赏进谏者，但对执行进谏的内容一直兴趣索然。随着在位时间越来越长，帝位的合法性越来越不是问题，李世民也渐渐不想再玩这种游戏。贞观十一年，先是魏徵对李世民说：“陛下欲善之志不及于昔时，闻过必改少亏于曩日。”[(43)]陛下知错就改的精神已远不如往日。然后又有李世民对魏徵发牢骚：“上封事者皆言朕游猎太频；今天下无事，武备不可忘，朕时与左右猎于后苑，无一事烦民，夫亦何伤！”李世民抱怨：进谏的人都指责我游猎过于频繁，但我以为如今天下虽然无事，武备还是不能松弛，我时而与侍臣在后苑狩猎，没有劳民伤财，有什么错呢？魏徵无奈回答：“陛下既使之上封事，止得恣其陈述。苟其言可取，固有益于国；若其无取，亦无所损。”魏徵的意思是：陛下既然鼓励进谏，应该让人畅所欲言。说得对，陛下采纳，对国家有好处；说得不对，陛下不理会，也没什么损失。李世民闻言大悦。[(44)]

魏徵的回答流露出了强烈的悲观情绪。李世民的牢骚清晰地传达出一种不想将形式主义的“进谏—纳谏”游戏进行下去的情绪。这种情绪也体现在同年发生的另一件事上。贞观十一年十月，御史柳范弹劾吴王李恪（李世民第三子）频繁外出游猎，严重扰民。处罚了李恪后，李世民发怒道：“长史权万纪事吾儿，不能匡正，罪当死。”他说：长史权万纪辅佐我儿，却不能有所匡正，论罪当死。柳范梗着脖子回答：“房玄龄事陛下，犹不能止畋猎，岂得独罪万纪！”他说：房玄龄辅佐陛下，也未能阻止陛下四处游猎，该死的不光权万纪一人！李世民拂衣而去。[45]这一年，朝臣屡次劝谏李世民节制游猎，李世民则屡次借游猎之事向朝臣发难。

李世民想要放纵自己的欲望，同时很在乎自己的历史形象。为兼顾二者，他选择一再违制向史官索求与自己相关的历史记录。贞观九年（公元635年），他要求阅读国史，被谏议大夫朱子奢驳了回去。[46]贞观十三年，他又询问褚遂良自己起居注的具体内容，担心里面记载了自己的缺点。[47]最终，他如愿以偿从房玄龄手里看到了国史，也对国史如何纂修给出了自己的指导意见。

在位二十余年，李世民犹如一位演员，在台上对自己的一举一动都做了刻意的修饰。他不止一次通过与臣僚对话的方式，来为自己塑造生活简朴、爱惜民力的光辉形象。在那些令人感动的对话背后，九成宫、大明宫、飞山宫、襄城宫……正在破土动工。舆论指责九成宫修建得过于华丽，他下令将其摧毁；襄城宫同样被摧毁，原因却是建成之后不合李世民的心意。在那漫长的“进谏—纳谏”游戏里，李世民获得了从善如流的美誉。但接受谏言是一回事，执行谏言是另一回事。李世民在朝堂之上充分展示着自己虚怀若谷的帝王风度，史官将他对犯颜直谏者的宽容载入实录之中，而他很快就忘记了谏言的具体内容。

但贞观之治的士大夫仍然是幸运的，至少，李世民愿意陪他们玩这样的形式主义游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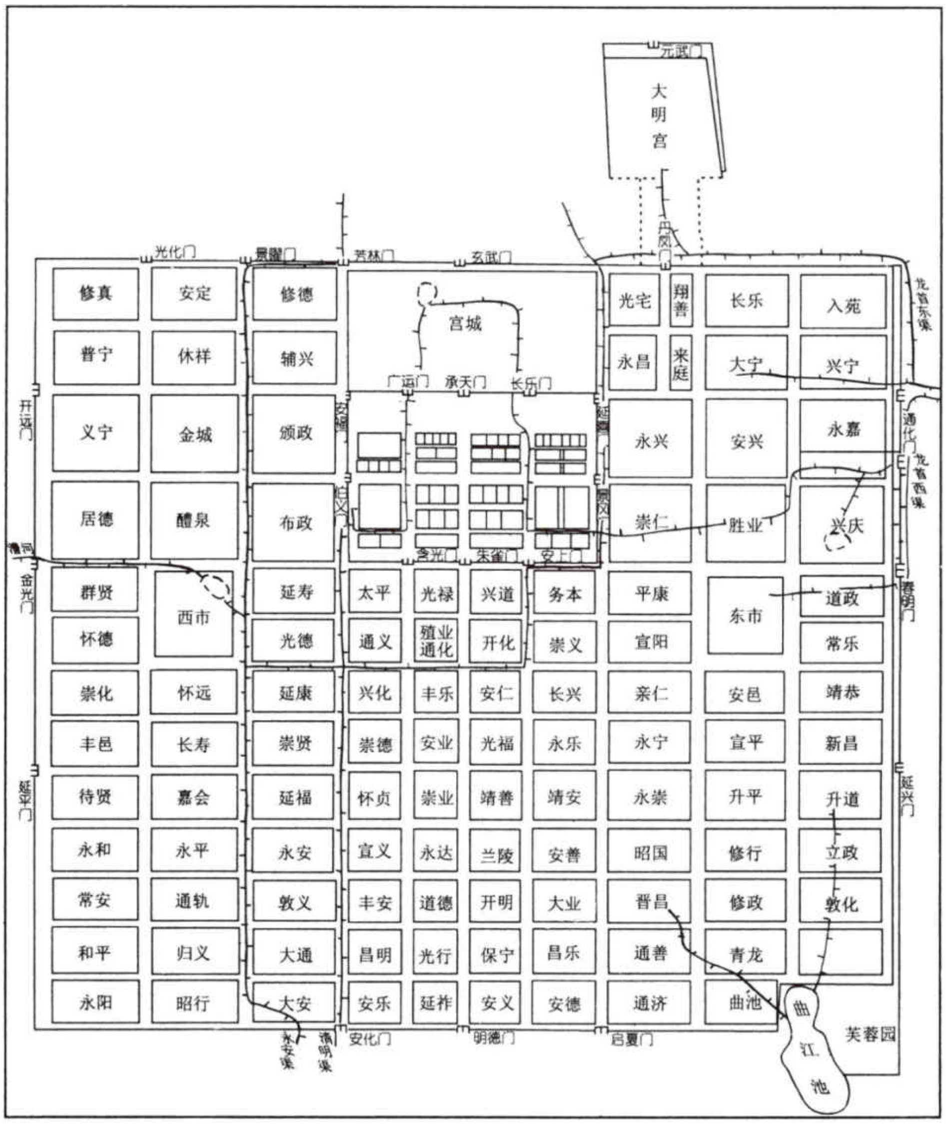
三、唐长安城的畸形繁华

自秦汉而下，中国古代的大城市有两个基本特点：1．不是经济发展的自然产物，而是由政治权力推动建筑，在布局与管理上完全遵从权力的意志。2．城中不存在独立的市民群体，也没有独立的经济结构。城中的农业、手工业、服务业、商业全部依赖城中贵族的消费而存在，是政治权力的附属品，从业者与行业俱受到政治权力的严格管控。

号称最能体现盛唐气象的长安城也不例外。长安共计108坊（唐高宗龙朔至唐玄宗开元间为110坊，唐玄宗开元之后为109坊）。其中西54坊由长安县管辖，东54坊由万年县管辖，两县统属京兆府。全城呈规整的棋盘式布局。

这是一种典型的权力化的布局，其设计思路的出发点是为权力服务，而非便利城内居民的日常生活。用日本学者妹尾达彦的话说就是："长安城的建筑原本就不是以居民生活为出发点的，而是根据6世纪末到7世纪初王都的理念，设计建成的一座宏伟的理想都市。"(48)

"宏伟的理想都市"追求的是凸显皇权的神圣性与保障皇室的安全。这种追求对普通市民而言往往意味着束缚、禁锢与不宜居。布局上，街道纵横笔直，坊区四四方方，全方位的整齐划一追求的是神圣性。管理上，实施里坊制度与夜禁制度，严格控制城内居民的人身自由，追求的是安全。



唐长安城布局示意图[(49)]

里坊制度源于秦汉时代的闾里制。所谓闾里制，简单说来，就是在城内用围墙圈出许多方块状的“闾”或“坊”。居民住在墙内的房子里，不许临街开门，不许临街起楼，只能从官府设置的坊门出入。坊门设置有“弹室”之类的机构，配备了“坊正”“里正”之类的管理人员，用来监控居民的进出。北宋定都开封后，里坊制才被抛弃——并不是赵宋王朝不喜欢里坊制，而是开封的自然环境不允许，取而代之的是《清明上河图》中那种较为开放的“街坊制”，城市居民不再被官府用高墙禁锢。及至清代，爱新觉罗氏入关后欠缺自信，用栅栏将北京城的居民住宅再次分割、封闭。据

《大清会典》记载，清初，北京内城有大小栅栏1100余道，外城有大小栅栏440余道，栅栏门晨启昏闭。直到清代中叶栅栏才渐渐消失，“大栅栏”的地名则流传至今。[(50)]

再说夜禁制度，简单说来就是，长安城的外郭城门、宫城城门、皇城城门与坊市之门会在入夜前定时关闭，形成三层封闭结构（长安城—宫/皇城—坊），以控制城内人员入夜后的活动半径（坊内之人只能在本坊内部活动）。

为将夜禁制度落到实处，唐朝皇帝想了很多办法。具体包括：1．若有人不守夜禁出坊，严厉追责坊正。2．设左、右街使（由左、右金吾卫中郎将担任），左、右巡使（由殿中侍御史担任）。3．左、右金吾卫上街夜巡，遇到犯夜禁之人可以毒打、砍杀、杖毙。4．于城门坊角设“武侯铺”，由武装兵士值班，巡查周边区域，兵士少则五人，多则百人。5．京兆府、长安县、万年县须参与夜禁的落实。[(51)]如此层层落实、级级追责，目的当然只有一个：调动尽可能多的资源来防范城中居民夜间行动，以满足皇权对安全的追求。

这种防范既针对底层百姓（使其散沙化，无力酿成群体性事件），也针对城内显贵。比如，唐肃宗时设有特务机构“察事厅子”，由宦官李辅国掌控，用以监督城中官僚、贵族，“官吏有小过，无不伺知”。武则天时代，为了控制李唐皇室，又将包括李隆基在内的诸多李唐皇室成员控制在兴庆坊内集中居住。晚唐皇权落入宦官之手，宦官又将这种做法继承了下来。有唐一代，长安城内先后出现过五王同坊、十王同坊、十六王同坊乃至“百孙院”。[(52)]

里坊制度与夜禁制度为上述监控与监管提供了极大的便利。但监控与监管也并非一成不变，其强度的大小取决于皇权的兴衰。皇

权兴，打压显贵游刃有余，监控的力度就强；皇权衰，不得不笼络权贵以维系统治，监控的力度就弱，对突破坊墙者也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甚至还出台过政策，允许皇室及三品以上官员临街开门。比如，安史之乱后，长安城的里坊就出现了许多穿墙破洞的现象——显贵们不愿绕道走官府铸造的坊门，更喜欢在自家临街的墙上破洞开门。唐代宗下诏命京兆尹李勉严查“侵街打墙、接檐造舍”[(53)]的现象，要求一律拆毁私开的门，并予以重罚，但并无太大成效。

后来，皇权落入宦官之手，长安城向街开门的现象更普遍了。唐文宗（计划诛杀宦官，却反遭宦官软禁的那位）时期，负责落实夜禁政策的左右巡使曾在报告中哀叹说，向街开门的太多，有皇帝特批可以开的，有未得特批自己就开了的，总之无法遏制，那些住户常常不等晨钟响就开门，暮鼓怎么敲也不关门，使得长安城的夜禁制度形同虚设。[(54)]

城市监控力度的衰弱确实增加了安全隐患。元和十年（公元815年）六月三日，晨钟敲过，天色未明，为了赶上早朝，家住靖安坊的宰相武元衡骑马走出了家门。他穿过靖安坊东门，进入大街时，突遭埋伏在侧的刺客围杀，被割去了头颅。同日，家住永乐坊的另一位高官裴度也遭遇了刺客袭击，他滚落到街旁水沟之中，头颈负伤，因毡帽厚实而侥幸捡回一条性命。事后查明，刺客来自地方藩镇（平卢节度使李师道）。因武元衡与裴度正协助皇帝加强中央集权，试图对藩镇用兵，故遭遇此劫。[(55)]

但另一方面，监控力度的衰弱也让城市有了更多的活力，城市的灵魂——商业有了很大发展。

唐长安城虽设有东、西二市，但因位置固定（所有交易只能在东、西二市进行），且营业时间短（中午开市，日落闭市），服务

对象始终非常有限。为了能够最大限度地享受到东、西二市带来的生活便利——市中不但可以买到各种商品，包括米、麦、肉类、酒类、蔬菜水果、衣物、纺织品、金银、宝石、药品、马匹、车辆等，还有酒宴、戏曲等娱乐项目，唐长安城的官僚、贵族在置办住宅时，首先考虑的是靠近位于城市东北部的大明宫和兴庆宫（那里是唐王朝的政治中心），其次就是靠近东市和西市——二市营业时间短，长安城又实行里坊制度和夜禁制度，住得离二市远了，既没有办法痛快地购物，也有可能因为购物耽搁时间太久而赶不及回坊，被巡夜的金吾卫抓住打个半死。[(56)]

为皇室的安全而施加的限制直接导致东市周边地区（该区域靠近大明宫和兴庆宫）成了长安城官僚、贵族府邸最为集中之处，也是唐长安城住宅价格最昂贵的地区。[(57)]事实上，不止官僚、贵族的府邸，整个长安城的住宅分布也基本处于“东贵西贱”“南虚北实”的状态。具体来说就是：以纵贯全城的朱雀大街为界，“公卿以下民（居）止多在朱雀街东”，街西则“浮寓流寄不可胜计”——官僚、贵族和有钱人集中住在街东，平民百姓和外来人口集中住在街西。而“自朱雀门南第六横街以南，率无居人第宅”——从皇城向南数，第六条横街以南的地方大多无人居住。“自兴善寺以南四坊，东西尽郭，虽时有居者，烟火不接，耕垦种植，阡陌相连”——最南边的四排坊，从东城墙到西城墙只偶尔有人居住，已被开垦为“阡陌相连”的农田。[(58)]

当皇权衰微，对城市的监控力度减弱时，长安城才渐渐有了烟火气，出现了宜居的一面。宜居的变化如下：

第一个变化是穿墙破洞与临街开门现象增多，前文已有叙述。

第二个变化是商业活动突破东、西二市的范围，扩展到了其他坊。崇仁坊里出现了造乐器的工匠作坊，平康坊里有人卖姜果，宣

阳坊里开设了彩缬铺，长兴坊里有毕罗店，宣平坊里可以买到油，升平坊里可以买到胡饼，延寿坊里出售各种金银珠宝……诸多的酒肆与旅店也出现在了东、西二市周边，“昼夜喧呼、灯火不绝”的夜市随之兴起。唐德宗时期，旅人可以在酒肆里喝到酩酊大醉，不必担心天黑后回不了旅店；韦庄也在诗里说“朝闻奏对入朝堂，暮见喧呼来酒市”，早上去朝廷上班，晚上去酒楼买醉。[(59)]这都是只有在皇权衰微、城市控制放松的中晚唐才有的快活。

遗憾的是，这些快活与长安城内的普通百姓关系不大。无论皇权如何衰微，唐代的长安终究是一座权力之城。金吾卫奈何不了达官显贵，对付底层百姓却绰绰有余。所以，草民照样不敢临街开门，照样暮鼓一响就得撒丫子往坊内跑，照样与城市的喧闹繁华无关。

与底层百姓有关的只有掠夺与汲取。

唐人诗词中常有“长安城中百万家”一类的句子，这当然是夸张之辞。开元、天宝年间的长安城，总人口约为70万，除去军队（约10万左右），簿籍所载宗室、宫人、宦官、外国人等（共计5万余人）、僧人和道士（约2万—3万人）以及脱漏人口（约10万人），长安城内由长安县与万年县管辖的普通百姓约有三四十万人。[(60)]这三四十万普通百姓在这座“无与伦比的国际化大都市”中并没有过上舒适的生活。除了负担所有唐帝国百姓都必须负担的常规的赋役、徭役外，他们还得不断承受来自皇权的“随兴掠夺”。

比如“金融榨取”，自唐帝国铸造“开元通宝”之后即已开始。为满足日益增长的财政开支，朝廷率先铸造减重的铜钱敛财，民间随之跟风盗铸。唐高宗时期，“恶钱”（含铜量不足之钱）即已充斥长安城。恶钱是一种官方称呼，它流行的根源其实是唐帝国

官方不愿为市场提供足量的合格铜钱——铸造合格的铜钱成本很高（主要是缺铜），没有多少收益，多数时候还会亏损，但官府又不愿将铸币权下放民间。铜钱不足导致通货紧缩、钱贵物轻，民间只好流通私铸的恶钱。[(61)]

对朝廷而言，铸造“好钱”会亏损，收缴“恶钱”却有利可图。

显庆五年（公元660年）唐高宗下令“以五恶钱酬一好钱”，命百姓用五个恶钱向政府换一个好钱，在长安率先实行。结果百姓不愿换，“私自藏之，以候官禁之弛”，等着朝廷取消不许恶钱流通的禁令。唐高宗无奈，改为“以好钱一文买恶钱两文”，两个恶钱换一个好钱，百姓仍然不愿。百姓又不傻，换了就等于将自己的部分财富无偿让给了皇帝。于是，六年之后，唐高宗采取了另一种敛财之法：铸造一种名为“乾封泉宝”的大钱，官定新钱一文等于旧钱十文（一文新钱的含铜量远低于十文旧钱），且给出期限，一年之后将废除旧钱，禁止旧钱流通，实际上仍是逼迫百姓拿旧钱来换新钱，将部分财富转移给朝廷。作为率先执行换钱政策的地方，长安百姓深受其害，史称“京城纷然，卖买殆绝”。[(62)]

类似的手段，唐肃宗也用过。

乾元元年（公元758年），唐肃宗采纳铸钱使第五琦的建议，铸造发行了“乾元重宝”，与开元通宝的兑换比例是1∶10——乾元重宝每缗重十斤，开元通宝每缗重六斤四两，朝廷以一个“十斤”强行兑换民间的十个“六斤四两”，这显然是赤裸裸的抢劫。稍后，第五琦变本加厉，又主持铸造了“重轮乾元钱”（每缗重十二斤），与开元通宝的兑换比例是1∶50。这场敛财运动制造了巨大的民生灾难。史载：“法既屡易，物价腾跃，米斗钱至七千，饿死者满道……京师人人私铸……郑叔清为京兆尹，数月榜死者八百

余人。”[(63)]刚刚重归李唐的长安百姓成了这场敛财运动最直接的受害者。为了止损，为了活下去，他们选择冒死私铸乾元重宝与重轮乾元钱。自然，这是皇权不能容许的，仅仅一个月，长安城内就处死了800余名盗铸者。

而相比遮遮掩掩，收效迟缓的“金融榨取”，皇权有时候更喜欢直接暴力掠夺。

唐德宗时期，长安城的百姓有过这样的遭遇。当时，为了支持与藩镇之间的战争，唐德宗采纳韦都宾、陈京的建议，决定搜刮天下富商，尤其是长安商人。史载：“判度支杜佑大索长安中商贾所有货，意其不实，辄加搒捶。帛粟麦者，皆借四分之一，封其柜窖。百姓为之罢市，相帅遮宰相马自诉，以千万数。卢杞始慰谕之，势不可遏，乃疾驱自他道归。计并借商所得，才二百万缗，人已竭矣。”[(64)]杜佑具体负责搜刮长安城中百姓，他的做法是搜查长安所有商人的财货，动辄以申报不实为由对他们进行鞭笞、棒打。如此搜刮之下，所得也不过8亿文。朝廷又决定对其他行业动手，结果导致整个长安城的百姓罢市，集体跑去拦宰相的马诉苦。宰相卢杞开始还开导他们，实在挡不住群情激奋的百姓，从别的道跑了。最后总计搜刮到了20亿文。

以上种种，只是长安底层居民命运无常的几个典型案例。在当时，长安确实可以称为国际化的大都市，城池规模大，城内人口多，官僚、贵族的宅邸占地广阔，而且相当雄伟，城内还有许多外国人带着外国的货物来来往往。但长安的繁华终究只是权力的繁华，不是民生的繁华。

四、“怀柔远人”的两笔账

贞观四年，唐王朝平定了东突厥。投降的突厥首领被唐太宗李世民封为将军、中郎将等，集体安排到朝中做官，五品以上的多达百余人。同时，大约15万突厥人南下归附，成为大唐百姓，其中“入居长安者数千家”[(65)]。

李世民很高兴，下令赏给他们钱粮布匹和土地。有些部落没有前来归附，李世民觉得美中不足，一而再再而三地派出使臣带着各种优惠政策前去招抚。

开国功臣、担任过凉州大都督的李大亮对皇帝的做法很不认同。他上书李世民：“臣听说，想要安抚远邦，必须要先让身边的人获得安定。中原的百姓是天下的根本，四夷之人只是枝叶。损害根本，却对枝叶倍加爱护，以求取天下安定，是不可能的。自古以来，贤明的帝王都是对自己的百姓讲信义，对外族使用权术。《春秋》上说：‘戎狄等外族犹如豺狼，不能满足他们贪得无厌的欲望；中原各族是自家人，不可以抛弃。’陛下现在的做法，臣看不出有什么好处。依臣的愚见，应该停止招抚不愿归附的部落。他们即使愿意归附，陛下也不应该接纳。周王朝爱护自己的百姓，排斥外面的夷狄，所以能传国700多年；秦王朝动不动就想把胡人纳入版图，常年发动百姓去征伐胡人，所以40年就亡国了。汉文帝只养兵防守，天下安定，百姓富足；汉武帝一心征伐夷狄，结果耗尽国库，民生凋敝，后悔莫及。”

李大亮的话字字句句都是在责备李世民优待归附与未归附的突厥人，胜过了爱惜大唐的百姓。李大亮还说，皇帝给归附的突厥人发放物资是在浪费大唐百姓的财富：“突厥人集体归附大唐，但我们没办法把他们迁徙到江淮，没办法改变他们的风俗，只能把他们安置在距离京城不远的地方。这不是长久之计。每一个突厥人来归，陛下都赏赐布帛五匹和一件袍子；部落头领来归附，一律授予

高官。突厥人俸禄多，地位高，很费钱。拿我大唐百姓上交的钱粮、布帛来供养他们，对我大唐实在是没有任何好处。”[(66)]

李大亮讲的道理是对孔子“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的继承，李世民其实也全明白。早在贞观三年，他就对靺鞨的使者说过：“昔人谓御戎无上策，朕今治安中国，而四夷自服，岂非上策乎！”[(67)]意思是，朕把自己的国家治理得繁荣、安定，周边的夷狄心生羡慕，自然而然就奔着我们来了，这才是驾驭戎狄的上策。李世民的话与贞观四年李大亮奏折里的“九州殷盛，四夷自服”的含义完全相同。

但明白道理是一回事，是否愿意按照道理去做又是另一回事。“治安中国”，实现“九州殷盛”，需要付出许多心力，需要复杂的制度建设，不是一朝一夕可以完成的。就效率而言，李世民更喜欢玩倒推游戏，先用武力威慑与物质诱惑让“四夷自服”，然后再反推出“治安中国”，已经完成了“九州殷盛”的丰功伟业。贞观四年的李世民正策划着要加冕为“天可汗”，不会因为李大亮的进谏就终止给新归附的突厥人赏赐官职、土地、钱粮、布匹，尽管李世民嘉奖了李大亮，且“纳其奏”。

也是在贞观四年，李世民还对长孙无忌说过这样一番话：“贞观之初，有人上书对我说，应该出动大军去征伐周边的夷狄。只有魏徵劝我偃武修文，说中国既安，四夷自服，我们把自己的国家治理得欣欣向荣，周边的夷狄就会向我们靠拢。朕采纳了魏徵的话，如今擒获了颉利可汗，魏徵的话应验了。”[(68)]李世民也是在用四夷自服的结果来反推自己已经通过偃武修文实现了九州殷盛、四夷自服，从而突厥人自愿成为归化人，成为唐帝国的百姓。

有唐一代，李大亮不希望拿唐朝百姓的税赋去供养外国移民和归化人的愿望，从来没有实现过。唐玄宗开元二十五年（公元737

年），对外国人移居大唐颁布过一份专门规定：“化外人归朝者，所在州镇给衣食，具状送省奏闻。化外人于宽乡附贯安置。”[(69)]地方官府要给他们提供吃穿，要将他们的情形报告给朝廷，要将他们安置在比较好的地方。大约在同期，还出台了另一项赋税上的优惠政策：“外蕃之人投化者，复十年。”[(70)]前来大唐，且接受归化的外国人可以享受免除十年赋税的特权。十年后，再与华夏百姓承担相同的赋役。

在以上优惠政策的刺激下，一批又一批的化外人通过各种渠道进入唐王朝境内。

长安常年居住着约四五千户归化人。扬州、楚州、泗州、海州、密州、登州、青州全部设有新罗坊或新罗馆，也就是说新罗人在今天的江苏、山东沿海形成了相当规模的聚居区[(71)]。敦煌、肃州、甘州、西州、伊州、凉州有来自中亚的粟特等国的“昭武九姓”（中国南北朝、隋、唐时期对来到中原的粟特人及其后裔泛称“昭武九姓”，共来自十多个小国，其王均以昭武为姓），他们是唐王朝境内实力最大的归化人，在唐玄宗时期他们参与过两次武装起事：一次是开元九年（公元721年）的“康待宾之乱”（康国的粟特人康待宾率部起兵反唐），参与者多达7万余人；另一次是著名的安史之乱，这场规模空前的叛乱得到了胡商的经济支持，也得到了昭武九姓胡人的支持。[(72)]广州、扬州则是波斯人和大食人的主要聚居地。唐肃宗乾元三年（公元760年），扬州刺史叛唐，淮南节度使攻陷扬州，数千名波斯人被杀。[(73)]唐僖宗乾符六年（公元879年），黄巢攻陷广州，大杀外国人，据说有多达12万人遇难。[(74)]外国移民中既有富商大贾，也有普通小民；既有印度归化人罗好心那样做到神策军正将的上层人，也有常见于唐人诗歌、传奇的昆仑奴一类的底层人。

在夷狄问题上，唐王朝大多数时候算的是政治账。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是“人傻钱多”的冤大头，基于现实需要，他们偶尔也会算一算经济账。

贞观二年（公元628年），李世民下令，“诸蕃使人所娶得汉妇女为妾者，并不得将还蕃”[(75)]。外国人跑到大唐来，娶唐的女子为妾是可以的，但不允许将其带出大唐。显然，经历了隋末大乱的人口锐减，李世民很在意保护唐王朝的生殖力，不许唐朝妇女随外国人离开，实际上就是要把唐朝妇女作为一种“生殖资源”留在大唐。唐高宗再度重申了这条禁令：“如是蕃人入朝听住之者，得娶妻妾，若将还蕃内，以违敕科之。”[(76)]外国人来唐王朝居住，可以在唐王朝娶妻妾，但不许把妻妾带走，否则将以违反皇帝的敕令论处。

到了唐代宗时期，因为安史之乱的缘故，唐朝妇女再度成为唐王朝的“稀缺资源”。史载，因借回纥兵平安史之乱的缘故，“回纥留京师者常千人，商胡伪服而杂居者又倍之，县官日给饔饩，殖资产，开第舍，市肆美利皆归之，日纵暴横，吏不敢问。或衣华服，诱取妻妾”[(77)]——长安城中常年驻留着上千回纥人，还有人数是回纥人数倍的胡商，他们穿着唐朝人的服装杂居在唐朝人中间。朝廷款待他们，准他们置办资产与房舍，市场上的利润都归了他们，可他们一日比一日蛮横，官吏也不敢过问。有些人还故意穿上“华服”（应该是指有钱、有身份的唐朝人穿的服装），来引诱唐朝妇女做他们的妻妾（“诱取”二字显示，不许汉妇随外国人离开唐朝的政策确实对外国人在唐朝娶妻妾造成了不小的影响）。为保护汉妇不被骗走，大历十四年（公元779年），唐代宗下诏“回纥诸胡在京师者，各服其服，无得效华人与汉相参”[(78)]，要求住在京城的回纥人和其他外国人必须穿自己本国的服装，不许与唐朝人一般装束。

对胡人在大唐挣到的巨额财富，唐王朝有时候也会很眼红。

按唐代律法，“海商死者，官籍其资，满三月无妻子诣府，则没入”[(79)]，来自海外的商人死了，三个月没有妻儿来衙门认领遗产，遗产就归官府所有。孔戣做岭南节度使的时候觉察出了三个月期限的微妙：“海道岁一往复。”波斯客商的死讯传回本国，本国的亲属再坐船来到唐王朝，往往要一年的时间，三个月的期限无异于直接没收海外客商的资产。于是在他的任期内，无视三个月的期限，随便什么时候，只要是海外客商的亲属来认领遗产，都同意交还。这个故事出自韩愈给孔戣写的墓志铭。孔戣的做法被韩愈拿出来赞叹，显示它并非主流，以三月为限没收海外客商遗产才是普遍的做法。历史学家吕思勉评价唐律规定的三个月的期限，说它的实质是“故立苛例以规利”[(80)]，故意制定苛刻的法律来谋利。

唐文宗大和八年（公元834年），朝廷又出台了一项政策：“死波斯及诸蕃人资财货物等，伏请依诸商客例，如有父母、嫡妻、男儿、亲女、亲兄弟元相随，并请给还。如无上件至亲，所有钱物等并请官收，更不牒本贯追勘亲族。”[(81)]

这是一项非常意味深长的政策，政策的微妙之处在于“元相随”三个字。大意是：波斯人和其他外国人死在了唐王朝，留下了资产、货物，如果他有“元相随”的父母、嫡妻、儿子、女儿与亲兄弟，可以继承他的财产，如果没有，那财产就归官府所有了，且不发公文去他的本国寻找亲属。所谓“元相随”指的是客商来唐王朝时随行的父母、妻子、儿女、亲兄弟，而非在唐朝娶的妻妾、生的儿女。这项政策让许多海外客商辛辛苦苦一辈子，只是在给唐王朝积攒财富。

《太平广记》中有两则波斯商人托付遗产的故事，颇能反映时代的变化。

第一则故事的主角是活跃于唐玄宗时代的李勉。故事中说，李勉遇到一个重病的波斯商人，因感念其照顾，商人临死前将一颗“当百万”的宝珠赠给李勉。李勉将宝珠藏在胡商口中一并埋葬。后来，李勉在扬州遇到胡商之子，带了他去胡商之墓中取走了宝珠。(82)

第二则故事的主角是李勉的儿子李约。故事中说，李约在江上遇到一位重病的胡商，胡商将自己的两个女儿托付给李约，还送了他一颗宝珠。胡商死后，“财宝约数万，悉籍其数送官，而以二女求配”。埋葬胡商时，李约把宝珠塞在了他口中。后来，胡商有亲属前来要求继承财产，打开坟墓，看到了宝珠。(83)

都是胡商，都是在江边相遇，都是相赠宝珠，都是放在尸体口中，都是掘墓得宝，元素如此雷同，两则故事显然出自同一个蓝本。但前者的故事发生在唐玄宗时代，“元相随”条款尚未形成，故事中也就没有将波斯商人的财产送官的情节；后者的故事大概发生在唐文宗时代，所以李约做出了“财宝约数万，悉籍其数送官”的举动——胡商身边的两个女儿不符合“元相随”的继承条件，李约只好将胡商的财产造册送官，后来，符合“元相随”条件的亲属来到，放在官府的胡商的财富连带墓中的宝珠才能被拿走。这是同一则故事在不同的时代流传，为了显得真实而糅进时代元素的典型案例。

也是在唐文宗时代，发生了显贵子弟向胡商借钱没有偿还、被胡商起诉的事件。唐文宗将政治账与经济账一起算。政治上，他觉得太丢大唐脸面，贬了欠债者的官职，又在大和五年（公元831年）下了一道诏书，要有关部门好好“抚安”被欠债的胡商，“免令受屈”，别让他们要不回钱，受了委屈。经济上，朝廷出台了新规定，“自今已后，应诸色人，宜除准敕互市外，并不得辄与蕃客钱物交关”，从今以后，不许唐朝百姓再向胡商借钱。政策看似是

在保护胡商的利益，实际上是限制胡商经营放贷业务，是在试图阻止唐王朝的财富外流。文宗开成元年（公元836年），朝廷再次重申了这项政策，禁止唐朝百姓拿自己的产业、奴婢做抵押，去向胡商借钱。[(84)]

但是朝廷的政治账与经济账，无论怎么算，对唐朝的普通百姓来说，都不会有什么好处。

---

(1) 杨际平：《隋唐均田、租庸调制下的逃户问题》，《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86年第4期。

(2) 葛剑雄：《中国人口史》第一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316页。

(3) 司马彪：《续汉书·郡国志一》刘昭引《帝王世纪》，见葛剑雄：《中国人口史》第一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402页。

(4) 《晋书·地理志上》，见葛剑雄：《中国人口史》第一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452页。

(5) 《旧唐书·地理志一》，见冻国栋：《中国人口史》第二卷，复旦大学2002年版，第96页。

(6) 葛剑雄：《中国人口史》第一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304页。

(7) 班固：《汉书·地理志下》，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1640页。

(8) 《晋书·地理志上》，见葛剑雄：《中国人口史》第一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402页。

(9) 《隋书·地理志上》，见冻国栋：《中国人口史》第二卷，复旦大学2002年版，第54页。

(10) 班固：《汉书·食货志上》，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1128页。

(11) 班固：《汉书·景帝纪》，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151页。

(12) 晏金铭：《唐贞观年间“课户”赋役负担考释》，《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1982年第3期。

(13) 王士立：《对贞观年间农民生活状况的初步探讨》，《河北师范大学学报》1983年第1期。

(14) 韩国磐：《唐天宝时农民生活之一瞥——敦煌吐鲁番资料阅读札记之一》，《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63年第4期。

(15) 孙翊刚主编：《中国赋税史》，中国税务出版社2003年版，第175页。

(16) 吴章铨：《唐代农民问题研究》，台湾商务印书馆1963年版，第12页。

(17) 王钦若等编：《册府元龟》，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1256页。

(18) 刘昫等：《旧唐书·戴胄 传》，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2534页。

(19) 刘昫等：《旧唐书·魏徵传》，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2560页。

(20) 吴兢：《贞观政要·畋猎》，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版，第285页。

(21) 吴兢：《贞观政要·奢纵》，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版，第207—208页。

(22) 吴兢：《贞观政要·安边》，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版，第278页。

(23) 吴兢：《贞观政要·慎终》，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版，第300页。

(24) 邓云特：《中国救荒史》，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8年版，第12页。

(25) 司马光：《资治通鉴》卷一百九十六，中华书局1956年版，第6173页。

(26) 吴兢：《贞观政要·求谏》，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版，第52页。

(27) 司马光：《资治通鉴》卷一百九十六，中华书局1956年版，第6176页。

(28) 吕思勉：《隋唐五代史》下册，中国友谊出版公司2009年版，第831页。

(29) 司马光：《资治通鉴》卷一百九十九，中华书局1956年版，第6262页。

(30) 《资治通鉴》卷一百九十五载：“魏徵上疏，以为：‘陛下志业，比贞观之初，渐不克终者凡十条。’其间一条，以为：‘顷年以来，轻用民力。乃云：“百姓无事则骄逸，劳役则易使。”自古未有因百姓逸而败、劳而安者也。此恐非兴邦之至言。’”中华书局1956年版，第6147页。

(31) 商鞅：《商君书·弱民》，上海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第66页。

(32) 韩非：《韩非子·六反》，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版，第510—511页。

(33) 《贞观政要·俭约》载唐太宗李世民之言：“朕有气疾，岂宜下湿？若遂来请，靡费良多。昔汉文将起露台，而惜十家之产，朕德不逮于汉帝，而所费过之，岂为人父母之道也？”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版，第186页。

(34) 《贞观政要·俭约》载唐太宗李世民之言：“崇饰宫宇，游赏池台，帝王之所欲，百姓之所不欲。帝王所欲者放逸，百姓所不欲者劳弊……朕尊为帝王，富有四海，每事由己，诚能自节，若百姓不欲，必能顺其情也。”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版，第186页。

(35) 吴兢：《贞观政要·俭约》，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版，第186页。

(36) 《旧唐书·张玄素传》，载张玄素之言：“陛下初平东都之始，层楼广殿，皆令撤毁，天下翕然，同心欣仰。岂有初则恶其侈靡，今乃袭其雕丽……每承音旨，未即巡幸，此则事不急之务，成虚费之劳。国无兼年之积，何用两都之好，劳役过度，怨讟将起……太上皇敕大殿高门并宜焚毁，陛下以瓦木可用，不宜焚灼，请赐与贫人。事虽不行，然天下翕然讴歌至德。今若遵旧制，即是隋役复兴。五六年间，趋舍顿异，何以昭示子孙，光敷四海？”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2639—2641页。

(37) 刘昫等：《旧唐书·张玄素传》，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2641页。

(38) 司马光：《资治通鉴》卷一百九十三，中华书局1956年版，第6088页。

(39) 《旧唐书·姚思廉传》载李世民游幸九成宫一事：“太宗将幸九成宫，思廉谏曰：‘离宫游幸，秦皇、汉武之事，固非尧、舜、禹、汤

之所为也。’言甚切至。太宗谕曰：‘朕有气疾，热便顿剧，固非情好游赏也。’因赐帛 五十匹。”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2593页。

(40) 《资治通鉴》卷一百九十四载皇甫德参之言：“修洛阳宫，劳人；收地租，厚敛；俗好高髻，盖宫中所化。”亦载李世民之言：“德参欲国家不役一人，不收斗租，宫人皆无发，乃可其意邪！”中华书局1956年版，第6109页。

(41) 《资治通鉴》卷一百九十四载魏徵之言：“陛下近日不好直言，虽勉强含容，非曩时之豁如。”中华书局1956年版，第6109页。

(42) 司马光：《资治通鉴》卷一百九十四，中华书局1956年版，第6119页。

(43) 司马光：《资治通鉴》卷一百九十五，中华书局1956年版，第6129页。

(44) 司马光：《资治通鉴》卷一百九十五，中华书局1956年版，第6131—6132页。

(45) 司马光：《资治通鉴》卷一百九十五，中华书局1956年版，第6134页。

(46) 司马光：《资治通鉴》卷一百九十七，中华书局1956年版，第6203页。

(47) 司马光：《资治通鉴》卷一百九十六，中华书局1956年版，第6175页。

(48) [日]妹尾达彦：《唐都长安城的人口数与城内人口分布》，见《中国古都研究》（十二），山西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

(49) 徐松撰，李健超增订：《增订唐两京城坊考》，三秦出版社2006年版，第17页。

(50) 孙大章：《中国古代建筑史话》，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1987年版，第65—74页。孙慧羽：《清代皇家档案里的北京栅栏》，《北京档案》2019年第7期。

(51) 刘浩：《唐长安城夜禁制度施行的时空背景及内容研究》，《人文杂志》2017年第4期。

(52) 孙英刚：《隋唐长安的王府与王宅》，见荣新江主编：《唐研究》第九卷，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185—214页。

(53) 王溥：《唐会要》卷八十六《街巷》。宫崎市定：《汉代的里制与唐代的坊制》，见《宫崎市定亚洲史论考》中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17年版，第635页。

(54) 王溥：《唐会要》卷八十六《街巷》。宫崎市定：《汉代的里制与唐代的坊制》，见《宫崎市定亚洲史论考》中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17年版，第633页。

(55) 刘昫等：《旧唐书·武元衡传》，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4161页。

(56) 唐长安城官僚权贵的住宅分布，参见王才强《唐长安的数码重建》中的“皇室贵族府邸示意图”，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6年版。

(57) 杨清越、龙芳芳：《长安物贵居大不易——唐代长安城住宅形式及住宅价格研究》，见樊英峰主编：《乾陵文化研究》（六），三秦出版社2011年版，第221—238页。

(58) 张永帅：《唐长安住宅的分布》，《史林》2009年第2期。

(59) 李瑞：《唐宋都城空间形态研究》，西安地图出版社2006年版，第154页。

(60) ［日］妹尾达彦：《唐都长安城的人口数与城内人口分布》，见《中国古都研究》（十二），山西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另可参考王社教、龚胜生、郑显文等人的研究结论。

(61) 钟兴龙：《唐代“铜贵”问题》，《古籍整理研究学刊》2013年第6期。

(62) 刘昫等：《旧唐书·食货志上》，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2095页。

(63) 欧阳修等：《新唐书·食货志四》，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1387页。

(64) 司马光：《资治通鉴》卷二百二十七，中华书局1956年版，第7325—7326页。

(65) 刘昫等：《旧唐书·忽厥传上》，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5163页。

(66) 《旧唐书·李大亮传》载李大亮之言：“臣闻欲绥远者，必先安近。中国百姓，天下本根；四夷之人，犹于枝叶。扰于根本，以厚枝附，而求久安，未之有也。自古明王，化中国以信，驭夷狄以权。故《春秋》云：‘戎狄豺狼，不可厌也；诸夏亲昵，不可弃也。’自陛下君临区

宇，深根固本，人逸兵强，九州殷盛，四夷自服。今者招致突厥，虽入提封，臣愚稍觉劳费，未悟其有益也……以臣愚惑，请停招慰。且谓之荒服者，故臣而不内。是以周室爱人攘狄，竟延七百之龄；秦王轻战事胡，四十载而遂绝。汉文养兵静守，天下安丰；孝武扬威远略，海内虚耗。虽悔轮台，追已不及……近日突厥倾国入朝，既不能俘之江淮，以变其俗；置于内地，去京不远，虽则宽仁之义，亦非久安之计也。每见一人初降，赐物五匹、袍一领，酋帅悉授大官，禄厚位尊，理多縻费。以中国之币帛，供积恶之凶虏，其众益多，非中国之利也。”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2388页。

(67) 司马光：《资治通鉴》卷一百三十九，中华书局1958年版，第6067页。

(68) 《资治通鉴》卷一百三十九载李世民之言：“贞观之初，上书者……又云：‘宜震耀威武，征讨四夷。’唯魏徵劝朕‘偃武修文，中国既安，四夷自服’。朕用其言。今颉利成擒，其酋长并带刀宿卫，部落皆袭衣冠，徵之力也。”中华书局1958年版，第6085页。

(69) ［日］仁井田升辑：《唐令拾遗·户令第九》“没落外蕃人、化外人附贯安置”条，长春出版社1989年版，第146页。

(70) 杜佑：《通典》卷六，中华书局1988年版，第109页。

(71) ［韩］金文经：《唐代新罗侨民的活动》，见《古代中韩日关系史研究》，香港大学亚洲研究中心1987年版。转引自朱建君、修斌主编：《中国海洋文化史长编·魏晋南北朝隋唐卷》，中国海洋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432页。

(72) 张广达：《唐代六胡州等地的昭武九姓》，《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6年第2期。

(73) 房仲甫、汪政平：《唐代扬州的大食和波斯商人》，见《江苏省考古学会1983年考古论文选》。

(74) ［日］桑原骘藏：《唐宋贸易港研究》，山西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第38页。

(75) 王溥：《唐会要》卷一百，中华书局1955年版，第1796页。

(76) 长孙无忌等：《唐律疏议》卷八《卫禁》“越度缘边关塞”条，丛书集成初编本，商务印书馆1939年版，第184页。

(77) 司马光：《资治通鉴》卷二百二十五，中华书局1958年版，第7265页。

(78) 司马光：《资治通鉴》卷二百二十五，中华书局1958年版，第7265页。

(79) 欧阳修等：《新唐书·孔戣传》，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5009页。

(80) 吕思勉：《隋唐五代史》下册，中国友谊出版公司2009年版，第646页。

(81) 窦仪等：《宋刑统》卷十二《户婚律》，法律出版社1999年版，第224页。

(82) 《太平广记》卷四百零二《宝三》，北京燕山出版社2011年版，第7034页。

(83) 《太平广记》卷一百六十八《气义三》，北京燕山出版社2011年版，第2418页。

(84) 吕英亭：《唐宋时期涉外法律研究：以外国人来华为中心》，光明日报出版社2010年版，第55—57页。

第十一章
另一个造极之宋

陈寅恪说过：“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1)]王国维也说：“天水一朝，人智之活动与文化之多方面，前之汉、唐，后之元、明，皆所不逮也。”[(2)]宋史专家邓广铭则有论断称，就中国古代史而言，“宋代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所达到的高度，在中国整个封建社会历史时期之内，可以说是空前绝后的”[(3)]。

上述赞誉只是两宋历史的一重面相，主要有赖于科举塑造的大批新型知识分子，他们在经济和政治地位上获得了前所未有的优待。优待既包括丰厚的俸禄，也包括不抑兼并带来的产业安全感，还包括“不杀士大夫及上书言事人”[(4)]的祖训带来的政治安全感（两宋亦有文字狱）。

尽管如此，两宋也没能走出秦制时代，控制与汲取仍是两宋官府施政的核心考量。而且，两宋的控制与汲取不但强度更大，还有一些其他朝代所没有的特色。

那是另一重面相的造极之宋。

一、赵匡胤的“百代之利”

北宋军队战斗力低下是当时朝野公认的一个事实。司马光对宋仁宗说过，宋朝最大的隐患就是“士卒不精”[(5)]；欧阳修说宋朝养了七八十万禁军，却“不得七八万人之用”[(6)]，可用的士兵不足十分之一；《宋史》卷一百八十七《兵一·禁军上》说，宋仁宗时，西部边境有战事，从京城派了禁军过去，结果却是“大率不能辛苦，而摧锋陷阵非其所长”[(7)]。后来招募的新部队虽命名为“万胜

军”，结果却是“痿”名远扬，在党项军中传为笑柄。倒是名将狄青曾利用这一点，拿了“万胜军”的旗帜来给自己麾下的精兵做伪装，成功欺骗过党项军。[(8)]

至于北宋军队为何战斗力如此低下，常见的解释是宋代以“重文轻武”为国策，推行更戍法（频繁调动军队主帅），导致军中兵不知将、将不知兵。这种解释有它的道理，但仍显不足。毕竟，中国历史上绝大多数统一王朝都重文轻武，即以文职官僚为统治基础的主体，也都致力于用与更戍法类似的方式来防范军队的私人化。也就是说，除了重文轻武、更戍法等常规因素之外，应该还有其他的特殊因素在起作用，使得规模远超前代的北宋军队在战绩上反不如前代。

这个特殊因素也是影响北宋军队战斗力的核心因素，即北宋王朝对军队的定性，见于宋太祖赵匡胤与赵普等“二三大臣”之间的一次谈话。众人讨论的主题是怎么做才有“百代之利”，也就是如何才能让王朝延续千秋万代。赵匡胤给出的答案是：“可以利百代者，唯养兵也。方凶年饥岁，有叛民而无叛兵；不幸乐岁而变生，则有叛兵而无叛民。”[(9)]意思是：唯有养兵可以让王朝延续千秋万代。遇上大灾之年，只会有造反的百姓，不会有造反的士兵；太平年岁出了变故，只会有造反的士兵，不会有造反的百姓。

赵匡胤的几句话意思有点模糊。宋神宗后来有一段解释，有助于准确把握赵匡胤的思路。宋神宗说：

> 前世为乱者，皆无赖不逞之人。艺祖平定天下，悉招聚四方无赖不逞之人以为兵，连营以居之，什伍相制，节以军法，厚禄其长，使自爱重，付以生杀，寓威于阶级之间，使不得动。无赖不逞之人既而为兵，有以制之，无敢

为非，因取其力以卫养良民，各安田里，所以太平之业定而无叛民，自古未有及者。[(10)]

前代那些造反作乱的人都是无业游民。宋太祖平定天下后，吸取了前代的教训，将全国的无业游民都招募到军队之中，用军队的组织和纪律来约束他们，给他们提供优厚的俸禄，让他们珍惜自己的生命，然后以奖惩和等级制度将他们困住。如此，无业游民不仅不敢为非作歹，且可以利用他们去保护（也可以换个词，叫控制）良民，于是天下太平，再无百姓起来反叛。这实在是亘古未有的大智慧。

也就是说，以军队吸纳无业游民与地痞流氓是北宋王朝的一项基本国策。对赵匡胤而言，除了抵御外敌，军队还承载着吸纳社会上的无业游民、消化国家内部不安定分子的意义。北宋军队这一对内职责的重要性绝不弱于抵御外敌，甚至犹有过之。

在宋太宗时代，将民间“与人为害者”全部招募到军队中，以实现“乡闾静谧”，是朝中大臣奏疏中称赞的治国良策。[(11)]宋神宗时期，王安石曾批评道：“募兵皆天下落魄无赖之人”，“募兵多浮浪不顾死亡之人”[(12)]——朝廷招兵的重点是吸纳那些无法无天的流氓无赖。他建议宋神宗以“良农”为兵，却也不主张废弃对流氓无赖的招募，理由是将流氓无赖弄到军队当中，可以“令壮士有所羁属，亦所以弭难也”，将他们约束起来也是消弭不稳定因素的好办法，即“每募一人，朝廷即多一兵，而山野则少一贼”[(13)]。

宋末元初的马端临在《文献通考》里对北宋的这一国策有一段很准确的总结：“所谓愿应募者，非游手无藉之徒，则负罪亡命之辈耳，良民不为兵也。”意思是：北宋军队招募来的兵员全是些游手好闲的地痞流氓和亡命之徒，鲜少有良民。[(14)]马端临还提到，

武人在北宋是受到歧视的，“老兵”在当时是非常难听的骂人话。以军队吸纳无业游民与地痞流氓的基本国策直接导致北宋军人素质集体低下，也进而导致了武官在政治集团中备受文官的歧视。

北宋的中央禁军与地方厢军即是在这样一项基本国策下迅速膨胀起来的。每有饥荒、水灾之类的变故，当局就会募兵，从灾民中招募那些破产的青壮年流民入伍，以免他们成为社会上的隐患，且以招募数量的多少作为考核地方官员的指标。建国之初，宋军数量只有40万上下，至宋仁宗时，已有120万之多，用时人蔡襄的话说，这是自五代往上直到秦汉从未有过的规模，可以说是“祖宗以来无有也”[(15)]。也唯有这种规模，才能实现“每募一人，朝廷即多一兵，而山野则少一贼”的治国理想。

与之相配套的是优厚的待遇。宋太祖时期，一名禁军士兵的年俸大约是17贯，一名厢兵大约是10贯。这笔钱足够维持一户中等人家的全年温饱。到宋仁宗后期，禁军士兵的年俸上调至50贯，厢兵的年俸上调至30贯，以至于宰相富弼说朝廷的财政收入“十中八九赡军”，即绝大多数都用来供养军队了。到了宋徽宗时期，禁军士兵的年俸上调至60贯，厢兵的年俸上调至36贯。

庞大的规模与优厚的待遇确实在一定程度上消弭了北宋王朝的内部不安定因素，一个可能的证据就是北宋民变的密度与强度要小于其他朝代，但它毁掉的是北宋军队的战斗力。冷兵器时代，军队的战斗力主要取决于：1．军人的身体素质。2．军人所受的拼杀训练、战阵训练。3．武器的数量与质量。4．军队的纪律性。5．军队长官的战略判断与临场指挥。

北宋禁军专门拣选精壮之人，且与地方厢兵之间有升降流动，厢兵里的精壮者可以升入禁军，禁军里身体垮掉的要降为厢兵。身体素质方面，北宋的士兵总体上不会有太大问题（当然也免不了有

弄虚作假）。北宋以超过七成的财政收入供养军队，武器的数量与质量也不会与外敌有太大的差距（马匹除外）。北宋享国160余年，在这个时间跨度里观察，也不能说所有的军事长官都不合格。因此，真正值得注意的是军队的训练状况与纪律性。而问题恰恰出在这里。所谓“无恒产者无恒心”，指望游民在军营中好好训练，在战场上令行禁止，乃至奋不顾身，古往今来，都是不切实际的幻想。

北宋朝廷其实也很清楚这一点。宋仁宗时，御史吕景初上奏请求停止“养兵”，停止往军队里招募游民，理由之一正是游民毫无战斗力，“战则先奔，致勇者亦相牵以败”[(16)]，游民上了战场无视军令，拔腿就逃，连带着把军中的勇士也坑了。石介也说，军中的游民士兵拿着丰厚的俸禄，“或老卧京师，或饱食塞下，或逸处郡邑，或散居邮亭，未尝荷一戈也”[(17)]，算不得正经的士兵。

宋神宗时期，大臣张方平建议朝廷实施军垦制度，引起诸多的反对意见。最有力的一条意见就是游民无组织、无纪律、无法屯垦。反对者说：唐代以前，士兵与农民一体，士兵本就是从田间征召上去的，所以不难让他们从事农耕。然而，“今之军士，皆市井桀猾，去本游惰之民，至于无所容然后入军籍”，意思是当今的士兵全是些在社会上为非作歹、没有出路的流氓无赖，早就骄纵惯了，平时军官也不敢强迫他们做不愿做的事。“是可使之寒耕暑耘者乎”，要他们老老实实去种地，太不现实了。[(18)]

中央禁军存在的问题，地方厢兵全有。厢兵的本质是挑选禁军剩下的和从禁军中退下来养老的，战斗力更逊一筹。宋仁宗时期，朝廷财政吃紧，于是下令让地方官府从厢兵中调人去做“役人”，这个口子一开，厢兵就更不成样子了。他们被地方官府或调去做买卖，或调去砍树、烧炭，或调去从事纺织，或调去吹奏乐器。以至于苏舜钦上奏说，厢兵“终日嬉游市间”，以刺绣、绘画为业，实

在与军队完全挂靠不上。类似的情况到了南宋也没有改观，兵部侍郎李邴曾愤然对宋高宗说，厢兵在给人抬轿子、玩杂耍、跑腿，“所谓厢军者，臣不知其所谓也”，所谓的厢军，臣实在不知道它是个什么东西。[(19)]

厢军变成了这副模样，于是就有了《东都事略》里记载的“宋江起为盗，以三十六人横行河朔，转掠十郡，官军莫敢撄其锋”[(20)]，也有了后来的金军长驱直入，直抵汴京。

不能用无业游民和流氓无赖来构筑国防本是一个常识——明朝抗倭名将戚继光在《纪效新书》里就说过，招兵“第一切忌不可用城市游滑之人……第一可用，只是乡野老实之人”[(21)]。戚继光懂的道理，行伍出身的赵匡胤自然也懂。他之所以做出与戚继光相反的事情，是因为他愿意牺牲军队对外的战斗力，来换取王朝对内的“百代之利”。

二、仁宗时代亦无仁

宋仁宗皇祐年间（1049—1053年），包拯给皇帝呈递了一道奏疏。这位以刚直著称的官员在奏疏中列举了一大堆数据：1．过去的四十多年里，朝廷供养的文武官员增加了一倍有余。2．当下所有的官吏加起来是治理国家实际所需的三倍有余。3．真宗景德年间（1004—1007年），国家每年的财政收入是4721．1万两，支出是4974．89万两。4．庆历八年（1048年），国家每年的财政收入增长至10359．64万两，财政支出增长至8938．37万两。[(22)]

依据这些数据，包拯提出了一个问题：天下的纳税户口“有常数”，并没有多少变化，土地的产出“虚耗”还不如以往，朝廷的财政收入却增长了一倍有余，这是为什么？

答案只有一个，那就是：横征暴敛在宋仁宗时代正愈演愈烈。

在另一道奏疏里，包拯说：近些年来，朝廷花钱的地方越来越多，官府于是在正税之外玩起了“折变”之类的把戏，以临时需要的名义改征其他物产，原定交麦子的折变成交布帛，原定交丝绸的折变成交大米。比如江淮、两浙的赋税，本来该交小麦，每斗小麦折钱34文，发运司却要求小麦每斗折钱94文，百姓的负担变成了原来的三倍。再如，陈州遭灾后，官府下令将交小麦变更为交铜钱，每斗小麦折税100文，再加上脚钱、头子钱、仓耗钱等，一共是140文，而当地市场上每斗小麦的价格仅为50文。这样征税是二倍、三倍地“诛剥贫民”，是在搞“重率暴敛”，是在向百姓疯狂地变相增税，残暴地重复征税。[23]

基于这些观察，包拯向宋仁宗发问：“日甚一日，何穷之有……输者已竭，取者未足，则大本安所固哉！”[24]如此一天天地聚敛，何时才是尽头？受剥削的百姓已经被抽干，搞汲取的人还不满足，国家的根本还要不要？

包拯所言并非个案，而是宋仁宗时代乃至整个两宋的常态。

北宋开国之时，百姓承受的税赋就很高。用朱熹的话来说，“祖宗创业之初”有很多事要花钱，百姓承受的负担“比之前代已为过厚重”，与前代相比已重了许多。朱熹还说“古者刻剥之法本朝皆备”[25]，历朝历代盘剥百姓的手段都被我大宋继承了下来，并发扬光大。南宋人李心传也说，北宋的税赋自开国之时就很高，宋太宗时的财政收入已“两倍唐室”，是唐王朝的两倍，之后“月增岁广”，朝廷的收入一年比一年多，百姓的负担一年比一年重。南宋偏安一隅，在“祖宗正赋”之外，又搞出“经制钱”“总制钱”“月桩钱”等税外之税，“宜民力之困矣”，[26]百姓当然会被压得喘不过气来。

包拯的奏疏并没有起到什么作用。十余年后，宋仁宗嘉祐年间，刘挚被派往冀州南宫县做县令。他到任后发现，该县“民多破产”，原因是赋税极重，而赋税之所以重，是因为官府在南宫县乐此不疲地搞折变：一匹绢的市价是1300钱，官定折变价只有500钱；一两绵的市价是76钱，官定折变价只有30钱。这意味着折变前交1匹绢所纳的税赋，折变后需要交2．6匹，百姓的负担无形中翻了一倍有余。(27)

史载，刘挚要求按市场价折算绢绵，结果“转运使怒，将劾之”。转运使相当于宋代省级行政单位的最高行政长官，他的发怒意味着以折变剥削百姓的做法并非南宫县的特例，而是其治下的普遍行为。这场纠纷最后闹到了朝廷，恰好此时包拯暂任中央的最高财政长官三司使，对折变之事不满已久，刘挚才赢了这场官司，保住了自己的官职。但刘挚是官员中鲜有的特例，刘挚的官司遇上包拯是特例中的特例。

折变只是宋仁宗时代百姓遭受官府变相盘剥的一个缩影。

陈舜俞是庆历六年（1046年）的进士。在他眼中，宋仁宗时代是一个民生凋敝的时代。他在给宋仁宗的一道奏疏中总结了民生困苦的主要原因，具体而言是八项盘剥：“今天下之赋五：曰公田、曰民田、曰城邑、曰杂变、曰丁口。天下之禁三：曰盐、曰茗、曰酒。生民之衣食，举此八者穷矣。”(28)

租种朝廷的公田要缴纳地租。公田的地租在字面上比租种私田要低，但佃户常年受到官吏的敲诈勒索，实际负担往往远超过字面上的地租。宋神宗熙宁年间（1068—1077年），朝廷掌控的公田为447000公顷，超过了全国垦田数的十分之一；宋仁宗时代的比例应与之大体相仿。换言之，朝廷是北宋最大的地主。

百姓耕种自家田地，需要向朝廷缴纳各种赋税。前文里包拯与刘挚提到的折变，其重灾区即民田。折变之外，还有一种“支移”，也是北宋的自耕农闻之色变的盘剥项目。所谓“支移”，顾名思义，指的是百姓不但必须缴纳田赋，还须自费将田赋运送到需要粮草的指定仓库。与折变一样，在实际操作中，支移也成了官府增收的常规手段，与指定的仓库是否有粮草需求并无必然关系。因为路途遥远，百姓往往选择携带银钱前往目的地，再在当地购入粮食交差，而非直接将粮食运过去，甚至还出现了边境州郡向内地州郡支移粮草的怪事。北宋中晚期，朝廷为了进一步创收，又对支移做了改革，将民运改为官运，转而向百姓收取“地里脚钱”，于是就出现了粮食并不出境，但人人都要缴纳“地里脚钱”的荒唐之事。宋哲宗元祐元年（1086年），吕大忠担任陕西转运副使，即以支移的名义命令辖下百姓将缴纳的每斗粮“纳脚钱十八文”——陕西与西夏接壤，乃是支移的输入地，根本不存在将粮食运出去的费用。[(29)]

所谓“城邑”指的是城市居民需要缴纳宅税、地税、茶课、盐课等杂税。北宋朝廷征税面之广前无古人，百姓日常生产、生活中的所有物品几乎都在征税之列，盖房子要征税，娶妻、嫁女要征税，出远门读书，路过税卡，随身携带的铜钱、铁钱也要纳税，连农具也要收税，且附在田赋之中，不管有没有购买新农具，每年按亩征收。倒是纸币一般不征税，因为官府很喜欢随意发行纸币来满足财政需要。对村野居民已然如此，城市居民更容易控制，对他们的征税力度也就更大。

“杂变”指的是各种稀奇古怪的税种。官府需要牛革了，就下文件向百姓征收牛革；需要箭杆了，下文件向百姓征收箭杆，极为随意。据《宋史·食货志》，征收的各类物资合计有四五十种之多。杂变的本质是权力的不受约束与财政收支的无计划。用欧阳修

的话说，就是“一切临民而取之”，随心所欲，言出法随，朝廷向百姓伸手毫无节制，“制而不足，则有司屡变其法，以争毫末之利”，正常制度下的收入不够用了，朝廷就随意制定政策去盘剥百姓。(30)

“丁口”就是人头税。宋真宗时期，两浙、福建、荆湖、广南等路的人头税收得特别狠，使得当地百姓不敢再养儿子，“民有子者或弃不养，或卖为童仆，或度为释老”(31)，即生了儿子或是抛弃，或是卖掉，或是送给寺庙。

北宋朝廷还对食盐、酒、茶、矾和香等商品实施“禁榷”，也就是搞国家垄断。垄断的方式主要包括：1．官产，官运，官卖；2．由官府掌控货源，将销售许可证卖给私商；3．民间生产的食盐、酒、茶、矾和香等商品必须集中卖给官府，再由官府卖到民间。

权力部门与利益部门挂一块牌子的结果是北宋朝廷在执行禁榷时，有一种异乎寻常的“积极”。

汴京的酒业经营实施的是“榷曲法”，对酒户实行“配曲”，一个酒户能造多少酒取决于他能从官府手里购买到多少酒曲的配额，购买酒曲配额的钱就叫作“曲钱”。北宋中期，汴京有正店酒户70家，每年要用掉造酒之米30万石，这些酒全部得向官府购买官曲才能酿造。为了牟利，北宋官府的一贯做法是多造酒曲，再摊派给酒户，根本不管酒户是否能把酒卖出去，于是就出现了酒户“蹶产以偿”的普遍问题，很多人把家产全卖了也还不上官府的曲钱。(32)

榷曲法直到宋神宗时才因为周直儒的建议而得到改变。周直儒上奏说：官府在汴京卖酒曲的收入一年不如一年，原因是摊派的酒

曲太多。酒曲多，酿的酒就多；酒多了，酒价就要下降；价格下降，酒户就要亏本；酒户亏本、破产，官府卖酒曲的收入也会减少。最好的办法是控制酒曲配额的数量，提高酒价，每年下发的酒曲以180万斤为最高额度，闰年可以再增加15万斤。周直儒的建议得到了宋神宗的认可。[(33)]但180万斤的额度仍不足以让汴京的酒户盈利，于是不得不降至150万斤。150万斤仍然太多，又降至120万斤。而在宋仁宗时期，这个额度曾高达222万斤。这意味着：基于赤裸裸的牟利冲动，朝廷利用自己的垄断权力，完全无视汴京市民的消费能力，超发、摊派了多一倍的酿酒配额。所以，清代史学家赵翼认为，“历代禁榷，未有如宋之甚者”[(34)]，就酒类垄断一事而言，历代之中以北宋朝廷的所作所为最过分。

食盐垄断也是类似的情况。堪称终极恶政的食盐垄断发生在燕云十六州。北宋联金灭辽后，收回了燕云十六州的一部分，将原北宋境内的盐法一并移植了过来。据《三朝北盟会编》记载，在辽国统治的时代，当地“每贯四百文得盐一百二十斤”，也就是11．7文钱可以买到1斤盐。北宋官员接收该地后，启动食盐专卖政策，“每斤至二百五十文足或二百八十文足”，将盐价提升到了250—280文钱一斤，是之前的20余倍。[(35)]

指斥了上述八项盘剥政策后，陈舜俞在奏疏中对宋仁宗时代的民生做出了非常直接的否定：“今夫取民之财可谓悉矣。一夫之耕，获者在田，而敛者在门。匹妇之蚕，织者在机，而征者在屋。天之所生，地之所产，苟可以衣且食者，皆为犯法禁，何民之不穷也！”[(36)]陈舜俞说：如今，朝廷盘剥百姓可以说是用尽了手段。粮食在地里还没熟，征敛者已经上了门；布帛在织机上还没完成，汲取者已经进了屋。天地所生的东西，凡是可供百姓吃穿的，都变成了朝廷所有，由朝廷垄断，百姓怎么可能不穷!

与包拯的奏疏一样，陈舜俞的奏疏也没有起到什么作用。

赋税之外，更要命的是差役。宋代的差役是一种不同于徭役的负担。徭役一般是指百姓必须出人力、物力去修城、筑堤、疏河、造桥。差役则是指百姓必须出人去为官府运送物品、看管府库、督收赋税、追捕盗贼……总之就是州县衙门里的任何苦力活都可以无偿摊派给地方百姓。遭到摊派的百姓从事不同的工作内容，有衙前、乡书手、承符、弓手、散从、壮丁等名目。官府的差役不但强迫百姓脱离生产，还要求百姓必须付出钱粮来完成工作的运转（比如押送纲运要自备路费，还得包赔损失），往往闹到破户败家的地步。

宋英宗治平四年（1067年），司马光在给皇帝的奏折里曾专门批评衙前差役对百姓造成的巨大危害。他说：朝廷以百姓恐惧担任里正的缘故，设置了衙前差役。为避免劳逸不均，还规定了衙前差役如果出现了缺口，就从各乡当中选择“物力最高者”，也就是最富有的人家作为补充。但结果是：“行之到今，已逾十年，民间贫苦愈甚于旧。”宋仁宗时期，衙前成为一种乡村、城镇百姓人人必须承担、人人害怕的差役。司马光的“行之到今，已逾十年”，即是指衙前差役的普及始于宋仁宗。

为什么衙前会让百姓陷入普遍贫困？司马光在奏折里以自身见闻做出了解释。他说：

> 故置乡户衙前以来，民益困乏，不敢营生。富者反不如贫，贫者不敢求富……臣尝行于村落，见农民生具之微，而问其故。皆言不敢为也。今欲多种一桑，多置一牛，蓄二年之粮，藏十匹之帛，邻里已目为富室，指抉以为衙前矣，况敢益田畴、葺庐舍乎？(37)

意思是，自从朝廷设置了“乡户衙前”的差役，百姓的日子就越来越困顿了，他们都不敢努力致富。富人必须承担衙前的苦差，

日子还不如穷人；穷人见了衙前差役这么苦，也不敢寻求致富之路。臣到过一些村镇，见到村民的生产工具和生活条件都很差，就问他们缘故。他们一致说是不敢求富。只要多种一棵桑树、多养一头耕牛、储蓄上两年的粮食、积攒上十匹布帛，就会被周围的人当成富户，然后被推举去承担会导致破户败家的衙前差役。至于买田造屋，就更不敢想了。

衙前差役让百姓两害相权取其轻，甘于贫困而不敢求富，是宋仁宗时期的士大夫观察到的普遍现象。嘉祐八年（1063年），苏轼在给朝中大臣韩琦的书信中说：我在凤翔（今陕西省凤翔县）做官，“见民之所最畏者，莫若衙前之役”，百姓最害怕的东西就是衙前差役。按照朝廷的规定，家产满二百贯的家庭就可以被征去衙前服役，这是最低标准。但这些年来，被征来服衙前差役的百姓极少有家产超过二百贯的。作为百姓，从锅碗瓢盆算起，家产连二百贯都不到，“则何以为民”，要怎么才能活得下去呢？如今连家产不足二百贯的百姓都要被拉去服衙前差役，“民之穷困亦可知矣”，可知百姓已经穷困到了何种地步! (38)

大约在同期，郑獬也给皇帝写过一封奏疏，专门讲述了自己的家乡安州（今湖北省安陆市）如何被各种差役弄得民不聊生。他说：该地服差役的人家“类多贫苦”，都是些穷苦人。每次要征召衙前差役，州县就派人来估计每户人家的资产，够二百贯就会被选中。家中的东西，鸡、狗、簸箕、笤帚、刀具、绳子，只要能值上一文钱，都会拿来补足二百贯之数。去服衙前差役的人得先在胥吏身上花费上百贯钱，才能得到正经的待遇；然后被派去押送纲运进京或转往别处，一次动辄就要耗费三五百贯钱。管理酒务的衙前差役最惨，主管一回就要耗费一千余贯钱（可参考前文提到的酒类官营情况），且没有任何报酬，“以至全家破坏，弃卖田业，父子离散，见今有在本处乞丐者不少”，许多人卖了田宅也补不上窟窿，

只好去做乞丐。纵使第一轮衙前差役还能剩下些“小家活”，长不过一年，短不过一两个月，又会再次轮到，总之是“不至乞丐则差役不止”。而且，一个壮丁被抓来做衙前差役，往往既要负担场务管理，又要负责纲运押送，还要应付本州官府的各种临时差遣。他分身乏术，只好自己去押送纲运，让家人替自己看管场务，应付州县。“是一家作衙前，须用三丁，方能充役，本家农务则全无人主管”，某个家庭一旦被选中做衙前差役，至少得出三个壮丁，自家的农活就完全顾不上了。(39)

郑獬在安州观察到的情况与司马光“行于村落”访谈得到的讯息完全一致。郑獬说，安州现在的风俗是“为生计者尽不敢满二百贯”，没有人敢勤劳致富，没有人敢将家产提升至二百贯的水准，因为到了这个水准，就要被官府弄去服衙前役，然后就要家境败落，沦为乞丐。“虽岁丰谷多，亦不敢收蓄，随而破散，唯恐其生计之充，以避差役”，百姓即使丰收了，也不敢储蓄，会立即将之消耗掉，唯恐自家的家产超过了二百贯。如此一来，就变成了一个恶性循环：“民愈贫，差役愈不给，虽不满二百贯，亦差作衙前。”百姓越来越穷，官府的差役越来越找不到人，到后来即便家产不满二百贯，也会被抓来服衙前差役。(40)

衙前差役已是如此可怕，但只是北宋百姓要承担的诸多差役的一项。散从、弓手与手力负责月巡，要赔偿遗失的物品，抓捕出没的盗贼；负责接送人与物，远者可达四五千里，要自备衣装、粮食与路费；负责催收税赋，要自己填补窟窿……如此种种全部发端并盛行于宋仁宗时代。

朝廷对衙前差役之祸其实心知肚明。早在宋仁宗景祐年间（1034—1038年），大臣韩琦就写了奏疏，对皇帝说：州县生民之苦莫过于“里正衙前”。为了规避这种苦，“有孀母改嫁，亲族分居；或弃田与人，以免上等；或非命求死，以就单丁。规图百端，

苟免沟壑之患”[(41)]——百姓不惜让丧夫的母亲改嫁，不惜与和睦的亲族分居，不惜将田地送给别人以减少家产，甚至不惜自杀，让家中只剩一个壮丁。这些极端的做法都是为了逃避衙前差役带来的家破人亡。

宋英宗时，又有大臣韩绛写了奏疏，对皇帝讲述自己的所见所闻：“闻京东民有父子二丁将为衙前役者，其父告其子曰‘吾当求死，使汝曹免于冻馁’，遂自缢而死。又闻江南有嫁其祖母及与母析居以避役者，又有鬻田减其户等者。”[(42)]为了让儿子躲避衙前差役活下去，在开封附近的京东路出现了父亲上吊 自杀的惨剧；在江南，也出现了让年迈的祖母改嫁，与母亲分居另立门户，不惜将田产贱卖等种种无奈的两害相权取其轻的做法。

但朝廷无意改革徭役。非但无意改革，在王安石变法期间，为将家产符合条件的百姓找出来服衙前役，朝廷又实行了“手实法”，用物质奖励来鼓动百姓告发邻居，导致户户惊惧，人人惶恐。

三、开封城的吸血游戏

宋哲宗元祐二年（1087年）三月，朝廷下旨，要在开封城搞一次“大拘掠”，也就是财产大清查和收入大管控。清查、管控的对象是那些欠了朝廷“市易均月钱”的人。圣旨里说，不管大户小户，一概采取强制措施，没收房屋，接管收入，直到他们将欠朝廷的钱连本带利还上。当然，朝廷是仁慈的，特许小户“拘掠一半”，即只按欠款的半数管控资产和收入。[(43)]

圣旨里提到的“市易均月钱”，大体可以理解为向朝廷按月还贷。宋神宗时，采纳王安石的建议推行市易法，成立了一个叫作市易司的新机构。该机构的主要业务之一是以略低于高利贷的利息

（一般为20%）向缺乏本金的商户提供贷款，商户则以房屋之类的固定资产作为抵押。市易司的金融服务推出后，迅速变成了一场摊派游戏——朝廷拿贷出多少款、收到多少利息来考核主持市易司的官员，官员们则利用手中的权力，强迫辖下商户贷款，有需要得贷，没需要也得贷。结果便是官员们顺利完成了绩效考核，朝廷顺利收获了一堆烂账。为消化这些烂账，元丰五年（1082年），宋神宗法外开恩，允许商人将还款期限延长三年，“均月限以输”(44)——既然无力一次性还清，那就分期，按月定时还贷。

经历王安石变法折腾的开封城百业萧条。无论皇帝如何法外开恩，都不可能从破产或濒临破产的商户手里将钱和利息收上来，才有了元祐二年的“大拘掠”。

谏议大夫梁焘得知“大拘掠”即将启动的消息后非常吃惊，紧急上奏劝阻。他告诉皇帝万万使不得。市易司的贷款已经让许多开封百姓家破人亡，朝廷之前意识到了这一点，所以把被抵押的房屋还给百姓，还放宽政策，允许他们按月还贷。这本是仁政，谁知没搞多久，又出政策说除了偿还本金和利息，还得按月缴滞纳金。滞纳金才搞没多久，又闹着要搞“大拘掠”，朝廷的政策怎么可以这样变来变去，毫无信用呢？更何况，把百姓每天的收入都拘掠到朝廷手里，不足的部分再勒索滞纳金，这是在断他们的生计，将他们逼上绝路。最后一定是百姓破产，朝廷也收不回欠款，对谁也没好处。

也许是觉得上面这些话还不足以说服朝廷，梁焘又站在朝廷的立场，以“贴黄”的形式（将内容写在黄纸上夹进奏章），纯从利益角度出发，对奏章的内容做了一番补充。他说：“我大宋有一项国策是高度优待京师之民，平常日子不怎么骚扰他们，所以京师之中能发育出数百家大户。仁宗庆历年间，西北边境有战事，急需钱用。朝廷将数十家大户弄过来，一天之内就筹足了军费。朝廷养着

京师之民，平日不动他们，正是为了让他们在危急的时候派上用场。臣希望陛下能继承这一祖宗之法，好好爱护因变法已遍体鳞伤的京师之民。如此，再过个一二十年，他们又可以发育成若干大户，可供朝廷在紧急之时取用。”[(45)]

梁焘拿“祖宗之法”说事的贴黄实际上是在劝告皇帝，不要光想着吸血和杀猪，也得注意造血和养猪。血造多了，猪养肥了，到了关键时刻再吸血、再宰杀，才能实现利益最大化。在梁焘的语境里，开封城是一座巨大的蓄血池、一座巨大的猪圈，京师之民则是朝廷蓄的血、养的猪。

梁焘是否真将京师之民看成待宰之猪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他相信宋仁宗、宋哲宗一定是这样看问题的，相信他的话会对皇帝起作用。有意无意之中，梁焘道破了北宋都城开封乃是一座吸血之城的本质——在北宋治下，开封繁华了160余年。但开封的富丽、繁华并不是自由生长的结果，而是皇权疯狂吸血的产物。

而且，皇权吸血是有层次的。

第一个层次，是开封疯狂吸取全国之血。

按宋太宗的说法，“东京养甲兵数十万，居人百万家”，也就是说开封在宋初就已是一座常住人口过百万的大都市，直到北宋灭亡，其人口规模始终维持在130万—150万左右。这当中包括驻军约10万—20万人，皇室、贵族、官僚、官用工匠约10万人，僧尼、道士约2万—3万人，这些人加上他们的眷属约占到了全城人口的三分之一。[(46)]

司马光算过一笔账，在开封一户十口之家若想维持体面的中产生活，每月需要有15贯钱的收入（开封之外，15贯钱维持一户中等人家全年的温饱绰绰有余）[(47)]。宋仁宗时禁军的月俸，底层士兵

有4—5贯，基层军官有7贯，中层武官有20—100贯，高级武官有150—400贯。考虑到底层士兵不会带着十口之家驻扎在京城，可以说几乎所有的禁军中人都超过了司马光提出的“中产线”，是高消费乃至超高消费人群。再看官僚集团，北宋官员的俸禄，自宰相至岳渎庙令，共分为41个等级。宋神宗熙宁年间，最高级别的宰相与枢密使，月俸是300贯；最低一级的岳渎庙令，月俸也有10贯。考虑到群聚开封城的主要是中高级官僚，而非岳渎庙令这类底层官员，可以说城内官僚也全部超过了司马光提出的“中产线”，是高消费乃至超高消费人群。这还仅仅只计入了他们的俸禄，没有将各种合法福利（比如发绫、发绢、发绵）和灰色收入算进去，后者在禁军中人和官僚的收入中往往占比更大。(48)

由国家财政供养的军队、官僚和皇室、贵族（以及依附于他们的僧尼、道士）构成了开封城核心的消费人群。城内的其他居民，也就是普通百姓，则主要靠给这些人提供服务来维持生计。开封是一座没有产业的城市，它几乎完全依赖“公务员消费”来维持运转。这一点从孟元老的《东京梦华录》中可以看得很清楚。孟元老笔下的开封有着各式各样让人眼花缭乱的奢侈消费，但几乎没提到任何其他产业。若将吃财政饭的群体集体撤离，开封的繁华就会瞬间崩塌，整座城市也会瞬间失去活力，归于死寂。(49)

也就是说，宋都开封是一座纯消费型的城市，它的活力的源头是权力集团的极尽奢靡，它的繁华背后是全国税赋源源不断地输入。《玉照新志》里说开封城里到处都是“天姬之馆、后戚之里、公卿大臣之府、王侯将相之第”；孟元老说城中官员豪宅太多，自己实在是没法全记录下来；做过宰相的吕蒙正则说，开封的繁荣景象全赖皇帝、官僚和士大夫集中于此。为了维持都城的奢靡与繁华，权力集团在北宋全境长期实施高强度的汲取。朱熹说过，北宋自开国之日起，百姓的税赋负担就已远超前代，而且“古者刻剥之

法，本朝皆备”，历朝历代盘剥百姓的手段都被继承了下来，并发扬光大。即使在号称“仁治”的宋仁宗时代也是民生凋敝，百姓不堪重负。陈舜俞曾在奏折里公开批评仁宗朝的政策，说它“取民之财可谓悉矣”，用尽了所有盘剥百姓的手段。

权贵所在之地必然要优先保障各种需求。由汴河、蔡河、五丈河、金水河构成的水运网络犹如一条条巨大的血管将全国的血液源源不断吸入开封。宋真宗大中祥符元年（1008年），仅各地运往开封的漕粮就多达700万石。《东京梦华录》里说，每日里驱赶进入开封的生猪有上万头，每日里送入开封城的生鱼也有数千担。[(50)] 但负责保障开封物资供应的漕卒和养殖户的日子却过得很艰难。宋神宗时期，苏轼写过一篇奏议，专门分析漕卒为什么会沦落到去做盗贼。他的结论是：“上之人”的盘剥让漕卒收入微薄，没衣穿，没饭吃，手烂脚烂，一年到头得不到休息，不做盗贼是活不下去的。[(51)]

为了优先保障开封的需求，京师周边地区的百姓也会时常被拿来当牺牲品。宋仁宗嘉祐初年，蔡河发洪水，为免水入开封，朝廷以邻为壑，出动军队与民工将河堤挖开，把滔滔洪水引向了开封西南县邑，沿线百姓俱成“鱼虾”。身在挖堤现场的王安石目睹了这一惨剧，在诗里留下了“妇子夜号呼，西南漫为壑”的句子。

第二个层次，是官府与官僚权贵在开封城内的疯狂吸血。

北宋有商业行会160个左右，多数总部设在开封。据《都城纪胜》和《梦粱录》记载，这些行会的成立全部由官府主导，让行会承担采购任务，目的是满足官府“科索”，而非维护商人利益。时人将成立行会的吸血之道总结为“京师百物有行，官司所需具以责办”。有利的买卖往往“责办”给那些有官僚、权贵背景的商户，没利润的买卖就“责办”给普通生意人。宋神宗时，米商曹赟被

“责办”采购糯米500石，他根本无法完成，只好上吊 自杀。更有甚者，官府或官僚权贵需要某物，开封根本没有经营该物的商家，他们也会强迫经营其他商品的商人成立行会，将采购的任务强行摊派到他们头上。这种风气愈演愈烈，闹到怨声载道的地步，宋神宗不得不颁下谕旨：“官司下行买物，如时估所无，不得创立行户。”官府有采购需求，若无商人经营该货物，不许强行设立行会。[52]

官府对行会的“责办”不仅限于采购，也包括售卖。官府常将积存的物资拿出来，强行摊派给行会，要他们按官定价格出售。有利可图的物资自然是交给有官僚、权贵背景的商户，无利可图的物资，比如“积压年深，以致陈损不堪食用”的茶叶之类，则往往强行塞给普通生意人，将损失转嫁到他们身上。

最要命的是，开封不允许任何一个商人游离在行会之外，即不允许他们脱离官府的控制和盘剥。宋人郑侠在给皇帝的奏折里提到过关于行会的苛政：“不赴官自投行者有罪，告者有赏。”不向官府登记、不参加官府组织的商人在开封城做买卖是有罪的，告发者可以领取赏金。苛政造成的结果是：“京师如街市。提瓶者，必投充茶行，负水担粥以至麻鞋头发之属，无敢不投行者。”连在开封城的街上提瓶卖水、挑担卖粥、摆摊卖鞋、为人理发，都得加入官府组织的行会。宋朝行会（与欧洲的行会组织区别极大）的存在意味着开封并没有真正的自由市场。[53]

恶政一旦付诸实施，很快就会形成一套以恶为轴运转的“生态系统”。先是官府利用手中权力从行会中的商人身上吸血，然后行会中的商人又会利用官府赋予的垄断地位，从底层成员和其他商人身上吸血。

首先，不向相应行会缴纳高额会费是不允许在开封城做买卖的。王安石雇用过一个洗衣妇，该妇人对王诉苦，说她有个儿子擅长做饼，“缘行例重，无钱赔费，开张不得”[(54)]，交不起高额的行会准入费，饼摊一直没法开张。

其次，外地商人携货来到开封，都得先让城内的相应行会吸足了血，才有机会赚钱。王安石对宋神宗说，开封的茶叶生意是控制在茶行手中的，茶行则由十多户有官僚、权贵背景的大商人控制。外地商人运茶来京，首要之务就是去拜见这十多户大商人，请他们吃饭喝酒，以亏本的低价将茶叶卖给他们，来博取他们的欢心。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得到他们的允许，将剩余的茶叶定个高价，再卖给城内茶叶行会里的那些“下户”。王安石说，不但茶行这样玩，城内其他行业“盖皆如此”，全是这样的套路。[(55)]类似的记载也见于《宋史·食货志》，书中说，行会商人从外地运货到开封，城内的“坐贾铺户”会为他们充当担保人，让他们按正常价格迅速完成交易，拿钱走人。非行会商人运货来开封，“坐贾铺户”是不肯出具担保的。没了担保，这些商人就只好连人带货一起滞留京城，往往落得一个货价暴跌、只好亏本卖给城内行会商户的结果。[(56)]

也就是说，官府吸行会的血，行会的控制者们一头吸外来商人的血，一头吸行会底层成员的血。开封城内的行会控制者又大多有官僚背景，或是权贵的亲戚，或是高官的代理人。自宋太祖默许宰相赵普公开“营邸店，夺民利”开始，官僚从商的不正之风贯穿了整个北宋王朝。其间虽屡有谕旨下令禁止，但大多只是走个过场，鲜少真的严查。朝廷对官僚从商的宽容，即本节开篇梁焘提及的“优待京师之民”。于是，到了宋真宗时代，按宰相王旦的说法，开封城中已是巨富遍地——“京城资产百万者至多，十万而上，比比皆是”[(57)]。百万即一百万贯钱，一贯钱是1000文钱，也就是有10亿文钱的家产。资产百万的基本上都是从商的官僚、权贵。如在

宋徽宗时期做过宰相的何执中，他名下的邸店数量“甲于京师”，每天可以收120贯房钱，一年可以收4万余贯；他的同僚朱勔更厉害，光邸店一项买卖，每天可得数百贯。

在开封这座权力之城里，官僚、权贵与自己的商业代理人合作，个个赚得盆满钵满。[(58)]开封是一个世界，开封之外的北宋，又是另一个世界。城内是宝马香车、雕梁画栋，是新声巧笑、按管调弦，是集四海之奇珍、会寰区之异味。城外是被各种税赋和衙前差役压得喘不过气来、“不敢营生”“不敢求富”的赤贫世界。司马光、苏轼、郑獬等人在给皇帝的奏折里描述那赤贫世界中的百姓，他们不敢多种一棵桑树，不敢多养一头耕牛，不敢积攒超过十匹布帛，因为他们害怕成为朝廷登记簿里的富户，那意味着会被拉去承担衙前差役，而衙前差役必然导致破户败家。两个世界之间的差距也体现在富豪的规模上。如前文所言，早在宋真宗时期，开封城内资产百万贯以上者就已“至多”，资产十万贯以上者就已“比比皆是”，而开封城外京东西路的首富万延嗣的资产只有十四万二千贯。[(59)]路相当于省，京东西路紧邻开封，位置优越，并不是什么偏远、穷苦之地，它的首富放到开封城内却根本排不上号。

第三个层次，是皇权疯狂吸开封城的血。

不论官僚、权贵将财富积累到何种程度，他们终究只是梁焘所说的被朝廷刻意优待、豢养的“京师之民”，是皇权的蓄血池，平常的宽纵是为了在非常之时抓出来放血。宋仁宗对西夏用兵，先是强行向开封城中数十户豪富借款，仅李氏一户就借了20余万贯；稍后在河东用兵，又向城中的“上等户”搞摊派，许多豪富被摊派了超过1万贯。宋徽宗也曾以收复燕云十六州为名，对包括开封豪富在内的全国富户进行勒索。这些摊派与勒索从不偿还，至多不过是像宋仁宗那样给被放了几十万贯血的人家赏赐个不值钱的京官名目聊作安抚。[(60)]

在这样的吸血游戏里，宋都开封的百年繁华不过是一场畸形的消费盛宴而已。

---

(1) 陈寅恪：《陈寅恪集》，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9年版，第245页。

(2) 王国维：《宋代之金石学》，见《王国维考古学文辑》，凤凰出版社2008年版，第113页。

(3) 邓广铭：《谈谈有关宋史研究的几个问题》，见《邓广铭全集》第七卷，河北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第61页。

(4) 这条“祖训”究竟是否刻成碑文实体性存在，学术界有很大争议。可参见张荫麟：《宋太祖誓碑及政事堂刻石考》，见《两宋史纲》，北京出版社2016年版，第35—42页；杜文玉：《宋太祖誓碑质疑》，《河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6年第1期；徐规：《宋太祖誓碑辨析》，《历史研究》1986年第4期；杨海文：《“宋太祖誓碑”的文献地图》，《学术月刊》2010年第10期。

(5) 司马光：《司马光奏议》卷三《拣兵》，山西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28页。

(6) 欧阳修：《准诏言事上书》，见《欧阳修集编年笺注》第三册，巴蜀书社2007年版，第243页。

(7) 脱脱等：《宋史·兵志一·禁军上》，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4574页。

(8) 沈括：《梦溪笔谈》，中华书局1957年版，第141页。

(9) 晁说之：《嵩山文集》卷一《元符三年应诏封事》，见《四部丛刊续编·集部》，上海书店1985年版。

(10)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三二七，中华书局2004年版。

(11) 田锡：《应诏言关右利病疏》，见《宋代蜀文辑存校补》第一册，重庆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16页。

(12) 邓广铭：《北宋政治改革家王安石》，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7年版，第199页。

(13) 林瑞翰：《熙宁变法丛考》，见《宋史研究集》第八辑，1976年版。

(14) 马端临：《文献通考》第六册，山东画报出版社2004年版，第133页。

(15) 蔡襄：《蔡襄全集·强兵》，福建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429页。

(16) 黄淮、杨士奇：《历代名臣奏议》卷二二一《吕陶奏》，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版。

(17) 石介：《徂徕集·兵制》，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97页。

(18) 严可均：《全宋文》卷八一三《张方平“屯田”》，巴蜀书社1991年版，第438—440页。

(19) 粟品孝等：《南宋军事史》，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版，第49—51页。

(20) 王称：《东都事略》卷一百三《侯蒙传》。

(21) 戚继光：《纪效新书》卷一《束伍篇》，中华书局1996年版，第23页。

(22) 包拯：《包拯集》卷一《论冗官财用》，中华书局1963年版，第14—15页。

(23) 包拯：《包拯集》卷七《请免陈州添折见钱》，中华书局1963年版，第89页。

(24) 包拯：《包拯集》卷一《论冗官财用》，中华书局1963年版，第14—15页。

(25) 朱熹：《朱子语类》卷一一〇《论兵》。

(26) 李心传：《建炎以来朝野杂记甲集》卷一四《国初至绍熙天下岁收数》。

(27) 脱脱等：《宋史·刘挚传》，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10849页。

(28) 陈舜俞：《都官集》卷二《厚生》。

(29) 陈振：《宋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第348—352页。

(30) 欧阳修：《欧阳修集·原弊》，江苏凤凰出版社2014年版，第240页。

(31) 《宋大诏令集》卷一八六。

(32) 李华瑞：《宋代酒的生产和征榷》，河北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229页。

(33) 黄天华：《中国财政制度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第1178页。

(34) 赵翼：《陔余丛考》卷十八《宋元榷酤之重》，河北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281—282页。

(35) 徐梦莘：《三朝北盟会编》上，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版，第175—176页。

(36) 陈舜俞：《都官集》卷二《厚生》。

(37) 司马光：《论衙前札子》，见《司马温公集编年笺注》第六册，巴蜀书社2009年版，第293—294页。

(38) 苏轼：《上韩魏公论场务书》，见《苏轼文集编年笺注》（六），巴蜀书社2011年版，第283—285页。

(39) 郑獬：《郧溪集·论安州差役状》。

(40) 郑獬：《郧溪集·论安州差役状》。

(41) 脱脱等：《宋史·食货志上五·役法上》，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4297页。

(42) 脱脱等：《宋史·食货志上五·役法上》，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4298页。

(43)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三百九十六，中华书局2004年版。

(44) 脱脱等：《宋史·食货志下八·市易》，中华书局1997年版，第4553页。

(45)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三百九十六，中华书局2004年版。

(46) 周宝珠：《宋代东京开封府》，《河南师大学报增刊》1984年版，第27—30页。

(47) 司马光的原话是“十口之家，岁收百石，足供口食；月掠房钱十五贯，足供日用”，转引自[韩]曹福铉：《宋代城市租赁人的生活水平研究》，见《宋史研究论丛》（第11辑），2010年。

(48) 黄纯艳：《宋代财政史·宋代官吏俸禄的构成和标准》，云南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620—654页。

(49) 姜庆湘、萧国亮：《从〈清明上河图〉和〈东京梦华录〉看北宋汴京的城市经济》，《中国社会科学》1981年第4期。

(50) 孟元老：《东京梦华录》，上海古典文学出版社1956年版，第13、28页。

(51) 苏轼：《关陇游民私铸钱与江淮漕卒为盗之由》，见《苏轼文集》上册，岳麓书社2000年版，第124页。

(52) 魏天安、戴庞海主编：《唐宋行会研究》，河南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84—108页。

(53) 郑侠：《西塘集·免行钱事》。

(54)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百五十一，中华书局2004年版。

(55)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三百三十六，中华书局2004年版。

(56) 脱脱等：《宋史·食货志下五·茶上》，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4480页。

(57)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八十五，中华书局2004年版。

(58) 开封权贵与商人之间的关系，可参见李华瑞：《宋代的资本与社会》，见《宋史研究论文集（2016）》，中山大学出版社2018年版。

(59) 周宝珠：《宋代东京开封府》，《河南师大学报增刊》1984年版，第265页。

(60)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三百八十八，中华书局2004年版。

第十二章
明太祖猛于虎

刘基在自己的文集里记有朱元璋对元朝灭亡教训的一条重要总结：

> 奈何胡元以宽而失。朕收平中国，非猛不可！[(1)]

所谓“宽”，用历史学者班布日（笔名“班布尔汗”）的话说，就是元朝的政策对民间的控制力不足：“推翻元朝的朱元璋评价元朝之亡，认为‘其失在于纵驰’，所谓纵驰就是管控不善，空间太大。”比如，科举本是皇权将选官、任官之权操之于己的重要手段，是重要的秦制统治术，但元朝人不甚明了。因此元朝统治初期不开科举，后来开了科举，又取士极少，仅可谓聊胜于无，这样做的结果就是无法将士绅纳入统治秩序之中，无法借助士绅的力量来掌控农村及农业收入，以至于元朝政府的主要财源不是农业税，而是盐税和商税。官府依赖商税，自然就会鼓励商业兴旺，商业天然追求自由贸易（包括人的自由流动与物资的自由流动），又会反过来进一步削弱官府的管控能力。比如，官方虽然有“人分四等”（蒙古人、色目人、汉人、南人）的等级制度，但现实中有大量的汉人、南人因为经商而富甲一方，也有大量的蒙古人、色目人因穷困而卖身为奴。元朝朝廷制定了“诸色户计”制度，本意是将职业与身份捆绑在一起，读书人是儒户、军人是军户、工匠是匠户，都不许随意变更，但在现实生活中，变更“户计”是一种很常见的事情。[(2)]

对百姓而言，宽意味着自由度高，自由度高意味着百姓对朝廷的依附性弱，依附性弱意味着百姓容易形成有力量的组织。作为造反者，朱元璋亲眼见证过发达的民间组织对元政权造成的冲击。所

以，夺取天下后，采取与元朝之“宽”相反的“猛”就成了朱元璋首要吸取的“历史教训”。

明太祖的“猛”同时针对官僚集团与普通百姓，是一种典型的秦制回归。

一、以“猛”治官

明太祖洪武八年（1375年）元旦，刘基拖着病躯，上朝给朱元璋拜年，在奉天殿内写下一首七言律诗，歌颂大明朝欣欣向荣、万国来宾，末了两句却是悲难自抑：

从臣才俊俱扬马，白首无能愧老身。[(3)]

刘基感叹：朝堂上全是意气风发的英杰、才俊，只有我这个头发白了的糟老头子是无用之人。

这是刘基留在世上的最后作品。

这位65岁的开国老臣本已于洪武三年（1370年）退隐家乡浙江青田，不交友，不接触官府，不谈论时政，只求有一个善终。然而，人在家中坐，祸从天上来，有人告发他看中了谈洋（位于今福建、浙江之间）这个地方有王气，要在那里给自己搞一块墓地。朱元璋勃然大怒，夺了他的俸禄。为求保命，洪武六年（1373年）七月，刘基仓皇离开青田老家，赶赴南京城，向朱元璋磕头请罪，不敢有任何辩解，“惟引咎自责而已”[(4)]。

刘基的主动来京暂时保住了他和家人的性命。但朱元璋没说可以回乡，他也只能继续待在南京，时刻准备好迎接朱元璋突如其来的各种羞辱。比如，回京后的第二个月，朱元璋就小题大做，以“不陪祭而受胙”（不参加祭祀活动，却分享祭祀用的肉），把刘

基拉出来点名批判，说他“学圣人之道”，却如此不检点，哪有半点符合礼；点名批评完，又从侧面插刀，说武人不懂礼，他们不去参加祭典，却吃了胙肉，倒是不必责备。[(5)]

有家不能归，有辱不能避，这样的日子让刘基的健康状况急转直下。洪武七年（1374年），刘基送宋濂之子还乡时，须发大半已白，牙齿掉了十三四颗，左手“顽不掉”（大概是麻痹不能动之意），耳朵听不见，脚也跛了。[(6)]

或许是亲自确认刘基已是风烛残年，洪武八年三月，朱元璋终于允许刘基返乡。他抓住最后一个打击、折辱刘基的机会，写下一份非常冷漠、充满了语言暴力的“允许归老诏书”。

这份诏书将朱元璋的冷酷本性暴露无遗，所以，后来收入《太祖实录》时，它成了“略稿”，所有无情的词句都被删除。唯有《诚意伯刘文成公文集》中仍恭恭敬敬地载有原文，照录于下：

> 朕闻古人有云：君子绝交，恶言不出；忠臣去国，不洁其名。尔栝苍之士，少有英名，海内闻之。及元末群雄鼎峙，孰辨真伪者谁？岁在戊戌，天下正当扰乱之秋，朕亲帅六军，下双溪而有浙左，独尔栝苍未附，惟知尔名耳。吾将谓白面书生，不识时务。不久而栝苍附，朕已还京。何期仰观俯察，独断无疑，千里之余，兼程而至，谒朕陈情，百无不当。至如用征四方，摧坚抚顺，尔亦助焉。不数年间，天下一统。当定功行赏之时，朕不忘尔从未定之秋，是用加以显爵，特使垂名于千万年之不朽，敕归老于桑梓，以尽天年。
>
> 何期祸生于有隙，致使不安。若明以宪章，则轻重有不可恕；若论相从之始，则国有八议。故不夺其名而夺其

禄，此国之大体也。然若愚蠢之徒，必不克己，将谓己是而国非。卿善为忠者，所以不辨而趋朝，一则释他人之余论，况亲君之心甚切，此可谓不洁其名者欤！恶言不出者欤！

卿今年迈，居京数载，近闻老病日侵，不以筋力自强，朕甚悯之。於戏！禽鸟生于丛木，翎翅干而飏去，恋巢之情，时时而复顾。禽鸟如是，况人者乎！若商不亡于道，官终老于家，世人之万幸也。今也老病未笃，可速往栝苍，共语儿孙，以尽考终之道，岂不君臣两尽者欤？[(7)]

诏书的大意是：你刘基早年归附于我，帮助我建功立业，我也没亏待你，给你加官晋爵，给你各种荣耀。然而，你刘基犯下的罪行（即所谓给自己找有王气的墓地），如果走法律程序，绝对不可饶恕；讲功劳人情，则有“八议”的条款可以减刑，所以朕只夺了你诚意伯的俸禄，没削掉你诚意伯的爵位。你如果是个愚蠢之徒，必然要来找朕申辩，强调自己无辜，进而凸显是朕错了。不过，你是一个善于为忠的人，不作任何辩解就主动跑来南京认错。你是一个不向朕要好名声的人，是一个不向朕口出恶言的人。所以，如今你老迈多病，朕放你回乡去，与儿孙好好团聚，好好死在家中。

这份诏书的遣词造句全是朱元璋依据《白虎通义》里的三纲五常发明出来的鬼话与浑话，也就是君王永远正确，即使君王错了，臣子也不许辩解、不许反驳，臣子要用主动认错的态度来巩固君王的永远正确。臣子遭君王污蔑，也没有辩解的权利，否则就是不忠，不忠就该死，且会被剥夺死在家乡、死在家中的权利。在朱元璋和他的三纲五常之下，只有“国之大体”，没有个人的尊严，凡追求“己是而国非”者，就不能算是合格的忠臣。而所谓“国之大体”其实完全等同于朱元璋的脸面。

一个月后，刘基病故于浙江青田。去世前一个月左右，刘基安排好了自己的后事。他先是拿出自己写的《天文书》，让长子刘琏赶紧上交给朝廷，且警告他“毋令后人习也”；再叫来自己的次子刘璟，交给他一封密奏，对他说，“夫为政，宽猛如循环。当今之务，在修德省刑，祈天永命”，日后皇帝想起我来，问你们有没有听到什么遗言要对他说，就把这封密奏交给他。[8]

刘基的安排里，不让后代传承自己的学问透露出的是刘基对朱元璋以“猛”治国，尤其是以“猛”治官的深刻恐惧。期待朱元璋有一天能回心转意再想起自己，说现在应该做的不是“猛”而是“宽”，不是控制与杀戮，而是“修德省刑”，且留下一封遗书，透露出的则是深切的不甘。

曾几何时，刘基的心中是有一个“理想国”的，也一度以为朱元璋是一个可以托付理想的明君。在《春秋明经》里，刘基描述过他期盼的君臣关系。他说，自己信奉孔子的“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坚信忠之大者是“以道事君”。君臣之间必须要以“礼”相待，“礼”就是不能徇私，因为彼此是公事上的上下级关系，不是私人间的主仆关系。臣与君共事，要以“忠”自处，“忠”是站在公事的立场上责难、批评和提意见，不是阿谀、承顺与唱赞歌。[9]

遗憾的是，朱元璋要的忠与刘基愿意奉行的忠并不是同一种东西。朱元璋要的忠是写在侮辱刘基的诏书里的那些鬼话与浑话——臣须永远无条件服从“国之大体”，也就是永远服从皇帝，永远奉皇帝的意志为绝对真理。冲突的结果是朱元璋的屠刀战胜了刘基的信念。为了活命，刘基不但要卑躬屈膝去践行朱元璋那些关于“忠”的鬼话与浑话，还得忍受朱元璋对自己的直接羞辱。“胙肉事件”中，朱元璋点名批评的切入点正是刘基的“谓之以礼，则不可以为私也”——你不是成天讲君臣相处要遵循礼、“不可以为

私”吗？如今你不去参加祭典，却堂而皇之吃起了胙肉，这不是“私”是什么？你所谓的礼又在哪里？

朱元璋玩的是杀人诛心。刘基能申辩说朝廷多年来一直这样分胙肉吗？能申辩说自己是无心之失吗？能抗议当时的宰相胡惟庸也吃了胙肉、也没参加祭典，为何皇帝不点名批评他吗？当然不能，一旦这样做了，就成了追求“己是而国非”，就成了朱元璋标准下的不忠之臣，也就永远没了死于故乡、死于家中的机会。

刘基唯一能做的就是含垢忍辱。

忍辱期间，刘基写了一篇题为《二鬼》的寓言，将自己比拟为一只遭天帝误会的鬼。天帝（暗指朱元璋）派了飞天神王率五百夜叉，拿着金绳、铁网来抓鬼，将之关在铁栅之内，给衣穿，给粥喝，唯独不许鬼“突出笼络外”，因为天帝担心它脱了牢笼，将会“踏折地轴倾天维”（暗指刘基被污蔑寻求有王气的墓穴），将地轴弄断，将天维推倒，掀起大风波。刘基在寓言里说，天帝多虑了，这只鬼如今所求不过是“不寒不馁长乐无忧悲”，有衣穿、有饭吃就很开心满足。这只鬼还相信，只要安静待在铁栅之内，终有一日天帝会“息怒”，会“解猜惑”。那时，鬼就可以离开铁栅，回到天帝身边，“依旧天上做伴同游戏”。[(10)]

《二鬼》满篇皆是求生欲，但朱元璋不会放过刘基。共事多年，他清楚刘基并非真的服膺自己的价值观，也清楚刘基真正的思想、旨趣何在。寓言集《郁离子》是刘基在元末隐居时的名作，其中有一篇石破天惊的《楚人养狙》，朱元璋是知道的：

> 楚有养狙以为生者，楚人谓之狙公。旦日，必部分众狙于庭，使老狙率以之山中，求草木之实，赋什一以自奉。或不给，则加鞭棰焉。众狙皆畏苦之，弗敢违也。

一日有小狙谓众狙曰：“山之果，公所树与？”曰：“否也，天生也。”曰：“非公不得而取与？”曰：“否也，皆得而取也。”曰：“然则吾何假于彼而为之役乎？”言未既，众狙皆寤。

其夕，相与俟狙公之寝，破栅毁柙，取其积，相携而入于林中不复归。狙公卒馁而死。

郁离子曰：“世有以术使民而无道揆者，其如狙公乎！惟其昏而未觉也，一旦有开之，其术穷矣。”(11)

“狙”是一种猴子，说的是百姓；靠奴役猴子为生的“狙公”说的是帝王。狙公霸占了猴子们十分之一的劳动成果，却说是自己养活了猴子。某日，一小猴问猴群：山上的果树是狙公种的吗？没有狙公你们无法获得果实吗？既然答案都是否定的，你们为什么要受他奴役，并将这奴役视为理所当然呢？于是猴群幡然醒悟。寓言的末尾，郁离子，也就是刘基自己，跑出来点题：世上那些用“术”来控制百姓、愚弄百姓，而不是以“道”治国之人就是狙公。等猴子们醒悟过来，狙公的“术”就要失效，狙公就要饿死。

不幸的是，懂得许多道理的刘基在元末乱世中不慎失足，投入了狙公阵营。待到他发现朱元璋是一位活生生的狙公时，已是泥足深陷，难以自拔，只能在诗作中悲叹“何如坐蓬荜，默默观大运”。

朱元璋的狙公本色见于《大诰三编》中他对夏伯启叔侄的痛斥。夏伯启叔侄是江西贵溪县小有名气的儒士。朱元璋以“猛”治官，洪武朝的官员大多数没有好的结局。夏伯启叔侄害怕进入官场，又不敢公然对抗，于是选择砍了自己的手指，成为不堪用的残废。朱元璋把他们捉入京城，亲自审问，痛骂二人：

人之生，父母但能生其身体而已，其保命在君。虽父母之命，非君亦不能再生，况常云人有再生父母……今尔不能效伯夷、叔齐，去指以食粟，教学以为生，恬然不忧凌暴，家财不患人将，尔身何将怙恃？尔所以不忧凌暴，家财不患人将，所以有所怙恃者，君也。今去指不为朕用，是异其教而非朕所化之民。尔宜枭令，籍没其家，以绝狂夫愚夫仿效之风。(12)

你们的父母只能生你们的身体，你们能够保命，活到今天全是君王的功劳。君王是你们的再生父母。你们自己说说，你现在剁了手指，却还能以教学为生，过上不必担忧遭受凌暴、不必担忧被人抢劫的好日子，靠的是谁？你们能过上好日子，靠的是谁？靠的全是君王，也就是我。你们知道奉养父母，但是对待我这个再生父母，宁可剁了手指，也不愿为我所用。我必须砍你们的头，抄你们的家，以免天下人效仿。

朱元璋对夏伯启叔侄的痛斥与刘基写的寓言《楚人养狙》的主旨可以说是截然对立。狙公不会放过说真话的小猴子，即使它已经屈服于狙公的淫威，满嘴只剩下阿谀奉承之词，不敢再说真相。对狙公而言，猴群中有一只看透驭猴之术的真相的猴子存在，本身就是不稳定因素。不肯为狙公所用的猴子必须死，看透狙公驭猴之术的猴子也必须死。这是刘基的命运密码，也是朱元璋统治时期大多数官员的命运密码。

二、以“猛”治吏

常熟县农民陈寿六突然成了明帝国最耀眼的政治明星。

据说，这位老实巴交的江苏农民平日里常受当地“害民甚众”的县吏顾英侵害。陈寿六忍无可忍，与自己的弟弟、外甥联手，将

顾英绑起来，手持朱元璋亲自编写的《大诰》，来到京城告御状。朱元璋很欣赏陈寿六的行为，赏给他二十锭银钞，赐给三人各两件衣服，免除了陈寿六三年的“杂泛差役”，并下旨将此事通报全国，予以表彰。

在表彰陈寿六的诏书里，朱元璋说，如果有人敢罗织罪名报复陈寿六，我会将其族诛！如果陈寿六仗着我的名头横行乡里，我也不会庇护他。但是，陈寿六的过失，地方官员无权惩处，须将他召到京城，由我亲自审理。末了，朱元璋赞扬道：“其陈寿六其不伟欤！”[13]

自此，陈寿六成了归朱元璋直接领导的天字第一号百姓。

陈寿六的故事只是洪武年间成千上万类似故事中最突出的一例。洪武十八年（1385年）、洪武十九年，在通往南京城的各条驿道上常能见到这样的场景：百姓们带着干粮，三五成群或百十为伍，押着几个被结实捆绑着手脚的富豪或胥吏匆匆赶路。遇有官吏盘查，就从怀里掏出几本小册子。看到他们的小册子，官吏立刻收起威风，恭请他们过关。

这种现象源于洪武十八年颁布的《大诰》，其中有这样一条政策：今后，布政司、府、州、县在职的吏员，赋闲的吏员，以及城市、乡村中那些老奸巨猾的顽民，若胆敢操纵词讼、教唆犯罪、陷害他人、勾结官府、危害州里，允许当地的贤良方正将这些人抓起来，绑送京城。如有人胆敢中途阻拦，枭首示众！各处关津、渡口也不得阻挡。[14]

赋予百姓捉拿污吏的权力在当时可谓石破天惊。关于这一新政，朱元璋还有不少补充条款。譬如，他担心地方政府为阻止百姓抓污吏上京，故意扣押他们的“路引”（《大诰续编》有规定，百

姓不带路引出门，将被治以重罪），遂补充道：凡确实是进京上访或抓污吏上京的百姓，“虽无文引，同行人众，或三五十名，或百十名，至于三五百名”，各处关津查问清楚，必须放行，不得阻拦，否则一律杀头！[(15)]

需要注意的是，朱元璋只赋予了百姓捉拿污吏的权力。但对待贪官，他的政策仍然相当保守。在比较早的一篇《大诰·民陈有司贤否》中，朱元璋说：“如果官吏巧立名目，害民取财，允许当地德高望重之人联名赴京告状。同样，如果官吏们治理有方，也允许当地德高望重之人联名赴京奏报朕。且须集体上京，不许三五人、十余人单独上奏。”[(16)]此处，官员与胥吏被混为一谈，也还没有赋予百姓将他们捉拿入京的权力。

稍后，在那篇著名的《大诰·乡民除患》中，朱元璋第一次明确“发动群众”，同时也限定了百姓有权捉拿的对象：“布政司府州县在役之吏、在闲之吏，城市乡村老奸巨猾顽民。”[(17)]只有胥吏和顽民，官员并不包括在内。简言之，朱元璋发动群众告发的范围只限于污吏。对于贪官，群众是没有权力捉拿的，只能走传统路径告状。许多野史笔记及通俗历史读物未能注意到这一点，过分夸大了朱元璋的“群众反贪运动”。愤怒的百姓冲进官衙，把贪官抓起来绑送京城，这样的场景并不存在。在发动群众反贪官污吏的问题上，朱元璋是谨慎的——毕竟，官僚集团是他的统治基础。

在《大诰三编·民拿害民该吏》中，朱元璋说：“朕设立地方各级官员，本是为了治理百姓。然而朕任命的官员多是些不堪之徒，到任之后就与当地的吏员、皂隶、泼皮无赖一起残害良民。贪官污吏，若不惩处，民何以堪！”朱元璋号召当地“高年有德耆民及年壮豪杰者”来帮助自己治贪。但百姓的捉拿权仍被严格限定在污吏层面：“今后所在有司官吏，若将刑名以是为非、以非为是，被冤枉者告及四邻，旁入公门，将刑房该吏拿赴京来。若私下和买

诸物，不还价钱，将礼房该吏拿来。若赋役不均，差贫卖富，将户房该吏拿来。若举保人材，扰害于民，将吏房该吏拿来。若勾补逃军力士，卖放正身，拿解同姓名者，邻里众证明白，助被害之家将兵房该吏拿来。若造作科敛，若起解轮班人匠卖放，将工房该吏拿来。”(18)

明代衙门有“三班六房”。“三班”即负责缉捕罪犯、看守牢狱、站堂、行刑等工作的快、皂、壮三班；“六房”则是与国家六部相对应的吏、户、礼、兵、刑、工六房。三班设衙役，六房由胥吏负责。三班六房里的工作人员都不属于官员。

朱元璋说得很清楚，受贪官污吏欺压、盘剥的百姓可以“旁入公门”，从小门进去，把与自己的冤屈相对应的六房胥吏抓起来，拿送京城。至于官员，百姓是无权抓捕的。考虑到不许百姓抓官员，而官员与胥吏一体，难免阻碍百姓抓污吏，朱元璋在《大诰》里又说：如果官员阻止百姓抓污吏，我将族诛他们。

百姓无权动手抓贪官，只能进京递材料。同样，百姓也无权动手保清官，也只能进京递材料。朱元璋在《大诰》中说道：“地方上的官员是否廉洁，是否曾为百姓造福，当地百姓肯定知道。若有清官、好官遭恶人中伤、诬告、栽赃陷害，朝廷一时失察，朕允许当地百姓或百人，或五六十人，或上千人岁末一起到京城来找朕，向朕当面奏报。朕必做到嘉奖为善者、严惩为恶者。”(19)

朱元璋是个明白人。如果百姓可以随随便便冲入衙门，把正在办公的官员五花大绑扭送京城，他的帝国必会土崩瓦解。摧毁官僚体系之后，仅凭个人威信，他不可能治理得了这个庞大的农业帝国。这样史无前例且后果难以预料的事情，生性审慎、保守、厌恶风险的朱元璋不会去做。所以，洪武年间轰轰烈烈的“群众反贪运动”有了一条分明的界限：只许抓胥吏，不许抓官员。

与视官僚集团为统治基础不同，胥吏在朱元璋眼里是导致元朝灭亡的重要因素。在《大诰·胡元制治》里，他曾如此痛心疾首地鞭挞元朝的胥吏：蒙古人初主中原，与汉人风俗、语言各异，又不通文墨，所以凡事倚仗胥吏。但三十多年之后，元代上层早已粗通文墨，各地政务仍然把持在胥吏手里。自古以来贵臣僚而轻胥吏的传统竟然丧失殆尽！[20]

相比之下，朱元璋更认同汉、晋、唐、宋所采取的重官员、轻胥吏的统治方式：自周代开始，历经汉、晋、唐、宋，历代做官的贤人君子都秉承着孔、孟之道，亲自处理所有政务。所以他们视吏卒如同奴仆而已，善者则礼遇，不善者则罢黜。朱元璋希望重建视吏卒如奴仆的体制，却发现重胥吏而轻官员的风气已经根深蒂固，难以撼动：朕如今任命的官员，庸才众多，所以在政务上依然蹈袭元代的弊端，终日袖手高坐，一应事务任凭胥吏处置。像户部侍郎张易，凭儒学为官，朕让他掌管钱粮，收支居然全操纵在胥吏手中，他坐在办公室犹如死尸！朕询问他钱粮收支状况，竟茫然无知，四顾惶然！[21]

胥吏不把官员放在眼里的现象在明朝初年相当普遍。譬如，苏州常熟县胥吏沈尚、衢州开化县胥吏徐文亮曾把各自的上级，也就是当地的县官，按在政厅里拳打脚踢（注：这些胥吏的所作所为，史料依据是《大诰》中的记述，记述是否客观，鲜有其他材料可供对照）。为此朱元璋气得七窍生烟，恨铁不成钢地大骂：“那些胥吏统统该死，可你们做官的如此任人侮辱，难道都是饭桶？”[22]

殴打县官还算情节较轻的。苏州昆山县的皂隶朱升已经完全脱离本县县官的约束，纠结同伙，连钦差的旗军都敢当众殴打。朱元璋无可奈何地哀叹道：“胡元之治，天下风移俗变，九十三年矣。无志之徒，窃效而为之。虽朕竭语言，尽心力，终岁不能化也，呜

呼艰哉！”[23]这是朱元璋发起群众反贪，捉拿胥吏运动的主要动机。

以常理论，胥吏的势力，上不足以与朱元璋的皇权相比，下不足以抗衡群众运动的汪洋大海，整顿他们本该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情，事实却不然。朱元璋在《大诰三编》里详述过一个捉拿不法胥吏的案例，其过程之艰难曲折，简直到了匪夷所思的地步。

按朱的讲述，事情是这样的：

江苏省溧阳县的皂隶潘富“教唆官长贪赃枉法，自己挟势持权”。洪武十八年，山西人李皋到溧阳县做知县，一上任便和潘富等胥吏一起同谋害民，巧立名目，大肆敛财。李皋到任不到一个月，潘富就用搜刮来的钱财买了一名苏州女子送与他。可笑的是，这名女子安顿在潘富家中，李皋幽会过三五次之后，潘富竟将其纳为小妾，据为己有了。对此，李皋也无可奈何。在潘富等胥吏的教唆下，李皋下令科敛荆杖，所有溧阳县的百姓都要向官府缴纳一根荆杖。百姓把荆杖送来，潘富又借口质量不好，拒绝收纳，甚至拳打脚踢，逼迫百姓把荆杖折换成银钱交上来。当地百姓黄鲁到京城告御状——此案涉及知县，百姓没有自发捉拿的权力，只能上访。朱元璋下旨严查，派人去捉拿潘富。潘富上演千里大逃亡，竟处处有人愿意庇护他。

先是溧阳本地的儒生蒋士鲁等十三家人秘密把潘富递送到邻近的安徽省广德县。不久，潘富流窜到安徽省建平县（今安徽省郎溪县），缉捕的差役跟踪到建平，当地百姓王海三又悄悄将他递送回了溧阳。接着，溧阳百姓朱子荣将他暗中递送到江苏省宜兴县，宜兴百姓杭思鼎将他递送到安吉县，安吉县百姓潘海将他私递到浙江省长庆县，长庆县百姓钱弘真将他递送到浙江省归安县，归安县百姓吴清浦等人将他秘密送至浙江省德清县。追捕的差役赶到德清

县，当地百姓赵罕仁已将他秘密送到了浙江省崇德县。崇德县的豪民赵真胜奴家财万贯，平日蓄养许多无业游民，做贩卖私盐的勾当，来往的朋党多达数百人，潘富即藏匿在赵真胜奴家中。缉捕的衙役随后赶来，赵真胜奴将潘富暗中送到浙江省千乘乡（今桐乡市）的一座寺庙里。庙里的和尚纠集两百余人，反将缉捕潘富的差役团团包围，杀伤多人……

此事越闹越大，潘富难以缉捕的问题被上报至朱元璋面前。朱元璋下令，将赵真及其同伙两百余户人家的家产全部抄没，凡参与围攻差役者，一律诛戮；沿途藏匿潘富、助其逃跑的一百零七户人家全部枭首示众，家产一同抄没![24]

一个小小的胥吏竟能够上演一场如此大规模的逃亡，先后历经九县，涉及三百多户人家，因其而死者近千人。以胥吏的身份而能够在九县纵横自如，死党无数，众多人为保护他不惜与皇权对立，潘富巨大的能量不能不让朱元璋触目惊心，也让他更深刻地体会到了元代之“宽”所造就的重胥吏、轻官员的现象对皇权造成的巨大威胁。朱元璋三番五次强调元代因此而亡，不是危言耸听。

如此也就不难理解，在治理胥吏的问题上，朱元璋为什么会选择前无古人的“群众运动”。在朱眼中，经过元朝的宽纵，其统治以胥吏为核心，相当一部分的底层百姓已经结成了利益共同体，成了有组织之人，势力大到可与地方官府分庭抗礼。不管这些组织有没有害民之举（这里再强调一下，以上种种关于胥吏及其友人的不法描述皆来自《大诰》，限于资料，今人已很难廓清这些胥吏具体的所作所为，也很难判断《大诰》记述的害民行为是否属实），朱元璋皆不会允许他们继续存在。

三、以“猛”治民

在《大诰·乡饮酒礼》里，朱元璋曾下令恢复废弃已久的“乡饮酒礼”。

乡饮酒礼的活动形式上类似于集体聚餐，目的在于弘扬孝敬父母、兄弟相亲、邻里和睦、朋友有信、长幼有序等儒家传统伦理道德。恢复这一活动的初衷，朱元璋说得很明白：“朕本不才，不过申明古先哲王教令而已。”

古老的乡饮酒礼在两宋即已沦为形式，在元代则几近消失，但朱元璋是真心想要恢复。他下诏说：乡饮座席必须按照年龄和德行来排列，良贱分开成席，犯过罪和德行有亏的人不许入良善之席。如果混淆贵贱，主会者治以重罪，乱席者全家流放边疆！最后，朱元璋告诫百姓，他不是说着玩的，“从者昌，否者亡”。[(25)]

为了加强对百姓的控制，朱元璋深入干涉百姓的日常生活，力求将之变成一盘散沙。

在《大诰续编·互知丁业》里，朱元璋第一次命令百姓“互相知丁”。他要求，自这一规定颁布之日起，市井、村镇中的老百姓对自己的邻居一定要做到“互知业务”，也就是要知道他们平日里从事何种职业，还要知道邻居家里有几口人、几个人从事农业、几个人读书、几个人从事手工业或商业；对于读书的邻居，一定要知道他的老师是谁，在哪里上学；给别人做老师的，也必须知道他教的学生是谁。

邻里之间彼此知道得这么清楚，目的是什么呢？

朱元璋解释说，按照圣贤的分类，百姓可以从事士农工商四种生计。在圣人的教导下，百姓谨守四业，所以天下太平。不在四业范围之内谋生的人没有不违法犯罪的。“知丁法”不是朕自创的，“朕本无才，申先王之教，与民约告”，不过是重申先王的遗教。

实施知丁法的目的就是为了抓出那些不务四业的害群之马——那些游手好闲的“逸夫”罗织词讼，勾结胥吏，危害官府，实在是社会的毒瘤。知丁法推广后，百姓把自己了解的邻里情况上报里甲，里甲再把情况报告县衙，如此一级一级备案，逸夫就无处遁形了。

最后，朱元璋还严厉警告道：“里甲坐视，邻里亲戚不拿，其逸夫者，或于公门中，或在市闾里，有犯非为，捕获到官，逸民处死，里甲四邻，化外之迁。”如果《大诰》颁布下去，一里之间、百户之内还有逸夫，里甲坐视不管，邻里、亲戚不抓，任凭逸夫游荡在公门、市井之中为非作歹，被官府抓住，逸夫处死，里甲和四邻全家流放边疆! [26]

对于不同职业的百姓，朱元璋还有更具体的规定。

如果你是农民，没有特别申请的“路引”，每日不得离开自家方圆一里。早上何时出门耕作，晚上何时回来，都须让邻居知晓。

如果你是工匠，出远门做工，须在“路引”上标明目的地。在本地做工，要让邻居知道你的具体所在。归来或早或迟，也要说与邻居知道。

经商者，本钱有多有少，货物有轻有重，出行有远有近，走水路还是走陆路，都要详细注明在“路引”中。归来的大致期限，邻里务必知晓。若一年没有消息，两年未曾归来，邻里必须去其家中调查原因。如此，对方借经商之名在外胡作非为，邻里才不必承担连带责任。

最后，朱元璋对全国百姓表达了他的美好憧憬：若百姓都遵守朕申明的先王之教，我们的国家会非常美好。[27]

对于知丁法，朱元璋有着十二分的重视，在《大诰续编》里用了许多条款来不断重申。在《辨验丁引》里，他补充说，百姓、官员在“验丁”的时候，不但要验看其所从事的职业是否与“路引”相符合，还要注意这个职业是不是他的主要生活来源；如果不是，肯定另有不轨图谋，应抓起来细细盘问。[(28)]

在《验商引物》里，他又补充：如果商人的“路引”虽未过期，但身边未带任何货物，里甲、村店必须将其当作逸夫、游食者捉拿送官，重则杀身，轻则流放边疆。若里甲、店主不抓，而被其他人抓住，里甲、店主与逸夫同罪。[(29)]

在《再明游食》里，朱元璋给逸夫、游食者留下了一个月的改过自新时间。期限结束后，仍然不在四业之中讨生活的，四邻、里甲有义务将其抓起来送官。如果不抓，这些人必然为害乡里，一旦案发，四邻、里甲与之同罪。[(30)]

朱元璋还不止一次严厉申明，不许各地衙门招收市井之人充当吏卒，理由是市井之人没有田产，不知道耕作的艰辛。朱元璋说，他们毒如蝮蛇，“设若官府差为吏卒，其害民之心那有餍足”。各衙门胆敢用市井之人做胥吏，治以死罪! [(31)]

以上对百姓日常生活的种种干涉无疑是反人性的。严格执行知丁法必然会出现一个互相监视、遍地特务、极其缺乏活力的死气沉沉的社会。但朱元璋喜欢死气沉沉，秦制帝国奉行外儒内法，本就一贯崇奉以损害社会的活力为代价来维护稳定。朱元璋不会忘记，有组织的流民如何摧枯拉朽般推翻了元帝国。朱元璋曾如此描述自己心目中的理想国：“朕初命官牧民，务在先王之教敷，使民复古，日出而作，日入而息，鼓腹而歌曰：无官逼之忧，无盗厄之苦，是以作息自然。朕尝慕此。”[(32)]

他的理想国是静态的。

知丁法恶的本质很快就凸显了出来。洪武十九年，福建沙田县的几个农民以一个叫罗辅的人为首，一共十三个人，穷则思变，想合作干点别的营生，聚在一起商量道："如今朝廷的法律好厉害，我等不务农恐怕会获罪。不如大家一起切掉几根手指，如此变成残废，不务农就没罪了。"众人齐声说好。结果被人告发到京城，朱元璋下令将这几个人"押回原籍，枭令于市，阖家成丁诛之，妇女迁于化外"。末了，朱元璋痛心疾首道：你们不遵教化，自残父母赐给的身体，是不孝；诽谤朝廷法度严苛，是不忠。将你等不忠不孝之人全家诛杀，朕也实在迫不得已! [(33)]

知丁法的本意是鼓励良民告发邻居中的"害群之马"，结果成了勒在良民脖子上的绞索。朱元璋在《大诰三编》里讲过几个让他深感无奈的案例。

浙江安吉县佃户金方租种了本县地主潘俊二的一亩二分地，连续两年没有交田租。潘俊二到金方家里去索讨，金方"响应"朱元璋的号召，把潘俊二当作祸害百姓的豪强绑了起来，还勒索他黄牛一头、肥猪一口。在逼着潘俊二写完已经收取田租、不曾遭勒索等三张文书之后，金方大摇大摆将其绑到了京城。[(34)]

浙江乌程县百姓余仁三是本县富户游茂玉家的佃户。水灾期间，游茂玉同情余仁三生活困顿，借给他许多米粮。事后，余仁三非但不想着还粮，反而勾结刁民一百余人跑到游茂玉家里打砸抢。在搜出所有的借据之后，余仁三等人将游茂玉当作害民豪强捆绑起来，押送到了京城。[(35)]

金方和余仁三的运气不太好，"英明"的朱元璋识破了他们的诡计，让他们落了个枭首示众、全家流放的下场。但朱元璋的"英

明”不及之处，还有更多的金方和余仁三在活跃，是可以想见的。

知丁法和发动群众抓污吏两项政策结合之后，事情往往会朝更变态的方向发展。

在《大诰三编》里，朱元璋讲了这样一个离奇故事：江苏嘉定县百姓沈显二和自己的邻居周官二一起把祸害本地百姓的里长顾匡捆绑起来，准备送往京城。走到苏州阊门，当地德高望重的老人曹贵五出来给他们讲和，沈显二收下15贯银钞、一匹绸缎和一些银钗、银镯，当场把顾匡给放了。顾匡回家之后，思前想后，胆战心惊，觉得在一个彼此监视、满地密探的社会，事情终究还是会败露，于是决定化被动为主动，去京城自首，他觉得这样也许可以逃过一死。曹贵五得到这个消息，心中思量“我是劝和人，必然也会受连累”，决定与顾匡一同去自首。周官二随后得到消息，也表示愿意同行。四人当中，沈显二最后得知消息，听说三人已经出发，他星夜追赶，终于在淳化镇赶上。沈显二提出一同去自首，顾、周、曹三人却设计将他绑了起来。原来这三人凑在一起，决定把沈显二当作“害民豪强”押往京城。

事情还没完。四个人进了京城，在押解“害民豪强”的报告刚刚递送上去的节骨眼，沈显二跑掉了。主管告状事务的通政司让他们把“害民豪强”押到衙门里去受审，周、曹二人私下计议，无奈之下，只得又将里长顾匡绑了起来。通政司接到的报告里，顾匡是良民，现在却跪在堂下，成了“害民豪强”。所以官员审问周、曹二人：“顾匡是和你们一起抓沈显二的人，你们怎么又把他抓起来了？”周官二只好如实回答：“顾匡本来是我们开始捉拿的人，沈显二受贿把他放了。我等害怕事情败露，一同赴京自首。没想到沈显二追了上来，我等遂将他当作骗人财物的奸民捆绑了来，把之前的事情隐瞒掉了。如今沈显二跑掉了，我们只好又把顾匡绑了

来。”[(36)]朱元璋说，这几个人说话一会儿一套，实在奸诈，谁也捉摸不透他们心里的诡计，全部“枭首示众，籍没其家”。

方孝标《钝斋文选》里记载有一个故事，颇能反映朱元璋的治国之道：“浦江郑氏九世同居，明太祖常称之。马皇后从旁惎之曰：以此众叛，何事不成？上惧然，因招其家长至，将以事诛之。”[(37)]虽然浦江郑氏最后没有被诛，但朱元璋的“惧然”已经很能说明问题。“九世同居”意味着浦江郑氏家族是组织化的，他们不是以脆弱的个体直面皇权，而是构成了一个团体，有了组织，他们的意志可以转化为实际的力量。

浦江郑氏险些遭到诛杀的命运不过是洪武朝的一个小案例——仅一桩郭桓案，朱元璋就实现了“民中豪以上皆破家”的效果。在《大诰三编》中，朱元璋还亲笔写下过这样一段话：

> 《大诰》一出，邻里亲戚有所畏罹，其苏、松、嘉、湖、浙东、江东、江西，有父母亲送子至官者，有妻舅、母舅、伯、叔、兄、弟送至京者多矣……其有亲戚影射，四邻擒获到官者，本人枭令，田产入官，人口发往化外，如此者多矣。[(38)]

亲戚邻居互相告发、父母扭送子女上法场之事“多矣”。这是朱元璋自己描述的洪武时代。

四、以“猛”治《孟子》

朱元璋的“猛”还表现在他敢于开创先河，公然删节《孟子》。

删节的原因是朱元璋读《孟子》，“怪其对君不逊，怒曰：使此老在今日，宁得免耶”[(39)]。民国时期学者容肇祖依据当时国立

北平图书馆所藏洪武二十七年（1394年）刻本《孟子节文》，与《孟子》足本比对，梳理了朱元璋到底删掉了哪些内容。具体如下(40)：

1．“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这是孟子在阐述自己的价值序列，百姓与社稷排在君王前面。）

2．“诸侯之宝三：土地，人民，政事。宝珠玉者，殃必及身。”（这是在责备诸侯贪求财富。）

3．“左右皆曰贤，未可也；诸大夫皆曰贤，未可也；国人皆曰贤，然后察之；见贤焉，然后用之。左右皆曰不可，勿听；诸大夫皆曰不可，勿听；国人皆曰不可，然后察之；见不可焉，然后去之。左右皆曰可杀，勿听；诸大夫皆曰可杀，勿听；国人皆曰可杀，然后察之；见可杀焉，然后杀之。故曰，国人杀之也。如此，然后可以为民父母。”（这是提出君王行使人事权的标准。）

4．“桀纣之失天下也，失其民也；失其民者，失其心也。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矣；得其民有道：得其心，斯得民矣；得其心有道：所欲与之聚之，所恶勿施尔也。民之归仁也，犹水之就下、兽之走圹也。”（这是在告诫君王要行仁政，否则会失去天下。）

5．“《太誓》曰：‘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此之谓也。”（这是在要求君王将自己置于天命和民心的监督之下。）

6．“天与贤，则与贤；天与子，则与子。昔者舜荐禹于天，十有七年，舜崩。三年之丧毕，禹避舜之子于阳城。天下之民从之，若尧崩之后，不从尧之子而从舜也。”（这是孟子在表达对“家天下”的不以为然。）

7．“吾今而后知杀人亲之重也：杀人之父，人亦杀其父；杀人之兄，人亦杀其兄。然则非自杀之也，一间耳。”（这是孟子在警告执掌生杀大权的嗜杀者：你杀了别人的父兄，别人也会杀了你的父兄，相当于自己杀了自己的父兄。）

8．“君之视臣如手足，则臣视君如腹心；君之视臣如犬马，则臣视君如国人；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雠。”（这是孟子在否定臣必须绝对效忠于君，他认为君臣关系是对等的。）

9．“邹与鲁哄。穆公问曰：‘吾有司死者三十三人，而民莫之死也。诛之，则不可胜诛；不诛，则疾视其长上之死而不救，如之何则可也？’孟子对曰：‘凶年饥岁，君之民老弱转乎沟壑，壮者散而之四方者，几千人矣；而君之仓廪实，府库充，有司莫以告，是上慢而残下也。曾子曰：“戒之戒之! 出乎尔者，反乎尔者也。”夫民今而后得反之也。君无尤焉。君行仁政，斯民亲其上、死其长矣。’”（这是孟子在否定百姓有为君王而死的义务，强调君王须行仁政，才能得到百姓拥护。）

10．“古之人与民偕乐，故能乐也。汤誓曰：‘时日害（曷）丧，予及女（汝）偕亡。’民欲与之偕亡，虽有台池鸟兽，岂能独乐哉？”（这是孟子在谴责君王贪婪残暴。）

11．“贼仁者谓之贼，贼义者谓之残，残贼之人谓之一夫。闻诛一夫纣矣，未闻弑君也。”（这是孟子主张杀不仁不义之君不算弑君。）

12．“暴其民甚，则身弑国亡；不甚，则身危国削。名之曰‘幽厉’，虽孝子慈孙，百世不能改也。《诗》云‘殷鉴不远，在夏后之世’，此之谓也。”（这是孟子在谈针对君王的历史评

价。暴君死后被评为“幽”和“厉”，他们的后代子孙虽为君王，也不能更改“幽”和“厉”的评价。）

13．“君有大过则谏，反覆之而不听，则易位。”（孟子说：君王有大过而不改，可以废掉。）

14．“无罪而杀士，则大夫可以去；无罪而戮民，则士可以徙。”（孟子说，君王残暴，滥杀士民，士民可以抛弃君王。）

15．“无恒产而有恒心者，惟士为能。若民，则无恒产，因无恒心。苟无恒心，放辟邪侈，无不为已。及陷于罪，然后从而刑之是罔 民也。焉有仁人在位罔 民而可为也？是故明君制民之产，必使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乐岁终身饱，凶年免于死亡。然后驱而之善，故民之从之也轻。今也制民之产，仰不足以事父母，俯不足以畜妻子；乐岁终身苦，凶年不免于死亡。此惟救死而恐不赡，奚暇治礼义哉？王欲行之则盍反其本矣？五亩之宅，树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 矣。鸡豚狗彘之畜，无失其时，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亩之田，勿夺其时，八口之家可以无饥矣。谨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义，颁白者不负戴于道路矣。老者衣帛 食肉，黎民不饥不寒，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孟子说，君王有义务让百姓有“恒产”，过上好生活，否则百姓不必对君王有“恒心”。）

16．“庖有肥肉，厩有肥马，民有饥色，野有饿莩，此率兽而食人也。兽相食，且人恶之。为民父母，行政不免于率兽而食人。恶在其为民父母也？仲尼曰：‘始作俑者，其无后乎! ’为其象人而用之也。如之何其使斯民饥而死也？”（孟子说：君王岂 可自己奢靡无度，而让百姓饥寒交迫？）

17．“不信仁贤，则国空虚；无礼义，则上下乱；无政事，则财用不足。”（孟子说，君王治国，必须讲求仁义，关心政事。）

18．“不仁而得国者，有之矣；不仁而得天下者，未之有也。”（孟子说，君王不讲求仁，也许可以夺取国家，但不讲求仁，永远得不到天下。）

19．“恭者不侮人，俭者不夺人。侮夺人之君，惟恐不顺焉，恶得为恭俭？恭俭岂 可以声音笑貌为哉？”（孟子说，君王必须要懂得什么才是真正的恭俭，不要搞形式主义，不要做两面人。）

20．“伯夷，目不视恶色，耳不听恶声。非其君不事，非其民不使。治则进，乱则退。横政之所出，横民之所止，不忍居也。思与乡人处，如以朝衣朝冠坐于涂炭也。当纣之时，居北海之滨，以待天下之清也。故闻伯夷之风者，顽夫廉，懦夫有立志。”（孟子说，伯夷见天下无道，拒绝为君王所用，是值得学习的好榜样。）

21．“有布缕之征，粟米之征，力役之征。君子用其一，缓其二。用其二而民有殍，用其三而父子离。”（孟子说，当政者不可以剥削无度，不可以无节制地汲取人力、物力。）

22．“古之为关也，将以御暴；今之为关也，将以为暴。”（孟子说，古人设立关卡征税，是为了替百姓抵御强暴；今人设立关卡征税，是为了对百姓施暴。）

23．“争地以战，杀人盈野；争城以战，杀人盈城。此所谓率土地而食人肉，罪不容于死。故善战者服上刑，连诸侯者次之，辟草莱、任土地者次之。”（孟子说，为了土地和城池而发动战争，罪大恶极，死刑也不足以抵消这种罪恶。）

24．“有人曰：‘我善为陈（阵），我善为战。’大罪也。国君好仁，天下无敌焉。”（孟子说，国君应该仁爱，爱好战争是大罪。）

25．“孟子曰：‘不仁哉，梁惠王也! 仁者以其所爱及其所不爱，不仁者以其所不爱及其所爱。’公孙丑曰：‘何谓也？’‘梁惠王以土地之故，糜烂其民而战之，大败，将复之，恐不能胜，故驱其所爱子弟以殉之，是之谓以其所不爱及其所爱也。’”（孟子说，梁惠王为了土地而驱赶百姓发动战争，可谓“不仁”。）

26．“今夫天下之人牧，未有不嗜杀人者也。如有不嗜杀人者，则天下之民皆引领而望之矣。诚如是也，民归之，由水之就下，沛然谁能御之？”（孟子说，天下人都在期盼一个不嗜好杀人的君王。）

27．“鲁欲使慎子为将军。孟子曰：‘不教民而用之，谓之殃民。殃民者，不容于尧舜之世。一战胜齐，遂有南阳，然且不可。’”（孟子说，不训练百姓，就驱赶他们去打仗，这是在残害百姓，在尧舜时代是不能容忍的。）

28．“今之事君者曰：‘我能为君辟土地，充府库。’今之所谓良臣，古之所谓民贼也。君不乡（向）道，不志于仁，而求富之，是富桀也。‘我能为君约与国，战必克。’今之所谓良臣，古之所谓民贼也。君不乡（向）道，不志于仁，而求为之强战，是辅桀也。由今之道，无变今之俗，虽与之天下，不能一朝居也。”（孟子说，那些自称能为君王开辟疆土、充实国库的能臣，在古代就是民贼。君王不讲求仁，而寻求府库充盈，等于桀纣。）

29．“是以惟仁者宜在高位。不仁而在高位，是播其恶于众也。上无道揆也，下无法守也。朝不信道，工不信度，君子犯义，小人犯刑，国之所存者幸也。”（孟子说，不讲求仁的人做了君王，等于将恶散播到众人之中，国家若不灭亡，算是侥幸。）

30．“民之为道也，有恒产者有恒心，无恒产者无恒心。苟无恒心，放辟邪侈，无不为已。及陷乎罪，然后从而刑之，是罔民也。焉有仁人在位，罔民而可为也？是故贤君必恭俭礼下，取于民有制。阳虎曰：‘为富不仁矣，为仁不富矣。’夏后氏五十而贡，殷人七十而助，周人百亩而彻，其实皆什一也……‘乐岁，粒米狼戾，多取之而不为虐，则寡取之；凶年，粪其田而不足，则必取盈焉。为民父母，使民盻盻然，将终岁勤动，不得以养其父母，又称贷而益之。使老稚转乎沟壑，恶在其为民父母也？’夫世禄，滕固行之矣……‘夫仁政，必自经界始。经界不正，井地不钧，谷禄不平。是故暴君污吏必慢其经界。经界既正，分田制禄可坐而定也。’”（孟子说，百姓有“恒产”才会有恒心，没有“恒产”就没有恒心，就可能走上犯罪之路。犯了罪，君王再对他们施以刑罚，等于设下罗网陷害百姓。百姓一年到头劳碌不休，仍没有办法赡养父母，还要靠借贷来交税，这样的君王岂可“为民父母”？）

31．“且王者之不作，未有疏于此时者也；民之憔悴于虐政，未有甚于此时者也。饥者易为食，渴者易为饮……当今之时，万乘之国行仁政，民之悦之，犹解倒悬也。故事半古之人，功必倍之，惟此时为然。”（孟子说，君王不行仁政，没有一个时代比现在更常见；百姓被苛政虐待，没有一个时代比现在更严重。）

32．“得百里之地而君之，皆能以朝诸侯有天下；行一不义、杀一不辜而得天下，皆不为也。”（孟子说，要真正的君王只去行一件不义之事，只去杀一个无辜之人，就可以换取天下，他们也不会去做。）

33．“若杀其父兄，系累其子弟，毁其宗庙，迁其重器，如之何其可也？天下固畏齐之强也。今又倍地而不行仁政，是动天下之兵也。”（孟子说，对外开辟疆土，对内不行仁政，会引来天下之兵，等于是与天下为敌。）

34．“其君子实玄黄于匪以迎其君子，其小人箪食壶浆以迎其小人，救民于水火之中，取其残而已矣……苟行王政，四海之内皆举首而望之，欲以为君。齐楚虽大，何畏焉？”（孟子说，周王东征，被讨伐国家的官吏带着绸布、百姓带着饭食来迎接周的军队。要救那些地方的百姓于水火，就得推翻那残暴的君王。）

35．“君仁莫不仁，君义莫不义，君正莫不正。一正君而国定矣。”（孟子说，君王讲求仁，天下风俗就会有仁，君王讲求义，天下风俗就会有义。）

36．“孔子曰：‘仁不可为众也。夫国君好仁，天下无敌。’今也欲无敌于天下而不以仁，是犹执热而不以濯也。”（孟子说，君王想天下无敌却不愿讲求仁，好比热得要死却不肯去冲凉。）

37．“人有恒言，皆曰‘天下国家’。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孟子说，百姓才是天下与国家的基石。）

38．“夫人必自侮，然后人侮之；家必自毁，而后人毁之；国必自伐，而后人伐之。”（孟子说，自己先干了要被讨伐的坏事，才会有人来讨伐。）

39．“仁则荣，不仁则辱；今恶辱而居不仁，是犹恶湿而居下也。如恶之，莫如贵德而尊士，贤者在位，能者在职。国家闲暇，及是时明其政刑。虽大国，必畏之矣。《诗》云：‘迨天之未阴雨，彻彼桑土，绸缪牖户。今此下民，或敢侮予？’”（孟子说，仁应该受赞誉，不仁应该被鄙视。君王讨厌被鄙视，却尽干不仁之事，这就好比厌恶潮湿，却还是选择住在低洼的地方。）

40．“齐人有一妻一妾而处室者，其良人出，则必餍酒肉而后反。其妻问所与饮食者，则尽富贵也……由君子观之，则人之所以

求富贵利达者，其妻妾不羞也，而不相泣者，几希矣。”（孟子讲了一个寓言故事：有个齐国人经常外出，向“祭者”讨残羹吃，回家再骗自己的妻妾，说在外面与达官显贵聚餐。后被他的妻子跟踪，发现了真相。）

以上所列40条被删除的内容全部引自容肇祖1947年发表的文章《明太祖的〈 孟子节文〉 》。被删除的内容后括号中的简略解读是笔者所加。容肇祖将被删除的内容归纳为十一项：1．不许说人民有尊贵的地位和权利；2．不许说人民有可以报复暴君的权利；3．不许说人民有革命和反抗暴君的权利；4．不许说人民有生存的权利；5．不许说统治者的坏话；6．不许说反对征兵的话；7．不许说反对捐税的话；8．不许说反对内战的话；9．不许说政治黑暗；10．不许说行仁政、救人民；11．不许说君主要善良，若风俗败坏，君主要承担责任。

不过，容肇祖列举出的内容并不是朱元璋下令删除的全部的《孟子》的内容。负责替朱元璋删《孟子》的刘三吾在《孟子节文题辞》中说：“《孟子》一书，中间辞气之间，抑扬太过者八十五条。其余一百七十余条，悉颁之中外校官。”也就是说，他们共计删除了85条，留下了170余条，相当于删掉了全书三分之一的条目，文字量约占全书的一半。被删除的85条，“课士不以命题，科举不以取士”，即考试不许拿来出题，科举不许拿来取士。(41)

值得一提的是，朱元璋以“猛”治《孟子》的时候，曾有三位读书人公开站出来反对。

第一位叫作钱唐。洪武二年（1369年），朱元璋读到《孟子》中“君之视臣如手足，则臣视君如腹心；君之视臣如犬马，则臣视君如国人；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雠”一段，勃然大怒，认为这样的话“非臣子所宜言”，下诏将孟子的牌位撤出孔庙，不

再配享，并恐吓群臣“有谏者以大不敬论”，即有敢劝阻朕的，以“大不敬”论处。时任刑部尚书的钱唐冒死直谏，自称：“臣为孟轲死，死有余荣。”[(42)]

以上是《明史》的记载。关于此事，民间史志留下了更多细节。《三迁志》（约嘉靖年间成书）里说：朱元璋当日盛怒，“有谏者以不敬论，且命金吾射之”，谁敢进谏，就让卫士拿箭将其当场射死。钱唐进谏，“舆榇自随，袒胸受箭”，让人抬着棺材，袒露胸膛，不惧让箭射死。[(43)]

“罢配享”是朱元璋称帝后第一次针对孟子。可能是考虑到王朝初建，不宜过分激烈，害怕失去天下人心，在钱唐冒死抗议后，“罢配享”一事不了了之。

第二位反对者是游义生。洪武二十七年（1394年），朱元璋命令刘三吾等人删节《孟子》。当时的明朝经过多次整肃，士林一片沉寂。次年，《孟子节文》完成，下发给全国各州县，供学子使用，遂有时任御史的游义生站出来带头反对，史称“义生与同谏十余人言辞愤切，触上怒，系狱”。众人触怒了朱元璋，全部被投入狱中。[(44)]稍后，游即死于狱中（有材料说他是吞金自杀），时年27岁。[(45)]

第三位反对者叫作孙芝。孙芝与游义生是同乡兼同学，洪武二十八年（1395年）进入太学，恰见游义生反对删节《孟子》之举。游义生入狱后，孙芝提了饭菜，前往击登闻鼓，“愿进一饭尽友谊”。因游在狱中突然死亡，未果。朱元璋死后，永乐九年（1411年），朱元璋的儿子朱棣在位，孙芝起复为官，遂上奏请求恢复《孟子》全本，废除《孟子节文》。

孙芝这么做风险极大，毕竟《孟子节文》是朱元璋钦定的东西，永乐七年（1409年）尚有徐善述等人因未从《孟子节文》中出关于《孟子》的科举试题而下狱，罪名是“偏题”。但他的奏请得到了朱棣的认可，这与朱棣得位不正，强烈希望通过宣传“仁政”来宣示其皇位的合法性有非常直接的关系。至此，在明帝国大小学校使用了17年之久的《孟子节文》被扫入了历史的垃圾堆。[46]

钱唐、游义生与孙芝的存在让万马齐喑的朱元璋时代多少还留存着些许亮色。遗憾的是，为了掩饰朱元璋的劣迹，永乐年间重修的《明太祖实录》，删除了与《孟子节文》有关的记载。游义生和孙芝的事迹也不存于正史，仅见于民间史志。

---

(1) 《诚意伯刘文成公文集》卷一《御书·皇帝手书》，《四部丛刊》本。

(2) 班布尔汗：《元朝控制力不足，民间商业文化发达》，腾讯网《短史记》栏目2018年11月5日。

(3) 刘基：《乙卯岁首早朝奉天殿柬翰林大本堂诸友》，见刘基著，林家骊点校：《刘基集》，浙江古籍出版社1999年版，第487页。

(4) 杨讷：《刘基事迹考》，上海古籍出版社2017年版，第214页。

(5) 谢贵安：《试析〈明实录〉对刘基形象的记述与塑造》，《明史研究》2012年第1期。

(6) 刘基：《送宋仲珩还金华序》，见《刘基集·附录·刘基年表》，浙江古籍出版社1999年版，第654页。

(7) 朱元璋：《御赐归老青田诏书》，见刘基：《诚意伯刘文成公文集》卷一，《四部丛刊》本。

(8) 刘基：《刘基集·附录·刘基年表》，浙江古籍出版社1999年版，第654—655页。

(9) 刘基原文：“仲尼曰：‘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谓之以礼，则不可为私也；谓之以忠，则不以趋走承顺为恭，而以责难陈善为敬也。”见刘基：《刘基集》，浙江古籍出版社1999年版，第596页。

(10) 金邦一：《刘基〈二鬼〉诗中的心态及艺术成就》，《明史研究》2012年第1期。

(11) 刘基：《郁离子·术使》，天津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135页。

(12) 《大诰三编·秀才剁指》，见杨一凡：《明大诰研究》，江苏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385—386页。

(13) 《大诰三编·如诰擒恶受赏》，见杨一凡：《明大诰研究》，江苏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272—273页。

(14) 《御制大诰·乡民除患》载原文："今后布政司府州县在役之吏、在闲之吏、城市乡村老奸巨猾顽民，专一起灭词讼，教唆陷人，通同官吏害及州里之间者，许城市乡村贤良方正、豪杰之士，有能为民除患者，会议城市乡村，将老奸巨猾及在役之吏、在闲之吏，绑缚起京，罪除民患，以安良民。"杨一凡：《明大诰研究》，江苏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239—240页。

(15) 《御制大诰：耆民奏有司善恶》，见杨一凡：《明大诰研究》，江苏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230—231页。

(16) 《御制大诰·民陈有司贤否》载原文："自布政司至于府州县官吏，若非朝廷号令，私下巧立名色，害民取财，许境内耆宿人等，编处乡村市井联名赴京状奏，备陈有司不才，明指实迹，以凭议罪，更贤育民。及所在布政司府州县官吏，有能清廉直干，抚吾民有方，使各得遂其生者，许境内耆宿老人，遍处乡村市井，士君子人等，连名赴京状奏，使朕知贤。凡奏是奏非，不许三五人，十余人奏。"杨一凡：《明大诰研究》，江苏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225—226页。

(17) 《御制大诰·乡民除患》，见杨一凡：《明大诰研究》，江苏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239—240页。

(18) 《大诰三编·民拿害民该吏》，见杨一凡：《明大诰研究》，江苏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408—409页。

(19) 《御制大诰·耆民奏有司善恶》载原文："今后所在布政司府州县，若有廉能官吏，切切为民造福者，所在人民，必深知其详。若被不才官吏同僚人等，捏词排陷，一时不能明其公心，远在数千里，情不能上达，许本处城市乡村耆宿赴京面奏，以凭保全。自今以后，若欲尽除民间祸患，无若乡间年高有德等，或百人，或五六十人，或三五百人，或千余人，岁终议赴京师面奏，本境为民患者几人，造民福者几人。朕必凭其奏，善者旌之，恶者移之，甚者罪之。"杨一凡：《明大诰研究》，江苏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230—231页。

(20)　《御制大诰·胡元制治》载原文："胡元入主中国，非我族类，风俗且异，语意不通，遍任九域之中，尽皆掌判。人事不通，文墨不解，凡诸事务，以吏为源，文书到案，以刊印代押。于诸事务，忽略而已，此胡元初始为。三十年后，风俗虽异，语言文墨且通，为官任事者，略不究心，施行事务，仍由吏谋。"杨一凡：《明大诰研究》，江苏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205页。

(21)　《御制大诰·胡元制治》载原文："比前历代贤臣，视吏卒如奴仆，待首领官若参谋，远矣哉。朕今所任之人，不才者众，往往蹈袭胡元之弊。临政之时，袖手高坐，谋由吏出，并不周知。纵是文章之士，不异胡人。如户部侍郎张易，进以儒业，授掌钱谷。凡诸行移，谋出吏已，于公廨袖手若尸。入奏钱粮，概知矣，朕询明白，茫然无知，惟四顾而已。"杨一凡：《明大诰研究》，江苏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205页。

(22)　《御制大诰·吏殴官长》载胥吏殴打县官一事："所以苏州常熟吏人沈尚等，衢州开化吏人徐文亮等，眇视二县官长邓源、汤寿轻等，于厅殴打，罪虽吏当，官何人也？"杨一凡：《明大诰研究》，江苏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212页。

(23)　《御制大诰·胡元制治》，见杨一凡：《明大诰研究》，江苏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205页。

(24)　《大诰三编·递送潘富》，见杨一凡：《明大诰研究》，江苏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394—396页。

(25)　《御制大诰·乡饮酒礼》载原文："其坐席间，高年有德者居于上，高年淳笃者并之，以次序齿而列，其有曾违条犯法之人列于外坐，同类者成席，不许干于善良之席。主者若不分别，致使贵贱混淆，察知或坐中人发觉，主者罪以违制。奸顽不由其主，紊乱主席，全家移出化外。"杨一凡：《明大诰研究》，江苏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239页。

(26)　《大诰续编·互知丁业》，见杨一凡：《明大诰研究》，江苏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264—266页。

(27)　《大诰续编·互知丁业》，见杨一凡：《明大诰研究》，江苏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264—266页。

(28)　《大诰续编·辨验丁引》，见杨一凡：《明大诰研究》，江苏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266页。

(29)　《大诰续编·验商引物》，见杨一凡：《明大诰研究》，江苏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266页。

(30)　《大诰续编·再明游食》，见杨一凡：《明大诰研究》，江苏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266—267页。

(31) 《大诰续编・市民不许为吏卒》，见杨一凡：《明大诰研究》，江苏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327—328页。

(32) 《大诰续编・科敛驴匹》，见杨一凡：《明大诰研究》，江苏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313—314页。

(33) 《大诰续编・断指诽谤》，见杨一凡：《明大诰研究》，江苏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329—330页。

(34) 《大诰三编・臣民倚法为奸》，见杨一凡：《明大诰研究》，江苏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352页。

(35) 《大诰三编・臣民倚法为奸》，见杨一凡：《明大诰研究》，江苏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352—353页。

(36) 《大诰三编・臣民倚法为奸》，见杨一凡：《明大诰研究》，江苏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351页。

(37) 方孝标：《钝斋文选》，见武新立：《明清稀见史籍叙录》，金陵书画社（江苏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第261页。

(38) 《大诰三编・逃囚》，见杨一凡：《明大诰研究》，江苏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393页。

(39) 全祖望：《鲒琦亭集》卷三五《辨钱尚书争孟子事》。

(40) 容肇祖：《明太祖的〈孟子节文〉》，见《容肇祖集》，齐鲁书社1989年版，第170—183页。

(41) 刘三吾：《孟子节文题辞》，见丁易：《明代特务政治》，江西教育出版社2012年版，第441页。

(42) 张廷玉：《明史・钱唐传》，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3982页。

(43) 嘉靖邹县孟氏《三迁志》卷三上，见张佳佳：《〈孟子节文〉事件本末考辨》，《中国文化研究》2006年第3期。

(44) 康熙《福建通志》卷四四《游义生传》，见张佳佳：《〈孟子节文〉事件本末考辨》，《中国文化研究》2006年第3期。

(45) 乾隆《连江县志》卷七《游义生传》，见张佳佳：《〈孟子节文〉事件本末考辨》，《中国文化研究》2006年第3期。

(46) 董应举：《连江孙公芝传》，见张佳佳：《〈孟子节文〉事件本末考辨》，《中国文化研究》2006年第3期。

第十三章 东林挽歌

明朝晚期的“东林党”，是中国秦制时代的一个异数。与民间敬重顾宪成、高攀龙等东林党魁不同，自天启年间（1621—1627年）开始，朝廷即致力于将东林党人形容为一群无事生非、沽名钓誉之人。至乾隆时代，更是借修《四库全书》的机会，由皇帝钦定，将东林党人定性为明朝灭亡的核心原因之一。“明朝亡于东林党”的论调之后在中国知识界不断发酵，形成了如下针对东林党人的集中批评：

1. 东林党专注党争，只批评，不建设，且批评多集中在道德层面。相比之下，魏忠贤的阉党更为实干，延缓了明帝国的崩溃。2. 东林党人借讽议朝政、评论官吏之名，行包庇地主、为富商巨贾争利之实，对灾民的悲惨遭遇视而不见，一味阻挠朝廷征收商税、矿税，实为大地主、大商人利益集团的代言人。3. 东林党不考虑国家前途，以道德为出发点，为了反对而反对，决不妥协。国本之争，考察、任用官员之争，抑制矿监、税监……一言不合就抵制加捣乱，阻碍政务的正常开展。

这些批评与史实是不符的。

一、东林党批判皇权暴政

其实，东林党并不是一个有着严密组织的政治团体，至多只能算是一个“志同道合者的松散联盟”。成员之中有着思想上的共鸣，但并无组织上的实体关系。比如黄宗羲就说过，东林党这个名称乃“小人者加之名目而已矣”[(1)]，是政敌扣的一顶帽子。什么人算东林党，什么人不算东林党，也没有确凿的判断标准。某些人成为东林党，因为政敌（如魏忠贤）的定性；也有些人成为东林党，

是来自个人的自我标榜（如崇祯处置魏忠贤后，许多官员喜欢攀附东林）。因此，要考察东林党人的真实作为，须将焦点放在顾宪成、李三才、邹元标等东林核心人物身上——不过，基于叙述方便的需要，本文仍使用“东林党”与“东林党人”两词。[2]

首先说反对考成法。

考成法是张居正设计出来的一套考察官员的方法。按张的设计，巡抚、巡按的工作业绩由六部进行考察；六部、都察院的工作业绩由六科进行考察；六科的工作业绩由内阁进行考察。月有月考，年有年考。

听起来，这是一套很好的绩效考核制度。但它的实质却是一种变相的言路打压。原本，明朝六科的言官拥有负责监督朝政的超然地位，他们的品级虽然不高，却可以封驳诏书，对皇帝的不合理决定行使否决权（纸面权力，事实上很难办到）。御史则是皇帝的耳目，代替皇帝对朝廷的行政、司法、人事做全面监察。张居正的考成法相当于借绩效考核之名，取消了六科的言官和御史的独立性，将他们的政治命运牢牢控制在内阁手里，也就是控制在内阁首辅张居正手里。造成的直接后果是体制内的批评之声被全面压制，张居正实现了以自己为核心的一言堂。[3]

张居正搞考成法压制体制内的言论自由之时，东林党这个词尚未出现，东林领袖人物如顾宪成、赵南星、邹元标、高攀龙、李三才等也尚未成为朝堂上有影响力的人物——要到万历三十年（1602年）左右，他们以东林书院为据点，聚集同道，批评朝政，才算形成了一股比较重要的舆论力量。但这些人在张居正当政的时候已经不惧后果，对考成法提出了严厉且精准的批评。

比如，巡按御史刘台因不堪言论压制，在万历四年（1576年）上疏点名批评张居正。刘台说，按照旧制，内阁是皇帝的顾问，言官拥有批评朝政的自由。考成法推行后，言官的自由遭内阁控制，“凡在外巡按御史垂首丧气”。张居正用“升迁之速”（快速升官）来诱惑六科的言官，用“考成之迟”（考核不达标）来恐吓六科的言官，如此体制之下，“谁肯冒锋刃舍爵禄，而尽死言事哉”，谁还敢直言不讳，监督、批评朝政？刘台的结局是削籍、流放和暴毙。[(4)]

考成法除了是一种变相的言路打压，还是一项针对底层百姓的暴政。考成法对地方官员的考核重点是“赋役完欠”，也就是百姓税赋、劳役的完成情况。追查拖欠的赋役有一个专用名词“追比”，“追比”的常规手段是锁拿、杖打或囚禁，就是抓人、打人、关人，直至百姓缴足所欠税款为止。张居正搞了考成法之后，地方官员的政治前途与追比的成效高度挂钩，地方官只好加大力度，使出各种残酷的手段逼迫底层百姓，于是就出现了一个新的词汇“酷比”，意即残酷的追比。比如在莒州，为完成考核，连续几任知州都在疯狂地使用“风搅雪”“打萝拐”“脑箍”等酷刑对待百姓。“风搅雪”就是在空旷地“用竹板交杂而笞”，大概是竹板生风，屁股溅血（雪）的意思；“打萝拐”是在公堂上“扣民足踝”，大概是扭人的脚踝，使其丧失行走的能力；最狠的是“脑箍”，拿绳索系在人的脑袋上，系处有一根木条，转动木条，绳圈就变小，“一绞则睛出寸余，人立毙，以水渍之，良久始苏”。刘子汾在莒州做了两年知州，用酷刑治死百姓800余人。当地百姓被吓破了胆，纷纷抛弃田宅，逃亡他乡。[(5)]

万历五年（1577年），张居正之父去世，按规定，张必须卸任内阁首辅，回家服丧。已被整得服服帖帖的言官们迎合张居正的意志，群起鼓噪对张实施“夺情”，不同意张卸职，也不同意他不服

丧。只有翰林院的吴中行、赵用贤和刑部的艾穆、沈思孝、邹元标敢于站出来表达反对意见，强调首辅必须遵守制度。他们的反对并非针对张居正，对他做道德层面的苛求。邹元标等人期望的是借此机会迫使张居正离开内阁，进而终止考成法。邹在奏折里以刑部事务举例：

> 先时决囚，初无定额。居正任事，限各省决囚有定数，以致首鼠私窜者，欲盈其数以免罚，有滥及无辜者矣。(6)

邹元标说：以前判决罪犯死刑，没有数量上的要求。张居正搞考成法，给各省下达具体的死刑判决指标，完不成就要受罚。各省为了凑足死刑犯的数量，只好滥杀无辜。

类似的祸民之举在张居正变法期间遍及底层社会的各个角落。其中最严重的莫过于地方官员“丈量田亩”，为完成考成法规定的任务，普遍采用短弓，以求增加丈量所得的田亩数。张居正的考成是全方位的，完成了丈量田亩的数字化考核，紧接着又是征收田赋的数字化考核。文件里的田亩可以虚增，实际的产出却无法大涨，而地方官又必须依照上报的田亩数来完成田赋征收的新考核，结果便是加大横征暴敛的力度，继续对百姓使出“风搅雪”“打萝拐”“脑箍”等酷刑。一边是国库殷实，一边是民不聊生。

张居正是皇权的代理人，与他作对，结局可想而知。等待吴中行和赵用贤的是廷杖六十，赶出京城；等待艾穆和沈思孝的是廷杖八十，囚狱三日，流放边疆；等待邹元标的是廷杖八十，流放贵州，并落下了终身残疾。

张居正死后，考成法被废除，但明朝朝廷内部的批评通道并未重新开放。明神宗，也就是万历皇帝下达诏书，勒令百官在提意见

时必须遵守两条规矩：1．“止及所司执掌”，只许就自己负责的工作发表意见。2．“听其长择而进之，不得专达”，所有意见必须经过上级部门的筛选，不许直接拿到朝堂上讨论。这其实是换了一种方式，继续封堵朝廷内部的批评通道。小部分有理想的读书人，如顾宪成与赵南星，再次冒着被廷杖、流放的高风险，抗议明神宗定的两条规矩。他们的抗议被皇帝痛斥为“沽名卖直”，没有产生任何效果。[(7)]

其次来说反对矿税。

以矿税一事责备东林党祸国的声音颇盛。大意是：东林党人不顾国家战事（“万历三大征”，即宁夏用兵、朝鲜用兵、播州用兵）的开支需求，代表东南地主与富商的利益，站在他们的立场上，反对朝廷征收商税，反对朝廷的矿监政策，不惜将沉重的负担全压在贫苦农民身上。从这个角度来看，东林党人是一群将个人利益与阶层利益凌驾于国家利益之上的伪君子。[(8)]

这是一种因对史实缺乏基本了解而产生的想当然的看法。朝廷派遣税监征收商税，派遣矿监开矿，始于万历二十四年（1596年）。那一年，明神宗派遣大批太监分赴各省，督办开采金、银矿，设置征税的新关卡。皇帝的做法实际上是皇权在官僚系统之外另造了一个新的敛财系统。明神宗对外宣称，他开矿、征收商税是为了应付“三大征”的军费开支和皇宫中三大殿失火的重修费用。但他的话并不可信，明神宗另造敛财系统的真实动力其实是为了满足自己对财富的无节制欲望。

明神宗是“以天下奉一人”理念的极致践行者。饮食方面，嘉靖时代，光禄寺（主管皇帝饮食）的开支一度减至每年白银17万两。张居正执政时，一手着力搜刮民财，一手抑制皇权铺张浪费，一度将光禄寺的开支压缩至每年“十三四万”。明神宗亲政后，他

的私欲如脱缰的野马难以遏制，光禄寺的开支迅速翻倍，增至每年“二十六七万”。[9]

金银珠宝方面。嘉靖时代，云南每年需要向皇帝缴纳贡金2000两。万历二十年（1592年），标准一口气提升至5000两。云南产金有限，地方官府没有办法，只好向四川、陕西等地采购，每两黄金的采购成本高达10两白银（不包括黄金本身的价格）。万历十四年，明神宗曾一次性花费超过19万两白银用来购买金珠宝石。万历二十六年，明神宗买珠宝花费了40万两白银。万历二十七年，因为皇室的珠宝采购量太大，京城的珠宝供应链出现断裂，户部无法购足规定的量，只好去黑市按“增五六倍”乃至“二十倍”的价格采购。

排场方面。明神宗同母弟潞王大婚，耗金3869两，青、红宝石8700块，珍珠85000余颗，珊瑚珠24800余颗。户部不堪重负，请求稍减，遭明神宗痛斥，驳回，最终共耗银88000余两。明神宗同母妹瑞安公主出降（出嫁），向朝廷索要“各色金二千三百余两”（后因户部实在拿不出来，减去三分之一），以及无数珠宝。明神宗的长女荣昌 公主出降，朝廷耗银12万两。七女寿宁公主出降，明神宗向朝廷索银数十万两，户部拿不出钱，一再力争，最后按荣昌公主的旧例，也耗银12万两。明神宗之子瑞王婚礼，耗银18万两；福王婚礼，耗银超过30万两；惠王、桂王婚礼正值辽东战事紧张，国库空虚，朝臣请求将耗费降至“七万金”，明神宗拍板，要求朝廷必须拿出“十四万金”。

布匹、瓷器方面。万历九年（1581年），明神宗向苏杭地区索要15万匹丝绸，万历二十七年索要4．19万匹，万历三十二年索要2．6万匹，万历三十八年索要4万匹。万历二十三年，明神宗向陕西索要7．47万匹羊绒（折合银价160余万两），每年按4000匹的数量进呈。万历十年，明神宗向江西索要9．66万余件瓷器，万历十

九年又索要15．9万余件，稍后又增加8万余件。需要特别指出的是，以上种种需索，其运输之费往往远大于制造之费。比如，自山西潞安将价值110两银子的砂器运到京城需耗资2833两白银，是砂器本身成本的25倍有余。

建筑方面，明神宗同样丧心病狂，毫无节制。下面这张表格引自南炳文、汤纲所著《明史》，只是一份不完全统计[(10)]。

年份	土木工程	费用及其他
万历十一年	天寿山皇陵	费时八年，耗银800余万两
万历十二年	修慈宁宫	耗银15万两
万历十三年	修潞王府第、乾光殿、金海亭等	耗银30万两
万历二十二年	整修养心殿、神怡殿、永宁宫、隆德门	耗银不详
万历二十四年	整修昭陵殿芜楼亭厨库房廊、修西华门楼	耗银不详
万历二十六年	修隆宗门	耗银不详
万历二十七年	整修慈庆宫、修端敬殿	耗银不详
万历二十八年	大高玄殿建新工程；修理龙舟、桥梁、亭	耗银不详

	轩、景陵及裕陵殿宇；修南城清和阁	
万历二十九年	修大内乾德殿	耗银不详。该工程体量巨大。设计台高八丈一尺，台上建殿。兴工一年，每日用工匠2000余人、军队2000余人，仅建成一丈三尺
万历三十年	修乾清宫、坤宁宫。修奉先殿西川堂	耗银不详。工科言官奏请停建各种不急工程，明神宗不予理睬
万历三十一年	整修天寿山长陵、修慈宁花园。皇极殿、中极殿、建极殿开始清理基座	耗银不详。户科、工科言官奏请停止崇德、两配、四斋等宫殿建设，明神宗不予理睬
万历三十二年	南海子御苑工程	工部因经费紧张请求暂缓，明神宗下旨继续

续表

年份	土木工程	费用及其他
万历三十三年	大修都城重城、修河	仅感恩殿及附属桥梁

	南开福王府、修孝陵、修感恩殿、修成湖广显祾恩殿、修长陵明楼、修显陵配殿	一项，即用银十余万两
万历三十四年	修南海普陀寺	耗银不详
万历三十六年	修会极、归极二门	耗银不详
万历三十八年	修贵溪龙虎山宫殿	耗银3万两
万历三十九年	修懋勤宫、端凝宫、寿安殿	耗银数万两
万历四十年	筹划营造朱常洛生母坟园	耗银15万两
万历四十一年	修蜀（王）府门殿	耗银不详
万历四十二年	修理昭陵殿芜楼亭厨库房廊	合用物料约数十万计
万历四十三年	修福王府从官房屋、修胡良巨马二桥、修三殿及正阳门箭楼	福王府从官房屋耗银4万两
万历四十四年	修咸安宫	耗银不详
万历四十六年	修德昌王府、修惠王府、修桂王府、修船坞、修乾光殿等	耗银不详

需要注意的是，这张表中的工程有许多绵延数年乃至十数年，统计时一般只以其启动的时间（个别以竣工时间）统计一次。简言之，明神宗亲政之后，几乎每一年都在大兴土木。另外，因史料所限，表中大多数工程的具体耗银缺少数据，但参照其他类似工程，不难推测其大体情况。比如，万历十二年（1584年）修慈宁宫耗银15万两，则其后建造相似的宫殿的成本可参考这个数据；万历十三年修潞王府耗银30万两，则其后修福王府、惠王府、桂王府等，多半要远高于这个标准（明神宗更宠爱福王）。

另外，采集木料、石料的费用并未体现在表格之中（这方面的费用多摊派给了地方，而户部、工部的官员写奏折向明神宗诉苦，往往只关注本部门的耗费）。明神宗对木料、石料的规格要求极高（木料非深山之中的楠杉大木不可），地方官府苦不堪言。比如，万历三十一年（1603年）筹划重修三大殿，明神宗摊派给贵州的任务之一是“采办楠杉大木”12298根，合银107万余两，摊派给湖广的任务是采办合银约420万两的楠杉大木，摊派给湖广、贵州、四川的任务是采办合银约930余万两的楠杉大木。还有，上述针对地方的摊派，其统计数据是按照官价来做的。地方官府摊派到民间，实际耗费往往是官价的数倍乃至十倍以上。万历二十五年，刑部侍郎吕坤上奏称，采伐巨木一根，“官价虽云千两”，但运到京城，百姓的实际消耗“不止万金”。[(11)]

明朝本有制度，宫廷每年有100万两金花银（明朝收税折收的银两，意为足色而有金花的上好银两）的进项（明神宗亲政后又强迫户部增20万两）。但是明神宗挥霍无度，120万两金花银往往仅够其开支两三个月，剩下的黑洞就只能靠挪用国库来填补。但国库也经不起明神宗折腾，张居正致力搜刮近十年，他死的时候，国库存银有近千万两。只过了五六年，近千万两白银就已消耗一空。于是，万历二十四年，丧心病狂的明神宗决定以“三大征”为借口，

派出宦官为矿监、税使，绕过官僚系统，直接向民间进行搜刮。他只用了三年时间，就利用太监建立起一张覆盖全国的敛财网络。他的敛财网络给明帝国的底层百姓带来了深重的灾难，时人称之为“矿税之祸”。

明神宗之所以派出宦官前往地方搜刮，而不再依赖明帝国的统治基础官僚集团，与他不满官僚集团内部长期存在着针对皇权的批评有直接关系。作为对抗，他宁愿让大量的中央、地方官员长期空缺，宁愿官员的空缺严重影响中央和地方官府的日常运转，也不愿调整人事进行填补。在他眼里，宦官是比官僚集团更忠实、更易于操控的皇权代理人。

矿监的职责是代表皇权监督百姓开采金、银矿，其具体的敛财办法有二：1．皇帝一分钱不出，百姓负责所有成本及开采工作，地方官府负责调兵防护（即武力控制）。开矿所得由皇帝和百姓五五分成。2．宦官只对明神宗负责，考核标准是每年能为皇帝拿到多少金银。为求旱涝保收，完成皇帝交下的任务，宦官往往直接将敛财的额度摊派给地方，既不管地方是否有金、银矿存在，也不负责勘探矿产，更不理会开采是否顺利。[(12)]

税监的职责是代表皇权直接向民间征收法外之税，其具体的敛财办法有四：1．在原官僚系统控制的税卡之外，另增由宦官控制的税卡。南直隶巡抚刘曰梧曾上奏痛陈，宦官来了之后，在自己的辖区内，商人携带货物一天之内要经过五六处税卡。北直隶的通州，税卡更增至数十处。2．巧立名目，增加税种。养鸡有鸡税，养猪有猪税，过路有过路税，落地有落地税，不产鱼的地方也要交鱼税。3．直接将敛财额度摊派给地方上的大商户，不管商业是否繁荣，也不管具体的营业额是多少，大商户必须按期如数向宦官缴足额度，否则后果可想而知。宦官及其爪牙敲诈勒索，导致商户家破人亡是极为普遍的事情。4．当因为开采不出金、银，或开采成

本高于收益而无法开矿之时，干脆将摊派给地方的开矿的额度直接转为“正额课税”，也就是转为正规赋税，由税监接手负责监督地方官员征收，并送到明神宗手里。(13)

南炳文等依据《明神宗实录》中的数据做过不完全统计，认为自万历二十五年至三十四年，派到地方做矿监、税监的宦官每年向明神宗进奉白银约171万两，黄金约3600两。也就是说，在这短短的9年时间里，明神宗就掠取了超过1500万两白银和超过3．2万两黄金，而矿税之祸的肆虐时间长达24年。(14)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明神宗的掠取所得并不等于汲取底层百姓的全部额度。时任吏部尚书李戴的评估是“十不解一”，一份献给了明神宗，两份被宦官中饱私囊，三份遭参随瓜分，四份落在数量众多的负责直接搜刮的恶棍手里。参随和恶棍瓜分了多少民财缺乏数据，但宦官中饱私囊是有具体案例可以参考的。山东巡抚黄克缵给宦官马堂算过一笔账：从万历二十七年三月到三十三年十一月，将近7年的时间里，马堂共计在山东临清及周边地区征税180万两左右，但献给内库（皇宫的府库）的只有50万两多一点。也就是说，有130万两白银被马堂和他的参随们瓜分了。黄克缵还说，另一位在山东做税监的宦官陈增在山东8年积攒了近百万资产，而他在这8年中献给内库的税银只有80多万两。陈增麾下有一个参随程守训，其家产被查抄，搜出了“违禁珍宝及赇银四十余万（两）”。因此，学者方兴认为，“在1596—1620年，即万历二十四年至四十八年间，通过贸易从美洲及日本等地输入中国的白银大抵被‘矿监、税使’搜罗殆尽”(15)。

矿监、税监横行天下，皇帝肥了，宦官及其爪牙也肥了，唯独民不聊生。按大学士沈鲤的说法，是“无一片安乐之地，贫富尽倾，农商交困”。按直隶巡抚刘曰梧的说法，是“民间之皮毛穿、膏脂竭矣”。按辽东巡按萧淳的说法，是“辽东……十室九空”。

按陕西巡按龙遇奇的说法，是“坐括（陕西）民脂一百四十余万，民间皮肉俱尽”。按户部尚书赵世卿的说法，是商业萧条，家家户户关门大吉，他举例说：税监到任不足两年，河西务的160余家布店只剩下30余家，临清关伙商38人只剩下2人；缎店32家，关门21家；布店73家，关门45家；杂货店65家，关门41家。[(16)]

民不聊生，自然就会有民变。万历二十七年（1559年），临清百姓纵火焚烧了税监马堂的衙门。同年，湖广百姓扔砖放火，欲与坐地敛财的宦官陈奉同死。万历二十九年，百姓又包围了陈奉的衙门，将其爪牙十余人投入江中。同年，2000余名苏州织工暴动，攻击了坐地敛财的太监孙隆，击毙孙隆的爪牙黄建节，焚烧了多名孙隆爪牙的家，孙隆本人连夜逃往杭州。万历三十年，江西百姓反抗宦官潘相，将他的爪牙陆泰打了个半死。万历三十四年云南军官贺世勋等人不堪宦官杨荣的暴虐，聚众数千人，杀死杨荣，将其住宅付之一炬。万历三十六年，辽东屯垦的军队不堪宦官高淮剥削，歃血为盟，杀死高淮，为民除害。万历四十二年，福建百姓万余人攻击了宦官高寀的住宅……据不完全统计，“神宗朝，万历后期的20多年中，各地直接因矿、税监激起的民变达49起之多”。[(17)]

频繁的暴动丝毫未曾动摇明神宗的矿税政策，所有领导暴动的人物均遭捕杀。因为矿监、税监的存在只对皇帝和宦官集团有利，故“内而六部尚书、侍郎、科道言官，外而各省督抚布按，上自内阁大学士，甚至个别掌权的太监，下至州县官员，无不反对矿税”[(18)]。东林党人针对矿税之祸的冒死批判即发生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之下。比如魏允贞直接说明神宗“爱贤士曾不如爱珠玉锦绮”。田大益指责明神宗误入歧途，嘴上说着爱国、爱民的漂亮话，实际上“内库日进不已，未尝少佐军国之需”，钱全进了内库。田大益甚至还说出了“陛下尔来乱政，不减六代之季。一旦变生，其何以托身于天下哉”这样振聋发聩的话语——陛下如此疯狂地把天下之财

往自己家搬，如此荒淫无道，一旦某天出了变故，你要如何让天下人再支持你![19]

在所有的批评当中，又以李三才最为大胆。李在奏折中非常干脆地给君王重新做了一番定性："（君主）省刑薄敛，视之如伤，爱之如子，人主能长为百姓之主；然后奔走御侮，尊为元后，戴为父母，百姓亦长为人主之主。"意思是：皇帝须实行仁政为百姓服务，才有资格做"百姓之主"；百姓是"人主之主"，是高于皇帝的存在。将这样的见解写入奏折，送到皇帝跟前，自然是需要胆识与觉悟的。而且，与一般人针对矿税之祸的批评只将矛头指向宦官不同，李三才的言辞非常尖锐，直斥皇帝："皇上爱珠玉，人亦爱温饱。皇上忧万世，人亦恋妻孥。奈何皇上欲黄金高于北斗之储，而不使百姓有糠秕升斗之储；皇上欲子孙千万年之计，而不使百姓有一朝一夕之计。试观往籍，朝廷有如此政令，天下有如此景象，而不乱者哉？"[20]大意是：皇上喜欢珠宝，百姓想要温饱。皇上追求千秋万代，百姓想要养活妻子儿女。皇上把黄金堆得天高，却不让百姓家中存有升斗的粮食；皇上想要子子孙孙都做皇帝，却不让百姓有足以活过明天的储粮。翻看历史，朝廷如此做事，天下如此景象，有不出乱子的吗？

李三才的政见与勇气，是东林党人有意在万历后期支持李三才进入内阁的主因（尽管李在私德上被他的政敌指责有许多缺陷）。但东林党人的支持并不会有什么结果，因为东林党自始至终只是一个松散的同道组织，除言路之外，他们没有更切实的政治实力。掌握着杀伐大权的明神宗则将所有的批评一律扣上"谤君卖直"的大帽子，随心情而定对批评者的惩罚，或无视、或廷杖、或流放、或残杀。

二、东林兴衰与明朝之亡

因庙堂上的批评、谏言毫无成效，万历三十年（1602年）前后，顾宪成等人开始以东林书院为据点，集结在野读书人批评朝政，渐渐形成了一股颇有影响力的舆论力量。

东林书院的影响力实为时代变迁的产物。时代变迁至少包括两个方面：1．先有祸国殃民的暴政，后有读书人出来为民请命。张居正当政时的暴政以考成法为核心，读书人的批判也集中在考成法；万历亲政后的暴政以矿税为核心，读书人的批判也集中在矿税。2．两套敛财系统，也就是宦官体系与官僚体系，他们之间发生了利益冲突，给了知识分子提高影响力的机会。有理想且敢于为民请命的读书人在任何时代都是少数。这少数人在张居正的时代，也就是神宗朝早期势单力孤，很难形成影响力；到了万历亲政之后，官僚集团的利益受到了宦官集团的侵害，使得他们转而愿意支持、利用那些有理想的读书人，让他们冲到前线去对抗宦官集团。这是东林书院在万历时代形成影响力的重要背景。

东林党的历史其实可以用一句话来概括：他们试图以制度章程，也就是《大明律》与《皇明祖训》之类的东西来约束皇权，进而维护自己和百姓的利益，却遭到了皇权的残酷镇压。前述针对张居正考成法的批评，针对明神宗矿税之祸的批评，东林党人拿出的武器均是《大明律》与《皇明祖训》。此外，东林党人还曾深度介入到“国本之争”（要求明神宗立长子为太子）、“红丸案”（涉及明光宗之死）和“移宫案”（明熹宗即位之初，涉及明光宗的妃嫔李选侍在后宫中的地位）。有些批评者认为，东林党人不该干预皇帝的家事，应该避免给自己招来不必要的麻烦。这样的论调似乎并未注意到在关于皇帝家事的三场风波中，东林党人的核心诉求仍是要求皇帝及其后宫按既定的制度和章程办事，即希望将皇权关进制度的笼子。制度与章程是赤手空拳的东林党人最可依赖的武器，按制度和章程办事，也就成了他们试图改革朝政的核心诉求。

这种政治诉求注定了东林党人无法在熹宗时代获得皇权的青睐。天启初年，因东林党人主张按既定的规章制度办事，支持光宗、熹宗父子继承帝位，朝堂之上一度出现了所谓“东林方盛、众正盈朝”的局面。但皇权肆意已久，绝不甘心受制度的约束。天启二年（1622年），皇权即展开了针对东林党的批判。兵科给事中朱童蒙首先开炮，给东林党扣了一顶“招朋引类”“摧残善人”的大帽子。也是在这一年，皇帝开始培植魏忠贤及其宦官集团，允许魏在宫中操练一支万余人的军队；次年，魏受命控制东厂和锦衣卫，开启了特务治国（此前，东厂与锦衣卫长期处于接近瘫痪的状态），宦官还被派往边境监视、控制军队。天启四年，魏忠贤开始逮捕东林党人，“众正盈朝”迅速成了过眼云烟。天启五年，魏忠贤秉皇权之意，开始大肆屠杀东林党人，制造了“东林六君子之狱”等惨案。

与肉体消灭大略同期，针对东林党人的精神消灭也提上了日程。天启五年（1625年），在魏忠贤的授意下，阉党开始在朝堂上制造“假道学不如真忠义”的舆论，并获得皇帝支持，全面禁毁天下书院、讲坛，且用上谕的形式公示《东林党人榜》，共收录309人。天启六年，明熹宗决定就东林党的问题做一个定性，下令编纂《三朝要典》。这部书的主旨是痛骂东林党，说他们为了达成自己留名青史的险恶目的，不惜拿各种琐事喋喋不休地攻击皇帝。后世那些针对东林党的不实批判大体都可以在这部由阉党一手炮制的《三朝要典》中找到。[(21)]

附带一提，在“众正盈朝”的短暂的两三年里，东林党人最受后人诟病之事是削了辽东经略熊廷弼的职。其实，熊虽然在神宗朝攻击过东林党，但他的去职并不能归咎于东林党人。因为东林党并不是一个严密的组织，而只是一群松散的同道，且邹元标虽然主张严厉处分熊廷弼，但维护熊廷弼的七名科道言官中也有五人被视为

东林党人。追究熊廷弼的冤狱中具体某个人的历史责任是恰当的，但将之说成东林党人热衷党争、不问是非，则不是一种与史料合榫的解读方式。[(22)]

从“众正盈朝”到肉体与精神被全方位消灭，东林党人在天启年间只维持了大约两年的存在感。他们之所以如此脆弱，与明熹宗同明神宗大不相同的宦官任用方式有直接关系。

神宗朝，围绕着矿税之祸，宦官集团与官僚集团存在着严重利益冲突，不但宦官集团横征暴敛造成的动乱需要官僚集团善后、担责，宦官集团还直接侵占了许多原本属于官僚集团的利益。为自身利益计，官僚集团多多少少愿意有限度地支持一下那“一小撮”东林党人。熹宗朝，魏忠贤将宦官集团与官僚集团整合到一起，大量官僚进入阉党，官僚集团也是宦官集团。身为“一小撮”的东林党人，对上，欲将皇权纳入制度的笼子加以约束，多次要求明熹宗从私人账户拿钱贴补国事（索要至少500万两白银）；对中，弹劾魏忠贤，欲使之远离政事；对下，试图通过京察等方式肃清吏治，整顿官僚集团。勇气与理想虽然可嘉，但开罪整个利益集团的后果也是可想而知。

后来，到了崇祯朝，东林党人早已四分五裂，不成气候。南明时期更甚，活跃的主要是在野的复社人士，这些人在崇祯朝的命运也与在天启朝大致相似。崇祯皇帝虽然铲除了魏忠贤，但东林党只是他拿来点缀朝堂的工具，他仍然更愿意选择宦官作为自己的代理人。用宦官控制官僚集团，用有限的几个东林党人点缀官僚集团，是崇祯自认为务实的做法。直到明朝（包括南明）灭亡，有限的东林党（包括其余绪复社）人虽仍致力于扩张言路，但再未形成有影响力的政治力量。面对皇权及其代理人——阉党（也包括南明时期的军阀），东林党与复社始终处于不堪一击的状态。

天启朝“众正盈朝”极为短暂，崇祯朝东林党人只是点缀，南明时期真正左右时局的是军阀。将明帝国灭亡的责任归咎于一个未曾获得施政机会的松散同道组织显然不是反思历史的客观态度。东林党人真正的力量不在于挽救明帝国的灭亡（事实上他们也挽救不了），而在于即使斧钺加身，也要以民本为出发点，去批判皇权之恶。杨涟被铜锤断肋、铁钉贯耳，留有血书“大笑，大笑，还大笑”。顾大章被投入诏狱，右手剁至只剩拇指与食指，仍作遗诗“当留日月照人心”。高攀龙自沉于后园池中，遗表直言要“从屈平（屈原）之遗则”……如此无所畏惧的批判精神是中国秦制时代极为鲜见的思想光辉。东林党的光辉传至明末清初的黄宗羲、顾炎武，始有“君主为天下之大害”“保国者，其君其臣肉食者谋之；保天下者，匹夫之贱与有责焉耳矣”这样启迪人心的彻悟。传至晚清，又被重新发掘，成为郭嵩焘、谭嗣同、严复等人“兴民权，抑君权”的思想来源。

至于明朝的灭亡，日本学者小野和子在《明季党社考》一书中有非常中肯的结论：

> 明朝，与其说是亡于党争，不如说亡于阉党之手。(23)

当然，若一定要说明朝亡于党争，也未尝不可。只不过党争的主体并无东林，而是阉党与官僚集团。崇祯起用阉党治国（崇祯朝宦官数量极多，约有10万之众），固然较之利用官僚集团治国更加如臂使指，但也造成了统治集团的内部分裂。北宋自建立至元祐年间（1086—1094年）的130余年，用宰相不过51人；崇祯在位17年，用宰相达50人，诛杀总督7人，诛杀巡抚11人。(24)当皇权如此蹂躏官僚集团，官僚自不会再视皇权为利益共同体，其消极怠政是必然的，明帝国的统治力因之削弱也是必然。当民变与外敌同时袭来，官僚集团的怠政，也就是消极于人力、物力的汲取，带给明帝

国的伤害会非常直接。换言之，若真的存在“党争亡国”，那么挑起党争、将政见分歧演变成杀戮的恰是皇帝自己。明神宗如此，明熹宗如此，崇祯也如此。

但崇祯绝不愿意承认这一点。他的名言是“朕非亡国之君，诸臣皆亡国之臣”。后世的乾隆皇帝也不喜欢从这个角度来反思明朝灭亡的教训。他更惋惜明朝没能消灭书院，更惋惜明朝没能把东林党彻底批倒、批臭。

三、乾隆为何痛恨东林党？

在《题〈东林列传〉》中，乾隆说过这样一句话：

> 东林讲学，始以正而终以乱，驯致与明偕亡。[25]

这相当于是将明朝的灭亡与东林讲学直接挂钩。为什么这样讲？乾隆也有一段解释：“盖有讲学，必有标榜，有标榜，必有门户，尾大不掉，必致国破家亡。汉、唐、明，其殷鉴也。”意思是：讲学者，必会标榜自己讲得好，讲得对；有了标榜，必会形成不同的门派；形成门派，等于形成了有组织的团体，这些团体尾大不掉，就成了心腹之患。汉、唐、明三代都是这么亡国的。

乾隆还说，那些讲学的东林党也有正人君子，但形成了门派，就有了门派利益，有利益，就会有小人趋炎附势。所以，小人以东林党自居，其过错仍在东林党。“开门揖盗者，本东林之自取，迄明亡而后已”，是东林党自己在开门揖盗，吸引小人。

陈鼎的《东林列传》旨在赞颂东林党人。乾隆将他的赞颂斥为“邪说”。其逻辑是：国破家亡，黎民涂炭者数不胜数，东林党人“不能守祖业，徒以国亡殉节为有光”，不能守护明朝，只知道成就自己的千古盛名，真所谓“国家将亡，必有妖孽”。

对于东林党领袖顾宪成，乾隆也完全没有好感。他在诗里嘲讽“足识斯人学不醇”，这个人学问不行，没做到家，同时还在诗后做注，说正因为顾宪成学问太糟糕，所以“其东林倡说，流而为门户，掉而为祸患，不亦宜乎”，说顾宪成在东林书院宣传歪理邪说，流毒成为利益门派，最终成了国家的祸患。[(26)]

东林党被乾隆定性为明朝亡国的主因，纪晓岚等人奉旨于《四库全书总目》之中对这一定性做了更详细的阐释。他们做的阐释的主旨，简而言之就是“夫明之亡，亡于门户。门户始于朋党，朋党始于讲学，讲学则始于东林”[(27)]——东林党聚众讲学，讲学形成门户、朋党，门户、朋党不以朝廷利益为先，明朝于是灭亡了。

为了让乾隆满意，有些阐释非常露骨，直指讲学活动会将人聚集起来，而聚集对朝廷有害：“大抵门户构争之见，莫甚于讲学，而论文次之。讲学者聚党分朋，往往祸患延宗社。操觚之士笔舌相攻，则未有乱及国事者。盖讲学者必辨是非，辨是非必及时政，其事与权势相连，故其患大。文人词翰，所争者名誉而已，与朝廷无预，故其患小也。”[(28)]讲学和写文章相比，前者的危害更大。因为讲学会把人聚到一起，讨论时事、辨别是非，形成有力量的团体；文人写文章互相攻击，不过是点对点争个人声誉，影响反而不大。

权力人物对读书人聚众讲学的憎恶也见于朱元璋与张居正。

在“卧碑文”里，朱元璋明确规定，“天下利病，诸人皆许直言，惟生员不许”，天下人都可以直言时事利弊，只有生员不可以。朱元璋还规定，遇到与己无关之事，生员不许去衙门，不许介入其中，否则革去生员资格，严重者发配边疆，乃至杀头。[(29)]在朱元璋看来，生员拥有同窗、师长方面的优质社会关系，比普通百姓更有活动能力，是需要严格控制的对象。

张居正也有相同的认知。万历三年（1575年）已身为内阁首辅，大权独揽的他再度重申并强化了朱元璋的祖制，严禁生员参与一切政治事务。他勒令天下：“不许别创学院，群聚党徒及号召他方游食无行之徒空谈废业……游士人等，许各抚按衙门访拿解发。”[30]万历七年正月，张居正又下令遵照“皇祖明旨”，毁天下书院，全部“改为公廨衙门”，书院的田产、粮食全部划归地方里甲。全国著名书院中，超过60所遭到查封。[31]与张居正禁毁书院大略同期，欧洲的中世纪大学开始向近现代大学转型。

在约束生员方面，张居正的规定较之朱元璋的更为具体：“我圣祖设立卧碑，天下利病，诸人皆许直言，惟生员不许。今后生员务遵明禁，除本身切己事情，许家人抱告有司……其事不干己，辄便出入衙门，陈说民情，议论官员贤否者，许该管有司申呈提学官，以行止有亏革退。若纠众托帮，聚至十人以上，骂詈官长，肆行无礼，为首者照例问遣，其余不分人数多少，尽行黜退为民。”[32]

严禁生员议论国家政策的利弊。若生员自己的切身利益受损，只能由家人去找衙门；与自己的利益无关，却前往衙门为民请命、议论官员的好坏，要被革除生员资格，丧失进入仕途的机会；如果利用自己的社会关系，聚集10个人以上，介入政治事务，为首者问罪发配，其他人一律革除生员资格，贬为庶民。

清军入关后，全盘继承了上述明朝的统治术，且有所发展。顺治九年（1652年）向全国颁布的《生员条例》，除重申朱元璋与张居正所定规章之外，另有补充：“生员不许纠党多人，立盟结社，把持官府，武断乡曲。所作文字，不许妄行刊刻。违者听提调官治罪。”[33]生员不但不能议论时事，不能亲自为自己的利益上诉，不可以帮助他人上衙门，不可以聚众介入公共事务，也没了结社、出书的权利。

自顺治而下，康雍乾三代皆继续维持并强化这种统治术，对“生员”实施严格管控。乾隆借修《四库全书》的机会，集合纪晓岚等学者，以“明朝亡于讲学”为历史定论，将东林众人拉出来鞭挞，其实是在警告清帝国的读书人千万不要“重蹈覆辙”。

---

(1) 黄宗羲著：《明儒学案》第十一册卷五十八，商务印书馆1934年版，第47页。

(2) 也有学者主张将“东林党”与“东林学派”分开来看。见刘军：《东林党与东林学派辨析：关于东林是否为党的另外一种思路》，《石河子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3期。

(3) ［日］小野和子：《明季党社考》，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版，第7—10页。

(4) 吴亮辑：《万历疏钞》卷十八《恳乞圣明节收辅臣权势疏》，见南炳文、庞乃明主编：《“盛世”下的潜藏危机：张居正改革研究》，南开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204页。

(5) 胡铁球：《新解张居正改革：以考成法为中心讨论》，《社会科学》2013年第5期。

(6) 吴亮辑：《万历疏钞》卷五《亟斥辅臣回籍守制以正纲常疏》，见［日］小野和子：《明季党社考》，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版，第18页。

(7) 倪军民：《试论明季言路膨胀与政治失控》，见《明史论集》，吉林文史出版社1993年版，第271—272页。

(8) 部分学术著作将东林党视为江南地主和商人的利益代言人。如吴慧认为，东林党由“中小地主、中下级官吏和地主阶级知识分子”组成，“代表东南地区部分地主和新兴的工商业者利益”。为了维护自己的利益，他们反对腐朽的“以皇帝、宦官、王公、勋戚、权臣为代表的大地主集团”，“反对王公勋戚的掠夺土地,反对税监矿使的横征工商”。见吴慧：《中国商业通史简编》，中国商业出版社2015年版，第202—203页。

(9) 此段及后文关于明神宗铺张浪费穷奢极欲的史料总结均引自南炳文、汤纲：《明史》下册，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711—717页。

(10) 南炳文、汤纲：《明史》下册，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718—722页。

(11) 南炳文、汤纲：《明史》下册，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722—723页。

(12) 方兴：《明朝万历年间“矿税银两”的定额与分成》，《首都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6期。

(13) 方兴：《明万历年间“矿监税使”的阶段性考察》，《江汉论坛》2016年第3期。

(14) 南炳文、汤纲：《明史》下册，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743—746页。

(15) 方兴：《明朝万历年间“矿税银两”的定额与分成》，《首都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6期。

(16) 南炳文、汤纲：《明史》下册，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746—748页。

(17) 吴慧主编：《中国商业通史》第三卷，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5年版，第852—857页。

(18) 周远廉、谢肇华：《万历后期的矿税之祸：明代辽东档案研究之三》，见《中国古代史论丛》，1982年第2辑，福建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

(19) 蔡明伦：《论明万历中后期言官对神宗的批判》，《史学月刊》2006年第4期。

(20) 李三才：《请停矿税疏》，见[日]小野和子：《明季党社考》，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版，第176页。

(21) 杨艳秋：《〈明光宗实录·三朝要典〉的编修》，《史学史研究》1998年第4期。

(22) 樊树志《晚明史》中《“东林党”论质疑：关于“东林与浙党”》一节，已清晰指出东林无党，“所谓‘东林党’与‘浙党’对立云云，实在是臆测多于事实的”。见樊树志：《晚明史1573—1644》上册，复旦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529—537页。

(23) [日]小野和子：《明季党社考》，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版，第376页。

(24) 陈登原：《陈登原全集》第八册《崇祯五十相》，浙江古籍出版社2014年版，第93—95页。

(25) 《题〈东林列传〉》，见张传锋：《〈四库全书总目〉学术思想研究》，学林出版社2007年版，第247—248页。

(26) 《题顾宪成解论语四勿诗及注》，见张传锋：《〈四库全书总目〉学术思想研究》，学林出版社2007年版，第248页。

(27) 《四库全书总目》卷九七，见张传锋：《〈四库全书总目〉学术思想研究》，学林出版社2007年版，第246页。

(28) 《四库全书总目》卷一四八，见宁侠：《四库禁书研究》，商务印书馆2018年版，第212页。

(29) 朱元璋：《卧碑文》，见《历代小说笔记选·清一·松下杂抄》，上海书店1982年版。

(30) 《张太岳集》卷三十九，见邓洪波：《中国书院史》，东方出版中心2004年版，第369页。

(31) 邓洪波：《中国书院史》，东方出版中心2004年版，第370—373页。

(32) 《张太岳集》卷三十九，见[日]小野和子：《明季党社考》，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版，第22页。

(33) 朱汉民、邓洪波：《岳麓书院史》，湖南教育出版社2013年版，第398页。

第十四章
雍正密折治国

雍正十三年（1735年）八月初九，二百斤黑铅被运进圆明园。

十二天之后，雍正皇帝在圆明园暴毙身亡。次日，他的儿子乾隆下了一道谕旨，说先皇日理万机，闲暇之时，听说江湖上有炼丹之说，于是把张太虚、王定乾等道士招来，安置在圆明园，但“圣心深知其非，聊欲试观其术，以为游戏消闲之具”，也“未曾听其一言，未曾用其一药”。现在朕将张太虚、王定乾等人赶出圆明园，遣回原籍，若有人出去后胆敢“捏称在大行皇帝御前一言一字”，决不轻饶，立即正法。[(1)]

这当然是欲盖弥彰的说法。雍正突然死亡，乾隆及朝中王公大臣皆措手不及。在诸事待办的状况下，乾隆于雍正驾崩次日竟腾出手来优先处置在圆明园内的两个炼丹道士，自是因为这两个道士与雍正之死有着非比寻常的关系。事实上，雍正皇帝热衷炼丹，他常年吃丹药是清帝国官僚集团众所周知的事。他不止一次将炼制的丹药赏赐给鄂尔泰、年羹尧、张廷玉、田文镜、岳钟琪等人，这些都记载在皇帝的朱批和臣下的谢恩折子里。

而雍正之所以长期服用“既济丹”“秋石”之类的丹药，既有色欲方面的因素，也与他统治清帝国的手段有密切关系——清军入关之后，历代皇帝都相当注意吸取中原秦制帝国的统治术。雍正是其中走得最远的。他在位十三年，心心念念的全是如何巩固自己的统治基础，也就是官僚集团。他不喜欢“与士大夫治天下”，而是希望将官僚集团规训为最服帖的奴仆。为达成他的目的，他在官僚集团中发起人格侮辱运动，实施密折治国，将自己变成一个日理万机的最高情报头目。

为了始终能够日理万机，他不得不求助于丹药。而那丹药最终要了他的命。

一、正面榜样与反面教材

雍正六年（1728年）四月初三，陕西三原县棉花贩子秦泰骑马路过河南府孟津县。在宋家山地界，将装有一百七十余两白银的包裹不慎掉落，秦泰一路风尘，满身疲惫，许是在马背上打了个盹儿，居然没有察觉。

刘姥姥进大观园，曾对贾府花费二十多两银子置办的螃蟹宴感叹说“这一顿饭的钱够我们庄稼人过一年了”。如此也就不难理解秦泰丢了一百七十余两银子之后的惊慌失措。他找到当地地保备了案，忍痛出了一张承诺“均分银两”的告示，并在第二天贴满了附近乡镇的大小角落。

秦泰不知道的是，就在他满大街贴告示的同时，孟津县一个叫翟世有的老农正抱着他那一百七十余两银子的包裹蹲在宋家山的官道上等他往回找，而且一直等到天黑。他更不会想到，告示贴出来的第二天，就在他几乎已经完全绝望的时候，翟世有那张带着些许木讷的脸会突然出现在他面前，把那包沉甸甸的银子塞回到他手中，而且拒绝接受任何酬谢。从惊愕中回过神来的秦泰跪下给翟世有叩了几个响头，将他拜做了干爹。[(2)]

两个多月以后，翟世有接受了朝廷的调查和褒奖。谈及拾金不昧的动力，受惊不小的他战战兢兢地说：“我当时只是想到了我的婆娘，她丢了三百文钱就差点儿急死。”

朝廷的调查缘于河南山东总督田文镜的一道折子。当雍正皇帝借着摇曳的烛光在田文镜的奏折里读到关于翟世有的汇报时，他深深地吸了一口气，一种巨大的满足感瞬间充溢胸间。在那道长达一

千二百余字的《恩赏义民翟世有顶戴银两谕》中，雍正皇帝将那乡野间的拾金不昧上升到理论高度。他大发感慨地说，孟津翟世有拾金不昧的事情充分说明朕这些年来尽心竭力、耗尽心神的教化工作取得的胜利，“乃风俗休养之明征，国家实在之祥瑞”，并大力称赞田文镜这些年在河南“奖劝”民风功不可没。[(3)]

皇帝明确要求把这道谕旨发到京里、京外所有官员手里。皇帝说，像翟世有这样大字不识几个的老农民都知道戒贪知足、拾金不昧，你们这些官员个个饱读诗书，居然还营私舞弊、贪污腐败，难道不觉得羞愧吗？皇帝决定恩赐翟世有七品顶戴，赏白银一百两，责成河南府将翟世有的事迹刻成石碑，立在拾金之处。

同年七月，田文镜再次上奏说，河南有一个卖面的穷人陈怀金捡到江南羊客王盛丢的二十四两八钱银子，不但全数奉还，还不要任何酬谢。雍正御批表彰说，河南底层百姓的道德水准这么高，“诚所谓瑞也”，实在是国家的祥瑞。雍正七年（1729年）九月，天津的地方官管承泽上奏说，当地有一个底层妇女梁氏也捡到了六两五钱银子，同样主动交还给了失主，不要酬谢。雍正下旨赏赐梁氏大米、布帛，还为她题写了匾额作为表彰。雍正八年五月，山西巡抚石麟递来报告，说在山西朔平府有一个叫赵亨清的百姓，捡到九两一钱银子，也主动交还给了失主。直到雍正十三年四月，直隶总督李卫还有类似的折子上奏。[(4)]雍正的兴致似乎也从未消减。他在李卫送来的奏折上批示说：“以匹夫匹妇之愚，而能轻财尚义，慕善乐施，允属难得。于斯足征风俗向淳之渐，览奏朕怀曷胜愉悦。”意思是：愚蠢的匹夫匹妇都懂得“轻财尚义，慕善乐施”，实在难得，可见朕登基以来整顿天下风俗的成绩很不一般。朕看到这样的奏折，实在是非常高兴。

集中力量树立正面榜样的同时，雍正也在努力寻找反面教材。

名士钱名世不幸被选中。雍正四年（1726年）四月的一道上谕里说：钱名世这样的读书人毫无廉耻，写诗谄媚奸臣、逆贼年羹尧。所以，朕之前特地为他书写了一块“名教罪人”的匾额，勒令悬挂在钱家，还下旨要求在京科举出身的大小臣工都必须赋诗一首来讽刺钱名世。朕这样做，并不只是为了惩罚钱名世这么一个宵小之辈，而是想让天下臣工都知道，让像他这样的“名教罪人”耻辱地活在世上比直接杀了他更残酷。所以，朕希望“凡读书之士，皆期仰体朕心，人人争自濯磨之故也”，其他的读书人都要扪心自问，好好反省，不要重蹈覆辙。(5)

钱名世被选中，直接原因是他牵涉进了年羹尧一案。

雍正二年（1724年），年羹尧进京，正值如日中天之际。钱名世赋诗八首相赠，当中有“分陕旌旗周召伯，从天鼓角汉将军”一句，用的是周成王年幼，周公与召公辅佐成王分陕而治的典故。雍正读了之后怒不可遏，觉得钱名世是在贬低自己，抬高年羹尧。稍后，雍正又在钱名世的诗中发现一句颂扬年羹尧的：“钟鼎名勒山河誓，番藏宜刊第二碑。”这当中也有典故，“第一碑”是康熙为表彰十四皇子胤禵的战功而立，雍正与胤禵素来不和，即位后曾借口碑文没有凸显康熙的功绩，对碑文的内容做了许多修改。钱名世说年羹尧有资格获得“第二碑”，他的诗句让生性多疑的雍正怎么想怎么别扭。(6)

文人作诗颂扬正春风得意的朝中重臣本是寻常事。钱名世颂扬年羹尧的时候，雍正也正在给年的密折里说什么“你我是千古君臣之遇的榜样”这样的肉麻话。在诸多颂扬年羹尧的读书人当中，雍正之所以单单选中了钱名世，要将他拉出来批倒、批臭，最主要的原因还是钱的那句“分陕旌旗周召伯，从天鼓角汉将军”犯了雍正的大忌讳。皇帝忌讳的不仅仅是钱名世的诗贬低了自己，抬高了年羹尧，还包括周公、召公的典故蕴含的儒家“王道”思想正是雍正

极力想要打击、清理的思想“毒瘤”。雍正理想中的君臣之道绝不是周成王与周公、召公之间的那种共享政权的平等关系，而是绝对的主仆关系。

唯有体察到这一点，才能理解雍正为何要给钱名世题写匾额“名教罪人”，也才能理解雍正为何要给所有在京科举出身的官员布置任务，命他们写诗讽刺钱名世，而不是更直接的将钱名世砍头、灭族。“名教罪人”的匾额也罢，集体写诗骂钱名世也好，其实都是为了规训所有的读书人，摧毁他们残存的“与士大夫治天下”的政治理念。

在雍正的运作下，钱名世很快成了举国皆知的反面典型。雍正还将那些讽刺诗汇集起来交给钱名世，勒令他将它们整理、刊刻，出版成书。雍正这样做的目的既是为了毁掉参与写讽刺诗的那些官员最后的人格尊严，也是为了用讽刺诗来规训全国的学子。末了，雍正还不忘指示常州知府和武进县知县（钱名世是常州府武进县人氏），每逢初一、十五，亲自去钱府查看那块“名教罪人”的御赐匾额，看看它是否还稳稳当当地挂在钱家的大堂之上。

二、全面侮辱打击科举出身的官员

雍正三年（1725年）六月，巡盐御史莽鹄上奏皇帝说：天下有许多钻营附势之徒，他们互通声气，投拜门生，没有中举的人希望靠他们在考场上打通关节，做了官的人希望得到他们的举荐，官越做越大。那些本来不和的人一旦拜了师生，立刻惺惺相惜，互相引荐、说情、徇私舞弊。莽鹄希望朝廷颁布诏令，严禁科举出身的官员搞门生、座主的把戏。[7]

莽鹄的奏折是在刻意揣摩雍正的心思，迎合他的需求。

清代有对官员与士人免除差役、徭役的优待。官员与士人被称作官户、宦户或儒户，对他们的优待催生出了两种后果。第一种是许多底层百姓为躲避朝廷沉重的差役、徭役，想方设法找关系，将自己挂靠在同姓的官户、儒户下面。雍正将之称作“其子孙族户滥冒及私立儒户、宦户”[(8)]。第二种是底层百姓将自己的田产挂靠在官户、儒户那里，到了纳税的时候，底层百姓就把钱粮交给官户、儒户，由他们代为缴纳。雍正将之称作“生监包揽同姓钱粮以为己粮”[(9)]。

躲避差役很好理解，包揽钱粮有必要略做解释。在包揽的过程中，底层百姓交给官户、儒户的钱粮往往多于应该交给官府的法定钱粮。百姓之所以愿意多出钱，也要去找官户、儒户来代自己纳税，是因为缴纳钱粮并不是往官府的银库、粮库一扔就完事了。在纳税的过程中，他们需要面对粮头、柜吏、仓吏、官银匠等少则七八个、多则十余个环节的刁难与盘剥。这些环节全部走下来，耗费早已远远超出了法定税额。让官户与儒户代缴则没有这样的问题。

嘉庆年间做过军机大臣、直隶总督的蒋攸铦在奏折里给皇帝分析过为什么百姓宁愿多出钱，也要将自己的税粮包给官户、儒户代缴。蒋说：“所最苦者，良善乡愚，零星小户，虽收至加五六而不敢抗违……且乡僻愚民，始则忍受剥削，继亦渐生机械，伊等贿托包户代交，较之自往交漕加五六之数，所省实多，愚民何乐而不为？是以迩年包户日多，乡户日少。”[(10)]那些老实的零星小户最惨，他们缴纳漕粮，常遭州县官府盘剥，多交法定纳税额度的五六成，也不敢反抗。但即使是老实的愚民，受剥削久了，也会慢慢开窍。他们会发现，其实花钱让人“包户代交”，比起自己去交而被多盘剥五六成更划算。所以，近些年来，民间的“包户”越来越多，自己单独纳税的“乡户”越来越少。

底层百姓两害相权取其轻，找关系依附在官户、儒户之下，对朝廷来说意味着可供汲取的物力、人力的体量变小了。对找不到关系挂靠的百姓而言，意味着朝廷会将更沉重的赋税和差役压在自己身上。所以，雍正二年，朝廷下诏革除了官户、儒户的名目；雍正四年，又再次下诏规定免差役、徭役的特权仅限于做过官的或有功名的士子本人。与这些新规同时推出的还有“士民一体当差”的新政策。

恰是“士民一体当差”的新政策在河南接连闹出风波。先是雍正元年（1723年），巩县知县张可标贴了一张“生员与百姓一体当差”的告示，引起该县生员不满，控告他贪污腐败。雍正二年五月，封丘县又以修复黄河河堤的人力、资金不足为由，下令“士绅一体当差”，引发了士子集体罢考事件。罢考之前，士绅群集在开封巡抚衙门前投诉，要求废除“士绅一体当差”，维护官户、儒户的尊严。[(11)]

事件本身不难平息，按常规办法杀几个带头者，组织一场补考，地方很快便能安定下来。但雍正对罢考事件非常在意。他发现，在处置的过程中，只有非科举出身的田文镜积极镇压，科举出身的河南官员则集体态度消极。科举出身的学政张廷璐平日里碰到儒户不肯上缴钱粮，即多有庇护。儒生罢考，他也自始至终没有半句申饬之言。科举出身的开归道陈时夏负责审讯闹事儒生，但他并不坐堂审案，而是将闹事的儒生请到内衙，彼此以年兄年弟相称。科举出身的按察使张保则拒绝介入罢考事件中来，声称自己只管人命盗案。据雍正接到的密报，甚至连朝廷派去处理罢考事件的钦差大臣也是“初有沽名袒护之意”，即一开始也有意袒护闹事的儒生。[(12)]

在雍正看来，这是士大夫“彼此为援”，是远比罢考本身更可怕的事情。

清廷自入关以来，始终对有组织的士绅群体保持着高度的戒心。顺治十八年（1661年），为打击江南士绅，清廷曾以“抗粮”为罪名制造过一起“江南奏销案”，被列入整治名单的江南士绅共有一万三千余人之多。这些人被集体革去了功名，“发本处枷责，鞭扑纷纷，衣冠扫地”[(13)]，即戴着枷锁被拉回原籍，当着本乡父老的面遭受鞭打。有科举探花出身的士大夫仅欠银一厘也遭此厄运；有些人并无任何欠银，竟也在整治名单之中。可见清廷的本意并不在追讨欠款，而是为了羞辱和击溃江南士绅这个群体。“江南奏销案”造成的结果是江南之地“庠序一空”，将有生员头衔的读书人消灭殆尽。松江府的五所官学原有生员三千余人，“奏销案”后每所官学只剩下数十人。嘉定县剩下的生员甚至成了个位数。

“河南罢考案”很明显是在提醒雍正皇帝，虽然康熙朝六十一年来仍继续维持对读书人思想上的高度管控，但科举录取名额和官学生员名额的增加已让士绅的数量得到了较为可观的恢复（尽管与明朝晚期的规模仍不可同日而语）。雍正有没有想起顺治年间的“江南奏销案”不得而知，但他接下来所做的事情与“江南奏销案”是没有本质区别的。巡盐御史莽鹄也正是看到了这一点，才在雍正三年上奏，请求皇帝严厉打击科举出身的官员玩门生、座主的把戏。

与莽鹄上奏大略同期，田文镜开始在河南大肆弹劾科举出身的官员。他的行为得到了皇帝的大力褒奖，雍正鼓励他“照此秉公执法，一无避忌，放胆为去，保尔永永平安”[(14)]。有了皇帝“永永平安”的底牌，田文镜工作得更加卖力。到了雍正四年二月，河南境内的读书人已是人人自危。

原广西巡抚李绂因升任直隶总督，恰于此时赴任路过河南，耳闻目睹了这一情况。李绂是康熙年间的进士，也是一位理学名家，在士绅中有很高的声望。他在河南暂住时曾劝田文镜不要刻意蹂躏

读书人，田否认自己有这样的用心。进京后，李绂写了一封弹劾田文镜的奏折，里面说田这个人性格阴暗，任用奸邪，还举了几个例证，说田文镜提拔市井无赖为官危害百姓。李绂正受雍正青睐，他的奏折引起了皇帝的重视，且调查之后发现李绂列举的田文镜害民的案例确实不假。田文镜随即受到了皇帝的严厉斥责。

田文镜深谙权术，反击思路别出心裁。在给雍正的密折里，他非常干脆地承认自己提拔的官吏确实害民不浅，确实是失职了，转而开始大谈特谈李绂之所以弹劾自己，完全是出于科举出身的官员“彼此为援”的弊俗。为证实他的指控，田文镜还“考据”出了几个受过他弹劾的河南官员其实是李绂的同科进士。据此，田给李绂扣了一顶“科举朋党徇私为奸”的大帽子。他扣的帽子正中要害。事实上，李绂也明白这层要害，所以他在弹劾田文镜时，绝口不提河南读书人所遭受的折辱，只说有确凿证据的害民事件。田文镜的回奏点破了这层要害。雍正很快就改变了立场，他给田文镜发去御批：“今览尔此奏，乃无稽之谗言也……具折奏来，朕自有道理！”

所谓的“朕自有道理”是皇帝重新表态，给田文镜送去了风羊和荔枝以资鼓励；给李绂扣了一顶“喋喋之辞，而见轻于朕”的大帽子，撤掉了他的直隶总督，先是降为工部侍郎，再降为奉天府尹，最后投入狱中。关押期间，雍正曾两次命人将李绂提至刑场陪绑，用刀架在他脖子上，让他欣赏处决死囚的实况。(15)

李绂失势的同时，一场针对科甲官员的全面打击迅速展开。雍正在谕旨里说，朋党的坏风气一天不清理干净，天下的公理就一天不能得到伸张，为了将这样的坏风气“尽行洗涤”，哪怕废掉千年沿袭的科举，自己也在所不惜。

在这场运动中，被雍正抓出来予以全方位人格羞辱的典型是云贵总督杨名时。杨出自康熙朝重臣李光地门下，也是一位理学名家。李光地去世了，李绂进了监狱，杨名时又对打击科甲官员的运动持有异议，于是就被雍正选中了。

随后，诸多古怪离奇的打击狂风暴雨般砸向杨名时，撤职降级自不必说了。雍正五年（1727年），杨名时奏请疏浚洱海河道，放在平常，这就是一件准或不准的事情，这时却被皇帝无限上纲上线。雍正说，杨名时这个混蛋在自己即将离任的时候，才提出这样的奏请，显然是想为自己在地方上留下好名声。奏请不用秘密的折本，而非要用公开的题本，也是想让所有人都知道，以博取美誉。再者，这样的好事不留给后任去做，无非沽名钓誉。这样的人"尚得觍颜自命为读书人乎"？说完这些诛心之论，雍正尚不解恨，紧接着下了一道刻薄到极致的命令：既然杨名时想要为地方造福，那不如就命他拿自己的资产来疏浚洱海河道吧。他死了之后，让他的儿孙继续承办，洱海河道的疏浚工程就永远承包给杨名时他们家了。只有这样，才能使天下人知道"沽名邀誉之徒不但己身获罪，而且遗累子孙也"。(16)

为了整垮杨名时，雍正安排了没有科举背景的朱纲去做云南巡抚。朱纲赴云南上任之前，多次蒙雍正召见，面授整治杨名时的方针。朱纲知道自己去做云南巡抚只有一个任务，就是按雍正的秘密交代整治杨名时，而完成任务的标准是查出杨名时贪污腐败的罪证，给他扣上"假道学"的帽子，进而将之问成死罪，也就是从肉体与精神上作双重消灭。所以，他一到云南就雷厉风行地掘地三尺，却没有挖出什么值得大做文章的东西，反将雍正的宠臣李卫的诸多不法勾当给顺藤摸瓜挖了出来。无奈之下，雍正只能在朱纲弹劾杨名时任内粮仓、钱库存在亏空的奏折上批示：朕知道，这些亏空是布政使常德寿的杰作，与杨名时无关，但他在任时没有弹劾常

德寿，表示他很乐意为这些亏空负责。勒令他来赔偿这些亏空，常德寿免罪，不予追究。[(17)]

再然后，雍正又决定让杨名时进京，当面接受训斥。沿途各地官员都接到了圣旨：杨名时进京的路上，不许任何人以礼接待，不许任何人为他鸣冤，不许出现任何不和的声音。必须让杨名时感到，他在这个世界上是孤立无援的。

这是一场旷日持久的人格侮辱运动。自雍正四年起，每个上任的官员都负有打压科举出身的官员的政治任务，皇帝甚至还为他们定下了具体的指标。最终，雍正得偿所愿，在清帝国造就了一种“天下方轻读书人，不齿举人进士”[(18)]的新风尚。

三、以密折困锁群臣而自困

除了侮辱科甲官员的人格，雍正还有一个治理天下的不二法门，那就是密折制度。

密折是皇帝赋予特定官员秘密奏事的特权，出现于康熙年间，如江宁织造曹寅就拥有给皇帝写密折的特权。康熙认为明代的厂卫容易尾大不掉，也看不起明太祖微服私访的手段，故创造了密折制度。康熙对自己的判断力极为自负，不止一次言及自己在甄别真伪方面的经验极为丰富，自信“人不能欺朕，亦不敢欺朕，密奏之事，惟朕能行之耳”。[(19)]

雍正对自己的判断力的自信远甚于康熙。登基之后，密折制度即上升为皇帝治国的主要手段。康熙晚年虽一再鼓励臣下密折奏事，但规模一般，参与密奏者不过百余人；雍正朝短短十三年，参与密奏的官员多达一千一百多名。康熙朝六十一年，现存朱批过的密折不过数千件；雍正朝十三年，现存朱批过的汉文奏折三万五千

余件，满文奏折七千余件，其中大部分属于密折，可见雍正对密折的情有独钟。[(20)]

利用密折制度，雍正将清帝国的核心官员全部纳入自己的间谍网络之中，官员们的一举一动全在他的掌握之中。同时，他也成功将自己丢入了如山的垃圾奏折之中。

雍正常常在朱批里痛骂地方官给自己送垃圾奏折，增加自己的工作量。比如雍正三年二月初三，广东巡抚年希尧上呈3件奏折，雍正阅后发现，奏折的内容早已报告过了，于是在朱批里责备道：“业经报明该部之事，又何必多此一奏，想尔粤省更无事可入告矣。如许遥远，特差人赍奏此三事，殊为可笑。”[(21)]

雍正也很讨厌地方官员上折子谢恩、表决心。这样无用的奏折占去了皇帝大量的办公时间，让他不胜其烦。他在朱批里反复强调自己没时间，让地方官员不要再写了送来。比如雍正三年，福建学政黄之隽多次上折子叩谢皇恩，赞颂谕训。雍正无奈回复道：“凡百只务实行，不在文字语言，颂圣具文，朕实厌览。此数奏甚觉浮泛不实，如此等之奏，再不必，朕实无暇。”[(22)]

雍正九年（1731年）十一月，镇海将军王釴上奏，说自己月前接到朱批的谕旨，里面有皇上的“谆谆告诫”，自己“捧读之下，感激愈深”，决心为皇上效犬马之力，否则自己就不配为人。雍正读到要吐，在回复里表示，自己实在不知道该怎么批复这样的垃圾奏折：“汝等汉军人人如此奏，如出一口，言行相符者百无一二，朕实难以批谕……行与朕看，不必务言于朕听也。”[(23)]

对宠信的心腹之人送来的垃圾奏折，雍正的朱批一般较为温情。但他的温情之中仍透露出深深的无奈——越是心腹，越没有办法对他们的垃圾奏折视若不见。比如，他曾如此批复河南巡抚田文

镜：“你差人奏折太勤了，何必费此无益盘缠，况朕日理万机，亦觉烦索。你奏来，朕自然批谕，若如此来往，则无宁止矣。”[(24)] 意思是，你递奏折的频率也太高了，不要浪费这个钱，而且朕日理万机，也觉得烦。你送奏折来，朕自然是要批复的，批复了，你再回奏谢恩，朕再批复，这样来来往往，就无休无止了。

葛森是雍正的藩邸旧人，他担任贵州布政使期间，也很爱给雍正写垃圾奏折。雍正设身处地站在葛森的角度来理解这个问题，觉得他这么干，可能是为了显示自己与皇帝的亲密关系，进而“挟制上司恐赫（吓）属员”，所以如此回复他：“路途远，若无应奏事件，何必塞责，徒劳往返。若以此为挟制上司恐赫属员之举，尤其不可不必者，志之，勉力做好官，务实行。若倚仗小才技弄聪明，非长策也。”[(25)]

遇到非心腹之人送来的垃圾奏折，雍正的批复就没这么好脾气了。比如，雍正五年十二月初十，江南总督范时绎上了一道折子，说自己的辖区瑞雪普降，还造了一尊龙的神像。雍正读完勃然大怒，大骂范时绎汇报垃圾信息，毫不体谅自己日理万机之苦：“朕日理万机，毫不体朕，况岁底事更繁，那（哪）里有功夫看此幕客写来的闲文章，岂有此理！”[(26)]

雍正的十三年皇帝生涯，可以说是埋头批阅垃圾奏折的十三年，每天批复奏折的平均文字量高达八千字。他不断责备下面的人不体谅做皇帝的辛苦，不断给自己送来垃圾奏折。殊不知，他自己才是垃圾奏折产生的核心原因。

在康熙年间，有资格以密折奏事者不过百余人。雍正上台后玩起了“密折治国”，获准参与密奏的官员多达一千一百多名，相当于将清帝国中上层的核心官僚全部纳入了一张巨大的间谍网之中。这张网辐射全国，间谍们彼此隔绝，只许与皇帝单线联系。任何情

报，无论是身边的还是别省的，无论有没有确凿证据，都可以直接报告皇帝，由皇帝甄别。所有人都处于他人的监控之下，所有人都知道自己身边有皇帝的间谍，而不知道谁是自己身边的那个间谍。亦即，雍正时代的中高层官场，人人都是监视者，人人也都是被监视者。

比如，雍正曾通过密折命广东布政使王士俊监视广东巡抚傅泰，同时让傅泰监视王士俊；命两广总督郝玉麟监视王士俊，又命王士俊监视郝玉麟；命傅泰、两广总督孔毓珣（与郝玉麟存在时间差）、广州将军石礼哈等三人同时监视广州提督王绍绪，三名监视者互不知晓对方的秘密任务。雍正希望通过这种手段，将千里之外的广东官场掌控在手。[(27)]

在密奏制度下，每个地方官员的命运极大程度上取决于密折（包括自己的和别人的）留给雍正的印象。雍正个人的喜怒与爱好成了他们递送密折时最关心、最需要揣摩的问题。海量的垃圾奏折正是在各位官员微妙的揣摩下产生的。

礼节性的谢恩折子是雍正朝的垃圾奏折里的一个重要门类。雍正曾一再告诫地方官员不要专程派人来呈递谢恩折子，要谢恩的话，可附在其他有实质性内容的奏折里一并送来。比如，雍正二年，云南提督郝玉麟收到御赐孔雀翎，派人赴京送折子谢恩，雍正的批复是：“路远，如此等谢恩之章奏，不必特使人来。”[(28)]雍正五年，福建海坛总兵朱文接到雍正的朱批谕旨，派人送折子谢恩，雍正的批复是：“再有些微赏赐，随便训谕之旨，路途遥远，不必特差人回奏，若有应奏事宜之便，再一并奏谢。”[(29)]

但地方官员绝对不敢把雍正的这些批复当真，因为在这方面有很多“血的教训”。

比如，在给山东巡抚陈世倌的朱批中，雍正曾经大骂浙江巡抚黄叔琳，说他多次接到自己的朱批谕旨，竟然不上奏谢恩，实在是可恶至极："黄叔琳自任浙抚以来，大负朕恩，种种不可枚举。朕经严谕数次，竟无一字奏覆，封还朕谕，可恶至极！"黄叔琳当时因他事犯错，惹怒雍正，结果雍正跟他翻起了不谢恩的前账。在给浙江提督石云倬的朱批中，雍正也在谢恩的问题上大发雷霆："朕诲汝许多格言，何啻珍宝。况悉系亲笔所书，未见汝感激奏谢一字。似此随众赏赐些微物件，乃长篇大论以相烦渎，殊属不知轻重、不识大体之至！可惜朕一片苦心训诲汝如此顽蠢之人。自此亦不再训不再赏赐矣。"石云倬送了一道长篇大论的垃圾奏折来感谢皇帝赏赐的物品。雍正被他的垃圾奏折弄得心情非常烦躁，又开始翻旧账，怒斥石云倬曾得到自己赏赐的"许多格言"，竟然没有上奏谢恩。(30)

皇帝的雷霆之怒自然会提醒那些困于密奏制度的中高层官僚，谢恩折子一定要写，而且最好单独写、尽快写。写晚了，送晚了，凉了皇帝的心，指不定就会变成"未见汝感激奏谢一字"，那事情就麻烦了。写垃圾奏折至多不过挨骂，不写却很有可能让皇帝疑心自己的忠诚，孰轻孰重一目了然。

雍正的信条是"以一人治天下"(31)，且不容任何人挑战他的权威。马尔齐哈曾在奏折中引用《论语》中的名言"笾豆之事，则有司存"，意思是祭祀、礼仪方面的事务自有主管的官员负责。结果引来雍正痛批，说他拿这个句子说事实在居心叵测，肯定是想要蒙蔽自己，"其心不欲朕详查，则伊等邀结党羽，任意擅行"。(32)

如此，雍正就只能既以官僚集团为统治基础，也以他们为重点防范对象。早在雍正二年七月，他就颁布过著名的《御制朋党论》，大张旗鼓批评官员之间的横向交往，还将儒家知识分子赞颂

了几百年的欧阳修《朋党论》斥为歪理邪说。欧阳修说，朋党是个很正常的东西，自古以来就是君子与君子“以同道为朋”，小人与小人“以同利为朋”，皇帝应该做的不是禁止朋党，而是远离小人的伪朋党，亲近君子的真朋党。雍正说，欧阳修简直是胡说八道，他要是活到今天还敢发这种议论，我一定会当面痛斥他，让他幡然悔悟。[(33)]

针对科举出身的官员的人格侮辱和密折治国都是为了实现这个目的。前者试图以运动的形式打掉士绅在社会上的尊严、地位与影响力；后者试图通过制度建设的方式，将整个官场变成一个互相监视、互不信任、互相告密的地狱。

构建地狱的雍正必然会掉进这地狱之中。他在朱批里反复告诫地方官，要识大体，要明白什么事该奏报给皇帝处理，什么事不该奏报。也就是要体谅皇帝的辛苦，不要乱递垃圾奏折。但他的告诫不会有效，因为“以一人治天下”与要求官员识大体之间存在着不可调和的矛盾。密奏制度将官员集体变成了提线木偶，“笾豆之事，则有司存”的责有攸归的理念也遭到了皇帝的否定。对雍正朝的官员而言，现实很清晰：将问题送到雍正案前，求取朱批圣裁，才是理想的工作模式。

于是就出现了这样的结果：雍正将自己累了个半死，只能在密折里跟心腹宠臣李卫吐槽“朕代各省督抚办理者十居六七”[(34)]，即各省督抚十之六七的工作都是雍正替他们做的。地方官员则不断在谢恩折子里批评自己如何如何愚蠢，赞颂皇帝如何如何圣明。

当然，自批愚蠢的垃圾奏折看得多了，雍正也就明白过来了——这些人自贬愚昧，赞颂皇帝的决策英明，实为懒政。在朱批里，雍正留下了大量严斥官员以“庸愚”自居的内容。比如，陕西总督查郎阿的奏折里有“（皇上）鉴照无私，惟臣才识庸愚，见不

及此”的句子，雍正用朱笔把“才识庸愚”四字划去，批复道：“朕深恶此等字句，你虽甘以庸愚自居，则朕以庸愚人寄托三省严疆重任，则朕之庸愚更胜汝之庸愚也！”你说自己平庸、愚蠢，那朕任用你做地方大员，朕岂不是比你还要平庸、愚蠢？再如，福建巡抚常赉上奏说更调水师武弁的事情，皇上的指示最为圣明，“臣跪读之下，顿开愚昧，仰见睿虑周详，无微不到，实非臣下愚浅陋之识所能窥”。雍正读了之后大怒，批复道：“‘顿开愚昧’四字岂可唐（搪）塞耶？胡说至极！”显然，雍正也知道称自己“顿开愚昧”已成了地方官员常规的避责手段。(35)

这些严厉的斥责不会起效。皇帝既然要“以一人治天下”，臣僚也只好玩“以天下奉一人”，事事禀报，等待皇帝圣裁。

---

(1)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雍正朝汉文谕旨汇编》第2册，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239页。

(2) 翟世有拾金不昧的具体过程，可参见《“还金山”碑重现记》（《孟津文史资料》第22辑）中所载“还金山”碑的碑文。

(3) 《四库提要著录丛书·史部》，北京出版社2010年版，第56页。

(4) 杨启樵：《雍正帝及其密折制度研究》，岳麓书社2014年版，第174—175页。

(5) 赵伯陶：《落日辉煌：雍正王朝与康乾盛世》，济南出版社2002年版，第89页。

(6) 赵伯陶：《落日辉煌：雍正王朝与康乾盛世》，济南出版社2002年版，第88页。

(7) 冯尔康：《雍正传》，上海三联书店1999年版，第256页。

(8) 《清世宗实录》卷四十三“四年四月戊子条”，见冯尔康：《雍正传》，上海三联书店1999年版，第177页。

(9) 《谕直省督抚晓谕粮户除去儒户宦户名目严禁生监包揽钱粮》，见《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雍正朝汉文谕旨汇编》第三册，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373页。

(10) 蒋攸铦：《拟更定漕政章程疏》，见《魏源全集》第15册《皇朝经世文编》卷34—卷53，岳麓书社2004年版，第488页。

(11) 何兆燕：《从“封丘罢考案”看雍正对绅衿的整饬》，《哈尔滨学院学报》2017年第7期。

(12) 《雍正朝汉文硃批奏折汇编》第三册，江苏古籍出版社1989年版，第431—434页。

(13) 董含：《三冈识略》，辽宁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81页。

(14) 《朱批谕旨·田文镜奏折·四年六月十一日折及朱批》，见冯尔康主编：《清朝通史·雍正朝》，紫禁城出版社2003年版，第184页。

(15) 杨启樵：《雍正帝及其密折制度研究》，岳麓书社2014年版，第105—107页。

(16) 《四库提要著录丛书·史部》，北京出版社2010年版，第475—476页。

(17) 郭成康：《政治冲突与文化隔阂：杨名时案透视》，《清史研究》2002年第4期。

(18) 汪景祺：《读书堂西征随笔·缪礼科条奏》，见冯尔康主编：《清朝通史·雍正朝》，紫禁城出版社2003年版，第183—184页。

(19) 杨启樵：《雍正帝及其密折制度研究》，岳麓书社2014年版，第166页。

(20) 史松：《雍正研究》，辽宁民族出版社2009年版，第194页。

(21) 《雍正朝汉文朱批奏折汇编》第四册，江苏古籍出版社1991年版，第409页。

(22) 《雍正朝汉文朱批奏折汇编》第五册，江苏古籍出版社1991年版，第874页。

(23) 《雍正朝汉文朱批奏折汇编》第二十一册，江苏古籍出版社1991年版，第513页。

(24) 李国荣：《雍正严禁臣工渎奏》，《北京档案》1999年第8期。

(25) 《雍正朝汉文朱批奏折汇编》第二十册，江苏古籍出版社1991年版，第654页。

(26) 《雍正朝汉文朱批奏折汇编》第一册，江苏古籍出版社1991年版，第21页。

(27) 杨启樵：《雍正帝及其密折制度研究》，岳麓书社2014年版，第180—184页。

(28) 《雍正朝汉文朱批奏折汇编》第二册，江苏古籍出版社1991年版，第925页。

(29) 《雍正朝汉文朱批奏折汇编》第十册，江苏古籍出版社1991年版，第848页。

(30) ［日］宫崎市定：《雍正帝：中国的独裁君主》，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6年版，第186—187页。

(31) 雍正于故宫三希堂西暖阁题有对联“惟以一人治天下；岂为天下奉一人”。

(32) ［日］宫崎市定：《雍正帝：中国的独裁君主》，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6年版，第182页。

(33) 《御制朋党论》，见《世宗宪皇帝御制文集》，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五卷。

(34) ［日］宫崎市定：《雍正帝：中国的独裁君主》，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6年版，第152页。

(35) 张书才：《雍正帝严斥官员以“庸愚”自居》，《历史档案》1993年第3期。

第十五章
同光中兴的逻辑

咸丰十一年（1861年）是清帝国命运的转折点。

这年八月，咸丰皇帝爱新觉罗·奕詝死在了热河行宫。他生前留下的人事布局——肃顺、载垣、端华等八名顾命大臣被恭亲王奕䜣联手慈安、慈禧两宫太后，以秘密政变的形式逮捕。肃顺被直接处决，赐载垣、端华自尽，余者或被革职，或被充军。

前任皇帝及其八人核心班底被连根拔起，清帝国的内政与外交有了改弦更张的空间。

一、咸丰的外交与肃顺的内政

咸丰皇帝奕詝自二十岁登基，即致力于在对外政策上重拾“以夏制夷”的昔日荣光。

那些在道光年间因主张抚绥议和而受重用的官僚，在咸丰初年纷纷下台。浙江宁绍台道咸龄被开缺的罪名是“惟夷首之言是听”，闽浙总督刘韵珂与福建巡抚徐继畬被免职的罪名是“委曲以顺夷情”；朝中重臣穆彰阿与耆英被革（降）职时，皇帝甚至亲笔撰写了他们的罪状，说他们排挤中伤主战派，“抑民奉夷”。[(1)]取而代之的政坛红人，是那些长期被弃用的主战派，比如曾在中国台湾与英国人发生武力冲突的姚莹。

可惜的是，皇帝的强硬立场基于他盲目的自信，并无真正的实力作为支撑。

咸丰八年（1858年），英法联军兵临城下，不得不接受《天津条约》的咸丰皇帝，只能将帝国的荣光寄托在外交礼仪之上。他向

前方负责谈判的官员下达指示，要求条约中必须规定西方使节来华，“一切跪拜礼节，悉遵中国制度，不得携带家眷”[(2)]，理由是：若允许西方使节觐见皇帝，以鞠躬代替跪拜，自己必会颜面尽失，清廷何以为天下共主？

但清军毕竟战败了，咸丰的指示无法得到贯彻。中英《天津条约》的第三款中，白纸黑字规定，英国乃自主之邦，与中国平等，大英钦差大臣觐见大清皇帝，必须使用英国使节拜谒其他国家元首的统一礼节。

可用的对策只剩下回避与西方国家使节会面。咸丰十年（1860年），因为换约纠纷，英法联军自天津攻入通州。咸丰对联军的八项议和条件全部应允，唯独对英方提出的国书须“亲呈大皇帝御览”一条表示“万难允许”，责令负责谈判的怡亲王载垣坚决抵制，还说了重话——若抵制不成，“该夷固执前说，不知悔悟，唯有与之决战”。[(3)]

当然，决战并不存在。皇帝匆忙逃去热河，英法联军攻入京城，烧掉了圆明园。恭亲王奕䜣奉命收拾残局，与列强签订《北京条约》。洋人退去，英、法两国也承诺不再坚持让公使觐见皇帝“亲递国书”。但咸丰对他们的承诺并不放心（毕竟外国公使已经正式进驻北京），他坚持留在热河，不愿返回京城，且对恭亲王奕䜣以平等礼仪与洋人会见一事伤心欲绝：“此次夷务步步不得手，致令夷酋面见朕弟已属不成事体，若复任其肆行无忌，我大清尚有人耶？”[(4)]

咸丰十一年，咸丰在承德去世。清帝国在外交上紧绷了多年的强硬立场瞬间松弛了下来。

肃顺是咸丰高度倚重的权臣。他并不是一个坏人，甚至可以说，在咸丰年间他是一名少见的有政治理想的高层官僚。作为满人，肃顺很愿意结交、重用汉人。《奴才小史》里说，肃顺当政之时，对待满官"眦睢暴戾，如奴才若"，对待汉官却"颇为谦恭"，理由是"咱们旗人浑蛋多"。曾国藩、胡林翼、左宗棠等人在咸丰年间得到重用，都与肃顺有直接关系。曾国藩升任两江总督是肃顺的建议；左宗棠遭人弹劾，也是肃顺维护；郭嵩焘等开明的汉族知识分子也是肃顺着意结交的对象。[5]

肃顺还是咸丰朝整顿官场腐败最积极的人。咸丰八年，他查办"戊午科场案"，杀了包括大学士柏葰在内的五位中央官员，数十名高官与新中举人被革职或流放。咸丰十一年，户部为逃避肃顺对"宇字五号案"的追查，纵火焚烧了户部档案，大火持续了六个时辰，相关文档、字据付之一炬。户部被逼到这种程度，可见肃顺反贪是在玩真的。所以，大火之后，仍有数十名高官被革职、抄家。[6]此外，肃顺在政治生涯晚期（即被杀前夕），还曾"奏减八旗俸饷"，理由是"满人糊涂不通，不能为国家出力，惟知要钱耳"[7]，不足以充当朝廷的统治基础，还要消耗朝廷大量的金钱。

凡此种种，都是对既得利益集团的侵害。所以，处决肃顺让整个官僚集团欢欣鼓舞，囚车经过之处，"其怨家皆驾车载酒，驰赴西市观之"，前往围观，指使儿童朝囚车扔泥土、瓦块，痛骂"肃顺亦有今日"。[8]

肃顺死了，清帝国官场多年来的战战兢兢也瞬间松弛了下来。

二、恭亲王奕䜣与慈禧太后的改革

咸丰要做的是维护清帝国"天下共主"的尊严，肃顺要做的是维护清帝国官僚系统的廉洁、高效。抽象而言，肃顺的这两件事情

似乎均有助于维护政权，但具体来看未必。咸丰说，“该夷固执前说，不知悔悟，唯有与之决战”，但清军与英法联军作战并无胜算。肃顺大刀阔斧动旗人的蛋糕，虽然提高了官僚集团的效率，但旗人是清廷的重要统治基础，他们的反弹会给朝局带来难以估测的震荡。

如今，咸丰与肃顺都死了。纠正他们生前的内政、外交路线就成了议政王奕䜣与新晋太后慈禧的首要之务。

英法联军初来时，奕䜣也曾是主战阵营里的一员。奉命议和之初，他仍幻想着可以整顿清军固守京城，一度强硬要求联军先行退兵，再释放扣押的英、法俘虏。但现实无情，清军不但一触即溃，而且“开门纳敌”，联军几乎未损一兵一卒就进了北京城。留给奕䜣的只剩下城下之盟。

签订《北京条约》时，奕䜣的内心是忐忑的，他担忧“目前之所失既多，日后之贻害无已”[(9)]。但联军“以万余众入城，而仍换约而去，全城无恙”[(10)]，即竟能依照条约，主动退出京城，又让他颇感意外。在给咸丰的汇报里，他说洋人“渐觉驯顺”“志在通商”，并无夺取清帝国政权的野心，可以用信义来笼络他们，“驯服其性”[(11)]。驯顺、驯服等字眼既是在迎合咸丰的口味，多少也代表着奕䜣内心的真实想法。

真正让奕䜣对近代外交产生信任的是同治三年（1864年）的“李福斯事件”。当年春，普鲁士首任驻华公使李福斯乘坐军舰由天津进入北京，计划赴总理衙门面见奕䜣呈递国书。在大沽口，李福斯见到三艘丹麦商船，遂将其扣押（普鲁士与丹麦当时处于战争状态）。刚刚接触到《万国公法》的奕䜣以国际法为依据，谴责李福斯，说他在中国海面扣留他国船只是对中国主权的侵犯，扬言此

事若不能得到合理解决，总理衙门将拒绝接待李福斯一行。李福斯只好派人到总理衙门谢罪，承认此事“咎在我国”。[(12)]

同治三年（1864年）七月，奕䜣奏请拨款印刷《万国公法》。在奏折里，奕䜣特意强调了李福斯事件：“本年布国（普鲁士）在天津海口扣留丹（麦）国船只一事，臣等暗采该律例中之言，与之辩论，布国公使即行认错，俯首无词。”[(13)]次年正月，三百部由总理衙门大臣作序的《万国公法》被分发给各省督抚参考、备用。清帝国终于尝试走出“华夷秩序”，开始意识到遵守条约、遵守国际法的重要性。

大约在同期，清帝国的官僚也看到了来自慈禧太后的极大善意。

慈禧太后不关心科举考试是否公正，也不关心官员群体是否贪腐成灾，她关心的是官僚集团对最高决策层（也就是她自己）的向心力。她的执政方针是“博宽大之名”。派人负责科考搜检工作，太后的指示是“勤慎当差，莫要多事”[(14)]——好好干，别像肃顺那样整出一大堆事情来。见到御史弹劾自己的亲信，太后的第一反应是“此无他，不过我所用之人总不好”，想弄死这个对自己没有向心力的御史，而当获悉御史搞这种弹劾，不过是在敲打官场，提醒别人不可忘了给自己多送炭敬时，太后的反应就成了大笑。[(15)]太后很明白，官僚的日子过舒服了，才会更加拥护自己，自己的日子也才能过得舒服。

除了遵守条约，承认国际法，融入国际社会和与官僚集团和解这两项，奕䜣与慈禧在咸丰十一年启动的改革还有一项内容——积极将西方的军事、工业技术引进过来。不过，与世隔绝太久，引进并非易事。“阿思本舰队事件”就是一个惨痛的教训。

同治元年（1862年），奕䜣试图通过总税务司李泰国（英国人）从英国购回一支现代化的舰队。但李泰国有着奕䜣不知道的盘算，他拿了清廷的钱，致力组建的却是一支完全由英国人掌控、只听命于自己的私人舰队。同年十一月，李泰国与他选定的舰队司令阿思本（原英国海军将领）在伦敦签署了一份包括十三项条款的合同，其中第二条规定："凡中国所有外国样式船只，或内地雇外国人管理者，或中国调用官民所置各轮船，议定嗣后均归阿思本一律管辖调度。"意思是：阿思本不仅是这一支舰队的司令官，也是中国所有官船（无论中央和地方）的司令官。第四、第五条又规定："凡朝廷一切谕阿思本文件，均由李泰国转行谕知，阿思本无不遵办；若由别人转谕，则未能遵行。""如有阿思本不能照办之事，则李泰国未便转谕。"意思是：舰队虽然是中国出钱购买的，名义上属于清帝国，但舰队司令阿思本只听李泰国的指挥；李泰国名义上接受清廷领导，但只要他不同意，就可以拿"阿思本不能照办"为理由，拒绝将清廷的旨意传达给阿思本。(16)

如果李泰国的阴谋得逞，那么他将拥有一支几乎可以完全控制东亚的可怕的海军力量，李泰国有可能成为整个东亚的"太上皇"。

奕䜣察觉到情况不对时，钱已经花了出去，而且超支。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的官员无法从李泰国那里获知任何关于那支舰队的详细报告，无法掌握具体的开销账目，根本不知道李泰国把钱花在了哪里。而李泰国招募的六百多名英国官兵已经到位，"合同十三条"也已经签署完毕。同治二年（1863年）七月，阿思本率舰队抵达天津，与李泰国一道威胁清廷，要么接受既成事实，要么听任阿思本解散舰队，清廷的全部投入将血本无归。最后，在美国驻华公使蒲安臣的提点和斡旋下，军舰被送回英国，由英方负责变价出售，李泰国被解职。有统计称，在这场闹剧中，不算中间的人事成本，清

廷支出白银172万两，收回102．1万两，白白亏损了69．9万余两。(17)

直接搬运的损失如此惨重，培养合格的技术人才就成了洋务运动的当务之急。同治五年（1866年），奕䜣上奏请求在他一手创办的京师同文馆内添设“天文算学馆”，理由是“洋人制造机器、火器等件，以及行船、行军，无一不自天文算学中来”。为了堵住反对者的嘴，奕䜣还在奏折里胡说，宣称西学的根在中国，只不过洋人心思缜密，善于运思，所以现在的水准才高于中国。但究其本质，西学的源头仍然是中学。他希望，翰林院里那些负责编修的庶吉士也能够放下成见，加入天文算学馆，将自己培养成合格的技术人才。(18)

成见是不可能放下的，因为成见关乎切实的利益。朝廷要培养技术官僚，政治官僚不可能没有话说。大学士、帝师倭仁亲自披挂上阵，强调立国之道在“在人心不在技艺”，痛骂奕䜣的做法是“以夷变夏”，将会招致亡国灭种的结局。倭仁是清帝国政治官僚的最高代言人，在他身后，还有李鸿藻、翁同龢、徐桐等一群政治官僚结成了同盟，在声势上，远非奕䜣一人所能抵御。

不过，倭仁等人的声势再大，在同治五年的“同文馆之争”中也不会有胜算。培养技术官僚的目的是为了更好地维系爱新觉罗氏的统治，政治官僚的利益必须为爱新觉罗氏的利益让道。所以，纷争进入白热化后，两宫太后站了出来力挺奕䜣，下旨要求倭仁随时留心寻访精于天文算学的国人，且命他在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行走。倭仁高举反对西学的旗帜，这个职务对他是一种含蓄的羞辱。

三、同治中兴的含金量

靠着两宫太后的支持，奕䜣获得了1866年“同文馆之争”的胜利。对奕䜣而言，这不是一件值得高兴的事情。五年前，他本是议政王，与两宫太后共同执政，是清帝国双头政制的一端，他可以对倭仁下达命令，而不必求助于两宫太后。

但双头政制没有办法在改革中维持稳定。所有的改革本质上都是利益的重新分配，任何一头因为改革而获益，都会导致另一头的不满，进而就会出现改革的绊脚石。当奕䜣通过支持曾国藩、李鸿章等人在改革中获得越来越多的权力时，慈禧太后是不高兴的。同治四年，慈禧太后与议政王当面起了冲突。慈禧责备奕䜣重用汉人：“这天下，咱们不要了，送给汉人吧！”奕䜣不服，慈禧又发飙：“汝事事与我为难，我革汝职。”奕䜣回嘴：“臣是先皇第六子，你能革我职，不能革皇子。”他从久跪中擅自站起，慈禧又“大呼，言恭王欲打她”，太监们只好先把奕䜣弄了出去。[(19)]

次日，慈禧写下一份字体幼稚、错字连篇的亲笔懿旨，责备奕䜣自当上议政王以来，“妄自尊大，诸多狂敖（傲），以（依）仗爵高权重，目无君上，看朕冲龄，诸多挟致（制），往往谙始（暗使）离间，不可细问……”[(20)]，宣布革去奕䜣的一切职务。

慈禧与奕䜣翻脸的这一年是同治三年，当年湘军攻陷天京，太平天国已成强弩之末。在这个时节拿“重用汉人”跟奕䜣算账，明摆着是要煽动朝中心怀不满的满族亲贵，打破双头政制，将奕䜣从议政王的位置上拉下来。

满族亲贵确实有很多的不满。1864年，全国总督缺额十名，旗人只占其二席，汉人占了八席；全国巡抚缺额十五名，全部被汉人占据。但奕䜣也有他的苦衷。自咸丰元年（1851年）太平天国起事，为了保住爱新觉罗氏的皇权，重用汉人为地方督抚就一直是朝廷的既定策略。道光三十年（1850年），全国总督缺额十名，旗人

只占四席，汉人占了六席；巡抚缺额十五名，旗人只占一席，汉人占了十四席。[(21)]之后，咸丰年间，清廷一直在与太平天国作战，肃顺也就一直在重用汉人。奕䜣的所作所为不过是因袭旧制，慈禧给他扣大帽子，说他重用汉人是要葬送爱新觉罗氏的天下，他自然不服。

1865年，奕䜣的议政王头衔被摘去。但靠着与慈安太后、文祥、醇亲王及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等地方督抚之间的亲密关系，他仍得以继续执掌军机处和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他与慈禧之间的关系也由“双头政制”变成了“一二线关系”。慈禧在二线垂帘，成了最终决策者。奕䜣在一线忙碌，成了信息枢纽，成了中转站、提议者和执行者。光绪二年（1876年），文祥去世。光绪七年，慈安太后去世。奕䜣的支持者日渐凋零，他与慈禧之间的一二线关系也愈发明朗。

双头政制脆弱，一二线关系同样不好维系。因为一线执行者天然要做二线决策者的替罪羊，奕䜣与慈禧也不例外。到了光绪十年（1884年），终于发生了甲申易枢，慈禧对军机处和总理衙门大换血，恭亲王的势力被迫从朝堂全面退出。“甲申易枢”缘于中法战争的失利，奕䜣领导的军机处确实应该负责任，但失利的核心原因是朝廷和战不定，而和战不定的根源在于慈禧的立场不明。她一面以谕旨安抚致力于维持和局的李鸿章，又同时放纵朝中清流弹劾主和派，导致军机处无所适从。但慈禧身在二线，战败的锅只能由在一线主持政务的奕䜣来背。

尽管李鸿章说甲申易枢让他“念之心悸”[(22)]，但慈禧与奕䜣之间的权力斗争并未改变时代的走向。奕䜣之前如何重用汉人督抚，慈禧也继续如何重用汉人督抚。奕䜣之前可以接纳条约外交，与列强改善关系，慈禧也可以容忍各国公使觐见皇帝不行跪拜之

礼。奕䜣如何支持李鸿章的洋务，慈禧也继续如何支持李鸿章的洋务。

于是，就有了所谓的“同治（光）中兴”。1863年，在太平天国行将溃灭之际，通政使王拯即上奏说“此诚我国家运际中兴，千载一时之际会也”；1875年，又有陈弢收录朝臣奏章编辑成书，直接定名为《同治中兴京外奏议约编》。(23)在整个19世纪70年代，“同治中兴”之说得到了朝野大多数人的认同。

同光中兴的发生逻辑，扼要来说包括三点：

1．战事上，依赖重用汉族士绅，向地方督抚放权——主要是在人力物力的汲取方面，赋予地方更大更灵活的权力；支持湘军与淮军，击溃了太平天国与捻军。正如印鸾章《清鉴》里所总结的那般：“（慈禧）听政之初，军事方亟。两宫仍师用肃顺等专任汉人策。内则以文祥、倭仁、沈桂芬等为相，外则以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等为将。自军政吏治，黜陟赏罚，无不咨询，故卒能削平大乱，开一代中兴之局。”也就是与秦制王朝的统治基础官僚集团达成和解、结为利益共同体（或谓向官僚集团让权让利），以应付内乱。(24)

2．内政上，依赖开征厘金与整顿关税，让财政系统摆脱瘫痪重新运转，支持了洋务民用企业、军工企业和新式海军的创建。以关税为例，在学习欧美引入近代海关制度，并聘用洋人进行管理之前，清廷的关税是“承包”给地方的，地方只管缴足中央的定额，定额之外横征暴敛的数额，从来无人知晓。时人估计，中央拿到的定额，不到地方实际横征暴敛总额的十分之一。在洋人的帮助下成立近代海关之后，降低了税率，砍掉了大量不合理税目，关税收入却跃居中央财政收入的第二位。道光时代，户部的常年财政收入只有4200万两左右。光绪年间几乎增加了一倍，1893年的财政收入是

8968万两，其中厘金关税两项合计达3392万两。而在1849年，关税收入只有区区472万两（当时尚未征收厘金）。[25]通过开设新税种并引入新的征税技术，提升了秦制国家的汲取能力。当可瓜分的蛋糕持续做大时，统治集团的内部矛盾，自然也就被弱化和掩盖了。

3．外交上，尝试着暂时抛弃“华夷秩序”，融入新的国际环境。其间虽有中法战争的波折，但自1861年起至1894年甲午战争爆发，清廷总体上仍可谓获得了长达三十余年的和平发展时段。也就是在力不能敌的前提下，外交上以接纳条约为代价，将外部力量对秦制王朝的冲击降至最低限度。

以上三点，既是“同光中兴”的由来，也是它的核心含金量所在。[26]遗憾的是，这条“中兴之路”终究只是秦制王朝模式下关于控制与汲取之术的小修小补，或谓适当松动。当历史的车轮进入20世纪，慈禧的非理性引来巨量的外部冲击，中兴的进程也随即戛然而止。

---

(1) 郭廷以：《近代中国史纲》，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第83页。

(2) 《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第三册，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985—986页。

(3) 《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第二次鸦片战争》第五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78年版，第85—86页。

(4) 《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第二次鸦片战争》第五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78年版，第269页。

(5) 高中华：《肃顺与曾国藩集团关系述论》，《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刊》2012年第3期。黎泽济：《郭嵩焘和肃顺的关系：对〈清史稿〉的一点质疑》，《学术月刊》1988年第9期。

(6) 王家范：《肃顺之死：晚清史随札》，见《中华文史论丛》第六十二辑，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

(7) 薛福成：《庸庵文续编》下卷，见王继平：《晚清湖南史》，湖南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151页。

(8) 薛福成：《庸庵笔记》卷一，见邓云乡：《宣南秉烛谭》，河北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第59页。

(9) 《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第二次鸦片战争》第二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78年版，第160页。

(10) 沈兆霖：《吁请回銮疏》，见《近代中国对西方及列强认识资料汇编》第一辑，1972年版，第743页。

(11) 《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第二次鸦片战争》第五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78年版，第272页。

(12) 王维俭：《普丹大沽口船舶事件和西方国际法传入中国》，《学术研究》1985年第5期。

(13) 蒋廷黻编著：《近代中国外交史资料辑要》，湖南教育出版社2008年版，第373页。

(14) 小横香室主人：《清朝野史大观》卷四《科场舞弊》，河北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

(15) 黄濬：《花随人圣庵摭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第13页。

(16) 戚其章：《论“英中联合海军舰队”事件》，《社会科学辑刊》1991年第3期。

(17) 张雪蓉：《“阿思本舰队”糜费考辨》，《历史教学问题》1991年第3期。

(18) 《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汇编·洋务运动时期教育》，上海教育出版社1992年版，第43—45页。

(19) 《同治实录》卷一三二，见徐泰来：《洋务运动新论》，湖南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359页。

(20) 白寿彝主编：《中国通史》第11卷《近代前编》（下）引“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朱谕原件”，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1026页。括号内文字是对慈禧错别字的更正。

(21) 朱东安：《曾国藩集团与晚清政局》，团结出版社2013年版，第41页。

(22) 《李鸿章致张佩纶·光绪十年三月十五日》，见《李鸿章张佩纶往来信札》，上海人民出版社2018年版，第371页。

(23) 任念文：《论“同治中兴”》，见《晚清政治散论》，山西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78—79页。

(24) 印鸾章：《清鉴纲目》，岳麓书社1987年版。

(25) 周育民：《19世纪60—90年代清朝财政结构的变动》，《上海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0年第4期。

(26) 迟云飞：《晚清“同治中兴”的再认识》，《历史教学》（上半月刊）2015年第7期。

第十六章
清王朝灭亡的原因

从19世纪70年代喊出“同治中兴”，到清王朝土崩瓦解成为历史尘埃，中间只有短短的四十年。

秦制王朝的灭亡是有规律可循的，它们或亡于外敌的入侵，或亡于内部利益集团（也就是统治基础）的分裂，或亡于底层民众脱离原子化状态，变成有组织的力量（如规模较大的流民集团），且多数时候是二者、三者兼备。

中国历史上的最后一个秦制政权——清王朝灭亡的原因也是如此。

一、太后“西狩”大损中央权威

19世纪80年代，中法战争不够体面的落幕，给一众期望实现更高程度中兴的清朝官员与士绅留下了巨大的遗憾。尤其是战争末期还出现了“镇南关大捷”之类的军事胜利（尽管这种胜利有其特殊性，难以复制），进一步加重了他们的失落感。

遗憾与失落催生出了批评。淮军出身的两广总督张树声深度参与了中法战争，对朝廷“战和不定”给战局造成的影响有极深切的体会。光绪十年年终，他鼓足勇气，于临终之际写了这样一道遗折：

> 微臣病势垂危，谨伏枕口授遗折，望阙叩头恭谢天恩……夫西人立国，自有本末，虽教育文化远逊中华，然驯至富强，俱有体用，育才于学堂，论政于议院，君民一体，上下一心，务实而戒虚，谋定而后动，此其体也；轮船、火炮、洋枪、洋炮、水雷、铁路、电线，此其用也。

> 中国遗其体而重求其用，无论竭蹶步趋，常不相及，就令铁舰成行，铁路四达，果是恃欤……圣人万物为师，采西人之体以行其用，中外臣工同心图治，勿以游移而误事，勿以浮议而隳功，尽穷变通久之宜，以尊国家灵长之业，则微臣虽死之日，犹生之年矣。(1)

张树声口中的“论政于议院，君民一体，上下一心”指向的是慈禧在中法战争期间的“瞎指挥”——慈禧那些基于自身利益做出的“理性决策”往往与地方督抚的利益背道而驰。张树声将“论政于议院”作为西人立国之本提出来，希望朝廷效仿，实际上是想要以“论政于议院”来取代慈禧的“一二人裁决于深宫”。这“众人”并非选举出的议员，而是指军机大臣、地方督抚之流。

但当时的清廷，中央权威正盛。若非临终遗折，张树声或许也不敢如此建议，即便建议，言辞也不敢过于露骨。再往后，戊戌变法浪潮中的官民上书依然如此。历史学者茅海建有这样一段总结：

> 在我所见的275件上书中，论及议会者不过以上数件，由此似乎可以得出这样的印象：尽管从其他材料来看，当时人对议会的议论颇多，而在正式上书中，言及议会者很少。在有限的议论中，并没有涉及西方代议制之根本，即议会的权力及议员的产生方法，更未谈及议会之理念，即“主权在民”。他们的心目中，西方议会的主要作用是“上下互通”，与中国古代的君主“询谋”是相接近的。(2)

“询谋”就是咨询、商议、征求意见。也就是说，尽管这一时期已有部分知识分子如梁启超、严复、谭嗣同、唐才常等在鼓吹扩张民权、限制君权，但因朝廷的权威尚在，正式的上书中是没有这样的内容的。康有为就是其中的一个典型，他提供给光绪皇帝的改

革建议，如“制度局”“懋勤殿”等，均属于“询谋”模式，也就是创建一个由有识之士组成的咨询、决策机构。他还在《国闻报》上刊文《答人论议院书》，明言“中国惟以君权治天下而已”。[(3)]大略同期，汪康年在上海办《时务报》，友人高凤谦也多次致信，劝他不要在报上大谈扩张民权，理由之一正是“中国民智未开，既不足与陈高深之义，君权太重，更不能容无忌讳之言，无益于事，徒为报馆之累”。[(4)]

所谓“君权太重”即是指朝廷的权威尚在。但朝廷的权威在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终于因慈禧的“西狩”而受到了极大的损害，甚至一度一落千丈跌到了谷底。

对于这种变化，孙中山深有感触。他曾比较过1895年10月广州起义与1900年10月惠州起义时的民心之别。孙说，1895年广州起义失败时，“举国舆论莫不目予辈为乱臣贼子大逆不道，咒诅谩骂之声不绝于耳”；1900年惠州起义失败后，“则鲜闻一般人之恶声相加，而有识之士，且多为吾人扼腕叹惜，恨其事之不成矣。前后相较，差若天渊”。[(5)]

类似的感受也见于蒋梦麟的回忆。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清朝海军在甲午战争中惨败，蒋梦麟见到的年画却是清军将日军打得落花流水，“其中有一张画的是渤海上的海战场面，日本舰队中的一艘军舰已被几罐装满火药的大瓦罐击中起火……另一幅画则画着一群戴了铐链的日本俘虏，有的被关在笼子里。中国打了大胜仗了……后来我年纪大一点以后，我才知道我国实际上是被日本打败了”。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蒋梦麟很快就知道了“慈禧太后已经命令各省总督把所有的外国人一齐杀光”。[(6)]换言之，与静悄悄的甲午惨败相比，慈禧“西狩”带给清帝国的冲击可以说是核弹级别的。

慈禧“西狩”造成的直接后果有三：一是庙堂内部，中央再也不能对各部门及地方如臂使指。庚子年南方督抚拒绝北上勤王，且策划“东南互保”，即是例证。二是江湖之远，士绅彻底对清廷失望。容闳、严复、唐才常、章太炎、文廷式等名流在上海张园成立“中国议会”，章太炎、钱玄同在日本绝不肯被称作“清国人”[(7)]，均是例证。三是辛亥革命由此爆发。

二、新政改革直指地方督抚

“庚子之变”极大地改变了清廷内部的权力结构。朝廷对财权、人事权、司法权、外交权、行政权乃至兵权的控制进一步衰弱。相应地，地方督抚的权力则有了很大的扩张。这种变化体现在之后的清末新政中，便是：

1．朝廷希望借“日式立宪”方式重新收回权力，重申君权的至高无上。

2．地方督抚对朝廷在光绪二十六年的不理性决策深感忧惧，故试图推动“英式立宪”。一面将自己手中的财权、人事权、行政权、司法权乃至军权合法化；另一面改革朝廷的决策机制。两广总督陶模在乱局初定之际上书朝廷，要求设立议院，就是出于这样的目的。陶模在奏折里说：“议院议政，而行政之权仍在政府，交相为用，两不相侵。”[(8)]很明显，他设想的“议院”已非戊戌变法呼吁的“询谋”机构，而是中央决策机构。陶模的主张背后潜藏的是对慈禧决策能力的极度不信任。

这种冲突在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达到了一个小高峰。

前一年，慈禧派载泽、端方、戴鸿慈等五人出洋考察各国政治。光绪三十二年载泽考察归来，向慈禧进了一道密折，核心思想是“宪法之行，利于国利于民，而最不利于官”[(9)]，劝慈禧采取日

式立宪，可以帮助君主（国）从督抚、士绅（官）手里把权力夺回来。七月初四（8月23日）载泽进呈密折，七月十三（9月1日）慈禧即宣布“预备立宪”，七月十四（9月2日）又宣布要改革官制，拟用立宪的名义，从地方督抚手里合法夺权——对这一用心，载泽等人在奏请改革官制的折子里说得非常明白：“循此不变，则唐之藩镇，日本之藩阀，将复见于今日。”[(10)]如果不把地方督抚手中的权力夺回来，我大清恐怕会重蹈唐朝藩镇之乱的覆辙。这就是“丙午官制改革”。

“丙午官制改革”的内容分中央和地方两部分。按御前会议商讨的结果，中央“略与日本现制相等”，就是继续保持君主高度集权的模式不变。地方则要“废现制之督抚，各省新设之督抚，其权限仅与日本府县知事相当，财政、军事权悉收回于中央政府”，具体做法是以立宪为名，在各省新设地方审判庭、地方议事会、地方董事会，分割督抚的行政权和司法权。立宪在当时是一种政治正确，督抚不能有异议，于是“人民程度不足”就成了督抚反对立即搞地方审判庭、议事会、董事会的主要理由。也有一些督抚回奏得很直白，比如河南巡抚张人骏说：“州县不司裁判，则与民日疏；疆吏不管刑名，则政权不一”[(11)]，他明确反对中央将司法权从地方督抚手里夺走。

反对的声浪当中以张之洞最为有力。张两次致电朝廷，逐一批评官制改革草案的内容，尤其对在各省设置地方审判庭，欲让行政与司法分立的做法耿耿于怀，说出了如今正值“天灾迭乘，民穷财匮，乱匪四起，士气浮嚣”，朝廷如此变革官职，很可能造成“眉睫之祸”的狠话。[(12)]张之洞还给浙江巡抚张筱帆致电，批评官制改革完全是胡来：“若果行之，天下立时大乱，鄙人断断不敢附和。倡议者必欲自召乱亡，不解是何居心！”[(13)]

袁世凯是地方督抚中唯一亲身入局，以“编制大臣”的身份参与制定新官制的。他本来的计划是与庆亲王奕劻联手，在中央成立责任内阁，以扩张相权，削弱君权，进而举奕劻为总理，自己为副总理。这是一种同样致力于中央集权，却有别于恢复君主专制的改革方向。袁得到奕劻、端方等人的支持，对这一改革方向抱有极大的期望，在编制局中一再“以死力争”，几乎闹到“全案皆其一人起草”的地步。但方案递上去之后，却遭慈禧否决。随后，朝堂上开始出现攻击袁世凯揽权、奕劻误国的风潮。慈禧采纳的新官制方案则直奔重塑君权而去，袁世凯不但没有建成责任内阁，他的北洋六镇也被慈禧以改制之名划入陆军部名下。(14)

同期，为阻断地方督抚要求改革中央官制、设立责任内阁的呼声，清廷中枢还达成过一项“五不议”的共识，具体内容是：军机处事不议，八旗事不议，内务府事不议，翰林院事不议，大（太）监事不议。(15)即一切可能削弱君权及皇室利益的话题均被剥离出了讨论范围。

“丙午官制改革”以不了了之收场。在中央，各部的名称虽然有所改动，有了外务部、度支部、法部、陆军部等新名称，但其运作模式与传统的六部并没有多少区别，以至于日本《东京朝日新闻》刊文讽刺说“此等内阁组织，真各国所无有”。在地方，督抚的抵制破坏了慈禧的集权梦，尽管后来又采取了将张之洞、袁世凯调入朝中担任军机大臣的办法，来削弱地方督抚的势力，但同样效果有限。此外，“丙午官制改革”还造成了两种后果：1．皇权与地方督抚的矛盾进一步激化；2．新官制里的军机处和中央各部的十三名长官，满人七名，蒙古人与汉军旗各一名，汉人只有四名，悍然打破了行之已久的满汉并列堂官的传统。这种做法让许多汉人督抚寒心，也开了之后的满汉官员内斗之先河。(16)

三、谘议局造就士绅组织化

在“丙午官制改革”的前一年，也就是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慈禧主导废除了科举制。

以科举为核心的传统功名体系是清廷重要的统治基础。没有这个东西，清廷很难将政治力量渗透到帝国的中下层。废除科举，意味着需要重塑统治基础，也就是寻找一种新事物来替代传统功名体系。

按照正常设计，新事物将是国会与地方议会。传统士绅将由举人、贡生转型为各级议会的议员，继续与体制保持一体，继续维持自己固有的地位与利益。但清廷与地方督抚围绕着权力分配问题展开的斗争旷日持久，士绅的身份转型也长期搁置，无法兑现。

非但身份转型搁浅，这一时期清廷还与士绅群体频繁发生利益冲突。比如，慈禧于1907年12月下达懿旨，用十分严厉的口吻谴责“各省绅商士庶”干预政务。谕旨说，近年来各省绅商士庶遇有内外政事，动辄拿立宪说事，“相率干预，一唱百和，肆意簧鼓”，以此干预朝廷决策，着实可恶。谕旨还说，所谓君主立宪，“固非人人皆得言事，亦非事事皆可参预”，绝不是说士绅们对什么事都可以直接批评或干预，而是“大权统于朝廷，庶政公诸舆论……其开设议院专为采取舆论”，士绅的声音只能是一种舆论，供朝廷采纳或不采纳。(17)

这份懿旨的颁布与江浙士绅发起收回苏杭甬铁路修筑权运动有直接关系。运动的起因是朝廷在铁路修筑权问题上出尔反尔。江浙两省的士绅成立的商办铁路公司本已获准修筑苏杭甬铁路，且部分路段已经开工。可是英方以1898年与清廷订立过借款代筑苏杭甬铁路的草约为由，要求清廷禁止江浙士绅自办。1907年10月，清廷颁布谕旨，将筑路权转移给英国，本国士绅只许“搭股”。(18)

清廷此举严重损害了两省士绅的利益。保路运动中，士绅们强烈意识到立宪改革与自身权益之间存在密切关系。他们在《时报》上刊文说，收回苏杭甬铁路修筑权“非仅铁路问题，乃民权问题”，公开倡议“合二十二省开国会，以争还我民权”。《申报》也刊登了不少江浙士绅的文章，有文章一语道破玄机称“今日应急设议院，然后可保路矿”。《申报》的社论说得更为明白：只有国会成立，监督政府，才能阻止朝廷向英国借款，才不会发生士绅利益被朝廷夺取的事情。要想从根本上解决问题，“非国会不得其当”。[(19)]

江浙士绅的活动力量与利益诉求刺激了慈禧在该年十一月颁布懿旨禁止“各省绅商士庶”干预政务，也刺激了清廷在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初出台《大清报律》，宣布对所有报纸的内容实行报刊发行前的审查。大略同期出现的由士绅组织、发起的联名“请开国会运动”，刺激清廷出台了《结社集会律》。但最让地方督抚与士绅群寒心的仍要数光绪三十四年七月颁布的《钦定宪法大纲》，旨在重塑皇权的无远弗届和至高无上，条款中遍布各种“议院不得干预”“皆非议院所得干预”“不付议院议决”“议院不得置议”……

1909年，士绅群体千呼万唤的“谘议局”终于得到允许在各省以选举的方式成立（中央的相应机构名为“资政院”）。张朋园统计了15省谘议局议员的出身，发现他们与科举时代的传统士绅高度重合，“他们中的89．13%具有传统功名，相对的，只有10．87%不具功名背景”。21省的63位正、副议长中，无传统功名者只有5人。[(20)]也就是说，新议员的主体正是那些渴盼身份转型已久的传统士绅。

然而，谘议局的成立并没有让士绅成为清廷的拥护者。因为，在清廷颁发的《各省谘议局章程》里，有一项规定是“谘议局仅为

一省言论之汇归”，“其所谓民权者，不过言之权而非行之权也”[(21)]。意思是：谘议局只是一个舆论汇总之地，议员拥有的“民权”只是朝廷所允许的发牢骚之权，至于该出台什么政策，该发布什么文件，该收什么税，该征什么捐，仍由朝廷和地方衙门说了算，资政院和谘议局均不得干涉。

在谘议局里做牢骚客显然不符合士绅群体对新身份的期望。他们在1907—1908年间频繁发起“请开国会”的签名请愿运动，绝不是为了得到这样一个结果。而且，为了分权制衡，朝廷本该赋予地方谘议局监督本省督抚的权力，如此则可以在中央、地方督抚与谘议局之间形成较为稳固的三角制衡关系。但朝廷担忧赋予谘议局监督权之后，资政院也会获得监督朝政的权力，于是反其道而行之，在谕旨中严令谘议局议员必须守规矩，必须接受本省督抚的监督，不可有任何逾越“一省言论之汇归”这一权限的行为。

慈禧去世后，以摄政王载沣为首的皇权集团似乎从未意识到如此设计谘议局是一件非常愚蠢的事情。谘议局的成立既没有能够安抚士绅群体，也没有能够制约地方督抚，反而将以前星散在各地的举子、生员聚集到了一起，为他们提供了合法的组织机构与合法的活动场所。谘议局横向可以与他省谘议局互通声气（他们成立了一个叫作“各省谘议局联合会”的组织），纵向上可联络资政院，下可沟通各州县的士绅。也就是说，原本影响力局限于本省、本县、本乡的士绅因为谘议局的出现，被统合成了一个有组织、有力量的全国性政治实体。

至此，清朝的灭亡已经只是时间问题。支撑清王朝的三大统治基础——官僚、士绅与军队，前两者与清廷离心离德，末者则实力有限，不堪大用。当宣统三年（1911年）武昌起义的枪声响起，湖北谘议局议长汤化龙立即选择了与革命党人合作。他利用“各省谘议局联合会”这一政治资源，“通电告知各省谘议局以联络，内部

订军事政治各条文，自是交战团之势成矣”[(22)]。汤成了稳固湖北革命局势的大功臣，其他各省也大体如此。比如，广西的谘议局议员与同盟会会员一道前往巡抚衙门劝说巡抚熊秉坤宣布独立，使广西不费一兵一卒倒向了共和。广东谘议局副议长丘逢甲率众游说总督张鸣岐不要与革命党人交战，张选择离开广州，让革命党人和平接手。福建虽有旗人将领朴寿率军抵抗，出现了流血冲突，但谘议局副议长刘崇佑召集议员开会，做出了与革命党人合作组织新政府、宣布独立的决议后，也成功劝说闽浙总督松寿接受了这一事实。浙江谘议局的议员则是在议长陈黻宸的带领下分头进行游说工作，使得浙江大体上和平宣布独立……[(23)]

也许，慈禧早已预料到了这样的结局。担任晚清宫廷史官十余年之久的恽毓鼎在日记中披露说，光绪三十四年十月廿二（1908年11月15日），慈禧于病危弥留之际，“忽叹曰：‘不当允彼等立宪。’少顷又曰：‘误矣！毕竟不当立宪。’”[(24)]

慈禧这番临终反思，道破了中国最后一个秦制王朝灭亡的玄机。

如本书开篇所言，秦制的两大基本特征是：1．以官僚集团而非封建贵族作为政权的统治基础。追求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和“莫非王臣”；官僚集团既是秦制政权的统治基础，又是秦制政权时时防范压制的对象。2．施政的核心诉求是尽可能提升人力与物力的汲取强度与总量。为此，必然致力于消灭一切有影响力的人与组织，消灭对象不但包括民间组织，也包括官僚集团的“朋党化”，简言之就是追求一种散沙化与原子化的扁平社会结构，为此不惜牺牲社会活力。

慈禧试图在“清末新政”中将已然有所松动的秦制，重新做一番强化，故一手抓立宪以强化皇权的至高无上，一手抓官制改革以

削弱督抚的军权、财权、人事权。然而，现实却是：庚子年的“西狩”已让她的威望一落千丈，朝野对“一二人决策于深宫之中”的体制更是深恶痛绝。无论是督抚还是士绅，均期望改走限制皇权的“英式立宪”之路，而非重塑皇权的“日式立宪”。亦即：众人皆以老太后及依附在她身上的决策体制为改革对象，老太后却拒绝转型，反要以众人为改革对象。这冲突可谓无可调和。

无法调和的结果，便是离心离德的地方督抚无意再维系清廷，已经组织化的谘议局士绅们则在辛亥年群起响应革命党人的起事，清廷亦随之土崩瓦解。

---

(1) 张树声：《遗折》（光绪十年九月初），见《张靖达公奏议》第八卷，第32—33页。

(2) 茅海建：《戊戌变法史事考初集》，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2年版，第291—292页。

(3) 孔祥吉：《关于康有为的一篇重要佚文》，见孔祥吉：《戊戌维新运动新探》，湖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57页。

(4) 《汪康年师友书札》（二），上海书店出版社2017年版，第1475页。

(5) 孙中山：《有志竟成》，见《孙中山全集》第六卷，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235页。

(6) 蒋梦麟：《西潮》，辽宁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第29、39页。

(7) 钱玄同：《三十年来我对于满清的态度的变迁》，见《语丝》1925年第8期；冯自由：《革命逸史》上，新星出版社2000年版，第54页。

(8) 陶模：《变通政治宜务本原折》，见《陶勤肃公奏议》卷十一，第28页。

(9) 载泽：《奏请宣布立宪密折》，《中国近代史参考资料》1984年第7期。

(10) 李剑农：《中国近百年政治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第202页。

(11) 侯宜杰整理：《清末督抚答复厘定地方官制电稿》，见庄建平主编：《近代史资料文库》第一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9年版，第399页。

(12) 关晓红：《从幕府到职官：清季外官制的转型与困扰》，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4年版，第169页。

(13) 胡均撰：《张文襄公年谱》卷六，第258页。

(14) 梁义群、宫玉振：《袁世凯与丙午改制》，《中州学刊》1992年第3期。

(15) 萧一山：《清代通史》四，台北商务印书馆1962年版，第2400页。

(16) 李剑农：《中国近百年政治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第204—209页。

(17) 《大清新法令1901—1911》第一卷，商务印书馆2010年版，第48—49页。

(18) 赵晓红：《从反帝到反清：由浙路运动看辛亥革命之社会基础》，《浙江社会科学》2011年第11期。

(19) 《申报》1907年11月19、28、28日，见《百年政治风云》，中国经济出版社2000年版，第49页。

(20) 张朋园：《中国民主政治的困境（1909—1949）：晚清以来历届议会选举述论》，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08年版，第64页。

(21) 《宪政编查馆会奏各省谘议局章程及按语并选举章程折》（1908年7月22日），见《政治官报》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六月二十六日。

(22) 张朋园：《立宪派与辛亥革命》，上海三联书店2013年版，第117页。

(23) 各省谘议局在辛亥年的详细活动，可参见张朋园《立宪派与辛亥革命》一书的第六章至第十章。

(24) 恽毓鼎：《恽毓鼎澄斋日记》第二册，浙江古籍出版社2004年版，第561页。


菊花王朝
两千年日本天皇史
胡炜权 著
天皇制两千年的神秘延续
日本文化的隐忍与疯狂
《菊与刀》未说尽的真相
浙江人民出版社
菊花王朝
胡炜权著
两千年日本天皇史
浙江人民出版社

菊花王朝

两千年日本天皇史

胡炜权 著

浙江人民出版社

浙江省版权局

著作权合同登记章

图字：11-2019-266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菊花王朝：两千年日本天皇史/胡炜权著．—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20.5

ISBN 978-7-213-09691-4

Ⅰ．①菊… Ⅱ．①胡… Ⅲ．①天皇— 历史— 日本— 通俗读物 Ⅳ．①K313.09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20）第042019号

本书中文简体版通过成都天鸢文化传播有限公司代理，经时报文化出版企业股份有限公司授权浙江人民出版社有限公司独家出版发行，非经书面同意，不得以任何形式，任意重制转载。本著作限于中国大陆地区发行。

菊花王朝：两千年日本天皇史

胡炜权　著

出版发行：浙江人民出版社（杭州市体育场路347号　邮编310006）

市场部电话：（0571）85061682　85176516

责任编辑：吴玲霞

营销编辑：陈雯怡　陈芊如

责任校对：陈　春

责任印务：聂绪东

封面设计：WSCGRAPHIC.COM

电脑制版：易细文化

印　　刷：北京阳光印易科技有限公司

开　　本：710毫米×1000毫米　1/16

印　　张：23

字　　数：250千字

插　　页：4

版　　次：2020年5月第1版

印　　次：2020年5月第1次印刷

书　　号：ISBN 978-7-213-09691-4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市场部联系调换。



图一：重建的平城京大极殿　2010年，为纪念平城京建立1300周年而重建。710年，元明天皇迁都平城京，当时的大和朝廷面对东北亚的局势变化，在这里拟定了许多外交、军事措施。



图二：平安神宫　明治天皇下令迁居东京之后，于明治二十八年（1895年）下令在京都建立平安神宫，以纪念桓武天皇建都的历史，也为被“舍

弃”的京都人提供一个回望“王都”辉煌过去的纪念之地。（ 参考下部第八章第1问）



图三：明治天皇陵　别名“伏见桃山陵”。明治天皇生前遗言，要求死后归葬京都，回到他的成长之地，可见他心中对京都的眷恋不曾受明治维新大业的影响。（ 参考上部第三章第6问）



图四：京都御所紫宸殿　位于京都御所中心区域的紫宸殿，是平安时代天皇接见朝臣、垂帘听政的地方。这里与清凉殿是天皇在皇宫里两个重要的活动场所，后者是天皇日常生活的寝宫。（ 参考下部第八章第2问）



图五：橿原神宫　幕末时期，幕府与朝廷为了振奋人心，高举“天皇神圣，以抗外敌”的旗帜，在现在的橿原市找到一个山丘，作为第一代天皇神武天皇的皇陵，即现在的橿原神宫。（ 参考下部第六章第5问）



图六：仙洞御所　现在的仙洞御所建于江户时代初期，借用道教思想，取其义为“仙人隐居之地”，是天皇成为太上天皇后的居所。但平成天皇退位后不会回到京都，而是留在东京，与新天皇交换居所。换言之，平成上皇的“仙洞御所”便是新天皇德仁的旧居“赤坂御所”。



图七：泉涌寺　中世以来，天皇的家庙俗称“御寺”。镰仓时代，泉涌寺获得后鸟羽天皇尊崇，后堀河天皇又将泉涌寺定为皇家祈愿寺。



图八：东京皇居　明治天皇与皇后在西乡隆盛等维新派功臣的要求下，迁居东京皇居，与京都御所永久分离。通过迁居，存续千年的禁宫文化和宫廷制度得以在昭宪皇后主持下进行历史性的大改革。（参考下部第十章第4问）



图九：京都御所　这里是游客到京都必访的名胜。现在的京都御所是14世纪时由室町幕府为天皇改建而成，此后大抵没有大的变动。明治天皇迁居东京后，京都市民积极向国家申请保留御所，将其作为缅怀昔日王都的圣地之一。（参考下部第八章第3问）



图十：衮衣　幕末时代孝明天皇即位时穿的衮衣。衮衣是模仿中国皇帝的冕服改制而成。背后的北斗七星取意自中国道教思想，象征帝王；瑞兽（龙、凤凰、麒麟）和日月，则显示天皇的神圣。（参考下部第六章第4问）

推荐序1　了解两千年日本天皇史有利于“知日”

提起日本的天皇，中国读者的脑海里大致会浮现出两个标志性的印痕：其一为日本的“天皇”与中国历史上的“皇帝”一样，不同的只是称呼；其二为日本裕仁天皇在位期间，曾经发动了包括对中国、朝鲜以及东南亚地区乃至美国的战争，用日语的表述是“十五年战争”“大东亚战争”“太平洋战争”。不过，1945年日本战败以后，裕仁天皇既没有被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宣判为战犯，又没有被追究“战争责任”。

正是这两个标志性的印痕，给中国读者带来很多疑问和困惑。比如，中国出现皇帝一事，时间、地点、人物明确，秦王嬴政在公元前221年统一中国以后，志得意满，感觉自己功盖“三皇”“五帝”，于是像今天流行的“互联网+”一样，把三皇的“皇”字与五帝的“帝”字加在一起，新创“皇帝”这一封建国家最高统治者的称呼。然后，他再把自己称为“始皇”，把以往达官贵人都可以使用的“朕”归为己有，从此拉开了“中国两千年皇帝史”的序幕。

相比之下，日本的“天皇两千年历史”就显得模糊、暧昧，总有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感觉。从天皇的起始人物，到天皇的起始时间，史家都有各种各样的说法，不像中国汉朝时期的太史公司马迁，身遭奇耻大辱，仍感责任在身，继承父志研究历史，在皇皇“二十四史”之首的《史记》中写出《秦始皇本纪》，梳理出历史的“铁案”。

接下来的话题就应该是日本天皇究竟起于什么时间，以及其首任天皇到底是不是来自中国的徐福。胡炜权先生在这本《菊花王朝：两千年日本天皇史》中一一做了正本清源性的回答。

“日本”在当下的中国是一个热门话题，似乎谁都可以聊日本，也谁都可以调侃日本，更是谁都可以“骂”日本。但是，出自“键盘侠”与“愤青”的“聊日本”，与出自“精日”与“吹日”的“聊日本”，都有一种缺乏理性和知识的共同弱点。“骂者”是“痛骂”到底，无所不骂；“吹者”是“吹捧”上天，无所不吹。我一直有一个理想，那就是让“骂日者”和“吹日者”都能够心中有货、腹中有底。《菊花王朝：两千年日本天皇史》无疑可以起到这个作用。

两千年日本天皇史的起始时间有待商榷，起始人物也有待探讨，但“天皇”的称呼源于中国本土产生的宗教——道教，这应该是没有太多疑问的。这一点，应该是“中国皇帝制度”与“日本天皇制度”可以比较研究的重要地方。

一位日本学者酒后对我说：“在历史上，日本一直想追赶中国，但是总觉得中国的变化太大太快，日本的速度跟不上。”他还举出这样的例子，说秦始皇统一中国以后，设立了36个郡县，以郡县制作为地方行政制度，日本后来学习中国，地方行政制度设为“都道府县”（东京都、北海道、大阪府和京都府，以及43个县）。可是，当日本地方政府主要为“县”的时候，中国的地方政府已经改叫“省”了，制度之更新让日本望尘莫及。他还举例说，中国在隋唐时期形成“三省六部”这样的中央官僚体制，日本派出大批的“遣隋使”和“遣唐使”学习中国，并把自己的中央政府机构部门都叫作“省”。谁料，进入民国之后，中国把中央政府机构都称为“部”，日本则依然称为“省”，不知道是追好还是不追为好。

其实，这样的困惑在日本天皇史上同样存在。日本天皇历史上，出现过中国的“骨灰粉”，也出现过“去中国化”的天皇，更出现过要与中国皇帝谋求“平等”的天皇，甚至出现过日本要帮助中国恢复“帝制”的举动，以致最后有日本天皇发动对华侵略战争的事情。可以这样说，一部中国皇帝史中，有不少“日本元素”；一部日本天皇史中，更有深刻的中国影响。若不对此加以了解，都是一种缺憾。

2019年是日本新天皇德仁继位的一年，也是日本启用新的年号——“令和”的一年。我从1988年开始自费留学日本，在日本已经学习、生活、工作了31年。其间，日本经历了裕仁、明仁、德仁三位天皇，我经常调侃自己是“三朝元老”。裕仁天皇去世的时候，我到皇宫外面观察过排着长队的人们吊唁“记帐”；我曾经受到宫内厅的邀请，到皇宫内参加纪念明仁天皇生日的活动；我也曾经应外务省的邀请，到皇宫内参加德仁天皇的继位活动。这种近距离的观察，让我认识到日本天皇的“个性”。而将日本天皇“去概念化”，也是《菊花王朝：两千年日本天皇史》作者的用心之一。

如今，我们常常讲要“知日”，也就是了解日本。在我个人看来，“知日”非常重要。如果我们把“知”和“日”这两个字上下叠加，就是一个“智”字。因此，“知日”不仅仅是为了了解对方，也是增加自身智慧的有效途径。“知己知彼，方能百战不殆。”《孙子兵法》所强调的“知”，是为了战争；我们这里所强调的“知”，是为了中日两国永久的和平。所以，我要推荐《菊花王朝：两千年日本天皇史》这本书，因为它在促进“知日”上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2019年12月1日于东京“乐丰斋”

蒋丰（著名旅日社评作家，《人民日报海外版》日本月刊总编辑，《日本新华侨报》总编辑，南京大学华智全球治理研究院亚洲研究中心主任）

推荐序2　深入浅出、通俗易懂的天皇史

“天皇”是现代世界中唯独日本才有的称谓。对于深受华夏文明影响的华语圈读者来说，与“天皇”这一称谓最接近的便是“皇帝”。两者看似相同却有着巨大的差别。与同时拥有绝对权威和权力的皇帝相比，日本历史上的天皇虽然享受至高无上的权威，却失去了总揽统治的权力。因此，天皇往往是“统而不治”的“象征君主”。

但即便如此，天皇制既是日本政治的核心构成要素之一，也是日本文化传承的特殊载体，同时还是日本人文化优越感在政治上的主要思想根源。天皇制作为世界政治史上独一无二的政治制度延续至今，它对日本社会的影响力远远超出我们的想象，具有无可替代的政治功能与文化功能。

日本思想家竹内好曾说过，天皇制存在于日本的一草一木之中。广岛大学教授小林文男也曾指出研究天皇和天皇制的重要性。在小林文男看来，如果要更好地理解日本，研究日本，进一步发展中日友好关系，就很有必要研究关于天皇制与日本人和日本社会的关系。可以说不了解天皇制，就不可能全面地理解我们的近邻日本。

尽管如此，国内学界对于天皇和天皇制的研究却较为薄弱，目前已有的研究成果大多是从历史角度进行的批判性研究。普通读者对天皇的印象往往定格于抗日战争影片中出现的皇军形象之中。针对这一现状，《菊花王朝：两千年日本天皇史》可以说为华语圈的读者提供了一个了解日本天皇和天皇制的新契机。

本书的最大特点在于其可读性较强。上部以史为线，将与天皇相关的重大历史事件串 接成章。从历史发展的纵向视角，基于严谨的学术基础，以通俗易懂的文笔勾勒出日本天皇的历史形象，同时也为读者展现了天皇制的形成史及其变迁史。下部以天皇与宗教、天皇的思想、天皇的形象、天皇的生活、天皇的家族等专题的形式，从横向关联的视角，对天皇制的理论形成及其体制特征等进行了立体探讨。

全书虽然谈古论今，时间跨度长，但能够做到以点带面，将日本历史上发生的重大事件悉数收录，为读者提供一个了解日本历史的机会。例如：上部探讨的“平将门之乱”，藤原家、足利义满、织田信长、丰臣秀吉等与天皇的关系，明治天皇与明治维新，昭和天皇与战争，战后建立的“象征天皇制”以及平成天皇的主动退位等重大历史事件对日本历史的影响；下部探讨的天皇的经济来源，神国思想，近代的“大元帅陛下”形象，以及菊花、樱花与战争和军国主义思想的关系等专题，都是深入了解日本历史的绝佳切入点。

我相信本书不仅能为读者揭开日本皇室的神秘面纱，还能为读者提供一扇了解日本、理解日本人和日本文化的窗口。

蒋奇武（安徽大学外语学院讲师，日本鹿儿岛大学大学院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科地域政策科学博士课程专攻）

推荐序3　华人视角的天皇史

东亚的中国、朝鲜、日本和东南亚的越南，都曾经出现过皇帝制度，延续了数百年乃至数千年时间，可以说是共通制度和文化现象。然而，起源于中国的皇帝制度，却产生了不同的“地方化”。

日本目前仍然维持皇帝制度，但吊 诡的是，它却是东亚第一个走向现代化的国家。历经明治维新和第二次世界大战等巨大变局，2019年是天皇制历史上重要的一年。原本应终身在位的天皇因为身体因素，决定在生前退位，让位给皇储。

如此重大的时刻，全世界都在关注。而中国与日本一衣带水，两者关系相当紧密，不仅在文化上相互影响，历史上也有千丝万缕的关系。可惜的是，我们缺乏对日本历史与文化的深刻认识，缺乏从华人视角出发的日本观点。

日本人读日本史并理解自身文化，此乃理所当然，那是他们生活的一部分。但是华人为什么要读日本史呢？因为中日两国有无法切断的关系，如果没有深刻的认识，则容易产生误解。胡炜权博士非常适合在华人与日本人间，作为沟通的桥梁。他出生于中国香港，精通日文，获得奖学金前往日本攻读学位，于2019年取得一桥大学的博士学位，并在日本学界发表多篇学术论文，如此成就，难能可贵。

我所经营的“故事：写给所有人的历史”网站，长期致力于推广历史知识，希望将历史从学院中带到社会大众面前，分享学术研究成果，我期许艰涩的历史，可以成为众人浏览和传阅的文章。胡炜权博士非常擅长书写普及性的读物，他在“故事”网站上的文章相当受欢迎，有固定的粉丝追踪。

胡炜权博士系统性地书写与整理日本历史，第一部书《明智光秀与本能寺之变》尝试解开战国史上难解的公案。第二部书企图心相当大，他以一人之力完成《日本战国·织丰时代史》，皇皇三大册的巨著，如此卷帙浩繁的通史，一般都是学术有成的学者才敢动笔，但他年纪轻轻，却展现深厚的功底。

读者眼前的这部《菊花王朝：两千年日本天皇史》则是又一部重要作品，他将华人对于日本天皇感兴趣之处，以问答方式和深入浅出的笔法来解说。这部书也是辟谣解密之书，澄清了一些没有根据的传说，将可信的历史带给华人读者。

日本人是徐福带过去的童男童女的后代？日本天皇是“万世一系”？神秘的日本女天皇是怎么出现的？还有中国历史上的“倭国”究竟在哪里？虽然每个人都能说上一两个战国武将的故事，但那些雄才大略的武将们与天皇的关系究竟如何？天皇在乱世中如何维持自身的尊严？到了江户时代，德川将军与天皇的关系如何？为什么江户时代会再次出现女天皇呢？以上每个问题都是我想问却还没有得到解答的。这部书提供给读者一把钥匙，打开了了解日本天皇史的大门，也可以帮助读者认识日本文化。

当今的天皇制度，除了受到明治维新的影响，也受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军占领日本的影响。即使日本人宣称天皇是长久以来的传统，但内容已经变动不少。近代日本历史上最重要的问题，莫过于明治天皇与明治维新间的关系，或是昭和天皇的战争责任，以上这些问题在本书都有相当深入的探讨。

天皇制是一种制度，但别忘了天皇也是人。天皇吃什么？他信仰什么宗教？他的成长过程是什么样的？在皇居中的生活，是不是像王子公主一般？天皇养尊处优，需要担心金钱来源吗？由于现在的媒体发达，大家对于皇室生活也很有兴趣，平民嫁入皇室后，麻

雀变凤凰就幸福吗？这部书的下部将天皇的大小事摊开在读者面前，让读者了解当个天皇真是不容易!

在天皇更替之际，我们等到了一部由华人所写的天皇史专著，让华人读者可以一窥日本皇室神秘的内幕，并且由此理解日本这个熟悉又陌生的国家。

胡川安（台湾“中央大学”中国文学系助理教授、“故事：写给所有人的历史”网站主编）

序言　一部为华人读者而写的天皇解说书

2019年4月30日与5月1日，注定成为日本现代史上重要的两个日子。

为什么呢？这不仅是因为在位31年的平成天皇打破近代天皇制的“终身在位”原则，成为明治维新以来首位生前退位的天皇，写下历史新页。同时，新天皇德仁即位后，潜藏已久的天皇制存续问题逐渐浮出水面，引起日本国内外思考：我们有生之年能否看到自夸“万世一系”的天皇制走向终结？

但我认为，在这个关键时刻，与其预测未来，不如趁此机会回首过往，通过堪称日本的代表元素——天皇与天皇制，重新认识日本。这便是本书的写作动机。

一、为什么要谈天皇？

日本的国王号称“天皇”，以其为核心，从神话时代延续至今的君主制度，据传已有2000多年历史，堪称世界上最长久的君主制度。对于华人来说，天皇与天皇制都是难以一言概之的存在和概念。客观来说，在历史、文化与宗教各方面，日本与中华文化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诸多交流更是与天皇有着紧密关系。

我们应该如何理解天皇这个存在呢？我认为首先必须摒弃以往深入人心的观点，即“君主＝绝对权力者”的成见。当我们谈到天皇时，往往有两个极端又互相排斥的印象：一个是“没有权力的傀儡”，一个是“受日本人崇拜的存在”。

这样的矛盾，究其原因，是我们仍不自觉地受制于中国封建时代的影响，印象中的历代皇帝必然高高在上，是“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的绝对独裁者。所以当我们听闻天皇丧失统治实权已久，被贵族与武士摆弄、扶养，我们便认定天皇是一个没有实力的君主，从而思考“为什么这样的君主没有被废”。

换言之，我们心底认定的君主，必须是万人之上、无人不从的存在，否则弃之不可惜，没有存续的必要。受这种思想捆绑，“没有权力的傀儡”成为我们对现今天皇的根本定调之一。

另一方面，我们也受到近现代日本史的影响，尤其是明治维新以来至第二次世界大战，被军国主义摆布的日本高举天皇的神圣旗号，以“大东亚共荣”为名义，发动了大规模的侵略战争。这段黑暗历史使身为受害者之一的我们，不禁苦思天皇究竟有何等魔力，让日本从一个轻视自己国君的国家，变成一个奉他为神明，对他极端崇拜的狂热军国。

我们看不透也理解不了，只能含糊且不加思考地想象：当中存在一种不可解的羁绊和纽带，维系着日本人与天皇。

然而，我们始终不理解这样的矛盾是怎么产生的？为什么这个国家的君主制与华人一直延续的君主制不同，这样的差异又是如何产生的？

不理解的原因还牵涉一个重要的认识——我们一直被灌输一种观念，认为日本接受中华文明，大量引进中国的知识和思想，并以此强调、规定彼此的关系和己方的优越感。

可是明治维新后，日本反过来对清朝、后来的中华民国和现在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进行各种各样的反输出，华人的“世界观”“日本观”从此天翻地覆，陷入混乱的状态，到现在似乎也没能从

当中走出来。“大中华主义”的历史教育和史观，又或者与之相反的“崇日”“亲日”观都深深地限制了华人去了解日本更深层的一面，本书的主题天皇与天皇制便是一例。

这种可谓以自我为中心的观念，无助于相互了解，在现今全球化的时代，也早已是过时的思想。历史说明了国与国之间的交流，不只有“谁影响谁”“谁给予了谁什么”的构图，互动关系也十分重要，不应该只在乎谁是主导、谁站在较高的位置。

总而言之，我们在研究、了解周边国家与我们的交流史和关系史时，必须摒弃先入为主的观念和独善的民族主义，以客观持平、无预设立场的前提，重新构建新型的史观和思考方式。

说了这么多，相信会有读者质疑：“日本难道没有学习、引入中国古代文化，然后活用？”“历代天皇不也大量引进中国制度，以便统治吗？”为了证明事情没有那么简单，同时为大家在进入本书核心前热身，先以一例来引导大家思考。

二、中国的真龙天子，日本的凤中天皇

古代中国以至现在，“龙”既是神兽，也是王权、帝王的象征。因此，我们经常在剧集、图腾、画作，以及皇帝身穿的龙袍上，看到皇帝与龙纹的紧密联系，并认为中国人是龙的传人云云。

这个文化和意识形态也影响了周边的越南王国和朝鲜王国。那么，岛国日本又怎样呢？

十分有趣的是，虽然日本与古代中国（汉、南朝、隋、唐）进行交流后，顺理成章引进了包括“龙”的思想文化在内的各种元素，但单以天皇为例，“龙＝天皇”的思想并没有完全扎根，而且很快便被中和了。

日本人确实曾以龙来比喻天皇，自平安时代以来至幕末为止，历代天皇在即位仪式当日穿着的“衮衣”（Kone），双袖上便各绣有一条龙。即使明治维新后，仍然看到日本人将龙与天皇联系在一起。但除此以外，天皇与龙之间便几乎没有关系，天皇也不像中国皇帝以及朝鲜、越南国王那样，身穿龙袍，天皇家的纹章上也极少看到龙的身影。天皇与龙之间的“友谊”，可算是点头之交，聊胜于无。

究其原因，日本当初引入的龙文化，不只进入了政治思想领域，佛教思想里也有龙文化。如果你熟识日本神话和以此为题材的古代绘画，或许曾留意到，日本文化更倾向视龙为水神和蛇神的变形。前者受佛教故事影响，后者则受到日本神话故事的熏陶和启发。

著名的八岐大蛇的故事深植日本人的内心，各地的蛇神文化是了解日本民俗和宗教的重要因素。而受到这两个传统因素影响，日本的龙大概分为佛教的龙、中国的龙和日本的龙三种。日本的龙就是本土文化中的龙头蛇身，具有日本特色的产物。日本人对龙并不陌生，但却因为龙文化的多元发展，而没有完全将中国的龙思想文化与天皇合体。

既然如此，象征日本天皇的神兽又是什么呢？答案是凤凰。虽然凤凰与龙、麒麟、龟一样都是神兽，但为什么日本天皇更爱凤凰呢？简单来说，这一方面也是受到本土神话的影响，传说中神鸟“八咫乌”（或称“三足鸟”，日本国家足球队的标志便是三足鸟）是神的使者，引领第一代天皇神武天皇东征。

日本从中国引进道教思想后，便将里面的凤凰与八咫乌联想起来，开始对凤凰情有独钟。10世纪左右，天皇和朝廷开始将象征永生不息的凤凰（或称“鸾”“朱雀”），以及象征吉祥、长久的植

物桐、竹视为代表天皇的灵物，合称为“桐竹凤凰”，以此作为天皇家的代表图腾，绣在礼服上。

在特定场合，凤凰实际代表天皇，例如，天皇即位时身穿衮衣坐在高御座，其顶上便装饰有一只金凤凰和八只小凤凰；中世纪以后，天皇所坐的轿子也称为“凤辇”，可见凤凰与天皇的关系一度十分密切，完全凌驾于象征性的龙之上。

虽然在中世纪以后，天皇权力与权威减弱，凤凰的使用禁忌也不如之前严格，后来为人熟悉的菊纹和桐纹慢慢凌驾于凤凰之上，成为天皇的代表象征。但皇家以外的权力者使用凤凰为图案的频率仍然较低；而龙的壁画、艺术品则在佛教建筑、神话故事的绘画中时有出现，与天皇的关系仍然不甚密切。

到了明治、大正时代兴起复古热潮后，凤凰再次被皇室重视，天皇专用的火车、即位周年发行的纪念金银币上，必定有凤凰标志，而没有龙。在现代日本，受到战后和平宪法限制天皇大权的影响，凤凰出场的机会非常少，但仍然与古代一样，是象征天皇的一种瑞兽，可以说“有天皇，便有凤凰”。

以上可见，日本人选择凤凰为皇家象征，很大程度上是基于呼应传统、神话的结果，也有意见认为，这是为了强调天皇与中国的真龙天子（皇帝）平起平坐。

三、本书的目标与寄望

我相信单从上述龙与凤凰的例子，各位读者已然理解日本吸收中国的元素后，并非就此“山寨”模仿，而是按照自己的需要改造变形，实行本土化。而在这个过程中，随着时代改变，天皇由引进

外来文化的主体演变成守护本国文化的主体，以及体现这个文化的代表，成为日本历史、文化、民俗等各方面的必需“零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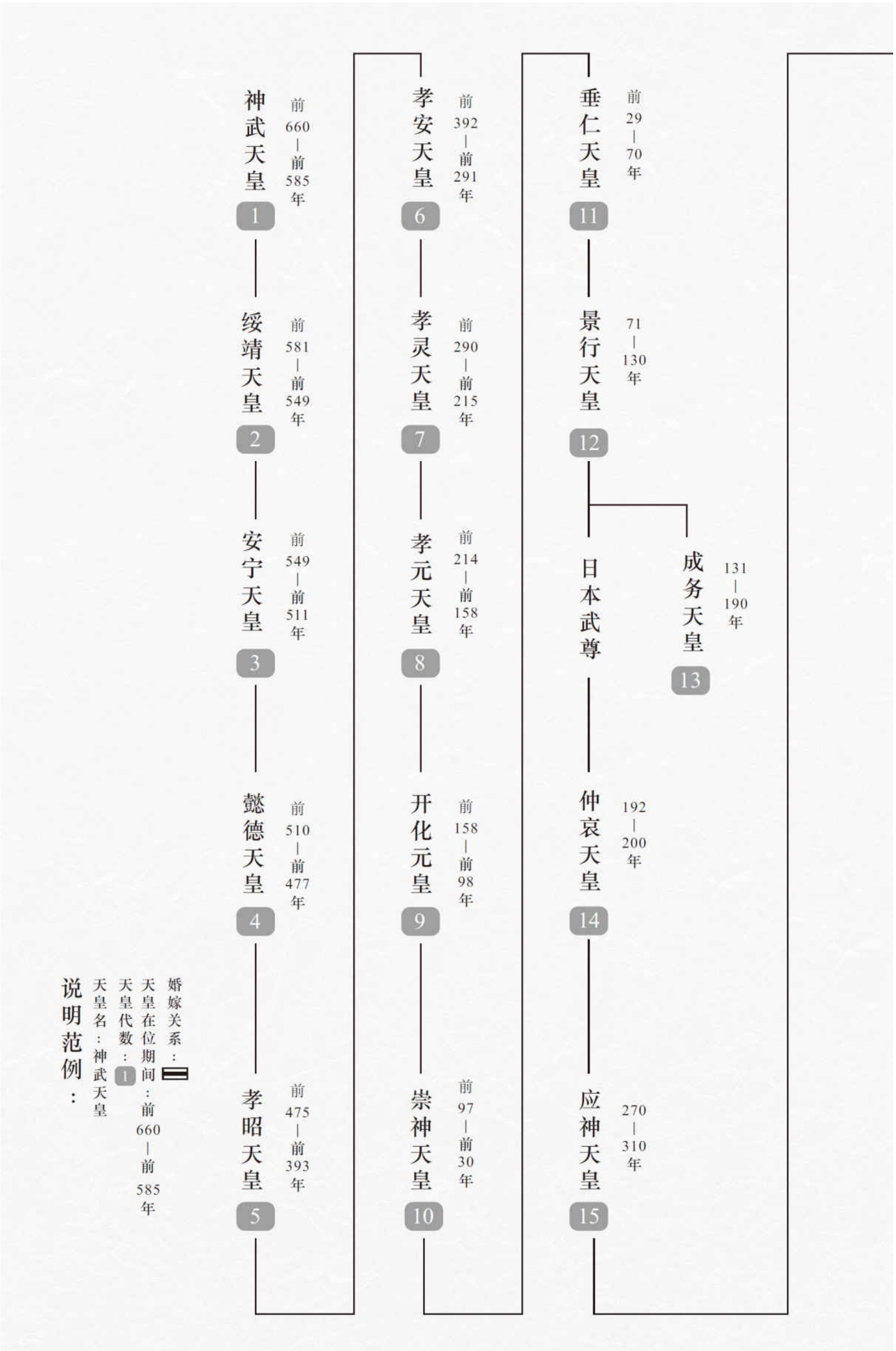
我们有必要抛开执着于中国封建制度的比较态度，重新从相对持平的角度去认识天皇和天皇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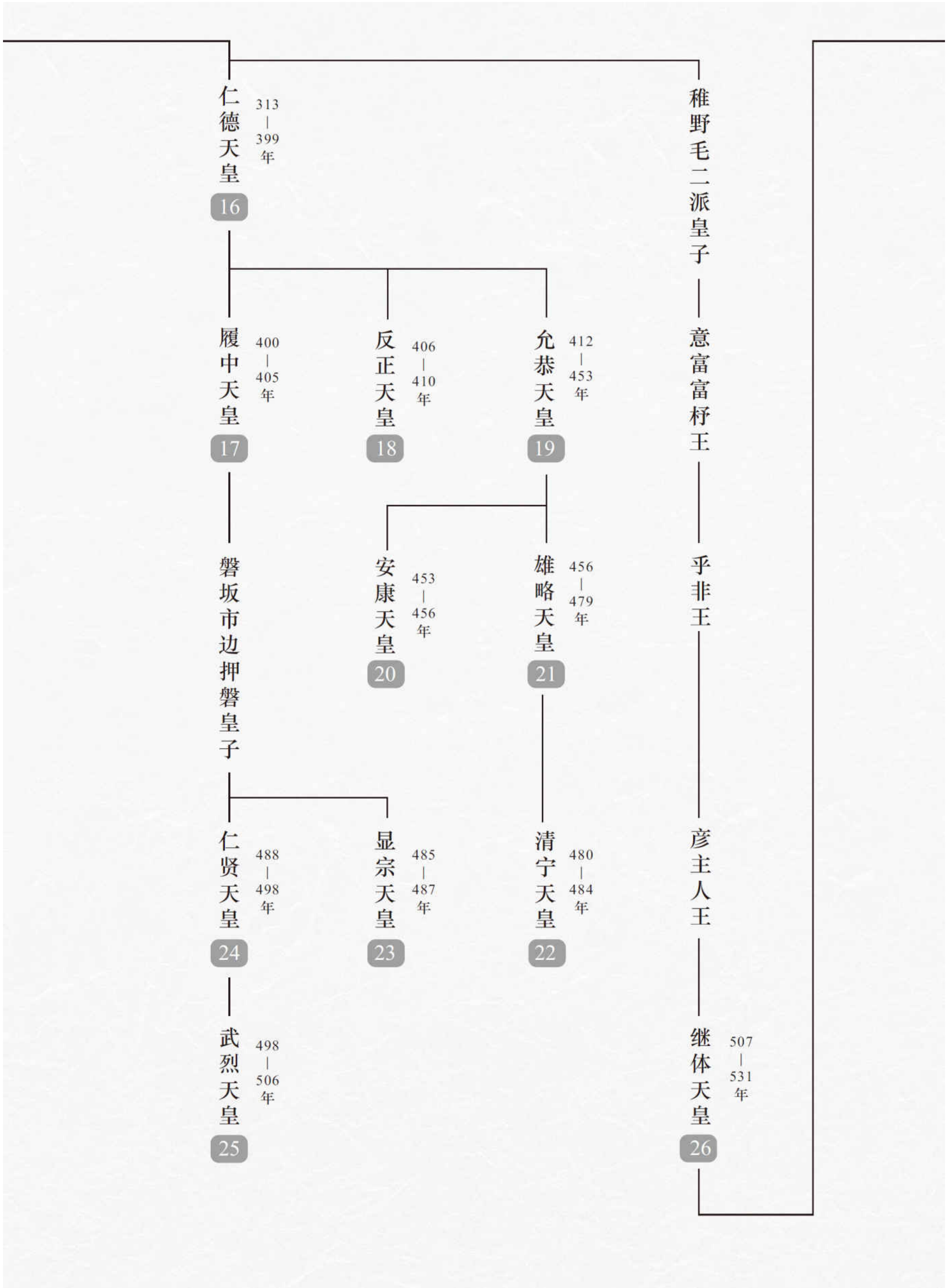
其实，我在执笔前认为，目前中文书籍已有大量原创和翻译的天皇通史书，实在没有必要再添一部。然而，综观这些作品，不是政治通史，便是以明治维新以后的断代史为主，而且大多以华人的立场和价值观去探讨天皇与天皇制。但这种没有抛开民族、国境的预设立场是不可取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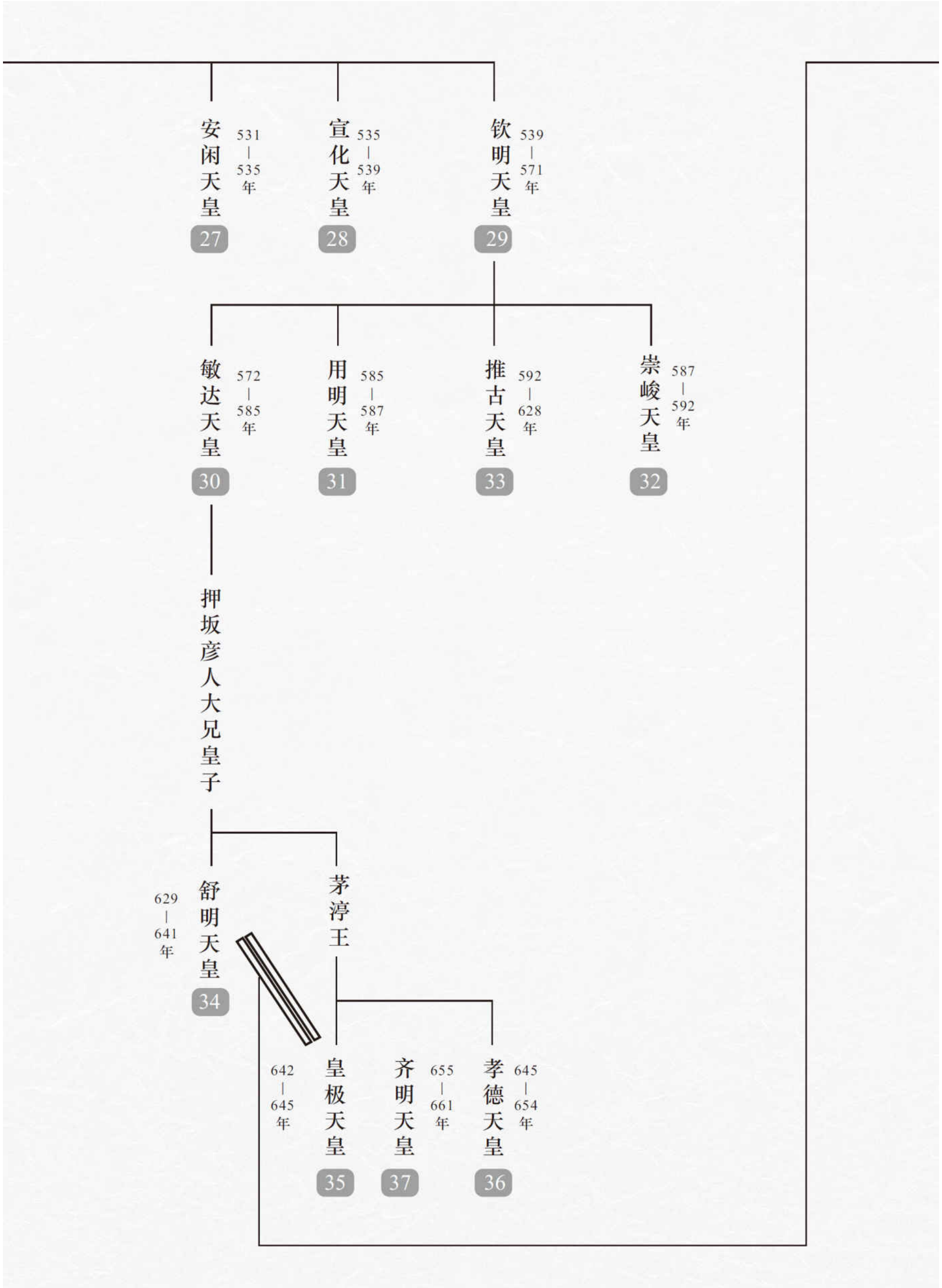
因此，本书不是一部关于天皇历史的通史书，也不是一部以华人的观点，或套用“华人标准”去描述日本天皇的书。反之，本书透过多角度，尝试向读者持平地介绍天皇、天皇制及其周边相关事物。通过上、下两部共十章，以最基本、最简单的语句，配合最新研究成果，为不同文化程度的读者提供契机，去重新思考对天皇的理解是否有改变的空间。正因为如此，我不打算为阅读本书的读者提供一个“笔者的天皇观”，因为我更希望借此与读者一起思考这个问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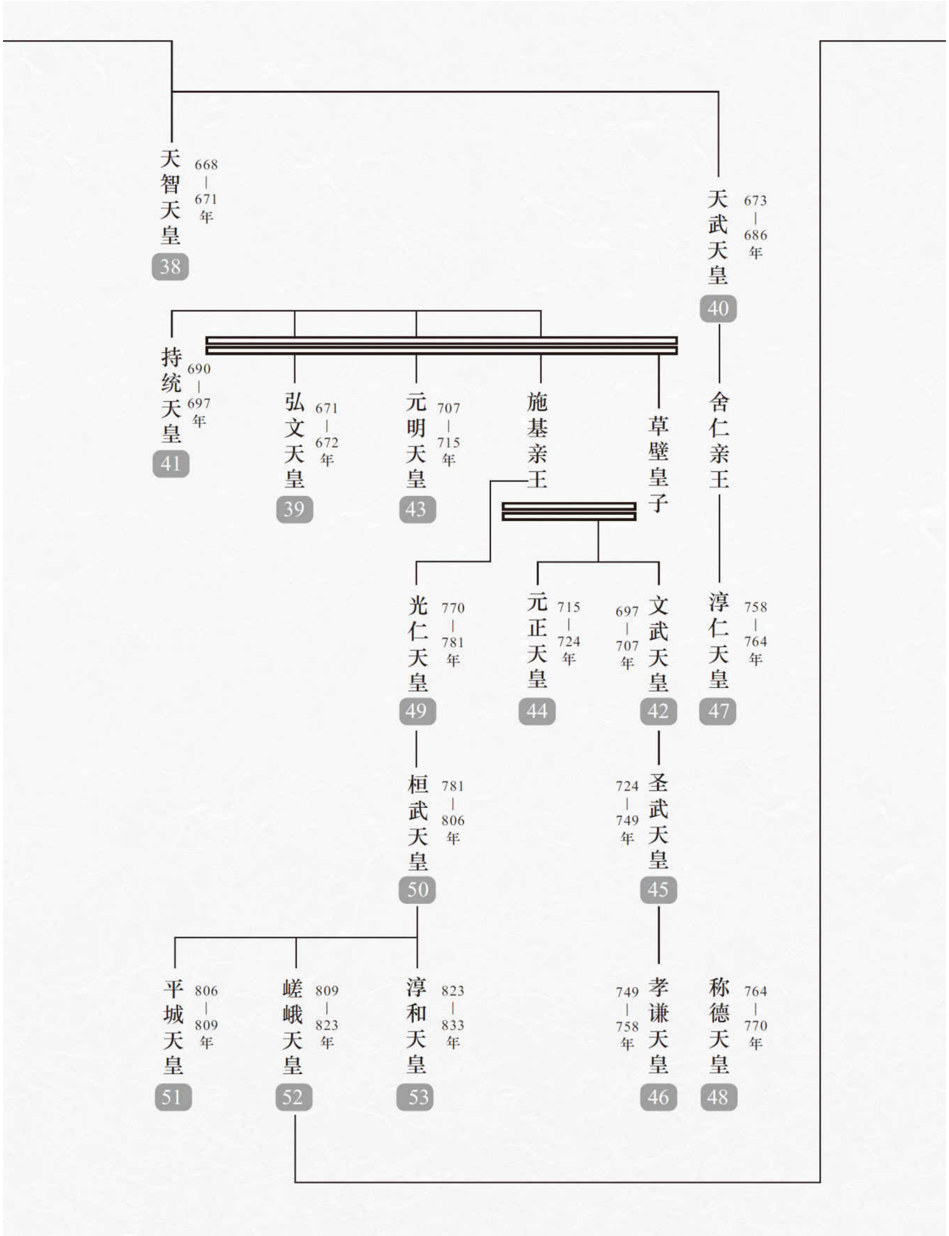
我相信不论是出于知己知彼想窥探日本文化，又或者只是纯粹对天皇感到好奇的读者，都能够从本书获得新的线索，提出新的疑问，从而再思考。我们现在就开始深入书中探索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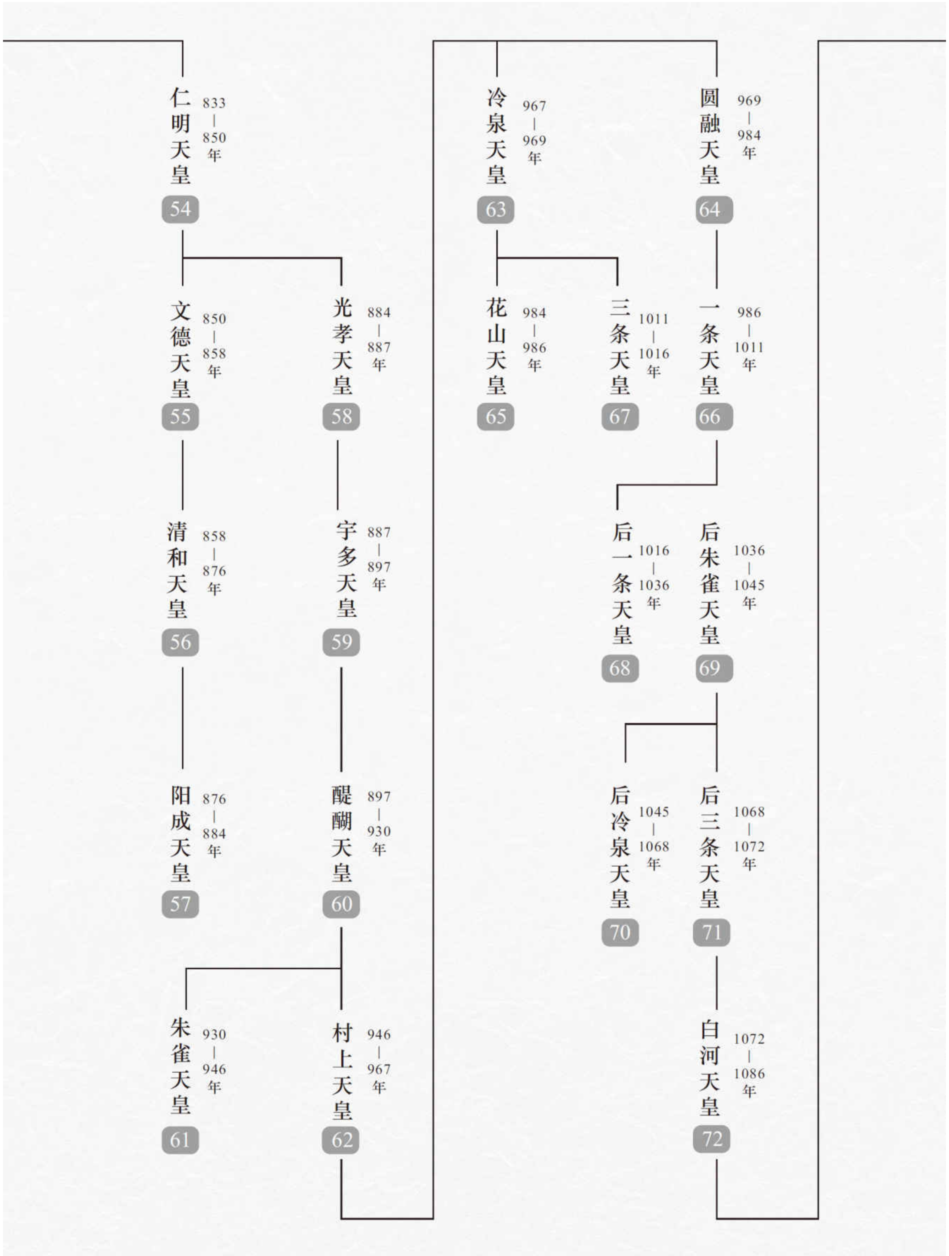
天皇世系图


神武天皇 前660—前585年 1
绥靖天皇 前581—前549年 2
安宁天皇 前549—前511年 3
懿德天皇 前510—前477年 4
孝昭天皇 前475—前393年 5
孝安天皇 前392—前291年 6
孝灵天皇 前290—前215年 7
孝元天皇 前214—前158年 8
开化元皇 前158—前98年 9
崇神天皇 前97—前30年 10
垂仁天皇 前29—70年 11
景行天皇 71—130年 12
日本武尊
成务天皇 131—190年 13
仲哀天皇 192—200年 14
应神天皇 270—310年 15
说明范例：
天皇名：神武天皇
天皇代数：1
天皇在位期间：前660—前585年
婚嫁关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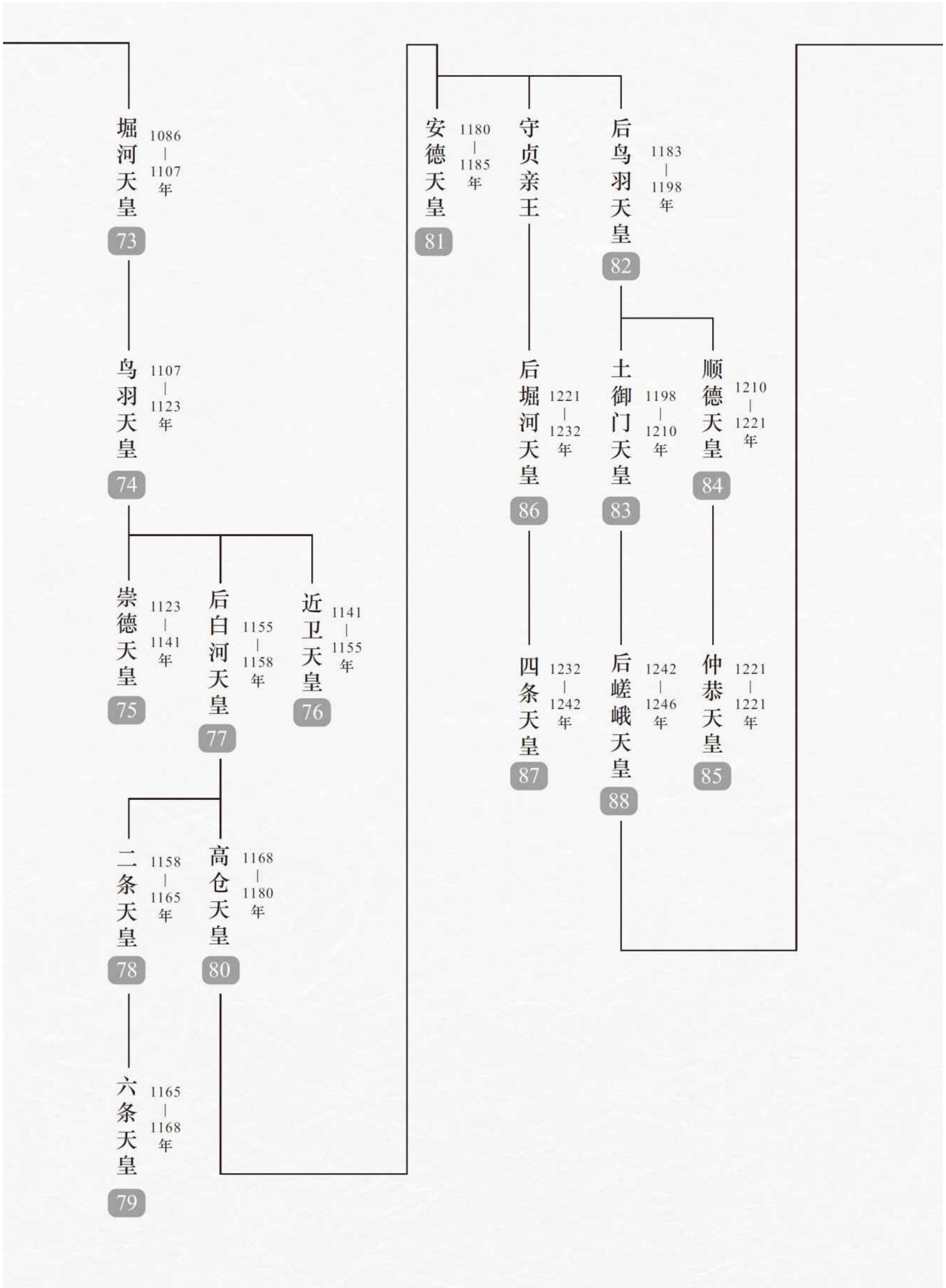

仁德天皇 313—399年 16
稚野毛二派皇子
履中天皇 400—405年 17
反正天皇 406—410年 18
允恭天皇 412—453年 19
意富富杼王
磐坂市边押磐皇子
安康天皇 453—456年 20
雄略天皇 456—479年 21
乎非王
仁贤天皇 488—498年 24
显宗天皇 485—487年 23
清宁天皇 480—484年 22
彦主人王
武烈天皇 498—506年 25
继体天皇 507—531年 2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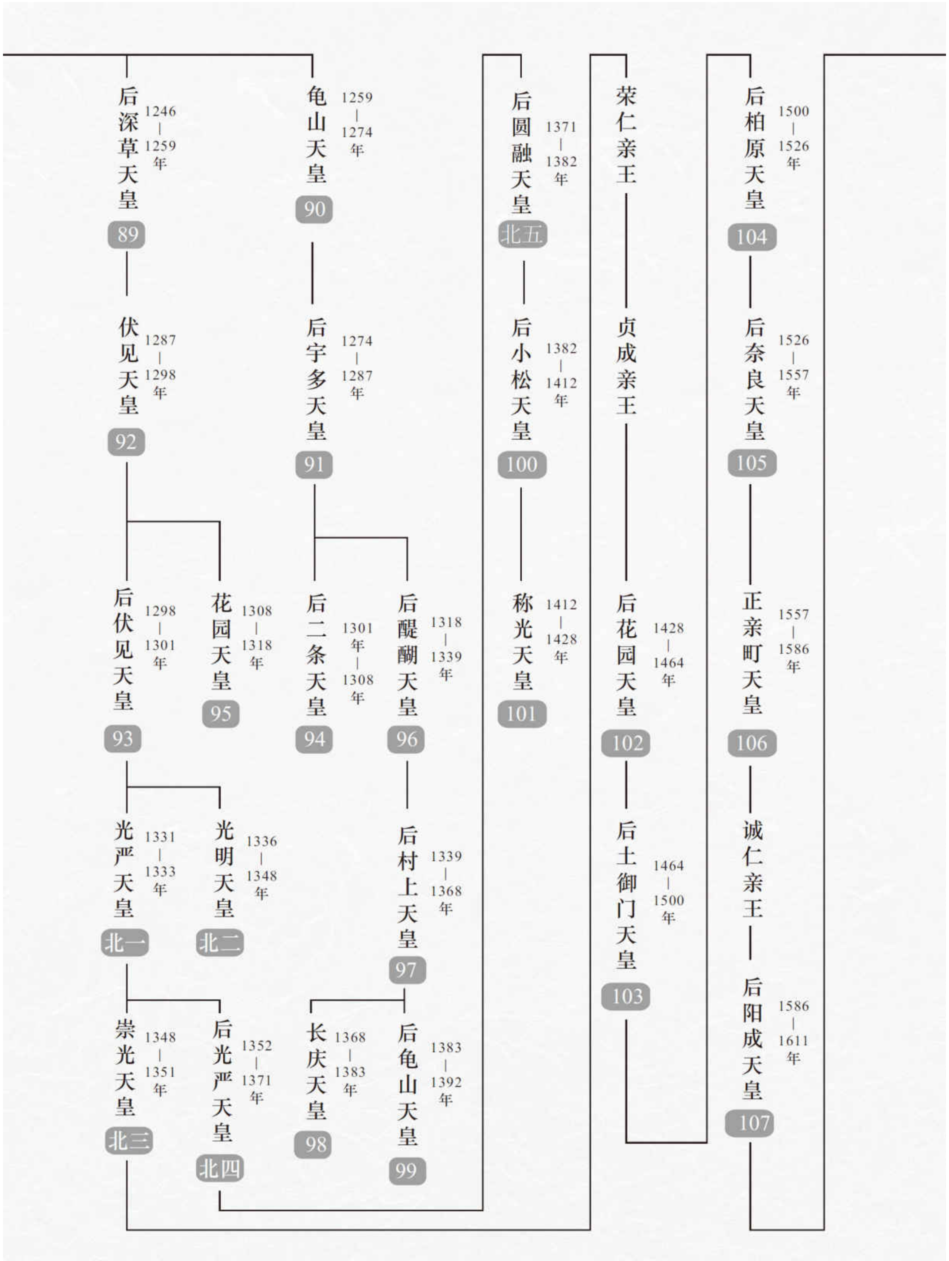

安闲天皇 531—535年 27
宣化天皇 535—539年 28
钦明天皇 539—571年 29
敏达天皇 572—585年 30
用明天皇 585—587年 31
推古天皇 592—628年 33
崇峻天皇 587—592年 32
押坂彦人大兄皇子
舒明天皇 629—641年 34
茅渟王
皇极天皇 642—645年 35
齐明天皇 655—661年 37
孝德天皇 645—654年 3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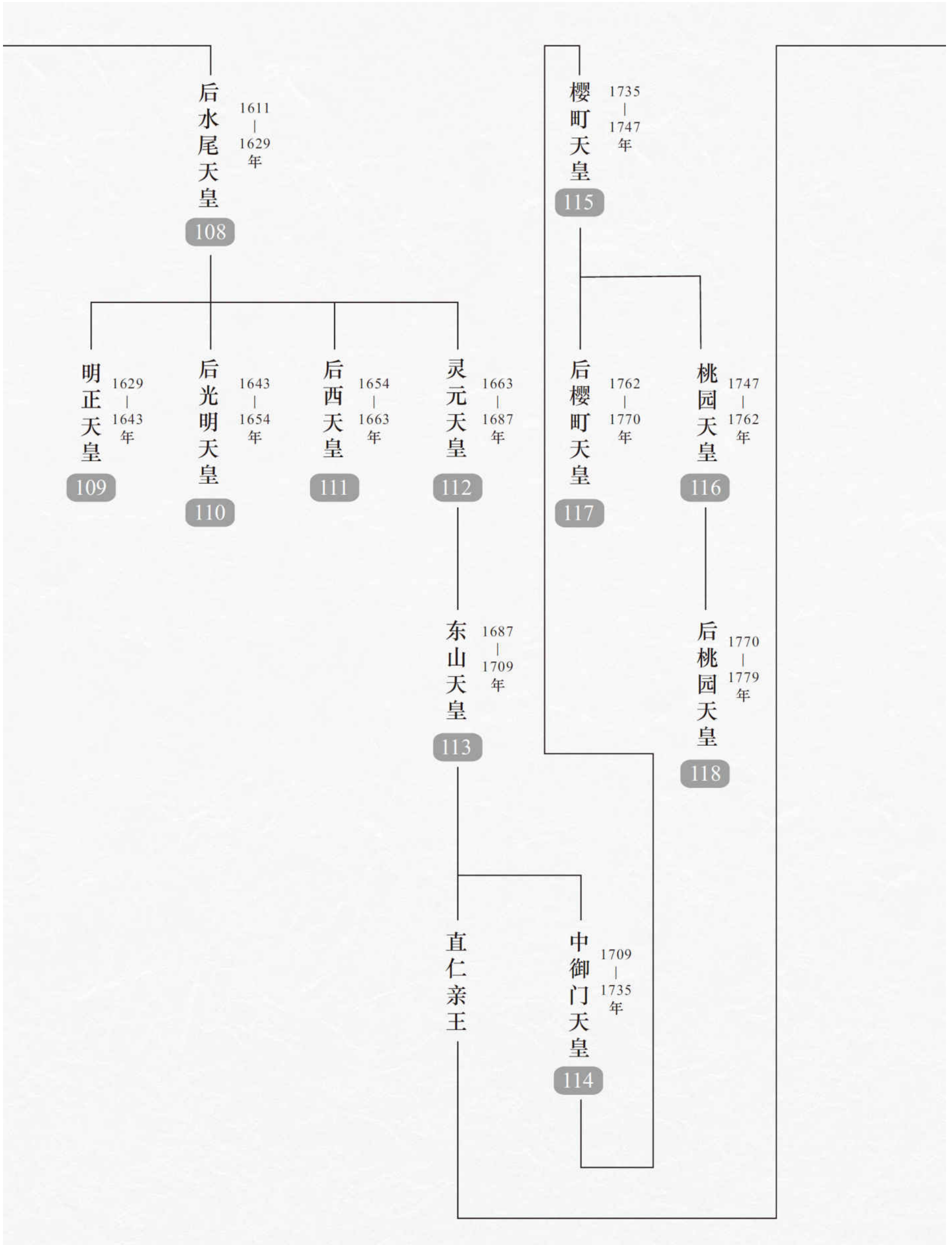

天智天皇 668—671年 38
天武天皇 673—686年 40
持统天皇 690—697年 41
弘文天皇 671—672年 39
元明天皇 707—715年 43
施基亲王
草壁皇子
舍仁亲王
光仁天皇 770—781年 49
元正天皇 715—724年 44
文武天皇 697—707年 42
淳仁天皇 758—764年 47
桓武天皇 781—806年 50
圣武天皇 724—749年 45
平城天皇 806—809年 51
嵯峨天皇 809—823年 52
淳和天皇 823—833年 53
孝谦天皇 749—758年 46
称德天皇 764—770年 48



仁明天皇 833—850年 54
文德天皇 850—858年 55
光孝天皇 884—887年 58
清和天皇 858—876年 56
宇多天皇 887—897年 59
阳成天皇 876—884年 57
醍醐天皇 897—930年 60
朱雀天皇 930—946年 61
村上天皇 946—967年 62
冷泉天皇 967—969年 63
圆融天皇 969—984年 64
花山天皇 984—986年 65
三条天皇 1011—1016年 67
一条天皇 986—1011年 66
后一条天皇 1016—1036年 68
后朱雀天皇 1036—1045年 69
后冷泉天皇 1045—1068年 70
后三条天皇 1068—1072年 71
白河天皇 1072—1086年 72


堀河天皇 1086—1107年 73
鸟羽天皇 1107—1123年 74
崇德天皇 1123—1141年 75
后白河天皇 1155—1158年 77
近卫天皇 1141—1155年 76
二条天皇 1158—1165年 78
高仓天皇 1168—1180年 80
六条天皇 1165—1168年 79
安德天皇 1180—1185年 81
守贞亲王
后鸟羽天皇 1183—1198年 82
后堀河天皇 1221—1232年 86
土御门天皇 1198—1210年 83
顺德天皇 1210—1221年 84
四条天皇 1232—1242年 87
后嵯峨天皇 1242—1246年 88
仲恭天皇 1221—1221年 85


后深草天皇 1246—1259年 89
龟山天皇 1259—1274年 90
伏见天皇 1287—1298年 92
后宇多天皇 1274—1287年 91
后伏见天皇 1298—1301年 93
花园天皇 1308—1318年 95
后二条天皇 1301年—1308年 94
后醍醐天皇 1318—1339年 96
光严天皇 1331—1333年 北一
光明天皇 1336—1348年 北二
后村上天皇 1339—1368年 97
崇光天皇 1348—1351年 北三
后光严天皇 1352—1371年 北四
长庆天皇 1368—1383年 98
后龟山天皇 1383—1392年 99
后圆融天皇 1371—1382年 北五
后小松天皇 1382—1412年 100
称光天皇 1412—1428年 101
荣仁亲王
贞成亲王
后花园天皇 1428—1464年 102
后土御门天皇 1464—1500年 103
后柏原天皇 1500—1526年 104
后奈良天皇 1526—1557年 105
正亲町天皇 1557—1586年 106
诚仁亲王
后阳成天皇 1586—1611年 107


后水尾天皇 1611—1629年 108
明正天皇 1629—1643年 109
后光明天皇 1643—1654年 110
后西天皇 1654—1663年 111
灵元天皇 1663—1687年 112
东山天皇 1687—1709年 113
直仁亲王
中御门天皇 1709—1735年 114
樱町天皇 1735—1747年 115
后樱町天皇 1762—1770年 117
桃园天皇 1747—1762年 116
后桃园天皇 1770—1779年 118

典仁亲王

光格天皇 1779—1817年 119

仁孝天皇 1817—1846年 120

孝明天皇 1846—1866年 121

明治天皇 1867—1912年 122

大正天皇 1912—1926年 123

昭和天皇 1926—1989年 124

平成天皇 1989—2019年 125

现天皇 2019— 126

目　录

推荐序1　了解两千年日本天皇史有利于“知日”

推荐序2　深入浅出、通俗易懂的天皇史

推荐序3　华人视角的天皇史

序言　一部为华人读者而写的天皇解说书

天皇世系图

上部　天皇的历史之谜

第一章　传说中的天皇（古代篇）

1．传说中的神武天皇就是徐福？

2．著名的邪马台国与后来的大和朝廷有什么关系？

3．日本有两个开国天皇？

4．“万世一系”的概念与古代天皇的诞生有什么关系？

5．日本的女天皇是怎么出现的？

6．天皇有姓氏吗？

7．“平将门之乱”和天皇有什么关系？

第二章　乱世中的天皇（中世篇）

1．天皇为什么与藤原家共治天下？

2．院政是怎样的制度？

3．“承久之乱”为何给天皇制带来重大影响？

4．天皇的内讧催生了南北朝时代？

5．“日本国王”足利义满打算篡夺天皇之位？

6．战国时代的天皇有多潦倒？

7．天皇与织田信长、丰臣秀吉的关系如何？

第三章　从江户时代到明治维新（近代篇）

1．德川幕府的《禁中并公家诸法度》是用来钳制天皇的法规吗？

2．为什么江户时代重新出现了女天皇？

3．两个事件动摇了天皇与德川幕府的合作关系？

4．孝明天皇为什么曾经坚持排外攘夷？

5．幕末时代的日本人怎么看待天皇？

6．明治天皇如何迎接明治维新？

7．病弱的大正天皇任内曾发生两起宫闱事件？

第四章　天皇如何逃脱战争的罪责？（现代篇）

1．昭和天皇结束战争与“国体护持”有什么关系？

2．日本人如何看待昭和天皇的战争责任？

3. “象征天皇制”的争议与矛盾是什么？

4. 新、旧《皇室典范》有什么不同？

5. 天皇、皇室与大众媒体的关系如何演变？

6. 平成天皇让位为什么会引起宪政危机？

7. “万世一系”的天皇制会走向终结吗？

下部　天皇的生活之谜

第五章　天皇的宗教与仪式

1. 天皇崇拜与初诣有什么关系？

2. “三种神器”如何影响天皇统治？

3. 《古事记》《日本书纪》两书为何对日本如此重要？

4. 天皇即位仪式与大尝祭为什么这么神秘？

5. 中世时代的“御灵信仰”与天皇权威的关系为何？

6. 明治维新破坏了天皇与佛教的关系吗？

7. 为什么天皇极力排斥基督教？

第六章　天皇的思想

1. 两种“天皇”的读音各有什么含义？

2. 天皇如何导入和实行元号制？

3. 历法制定与天皇有什么关系？

4．蒙古入侵时发生的“神风”如何反映天皇的神圣性？

5．幕末的修陵热潮、尊王攘夷与明治维新的关系为何？

6．“神国思想”如何发展成后来的“靖国思想”？

7．“日之丸”、《君之代》与天皇有什么关系？

第七章　天皇的艺能与学问

1．为什么天皇视和歌为“国学”？

2．出自民间的能乐如何与天皇分分合合？

3．音乐在天皇帝王学中的代表意义为何？

4．茶道如何成为近世天皇的新学问？

5．天皇与日本帝王学的关系为何？

6．昭和天皇的伦理课为什么会提到战国大名？

7．近代天皇与达尔文进化论有什么矛盾？

第八章　天皇的生活与一生

1．天皇的都城为何由大变小？

2．没有政治实权的古代天皇生活很悠闲？

3．江户时代的天皇即位仪式是京都官民尊享的同乐日？

4．天皇的葬礼为什么由佛教仪式转为神道仪式？

5．天皇的日常饮食是怎样的呢？

6．古代天皇的经济收入来自哪里？

7．现代天皇的经济收入来自哪里？

第九章　天皇的形象

1．为什么古代绘画中的天皇面容都被遮掩了？

2．为什么天照大神时为男身，时为女身？

3．从江户时代的天皇肖像画能看到怎样的天皇观？

4．明治天皇的肖像画和照片有什么秘密？

5．古代天皇怎样让人感知他们的存在？

6．近代的“大元帅陛下”是如何形成的？

7．菊花、樱花与天皇各有什么关系？

第十章　天皇的家族

1．皇太子如何产生？

2．一桩禁宫丑闻如何折磨后阳成天皇？

3．禁宫女官们与天皇是什么关系？

4．明治天皇如何进行“皇宫现代化”？

5．为什么日本必须有天皇，但不一定需要皇后？

6．昭宪皇后的“国母”形象是怎么确立的？

7．为什么第一代“平民皇后”美智子成为改变皇室形象的象征？

结语

历代年号一览表（附年号出典）

新、旧《皇室典范》

著者志

旧《皇室典范》

新《皇室典范》

主要参考文献

返回总目录

上部　天皇的历史之谜

第一章　传说中的天皇（古代篇）

1. 传说中的神武天皇就是徐福？

（1）徐福东渡到达日本？

不少人曾经听过“徐福东渡”的传说，更曾有学者撰写书籍、论文，论证徐福最终到达的就是日本，而且成为日本的初代天皇神武天皇，开创了日本建国的神话。情况究竟是怎样的呢？

众所周知，徐福东渡的故事来自司马迁《史记》卷六《秦本纪》。齐地出身的方士徐福（一作“徐市”）上书秦始皇说，海中有“蓬莱、方丈、瀛”三座神山，他想“入海求神药”，并且请求皇帝提供数千名童男童女，一起出海求仙。类似的故事也能在记载有不少神话故事的名著《淮南子》中看到，里面提到徐福初次出海，无功而返，回到秦始皇面前时表示，海神要求他带男女百工同行，即可得神药。结果秦始皇答应徐福的要求。然而，一行人出发后到达一个“平原广泽”之地，徐福便就地称王，一去不复返了。

相信大家对以上来自《史记》《淮南子》的故事都略有所闻。这个故事其实在汉朝以后还继续流传，例如，班固的《汉书》、陈寿的《三国志·吴志》都曾提到，在这里先不详细考究。我想说的是，徐福到达的“平原广泽”之地，怎么会与日本、神武天皇扯上关系？

（2）日本当地的徐福传说

既然有说法指徐福东渡求药的目的地就是日本，他还成为神武天皇，那么日本人是否知道这段历史呢？当然是知道的。日本留存下来近40个与徐福有关的历史遗迹，如祭祀徐福的“徐福庙”“徐

福大权现”“徐福祠”等，主要集中在九州岛西部、北部，最远的在本州岛北端的青森县。如此看来，徐福传说依然流传在现今的日本。只是去考究这些遗址时发现，不少都是在江户时代才建好，而最早提到有关徐福的日本史料，出现在8世纪左右，上流贵族（知识阶层）也差不多这时候才见到徐福东渡或来日本的纪闻。

日本在7世纪开始与隋、唐建立频繁的互动关系，因此，结合上述文献史料，我们可以想象，当时的日本人得知徐福东渡的“情报”来自曾到隋、唐留学的留学生、僧侣，然后在民间流传下来。

另外值得留意的是，我们在日本的史料中可以发现，中世至江户时代的部分日本人的确听过徐福东渡的故事，但他们从未将徐福视为神武天皇。他们重视的是徐福去仙山（蓬莱、方丈、瀛）求得神药，将仙山比拟成日本。换言之，日本的知识分子其实希望借徐福传说，强化日本是神仙所在的神国观念，而根本没承认开国之祖是一位中国方士。

（3）中日两国关于徐福的论述

简单介绍一下神武天皇的神话故事。神武天皇是天照大神的五代孙，他的曾祖父，即天照大神的孙儿琼琼杵尊受命下凡来到九州日向国（即现在的宫崎县），管治日本。神武天皇继承王位后，在45岁时带领族人东征，最后辗转来到大和国亩傍（现在的奈良县），成为日本的开国天皇。按照神话，神武天皇在位79年后病逝，享年127岁。

显然，神武天皇的故事存于传说的云雾中，无法完全否定，也无法证实。无论如何，自8世纪以来，日本人都相信神武天皇是天照大神的子孙，绝非外国的凡人。所以，日本人从一开始就将“东渡求药”与“止王不来”分开，选取对自己有利的内容进行诠释。

既然如此，“徐福是神武天皇”的传说又是怎么出现的呢？这个说法主要来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中国学者的论考。他们根据保留在日本的徐福传说遗迹和《古事记》《日本书纪》的记载，推断徐福就是神武天皇。

日本国内则一直以此为奇说、邪说。不过，随着考古研究成果的逐渐累积，日本学界基本上承认日本列岛在古代曾多次接纳来自中国、朝鲜半岛的文明、技术和移民。但关于徐福是神武天皇之说，大多日本人只视之为无稽之谈。

表1-1　日本国内徐福的相关史迹一览

序号	县　名	所在地	史迹·遗物名
1	佐贺县	武雄市	蓬莱山
2		佐贺市金立	金立神社
3		诸富町	徐福登陆地
4		富士町	温泉
5		山内町	黑发山
6		白石町	徐福登陆地
7		伊万里市	徐福登陆地
8	福冈县	八女市山内	童男山古坟
9		筑紫野市	天山

10		糸岛市	徐福登陆地
11		福冈市名岛	名岛神社
12	鹿儿岛县	屋久岛	徐福登陆地
13		种子岛	徐福登陆地
14		坊津町	徐福登陆地
15		串木野市	冠岳
16	宫崎县	宫崎市	滨木绵
17		延冈市	蓬莱山徐福岩
18	山口县	上关町祝岛	徐福登陆地
19	广岛县	宫岛町严岛	圣崎蓬莱山
20	高知县	佐川町	虚空藏山
21	和歌山县	新宫市	徐福宫
22	三重县	熊野市	徐福宫
23	爱知县	名古屋市热田	热田神宫
24		小坂井町	莵足神社
25	静冈县	清水市三保	三保松原
26	山梨县	富士吉田市	富士山

27		河口湖町	徐福社
28	东京都	八丈岛	编织物
29		青之岛	编织物
30	京都府	伊根町	新井崎神社
31	青森县	小泊村	熊野神社
32	秋田县	男鹿市	赤神神社

2．著名的邪马台国与后来的大和朝廷有什么关系?

（1）“谜之王国”邪马台国

说到日本的古代历史，大家多少受影视作品、游戏的影响，听说过邪马台国及其女王卑弥呼（或称“俾弥呼”）。

熟悉陈寿《三国志》的朋友也一定知道邪马台国和卑弥呼的存在，出自《魏志・乌丸鲜卑东夷传》（以下简称为《倭人传》）。另外，《汉书》《后汉书》以及后来的《宋书》《梁书》《隋书》《旧唐书》《新唐书》，都有关于倭国和日本国的记载。

换言之，关于古代日本的文献资料，主要来自中国的王朝正史，其次是先后存在于朝鲜半岛的百济、高句丽、新罗等国的记载，以及日本本土考古出土的文物。如何解读《三国志》为主的中国史书，成为还原日本古代史的一大关键。正因如此，日本史学界便开始了将近100年的“邪马台国论战”，至今无法休止。详细的争论经过在此姑且不谈，总而言之，最大的争论焦点就是：邪马台国究竟在哪里?

目前为止，主流的两大说法是九州说和畿内说。支持前者的学者推断邪马台国位于九州中南部，今天的熊本县附近，后来邪马台国国王远征本州，成立大和国，即我们熟悉的“日本国”的雏形。支持畿内说的学者则认为，邪马台国一直在奈良盆地，与后来的大和国有深厚的关系。

但双方至今仍未握有足以否定对方的重要证据，我也无意在这里论断谁是谁非。

（2）邪马台国的记录突然中断

比起上述的位置争议，我认为更重要的是：邪马台国、卑弥呼女王，与后来的大和国有什么关系？

按照《倭人传》以及学者的分析，邪马台国与卑弥呼女王出现在公元3世纪，而大和国大约在5世纪初征服各部，建立起日本列岛第一个统一的国家政权。换句话说，邪马台国与统一的大和国之间，大约有一个世纪的空白期。

《倭人传》里，邪马台国只是当时割据日本各地的诸多王国之一，在女王卑弥呼带领下强盛起来，成为诸部的盟主。然后，邪马台国通过由魏国控制、位于朝鲜半岛的带方郡（今天的开城—首尔一带），与曹魏以及后来的西晋建立朝贡关系。但是记录只到266年，即西晋建立后第二年。在这之前，卑弥呼去世后，邪马台国面临重大政治危机，最后由卑弥呼的宗女（同族女子）台与（又作“壹与”）继承王位。266年，成为倭女王的台与派人到西晋朝贡，在此之后，有关邪马台国的记录便消失无踪了。

专家学者认为，这与不久后西晋受到北方少数民族侵扰、国力衰退有关。西晋皇室南迁后，黄河流域陷入分裂内乱，波及作为中日交往桥梁的朝鲜半岛。乘势崛起的高句丽、百济以及后来的新罗，使朝鲜半岛陷入战乱。中国与朝鲜半岛局势的转变，被认为是邪马台国无法与中原王朝保持交流的主因。

进入4世纪，邪马台国的情况已无从稽考，但根据考古研究，当时的奈良盆地以及附近的大阪平原，陆续出现大小不一的古坟遗迹群。

目前学者们相信，即使邪马台国继续存在，也仍然是诸国之一，盟主地位很可能因为卑弥呼死去而旁落，由其他部落取代。

另一方面，在4世纪末期高句丽的“广开土王碑”上，记载高句丽与南方的百济以及背后的倭国时有交战。换句话说，与中原王朝交流中断的4世纪末期，日本列岛已出现一个足以率兵越过今日对马海峡的倭国。

（3）从邪马台国到倭国转移的推断

考虑到目前的考古成果，没有证据显示当时有强大的其他文明进入日本列岛，而散落在日本西部——奈良盆地至北九州各地的古坟，也没有出现特大差异。不过，考古学家认为，几个建于4—5世纪，分布在奈良、大阪区域的大型古坟遗迹，反映当时在该地区已经逐渐出现强大的权力体。

日本古代史的主流学者相信，在后邪马台国时代，今天的奈良县一带，数个王国通过联姻结成联盟。后来，联盟式统治慢慢发展成由拥有较强统治权的“大王”领导多个相对较弱的部族，即“盟主式”联邦政体。之后，“盟主式”联邦再演变成后来与南北朝的刘宋、萧梁和萧齐交流的大和国，也就是出现在上述“广开土王碑”上的倭国。

因此，根据目前考古挖掘成果以及文献资料综合推断，卑弥呼的邪马台国与后来形成的大和国——倭国，并没有直接关系，以“万世一系”的天皇为中心的国家，起码要到5世纪末才开始成型。

3．日本有两个开国天皇？

（1）“阙史八代”天皇真的存在吗？

按照日本的宪法规定，天皇是“日本的国家与国民统合的象征”。熟知日本历史文化的人都知道，日本天皇至今已传126代，2019年5月继位的德仁即是第126代天皇。不过，从很久以前开始，不少外国人包括部分日本人都质疑：真的有126代天皇存在？

有关天皇诞生的传说，到近代为止都依据着《古事记》《日本书纪》这两部夹杂神话的历史书（有关这两部书与天皇的关系，请看第五章第3问）。这两部书成书于8世纪左右，其中都记载第1代天皇神武天皇是在公元前660年即位的。这个说法虽然自江户末期以来，已经成为日本人的常识，但直到现在，关于神武天皇是否真实存在及其即位年份，均未获证实。

不仅如此，历史学家目前也还不能确认6世纪以前的天皇，即第1代天皇神武天皇至第9代天皇开化天皇的存在。神武天皇作为“开国之祖”，即使没有史实根据，但有关他的各种神话和传说数量都远超他的八代子孙，因此，即使经不起历史学和考古学的考验，神武天皇的存在感至今仍然十分强烈。

相比神武天皇，他之后的八代天皇则显得十分渺小。关于这八代天皇（绥靖至开化），除了《古事记》与《日本书纪》的记载外，没有其他史料可考证，因此在历史学上，这八代天皇被称为“阙史八代”。“阙史”即欠缺史料证实的意思。在目前的日本历史教科书里，几乎都不称这九代天皇为实在人物，只称他们为传说中的天皇。

然而，即使难以确认阙史八代的存在，日本人也普遍难以舍弃早已在他们心中根深蒂固的神武天皇。在一般认识上，他们仍视神武天皇为开国天皇或初代天皇。

（2）崇神天皇之谜

日本第一位真正被历史学家、甚至考古学家认可的开国天皇是谁呢？一些聪明的读者会想，是否是第10代的崇神天皇呢？但很遗憾的是，他也不是被史料证实存在的天皇。严格来说，第10代的崇神天皇至第14代的仲哀天皇，也是没什么史料可考证。既然如此，为什么历史学家不把这四位天皇称为“阙史”的天皇呢？

这是因为在《日本书纪》里，崇神天皇的和风谥号（请参考第六章第1问）是“御肇国天皇”，也就是“始治国家的天皇”。因此，即使没有史料支持，历史学家也相信崇神天皇是有着特殊意义的一位人物，他甚至有可能是一位扩大倭国统治，乃至为统一日本做出贡献的天皇。

现时的历史学家普遍认同当初日本列岛上存在多个大小部落，然后由史称倭国的大和朝廷（或大和国）进行统一，最终形成了后来的日本王国。因此，如按照谥号的意思来看，崇神天皇便是被尊崇为扩大大和朝廷疆土的君主了。当然，这些观点都只是基于《古事记》与《日本书纪》特别重视崇神天皇推测得来的。

无论如何，按照《古事记》与《日本书纪》的记载，在两书成书时，朝廷与知识阶层认定他们有两位开国天皇，一位是神武天皇——天照大神的第五代孙子、初代天皇，另一位是崇神天皇——第一位扩大国家规模的天皇。



图1-1　首十代天皇与“阙史八代”

（3）第一位真实存在的天皇

关于两位开国天皇——神武天皇与崇神天皇是否真实存在过，有诸多争议，也没有足够的史料和证据去支持，但同时又难以完全否定他们的存在。那么，真正有根有据的天皇究竟又是谁呢？

按照目前的考据和研究，日本第一位获历史学家、甚至考古学家认可其真实存在的天皇是第21代的雄略天皇。这主要是根据1978年在埼玉县稻荷山古坟遗迹里发现的一把铁剑，剑上刻有“辛亥之年”“获加多支卤 ”大王之名。

一般认为上述的辛亥之年是471年，即《古事记》与《日本书纪》记载的雄略天皇时代，而“获加多支卤 ”的日文发音又与《古事记》《日本书纪》上雄略天皇的名字“大长谷若建”“大泊濑幼武”的发音近似。除此之外，《古事记》与《日本书纪》里记载的雄略天皇的事迹，也是有中国史料可以佐证的（请参考第一章第6问）。于是，主流的历史学家与考古学家都相信：雄略天皇是日本第一位有迹可循、真实存在的天皇。

4．“万世一系”的概念与古代天皇的诞生有什么关系？

（1）神代以来的“万世一系”

明治时代到现在，日本当政者、神道派和保守势力都一直强调并深信，天皇是自神代以来的“万世一系”，是永无断绝的神圣存在。因此，天皇统治的日本是与其他国家不同的神国，国民必须毫不犹豫地拥护天皇统治，维持国家上下团结。这个信念虽然在日本战败后急速被否定与打压，但目前依然有不少人维护这个想法。另一方面，考古学界与历史学界在战前被政府钳制思想，也受制于“不敬罪”，自然无法对“万世一系”进行充分检讨。战后，学界从神国思想中得到解放，讨论才变得活跃。

战时的日本政府将《古事记》和《日本书纪》作为力证天皇“万世一系”的根本资料。不过，到了20世纪60年代，历史学家重新验证、分析两书的内容，论证神武天皇至开化天皇为止的首九代天皇只是传说人物，神武天皇以外的八代天皇被称为“阙史八代”（详见前一问）。而对于大和朝廷时代为止的天皇们，目前还无法证明他们的真实身份，而且按照两书的内容去复原古代天皇的继承关系，也会发现其中至少出现了几次暗示天皇家族转换的记录。

（2）20世纪七八十年代出现的“王朝更替论”

承上所言，20世纪七八十年代以来，有不少历史学家提出了“王朝更替论”，指出古代天皇事实上是几个家族通过联姻的方式结合成现在的天皇家系。然后到了奈良时代，朝廷先后编写了《古事记》和《日本书纪》，将古代本来不是一系的几个家系合而为

一，形成了“天皇一直是同一家族相传相承至今”的假象和意识，后来进一步形成“万世一系”思想。

其中，历史学家怀疑最有可能出现“王朝更替”的，是在第26代继体天皇的时候。《古事记》和《日本书纪》中记载，继体天皇本来是第15代天皇应神天皇的五世孙，以越前（现在的福井县）为根据地。到了第25代武烈天皇时代，大量王族在多场政治斗争中相继被杀，而武烈天皇又没有子女，于是群臣讨论后，决定到越前迎接分属武烈天皇远亲的继体天皇来继承大统。

由此，历史学家强烈怀疑继体天皇的来历，有人甚至认为，关于继体天皇是应神天皇五世孙的说法，是他的子孙捏造出来的，只因为想强调统治的正当性。

“王朝更替论”是战后一部分历史学家反省战前“万世一系”思想的回应，这对于我们重新思考天皇的历史发展和存在意义，有着一定的作用和贡献。然而，在缺乏史料和实质证据的情况下，这样的主张也只是一个值得思考的学说，想借此改写天皇的家系发展史，仍然十分困难。

（3）“万世一系”的成立过程

目前来说，6世纪以前天皇的历史有待更多考古挖掘的成果，才能进行验证。现时更重要的是梳理“万世一系”意识的产生过程。

“万世一系”的意识最早是在什么时候出现的呢？按照可信的史料，如《续日本纪》等记载，第42代文武天皇于697年发布的即位宣命上，便提到了现御神、高天原（皇祖，天照大神所在之

地）、天津日嗣等词语，这些都是在宣命之后成书的《古事记》和《日本书纪》中出现的用语概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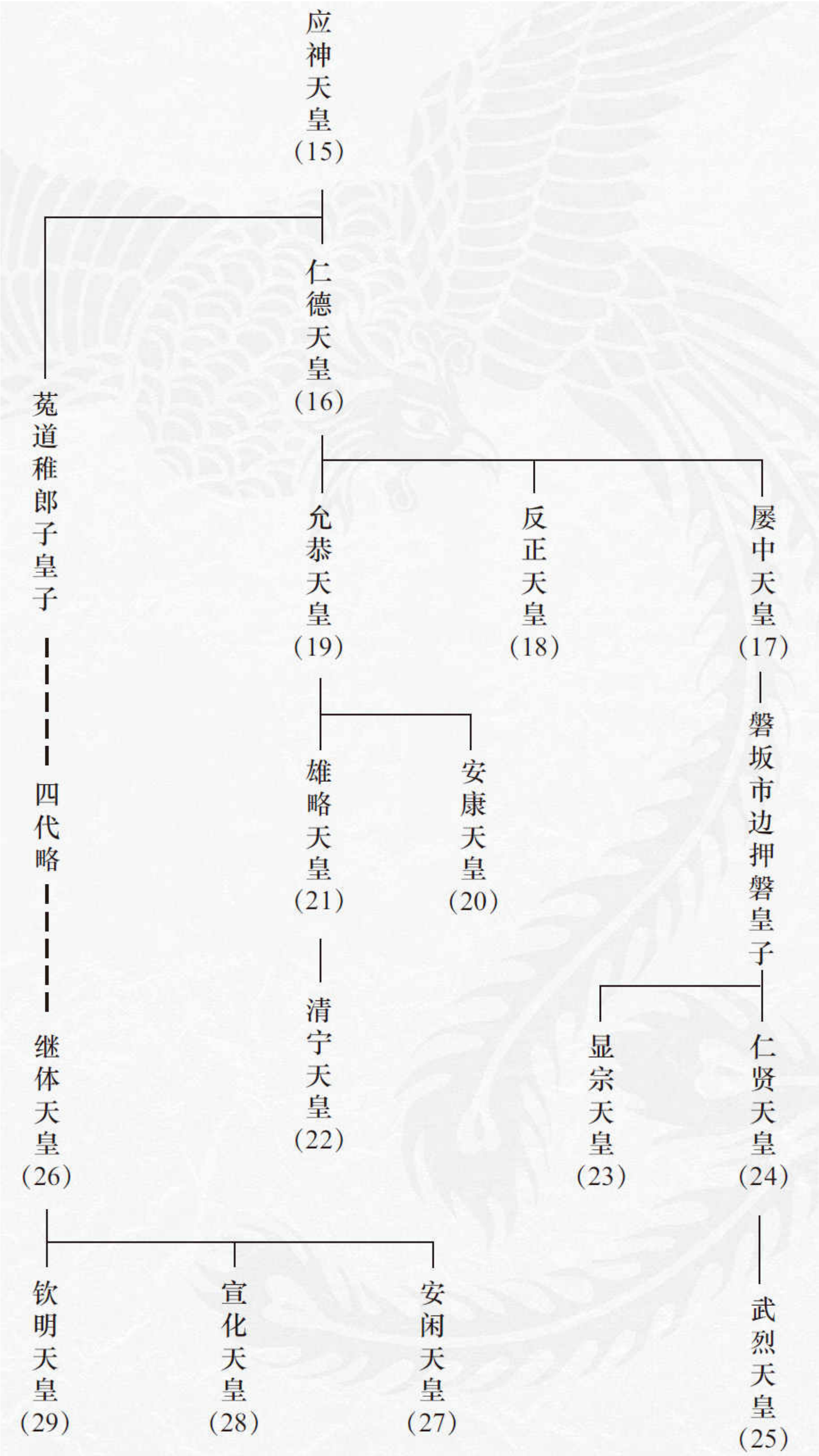


图1-2　公元6世纪中叶的天皇继承

换言之，天皇作为天照大神的子孙，受命治国，此说在7世纪的奈良时代已经确立。

然而，文武天皇的宣命文只反映“当时朝廷和天皇意识到强调自己的根源”，但将这个根源升华和绝对化，则要等到文武天皇的子孙——桓武天皇的时代。

在本书第八章第1问，我们将会提到桓武天皇不只迁都到平安京，他与儿子嵯峨天皇还积极引入中国的文教思想和典章制度，强调自己的统治合情合理，是天命所归。他们希望普及“万世一系”的观念，其中一个重要工具便是中国的“德政”“天命”思想和“祭祀帝皇祖宗”的概念。

自桓武天皇开始，朝廷便积极修史，并在各种文学作品里弘扬天皇统治起源于远古神话时代，再利用祭祀部分先皇的行动，将这种思想渗透到贵族之间。自此，“万世一系”思想的雏形就形成了。

不过，还必须处理一件事——排除中国天命思想中的“易姓革命”观。所谓的“易姓革命”，是指“只要受命于天，任何人都可以取代不德失政的君主，自立为帝”。显然，弘扬“万世一系”思想的天皇，不可能接受这个观念。于是，中世以来的天皇和贵族只好进一步神化、美化过往的历史，将所有天皇视为同一家族的一分子，将继体天皇也视为旁系皇族，以树立一个对抗“易姓革命”的新思想，就是当出现不德失政的天皇时，只可找旁系出身、德才兼具的皇族来取代。因为历史上无先例可循，以他姓取代自然也就没有合法性了。

5．日本的女天皇是怎么出现的？

（1）史上有八位女天皇

在古代的东亚国家里，除了日本女天皇，就只有中国曾出现武周皇帝武则天这位女皇帝。为什么日本会出现女天皇，而且多达八位呢？

首先说明，这八位女天皇并不包括人们较为熟悉的邪马台国女王卑弥呼，也不包括《三国志》中记载的继承卑弥呼地位的台与女王。这里说的女天皇，是指有较多史料佐证其存在的推古天皇、皇极天皇（后来再任，改称齐明天皇）、持统天皇、元明天皇、元正天皇和孝谦天皇（后来再任，改称为称德天皇），还有江户时代的明正天皇和后樱町天皇。

上述有十任女天皇，但皇极天皇和孝谦天皇都在退位后不久，重新即位为天皇（历史上称为“重祚”），所以实质上只有八位女天皇。另外，八位女天皇之中，最后两任女天皇——明正天皇和后樱町天皇——与前面六任天皇，时隔近1000年。因此，除了问为什么日本会出现女天皇外，我们还要问，为什么会相隔1000年后再次出现女天皇？

（2）第一位女天皇——推古天皇

在7世纪之前，当时的大王（天皇的前身）是由群臣按血统和能力来推举，并没有绝对的男女之分。成为第一位女天皇的推古天皇本来是敏达天皇的大后兼异母妹妹，她的父亲是钦明天皇。换言之，推古天皇与敏达天皇是兄妹成婚。

敏达天皇病死后，用明天皇和崇峻天皇先后继位。然而，前者短命而死，后者被臣下苏我马子暗杀身亡，王位出现短暂的真空。敏达天皇的儿子们尚且年幼，由于推古是王族成员，又是天皇的近亲，于是群臣便拥戴时任大后的她为新天皇。顺带一提，推古天皇的一个侄子便是厩户王，即著名的圣德太子。

（3）7—8世纪是“女帝的时代”

推古天皇开创女性天皇的先例后，除了江户时代的两任女天皇以外，剩下的六任女天皇都集中出现在7—8世纪。因此，不少历史学家称这两个世纪为“女帝的时代”。这六任女帝各有不同。例如，前述的推古天皇和皇极天皇（齐明天皇）、持统天皇、元明天皇都是前任天皇的女儿，嫁给分属近亲的新天皇，成为妻后，加上自身也是王族，提高了继承天皇之位的可能性和正当性。因此，她们的儿子身带双重的皇族血脉，自然更有资格继承皇位了。

换句话说，这几任女天皇继承大统，表面上虽然是过渡性质的，但是由于她们的生父、丈夫都是皇族出身，因此地位非常尊贵，性质上与江户时代的女天皇十分不同。而且，她们不是等待交接的过渡天皇，而是各自在天皇制早期扮演着重要角色并发挥着稳定作用。例如，皇极天皇让位后，因为弟弟孝德天皇早亡，政局不稳，于是她便以前任天皇的身份再次即位，以保局势稳定。

持统天皇和元明天皇时，也有类似的情况。文武天皇去世后，其儿子首皇子还年幼，所以他的母亲即位成为元明天皇。元明天皇于715年让位，将长女立为元正天皇，待首皇子长大后再安排元正天皇让位。由此可见，这几位以双重身份成为天皇的女帝，都有强大的影响力和权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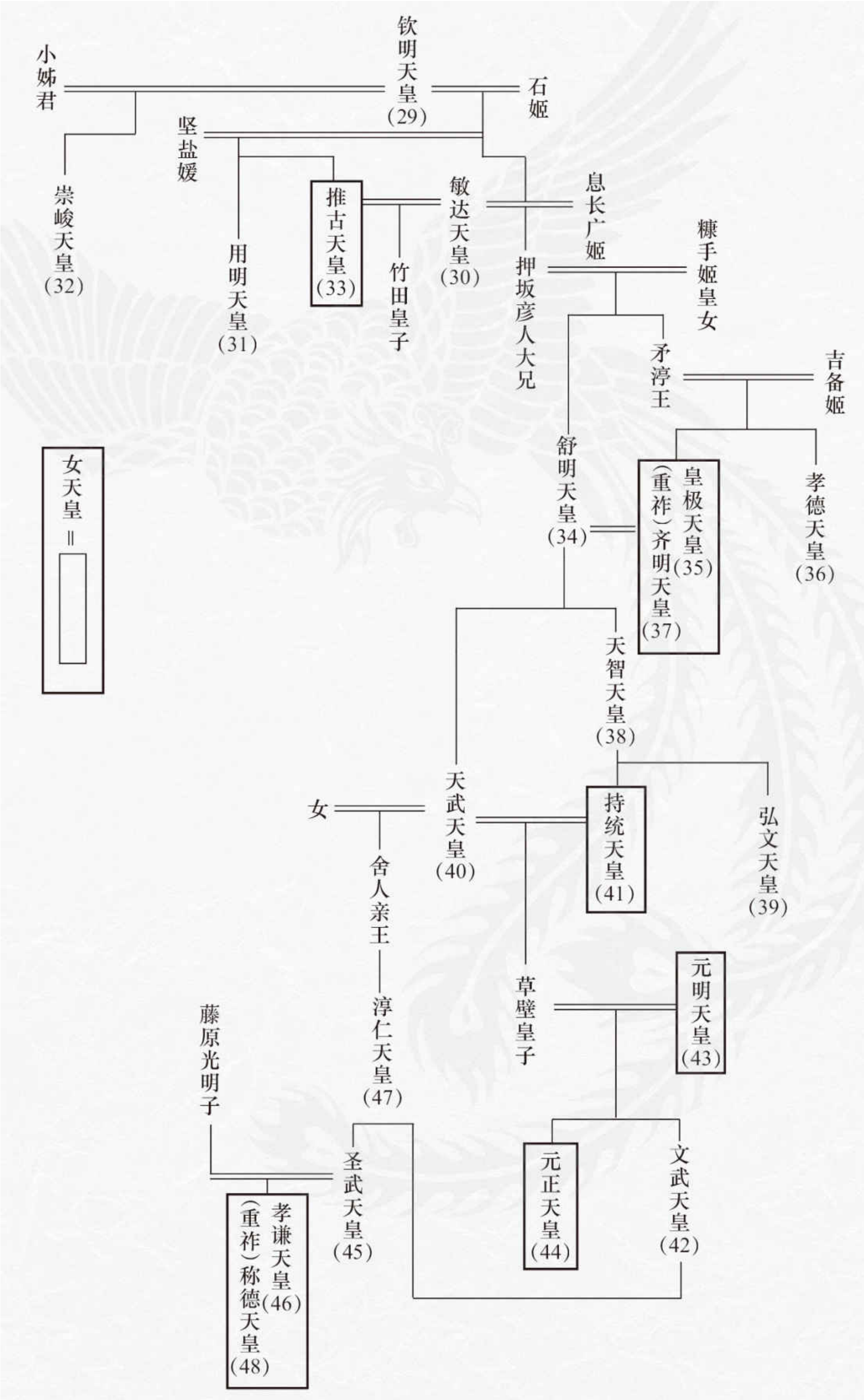


图1-3　7—8世纪的女天皇

至于之后的元正天皇和孝谦天皇，与前面提到的天皇相比，情况略有不同。首先，元正天皇和孝谦天皇都是终身未婚。而前文已

提到，元正天皇是元明天皇的女儿，她是为了等待弟弟文武天皇成年，才被立为天皇，是带有过渡性质的。所以，元正天皇终身未婚的原因，是因为她没有传宗接代的任务。

孝谦天皇则是天皇史上第一位被册立为皇太子，再成为女天皇的人物。由于她未与王族男子成婚，所以一度将皇位传给了旁系出身的淳仁天皇，后再次夺回皇位，“重祚”成为称德天皇。

从孝谦（称德）天皇的例子，我们再次看到女天皇在7—8世纪的权限与统治，绝非虚有其表。但不要忘记，即使女天皇握有实权，但当时的大和朝廷基本上仍然以男系子孙继承皇位为优先条件，一旦女天皇无法确立这个后继人选，便会出现政局动荡。

孝谦天皇第二次继位后，就因为无法完成这个政治与历史的使命，最终由群臣合议，推选出皇族出身、称德天皇的妹夫继位，是为光仁天皇。

详细的政乱不在此赘述。总之，自此之后，鉴于女天皇继位后潜藏的危机教训，自光仁天皇开始（770年即位），皇族女子再也没有继承天皇之位，直至850年后的江户时代，才又有女皇明正天皇即位。

6．天皇有姓氏吗？

（1）八色之姓与和风谥号

一直以来，日本人与外国人都想问：“天皇有姓氏吗？”回答这个问题之前，先为大家整理天皇与日本人姓氏诞生的大概过程。

大约在3世纪中期，当时被称为“倭国”的日本还没有文字，上流阶层以职名和所在地为氏，如大伴氏（职名）、苏我氏（地名）等。

到了670年，天智天皇实施了著名的“庚午年籍”（日本历史上最早的国民户籍账册，已散佚），他的弟弟天武天皇除了另外制作了“庚寅年籍”（也已散佚）外，又为从属国家的官员和地方豪族设立“八色之姓”，按地位高低排列为：真人、朝臣、宿祢、忌寸、道师、臣、连、稻置。自此之后，豪族群臣受封于天皇，领取了赐予的姓氏作为身份象征。

那么天皇有没有为自己和家族创立姓氏呢？曾有说法指出，创立八色之姓的天武天皇死后，他的和风谥号为“天渟中原瀛真人天皇”。换言之，天皇很有可能用了八色之姓中最高级的“真人”作为自己的姓氏。顺带一提，所谓“和风谥号”，便是以古日本语和思维去纪念、评定天皇生前功德的谥号，而且专门在国内使用，与模仿中国、朝鲜半岛，以汉音双字作为纪念，主要用于国史上的“汉风谥号”有所不同。

话说回来，由于天武天皇以后的天皇都没有用真人自称的相关资料，因此，更多历史学家认为，真人不是指八色姓中的真人，而是仿照唐高宗采用道教思想，将皇帝比作道教中的仙人（真人）。

换言之，天武天皇的和风谥号“天渟中原瀛真人天皇”与八色之姓毫无关系，一切只是巧合而已。

（2）倭之五王曾以“倭”为姓

其实在天武天皇之前，在日本以外的史料里，也能找到倭国时代的大王曾向外国提到自己姓氏 的记载。这个重要的线索来自中国南北朝时期南梁沈约撰的《宋书》。

根据《宋书·倭国传》记载，当时倭王倭赞向刘宋要求建立外交关系，并且请求皇帝刘裕赐官。接着，倭赞的弟弟倭珍，还有18年后被推断是倭王同族的倭济、其子倭兴和倭武两兄弟均先后派使者向刘宋朝贡，并请求赐予“将军”等称号。倭武更是分别与刘宋、萧齐和萧梁建交。这五位倭王在历史上一般被称为“倭之五王”。

这五位倭王均曾以“倭”（yamato）为姓，并且被记录在中国王朝的正史上。关于他们究竟是主动以“倭”为姓，还是刘宋、萧齐、萧梁因他们是倭国国王，所以记载为倭姓，目前在史学界仍然有争议。但整体来说，后一种说法获得较多历史学家的支持。

目前史学界根据最后一位倭王倭武在中国正史的活动时代，推断他是雄略天皇。然后，再按照以上的亲族关系，进一步推断倭赞、倭珍，同族的倭济、倭兴分别是仁德、履中、允恭和安康四位天皇，但这样的说法还没办法得到确证。

（3）《隋书》记载：倭王姓阿每

倭武在萧梁立国初期（502年），仍然与中国进行交流和朝贡，但似乎没有跟接续的南陈有交流的记录，也没有出现在《陈

书》之中。而倭国（《隋书》写作“俀”）与隋朝交流，已经时隔近100年（600年），也就是史称“遣隋使”的时代。

按《隋书·倭国传》记载，倭国派来的使者向隋文帝杨坚说明了倭国国王的姓名。使者称“倭王姓阿每，字多利思比孤，号阿辈鸡弥”。乍看之下，与南朝时代的倭姓完全不同。不过，日本历史学家重新按照这些汉字的读音进行解读后，得出“阿每”（ame）是“天”的音译，“多利思比孤”是“降临”之意，而“阿辈鸡弥”则是“天儿”“大王”的意思。

换句话说，“阿每·多利思比孤·阿辈鸡弥”就是“从天降临的大王”，是“天皇”在古日语中的同义语，也就是说，在《隋书》留下的倭国国王姓、名、号其实都不是当时天皇的姓名，倭国使者只是将“天皇”的同义语分拆成姓、字、号来告知隋文帝，不打算按照中国习惯为天皇定一个中国风的名讳。更直接一点说，倭国已有与隋朝平起平坐的意识。

（4）唐宋之后不再探求天皇的姓氏

到了8世纪初，当时已改称国号为“日本”的奈良朝廷与唐朝交流，唐朝曾按照在长安留学的日本僧侣、学生的说法，在写给天皇的国书中称“日本国王主明乐美御德”。“主明乐美御德”其实就是日语“天皇”的读音转化为汉字，而这也是一串赞美字词，反映了日本僧侣利用机会美化自己国王的称号。唐朝似乎不知其意，直接照用。

之后的《宋史》则改称日本国王的姓为“王”，但没有更多的描述。宋朝以后的中国正史，没有再对天皇之姓有什么记载，一方面是同时代的天皇已经不再是执政的国君，而成为“统而不治”的

国家代表；另一方面，在中国王朝的情报里，天皇的存在感也每况愈下，所以对天皇姓氏的求知欲也随之消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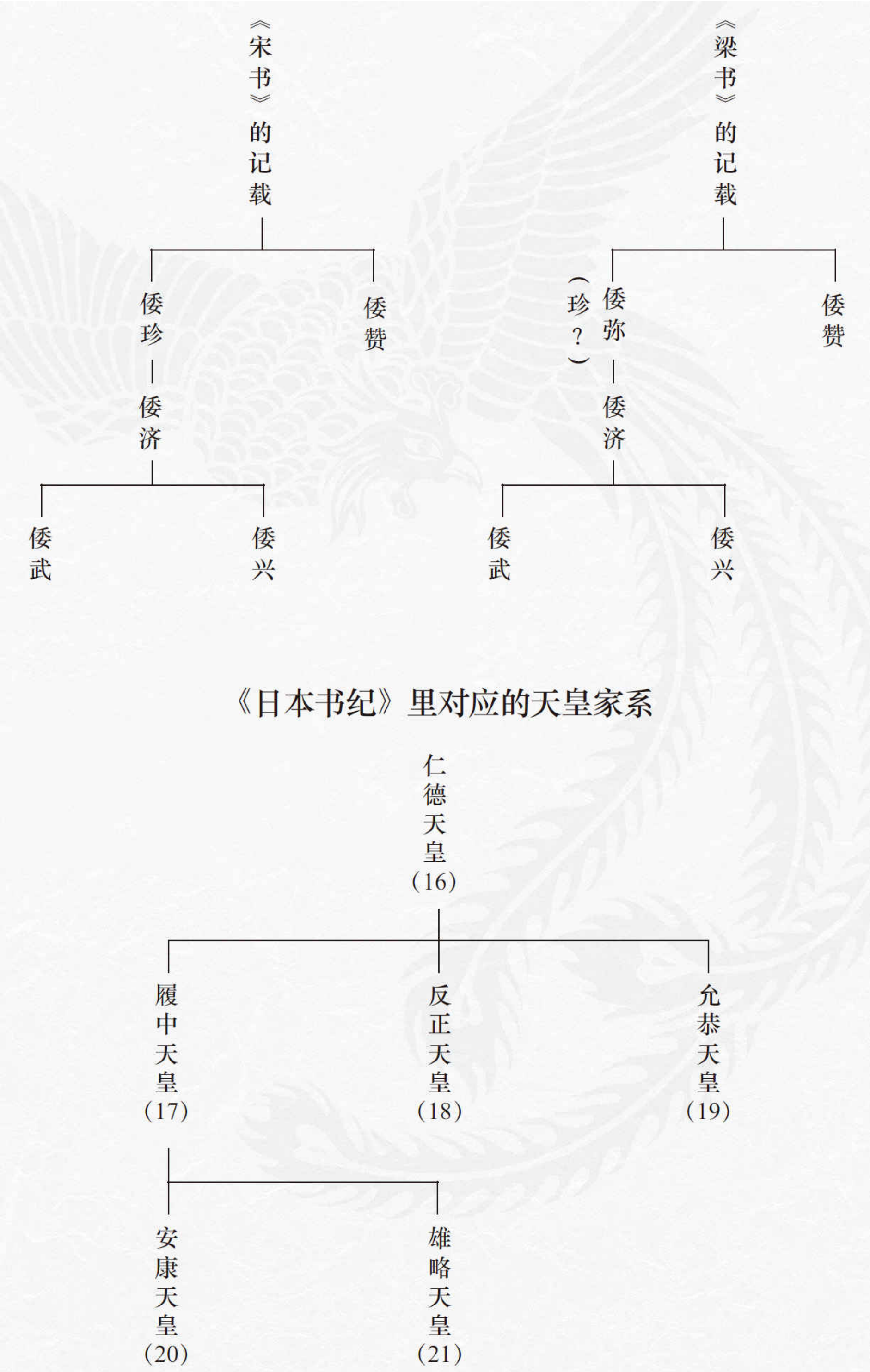


图1-4　中国史料与日本史料中的“倭之五王”

7．“平将门之乱”和天皇有什么关系？

（1）日本史上著名的“平将门之乱”

“平将门之乱”是日本历史上十分有名的政治事件，考虑到不少读者不了解这个事件，因此先简单说明一下。

该事件发生在939年底，与同时期在西日本发生的“藤原纯友之乱”都是10世纪日本最大的地方乱事，历史学家一般合称“承平天庆之乱”。

平将门之乱的主角平将门（？—940）是著名的桓武天皇的五世孙，他的父亲一辈被赐“平”姓，从此他们一族便被称为“桓武平氏”。将门的祖父高望王获封为上总介，随即到了关东的上总国（现在的千叶县中北部）任职，主责镇讨当时在关东地区十分猖獗的强盗集团。也因为这个原因，高望王便一直留在当地，成为当时盘踞关东南部的一支王孙贵族。

既然是天皇子孙，又身为贵族，为什么平将门会发起叛乱呢？参考后来成书的《将门记》所述，起乱的主因是为了争夺家产。平将门的父亲平良将死后，其伯父平国香等想夺取平良将的遗产，平将门便与他们相争。另外，又因平将门与邻国常陆国掾（地方官的一种）源护有婚嫁之争，于是原本族人间的争产变成了跨境的大乱。

（2）日本史上第一个被判枭首的贵族

平将门决定与上述的敌人对抗后，随即起兵发难。但随着战事扩大，他与前来平乱的常陆介（常陆是现在的茨城县）藤原维几展

开战斗，并获得胜利。他乘势攻入常陆国，攻陷了常陆国府（常陆国的官署）之余，邻近的下野（现在的栃木县）、上野（群马县）、相模（神奈川县东部）、下总（千叶县北部）、武藏（东京都和埼玉县）、安房（千叶县南部），即关东八国，连同西南的伊豆国（神奈川县西部），都先后落入了他的手中。

不仅如此，平将门还将这几国的官印全数收走，这意味着他夺去了这几国的统治大权。这样一来，原来的私斗私怨便上升为公然反叛天皇朝廷的行为了。不过，平将门起乱的时间不长。受朝廷之命出兵讨伐的关东军事贵族平贞盛和藤原秀乡等人，在征东大将军藤原忠平率领正规军到来之前，已经击杀平将门，成功镇压叛乱。平将门被送到京都枭首示众，成为日本史上第一个被判枭首的贵族。

（3）新皇与天皇分庭抗礼

比起同时期发生的藤原纯友之乱，平将门之乱深深烙印在京都贵族们的记忆以及后来的史书中。平将门战死后，京都发生了一连串天灾瘟疫，人们认为这是平将门对败死愤愤不平，于是作祟害人。更重要的是，传说平将门在起乱时曾自称“新皇”，成为关东八国之王，与京都的天皇分庭抗礼。

《将门记》里提到了平将门称皇的经过。当时他攻下上野国之后，一名巫女自称是八幡大菩萨的使者，要将帝位授予他，而且还出现了已故名臣菅原道真的灵魂。

道真在平将门之乱前，在政治斗争中受累被贬，最后死在九州。据《将门记》记载，道真的灵魂表示会跟八幡大菩萨一起率领大军，协助平将门成为新皇。当然，这只是文学里的场面，不能当真。

然而，这个故事引发了不同时代人们的讨论，更有人认为后来创立镰仓幕府的源赖朝，很可能就受到《将门记》的影响，才会决定成立幕府。但平将门自称新皇这个说法没有史实根据，只能说是一个传说。

比起平将门是否真的自称新皇，《将门记》的作者故意提到八幡大菩萨协助他称皇的情节，以及他与天皇的关系，更值得我们留意。

八幡大菩萨也称“八幡神”，原本是九州丰前国宇佐（现在的大分县）八幡宫的祭神，后来被认为是曾派员出征朝鲜半岛的应神天皇的分身，更是佛教里的菩萨。故此，自奈良时代直至平将门之乱时的10世纪，作为天皇分身的八幡神，已经是天皇与贵族们深信的神祇之一。

（4）授予天皇之位的八幡神或天照大神

即使《将门记》里说八幡神显灵是无稽之谈，但其背后的意识却十分重要——包括《将门记》作者在内的当时人相信，要挑战天皇或者与天皇平起平坐，就必须获得能授予天皇之位的八幡神或天照大神的授权（天照大神在《将门记》里没有出现）。

八幡神愿意显灵相助的人当然不会是凡夫俗子，相助平将门也因为他是天皇的后裔。换句话说，八幡神授予皇位的人，必须是皇族才行。《将门记》表面上看似描写了一个王孙谋反失败的故事，但它说明了成为天皇的必需条件，以及天皇与神祇的关系。平将门的失败并不意味着八幡神无能，反而更强调八幡神显灵，配合平将门的皇族血液，才有资格与天皇处于平等的位置，一较高低，甚至获得与天皇分土而治（关东八国）的机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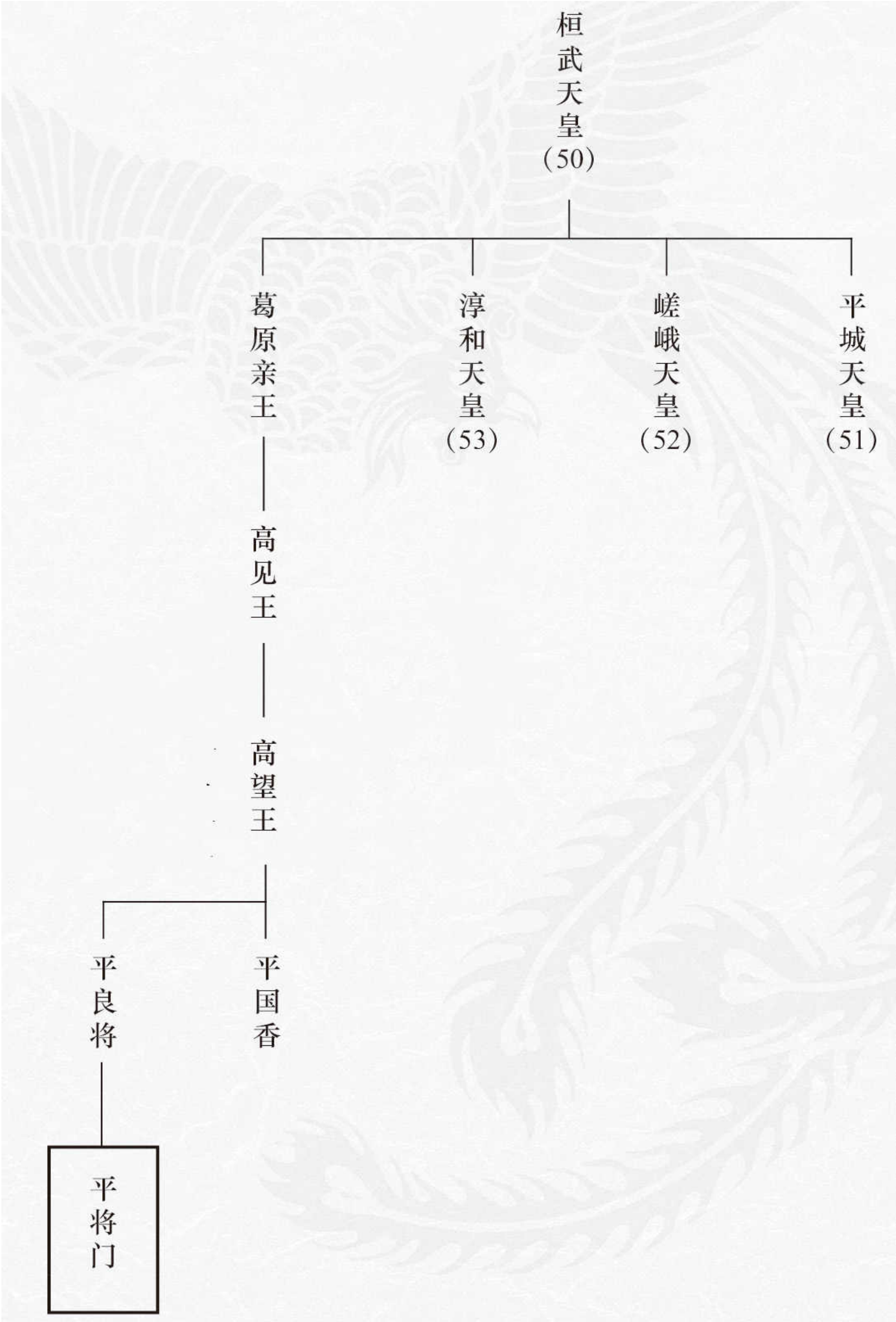


图1-5　平将门与天皇的关系图

第二章　乱世中的天皇（中世篇）

1．天皇为什么与藤原家共治天下？

（1）“摄关政治”的迷思

相信不少读者听过“摄关”这个名词，“摄”是摄政的简称，而“关”则是关白的简称。“摄政”顾名思义就是摄理政事之意。天皇年幼时，摄政协助幼帝主理国政，天皇成年后，摄政改称关白，协助天皇总揽政事。换言之，摄政与关白本来是两个因应不同情况而设置的特别官职，但一直到10世纪为止，虽时有设置，但都是临时性质，不是常置官职。

至平安时代初期为止，摄政本来只限天皇的家族成员来担任，而且一般都是皇太子或至亲的皇族。而在1000年后的明治维新时，一直标榜“王政复古”的日本政府为了宣示天皇摒除权臣专权的意志，恢复由成年皇太子担任摄政。昭和天皇便曾在太子时期担任摄政，协助体弱多病的父亲大正天皇管理国家。

话虽如此，10世纪后半期开始，摄政与关白已经完全成为藤原氏中的藤原北家（又称“良房流”）的囊中物，直到明治维新，前后持续将近1000年。就日本的历史发展过程来说，皇族摄政存在的时间还是相对短暂的。

（2）天皇不是傀儡

希望读者留意，藤原氏能够晋升“摄关”之位，继而把持该职将近千年之久，是因为藤原北家在11世纪时成为天皇的外戚，从此与天皇家建立唇齿相依、难分你我的关系。这使得不少人以为藤原

北家已经不用理会天皇是长是幼，可以恣意妄为，代替天皇掌管国家，而天皇似乎成为“花瓶”。

可是，摄关政治并没有那么简单。藤原道长虽然将藤原北家推向最高峰，世称“御堂关白”，但事实上他从未担任过关白，只曾担任摄政一年。还有，自他的五世祖（首位非王族摄政藤原良房）直至道长之父藤原兼家为止的一个多世纪里，代代皆出关白和摄政，但不要忘记这一百年同样是天皇史上少有的亲政时代，那时候宇多天皇、醍醐天皇、朱雀天皇和村上天皇四代的治世，在日本历史上被称为“圣代”“盛世”。可见道长以前的藤原北家即使身兼关白和摄政，其实也无损天皇的统治权。

藤原北家成为摄关，不代表天皇变成傀儡，这是为什么呢？

（3）摄关藤原家的真正武器——外戚身份

摄政与关白到10世纪前半期为止，都是不常置之官（令外之官）。按当时的规定，两者只是辅助之职，不能干涉天皇管治，也不可参加天皇与朝廷大臣（太政官）商议国政的公卿会议。另外，当时在天皇与太政官之间，还存在一个名为“内览”的官职，他有权在公卿会议审议之前阅览天皇的决策案和旨意草案。显然，这个内览之职才是真正左右政策的职位，但担任内览的公卿不一定是藤原氏出身，内览与摄关本是两个系统。

不过，在道长登场之前，上述的规定逐渐出现变化。962年，藤原伊尹（道长的伯父）趁在位的冷泉天皇（村上天皇之子）体弱无子，决定先下手为强，发动“安和之变”，排斥有力政敌源高明，使藤原北家完全垄断了朝政。自此，藤原北家的地位渐次巩固，摄关正式成为常置之官，藤原北家也独占内览。到了道长时

代，以内览把持朝政，继而独占摄政、关白之职的“摄关藤原家”正式诞生。

上文曾提到道长非但没有担任过关白，而且只担当了摄政一年。但是，由于他一直担任内览，因此依然能在朝廷里呼风唤雨。当然，这不代表外戚的身份不再重要。道长进入政坛后，先后将自己的4个女儿嫁给天皇和皇族子弟为妻，确保不论天皇是谁，藤原家的外戚身份都得以万全。

然而，这并不意味着天皇家从此成为傀儡，摄关藤原家的诞生不等于天皇衰微。藤原北家的子孙即使占据了朝廷最重要的职位，但他们想要把持权柄，关键还是靠宗族女子成为天皇的后妃和母后。换句话说，藤原道长的子孙要继续握有权位，第一，在任的天皇必须一直早逝，由藤原北家出身的母后代幼帝统率皇室；第二，天皇得继续迎娶藤原道长的宗族女子为后。藤原北家的这些女子成为天皇的母后以后，便可以利用国母的身份，协调夫家天皇家与娘家藤原家双方的利益，姻亲成为两家共治天下的关键。

另一方面，藤原道长和他的子孙虽然靠宗族女子成为国母，再把持朝政，但既然摄关是辅助之职，天皇成年后，藤原家也没有阻止之理。而且，自8世纪以来，“天皇是神的子孙”的观念逐渐根深蒂固，藤原氏为了保证自己有大义名分去扶持天皇家，只能利用宗女延续下去。

（4）藤原氏成为佐翼之臣，再被削弱权力

自7世纪中叶的白村江之战（663年）后，日本外无敌患、内无战乱，没有任何政治条件可以动摇天皇的存在根基，藤原氏最终选择了“佐翼之臣”的角色。

11世纪初，藤原道长之子赖通接掌摄关、内览之职，在位的后三条天皇年轻力壮，决定在不影响国政的前提下，限制藤原家族的势力，振兴天皇的权威。天皇迎娶了同是藤原家出身，但属于势力较弱的分家女子为后，变相地削弱了赖通的摄政名分。自此，叱咤朝野百余年的摄关藤原家迎来了君权重新膨胀的时代，即史上有名的“院政时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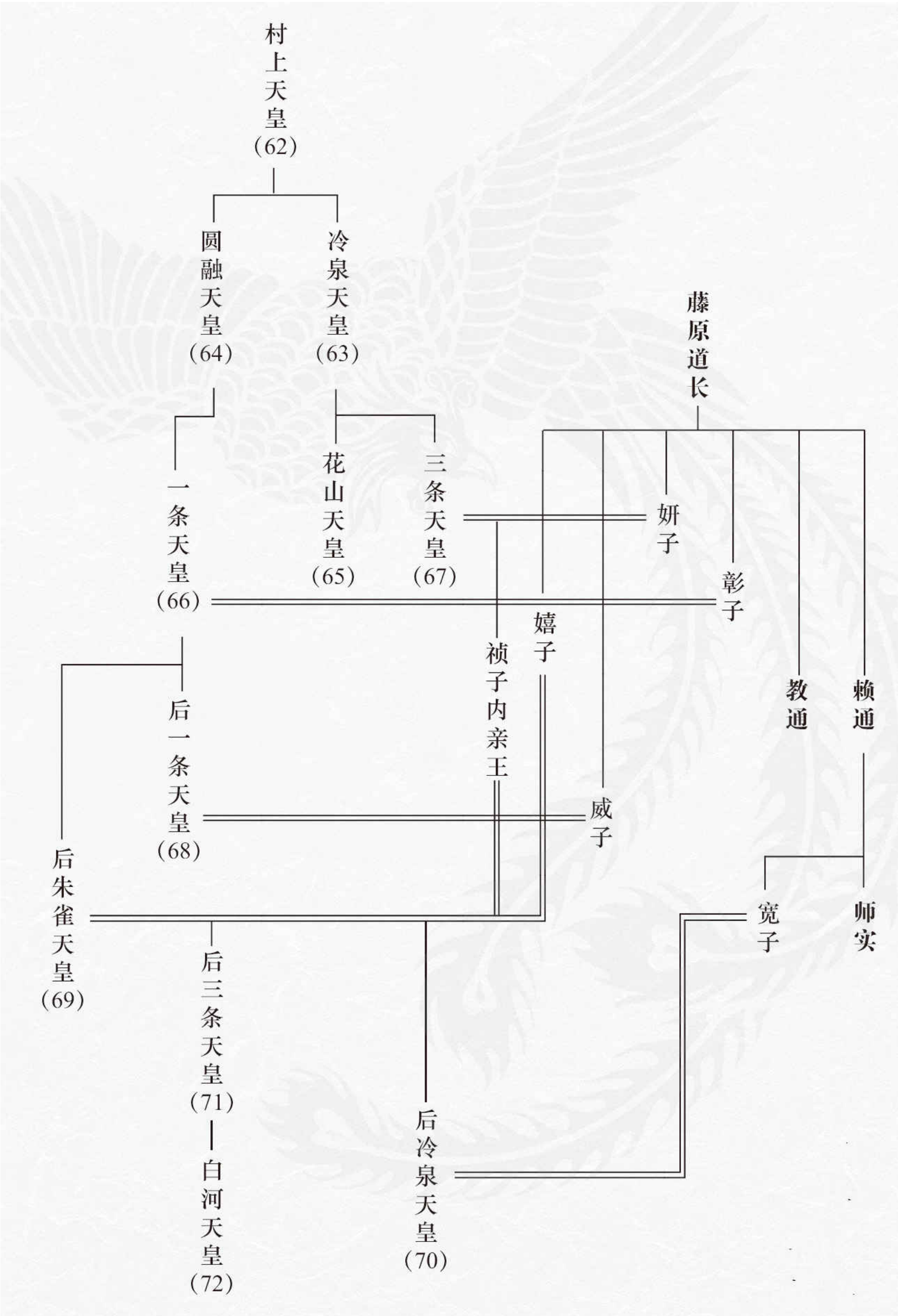


图2-1　天皇与摄关藤原家的姻亲关系

2．院政是怎样的制度？

（1）二王共存：天皇与太上天皇

退位后的天皇，其正式名称是“太上天皇”，简称“上皇”。上皇的历史悠久，早在公元7世纪的奈良时代便已经存在。在这之前的大和时代，天皇（本来称为“大王”）与贵族联手共治。但自11世纪开始，为“院政时代”。太上天皇一般被称为“院”或“上院”，“院政”就是退位天皇仍然握有执政实权，并且以“天皇家之长”“天皇之父/ 祖父”的至尊身份，与在位的天皇以及摄关藤原家合力统治国家，是一种极为特殊的政治制度。

从历史发展来说，院政并非一开始就存在。奈良时代出现太上天皇，是由于当时王族之间的争权政变繁多，在没有确立皇太子制度时，天皇为了确保自己的血脉能够继承王位，于是选择了生前退位、先立继承人为天皇的做法。与后来的院政不同的是，那个时代的太上天皇与天皇不一定是父子关系，有的是母子、祖孙、兄弟等，而且奈良时代的太上天皇普遍不会主动干政，也没有自己的官署和势力。

虽然如此，真的到了危急关头，奈良时代的太上天皇可以重新成为天皇，这在奈良时代有过两例。一般来说，奈良时代的太上天皇还是为守护天皇统治制度安定而存在的。

随着王权交接恢复稳定，太上天皇没有被废，仍然存在。到了9世纪末，贵族之中一个有力贵族——藤原氏——获得天皇重用而崛起。当中的藤原北家利用外戚身份，手握最高辅政之职摄政和关白，奉天皇为君，代管国政，史称“摄关政治”。而那时候太上天

皇仍然存在，这意味着最高权力是天皇、太上天皇、摄关藤原家三方共治。

约100年后，与藤原氏没有直接血统关系的后三条天皇即位，决定收回部分权力，削弱藤原家的威势。他的继承人白河天皇沿袭其方针，同时仿效藤原氏的手法，积极利用太上天皇的身份代替天皇执政，院政自此诞生。

值得我们留意的是，自平安时代开始，太上天皇与天皇之间原则上只限父子、祖孙和兄弟关系，奈良时代的女天皇已然被完全否定了。而且，院政也只限由现任天皇的父亲或祖父来开设。这个规定象征着当时日本上流社会增强了“父权为贵”的意识，以及父子相承的必然继承条件。在这个原则下，一旦天皇膝下无子或儿子尚幼，在主观感情上是不想由弟弟接任下一代天皇的。不过，如果太上天皇仍在，又手握院政之权的话，天皇受制于父皇的权势，也只能传位给弟弟，间接埋下了兄弟两支血脉明争暗斗的危机，这个危机也在200年后成为事实（请参考本章第4问）。

（2）从兴起到终结，院政分为四个时期

作为天皇之父，白河上皇以来的院被冠以“治天”或“院治天”之名，以曾为天皇之尊以及现任天皇之父获得凌驾于天皇之上的权威，而且身为退休人士，院比较不受朝廷的礼仪和规范限制，可以随心所欲地指导天皇治国。

上述所谓的“治天”之语，来自大和时代国王的称号——治天下大王（后来改为“治天下天皇”）。“天下”也就是日本国的意思。因此，“治天”本来是天皇的代名词，太上天皇恒久出现后，也成为上皇的别称，所以，“治天”存在两义，一些记录称上皇为“院治天”来划分。又有另一种分法，将现任天皇称为“院”，太

上天皇称为“上院”。为免读者觉得复杂，本书一律统称为“太上天皇”。

由于当时的朝廷实际上已经放弃了源于中国王朝的中央集权制度，改为与藤原家为首的朝廷贵族和各大寺院“瓜分”日本的国土，代为自己的庄园，再由天皇以国君的名义做出承认。而天皇本人退休成为太上天皇之后，也加入了“瓜分”国土的行列，而且利用国君的权威，大量拿下日本各处的土地作为自己的庄园，称为“院领”。

换言之，院政兴起时，日本形式上是集权，实际上则走上庄园制度。然而，天皇作为国君和当权者，不能以权谋私，但太上天皇则没有这个政治约束。因此，只有早日成为太上天皇，才能继续以庄园领主兼天皇家之长的双重身份，谋取最大的利益，并且成为日本国内最大最强、有权有势有财的权力者。院政自白河上皇在1086年让位开始，一直到光格上皇于1840年去世为止，前后共维持了700多年。历史学家一般将这700多年的院政时代分为四个时期，院政在这四个时期也存在着不同的特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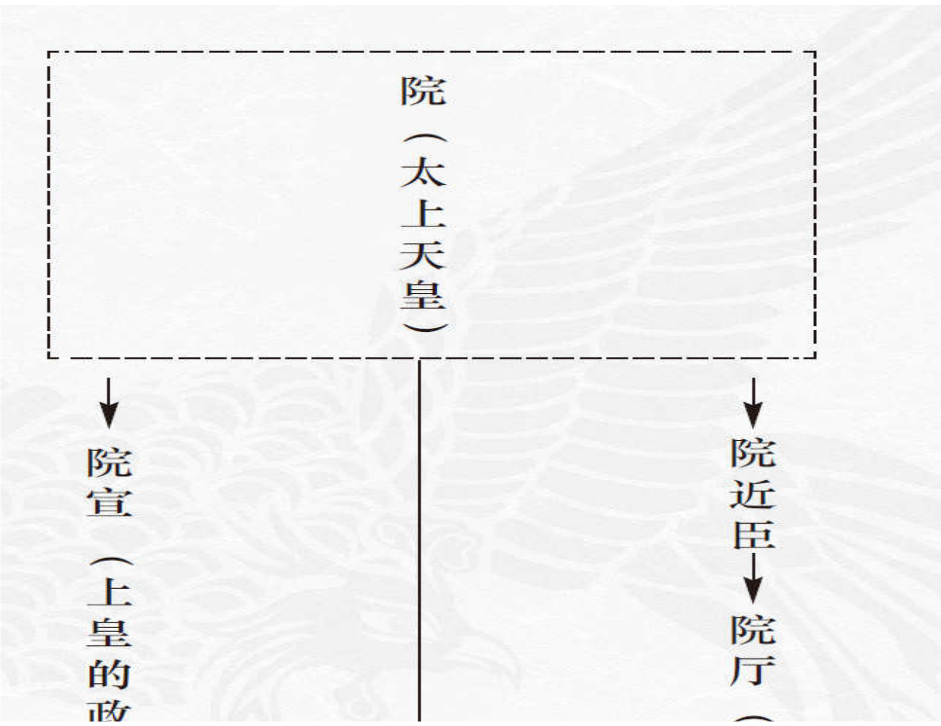
第一个时期：从白河上皇开始实行院政到鸟羽上皇为止的60年，是院政的草创期，各种与之相关的独立官署院厅、院的执事院司等，在这一时期陆续诞生。

第二个时期：后白河上皇到后鸟羽上皇的时代，前后约60年。这时期正值武士崛起，但也是院政最鼎盛的时期，两者联手削弱了摄关藤原氏的势力后，一段时间内保持合作无间的关系。可是1221年，承久之乱爆发，院政与朝廷势力被武士政权——镰仓幕府——盖过，院政能够呼风唤雨的时代也到了尾声（详见下一问）。

第三个时期：承久之乱后到南北朝时代开始为止的100年间（1221—1321年），是院政权力受到幕府压制的时代。虽然当时朝廷受到镰仓幕府的干预与影响，国家统治大权也握在幕府手上，但贵族和寺社的支配权仍然由院政支配。在这100年里，经过数代院与天皇的努力，适应社会时政的变化，改革了朝廷的架构，成为后来朝廷的基本形态，直至幕末。

第四个时期：室町时代以后到明治维新为止的600余年。虽然院政依然存在，但随着室町幕府在京都成立，这个“皇家最后堡垒”的统治权慢慢受到室町将军的干预，形成了天皇与将军共存共荣的状态。在这种情况下，院政已经变成徒有其表的制度。那个时代以后的天皇即使让位成为院，也不再像过去一样可以呼风唤雨，基本上是与天皇唇齿相依，去应对幕府。

到了1840年，光格上皇逝世后，院政便不再出现，可以说自动结束了。顺带一提，2019年退位的平成天皇在退休后，被称为“上皇”，当然在宪法之下，这位时隔近180年来首次出现的上皇将不会实行院政，而是名副其实的退休天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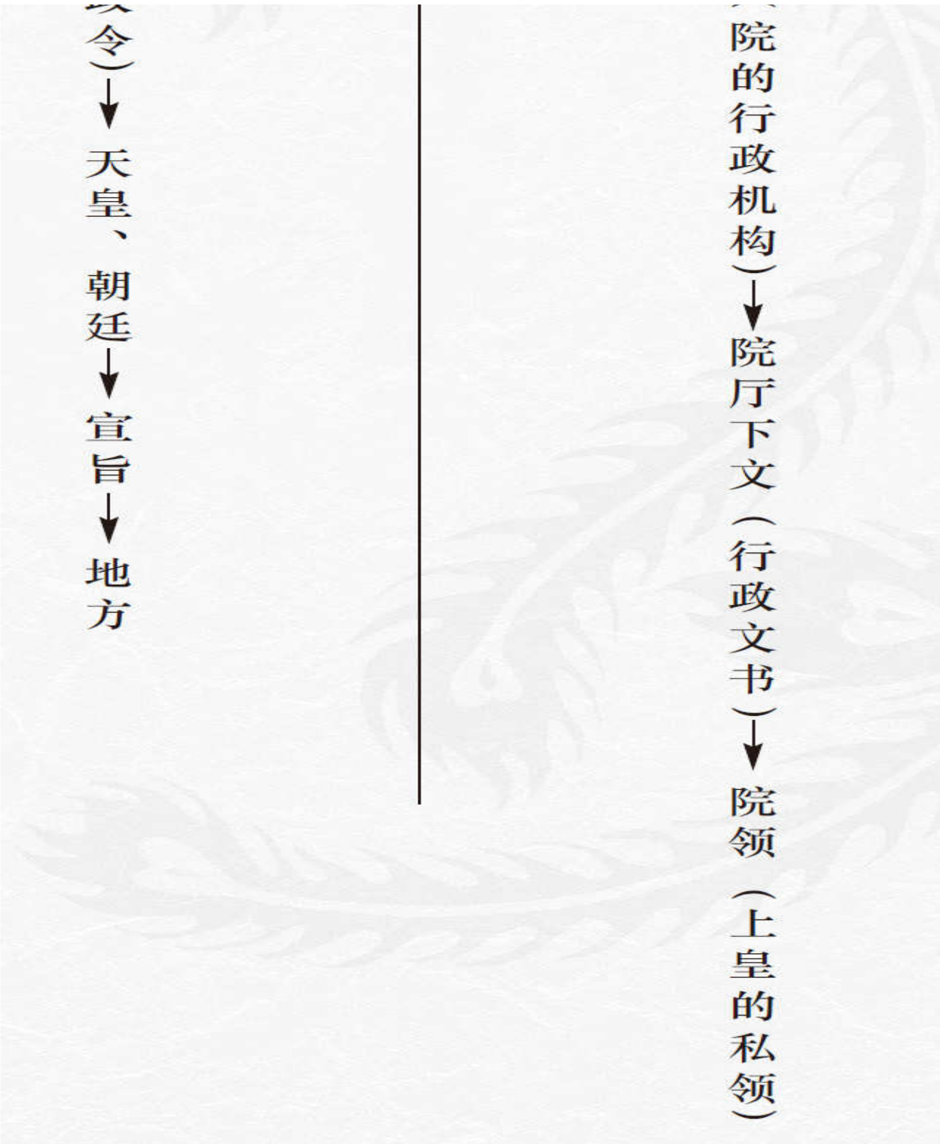


图2-2　平安时代“院政”的权力架构

3．“承久之乱”为何给天皇制带来重大影响？

（1）什么是承久之乱？

1221年，发生了日本史上十分著名的承久之乱，这是日本国史教科书里必然提到的一课。对天皇来说，这是一个空前的历史大事件。简而言之，承久之乱的起因与后鸟羽上皇有关。当时领导朝廷、开设院政的后鸟羽上皇不顾朝廷内部的反对，在1221年向镰仓幕府宣战。上皇一方原本形势大好，但镰仓幕府迅速决定应战，并且发动三路大军直扑京都，最终上皇方大败。他本人被幕府捉拿后，与另外两个已让位的上皇——土御门上皇与顺德上皇——都被流放外地。后鸟羽上皇被流放到隐岐，土御门上皇被流放到阿波（今天的德岛县），顺德上皇则被送到佐渡岛（今天的新潟县）。而在兵乱前刚就任的仲恭天皇（后鸟羽上皇的皇子，正确名称是“九条废帝”，“仲恭天皇”是明治维新后追封的）以及他的两名皇弟，一样遭到流放。

11世纪发生的保元平治之乱，战败的崇德上皇也被处以流放之刑，被放逐到四国赞岐（今天的香川县），可以说天皇被放逐不是没有先例。可是，1221年的兵乱后，战败方的数名天皇与皇子都一一被处罚，人数之多，在日本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

战事后，取得空前胜利的镰仓幕府便开始加强对朝廷与京都的控制，甚至在京都设置了著名的“六波罗探题”，专门监视朝廷的举动，又干预天皇的继位等原本不得过问的天皇家事。换言之，承久之乱使幕府有了干预朝廷的口实，强化了镰仓幕府对国家的控制。另一方面，幕府加强控制朝廷的结果，是使部分贵族和王族心生不满，这在某种程度上也间接地引致了100年后后醍醐天皇因为

不满幕府决策，决定仿效后鸟羽上皇去挑战幕府，而他最终成功了。为什么上皇们与朝廷会突然向镰仓幕府宣战？

（2）天皇与幕府的战争

天皇向幕府宣战的原因，一般说法是因为后鸟羽上皇对幕府专横、控制国政感到不满。可是，这不过是军记物语的说法，并没有确实根据。事实上，后鸟羽上皇本来跟幕府的关系十分不错，更与当时的镰仓幕府第三代将军源实朝（源赖朝之子）有一定的交情。

总而言之，上皇对幕府并不是从一开始便心生恨意的，那时候的幕府没有控制朝廷之举，西日本各地区仍未完全受镰仓幕府控制，幕府的势力范围和重心依然以东日本为主，更没有插手天皇与朝廷内部的事宜。所以，军记物语的情节只是附会之说。上皇动兵的真正原因有二。

一是与上皇相知相交的第三代将军源实朝，被幕府执权北条家和他的生母北条政子暗杀，使幕府与朝廷关系出现不稳。二是源实朝死后，幕府决定让九条家的子弟来当新将军，实权则由北条家把持。

九条家是朝廷贵族中地位最高的摄关藤原家的有力分家，当时后鸟羽上皇同意了这个安排，但有朝臣认为九条家出任将军，不仅会伤害他们的利益，而且九条家将因此壮大，使朝中各家贵族（尤其是摄关藤原家的其他分家）之间的势力失衡。于是，不满九条家独享利益的贵族们便向上皇表达不满。

一系列由源实朝被暗杀所引发的人事、利益问题，最终使上皇决定以武力迫使幕府撤回招请九条家子弟当将军的决定，改由其他人（例如他的皇子）来出任，以保朝廷内部的和顺。但是上皇的要

求打乱了幕府的盘算，结果遭到幕府拒绝。威信尽失的上皇决定与幕府兵戎相见。换言之，上皇本来针对的是新将军的人事安排，而不是幕府本身。

（3）战败背后的天皇观

天皇战败是因为幕府拥有强大的军事资源，但是在起兵之初，敢响应幕府的号令，将矛头指向天皇的武士寥寥无几。因为当时的镰仓武士一直都以侍奉天皇、护王护国为最高使命，不存在与天皇、朝廷敌对的思想。所以镰仓幕府得知上皇要号召全国上下去打倒幕府时，北条家也出现空前的信心危机。

然而，就在这危急存亡之际，两名从京都来效命的中下级贵族大江广元（战国名将毛利元就的祖先）和三善康信向幕府进言，并要求幕府立即出兵进击京都，更指出兵讨幕的上皇是“祸乱天下”的坏天皇，幕府和天下人有责任“拨乱反正”。

同时，在京都的九条家也对上皇的行为感到不满，更主张贵族为了天下和祖宗基业，以及身为“佐翼之臣”，有必要阻止行为不正的天皇，以保天皇家的存续。

换言之，当时的上流社会是将天皇与天皇制度分开来理解的，他们誓死保护天皇的安全与天皇家的存续，但同时也义不容辞地将不合众人利益的天皇赶下皇座。这个思想与当时盛行的儒家德治思想有莫大关系——只要是祸乱天下、私德有亏的天皇，都会被认为是难以胜任天皇大任的“失败品”。当要更换天皇时，贵族不能以下犯上，与天皇对立，而是另立新天皇后，由新天皇来处罚旧天皇。承久之乱后一众天皇被流放，也是由新天皇下旨决定的。

承久之乱在日本天皇历史上究竟有何意义呢？除了是天皇史上少有的大败北，也使天皇正式成为武士政权下的监视对象和保护人物，其自主权和统治权进一步受到控制。也就是说，承久之乱使幕府得以控制日本全国，包括了天皇政权，确实堪称划时代的重大事件，也为天皇历史发展带来重大转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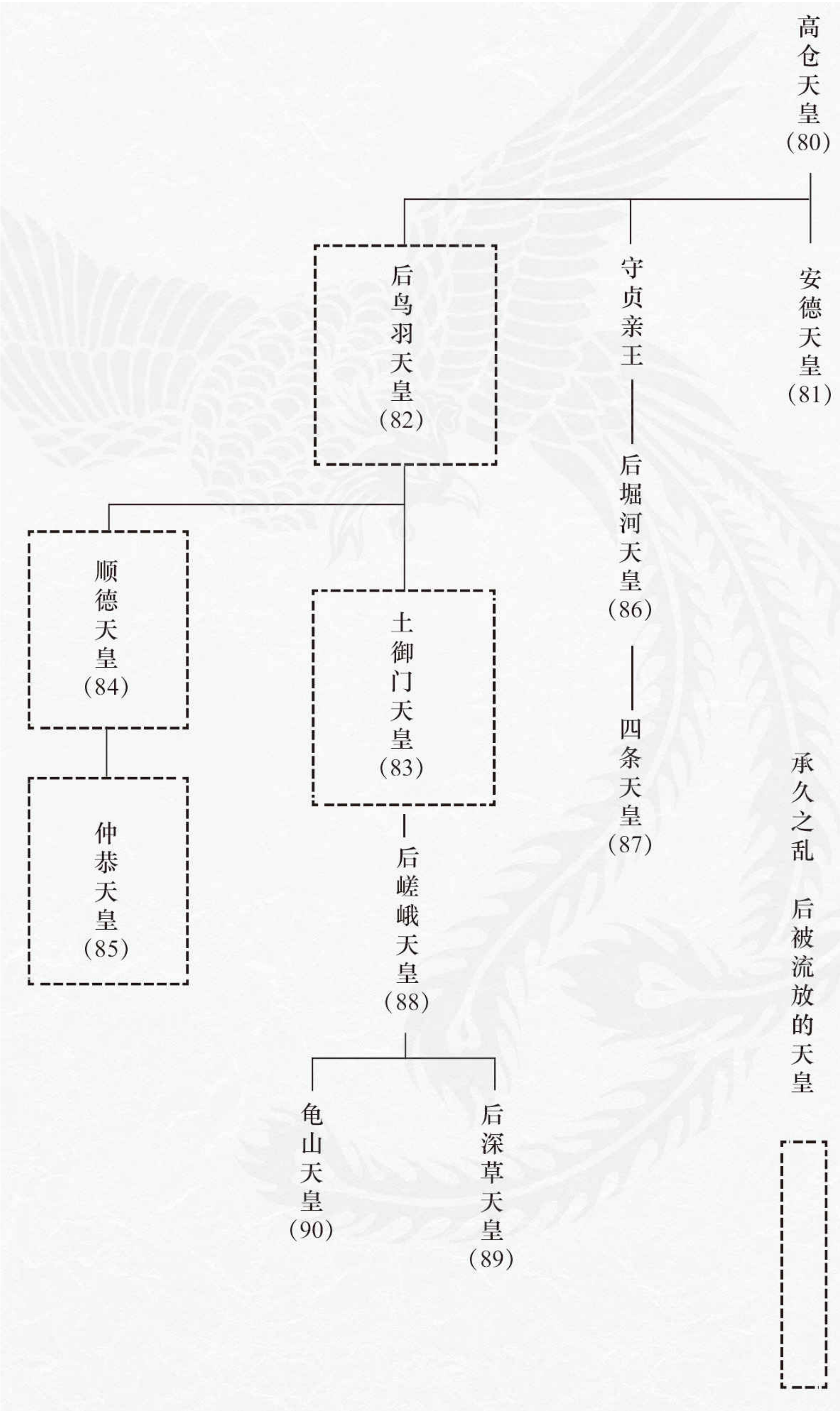


图2-3　“承久之乱”时期的天皇关系图

4．天皇的内讧催生了南北朝时代？

（1）绝无仅有的皇家分裂危机

公元5世纪，在中国历史上出现了南北朝时期，800年后的14世纪中期，日本同样有一个南北朝时代，但不同的是，中国的南北朝时期是来自北方的少数民族入侵中原地区，并且在黄河流域建立了政权，与长江流域以南的汉族政权对抗。日本的南北朝时代则没有外族入侵，也没有敌对的他姓政权，而是出现两个各拥天皇的朝廷，然后互相否定对方，引发了持续60年的内乱。

为什么会出现这个日本史上的重大危机？这还要追溯到13世纪，并且认识一个历史名词——“两统迭立”。

两统迭立是指在镰仓幕府后期，当时的太上天皇后嵯峨上皇让两个儿子成为天皇——兄长是后深草天皇（他的子孙称为“持明院统”），弟弟是龟山天皇（此脉则称为“大觉寺统”）。

后嵯峨天皇其实希望幼子继承大统，但当时长子后深草已成为天皇，于是后嵯峨天皇以父皇身份让后深草退位，由龟山天皇继位。此例一开，再下一任的天皇会是谁，便引起朝中关注。可是，后嵯峨天皇在还没决定下一步时，便已经逝世，当时朝廷里已有两位太上天皇——后深草、龟山，在位的后宇多天皇是龟山上皇之子。

镰仓幕府的执权北条时宗向后嵯峨天皇的宠妃，即龟山天皇生母大宫院询问后嵯峨天皇生前意愿时，龟山天皇的血脉自然成为必然之选。可是幕府同情后深草天皇的处境，加上当时正值中国的元朝向日本施压之际，时宗为免节外生枝，于是决定执行折中方案

——让后深草上皇的长子成为后宇多天皇的皇太子，即后来的伏见天皇，而后宇多的长子（后来的后二条天皇）则成为伏见天皇的皇太子。自此，后深草、龟山两兄弟的子孙轮流成为对方的继承人和候任天皇，让位后的天皇只能在儿子成为天皇时，才能以太上天皇的名义握有统治朝廷的实际权限，即院政。不过，由于当时强调父子相承，院政的开设权只能在自己的血脉成为天皇时才得以启动，对方的子孙成为天皇时，则由其父或祖父来开设院政，成为具有实权的太上天皇。因此，站在任何一方的角度而言，他们都希望自己手下那个名义上的皇太子、对方血脉的天皇赶快下台，让与自己一脉相承的人继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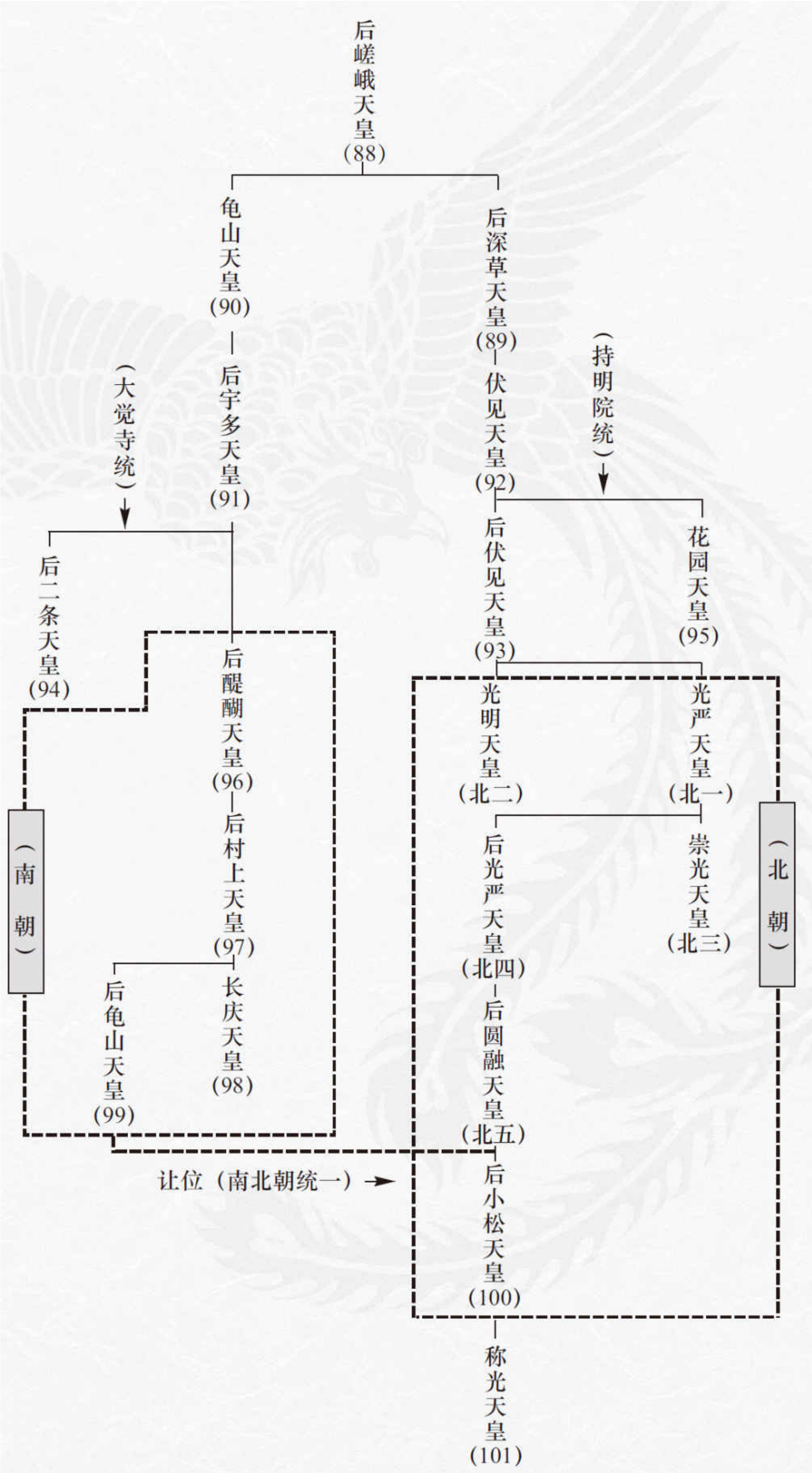


图2-4　日本南北朝时代的天皇关系图

显然，北条时宗这个做法表面上看似维持了朝廷和睦，但实际却使得后深草、亀山的子孙千方百计地要扳倒对方，早日实现“皇统一统”的终极目标。可是，碍于幕府以仲裁者的身份平衡两方，两家的“心底话”一直难以言明，同时也开始将怨气和不满指向幕府。

（2）挑战命运的后醍醐天皇

将这一情绪表露出来的是属于亀山上皇血脉（大觉寺统）的后醍醐天皇。后醍醐天皇是后宇多天皇的次子，后二条天皇的弟弟，原本没有希望继承皇位。可是，兄长后二条天皇早亡，加之他的儿子邦良亲王年幼，天皇之位依规定回到持明院统的花园天皇手上。按照上面轮流继位的原则，年长的后醍醐天皇成为父皇后宇多手上唯一的牌，于是，奇迹般的机会降临了。

可是，从结果来说，这才是后醍醐天皇不幸人生的开始。由于后宇多仍然属意已故长子后二条天皇一脉，即后醍醐天皇的侄儿邦良亲王继承王位，后醍醐天皇继位充其量只是过渡性的安排，待邦良亲王成年后，后醍醐天皇的“历史任务”便告完成。

比起其他受两统迭立影响的天皇，后醍醐天皇显示出不甘心的态度。1324年，一直在背后操控谋划的后宇多上皇因病去世，邦良亲王也在两年后的1326年病故，后醍醐天皇的命运又迎来一个新转机，他只需要考虑怎么应对持明院统的天皇。

后人感觉后醍醐天皇是一位想打倒幕府，实现王权再兴的天皇。其实他一开始想打倒的不是幕府政权，而是两统迭立的局面，然后实现皇统一统。然而，从结果以及当时的现实来说，要达到这个目标只有两个可能，一是幕府取消两统迭立原则，另一个则是打倒幕府。

后醍醐天皇最终决定要推翻幕府，可见他个人意志之强与执着之烈。经过了两次起事失败（1324年“正中之变”、1331—1333年“元弘之乱”），他终于得到了不满镰仓幕府统治的武士的响应，并于1333年将其打败，奇迹般地实现了没有幕府将军和摄关干预的“王政复古”，而且否定了持明院统天皇的继承权。

后醍醐天皇打倒幕府后，如何善后和安抚各个既得利益者的问题接踵而来。结果证明他对此没有充分的准备，独自撑起来的“建武新政”经过三年挣扎，终于在怨声载道下崩盘，被一心想重建武士政权的足利尊氏 打败，第二个控制天皇的幕府政权由此诞生。

后醍醐天皇与他的子孙逃到吉野，联合一度被打压的持明院统天皇与足利尊氏 建立的室町幕府继续抗争。后醍醐天皇结束了两统迭立，结果却将问题推向更复杂的局面，形成了日本历史上长达60年的南北朝时代。

5．“日本国王”足利义满打算篡夺天皇之位？

（1）最广为人知的室町幕府将军——足利义满

相信不少读者通过著名日本动画“一休”认识了室町幕府第三代将军足利义满。撇开动画，义满仍然是最为华人所熟识的室町时代的日本人。这不是因为他开创了灿烂的北山文化，使室町幕府走向安定强盛，他被我们记得的最大原因，是他曾被明朝册封为“日本国王”，等同代表日本向明朝称臣纳贡。

也因为这个原因，足利义满在江户时代后期便被尊王派狠批，他的名字以及他的室町幕府，成为“轻蔑天皇与国家的逆贼、权臣”的代名词。又有历史学家认为，义满打算利用明朝册封“日本国王”为大义名分，否定天皇的合法性。这个观点也影响到华人世界，使我们以为他真的是一个想取代天皇，自立为“日本国王”的野心家。真相真的是这样吗？我们先简单介绍这位风云人物。

室町幕府第三代将军足利义满（1358—1408）在1367年继承父亲足利义诠的权位成为将军，当时他不足10岁，全赖室町幕府的老臣细川赖之、斯波义将和其他幕臣辅政，才得以顺利接掌大位。

当时，使日本分裂为二的南北朝争乱已近尾声，幕府拥立的北朝天皇，其地位已经稳如泰山。到了1392年，以义满为首的幕府终于诱使在大和国吉野（现在的奈良县）和九州负隅顽抗的南朝天皇妥协，承认了北朝天皇的合法性，史称“南北朝合体”。

在这前后，义满也分别将威胁幕府的强大诸侯——山名家与大内家打败，迫使他们成为幕府体制下的藩臣；同时，义满利用余

威，打压在南北朝内乱时期大权独揽的九州探题今川了俊，并迫使一直想并吞幕府的亲戚镰仓公方足利氏满再次臣服于幕府。自此，室町幕府统治下的日本总算回归和平稳定。那时候，义满不过23岁。

平定外乱之后，足利义满接下来面对的问题便是如何处理与天皇和朝廷的关系。身为幕府将军，又是北朝天皇的保护者，足利义满早早便身处高阶官位，在完全统一日本的1392年，他已经是仅次于天皇、与摄关平起平坐的“准三后”（当时的荣誉称衔，地位仅次于皇后、皇太后与太皇太后，实质上就是地位仅次于天皇，与摄白同等之意）。

正所谓少年得志，义满才24岁便位极人臣。但是，义满晋升的步伐还没有停止。他接着在1394年将将军之位让给了长子，即第四代将军足利义持，自己成为最高官位的太政大臣。之后他又辞去所有官职，决定出家，法名“道义”。这样，他就成为一个不受官职制度左右，而且不受世俗之礼约束，却又手握所有权力的统治者，也就只有天皇在权威及地位上能与他相比肩了。

（2）“日本国王”与天皇的关系

重新统一日本的足利义满与天皇又是怎样的关系呢？其实，当时的后圆融天皇与足利义满是同年岁的年轻帝王，他对于义满人气疾升、炙手可热，的确感到不快。加上朝廷贵族陆续惟义满马首是瞻，不少人甚至游走于幕府与朝廷之间，左右逢源。后圆融天皇看在眼里，自然火冒三丈，不时做出一些过激行为。例如，他怀疑自己的妃子与义满有染，于是发生“家暴”事件，对妃子拳打脚踢，被群臣发现后，又突然扬言要自杀了断；后更因为不满贵族向义满献媚，于是“罢工”不上朝。

但讽刺的是，正因为天皇的“超个性”行为，导致朝廷运作不时出现问题，最终导致朝臣向权倾天下的义满求助，结果间接地提高了义满的地位与威望。而且，后圆融天皇驾崩后，义满认为新上任的后小松天皇父母双亡，为国家不幸，于是让自己的妻子当上了天皇的义母，自己则成为天皇的监护人。他利用这个机会提高自己的地位，各种仪式都按照天皇的等级来进行。义满去世后，朝廷更主动追封他为太上法皇（出家的太上天皇），但遭到幕府拒绝。这些行为都被质疑义满有夺国野心的历史学家列为“罪证”。

对于这批历史学家以及认为义满有心篡夺天皇之位的人来说，最重要的证据莫过于他向明朝称臣，受封为“日本国王”。明朝曾在日本仍处于南北朝分裂的时期，派使者到九州，要求当地的南朝势力打击猖獗的海盗行为。这个消息辗转传到了义满耳中，他与幕府担心外国以为南朝才是日本的代表权力。

到了1401年，已经位极人臣、结束南北朝的义满终于向明朝派出使者，要求交流和进行贸易。当时他使用的头衔是“日本准三后源道义”，完全是“日本制造”的头衔，明朝对这个称号完全不理解。明朝只接受其他国家以国王为代表向其称臣，对于日本的官制认识不足，于是回信时便册封义满为“日本国王”。

义满和幕府希望与明朝交流和贸易，现在也理解了明朝的“游戏玩法”，两年后（1403年），便决定顺应明朝的要求，上表称臣，接受明朝的册封。

这似乎是明明白白的卖国、欺君行为，但我们要理解，“日本国王”之称在当时的日本国内属于极隐秘事项，而且只限在幕府写给明朝的外交文书上使用。幕府与义满从一开始便没有打算让国内的权贵知道这件事。他们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接受册封才能与明朝贸易，而并不打算利用这个封号在国内耀武扬威。

在当时贵族们的历史观里，日本从没有向中国称臣的记录，也不存在这种观念。义满与他的幕臣，还有当时的武士、贵族，尊崇天皇为神圣存在的意识深入骨髓，从史料里未曾看到他们有过否定天皇的记载。而且，义满即使真的想利用这种方式改变制度和历史，也难以获得支持。

无论如何，义满在日本国内外的举动的确使他成为日本的国家代表。但是，借国外势力来否定天皇不太现实，而在国内要靠权臣身份去否定天皇，又没有合法的依据。最后，义满突然逝世，所有的问题都成为不解之谜。眼下质疑义满有意取代天皇的说法，也只能说是“诛心”的阴谋论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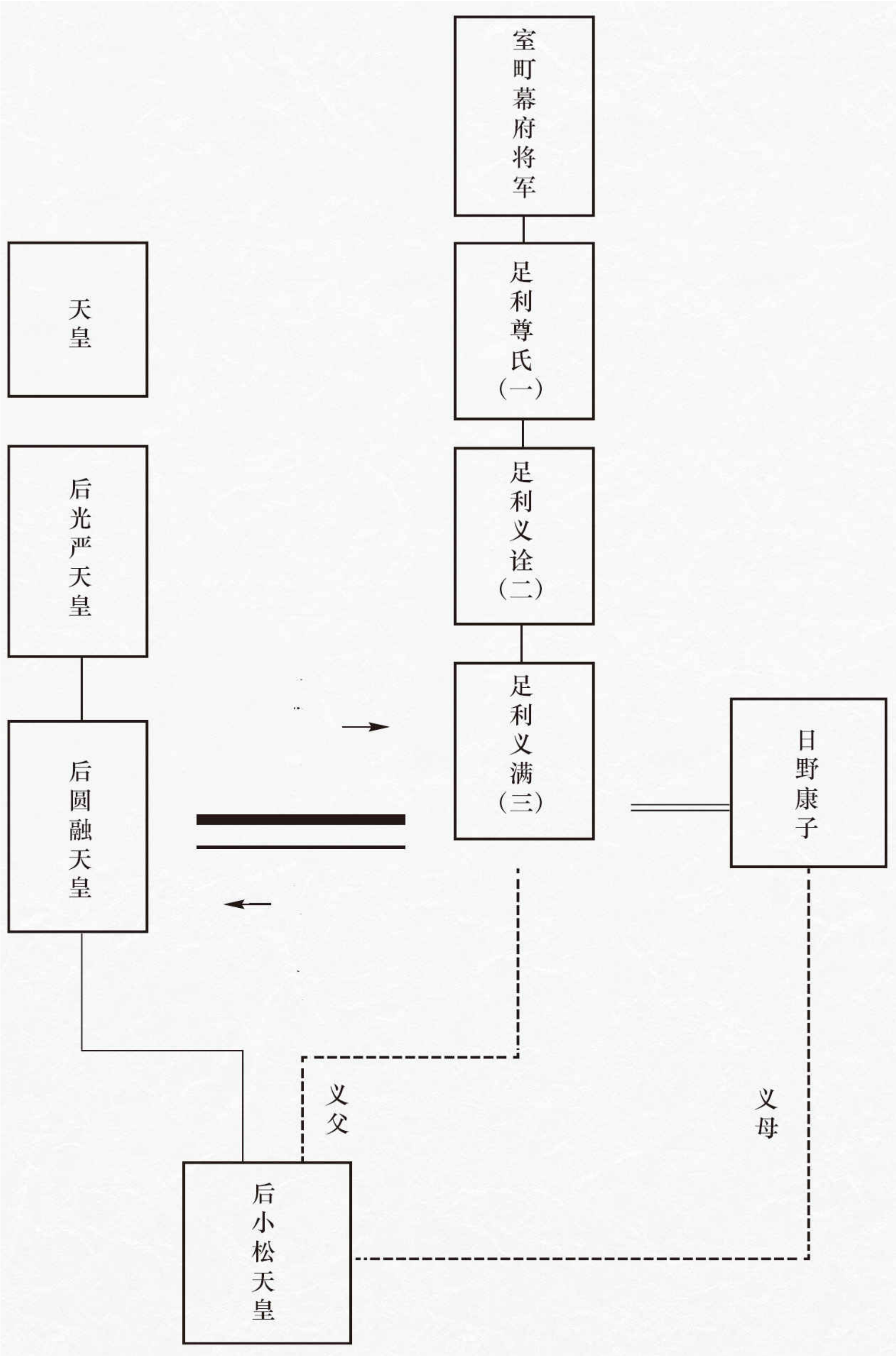


图2-5　后圆融天皇与足利义满的关系

6．战国时代的天皇有多潦倒？

（1）天皇的战国时代

说到战国时代，不少人可能立即想到盘踞日本各地的战国大名怎样叱咤风云、驰骋天下，当时身处京都的天皇却一直默默无闻，仿佛与战国时代毫无交集。这当然是因为我们都认为天皇在那时候是没有权力的政治象征，只是接受室町幕府，以及后来的战国大名，还有三个“天下人”——织田信长、丰臣秀吉和德川家康——供养的存在。

而且，受到游戏和小说影响，不少人听过以下说法：那时候曾经有天皇靠卖自己的字画以及向大名卖官鬻爵来赚钱为生；天皇驾崩后迟迟不能下葬，最终遗体在盛夏里发臭发胀，历时良久才凑足钱举行葬礼。

以上这些说法均不能说完全正确，有些更是夸张其事、道听途说。活在这100多年的战乱时代里的四位天皇，努力地排除万难，以免祖业丧于己手。究竟这四位天皇是如何走出困境，使天皇制得以继续发展的呢？

（2）生于乱世的四位天皇

关于战国时代的始终，到目前仍然有不少争论，但大体而言，是15世纪末至17世纪初的100多年，其间有四位天皇在位，分别是后土御门天皇、后柏原天皇、后奈良天皇和正亲町天皇。后土御门天皇即位于1464年，三年后便爆发了著名的“应仁·文明之乱”（1467—1477年），而最后的正亲町天皇则在丰臣秀吉统一日本前4年（1586年）让位给孙儿后阳成天皇。

代　数	天　皇	生卒年	在位期间
第103代	后土御门天皇	1442—1500	1464—1500
第104代	后柏原天皇	1464—1526	1500—1526
第105代	后奈良天皇	1496—1557	1526—1557
第106代	正亲町天皇	1517—1593	1557—1586

换句话说，后土御门天皇的治世刚好是室町幕府走向衰亡的前夕，而正亲町天皇的让位，则标志着战国时代已步入黄昏，处于两者中间的后柏原天皇和后奈良天皇则经历了战国时代最混乱的岁月。

除了活在乱世，战国时代的天皇与其他时代的天皇最大的分别是终生在位。战国时代之前和之后的天皇，直至400年后明治维新为止，生前让位是理所当然的做法，以确保自己选定的继承人继承大统。可是，在战乱频仍的战国时代，天皇与朝廷的保护者室町幕府早已自身难保，没有余力去供养天皇，幕府将军因为卷入战乱，经常转战于京都的外围。

失去了靠山和“赞助人”的天皇被迫离开常住的皇宫，到京都内其他地方避难。事已至此，为了活命和保持朝廷运作，以天皇为首的京都贵族只能靠自己闯出一条活路，以保朝廷不会与幕府一起灭亡。

随着战乱持久，情况越来越不利，朝廷因为缺乏幕府提供资金而运作不了，陷入停摆状态。不仅如此，天皇的生活开支所需也因为没有支援而出现困难。天皇与朝廷贵族只好减少各种圣俗仪式，

或者将仪式规模缩小，小规模的就干脆停办，以求度过时艰。其中，最受影响的便是天皇的葬礼和新天皇的即位仪式。

“战国四天皇”之一的后土御门天皇在1500年去世，他的葬礼受到战乱影响，足足拖延了43天才完成。他的继承人后柏原天皇在1526年去世，葬礼同样因为战乱和经费问题延误了22天，下一任后奈良天皇的葬礼则足足等了77天才完成。

另一方面，天皇的即位礼自后柏原天皇起，相关仪式如大尝祭（详见第五章第4问）等一律停办。即便是从简后的即位礼，也足足拖了20年又6个月才顺利完成，那时的后柏原天皇已经是半百老人了。相比之下，他的继承人后奈良天皇和正亲町天皇的即位礼虽然只拖了数年时间就完成了，但也肯定成为两人的人生遗憾。

作为一国之君、天神的子孙，连即位登极和下葬举丧这种大事，都因为战乱而没有办法顺利完成，足见战国时代的天皇算是处于1000多年天皇史的谷底，那是天皇史上的“黑暗时代”。

（3）天皇的战时经济学

虽然极尽潦倒，但正所谓“绝处逢生”，四代天皇都想办法来度过困局。其中一个重要的方法，便是积极与当时崛起的战国大名交往。从前室町幕府仍然强大的时候，朝廷与天皇根本不会与地方诸侯积极交往。然而，幕府已经危在旦夕，新崛起的战国大名也急需获得权威来确保霸权获得正当性，除了将军，没有比身为“天神子孙”的天皇更尊贵的权威了。因此，天皇与大名一拍即合，天皇通过授予官位来换取献金，挽救濒临破产的财政。

不过，如果战国大名出身太低或出价太低，天皇也不会轻易答应。事实上，“战国四天皇”中的后奈良天皇多次因为卖官鬻爵而

感到有莫大的罪恶感。为了生存，天皇们做出了很大的改变，违背自己的良心，承受道德谴责。

另外，当时天皇与宗教界有较紧密的来往，各寺院的新任住持最终都想通过天皇下令承认来获得保障，他们也会献金。朝廷的贵族也会到处奔走，为自己、朝廷和天皇筹措财源，曾有贵族向后奈良天皇求要天皇手写的佛经，做出门保平安之用，之后却转售给地方的大名牟利。

这个故事成为我们常听到的“天皇卖字画谋生”的故事原型，其实并非如此。天皇写佛经给贵族是事实，但其实没有变卖之意。而从结果来看，天皇靠着贵族的智慧，与各地方势力建立了关系。

天皇与贵族这种谋生之道，一直到70年后（1500年后土御门天皇驾崩起算），织田信长于1569年拥戴室町幕府第15代将军足利义昭上京任职，才算告一段落。

7．天皇与织田信长、丰臣秀吉的关系如何？

（1）信长忠于天皇还是想取代天皇？

提到织田信长，一般读者都会认为他杀人如麻，是遇神杀神、遇佛杀佛的乱世枭雄。那么在战国时代无力至极的天皇，究竟是如何与占领京都后的信长相处的呢？

从前，有人认为以信长的火爆性格来看，他必然会霸凌天皇，予取予求，天皇也一定对信长恨之入骨。但是，随着研究的深入，这种推测已经过时了。

其实，织田信长出身的织田家早已与天皇有联系。他的父亲织田信秀曾赠送礼钱给当时的后奈良天皇，以缓解朝廷的财政困难，后奈良天皇也曾下赐礼物给信秀。因此，在信长进出京都之前，织田家算是与天皇建立了基本关系。不过，正所谓“一朝天子一朝臣”，后来天皇换成了正亲町天皇，信长也取代了父亲驰骋天下。信长进京时，还曾经让已经受够了战火打击的天皇与朝廷感到害怕，以为他又是来此捣乱的。

时隔数年，信长在1569年与将军足利义昭入京实行统治，1573年信长迫使义昭离开京都后，便正式接管了京都。在那个时候，信长与天皇的关系总体而言还算是良好的。例如，很多人知道“天正”是信长向朝廷提议使用的年号，但却不知道更改年号的意愿是天皇先提出的。前一个年号“元龟”使用了3年多，但因为连年战乱祸及京都，天皇便向将军足利义昭与信长提议更改年号，希望转换景象。等义昭逃出京都，信长完全控制京都后，便立即回应了天皇的要求，向朝廷提议改年号。

第二个例子是实现天皇让位的承诺。平安时代以来的天皇政治制度中，天皇生前让位，然后实行院政，辅佐新天皇，是最理想的做法。这是为了确保天皇指定的继承人顺利在上皇的保护下安全接班，然后由上皇身居幕后，打点一切。我们在前文提到，战国时代的天皇因为没有经费进行让位典礼，就连筹办天皇葬礼、即位之礼都有困难，最终正亲町天皇之前的两位天皇都老死在天皇之位上。

信长接管京都后，很快便向朝廷承诺，自己将大力协助天皇实现让位的心愿，又大量献上金钱和物资，让贵族和天皇开心不已，高呼“朝家再兴”。当然，信长这样爽快回应，除了他个人的意愿外，也是因为要尽快找到统一天下的正当性，洗刷他赶走足利义昭的不忠污名，可谓互惠互利。

信长也利用了控制京都的机会，开始整顿朝廷的风气。在前一问里提到战国时代的天皇与贵族为了谋生，可谓“节操”见底，使得滥发官位、贪腐让利等问题丛生，而且最重要的是贵族们就连侍奉天皇的工作也没有做好，经常旷职，甚至在天皇不知情的情况下伪造圣旨，损害天皇权威。

信长曾明言：“天皇声誉不好的话，我也毫无面子。”因此，等他稳定京都后便开始介入朝廷，处理了这些渎职懈怠的贵族，而且在1575年向朝廷公布了“公家法度”，改革贵族风气败坏的恶习流弊。

信长的改革和财政支援，终于使朝廷从潦倒穷困的谷底逐渐走出。天皇与朝廷眼见信长快要统一天下，便提议让信长选择当将军、关白或者太政大臣。然而，在信长死于1582年的本能寺之变后，朝廷再次陷入不安。不过，新的“救世主”很快便出现了。

（2）“相敬如宾”的天皇与秀吉

继承信长遗志照顾天皇的人，就是打败明智光秀，成功为信长报仇的丰臣秀吉。对于平民出身的秀吉来说，要立即与天皇建立关系谈何容易，好在有一批贵族为秀吉出谋划策，为他与天皇建立了桥梁，而且让他在一年半内连升五级，位列贵族。

结果，秀吉终于在1585年成为关白（与太政大臣并列的最高官职），以天下霸主的身份与天皇建立更紧密、更顺理成章的关系。到了1586年，双方互派使者定期沟通，正式建立了稳固的沟通平台。

秀吉照顾天皇是不是比信长更周到呢？答案是肯定的。首先是前文提到的天皇让位一事，秀吉终于在成为关白之后的1586年，协助正亲町天皇让位给孙儿后阳成天皇，当上太上天皇，恢复天皇制度应有的模样。

接着，秀吉又下令恢复保护贵族和天皇的御领，继续改善天皇和朝廷的财政状况。不过，秀吉这个横空而出的权力者——天下人，突然摇身一变成为武士关白，打破了千年来朝廷由摄关藤原家把持的局面，这对贵族们的冲击自然十分巨大，不少人敢怒不敢言。

可是，秀吉的回应不是血腥镇压，而是在天皇与贵族面前进行全面的家世调查，重新确定各贵族在朝廷的地位，让贵族起码在表面上服气。

还有，为了借助天皇在诸侯和贵族面前展现自己的权威，秀吉利用天皇的信任，获得统一天下的正当性，为了让自己创立的政权更为特别，秀吉请求天皇赐自己和家族新的姓氏“丰臣”，并列在传统的源、平、藤原和橘四家之中。

作为报答，秀吉出资修建日久失修的皇宫和上皇居住的御所，还多次宴请天皇出席盛大的茶会与和歌会，协助天皇回到从前的光辉岁月。

以上所见，信长与秀吉一方面以忠于天皇为己任，另一方面也利用重建天皇权威，为自己与手中的政权“贴金”，找出一个树立新政权体制的模式。

换言之，在后来成立的德川幕府出现前，信长、秀吉和天皇曾经有机会摸索出一条新的政治体制道路。可是，最终都没有成功。但即便如此，我们可以肯定天皇是造就两人称霸的不可或缺的元素，而天皇和天皇制也多亏他们而获得重生。

第三章　从江户时代到明治维新（近代篇）

1．德川幕府的《禁中并公家诸法度》是用来钳制天皇的法规吗？

（1）德川幕府发布的三部法度

天皇家熬过战国时代的洗礼历练，到了织丰时代，受惠于织田信长与丰臣秀吉的帮助，天皇终于重新迎来了“春天”。以往衰微颓丧的朝廷也慢慢恢复过来，人心回归，仪式重来，一切好像都很美好。

德川家康夺取天下之后又如何呢？1615年的大坂夏之阵（消灭丰臣政权的战争）后，再无势力对德川幕府构成威胁，德川幕府随即发布了《禁中并公家诸法度》，明文规范天皇、朝廷与公卿贵族的行为。

这部著名的法律是不少人研究德川幕府与朝廷关系的基本材料。但早在它出现之前，德川幕府已在1613年对朝廷与重要佛教寺院发出了《公家众法度》和《敕许紫衣法度》。《公家众法度》有三大重点。

第一，幕府严格要求京都的公卿贵族（主要针对高级以下的普通贵族）要专事学问，以保家业长久。

第二，要贵族们守法自律。

第三，要求公卿恪守“天皇之臣”的职责，在皇宫和天皇面前要勤务办差，不可懈怠。

一旦贵族们违反以上三点要求，幕府将代天皇对他们进行处分。

《敕许紫衣法度》则是针对佛教的法规。“紫衣”是高级僧侣才可穿着的紫色袈裟，这个法度就是任命高僧的法律。本来，寺院高级僧侣的任免权握在天皇手上，但通过这部法令，幕府以“受天皇委托”的名义，插手天皇与宗教界的关系，强行代理天皇与佛教界的接洽。包括天皇的家寺泉涌寺在内的七所京都重要佛教寺院，其住持向朝廷申请紫衣许可之前，必须接受幕府检查，然后才可由朝廷任命（泉涌寺因为与天皇渊源太深，后来获得豁免）。

以上两部针对贵族与重要佛寺的规定，可以说是幕府加强控制朝廷的先声，并为后来的《禁中并公家诸法度》铺路，以免太过突然，使幕府与天皇、朝廷的关系在丰臣政权灭亡后顿时进入紧张状态。那么，长达17条的《禁中并公家诸法度》究竟是不是如一般指责的那样，是一部德川将军钳制天皇行动与权力的法规呢？答案是肯定的，也是否定的。

从肯定的角度来说，直至江户时代，的确还没有一部法规，是由天皇以外的权力体明文指出天皇、朝廷贵族应尽之责。以前只有天皇或太上天皇以前辈、经验者的身份告诫子孙而已。

从否定的角度来说，《禁中并公家诸法度》是一部江户时代版的“皇室典范”加“朝廷业务守则”。细看与天皇相关的内容，我们便可发现主旨不是限制天皇的权力，而是以白纸黑字使天皇回归应有的位置，甚至可以说是恢复天皇应尽的职责。

例如，经常被引用的《禁中并公家诸法度》第一条提到：“天子诸艺能之事，第一御学问也。”这里的学问是指读书与和歌，而且是饱览中国的经典著作，以及成为和歌界的最强歌人。这些规定

看似是幕府堆砌的理由，但本书第七章第1问将会提到，早在平安时代就已经存在类似的规定。

（2）幕府与天皇并非对立

虽然对那些认为“天皇必须是最高权力者”的人来说，第一条主旨从表面看来，的确像是幕府干政的条文，但那其实是断章取义。而且，发布《禁中并公家诸法度》的人是幕府与时任关白，是双方达成协议后的产物，不是幕府一意孤行的“霸王条款”。

再说，法例上虽然明确规定幕府有处罚贵族的权限，但从后来的真实例子来看，不仅鸡毛蒜皮之事的处罚权都在朝廷手上，大的违法行为也由朝廷最高领导关白、摄政与幕府商议后，再由关白、摄政执行。幕府表面上握着最高权限，但却不曾轻易使用。

更重要也是最基本的，幕府制定《禁中并公家诸法度》的背景原因，是因为由战国至织丰时代以来，长达100多年的混乱致使朝廷的规则松散不堪，而旧时天皇与贵族为了谋生而放宽规范的问题，也广泛出现在史料之中。对于已然统一天下的幕府而言，利用法制整理朝廷秩序，回到其应有状态，以及恢复天皇本来的理想状态，皆能为幕府建立权威，使朝廷、幕府以及各藩信服，最终使幕府获得了统治的大义名分。

对于天皇而言，与幕府磨合的确不甚愉快顺畅，致使当时在任的后水尾天皇最终以让位的方式向幕府表示抗议（详看下一问：为什么江户时代重新出现了女天皇）。

不过，天皇让位后，随着幕府做出一定退让，幕府与天皇的关系也得以改善。除了后水尾天皇当政时代，以及幕末动荡时期，天皇、朝廷与幕府基本上都能维持良好、协调的合作关系。其中一个

重要的佐证便是灵元上皇评价幕府将军有“重朝家之心”，又说可以借幕府之力复兴朝廷，重振纲纪。

可见，后世认为幕府与朝廷处于对立关系，幕府将军霸凌天皇的观点，既是受明治维新以后的史观影响，也是由于不少人都视天皇为唯一的最高权力者，视幕府体制为不正常，所以无视一些历史事实。

2．为什么江户时代重新出现了女天皇？

（1）女帝再现——明正天皇

第一章第5问已经向读者说明古代出现六位女天皇的原因，以及她们的特别之处。其余的两位女天皇均出现在800多年后的江户时代，她们是明正天皇和后樱町天皇。为什么时隔数百年后，她们又被拥立为女天皇呢？与六位先祖又有什么不同？

明正天皇是自神武天皇以来第109任天皇，她是后水尾天皇之女，母亲是德川幕府第二代将军德川秀忠的五女儿，名为德川和子。换言之，明正天皇身上流着德川幕府将军家的血，其身世背景完全与古代的女天皇不同。古代的女天皇都拥有双重皇族血统，既是公主，又是天皇妻后。但明正天皇既不是皇子，身上也只有一半的皇族血液，为什么会当上天皇呢？

其实，明正天皇根本不是继承天皇的人选，她的父皇后水尾天皇与德川幕府的关系一直不甚良好。明正天皇继位的15年前，德川幕府灭亡了丰臣家，夺取了全日本的统治权。

接下来，明正天皇的外祖父，也就是德川幕府第二代将军德川秀忠，为了巩固幕府的威信，延续亡父德川家康的路线，加强对天皇家与朝廷的控制。当时已经成为后水尾天皇中宫（皇后）的和子，在不久后生下了皇子高仁亲王（明正天皇之弟），秀忠本应像当年的藤原道长和平清盛那样，以天皇外戚的身份权跨公、武两方。可是两年后，高仁亲王夭折，和子后来也没再生下皇子，秀忠的计划完全化为泡影。另一边的后水尾天皇也因为不满德川幕府得寸进尺，对朝廷过于强硬，于是趁着高仁亲王夭折之机，突然将皇位让给了明正天皇，自己成为太上天皇，以发泄对德川家的不满。

换言之，明正天皇的继位完全是父皇发泄不满的结果。跟古代一样，没有多重皇族血统的女天皇不能结婚，因此明正天皇铁定不能有后代，同时生母德川和子之后也再没有生下男嗣，因此明正天皇的继承人只能是没有德川家血脉的皇子。

更讽刺的是，后水尾天皇成为太上天皇后，却与其他妃嫔生下多个皇子，仿佛就是要向幕府表示不认输，不接受幕府的摆布。因此，天皇让女儿明正天皇完成她的任务（向幕府示威）后，皇位便转到没有德川家血脉的异母弟弟后光明天皇的身上。一直强势的幕府也只能妥协，让后光明天皇以和子的养子之名成为天皇，勉强保住了颜面。

（2）最后的女帝——后樱町天皇

相隔133年后，江户时代再次迎来了女天皇后樱町天皇，这也是日本历史上最后一位女天皇。不过，后樱町天皇继位的原因与朝廷、幕府的政治斗争无关，可以说完全是无奈之下的紧急措施。

比起明正天皇盘根错节的继位原因，后樱町天皇继位的过程，却与现时日本皇室的情况颇为类似。后樱町天皇的父皇樱町天皇膝下只有后樱町天皇与她的弟弟桃园天皇两人。樱町天皇去世后，皇位传到了桃园天皇手上，不巧桃园天皇早逝，膝下只有两名年幼的皇子，而且较小的皇子早已约定成为旁系亲王家的养子，没有继承皇位的资格。

至于年长的皇子英仁亲王也尚且年幼，不知能否长大成人。为了避免年少天皇无嗣夭折的可能，朝廷决定先让后樱町天皇当上天皇。而且，为了安全成事，朝廷以桃园天皇“遗愿”的名义，通知了幕府。面对突如其来的女帝登基，幕府最终同意的原因也是因为已有明正天皇的先例，明正天皇本身也是德川幕府第二代将军德川

秀忠的亲外甥女，故难以否决，加上考虑到当时天皇家的确有难处，于是予以同意。

最终，众人一直担心不能顺利长大的英仁亲王健康成长，朝廷与幕府也按照计划，在英仁8岁时让他即位成为新天皇，也就是后桃园天皇。后樱町天皇则顺理成章地成为太上天皇，继续守护自己的侄子。

值得一提的是，江户时代女天皇的特殊性。江户时代，儒家“男尊女卑”的思想隆盛，女天皇因为不可产下含有他家血脉的子嗣来继承大统，从一开始便被认为是不完美的存在。就算是朝廷支配方面，也必须由关白以摄政的名义代办，两位女天皇比起江户时代的男性天皇，更像花瓶、装饰品。

从中可见，明正天皇与后樱町天皇的诞生是诸多困难同时出现下的折中之策，后樱町天皇的即位更是百般无奈。朝廷与幕府本来便没有想让女天皇再出现，因此当英仁亲王顺利长大，危机解除后，女天皇从此成为绝唱，走入历史长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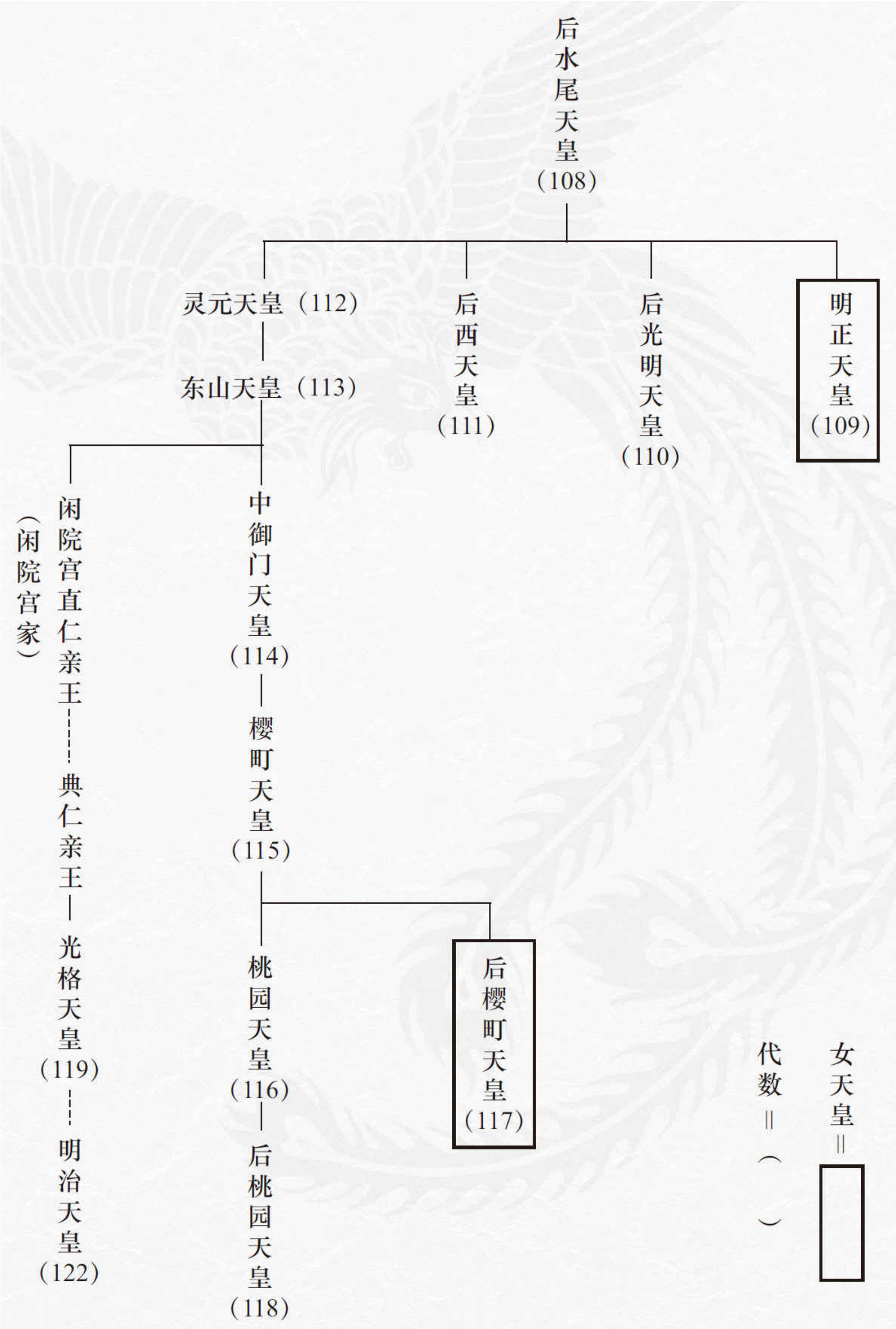


图3-1　江户时代的天皇世系与女天皇

3．两个事件动摇了天皇与德川幕府的合作关系？

（1）“宝历事件”——挑战《禁中并公家诸法度》

前一问提到，天皇与德川幕府除了初期的磨合，双方的关系大抵维持良好。然而，踏入江户时代中期（18世纪中期），蜜月期已过，大大小小的问题随着时代与人事的更替而慢慢浮现。接下来要谈到两个事件。

第一个事件是发生在1757年（宝历七年）的“宝历事件”。简单来说，就是京都朝廷的下层贵族试图挑战当年幕府与朝廷订立的《禁中并公家诸法度》。

前文提到《禁中并公家诸法度》的第一条，规定了天皇要专心于学问与和歌，以恢复古来天皇应有的职能和本分。专心于学问是指各种中国传来的政治典籍，至于日本的传统典籍，如《日本书纪》则属于次要的学问。正所谓规矩是由人来定，也是由人来改变的。即使这个订于初期的规定僵化，而且社会的身份阶级基本维持不变，也不能阻止江户时代中期日本的社会观念出现变化。

18世纪中期，人们对僵化的身份阶级以及千篇一律的生活开始感到厌倦，中下级武士、百姓与下级贵族都对现实感到不满。而且，当时对外贸易受到严格限制，日本国内的内需已经到达瓶颈，最重要的消费品和交易品——米的价格又受天灾影响而越来越贵，不论是武士、贵族，还是百姓，都出现经济困难，无法安稳生活。

终于，各地百姓发起暴动，拒交田租，下级贵族则以投闲置散的方式进行消极的抵抗。他们由言语上的顶撞到实行旷工，希望获得改变的机会。这些下级贵族们受到当时强调“日本优越不凡”的国学影响，进一步质疑《禁中并公家诸法度》尊崇中国古典的基本态度。

1757年，垂加流神道（重视神国思想的神道流派）一位出身下级贵族的神道家竹内敬持（式部），连同受其影响的几个中下级贵族，偷偷地向当时的桃园天皇讲授重新解释、立注过的《日本书纪·神代卷》，强调日本从神话时代起建立国家的过程，以求天皇理解他们想象中的理想国家的样子。成事之后，他们获得了天皇的重用，从而获得了进入上流社会的机会。

这些人的行动很快便被最高级的贵族——关白近卫内前发觉和制止。不过，他们很快又聚集了一些志同道合的少壮派下级贵族，打算再次挑战。当时的桃园天皇年轻而好奇心重，对他们的讲法感到意犹未尽，半年后，又听这些贵族讲学。

可最终还是纸包不住火，关白近卫内前等高级贵族得知他们死不悔改后，决定要实施重罚，以保证实行至今的秩序可以维持，也阻止下级贵族越过他们搭上天皇，做出过激行为。其实他们最大的担忧是，一旦事件不在早期及时扑灭，等传到幕府耳边，难保不会出现朝廷难以控制的局面。

结果，关白为首的高级贵族及早下手，天皇虽然没有受到牵连，但怂恿天皇参与的贵族分别处以罢免、去职和软禁在家的惩罚，始作俑者竹内敬持则被处以较重的逐京之刑（终身禁止回到京都）。

为什么“宝历事件”会受到关注呢？那是因为事件中涉事的下级贵族虽然被处罚，但是他们心里受到提倡尊王、神国的近世神道影响，对现有的朝幕关系与制度萌生质疑（后来甚至有推翻之意）。

虽然“宝历事件”被暂时压下，但是与他们志同道合而不在明处行动的贵族，以及下层武士阶级却受到影响，越来越质疑现有体制。这些质疑成为后来“尊王攘夷”中最激进的声音，将幕藩体制与朝幕合作视为敌人。

（2）“尊号一件”——被否定的天皇孝心

另一个打击天皇、朝廷与幕府关系的大事便是史称“尊号一件”的事件。前文的“宝历事件”来自朝廷下级贵族，对天皇的影响不算直接，但“尊号一件”则直接导致天皇与幕府关系出现裂痕。

起因与当时天皇家出现继承危机有关。1779年，后桃园天皇（桃园天皇的继承人）英年早逝，其后没有男性继承人。朝廷与幕府决定不再拥立女天皇，改为册立出身王族旁支，分属后桃园天皇远房堂弟的男性王族为君，即著名的光格天皇，他当时只是8岁的小孩。

10年后的1789年，18岁的光格天皇借着正式执政的机会，希望利用自己的权力，让自己的生父典仁亲王获得太上天皇的荣号，聊表孝顺之念。但是，幕府以典仁亲王不是天皇为理由而否决。

问题的关键还是与《禁中并公家诸法度》有关。第二条规定指出，礼法上亲王的地位和待遇次于关白、摄政。所以即使贵为天皇的亲生父亲，典仁亲王也只能与其他亲王一样，向关白、摄政低头

行礼，不能被百官尊敬，同时也不能开设院政。这个严苛的规定对身为人子的光格天皇而言，是沉重的打击。

原本献赠尊号给自己父亲，理应是天皇独断专擅之事，又是尽伦常天理的行为，但是基于朝、幕合作的基本原则，以及实际主导权在幕府手上的现实因素，必须得到幕府同意才能成事。如今幕府一声否定，顿成泡影。

可是年轻的天皇与朝廷中同情天皇的贵族坚持己见，多次要求幕府答应，却被幕府“既读不回”。三年后的1792年，不满之情到达沸点的天皇，决定召集中上级贵族到御前，要求他们集体表态，打破了由摄关做全权代表的惯例。结果，主张慎重的摄关成为少数派，附和天皇的中级贵族中山爱亲，还有支持他的一众贵族则决定铤而走险，在没有摄关和幕府的同意下，单方面决定献赠尊号。幕府得知后既震惊又不满，使得朝、幕关系陷入前所未有的低点。

脸上无光的幕府终于以处罚来强硬表态。幕府使者到京都后，在摄关的协助下处罚了中山爱亲等贵族。这个结果与“宝历事件”一样，表面上好像解决了问题，但众多不满却持续发酵，朝廷内部的愤恨继续累积。

经历这两个事件后，朝廷内部已经种下半世纪后反幕府体制的种子。可见，后来的倒幕运动不只是一小撮下级武士（如坂本龙马、西乡隆盛等）的妄想。这股经过上百年积累的“负能量”由“黑船叩关”引燃，成为一股强大动力，将幕府体制推向终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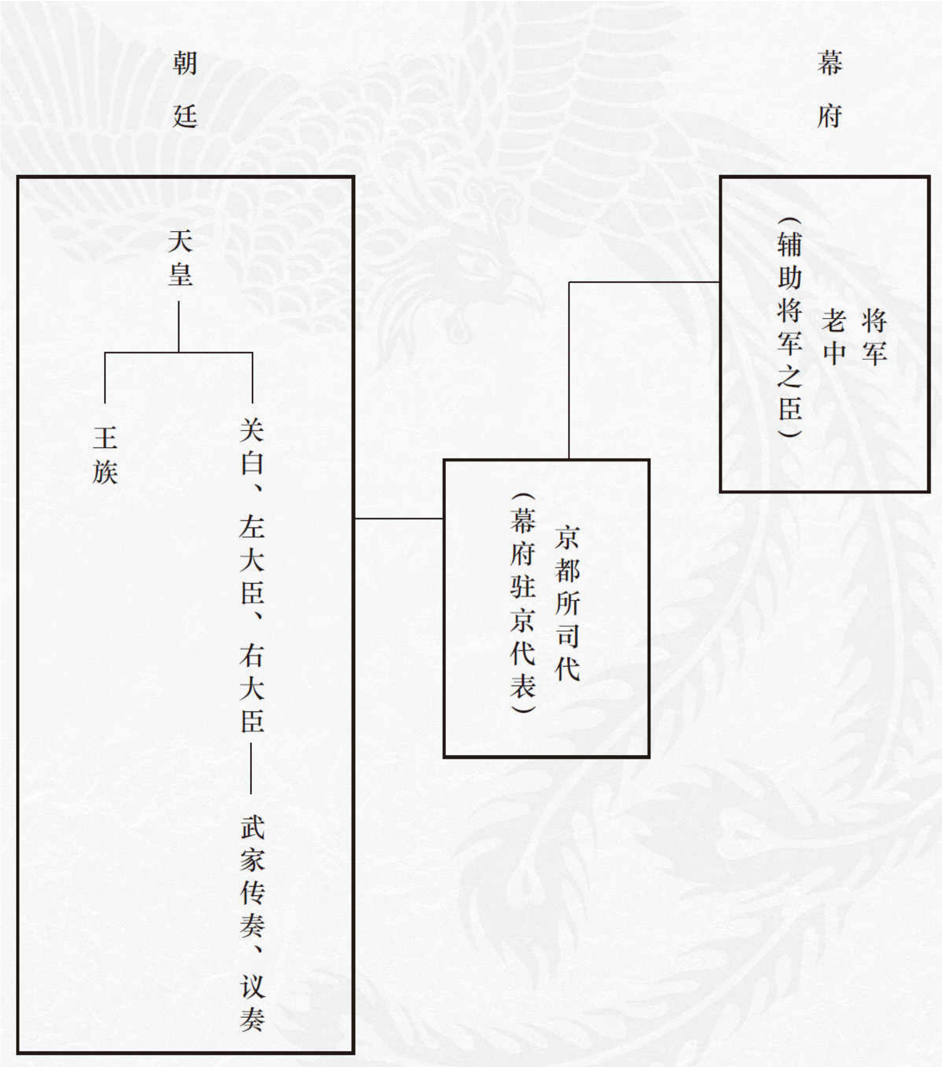


图3-2　江户时代朝廷与幕府的通报机制略图

4．孝明天皇为什么曾经坚持排外攘夷？

本章的第1问、第2问已经为读者说明了江户时代的天皇如何与将军打交道，第3问也提到了孝明天皇的祖父光格天皇锐意重振朝纲与天皇家的权威，与幕府关系一度紧张。接下来这一问，将为大家解说光格天皇的孙子孝明天皇的“攘夷”观。

（1）难以评断的孝明天皇

孝明天皇（1831—1867）是日本第121代天皇，也是明治天皇之父。随着近年的“幕末热潮”，不少人也认识了这位天皇。在大多数的介绍里，孝明天皇的形象都是差不多的——保守顽固又不会变通。当美国先后两次派舰队来日本要求通商时，他一直坚持“攘夷”，拒绝和批评江户幕府决定让步的“开国”方针。不过，后来发生的“禁门之变”（长州藩中的激进“尊王攘夷”派发动的武装冲突，又称“蛤御门之变”“元治之变”），又使天皇改变方针，坚持既要“攘夷”，也继续与幕府保持良好关系。

明治维新后，日本人对孝明天皇拒绝开国，公然与幕府对抗，普遍出现两极评价。一边是站在天皇权威上升的角度，认定孝明天皇是一位勇敢有胆识的君主；另一边是站在开国进步的史观角度，认为天皇轻视当时的危机，是昧于时势的强硬保守分子。在此先不论谁对谁错，这两种评价其实有一个共同点——天皇坚持“攘夷”。为什么他对外国人那么反感呢？

（2）孝明天皇对开国的恐惧

1858年1月11日，天皇写信给关白九条尚忠，提到了对于“开国”的忧虑：“若从朕之一代发生了那样的事（开国通商），可谓

后代子孙之耻辱……对各代祖宗之不孝，朕将无处容身，十分忧惧。”

孝明天皇真正惧怕的是自己同意开国的先例，会玷辱祖宗英名，为后代子孙带来难以磨灭的耻辱，他不想当这个“遗臭万年”的罪人。那么，为什么天皇视开国为不孝和耻辱呢？

这与当时日本的国家观与世界观有着密切的关系。17世纪初，江户幕府成立后，限制外国人进入日本。但日本与邻邦明朝与后来的清朝，还有朝鲜王国、琉球王国仍然保持一定程度的交流；同时还容许荷兰在九州长崎进行贸易，并且以此每年向荷兰索取有关世界时事的情报。

不过，这些最新消息全都集中在幕府高层身上，除了少数获幕府信任的藩和高级贵族外，天皇的朝廷与其他小藩，以至民间，都无权过问。因此，在有限的情报流通下，长期稳定的日本社会各阶层催生出一种普遍的观念，用现代话来说就是“自我感觉良好”的世界观——觉得日本是最优秀、独一无二的国家，其他国家都是劣种“蛮夷”，愚昧落后。熟知国外世变的幕府当然明白真相，但这样的误会对幕府继续统治并无伤害，因此便没有加以制止。

直到欧美国家先后带着坚船利炮出现在日本人眼前，日本各阶层仍然相信日本是“世界里无出其右、系出神武天皇的神国”。身在京都、体内有着皇家血脉的孝明天皇与贵族们也如此坚信。因此孝明天皇才强调他不想做出有辱国家荣誉的“不孝行径”，身陷与蛮夷平起平坐的“耻辱”。

我们可以说，天皇真正拒绝的不是通商，否则便不会容许荷兰人200多年来一直来日本，大部分攘夷派认为开国即等于让“神国”日本与一直以来蔑视为蛮夷的外国缔结平等的条约，这颠覆了

他们的世界观、国家观，甚至伦理观。因此，即使幕府派人向天皇和朝廷说明国外形势，晓以大义，天皇反而更视开国为威胁。

天皇展开的“反击”除了向幕府提出抗议，拒绝批准幕府签约外，还将矛头指向没有清楚表明旨意的朝廷贵族，又以退位来威吓幕府，希望幕府知道他的不安与恐惧。他还试图将激进的攘夷派贵族和列藩带进来，增强舆论气势，进一步向幕府施压。

（3）倒幕攘夷派的反扑

然而，在井伊直弼的判断下，幕府还是与美国缔结了《日美修好通商条约》。井伊直弼更亲自向天皇说明签约只是“权谋”，待国家军备精良，足以对抗外国列强，便会中止与列强交流。井伊直弼的辩解获得了孝明天皇的谅解。转眼间，与天皇和朝廷修好的幕府，出手打压各地的激进攘夷派，而天皇本人则回到与幕府合作的路线上。

不久后的1862年，孝明天皇更让亲妹和宫下嫁当时的将军德川家茂，也同意讨伐与幕府敌对的长州藩，表达坚决与幕府共存的决心。正当朝幕关系破冰之时，天皇突然在1867年初染病去世。他死后，曾一度获他拉拢，后来又被打压的倒幕攘夷派随即进行反扑。一年后的1868年，江户幕府在接连的政治、军事失利下，被迫终结260余年的统治。

5．幕末时代的日本人怎么看待天皇？

（1）尊王攘夷思想的诞生

说到幕末与维新，便立即想到“尊王攘夷”的思想。这个思想源自江户时代中期，是受到朱子学的名分论影响转化而成的产物。其中一个重要的源头是有“德川御三家”之称、拱卫幕府的重要德川家分支——水户德川家。他们的第二代藩主德川光圀（也就是著名时代剧《水户黄门》中的史实人物），在17世纪后期，仿照中国王朝官史的规格，开始编纂第一部大型日本通史《大日本史》。这个庞大的修史工程历时四代，经过多次暂停，终于在18世纪末期完成。

《大日本史》深受朱子学的影响，在负责后期修书的儒士藤田幽谷的带领下，按照政治名分论的立场，特别强调天皇是国家顶端的存在，而幕府将军则从天皇手上获得了“大政委任权”，得以驾驭各地诸侯和所有武士。然后以将军为首的武士阶级为中心，其他阶层则顺从幕府统治、安守本分，日本自然得以太平。

与这种“尊王”思想相辅相成的就是“攘夷”思想。在前一问提到，江户时代的日本人在重新认识国家与外国关系时，将中国王朝以外的朝鲜王国、琉球王国都视为低日本一等的“藩国”，而当时已来到东亚地区的西欧诸国则和北方的虾夷（现在的爱奴族）一样是“蛮夷”。

以理想上的天皇为顶端，外有神明加护的神国日本，绝不可能与藩国、蛮夷同等，更不接受被他们的压迫和威胁。当时的尊王论者更将16世纪末的禁止基督教的行动，和发生在17世纪中期幕府镇压由日本基督教徒借反抗藩主苛政为名而引起的“岛原·天草之

乱”，视为日本坚拒外国干扰的成功例子。以天皇为尊的日本必须以攘夷为己任，保卫国家的神圣。当然，对武士出身的人而言，“尊王”和“攘夷”的重任必然落在幕府的“征夷大将军”身上。

在这个思想体系中，天皇成为体现神国日本的必要存在和核心，构成了“神明→天皇（朝廷）→将军（幕府）→藩主→武士→百姓”的统治理论。由此可见，“尊王攘夷”思想与“神国”思想是互相呼应的。通过编纂《大日本史》而集结的“水户学派”认为，日本之所以能走出战乱，享受200多年的太平盛世，全都归功于这种君臣关系顺应“天命”，井然有序。他们坚信普天之下，万国之中，就只有神国日本才能做得到这种“创举”。

幕府一开始虽然对这种“因为尊王，所以长治”的“尊王论”有些抗拒，但是不久之后，面对社会的矛盾日益深重，幕府高层深知自己不可能永久强势。加上在18世纪初，幕府相继出现继承人早死的问题，为了保住威信，自然选择走捷径，接受、套用了这个理论。到了幕末前夕，幕府自己也积极高举“尊王”大旗，使各地诸侯和平民继续拥护幕府体制。

但这个本来为幕府正名的思想，最终在一连串外交失利、内政失误下，反过来成为刺向幕府的尖刀和“倒幕”的根本思想来源，葬送了1000年的武士统治历史。

（2）百姓如何看待尊王攘夷

“尊王攘夷”是一种由上而下的政治思想，它最终成为革新日本历史，推倒武士时代的原动力。然而，它并非一开始便为了反对幕府体制而存在。起码在18世纪，上层社会的幕府、朝廷，以及深受儒家与近世神道影响的中上级武士阶层大多认为，只要幕府带头“尊王”和“攘夷”，那么便无必要也没有道理去质疑幕府统治的

正当性。换言之，最初的“尊王攘夷”思想与幕府统治是互为因果的。值得我们一问的是，平民百姓又是怎么想的？很多人以为那时候是“全民尊王”“全民攘夷”和“全民倒幕”。可事实上不尽如此。

的确，随着江户时代学术的发展，思考日本价值与定位的学术风气在这200多年太平盛世里急速发展。以弘扬国家的真善美与精髓为目标的“国学”也在17世纪崛起。其中以大儒家平田笃胤为首的“平田派国学”和上述的“水户学派”，将学说渗透到部分地方豪强和商人阶层，形成所谓的“草莽国学”。

不过，这并不代表“草莽国学”的影响力深入了所有百姓中。事实上，对于“尊王攘夷”表示反感的百姓也不在少数。例如，第六章第6问提到“文久修陵”，即修复传说中初代的神武天皇陵寝，当时便惹来陵寝所在地的橿原住民反感。而十分流行的“讽刺版画”，许多就揶揄了尊王论者是“狐假虎威”的鹰犬，只会虚张声势，劳民伤财，造成动乱，破坏了他们的生活。

现代人以为当时是铺天盖地的“尊王攘夷倒幕”，这些被轻视的讽刺版画渐渐被人遗忘，而传达出低下阶层对“尊王攘夷倒幕”的真实态度，也在维新后被“和谐”了。

另一个反映部分幕末普通百姓看这场“尊王动荡”的例子，出现在戊辰战争时的江户。当时的江户民众眼见萨摩、长州等藩以年幼的明治天皇之名，领导推倒幕府派系的战争，便创作出各式各样的讽刺版画，将天皇画成小孩子，揶揄他只是萨、长诸藩的傀儡，毫无判断力。

与其说江户民众不尊王，不如说这反映了他们眼中的新政府本质，以及他们对于国家文化中心被一直制造事端的萨、长诸藩占

领，表达出明显的不满与愤恨。

以上例子说明，在一般民众心里，幕末时代的天皇仍是虚无缥缈的幻影。民众通过各种书籍，知道天皇位于国家的顶端，然而对于身在权力斗争以外的他们而言，“尊王”与“攘夷”是遥不可及的，与他们的生活关系不大，天皇是谁，应该怎样看待他（她），只是概念上的问题而已。

这反映了在后世被浪漫化的幕末，其背后存在更现实尖锐的民众视线，也成为明治维新后明治政府努力想提高天皇威信的根本原因。

6．明治天皇如何迎接明治维新？

（1）突如其来的革命

1866年12月25日，孝明天皇急病驾崩，才14岁的皇太子睦仁便接任为明治天皇。随着亲幕府的孝明病死，倒幕与护幕的形势完全逆转，以明治天皇祖父中山忠能为首的倒幕派，开始与西国雄藩联手倒幕夺权。

由翌年的王政复古开始，经过1868年的伏见鸟羽战争以及会津战争，接连而至的大事件对年纪尚幼的明治天皇来说，可谓毫不相干。他仍然是符合大众想象的傀儡君主。等候拥立他的倒幕派代他打倒幕府，确立真正的“王政复古”，迎接天皇“万机亲裁”的一天。

从现今的角度来看，“明治维新”是日本走向现代化的代名词。对于当时一心推动改革的维新政府来说，要走向现代化便要先富国强兵，向西方列强学习，摆脱老旧的封建社会体制。因此，打倒不利于进步的幕府体制，将象征权威的天皇牢牢握在手里，是理所当然的事。不过，维新政府接下来发现，打倒他们眼中视为“保守”的幕府后，还有比幕府更棘手的问题——如何为以天皇为中心的朝廷去旧立新。

倒幕派等待着明治天皇转身成为破除封建、带领日本“富国强兵”的新君主，意味着这位从未接触西方事物、甚至未曾踏出京都禁宫半步、在日本人民心中最神圣的青年天皇，需要巨大的转变。可以说在维新派的心中，从一开始就有“天皇现代化”的计划了。

然而，对于天皇身后大部分的朝廷倒幕派来说，实现倒幕是为了尊王和攘夷，而不是要“迎夷”及西化，更不可能接受朝廷及天皇也一并西化。在这个矛盾之中，我们无法得知明治天皇当时的反应，但他身边的女官及攘夷派贵族，俨然成为维新的拦路虎。

为了杜绝攘夷派的干扰，由强硬的西乡隆盛带头，以大久保利通和木户孝允为辅，对天皇身边的人事进行了重大调整，顽抗交出天皇控制权的长桥局、大典侍等女官被免职，只剩下部分攘夷派的青年贵族作为侍徒留守。虽然保守派力量被大幅削弱，但排除他们还需要一段时间。

（2）青年天皇的创举与自觉

在排除守旧派人事后，维新政府的高层为了使明治天皇成为日本唯一“万机总揽”的君主，还让他走出深幽的禁宫。1868年初，明治天皇首次以政治上“一国之君”的身份接见了法国、荷兰的外交使节。这是律令时代接见中国大唐名僧鉴真之后，天皇接见外国人的首例。

另外，同年3月中，维新政府又成功促成明治天皇走出京都这个巨大封闭的空间，巡视大阪，并检阅大阪湾的海军。这是明治天皇第一次见到大海，他也是数百年来第一位亲眼看到大海的天皇。这对维新政府或天皇来说，极具象征意义。除了以上的创举外，明治天皇“受惠”于维新，还做了很多历代祖宗没有做过的事，例如为他重开的“天长节”（天皇诞生日），被法定为全国的假期，以彰示“皇恩君威”的政治目的，强化维新政府的权威。后来，他第一次穿上西装军服，以和洋混合的方式宴请百官和外国使节，成为“天皇大元帅”。

维新派的这些安排，说白了便是一场场精心策划的“政治秀”。而君威是到了明治天皇成年后，扶持他为君的木户孝允、岩仓具视、大久保利通等人相继死去后才慢慢形成的。

事实上，明治天皇还是皇子时，常对侍候他的侍从颐指气使，稍有不如意便恣意打骂，而且会接连生气几天。即使在父皇孝明天皇急病驾崩，他仓促继位后，粗暴的性情也没有立即转变。更麻烦的是，他从小酷爱喝酒，不时出现烂醉如泥的情况。他也十分喜欢骑马，表现出嗜武的一面。

大概是因为明治天皇年少以来多舛的成长经历，没有给他稳定的成长环境，才使他形成这种复杂的个性，但若长久发展下去，人们无法期待他具备“新日本国”带领者应有的君威及德性。

为此，木户孝允、侍从长东久世道禧、后来的侍读长元田永孚等，都苦心劝说、教育明治天皇。这些努力的成果却讽刺地因为十年后爆发的西南战争，使明治天皇陷入前所未有的精神压力，后来更是因此大病了一场。

（3）真实的“明治大帝”像

险些动摇明治维新成果的西南战争结束时，明治天皇大病初愈，从那时开始，熬过“试炼”的他的确与病前的“挂名”天皇有所不同，他开始对政事有兴趣，投注心力于其中。虽然受限于维新政府，但或许是受到新政府空前的政治危机打击，他开始意识到自己与维新政府唇亡齿寒的关系。十年以来侍读们的君德教育，也终于让他开始有了众人期待的君主风范。令后世敬仰的“大帝”才开始出现雏形。

从明治天皇继位前的成长之路来看，他一直没有准备好要成为带领日本新生的君主。他之所以成为新政府的象征，最初可能只是一连串 机缘巧合，各种新创举看来都是被安排好的。或许可以说，他从未想到自己会为天皇家历史写上各种新的篇章，但从结果来看，他是站在历史转折点上的关键人物。

在150多年后的今日重看这段历史时，少一点神话及美化，多一点客观及理性，对明治天皇与他的国家革命的看法，才会有新的角度。由任人摆布到彰显才略，明治天皇的政治道路、君主命运其实几经艰辛，既苦涩，又迂回曲折。

7．病弱的大正天皇任内曾发生两起宫闱事件？

（1）天生不完美的天皇——大正天皇

说到近代天皇，应该立即会想起明治天皇和昭和天皇。因为在近代以来的150年里，两人对日本和周边地区的历史都具有深远的影响。那么在他们之间的大正天皇又是怎样的呢？

除了大正天皇的年号“大正”，以及他在位时，日本正处于社会转向的重要时期“大正民主时代”外，人们对这位天皇的了解可谓少之又少。究其原因，最大而又唯一的理由便是大正天皇不具备担当一国之君的能力。他成为天皇是诸多无奈和困窘之下的结果。

大正天皇在位的14年间，只是一个与摆设无异的君主？当时的日本政府又如何克服这个困难？接下来先简单介绍大正天皇。

大正天皇名叫嘉仁，1879年出生于东京的青山御所（今天的东京都涉谷区）。生母是明治天皇的典侍（妾侍）柳原爱子。顺带一提，在明治天皇晚年以前，日本政府一度承认柳原爱子为大正天皇的生母，更公告全国。可是到了后来，基于社会提倡一夫一妻制，政府为了维护天皇形象，在没有明确的新说明下，官方报道上将大正天皇改为明治天皇皇后一条美香（昭宪皇后）的儿子，其生母柳原爱子终其一生都没有获得皇太后的尊称。

大正天皇是明治天皇的三儿子，出生后因为脑部出现病患（后来被推断为脑膜炎），一直体弱多病，困扰终生。其实以众皇子的长幼排序和体能对比来看，大正天皇绝对不是继承明治天皇伟大帝业的良好人选，然而，由于他的其他皇兄弟先后夭折，加上他出生

10年后的1889年，日本政府订立了《帝国宪法》和《皇室典范》，后者明文否定女天皇的可能，明治天皇和日本政府最终只好册立病弱的嘉仁为皇太子。

即使嘉仁成为皇太子，他还是在与病魔战斗，难以执行国政，这一定程度上加快了当时日本民主政治的步伐和国会政党政治的成熟。

自皇太子时代至1926年病逝为止，大正天皇绝大部分的时间都处于休养期。即使是近代天皇必须躬亲执行的祭祀，大正天皇也有困难。因此，后来的原敬内阁和元老山县有朋、松方正义等人，迫切希望大正天皇与贞明皇后能生出健康的皇子，早日进行交接。不过，这使得当时天皇、皇后与内阁曾出现两次不愉快。

（2）“宫中某重大事件”与皇太子摄政问题

虽然大正天皇体弱多病是人所共知的事实，但这并不代表他一直卧病在床，任由内阁摆布。幸好他后来也与皇后成功生下四名健康的皇子，扫除了政治危机。

长子裕仁（后来的昭和天皇）16岁时，便被册封为皇太子。不久后，第一次世界大战接近尾声，全球性经济不景气波及日本，在一连串 的社会运动和劳工问题下，首相原敬等内阁高层决定加速推动皇太子裕仁接掌国政，稳定人心。

为此，政府安排了皇太子裕仁成婚，又让他在1921年访问英国，向国内外展示日本未来天皇是充满活力和见识的新希望。可是，这两个具有先见之明的安排却激起了两次矛盾。

首先是后来被称为“宫中某重大事件”的皇太子婚姻问题。裕仁与旧王族出身的久迩宫良子（后来的香淳皇后）在1919年6月订

婚，但由于良子患有色盲症，又与旧萨摩藩主岛津家有血缘关系，使得属于旧长州藩的政府官僚感到不满。良子的色盲也引起皇族与大臣的不安，他们担心天皇的子孙会受到影响，于是一度反对婚事。

不久之后，对婚事态度消极但不主动干预的首相原敬于东京遇刺身亡，另一个倾向反对的元老山县有朋也在翌年初病死，反对声音随即变弱。最终，裕仁与良子在1924年顺利成婚。然而，这婚事依旧引起了天皇、皇后与太子、太子妃之间的不和，在当时更传出天皇与皇后迟迟不与儿媳良子见面的传言。

“宫中某重大事件”扰攘的同时，政府继续推动皇太子裕仁逐步摄理国政，更向大正天皇提议启动旧《皇室典范》第19条，以天皇长久不能处理国政为由，另立太子为摄政，代天皇处理国务。

其实关于设置摄政问题，早在明治天皇时代，伊藤博文与井上毅已经讨论过，最终决定坚持天皇终身制，不另立摄政（参考第四章第6问）。虽然大正天皇的情况有异，但这个决定却让他感到不满，更透过皇后向内阁表达拒绝设立摄政的意思。

可是，到了1921年，大正天皇的身体状况恶化，前述的社会问题也日渐激化，日本政府亟须皇太子来稳定人心。于是，在大正天皇无奈同意下，政府在当年底对外以“天皇患上不治之病”为由，宣布太子摄理国政。政府为了消除外界的疑虑，更通过宫内省公开历年天皇的病历，首次对外承认天皇长期体弱的事实。

步入晚年，大正天皇已经病重到难以自由活动。1922年，当时的英国储君爱德华（后来的英国国王爱德华八世）访日，天皇也无法出席官方活动，就连贞明皇后也因为照顾天皇而劳累病倒。

1926年12月25日，长久患病的大正天皇在神奈川县叶山别邸病逝。1927年初葬于东京都多摩陵，成为第一位葬于东京的天皇。

第四章　天皇如何逃脱战争的罪责？（现代篇）

1．昭和天皇结束战争与“国体护持”有什么关系？

（1）“国体护持”的责任

日本自20世纪30年代晚期开始，疯狂地对中国以及东亚地区进行侵略，更与纳粹德国和意大利组成轴心国，与美、中、英、苏四国为首的同盟国展开第二次世界大战，在东亚战场与美、中等国交战。

关于昭和天皇的战争罪责问题，到了21世纪的今天，依然是日本与中、朝、韩、美等国争吵不休的话题。争论昭和天皇处理战争的问题，其中有一个关键词是“国体护持”，这让我们得以了解天皇的战争观和“终战”原则。

所谓“国体”，简单来说，可以理解为“天皇统治日本的体制”，“天皇是日本国构成的核心”，以及“天皇的命运等于日本的命运”。换言之，天皇最大的担忧和关切点，就是确保明治维新以来的天皇制能够不衰，即所谓的“国体护持”。

但绝大部分历史学家都认为，昭和天皇不算一个右翼极端思想的人，他也一直批评军中态度过激的皇道派，并与他们保持距离。然而作为一国之君，天皇在开战后除了战局之外，最关心的是万一战败，如何避免祸及自己和皇族，进而导致天皇制无法存续。

例如，他在战时（1941年）便拒绝让皇族成员担任首相，以免皇族最终被追究开战责任，祸及全体皇族。到了1945年8月12日，

昭和天皇决定向盟军投降，立即召开皇族会议，向皇族成员陈述投降的主张和理由。当时，主张抗战的朝香宫鸠彦王追问昭和天皇，一旦无法维持天皇统治体制，即“国体护持”失败时，天皇是否会抗争到底。昭和天皇爽快地以“当然”来回应。

说到底，昭和天皇为了确保“国体护持”，不惜大幅让步。因为他相信只有“国体护持”成功，日本才会继续存在。同时，“国体护持”的背后也反映了天皇的神权政治观和使命观。

最佳的例子是在1945年5月，美军已经快要攻陷冲绳，日本当局已经想到，如果不尽早找到阻止美军进行本土作战的方法，日本国土将会被入侵。昭和天皇向侍从透露，自己很担忧美军一旦在伊势湾（现在的三重县）附近登陆，祭祀天皇祖宗的热田神宫和伊势神宫，将会瞬间被美军占领和破坏；放在那里象征王权正统的“三种神器”（请看第五章第2问）来不及转移，将难以做到“国体护持”。

由此可见，天皇口中常常提到的“国体护持”与天皇自己的存在和权位，皆来自“皇祖皇宗”传承下来的传统和衣钵。简单来说，这是“君权神授”“神权政治”糅合而成的思想。

因此，天皇不论是想开战还是停战，始终最关切如何在最坏的情况下仍确保“国体护持”，否则就会觉得对不起“皇祖皇宗”，有愧重托。而国民生命与国土安全在这个大前提之下，都只是次要问题。

（2）日本深陷战败危机

1945年，日本侵略军在中国各地的战场遭受反击，加上美军的跳岛战略奏效，日本已然深陷战败危机，“国体护持”已到了崖边

峰口。当时已辞去首相之职的近卫文麿等主和派，开始加快向盟军讲和的步伐，另一方面则计划战败后昭和天皇的安置问题。

同年1月25日，近卫文麿与米内光政、冈田启介等人在京都商议让天皇削发出家和退位，改由皇弟高松宫摄政，以示引责，从而换取盟军同意讲和。大致达成共识之后，近卫文麿便代表主和派向昭和天皇上奏，说明“败战必至”，为避免国内爆发革命，摧毁国家制度，提议更积极地向盟军提出和平交涉。可是，心中执着于“国体护持”的昭和天皇认为必须先求得一次胜利的战役，打造有利形势后才能顺利交涉，因此没有答应近卫文麿的要求。

可是到了3月，美军攻陷硫磺岛，并夺取吕宋岛的控制权，眼看进攻日本本土的危机迫近。4月，美军出乎日军的意料，绕过日军预想的决战地台湾，直接进攻更靠近日本的冲绳诸岛。

连番打击终于促使天皇开始积极考虑与美国和苏联交涉。于是，近卫文麿的讲和方案提出，只要盟军同意维持天皇制以及“固有国土”（殖民地以外的固有土地）的完整，日本政府和天皇愿意考虑在法制、教育改革等方面妥协。

（3）天皇决定接受《波茨坦公告》

到了5月初，纳粹德国的希特勒和意大利的墨索里尼先后死去，加上冲绳防卫战完全失败，昭和天皇由坚决拒绝解除武装和处罚责任者，开始转为“不得已”而从之，态度软化。

同年7月26日，美、中、英三国以宣言形式发表了《波茨坦公告》，要求日本无条件投降，处分国内的军国主义分子，并且放弃所有殖民地和战争期间的占领区，再接受盟军的国土占领和战犯审判等。

日本当局原本打算无视《波茨坦公告》，但当美军向广岛、长崎各投下一颗原子弹，苏军则进入中国东北的日军占领区时，这些重大挫败使日本政府转趋妥协。但对于是否接受盟军的所有条件，天皇与日本政府高层的意见存在严重分歧。

8月10日的御前会议，天皇决定接受《波茨坦公告》，即部分日本保守派强调的“停战圣断”。美国代表盟军要求天皇和日本政府在投降后，接受盟军最高司令部的指令，并且遵照《波茨坦公告》的精神，让日本的国民能够自由地决定战后日本的政治体制。

美国的回应使日本政府内部出现“慎重论派”，他们质疑美国的用心以及担心美国最终还是会取消天皇制，让天皇接受审判。有陆军将士坚持要进行本土作战，甚至有军内人士认为，这是近卫文麿为首的主和派假传圣旨。

不过，由于美国没有强硬否定天皇制的意思，于是在8月14日，为免美国的态度再次转变，天皇决定接受美国的要求。因此有部分历史学家认为，当时天皇转为配合主和派积极推动投降，并非有意承担罪责，实际上是希望在美国没有改变初衷前，确保“国体护持”成功，能由天皇继续统治国家。

（4）战败后，力保天皇统治体制的过程

8月15日，天皇发表著名的“玉音放送”，向国民宣布终止战争的决定，并在这九分钟的讲话里强调，这是“为了避免国民再受生灵涂炭之苦”，是基于仁心和不悯而无奈为之。这与日本政府向盟军表示无条件投降的立场和态度大为不同，变成是日本主动决定停止战争，而这种终战方式也与近卫文麿以天皇退位来请罪的设想，有所出入。

另外，天皇在8月下达《终战诏书》（史称《终战之圣断》），内容与用词也引发盟国不满。关于整个停战工作的进程和如何保住天皇统治体制，天皇与政府高官持续出现意见分歧。

进入9月，为了准备向国民解释美军即将占领日本，新担任首相的东久迩稔彦到各地向国民公开了与盟军战力的差距和实际败绩，引发不少民众哗然和批评。天皇“玉音放送”的悲恸，最终保住了他在不少国民心中的形象，但大众对政府内阁的愤懑却有增无减。

随着战争细节慢慢公开，民众对内阁和军部的不满也波及天皇，尤其是引致美国大举反击的珍珠港事件，天皇事前是否知情？为什么会批准这“无谋”又“无益”的作战？种种问题成为9月以后国内外媒体关注的焦点。

尽管出现负面反应，但是既然“国体护持”基本成功，下一步便是如何在战败后，尽快保住天皇制。最终，占领军总司令麦克阿瑟以“没有找到积极证据”证明天皇主动参与战争为由，向盟军和美国政府建议不追究天皇的战争责任。

在多番协调下，力求“国体护持”，而且以此为最后底线的昭和天皇决定主动会见麦克阿瑟，向盟军展现愿意全面配合审判和美军占领工作的态度。最后一步棋是将战争责任推向以东条英机为首的战时内阁成员，而一直力主天皇退位引责的近卫文磨也遭到追责，最终被迫自杀身亡。

2．日本人如何看待昭和天皇的战争责任？

（1）“不幸的战争”与“不幸的过去”

“阻止战争无果，其遗憾与无奈，虽已七十有年，至今依然不变。”这是1971年昭和天皇参拜伊势神宫时吟诵的和歌，当时他已经年过七十。不少人认为，这首和歌充分反映了他对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态度。四年后的1975年10月，他到美国进行国事访问，并在白宫与当时的美国总统福特会面。他在会后的公开讲话中再次提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天皇说那是“一场让我深感悲痛、不幸的战争”。

后来，当韩国总统全斗焕访问日本，并到皇宫参加昭和天皇主持的国宴，天皇致辞时表示：“本世纪（20世纪）里的其中一个时期，（日韩）两国之间存在不幸的过去，我实在感到十分遗憾。”

这个“不幸的过去”当然是指日本对朝鲜半岛进行半个世纪以上的殖民统治，又命令朝鲜半岛人民为日本参加第二次世界大战。

昭和天皇几次在不同场合的发言都让人觉得，虽然他在战败后获得盟军放弃追诉战争责任，但他对此事仍然耿耿于怀。然而，不论他个人对战争有着怎样的态度和思想，战后免责的结果一直在日本国内外受到质疑和抨击。

例如，在东京审判中，其中一个被判有罪的战争罪犯、昭和天皇的左右手木户幸一便认为昭和天皇也必须承担责任。而日本国内的共产主义者也希望借由追讨昭和天皇罪责，实现在日本成立共和国、推翻天皇制的目标。国外方面，昭和天皇在1971年秋天访问欧洲七国时，分别在英国和荷兰遭遇当地人士示威，要求他对战争罪负责，也向受害者公开道歉。

虽然如此，昭和天皇也不是完全孤立无援的。日本国内的保守派和免受追责的右翼分子则继续拥护天皇，坚持“天皇无罪论”，回击“有罪派”和共产主义者的责难。究竟两方的理论分别为何呢？

（2）天皇无罪论与天皇有罪论

简单而言，二战后至今，强调昭和天皇无须负责的论点，主要有两大根据。第一是认为1889年的《大日本帝国宪法》（以下略称为《帝国宪法》）第3条提到，“天皇乃神圣不可侵”，规定天皇只是“统之不治”的国家元首。而第55条则明确规定：“国务各大臣负责辅弼天皇，法律敕令以及其他国务相关的诏敕，均需国务各大臣副署。”天皇本来便没有单独行使统治权的可能，国家实权其实在内阁以及随之成立的国会手上。因此，他们认为战时的首相东条英机等人被远东法庭列为甲级战犯是合理的，但累及昭和天皇则不合理。

第二是认为在现存的记录里，难以确认昭和天皇自开战之前便积极、主动参与指挥战争，或者指挥任何军事行动。至于下令向中国和美国宣战的开战诏书也只不过是例行公事，而不是出自他本人的意愿。这种意见又认为当时的军部早已尾大不掉，不受天皇控制，不应反过来将责任推向无可奈何的天皇。

这两个论点都强调战前的明治、大正和昭和三代天皇，与维新前的天皇们一样，都只是受到国家供奉和拥戴的存在，而且认定天皇在《帝国宪法》确立后，便与英、荷等西欧的立宪君主一样，只有象征性而没有实权和责任。

“无罪派”还强调立宪后的天皇已明文受到《帝国宪法》的制约，不存在天皇专制独裁、一意孤行发动战争的可能性。因此，日

本投入战争和日军犯下的战争罪行都不应牵连昭和天皇。

面对“无罪派”的辩护和观点，“有罪派”则提出了“无罪派”刻意避而不谈的《帝国宪法》第11条，即关于天皇统帅权的规定。该条明确规定天皇对军队拥有绝对和完全的权限，是日本国家军队的“大元帅陛下”。只有天皇可以行使统帅权，命令军队，而海军的军令部和陆军的参谋本部首长属于天皇的幕僚，海陆两军的军事指令都要“大元帅陛下”批准才可通达。

而且，整理战时文件也显示，“无罪派”所谓没有证据证明天皇干预战争部署之说是不实之词。事实上，当时海陆两军的每日战报都会上呈昭和天皇，换言之，他对战事的进展十分清楚。而从目前记录而言，他至少有十多次下令更改军方的作战方案，又曾主动向军方提出战略方针，要求执行。这些研究成果均否定了“无罪派”坚称昭和天皇在战时被旁置的主张。

另外，国内外的“有罪派”均质疑，如果按“无罪派”所说，昭和天皇在战时没有办法阻止军部的军事行动，为何他却在美国向广岛、长崎投下原子弹后，又单独地下达《终战诏书》，指令各地日军放弃战斗呢？

面对“有罪派”的反击，“无罪派”分别做出两种回应，一是仍然认为昭和天皇的统帅权问题是特殊情况，不能证明他主动参与战争；二是主张日本参战不是为了侵略，而是一场自卫战争和对抗西方帝国主义的解放战争，从而规避昭和天皇的战争责任问题。

（3）由“战争责任”到“战败责任”

即使历史学和宪法学的主流见解均认为昭和天皇责无旁贷，但是，由于美国急欲避免共产主义在日本抬头，以及日本政府与天皇

展现出积极配合美国占领日本的态度，结果使得昭和天皇摆脱战争责任，改为由陆军为主的战时官员来承担罪责（详细请看下一问）。

虽然战后追究昭和天皇罪责的呼声未曾停止过，但是在天皇的“清白”尘埃落定后的20世纪40年代末至50年代初期，着手战后重建的日本政府为了向国民提供一个既合乎政治需要，又能自圆其说的二战总结，于是在美国政府默许下，对日本的战争责任进行分割。东条英机、近卫文麿等甲级战犯为首的战时政府和军方蒙骗天皇和国民，误启战端，为国家、国民带来破坏性的灾难和伤亡。这些人最终承担了发动战争的责任，或遭处决，或自杀，或被判处终身监禁。

而“清白”“被蒙骗”的昭和天皇与战后的日本政府则承担起战败责任，弥补所造成的破坏，全力为复兴而努力。由此可见，日本政府成功地掩饰了昭和天皇和政府、军方主动带领国家发动战争的责任，又塑造出昭和天皇带领国家复兴的“象征天皇制”的形象。

日本政府在20世纪50年代开始，逐步淡化了昭和天皇的战争责任问题，奏请天皇避免谈及二战，也指示负责天皇事务的宫内厅禁止媒体追问相关问题。至今，昭和天皇的战争责任已然被淡化为日本学术界的讨论课题，而日本民间与媒体对此也避而不谈。随着时间推移和社会发展，此争论在日本国内或许将继续被淡化，湮没在历史长河之中。

3．“象征天皇制”的争议与矛盾是什么？

（1）新天皇制成立的背后

1945年8月，日本对外宣布向盟军无条件投降，对内则通过《终战诏书》，以天皇“圣断”的名义，下令本土以至海外占领区的日本军民放弃战斗。

昭和天皇与日本政府在桌面上与美国继续进行谈判，确保天皇制存续，为此愿意配合美国占领政策和法制改造，换取美国与远东国际法庭不起诉昭和天皇，变相免除了天皇的战争罪责。美国当局参考了远东盟军最高司令麦克阿瑟的意见，想尽快安稳占领日本，防范苏联为首的共产国际势力渗透到日本，决定有条件地接受保存天皇制的选项。

谈妥这场无视日本国民与其他同盟国意愿的政治外交交易后，日本便着手废除旧有的《帝国宪法》与《皇室典范》，打算在最短时间内改造天皇与日本政治体制，向国际社会释放出最大程度的善意。

与此同时，以东条英机为首的七名甲级战犯和其他乙、丙级战犯在等待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审判时，日本政府要员则与国内的宪法专家成立宪法问题调查委员会，就确立新的民主宪法事宜继续与美国政府磋商。

然而，在1945年10月制定的新宪法草案里，日方委员会对改革天皇制呈现出明显的消极态度。在第一次草案中，只提议强化国家议会权力和国民的自由权利，以制衡天皇的“大权”。但是，一直为人诟病的“天皇总揽统治权”却维持不变。

美国政府没有正面回应第一次草案，在1946年初，直接向麦克阿瑟传达了改组日本政治体制的具体意见，表明新宪法应该基于日本国民的自由意志（类似现代的“民族自决”原则）和民主主义的政治制度，来决定天皇制何去何从。至于在新的天皇制里如何体现“民主政体”，美国政府提出了四项原则，并在后来成为新《皇室典范》的核心精神：

① 天皇所有决定都要在内阁制决议后，才能执行。

② 褫夺并永久否定天皇的军事权限。

③ 由首相统辖的内阁负责辅助天皇，防止天皇胡作非为。

④ 所有皇室收入都归国库所有，天皇与皇室的各种支出由国库支付。

麦克阿瑟基于以上四大原则，进一步向日本的战后政府提出了新宪法草案的三个必须条件（史称“麦克阿瑟三原则”）：

① 天皇的地位为国家元首，其皇位为世袭制，天皇的职务与权限皆基于宪法以及国民的总体意志来行使，天皇不被赋予任何政治权力。

② 废除天皇发动战争的权限，同时日本也宣告放弃一切进行战争的权利。

③ 废除日本的封建制度，天皇亲族（皇族）以外的贵族权利均只限一代。

从结果而言，美国与麦克阿瑟为代表的远东盟军司令部已经坚决地否决日方当初的盘算，强调了主权在民的原则，天皇则成为日本国家与国民统合的象征。

（2）“象征天皇制”的四大暧昧

由上可见，在美国政府半强制起草的新宪法里，天皇的地位与角色被急促地确认。可是，这不代表问题就此解决。另外，有四个问题到现在还备受宪法学者质疑。首先，前文提到所谓“日本国民统合”的象征定义与关系，美国与日本之间对于两者的理解与阐释存在歧义。这个部分完全没有经过国民讨论，便在两国政府的协议中被制定完成。

也就是说，新宪法制定时是怎样得出“日本国民统合”的总体意志，又如何认可并从这个意志体现天皇的象征意义，这个象征在宪法上又如何解释，以上皆无具体说明。这个暧昧含糊的条文内容，欠缺客观严谨的民意基础，更有违当初美国政府基于民主主义原则来改造日本政体的声明。结果，保存天皇制的问题，成为制定新宪法的优先考虑事项。

其次，新宪法在没有任何根据的情况下，以抽象的“日本国民的总体意志”为基础，外加以民主主义包装，由美日政府决定了新天皇制继续采取战前的世袭制。结果，无论是昭和天皇还是平成天皇，又或者是2019年继位的新天皇德仁，他们在宪法上的合法性、正当性都存在混淆不清的部分。

第三，在暧昧不明的“日本国民的总体意志”下，天皇没有退位的选项，即使是2019年平成天皇的退位，也只属于特别措施，由政府独断立法批准。本书在第四章第6问提到，新宪法和新《皇室典范》否定天皇退位（辞职）的可能性，不仅硬性规定了天皇终身在任制，更彰显“天皇去留不需经过国民总体意志来决定”的事实。就这个宪法规定而言，日本国民对于世袭制的存废，从一开始便没有选择支持或反对的权利，也难以从宪法条文里找到可以推倒天皇存在的法理依据，也就是说他们不可能通过法律程序去推倒

“象征天皇制”。这与美国政府当初强调的“主权在民”原则相悖。

因此，自新宪法施行后，日本国内外有不少政治人物与宪法学者均猛烈批评宪法中的“终身在任制”，那实际上赤裸裸地侵害了天皇本人的人权和国民主权的绝对性。

所有天皇只能等待死在职位上的一天，无法从中抽身，国民也无从干预。在这样的设定下，难以宣称天皇获得了与平民同等的人权，甚至也难以界定天皇为一个法律上的个人。昭和天皇当日所宣告的《人间宣言》，主张自己与国民平等的声明，自然沦为一纸空谈。

第四，新宪法否定了天皇行使政治权力的可能，但天皇具体该行使哪些国务同样没有明确界定，灰色地带之大，不难想象。因此，昭和天皇战后多次巡视全国和访问国外，均被宪法学者质疑是实质的政治活动，无视宪法精神。

以上种种暧昧与漏洞，暴露时任政权握有肆意解释天皇在宪法上的地位、角色与功能的权力。换句话说，“象征天皇制”在理论上存在既不违背新宪法的文字规定，但又能行使无从掣肘的权限的可能性，使看似已经被全面解除“武装”的新天皇制，残留了不稳定的因素。

4．新、旧《皇室典范》有什么不同？

（1）皇族的家法——《皇室典范》

近年来，世界各国与日本皆关注天皇家族和他们的日常生活，新闻报道里经常出现《皇室典范》这四个字。《皇室典范》顾名思义就是规范、定义日本皇室，是上至天皇、下至一般皇族的家法，内容包括天皇的定义、皇位继承顺序、皇族的范围，以及皇室的财政管理等。

《皇室典范》存在的历史其实非常短，因为在明治维新以前，天皇家族和朝廷都没有意识到要订立明确的家法，只有天皇教导太子和其帝王学心得一类（如顺德天皇撰写的《禁秘抄》），天皇、皇室的定义要到明治维新后才明确起来。日本于第二次世界大战战败投降后，《皇室典范》伴随着新制定的《日本国宪法》（以下略称为新宪法）进行了改正，因此《皇室典范》存在两个版本，明治时代的一般被称为旧《皇室典范》，而战后的则被称为新《皇室典范》，以资识别。

旧《皇室典范》订立的契机，当然与著名的《大日本帝国宪法》（以下简称《帝国宪法》）有密切的关系。1889年2月11日，明治政府宣布实行立宪制并公布了《帝国宪法》，且在一年半后的1890年11月29日正式施行。旧《皇室典范》作为定义“现御神”天皇与皇族的规定，自然成为《帝国宪法》的核心。

不过要留意，由于旧《皇室典范》是天皇家的家法，共12章62条明文规定，但是条文制定完成后，并没有与《帝国宪法》一样，向国民公布，当然也不容许国民谈论；同时，《帝国宪法》与其他立宪后的法令都需要天皇和各国务大臣共同签署，但旧《皇室典

范》一开始并不需要天皇签字，到了1907年实行旧《皇室典范》条文增补时，天皇与各大臣才签署增补案。但由于也没有对外公布，所以战前的旧《皇室典范》仍然完全属于天皇专断、皇室专属的法规。

旧《皇室典范》与《帝国宪法》的关系完美反映在《帝国宪法》的第7章第74条里。第74条明确规定：“旧《皇室典范》的改正无须经过帝国议会的审议。”与此同时，“不可以皇室典范来变更（帝国）宪法的条规”。换言之，旧《皇室典范》与代表国家最后法律的《帝国宪法》，明显是两部不同的法规，地位对等。

（2）两个《皇室典范》的不同之处

那么，旧《皇室典范》与战后的《皇室典范》有什么不同呢？涉及“万世一系”与天皇神话的内容，还有一些与天皇相关的枝节事项，留在其他章节再提，这里先将焦点放在两部《皇室典范》的性质差异上。

首先，上文提到旧《皇室典范》与《帝国宪法》是井水不犯河水的，两者均不能节制、左右对方。相反，战后改订的《皇室典范》虽然也同样不受战后的新宪法影响，但与旧《皇室典范》最大的不同，是《皇室典范》新订立的第五章“皇室会议”。

“皇室会议”是由皇室、皇族、首相、参众两院正副议长、最高裁判所法官，以及执掌皇室事宜的宫内厅厅长，共10人组成的机构，负责规范、决定皇室的未来和行动。

在战前的旧《皇室典范》里也设立了“皇族会议”，明确规定与皇族相关的问题，也有政府高官出席。但是战前“皇族会议”里的议长，是天皇或天皇指名的一名皇族人，各列席的大臣没有资格

代理，因此理论上完全是天皇处理自家事，只是名义上必须招请政府高官列席。至于战后的“皇室会议”，议长必须由当时的首相出任。而天皇受到新宪法明确规定的“象征天皇制”的影响，虽能列席“皇族会议”，但没有发言权，也不算是会议的议员之一。这意味着战后的“皇室会议”不再是天皇独断的机构，而要尊重民选政府和司法、立法机关的意愿。

除了“皇族会议”变成“皇室会议”，且天皇的角色出现大转变外，旧《皇室典范》与战后改订的《皇室典范》，其不同之处还包括：

① 旧《皇室典范》第六章设立的太傅之职被取消，即天皇和日本政府不再特定教育皇子的人选。皇太子和皇族子弟均进入国家制度下的各级学校。

② 旧《皇室典范》第八、九章订明的皇室财产、经费使用（第8、9章），在战后的《皇室典范》中被取消，不复记载。

③ 旧《皇室典范》第十章订明的皇族诉讼与犯法惩处的规定，受战后的皇族改革、减员影响，战后的《皇室典范》取消相关条文，皇族成员犯法将与平民同等处理。

④ 旧《皇室典范》里皇族女子只可嫁给指定身份的家族，如王族与华族（旧藩主子孙），此规定也被废除。战后的皇族女子可以嫁给平民，但其身份同时被废除，即与平民无异。

以上几项改动和皇室会议的改革，给天皇与皇室带来重大影响。但最重要的是，战败后由美国主导的新政府锐意削弱战前天皇与皇室的影响力，表明新政府将天皇置于政府高层的管理之下，天皇不再是战前那个高高在上、万机独断的君主。但是，新宪法与

《皇室典范》在解释上仍然存在极多暧昧不明的灰色地带，天皇的形象仍可能受到日本政府的肆意解释，进而扭曲和变形。

5．天皇、皇室与大众媒体的关系如何演变？

通常而言，政治人物的花边新闻比起僵硬乏味的政治动向，更能吸引大众的注意力。在仍然存在皇室的国家里，情况也一样，像英国皇室被传媒“狗仔队”贴身报道，便是一例，日本的皇室又如何呢？

目前，日本国内及国外传媒已获得较多报道皇室的机会。近年在出现一些不利皇室的消息和事件时，大众也能自由地查阅媒体报道，国民与媒体均不会受到来自政府当局的政治审判和检查。但以前的情况并非如此。

（1）官方如何利用皇室报道

从日本传媒业历史来说，著名的明治维新既是改变日本命运的历史事件，也是官方与民间办报的重要契机。同时，社会主义、民主主义等西方思潮随着日本开国而到来，民间在各种思想的熏陶下，积极利用各种渠道发出自己的声音。那时还没有电视机，收音机也尚未普及，报纸就是当时最有力的平台。

明治天皇晚年的立宪运动，以及大正天皇时代的民主运动，都通过民间团体办报，向官方施加压力。然而，关乎天皇与皇族的报道则不存在自由评论的空间。官方靠着“天皇乃神圣不可侵”的全民共识，将限制国民批评国政一事，抬升到更高的层面。

也就是说，明治及大正政府利用限制有关天皇的报道，维持政府的威严，同时利用天皇这个万民爱戴的金身，反过来通过媒体进行国民教育。在战争频发的20世纪上半期，官方利用公权力压迫和

控制媒体，使媒体大多成为政府的鹰犬和宣传工具，向人民灌输盲目的国家主义和忠君思想。例如，明治天皇于1912年7月30日过世，当时传媒带着半分爱国心、半分煽情，以制造声势的意图，鼓动东京民众到皇宫外的二重桥外跪地祈祷。

相较健康长寿的明治天皇，接任的大正天皇是出名的“药罐子”，到了1926年12月25日，大正天皇病危时，《东京日日新闻》等报章则改以“美谈”“壮烈”为名，报道少年少女听闻天皇病危而哀痛自残的新闻，变相宣扬忠君爱国的思想。

（2）媒体“自肃”与自我审查

到了战前的昭和时代，战争新闻的煽情与夸张手法，自不待言。关于不利战况以及天皇动向的新闻，通通受宫内省（宫内厅的前身）和军部严格管制，一旦发现不妥言论，轻则禁止发放，重则以“不敬罪”处罚当事人。

当时的报纸和电台媒体为免以身试法，都会自主地以“自肃”为名，不报道一些危险敏感的新闻，用现在的话来说便是“自我审查”了。另外，在“天皇与皇族皆神圣不可侵犯”的原则下，也不能主动采访他们。

（3）战后的皇室报道

随着二战战败，在美国的强大压力下，日本政府完全否定了自己过于激烈的忠君爱国思想，用来钳制媒体的不敬罪也被废除。在新宪法赋予的言论思想自由和新闻自由的保障下，媒体对皇室、天皇的报道限制也陆续放宽。

尤其在美国占领期间，为了对国内外展现天皇《人间宣言》已落实执行，日本政府和昭和天皇都与媒体有更多交流，被历史学家称为多年来难得的“蜜月期”。话虽如此，昭和天皇召开记者会的次数屈指可数，而且媒体一律不可询问关于二战罪责、政治和时评等话题，日本政府会事前介入和协调。

平成天皇对媒体采取更开放的态度，他与主要皇室成员有更多的机会露面，或召开记者招待会。不过，天皇与皇室言论仍受到宫内厅的管理，大部分发言都以“建议”为名而受到限制。

踏入千禧年代，媒体对于皇室的主要报道仍然停留在转述发言，以及报道动向。另一方面，皇室与宫内厅出现越来越多的矛盾，平成天皇、新任天皇德仁与成为皇嗣的秋篠宫文仁亲王在这10多年内，皆曾在没有事前知会下批评宫内厅，或者对宫内厅以及日本政府无视皇室意愿表达不满，使宫内厅和政府尴尬不已。

而传媒又如何报道皇室的花边新闻呢？近10年来，比起英国为首的欧洲皇室，以及仍被国民视为神圣至上的泰国皇室，现时日本皇室报道的自由度算处于两者之间。

进入2000年后，日本皇室成员的花边新闻大多与婚姻问题相关。目前最新的新闻是文仁亲王的长女真子公主与未婚夫小室圭的婚事濒临破局。传媒虽有报道，但大多“点到即止”，不像英国媒体对皇室做贴身式报道。

可见，虽然战前的不敬罪已不再成为威胁，但是日本媒体或多或少出自对皇室和天皇的崇敬心态，在不利于皇室形象的报道上仍然采取明显的“自我审查”方针，以帮助天皇贯彻“象征天皇”“大众天皇”的形象。昭和天皇时代禁止传媒询问历史、政治和二战问题的方针，继续成为媒体不言自明的“潜规则”。

6．平成天皇让位为什么会引起宪政危机？

（1）生前让位还是生前退位？

2016年7月13日，日本的国营电视台日本放送协会（NHK）和《每日新闻》援引负责皇室事务的宫内厅消息——平成天皇明仁已向宫内厅表示自己打算提早让位给皇太子德仁。天皇认为应该让有能力履行天皇职责的人来担任，暗示自己年事已高，身心上都已经无法胜任天皇的职位。

消息传开之后，宫内厅发言人随即向记者否定上述的报道，更表示天皇将按宪法规定，继续履行天皇的职责。可是，到了同年8月8日，平成天皇在长约10分钟的公开讲话中，再次表达了让位的意愿，并且公开请求日本国民谅解。事已至此，政府当局显然已不能再否定这一事实。

经过与皇室内部磋商，首相安倍晋三内阁于2017年6月1日向国会提交了《关于天皇退位等皇室典范特例法》，由5条与附例11条组成，并在同月中旬获得国会两院通过，再对外公布。

特例法正式写明“天皇退位”，但包括天皇本人发言在内，都将这次决定称为“让位”。一些右派传媒也遵循意志，在之后的相关报道里一律使用“让位”。两者究竟有什么分别？

“退位”是指在没有天皇的主体意识下，使他从皇位上下来。

“让位”是指在天皇的主体意识下，自行放弃皇位，并将皇位交予指定继承人。

按照天皇的上述行动，“让位”的说法当然最为准确，为什么日本政府还是要在特例法上写“退位”呢？这是因为在现行宪法和《皇室典范》规定下，天皇没有“辞职”“退休”的权利。但平成天皇突然提出，而且罕有地做出强烈要求，安倍内阁最终妥协，急忙制定上述的特例法去追认。

但是，为免再次被天皇杀一个措手不及，安倍内阁在特例法里强调了特例，即“只此一次，下不为例”的意思。也就是说，法例上是特意用退位来强调法律先于天皇的意志，避免抵触“宪法最大、天皇受宪法限制”的精神，引起宪法解释混乱的尴尬情况。

（2）为什么不可退位？

前文所谓的“尴尬情况”，是指天皇突然想退位，导致天皇有可能违背宪法规定的局面。那么，为什么宪法规定天皇不可退休，要做到死为止呢？先看看这个规定是怎么来的。

历史上天皇生前让位、退位的例子多不胜数，有天皇自愿提出让位，也有天皇被要求退位。但到了明治维新之后，天皇成为国家唯一、最大且至为神圣的代表和象征，明治政府更通过明治天皇向国内外宣言会担负起率领国家的重责，实现“万机亲裁”的君权政治，回复“古制”。

宣言归宣言，没有人能保证天皇不会突然出事。因此，明治政府确保政权在握之后，开始讨论皇室、皇位的规定，也就是后来于1889年确立的《帝国宪法》与旧《皇室典范》。

在这之前的1886年，政府辖下的制度调查局提出，万一天皇身体不妥时，便设置“摄政”来署理国务。但当时的外务大臣井上毅

表示反对，认为这等于让国民知道天皇有恙，无法领导国家，会引起国内不安，也有损天皇权威。

井上毅又强调，在制宪后一旦设置摄政，必然要通过国会表决，变相使天皇无上权威和继承受到民选议会及其背后的国民掣肘。因此，井上毅反而提议立法容许天皇以让位（不是退位）的方式，将国务职责交给皇位继承人，以跳过议会，完成权力交接。不过，他的建议旋即被首相伊藤博文否决。伊藤博文忧虑一旦容许天皇可以让位，难保将来天皇因与政府不和，用让位作为抗议手段，威胁政府。他也担心有反政府势力勾结皇族，夺取皇位，再废掉现有天皇，引起政治动乱。

最终，伊藤博文的忧虑获得了内阁幕僚的认同，并且在1889年制定的旧《皇室典范》第10条里，明确规定天皇终身制，不可提前退位、让位。伊藤的这个想法延续到了战后的新宪法与新的《皇室典范》，战败后的天皇已成为“国家和国民统合的象征”，必须终身在任，减少更替，才能体现“统合”“象征”的精神，为国民带来安全感。

然而，日本国内一些开明人士认为，这个期待等于剥夺了天皇的人权，甚至等同宣言天皇的“特别性”，与当年昭和天皇公布“天皇是人”的《人间宣言》相违背。另外，也有人猜测天皇的“退位”另有隐情，包括不满安倍晋三政权的右倾路线，破坏天皇一贯的不战、反战原则，于是罕见地主动“让位”，以示抗议等。

无论如何，平成天皇“让位”一事已成定局，引发的宪政危机也被强行拉回原本路线。然而，关于今后新天皇德仁能否继续与安倍政权以及将来出现的内阁保持和谐，这势必成为日本国内外关注的焦点。

7. “万世一系”的天皇制会走向终结吗？

（1）天皇家存续的危机

2019年4月30日，在位31年的平成天皇让位（法律上称为“退位”），皇太子德仁于翌日接任，成为第126代天皇。这个延续天皇制的大事潜藏着一个重大的危机，足以影响自夸“万世一系”的日本皇室存续。

战后确立的日本现行宪法（俗称《和平宪法》）第二条规定，天皇是世袭制。同样，在战后改订的《皇室典范》第一条也明确规定，只限拥有天皇血统（原文称为“皇统”）的直系男性成员来继承天皇之位，直接否定了女性成员的继承权。这个规定背后的理由和理论留待本小节（2）说明，这里先说明此规范造成的隐忧。

这个规范只有当天皇成功生下儿子，又或者天皇有直系弟弟，而这些弟弟（们）又有大量儿子时，才能维持下去。可是现实是新天皇膝下只有一名公主（爱子内亲王），没有男性子嗣。因此，在平成天皇提出让位想法之前，日本政府与皇室会议已按照上述原则，内定了德仁天皇的胞弟秋篠宫文仁成为第二顺位继承人，而秋篠宫文仁的儿子悠仁亲王则成为第三顺位继承人。

按照现时的情况来看，天皇德仁死去后，如弟弟文仁仍在世，那么天皇继承权便自然转移到文仁身上，然后继续传延下去。文仁之子悠仁将成为天皇家的唯一继承人，没有其他直系男性亲族。

而受到“臣籍降嫁”制度的影响，所有女性成员出嫁后将自动失去皇族成员身份。换言之，如果悠仁亲王继承皇位时，所有女性成员都已出嫁，他身边将没有任何皇族亲人。万一悠仁又有什么三

长两短，而上述原则又不做任何改变，那么拥有千年以上历史的日本皇室因为直系血脉断绝，“万世一系”的神话将成为绝唱。

这个问题早在悠仁出生前，便已成为日本政府、皇室，以及异常重视天皇存续的保守势力至为关心的问题。目前来看，德仁夫妇与文仁夫妇均年事已高，恐难以再生育，所以只能期待悠仁长大后，尽快成婚，然后开枝散叶，确保天皇家族的男性成员人数回升。

然而，没有人能保证悠仁一定能长大成人，以及结婚后一定能生出大量男嗣。于是，便有人提出次善之法，包括恢复承认女性天皇的合法性，又或者让天皇家族旁系出身，但已不属皇室成员的男性以养子身份继承大统。这两者之中，尤以前者最受到保守派系抨击。就媒体调查显示，日本国民对前者的抗拒其实没有保守派那么强烈。但保守派为何坚决反对女性天皇再现？为什么战后的《皇室典范》不承认女性天皇？

（2）否定女性天皇的缘由

《皇室典范》不承认女性皇室成员继承大统的规定，与战前的旧《皇室典范》里的精神如出一辙，反映当时政府与皇室即使战败被迫改变天皇体制，仍然希望维持战前的天皇理念。

这个“非男子不能为王”的理念是如何产生的？在1946年底，国会审议《皇室典范》内容时，便有议员问及政府与皇室执意否定女性皇室成员成为天皇的原因。当时的日本政府（吉田茂第一次内阁）在答复质询时，总括了六大原因。简单来说，可归纳为以下四项：

① 女性天皇与他家男子成婚而生的子女，天皇家系将转到他家之手，影响“万世一系”的皇统纯正。

② 女性天皇即使结婚生子，也只能解决一代的子孙不足问题，长远而言还是要有男性子孙继承大统。

③ 天皇继承问题为特殊问题，不受新宪法规定的男女权利平等精神影响。

④ 在天皇历史上出现的女天皇皆为例外和偶然，不属于天皇继承的根本原则。

以上种种，说白了便是不希望天皇血脉外流，因此必须认定历史上出现过的女天皇皆为例外，不成正统，更强调否定女天皇是符合天皇历史惯例和传统的做法。

更明确地说，当时的日本政府以至今日保守派，皆执着于天皇家系只可由直系男性子孙来继承的“信仰”，背后潜藏着男尊女卑、父系继承为尊的思想。再加上现时属于神道思想产物的皇室祭祀，大多规定由男子来进行，女性成员一律无法参与。因此，保守派拿出“神道＝国家传统＝习俗”的理论，进一步否定女天皇出现的合理性和正当性。

通过本书对女天皇的介绍，大家不难想象，这些矮化女天皇存在的言论并非一朝一夕而成。江户时代两位女天皇（明正天皇与后樱町天皇）的即位和不能生子的事实，已反映这种倾向。可以说，1946年日本政府与现今保守势力的持论，传承自江户时代，但更早的古代女天皇却是曾真正统治国家的实际君主，不是虚设的元首。至于直系男性子孙来继承的“万世一系”传统，放在南北朝时代（出现皇家分裂）来看，也并非无懈可击。总而言之，种种保守意见充其量只是一种执念，没有法理、历史根据。

虽然如此，保守派仍然坚拒女天皇重新出现。一些较为极端的言论更提出，因现行宪法没有规定天皇不可多妻多妾，必要时，可以复行立妾来确保子嗣。从前的明治天皇和大正天皇都是侧室所生，可为近例，无须找寻更早的例子。但从日本正缓慢地提升女性地位、保障女性权益的国情来看，这类极端言论如何能上得了台面，则是另一个问题了。

（3）天皇制将走到尽头？

当然，对于是否开放公主（爱子、真子、佳子）成为候补的皇位继承人的问题，目前正反双方处于自说自话、互不承认的状态，相信这一切在悠仁成婚生子前，不会有重大改动。特别是目前的政府（第二次安倍内阁）所属的自民党，属于保守势力。在选票及保守势力的压力下，公然接受女天皇的可能性比较小。

假设改革毫无进展，悠仁亲王继承皇位又无法生下男嗣，天皇制“独子单传”恐成常态，终有一天会出现没有男性皇族成员的结局。一旦问题拖到悠仁长大后才去解决，属于天皇家族近亲的旁系旧皇室成员已然疏离，保守派又是否会接受一度失去皇族身份的男性突然成为天皇呢？

因此，目前解决这个问题的理想时机，是在爱子、真子和佳子皆未出嫁前。又或者政府与皇室直接改变继承制度，让她们三人获得继承资格。否则，天皇制断绝的危机会继续缠绕这个千年家族。

当然，除了存续天皇制度外，另一个解决之道是在天皇家族后继无人之前便改行共和制，彻底结束这个两千多年的体制。

不过，目前天皇制在日本国民心目中仍拥有较正面的评价，而且保守势力仍然控制国内政治，日本想迎来真正称得上历史“革

命”的共和制，比起让女天皇复归继位，概率更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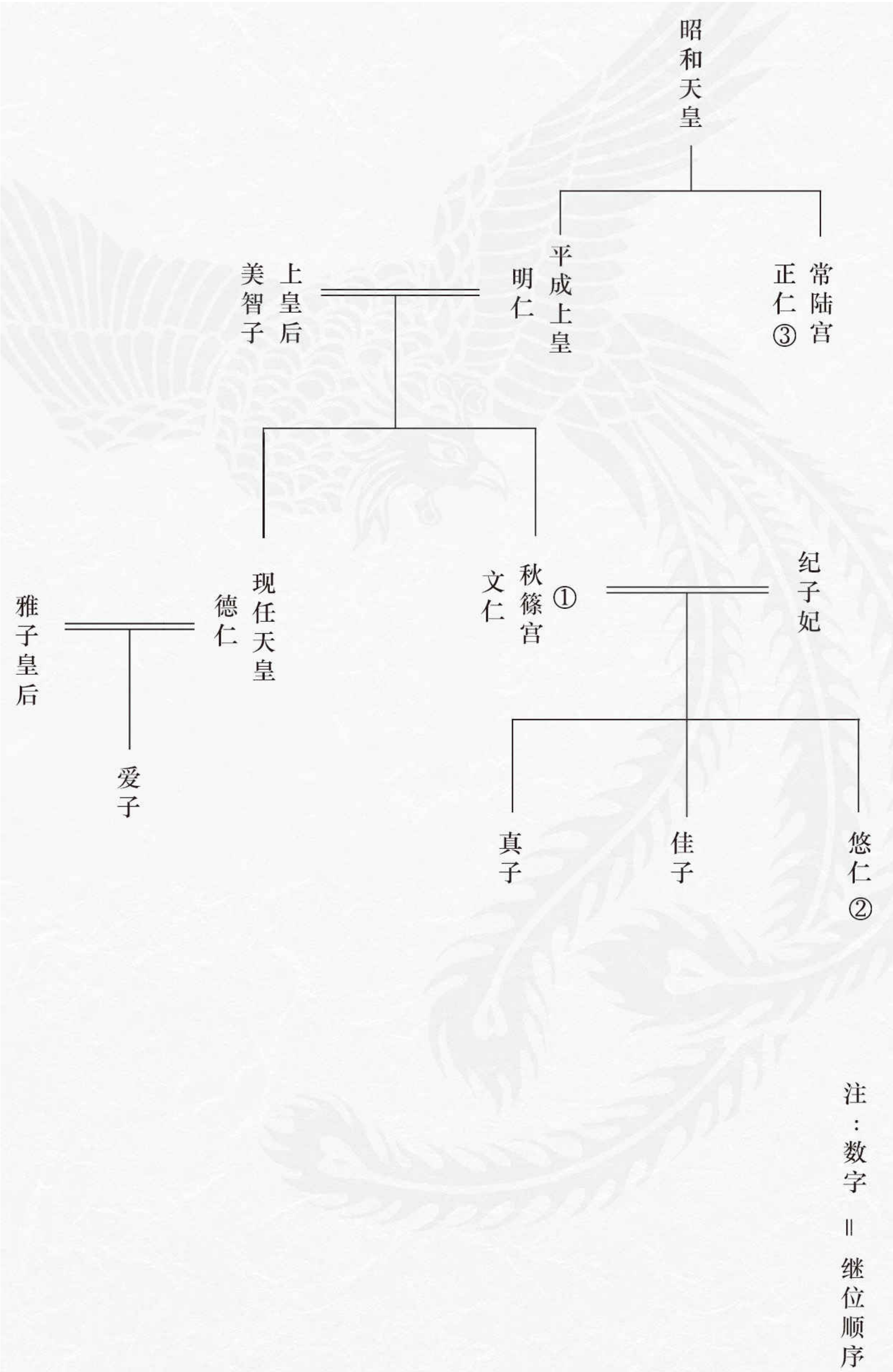


图4-1　现代皇位继承顺序

下部　天皇的生活之谜

第五章　天皇的宗教与仪式

1．天皇崇拜与初诣有什么关系？

（1）初诣的形成

初诣是现代日本国民于每年1月1—3日（现在扩大到1月第2周为止）到神社佛寺进行参拜，祈求当年平稳顺利，近年更吸引了外国游客和在日留学生、侨胞专程参加。不过，这样大规模的民众活动只有200多年的历史，可以追溯至18世纪末，即江户时代末期。

现在的初诣与原本的最大不同之处，在于人数和参拜的性质。原本的初诣，参拜者会根据自己的属性，如生年、姓氏、当年的吉利方位（“惠方”），与自己八字配合的缘日等因素，决定到哪个神社佛寺参拜。而且在交通相对不便的江户时代，参拜者一般都会到居住地附近的神社佛寺参拜。

然而明治时代，尤其铁道铺设后，初诣便出现了很大的变化，由特定的神社佛寺改为前往著名、热门之处，即使距离较远也不是问题。刚成立的铁道公司确实也大力推动民众使用铁道出行参拜。以江户（东京）、大阪为首的大城市居民慢慢转到当地附近最具人气、又可利用铁道或汽车轻松到达的神社佛寺参拜，如东京附近的成田山新胜寺和川崎平间寺（俗称“川崎大师”），还有大阪的西宫神社等。

久而久之，初诣对东京、大阪等大城市的民众而言，从江户时代重视吉利、现世利益的宗教行为，逐渐演变为行乐郊游的消费行为，而且在大正时代开始向全日本的中等城市扩散。

（2）初诣性质的改变

虽然初诣自江户时代末期已然成为群众活动，而且一直延续到明治维新后，但主要是各地平民和商人参与。从前的武士阶层、明治时代崇尚先进知识与西方思潮的知识分子，普遍对初诣态度冷淡，认为这是落后的民间活动，是属于庶民的。这个情况到1912年明治天皇病逝前夕，出现重大改变，也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初诣的性质。

20世纪初，明治天皇的健康开始走下坡。1912年7月20日早上，日本政府对外宣布天皇已经进入危笃状态。消息一出，全国各地的官民开始用自己的方法，为这位带领国家走向富强的天皇祈福。值得留意的是，参与这次活动的有官方组织，也有横跨不同阶层和宗教背景的人士。

以东京为例，民众分别到市内不同的宗教场所许愿，就连最应该否定偶像崇拜的基督教徒也自发组织上百人，到东京基督教青年会馆举行祈祷会。另外，也有东京民众和学生响应报纸的号召，走到皇宫外的二重桥前跪地祈祷。受民众敬仰的老天皇行将就木，前所未有地使国家意识与国民团结起来。

随着天皇病逝，国粹主义者和神道者借助民众自发的行动和热情提出建议，要为天皇在东京建造纪念参拜场所——明治神宫。虽然天皇生前已决定将陵寝定在京都，而且也有不少知识分子担心此举助长盲目崇拜，提出反对。然而不少标榜爱国、高呼尊王的人，还是希望在东京建造明治神宫来歌颂、纪念这位天皇，而且获得不少民众和媒体的支持，逐渐成为主流的舆情。结果到了1920年，支持派终于如愿以偿，在涉谷建立了明治神宫。

（3）初诣的质变

原本明治神宫只在明治天皇的生辰、忌日等几个特别日子举行祭礼，但随着国家主义高扬，以及东京媒体有意无意地多番吹捧，国民意识日益提高，明治神宫在建立后立即变成了纪念明治时代“富国强兵”的圣地，也成为“明治大帝”的象征。

明治神宫建立的第二年，即1921年，成为东京以至近郊地区民众初诣的新热点。当年的初诣便有超过3万名参拜者蜂拥而至，热潮更一直持续了数日。自此之后，东京民众原本要到都外进行初诣的习惯发生了改变。直至日本二战战败，到明治神宫进行初诣的人数与前述的成田山和川崎大师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

明治神宫使东京都民拥有了一个属于他们的初诣圣地，是培养、体现国民意识的具体场所。然而从当初的热潮来看，不能否认当时的东京民众是出自真心，而且是自发地想纪念天皇，因而支持建设神宫。

对于同样热烈地支持建设神宫，但别有用心的国粹主义者和国家神道主义者来说，这个新兴的初诣圣地从一开始便是超越了宗教派别的“国家祭拜圣地”，凌驾于所有圣俗信仰之上。站在他们的角度而言，明治神宫的真正用途是使国民的身份认同与国家意识牢牢地联系在一起。

大正至昭和前期，日本因军事侵略中国招致国际社会批评，备受孤立。加上国家内部的社会问题、经济不景气等危机，民众发自内心崇敬天皇之念被推崇军国主义的军方、国家神道主义者利用，变成鼓吹官民一致对外的极端民族主义。

大正末期至昭和初期，即20世纪30年代前后，日本政府利用媒体和教育，将明治神宫乃至各地的神社，转化为崇拜天皇、敬仰国

家的圣地，更将民众原本发自内心、相对纯粹的感情，转变为强制与理所当然的责任。

而民众展示自己“崇敬”“爱国”“忠君”之情的方式，就是自发地带领下一代参拜与天皇有关的神社（如明治神宫、伊势神宫等），学校则必须悬挂天皇与皇后的肖像画，行鞠躬礼，最激烈的便是为国家牺牲生命。抗拒这种爱国情操表现的人士与团体往往遭到排斥、打压。情势至此，已与民众出于相对纯粹的思念之情，跨越宗教、阶层去为明治天皇祈福祷告，有了根本性的差异。

随着官方铺天盖地的政治洗脑，神社参拜与初诣被强制披上了一层极端的、带有军国主义色彩的外衣，一直到日本战败，这层外衣才被强行脱下。

2. “三种神器”如何影响天皇统治？

所谓的三种神器来自《古事记》和《日本书纪》的记载，是天皇之祖，也就是天照大神，命令其孙琼琼杵尊（神武天皇的祖父）下凡统治人间时，亲自授予他的三件宝物：八咫镜、八坂琼勾玉和天丛云剑。14世纪写成的《神皇正统记》（北畠 亲房著）便指出三种神器分别代表王者必备的三个元素——正直、慈悲和智慧。传说现代天皇出外游历，必然带着这三件宝物同行。关于三种神器，其实大有学问。

（1）三种神器为何？

先简单说明一下三种神器。八咫镜的“八咫”的意思一直众说纷纭，其中一个较主流的说法指出，“咫”类似长度单位寸，即八咫镜是一块直径8寸左右的镜。八坂琼勾玉中的“八坂琼”同样有“很长”的意思，是由复数勾玉连合而成的玉串 。至于天丛云剑，又名“草薙剑”，“天丛云”意指浮游天空的云朵，一般认为只是修饰词而已。

另外要留意，在《古事记》和《日本书纪》里，八咫镜、八坂琼勾玉和天丛云剑被称为“宝物”，在10世纪、11世纪的时候较常被称为“神宝”。“神器”则是进入13世纪以后才被广泛使用的称号。

历史学家和民俗学家相信三种神器起源于古代大和朝廷。那时候大和盆地（今天的奈良县中北部）的君主大王（天皇的前身）继位时，群臣和臣属的部落酋长献上宝剑、铜镜和勾玉，作为服从的象征。

（2）三种神器的地位变化

虽然在古代传说和历史书中，三种神器多次被强调，但是它们的地位却一直在变动。例如，在8世纪的文献里，只看到有“神玺之镜、剑”，勾玉却没有明确的记载，可见三种神器的概念并没有在一开始便定型，而是到了中世纪以后才慢慢固定下来。起码在一开始，勾玉的重要性还没有镜、剑那么高。

另外，镜和剑的描述也有一些变化。11世纪时的贵族相信，先人因为敬畏祖神，早已将镜与剑的“正货”转移到祭祀天皇祖先的伊势神宫和热田神宫。历代皇宫里供奉的镜和剑，以及后来被重视的勾玉，都只是仿制品，以免发生事故。

不过至今为止，没有人真正目睹过三种神器，它们是什么模样，就只能靠神话故事的描述来想象。而且，随着时代的发展，时人更看重三种神器的象征性，多于它们的神圣性。例如，在三种神器之中最被天皇和朝廷重视的八咫镜，虽然是仿制品，但由于它在神话里被认为是天照大神的化身，因此被历代天皇小心供放在皇宫神殿之中，并且由专门人员看护。

可是平安时代，皇宫起码发生了三次大火，将宫殿烧毁殆尽，而仿制的八咫镜也因此多次破损。当时的朝廷贵族直至天皇，对于重修八咫镜一事，既不热衷，也不担心它的破损会得罪皇祖。

还有，在著名的“源平对决”（即当时两大武士家族平家与源家为争夺国家主导权而爆发的战事）时，平家带着他们拥立为帝的安德天皇与三种神器逃到西日本，以保他日东山再起，但最终在澶之浦之战兵败，全军覆没。有说法指出，三种神器和安德天皇因此双双沉没海中，虽然源家后来打捞到勾玉和镜，送还京都，但却始终找不回天丛云剑。

既然三种神器是天皇即位时象征王权的宝物，出现三缺一的尴尬情况，使源家拥立取代安德天皇的后鸟羽天皇变相缺乏正统性，只好以后鸟羽天皇的祖父后白河法皇的“传国诏书”替代，使后鸟羽天皇仍有足够的正统性来继承皇位。虽然这是权宜之计，但在当时的朝廷眼中，已退位的天皇因为曾任天皇之职，又是新天皇之祖父，同样具有足够的神圣性，他的认定和批准等同三种神器。

到了14世纪的南北朝时代，出现南朝和北朝两派天皇敌对、互相否定的情况，由于两方都以天皇为首，那么谁握有三种神器便自然成为象征正统的重要条件。但是，握有三种神器的南朝天皇最终落败，被迫将三种神器还给北朝，作为和解的条件。这再次反映出三种神器仍然是天皇必要的象征，但与正义与否则没有绝对关系。

三种神器在11世纪以后，变成象征王权的宝物。在一般情况下，它们对天皇来说都是必不可少的，它们的状态也多少会影响人心。但从前文诸多例子可知，朝廷贵族们在必要的情况下，仍然可以想出取代神器的方法。随着时代发展，以及天皇的地位已经坚不可摧，朝廷已不如以往那样需要“三种神器”来加强权威，它们的存在感越来越弱，完全变成了形式主义的道具。

3．《古事记》《日本书纪》两书为何对日本如此重要？

每个国王制国家成立后，都会制造出创国神话，强调国王的由来以及统治的正当性。在现代历史学还没成型之前，这些神话便成为时人了解历史的根本资料。古代日本先后出现了两本影响深远的神话著作，一本是《古事记》，另一本是《日本书纪》，都叙述了天皇开创和统治日本的故事。

（1）两书的成书过程与异同

《古事记》是天武天皇命令大臣稗田阿礼阅读自古代流传至今的《旧辞》（古代的故事集）和《帝纪》（古代君主的传记）后，综合贯通，并由另一个大臣太安万侣笔记，最后在公元712年，即元明天皇时代完成。

全书分上、中、下三卷，上卷由开天辟地的神话时代开始，称为“神代卷”。中卷由神武天皇到第15代应神天皇为止，称为“神与人代卷”。下卷则从仁德天皇至推古天皇为止，称为“人代卷”。

《古事记》的特色是以上述的《旧辞》和《帝纪》为基础，再将当时流传的各种神话、传说、故事、歌谣融入书中，以当时的口语写成，夹杂汉字与假名。对于公元8世纪的大和朝廷来说，这些神话、传说、故事、歌谣都是诉说他们祖先来历和事迹的历史资料。保存与传承这些资料就是《古事记》的主要使命。

《日本书纪》的成书时间较《古事记》晚数年，在720年完成。提议编书的是前述的天武天皇之子舍仁皇子，《日本书纪》以

唐朝的官史体裁为蓝本，将神话时代至持统天皇为止的国家历史，按时间顺序编写。

《古事记》着重记载神话，该部分的内容约占全书篇幅的七成。《日本书纪》则重视距离天武天皇时代较近的天皇纪事，只有两卷（卷一、卷二）叙述神武天皇以前的神话时代，仅占全书内容的一成左右，相当于《古事记》上卷的分量。《日本书纪》第三至第十卷，相当于《古事记》中卷的神武天皇至应神天皇部分。其余二十卷均属于距离天武时代较近的历代天皇事迹。

虽然《古事记》与《日本书纪》有很多相关、共同的部分，对于神话时代以来，历代天皇的即位顺序、血缘关系的叙述也基本一致，但在选材和叙述方面，《日本书纪》较为简洁，也更有目的性。将《日本书纪》中一些出现在《古事记》中但又未强调天皇正统，或者与天皇家历史无直接关联的神话加以改写，这是《日本书纪》与《古事记》之间的另一个主要分别。

相比《古事记》以和汉夹杂的文体书写，《日本书纪》则模仿唐朝官史，采用汉文体来书写，这当然是因为大和朝廷已与唐朝展开多次文化交流，文字和史书编写的技巧都在两书编纂前传入日本。

（2）影响日本人历史观的“记纪神话”

《古事记》与《日本书纪》成书后，是如何影响日本人看待国家形成史、发展史的呢？

两书虽然内容有所不同，但都是王朝官史，地位当然等同于现代的官修历史教科书，因此两书论及的国家诞生传说以及之前的神话故事，在民俗学、人类学上被合称为“记纪神话”。

值得注意的是，两书在之后的地位发展出现颇大差异。按中国风格编纂而成的《日本书纪》一直被珍而重之，历代天皇的教育更有一门必修的“书纪讲义”。不仅是天皇，各家贵族乃至武士也纷纷积极地学习《日本书纪》，认为这是了解自己家族与天皇家关系的历史书，可以说是寻找身份认同的行为。

相反，直到江户时代为止，《古事记》一直没有获得朝廷和武士政权的认可，导致抄本很少，流传普及程度也远逊于《日本书纪》。

不过到了江户时代，当时盛行的国学强调本土意识，所以用和汉文体书写、详细交代神话与天皇关系的《古事记》，被认定是一本比《日本书纪》更纯正、更能体现神国日本和天皇伟大的历史书。而且，在朱子学的名分论思潮下，《古事记》进一步得到民间学者的重视，成为江户时代国学诸多学派争相阅读、钻研、解读、分析的瑰宝。

研究学者中最为有名的，便是受到提倡天皇神圣的近世神道影响，独力研究和注解《古事记》的江户时代大儒家本居宣长。他全力解读《古事记》的成果（虽然当中有不少过度解读的成分），大大地刺激了江户中期以后的知识分子。宣长以后的各派国学学者无不受他影响，更使民间对《古事记》的推崇首次超越了《日本书纪》，为日后的“尊王攘夷”思想提供了基础。

时至今日，在日本全国各大书店里，有各种各样的《古事记》解说书，插图、漫画等形式，应有尽有。相信很多日本人也不知道《古事记》的“光复”背后，其实有着如此曲折的发展史。

4．天皇即位仪式与大尝祭为什么这么神秘？

（1）践祚之仪与即位之礼

平成天皇（现在称为“上皇”）于2016年7月28日宣布让位给皇太子德仁（法制上称为“退位”），新天皇德仁在2019年5月举行了即位典礼。自8世纪的平安时代初期开始，这个仪式被称为“践祚之仪”“即位之礼”，但由于两者是先后接连执行，因此也合称为“即位礼”。这是古代日本参考唐朝皇帝的即位仪式和道教信仰，并配合日本美学综合而成的做法。

“践祚”在古代写成“天つ日继しろしめす”或“天つ日嗣しろしめす”，意思是“继承王统”（日嗣）之意，后来才改用中国古代用语“践祚”。顾名思义，践祚的“践”是承袭，“祚”是天子之位的意思，加起来就是继承皇位之意。

前面提到，天皇的即位礼分成践祚之仪和即位之礼。即位之礼是现任天皇向天下宣布将皇位传给继承人（皇太子或皇太孙）的仪式。与此同时，朝廷会派出敕使到伊势神宫和特定的几个前任天皇的皇陵（当时称为“山陵”），告知皇祖皇宗。即使前任天皇（即太上天皇）已经死去，也会按照习俗把他当成活人来进行传位仪式，将三种神器里的剑、勾玉移交给新天皇后，前任天皇才能入葬。换言之，前任天皇去世不代表他已经完成使命，也不能立即入土为安。他必须将皇位传给皇太子，然后再进入葬礼阶段。

到了新天皇即位当日，皇族与百官会到京都御所内的主殿（自平成天皇起改在东京皇宫的正殿）参加新天皇的践祚之仪。负责传令、主持的宣命使会在众人和新天皇面前宣读“即位宣命”，群臣

百官向新天皇行群拜舞踏之礼，然后齐呼“万岁”。等新天皇宣读登极谕令后，仪式便告完成。

不过明治维新后，《帝国宪法》以及战后的新宪法规定“天皇终身制”，新天皇必须在前任天皇死后立刻“践祚”，继任天皇，以防出现“空位”的情况。因此，大正天皇和昭和天皇的即位之礼都在践祚后进行。换言之，践祚比即位之礼更具重要性。例如，大正天皇在1912年7月继任，但他的“即位之礼”因故推迟到两年半后的1915年才正式举行。

而2019年平成天皇破例在生前让位，情况更加特殊。官方安排前任天皇在4月30日让位，新天皇在5月1日进行践祚之仪和即位之礼。

（2）极秘大尝祭，严禁外人笔录和外传

与践祚之仪、即位之礼有着密不可分关系的，是即位后同年11月举行的“大尝祭”。原本天皇每年11月都会在皇宫内举行“新尝祭”，这是天皇各种祭祀中属于大祭的重要宗教活动（大祭之外，还有小祭等重要性相对较低的祭祀活动）。但是，如果该年有新天皇即位，新尝祭便会改为大尝祭，规模、阵仗也会比例年的新尝祭大很多。而由于大尝祭只会在新天皇即位当年的11月举办，因此在皇室仪礼上会将两者合称为“践祚大尝祭”。

不过，如果当年新天皇的父母、祖父母逝世，而时间是在夏末秋初或11月之前，大尝祭便会等到他们的葬礼和丧期（称为“谅闇”）过后，在第二年的11月进行。

大尝祭的本体新尝祭是天皇每年以新收割的谷物祭祀皇祖皇宗与诸天神的仪式。因此，新尝本义是“新谷之飨”，原本念作

Nihi-no-ae，后来普遍使用汉字读法Shin-joū。而大尝祭本来是大新尝祭，跟新尝祭一样，大尝原本念作Ō-Nihi-no-ahe或Ō-ni-e，后来普遍使用汉字读法Dai-joū。

大尝祭是延续数日的重大祭典，之后还有宴请诸神的大尝节会。例行新尝祭时也会进行“镇魂祭”等活动，各项工作都需要将近一年的准备时间，开支极大。

因此，在皇家式微的中世后期，即室町末至战国时代的1466年，后土御门天皇举行了大尝祭后，大尝祭便被迫停办近220年，直到江户时代的1687年，东山天皇即位时才得以复办，一直延续至今。

传统上，朝廷准备大尝祭时，会有几项工作要先行准备。首先在同年的8月下旬，称为“币帛使”的敕使，会到伊势神宫和其他官定神社进行宣告（现在基于政教分离原则，官定神社已被废止），并在11月的其中一个旧历卯日开始祭典，通常是第二或第三个卯日。

另外，为了进行大尝祭，古代会特意建造临时会场“大尝宫”，作为新天皇祭祀的场所。还有，天皇进行祭祀时所着的祭衣，也会在祭典前做好。

一般来说，天皇会在祭祀时奉上当年指定为祭拜所用的新收谷物，即被称为“天御膳”的新白米饭。而负责提供天御膳的田地则被称为“斋田”。除了谷物，祭典上还有事先准备好的黑、白两种酒酿，以及供神明享用的“神馔”。天皇在祭拜皇祖皇宗和诸神后，便会食用这些酒菜谷物，以示与祖宗和诸神相感应，获得他们的认可和附体。

由于大尝祭是历代天皇的专属典仪，所有相关做法、具体仪式和手续，一律严禁外人笔录和外传。在古代，也只有极少数的高级贵族，如关白、摄政，才能在事前获得相关的纲领要义，但核心环节仍然只由天皇本人去执行。天皇本人如何获得相关知识，如何练习，都属于极秘事项，外界和学者只能通过古代不完整的文献去推敲分析。

时至今日，日本皇室坚决不开放大尝祭，因此，大尝祭可以说是维持天皇和天皇制神秘主义最重要的一环。

5．中世时代的“御灵信仰”与天皇权威的关系为何？

（1）神社的本来功用与御灵信仰

喜欢到日本旅游的朋友，大多会到著名的神社参拜，写绘马、买御守，近年更流行到与历史人物有关的神社求取独特的朱印。由此可见，神社不再只是日本民间信仰的象征建筑，更是外国人到日本旅游时必访的景点，是引导我们了解日本文化的重要媒介。

说到神社，外国人很容易将它联想成华人社会里的庙宇、佛寺，可以为人们消灾解厄。的确，大部分的神社现在已然与华人社会的庙宇、佛寺、道观一样，成了为俗世服务的宗教设施。可是，神社建立的原本目的却刚好相反，主要是为了镇抚、防止神祇作乱而设。这是因为古代的日本人相信，为这些作乱的神祇和怨灵建立神社，能够使它们不再作恶，祛除它们的暴虐。

这种神祇暴虐作乱、遗祸人间的思想源自古代中世的“御灵信仰”。在第九章第5问会提到古代日本人视神祇为既可敬又可怕的存在，所有的乱事、怪事都由神祇为患所致。

到了8世纪初期，人们对神祇的恐惧越发扩大，开始认为不只是神祇，死去的人，特别是愤恨或含冤而死的人，也会化为“死灵”作恶为患。

面对“死灵”“怨灵”，还有神祇作祟为祸，那时候以天皇为中心的日本人想出的应对方法，大致分为两种。第一种，抚慰死灵，祛除它们的怒气，具体方法便是将它们升格为神祇，并且为它

们建设神社，进行恒久祭祀和纪念。著名例子是祭祀怨恨而死的文臣菅原道真（京都市北野天满宫）。

第二种，吸取当时民间的死灵作祟思想，在京都举行盛大的祭祀活动，以镇慰一些特定的死灵，这就是著名的“御灵会”。不过，获选为“御灵”的死灵是与天皇相关又死于非命的人物，如伊予亲王、桓武天皇妃——藤原夫人等，与一般怨灵不同。

御灵会一直受到天皇与朝廷重视。如同下一问将提到，朝廷将它们视为“疫病神”，把当时定期肆虐的疫病、天灾等通通算在它们的头上，然后再举行御灵会镇抚，不断循环。比较著名的例子有，以祭祀疫病神牛头天王而建的京都八坂神社。

（2）御灵信仰与天皇

虽然天皇贵为一国之君、天神子孙，但对于这些死灵、御灵肆虐也十分焦急，而他的命运也无法不受死灵、御灵影响。

前文提到镇抚的思想逐渐普及，更将死灵、御灵与疫病、天灾连成一气，就连天皇身体有恙都被认为是它们肆虐的结果。随着时代的演进，人们对于死灵、御灵作祟的对象，从无特定者变成针对特定个人，而天皇的御体自然最容易受到众灵关注了。

当时的贵族日记里大量出现记录天皇生病与“邪气”“凭灵”的字眼，上流阶层相信生病与死灵、御灵作祟相关，于是招请阴阳师来驱祛，后来改为通过佛教形式的护摩修法和僧侣诵经来驱灵。

由此可见，御灵信仰的普及使更多人相信其存在和威力，就连天皇也会成为驱灵的对象。国王身体有恙在任何国家都是重大事件，在日本，即使后来武士政权崛起，一旦死灵、御灵作祟，使天皇、皇子等患病，当消息传到幕府后，作为“天子臣下之首”，幕

府将军当然不能置之不理。所以各种大型的祈祷修法在各地主要神社、寺院举行，成为上流社会的一大要事。

虽然死灵、御灵引起天皇病痛，对于百姓来说似乎是没有直接影响和关系的，但随着佛教、神道在中世纪以后急速平民化，这些死灵、御灵思想向民间输出，成为庶民信仰的一部分。即使为天皇举办的祈祷修法规模变小，但随着皇族与平民的距离相对拉近，平民对于祈祷修法的认知度与关心度也逐渐提高，增强了他们对这些信仰的崇敬。

顺带一提，到了中世纪（13世纪）以后，天皇的神圣性日益提高，对于如何保护天皇的意识，用现代人的眼光来看，实际到了“神经质”的地步。除了死亡、污秽、疫病、血腥要规避之外，天象异常也被视为怨灵、邪气肆虐或天神示怒的警告。

天皇、贵族，甚至后来的幕府将军，都对日食和月食感到非常紧张。日食出现在日间时，太阳被遮蔽的样子更让众人惊恐。

当时人们认为日食和月食发出的光芒都带有邪气，而身为天照大神子孙的天皇，自然不能被“邪光”侵袭。于是，天皇下令负责天象的天文博士必须准确预测日月食的时间。等到实际发生时，天皇与皇族就足不出户，命令下人用布遮掩寝宫的门窗，直至日食和月食结束，这称为“御包”之仪。

后来，室町幕府将军和德川幕府将军都遵照这个办法，在日月食时，与天皇一样各自在家里“闭关”。这也是以天皇为中心的贵族思想传播到武士社会的另一个特别例子。

6．明治维新破坏了天皇与佛教的关系吗？

（1）天皇信仰什么宗教？

不知道多少读者知道，到明治维新为止，天皇严格来说是佛教徒。最为代表性的体现就是在明治维新前，有关天皇的各种仪礼都以佛教为主、神道为辅。但到了明治维新后，1889年颁布的《大日本帝国宪法》（以下简称《帝国宪法》）里便明确规定，日本是由“万世一系的天皇统治”，天皇是“天照皇太神宫的御子孙”；“从神的时代以来便无比尊贵，每尺之地，每个人民都是天子（天皇）所有”。

换言之，《帝国宪法》站在神道信仰的立场，将天皇定性为“神的子孙”。而明治政府在后来进行“废佛毁释”和“神佛分离”等贬抑佛教的运动，就是为了宣示天皇高于佛教的立场。

虽然排抑佛教的行动最终使得社会产生巨大混乱而被迫终止，但明治时代以后的天皇仍然在官方上称为神道教徒。宫中的各种宗教仪式，包括天皇的葬礼一律改行神道仪式。日本在二战战败投降后，昭和天皇应美国的要求向日本国民公布了《人间宣言》，可是新成立的《和平宪法》主张国民享有平等的宗教自由，却不包括天皇和皇族。也就是说，天皇与皇族没有选择宗教信仰的权利，他们仍然受到战前的国家规定影响，只能信奉神道，自认是神的子孙，而宫中仪礼也继续以神道方式进行。因此，1989年昭和天皇的国葬，便被国内外人士批评：“政教分离”只是表面功夫。

即便如此，日本的保守派和不少国民至今依然认为：天皇家按照国家历史，自然是神道分子，佛教只是外附的元素。那么，天皇与佛教的关系又有多深远的历史呢？

（2）与佛日夜相对的天皇

佛教是在6世纪经朝鲜半岛传入日本的。那时大和朝廷内部出现了“迎佛”和“排佛”两派声音，但最终由“迎佛”派赢得了胜利。不过，日本后来没有再出现神佛间的宗教对抗，主要原因是因为古代人想出了折中方案——神佛习合，它的另一个称呼更有名——本地垂迹。

“本地垂迹”就是在佛教传来之后，当时的日本人为了找到正当理由去接受佛教，以及减少对传统神祇信仰的冲击，于是形成了一种主张——佛教神祇与本地神祇互为一体，两者只是在不同地方有不同称呼。例如，当时的人认为天皇之祖天照大神其实就是佛教的大日如来。自此在日本国内，佛与神道难分你我。佛教得到了“本地垂迹”这个方便之门后，开始融入各阶层，甚至进入天皇心扉。

公元9世纪正值日本历史上、也是天皇历史上最辉煌的“圣代盛世”——宇多天皇至村上天皇的四代天皇，与当时崛起的藤原北家一起将日本带进社会最稳定、文化最昌盛的时代，史称“延喜·天历之治”。

那时候的皇族祭祀和仪礼是佛神并存的，祭祀天照大神的新尝祭，以及向京都主要神社颁赐拜祭贡品（称为币帛）自然是以神道形式进行。另一方面，天皇也会进行各种佛法仪式，如每逢正月举行“护国法会”“太元帅法”等。这些法事大多与护持国家有关，祈求佛祖神明使国家安泰长久。

上述的“太元帅法”便是由天皇主持的法会，祝愿国家不受外敌入侵，将敌人铲除荡平。自9世纪以来，一直只有天皇才可以主持。到了后来的战国时代，即使天皇变得穷困潦倒，天皇与朝廷不

惜缩减规模，也仍坚持进行太元帅法，直至明治维新为止。可见天皇仍然通过佛教法会来显示自己代表国家，是祈求神佛护国抗敌的不二人选，并且以此为己任和使命。因此自中世纪以来，日本上流社会的贵族和寺院都认同“护佛等于护王，护王等于护国”。文献中常常有“王法与佛法为国家两翼”之类的字句，能反映当时的日本统治阶层已经将信佛与统治连成一线。这个信念一直影响到后来崛起的武士政权。到了江户时代，佛教更是协助幕府管理百姓生活的重要支柱。

总而言之，历代天皇对佛教与神道都十分重视。两者的关系和重要性虽然难以一言而明，但是严格来说，神道的仪式主要是与天皇家、祖先祭祀有关，而佛教法事则针对国家层面。

除了大行佛教外，还有两个能证明天皇将佛教与国事相连的例子。第一个明证就是出家。在天皇史上，天皇让位给皇太子后，会成为太上天皇，而选择出家的太上天皇就成为“法皇”，这样的例子十分多。当太上天皇决定出家，便招请佛教高僧来为自己进行“传法灌顶”，传授秘印和真言，之后正式成为佛家弟子。

13世纪，天皇即位时也加入“传法灌顶”的环节。一开始也是由高僧执行这些仪式，自13世纪末后，改由当时的关白向新天皇传授。而到了14世纪，正式成为惯例，在每代天皇即位礼时实行“即位灌顶”。这些口传秘法一律不可记录，只有极少数关系人物才会知道做法。

第二个明证，在京都的皇宫里有“护持僧”常驻，负责为天皇和上皇的身体康泰祈福。这些护持僧主要由著名的佛教名刹比叡山延历寺、东寺和园城寺各派出一人，到宫中共同保护天皇，令其不受邪灵、污秽侵袭。

在这种神秘主义影响下，天皇获神佛保护，自己也成为神佛的化身，并且通过贵族和寺院，逐渐向民众传达“天皇即神”的思想。

7. 为什么天皇极力排斥基督教?

(1)传教士眼中的天皇

1549年，基督教派耶稣会创立者之一的沙勿略到日本传教。当时他通过各种渠道收集了日本的情报，还从在吕宋（现在的菲律宾）遇到的日本人弥次郎口中，探听并整理出日本的政治架构。最后，他在出发前向印度总督提交了报告书，当中提到天皇与室町幕府将军的关系。

他们的国王（天皇）拥有他们当中最有力的血统。拥有这个血统的人（王族）不会跟其他血统的人结婚。他们的国王从我们的角度来说，就好像教皇般的存在，统率俗人与国家内所有的宗教者，并且对所有事都拥有绝对权限。但是，并不是所有事情都由国王来下令决断，而是由他们日本人称为“御所”（将军）的人代理。“御所”便是如我们的“皇帝”一样的存在，对日本全土拥有命令权和支配权，但又会服从国王。

这个根据弥次郎的理解整理而成的情报，当然存在很多误解，毕竟弥次郎不过是出身鹿儿岛的平民百姓，不可能准确地理解远在京都的天皇与将军的事。然而对于沙勿略来说，这份口述是当时最可信的情报，因此他在同年便出发到鹿儿岛，但只在当地短暂停留，因为他被当地僧侣驱赶，转往周防国山口（今天的山口县山口市）。

两年后的1551年初，沙勿略到达京都，也就是弥次郎口中的“王”的所在地——这个仍然受战火洗礼的地方。他很快便知道天皇在这个都城里没有强大的影响力。他在报告中说道：“后来我们

得知这里的人们都不服从国王，所以我们放弃了请求他批准我们传教的事。”

同年底，沙勿略便决定离开日本，回到印度，结束了短暂的传教之旅。他对日本天皇的理解并不是个人的偏见，后来仿效他来到日本的传教士佛洛依斯也有类似观察。佛洛依斯到京都后观察了天皇所在的皇宫，然后在报告中写：“（国王）隐居在一个既不华丽也没有威仪的古旧宫殿之中。”

从沙勿略和佛洛依斯的所见所闻，我们可以理解他们对天皇的印象不会太正面和良好，因此，后来的传教士都改向“御所”，也就是将军，还有当时的权力者，如三好长庆、织田信长求助，希望他们批准传教。那么天皇又如何看待这群从大洋彼岸而来的外国人呢？

（2）天皇如何看待基督教

沙勿略和佛洛依斯来到日本时，正值著名的战国时代。那时的天皇十分潦倒，在位的后奈良天皇和正亲町天皇的苦难仍没有解除，身处京都皇宫内，只能勉强维持日常生活。但天皇还是通过贵族通报，留意到传教士来到京都这件事。

继承沙勿略遗志的佛洛依斯，改向当时的将军足利义辉和强大的诸侯三好长庆求得了传教许可。然而到了1565年夏天，三好长庆死去后，他的家臣们因为政见问题，突袭并杀害了将军义辉，京都内出现群龙无首的状态。就在这个时候，一直不满传教士传教的法华宗僧侣和信奉法华宗的贵族，成功请求天皇下旨将佛洛依斯在内的传教士驱逐出京。

为什么他们要驱赶传教士出京呢？对于前所未见的传教士进行宗教活动，而且在幕府的保护下取得了一定成果，这让当时佛教中的激进派——视京都为自己地盘的法华宗教徒——看不下去。新将军足利义昭（义辉弟弟）和织田信长上京接掌京都的统治权时，天皇再次应僧侣之请，下旨驱赶受幕府保护的传教士出京。信长虽然没有遵从，但也没有轻视天皇的旨意。

不过，当时的贵族也不尽然是反传教士的人，甚至有阴阳师出身的贵族贺茂氏，以及专修儒学的贵族清原氏 先后入教（研究显示他们追求传教士的知识多于教义，但起码对基督教没有恶意）。所以，攻击、排挤传教士的贵族只是其中一部分，天皇不过是做了顺水人情，不见得是“排耶分子”。

即便如此，排除行动还是以天皇以及神国的名义，在统一天下的丰臣政权下落实了。秀吉在1587年发布的“驱逐令”中提到：

日本乃神国也，接受基督教国的邪法，甚为不可也。

秀吉提到的“神国”日本，自然是以天皇身为天照大神子孙来体现的。也就是说，秀吉否定了基督教义中唯一神的存在，坚决不认同基督教的神凌驾日本的神，以及神的化身——天皇。这个主张延续到取代丰臣政权而立的德川幕府。

严格说来真正的当事者天皇，有没有发表过对基督教的看法呢？接下来听听江户时代初期的后水尾上皇，以及江户时代末期的孝明天皇的说法。后水尾上皇在1668年出家时，向当时在位的儿子后光明天皇提到：

有信心（ 对神佛的信仰心） 的人，不可以邪路为志，凡事皆守正路为要。

上皇在这里说的“邪路”便是指神佛以外的其他信仰，自然包括了基督教。上皇认为天皇笃信神佛才是正路，信仰基督教是坚决不可的行为。孝明天皇的言论则更为直接，他在1858年奉献给伊势神宫的宣命中说：

蛮夷屡来……深请与我和亲（建交），后有并吞之兆，又邪教传染亦可恐矣。

孝明天皇以坚持排外攘夷著称，他对西方的宗教怀有恐惧，当然是不难理解的。但我们从其发言可知，天皇以及他身边的人士都视基督教为“邪教”，视其为欧美诸国吞并日本的武器。这种认识虽然多少受到江户时代以来的排耶、禁教意识影响，但自基督教传到日本以后，天皇对其观感大抵不算很正面，视其为影响国家的负面存在。

天皇对基督教的态度既来源于宗教的排他性，也源于其作为一国之君保护国家与传统的使命感。

第六章　天皇的思想

1．两种“天皇”的读音各有什么含义？

（1）“天皇”称号的由来与读音

我们一般都称呼日本的国家元首为“天皇”（Tennō），英文的表记是Emperor。1889年，明治政府颁布《帝国宪法》和《皇室典范》，“天皇”这个称呼正式确立“日本国国王＝日本国元首”。

当然在日本历史上，“天皇”的称呼早有记载，大抵可追溯到公元7世纪。但是官方使用“天皇”一词的习惯也不过才维持了200多年。公元10—19世纪中叶的800多年间，除了一些外交或特别宗教仪式外，“天皇”一词几乎没有出现在官方文书上。

神武天皇以降的近30代天皇，其存在与权力都存在疑问，其事迹都根据《日本书纪》及《古事记》这两本书而来，“天皇”的称谓也是从那时才有的。以前的“天皇”实际上称为“王”或者“大王”（ōkimi），《三国志·魏志·倭人传》中便有“亲魏倭王”的记载。

关于“天皇”的古代读音，除了相关学者，很少有人知道。我们熟悉的“天皇”（Tennō）读音是到了明治维新以后才确定的。在古代日本，“天皇”的读音是Sumera-Mikoto（すめらみこと），意思是“神圣无秽之贵人”。为了让这个称谓通用于当时以汉语为核心的东亚世界，便发展出“天皇”这个意译。所以，“天皇”本是属于对外使用的称呼。

当时日本与隋唐建交，一改三国时代称臣受封的习惯，把国名由“倭”改为“日本”，向隋朝政府自称“日出处天子”，称隋朝皇帝为“日没（落）处天子”，反映日本当时已有与隋唐平起平坐的意识。

那么，为什么会译作“天皇”呢？目前存在不少说法，但一般认为是受到唐朝传来的道教思想影响，将道教中最高地位的“天王”加以应用，配合日本既有的“大王”的观念，再改为“天皇”。在前述的《日本书纪》中，便清一色将所有在书中出现的国王都称为“天皇”。

（2）天皇的谥号和追号

日本在7世纪引入中国典章制度后，也将谥号以及年号等文化元素引入。但毕竟是外来之物，因此日本朝廷使用中国风的谥号也与中国不尽相同。

例如，为历代天皇翻译中国风的两字谥号（如神武、推古），但也保留了和风谥号，例如天智天皇的和风谥号是“天命开别”，他的弟弟天武天皇的和风谥号则是“天渟中原瀛真人”。这些名称有的只是将天皇的真名当作谥号，有些则真的是追悼其功德的谥号。由此可知，日本可以说是“和风为体，华学为用”。

随着日本因朝鲜半岛问题与唐朝闹翻，以及后来唐朝衰落，日本开始积极推动“国风化”——将从隋唐两代学到的东西加以转化，成为更切实的和风制度。同时，日本的政治也走向了与外戚藤原氏共治的摄关政治时代，天皇王权不再唯我独尊，开始了生前让位，即“院政”的制度。

在这些内外因素的影响下，天皇的谥号与中国越来越不同，尤其原本谥号是带有敬仰含义的两个汉字，后来则多以天皇的住处所在地，或者皇陵所在地的地名作为谥号，如“清和天皇”“龟山天皇”等，这种“以地为号”的称号，一般称为“追号”。而随着让位制度成立，同时又有两三位天皇存在，他们之间的称谓更要分清楚，也等不到去世后再追封，因此当时的天皇在生前就定好追号，显得顺理成章。

（3）另类的天皇称号

同样受到上述因素影响，天皇称号的重要性相对下降。自公元10世纪开始，也就是追号取代谥号的前后时期，日本朝廷已较少使用“天皇”来指称他们的国王，而改为“帝”“御门”“内里”。但考虑到让位天皇，当时除了先定追号外，在位的天皇则被称为“今上”“上样”“帝”；退位的天皇除了被称为“上皇”外，也会被称为“院”，因而有“院政”之称。

由于中古世纪的天皇除了任内驾崩外，大多都会实施院政，掌握实际的权力，因此在史书表记上，大多称天皇为“×× 院”，而天皇的治世时期会称为“御宇”。

顺带一提，历代天皇中有数十位的追号、谥号前加上了“后”字，如后醍醐天皇、后阳成天皇。这些天皇大多是因为追慕祖先之荣誉和功绩，生前便自定追号，作为自身政治信念的象征。另外，中世纪有几位天皇因为政变、兵乱而死于非命，基于当时的思想，认为死于非命的人会化为怨灵厉鬼，于是这些天皇都获追封中国风的谥号，并一定有“德”字，如崇德天皇、安德天皇等，以此镇封、抚慰他们。

到了中世纪时期，天皇在称号方面越来越有个人色彩，也越来越有本土意识。反之，国家层次的规范则越发宽松。此时天皇的大权旁落，除了管治京都一带，以及作为贵族的主君、国家的象征“天孙”“现人神”外，已不具备统治国家的实权。

但中国风谥号在幕末第119代光格天皇时突然回归，这有两个原因：一方面光格天皇本来是从旁系过继才成为天皇的（详看上部的天皇世系图），他为了增强自己的权威和神圣性，于是大行复古之制，包括将自己的谥号称法回归仿唐风格。

另一个原因是光格天皇在位时正值动荡不安的幕末时期，西方国家大举进出东亚，尊王攘夷的思潮在国内知识阶层蔓延。苦于应对的江户幕府也借助天皇的权威作为挡箭牌，要求天皇恢复中国风谥号，顺应潮流，借此表明幕府“尊王”的态度，缓解来自尊王派的政治压力。

明治维新后，天皇的称号与元号——他们的治世代号——合而为一。换言之，自明治天皇起，天皇丧失了通过追号、谥号来表明自己意志的权利。但从另一方面来说，又因为称号与元号结合，与国家纪年一体化，让国民更容易记得天皇的元号，这也提高了天皇的存在感和权威。

2．天皇如何导入和实行元号制？

（1）元号与年号之别

现任天皇德仁于2019年5月1日即位，自此，日本也迎来了新的纪年元号“令和”，取代使用长达31年的“平成”。顺带一提，平成元号的使用时间在日本历史上居第四位。使用时间最长的元号是平成前的“昭和”，维持了64年。第二长的是近代的“明治”，使用了45年。平成、昭和和明治皆属于后文将提到的“一世一元”，即天皇终身只使用一个元号。换言之，近现代的元号使用年限，与天皇的寿命紧紧联系在一起。明治以前的元号则没有这个原则，这方面下文再述。

自从平成天皇宣布让位后，日本国内便开始猜想新元号会是什么。而事隔31年再次迎来更改元号的时机，也出现了一个问题：元号与年号的分别是什么？

日本人有这个疑问，是因为有些书用的是年号，另一些则用元号，因此，他们好奇两者之间的分别。大多数学者认为两者是一样的，有些专家则对元号与年号的分别有不同见解。总的来说，按照日本最有公信力的辞典《广辞苑》解释，现在日本的元号与年号都是“指称年代的称号”。

现行日本宪法里的“元号法”（1979年订立）也是依照这个原则，将天皇更替时的两字汉字纪年称呼（如明治、平成）统称为元号。所以，按照习惯来说，年号是元号的别称，两者基本同义，本文也依此原则统称为元号。

（2）古代元号的制定方法

大家参考本书的年号表，便可以发现日本自7世纪创造“大化”年号后，元号的使用便一直沿袭到现在。明治维新时，政府宣布一位天皇一辈子只能使用一个元号，即所谓的一世一元制。其实江户时代晚期便有儒者主张一世一元，而中国在明朝开国皇帝明太祖时就已经这么做了，清朝也是如此。

而日本在明治天皇以前，几乎历代天皇都拥有多个元号。但是按照以上原则，天皇死后的谥号将以元号来命名，这与古代元号、谥号分开的习惯完全不同。

从前天皇谥号的命名方法繁多，而且没有既定原则，有些按天皇陵寝所在地或居住地；有些按中国古代的谥号方式，也就是德行表现；更有些谥号是天皇本人生前决定好的（如后醍醐天皇）。由此可见，一世一元制后，不仅是元号，连天皇谥号也迎来了根本性的变化。

古代天皇更改元号有四个因素：

一是天皇因故换人，称为“代始改元”。

二是国家出现喜祥之事，称为“祥瑞改元”。

三是国家出现不吉凶事，称为“灾异改元”。

四是按照历法规定改元，称为“革年改元”。

在四大因素影响下，我们不难想象频繁更改元号是十分正常的事情。顺带一提，前三个因素都难以预测，最后的革年改元却有迹可循。所谓的革年改元，就是按照历法，每逢“辛酉”与“甲子”之年便要改元，以顺应自然变化（但也有不改元的例子）。

在古代，每当需要改元的时候，熟悉中国典籍的贵族（文章博士）会从典籍中找出寓意吉祥的字句，再取出几个组成两个汉字的元号备案，供天皇和高级贵族商议，再以天皇名义选取采用。元号在早期曾出现过四个字的，如“天平胜宝”“神护景云”，但大多是两个字的。

前文提到，元号最终由天皇决定。可是到了幕府政权和战国时代，元号大多受到幕府意向影响，甚至会因幕府或当时的权力者要求而随时改元。

另外，在战乱多变的室町时代末期至战国时代，关东地区曾短暂出现过一批不经朝廷批核的私制元号，反映当时王权与朝廷影响力的衰弱。

而元号改定后，要如何通达全国呢？在政治稳定时，自然通过朝廷或幕府来传达，而在战乱时则只能靠个别人士到地方时传达，再间接地分传出去。因此，在战国时代曾出现元号不详或沿用旧元号的情况。

（3）现代元号的制定方法

到了现代，天皇不再是万民膜拜的“现御神”，元号也自然要依循宪法规定。按照“元号法”规定，元号产生流程如下：

① 由政府委托指定的学者提出几个候选元号，原则上以两个汉字组成。

② 经过内阁官方长官考虑后，再由首相从中划定数个最终候选元号。

③ 最终候选元号会交由各界专家代表开会讨论，再提出意见。

④ 专家代表的意见呈交参众两院的正副议长考虑，并提出意见。

⑤ 政府各部署的长官开会后，再提交内阁决定。

⑥ 新天皇在内阁最终决定案上签名。

⑦ 政府正式颁布新元号。

2019年的新元号也是按照以上程序和原则来制定的。天皇不再定义自己的时代，他在整个甄选程序中没有任何决定权，只能等待专家小组、参众两院的正副议长，以及内阁成员决定。他在签字时才能正式得知自己的“任期代号”。换句话说，天皇与元号只剩下形式上的关系了。

3．历法制定与天皇有什么关系？

（1）日本古代历法的源流

日本早已改用世界通用的格雷历，与各国同步，也兼用来自古代中国太阴历的“二十四节气”，如“春分”“夏至”“冬至”等。虽然二十四节气只会写在日本的年历上，或在天气预报节目中偶然提到，但是日本引入太阴历和二十四节气作为历法，已有近1000年历史。

日本是如何引入太阴历，又是如何改用西方历法的呢？

其实，日本从中国引入太阴历和二十四节气的同时，也引入了中国儒家“天子控制时间”的观念，以及“天子受命于天”的天命思想。天子作为感应天地的代表，需要适时反映天地时空的改变、异动，以免错过上天的启示和警告。因此，除了制定历法外，天子也要因时制宜改订历法（改历）。

在古代中国和受到中国历法观影响的国家，维持历法的准确性是天子或国王的重要职责。古代中国每次改朝换代，也大多会修正历法，以示政权正统。那么，自引入中国历法以来便没有更替政权的日本，又是怎样的呢？

（2）古历法的应用与问题

回顾历史，日本先后三次引入中国王朝的历法，即仪凤历（唐高宗时代的麟德历）、大衍历和宣明历，三者都属于唐朝所用的历法。前两者是通过遣唐使获得的，宣明历则是通过朝鲜半岛北端的渤海国引入的。自此，日本便以宣明历为基础，并利用从唐朝习得

的天文历法技术，多次改订历法，直至明治维新改行西方历法为止。

还有一点值得留意，就是日本在689年引入仪凤历时，维持历法准确度的观念，中国历法中的进朔、置闰法都还没有引入。而是到公元8世纪日本改用大衍历时才全面引入。

由于历法必须时常按天体变动而改订，这需要一个稳定的政府指派负责的专业人员（如天文博士或阴阳师）来进行观察和追踪。然而，日本固定使用宣明历300年后的11世纪，王朝统治力低下、内乱频生的武士时代开始，历法的改订也变得不稳定，时有错误出现。

因此，在15世纪，京都以外的地方出现了由地方自行改订的地方历法，并且成为局部地区通用的历法。理论上来讲，这大大伤害了天皇的权威，然而当时朝廷更担心错误的历法会贻误察觉不祥的天机（如流星、日月食），导致影响天皇和周边的人，进而影响国运。

有一个例子，织田信长在1573—1582年控制京都期间，曾三次发现当时使用的改版宣明历不够准确，致使多次未能预测日食。当时人们相信日食时的阳光带有邪气，会伤害神圣的天皇、将军以及贵族。因此，信长便下令京都的阴阳师必须改订历法，而且询问引入地方历法的可能性。然而，随着信长于1582年被暗杀，这个问题最后不了了之。

（3）明治改历的秘密

江户时代，日本进行了四次历法大改订，按顺序分别是贞享历（1685年）、宝历历（1755年）、宽政历（1798年）和天保历

（1844年）。明治维新前，最后使用的是天保历。那时中国清王朝的历法（时宪历）与江户时期日本使用的历法已然不同。

而且，江户时代的历法完全是由幕府属下的“天文方”（类似现在的气象局）来制定。从这个角度而言，天皇控制时空、与天地进行感应的理念已经名存实亡。幕府将军完美地利用统治权受命于天皇的大义名分，代替天皇与朝廷改行历法，再颁布全国。这个尴尬的局面要到明治维新、幕府倒台后才得以拨乱反正。

1873年，成立已有六年的明治政府突然决定实行历法改正，全面改用当时西方诸国广泛使用的格雷历。改历与新政府实施新制度当然也有关系，但最重要的原因是要通过改历，解决政府面临的财政危机。

旧历法存在闰月，一年有13个月，而明治维新将工资发放方式由年俸改为月俸，这意味着政府要发放13个月的工资给公务员。多一个月的工资，对于当时百废待兴的日本政府来说，无疑是巨大的财政压力。但政府出于方便而做出的改变，自然引起了一阵混乱。政府改历和改变工资计算方式后，变相夺去了平民一个月工资，使看来文明进步的改革，变成了损民的政策。

4．蒙古入侵时发生的“神风”如何反映天皇的神圣性？

（1）千古传颂的神风传说

公元13世纪初，成吉思汗与他的子孙建立起横跨欧亚大陆的蒙古国。忽必烈承袭汗位后，接连灭南宋，建立元朝，又在征服朝鲜半岛的高丽王国后，派使者向日本招降，日本镰仓幕府以日本为“神国皇土，不降蛮族”为由拒绝投降。

于是，忽必烈集结了元、高丽联军，在1274年和1281年袭击日本。这在日本史上被称为“元寇”“蒙古袭来”或“文永·弘安之役”。

传说在两场战役里，曾经吹起“神风”，使排山倒海而来的元军溃败而逃。这个传说更在600年后的第二次世界大战时，被已露败迹的日军利用，设立了自杀袭击的“神风特攻队”。

事实上，抗元战役结束后，“神风”传说便在京都贵族和宗教界传开，到江户时代更渗透民间，所以“神风”绝非到了近代才突然出现。

不过，真正将这个“信念”大肆宣扬，并强制植入日本人心里的契机有两个：其一，1904—1905年日俄战争前后，日本国内吹起了“神风”热潮，将对手沙皇俄国比作当年的蒙古国；其二，1934年，由军部主导改订的教科书，强调当年“神风”吹起，是因为“神国所然”，是天神的“御稜威”所致。当时正值东亚地区爆发战争前夕，军部改订并推出富有国粹主义的内容，目的和企图不言自明。

（2）“神风”与天皇的天职

日本战败之后，“神风”这个敏感的历史名词已经远离教科书，成为一个历史学、民俗学和宗教学的课题。那么“神风”是否真的发生过呢？目前史学界配合天文科学的研究推断，当时发生过暴风雨，但这是否为元军败退的主因，则仍然存在争议。

而这个有名的故事又与天皇有什么关系呢？其实在弘安之役（1281年）时，当时开设院政的龟山上皇借着在位的后宇多天皇的名义，向伊势神宫奉上了祈愿文，文中提到，“于朕治世之时，出现如此乱事，如要日本受害的话，请拿朕的命来代替吧”。

除了伊势神宫外，上皇和朝廷也以当时在位的后宇多天皇的名义，向祭祀历代天皇和诸神祇的各大神社下令，要求他们一起做法祈愿，“降伏异寇”。上皇以真正国王的身份代国家向神明请命，甚至愿意以牺牲自己来代替，这成为明治政府用来鼓吹天皇守护国家的案例，同时配合后来的“神风”，使人联想到召唤“神风”的是天神，而促使天神出力相助的人就是身为“天神御孙”的天皇。

再具体一点来说，日本之所以能够力拒外敌，免受侵袭，根本原因就是天皇的存在——天皇是天神的子孙，于是天皇统治的国家便是“神国”。因此当天皇向天神求助时，“神风”便是神的应许。这也是为什么其他国家被蒙古国灭亡，而只有日本幸免的唯一原因。

另外值得留意的是，向神明求助的名义与实际的主体问题。上文提到龟山上皇和朝廷是以当时在位的后宇多天皇的名义要求神社祈愿，但事实上祈愿的真正发起人和祈愿者是龟山上皇。既然如此，为什么他不以自己的名义向神明祈愿呢？

这说明即使实际当权的是上皇，不是天皇本人，但只有天皇在名义上、制度上拥有与神明、皇祖交流的权利。天皇这个天职不会被夺走，完全栖宿在天皇的身体里。不过，当天皇成为上皇后，天职便会离他而去，转移至新的天皇。只能由拥有天照大神血脉的人来执行天职，其他家族的人是办不到的，这反映出中世纪的日本上流社会是如何理解天皇的神圣性和绝对性的。

5．幕末的修陵热潮、尊王攘夷与明治维新的关系为何？

（1）现代天皇祭祖活动的争议

据宫内厅的统计数字，目前共有740座墓园获认定为天皇陵墓，包括古坟时代的大王坟等，分布在一都二府三十县。如果连同分骨所、火葬地、骨灰冢和疑似皇陵，总数将达892处。

这些历代天皇的陵墓现在按照《文化财保护法》，全由宫内厅管理。宫内厅派遣职员管理其中的400多处陵墓，每年的维持费和工资大约是4亿日元。虽然战后的天皇基于尊重新宪法的精神，拜祭先祖陵墓全属私人性质，但费用却多半出自纳税人。

原则上，现代仍然保留的祭祖活动只限天皇与他的直系皇室成员参加。除了到陵墓参拜祭祀，东京皇居仍设有称为“三殿”的贤所、皇灵殿和神殿，让天皇在宫里进行拜祭。基于战后《和平宪法》强调“政教分离”，战前法定的《皇室祭祀令》被取消，纪念传说中的日本诞生日“纪元节祭”因而被废止，但它在1966年以“国家建立日”之名重新被设立为法定的公众假期。

而纪念每代天皇诞辰的“天长节”也被淡化为“天皇诞生日”，只作为公众假期，没有任何官方的庆祝活动。换言之，现时天长节与纪元节祭都只是宫中的祭祀，与国民的关联性则暧昧不明。

上述几百处皇陵大多由宫内厅管理，不许国民参观和研究。也就是说，这些皇陵是不是真的埋葬了古代天皇，只有宫内厅才有判断权，纵使外界诸多怀疑，也无从下手去解惑。因此在日本国内，

一直有不少学者和质疑天皇制存续必要的人士，批评宫内厅大搞神秘主义，继续神化天皇。但也有保守派认为这么做合乎国家利益，是维护国体的妥善处理之法。

（2）祭祖修陵与尊攘思想

接下来要说一个更吊诡的事实。上述几百处陵墓，其实是在明治维新后才获得官方认证的，这不过是150年前的事。更有趣的是，在皇家制度里，除了照例拜祭供奉皇祖天照大神的伊势神宫外，天皇家并不存在祭祀先皇的习惯。即使是传说中的初代天皇神武天皇陵寝（即现时的橿原神宫），也是在幕末时期才获得确认，朝廷和幕府下令修葺，史称“文久修陵”（1862年）。在这之前，历代朝廷可以说根本不关心也不在乎神武天皇陵寝。

“文久修陵”的背景与当时欧美国家强烈要求日本开国，从而引发国家有识之士的不安有关。当时的发起人宇都宫藩主兼幕臣户田忠恕，希望借修复神武天皇陵来团结人心，集结力量，一致对外，获得幕府与当时在位的孝明天皇认可。话虽如此，不论是发起人户田忠恕，还是幕府与朝廷，均没有确实证据证明现在的橿原神宫就是神武天皇陵，因为历来没有拜祭神武天皇的定例。坦白说，“文久修陵”只是基于国家危机，以及当时盛行的尊王攘夷思想，突然发起的政治行动。

即便如此，自“文久修陵”起，由政府主导的各大天皇陵的修葺工程陆续展开，从较著名、象征国家光荣又有文献可依（但不代表可信）的陵墓开始（如天武天皇陵、神功皇后陵和持统天皇陵等），扩展到古坟时代的大王古坟。

幕末至明治时代的修陵活动其实是展现尊王攘夷的一个行动，而且持续了数十年。此外，除了修陵，国家祭祀仪式也随之展开。

1870年，“圣忌御祭典”“御追祭定则”等法规先后形成，经过30多年反复讨论修改后，明治政府终于在1908年9月制定了上述的《皇室祭祀令》，规定每年必须举行的国家祭祀的日子，这也直接影响到国民生活。同时，这些被认证的皇陵，一律被神化为“圣迹”，获得格外保护和尊崇，成为当时“祭政一致”的具体体现。

天皇以国家之主、皇祖子孙的身份拜祭诸先帝，使大多数在国民心中不值一提的历代天皇获得极大重视，配合以《古事记》和《日本书纪》为基础的国史教育，这些皇陵成为日本国民学习国史时的“实物教材”和信仰象征。

自明治时代以后，这些突然身价十倍的皇陵在强化国民意识形态上，有着重大的教育意义。但进入21世纪，皇陵再次远离百姓的生活和视线，成为一座座只可远观但不知究竟的山丘。

6. “神国思想”如何发展成后来的“靖国思想”？

（1）什么是“神国思想”

我们一谈到日本的历史，很难不想到“神国思想”，也不能不考虑它与天皇的关系。撇开过往的历史问题和国仇家恨，冷静去了解所谓的“神国”，意思就是“获神明加护保佑之国”。“神国”一词最早出现在《日本书纪》里，里面曾借朝鲜半岛的新罗国王之口，说了以下一句名言：

吾闻东有神国，谓之日本，亦有圣王，谓之天皇。

《日本书纪》是奈良时代朝廷宣传国家源起的一本书，内容自然有夸张的部分，不可轻信。不过，上述新罗国王的一席话不论真假，充分反映“神国思想”已在奈良时代日本贵族的精神里扎根了。自此在日本的各种文献里都能看到“我国乃神国”的字句。而随着佛教在日本弘扬，当时日本上流社会和佛教界也认为日本是佛教世界里的“小国”“粟边散土”，这样的思想与同时间形成的“神国”思想并存。

而日本自从接受佛教后，对佛教进行了本土化，形成了互为表里的“神佛习合”思想。因此奈良时代以后的“神国思想”里所指的“神”，当然包括了佛教里的神明，如大日如来等。

更重要的是，佛教进一步成为日本的重要宗教后，天皇也成了佛教的代表。换言之，天皇既是天照大神的神孙，也是佛教的圣王，因此奉天皇为最高存在的日本，理所当然会得到特别的“呵护”。当时的人进一步相信，这个“特别待遇”使日本变得与众不

同。另一本与《日本书纪》一样是古代日本重要历史书的《续日本纪》提到：

大日本神国也，天祖（ 天照大神）始弘基，日神（ 太阳神）长传此统，唯我国有此事矣，异朝（ 他国）无其类也，故此谓之神国也。

引文显示，中世纪初期的日本上流社会不单以“神国思想”作为身份认同的象征，更是将国土推向神圣化的重要根据，当时的上流社会不遗余力去神化天皇，即所谓的“神格化”——天皇是现御神（或“现人神”）的思想。“现御神”就是指天皇是化为人形的神，作为天神的子孙留在凡间，并且统治“神国”日本。

（2）从“神国思想”到“靖国思想”

“神国思想”随着历史发展，一步一步将日本和天皇也一并神圣化、神格化，催生出日本人对自身国家的优越感，同时也衍生出对他国的鄙视。尤其到了江户时代，与外国的交流减少，以及朱子学的引入，神国思想进一步与儒家的华夷之别产生“化学反应”，尊崇日本本土思想文化的“国学”“国粹”思想急速抬头，强调日本的“神圣”，而天皇的尊贵成为他们肯定自我、赞美国家的重要元素。在这种热烈的情结中，江户时代的知识分子对外来文化和文明出现了又爱又恨、既好奇又鄙视的态度。

到了19世纪50年代，美国海军准将马修·佩里来到日本要求开国，事件发生后，“尊王”“排外”“攘夷”的呼声不绝于耳，也是推倒千年武士政治的重要力量。不过，在明治维新后，这种神化国家、排外攘夷的思想逐渐消融，但不变的是崇拜天皇。当坚信“万世一系”的思想配合从西方引入的“君权神授论”，又从政治神学层面加强了天皇的绝对权威和神圣性。

随着日本开国，走向现代化，西方思想陆续进入明治、大正时代的日本社会，对当时的日本政府来说，正在萌芽的民主主义、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等左翼思想，开始对他们的寡头统治构成威胁，也打击了他们利用天皇神圣权威来掌控统治权的正当性。于是，1889年发布《大日本帝国宪法》后到大正时代，保守派势力与政府开始在思想层面塑造对抗左翼思想的“国粹主义”和“国家主义”。在这时发挥作用的便是承自江户时代的尊王、神国思想，两者在明治时代后期急速膨胀成为“国家神道”。

这种保守、独善思想持续成长的契机，来自19世纪90年代以后一连串 的对外战争，以及帝国主义的抬头。由于对清朝、沙俄帝国的战事节节胜利，日本国民对国家有着空前的自豪感，明治政府利用并转化这样的自豪，鼓励国民为国家卖命、奉献。明治后期、大正至昭和时代的日本政府，继续利用天皇的神圣性作为号召，并在这个前提下，以靖国神社为工具，鼓吹为国家、为“万世一系”的天皇牺牲是一种美德，死后将以护国英灵之尊，在靖国神社里接受供奉和国民敬仰。

结果日本在二战战败，以神国思想为核心的“国家神道”和“天皇＝神”的意识都逐渐消融，天皇也出于政治考虑，选择与神国思想、靖国神社分道扬镳。然而，坚信神国思想的强硬保守分子仍然将靖国神社视为精神支柱，这样的势力在现今日本政经界仍然保持隐约的影响力。

7. “日之丸”、《君之代》与天皇有什么关系？

（1）日本的国旗和国歌

日本的国旗是“日之丸”旗（正式名称是“日章旗”），而国歌则是《君之代》。不过，日本当局应执政自民党党员的提议，急欲加强国民教育，强化国民对国家的认同感，决定订立《国旗及国歌法》，确立两者的地位。

此举被民权人士和部分反对派批评违反了宪法赋予和保障的思想自由，但在执政自民党的推动下，国会在1999年8月通过此法案。

“日之丸”与《君之代》作为政府承认的国家象征纹章和歌曲，前后不过20年的历史。虽然认定的时间尚短，但两者是如何产生的？又与天皇有什么关系呢？

（2）“日之丸”与《君之代》的由来

首先是“日之丸”。这个象征太阳高升在天的纹样，早见于各种历史资料，但一开始的纹样并非“白底红圆”，而是有不同的颜色配搭，代表太阳的“日之丸”，其大小形状也与现时国旗不尽相同。

天皇使用类似“日之丸”纹样的最早记录，出现在公元701年的朝贺之礼，此后以不同样貌出现在美术作品之中。最早出现与现在“白底红圆”相似的纹样，是在11世纪源、平两大武士家族争霸时期（史称“治承·寿永之乱”）的军用品上。而作为旗帜纹章使

用的最早记录，则出现在14世纪的南北朝时代，传说是后醍醐天皇下赐给大臣使用的。此后，“日之丸”被广泛使用，成为战国大名和武将军配上的常见纹样。

即使“日之丸”代表太阳，而且天皇曾下赐印有“日之丸”印纹的旗帜，但这也不代表“日之丸”在中世纪已经代表日本和天皇。它当时被大量使用的原因，只是出于国民普遍崇拜太阳的习俗。

国歌《君之代》本来是《古今和歌集》的一首和歌，由天皇下令编纂。《君之代》在公元9世纪用于祝贺天皇长寿、统治长久，同时也用于贵族的活动。到了奈良、平安时代，扩大使用范围，成为祝贺仪典时的庆贺和歌。

《君之代》的原文（译文后述）“君が代は　千代に 八千代に　さざれ石の　いわおとなりて　苔のむすまで”里的“君”存在诸

多解释，既可以是天皇，也可以是被庆贺的主人公本人。它经过1000多年的发展，成为祝愿天皇家长久无限、歌颂万世一系的特别和歌。

（3）“日之丸”、《君之代》与近代国民教育

正式的白底红圆“日之丸”旗由幕末时期的萨摩藩主岛津齐彬创立。1870年，《邮船商船规则》确立，规定“日之丸”旗为日本商船的标志。这个规定的原意是用来识别开国后进出日本与非日本的商船，但后来便因例俗成，被新政府认可为国家标志的初例。

到了1933年，白底红圆“日之丸”旗首次被写入小学六年级的国语教科书，即在没有立法的情况下，国民、国家普遍认可了“日

之丸”旗。

《君之代》又如何呢？它比“日之丸”更早获得政府肯定。1893年，当时的文部省指定《君之代》为国歌（同样没有立法），令各级学校须在各种仪式中齐声唱诵。大正时代，《君之代》成为小学音乐教科书里必载的歌曲，而且小学四年级的“修身”科里，学生更需学习其含义。

这首歌是日本国民衷心祝愿天皇陛下的治世能够千秋万世，繁荣昌盛。从古代开始，日本人的祖先便一直扶持皇室，世世代代吟唱《君之代》，它是世世代代国民以真诚之心吟唱的歌曲。每逢节日和喜庆仪式时，国民都会高歌《君之代》。

大正时代以后，《君之代》也成为日本殖民地的例唱之歌。1941年，日本军攻下香港后，便将它翻译成中文版本，歌名定为《皇祚》：

皇祚连绵兮久长，万世不变兮悠长，小石凝结成岩兮，更岩生绿苔之祥。

第七章　天皇的艺能与学问

1．为什么天皇视和歌为“国学”？

（1）天皇的最大使命——敕撰和歌集

熟知日本文化的读者必定知道，在日本传统文学里，和歌担当了重要的角色，其起源可追溯到公元8世纪。当时编成的经典歌集《万叶集》是日本最古老的和歌集，在古典文学中有着不可动摇的地位。

除了《万叶集》，不知道有多少读者听过敕撰和歌集呢？它是天皇、上皇主导编纂而成的和歌选集。被选中的和歌必须是能代表当朝风流和具有顶级水平的作品，要天皇或上皇过目钦定才可发表。因此，天皇与上皇的慧眼与和歌水平必须是“达人级”或以上才行，否则便会落人话柄了。

敕撰和歌集的历史可以追溯到10世纪初的平安时代初期，当时的醍醐天皇在905年下令编纂《古今和歌集》，将古代至当时为止的各代歌人名作结集成册。由于醍醐天皇一直以来被奉为“圣君名主”，他之后的多代天皇和贵族都视他为楷模，因此便依照先例，每隔一段时期就下令编纂和歌集，直至室町时代的1439年，后花园天皇下令编纂《新续古今和歌集》为止，历时500多年，总共编纂了21部敕撰和歌集，在和歌史上被合称为“二十一代集”。

在《新续古今和歌集》后，和歌发展当然没有停止，编纂和歌集也受到当时的室町幕府支持，曾经想继续进行，但受到1467年爆发的“应仁之乱”影响，京都许多保存历代敕撰和歌集原本、抄本的贵族官邸和寺社，或受战火波及，或被烧毁、抢掠，损失惨重。后来虽然寻回部分，但因战火持续，京都贵族和天皇自顾不暇，已

无力顾及。其实战国时代以后，天皇与贵族的和歌会以及和歌创作都继续进行，武士阶级参与和歌创作的人数也越来越多，但受到乱事打击，敕撰和歌集的编纂至15世纪便被迫停止，无以为继。

（2）近世天皇与和歌复兴

对于天皇以及上流社会来说，和歌代表着与古代先祖对话，是传承王朝美德的媒介，其创作大多会参考、取材已有作品，也就是延续过往的“王朝记忆”。作为国君、先皇子孙，维持传承文化遗产是历代天皇的重要使命。换言之，复兴和歌与恢复天皇权威，互为因果。

比起敕撰和歌集无以为继，对于天皇来说，最大的问题还是和歌的传承将会青黄不接，即使敕撰和歌集在散失后被陆续寻回，但内容的解读以及歌中的意义、意境，却需要高人传承下去才行。

然而，失去举办和歌会的资源与场所，作为传承传统“美意识”的最高责任者的天皇，其权威将大受打击。因此，战国时代以后直至江户时代的天皇，都拼命地想尽快恢复举办和歌会。

漫长的复兴之路，从战国时代中期的后柏原天皇时代开始。上文提到，熟知和歌的“歌人”贵族四散，但天皇努力在仅有的资源下，组织王族与留守京都的贵族进行和歌会，勉力传承和歌，并着重教育年轻贵族子弟。

由于失去了稳定传承和歌的场所，优秀的歌人改为收弟子传授，并确保能传承给最优秀的人才。这种传承方法被称为“古今传授”。简单来说，就像金庸小说中的绝世武功秘籍，靠一个人传续下去。后来这个重担辗转落到了战国武将细川幽斋的身上，后来他

传给王族出身的八条宫亲王，亲王再将衣钵传给他的侄子，也就是江户初期的后水尾天皇。

作为江户时代和歌史上的风云人物，后水尾天皇在复兴和歌等传统文艺方面广受后世推崇。他活在太平复兴的时代，不仅复办了和歌会，而且打破战国时代一对一“古今传授”的做法，改为集体传授；不局限贵族、王族参加歌会，而是开放给平民歌人参与；又鼓励提供和歌指导给坊间。以上都是后水尾天皇时代，让来自不同阶层的人一起传承和歌的政策方针。

经过后水尾天皇一代的努力，和歌从贵族世界渗透至武士社会和平民阶层。到了江户中期，国学思想隆盛，憧憬1000年前王朝美好风光的意识到达新的高度。“和歌全民化”为后来涌现的“尊王攘夷”思潮带来了一定的思想基础。民间与贵族通过和歌凝聚对往古时代的集体想象。而天皇作为传承的主体和象征，受全民推崇，所以肯定天皇存在的必要性也提升到新的境界。

到了现代，天皇在宪法里被定义为“日本与日本国民统合的象征”。其中一个重要的“统合的象征”，体现在天皇每年举行的“歌会始”，那是吟诵和歌的文艺活动。换言之，举办歌会始是现代天皇传承日本文化，向世人、国民显示日本传统的重要职责和国务。

（3）《百人一首》与纸牌游戏

前文概述了天皇与和歌的关系，以及天皇如何负担起传承和歌的“帝皇之责”。最后，我们来看看《百人一首》这部作品，了解这些源起于宫廷的和歌如何找到新的出路，成为17世纪以后日本民间的文学游戏。《百人一首》让平民百姓接触到宫廷文学，并成为日本人学习国语的基础资料之一。

敕撰和歌集是天皇钦命修撰的和歌集，《百人一首》则是镰仓时代著名歌人贵族藤原定家，从当时已有的各种敕撰和歌集等作品中，选取有政治意义和社会愿景的作品而成，属于私人选集。《百人一首》收录了象征古代王朝辉煌时代的八位圣君（从天智天皇到顺德天皇等），以及历代文人贵族的代表作品。所以《百人一首》可以说是藤原定家通过编纂歌集去追忆古代王朝的体现。

《百人一首》自从面世后，直至江户时代，都只是朝廷贵族和上流武士学习和歌精粹的重点教材之一。一百首古代圣贤、名君的作品，是供他们回忆过往岁月、找寻根源的重要依据。然而，时移势易，到了室町时代，贵族们不再只视它为教材，改为以“寓玩乐于学习”的游戏方式去活用。

所谓的游戏方式像是最基本的“贝合”——将《百人一首》的各个名歌分成上下句，分别写在贝壳上，然后盖好。玩家拿着其中一片贝壳，进行斗快配对，最快又最多的一方便是胜者。

进入战国时代，贵族势力大受打击，其文化随之流出民间，“贝合”亦然。然而由于贝壳成本高，加上17世纪后期的江户时代，雕版印刷技术的提升，时人也接触了葡萄牙人于16世纪传到日本的纸牌游戏，于是出现了《百人一首》的纸牌。如此一来，平民更容易接触到这些来自宫廷的古典精粹。举例来说，纸牌里的歌人肖像和图案设计，使庶民对原本遥不可及的贵族生活更添了几分想象。

随着时代发展，《百人一首》的宫廷文学精神在民间慢慢淡化，转化为一种文学游戏，甚至赌博玩意儿，陆续出现不同玩法，像是一对一的斗快配对，再到团体战（当时称为“源平战”），又或者是上句和下句反向配对等。

虽然《百人一首》纸牌游戏的玩法越来越多，而且不再是贵族社会的专利，但是日本人没忘记这是来自宫廷的文化，与天皇有关。游戏中出现的一百位圣贤、名君，成为日本各阶层追忆昔日王朝时代的入门工具，他们被深深植入大众的意识形态中。直至现代，《百人一首》演变为一般国民理解古代和歌韵味的工具，甚至是小学生和中学生学习国语的辅助教材。对王朝的憧憬之情虽然已不复见，但《百人一首》平民化之后，传统和历史却获得保留和延续。换句话说，以天皇为中心的宫廷文化，至今仍发挥着“软实力”。

2．出自民间的能乐如何与天皇分分合合？

（1）被禁止的民间舞乐

我们到日本各地旅游时，会看到各式各样的“能舞台”，那是举行能乐的场所。这个现代人视为日本传统文化的代表，与天皇曾有一段“剪不断，理还乱”的关系。

“能”或者现在所说的“能乐”，发源于11世纪，是来自民间的艺能表演之一，后来派生出各种不同的特色，尤其以“猿乐能”最受欢迎，是当时成长最快、最有代表性的艺能活动。以猿乐为代表的“能”不仅深受地方武士阶层喜爱，后来更成为江户时代歌舞伎的重要元素之一。

因此我们可以说，能乐是日本庶民文化的代表，与宫廷音乐、艺文活动形成两个不同的世界。不过，随着王朝时代的告终，原本壁垒分明的两个世界慢慢找到了接触的机会。一方面是连歌、和歌开始在武士、百姓中普及，而“能”“猿乐”“狂言”这些原本属于百姓、田野的艺能舞乐，则随着庶民生活日益改善，开始成为精神享乐，冲击了久居深宫的天皇和贵族们。

对于这些出自市井黎民的艺能活动，身为“天神御孙”的天皇本来应该嗤之以鼻，不屑一顾，因为按职业、出身来划分的身份等级概念，是当时的重要观念，而“能”“猿乐”“狂言”的主要推动者是出身卑贱的“声闻师”“散乐师”。他们除了是“音乐人”，也兼职经营民间的宗教活动，从事咒术作法等与死亡、血腥密切相关的工作。因此，就身份观念体系和“声闻师”“散乐师”的职业性质而言，天皇压根儿与他们沾不上关系，不会也不能与之

往来。当时的贵族甚至相信，一旦跨出这一步，将招来天灾人祸，影响国家与天皇的安全。

11世纪，朱雀天皇更曾在写给子孙的《宽平遗诫》中提到，“天皇不应与这些卑贱之民交流，以免有失身份”。但这样的宣言正反映了当时的贵族社会与王族的确已经有“犯戒”的事实，所以才迫使天皇要明文禁止。

（2）破戒的后白河天皇

天皇禁止是一回事，子孙有没有照办则又是一回事。说到天皇之中破戒最为明显，甚至可以说是毫不避嫌的，便是后白河天皇。他本来只是被安排作为临时天皇的人物，因此，这位天皇的德行与操守自小便没有受到严格管束，对民间的音乐艺能有更多接触的机会。

保元之乱（后白河天皇与兄长崇德天皇的王位之争）后，他成为天皇的不二人选，他对民间艺能的喜好，为宫廷与民间搭建了罕有的桥梁。

可是，后白河天皇时代的日本，兵乱繁多，贵族的生活和权威受到武士崛起的影响而日渐衰败，他之后的天皇与朝廷为了维持原有的秩序，始终对猿乐为首的民间艺能有所顾忌。顺德天皇写于13世纪的家教戒条《禁秘抄》便再次强调了“阶级之别”，告诫今后的天皇不应“自劣其身”。

不过“口嫌体正直”，朱雀天皇和安德天皇的遗诫都没有太大作用，后来的天皇还是拒绝不了在民间大受欢迎的艺能活动。不少天皇多次以后白河天皇的例子来破戒，容许这些本应一辈子不能进入皇宫的乐师来御前表演。

到了室町时代，同样喜欢猿乐，但又不受宫廷戒条影响的室町将军足利义满有系统地组织这些乐师，并且由幕府进行全面管理，即所谓的“猿乐座”或“大和四座”（四个出自大和国，即现在奈良县的猿乐流派）。室町时代的天皇只能通过幕府来观赏猿乐，同时又面对来自贵族的阻挠，一直不能轻易成事。尤其如果天皇在这前后碰巧得病，更给了贵族阻止的口实，说这是天皇破戒招来贱民引起的警示。

（3）天皇与猿乐的分分合合

当天皇受制于祖宗家法和贵族阻挡，皇宫外的猿乐在室町时代迎来了另一个春天，猿乐的演绎者从专业乐师扩大到京都、奈良等地的民间艺技师，以及一般村落百姓。在同一时代，猿乐也通过各地的宗教祭祀活动，开始广泛渗透进入民间，形成后来的“田乐”。直至江户时代，猿乐、田乐成为一种在城市、乡村普及的文艺活动。

之后，出自民间、叱咤战国风云的织田信长与丰臣秀吉，对于这种转化为大众娱乐的艺能活动更是喜爱有加。织田信长在桶狭间之战前自唱自跳的久世舞《敦盛》便来自猿乐，并加以改良、简化。丰臣秀吉掌权后，更主动于1593年邀请后阳成天皇在皇宫观赏由他安排的猿乐演出。

然而，天皇与猿乐这段久禁不止的交流，终于在江户时代迎来了终结。德川幕府重视当年朱雀天皇和顺德天皇的遗训，强力阻止猿乐再次进入皇宫，并将猿乐和能乐定性为武士专享的艺能活动，以保天皇的神圣和权威，企图回复王朝时代重视宫廷传统艺能的精神。

一直到明治维新后，能乐才再次与天皇结缘。当时的明治政府在考察欧美国家的风土人情后，深刻意识到在维新西化的同时，有必要向国内外人士彰显日本传统的真善美。于是在时任外交大臣岩仓具视的指引下，政府重新捡起了能乐，以之作为“国乐”“国剧”，抗衡欧洲的歌剧，更通过出身贵族的政府官员，邀请明治天皇观看能乐（称为“天览能”）。自此，出于政治考量而获得大力扶持的能乐终于“重见天日”，得以与天皇在“阳光底下”做恒常交流，所以能乐迎来了又一高峰。

除了江户时代和明治维新，天皇与民间艺能虽然有着一定的禁忌隔阂，但是这种枷锁并不如想象中森严。天皇与民间的互动一直隐晦地进行着，形成了一丝羁绊。即使经过数百年的变革，两者仍能够通过昔日的记忆，重新联系，这足以让我们重新估量天皇自身的文化软实力。

3．音乐在天皇帝王学中的代表意义为何？

（1）被遗忘的帝王学——音乐

在前一问，我们已经了解了和歌作为帝王学的一种，对于天皇和天皇制来说，意义匪浅。我们甚至可以说，和歌是天皇扮演国家象征、文化传承的其中一个重要素材。

不过，即使我们以为天皇们对于传统十分执着，保护古来的风尚不遗余力，但事实上不是所有天皇的帝王学都能保留至今。一些从古代延续下来的仪式、行事往往随着国家历史发展而停住了脚步，成为人们的记忆。其中一个被留在历史里的是音乐。

说到音乐与天皇的关系，相信有些较留意现代皇室消息的读者知道，新任天皇德仁是一名管弦乐的能手，他在就读学习院大学时，便能演奏小提琴和中提琴。然而对于天皇家来说，演奏西洋乐器难得一见，毕竟西洋乐器和音律传来日本不过是150年前的事。

在那之前，历代天皇一直都与和式乐器和音律如影随形，密不可分。没错! 乐器和音律就是天皇的帝王学之一。

现代的日本皇室会在每年1月于皇宫举行和歌会，歌会起码已有近800年的历史，可追溯到13世纪末的镰仓时代中期。

比和歌会历史更悠久的就是“御乐始”，用现代语来说类似于皇家演奏会。在这个皇家演奏会里，天皇不是临席聆听的一方，而是亲自演奏的当事人。因此，御乐始与和歌会一样，都是展示天皇文化实力和教养功力的重要活动。

御乐始的历史可以追溯到1200年前的奈良时代，一直延续到1869年，也就是明治维新的第二年。明治天皇在该年举行了历史上最后一次御乐始，直至150年后的现在，都没有再举行过，已成绝响。

镰仓时代中期的顺德天皇在亲笔书写的帝皇家训《禁秘抄》中，提到天皇有几个必须学习的技能，排第一的是中国经典学问，第二是管弦，第三便是和歌。由此可见，在古代帝王学里，管弦的重要性与和歌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而且均要求皇室子弟从小学习，皇太子则以最严格的方式接受名家的教育和培训。

既然如此重要，为什么管弦会在明治维新之后随即被弃之一旁，不曾复兴呢？在这之前，我们先来谈谈天皇的音乐学史。

（2）天皇的管弦学

上文提到，古代的日本宫廷重视奏乐，这与7世纪时通过遣隋使、遣唐使的交流，吸收了中国王朝的礼乐制度有着重要关系。在这之前的古坟时代，即公元5世纪为止，日本通过与朝鲜半岛的交流，吸收了百济、新罗和高句丽三国的礼乐舞曲，并将其改良，实行本土化，慢慢形成日式风格。因此，日本宫廷的奏乐文化其实是经历不少转变、融合而成的。

在诸多奏乐种类之中，天皇尤重管乐和弦乐。一般而言，主要学习的管乐乐器有笛和笙，而弦乐乐器则是琴（和琴、和筝）与琵琶。

10世纪时在位的村上天皇曾经说明管弦乐对天皇的意义。他说：“思于心里，携于手上，唱于口中，听于耳内。”他认为通过学习、演奏管弦，便能习得四个重要的美德——心有所思、手持音

乐、唱念口边和深入耳听。可见天皇不只视音乐为陶冶性情的工具，更将其提升到培育君德君才的高度。也因为这个原因，管弦在中世纪时便被尊称为“帝器”。

12世纪，正值武士崛起的时代。即便如此，天皇与贵族对于“帝器”管弦的重视一如既往，也产生了很多理论和哲学，当时最重要的一本管弦乐理书《管弦要义》便提到，“一切音乐皆是为治国治民也”。

当时的贵族依然相信管弦为首的音乐是国君学习治国、兼听八方、知国难、忧民苦的重要一环。因此，为了尽早习得如此重要的治国之术、帝王之学，皇子们自小便刻苦学习，学有所成后便会在御乐始等场合，于众贵族面前演奏，以示具备统治能力。

然而，随着朝廷统治能力的衰退，以礼乐治国的理想已不具现实性，天皇学习管弦也变成一种礼仪和家艺独学。对于镰仓时代以后的天皇来说，学习管弦既是天皇的任务，也是延续祖宗遗德、绝学的使命。

因此，虽然少数天皇在特定条件下，可以自选喜欢的管弦乐器来学习，但这也与其父皇的学习经历十分有关。即使某一位天皇对学习特定的乐器没有天分，但为了以上的理由也必须勉力学习，延续传统。

这是因为管弦学习如果不能延续下去，既愧对祖宗，也有损君德。尤其在13—14世纪天皇家分裂后，学习管弦乐器对于互不承认的天皇家系（北朝、南朝）来说，更是分辨敌我、显示自我优越性的武器。

这段皇家分裂的苦难同时也是“帝器”的淘汰筛选时期。到了室町时代，管乐中的笙与弦乐中的筝，成为最重要的“帝器”，为

此后历代天皇所必修，以示君主的气度与教养。不过到了江户时代，学习乐器逐渐式微，“帝器”也不如古代那么被重视，而流于形式化。笙与筝以外，曾一度被放弃的和琴、和笛，也重获重视。

到了幕末时代，最后一个可以演奏笙与筝的是孝明天皇，而明治天皇则似乎未学习“帝器”。在1869年举行的最后一次御乐始，天皇变成了“听乐”的一方，而不再进行演奏。明治政府虽然没有明示原因，但显然是模仿当时西方国家君主出席演奏会的习惯。虽然西欧国家也有国王自行演奏乐器，但明治政府为了提高君威，强调国家威严，否定了身为“现御神”的天皇在公众场合演奏乐器的需要。

虽然新天皇德仁熟习西方弦乐，但这并不代表天皇重拾演奏乐器的皇家传统（毕竟不是和乐）。这嗜好会不会成为将来天皇重修“故业”的契机，则有待观察了。

4．茶道如何成为近世天皇的新学问？

（1）天皇与斗茶的邂逅

天皇与茶有一段悠久曲折的关系，而且这段关系足以反映天皇与时并进，绝对不只是抱着古典、传统死守到底的“活化石”。

天皇与茶的关系可以追溯到9世纪初（815年），即平安时代最初期。《日本后纪》记载，当时在位的嵯峨天皇继承父亲桓武天皇热爱唐朝文化的遗风，协同贵族、皇族出行至京都东面的近江国，当时与群臣吟诗游兴，更喝下了随行高僧永忠为他冲泡的茶。

这是目前天皇与茶接触的最早记录，但我们没办法确定嵯峨天皇喝的究竟是什么种类的茶。不过，由于广为日本国内外熟悉、号称最早的名茶“日本第一茶”宇治茶肇兴于公元14世纪左右，因上述记载的地点是在今天的滋贺县，因此我们几乎可以肯定，嵯峨天皇喝的不是宇治产的茶。

一般认为，永忠为嵯峨天皇冲泡的茶很可能是从唐朝进口，又或者是永忠自行栽培的茶树。因为他在年轻时曾作为遣唐使，到长安留学。

日本通过遣唐使大量吸收了唐朝的文化，形成了一段长达百年的“唐风文化”热潮。即使后来唐朝灭亡，日本走向自己的文化发展期（史称“国风文化”期），这个记忆和习得的诸艺能却成功留在了天皇与王朝贵族的生活之中。

10—15世纪，除了继承唐文化外，受到日中贸易的影响，唐至宋朝流行的团茶，以及当时在宋朝流行的游戏“斗茶”，也渗透到

京都宫廷。另外，宋朝兴起的抹茶也在12世纪左右，通过留学僧传到日本。

那时候最为流行的还是斗茶游戏，在贵族的日记中能看到天皇也参与其中。那时的宫廷茶会不像下一问谈到的“侘茶”那样，在一间小小的茶室里安静沉思、喝茶，其实更像一个派对。斗茶之后还会有一系列文艺活动，如能乐、歌会等。总之，斗茶在13—15世纪是主要的游兴之一，成为宫廷生活的一大部分，与以幽玄见称的“侘茶”，是完全两种概念和玩法。

这个风靡于天皇与贵族们中间数百年的时尚斗茶，到了室町时代晚期，为什么会被“侘茶”取代呢？接下来要提到两位重要人物。

（2）近世茶道文化与天皇

说到“侘茶”，相信不少了解日本茶道的读者，立即就想到“茶圣”千利休。的确，千利休的茶道成就了“侘茶”的发展，但是站在天皇与“侘茶”的角度而言，首先发挥作用的却不是千利休，而是“第六天魔王”织田信长，以及他的霸业继承人丰臣秀吉。

严格来说，“侘茶”是在丰臣时代才兴起的。之前的战国时代，当宫廷世界还以斗茶为乐时，宫廷外的喝茶文化已经出现重大转变。最大的改变源自室町幕府第八代将军足利义政的茶室文化，接着是由町众商人继承、发扬的茶汤文化，也就是“侘茶”的前身，还有与茶汤文化紧密相关的收集茶具热潮。

将这两个热潮推进到新阶段的是织田信长。信长自从1572年开始控制京都后，便大力推广茶汤文化和茶具收集，更将两者与政

治、驾驭家臣扯上关系，当时称为“茶汤之政道”。总而言之，钟爱茶汤的信长在晚年将这个嗜好介绍给当时的正亲町天皇。

1582年，信长死于本能寺之变，成功“接班”的丰臣秀吉在1591年完全统一日本。在这期间，秀吉仿佛继承信长遗志一般，自1586年第一次与千利休一起举办茶会后，便持续向天皇与贵族们引入茶汤文化。

秀吉在这些茶会里都主动地为天皇沏茶，背后的政治意图自然不言而喻。但更重要的是，在信长先提倡，秀吉再大力推动之下，天皇与宫廷享乐已久的斗茶文化正式受到冲击，开启了天皇、宫廷茶文化史的新阶段。

不过要留意的是，虽然受到秀吉影响，正亲町天皇以及他的孙儿后阳成天皇开始接受茶汤文化，但天皇家和宫廷完全舍弃“派对”茶会、斗茶，改为全面拥抱“侘茶”，还是要等到江户时代初期（17世纪70年代），即后西天皇时代。

在大约80年的岁月里，天皇的茶文化、茶生活处于转换阶段，尤其是丰臣秀吉死去后，继承霸业的德川家康在茶文化的交流上与天皇保持一定距离。于是，那时候的后水尾天皇便自行摸索“天皇的茶道”，既维持着一直以来的游兴式茶会，同时又在京都皇宫里引入了秀吉时代流行的茶室。靠着后水尾天皇惊人的活力和长寿，宫廷茶文化终于脱离中世纪的斗茶文化，慢慢转换到“侘茶”，而且推广到贵族阶层之中，最后在他儿子后西天皇时完成。可是，除了“侘茶”在江户时代越来越流行外，天皇转换茶文化的更现实原因，是游兴式茶需要极大开支和人力。当时的德川幕府鉴于德川和子（家康孙女）成为后水尾天皇的中宫，为了对外彰显朝廷与幕府关系良好，于是一直支持天皇茶会等活动的费用。然而，天皇驾崩后，幕府便以提倡节俭为由，逐步减少对朝廷的津贴。

纵使天皇的文化软实力有限，但是总体而言，“侘茶”在天皇的茶文化史里开花结果却是不可否定的事实。这个因缘也是以“侘茶”为中心的近世茶道能在日本获得尊崇，得以发展的重要因素之一。

5．天皇与日本帝王学的关系为何？

（1）天皇的学问与儒家经典

如果讨论日本帝王学，不知道各位读者会想到些什么？或许大家会反问："日本天皇也有帝王学吗？"天皇长期只是"象征君主"，使得不少朋友觉得，天皇就算有帝王学也无用武之地。

然而，如果我们放开对于权力与统治的执着，作为一国之王，还是必然要思考、学习帝王学的。事实上，日本天皇的帝王学在古代已有迹可寻。

最早记载天皇和皇家教育的史料是《古事记》和《日本书纪》。据两书以及其他的史料记载，第15代天皇应神天皇让长子菟道稚郎子拜当时的学者阿直岐为师，又命到日本的百济人王仁教导长子学习《论语》。自此，从大和朝廷时代的大王时代，到后来的天皇时代，日本皇家的教育都以中国的汉文经典作为主要教材。

除了上述的《论语》，《五经》《贞观政要》《帝范》《孝经》等中国各朝帝皇必读的儒家经典也陆续引入，在奈良时代和平安时代已经成为天皇、皇太子和其他皇子（亲王）的必修教材。后来，教材数量随着时代发展有增无减。《史记》《千字文》《文选》《群书治要》等史、书、治类的书，《周易》《尚书》《周礼》《左氏春秋》《孟子》等中国先秦时代的圣贤之书，唐代的诗集文选《白氏文集》等，都一一成为天皇和皇子的家课读本。而且即使天皇继位，教学也不会停止，正所谓活到老，学到老。

另外，有关皇家教育制度方面，平安时代初期设立了皇太子和皇子们开始学习的仪式，称为"读书始"。一般来说，皇太子大概

都在11岁开始学习中国儒家经典。平安时代开始，都会由通晓儒学、身任明经博士的贵族担任师傅解说儒学，还有老庄之学。

皇太子第一本修读的经典都是《孝经》，当时的皇家认为，储君要懂得对皇父尽孝守节，这才是为君的根本条件。11世纪中期，当时的后三条天皇决定在皇子的名字里加上“仁”字，从此除了少数例子外，这逐渐成为天皇家子弟命名的先例，2019年即位的新天皇德仁，就是一例。

这也反映在11—12世纪，天皇重视和积极引入儒家思想，而且体现在生活的各个方面，以求将来的天皇不仅具备儒学修养，更有君心和君德。当然，这并不代表日本皇家全面倾心儒学，天皇家也注重学习《日本书纪》，作为学习、理解祖宗立国的书籍。

（2）天皇们的为君心得

学习儒家经典是天皇家学习为君之道的基本方法，但是，常言道“子不教，父之过”，作为父亲的天皇又是否把教育儿子之责全都推给帝师呢？当然没有，其实在9—13世纪，当时有几位天皇留下了一些训诫子孙的教导文，例如，9世纪时宇多天皇的《宽平御遗诫》，13世纪时顺德天皇的《禁秘抄》以及后来的花园天皇写下的《诫太子书》，都成为后世天皇引以为座右铭的帝王学教典。

这几位天皇是如何说解为君之道呢？例如，《宽平御遗诫》里就提到：

圣哲之君，必依辅佐以治事。华夷寡小之人，何无贤士以感救彻。事有持疑，必可推量以决之，新君慎之。

为君“用人勿疑，疑人勿用”的道理，天皇当然不可不知。

而关于天皇的能力修养方面，《禁秘抄》则强调："第一学问也，第二管弦。"说明天皇最重要的是强化自身的学问修为，通文晓乐，这才是君德、君心的核心。《诫太子书》也提到：

学功立之，德义相成者，不啻盛帝业于当年，亦即贻美名于来叶（世）矣，上致大孝于累祖，下加厚德于百姓。

13世纪的天皇虽然已大权旁落，只能冷眼旁观武士当权，但这却不代表他们已经视"帝业""君之道"为儿戏。上述的帝王学依然继续传承，一直到近代的昭和天皇。随着大权失去，久居深宫，这种心声和理想只能作为精神支柱，默默留在天皇和侍奉他们的贵族心中，提醒自己存在的意义和使命。

6．昭和天皇的伦理课为什么会提到战国大名？

（1）天皇的帝王学

如果不理解“帝王学”这个名词，或许可以将它比喻为家族式企业或独裁政权培养接班人的教育方式。不过，对于仍然存在“帝王”的日本来说，天皇的教育是实在的问题。说到近代天皇的教育，尤其是明治维新以后，华人比较少留意和关心。以下以较为有趣的角度，带读者一窥近代日本天皇的教育。

明治维新成功后，新政府在开国自强之外，对于年仅16岁的明治天皇睦仁的教育也是不遗余力。新政府为了实现“王政复古”，天皇“万机亲裁”，培养明治天皇的君德、君威与君才，自然是十分重要的任务。由皇子时代学习中国的经典，如《大学》《中庸》和《论语》，直至登基的第二年开始学习《贞观政要》《日本书纪》等，天皇的教育进入了新的时代。君德与万世一系、万机亲裁变得息息相关，除了技能、学术上的知识，内心的涵养与道德日渐占据更大的比重。

明治天皇的皇太子嘉仁（大正天皇），脑部疾病影响，学习能力略低，这让十分关心子孙教育的明治天皇对皇太子的教育十分着急。明治三十四年（1901年）四月，皇长孙裕仁出生后，明治天皇为了确保刚走上轨道的帝国能长远发展，对皇长孙的教育更是重视。在裕仁出生刚过两个月左右，便将其送到伯爵川村纯义的家中，由其教养。8岁开始，裕仁便在乃木希典的全力指导下，开始学习。

裕仁13岁时，即大正三年（1914年）初春，乃木希典在死前推荐的时任海军大将的东乡平八郎，获大正天皇批准，设立东宫御学问所，教授甫踏入青少年期的皇太子裕仁中学程度的教育。其中一个新开设的科目便是伦理科，当时负责此科的讲师（御用挂），是旧膳所藩出身的学问家杉浦重刚，他曾兼任东京大学、日本中学校校长等教职。

大正三年至大正十年，从杉浦重刚准备的庞大、多元又贯通古今的道德教材和事例，我们可以看到他为了教育这位未来天皇所下的苦功和热诚。值得向各位读者分享的是，杉浦重刚不知道是有意还是无心，特意在其中一节课举了一位战国大名的例子，向为皇太子裕仁进行详细讲解。那么这位战国大名是谁呢？

（2）君德与上杉谦信

有幸成为皇太子学习伦理时的重点事例的，是“越后之龙”上杉谦信。裕仁在东宫御学问所里学习的其他学科，当然也提到了其他战国大名，例如，在明治时代备受歌颂的织田信长，而其他的大名武将则只有只言片语，杉浦重刚却花费一节课的时间来说解上杉谦信，以教导皇太子裕仁。

翻阅杉浦重刚的教材及讲授稿，发现他经常以时节或事物为契机，借题发挥，并举例说明各种道德伦理的要义。谦信的“专场”在第二十四讲，时间在大正四年（1915年）九月十三日，按照重刚所说，当日正好是中秋，于是引用了据传为谦信在天正二年（1574年）九月，攻击能登国七尾城时所作的七言绝句《九月十三夜》。

重刚先向裕仁讲解谦信的简单生平（因其中不少是根据江户时代以来的军记物语所写，因此不尽史实的部分颇多），他这样评价谦信：

我战国之世，豪杰四方竞起，互斗智勇，各自发挥其才能，然而，当中如上杉谦信，不啻其武略杰出，且侠骨棱棱，殆不见有人可与之比也。

之后当然是谦信的生平，如协助上杉宪政征伐小田原、向宿敌武田信玄送盐、上京面圣勤王等早已家喻户晓的故事，重刚都一一向14岁的裕仁讲解。在这之后，又略提到谦信的继承人上杉景胜，以及江户时代名君上杉治宪（鹰山）的事迹。最后，重刚为上杉家辈出谦信、景胜和鹰山等名君的原因做出总结，他说：

谦信性廉洁而重信义，最富侠气，景胜受之以武，至治宪中兴家道，专布仁惠。上杉氏传至今日，犹列华族，盖存余庆者也。

换言之，重刚想通过谦信以及上杉家的例子教导裕仁侠义廉洁。他又借景胜和鹰山的例子，指出传续优良精神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并且指出，如果能做好，必定会泽惠后人的道理。套在裕仁身上，如果他能秉承祖父明治以来的“祖业”，那么日本帝国的国祚也能长久下去。

不论后来的历史发展与重刚期待的有多少差异，但我们通过以上的例子，看到这位帝师在近代日本的帝王学里，怎样善用例子（史实与否，姑且不论）去丰富未来天皇的涵养和道德心，这在天皇的教育史上是难得窥见的珍贵片段。

7．近代天皇与达尔文进化论有什么矛盾？

（1）污蔑“现御神”的进化论

现代人对于英国科学家达尔文提出的“生物进化论”，可以说是耳熟能详，除了部分人士因为宗教信仰排斥它之外，大抵不会对此论做出强烈的质疑与抨击。不过，在明治维新后至二战前，进化论在日本却有着曲折的发展历程，更与天皇的地位与定义扯上关系，一度成为日本国内的禁忌。究竟是怎么一回事？

时间要拨回到20世纪初，进化论通过曾留学德国的生物学者丘浅次郎介绍，进入日本。他著有不少科普启蒙书籍，以便年轻科学家了解。这些努力与贡献使他成为明治末期至大正时代具有影响力的科学家之一。

在众多推广进化论的书籍中，丘浅次郎吸收了达尔文的精神，主张“人类是猿类的一种”；“人与其他动物一样，来自同一个祖先”，即所谓的“人猿同祖论”与“人兽同祖论”。他的理论虽然冲击了当时的日本知识界，并且获得年轻学生和后进学者的认可，但也大大伤害了主张“皇国史观”和“神国思想”的人士，变相地打击了他们的“玻璃心”。为什么呢？

丘浅次郎引入的进化论获得了认同，意味着有一群人正面地接受了西方思潮，代表他们开始质疑、无视江户时代以来的神道家和国学者所宣扬的传统世界观和国家观。这不只是学术研究的问题，因为站在主张“政祭一致”“政教合一”的神道家、国学者、政府的立场和角度，进化论已经动摇了天皇权威。因为在神道、国学以及政治思想里，天皇是“天照大神之御子孙”，“大日本帝国从一开始便是由天照大神之孙琼琼杵尊下凡统治之国”，“万物万事无

不依赖神德”。这些思想早已写进了当时的小学教科书里，所以当丘浅次郎介绍人类与野兽、猿类同祖时，等于向国民宣示科学界否定了已定调的思想方针，将神圣的天皇与猿猴扯上关系，犯了亵渎天皇的不敬大罪。

可是，当丘浅次郎引入进化论时，政府机关的执法还没有大力进行，仍然处于科学家、神道家与国学者论争的状态。但随着当时的外交政局改变与对外战争的胜利，使得国粹主义与爱国思想急速膨胀。

政府需要持续鼓舞人心，一致支持对外扩张的声音，同时也需要急速发展科技，鼓励科学，以备国家发展的需要。在这些事务之前，强调天皇的神圣性以及日本优越不可侵的思想，是不变的基调。于是，到了20世纪二三十年代，日本政府一方面大力支持自然科学、军事科技等的发展，提倡合乎政治需要的“优生思想”，来证明日本优于东亚诸国；另一方面则利用思想警察对进化论等被认为是有害国家安全与天皇权威的言论、刊物，进行监查。

换言之，在当时，科学家们只要“识时务”，不故意发表一些“不合时宜”和“不敬”的言论，便可安心进行科学研究。这种刚柔并用的白色恐怖，反映了战前日本人对于皇国思想与科学精神所持的那条暧昧的分界线。问题是，理论上受进化论影响的当事人——天皇，又是怎么想的呢？

（2）昭和天皇的科学思想

丘浅次郎引入的进化论，席卷20世纪初的日本科学界，昭和天皇当时已为学子，积极学习各种最先进的科学。被誉为“最后的元老”的西园寺公望，以有可能影响天皇的神圣为由，提议天皇改修“较为安全的”生物科学。事实上，天皇本来想向人文学科发展。

受到这个决定影响，昭和天皇在皇太子时代，以及1926年即位后，都积极研究生物学，当时的日本政府多次通过宫内省对民间媒体发布照片和新闻稿，向国民展示了“国家君主关心科学，具有先进思想”的理想君主形象。然而，这个理想的君主形象很快便产生两重尴尬。一方面，官方否定了进化论，但应当拥护这一方针的天皇却研究了生物学，难免使国民及有识之士关心天皇对进化论的见解。

另一方面，随着侵略中国的战争日渐白热化，积极推动侵略战争的军部激进派（皇道派）要求身为军政最高长官的大元帅陛下——天皇——以身作则，天皇的各种行动要符合国家利益，醉心于可能削弱士气的科学研究，被军部内的激进派视为不当。

同时，军部事实上控制政府后，也代表天皇对外发布消息，天皇奖励科研与从事科研的新闻则一律停止发布，大幅增加天皇与军队相关的消息。在当时的政府计划里，天皇是奖励科学的开明君主，站在科学知识界之上，而不是他们中其一员。

那么，天皇自己又对这种肯定与否定的分裂状态有什么想法呢？据当时常伴天皇左右的侍从武官长本庄繁的日记，天皇于1935年4月曾对思想与科学的关系有过以下发言：

如果想以思想信念去抑压科学，我们将会落后于世界。就好像现在我们无可避免要被进化论盖过一样……话虽如此，思想信念本来就是必要的，总之，朕认为思想与科学应该平行并进才对。

尽管在军部的强烈要求下，天皇被迫隐藏了自己的科学家思想，但到了战后，他卸下了战争罪责的同时，也卸下了皇国思想、军国主义的负担。日本也宣布与激进思想诀别，重新拥抱西方的先进思想，包括长期被排挤的进化论。

天皇则通过《人间宣言》，宣告放弃“神”的身份，可以回到当初的本心，继续担当一国之君，以及“科学者天皇”。

战后的日本政府和驻日美军急需为天皇洗去保守固执的“皇国思想”外衣，换回一度被军部遮蔽的先进科学家的形象。1947年，日本政府向外国媒体发布了皇室写真集。当中一张照片非常著名，反映日本政府有意向世界树立一个崭新的天皇形象。

在这张名为“天皇”（EMPEROR）的照片中，昭和天皇在皇宫的某个房间里，坐在椅子上阅读美国的《星条旗报》，而茶几上则放着英国的《泰晤士报》。值得注意的是，他背后设有两尊黑色半身雕塑。上方是以解放黑人奴隶闻名的林肯的半身雕塑，象征自由、平等精神；而下方靠近天皇左边的，则是达尔文的半身雕塑。

放弃皇国思想的天皇与主张自由、平等的传奇美国总统，还有进化论的提倡者，再次天衣无缝地“合照”。这张照片的绝妙之处在于，它强烈地宣告：昭和天皇已经从“神的子孙”回到“进化论”支持者，而且拥抱美国的核心价值。更重要的是，日本当局希望可以通过这张照片，将坚决否定进化论的过去归零，再由天皇与达尔文、林肯的“合照”，宣示战后日本将继续由天皇带领，重归先进文明的现代社会。由此可见，战后的日本与战后的天皇互为表里，不可分割。



图1　正在阅读英美报纸的昭和天皇（Toppan1947年出版）

第八章　天皇的生活与一生

1．天皇的都城为何由大变小？

（1）天皇的“移动宫城”

说到日本天皇的宫城，想必大家会想到京都市的京都御所、奈良市的平城京，以及现今的东京皇居。事实上，历代天皇的皇宫不止这三个。

日本的王都在1200多年前才固定在平安京。之前是长冈京（京都府长冈京市），更早之前是在平城京（奈良市），再往前追溯的话，还有新益京（即所谓的“藤原京”，现在的奈良县橿原市）、恭仁京（京都府木津川市）、难波京（大阪市）、飞鸟京（橿原市）等。

从大王时代开始，便有定期迁宫的记录。这不像中国商代的盘庚迁殷，是受天灾之类的客观因素影响而迁都。简单来说，日本君主当时迁都是因为风土习惯。大和朝廷时各王族有属于自己的宫殿，每当新的大王登基，都会将统治中心转移到自己当太子（当时的史料称为“大兄”）时居住的宫殿，或者再建一个宫殿，作为王国的新中心。

换言之，大和朝廷当时仍没形成一个集权体制的国家，王与王族以至大臣都各据一方，核心是大王与归附效忠的豪族首领建立的君臣关系。民众分属各个豪族、大王与王族，即所谓的“部曲民”。每逢王权更替，便很容易出现政治危机和血腥政变，改置宫殿便等于重新确立新王的权威一样。而基于这种统治形态，大和朝廷的“王都”严格上仍属小规模。

（2）由宫殿变成宫城

到了公元7世纪，大和朝廷与唐朝建立起稳定的外交关系，进而模仿唐朝的制度，其中引入的一项改革便是宫城的长期化、固定化。伴随着“宫殿”变成“宫城”，政府集权与王国下的国民统合更为重要，而宫城则成为国民集中居住的地方。

新都城内部的规划也参照了唐朝长安城，即棋盘状的分区方式，史称“条坊制”。日本历史上第一个实行“条坊制”的就是新益京。不过，在这之前曾有数次尝试，但都没有完全成功，而新益京也在建造不久后被废弃，宫城转移到了更为著名的平城京。

这次是真正仿效唐朝的都城，将百姓、豪族、大臣等从原本的聚居地飞鸟，全数转移到平城京，并利用这个机会改行集权化的新身份制度，抵消了部落制余风。

约100年后，已经成功将国家体制由部落制转化为集权式的日本，再次迁都，时间是8世纪中期。当时的桓武天皇将新宫城迁到北面的长冈京，之后又迁到今日知名的平安京——京都。

（3）由大变小的王宫

桓武天皇全面积极地引入唐朝的制度，在天皇历史和日本历史上都十分知名。天皇在迁京平安后建造的平安宫（当时称为“大内里”）面积广阔，据传世的资料记载，其面积大约有65平方千米，而当时平安京的面积大约是1150多平方千米，可见光是皇宫便占了都城约5%的面积。

桓武天皇建造大皇宫和大宫城，是想象自己将接待唐朝、新罗、百济等邻国使者，所以必须显示出王国的气派。但自从日本在

公元663年的白村江之战中战败后，日本与唐朝、朝鲜王国的关系不再那么密切，加上唐朝在天皇迁都平安京前，已经受到安史之乱打击，不复昔日的国势，日本与其的往来不复从前，天皇原本构想的大国外交蓝图成为泡影。

伴随而来的是“大内里”显得不合时宜、多余和累赘。尤其是9世纪以来，日本已然放弃中央集权，朝廷官员（贵族）不减，但行政规模却大幅缩小，彰显天皇权威的必要性也随之大减。面积过大的“大内里”维修费又十分昂贵，对行政与财政都形成了重大压力。

自8世纪迁都至13世纪，记录中“大内里”起码发生过16次火灾，其中有三四次是毁灭性的大火，将宫殿烧成灰烬，天皇被迫暂时迁出宫城，到其他较小但比较合理的别院暂住，这些别院被统称为“里内里”。

“大内里”经过多次重建，财政负担越来越重，重建的意义和必要性又越来越小。天皇多次搬出搬进，也早已与“大内里”没有感情。到了11世纪，著名的白河天皇以“大内里”太大、无用为由，正式决定停止重建。因此，平安京时代的天皇宫殿多为较小的“里内里”，而天皇办公、祭祀等活动也在“里内里”进行。

虽然朝廷后来曾有重建“大内里”的计划，但最后都因为成本太高，又无实际必要而放弃。目前位于京都市的京都御所，是室町时代以来天皇定居的“里内里”，当时称为“土御门东洞院殿”。自室町时代起，幕府将军也长住京都后，天皇获得将军的照顾和保护。因此，除了因为发生火灾而临时到外居住外，天皇的居所地和规模大致固定下来。曾经辉煌的“大内里”，永远停留在了贵族们的回忆中。

2．没有政治实权的古代天皇生活很悠闲？

在上千年历史里，天皇绝大多数时间没有亲自执政，而是主动或被动地委任“权臣”代为执政，如摄关藤原氏、平家和三个幕府政权。所以天皇在皇宫里都很清闲，没有事情干吗？当然不是这样。那么天皇每日都在忙什么事情呢？

如果大家曾经到过京都御所，里面的最主要建筑物——清凉殿——设置了一块大的公示板。这块公示板上写了天皇搬到东京皇居生活前，在京都御所一年要进行的活动，即所谓的“年中行事”。“年中行事”的时间表十分紧密，由每年的元日开始，几乎每月每周，以至每日都有“行事”。大部分都是祭祀活动，但也有一些重要的非祭祀性质的“行事”，这是天皇作为一国之主的重要工作。

接下来，我们简单看看天皇一年之中几个最重要的“行事”。

（1）元旦的朝贺

元旦既是每年的第一天，也是天皇进行一年中最重要的“行事”之日。当日，天皇会接受朝贺。朝贺就是皇太子以下的皇族和众臣，在清晨群集于皇宫的太极殿外前庭，向天皇行朝拜之礼。天皇当日在寝室进行梳洗，穿上朝贺专用的冕衣后，便会来到太极殿接受朝贺。他会向皇族和百官下诏，作为回礼。朝贺是从唐朝典制里引入的仪式，规模和做法大抵与唐朝类似，但到了11世纪以后，由于与中国的交流变少，加上朝廷财力较弱，朝贺的规模也有所缩小，只限皇族和朝廷内称为“殿上人”的高级官僚参加。

（2）贺茂祭

四月中旬，有另一个重要的“行事”——“贺茂祭”。“贺茂祭”又称“上贺茂神社祭”“下鸭神社祭”或者“葵祭”。在平安时代，“贺茂祭”与“石清水祭”“春日祭”俱为王朝最重要的祭祀，后来“石清水祭”“春日祭”逐渐式微，反而源于八坂神社、获京都市民重视的“祇园祭”，在中世以后越来越重要，更与“贺茂祭”并称为京都最重要的两个祭典。后来加上明治时代庆祝平安神宫建成而举办的“时代祭”，并称为“京都三大祭”。

简单来说，“贺茂祭”就是祭祀京都的土地神“贺茂神”的祭典。天皇作为京都之主、天下之王，会亲自前往或派敕使到上贺茂神社和下鸭神社，祈求国家中心京都风调雨顺。

（3）神尝祭与七夕之会

到了秋天，最重要的“行事”便是“神尝祭”。每年的9月中旬，即农作物收成的季节，天皇会在宫中进行祭拜和进献，也会派遣“币帛使”带御酒与神馔（供品）到祭祀皇祖天照大神的伊势神宫祭拜，感谢皇祖赐予五谷丰收。遇上歉收凶作之年，“神尝祭”当然继续进行，但会改为祈求皇祖、神明赐予来年丰收。“神尝祭”多次因为国家战乱、皇家式微而停办，在战国时代更是百年没有执行，到江户时代才得以复兴，并且延续至1947年新宪法颁布废除为止。

除了“神尝祭”，农历七月七日的“七夕之会”，又称“乞巧奠”，重要性相对较次，但仍然是主要“行事”之一。奈良、平安时代以来，喜爱“哀伤之美”的贵族，对于牛郎织女的故事甚为重视。在王朝时代每逢“七夕之会”，天皇与贵族便会在皇宫内的清凉殿东庭举行宴会，主要的活动就是管弦之会和吟唱和歌。这看似纯属娱乐性质的活动，其实是天皇在秋季的一个重要的“才艺秀”的日子，他会亲自演奏乐器、吟诵和歌，向群臣显示自己文化、学

问实力。从古代到近代，乐、歌都是日本上流贵族社会的重要核心价值，甚至是评定贵族与天皇才干的重要标准。不过，与很多“行事”一样，“七夕之会”在天皇迁居东京后，便不再是例行的“行事”了。

（4）新尝祭、大尝祭

冬天的最重要“行事”就是“新尝祭”，在每年的11月下旬。与9月的“神尝祭”一样，“新尝祭”也是感谢五谷丰收的祭祀，不同的是，“新尝祭”的祭祀对象不是天照大神，而是天神地祇。天皇向天神地祇进献当年的收获表示感谢，祈求来年继续丰收。由于是向天神地祇祭拜，天皇不会遣使到伊势神宫。他会进食祭品，以示与天神地祇享有同等地位。不过，如果当年新天皇在“新尝祭”之前即位，那么“新尝祭”便会改为“大尝祭”或“践祚大尝祭”，作为向天神地祇宣告新天皇即位的仪式。因此，“大尝祭”的规模远比一般例行的“新尝祭”大得多（有关“大尝祭”的说明，请看第五章第4问）。

除此之外，天皇还有大大小小的“行事”，有兴有废，但无论如何，从天皇在这方面的参与程度来看，他绝非无所事事的。天皇作为一国之主，国家级的祭祀和仪式都只能由他来主持，这些都是权臣们不敢僭越的“圣域”。

3．江户时代的天皇即位仪式是京都官民尊享的同乐日？

（1）即位仪式与京都市民

君主即位仪式必然是盛大而隆重的。到了近代，英国等西方国家更直播君主即位仪式，以凝聚国家共识，也通过媒体让外国人观看盛况，宣传国家荣誉与历史文化。

至于日本，从平民的角度而言，大正天皇和昭和天皇的即位仪式既庄严又神圣，但没有国民参与。当时的日本人主要靠媒体上的官方消息来理解、想象新天皇的即位仪式。一直到平成天皇，才通过摄影片段让国民窥见部分仪式的过程和场面，但仪式与民众之间仍然存在距离。

大家不要以为这是天皇家的惯常做法，借此用来提高威严。在江户时代，天皇的即位仪式其实有截然不同的风景。虽然江户时代的天皇常受德川幕府将军的霸凌，但是反过来看，天皇与朝廷的典章制度也的确在德川幕府的扶持下，得以从颓废的战国时代恢复，各种重要的仪式得以复办，即位仪式便是一例。

新天皇即位后于同年底举行的“大尝祭”，是新天皇与历代祖先、各方神祇进行感应、互相认知的重要仪式，理论上属于即位仪式的一环，但这部分属于天皇家独有的宗教仪式，其隆重与庄严程度自然非同一般，因此与天皇以外的贵族和民众无关。

不同于“大尝祭”，天皇即位礼是对外公开的活动，但这个重要的典礼，除了从江户前来参加的幕府要员外，实际上的参与者只

有京都市民，或者来京都参观的人。这些观众会用各种方式记录当时的情况。

为什么只有京都市民呢？一方面，这当然是因为天皇身在京都，而且几乎终身都只待在那里的缘故；另一方面，对于京都民众来说，天皇就是他们千年不易的老领主，他们是天子脚下的特别子民。因此，在没有电视、电脑和智能手机的古代，天皇的即位仪式当然是属于京都市民的独家盛典，京都以外的日本人是很少有“福气”到现场观看的。

（2）与民同乐的实况

那是从什么时候开始，京都市民可以观看天皇的即位仪式？其实早在平安时代，天皇的即位仪式便与民同乐。可是，如果要从相关史料及更多角度去了解当时京都民间的情况，江户时代才是最佳的样本。

明治维新以前的皇位继承不以生死作为分界，中世以来的历代天皇会像现代的平成天皇一样，在自己生前便让位给自己属意的皇子。所以在理论上，天皇随时都有换人的可能。

那么，一旦天皇换人，究竟如何将消息告知民众呢？以江户时代为例，当朝廷与幕府共同决定好让位与即位的日子后，朝廷便会派人提前向管理京都的幕府驻京机构“京都所司代”（类似今天的警政署）通报，同时向管理京都各区的市政民政单位“町”，通传一连串 相关消息与指令。

最早有系统地向町通报的史料，大约出现在18世纪初。那些行政指令当然是与即位仪式有关的各种保安措施，特别是护送新天皇，以及随行贵族行经路线上的安全检查。其中以当时经常发生的

火灾事故最受重视。一旦在即位仪式当天的巡游途中发生火灾，引发的混乱将大大地伤害新天皇的威严。

除了提醒京都各区町民防范火警，另一种行政指令则是驱赶特定民众，如社会阶层上被公然歧视的“秽多”“非人”，还有僧人、老人、小孩和服丧中的人士。不过在个别例子里，僧人也会获准在即位礼过后，在指定日子与一般百姓进入皇宫参观。

其中，朝廷拒绝服丧中的百姓参加，因为当时认为服丧之人身上带有污秽，是不吉利的。因此，除了不让他们出现在天皇队伍经过的地区，也不可进入京都市中心。

天皇即位礼以及“大尝祭”当日，市内的各种剧场和娱乐活动也必须停止。在仪式一两天前，朝廷会通过町役所通告具体的中止和解禁时间。另外，朝廷也禁止京都市内各佛寺在当日敲钟、举办法事和诵经。

禁止娱乐活动和佛寺敲钟，当然是为了让即位仪式没有任何杂音，让百姓全神贯注于天皇即位礼，从中深深地感受天皇的威严。

从以上各种规定来看，似乎很难说是与民同乐。当然，这只是其中一个侧面。仪式结束后，町役所便会具体地公告参观细节，让符合资格的民众参与。以1747年举行的桃园天皇即位礼为例，符合资格的京都市民会分为男、女两队，共300人，每人各持派发的入场券，从两个入口分别进入及离开京都皇宫。朝廷也会派人在各入口把守，检查进出行列是否混入违规的人。

获许进入皇宫参观和观礼的300人，一般是200位女性，100位男性。虽然我们不知道为什么按这个比例安排，但朝廷似乎对女性较为宽厚，除了容许较多女性参观，还特别批准她们到属于天皇私

生活区域的寝宫紫宸殿，以及天皇妻室（女官）办公的内侍所参观。

随着时代发展，天皇即位仪式当日与前后几天的开放事宜、官民参加章程等规定，日渐具体化。例如，幕末前夕的光格天皇即位仪式，便列出了当日参观人数、出入口、当日禁止参观对象，以及即位仪式后的安排等。

天皇让臣民进入自己的皇宫，并且观看自己的即位仪式，在古今中外都算是十分罕见的做法。基于这种相对开放轻松的官方态度，曾经有幸观看天皇即位仪式的人，自然会写下观感，甚至出版图书或绘图，在京都的书肆公开发售，如18世纪出版的《御即位见闻私记》等。

这些书籍、绘图的出版虽然出自民间，但由于是客观见闻，有独特的眼光，对史家了解、复原当时情况有莫大帮助。明治时代以后，政府通过大搞各种仪式，重建天皇权威，民间见闻更是重要的参考资料。可以说，昔日天皇的无心插柳，不只成就了与民同乐的盛况，还意外地为后人提供了各种方便了解的途径。

4．天皇的葬礼为什么由佛教仪式转为神道仪式？

（1）明治维新以前的天皇葬礼

1989年举行的昭和天皇葬礼，距今已经31年。当时国外对此没有大量报道，所以中文世界的读者应该没有太多印象，在这之前的明治天皇和大正天皇的葬礼就更不用说了。因此，大家可能不知道，天皇的葬礼在明治维新前后，其实有很大的改变。接下来先看看明治维新以前的情况。

现今奈良、大阪地区的巨大古坟，一般人相信那是当地古代大王（豪族之长）们的坟墓。虽然考古学家挖出了不少文物，但由于文字资料少之又少，目前对当时的殡葬制度，仍处于研究阶段。对日本殡葬制度了解较多的时代，是在大和王朝登场后，也就是佛教传到日本后。

最早以佛教方式实施天皇葬礼，是在圣武天皇时代，自此直至幕末的孝明天皇为止，葬礼都以佛教仪式来执行。

一般而言，天皇驾崩后，朝廷会在宫内找一处空地建造临时建筑物，作为“殡宫”，用来安放天皇遗体，以等待下葬日期的确定。由于是一国之君，天皇的驾崩触动全国上下，配合当时从中国传入的王朝典制，天下需要更长的时间去悼念，即有所谓的“殡期”。因此，他的下葬日期并不是一天两天后的事。在大和朝廷时代，殡期一般是一年左右，而天武天皇的殡期更长达两年半。

虽然天皇已去，但不代表殡期期间，殡宫便是没人管理的地方，刚好相反，殡宫的管理十分严格，投入了大量人力去维持和看

护。例如，奉献祭品（称为“供馔”），要有专人天天在殡宫内哭叫（称为“举哀”），以示哀痛；还要进行“奏诔”之仪，即向天皇诵读表达哀思的悼文。

这些仪式伴随着巨大的费用和精力，因此到了奈良时代后期，葬礼陆续从简；到了平安时代初期，上述参考中国而行的“举哀”与“奏诔”之仪也逐渐被废除。同时，随着天皇与朝廷越来越笃信佛教，葬礼的佛教味道越来越浓，薄葬的意识强烈。首先是殡期一律缩短至30日左右，“举哀”与“奏诔”之仪也逐渐被僧人诵经和烧香拜祭取代，从此成为定式。

（2）天皇遗体的处理与葬地

关于天皇遗体的处理方法，即“葬法”，一般相信古坟时代是实行土葬，并且维持到大和朝廷时代。不过，同样受到佛教影响，公元7世纪时的持统天皇首次由土葬改为火葬，在这之后，天皇的葬法绝大部分是火葬，只有醍醐、村上两位天皇，以及1000年后幕末时期的孝明天皇选用土葬。

自从佛式葬礼和火葬成为定制后，就不再跟古坟时代一样到处修建天皇陵寝。火葬在京都附近的寺院进行，参考阴阳五行，按照当年吉凶，选定位于吉利方位的寺院。不过自室町时代开始直至幕末，火葬和供奉天皇的地点都选择在京都东南的泉涌寺进行。

（3）明治维新前后的葬礼改革

前文提到孝明天皇的葬法复行土葬，但他的葬礼仍然以佛教仪式进行。可是，这也是天皇佛教葬礼的最后一例。到了明治维新后的1870年，天皇下令废止佛教葬礼，他以及之后的天皇与皇族的葬礼，均改行神道仪式。

改行神道仪式的背景，与维新政府的意识形态、政治需要有关。江户时代中期开始，近世神道和儒家思想强调天皇是日本固有的存在，不应使用外来宗教的殡葬仪式，要进行“转型正义”和“本土化”。因此，锐意重建天皇权威的维新政府继承了这种思想，让天皇和皇族的葬礼回归日本固有的神道方式。

政府下令皇族改行神道葬礼后，英照皇太后（明治天皇生母）大丧和明治天皇大丧莫不依循。但由于没有实际经验和古法可供参考，这两次大丧的丧仪、做法、称呼、具体程序、相关祭祀，均属试行摸索。维新后的皇家殡葬制度用了近半个世纪时间，才明确规定章程，在1926年发布《皇室丧仪令》。

与《皇室丧仪令》相关的《皇室服丧令》则在较早的1909年公布。原本《皇室服丧令》只用来规定皇族在天皇、皇后、太后死去后如何服丧，但到了大正天皇死去（1926年）时，服丧的对象扩大到所有日本国民，以强化国家团结和忠君尊王的国民意识。国民也要按规定服丧一年，规范其行动、服饰，以示哀悼。

由此可见，明治以后的天皇葬礼，一方面在仪式、程序上转行神道形式，但对外的规范则带着浓厚的国家主义，将神道仪式扩大成制度，而且在大正、昭和时代渗透到国民生活之中。

这就是所谓的“国家神道”。天皇的生死、祭祀与政治无缝对接（即“祭政一致”原则），一方面神化天皇，另一方面当政者则利用天皇的神圣性教化国民，使国民能够展现对国家的忠诚和热爱，做出贡献和牺牲。

5．天皇的日常饮食是怎样的呢？

（1）早餐前的准备

早餐是每个人起床后吸收营养、补充元气的重要一餐。古代的天皇一般在早上5—6点起床，晚上10点左右睡觉。以平安时代和江户时代的记录来看，天皇起床后，首先是洗手洗脸，接下来还需要洗澡，称为“御汤”，另外也有称为“风吕 ”的蒸汽催汗洗法，类似今日的桑拿浴。

一般来说，天皇入浴是在早上8点左右，洗澡时当然有侍候天皇的女官从旁协助。不过，古代天皇（还有贵族们）洗澡时是不会脱光衣服的，会穿着薄薄的“御汤帷子”入浴。这个“御汤帷子”便是现在浴衣的前身。

洗完澡之后，天皇还不可以用餐，因为还要整理仪容，而且依照情况需要，每隔两三天便要做一次染齿，即“齿黑”。关于“齿黑”是什么时候开始的装扮，已不可考。但由于考古学家在公元3世纪中后期的古坟时代遗迹里，找到类似“齿黑”痕迹的人齿样本，因此一般相信“齿黑”是古代便存在的习俗，用来保护牙齿，到后来成为区分贵族与平民的身份象征。

整理好仪容，天皇还要找专人为自己洗刷双手，称为“御手水”。弄得干干净净，为的是准备早上最重要的事——四方拜。四方拜的“四方”，简单来说就是皇宫的四方，寓意国土的四周，还有朝伊势神宫的方向进行遥拜，以示向祖宗行拜礼。这些仪式是天皇每天的“国务”，原则上风雨无阻。

（2）天皇的早餐

早上的“任务”完成后，天皇终于可以到日常生活的空间“常御殿”享用早餐，时间为早上的10—11点。这顿早餐一般称为“大床子御膳”。前菜一般是饼（御朝之饼），通常有6块，放在一个称为“三方”的木制台盘上，然后还有其他主菜，有菜有肉。中世以后，一般每顿主菜里都有一条长30厘米的鲷鱼。

由于天皇长期奉行佛教思想，所以自10世纪以来，他与京都的贵族们主要进食的肉类是鱼肉和鸟肉，而野猪、鹿等兽肉则要到明治以后才得以解禁。因此，在普遍不进食兽肉的当时，鱼类和鸡便成为当时天皇和贵族补充蛋白质和脂肪的主要来源。另外，在一些记录里也能看到天皇和贵族会饮用称为酥和酪的乳制品，它们同样是摄取蛋白质和脂肪的来源。但是这些与牛相关的乳制品最终没有成为御用食品。

话说回来，天皇进膳的时候，一般都有多名女官来陪食和侍候，还有专人先试吃试毒，以保安全。除了鱼类之外，还有数十碟小菜。天皇食用鲷鱼时，当然不会自己挑鱼刺，而是由侍候左右的女官处理。她们会用训练有素的技巧在不破坏鱼的形态下将刺全数拔出。

当然，天皇是吃不完这数十碟御膳的，所以剩下来的都会留给陪食的“御末”，甚至天皇用过的餐具也会送给她们，当作赏赐。

（3）天皇的晚餐

我们现代人一般是一天三餐，古代天皇一天进食两餐至三餐不等。晚餐在傍晚5点左右开始。换言之，早上11点至傍晚5点，是天皇处理政务、学习的时间。晚餐菜色没有指定品种，唯独不可缺少日本酒。从历史资料里可以看到，不少天皇都是爱酒之人，明治天皇便是其中一位，甚至可以说是酒不离手。

明治维新后，伴随着西化运动，天皇的饮食自此由“和式”转为“西式”，直至现在。所用的餐具、餐桌也改用西式。明治天皇时的早餐一般是拿铁配上面包，午膳和晚餐则主行法式风格。至于酒类，香槟和红酒成为这位天皇的“新宠”。不过，自小嗜酒如命的他，身体日渐受到影响，在身边的侍医力劝下，才减至每日一杯左右。国务繁重时，他会多喝几杯来减压。

说了这么多，那么天皇一顿御膳平均究竟要花多少钱呢？很遗憾的是，关于这方面没有系统性的记载。但以江户时代的天皇膳食费为例，食材大多由朝廷负责分配，唯独天皇食用的白米是由幕府专职提供的，而且都是最上等的白米，每年约供给4000千克。

供应天皇的食物一般是从皇家庄园上贡的食材。这些庄园大多位于京畿附近，主要集中在今天的兵库县和京都府一带。上述的前菜御饼，到了战国时代以后，便由京都北山的和果子商人川端道喜提供，也就是所谓的御用商人。

这些负责提供天皇食材的京都御用商人到明治维新时，有29家或30家。明治维新后，由于天皇迁居东京，这些商人大部分都失去了御用商人的资格。现时在京都，如果有老店自称“宫内厅御用达”“皇室御用达”，说明它在过去是为天皇提供食材的，但现在已经与宫内厅和天皇毫无关系了。

6．古代天皇的经济收入来自哪里？

（1）王之财产

天皇的财产、收入来源，与天皇的权力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在大和朝廷时代，大王以诸豪族长的盟主兼最强豪族的身份实行统治。据目前的研究显示，那时候的大王（其他豪族也类似）拥有直辖地，称为“屯仓”“御厨”等。另外，大王当然有直属的“部曲民”，当中有称为“名代”“子代”的民众。他们负责提供劳动力，还要纳贡。这些土地和民众的劳作便是大王们的基本收入来源。

到了公元7世纪，大王改称为天皇，效仿唐朝而引入的律令制度随之实行，皇家领地也进入制度化管理的时代。那时候的“御领”主要由宫内省下的“大炊寮”和“内膳司”管理。宫内省便是天皇的家政机关，辗转延续至今。

当时与唐制度一起引入的还有儒家思想，著名的句子“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也是天皇坚信的观念。因此，国家的山泽资源、田贡租税等纳贡品，当然皆为天皇财产。那时候的国家税收则由中务省的“内藏寮”和“缝殿寮”两个部署负责征收。

后来，律令制度行之失效，9世纪的平安时代前期改行庄园制，国内土地的租税转变为由贵族为领主的庄园贡税。简单地说，庄园制便是将国家土地分割，交到贵族、寺社手上管理，而庄园领主则有责任缴纳朝廷指定的租税额，来维持朝廷运作。

在这些庄园领主中，最高位的便是天皇和天皇家的家长——院，即太上天皇（简称为“上皇”）。不过，为免被世人非议一国之君敛财自肥，有失君德，天皇和上皇习惯将这些庄园中的大部分转为皇室寺院名义下的庄园，作为供神礼佛的贡地，由上皇来管理，因此这些庄园在当时一般被称为“院领”。上皇也会把遗产分给自己的妻妾或女儿代管，期待她们日后将遗产还给上皇属意、但又未成人的后继人。这些暂时转给妃子、公主管理的领地，被称为“女院领”。当然，天皇、上皇的收入不只有田产。在庄园盛行的时代，古来的国家祭祀活动继续执行，相关的祭祀供品和费用当然从官、私两种庄园里征收。而负责为皇室庄园调配物资的“供御人”，受惠于为天皇办差之便，慢慢形成了后来称为“座”的特权商人，为天皇和上皇提供生活所需、享乐物资。

到了13世纪，镰仓幕府和室町幕府相继成立，武士强抢贵族庄园的问题十分猖獗，但两个幕府的将军均以“勤王”作为大义名分，积极地保护皇室庄园的安全。但结果，国家的租税征收权便落入幕府手上，皇家的经济能力大幅下降，显然不足以独自负担执行国家事务和祭祀所需的资金。在室町时代，天皇要进行即位、祭祀的仪式时，基本上都要靠幕府全资支付。

（2）贫困的天皇

正所谓“唇亡齿寒”，天皇与朝廷全面依靠室町幕府来支持，幕府的稳定显得尤其重要。但当幕府经历了1467年的“应仁之乱”，元气大伤，对天皇与朝廷的支持便显得有心无力了。当时天皇的即位典礼、葬礼，都因缺钱而无法如期进行，以至于后奈良天皇与后柏原天皇两代，无法按祖制让位给新皇，郁闷地死在皇座之上。

为求活路，战国时代的天皇曾一度依靠各地新崛起的战国大名索求官职的献金来维持生计。虽然天皇对形同卖官鬻爵的行为多次表示不情愿，但幕府默许，朝廷又需要经费维持国务运作，加上换来的政治献金实在可观，使得这样的行为持续了40年左右。

织田信长掌握京都后，代替室町幕府管治，京畿一带局势回稳，皇室财政终于回春。在丰臣政权时代，正亲町天皇（后柏原天皇之子）终于获得资助，重启让位大典，续行祖制。而且，丰臣政权继承织田政权保护皇室权威的方针，使各种皇室领地和贵族领地得以回归。到了德川幕府时代，大部分仪式和费用继续获得资助，皇室与贵族迎来了最安定的时期。

德川幕府沿袭织丰时代以来的做法，出资修护天皇皇宫和太上天皇居住的仙洞御所。皇室与朝廷贵族获幕府保证的领地亦超越了织田、丰臣时代，约为12万石，相当于当时一个中级藩的领地。

7．现代天皇的经济收入来自哪里？

（1）天皇的零用钱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新的国家宪法正式实施，昭和天皇与皇室的身份定位都大大改变，由万民崇拜的“现御神”变为守护和平的国家象征。也因为是国家的象征，日本政府在获得美国默许的情况下，仍然让天皇与皇室出席官方活动。为此，他们的活动经费自然成为国家开支之一，并按照《皇室经济法》管理。这笔经费就是“皇室费”，也就是天皇家族的零花钱和生活费。

具体而言，“皇室费”还可以分为“宫廷费”“内廷费”和“皇族费”三大种类。“宫廷费”是天皇与皇室参加官方活动时的费用，如国宴和地方访问等。“内廷费”与“皇族费”名义上属于私人用途，如支付负责天皇饮食的厨师工资、私人性质旅行等。总之，“内廷费”是天皇家族，即天皇、皇后、皇子、公主的生活开支，但是按照每个成员来设预算，而不是以家族为单位。至于“皇族费”则是核心家族以外，仍然有皇族身份的天皇亲族，如弟妹、叔叔的私人费用，也是按人头计算的。

另外，除了天皇与皇室直接使用的“皇室费”外，其实还有两项相关的支出，一个是“皇家执事”宫内厅的各种支出，即“宫内厅费”；另一个则是“皇宫警察本部费”。“皇宫警察本部”的支出，是专门负责保护天皇与皇室的警视厅特别分局，在天皇出巡等场合中，负责保安的费用。

“皇室费”主要来自国家税收，而且由宫内厅全权负责和管理。虽然宫内厅会向日本国民，即国家纳税人公开“皇室费”的金额和用途，但国民无法过问是否合理。另外，天皇与皇室成员也不

用缴税，不用支付各种国民保险。天皇与皇室变相拥有特权，只接受供养，而不用负担。这也是为什么战后到现在，有部分团体质疑天皇与皇室的生活费是公器私用，所以他们仍是“特权阶级”。

那么，天皇的“皇室费”是多少钱呢？宫廷费的预算是按照每年的日本政府收入，和上一年对下一年安排的活动计划来决定的。据宫内厅的数字，2018年度宫廷费为91亿7145万日元，皇族费是3050万日元，内廷费则是3亿2400万日元。三种“皇室费”的金额每年都在增加，例如，与2003年相比，增加了近30亿日元。除了物价指数和不定期的临时支出增加外，天皇与皇室的活动比从前更频繁，在公众场合的曝光率越来越高，这意味着天皇与皇室比以前更积极地参与公益活动、国家活动。

（2）天皇的财产

与“皇室费”一样，天皇家族的财产也分为公、私两个部分。“公的财产”是指天皇向国家借用，由宫内厅管理的财产。例如，不少读者都参观过的京都御所和东京皇居，还有分布全国各处的别墅，提供皇室食材的牧场、农场。

对! 大家没有看错，不仅是用作观光的京都御所，天皇家族居住的东京皇居其实也是借来的“公的财产”，而不是天皇的私产。简单来说，这些住宅、建筑物都是体现天皇是国家象征的必需“道具”，由国家出面提供和借出是理所当然的。

既然如此，那天皇有没有私产呢？当然有! 例如，上述的“内廷费”用剩的金额会全数留作天皇和皇室的积蓄。这些历年剩下来的积蓄有一大部分会存入银行，或者用于购买股票和债券。以2019年退位的平成天皇为例，他的私产还包括父亲昭和天皇过世后留下来的时值约20亿日元的遗产（不过，那时候还扣除了5000万日元作

为遗产税，后来以天皇名义开设了基金），以及他当年还是皇太子时的东宫预算剩余金。这些私产的财务情况也不会向公众公开，只有宫内厅所属的内廷会计主管才会知道。

不过，这里其实存在一个矛盾地带。那就是新宪法的第88条，明确规定天皇与皇室均不得拥有私产，即“所有皇室财产均属国家资产”。这个规定是要反省二战时，天皇与皇室在《帝国宪法》的保护下，坐拥巨额资金和全国各地的山泽资源，并在军、政两方面握有影响力，左右政府决策。

但是，宪法颁布之后没有人过问这条是否确实执行，结果到了昭和天皇驾崩后，才引起了社会关注。当时的日本政府以“资产不过度膨胀，而且不会集中于某一个皇室成员身上”为条件，默许了天皇与皇室拥有私人资产。

绿灯一开，天皇与皇室只要小心行事，便可以在一定限制下运用私产。当天皇想进行投资时，宫内厅还会为天皇招聘顾问。这些顾问虽然不用公开姓名，但据曾经意外曝光的资料来说，一般都是国家银行或大型银行的前行长或总监。既然有投资，天皇的私有财产当然会随着收益有增有减了。当然，这些皇室私事均不会向国民公布。

第九章　天皇的形象

1．为什么古代绘画中的天皇面容都被遮掩了？

（1）被打“马赛克”的古代天皇

想知道天皇的样貌、真面目，现在已不是什么难事了，打开电视或利用网络搜寻他们的图片便可。随着时代发展，尤其昭和天皇在二战后，向国民宣布《人间宣言》，天皇及皇室渐渐放低身段，天皇的形象不再像战前那样遥不可及、不可直视，反而越来越受到国民和国内外媒体关注。另一方面，随着政府解禁，媒体信息爆炸，天皇的影像、照片都公开了，不再像战前那样，会因不当或肆意使用天皇影像的问题犯下“不敬罪”。

请各位想象一下：古代人（奈良、平安时代）会如何在艺术作品中描绘天皇的样貌呢？

大家是否知道，那么被尊崇、敬畏的天皇，在古代绘画作品之中曾经是以十分特别的方式出现的——他们总是“犹抱琵琶半遮面”。

对！就是在这些肖像画以外的绘画作品，如绘卷画、屏风画等，天皇虽然是主角或主角之一，但最应特写的部位——脸，却被刻意遮蔽。他们不是被轿帘遮住，就是脸刚好被其他物品挡住，又或者刻意背对着画师。总之，画师似乎有意故弄玄虚，为天皇制造神秘感，吸引看画者的注意。

这个现象持续了数百年之久，仿佛是规矩、惯例。可是作为一国之君，天皇当然是画作中的主角，绝不可能是配角，甚至按常识

来说，哪怕是带点夸张、美化，其容貌体态也应该获得特写才对，所以这种刻意的遮掩究竟是怎么回事？

（2）“犹抱琵琶半遮面”

各位读者可能会猜想，很可能是因为画师出身太低，根本没办法亲见天皇，所以才想到这种无奈的方法来敷衍了事。然而，既然当时的一般百姓都不知道各代天皇的样貌，更没有机会经常见到天皇。而且即使百姓对天皇评头论足，也不会传到禁宫里的天皇耳中，更何况这些画作也不会公之于众。那么，就算画师将天皇画上大众脸，或者凭想象去画，也不会有大问题才对。历来有艺术史家研究分析背后的原因和这种表现方式的含义。简单来说，有两大因素。

第一，这种刻意不绘画君主长相的方式，在中国（特别是唐代）和古代朝鲜的大型绘画作品中也看得到。而且不只君主，王族或高贵出身的人也是如此。由此可以推断，古代日本很可能受到唐朝文化的影响，在作品中刻意回避天皇的脸部。

这么做是为了表示对天皇的敬畏。在画中露脸的贵族、神职人员、僧侣的衬托之下，被刻意遮脸的天皇显得与众不同，更能提高其权威。

另外，古代日本贵族社会相信，如果画作中的容貌与本人太相似，当有不满的人对画作涂鸦或指骂画中的主角，会成为一种诅咒，最终很可能祸及本人。因此，到了平安时代以后，不只天皇，就连贵族也不喜欢在对外公开的绘画中被画得太像。

第二，奈良时代早期的神道相关作品，如一些神社的缘起画卷，画师描绘天照大神或其他本地神祇时，同样刻意遮挡神明的长

相。因为在日本神话故事里，对神祇的样子没有统一的描述，神道也主张神祇是无相无形的，人们只能通过种种不可解释的现象去感觉、察知其存在和意志，而不能目视他们。因此，画师即使不得不在宗教画作中描绘神祇，但也的确不知道应该怎么画。于是，陷入两难的画师，便刻意遮住神祇的容貌。

久而久之，这种处理手法也扩及描绘天皇的作品，一直到幕末时代才完全解禁。而天皇是否一直没有自己的自画像呢？也不是，自10世纪初的白河天皇和鸟羽天皇父子以后，历代天皇开始找人绘画自己的肖像画，但仅作私用。在父皇去世后，其子女也会命画师画肖像，供凭吊之用。另外，现时负责皇宫事务的宫内厅也保存了中世纪以后天皇的肖像画，称为“御影”，但基本上是千篇一律的大众脸，很难想象是在天皇本人面前画的，恐怕只是为了纪念天皇们而凭想象绘制的作品而已。

而明治维新后，天皇的相貌成为近代日本的象征之一，政府对于天皇在绘画、照片中的长相尤其重视，力求突显其君威和神圣，与古代的观念当然无法相提并论。

2．为什么天照大神时为男身，时为女身？

（1）天照大神的性别

相信有不少读者去过日本三重县伊势市的伊势神宫，也知道那里供奉的是传说中的创造天地之神——天照大神。

天照大神在后来又被尊称为“天照皇大神”，如前文所言，它是开创天地的至尊，地位凌驾于其他神祇之上，同时也是天皇家的祖先神。因此，伴随着神道的发展，天照大神的故事越来越普及，成为备受知识分子以及百姓敬仰的“皇祖神”。就连外国人也耳闻过他的存在和故事。

不过，由于日本的神道不像外国宗教一样设置雕像，供人膜拜，而是主张神祇无相无形。因此，神道里的“八百万神祇”究竟长什么样子，一直都只能靠文字资料的描述来想象。也因为这个原因，各神祇在历代不同的美术作品里，样子都不太一样。

即使是尊贵的天照大神，在各种画作里的样子也是千差万别。其中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就是天照大神的性别。说到神祇的性别，放眼世界各大宗教，有明显的男性神、女性神，也有性别难断、不分性别的神祇。那么，天照大神究竟是哪一种呢？

其实，在古今诸多关于天照大神的美术作品，如绘画、雕像之中，天照大神既曾被塑造成童子，也曾以威风凛凛的男神形象示人。另外，有一些神道家主张天照大神是两性兼备的神。到了明治时代以后，天照大神被描绘成女神形象登场的作品越来越多，“天照大神等于女神”的说法也逐渐成形。

（2）女神天照大神与近代日本

天照大神化为男神形象的原因，与伊势神宫的发展有很大关系。现在看来，伊势神宫是香火鼎盛的宗教圣地，但其实这个盛况是到了江户时代才出现的。在当时重男轻女的社会风气下，男性神的形象慢慢为人接受。直到幕末为止，天照大神以男性神形象为本的画作陆续出现，与仍属主流的女神形象一起流传。

那么，天照大神被定型为女神的原因又是什么呢？前面曾提到古代一般认可天照大神是女神，同时兼具男神的形象，而到了明治维新后尊崇神道，至二战为止，有意图地通过政策与法律贬抑女性的地位。既然如此，不是应该将天照大神描绘成男神，才更显得“政治正确”吗？

天照大神定型为女神的最盛时期，是二战时的昭和时代，当时日本政府为了强化国家对外扩张、侵略的正义，除了大力鼓吹出现在古代神话里的“神功皇后征韩传说”外，也借用《日本书纪》等的记载，将天照大神化为女神，与神功皇后的故事有所联系。而且那时代的“女”天照大神，并不是以温柔、高贵的典型女神形象示人，而是男性打扮，又手执武器，以威风凛凛的女战神样貌出现于各种教科书、绘画作品中，完美地将神话女神与军国主义融合在一起。

（3）天照大神与天皇

以上可见，天照大神受到日本上下的敬仰，其过程其实相当曲折。在古代的神祇信仰里，天照大神并不是世俗之神，不太理会它“创造”的神国日本，也不像其他神祇会为百姓求福请益。在古代神话故事里，它甚至会突然出现，以各种方式加害国家与天皇，要求对方崇拜和祭祀。

前文已经提到，天照大神原本是天皇家的祖先神，而不是所有日本人的祖先神。祭祀也只限于天皇与王族，与其他阶层无关。

因此，长期以来，天照大神在天皇以外的日本人心目中，是一个极不明晰的存在。平安时代著名的贵族日记《更级日记》里，主人公便问："天照大神究竟是活在哪里的神佛？"由此可见，天照大神的信仰本来便具有强烈的封闭性。

这个现象是到了什么时候才得以改变呢？早在镰仓时代开始，随着天皇家衰落，祭祀天照大神的伊势神宫逐渐式微，其势力和收入也受到了影响，不得不广开财源。而且因长期缺乏宣传，那时候的伊势神宫较少有人前往参拜，收入来源更显不足。

于是，为了图存，伊势神宫在室町时代中期开始派称为"御师"的神官到各地宣传，劝人捐献。为了加强宣传，原本不外传的天照大神的故事也成为宣传工具。而且，为了让更多人知道天照大神的伟大，神宫也决定接受天皇以外的各阶层参拜和供奉。也因为这个原因，天照大神由"任性""自我"的恐怖之神，变成了与其他低一等的神祇一样，是为民请命、倾听百姓祈愿的入世之神。这个转化使得江户时代的神道思想得以广传，成为影响近世日本国家思想成型的基础。

3．从江户时代的天皇肖像画能看到怎样的天皇观？

（1）过度平淡的肖像画

放眼古今中外，上至神祇、帝皇，下至著名人物，肖像画都是我们揣想其外貌的参考依据。然而，日本的天皇肖像画却不尽如此。

自古代至中世纪为止，在历任天皇的肖像画中，能说有个人特色的作品，屈指可数。例如，改变天皇与日本史的天武天皇、桓武天皇、后醍醐天皇等，其肖像画渗透了同时代的中国画风。但大部分的天皇画作可谓千篇一律，都是差不多的表情，差不多的装扮。

与欧洲、中国不同，天皇的画作并没有随时代进步而越来越写实，一直要到明治维新改走西洋风格后，才有了根本性的改变。这是为什么呢？

先说明，除了传说中的天皇和古代的大王外，大部分天皇都有肖像画，称为“御影”。现存最早的肖像画是10世纪的鸟羽天皇。

而画师的身份也没有硬性指定，以江户时代的天皇肖像为例，画者有专业的画师，也有皇族出身善于绘画的贵族，也有出身已不可考的画师。

纵然画师不尽相同，也不是来自同一画派，但是江户时代的天皇肖像画却没有明显的分别，也没有象征皇权、威严的神器在其中，只是一幅幅千篇一律的肖像画。与中国、欧洲的君主相比，极为内敛。

另外，各代天皇肖像画完成后，并不是所有画作集中统一管理。在江户时代以前，大多数画作会在天皇驾崩后，安放在相关寺院中；江户时代以后，大多数画作则统一存放于京都泉涌寺，有些则放在旧时的宫内厅仓库里。泉涌寺自镰仓时代开始，是多位天皇、太上天皇、皇子们死后安放灵位的皇家寺院，自然是存放画作的理想地点。接下来，我们便以泉涌寺的画作为例，谈谈天皇肖像画如何反映当时人们对天皇的理解和认知。

（2）天皇肖像画的共同点

天皇的权威与权力时有起伏，到了太平安定的江户时代，天皇在政治上的威信低落，时人对其印象也越来越僵化，这些固定印象反映在肖像画里。

第一，没有女天皇的肖像画。江户时代曾出现两任女天皇——明正天皇与后樱町天皇。如今并没看到她们的肖像画，这肯定不是因为灾难而遗失，而是一开始便没有。

为什么“歧视”她们二人呢？那是因为她们的即位是政治考虑下的安排，完全出于偶然，一些皇家、天皇执行的祭祀仪式，按规定还是必须由男性天皇执行。另外，女性生理期也是“元凶”之一。

在古代日本，月经被视为污秽不堪的象征之一，即使天皇也无法阻止这个生理现象。“不完美”的身体限制了她们作为天皇的“完整性”，朝廷和幕府也没有将她们当作“完整”的天皇来看待。她们继位之后，没有真正执政，履行天皇之责，而是由当时的关白摄理朝廷事务。

第二，因为历代天皇肖像画中没有女帝的先例，创作自是困难，而且，男性画师无法直接观察女天皇，所以解决方式就是干脆不画。

而男性天皇的肖像画有什么共同点呢？最明显的是——不留胡子。中世纪至战国时代为止的天皇肖像画，还看得到部分天皇蓄须，但江户时代肖像画里的天皇是一律没有胡子的。虽然没有规定天皇必须留胡子，而且外国也有不蓄须的君主，但在大多数文明中，胡须是最明显的男性特征，是强调威严、权力的标志。所以江户时代的天皇不留胡子，是较罕见的现象。

江户时代，不只是天皇，德川幕府将军的肖像画，除了头三代将军家康、秀忠和家光外，以后的将军均没有留胡须。这又是为什么？

简单而言，江户时代初期，大约是17世纪60年代，时值四代将军德川家纲当政，幕府频频下令禁止各阶层的男性留胡子，这是因为当时幕府认为胡须代表蛮勇、粗鲁，想通过禁止蓄须，改变社会的暴戾风气。

结果，天皇与将军都受到这个规范的影响，起码在肖像画里贯彻了这个宗旨。一直到明治天皇，才重新留起胡须。

以上可见，江户时代的天皇肖像画虽然没有中国、欧洲帝王那些强调权威的表现手法，也没有用名贵艳丽的颜料来突显其气势，但作品活生生地反映了当时的天皇观，也让我们有机会了解当时的社会风尚与意识表象。

4．明治天皇的肖像画和照片有什么秘密？

（1）不爱拍照的明治天皇

本书上部谈到明治天皇在天皇史上的创举，他是数百年来第一位看到大海的天皇，是第一位与外国人见面聚餐的天皇。除此之外，他还是第一位拍照、成为西洋画主角的天皇。

我们现在能轻易地通过历史书籍和网络，看到这位传奇天皇的真面目。与从前的天皇肖像画相比，明治天皇在照片和油画中显得更加写实。不过，这些传神作品的背后其实存在两个秘密。

第一个秘密是，天皇其实不喜欢拍照，对肖像画也没有太多兴趣，这明确记录在官方记事里。除了天皇的个人喜恶外，那时日本人仍然觉得天皇是神，不应该也不需要留下真容；坊间也谣传西洋人的机器有问题，拍照的闪光灯会摄走人的灵魂云云。

无论如何，明治天皇在维新成功后的确进行了两次拍照。第一次是在1872年，照片里的年轻天皇穿着传统和式礼服。这张照片被用于宣传，证明天皇的确领导着新政府，带领国家走向新时代。第二次在1873年，是为了配合政府向全国颁布征兵令，强调天皇是国家军队的最高统帅和指挥。这次天皇穿上了西式军服，配有西式佩剑，坐在西式椅子上，旁边茶几上放了法式元帅使用的军帽，表现出天皇带头走向西化的决心，所以打扮也与西方君主看齐。与前一年的和式照片比较，第二次拍摄的用心和想表达的信息，明显比较多。

虽然如此，但天皇拍照不是公开的活动。当时政府并没有向外公布拍摄目的，一般相信是受到前一年在美国完成考察回国的岩仓

具视的影响。明治政府也没有公布拍摄这两张照片的确切日期，更没有实时公开和发放。

至于负责这两次拍摄的摄影师是谁，倒是留下了记录，都是内田九一。他出身于长崎，在维新以前已是具有名气的摄影师，更曾拍摄幕府军队。他为天皇拍摄照片时，已经在浅草开设了摄影馆。他获政府任命为天皇的摄影师，还为英照皇太后和昭宪皇后拍摄照片，堪称初代皇家御用摄影师。

天皇照片的首要用途不是在国内发放，而是作为礼物送给当时的驻日外国大使。换句话说，是为了让外国对天皇留下印象。说得更直接一点，这是明治政府为天皇而设的宣传广告计划。

（2）半复制半想象的二次创作——御真影

前文提到天皇不喜欢拍摄，也不喜欢画肖像，但我们现在看到的各式各样、不同时期的明治天皇油画和照片，又是怎么一回事呢？难道天皇“口嫌体正直”吗？这就是接下来的第二个秘密了。

除了上述两次拍照由天皇亲自出席，此后完成的照片和画作，他一次也没有参与。也就是说，后来完成的画作都不是在天皇面前绘制的，是政府雇用画师，根据之前拍摄的照片，尤其以1873年的西服照片为基础，配合画师的想象绘制而成，这些肖像画在当时被称为“御真影”。

1873年以后，所有“御真影”都是半复制半想象的二次创作。其实只要我们细心一看，就会发现这些作品里的天皇大多是同一个角度、同一个表情，只是容貌、样态随着时代变化而有所调整。

还有一点值得我们留意，自1873年后，明治政府一律禁止民间复制天皇、皇后和皇太后的照片和画作，更曾有摄影师因此被罚

款。这是因为政府担心民间会出现滥用、污蔑天皇肖像等犯上的不敬行为，加上明治天皇的样子在当时还没有为大众熟识，政府为了确保不会被误传，于是对此进行严格的管理。

官方制作的“御真影”，当时只可以在宫中、驻外国使馆内张贴，直到19世纪90年代，随着《帝国宪法》推行，才大量向民间宣传。而民众要一睹天皇的风采，除了等待天皇到各地出巡（行幸），远距离瞻仰，便只能等待政府发布官方的复制肖像了。

基于同一道理，我们也就能明白为什么明治时代以及日本后来的货币，不会像外国那样铸印国王、女王的头像或照片，因为这对日本人来说是有辱神圣天皇的行为。一旦铸印天皇的头像或照片到货币上，涂鸦等不敬行为就越来越难杜绝和追查了。不只是明治天皇时期如此，之后的大正天皇、平成天皇，同样贯彻这个方针。

明治政府突然为天皇拍照，是为了进行“天皇外交”，向全世界介绍他们新国家的青年君主。随着时代发展，日本政府进一步强化对天皇和皇室的“神化”工作，使天皇“御真影”的用途日益广泛。直到二战战败，实行新宪法，昭和天皇宣布《人间宣言》为止，天皇的“御真影”都是政府用来维系、团结民心的政教工具。

5．古代天皇怎样让人感知他们的存在？

（1）天皇刷存在感的机会——鸣物禁止令

江户时代的天皇除了最初期的后水尾天皇，曾到二条城与第三代将军德川家光会面和游玩外，其他天皇都不会离开皇宫和京都。换句话说，那时候的天皇基本上不怎么跟外界接触。那么，江户时代的日本人，如何感知天皇的存在呢？这有赖一个重要的时机。

江户时代存在一个制度，即鸣物禁止令。所谓“鸣物”就是指奏乐、歌唱、舞蹈等发出的吵闹声响，甚至包括土木工程建设发出的声音。这个禁止一切活动声响的命令，每逢德川将军和天皇、上皇去世时便生效，而且范围广达全国，有效期大约为30—50日。

具体来说，一旦天皇、上皇和将军去世，在京都的鸣物禁止令大约维持50日；而在江户，天皇的鸣物禁止令一般只维持5日，而将军去世的话却是50日。可以说，江户时代的德川将军在当时京都人的心目中几乎与天皇、上皇同等，而江户人对天皇的敬意只属一般，甚至低于将军。

但是，到幕末时代却出现了例外的情况。当时，支持与幕府合作的孝明天皇患急病去世后，幕府为了维系人心，彰显幕府也是尊王的立场，宣布江户进行长达100天的鸣物禁止令，算是历来最长的一次，甚至比历代将军去世执行的时间都更长。

总的来说，除了幕末的孝明天皇外，鸣物禁止令是天皇在江户时代“刷存在感”的最重要时刻，但主要还是针对京都与江户两地，其他地方则不太受影响。

（2）天皇唯一紧握的大权——更改年号

严格来说，天皇没有那么可怜，不是只能等到去世，民众才知道他们的存在。除那之外，还有一个历史更悠久的、同样间接的方式，能让国民感知到天皇的存在，那就是更改年号。

自公元701年大宝律令颁布，制定第一个年号“大宝”以来，天皇便握有了决定、更改年号的权力。

对于现代人来说，年号的意义已经十分模糊，其重要性也较难理解。对东方社会来说，在西方历法没有引入前，皇家制定的年号代表着一个时代，也就是时间的解释权和控制权。民间的交易、记事等，凡牵涉时间，都需要明记年号和干支来识别。因此，天皇一旦更改年号，对全体日本人来说都是牵一发而动全身的事。

自幕府登场后，天皇制定、更改年号时，多少受到将军或战国时代的天下人织田信长和丰臣秀吉的影响。很多年号都是天皇和朝廷在外界强烈要求下，才随之更改。即便如此，所有权力者都坚信更改年号的人只能是天皇，而不是他们自己。这是为什么呢？

第一，自大宝律令以来，天皇便一直握有控制“时间”的大权，这个历史的传统成为一种意识和信仰，这一点即便是幕府将军都难以轻易否定，更不用说普通民众了。第二，所有武士政权都以侍奉天皇、代理国政作为执政的大义名分，换言之，天皇的权威若不能得到彰显，将军存在的正当性也将受到打击。

因此，每代权力者都需要天皇保持一定的存在感，而年号控制权是能维持传统信仰以及当权者威信的象征。

（3）扭转局面的“天明大饥馑”

在江户幕府的严格控制下，天皇“刷存在感”的机会屈指可数，只要幕府保持强势，这个局面便不易被打破。可是，时局变化

无常，长久的强势统治本来就是不可能的事。扭转局面的契机终于在江户幕府成立180多年后出现了。

1787年，史称“天明大饥馑”的天灾爆发，农作物歉收，各大城市的米价暴涨，责任重大的幕府却束手无策，以至于各地出现“米暴动”。饥饿的灾民袭击米商的仓库，大肆抢掠，就连天皇所在的京都也不能幸免。而京都市民首先找的是幕府派驻当地的京都町奉行（即京都市役所），但他们同样无法解决问题。

在这个时候，同样受米价高涨影响的朝廷与天皇当然没办法当英雄，但当走投无路的京都民众转向神明求助，希望奇迹发生时，便把久居深宫的天皇也当作神明膜拜，希望这个天照大神的子孙能拯救他们。

当时在位的，是出身天皇家族旁系、几经波折才继位的光格天皇。也因为这些经历，这位天皇决定不再沉默。他眼见京民之苦，终于忍不住想要做点回应，于是打破常规，派出朝廷使者要求幕府设法救民。

这个看似简单的呼吁却引起了巨大的政治动荡。天皇打破沉默，指示救灾不力的幕府加把劲，后来大致平息民怨后，京都民众记住的是天皇解救了他们，这使得以京都为中心的民众对于天皇极有好感，也刺激了当时有尊王之志的人。

“天明大饥馑”结束约半个世纪后，以“尊王攘夷”为口号，质疑幕府统治的呼声便在以京都为首的西日本日渐高涨。

6．近代的“大元帅陛下”是如何形成的？

（1）近代天皇的统帅权

1889年制定的《大日本帝国宪法》（简称《帝国宪法》），明确规定近代天皇拥有三大权限，即国务权、统帅权、授勋权。

我们先来说说统帅权。日本在二战时侵略东亚诸国，战败后被盟军主持的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判定为战争罪行，身为一国之君的昭和天皇虽然通过与美国谈判，得以免责脱身，但战时天皇握有的统帅权一直成为史家、政治家讨论的课题。

所谓的统帅权就是按照《帝国宪法》第11条，有关“天皇统帅（帝国的）陆、海军”一节，言明：“天皇是帝国最高军阶的军人——大元帅，拥有指挥、统率军队的权限。”自《帝国宪法》颁布后，明治天皇、大正天皇和战前的昭和天皇都被称为“大元帅陛下”，其统帅权具体分为三类：

第一，大元帅的发令称为“奉敕命令”，又称为“大本营命令”，进一步细分为对陆军下达的“大陆命”和对海军下达的“大海令”。不过，“大本营命令”虽然是以天皇的名义下达的，但原则上均需由海、陆两军的总长奏请，然后由天皇许可。换言之，天皇在“大本营命令”上，实际上只有许可权和最终发出权，没有提案权。

第二，天皇参考陆军参谋本部和海军军令部的意见后，对国家军队下达战略作战方针。最著名的例子是，昭和天皇在二战期间曾多次对已制定的作战方针发表意见，最终使海、陆军修正计划。

第三，鼓励士气，也就是让军队士兵感觉到天皇是军队最高统帅。阅兵、授旗和师团长任命等军务仪式，都是具体的方式。

（2）天皇与《军人敕谕》

《帝国宪法》明确规定了天皇统帅权与“大元帅陛下”的具体职务，那么，天皇统帅权的源流为何？

先回想古代天皇与军事的关系，除了极少数传说中的天皇曾率领军队亲征，大多数天皇是不参与军事行动的，只会授予出征的将领象征天皇的节刀。到了中世纪则会颁授军旗，而到了幕末的鸟羽伏见战争时，萨摩藩曾伪造天皇御旗，一直到大政奉还后，才制作官方的天皇御旗。

军旗之外，天皇与近代军队的关系，到了维新政变成功后才逐渐成形。早在《帝国宪法》制定前，两者的关系便有雏形，就是1882年明治天皇向帝国军队下达的《军人敕谕》。

《军人敕谕》的制定与当时国家军队屡屡不稳有关。明治维新以来，日本各地出现了几次军人叛乱，1878年更爆发由守卫天皇的近卫炮兵团发起的“竹桥事件”。兵乱平息后，政府有鉴于军纪不良，于是以当时陆军大臣山县有朋的名义，率先向全体陆军发出了《军人训诫》，告谕天皇的绝对性和神圣性，要求军人严守军纪，禁止干政。

到了1882年，改为以天皇的名义向海、陆两军下达《军人敕谕》，这是山县有朋统筹、当代思想家西周起草的。《军人敕谕》与前述的《军人训诫》原则相近，开头便强调：“我国军队世代皆由天皇统率。”强调天皇对军队拥有绝对统帅权。

另外，《军人敕谕》强调五个军人操守和道德教条，即以忠为本、重视礼仪、崇尚武勇、重视信义和重视质素；又鼓励士兵无条件地服从上级指挥，确实执行命令，必要时慷慨就义、牺牲生命等。

（3）无力的“大元帅陛下”

《帝国宪法》颁布后，军部与政府为了强化军队对天皇的忠心，陆续要求士兵背诵《军人敕谕》，视它为最重要的教条。在这种军人教育之下，表面上看似解决了军纪问题，但结果恰恰相反。问题的根源在于，《军人敕谕》和《帝国宪法》虽然强调天皇对军队有绝对统帅权，独立于行政之外，再由陆军参谋本部和海军军令部共同辅助。但是，对于天皇如何具体确保统帅权上行下效，又如何平衡军、政两方的利益，却十分暧昧。这些问题在二战以前，完全由天皇和维新时代的元老们努力协调。

可是，甲午战争、日俄战争后，军部对政府的干涉越来越明显。与此同时，努力协助天皇维持军政平衡的元老们在20世纪20年代陆续死去，“大元帅陛下”天皇便担起重责。结果证明天皇对军政只有名义上的指挥权，无力阻止军部尾大不掉。

虽然，功勋元老死去前后，天皇之下已经增设数名侍从武官长和侍从武官担任天皇的军事顾问，在海、陆两军间传达天皇指令，并向天皇呈交陆军参谋本部和海军军令部的请示案。然而，想单靠少数侍从武官长和侍从武官来统治海、陆两军，完全是不可能的（到了二战才增加到43人左右）。二战期间，天皇平常不会一直参与军事会议，身边又只有日常跟随的武官长和武官各一名，要及时获知战况和进行决断是十分困难的。

战败后，日本政府主张保住天皇，立即向盟军总部强调“天皇无责”，主张身为“大元帅陛下”的天皇根本无力只身制衡军队。但战后力主天皇有罪的澳大利亚等国，还有日本史学界及反战团体，列出诸多证据反驳这一说法。

7．菊花、樱花与天皇各有什么关系？

（1）樱花与菊纹的迷思

不知道读者想到日本的花时，会先想到菊花还是樱花呢？对于经常到日本赏樱的读者来说，必然十分熟悉樱花，甚至有不少外国游客以为樱花是日本的国花。纵然樱花俘获了国内外游人的心，事实上，日本法律并没有明文规定国花，樱花只能说是日本最具代表性的花种而已。

日本皇室使用菊纹（另外还有五七桐），这个纹章也用在日本国民的护照上，宛如日本人的标志。菊花是象征天皇的花纹，而依现行日本宪法，天皇是日本与日本国民的象征。然而宪法又标榜天皇与国政分离，因此我们只能勉强地说：菊花在意识形态上算是“准国花”，但恐难成为国花。

二战前的日本标榜天皇至上的“皇国思想”，但为什么没有将菊花定为国花呢？道理很简单，上文提到菊纹是天皇家的纹章，在明治维新后，为了最大限度提升天皇的权威，为发动政变打倒幕府的新政府正名，于是明治政府开始严格管制菊纹的使用，一开始限制平民百姓使用，到后来连皇族、华族也受到限制。

菊纹成为至高无上的、天皇才能使用的特别花纹。在“国家因为有天皇而存在”的意识形态下，自然不能将菊花定为国花。再说，由于菊纹是天皇家的独家纹章，而不是国家层面的，因此，明治维新时期的官方活动为免犯忌，自然不会大量张贴菊纹。当年新政府成立后，派遣军队打倒东日本各地的旧幕府军，当时动用的御旗其实是“日月之御旗”，而不是“菊纹旗”。近年根据漫画改编

的电影《浪客剑心》第一部的开头，便错误地将“御之锦旗”描绘成“菊纹旗”，与“日月之御旗”混为一谈了。

总之，菊纹在日本政治与文化上具有特殊性，直至军国主义、皇国思想日渐远去，仍保持着暧昧的特别意义。菊花则降格成为普通的花种，在日本国民心目中，地位已难与樱花相比。

（2）樱花的暗黑史

虽然樱花已经成为日本国民的“爱花”，但回首往昔，樱花也有过灰暗的过去。明治维新后，日本先后打败沙俄和清朝，一跃成为亚洲第一的帝国主义强国，强化了它的扩张野心。正所谓“贪胜不知输”，日本政府开始谋划进一步夺取其在中国的权益，同时，也在不断强化国民所谓的“爱国心教育”，其中一个重要的“教材”便是樱花。

日本人对樱花的钟爱，历史悠久。就近来说，从江户末期的国学大师本居宣长的作品，到明治初年的文学，赞赏樱花的文章多如星宿。而明治天皇为了与外国政要拉近距离所开设的“御观花会”（模仿西欧国家的宫廷宴游会），便以樱花为主题，即后来的“观樱会”。教育普及后所编写的国民中小学课本，也必然提到樱花。不过，在甲午战争、日俄战争前，对樱花的描述只停留在“名花”“日本的花中之王”，还没有特别将樱花与国民的爱国教育联系在一起。樱花以外，梅花和松也是能代表日本的名花名木。

甲午战争、日俄战争后，大量以樱花为主题的军歌，以及与靖国思想有关的文章，在军部主导下大量出现。樱花盛开后凄美地凋谢，被政府利用作为国民“忠君爱国”的理想形态。例如，明治晚期的一首陆军军歌《步兵的本领》，便有以下句子：“既生为大和男子，当化身为散兵战中之花凋落。”

这个“散兵战中之花”的花，当然就是樱花了。到了二战前夕，1933年改版的《小学国语读本》里加入了以下句子：“开花了，开花了，樱花开花了！ 前进吧，前进吧，兵队前进吧。”

樱花盛开与军队前进（发动战争）紧密结合。这种利用樱花以及象征国民意识的“大和魂”教育和国家宣传，在1937年全面发动侵华战争后日趋强烈，与“皇国精神”“为君舍命”的军队思想，一起成为战时日本人的精神支柱和唯一被认可的价值观，甚至是协助日本在亚洲发动侵略战争的标签。军中、国内倡议在占领地广种樱花，即“进军之樱”，作为“建设大东亚共荣”的重要任务之一。

（3）爱思哀愁交缠的“国之华”

随着日本战败，日本各地大量栽种的“国之华”樱花，在美军空袭中被大量烧毁。战败后，樱花作为军国主义的象征之一，一度成为民众避免谈及的话题，急求与军国主义划清界限的日本人也不在少数。

然而，自古以来对樱花的钟爱，以及维新以来耳濡目染的感觉，使得樱花对大部分日本人来说仍有无可抗拒的魅力，就连占领日本的美军也无意将樱花“赶尽杀绝”。战争完全结束后，日本国内在美军主导下实行新宪法，宣布与军国主义“分手”，一时被压抑的“樱花爱”也陆续复苏。

20世纪五六十年代，以大阪、东京为首，重新种植樱花的运动在日本各地进行。配合1964年举办东京奥运会，政府更加积极推动，着手重建国民对国家的认同感，洗刷战败的污点，也将樱花打造成为推动日本旅游发展的法宝。这些措施维持到现在，日本借助

樱花，增强“软实力”和文化输出。樱花在日本人心目中的地位，重新回到顶点，甚至超越战前，成为直接、纯粹的“国之华”。

第十章　天皇的家族

1．皇太子如何产生？

（1）新、旧《皇室典范》里的皇太子

2019年即位为新天皇的浩宫德仁是平成天皇的长子，也就是日本皇室制度下的皇太子。根据现行的《和平宪法》第二条，日本天皇实行世袭制，皇位继承依照国会决议订立的《皇室典范》的规定。第一条规定：“皇位由归属皇统之男系男子继承。”

第二条则规定了继承的顺位：皇太子、皇长孙（皇太子的儿子）、皇太子的其他儿子及其子孙、皇次子（皇太子的弟弟）、皇次子的子孙。

另外，战前实施的旧《皇室典范》第一章第一条，也明确规定皇位继承的原则与皇太子的定义。

第一条：大日本国以祖宗之皇统，由男系男子继承之。

第二条：皇位传于皇长子。

第三条：皇长子不在，则传于皇长孙。

第四条：皇子孙继承皇位，以嫡出优先。

比较战前与战后的《皇室典范》，除取消了“嫡出”原则，基本精神不变，以传位给长男长孙为优先，而且将方法提高到“祖宗”规定，这意味着战后制定的《皇室典范》强调嫡、长继承乃源于古代的制度与传统，即所谓“万世一系”。

天皇制下的皇太子是法定的储君，在目前大多数君主立宪制的国家，以及中国古代不少王朝，皆遵此道。

但日本皇太子制与皇后制一样，曾中断数百年，也经历了很多演变，某种程度上可说是全新的产物。尤其关于“皇太子”是不是等于“长子”的问题，更是争议不断。接下来，看看在日本历史上，“储君等于皇太子”的演变，从而帮助我们理解现今的皇太子。

（2）不稳定的皇位继承制度

日本历史上的确曾存在过皇太子制，但其中仍有诸多不明确的部分，皇太子既不一定是长子，他的权力也不多，而且从现存文献和出土文物里，也确认当时的王位继承制度似乎并没有硬性规定父子相承，实际上多次出现过兄弟相承。因此，我们只能说古代日本的皇太子制只是一个曾经出现、但没有成功落实和稳定推行的制度。公元6—7世纪时存在过“日之御嗣”，“日”就是天皇，真正意思是“天照大神的御子孙”，后来“日之御嗣”慢慢转化为皇太子的代名词。

不过，大和朝廷初期曾有过豪族酋长出身的大臣共同推举王子继承王位的情况，换言之，册定“日之御嗣”时也要考虑群臣的意见。这曾引发多场豪族与个别王族、王子勾结，与其他党派争夺王位的事件，王位继承处于极度不稳定的状态。

到了7世纪左右的律令时代，终于出现了名副其实的皇太子制，这是为了否定上述群臣干预王位继承的新政策。8世纪订立的《大宝律令》与《养老律令》便有“继嗣令”，均明文规定“凡皇兄弟皇子皆为亲王（女帝子亦同）”。也就是说，公主可为天皇，而她所生的儿女都可为亲王，都有资格继承皇位。

因此，7世纪时的大和朝廷承认女天皇及其子女的继承权。这是因为当时的天皇与皇后都是王族出身，所以按照这个道理，只要能保证继承人是王族血脉，皇太子不一定是天皇的长子，公主也可被立为皇太子，孝谦天皇就是例子。

古代的皇太子制并没有近代这样的硬性规定。到了中世纪，藤原家以外戚身份与天皇家结亲后，皇后不再是王族出身的女子。为了确保天皇家系血脉，以及维持与藤原家的关系，继承者从“必须是皇太子”，逐渐改为“男性直系亲族”，即天皇的儿子、孙子，这一规定成了后世遵循的原则。

此后的皇位继承人不一定是天皇的长子，中世纪以后的皇太子制度也形同虚设，渐渐成为历史。全由在任天皇“圣心独断”，决定继承人，而选择时会考虑当时的政治情况。

所谓的政治情况，是当时能左右人选的当权者，如摄关藤原家和幕府将军的意向。而镰仓幕府末期至南北朝时代则发生两大家系的皇子交互继承皇位，最后引发对抗分裂，史称“一天两帝南北朝”。到了室町时代，南朝天皇兵败，向胜利的室町幕府以及幕府扶持的北朝天皇屈服，皇统合而归一，王权分裂的问题才得以解决。综观天皇历史，南北朝时代是一个例外。

总而言之，自中世纪至近代为止，皇位继承在原则上转变为男子继承制，但又没有必然由嫡长子继承的规定。那段时期的天皇们，有近一半不是前天皇的长子。所以，明治维新以来所谓的“祖宗规定”，不过是当时人为了稳定皇位继承，继而强化天皇权威而想象出来的托词和理想，然后再强行使之成为不可违抗的“依据”。

2．一桩禁宫丑闻如何折磨后阳成天皇？

（1）禁断的宫闱丑闻

婚外情是典型的剧情设定，各位读者有没有想过，这种让男主角“戴绿帽”的剧情曾真实发生在江户时代的某位天皇身上。这位遇上“男人最痛”的天皇，便是后阳成天皇，他见证了统一日本的丰臣家没落、德川幕府接掌天下大权的历史时刻。这位获得丰臣秀吉照顾扶持的天皇，怎么会遭受“戴绿帽”的奇耻大辱呢？这要从他治下的朝廷风气说起。

在不少人心目中，丰臣时代就是侵略战争的代名词，历时七年有余的朝鲜战争耗尽了丰臣政权的元气，但从文化史的角度而言，它仍然是以绚丽灿烂著称的文化复兴时代。以黄金茶室为代表的茶道文化，还有和歌、连歌的复兴，都是这十多年国内政治安定而成就的。

受惠者除了丰臣秀吉本人与他的丰臣政权，还有一直追求通过文化、文艺的复苏，恢复权威的朝廷与后阳成天皇。在丰臣政权大力资助下，天皇与他的后宫，还有侍奉天皇的贵族们，得以重享往日的文化宴会，可谓夜夜笙歌，风流逍遥，战国时代的困苦日子早已被抛诸脑后。

然而，困苦生活造成的风纪败坏问题，却没有随着生活安逸而消失，仍然残留在宫中。而且，宫廷里虽然逐步恢复了文艺活动，但由于战国时代的阻隔，文艺并未发展，反而是以回想往昔为基调。其中，《源氏 物语》成为天皇和贵族喜爱的文学作品，成为他们追思往昔风流生活的凭借。

后阳成天皇万万没有想到，这会成为他的噩梦。那时的禁宫里，他与其他时代的天皇一样，身边尽是一群贵族家庭出身的女官，负责天皇的起居饮食以至性生活。当时的后宫没有后来江户城大奥那样的禁令，因为所有的女官都知道自己是为了侍奉这个国家的最高代表而存在的。也因为这个原因，天皇的女官通过自己的家族出身来划分阶级，然后互相监督。

前文提到的各种文艺宴会，天皇与女官自然会积极参与。表面看来是纯属诗文歌舞的交流活动，但随着交流日趋频繁，女官与天皇以外的男性贵族的接触也多起来，结果让天皇痛心疾首的禁宫丑闻便发生了。

时间是1609年7月。揭发的过程已不可考，只知道有五名获天皇宠幸的女官与十多名中上级男性贵族有染，而且是多角恋的关系。更让天皇难堪的是，这十多名贵族中不乏自己重用的臣子。换言之，天皇心爱的女人与自己宠信的臣下联手给了天皇最大的羞辱。

（2）德川家康的介入与处断

五名女官与十多名男贵族有染的丑闻，如果发生在当今社会，足以让各大媒体日夜追踪报道。幸好在那个时代，丑闻只在宫中扩散，但这宗十分火爆的事件很快也传到了幕府前任将军德川家康那里（他当时已退休，被尊称为“大御所”）。

事实上，早在这桩丑闻爆发的几年前，后阳成天皇的后宫便有过几次零星个案，也是由德川家康协助处理。只是当时涉案的女官身份低，而且人数少，所以没有闹成大事件。

可以想象当时天皇后宫风纪败坏的严重性，而且这些事件中都出现了同一个名字——猪熊（山科）教利。这位中上级贵族是在天皇身边侍奉颇久的人物，但操守记录不好，不难想象他利用了天皇的宠信。

1609年的丑闻规模之大，前所未有，猪熊教利也涉事其中，终于惊动了天皇、太后、其他女官和德川家康。身为最大受害者，天皇本想将涉案的贵族、女官通通处死，以泄怒火。由此可见面对这般羞辱，他是何等愤慨。但他心知不能无视刚成立的幕府，便命令幕府协助。

不过，家康与幕府却不打算按天皇的心思处理。家康在回复天皇时提到，丑闻说明宫内风纪问题已不是一两天的事，杀人无助于解决问题，反而会损害天皇的仁德。言下之意，天皇没有管好自己的后宫，本身也有失职之处，杀人解恨只会显得天皇德行有亏，有损王威。结果，家康代替天皇处理了肇事人等，五名通奸的女官被流放孤岛，了此残生；至于轻罪的贵族，不久后还获得了家康的赦免。

猪熊教利在事件曝光后便与另一名同样重罪的贵族潜逃到九州日向国（现在的宫崎县），之后被抓捕归案，两人最终在同年10月被押回京都，均被家康判处死刑，在京都上善寺伏法。丑闻虽然就此了结，但是最大受害人后阳成天皇受到如此大的羞辱，却不能顺意处决肇事女官和贵族，反而遭到家康与幕府暗讽、批评，更让他感到郁闷无趣、心灰意冷。于是在同年底，后阳成天皇便向幕府提出有意让位给三皇子（后来的后水尾天皇）。

家康与幕府对此也本无异议，只是家康当时希望自己的小女儿市姬，能在三皇子成为天皇前，确定成为他日后的妃子。可是正当天皇让位几近成功之际，市姬夭折而死，使得家康要另想办法。为

此，家康与幕府喊停了后阳成天皇的让位准备工作。最后因为后阳成天皇再三派人催促，终于在4个月后（1611年3月底）成功让位，迎来解脱的一天。

回到宫闱丑事，事件结果让德川幕府找到介入朝廷事务的口实，使幕府进一步管控朝廷，为日后制定著名的《禁中并公家诸法度》带来契机，不知道这是天意还是巧合。

3．禁宫女官们与天皇是什么关系？

（1）身肩多种职责的女官

古今中外的国王都需要有人执勤侍奉，而他们身边的配偶则有养育后代的责任。在诸多王国之中，较少出现必须兼顾上述两种责任的国家，日本算是其中之一。

自古代以来，在天皇身边负责其起居饮食的职员，称为女官。当然，女官以外也曾有男官，但随着时代演进，宫中的职务大多由女官负责。

女官源自律令制时代，是在皇宫里执勤的女性官员，又称为“宫人”，后来又被称为“女房”。她们负责的职务繁多，按部署分为十二司，即内侍、藏、书、药、兵、闱、殿、扫、水、膳、酒和缝。不过，随着律令制效能低下，朝廷职能萎缩，最后只剩下内侍司，而且一直保留到明治维新后。

内侍司由尚侍、典侍、掌侍和女孺组成（前三者被称为“三等官”），以尚侍为长。尚侍是侍奉天皇左右的重要职位，在平安时代还负责传达天皇旨意。典侍、掌侍也有同样的职能，但只能在尚侍不在时传达天皇旨意。至于女孺，一般是下级贵族和民间妇女，只是打杂的女工，地位远比前三者低。

除了侍奉天皇左右外，内侍司的女官在中世时代开始，负责守护安放在宫内温明殿中、俗称“三种神器”（镜、剑和勾玉）之一的镜。我们曾经提过，从那时候开始，镜被认为是天皇的皇祖天照大神的灵魂所在，以及它显灵的媒介。因此，比起常伴天皇身边的剑和勾玉，镜更须悉心保护。

另外，由于中世纪以来的天皇生活在女官包围之中，其饮食起居的一举一动自然由女官来记录。而天皇在宫内行走或出宫时，三种神器中的剑要与他同行，捧剑、护剑的工作也由女官负责。

以上这些重要的工作都落在内侍司的女官身上，可见中世时代开始，随着其他十一司逐渐消失，内侍司的功能越来越强大，走向多功能发展。

（2）女官也为天皇生育后代

内侍司里的尚侍、典侍和掌侍还负责侍候天皇，为天皇生儿育女。这里先说明，在大王时代，大王的配偶是大后，大王改称天皇后，大后也改称为皇后或后。

至于其他妃嫔，则没有严谨的制度。天皇自中世纪以后便很少设立皇后，而是从各个上级贵族家里招纳未婚少女入宫，成为“女御”。但是，除了这些出身高贵的“女御”，天皇还将侍寝的工作扩大到内侍司的尚侍、典侍和掌侍。三者渐渐与“女御”一样，为天皇繁衍后代。他们生下的儿女当然也成为正式的皇族子孙，甚至成为皇位继承人。

如近代的明治天皇与大正天皇的生母便是典侍、掌侍出身。虽然在她们之上还有摄白出身的女性成为天皇的正室，但生下天皇继承人的典侍、掌侍也能母凭子贵，获得特别的荣誉。不过要留意，因为明治时代奉行一夫一妻多妾制，到了后期更只强调“一天皇一皇后”（一夫一妻）的精神，加上《帝国宪法》确立后，也废除了纳妾制。因此，大正天皇的生母柳原爱子不是明治天皇的正室，无法在明治天皇逝世后成为皇太后，官方也不承认她是大正天皇的母后。

（3）女官制度的细分与改革

回到女官的发展。在平安时代后期，高级的尚侍越来越少出现，典侍、掌侍成为主要的“多功能女官”。随着尚侍、典侍和掌侍的功能多样化，以及活动增加，种类和等级也开始细分。往后数百年直至明治维新，三者陆续被细分为尚侍、典侍、掌侍、命妇、女藏人、女孺、御末、御差等，再按出身，分为上﨟、小上﨟、中﨟和下﨟。尚侍和典侍属于上﨟、小上﨟，掌侍和命妇是中﨟，女藏人以下皆是下﨟。

随着女官人数越来越多，负责的工作也越来越广泛，随时都会看到这些女官。例如，从室町时代开始，女官里的典侍、掌侍为天皇宣读旨意之余，还会以天皇使者的身份，用文书向外界传递天皇的旨意，这一度还成为制度。这些写给外界的文书，便是有名的“女房奉书”，是现在研究中世、近世天皇动向的重要史料。

明治维新后，在木户孝允和西乡隆盛的强烈要求下，后宫的女官制度迎来巨大的改革。从以前宫内只有天皇与女官的局面，改为由复置的皇后来统率女官们。传宗接代的工作，原则上也属于皇后（只有在皇后无法完成任务时，才由典侍和掌侍来负责）。不过到了昭和时代，曾到英国交流的昭和天皇强调一夫一妻制，不再设置典侍和掌侍等侧室（但在法理上，仍然有复置的空间）。

负责宫内行政、杂务的女官，到战前为止，分属皇后和皇太后；战后则只剩下女官长、女官、侍女长与侍女长补，分置皇后与皇太子之下。

从昭和时代开始，作为“特别公务员”的女官的入职资格逐步放宽，平民女子、已婚妇人也可以成为女官。与从前女官不同的是，她们不可住在宫中，而是像普通上班族一样，从自家到宫内出

勤。女官们也因为职务的特殊关系，原则上不可向外界透露工作情况和宫中之事（一般相信她们签署了保密协议）。

4．明治天皇如何进行“皇宫现代化”？

（1）明治维新前后的后宫与天皇

在幕末的动荡时代，积极维持朝廷与幕府合作关系的孝明天皇因急病去世，少年太子睦仁匆忙即位成为明治天皇，他与宫廷处于怎样的局面？为什么他们也成了“维新”的对象呢？

明治天皇是孝明天皇唯一顺利长大的儿子，曾经患上天花，幸好大难不死，最终在父皇去世后，接任了天皇之位。

幕末宫廷是怎样的风景呢？那时候的天皇是在女官丛中长大的男性，除了少数的年轻男性侍从外，天皇的日常起居、饮食、房事，以及政令和消息，都由一群女官负责。睦仁小时候曾短暂住在外祖父中山忠能的宅第里，由于急忙继位，才回到皇宫继续接受这些女官的照顾。因为这个原因，少年天皇在改革女官制度前的数年里，生活在被女官包围的环境里。

按照传统，睦仁脸上会被抹上轻白的薄粉，牙齿会被染黑，这是传统京都贵族的风气，在江户时代是再正常不过的。然而，身处日本历史转型之时，在成功夺取政权的维新派眼里，却是不合时宜的。

可是，既然天皇的事务大多由女官负责，而后宫也是天皇的“圣域”，外臣要跟天皇取得联系，就要通过女官来传话，从而获得批准。就算夺取了国家政权，维新派公卿贵族与新政府要员一时也难以从女官手中夺得与天皇直接联系的权力。因此，要更有效地利用天皇来推动国家走向现代化，首先要革新的就是后宫传统。

这般大刀阔斧的宫廷改革，也会刺激那些原则上同意抬高王权、尊王倒幕，但骨子里反对西化、现代化的京都贵族，当中的政治风险不言而喻。

不过，在成功结束幕府统治的维新政权面前，这些反抗已然微不足道。带动政变的西乡隆盛、大久保利通和木户孝允等人，毅然发动了这个巨大的改革。

（2）“皇宫现代化”与维新

对维新派而言，他们真正关心的是如何尽快使天皇和宫廷成为国家现代化的标志。因为标榜“王政复古”，天皇带领国家向前走的同时，如果宫廷仍是自古以来的样子，将会自相矛盾。他们要塑造的天皇，是坚强、威风的男性，而不是活在女人圈中，化着薄妆的懦弱贵族。

1871年2月，西乡隆盛上京接受政府恩赏，6月正式接受官职。之后，他便与木户孝允、大久保利通以及贵族出身、支持宫廷改革的德大寺实则等人，在没有天皇的指令下，率先对宫廷进行“大扫除”，事后再获天皇追认和批准。

8月1日，宫中的女官全数被辞退。之后再以新政府的名义重新任命部分女官，废除了旧有的门第制度，降低任职女官的资格。

另外，为了不让一众女官身处天皇与外臣之间，导致隔阂，新政府让当年才20岁的皇后一条美子（后来的昭宪皇太后）负责统驭新改组的后宫。

下一步便是让政府介入皇宫。早在发动“大扫除”的两年前，即1869年，新政府内新设的宫内省便是为管理天皇与皇宫事务而设立的机构。初步实施“大扫除”后，政府便指令宫内省的次官（宫

内大辅）万里小路博房在名义上辅助年轻皇后，同时又任命主导旧萨摩藩和长州藩出身的官员成为天皇的侍从长，与改革派的贵族们一起协助政府接管皇宫，扫除“百年之害”。

然而，留下来的女官们也不是省油的灯，她们试图阻止皇后接管宫内事宜，结果政府正式奏请少年天皇和英照皇太后支持政府以皇后为中心，对宫内进行改革。这毫无疑问获得了批准。

在天皇的圣旨下，强硬的女官们失去了大义名分，被迫接受皇后的管辖。到了1872年4月，英照皇太后与昭宪皇后追随天皇迁居东京，这些不愿离开京都的强硬派女官正式被革职弃用。自此，在东京新皇宫里，由昭宪皇后管理的宫廷正式成立，新政府改革皇宫形象的目标也算基本完成了。

5．为什么日本必须有天皇，但不一定需要皇后？

（1）皇后的诞生与册立仪式

日本在中世纪后，整整500年内没有皇后（最后一任皇后出现在14世纪中期）。那么，为什么天皇不再需要立后呢？

大和朝廷仿照唐朝的典章制度，在8世纪初实施《大宝律令》和《养老律令》。在平安时代成书，专门解说前述诸律令内容和精神的《令义解》便提到了皇后的定义：天子之嫡妻，按例只设置一人。此外，天皇册立皇后的仪式和大婚的仪式，理论上有着密切关系，但两者却不一定同时执行，到了平安时代，两者大多分开处理，大婚先行，立后在后。

由于现代册立皇后的方式与古代不同，背后的意识形态也有很大差异，近现代的皇后事宜将另外详述，这里先谈古代的立后仪式。

在平安时代，朝廷所用的礼仪书详细记载了天皇册立皇后的程序，即天皇大婚的仪式和做法。在13世纪以前，日本的社会各阶层仍然流行“婿入婚”，即女婿到妻子家中居住的习俗。但由于天皇是一国之主、皇祖天神的子孙，他的婚礼一直是现代普遍的“嫁入婚”，即妻子到夫家居住。

按照平安时代的礼法，获选为皇后（当时一般称“中宫”）的贵族女子，会在入宫前先获天皇赐予位阶，提升身份，一般是三位或四位。入宫（当时称为“入内”）当日，会由近卫中将或近卫少将迎接，时间均定在晚间。

整装待发的准皇后会由家人送到皇宫的北门，然后在宫门前，敬听宣旨，再转坐专用的辇车到达夜御殿，等待天皇到来。天皇到达后，先共进晚餐，然后成婚。第二天，天皇照例临朝，接受祝贺。然后，他会指派宣命使在殿前正式册封皇后，并宣布皇后寝宫的职员任命等事宜。

（2）昙花一现的皇后

按照上述律令制，皇后作为“天子之嫡妻”，只能是皇族出身的女子（称为“内亲王”）。其他非皇族出身的妃妾则称为“女御”和“女官”，负责宫中庶务和繁衍后代，地位是低于皇后的。换言之，大和时代和奈良时代，为了保证皇族血脉的纯正和神圣，皇后基本上是天皇的近亲女子。

可是，这个原则在729年被打破。当时的豪族藤原不比等的女儿光明子，被圣武天皇册立为皇后，这是史上第一位非皇族女子成为皇后。不过，9世纪以后，皇后不再是常设、必设之位，或不一定只有一人担任皇后。

这个特异的例子，发生在摄关藤原道长之女彰子身上。当时的一条天皇已有皇后藤原定子（彰子的远房亲戚），但在道长的策划下，成功让天皇再纳彰子为皇后。换句话说，一条天皇同时拥有两位皇后。

11世纪以后，“皇后乃天子之嫡妻”的规定，逐渐成为形式，除了出现两位皇后外，也曾经有天皇的姊妹成为皇后的例子。11世纪，堀河天皇年幼，他的姐姐媞子内亲王被立为皇后，以养母的身份扶持他。当然，这种做法只是形式，不代表有乱伦关系，不过皇后的身份也由此变得含糊，不再是天皇的法定妻子、“天子之嫡妻”。

与此同时，随着11世纪以后朝廷统治能力衰退，武士政权崛起，朝廷无力负担册立皇后仪式所需的费用，而且朝廷也不需分置多个部门去维持营运，皇后寝宫里的职员也被裁去。

随着与中国王朝交流日疏，仿照唐朝设立的皇后制、律令制度已成为过去。到了14世纪的室町时代开始，便几乎没有再册立皇后，皇后职能由宫中女官们高级别的尚侍、典侍、常侍取代。

不过在江户时代初期，曾出现一次复古的册立皇后例子。天下太平后，德川幕府第二代将军德川秀忠，按照亡父德川家康的遗训，积极策划让自己的五女儿和子，成为后水尾天皇的皇后。这个计划是为了强调天皇与幕府同心协力，带有强烈的政治意图。而且自和子以后，江户时代的天皇均不再立后，所以和子是个特例。

在江户时代260多年的岁月里，皇后继续成为历史名词。经过动荡多变的幕末和明治维新后，明治政府才在“天皇万机亲裁”的精神下，重整相关制度，包括皇后制。当然，其意义已经与古代皇后制迥然不同了。

6．昭宪皇后的“国母”形象是怎么确立的？

（1）明治维新后的皇后定位

在王朝时代，皇后一般称“后”或者“中宫”，是天皇的“妻室之首”，负责为天皇生育继承人，以及在前天皇去世后作为新天皇之母，扶持新君。

中世纪以后，皇后已不常置，明治维新以前的后宫是“一个男人被很多女人包围”的空间和架构，天皇的所有事情皆由这些女性代劳、主持。那么维新后的皇后又是怎样的呢？

我们再次重申，明治维新既标榜进步（向西方学习），同时也主张复古，这个“古”就是追溯传说中第一个天皇神武天皇的理想统治形态。这是源自江户时代中期以来的国学构想：天皇以天神子孙的身份统治世界，万民百姓忠诚相随，诸国信服。

不论这个理想有多虚幻，在这个将进步与复古混为一谈，看似矛盾的构想下，维新政府除了恢复天皇统治国家的复古模式外，也不忘恢复自古以来的理想家族模式——复置作为天皇配偶的皇后。

复置皇后就是为了实现源自中国儒家思想的理想夫妻关系，即“男耕女织”“夫主外，妻主内”“夫唱妇随”。男耕女织的观念早已存在，《日本书纪》便提到传说中的继体天皇，曾主张帝王应该亲自耕作，作为劝农的表率；后妃则亲自种桑养蚕织衣，作为妇女持家的模范。

虽然这个理想在明治维新以前基本上从未实践过，与复古思想一样，只是假托古人来刻画理想，但是近现代天皇与皇后一直秉承

着这个理想。以2019年刚退位的平成天皇与皇后为例，他们会在每年4月举行一个仪式。天皇亲自到东京皇居里的水田播种，而美智子皇后则到红叶山御养蚕所亲自授桑，利用蚕丝来编织，亲身实践男耕女织的理想。

虽说这个仪式的象征意义大于实质意义，但可见明治维新赋予皇后的功能已经不再局限于“生育天皇继承人”，更重要的是以“天皇之妻”“贤内助”以及日本女性总代表的身份辅助天皇，同心协力去统御国家。

（2）昭宪皇后的西化

明治维新赋予皇后“内助之功”的任务，那么第一个担当此重任的昭宪皇后做得怎样呢？

昭宪皇后乃贵族出身，本是一位深有教养的女性，她精通和歌与《源氏 物语》，又跟其他待嫁的贵族女子一样，学习各种为人妻子应有的涵养。但是在国家变革的时代，旧时代的教养显然不足以应对。而且，皇后一开始与明治天皇聚少离多，一直没机会正式涉入新时代皇后的工作。一直到1877年的西南战争后，年轻的明治天皇意识到自己是一国之君，开始积极地与皇后一同担负起革新国家的使命。

昭宪皇后的第一个任务，是在西乡隆盛等人进行后宫改革后，成为后宫领导者。除此之外，她的例行公事就是以天皇之妻的身份，陪同天皇巡视各地，检阅军队军舰，以及接见外国驻日公使。

对于明治政府而言，接见外国驻日大使的重要性不言而喻。特别在伊藤博文、岩仓具视等政府首脑极力主张学习西方的方针下，天皇、皇后与皇室作为国民表率和国家代表，必须展现出积极与西

方国家打交道的态度，从衣着到公开活动都尽量以德、法两国为蓝本，进行改革。

例如，19世纪80年代开始定期举行的赏樱赏菊会、国宴，还有与外国使节夫妇进行社交等，都是皇后必须陪同天皇出席、主持的国家活动。另外，在当时外务卿井上毅的推动下，日本政府在19世纪七八十年代，先后聘请精通欧洲宫廷典章制度的德国驻日公使奥特·格拉夫·冯·德霍夫夫妇与奥特玛·冯·莫尔夫妇到宫中，亲自指导皇后与皇室成员学习西方社交礼仪。

透过德霍夫夫妇与莫尔夫妇的帮助，昭宪皇后更有自信地与各国驻日大使和夫人们进行社交，并继续学习西方国家皇后与贵妇的社交模式和礼仪。到了后来，皇后更获授权，在天皇外出时代为接见各国使节。对此，堪称昭宪皇后师父的莫尔更在自己的日记中，夸赞皇后是“王侯贵妇的典型模范”。

（3）“国母陛下”的诞生

昭宪皇后成功落实西化政策，获得西方国家的青睐和肯定，这只是外交上的成就。昭宪皇后的另一个使命在国内，以天皇之妻的身份，彰显“国母”“贤后”的典范。

自维新政府成立以来，各地不断发生大大小小的叛乱和战事，昭宪皇后便以皇后的名义下赐药品给政府军，以为抚恤。这个工作原本是出于皇后的仁爱之心，但随着日本的对外扩张，在19世纪90年代开始与周边国家相继出现矛盾，从江华岛事件、甲午战争，再到日俄战争，标志着日本从改革转为对外扩张，皇后的角色与职能也随之改变。

尤其是日俄战争时，为了激励国民士气，祈求战事胜利，皇后与由贵族妇女领导的“爱国妇人会”联手，通过发行刊物和公益活动，鼓励全国妇女在大后方投入生产和劳动，又要求全国节俭，以支援前线将士和国家。

那时候曾传出一件事，皇后梦见已故的维新志士坂本龙马，坂本龙马清她协助守护日本海军。该传闻流出后，当时日本国民士气大振，更愿意一致对外。皇后又代表皇族、贵族妇女，以“爱国妇人会”的会员身份到前线基地广岛的医院，亲自慰问因伤被送回国的将士，又赐予各种医疗物品、义肢、义眼、纱布等。自此，日本国内媒体纷纷高呼皇后为“国母陛下”，受万民爱戴，人气更是一时无两。

日俄战争胜利后，日本全国沉浸在喜悦与光荣之中，但战争的后遗症，以及当时社会因为过快发展导致的社会问题陆续发生，肺结核也在战后急速蔓延，成为国民的致命杀手。

昭宪皇后配合天皇的救济政策，与“爱国妇人会”、日本红十字会合作，拨出资金进行救济，多次以行动支持上述两会的慈善活动，又走访多家医院慰问住院病人。

昭宪皇后这种救苦、扶弱、怜恤的仁爱形象，成为后来的贞明皇后、美智子皇后以及现在的雅子皇后的表率，是近现代日本皇后的典范。

经过昭宪皇后改造后的皇后形象，不再是从前那个“天皇的生育机器”，而是恤民爱民、扶持夫君的女性模范。昭宪皇后在晚年更受敬仰，被称为“天皇之御后，国民之国母陛下”。

7. 为什么第一代“平民皇后”美智子成为改变皇室形象的象征？

（1）Micchi-Boom——平民皇后的诞生

有多少读者听过Micchi-Boom？Micchi是平成上皇之妻美智子（Michiko）在读书时的昵称，而Micchi-Boom一词用中文来说，就是“美智子热潮”或“美智子旋风”，这是20世纪50年代末期的流行语。为什么美智子上皇后的名字会成为Micchi-Boom的来源呢？

上皇后美智子是大企业日清制粉前社长正田英三郎 的长女，1957年毕业于圣心女子大学，不久便被选为皇太子明仁亲王（现在的平成上皇）的太子妃。

时值日本在二战中战败投降，国家急需喜事来安抚人心，重振皇室声威。刚好皇太子通过网球活动认识了美智子，很快便有了与她结婚的意愿。当时负责皇太子事务的“管家”东宫职参与小泉信三也留意到皇太子的意思，后来他在回忆录里提到，当时皇太子深深赞叹美智子的学识及教养，认为她是太子妃以及将来皇后的理想人选。

然而，美智子本人有两个大麻烦。一方面，她不是皇族、华族出身。事实上，在平成天皇以前的所有天皇，包括明治天皇、大正天皇和昭和天皇的皇后都是名门贵族之后，没有例外。一旦接受了美智子成为太子妃，便意味着日本将迎来史上第一位“平民皇后”。这个转变在当时引起了保守势力的质疑和不安。皇太子的生母香淳皇后认为太子妃身份过低，两人结婚并不合适，因此表示愤慨。

另一个比平民皇后更为棘手的问题是，美智子所在的正田家的宗教背景。正田家是基督教徒，美智子就读的圣心女子大学也是基督教背景的私立大学，但皇族、华族子女都会就读东京的学习院大学。美智子的基督教信仰对于当时刚卸下“现御神”信仰的天皇家，以及仍然强烈信奉国家神道、“天皇是神”的保守派而言，自然是难以接受的。

不过，这些来自保守派的质疑与阻挠，在皇太子的强烈要求下被一一扫清。更重要的是，当时的首相岸信介积极带领日本走出战败国的阴影，他对皇太子与美智子的婚事表示欢迎，认为能给国内外人士一个良好印象，去除日本皇室保守落后的观感。

于是，在1958年11月27日，经过皇室与首相参与的皇室会议后，皇太子与美智子的婚约得以正式确认，并且向全国国民通报。由于美智子是第一位平民太子妃，大众媒体在官方消息发出后，一连串 关于她的大小报道和花边新闻占据了报章的头版。各大女性杂志纷纷刊登美智子的照片，分析她的日常衣着打扮，使得年轻女性争相模仿。而且，借由追访美智子的新闻、故事而创刊的大小杂志，也在当年如雨后春笋般涌现。

不只如此，皇太子与美智子交往的消息传出后，反对保守主义的民间团体热烈地对两人交往表达支持，女权组织纷纷祭出自由恋爱、万民平等等口号。

由此可见，战后日本民间同样希望一洗战败的颓废，并且借机改革，迎来新的社会风尚。这些希望、期待与呼声寄托在皇太子与美智子的婚事上。当政府公布两人的婚礼将于1959年4月10日举行，并且会直播婚礼过程时，民众开始争相抢购黑白电视机。据统计，单是当年4月便卖出了200万台电视机。自此，Micchi-Boom便出现在各大杂志报纸中。

（2）与保守思想抗衡的皇后与妃子们

盛况空前的Micchi-Boom，正是岸信介政府想看到的。战后初期，日本政府的一个重要工作就是保有皇室，而重建天皇形象更是当务之急。当时重点都放在如何改造天皇的形象，皇后的形象和定位都不是讨论的重点。美智子成为平民太子妃后，也将成为平民皇后，入宫后的她如何力抗皇族的保守势力和声音，成为当时媒体另一个关注的重点。

美智子在婚后生下了两个皇子和一个公主，在皇室与政府的推动以及美智子本人的意愿下，改由她亲自给孩子喂哺母乳，又废止了三名子女接受特别教育的惯例。虽然这些改革和意志广受平民欢迎和支持，但皇宫以及宫内厅则有迥然不同的反应。

日本国民为拥有平民皇后而雀跃，政府也利用这机会去推动天皇亲民化，并向外国力证“天皇是日本万民所望的存在”，但保守派一直没有放弃攻击美智子，“面粉屋的女儿”“霸凌美智子事件”等更成为当时的新闻话题。

种种压力，还有外界对理想皇后的期许，皆让美智子承受巨大压力，1993年，她患上了短期的失语症，无法说话。可见，嫁入皇室的女性并不一定就能从此荣华富贵，飞上枝头变凤凰。

美智子承受的压力，也转移到她的媳妇，现在的新皇后雅子身上。尤其是雅子始终未能生下皇子，使她与爱子公主承受着揶揄。出身外交官世家的雅子在压力下被迫放弃工作，只能成为一位贤妻良母，她患上抑郁症的消息也多次传出。

至于将来的皇后纪子，虽然她生下了唯一的男嗣悠仁亲王，但也同样受到来自保守派、普罗大众的“监察”。日本皇后的重担随着天皇、皇室走向亲民化，似乎仍未减轻。

结语

本书是我三年来的第三部著作，此前的两部作品都以日本战国时代史为主题，那是我在日本攻读博士学位的研究领域。这次特意以天皇为主题，其原因之一当然是因为日本在2019年迎来又一次天皇更替的历史时刻，也是我们重新思考、认识日本这个一衣带水的邻国的好时机。

我这样说并不是认为华人对日本这个国家的文化、历史不关心，事实上恰恰相反，随着时代的发展，华人对日本的好奇度与日俱增。到现在，走访日本各地名胜古迹的游客，也以华人为最多，这是我旅居日本十余年亲眼看见的变化。

然而，正因为如此，我认为华人对于日本的了解，不应只是表层上的文化潮流，或者一边倒、不求甚解地吹捧，我们应该多接触其深层的历史、文化、民俗及思想等各领域。

说到这里，我回想起三段类似的经历。我当年在香港参加日本文部科学省公费留学奖学金的面试，后来到日本国立广岛大学考硕士班的面试，再后来到国立一桥大学考博士班的面试，考官们不约而同地问我一个问题："为什么你这个外国人想研究日本历史呢？"

我每次的回答都是一样的："想为促进华人与日本人相互了解做出贡献，想成为一座桥梁。"虽然无法知道老师们听到之后的反应和想法，但不管如何，我至今为止的作品、写作的根本动机仍是如此，从未改变。对于我而言，在这个自设命题里，日本的历史、文化和思想核心，其中一个必不可少的部分就是天皇。

我一直在日本研究日本历史，在日本生活，当我听闻本应终身在位的天皇要退位，那一瞬间，除了深感日本历史又翻开重要的一页，更因此再次肯定历史并不是一种只为追溯过去的学问，历史的转变一直都会突然发生。而且，我们往往是在那一刻之后，才意识到转变的意义。

我在十多年前踏进日本史的世界后，不仅对武士的历史，也一直对天皇与天皇制抱有浓厚兴趣。如同本书“序言”所说，那时候的我与一般华人读者一样，都曾经将中国的帝王观套到包括天皇在内的其他国家君主上，以便自己去理解。更甚者，除了权力强弱外，对“天皇是什么”“天皇对日本而言有什么意义”等问题的关心度不高，仿佛事不关己，只将帝王视为一种权力的生物，除此之外，别无其他。

随着自己对日本史的研究深度与日俱增，我痛感这样的理解实在不合适（对其他国家，情况亦然）。但与其只是抱怨、不满，实际行动才是最重要的。这次天皇退位、新天皇登基，正是唤起华人读者关注度与好奇心的好机会。

为此，我写作本书，摆脱过去以政治通史为主的单一述说方式，改以多角度向读者介绍、说明天皇和天皇制。不知道各位读完本书后，有什么看法？如果能让读者重新唤起对相关问题的好奇心，重新思考天皇对日本的意义，乃至与中华文化的关系，本书的价值便得以体现了。

最后，我想感谢一直以来支持我的各位朋友和家人。我完成本书时，刚好结束在日本国立一桥大学的博士学位课程，人生即将翻开新页。在这长达六年有余的求学时期，父母、亲姊，还有岳父母的默默支持和帮助，自不待言。我更庆幸获得妻子对于我远赴日本求学的谅解和同意，并义无反顾地给予鼓励和支持。这些都是我一

生难忘的恩情。今后将会学以致用，继续将所学所知化为著作的原动力，努力发挥所长，以为报答。

在本书末，我深感本书得以完成，有赖“　故事：写给所有人的历史”的主编胡川安先生的协助和宝贵意见，在此表示衷心的感谢。

恩义情谊，尽在心中。

胡炜权

2019年1月25日

写于日本国立国会图书馆，眺望东京皇居的早上

历代年号一览表（附年号出典）

天皇代数	在位天皇	年号	历时	改元原因	年号出典					
飞鸟、白凤时代					飞鸟、白凤时代					
36	孝德	大化	645—650	天下安宁（《释日本纪》）	《荀子》	《汉书》	《晋书》	《宋书》		
		白雉	650—654	祥瑞（《日本书纪》）	《日本书纪》	《后汉书》				
		白凤	672—682	未详						
40	天武	朱鸟	686	祥瑞（《一代要纪》）	《礼记》	《淮南子》	《日本书纪》			
42	文武	大宝	701—704	吉事（《神皇正统记》）	《神皇正统记》					
		庆云	704—708	祥瑞	《汉书》					
奈良时代					奈良时代					
43	元明	和铜	708—715	吉事（《续日本纪》）	《续日本纪》					
44	元正	灵龟	715—717	即位	《易经》					
		养老	717—724	未详	《孟子》					
45	圣武	神龟	724—729	即位	《大戴礼》					
		天平	729—749	祥瑞	《礼记》					
		天平感宝	749	吉事（《续日本纪》）	《续日本纪》					
46	孝谦	天平胜宝	749—757	即位	未详					
46—48	孝谦、淳仁、称德	天平宝字	757—765	未详	未详					
48	称德	天平神护	765—767	未详	未详					
		神护景云	767—770	未详	《晋书》					
49	光仁	宝龟	770—780	祥瑞（《续日本纪》）	《礼记》					
49—50	光仁、桓武	天应	781—782	祥瑞（《续日本纪》）	《汉书》	《后汉书》				
平安时代					平安时代					
50	桓武	延历	782—806	即位	未详					
51	平城	大同	806—810	即位	《礼记》					
52	嵯峨	弘仁	810—824	即位	未详					
53	淳和	天长	824—834	即位	《老子》					

天皇代数	在位天皇	年号	历时	改元原因	年号出典					
54	仁明	承和	834—848	即位	未详					
		嘉祥	848—851	祥瑞（《续日本后纪》）	《续日本后纪》	《毛诗正义》	《文选》			
55	文德	仁寿	851—854	即位、祥瑞	《论语》					
		齐衡	854—857	未详	《文德实录》					
		天安	857—859	祥瑞（《续日本后纪》）	《文德实录》	《史记》				
56	清和	贞观	859—877	即位	《易经》					
57	阳成	元庆	877—885	祥瑞（《三代实录》）	《张华诗》					
58	光孝	仁和	885—889	即位	《礼记》					
59	宇多	宽平	889—898	即位	《旧唐书》					
60	醍醐	昌泰	898—901	即位	《旧唐书》					
		延喜	901—923	辛酉革命	《尚书》					
		延长	923—931	灾害	《文选》	《汉书》				
61	朱雀	承平	931—938	即位	《后汉书》					
		天庆	938—947	灾害、兵乱	《汉书》					
62	村上	天历	947—957	即位	《论语》	《史记》				
		天德	957—961	灾害	《易经》	《礼记》				
		应和	961—964	辛酉革命	《董巴议》					
		康保	964—968	甲子革命	《尚书》					
63	冷泉	安和	968—970	兵乱	《汉书》	《宋书》				
64	圆融	天禄	970—973	即位	《论语》					
		天延	973—976	灾害	未详					
		贞元	976—978	灾害	未详					
		天元	978—983	灾害	《史记》	《后汉书》				
		永观	983—985	灾害	《尚书》					
65	花山	宽和	985—987	即位	《汉书》					
66	一条	永延	987—989	即位	《后汉书》	《艺文类聚》				
		永祚	989—990	灾害	《晋书》	《旧唐书》				
		正历	990—995	灾害	《史记》					
		长德	995—999	灾害	未详					

天皇代数	在位天皇	年号	历时	改元原因	年号出典					
66	一条	长保	999—1004	灾害	《国语》					
		宽弘	1004—1012	灾害	《汉书》					
67	三条	长和	1012—1017	即位	《礼记》					
68	后一条	宽仁	1017—1021	即位	《会稽记》	《汉书》				
		治安	1021—1024	辛酉革命	《汉书》					
		万寿	1024—1028	甲子革命	《诗经》					
		长元	1028—1037	灾害、兵乱	《六韬》					
69	后朱雀	长历	1037—1040	即位	《春秋》					
		长久	1040—1044	灾害	《老子》					
		宽德	1044—1046	疫病	《后汉书》					
70	后冷泉	永承	1046—1053	即位	《宋书》					
		天喜	1053—1058	灾害	《抱朴子》					
		康平	1058—1065	灾害	《后汉书》					
		治历	1065—1069	灾害	《尚书》					
71	后三条	延久	1069—1074	即位	《尚书》					
72	白河	承保	1074—1077	即位	《尚书》					
		承历	1077—1081	疫病	《维城典训》					
		永保	1081—1084	辛酉革命	《尚书》					
		应德	1084—1087	甲子革命	《白虎通义》					
73	堀河	宽治	1087—1094	即位	《礼记》					
		嘉保	1094—1096	疫病	《史记》					
		永长	1096—1097	灾害	《后汉书》	《礼记正义》				
		承德	1097—1099	灾害	《周易》					
		康和	1099—1104	灾害、疫病	《崔寔政论》					
		长治	1104—1106	灾害	《汉书》					
		嘉承	1106—1108	天象异变	《汉书》					
74	鸟羽	天仁	1108—1110	即位	《文选》					
		天永	1110—1113	天象异变	《尚书》					
		永久	1113—1118	天象异变、疫病	《毛诗》					

天皇代数	在位天皇	年号	历时	改元原因	年号出典					
74	鸟羽	元永	1118—1120	天象异变、疫病	未详					
		保安	1120—1124	天象异变	未详					
75	崇德	天治	1124—1126	即位	《易经》					
		大治	1126—1131	疫病	《河图挺佐辅》					
		天承	1131—1132	灾害	《汉书》					
		长承	1132—1135	灾害、疫病	《史记》					
		保延	1135—1141	灾害、疫病	《文选》					
		永治	1141—1142	辛酉革命	《晋书》	《魏文典论》				
76	近卫	康治	1142—1144	即位	《宋书》					
		天养	1144—1145	甲子革命	《后汉书》					
		久安	1145—1151	天象异变	《晋书》					
		仁平	1151—1154	灾害	《后汉书》					
		久寿	1154—1156	天象异变	《抱朴子》	《隋书》				
77	后白河	保元	1156—1159	即位	《颜氏家训》					
78	二条	平治	1159—1160	即位	《史记》					
		永历	1160—1161	兵乱	《后汉书》					
		应保	1161—1163	疫病	《尚书》					
		长宽	1163—1165	疫病	《维城典训》					
		永万	1165—1166	天皇病患	《汉书》					
79	六条	仁安	1166—1169	即位	《毛诗正义》					
80	高仓	嘉应	1169—1171	即位	《汉书》					
		承安	1171—1175	天象异变	《尚书》					
		安元	1175—1177	疫病	《汉书》					
		治承	1177—1181	灾害	《河图挺作辅》					
81	安德	养和	1181—1182	即位	《后汉书》					
		寿永	1182—1184	疫病	《毛诗》					
镰仓时代					镰仓时代					
82	后鸟羽	元历	1184—1185	即位	《尚书》					
		文治	1185—1190	灾害、兵乱	《礼记》					

天皇代数	在位天皇	年号	历时	改元原因	年号出典					
82	后鸟羽	建久	1190—1199	灾害	《晋书》	《吴志》				
83	土御门	正治	1199—1201	即位	《庄子》					
		建仁	1201—1204	辛酉革命	《文选》					
		元久	1204—1206	甲子革命	《毛诗正义》					
		建永	1206—1207	天皇病患	《文选》					
		承元	1207—1211	疫病、天灾	《通典》					
84、85	顺德（仲恭）	建历	1211—1213	即位	《后汉书》	《宋书》				
		建保	1213—1219	天象异变	《尚书》					
		承久	1219—1222	天象异变	《诗经》					
86	后堀河	贞应	1222—1224	即位	《周易》					
		元仁	1224—1225	天象异变	《周易》					
		嘉禄	1225—1227	疫病	《博物志》					
		安贞	1227—1229	疫病	《周易》					
		宽喜	1229—1232	天象异变	《后魏书》					
		贞永	1232—1233	饥馑	《周易注疏》					
87	四条	天福	1233—1234	即位	《尚书》					
		文历	1234—1235	天象异变	《唐书》	《文选》				
		嘉祯	1235—1238	天象异变	《北齐书》					
		历仁	1238—1239	天象异变	《隋书》					
		延应	1239—1240	天象异变	《文选》					
		仁治	1240—1243	天象异变	《书仪》					
88	后嵯峨	宽元	1243—1247	即位	《宋书》					
89	后深草	宝治	1247—1249	即位	《春秋繁露》					
		建长	1249—1256	天象异变	《后汉书》					
		康元	1256—1257	疫病	不详					
		正嘉	1257—1259	灾害	《艺文类聚》					
		正元	1259—1260	疫病、饥馑	《毛诗》					
90	龟山	文应	1260—1261	即位	《晋书》					
		弘长	1261—1264	辛酉革命	《贞观政要》					

天皇代数	在位天皇	年号	历时	改元原因	年号出典					
90	龟山	文永	1264—1275	甲子革命	不详					
91	后宇多	建治	1275—1278	即位	《周礼》					
		弘安	1278—1288	疫病	《太宗实录》					
92	伏见	正应	1288—1293	即位	《诗经》					
		永仁	1293—1299	天象异变	《晋书》					
93	后伏见	正安	1299—1302	即位	《孔子家语》					
94	后二条	干元	1302—1303	即位	《周易》					
		嘉元	1303—1306	天象异变	《艺文类聚》					
		德治	1306—1308	天象异变	《尚书》	《后魏书》				
95	花园	延庆	1308—1311	即位	《后汉书》					
		应长	1311—1312	疫病	《旧唐书》					
		正和	1312—1317	天象异变	不详					
		文保	1317—1319	灾害	《梁书》					
96	后醍醐	元应	1319—1321	即位	《唐书》					
		元亨	1321—1324	辛酉革命	《周易》					
		正中	1234—1326	甲子革命	《易经》					
		嘉历	1326—1329	疫病	《唐书》					
		元德	1329—1331	疫病	《周易》					
		元弘	1331—1334	兵乱	不详					
南北朝 / 室町时代					南北朝 / 室町时代					
		（北 朝）							（南 朝）	
北一	光严	正庆	1332—1333	即位	《易经》					
		建武	1334—1338	不详	不详		96（南一）	后醍醐	建武	1334—1336
北二	光明	历应	1338—1342	即位	《帝王世纪》				延元	1336—1340
		康永	1342—1345	不详	《汉书》		97（南二）	后村上	兴国	1340—1346
		贞和	1345—1350	疫病、灾害	《艺文类聚》				正平	1346—1370
北三	崇光	观应	1350—1352	即位	《庄子》					
北四	后光严	文和	1352—1356	即位	《吴志》					
		延文	1356—1361	兵乱	《汉书》					

天皇代数	在位天皇	年号	历时	改元原因	年号出典					
北四	后光严	康安	1361—1362	疫病	《史记》					
		贞治	1362—1368	灾害、兵乱	《周易》		98（南三）	长庆	建德	1370—1372
		应安	1368—1375	疫病、天象异变	《毛诗正义》				文中	1372—1375
北五	后圆融	永和	1375—1379	即位	《尚书》	《艺文类聚》			天授	1375—1381
		康历	1379—1381	疫病、兵乱	《唐书》					
		永德	1381—1384	辛酉革命	不详				弘和	1381—1384
100	后小松	至德	1384—1387	甲子革命	《孝经》		99（南四）	后龟山	元中	1384—1392
		嘉庆	1387—1389	疫病	《毛诗正义》					
		康应	1389—1390	天皇病患	《文选》					
		明德	1392—1394	天象异变、兵乱	《礼记》					
室町时代					室町时代					
100—101	后小松、称光	应永	1394—1428	疫病	《会要》					
101	称光	正长	1428—1429	即位	《礼记正义》					
102	后花园	永享	1429—1441	即位	《后汉书》					
		嘉吉	1441—1444	辛酉革命	《周易》					
		文安	1444—1449	甲子革命	《晋书》	《尚书》				
		宝德	1449—1452	疫病、天象异变	《旧唐书》					
		享德	1452—1455	疫病	《尚书》					
		康正	1455—1457	兵乱	《史记》					
		长禄	1457—1460	天皇病患、灾害	《韩非子》					
		宽正	1460—1466	饥馑	《孔子家语》					
103	后土御门	文正	1466—1467	即位	《荀子》					
		应仁	1467—1469	兵乱	《维城典训》					
		文明	1469—1487	兵乱	《周易》					
		长享	1487—1489	兵乱、疫病	《春秋左传》	《后汉书》				
		延德	1489—1492	天象异变、疫病	《孟子》					
		明应	1492—1501	天象异变、疫病	《文选》	《周易》				
104	后柏原	文龟	1501—1504	辛酉革命	《尔雅》					
		永正	1504—1521	甲子革命	《周易纬》					

天皇代数	在位天皇	年号	历时	改元原因	年号出典					
104	后柏原	大永	1521—1528	兵乱、天象异变	《杜氏通典》					
105	后奈良	享禄	1528—1532	即位	《周易》					
		天文	1532—1555	兵乱	《易经》					
		弘治	1555—1558	兵乱	《北齐书》					
106	正亲町	永禄	1558—1570	即位	《群书治要》					
		元龟	1570—1573	兵乱	《毛诗》					
		天正	1573—1592	兵乱	《文选》					
107	后阳成	文禄	1592—1596	即位	《杜氏通典》					
		庆长	1596—1615	天象异变	《毛诗》					
江户时代					江户时代					
108	后水尾	元和	1615—1624	即位	不详					
108—109	后水尾、明正	宽永	1624—1644	甲子革命	《毛诗朱氏注》					
110	后光明	正保	1644—1648	即位	《尚书正义》					
		庆安	1648—1652	天皇病患	《周易》					
		承应	1652—1655	将军更替	《周易》					
111	后西	明历	1655—1658	即位	《汉书》					
		万治	1658—1661	灾害	《史记》					
		宽文	1661—1673	灾害	《荀子》					
112	灵元	延宝	1673—1681	即位	《隋书》					
		天和	1681—1684	辛酉革命	《尚书》	《后汉书》				
		贞享	1684—1688	甲子革命	《周易》					
113	东山	元禄	1688—1704	即位	《宋史》					
		宝永	1704—1711	灾害	《旧唐书》					
114	中御门	正德	1711—1716	即位	《尚书正义》					
		享保	1716—1736	天象异变	《后汉书》					
115	樱町	元文	1736—1741	即位	《文选》					
		宽保	1741—1744	辛酉革命	《国语》					
		延享	1744—1748	甲子革命	《艺文类聚》					
116	桃园	宽延	1748—1751	即位	《文选》					

天皇代数	在位天皇	年号	历时	改元原因	年号出典					
116	桃园	宝历	1751—1764	天象异变	《贞观政要》					
117—118	后樱町、后桃园	明和	1764—1772	即位	《尚书》					
118—119	后桃园、光格	安永	1772—1781	灾害	《文选》					
119	光格	天明	1781—1789	不详	《尚书》					
		宽政	1789—1801	灾害	《春秋左传》					
		享和	1801—1804	辛酉革命	《文选》					
		文化	1804—1818	甲子革命	《周易》					
120	仁孝	文政	1818—1830	即位	《尚书》					
		天保	1830—1844	灾害	《尚书》					
		弘化	1844—1848	灾害	《书经》	《晋书》				
121	孝明	嘉永	1848—1854	即位	《宋书》					
		安政	1854—1860	灾害	《群书治要》					
		万延	1860—1861	不详	《后汉书》					
		文久	1861—1864	辛酉革命	《后汉书》					
		元治	1864—1865	甲子革命	《周易》					
		庆应	1865—1868	兵乱、灾害	《文选》					
现代					现代					
122	明治	明治	1868—1912	即位	《周易》	《孔子家语》				
123	大正	大正	1912—1926	即位	《易经》					
124	昭和	昭和	1926—1989	即位	《书经》					
125	平成	平成	1989—2019	即位	《史记》	《书经》				

新、旧《皇室典范》

著者志

一、第一项的旧《皇室典范》现在已为历史资料，与第二项的新《皇室典范》无关。

二、第二项的新《皇室典范》及第三项的《平成天皇退位特别法》为日本现行法律之一，官方版本并没有中文翻译。本翻译仅为方便本书读者阅读和参考，一切条文解释以日本官方的日本语原文为准。

我日本帝国享有天佑，宝祚万世一系，历代继承。以至朕（注：明治天皇）躬，惟祖宗肇国之初，大宪定一，昭如日星，如今之时，宜当明彻遗训，制立皇家成典，以永远巩固丕基。兹经咨询枢密顾问，裁定皇室典范，为朕之后嗣及子孙所遵守。

明治二十二年二月十一日

旧《皇室典范》

第一章　皇位继承

第一条　大日本国以祖宗之皇统，由男系男子继承之。

第二条　皇位传于皇长子。

第三条　皇长子不在时，（皇位）传于皇长孙。皇长子及其子皆不在时，传于皇次子及其子孙，以下皆以之为例。

第四条　皇子孙继承皇位，以嫡出为先，皇庶子孙继承皇位，皆限皇嫡子孙不在之时。

第五条　皇子孙皆不在时，（皇位）传于皇兄弟及其子孙。

第六条　皇兄弟及其子孙皆不在时，（皇位）传于皇伯叔父及其子孙。

第七条　皇伯叔父及其子孙皆不在时，（皇位）传于其以上最近亲之皇族。

第八条　皇兄弟以上，于同等之内，以嫡为先，庶为后，长为先，幼为后。

第九条　若皇嗣有精神、身体不治之重患，又或者有重大之事故时，咨询皇族会议及枢密顾问，可依前诸条，更换继承顺序。

第二章　践祚即位

第十条　天皇驾崩之时，皇嗣随即践祚，承祖宗之神器。

第十一条　即位之礼及大尝祭于京都进行。

第十二条　践祚后，建元号。一世之间，不再改之，遵从明治元年之定制。

第三章　成年后立太子

第十三条　天皇及皇太子、皇太孙以年满十八岁为成年。

第十四条　前条以外，其他皇族则以二十岁为成年。

第十五条　以储嗣之皇子为皇太子，皇太子不在时，以储嗣之皇孙为皇太孙。

第十六条　册立皇后、皇太子、皇太孙时，以诏书公布之。

第四章　敬称

第十七条　天皇、太皇太后、皇太后、皇后之敬称为“陛下”。

第十八条　皇太子、皇太子妃、皇太孙、皇太孙妃、亲王、亲王妃、内亲王、王、王妃、女王之敬称为“殿下”。

第五章　摄政

第十九条　天皇未达成年之时，置“摄政”。天皇因恒久之故障，不能亲大政时，经皇族会议及枢密顾问之议而置“摄政”。

第二十条　“摄政”由到达成年之皇太子，或皇太孙任之。

第二十一条　皇太子、皇太孙不在，或未达成年之时，依下列顺序委任“摄政”。

第一，亲王及王；

第二，皇后；

第三，皇太后；

第四，太皇太后；

第五，内亲王及女王。

第二十二条　皇族男子将遵从皇位继承之顺序，担任“摄政”，其女子亦以之为准。

第二十三条　只限未有配偶之皇族女子担任“摄政”。

第二十四条　最近亲之皇族未达成年，或因其他事故，需由其他皇族担任“摄政”时，即使后来最近亲之皇族到达成年，或其事故已解决，除皇太子、皇太孙外，不让他人担任“摄政”之位。

第二十五条　若“摄政”或将任“摄政”者身体有重患，或有重大事故之时，经皇族会议及枢密顾问之议，可更换其顺序。

第六章　太傅

第二十六条　天皇未达成年之时，置太傅，掌管天皇保育。

第二十七条　以先帝遗命担任太傅时，需由摄政咨询皇族会议及枢密顾问后，再行选任。

第二十八条　摄政及其子孙不可担任太傅。

第二十九条　摄政未经咨询皇族会议及枢密顾问，不可辞退太傅。

第七章　皇族

第三十条　“皇族”乃指太皇太后、皇太后、皇后、皇太子、皇太子妃、皇太孙、皇太孙妃、亲王、亲王妃、内亲王、王、王妃、女王。

第三十一条　由皇子至皇玄孙，男为“亲王”，女为“内亲王”，五世以后，男为“王”，女为“女王”。

第三十二条　由天皇支系继承大统时，（其）皇兄弟姊妹中之“王”“女王”将获特别宣赐“亲王”“内亲王”。

第三十三条　皇族之诞生、命令、婚嫁、薨去皆由宫内大臣公告。

第三十四条　《皇统谱》及关于前面诸条的记录皆藏于图书寮。第三十五条　皇族由天皇监督。

第三十六条　摄政在任之时，摄行前面诸条之事。

第三十七条　皇族男女幼年丧父者，将任命宫内省官僚掌管保育。依事宜，天皇或认可其皇族父母选定之监护人，或以敕命选之。

第三十八条　皇族之监护人只限成年以上之皇族。

第三十九条　皇族婚嫁（的对象）只限同族，或天皇敕旨特准之华族。

第四十条　皇族婚嫁需敕旨批准。

第四十一条　天皇准许皇族婚嫁之敕书，需由宫内大臣副署。

第四十二条　皇族不得收纳养子。

第四十三条　皇族欲出国旅行时，需请敕旨批准。

第四十四条　下嫁臣籍者之皇族女子将不再在皇族之列，但依特旨，其人仍可获称为“内亲王”“女王”。

第八章　世传御料（财产）

第四十五条　不得分割、让与已经定为世传御料之土地物件。

第四十六条　已编为世传御料之土地物件，咨询枢密顾问后，以敕书定之，再由宫内大臣公告。

第九章　皇室经费

第四十七条　皇室诸般经费特定常额，由国库支出。

第四十八条　皇室经费之预算检查及其他规则，依《皇室会计法》所定。

第十章　皇族诉讼及惩戒

第四十九条　皇族相互之民事诉讼将依天皇敕旨，命裁判员于宫内省内裁判。经天皇敕裁后，执行之。

第五十条　人民对皇族行民事诉讼，将于东京控诉院（注：法院）裁决。但皇族当以代理人出席裁判，无须亲自出庭。

第五十一条　未得天皇敕准，不可逮捕或传召皇族到法庭。

第五十二条　皇族犯下有辱其身份之行为，或对皇室缺乏忠顺时，天皇当以敕旨惩戒，若有重罪者，其部分或全部皇族特权将遭剥夺。

第五十三条　皇族犯有倾家荡产之行为时，天皇以敕旨宣告禁止其人管治资产，改任他人为管理者。

第五十四条　以上诸条咨询皇族会议后，再由天皇敕裁。

第十一章　皇族会议

第五十五条　皇族会议由成年以上的男性皇族组成，内大臣、枢密院议长、宫内大臣、司法大臣、大审院长参列其中。

第五十六条　天皇当亲临皇族会议，或任命一名皇族成员为议长。

第十二章　补则

第五十七条　现在（注：明治二十二年）之皇族五世以下，获宣赐“亲王”称号者，仍如旧制。

第五十八条　皇族继承之顺序全依真实血缘，现时之皇养子、皇义子，或者其他继嗣不可以故混乱之。

第五十九条　废除亲王、内亲王、王、女王之品位。

第六十条　废除所有亲王家格及其他抵触此典范之规例。

第六十一条　皇族之财产岁费及诸规则，将另而定之。

第六十二条　当将来有必要改正或增补此典范条项时，需咨询皇族会议及枢密顾问后，再由天皇敕定。

附一：旧《皇室典范》增补（明治四十年二月十一日）

第一条　依天皇敕旨或情况，（皇族中的）王家可获赐家名，配列华族。

第二条　依天皇敕旨或情况，（皇族中的）王家可指名华族的当家为继承人，或以继承当家之位为目的，成为华族养子。

第三条　依前两条，降为臣籍之“王家”，其妻直系、卑属及其妻当从其分，但嫁入其他皇族之女子及其直系卑属，则不在此例。

第四条　已遭剥夺特权之皇族，可经敕旨降为臣籍。

第五条　于第一条、第二条及第四条之情况，需咨询皇族会议及枢密顾问。

第六条　皇族降为臣籍后，不可复为皇族。

第七条　关于皇族之身份及其他权益之规程，将于此典范之外，另作定规。又，牵涉皇族与人民之间的事项，遇有异于现行相关法规之情况时，将依前项之规程处理。

第八条　法律命令中适用于皇族之规定，只限此典范或以此典范为基础所发布之规则里并无特别规定时，方能适用。

附二：旧《皇室典范》增补（大正七年十一月二十八日）

补：皇族女子可下嫁王族或公族。

新《皇室典范》

第一章　皇位继承

第一条　皇位由归属皇统之男系男子继承。

第二条　皇位依照下列顺序，在皇族中传承。

一、皇长子；

二、皇长孙；

三、其他皇长子之子孙；

四、皇次子及其子孙；

五、其他皇子孙；

六、皇兄弟及其子孙；

七、皇伯叔父及其子孙。

前项各皇族皆不在时，皇位由以上各人里持有最近亲血统的皇族继承。在前述两项的情况下，以长子家系为先，同等兄弟以长为先。

第三条　若皇嗣有精神、身体不治之重患，又或者有重大之事故时，可由皇室会议按前述所定顺序，改变皇位继承的顺序。

第四条　天皇死去时，皇嗣立即继位。

第二章　皇族

第五条　“皇族”乃指皇后、太皇太后、皇太后、亲王、亲王妃、内亲王、王、王妃、女王。

第六条　嫡出皇子及嫡男系之皇嫡孙，男为“亲王”，女为“内亲王”。三世以下的嫡系子孙，男为“王”，女为“女王”。

第七条　（前条的）王继承皇位时，其（皇室身份为）王的兄弟姊妹可特封为亲王及内亲王。

第八条　获定为皇嗣之皇子为“皇太子”，皇太子不在时，获定为皇嗣之皇孙为皇太孙。

第九条　天皇及皇族皆不可收纳养子。

第十条　天皇立后及皇族男子的婚姻，需经过皇室会议审议。

第十一条　年满十五岁以上的内亲王、王及女王，可按其意愿，经皇室会议审议，脱离皇族身份。

除了前述情况外，（皇太子及皇太孙以外的）亲王、内亲王、王及女王遇上特别事故时，经皇室会议审议后，可以脱离皇族身份。

第十二条　皇族女子与天皇及皇族以外的人士结婚时，即脱离皇族身份。

第十三条　除了与其他皇族结婚之女子及其直系卑属外，脱离皇族身份的亲王、亲王妃及其直系卑属将同时脱离皇族身份。但是，经皇室会议审议，直系卑属及其妃可免除脱离皇室身份。

第十四条　（1）皇族以外的女子兼曾经身为亲王妃或王妃的女子丧夫后，可按其意愿，脱离皇族身份。（2）前项的亲王妃或

王妃于丧夫之时，又或者在同项所述情况之外，遇有特别情况因由时，经皇室会议审议后，其人可以脱离皇族身份。

第一项情况的亲王妃或王妃于离婚后脱离皇族身份。

第十三条中，与其他皇族结婚的女子可适用于第一项及第二项的规定。

第十五条　除了女儿成为皇后，或与皇族男子结婚外，皇族以外之人及其子孙皆不会成为皇族。

第三章　摄政

第十六条　（1）天皇未达成年之时，置“摄政”。（2）天皇若因精神或身体的重大病患，不能亲自参与国事时，皇室会议经审议后，设置“摄政”。

第十七条　“摄政”将依下列顺序，并由成年皇族担任。

第一，皇太子或皇太孙;

第二，亲王及王;

第三，皇后;

第四，皇太后;

第五，太皇太后;

第六，内亲王及女王。

前项第二种情况，依照皇位继承的顺序，第六种情况则准据皇位，继承的顺序来安排。

第十八条　摄政与按顺序成为摄政之人，其精神或身体得重大病患，又或者有重大事故时，经皇室会议审议，并按前一条的顺序，摄政的担任顺序可以改变。

第十九条　摄政与按顺序成为摄政之人因未达成年，又或者出现前条所谓的事故，由其他的皇族代为摄政，即使原本的顺位者已达成年，或事故已经解决，除非其人为皇太子或皇太孙，否则时任摄政之人无须让出摄政之位。

第二十条　第十六条第二项里提到的天皇重大病患、问题消除后，经皇室会议审议后，废除摄政。

第二十一条　摄政在任期间可免除被提告，但不能因此而侵害他人的提告权。

第四章　成年、敬称、即位之礼、大丧之礼、皇统谱及陵墓

第二十二条　天皇、皇太子及皇太孙的成人年龄为十八岁。

第二十三条　天皇、皇后、太皇太后及皇太后敬称为“陛下”。其余以外的皇族敬称为“殿下”。

第二十四条　继承皇位后，随即举行即位之礼。

第二十五条　天皇死去后，随即举行大丧之礼。

第二十六条　天皇及皇族身份的相关事项，皆登录到《皇统谱》中。

第二十七条　天皇、皇后、太皇太后及皇太后下葬之地为“陵”，其他皇族的下葬地为　“墓”。“陵”“墓”的相关事

项，将登录在《陵籍》及《墓籍》中。

第五章　皇室会议

第二十八条　（1）皇室会议由十名议员组成。（2）议员由两名皇族、众议院议长、参议院议长及副议长、内阁总理大臣、宫内厅长官、最高裁判所裁判官长及一名裁判官组成。（3）位列议员的皇族及最高裁判所裁判官长以外的裁判官需各自通过成年皇族最高裁判所裁判官长以外的裁判官互选产生。

第二十九条　由内阁总理大臣兼任皇室会议的议长。

第三十条　（1）皇室会议设置十名后备议员。（2）位列后备议员的皇族及最高裁判所裁判官长以外的裁判官须按第二十八条第三项的规定选出。（3）众议院议长、参议院议长及副议长的后备议员需由参、众两院的议员互选产生。（4）前两项的后备议员人数与正议员相同，行使职务的顺序将于互选时决定。（5）内阁总理大臣的后备议员需按内阁法的规定，由获指定为署任内阁总理大臣职务的国务大臣担当。（6）宫内厅长官的后备议员需由内阁总理大臣指定的宫内厅职员担任。（7）各议员遇有事故时，或出现缺员时，由其后备议员充当职务。

第三十一条　第二十八条及第三十条中，担任皇室会议的众议院议长、副议长或议员在众议院解散后，直至确定后任者为止，将由解散前的众议院议长、副议长或议员继续担任。

第三十二条　担任皇室会议议员的皇族及最高裁判所裁判官长以外的裁判官，以及其后备议员的任期为四年。

第三十三条　（1）由议长召开皇室会议。（2）本典范的第三条、第十六条第二项、第十八条及第二十条的情况发生时，并且有

四名以上的皇室会议议员提出要求下，必须召开皇室会议。

第三十四条　皇室会议内，如有六名以上的议员缺席，不可展开议事及决议。

第三十五条　（1）皇室会议的议事在本典范的第三条、第十六条第二项、第十八条及第二十条的情况发生时，需要三分之二以上的出席议员通过决定，其他情况则需要有过半数议员支持决定，方能通过。（2）于前项后半段的情况里，遇到正反双方同数时，由议长决定。

第三十六条　议员不可参加与自身利弊有特别相关的议事。

第三十七条　皇室会议基于此典范及其他法律赋予的权限而举行。

附则

一、此法律于日本国宪法实行当日（一九四七年五月三日）开始实施。

二、现时的皇族乃基于此典范获确认为皇族，第六条规定的情况，则由嫡系嫡出男子担任。

三、现时的皇室陵、墓按第二十七条定义。

附：平成天皇退位特例法本文内容

法律第六十三号[平成二十九（二〇一七）年六月十六日]

《关于天皇退位等皇室典范特例法》

第一条　此法律乃因（平成）天皇陛下自昭和六十四年一月七日即位以来，超过二十八年间，在长期努力从事国事行为、到全国各地进行访问、探访受灾地等各种象征性公务活动之中，迎来八十三岁之高龄。我们深感天皇在今后，将越来越难以继续以上的诸公务活动，国民亦深深敬爱已达高龄，仍然努力进行以上诸公务的天皇陛下，十分理解和体会天皇陛下的感受。加上鉴于现时身为皇储，现年五十七岁的皇太子殿下长期致力于为天皇陛下代行诸国事行为的公务，现以《皇室典范》（昭和二十二年法律第三号）第四条规定的特例方式，实现天皇陛下的退位和皇嗣即位，以及对天皇陛下退位后的地位、其他因退位而来的诸必要事项做出规定。

第二条　天皇于此法律施行日起退位，皇嗣（皇太子浩宫德仁）实时即位。

第三条　（1）按前一条的规定，退位后的（平成）天皇称为“上皇”。（2）上皇的敬称为“陛下”。（3）上皇的相关身份事项的登录、葬礼及陵墓事宜以天皇之例为准。（4）除了前述两项中规定的事项外，关于上皇于新《皇室典范》（第二条、第二十八条第二项及第三项、第三十条第二项除外）的事项，将以皇族之例为准。

第四条　（1）上皇之后为“上皇后”。（2）关于上皇后于新《皇室典范》所定事项，将以皇太后之例为准。

第五条　按照第二条规定，伴随是次皇位继承而成为皇嗣的皇族（秋篠宫文仁亲王），于新《皇室典范》里所定事项，将以皇太子之例为准。

主要参考文献

[1]历史学研究会，《日本史史料一～五》，岩波书店，1997—2005年。

[2]《神皇正统记》，岩波文库，2013年。

[3]《日本思想大系1古事记》，岩波书店，1982年。

[4]《新订增补国史大系　日本书纪》，吉川弘文馆，1986年。

[5]《新订增补国史大系　续日本纪》，吉川弘文馆，1972年。

[6]《新订增补国史大系　日本三代实录一～二》，吉川弘文馆，1974年。

[7]《古事类苑14帝王部》，吉川弘文馆，1967年。

[8]《孝明天皇实录一～三》，ゆまに书房，2006—2019年。

[9]《明治天皇纪一～三》，吉川弘文馆，1968年。

[10]《天皇的历史一～十》，讲谈社，2005年。

[11]《昭和天皇实录一～十九》，宫内厅，2015—2019年。

[12]《后村上天皇实录　长庆天皇实录　后龟山天皇实录》，ゆまに书房，2009年。

[13] 《后醍醐天皇实录一～二》，ゆまに 书房，2009年。

[14] 《后圆融天皇实录》，ゆまに 书房，2009年。

[15] 《后小松天皇实录一～二》，ゆまに 书房，2009年。

[16] 《神武天皇实录　绥靖天皇实录　安宁天皇实录　懿德天皇实录　孝昭天皇实录　孝安天皇实录　孝灵天皇实录　孝元天皇实录　开化天皇实录　崇神天皇实录　垂仁天皇实录》，ゆまに 书房，2008年。

[17] 《用明天皇实录—弘文天皇实录》，ゆまに 书房，2008年。

[18] 《天武天皇实录》，ゆまに 书房，2008年。

[19] 《后白河天皇实录一～三》，ゆまに 书房，2008年。

[20] 《后鸟羽天皇实录一～四》，ゆまに 书房，2008年。

[21] 《白河天皇实录一～三》，ゆまに 书房，2007年。

[22] 《鸟羽天皇实录一～三》，ゆまに 书房，2007年。

[23] 《桓武天皇实录》，ゆまに 书房，2007年。

[24] 《光格天皇实录》，ゆまに 书房，2006年。

[25] 《灵元天皇实录一～三》，ゆまに 书房，2006年。

[26] 《后水尾天皇实录一～三》，ゆまに 书房，2005年。

[27] 《正亲町天皇实录一～二》，ゆまに 书房，2005年。

[28] 《后阳成天皇实录一～二》，ゆまに书房，2005年。


PEDRO BAÑOS
大国战略
ASÍ SE DOMINA EL MUNDO
Desvelando las claves del poder mundial
世界是如何被统治的
欧洲著名国际地缘战略专家
讲透全球地缘战略布局
翻开本书，了解近年来全球热点事件的来龙去脉
本书英文版由企鹅兰登独家全球推出
[西班牙] 佩德罗·巴尼奥斯 著 刘洋 译
浙江人民出版社

本书献给所有为建立一个更加公正、自由和安全的世界而努力奋斗的人们。

大国战略

PEDRO BAÑOS

ASÍ SE DOMINA EL MUNDO

Desvelando las claves del poder mundial

世界是如何被统治的

[西班牙] 佩德罗·巴尼奥斯 / 著
刘洋 / 译

浙江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大国战略：世界是如何被统治的/（西）佩德罗·巴尼奥斯著；刘洋译．—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20.11

ISBN 978-7-213-09883-3

Ⅰ．①大…　Ⅱ．①佩…②刘…　Ⅲ．①地缘政治学—研究②国际关系—研究　Ⅳ．①D5②D81

浙江省版权局

著作权合同登记章

图字：11-2019319号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20）第268507号

© 2017，Pedro Baños

© 2017：Editorial Planeta, S. A.

本书简体中文版权经由Peony Literary Agency代理授权。

大国战略：世界是如何被统治的

［西班牙］佩德罗·巴尼奥斯　著　刘洋　译

出版发行：浙江人民出版社（杭州市体育场路347号　邮编310006）

市场部电话：（0571）85061682　85176516

集团网址：浙江出版联合集团　http://www.zjcb.com

责任编辑：傅　越　郦鸣枫

特约编辑：魏　力

营销编辑：陈雯怡　陈芊如

责任校对：朱　妍

责任印务：刘彭年

封面设计：人马艺术设计·储平

电脑制版：易细文化

印　　刷：杭州丰源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710毫米×1000毫米　1/16

印　　张：16.5

字　　数：200千字

插　　页：1

版　　次：2021年2月第1版

印　　次：2021年2月第1次印刷

书　　号：ISBN 978-7-213-09883-3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市场部联系调换。

致读者

本书是我过去25年工作和研究的总结，既收录了一些我在报纸和杂志上发表的文章，也收录了我参与编著图书的序言和部分章节，还有一些内容来自我过去25年间在军事机构、大学、研究中心和基金会等讲授的数百节课程和讲座的讲义。内容涉及地缘政治、战略、情报、国防安全、恐怖主义等主题。我在武装部队总参谋部高级学院教授战略和国际关系课程多年，也曾在国防部地缘政治分析部门担任负责人，其间积累了大量经验，并总结了大量教训，均在本书中予以呈现，这是书中最具有实用价值的内容。

为了对上述内容加以完善，我还查阅了大量参考书目。我想提醒读者的是，为了方便阅读，我不是原封不动地摘录参考书目中的文字，而是在不改变原意的前提下，对文字进行适当的解读和注释。本书所面向的不仅仅是上述主题的爱好者，还有最广大的读者，包括出于好奇或消遣目的而阅读此书的读者。

读者也许会注意到，一些战略问题有交叉，这是因为所给出的历史事例是为了说明多个战略问题。在书中，我提到某些国家的次数之所以多于其他国家，是因为这些国家更有实力，更能够在世界范围内运用这些战略，并发挥影响力。这并不意味着我反对某些国家的意识形态或宗教信仰，我也未对任何人怀有敌意，除了那些明显地虐待贫弱群体的人——为了更好地控制这个群体，他们总是想办法迫使这个群体更加愚昧无知。

为了使著述尽可能严谨，我上网查阅了各种说法和高度专业化的资料，验证和对比书中提供的数据。在脚注处，我标注了资料的来源，以便读者扩展阅读内容。

尽管如此，本书也很难做到完美无瑕。亲爱的读者，如果您发现任何错误或纰漏，欢迎您指正。您可以通过以下电子邮件地址与我联系：director@geoestratego.com。

序言

FOREWORD

权力的本质是影响对手的行为。

——《 地理的报复》作者，罗伯特·D. 卡普兰

从远古时代起，强国就总想将其意志和影响力扩张到能力所及的地方。不过直到16世纪，这种权力的扩张还只是在有限的地域内进行。随着美洲新大陆的发现，这种扩张的范围日益扩大。工业革命成了推动这种扩张向未知地区甚至是向地球深处发展的新动力。

随着时间的推移，虽然权力的归属一直在变化，但是权力拥有者的野心总是一样的。他们想要征服在扩张过程中所遇到的对手，想要阻止对手在军事、经济或宗教方面的发展，以避免对手赶上或超越自己。这一历史常识现在依然存在，不会随着时间推移而失去效力。正如人们所见：技术会进步，实现人类愿望的方式会改变，但是征服和统治他人的野心不会变化。地缘政治已经变为“地缘权力”（ 也可称为“地理控制”或“地理统治”）的一种工具，用来控制全世界或者世界大部分地区，同时避免被其他人所征服。

这就是为什么有必要知道强国如何控制和统治其周围的世界的原因。有些战略已经被使用了几个世纪，而有些战略则是近些年才被使用。即使世界发生了某些变化，也没有任何迹象表明将来强国会停止使用这些战略。本书所讨论的27个地缘战略，只不过是地缘权力的实际应用，即将权力拥有者如何在国际领域开展行动和发挥影响具体化了。

了解上述战略将使我们保持清醒和警惕，以免成为世界上某些人手中的玩偶。我们必须意识到，外部世界存在威胁我们生命的重大隐患，而且摆脱这些隐患是十分困难的。

我们认为我们是自由的，可以自主选择我们的品味、穿着或行为方式，自主决定吃什么或如何打发时间。但事实上，我们一直被引导着采取行动、做出决定和表明态度。随着这种微妙性与日俱增，为我们做决定的人不断向我们强加某种生活方式、社会模式和意识形态，以使我们屈从于他们的意志。这在今天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真实，因为“后真相”这个词已经风靡起来，它被用于定义全球背景下的虚假信息。不过，将“后真相”这个词称为“前谎言”“多种谎言”或“多个谎言”会更准确，因为其主要向公众传播的只不过是一个伪装成真理的虚假谎言。

只有了解到这些地缘政治的现实，我们才能确定，要打造一个真正以人类安全为第一要务的世界，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目　录

CONTENTS

致读者

序言

第一章　从地缘战略到角逐世界：统治世界的秘密

第二章　大国的性格：统治世界的前提

1．虚伪和残忍：国际政治的真实品格

2．支配者与被支配者：大国的权力游戏

3．不择手段：人类斗争的真相

4．战争的唯一目标：不惜一切赢得胜利

第三章　一切为了活下去：统治世界的原则

1．生存并强大：国家存在的终极目标

2．谁控制了财富，谁就能控制世界

3．了解历史，才能创造历史

4．永恒的利益，总是披着道德的外衣

第四章　大国只做不说的秘密准则：统治世界的方式

1．威慑

2．包围和反包围

3．“抽梯子”

4．让你的邻居变得更穷更弱

5．伪装和隐瞒

6．突破点

7．促进分裂

8．间接统治

9．曲解法律，抹黑敌人

10．你下去，我上来

11．近水楼台先得月

12．别人能为你做的，你就不要自己做

13．制造敌人

14．维持均势

15．有些谎言会持续下去

16．把大众传媒作为武器

17．同化思想

18．利用穷人

19．挑拨离间

20．利用宗教

21．万事留余地

22．“好好先生”

23．创造需要

24．“疯子”

25．协同作用

26．“香槟杯”

27．“驴子和鞍子”

第五章　足以致命的错误：统治世界的教训

1．忽视各国人民的特质

2．最大的优点也是最大的弱点

3．为意想不到的事情做准备

4．幻想快速获胜

5．不尊重他人的宗教信仰

第六章　无法摆脱的罪恶：统治世界的恶果

1．自私

2．欲望

3．懒惰

4．贪婪

5．愤怒

6．嫉妒

7．傲慢

8．野心

后记

致谢

返回总目录

第一章　从地缘战略到角逐世界：统治世界的秘密

西方国家的问题在于自由民主政体缺乏可持续的战略，并且将战略与战术混为一谈。

——亚历山大·德·马朗什

要理解“地缘政治”这个词的现实意义，仅仅了解其传统意义是不够的。在不忽略传统意义的前提下，我们必须更进一步将地缘政治置于当前的世界环境之中进行界定和解读。

根据普遍认同的观点，可以通过与其相关的地理位置和历史背景来理解和解释政治事件，甚至证明其合理性。这种研究方式认为，存在一系列地缘政治常数，这些常数永恒不变地构成了从过去到现在重复发生事件的发展框架。

一方面，在重视这些方法的前提下，当前的地缘政治研究需要更广泛和更深入的视角。随着全球化的不可逆转和各国相互依存程度的日益加深，地缘政治（Geopolitics）的研究范围已经从只局限于地理和土地（“Geo”这个前缀把它的词义限制在了“一块特定的领土和一个非常特定的物理空间”之内）转向了涵盖整个地球。因此，即使是最小的国家，也必须制定自己的地缘政治战略，因为世界其他地方所发生的事情都会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影响到这些国家。如今，这种影响甚至已经波及地球以外的太空，因为人类既要到地球之外寻找新资源，也要到外太空寻找其他空间，以容纳有限地球空间内不断增长的人口，这使得现代地缘政治学不得不关注地球外的空间。

另一方面，地缘政治研究不仅要深化对过去和现在的研究，还要着眼于对未来的探索，这使得该领域的研究获得了极大的动力。

如果我们能够预料到未来几年各种事件将如何发展，我们就可以采取有力的行动以捍卫自己的利益，当然，这必须符合全人类的利益。

在《西班牙皇家语言学院西班牙语词典》中，“政治”一词的前两个释义为本研究提供了有价值的信息。第一个释义是“关于国家和政府的艺术、学说或观点”，第二个释义则是“管理或渴望管理公共事务的人的活动”，第二个释义也可以理解为管理同类命运的愿望。

因此，当前的地缘政治可以被定义为：为了影响国际事务而开展的活动。我们可以将从事这种活动的愿望理解为：想要在全球范围内施加影响，同时希望避免受到其他国家的影响。我们也可以将其具体理解为“那些想要管理全世界（或世界大部分地区）的决策人所进行的活动”，这些人试图阻止其他人干预他们的决策。

尽管在术语上有所创新，地缘政治仍然与地理环境密切相关，其中包括山脉、海峡等地形因素，也包括依靠不同自然资源（能源、矿产、水等）得以定居的人口。

尽管并不那么重要，我们也不应该忘记，地缘政治会对其他不太明显的领域起作用，例如经济和金融。

正是因为它涵盖的范围十分广泛，地缘政治这个“新生儿”成了国家一系列政策的“制造者”。一国之内所发生的事情，很少或者几乎不能与国际形势、世界主流趋势和共同风险隔绝开来。在全球范围内，复杂性和混乱性会继续增加，因此，地缘政治决策者越来越有必要掌握精确的情报，以预见未来可能发生的事件。

在建立地缘政治指导方针（“什么”）的过程中，必须首先确定国家的需要和利益需求（“为了什么”）。因此，相关的战略转

变为地缘战略，也就是为达到地缘政治目的所需的程序、行动和手段（“如何”和“用什么”）。换句话说，地缘战略是指将为实现地缘政治目标而制定的纲领付诸实践。

第二章　大国的性格：统治世界的前提

管理国际关系比指导国内事务更棘手和受限。

——罗伯特·D．卡普兰

世界就像校园。在世界上的每所学校中，都有男孩和女孩控制着自己周围的小圈子。他们是所在班级或年级权威组织的主要成员，受到每个人的尊重和敬畏。在下课或放学后，这种权力等级尤其明显。特别是在操场上可以看出谁具有影响他人的能力，这种能力受许多因素影响，例如强壮的体魄、天生的领导能力、运动能力、强大的家庭背景、良好的口才以及教师的青睐等。

那些占主导地位的孩子可能以有益于班级的方式行事，引导整个班级积极向上。但是，他们通常也是麻烦的制造者，会趁老师不注意，组织一些违反学校规章制度的活动。更有甚者，他们会对比较弱小的同学进行身心上的霸凌。

一些寻求保护和被认可的孩子，则习惯于围绕在那些领头者的周围，成为追随者。他们会在领头者讲笑话时大笑，会在领头者嘲弄弱者时鼓掌，还会在领头者展示自己的才能时欢呼。简而言之，那些追随者宁愿丧失部分人格，也要成为领头者的拥趸，只是因为这个团体会给予他们一定的地位。

为了能够这样行事，领头者及其追随者需要周围的人持续不断地肯定他们。除了轻视那些不具有相同社会地位，或者在学校最受欢迎的运动中玩起来不如他们的孩子，他们还会将一些不幸的孩子作为他们投掷“毒箭”的目标，因为这会使他们产生优越感。如果这些不幸的孩子碰巧是出色的学生，那么他们就更有理由针对这些不幸的孩子了，因为他们必须防止后者成为他们的竞争对手，对他们的地位构成威胁。对于后者来说，如果缺乏足够的智慧或家庭支

持，可能最终会受到不可挽回的伤害。而其中一些受害者为了避免被打击，则可能希望成为追随者。

可能你也会发现，有一些孩子会拒绝领头者的领导或者整个团队的压力；另有一些孩子虽然具备某种能力，但是根本不想结成团伙，也不想对谁施加什么影响，他们只想在好好过自己的生活的同时，避免对其他人采取不恰当的行为；还有一些孩子独来独往，坚决不参加任何团体活动（无论是积极的，还是消极的），但是当有人诋毁他们时，他们会做出过激的反应。

对于必须共同度过许多时光的群体来说，例如士兵、在押犯人等，情况也是如此。国际领域也一样，只是其成员是能够不同程度地影响全球决策的国家。

1．虚伪和残忍：国际政治的真实品格

征服者永远是和平的爱好者。他想在没有遇到反对意见的情况下，扫清通往他国领土的道路上的障碍。

——卡尔·冯·克劳塞维茨

没有什么比国际政治更为虚伪和残忍，因为每个国家的所作所为，都是以自己的利益为基础，而每个国家的利益总是不断变化的，与其他国家的利益很少相关或者完全无关。国家政策也是无情的，不会顾及政治对手的感受。为了削弱和击败政治对手，一方会采取一切自认为合理的手段，其唯一目的就是打压政治对手。尽管意识形态不同，对利益的解释也不同，但是所有政治团体都追求同样的目标，即实现国家和公民利益的最大化。

就国际政治而言，没有共同目标（就算有，也不长久）能抑制最低级的本能，也没有一丝温暖能凝聚人心。共同利益是如此脆

弱，很快就会被其他事情代替，因此许多联盟关系或敌对关系总是以自相矛盾的方式解散或以惊人的速度转换。处于永久竞争状态的各方，会相互使绊子，以获得更大的利益。

即使出现共同的危险或威胁，例如气候变化，竞争状态也不会受到真正的影响，因为每个国家都专注于自己的利益。通常一个国家越强大，就越不关心其他国家的需求。尽管这样说有点草率，但是事实上很难让所有国家都采取有利于整个人类的共同决策，除非外星人入侵。无论是过去、现在还是未来，每个国家只会关注自己的兴趣点并为自己的利益行事，哪怕他们完全意识到这可能对其他国家造成直接或间接的损害。

在国际关系中，总是由强权主义者引导和制定规则。对于这种情况，英国军事历史学家迈克尔·霍华德用这句话进行总结：“通常，对维护和平表现出更大兴趣的国家，是那些拥有更多武器的国家。”这充分体现了霸权主义者的极度虚伪。

2．支配者与被支配者：大国的权力游戏

强者做其想做之事，弱者不得不承受。

——修昔底德

对世界具有不同影响力的国家共存于一个大舞台，这些国家可以分为两种类型：支配者和受支配者。支配者在某些区域或全球范围内实施控制；受支配者会以不同的方式（军事、经济、文化、技术等）被支配，有时不得不屈从于支配者的统治。

不管出于什么原因，自认不够强大的国家（是否拥有核武器是一个重要区分标准）总是寻求大国的庇护。至少在理论上，大国会保证为小国提供安全保护和外交豁免权。就纯粹的战略手段而言，

核大国所能提供的保护，就是当小国面临联合国制裁时，以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身份对其加以保护。

一个弱国受到其他好战国家的攻击时，不得不依靠强悍的第三方。以叙利亚为例，叙利亚总统巴沙尔·阿萨德不得不接受俄罗斯的帮助，而俄罗斯在这个过程中，当然也追求自己的利益——防止美国及其盟友所支持的叛乱分子，对俄罗斯的力量造成冲击。

当一个国家自认为不具备足够的地区影响力或世界影响力时，便会与其他国家结盟。一些国家笃信俾斯麦所说的“认为自身力量足够强大、能够捍卫自己的领土和利益，并选择完全孤立的国家，最终会在其他国家的重压下消失”，强调结盟的重要性。当不得不与其他国家结盟时，依附性可以达到如此之深：一些国家，甚至是中等规模的国家，被超级大国拖入与自己利益完全无关的军事冒险中；有些政府会把军队派往与本国利益无关的远方，尽管善于取悦当政者的理论家会抛出一些理由来证明政府这种行为的合理性，如提前防御、保护人权、推广民主价值观等。但在许多情况下，这些“充当伴唱者的国家”的唯一收获就是树立了根本没有必要树立的新敌人。由于这些国家在远方采取了军事行动，或只是在某种程度上损害了恐怖主义组织的利益，其本土通常会受到攻击；有时，这些国家的公民对目的模糊的军事行动不予支持，从而导致社会动荡或政府下台。

也有少数国家不参加任何联盟，它们没有足够的实力成为支配者，也不想被有实力的大国以任何方式支配，因此被某些国家定义为“叛乱分子”。2015年2月美国发布的《国家安全战略》中，“叛乱分子”一词被“不负责任的国家”所取代。但是，就像那些想要游离于学校主导群体之外的孩子一样，拒绝参加权力游戏、想要走自己的政治和社会道路的国家会冒一定的风险，它们必须确保自己能在施行孤立主义外交政策的情况下生存下去。

还有一些国家，如沙特阿拉伯、土耳其、埃及和伊朗，走了另一条路。这些国家都是区域性领导者，渴望继续扩大影响力。但是，它们并不想成为全球性大国，更不想得罪与其若即若离的超级大国。同时，它们也不甘心沦为大国的附庸。

政治学家兹比格涅夫·布热津斯基也提出了一个类似的概念，他认为存在着“战略参与者”和“地缘政治支点”。前者是指有能力和意愿在国外行使权力或发挥影响力，并且能够改变地缘政治现状的国家。这些“战略参与者”一般是重要且强大的国家，但是并非所有重要且强大的国家都是“战略参与者”，因为这取决于该国是否愿意参加这种权力游戏。“地缘政治支点”是指这样一类国家：他们地理位置特殊，能够限制其他国家获取某些资源或进入某些地区，例如乌克兰、阿塞拜疆、土耳其、伊朗等。

3．不择手段：人类斗争的真相

人与人的冲突、族群与族群的冲突，都是利益、观念和文化多样性的必然产物。武装冲突则存在于任何国际体系当中。修昔底德在讲述伯罗奔尼撒战争时提到，那场战争的真正原因是：雅典的日渐强大引起了斯巴达的恐惧，使斯巴达不得不发动战争。这个理论被称为“修昔底德陷阱”，它可以解释在历史上发生的任何事情或者未来可能发生的任何事情，因为拥有权力的人将会不择手段地阻止其他人在任何领域威胁其霸权。尽管人们试图避免这种斗争，但是人类群体之间的斗争却是永恒存在的。虽然斗争形式会改变，斗争的血腥和野蛮程度有大有小，斗争方式或显而易见或不可察觉，但是斗争永远不会终结。这无疑是一种悲观的看法，但是我们所看到的一切，都使我们不得不承认现在和将来的情况也是如此。

1929年，国际联盟委托莫里茨·波恩和安德烈·齐格弗里德编写了一份名为《影响世界和平的经济趋势》的报告。这两位学者得

出的结论是，在历史上的大部分时间里，既得利益的国家总想在权力和财富方面保持其特权地位，而未得利益的国家则渴望获得财富以变得更富裕或渴望获得权力以变得更强大。可以说，什么都没有的人想拥有某些东西；拥有一些东西的人还想要更多，而拥有一切的人则害怕失去。个人和国家都是如此，都是自私和野心使然。

中国军事科学院的彭光谦将军和姚有志将军认为，《吴子》表明，在战国时期（前475—前221年），人们参加战争的动机有五种：一曰争名，二曰争利，三曰积恶，四曰内乱，五曰因饥。曾于1970年至1981年期间担任法国情报部门负责人的亚历山大·德·马朗什伯爵明确指出，目前的国际冲突主要表现在控制原材料，以及通过媒体、教会、教育等方式控制人类心理的斗争。伯爵的发言出现在互联网和社交网络爆炸之前的1986年，时至今日，网络的发展已经成倍地加强了领导者对群众的心理操纵。

斗争的目的一直都是为了争夺权力、地位，以及对人和资源的控制。在任何时候，为了达到目的，斗争者都会使用一切可用的手段，并将获胜的雄心变为纯粹的统治欲望。如果使用暴力是取得胜利的最有效手段，所有斗争者都会毫不犹豫地使用它。

俾斯麦曾说：“感恩和信任不会让任何一个人站在我们一边；但恐惧却可以，前提是我们知道如何有技巧地、谨慎地利用这种恐惧。”他明确指出，无论是使用或威胁使用武力、暴力，都会对关系产生决定性的影响。尼可罗·马基雅维利说得更直白：被害怕比被爱更有用。一方面，只有恐惧能在短期内发挥作用并助长仇恨，产生不可预测的后果；另一方面，让别人喜欢自己的愿望，会被别人当作明显的弱点，并以此为媒介，控制自己的上级甚至夺取上级的权力。

正如老话所说：“有的人是出于爱而行动，有的人是出于恐惧而行动，还有的人是出于信念而行动。”实际上，人们的行为是这三者共同作用的结果。在国际关系中，至关重要的是要知道如何在关键时刻让别人站在你这边；同时还要了解，同一战略不可能永远奏效。即使仅作为最后的手段，对武力的恐惧也是一切国际关系的基本要素。很明显，谈判和对话只能与愿意倾听、相互理解且有理性的人进行；礼节和说教在暴力和野蛮面前是无能为力的。无论多么令人遗憾，但是不得不说，有些人只有在受到武力威胁时才会做出反应。

4．战争的唯一目标：不惜一切赢得胜利

即使人类能设法避免一切危险，他们也永远不能消除那些想要消灭同类的人所制造的危险。

——德莫斯特内斯

只要有人类群体想要把自己的意愿和生活方式强加于他人，战争就将作为国家执行其意志的暴力手段而存在。即使是最爱好和平的群体，也必然会在反击和屈服之间做出抉择。康德悲观地认为，战争本身并不需要特别的动机，其似乎植根于人的本性当中。他说：“人类的自然状态不是和平，而是战争。”这种说法并不新，柏拉图就曾预言：“城邦之间的战争将是持续和永恒的，这是自然法则。”伊拉斯谟认为：“战争是如此残酷，更适合野兽而非人类。”这完全体现了“战争所反映的兽性本质、战争所释放的暴力循环和战争所带来的低级本能”。人类的恶劣本质通过战争暴露出来，并且被放大。战争一旦爆发，动用武力就会有更充分的理由。从那时起，参战者就只有一个目标：不惜一切赢得战争。如何赢得战争则显得无关紧要，即使是使用最无法想象的手段也无所谓。

2007年5月9日，弗拉基米尔·普京在纪念苏联卫国战争胜利62周年之际发表讲话时说：“我们有责任记住，任何战争都源于和平时期对国际形势的误判，都源于对抗和极端主义的意识形态。记住这一点对今天来说非常重要，因为今天类似的威胁并未减少，只是改变了外在表现形式。这些新威胁表现出对人类生命和全世界共同愿望的蔑视。”他所说的威胁可能来自“圣战主义运动”和美国。但是毫无疑问，无论如何，他的言论反映了人类固有的“雄心壮志”，那就是凌驾于他人之上。

法国将军、地缘政治学家皮埃尔·M. 加洛伊斯认为，强者并不总是首先发动战争。英国军事历史学家和思想家J. F. C. 富勒说：“失败者想占有强者财富的愿望并没有什么不合逻辑的。”所谓的“西方世界”约有9亿人口，但是目前在这个星球上还有另外66亿人。这66亿人有不同的文化视野，并在某种程度上被认为是社会发展和全球化的输家。显而易见，地球上的大多数居民都渴望扭转目前的局面并成为特权阶层。“西方世界”狭义上指欧洲、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和新西兰。从更广的角度来看，也包括其他发达国家，如以色列等国。

在地区性暴力盛行的全球背景下，曾担任过美国国家安全顾问和国务卿的政治家亨利·基辛格指出：两个超级大国常常像两个全副武装的盲人，同处一室，到处摸索，他们都以为对方目光如炬，相信自己正受到致命的威胁。时间一长，两者都可能给对方造成巨大伤害，更不用说对他们所处的房间（地球）造成的破坏了。这种情况已经发生而且可能再次发生，因为当今全球超级大国拥有巨大的破坏力，所以将对人类造成巨大的威胁。解决这种情况的唯一方案是大国之间的定期对话，但是鉴于某些大国想要完全称霸全球的野心，这似乎是一个乌托邦式的梦想。

记者兼政治分析家罗伯特·D．卡普兰强调了这一主要问题，他说：“世界继续处于自然状态，在这种状态下，没有霍布斯主义的利维坦惩罚不公正者。”他的意思是，虽然已经建立了一个旨在“惩治国际不公正行为”的国际法律体系，但是强国总是能设法逃避法律的惩罚，同时又能对弱国严格执行这种法律。当前的地缘政治准则，是中小国家希望国际关系建立在国际法的基础之上，即无论各国的规模和实力如何，国际法对所有国家都应该是真正公平和公正的。然而，强国想把国际关系建立在实力、地缘政治权重和影响力的基础之上。

经常出现的一个问题是国际关系中使用武力的合法性问题。这往往被认为是善与恶的区别。问题在于，对立双方总是认为自己一方是善良、正义和理性的，另一方则是凶狠、邪恶和非理性的。可以说，对正义的理解不同导致了冲突的发生。

另一个问题是，国家之间的政治和军事联盟能否保障更大程度上的集体安全？如果某些国家决定结盟以保障自身安全，那么其他国家也可能结盟作为应对之策，这就可能在大国之间引发一场新的战争，甚至可能是颇具破坏性的战争。由此可见，联盟既不会带来更大的稳定性，也不会使世界减少暴力。

在这个暴力盛行的世界，人类好像无法摆脱原始的野蛮行为。英国军事历史学家迈克尔·霍华德说：“有一些人认为现有的秩序不能构建‘和平’，并已经准备使用武力来改变我们认为可以接受的秩序。为了维护和平，我们必须提防这些人。”他还警告说，至关重要的是要辨别当前的敌人和潜在的敌人，并了解他们的意图。不要认为开战对一方不利就足够了，因为其他人不一定这么想。

在纷繁复杂的国际关系中，既没有好的国家也没有坏的国家。每个国家都在追求自己的利益，而这种利益越来越变化无常。小国

的影响力极小或根本不存在，它们只能通过分析大国的行为会使其受益还是受害，来做出适当的反应。如果孤立主义有益，它们会选择置身于大国的争斗之外；如果孤立主义有害，它们则会选择与其他国家结盟。

任何理想主义式的立场都只会损害国家利益。对于地缘政治来说，对于任何国家来说，没有绝对的好坏之分，只有短期的利害之别。在虚伪和犬儒主义笼罩的世界当中，唯一有效的建议是：依靠你自己的实力。

第三章　一切为了活下去：统治世界的原则

纵观历史，一系列地缘政治原则不断涌现。虽然地缘政治本身随着时间推移、历史演变和技术进步而发生了改变，但是那些永恒的地缘政治原则继续支配着国际关系和世界事务。

1．生存并强大：国家存在的终极目标

在19世纪下半叶，随着工业革命的全面展开，出现了经典的地缘政治概念。这些概念的创造者认为，国家是一个有机体，需要养活自己以求生存和发展。弗里德里希·拉采尔在《政治地理学》一书中做了类比。在这本书中，这位人文地理学的创始人列举了具有普遍性的7条法则：

• 国家的空间随着文化的发展而扩展。

• 国家领土的扩张应该与其经济、商业或意识形态的发展同步进行。

• 国家通过纳入或吸收重要性较低的政治实体而成长。

• 一个国家的边界是不断变化的生命体。

• 国家扩张过程中所遵循的主要逻辑是兼并更富裕的领土。

• 一个国家之所以能够扩张，是因为其周边存在着劣于它的文明。

• 吞并和吸收弱国的总体趋势，是占有更多的领土来满足自己的发展需求。

这些法则所隐含的思想是：并非所有国家都是一样的，总会有一些国家的文化、军事或经济发展程度较高，而发展程度高的国家总是试图控制它们认为发展程度较低的国家。拉采尔认为，各个国家为了占据和扩大生存空间而处于永久的竞争之中。在20世纪早期，这一点对处于工业化进程中但是缺乏资源的德国来说至关重要，因为它既不像法国和英国那样拥有庞大的殖民地，也不像沙皇俄国那样拥有广阔而富饶的国土。尽管当时的争斗主要发生在邻国之间，但随之而来的全球化过程使对抗的范围扩展到全球。

与上述观点类似，在1899年首先使用“地缘政治”一词的瑞典政治家、地理学家鲁道夫·契伦认为，国家具有生命。作为有机体，国家先是诞生，然后为生存而斗争，继而发展，发挥其影响，最后进入衰竭期并死亡。作为生命体，国家掌握着自己的命运。

每个国家为保证自己的生存，都需要利用地缘政治法则和生存空间法则。这两个法则的忠实继承人、慕尼黑学派以及地缘政治学的创始人——德国人卡尔·豪斯霍弗，在政治思想和政治野心方面，对当时正在走向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文简称“二战”）的德国产生了重要影响。这位将军和地理学家曾担任过日本的军事顾问。他认为根据日本所提供的范例，德国的扩张是合理的，因为只有扩张才能确保其满足处于发展阶段的国家需求。生存空间的概念对希特勒产生了强烈的影响。通过豪斯霍弗的帮助，被囚于兰茨贝尔监狱的希特勒阅读了拉采尔的《政治地理学》。豪斯霍弗认为，从军事地理和资源的限制性来看，德国的处境极为不利。拉采尔和豪斯霍弗的思想为希特勒发展自己的思想提供了所谓的科学依据，这在《我的奋斗》一书及希特勒的扩张计划中都有体现。这些理论促成了巴巴罗萨行动，促成了纳粹德国对苏联的入侵，也促成了这位元首渴望为德国获得生存空间所采取的一切行动。

多年以后，皮埃尔·加洛伊斯写道：“争夺空间的战争实际就是人类的历史。这种战争开始是为了生存，接着是为了安全，最后是为了获取最高权力。”加洛伊斯说：“人类受存在主义的驱使，一直在追求扩张主义的目标。尽管这一目标由于人们的需要和能力不同而有所不同，但是这已经成了历史的常态。”这一论断，实际上也遵循了拉采尔和契伦的思想。

直到今天，这些假设仍然完全有效。作为一个有机体，国家必须关注自己的重要需求，该需求既包括维持生存现状的需求，也包括发展和进步的需求。为了满足这些需求，国家必须关注两个不同但密切相关的方面：以食品供应为核心的人口基本需求和以原材料和能源资源为主的工业需求。

2. 谁控制了财富，谁就能控制世界

战争有三件事：第一是钱，第二是钱，第三还是钱。

——拿破仑·波拿巴

俄国十月革命的领导人列宁说：“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这一论断现在依然完全有效，因为经济是人际关系和国际关系的主要推动力。若再加上19世纪普鲁士军事理论家克劳塞维茨的名言——“战争无非是政治通过另一种手段的继续”，就可以用三段论的形式得出结论：战争也是经济的延续。

可以大胆地说，经济现实决定国家所制定的政策，其中也包括战争政策（例如，建立海军主要是为了保护商船队）。同样地，今天的国际政治也可以被描述为经济的产物。

德国历史学家沃尔特·格利茨认为，英荷石油巨头亨利·迪特丁的财政支持对希特勒的崛起起到了重要作用。这位荷兰皇家壳牌

集团总裁之所以支持希特勒，是因为他是布尔什维克政权的坚定敌人，而布尔什维克政权占有了壳牌集团在巴库（阿塞拜疆）的石油勘探基地。格利茨还指出，在西班牙内战期间（1936—1939年），美国德士古公司为佛朗哥政权提供了所需的全部石油。作为回报条件，佛朗哥政权不仅偿还了拖欠德士古的债务，还使德士古获得了常年在西班牙独家销售石油的垄断权。德士古时任主席——石油巨头托尔希尔德·里伯为这一行为辩解，称他们必须像共和党人赢得南北战争那样阻止苏联石油涌入西班牙市场。

各国甚至在战时也采取经济措施，以便为和平的到来做好准备。比利时外交官雅克·德·洛奈回忆说，1944年8月10日，来自克虏伯、劳士领、莱茵金属和大众汽车等公司的德国工业代表在斯特拉斯堡会晤，讨论德国战败后，各家公司如何保护其工业资产。在第二次会议上，德国军备部的一位特使敦促工业代表尽快在国外建立秘密基地，为战后发展做准备。

2001年美国反恐安全小组主席理查德·A. 克拉克说，经济对于一个国家的安全和稳定至关重要。“9·11”事件后，小布什总统首先关注的是恐怖袭击可能造成的经济损失。他的第一批指示都发给了对维持经济发展至关重要的企业，例如银行、证券交易所、航空公司等。尽管华尔街遭到了严重破坏，但是总统下令，要求一切尽快恢复正常。

在一项联合研究中，马朗什和外交官戴维·A. 阿德曼说，意大利曾与利比亚建立密切关系，因为卡扎菲在意大利投入了大量资金，是菲亚特汽车公司的主要股东。2013年，阿卜杜勒·法塔赫·阿西西将军通过政变上台后，一些欧洲国家与埃及政府保持密切经济联系也是出于这个原因。

阿富汗的鸦片生产也是一个经典案例。罂粟长期以来一直是阿富汗人的传统作物，不过在塔利班执政期间，执政者认为种植罂粟违反伊斯兰教教义，禁止人们种植罂粟。然而令人惊奇的是，自2001年美国入侵阿富汗以来，阿富汗的鸦片产量却连年增长，达到创纪录的数字。据说，美国军队曾编写一份报告，详细说明了其他作物可以取代罂粟，其中最能带来利润的是棉花。这是因为阿富汗的气候非常适合棉花种植。但是，当美国棉花生产商得知这一计划后，马上设置一切障碍以阻止这个项目的启动，因为质优价廉的阿富汗棉花将与美国本土棉花形成激烈竞争。

占领市场和控制先进技术越来越重要。可以说，一个国家在国际舞台上发挥作用时，经济武器在某种程度上已经取代了常规武器。

经济也可以对国内政策产生同样重要的影响。法国地理政治学家弗朗索瓦·蒂阿尔将分离主义定义为一个国家的富裕地区利用各种借口，寻求摆脱贫穷地区的过程。这不过是一种驱逐被剥夺权利之地区的集体利己主义形式。

三个支柱：自然资源、能源和技术

温顺的人将继承土地……但不是土地上的矿权。

——保罗·盖蒂

作为典型的资本主义和经济自由主义的产物，对利润最大化的追求让许多国家制定了相应的政策。苏联曾一直遵循传统的按需生产原则组织管理生产和经济，但是苏联解体后，现在几乎所有国家都按照自由贸易的原则来管理经济和组织生产。

在西方国家，商业自由主义和资本主义占有重要地位，经济以追求利润为中心。为了追逐这些预期的利润，公司和国家都需要不惜一切代价进行销售，而且越多越好。为此，面对日益激烈的竞争，各国要获取、维持和扩大可靠和稳定的市场。

为了获得“可销售”商品，各国还需要一系列的要素，这些要素对于最大限度地提高工业生产效率和获取利润至关重要，主要包括：自然资源（如矿物、木材等）、能源（主要是化石燃料和电力）和技术。因为这些要素是稀缺的、令人垂涎的，所以也是战斗开始的地方。就自然资源而言，其类别是广泛的，包括工业生产能源或高科技产品所需的战略性矿产。

到18世纪下半叶，随着机械化的引入和推广，尽管有一些畜力的辅助，但是动力基本还是来自人类。因此，在大国征服别国的过程中，掠夺奴隶与获取资源成为同等重要的目标。从工业革命开始，对大量需求的原材料（橡胶、矿物等）和能源（蒸汽机械用煤）的争夺成为一种常态。

目前，全世界范围内加速发展的工业正在消耗越来越多的自然资源。根据法国地缘政治学家蒂阿尔的说法，在里根政府执政期间，美国开始进入非洲，目的是控制工业发展所需的矿产和能源资源，甚至是农业资源。蒂阿尔认为，大国之间为控制非洲资源而引发的经济矛盾，是造成非洲大陆冲突的主要原因。他还补充说，乌克兰已经成为美国及其盟国与俄罗斯展开竞争的舞台。美国及其盟国的主要动机是阻止俄罗斯进入黑海地区，以免其争夺克里米亚并控制乌克兰境内的重要自然资源。蒂阿尔和拉彼威尔还指出，北极的核心问题是石油和矿产财富的分配。他们认为，美国正在努力使未来在格陵兰岛上的任何自然资源勘探、生产和贸易活动都由美国公司进行。目前格陵兰岛最大的企业是美国铝业公司。这家公司是

全球最大的原铝生产商之一，其产品广泛应用于军事装备、航空航天、运输和建筑行业。

就矿产资源而言，有一系列可能导致紧张局面的问题：许多自然资源稀缺；即使某种资源储量丰富，但因地形复杂、运输困难或环境问题，开采成本很高；矿产资源通常掌握在一个国家或一小群国家手中，而且通常位于不稳定且容易爆发暴力冲突的地区；对工人来说，采矿工作也威胁着身体健康。出于上述这些原因，获得能够持续供应“战略矿产”的良好矿藏是各国及各跨国公司的优先战略。

纵观历史，根据时代需求的不同，人们对“战略矿产”的定义也不同。铜和锡曾是重要的战略矿产，但是在工业革命时期被铁和煤所取代；而如今，铀、铜、锰、锗、铍等都被认为是必不可少的矿产。大国积极储备“战略矿产”，以便在爆发剧烈冲突导致矿产供应被完全切断的情况下，能够维持两到五年的工业生产。尽管在当前政治经济背景下，我们应该从持续的国际经济斗争角度而不是从假设的国家间冲突角度来看待“战略矿产”，但是“战略矿产”一词仍常常被理解为与军事或战争有关。只要最终有利可图，一些大国和企业就愿意付出巨大代价甚至挑战国际法。获得关于某些矿物生产和贸易的可靠数据几乎是一项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因为有些国家故意将这些信息隐藏起来，以防有人对其进行详细分析。例如，在美国的官方文件——地质研究所每年出版的《矿物年鉴》中，美国政府承认用于微电子、电信和航空航天行业的一些矿物的交易信息都是不公开的。维基解密披露的美国外交消息说明了这些矿物的重要性及其矿藏资源的地理位置。这份时间为2009年的消息，记述了对美国至关重要的自然资源，以及可以找到这些资源的国家，其中是这样描述的：几内亚的铝土矿，刚果的钽铁矿，南非、哈萨克斯坦和印度的铬铁矿，加蓬、巴西和乌克兰的锰，中国

的锗、稀土和石墨，印度尼西亚的锡，巴西的铁，俄罗斯的铀、镍和钯。

另一个值得特别关注的国家是阿富汗。根据各种研究和报告，在阿富汗的地下有一个巨大的矿藏，其中许多矿物被认为是战略性的，包括金、铜、铁、钼铁矿、稀土、锂、铬、铅、锌、铍、萤石、铌和铀，以及在历史上就以品质良好而闻名于世的宝石。因此，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显然受到了DynCorp公司总裁斯蒂芬·芬伯格和American Elements稀土开采公司的首席执行官迈克尔·西尔弗的鼓动，在2017年7月末说："矿产开采可能是美国继续干涉阿富汗的一个原因"，"对于开发阿富汗的矿产资源，美国做得远远不够"。

关于能源的地缘政治的最好定义是：控制能源（储备、开采、生产、运输、转化、储存或分配）的斗争。正如政治学家、外交官约翰·G．斯托辛格所解释的那样，第一次海湾战争的爆发是因为石油。如果萨达姆·侯赛因控制了沙特阿拉伯的石油，他将控制世界石油已知储量的一半，这将对西方国家产生巨大影响。因此，对沙特领土的防御成了美国等西方国家的一个明确的战略目标。能源和自然资源的运输路线也非常重要，特别是承担了80％世界贸易运输的海运路线。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谁控制了海洋，谁就控制了世界市场，就能够在世界占据领先地位。这也就解释了世界上一些地方的战略重要性，如好望角、苏伊士运河、巴拿马运河、霍尔木兹海峡和马六甲海峡等地。

目前，石油和天然气仍然是对全世界都有重要影响的燃料，可以满足个人生活需求以及大规模工业消费。然而，在并不遥远的未来，电力可能会成为最重要的能源来源，这意味着谁控制了电能的生产、储存和运输，谁就有可能统治世界。

就技术而言，目前经济斗争的关键焦点是科学技术创新。任何在这些领域没有进行充分投资的国家都有被更发达国家超越的风险。

为了了解未来可能产生自然资源争夺战的地点，我们不妨看看大国探索太空的雄心壮志。在太空探索的新时代里，人们不仅是为了寻找未来人类的定居地，也是为了获取地球上稀缺的资源。行星、卫星和小行星很可能成为“战略矿产”、能源乃至水的不竭来源。踏上其他星球不仅能带来巨大的国际威望，也会显示一个国家或国际组织的技术潜力和地缘政治影响力。

只有当人类能登陆火星时，外层空间才算真正被人类征服。在这个红色行星表面，至少有300万立方米的高纯度冰，其下面也可能存在液态水。因为火星与地球具有相似的特征，所以是建立大型永久定居点的理想场所。火星定居点既可以减轻不断增长的人口压力，也可以在发生灾难时作为可能的避难所，还可以成为进一步开展太空探索的基地。

经济与冲突

现代战争已经成为各国开展贸易的方式。

——科尔玛·冯·德·戈尔茨

冲突的发生和发展或多或少都与经济因素有关。经济因素既是大多数战争的主要目标或者次要目标，也会对战争的形式产生重大影响。法国社会学家加斯顿·布杜尔认为，1914年德国发动战争，是因为它与其他主要工业强国和出口强国进行经济斗争的成本过高。法籍黎巴嫩裔作家、记者阿敏·马卢夫以及中国军事理论家乔良和国际关系学者王湘穗认为，尽管英国以自由贸易之名发动了臭

名昭著的鸦片战争，但实际上，战争原因是中国拒绝为英国操纵的暴利贩毒活动打开大门。英国的贩毒活动，是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由国家组织的毒品走私活动。

英国军事理论家富勒准确地分析了战争和经济之间的关系。他认为，美国的南北战争（即内战）主要是由经济原因而引发的——北方希望发展工业，而南方希望发展畜奴农业。

而在印度和巴基斯坦爆发冲突之前，圣雄甘地得出的结论是：对邻国发动战争的开销将比每年处理难民问题的经济负担（大约1000万孟加拉国难民，每天费用约为250万美元）更低。

布匿战争的经济原因

在罗马和迦太基之间发生的第一次布匿战争，使这两个城邦国家都元气大伤。但是，海上贸易中断造成的巨大损失，使得迦太基这个非洲城邦情况更糟糕。作为战败方，迦太基人必须接受苛刻的条件，包括向罗马人赔款3200塔兰特和割让西西里岛。在这种情况下，罗马和迦太基之间又爆发了第二次布匿战争。由于经济状况恶化及失去了西西里岛，迦太基人在哈米尔卡·巴卡的带领下，开始向伊比利亚半岛发展。几年后，迦太基人与罗马人在这里又发生了冲突。第三次布匿战争也是由经济利益冲突而引发的。由于之前的战败，迦太基已经失去其在非洲以外的所有领土，还不得不在半个世纪的时间内每年向罗马缴纳高达200塔兰特的赔款。

此外，罗马还禁止迦太基拥有战舰，要求迦太基必须在获得罗马的授权后才能对外宣战；还迫使迦太基接受努米底亚王国的独立，努米底亚人在罗马的公开支持下并利用迦太基的弱点，不断扩张。

有趣的是，罗马制定的这些限制条件产生了意外的效果。善于经商的迦太基人，由于不能再将积累的财富用于军事目的，就把财富投资到迦太基城的建设当中，使其成为一个发达的商业中心。当罗马长老卡托于公元前2世纪中叶访问迦太基时，他看到了一个富足、繁荣和商业兴盛的城市，感到十分惊讶，因为他希望它一贫如洗。这次访问使得卡托认为，按照这个发展速度，迦太基人对罗马人发动新的复仇战争只是一个时间问题。从那一刻开始，卡托长老一直试图说服罗马元老院，在迦太基变得强大之前对其进行预防性的战争。为了强调对迦太基发动先发制人的攻击的必要性，卡托每次在罗马元老院演讲时，都会以同样的话语作为结束语：“迦太基必须毁灭！”

在权力和个人主义的雄心背后，还有一个决定参战的关键性因素——两个城邦之间的经济竞争。迦太基的无花果和葡萄酒等产品对罗马商人构成了威胁，所以罗马商人公开支持发动战争。由于人口的增长，罗马需要新的耕地，而夺取迦太基人的耕地无疑是一个好的选择。最后，罗马人找到了攻击迦太基并将其驱逐出地中海的完美借口：迦太基人建造了被和约禁止的船只。

从经济角度看拿破仑的战争

富勒说，英国与欧洲大陆在经济利益方面存在着长期的对抗史。在拿破仑时代，英国需要出口产品以保持其繁荣和强大，而法国需要保护其不断发展的工业，以实现繁荣并保持其政治权力。为此，拿破仑试图扼杀英国商业，阻止英国向其他欧洲国家供应商品。英国不能够容忍一个可以威胁其海上霸权且联合在一起的欧洲。因此，英国禁止中立国与法国及其盟国进行贸易。通过这种方式，双方开始了一场最终走向武力战争的经济战争。

这个借口与2003年美国攻打伊拉克（使用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或后来攻击叙利亚（使用化学武器）的借口本质上没有什么不同。

西班牙和古巴的战争

美西战争的发生有一个非常具体的经济和地缘政治背景。在这个背景下，一个伟大的新兴强国——美国与另一个明显衰落的大国——西班牙之间的对抗几乎不可避免。这场冲突是为了实现区域和世界的权力再平衡。美国力量的增长使欧洲列强不得不置身于美西战争之外，以免与美国发生正面冲突。在那个时代，工业革命驱使工业化国家和处于工业化进程的国家要不断获得原材料、能源产地以及产品销售市场。从美国西海岸向中国和日本发展的重要贸易，使菲律宾成为关键的跳板。此外，美国需要从拉丁美洲及其南部各州运输原材料，以服务于美国北部蓬勃发展的纺织工业。问题是从美国南方向北方的工厂运输物资需要通过佛罗里达海峡，而来自南美洲和中美洲的物资必须通过尤卡坦海峡。美国担心西班牙可能通过古巴和波多黎各控制向风海峡、莫纳海峡和阿内加达海峡的海上航线，从而对其商业安全构成威胁。

随着巴拿马运河的建设，西班牙可能会通过封锁这些航线向美国施加战略压力，这让美国的担忧与日俱增，因为通过这些海峡也可以进入巴拿马运河。事实上，在西班牙和美国发生冲突的一个世纪以前，古巴和波多黎各的命运就被注定了。面对欧洲列强所建立的帝国主义框架和殖民地体系，美国第六任总统约翰·昆西·亚当斯发展了门罗主义。门罗主义是由其前任詹姆斯·门罗于1823年提出的，可以用“美洲人的美洲”加以概括。门罗主义直接反对任何欧洲国家干预美洲大陆事务，任何对门罗主义的挑战都会引起与美国的冲突。这也适用于在美洲存在了几个世纪的欧洲殖民国家。

当时，西班牙占据着一些对美国的扩张具有特殊战略意义的地区。美国多次试图从西班牙手中购买古巴，并威胁如果不能达成协议，就要占领这个岛屿。

随着阿尔弗雷德·赛耶·马汉海洋战略理论的实施，美国开始在太平洋和大西洋海岸建立强大的海军舰队。这两个舰队需要通过跨洋水道——也就是后来的巴拿马运河进行调遣。西班牙殖民当局也有过类似的想法，这样就可以在两洋之间不必绕过合恩角运输货物，从而节省时间和成本。为此，美国需要完全控制中美洲及其外围水域，而西班牙在古巴的存在对美国的这个构想构成了重大威胁。

此外，由于古巴的糖产量几乎可以满足整个美国的需求，因此美国的大资本集团一直在向政府施加压力，要求控制古巴以便从其繁荣的蔗糖产业中攫取利益。

19世纪的拉丁美洲战争

在拉丁美洲，有一些近邻国家因为争夺自然资源而发生冲突。其中一个例子就是发生在1879年至1883年间的南美太平洋战争。这场战争是智利、玻利维亚和秘鲁因为硝石的开采地而引发的，也被称为“硝石战争”。几年之后，即在1899年至1903年间，玻利维亚和巴西之间发生了阿克雷战争，战争起因是对富含金矿和盛产橡胶地区的争夺。由于与争夺汽车工业的基本原料——橡胶有关，所以这场战争也被称为“橡胶战争”。

各国参加“一战”

自1873年发生经济危机开始，出现了一种新的经济模式，即放弃当时普遍存在的自由贸易，重新实行高关税的保护主义。这种背

景导致了主要工业化国家之间的公开经济战争，而这种经济战争无法通过外交渠道解决。同时期，还出现了寻求自身发展空间的新兴大国，例如德国、日本和美国，更加剧了经济的不稳定性。

在欧洲舞台上，德国不仅在短时间内成功地在钢铁和化学品等行业占据了主导地位，还拥有了数量庞大、训练有素且有组织的劳动力队伍。这使得世界经济霸主——英国越来越关注德国的快速崛起。英国意识到，德国缺乏能够以低成本开采自然资源的殖民地，因此德国寻求征服新领土似乎只是时间问题。当德国人开始建立强大的海军舰队时，英国的这种怀疑得到了证实。由于英国的海上霸主地位受到威胁，英国开始考虑与德国开战，只是缺乏开战的借口。

富勒认为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原因是英国要在工业和商业领域击败德国这个竞争对手。19世纪末，德国对外贸易的迅速扩张和商船的增加对英国的贸易造成了威胁。更糟糕的是，俾斯麦提高了军队保护对外贸易的能力，以阻止法国海军获取优势地位。对于英国和法国来说，这种情况成了关乎生死存亡的经济斗争，因此，两国的目标都是击败对方。

列宁认为，“一战”爆发的原因是列强瓜分世界，重新分配殖民地、势力范围和金融资本。事实上，到战争结束时，在主要工业大国之间发生的这场战争，业已影响到世界一半以上的人口。国际关系专家、法国历史学家皮埃尔·雷努文认为，美国于1917年介入欧洲冲突是为了捍卫其经济利益。

“二战”的关键经济因素

在“二战”爆发之前，美国和英国代表了世界的财富力量。根据富勒的说法，这种霸权背景受到了希特勒的挑战。希特勒声称要

创立一个脱离容克资本主义的德国。这位“元首”决定拒绝有利息的外国贷款，并将德国货币发行的基础建立在生产而不是黄金储备之上。除了通过易货系统进口和补贴必要的出口外，还提议结束自由交换（根据政治局势在各国之间交换货币和转移个人财富）。但是这对国际资本主义来说是无法接受的，因为国际资本主义依赖于产生利息的贷款。如果希特勒成功了，其他国家也可以仿效德国，这意味着缺乏黄金的政府会相互交换货物，导致贵金属失去价值。不要忘记，美国那时拥有世界70％的黄金储备。于是，摧毁希特勒的金融体系就成了容克资本主义的目标，因此经济战争爆发了。[(1)] 与此同时，新兴的德国工业需要产品市场。1937年9月，迅速且具毁灭性的经济危机导致数百万美国人失业。而德国在7年之前，也就是1930年，有1750万人由国家养活，其中1500万人经历了饥饿，但是此时失业结束了，经济开始复苏。

在“二战”中，为了经济利益，德国不得不推行全面的军事战略。根据英国军事史学家巴兹·李德·哈特在《山的那一边》中的说法，在“二战”期间，德国经济巨头对希特勒施加了相当大的压力，要求夺取高加索地区的石油和乌克兰的小麦，因为这两项资源对于战争来说至关重要。挪威的锰和铁矿床对德国钢铁业来说也至关重要。

德国历史学家沃尔特·格利茨表示，早在1937年西班牙内战期间，德国就制定了“山计划”，旨在控制含有铁、铜、铅、钨、锡、镍和其他重要矿物的西班牙矿山。特别是钨，对战略至关重要，因为它能够用于加强战车上的装甲。20世纪40年代早期，在韩国和中国的矿山关闭之后，德国人在加利西亚和莱昂获得了钨。由于德国在西班牙内战期间所提供的帮助和两国地理上接近的原因，德国和西班牙的关系十分亲近。对德国来说，伊比利亚半岛成了钨这一“战略矿产”的主要来源。赫尔曼·戈林向德国专家们强调，

要采取行动以便重启由于缺乏劳动力而陷入瘫痪的比斯开钨矿，同时尽快将储存在毕尔巴鄂港口的数千吨矿藏运往德国。

中东的动乱

尽管中东战争通常是由民族、宗教或政治因素所引起的，但总是有其深刻的经济根源。美国外交官威廉·C．布利特说，在20世纪40年代末和整个50年代，伊朗成了苏联、美国和英国争夺油井和波斯湾控制权的战场。当时，美国对沙特阿拉伯的兴趣仅限于购买其石油。对于美国人来说，在这个阿拉伯国家的唯一政治利益是确保和平与安全，以便开采石油。

在回顾伊朗的情况时，不应该忘记，伊朗民主选举产生的首相穆罕默德·摩萨台曾经希望将石油产业国有化，所以于1953年，在由英国、美国支持发动的政变中被赶下了台。这是因为英国不想失去对伊朗油田的控制权。根据阿敏·马卢夫在《世界的不协调》一书中的说法，当摩萨台促使伊朗议会投票支持对英伊石油公司（一家由英国控制的公司开采伊朗石油，却给伊朗很少的回报）进行国有化改革时，英国立即对伊朗石油实施了世界贸易禁运。没人敢购买伊朗的石油，伊朗财源受阻，经济受到扼杀。对伊朗发动政变的条件已经成熟，美国中央情报局发动了名为“阿贾克斯”的行动。为了加快这一进程，美国中央情报局和英国军情六处雇佣了伊斯兰恐怖组织发动街头骚乱。

马朗什提供了一个很好的例子，能够说明这个地区的地缘政治和经济利益的虚伪性。在谈到伊朗与伊拉克的战争（1980—1988年）时，他说，许多国家和石油生产商更希望这两个国家的军事力量保持平衡，以免巴格达或德黑兰有能力提高原油产量，因为这可能意味着油价崩溃，从而导致全球金融危机。马朗什还强调了相关利益在战争中的重要性，这促使一些国家向这两个敌对国提供战争

物资。这些国家的最终目标是让伊朗和伊拉克这两个国家相互消耗，从而不会成为该地区的麻烦制造者。也有人担心，伊朗将打破中东地区的力量平衡并控制伊拉克，建立一个自巴基斯坦至地中海的什叶派帝国。如果发生这种情况，那将对包括土耳其在内的北大西洋公约组织造成巨大威胁。[(2)]

对于这场战争，克拉克强调了一个可靠的猜测。1980年，当萨达姆·侯赛因决定入侵伊朗时，美国向伊拉克领导人开了绿灯，希望他能够占领石油省份朱兹斯坦，以便美国人获取伊朗的原油。美国很可能希望刚刚在德黑兰建立的新政权因为失去主要收入来源而迅速崩溃。

袭击利比亚的经济原因

曾在海军陆战队服役的记者布拉德·霍夫于2016年发表了一篇文章，他指出：尽管法国向联合国安理会建议通过第1973号决议，该决议声称是根据联合国倡导的“保护责任”原则，在利比亚设置禁飞区来保护平民，但是时任法国总统尼古拉斯·萨科齐的真正动机却是控制利比亚的石油及确保法国在该地区的影响力，从而增加他在法国选民面前的声望，显示其国家的军事潜力。

2011年3月19日，萨科齐在谈到对利比亚的干预时，郑重其事地表示：“我们这样做是为了保护平民免受其本国政权的疯狂屠杀，这个政权已经失去了所有合法性。我们的干预是为了让利比亚人民能够支配自己的命运。”几个月后，法国《解放报》公布了利比亚全国过渡委员会与法国政府签署的一项协议。通过该协议，法国企业将获得该国原油总产量的35％。据该报报道，在联合国安理会通过上述第1973号决议17天后，阿拉伯联盟秘书长阿姆鲁·穆萨收到了该协议的副本。

但是，攻击利比亚和推翻卡扎菲政权的背后可能隐藏着金融性质的原因，特别是利比亚拥有价值70亿美元的143吨黄金和143吨白银储备，这对非洲大部分地区的主要货币——非洲金融共同体法郎构成了重大威胁。(3)

利比亚领导人想建立一种基于利比亚第纳尔的泛非货币，并以本国的贵金属储备作为基础，以取代非洲金融共同体法郎。要真正理解这个意图的含义，我们必须认识到：如果任何使用法国金融共同体法郎的国家未能履行法国的要求，法国会立即封锁这些“叛乱国家”的货币储备，并关闭其银行。

上述情况就曾发生在洛朗·巴博担任科特迪瓦总统时期（2000—2011年）。根据法国前总统雅克·希拉克的说法，这个问题并非微不足道，“法国政府每年从其前殖民地征收4400亿欧元的税收。来自非洲的收入使法国免于陷入经济上的困境”。

与此同时，一些消息人士表示，卡扎菲计划用美元以外的货币进行石油交易。美国无法容忍发生这样的事情，因为绝大多数国际交易是以美元结算的，这对美国尤为重要。任何提议使用其他替代货币的领导者都会因此成为美国的攻击目标。

经济作为战争的武器

在商业中没有朋友，只有客户。

——亚历山大·杜马斯

我们生活在一个不易察觉的永久战争状态。这种战争的主要参与者是情报部门、外交使团和媒体，他们将网络空间变成了最新的战场。在这种背景下，虽然军事力量是其他方面行动的重要支持，但是经济方面的重要性已经超过军事力量。法国分析家帕斯卡·洛

洛特和弗朗索瓦·蒂阿尔认为，现代地缘政治的明显特征是军事因素相对于经济因素的重要性降低，发展经济实力是所有发达国家政府的主要战略。中国军事理论家乔良和国际关系学者王湘穗也认为，军事威胁往往是影响国家安全的次要因素。即使领土争端、民族主义对抗、宗教冲突和势力范围划分仍然是战争的主要动机，但是这些因素已经越来越多地与经济因素联系在一起，如资源的占有、市场的获取、资本的控制和贸易制裁。

在当代战争（有些人称之为“后现代战争”）中，为了削弱并最终打败敌人，除了使用上述方法之外，人们也使用具有压倒性效力的经济和金融工具。其中包括提供贷款、实施制裁、发布国家信用评级报告、由外国财富和风险投资基金进行投资、操纵股票交易、债务管理等。随着经济日益成为战争工具，在这种对抗中，经济工具被主要用来追求经济目标。经济战在理论上是可以不流血的，但是其后果、影响或是行动方式，常常导致大量流血事件发生。

正如一些人极为愤慨地指出的那样，提供国际贷款不是为了帮助债务国，而是为了控制债务国并使其屈服。美国时事评论家法里德·扎卡利亚给出了一个例子。在20世纪90年代，俄罗斯完全依赖美国的援助和贷款。正如米歇尔·埃尔特尚尼诺夫指出的那样，这促使普京试图建立一个以卢布扩张为基础的帝国，其目的是能够与世界主要经济体竞争。

乔良和王湘穗认为，未来的金融敌对行动将会加剧，这种行动会使一个国家在不流血的情况下被征服。为了证实这个观点，他们引用了20世纪90年代末美国与韩国的例子。当时，为了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获得550亿美元的贷款，韩国被迫接受美国开出的条件：完全开放市场。这个条件使美国资本能够以低价购买韩国的公司，从而借此实施某种形式的经济占领。乔良和王湘穗断言，金

融战已成为具有毁灭性破坏力的“超级”战略武器。他们认为，这种对抗的一种形式是“货币资金之战”。时至今日，由跨国公司和亿万富翁所创立的基金会的财富已经能够与一些国家比肩。例如，在1992年，金融大亨乔治·索罗斯迫使英格兰银行将英镑贬值。他们的财富甚至能够控制媒体，为政治组织提供资金，反对现有政权，根本改变社会秩序并使政府陷入困境。又如20世纪90年代发生在东南亚的金融危机。乔良和王湘穗认为，这场意外的危机完全是由国际流动资本持有者策划和发起的，其主角不是政治家或战略家，而是索罗斯。冷战期间，德国总理赫尔穆特·科尔使用类似的方式将柏林墙打开了缺口。

在这种经济战争中，尤其是当重大经济和地缘政治利益受到威胁时，所谓的制裁与事实截然不同，而公众通常对此毫不知情。理查德·A．克拉克认为，尽管在1980年伊朗与伊拉克爆发战争时，华盛顿宣布对伊朗实施经济制裁，冻结伊朗在美国的财产，但是伊朗仍继续向美国出口石油。在1987年，伊朗向美国出口的石油总价值达16亿美元。

即使在各国间紧张局势加剧的时候，也发生过类似的情况。根据阿敏·马卢夫的说法，在20世纪60年代，以色列通过与伊朗国王达成的秘密协议，连续多年通过亚喀巴湾从伊朗获得石油。尽管在1973年的赎罪日战争之后，以色列和叙利亚只是按照联合国脱离接触观察员部队的要求，自1974年起停火，从未签署永久和平协议，但是两国之间的商业往来早已开花结果。叙利亚政府仍然声称对以色列占领的戈兰高地拥有主权，但是这并不妨碍以色列在戈兰高地生产的产品出口到叙利亚。同样，尽管美国和委内瑞拉的关系比较紧张，但是委内瑞拉仍然向美国出售大量石油，这是因为能够对委内瑞拉重油进行提炼的工厂都在美国。

谁主宰世界经济？

根据2016年5月24日Investopedia网站上发布的报告，世界上最富有的五个家族是：第一，罗斯柴尔德家族，它起源于18世纪欧洲一些主要城市（法兰克福、伦敦、那不勒斯、巴黎和维也纳）。金融分析家估计其家族资产多达2万亿美元。第二，来自沙特阿拉伯的沙特家族，资产估计约为1.4万亿美元。第三，美国的沃尔顿家族，资产约1520亿美元，其员工数量超过220万人，是世界上最大的非国有雇主。第四，美国的科赫家族，资产约890亿美元，投资于众多企业。第五，美国的玛氏家族，最大私有糖果公司所有者，资产大约800亿美元。虽然这些数字不完全精确，但也足以说明五大家族的经济实力，特别是罗斯柴尔德家族，它一直与媒体保持距离，引发了人们对其家族干预全球关键决策的实际能力的多种猜测。

世界谷物和豆类市场实际上由四大公司主导：ADM（美国）、Bunge（来自巴西，总部在美国）、Cargill（美国）和Louis Dreyfus（源自法国，总部在荷兰）。这四家公司被称为“ABCD”，它们有能力在全球范围内规定大米、玉米、小麦或大豆等农作物的价格。

在粮食生产领域，少数公司控制着种子、农药、转基因食品等重要且有影响力的产品市场。这些公司中，有德国拜耳公司、瑞士先正达公司，以及孟山都、杜邦和陶氏三家美国公司。

经济情报的重要性

谁控制了食物，谁就控制了人类；谁控制了石油，谁就控制了所有国家；谁控制了财富，谁就控制了世界。

——亨利·基辛格

经济对任何国家的稳定都至关重要，因此，所有用来保障经济安全的投资都很有意义。一国的真正需求是什么？该国的兴趣点在哪里？该国遇到或者可能遇到的经济威胁是什么？可能用经济机制对该国造成破坏的主角是谁？可以采取的主动措施和防御措施有哪些？要想了解这些问题，必须获取经济情报。

2011年，时任法国总理弗朗索瓦·菲永制定了一份名为《国家在经济情报中的行动》的文件，完美地说明了经济问题对国家的生存和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性。这份适用于任何国家的文件，将经济情报活动定义为“为了增强国家的竞争力，收集、分析、评估、传播和保护战略经济信息的活动”。该文件解释说，“法国的经济情报活动是其全球经济政策的一部分，有助于经济增长，也有助于支持国内经济，保持法国公司的竞争力和安全”。这份文件表明法国在经济情报问题上的行动目标应围绕三个方面展开：一是实施战略监控，为领导人制定经济决策提供帮助；二是维持公司竞争力和增强研究实体的技术转让能力，确保法国和欧洲公司受益；三是保证公司和研究机构的经济安全。

文件结尾明确指出了各部委和各省在国家经济情报框架内应该发挥的作用。最值得注意的是关于外交使团的具体任务，该文件明确指出，“对重大合同的支持是外交使团的首要任务，确保及早发现需求和项目、政治背景、决策实施及对法国投标的竞争”。对于菲永所说的内容，我们毫不惊讶，因为法国为了确保其在国外具有竞争优势，不仅在经济情报领域是先锋，在公共和私营部门的协调（例如销售合同或公共工程执行）方面也一直是先锋。鉴于这种协同作用对于战胜其他国家的重要性，法国政府的这一举措对其国家和公民的益处显而易见。

如果有一个引擎无可争议地能够驱动人类，那就是财富。不是金钱这种邪恶的物质本身能够驱动人类，而是依靠金钱所能取得的成就——商品、服务和意志能够驱动人类。财富是满足最终目的——权力的工具。因此，获得财富、持有财富和拥有比他人更多的财富是一场永恒的斗争。

3．了解历史，才能创造历史

继续历史是一回事，重复历史是另外一回事。

——哈辛特·贝那温特

1992年，美国政治学家弗朗西斯·福山宣布历史已经终结。“作为两个世界隔离象征的柏林墙已经倒塌。苏联解体已经成为事实。冷战已经结束，民主似乎会到达地球的任何地方，就像它现在到达了东欧一样。经济和政治自由主义已被确立为唯一可行的意识形态，这意味着我们已经到达人类社会文化进化的终点。”全球化将促进国际安全。然而，尽管福山非常乐观，但是现实是完全不同的。2001年的“9·11”事件开启了一个改变国际局势的新时代。经过更新和改造的新意识形态与西方的思想发生了冲突，福山之前认为西方的意识形态已经大获全胜，但是事实并非如此。因此，历史并没有终结，而是继续存在并且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现实。

与第一批进化论者一样，马克思认为人类从一个阶段进化到另一个阶段时，其原始特征朝着实现文明和充分理性的方向发展，因此，关于阶级与信仰的斗争将不复存在。这是人们应该走向的目标。当苏联解体时，包括福山在内的各门派思想家都认为人类进步的最后阶段已经到来。他们没有想到在理解社会和世界的各种新方式之间可能会出现对抗。

然而另一些人则认为，由于将世界划分成两部分的冷战体系崩溃，世界将重新调整。美国政治学家塞缪尔·P．亨廷顿在其1996年出版的《文明的冲突和世界秩序的重建》一书中写道，西方社会和非西方社会将处于永久冲突之中，暴力将成为他们之间唯一的沟通渠道。我们不一定要赞同亨廷顿这种悲观主义观点，但是可以肯定的是，不同思想流派之间的对抗在今天依然存在。许多情况下，这种竞争不是出于意识形态，而是出于对空间和资源的争夺。

为了了解当前国际关系的博弈情况及其与历史的关系，必须了解不同参与者之间关系的运行机制。进入21世纪后，人类对日常琐事十分关注，但是对全局的看法却存在偏见。尽管生活在信息社会中，我们对了解那些实际发生的事情的真相也缺乏兴趣。我们得到的信息只是有关孤立事件的碎片，这些信息碎片并不能真正解释对抗、冲突或战争的前因后果。历史成为揭示此类事件发生缘由的完美工具。随着时间的推移，收集相似历史事件的情况，可以帮助我们总结、推导几个世纪以来共同的范式、模式和趋势。回顾过去，可以使我们思考和分析引发当前情况的根本原因。正如美国作家马克·吐温颇具幽默感的一句话："历史不会重复，但是往往惊人地相似。"

在希腊语中，历史意味着"研究"。研究已经发生的事情并指导人们预知未来可能发生的事情很重要。正如古罗马政治家西塞罗所说，"历史是时代的见证、真理的火炬、记忆的生命、生活的老师和古人的使者"，"如果不知道在我们出生之前发生了什么，那么我们永远都是孩子"。但是历史不是一门实验科学，更不是一门实践科学，无法在一系列数学运算或统计研究之后，得出一系列积极的、可量化的和无可辩驳的结论。相反，它是一门人文科学，在特定的时间和空间中研究人类，同时考虑事实和行为，评估其在物质以及思想、信仰等方面的影响。因此，历史能帮助我们分析过

去，从而更好地把握现在。然而，由于历史总是由人来解释的，因此对历史的解释会存在争议或受到操控。

在“二战”期间，纳粹分子或摧毁或没收了数千件与其意识形态不符的艺术品和书籍。近年来，阿富汗的巴米扬大佛和叙利亚的巴尔米拉城也被摧毁。这些行为不是暴力或欲望的结果，而是统治者或强权者渴望消除历史的痕迹。重塑过去是统治者惯用的伎俩。自远古以来，不同的权力集团选择遗忘、篡改或改写过去，以重新引导社会发展，以及控制和操纵人口。

独裁者、压迫性政府或极端民族主义者经常通过“修正”历史来编造现实。即使在今天，从理论上讲，一些几乎不具有压迫性和专制性的政治领导人也会曲解历史事件。因此，历史不是一件小事。了解事件的真实性或者最接近事实的版本，能够帮助我们确定我们是谁，以及我们要去哪里。更重要的是，它促使我们寻求真理和客观事实。

历史和地缘政治

地缘政治受到历史事件的影响，使得历史将过去与现在联系在一起。例如，如果不了解土耳其人在一个多世纪以前对亚美尼亚人民所犯下的罪行，我们就很难理解当前亚美尼亚与土耳其的紧张关系。[(4)]如果不了解资本主义扩张时期宗主国与殖民地之间的关系，我们就不会理解美国和英国之间的良好关系，也不会理解某些非洲国家与一些欧洲国家的亲密关系。

世界政治地图与50年前大不相同，在50年后也不会一样。地理空间未曾改变，也不会改变。在这些地理空间内，一个个国家不断诞生、发展和消失。有时，不同国籍的民族聚集在一起，形成一个新的国家；有时，一个多民族国家无法承受各种族群体的分离压力

而分裂，产生了几个新的国家，只留下了对过去功绩和历史成就的记忆。因此，历史对地缘政治很重要，因为它展现了国家的演变、持续存在的利益和冲突，以及利益如何得到满足或冲突如何得到解决。历史帮助我们从错误中吸取教训，尽管我们经常重复同样的错误。

几个世纪以来，类似的事件在相同情况和条件下相继发生。虽然有人类学家和文化研究者认为，这是某些民族好战性和文化或地理决定论的结果，但是实际上冲突在同一地方再次发生，主要是因为这个地方具有战略敏感性。

如果我们分析世界历史地图，会注意到某些区域一直是冲突的中心。在某些情况下，这些冲突反映了物理空间与边界标记的虚拟空间之间的不匹配。事实上，一些国家之间的界限是按照地形的自然线条划分的，没有考虑到当地居民的种族、文化、宗教差异，就像非洲大部分地区一样。在一些情况下，生存、福利和财富所需的资源集中在“无人控制区域”，这导致争夺资源控制权和管理权的斗争经常爆发；人口压力也迫使一些国家不得不开疆拓土。但是在许多情况下，冲突的产生仅仅是因为这些区域是通道区域，是获取资源或占领其他地缘政治空间的关键性“十字路口”。

阿富汗就是这样一个处于关键性“十字路口”的国家。在19世纪中期，英国试图控制这个多山的国家，以阻止沙皇俄国向其殖民地边界挺进。但是英国的企图失败了，阿富汗人抵御住了英国的入侵并将他们赶出了国境。英国人是第一个犯这种错误的国家，但绝不是最后一个。一个世纪后，苏联人试图控制这个国家，以增强其在冷战中的国际影响力，但是最后也被击败了。在2001年世界贸易中心双子塔遭受袭击之后，由美国领导的“持久自由军事行动”也失败了。阿富汗证明了自己是一个“不可征服的”国家，也是永久

公开冲突的焦点。这是一个颠扑不破的事实和真理：不了解历史的人会一再重复过去的错误，越了解历史，就越不会重蹈历史覆辙。

另一个例子是俄罗斯。1812年，拿破仑·波拿巴在控制欧洲的过程中，发动了针对沙皇亚历山大一世帝国的战争，但是悲惨地失败了。一个多世纪后的1941年，希特勒还试图在所谓的巴巴罗萨行动中占领苏联的土地，但是也像拿破仑一样，被击败了。这两人不仅低估了对手的力量和能力，而且都没有考虑到寒冷冬天带来的威胁。如果希特勒研究了历史，或者至少有研究历史的意愿，或许就可以避免类似的错误。[5]

军事历史

美国军事历史学家维克多·达维斯·汉森指出：如果将领缺乏对军事历史的了解，那么在战争爆发时，他会向士兵和军官提出不合理的要求。作为解释说明，他还列举了在朝鲜战争爆发时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的无能表现。历史学家迈克尔·科菲也提供了一个在战术层面忽视历史负面影响的例子。在“二战”期间的诺曼底登陆战之后，也就是1944年，美军地面部队的前进步伐被未曾预料到的障碍所阻滞。那是2000多年前凯尔特农民用作田地边界的栅栏，有3米高，由交织在一起的树根、石头和泥土构成，相互间隔约100米，为德国人提供了几乎坚不可摧的防御，然而这些防御却完全被美军所忽视。因此，道格拉斯·麦克阿瑟将军建议军校学生，不要试图从历史当中学习方法和技术的细节，因为“在每个时代，两者都受到可用武器、部队指挥、后勤供应和控制方式的决定性影响”。不过麦克阿瑟还说：“在研究中，要发现指导以往成功战例的基本原则及其应用。这些原则是长期适用的。”

了解一个民族的历史

历史知识涉及人与其所处的环境。文化、宗教或语言是了解各民族现状和未来的基本要素，但是人们的社会条件取决于他们所占据的地理空间。时至今日，由于全球化，文化、传统和信仰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分散，都受制于其周围的地理环境。服饰、食品或建筑也是了解环境的一种方式。地理空间对一个国家的历史演变，及其遇到的紧张局势和对抗情况，都有重大影响，同时也产生了复杂的国际地缘格局。如果我们不研究其过去，在很多情况下，是无法解释这种格局的。

与此同时，与其他民族、文化或文明打交道时最常犯的错误便是未能考虑其他民族对历史事件的重视。对于一些民族来说，祖先的经历对他们看待世界的方式（尤其是在谁是朋友和敌人方面）、对他们的行为方式、对他们的信仰，具有决定性的作用。在某些情况下，历史的重要性在于它能帮助我们彻底地了解导致一个民族以特定方式行事的原因和动机。在这方面，即使是与他们最亲近的邻居，也可能完全不同。所有的过去，胜利或失败，征服或屈服，荣耀或耻辱，优点或缺点，受惩罚或辉煌的时刻，构成了一个国家的世界观。从这个意义上说，还应该考虑对历史事件的解释和重塑（这比想象的更频繁），特别是在民族主义进程中的重塑。

与一个民族打交道时，不了解其历史，就无法理解其现实。如果我们不了解俄罗斯民族的历史，就无法理解今天在乌克兰发生的事情。如果我们想要了解科索沃对塞尔维亚的意义，就有必要知道1389年在科索沃的荒野中发生的一场决定性战事。在这场战斗中，奥斯曼帝国击败了塞尔维亚军队。

朝鲜被认为是世界上在民族、语言、历史、文化和宗教各个方面最同质化的民族，有着自己多年来形成的显著个性，有其不为人知的特质。要了解这个亚洲民族的思想、态度和行为，除了了解其政治背景外，我们也要了解其近代历史。只有通过这种方式，我们

才能理解朝鲜人对美国及其盟国，特别是日本的敌意和怨恨，以及对韩国所代表的西方资本主义世界的敌视。

19世纪，朝鲜是一个“隐士王国”，反对与西方国家建立外交和商业关系，倾向于与同样努力摆脱西方干涉的中国保持联盟关系。1897年，朝鲜的高宗皇帝宣布改国号为大韩帝国。

跃居为工业大国的日本，为了在经济上加强对朝鲜半岛的控制，于1910年吞并了大韩帝国。日本政府鼓励本国的农民和渔民迁移到朝鲜半岛，并向其免费提供土地或以象征性的价格向其出售土地。在朝鲜人民挨饿的同时，日本政府将收获的大部分稻米用于养活自己国内的人。在日本对朝鲜民族所犯下的滔天暴行中，最臭名昭著的就是所谓的“慰安妇”制度。这种制度强迫妇女在太平洋战争期间向日本士兵提供性服务。据统计，至少有20万妇女被强征为“慰安妇”，其中约有15万人在战争期间死亡。

此外，日本占领者还实行了同化政策。一些朝鲜知识分子奋起反抗，努力保护他们的文化和价值观。自1919年起，整个半岛成千上万人为此而丧生。尽管反抗运动最后失败了，但它反映了朝鲜人民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和反殖民精神。直至日本在“二战”中被击败，朝鲜半岛才摆脱日本人的统治。

“二战”结束之后的1948年，苏联和美国以北纬38度纬线为界，将朝鲜半岛划分为两部分，北部由苏联军队占领，南部由美国军队占领，两边的紧张局势愈演愈烈。为了重新统一半岛，朝鲜在斯大林的支持下，于1950年6月进攻韩国，理由是生活在韩国的共产党同情者受到军政府的残酷镇压。由于担心共产主义在整个半岛蔓延，在联合国的支持下，美国做出了出兵朝鲜的决定。

最开始，美国对军事基地和其他战略目标的轰炸似乎足以阻止朝鲜的进攻，但是随着中国派出志愿军，情况发生变化。因为不能容忍美国军队侵犯其边境，中国政府不断地将大批士兵投入战斗。中国军队虽然装备不那么精良，却重创美军。美军总司令麦克阿瑟随后发动了全面的空中绞杀行动，想迫使朝鲜尽快屈服。从那时起，朝鲜遭受了冷酷无情的系统轰炸，连最小的村镇也难逃厄运。

尽管消息来源不同，数据有所出入，统计结果还是令人不寒而栗。在3年的朝鲜战争中，美国可能向朝鲜投放了约65万吨炸弹，其中包括3.5万多吨的凝固汽油弹。60多万间民房、5000多所学校和上千所医院变为废墟。当完成对城市目标的轰炸后，美军又开始轰炸湿地和水坝，造成洪水泛滥、庄稼尽毁。做个比较，美国在朝鲜投下的炸弹数量比“二战”期间在整个太平洋地区投放的都多，而在朝鲜所摧毁的城市也比在德国或日本摧毁的更多。

战争期间一直担任战略空军司令部负责人的美国空军将军柯蒂斯·E．李梅，在大战结束30年后，不知廉耻地向美国空军历史办公室报告，称消灭了20％的朝鲜人口。为了更确切地了解大屠杀的严重程度，我们可以对比“二战”期间的英国，尽管英国也遭受了猛烈的轰炸，但是人口死亡比例仅为2％。朝鲜战争结束后，麦克阿瑟将军接受采访时承认，他曾提议在朝鲜投下30到50颗原子弹，以便在10天之内结束战争。

朝鲜人民没有忘记曾遭受的毁灭性空袭，这解释了他们支持朝鲜政府为装备防空系统以及建设地下设施和避难所所做出的努力，以及支持政府拥有抵御入侵者的核武器的决心。鉴于历史，朝鲜人民有理由反对美国和日本，这是一种根深蒂固的民族情结。这个例子说明了了解历史的重要性。了解历史，才能了解对手的特点，否则，任何行动都注定要失败。

4．永恒的利益，总是披着道德的外衣

在国际关系中，各方都试图根据自己的情况和所掌握的手段来满足自己的利益。对每个人和每个国家来说，其他人或其他国家行为的正确性或不正确性，取决于该行为如何影响他们自己的利益。对“现实政治”的应用意味着在国家关系中，首先考虑的是国家利益，因此，所有关系的基础是自己的利益，而不是道德。

由于国家利益不断变化，国际关系也在不断变化。在国际博弈中，有时候，一个国家决定与其他国家结盟以实现具体目标。这些目标可能是经济目标，也可能是与安全或战争有关的目标。然而，今天的盟友可能是明天的敌人，考虑到现在社会的发展速度，这种情况已变得越来越真实。根据罗伯特·格林的说法，完美的盟友能为你带来你自己无法获得的东西，而你可以向他们提供他们感兴趣的东西。同样，在主权国家中，任何联盟都是基于互惠互利的原则。因此，谈判的最大秘诀是找到分享共同利益的方法。

利益和需求有时会促成看上去很奇怪的联盟，联盟的价值观可能与一个成员国家一直坚持的价值观相抵触。这种历史事例不胜枚举。在16世纪，尽管欧洲的基督教国家和叱咤风云的奥斯曼帝国处于对抗状态，但是他们之间也出现过令人惊讶的联盟。这些联盟主要是基于不断变化的经济利益、安全利益和地缘政治利益。

由于在很大程度上依赖奥斯曼帝国的粮食，信仰天主教的威尼斯多次利用伊斯坦布尔（奥斯曼帝国首都）政府向邻国和敌对的城邦施加压力。由于威尼斯主要关注的是对其海上商业航线的保卫，而奥斯曼帝国又是其主要贸易伙伴，所以两者之间的合作要比对抗更多。16世纪初，法国国王弗朗西斯科一世和奥斯曼帝国的苏丹苏莱曼联合开展了反对神圣罗马帝国皇帝查理五世的海军行动；与此同时，哈布斯堡王朝与波斯的什叶派萨非王朝结盟。在克里米亚战

争（1853—1856年）期间，面对沙皇俄国可能打败奥斯曼帝国并改变欧洲格局的局面，法国和英国毫不犹豫地支持土耳其人反抗俄国人。在19世纪末，英国利用奥斯曼帝国阻止沙皇俄国使用连接黑海和地中海的土耳其海峡。

所有联盟，甚至看上去很坚实稳固的联盟，在出现可能导致分裂的因素时，就会变得短暂和不稳定。在两次世界大战期间，很多联盟建立又破裂，很多秘密协议签署又撕毁。例如，罗马尼亚王国曾经是德国的盟友，却在1916年夏天对德国和奥地利发动了战争。在“一战”期间，为了对抗德国，日本与美国、英国并肩作战。几年后，在“二战”中，日本却改变了立场，与德国并肩作战。

根据理查德·A．克拉克的说法，在两伊战争期间，美国向伊拉克人提供情报，用科威特的油轮帮助他们运送石油，并中断了对伊朗的军事物资供应[(6)]，但是仅仅过了两年，美国就毫无顾忌地宣布萨达姆·侯赛因是他们最大的敌人。需要记住的是，在1983年伊朗和伊拉克冲突期间，美国时任总统罗纳德·里根派遣特使前往巴格达，与萨达姆·侯赛因会晤并向其提供帮助以打败伊朗。这位特使是7年前曾担任过美国国防部部长的唐纳德·拉姆斯菲尔德。20年后，拉姆斯菲尔德再次成为国防部的负责人，是入侵伊拉克和推翻萨达姆政权计划的直接设计者。

历史经验表明，为了使联盟真正有效和持久，联盟成员必须拥有相同的观念，面对共同的威胁。一旦该联盟的某个成员感受到不同的威胁，或者认为原来的威胁不那么严重了，就会考虑退出，促使联盟解散。即使联盟得以维持，其成员也不会继续以完全协调的方式行事，其行动的目标将更多体现在双边或多边行动中，而不是所有成员一致行动。法国前海军上将和地缘政治分析家皮埃尔·塞莱里埃尔认为，只有在同质地缘政治框架内的利益和观念趋于一致，国家间的联盟才会可行和日益强大。如果情况并非如此，那么

一旦军事干预结束或促成联盟的动机消失，联盟关系就会松动。这也许说明了为什么欧盟成员国的共同利益不足以分享其军事力量。

虽然希腊是欧盟和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成员国，但是在1999年科索沃战争期间，希腊却站在了俄罗斯和塞尔维亚的一边，与欧洲对抗。这一事实非常重要，如果希腊自愿或被迫脱离欧元区甚至欧盟，俄罗斯可能会将希腊拉入自己的阵营。这对俄罗斯来说，具有重大的地缘政治利益，因为能够强化其在地中海的地位，并能更好地控制黑海舰队所在的塞瓦斯托波尔港。在这种情况下，俄罗斯可能会在伯罗奔尼撒半岛等要地建立一个海军基地。

成员实力不均衡，也可能导致联盟崩溃。正如路易十四的枢机主教儒勒·马札然在《政治家概略》中所说的那样：“在一个利益共同体中，当其中一个成员变得过于强大时，这个共同体就会出现危险。”将这句话应用于今天的世界，我们就可以了解那些脱颖而出的国家是如何成为其他国家的威胁。

在国际舞台上，背叛是司空见惯的，因此，秘密协议是常见的，甚至在公开谈判中作为隐藏的附件出现。1898年10月，英国和德国签署了一项协议，分享了葡萄牙在非洲的利益。在财政状况不佳的情况下，葡萄牙别无选择，只能把自己在非洲的殖民地卖给两个大国。在与德国签署协议一年多后，英国与葡萄牙秘密签署了《温莎条约》。在这个秘密协议中，旧的协议得到了更新：英国和葡萄牙相互保证彼此的领土完整，并承诺在必要时提供相互防御。这很符合一句谚语：“在爱情和政治中，一切都是公平的。”（或者说，在爱情和政治中，任何事情都值得。）因此，葡萄牙人在“一战”中参加了同盟国军队，并参与了非洲的军事行动。

不可否认的是，联盟是国际关系里虚伪游戏的一部分，没有什么事情可以让人感到意外。在20世纪30年代，面对人们对自己反德

言论的指责，温斯顿·丘吉尔回应说："如果情况发生逆转，我们可能同样是亲德国人而反法国人的。"毕竟，国家的目标是利用一切可能的手段迫使敌人满足自己的利益，而联盟只是其中的手段之一。

在这种实用主义的背景下，悖论经常出现。斯大林在1944年撤回暗杀希特勒的命令，是因为担心如果德国的其他领导人上台，德国会与西方盟军达成将苏联排除在外的和平协议。在20世纪50年代，法国同意加入欧洲防务共同体，以换取美国参与印度支那事务；美国希望将法国及其军事力量纳入北约体系，作为交换条件，法国政府要求美国帮助其遏制亚洲的共产主义。

在其他许多情况下，对实现短期目标的过度渴望和焦虑，会导致草率行事或匆忙做决定，最后引发不可逆转的错误。在18世纪，普鲁士国王腓特烈二世写道："在普鲁士的所有邻居中，根据各国实力和地理位置来看，俄国最为危险。基于这个原因，普鲁士的统治者要有能力，很好地培养与这些野蛮人的友谊。"然而，在接下来的一个世纪之末，受顾问怂恿的德皇威廉二世，尽管曾向俄国大使保证会维护两国之间的安全协议，最终还是废除了它。正如俾斯麦预测的那样，这促使俄国投入了法国的怀抱。

还有一个时常引起人们注意的案例，很好地反映了联盟的变化。在20世纪80年代阿富汗战争期间，曾为苏联而战斗的乌克兰人子女，从2001年开始，又与阿富汗的同一股叛乱分子展开了斗争，而现在又变为在为北约而战。北约这个集体防卫组织曾是他们父母所属的华沙条约组织的大敌。

西班牙、法国和英国结盟

在18世纪和19世纪初，由于各个国家在不同时期的利益变化，欧洲大国之间的联盟关系遇到了重大波折。1733年至1789年间，西班牙和法国的君主签署了3项针对英国及其海军霸权的协议。这些协议也被称为“家族内的协议”，因为西法两国的国王都来自波旁家族，他们是亲戚。

1789年爆发的法国大革命导致了这些协议的终结。当最后一位法国君主路易十六被送上断头台时，西班牙不得不与法国开战。1793年，联盟发生了新的变化，英国和西班牙联合起来结成了新的联盟，两国的联合部队与法国海军开战，重创法国海军。

接着，在英国和法国之间发生激烈对抗的背景下，西班牙有两种选择。一个选择是与法国结盟，这样既可以保证比利牛斯边境的安全，又能保持对英国海军的实力平衡，从而保护自己的海外利益。另一个选择是与英国人结盟，共同对付法国人。最终，西班牙选择了与法国联手，并对英国宣战。

1805年，当拿破仑·波拿巴考虑入侵英国时，他毫不怀疑地认为：这次冒险，法国别无选择，只能依靠西班牙海军来打败强大的英国舰队。他迫使西班牙奉献了几乎全部的船只。在这一历史关键点上，发生了一场著名的海战——特拉法加海战。这场海战于1805年10月21日在西班牙特拉法加角外海爆发，由海军上将霍雷肖·纳尔逊率领的英国舰队击败了由法国海军上将皮埃尔·维伦纽夫指挥的西法联合舰队。

1808年，当拿破仑的军队进入西班牙后，联盟再次发生变化。英国站到了西班牙一边，与西班牙一起为赶走法国人而战，要最终击败拿破仑创建的帝国。英国人的愿望终于在1815年得以实现。

从那时起，法国花了几十年的时间才恢复其在欧洲大陆的影响力，而西班牙则沦为了二流国家，时至今日也没能恢复往昔的荣光。欧洲大陆风云变幻，英国的力量日渐强大，成了欧洲事务的仲裁者，在欧洲举足轻重，是无可争议的赢家。伦敦成为海上贸易中心和全球金融中心，并将这种地位保持到了19世纪末美国崛起之时。

在纳粹德国和美国之间的苏联

1939年春天，斯大林寻求改善与德国的商业关系，并考虑如果希特勒对波兰开战，就秘密地与德国瓜分波兰。同年8月，苏联和德国签订了为期十年的友好和互不侵犯条约。这个互不侵犯条约以领导谈判的两国领导人的名字命名，所以叫《莫洛托夫—里宾特洛甫条约》。条约使双方受益，因为德国向苏联提供机械，而苏联向其供应谷物、石油和矿物。但是希特勒对苏联的这种态度引起了美国的疑虑，美国认为这对其利益构成直接威胁，决定改善对苏联的供应，并推出援助苏联的“租借法案”，即美国将用价值1400万美元的战争物资供应苏联。斯大林高兴地接受了华盛顿出人意料的“慷慨”，结果使得苏联与德国的协议陷入了窘境。[7]

从盟友变为敌人

在“二战”期间，发生在希腊的凯法利尼亚大屠杀，展示了盟友是如何在几个小时内变为敌人的。在受到轴心国的侵略后，希腊领土被意大利人和德国人瓜分了。意大利军队的驻扎地点之一是爱奥尼亚海的凯法利尼亚岛。当时在该岛驻扎的是意大利陆军第33步兵师，也称“阿古依”师，约有12000名官兵。意大利军队与德国军队之间的关系是稳定的、友好的。意大利将军安东尼奥·甘丁被认为亲德。他在与苏联的战争中表现出色，还被纳粹德国授予铁十

字勋章。但是在1943年，由于意大利的投降，一切都发生了变化。看到盟军在意大利半岛的进军步伐不可阻挡后，意大利国王维克托·伊曼纽尔三世于9月8日签署停战命令，并下令逮捕墨索里尼。

从此时起，驻扎在凯法利尼亚岛上的意大利人发现自己陷入了窘境：要么放下武器，要么与曾经的盟友德国人开战。事实上，可能是预料到局势有变，几个月前，德国部队便增加了一支由两个营大约2000名士兵组成的特遣队。由于没有船只，意大利军队无法撤离该岛。3天后，意大利将军收到不得向德国人交出武器的命令，也就是说，必须把德国人当作敌人。

48小时后，这些曾经是亲密盟友的人开战了。实力增强的德国人很快就控制了局势，之后，一些被盟军抛弃的意大利人不得不在9月22日投降。在这场战斗中，意大利人伤亡人数有1300之多。被俘虏的意大利人，被判以叛国罪，他们要么在被俘时直接被杀死，要么在经过短暂囚禁后，由军事法庭审判，然后被处决。5100多名意大利人死于德国人之手，几乎占士兵总数的一半。而其余的人也没有好运，除了那些能够证明自己来自被德国吞并的蒂罗尔的人之外，其余的人或被留在岛上参加强迫性劳动，或被送往集中营。

美国和苏联的关系

在“二战”期间，美国和苏联是亲密的合作者。为了击败德国和日本，美国需要苏联军队的支持。而这支人数庞大的军队所缺乏的物资，可以由强大的美国工业大量供应。

在这个背景下，美国向苏联出借了数十艘战舰以换取1945年8月8日苏联对日本宣战。为此，这两个大国在1945年初签署了秘密协议。这个在华盛顿签署的协议，破坏了日本和苏联曾在4年前签

订的中立条约。这个中立条约曾确保日苏双方避免腹背受敌（苏联当时正对德国作战，而日本则正对美国作战）。

为了与日本开战，苏联要求美国为其提供数量众多的各种物资（包括船只和飞机），以建立强大而现代化的武装力量。根据该协议，诞生了一个名为“Milepost”的大型计划，以及后来名为“Hula”的计划。美国曾计划向苏联移交180艘船只，但最终只移交了149艘，其中包括塔科马级的30艘护卫舰。此外，美国军方开始训练超过12000名的苏联士兵，其中约有750名是军官。有趣的是，来自两国的这些士兵，几个月后，从盟友变为了敌人，因为他们的国家进入了意识形态和地缘政治对抗阶段，在之后几十年一直如此。

菲律宾目前的情况

自1898年脱离西班牙的统治后，菲律宾与美国的联盟非常紧密。这使得美国将菲律宾当作对中国进行战略遏制的关键点。然而，自罗德里戈·杜特尔特于2016年6月30日当选总统以来，情况发生了意想不到的转变。

由于广受西方国家对其在打击毒品犯罪过程中侵犯基本人权行为的批评，以及与时任美国总统奥巴马关系的恶化，杜特尔特决定改变菲律宾的外交政策，脱离华盛顿的阵营。

鉴于菲律宾的地缘政治重要性，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尝试修复与杜特尔特的关系，以使菲律宾回到美国的怀抱。但菲律宾与中国地理距离接近，两国商业关系密切，中国对菲律宾有巨大的经济吸引力。面对这种形势，美国能够为菲律宾政府提供多大的利益是问题的关键。

复杂的美日联盟

朝鲜问题可能仅仅是美国为掩盖其与日本关系的困境而放出的烟幕弹。这种困境始于1945年8月美国对日本广岛和长崎的原子弹轰炸，因为自那时起就埋下了未来美国与日本关系的伏笔。专门研究这一地区的分析人士认为，只要日本还是一个国家，就永远不会放弃对美国人使用核武器行为的追责。从理论上讲，在任何时候，日本都可以向国际法庭指控美国的危害人类罪行。这将对美国在亚洲和世界其他地区的声誉造成无法估量的损害。迄今为止，在许多方面，日本都以一种非常谨慎而有效的方式对美国施压。因此，美国总是需要在中国南海放出一枚烟幕弹，因为其在该地区的主要“盟友”——日本也是一根围绕在其脖子上的套索。无论美国想或不想在中国南海做什么，都必须得到日本政府的支持并与日本“商量”。

此外，韩国人民对日本军队的憎恨源于日本对朝鲜半岛的统治。其统治始于1910年，终结于“二战”结束。由于这种仇恨，只要日本是美国在该地区的主要盟友，韩国和美国就不可能达成持久的协议。

对于较弱的国家，联盟可能是具有高度风险的。因为这些国家很容易被联盟中的强国拖入对它们没什么好处的行动之中。由于强国的影响总是难以抗拒，弱国的领导人如果真的是为国民的利益服务，就必须有足够的勇气和尊严，不在任何事情上向强国让步。领导者要记住，当他们不再有用时，将会被曾向他们承诺一切的“盟友”所抛弃。根据上述内容，可以得出一个教训，正如马基雅维利在《君主论》中所说的那样：“依靠自身力量和自身才干的防御才是优秀的、安全的和持久的。”

(1) 许多年后，穆阿迈尔·卡扎菲、萨达姆·侯赛因、乌戈·查韦斯和其他想要打破美元霸权来改变现行经济模式的领导人，最终都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2) 这种情况业已成为现实。伊朗的势力现已到达叙利亚、伊拉克、黎巴嫩和也门，还将到达阿富汗。因此，特朗普政府想要重新建立该地区的平衡以应对伊朗。

(3) 非洲金融共同体法郎（CFA）是14个非洲国家的共同货币，14个非洲国家几乎都曾是法国的殖民地。

(4) 1915年到1923年，奥斯曼帝国的青年土耳其党政府驱逐或杀死了150万至200万名亚美尼亚平民。1975年，在亚美尼亚出现了两个渴望报复的团体——亚美尼亚秘密解放军队和亚美尼亚种族灭绝正义司令部。虽然两者在意识形态上对立，但是都认为土耳其应该对种族灭绝负责，并在经济上对幸存者及其后代进行补偿。1975年至1985年期间，两个团体杀害了40多名土耳其外交官及其亲属。

(5) 有趣的是，希特勒也说过类似的话：“历史上最伟大和最好的教训是没有人吸取历史教训。”

(6) 美国与萨达姆·侯赛因的关系曾非常好。1980年，这位伊拉克领导人获得了美国底特律市的钥匙，以表彰他为当地教会捐款。

(7) 类似的情况，几十年后，也许会发生在想结盟的欧盟和俄罗斯身上。如果他们结盟，将极大地伤害美国，而美国可能会采取措施，防止或打破这种假设的结盟。

第四章　大国只做不说的秘密准则：统治世界的方式

一旦了解了世界是怎样的及如何建立地缘政治，也就是说，知道了要做什么、为什么而做，下一步就是制定一个地缘战略计划，以实现这些目标。更具体一点，就是如何制定和平时期和战争时期的国际政策，以在国际范围内或区域范围内保卫国土和人民，避免受到他国的不当影响。研究一下历史上和当今的地缘战略，我们会发现许多战略是一脉相承的。

1．威慑

战略家的工作是考虑如果威慑失败该怎么办。

——迈克尔·霍华德

没有比进攻更好的防御，可以说最好的防御形式是威胁、是进攻。

这种战略是指通过威胁使用身体或情感上的武力或惩罚措施（辱骂、羞辱、蔑视等），迫使他人按照自己的意志行事。有些人主张对犯罪分子使用威慑，他们认为人们在权衡利弊之后，才会选择遵守法律或违反法律。对此很难验证，因为只有犯过法的人才知道当时是怎么想的。

在17世纪和18世纪，托马斯·霍布斯、切萨雷·贝卡里亚和犯罪学现代威慑理论之父——杰里米·边沁提出，国家应实施一种预防犯罪的制度，对违法行为的惩罚要大于实施犯罪所带来的好处。

威慑理论也可以应用于国际关系：各国寻求捍卫自己的利益，但是在缺乏中央权威的无政府性国际体系中，冲突将不可避免地产生。因此，威慑是各国用来维护本国利益并影响他国行为的重要工具。

在地缘政治背景下，威慑主要是指使用能够造成难以恢复的伤害的武力进行威胁，从而使敌人因害怕受到报复而不发动攻击。历史学家维克多·戴维斯·汉森将威慑理解为给敌人制造一种感觉，即战争是代价高昂、无利可图和久拖不决的事情。迈克尔·霍华德认为，威慑的目的在于说服对手，使其相信用军事手段解决政治问题是不值得的。

一个国家的武装部队在和平时期的首要任务，是对妄图入侵本国的势力实施有效的威慑。按照这种方式来理解，历史上几乎所有的政治关系都涉及威慑。

“二战”后，世界划分为两个争夺全球霸权的集团。这是一场意识形态、战略和武装的斗争，其特点是威慑的主要工具是核武器。在整个冷战期间，美国和苏联在威慑战略的基础上保持了“恐怖的平衡”。广岛和长崎的原子弹爆炸证明了核武器的威力，因此，两个超级大国都希望这种袭击不要落在自己的领土上。此时，战略的重点不仅是打败敌人，还有如何防御核打击。由于核武器的发展势不可挡，任何一方都不会在冲突中获益。这种相互摧毁理论迫使两个超级大国通过代理人或第三国战争来解决分歧，以将冲突限制在较低级别，避免自我毁灭性的直接对抗。

冷战时期，让世界陷入悬念的时刻是古巴导弹危机。在20世纪60年代早期，华盛顿和哈瓦那断绝了外交关系，而古巴领导人菲德尔·卡斯特罗开始接近苏联，并加入了共产主义集团。1962年10月，美国情报部门在古巴海岸发现了射程可以覆盖美国领土的核弹

道导弹。鉴于美国在土耳其和与苏联相邻的其他欧洲国家拥有军事基地和核导弹基地，苏联的这一战略性举措明显体现了“包围和反包围”的战略。美国计划袭击古巴或对该岛实行封锁，但是最终决定对古巴进行封锁。由于几艘苏联船只驶向古巴，10月22日至28日是最紧张的一周。面对这种情况，美国划出了一条红线：如果苏联的船只越过该线，美国就会发动核攻击。还有其他一些可能引发战争的事件，例如美国俘获苏联潜艇、古巴击落美国飞机以及另一架美国飞机在苏联领空被击落。然而，核灾难的威胁阻止了这两个大国的冒险行为：苏联船只掉头了，并没有跨越红线，随后又撤出了在古巴的导弹；而美国也撤出了在土耳其的导弹，白宫和克里姆林宫之间还建立了直通电话。

虽然在21世纪，核武器仍然是国际和平与安全的主要威胁之一，但是现在除了军事手段外还有其他方法可以实施威慑战略，例如封锁石油运输通道、操纵汇率等。

为了使对手真正地感到恐惧，并使其确信开战可能意味着直接和无法恢复的伤害，威慑战略必须基于三个原则：一是拥有全能及可靠的力量和手段，这种力量和手段可以是自己所有或与盟友共有的；二是在必要的情况下，有使用这些军事力量的政治意愿；三是向对手甚至是潜在的对手传递一个信息，即自己拥有威慑力量和手段，而且，为了捍卫国家安全，本国政府能够使用这些力量和手段。

将信息传递给对手，与拥有手段并有使用它的意愿同样重要。如果你的潜在敌人不了解你的手段和使用手段的意愿，你的潜在能力是没有用的。除非，你的目标是隐藏实力，使敌人因为过度自大而盲目攻击，结果在你更胜一筹的实力面前不堪一击。

这就是朝鲜为了维护其主权及其政治和社会制度而使用的战略。朝鲜的看法是，自己在任何时候都可能受到与其意识形态不同的国家的攻击或入侵，所以朝鲜四处宣扬包括核武器在内的军事力量，目的是向对手传达威慑信息，以免遭受到伊拉克或利比亚等国的厄运。朝鲜认为如果这些国家拥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就不会遭到入侵。尽管在2003年，美国攻击萨达姆·侯赛因政府的理由是伊拉克拥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但实际上，恰恰是因为没有这些武器，伊拉克才遭到了攻击。

感知无疑在这一战略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你拥有的真正力量与敌人认为你有什么样的力量和你怎么使用这种力量同等重要。通俗地说，你是什么和你拥有什么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你代表什么。

2. 包围和反包围

从过去到现在，包围一直是地缘政治的一种法则。

——弗朗索瓦·蒂阿尔

地缘政治可以被视为一个巨大的棋盘。在公元7世纪，波斯国王库思老二世问自己："如果一个统治者不了解国际象棋，他怎么能统治一个王国呢？"棋局中的一举一动都是为了在战略上给对手施加压力，使对手四周的包围圈越来越小，直至被将死。为此可以牺牲棋子，将对手诱入陷阱，可以通过"王车易位"保护国王，等等。在这种战场确定的斗争中，力量（棋子数量）很重要，计谋（移动棋子的方式）也非常重要。历史上使用这种战略的例子不胜枚举。

在20世纪初，英国的政策目标是将阿拉伯王国压缩在被微型国家——酋长国包围的领土之内。在同一时期，法国剥夺了叙利亚的出海口，分割叙利亚的内陆，将黎巴嫩从大叙利亚分裂出去。

冷战是一个明显的战略博弈实例。在这场博弈中，博弈双方想做的就是扼杀敌人，削减其势力范围，同时通过增加盟友数量来扩大自己的影响力。这场棋局中所使用的小棋子是那些来自拉丁美洲、非洲或中东的国家。洛洛特和蒂阿尔认为，美国及其盟国曾努力通过一系列协议包围苏联及其盟友。

另一个例子是古巴导弹危机。美国在土耳其有导弹，苏联想在古巴部署导弹，两者都是为了给对方施加压力，以拥有更多的控制权。

时至今日，美国一直依靠一系列盟友的支持和帮助，阻止俄罗斯染指某些地区。同样可以引用以色列的例子。这个国家遭到了阿拉伯邻国的围困，所以一直在计划如何打破它。其中一种方法是参与埃塞俄比亚青尼罗河的水坝建设，以便通过控制这条流经埃及的河流，威胁对埃及人民至关重要的水源，以此向埃及施加压力。

在另一个地理背景下，根据蒂阿尔在《高加索的地缘政治》一书中的说法，阿塞拜疆对于美国的作用在于监控俄罗斯和伊朗。同样，为了土耳其和阿塞拜疆的利益，美国一直在亚美尼亚的南部对其实施包围，将其与邻国和盟友伊朗隔离开来。出于这个原因，亚美尼亚人确信有一个针对自己的阴谋，目的是将从地中海到中国之间的土地连成片。

迈克尔·霍华德警告说，为了避免成为地缘政治围困战略的受害者，一个国家可以寻求邻国以外的盟友或控制海岸以外的海洋，

以防止敌对力量聚集在一起对其进行攻击或实施封锁。毫无疑问，俄罗斯一直在这样做。

海峡作为包围的工具

今天与历史上的大部分时期一样，一个不争的事实是谁掌控了海洋，谁就掌控了世界。为了实施海上包围与反包围，关键的地区是历史上贸易和经济流通的必经之地。在当前的地缘政治中，主要的海上贸易通道是马六甲海峡、霍尔木兹海峡、苏伊士运河和巴拿马运河。前两个是天然海峡，后两个是人工运河，这四个通道集中了世界上63％的石油运输量。

自1869年起，连通地中海和红海的苏伊士运河给海上航线带来了巨大的进步，因为从亚洲到达欧洲不再需要绕行非洲。尽管目前的运河可追溯到拿破仑·波拿巴时代，但是第一次建造两海之间的通道是在13世纪。拿破仑认为在苏伊士地峡开挖运河将使法国具有比英国更大的优势，因为法国控制运河（及其通行费）后，英国将不得不通过向法国支付过路费或通过好望角绕行非洲。这是一个明确的战略例子，说明了对苏伊士运河的控制如何使一个强国的力量超过另一个强国。

埃及人和法国人最终建成了运河，但是累积的债务迫使他们于1875年将股份出售给英国。虽然在1888年签署的国际公约规定，任何一个国家的船只都可以通过这条运河，但是在整个20世纪，爆发了多次有关这条运河的所有权和使用权的冲突。1956年，法国、英国和1948年建国的以色列与埃及爆发了冲突，称为“苏伊士运河危机”。在这场危机期间，埃及不顾法国和英国停止资助阿斯旺大坝的威胁，毅然将运河国有化。为进行报复，埃及击沉了40艘船并封锁了运河。

由美国领导的联合国最终促成了休战。开罗获得了苏联的资金，用于建设大坝，并于1957年重新开放运河。

加勒比海和太平洋之间的巴拿马运河，是另一条重要的通道，每年可由此运输2.35亿吨货物。自1914年开放以来，已经有超过100万艘船只从这里通过。在巴拿马运河开通前，为了从大西洋前往太平洋，航海者不得不环绕美洲大陆，并穿过位于智利的麦哲伦海峡或合恩角。美洲原住民曾使用过巴拿马地峡，西班牙人到达美洲时也这样做过，以发展贸易并缩短旅行时间。从15世纪起，人们就有建设运河的想法。但是直到20世纪初，巴拿马在美国的支持下从哥伦比亚分离出来后，才促成了工程的开工建设。巴拿马宪法将政府手中的运河定义为“国家不可分割的财产”。

国际贸易的主要自然通道是霍尔木兹海峡和马六甲海峡。世界上1/5的石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运输，每天约有1300万桶来自波斯湾的石油经这里运送到东方和西方。尽管与阿曼和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共享水权，但是霍尔木兹海峡主要由伊朗控制。近年来，由于也门冲突的恶化，伊朗与沙特阿拉伯之间的关系也变得更加紧张，伊朗曾威胁封锁霍尔木兹海峡。这是一个明显的包围和反包围的情况，因为如果沙特阿拉伯及其盟友在也门对伊朗造成伤害，伊朗将通过威胁这些国家在霍尔木兹的利益而做出反应。

马六甲海峡将印度洋与太平洋连接起来，世界50％的海上交通运输由此通过。东南亚国家联盟（简称“东盟”）和区域贸易条约等协定促进了该地区各国之间的经济关系，使各国在马六甲面对政治紧张局势时能够采取共同行动。毫无疑问，中国在该地区的任何行动都受到日本和菲律宾等其他亚洲国家的怀疑，也受到近年来将其外交政策重点转向亚太地区的美国的怀疑。这是中美关系中的政治和经济利益竞争在地理层面上的反映。

因此，通过这种包围和反包围的战略，对对手的战略要点加以控制或施加一些压力，就能够削弱对手并巩固自己的地位。当涉及多个国家时，战略要点就会成为热点，只有保持力量平衡才能避免冲突。

这种战略可以在任何地方使用。俄罗斯对克里米亚的“吞并”使其受到了欧盟的封锁和经济制裁；而北约在俄罗斯边境附近开始部署强大且具有挑战性的力量，促使俄罗斯在叙利亚等地采取了相应的反包围对策。如果继续受压，俄罗斯很可能会通过在其他地方的反制行动做出回击。

由于气候变化引发的全球变暖，北极变得越来越重要。谁控制了海上通道和储量巨大的资源库，谁就会在国际竞争中占上风。因此，北极的周边国家，主要是美国、加拿大和俄罗斯，为了控制北极，都在积极进行外交和军事努力。例如，俄罗斯正在推动军事基地的建设和强大核动力破冰船（如75000马力的Arktika）的建造。

穿越北极能够避免巴拿马运河的瓶颈限制，也能够避免苏伊士运河和马六甲海峡的瓶颈限制（自20世纪初起，俄国人担心这两个海峡遭到海上封锁，尤其是担心苏伊士运河受到德国和土耳其的封锁）。这个“捷径”意味着节省大量通过这两个海峡的成本。例如，每艘船穿越巴拿马的平均成本为15万美元，而等待通过期间，每天还需要35000美元。此外，使用北极通道代替巴拿马运河或苏伊士运河意味着节省大量时间，因为距离将缩短近一半。欧洲和亚洲之间的航程将从目前的31天缩短为3周。

很明显，北极的地缘政治重要性是巨大的。

俄罗斯被包围了

俄罗斯感受到了美国及其北约盟友渐进式地缘战略的围困，并一直想打破这种围困。

自1991年以来，正如西班牙地缘政治学家豪尔赫·韦斯特万杰所指出的那样，美国利用俄罗斯在苏联解体后的衰落，通过不断为本国和北约建立军事基地而对俄罗斯边界实施日益严重的包围；与此同时，还不断干涉俄罗斯和前苏联地区的内部事务，其最终目标是尽可能将俄罗斯的影响力推向远离西欧的欧亚大陆内部。

同样，根据韦斯特万杰的说法，渴望独霸世界的美国还计划将俄罗斯和中国的影响赶出非洲和拉丁美洲。

蒂阿尔同意韦斯特万杰的说法，他说自苏联解体以来，美国对俄罗斯的战略包围具有双重目标性：既要防止这个国家再次成为一个世界性大国，又要尽量保持其地区性大国的地位。为此，美国将俄罗斯周边的曾为苏联加盟共和国的国家逐渐纳入“北约化”的进程，并加剧高加索和中亚的冲突。目前，乌克兰的事态发展表明，这是美国用来打压俄罗斯的一张地缘政治牌。

俄罗斯试图打破在格鲁吉亚的包围

在21世纪初期，俄罗斯联邦具有不可否认的经济实力，这是它以高价大量出售能源资源的结果。不安的美国期望油价大幅下跌以拖垮俄罗斯经济，从而遏制俄罗斯的扩张。

俄罗斯曾经被以美国为首的北约和日本等国打压得走投无路，因为其经济实力对于打破包围来说是杯水车薪。在科索沃战争（1999年）失利之后，俄罗斯试图在一个对其生存至关重要的地区采取行动，那就是高加索。俄罗斯对南奥塞梯分离主义的支持，以

及2008年8月与格鲁吉亚之间爆发的军事冲突，都符合经过完美计算的地缘政治利益。

自19世纪初起，沙皇俄国开始征服格鲁吉亚公国，而格鲁吉亚民族主义者一直梦想将俄罗斯人赶出国土。格鲁吉亚的这种怨恨，通常以镇压的形式发泄在亚美尼亚人、阿布哈兹人、阿布扎里人以及多数认为自己是俄罗斯人的奥塞梯少数民族身上。面对这种情况，在整个20世纪，西方大国利用格鲁吉亚人的民族主义情结及其对俄罗斯人的抗拒心理，来削弱苏联（俄罗斯）在该地区的影响力，而俄罗斯则利用格鲁吉亚的少数民族与之对抗。

到2008年，格鲁吉亚已经成为美国在高加索地缘政治活动的焦点之一。该国获得了美国无条件的支持，并与乌克兰和阿塞拜疆一起被纳入了北约候选国家名单。更让俄罗斯无法忍受的是，美国与格鲁吉亚的这种联盟关系已经从单纯的防守变成了肆意的进攻。在美国、德国、乌克兰和土耳其等盟友的支持下，第比利斯在南奥塞梯发动进攻。南奥塞梯长期渴望与北奥塞梯的族裔兄弟合并，并加入俄罗斯联邦。

俄罗斯清楚地看到了这一点：只能反击，不能屈服。俄罗斯面临非常大的战略性压力，没有任何出路。在苏联解体之后，后退一步就意味着其信誉和威望的终结。俄罗斯必须表明自己在地缘政治博弈中是不可或缺的，因此必须恢复往日在世界上的地位和影响力，正如它现在在叙利亚所做的那样。俄罗斯认为在该地区与亚美尼亚和伊朗结盟是正确的。亚美尼亚可以激起居住在格鲁吉亚的亚美尼亚族人的民族感情，进而通过在纳希切万采取军事行动威胁阿塞拜疆。而希望从里海资源分配中获益的伊朗，可以从南方施加压力。

这次军事行动的直接战略优势是明显的。依靠统一的奥塞梯，俄罗斯可以控制大高加索山脉的主要通道以及里海和黑海之间的交通，同时也可以完成对车臣的围困。

至于格鲁吉亚的另一个分离主义地区——阿布哈兹，它对俄罗斯的地缘政治重要性甚至超过了南奥塞梯。这个黑海港口可以替代克里米亚半岛上的塞瓦斯托波尔。不要忘记，对于俄罗斯来说，拥有不冻港出海口一直是战略重点。在苏联时代，塞瓦斯托波尔就是理想之地。自1997年以来，俄罗斯每年以7000万欧元的价格从乌克兰手中租用塞瓦斯托波尔港口。在格鲁吉亚爆发冲突时，基辅发出了撤销2017年塞瓦斯托波尔租赁合同的声音。

通过承认南奥塞梯和阿布哈兹的独立，莫斯科大胆地向全世界展示了俄罗斯反击的决心。

俄罗斯也在委内瑞拉进行尝试

在2008年的时候，和现在一样，俄罗斯认为美国是其主要的地缘政治竞争对手，并认为美国是阻碍其恢复超级大国地位的主要威胁。时任俄罗斯总统德米特里·梅德韦杰夫在当年8月31日，阐述了其外交政策的五个基本点，断然拒绝美国强加于人的霸权主义行径。在俄罗斯的多极世界秩序愿景中，俄罗斯将编制一个战略基础网络，以便在未来投射其力量。考虑到这一点，俄罗斯积极拉拢也门、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利比亚和叙利亚。同时还在拉丁美洲寻求加强与尼加拉瓜和古巴的关系，但是其主要的区域伙伴是委内瑞拉。

鉴于委内瑞拉政府毫不掩饰其反美主义倾向以及委内瑞拉时任总统乌戈·查韦斯向该地区其他国家输出“玻利瓦尔革命”的决心（ALBA计划），俄罗斯决定在2005年至2007年间向其出售价值34亿

欧元的武器。由于俄罗斯提供了贷款，委内瑞拉又追加了另外8亿欧元的军购。尽管《委内瑞拉宪法》第13条禁止外国在其领土上建立军事设施，但是俄罗斯可能会在那里建立一个永久驻军基地。与委内瑞拉的合作将使俄罗斯能够影响巴拿马运河。如果委内瑞拉效仿日本和德国在“二战”期间的做法，查韦斯从俄罗斯购买的飞机就可以通过攻击船闸或过往船只，切断世界上两个最大海洋之间的联系。

面对俄罗斯和委内瑞拉的紧逼，美国重新恢复了于1950年解散的第四舰队，目的是捍卫其在加勒比海、中美洲和南美洲的利益，并保护巴拿马运河。与此同时，美国计划在哥伦比亚拉瓜基拉半岛建立一个军事基地，而这一地区实际上是哥伦比亚与委内瑞拉边境的唯一连接部分，美国的这一行为可以视作半进攻行为。同样，尽管1999年完成了非军事化进程，巴拿马时任总统马丁·托里霍斯还提出为美国人提供一个新的停泊港口，以换取美国为巴拿马的军事和情报设备升级。很明显，俄罗斯军事力量的迫近令美国政府感到不安。

弗朗索瓦·蒂阿尔说，历史表明，当一个国家被包围时，最终会变得更激进和更具侵略性。面对压力，俄罗斯、朝鲜或伊朗都可能发生这种情况，因为摊开地图就可以看到美国和其盟友所建立的军事基地是为了包围谁。美国战略分析家法里德·扎卡利亚估计，美国在海外拥有766个基地，分布在40多个国家。美国在这些国家拥有近20万军队，占据着2750平方公里的外国领土。

3．“抽梯子”

一旦你到达了荣耀的顶峰，非常聪明的做法就是抽掉梯子，不让别人有爬上来的机会。

——格奥尔格·弗里德里希·李斯特

虽然这一战术可以应用于国际关系的所有领域，但是它起源于经济学领域。在19世纪中叶，德国经济学家格奥尔格·弗里德里希·李斯特在他的论文《国家政治经济体系》中写道：对于任何国家来说，如果依靠贸易保护和海运限制政策，提高了工业实力和海运能力，使得其他国家在自由竞争条件下已经无法与其抗衡，这个时候，最明智的做法莫过于把自己爬到高处时所用的梯子扔掉，然后告诉其他国家自由贸易的好处。

李斯特祝贺英国成为一个超级大国，并将这种成功归因于殖民地。因为英国的殖民地为其提供原材料，英国负责加工原材料并通过船队进行销售。尽管英国及其工业革命极大地推动了世界的进步，但是英国也应该扪心自问一下，它是否应该对其他一些国家的衰落负责。

韩国经济学家张夏准在经济层面深入研究了李斯特的“抽梯子”理论。在那些于全球化中处于不利地位的国家，张夏准的研究非常受欢迎。他的研究前提是这样的：欠发达国家面临着巨大压力，它们所采取的经济政策无法使自己受益，却总是让那些领导世界经济和金融的国家受益。与此同时，这些欠发达国家无法采取拥护自由贸易的国家之前所采取的措施，来追赶这些拥护自由贸易的国家现在所达到的发展程度。原因是这些现在拥护自由贸易的国家，抽掉了使欠发达国家达到经济高峰的“梯子”，使它们难以望其项背。

张夏准认为，那些目前最热衷于自由贸易的国家，虽然认为自由贸易是通向繁荣的道路，但是当它们处于发展的初期阶段时并没有遵循这种立场，而是通过对进口商品征收高额关税来保护国内市

场，同时通过补贴、国家信贷和其他手段激励出口，促进自己的工业发展。

事实上，这就是18世纪时英国成为世界第一经济大国和世界工厂的方式。18世纪末直至“一战”爆发，随着世界新秩序的确立，自由贸易开始盛行，世界进入了繁荣时期。

自14世纪以来，英国一直在推行激励毛纺织业的政策，虽然很难衡量这些政策对工业发展的具体影响，但是这些政策无疑是不可或缺的。英国第一任首相——罗伯特·沃尔波尔于1721年颁布的改革措施，促进了制造业发展，其方式是向殖民地出口工业制成品，并从殖民地进口原材料。美国和英国是18、19世纪两个最盛行贸易保护主义的国家，其关税征收比率超过了50％。德国、法国、日本和荷兰等国也采用了类似的政策。

自由贸易在“一战”中陷入了僵局，因为当时各国都建立了贸易壁垒以保护本国经济。直到1945年“二战”结束，主要由美国推动的贸易自由化谈判才重新启动。但是，在保护主义时代之后，隐藏在政策中的保护主义仍然存在。例如，出口的自愿限制、服装和纺织品配额、农业补贴和预防倾销的税收政策。倾销是指企业以低于国内市场的价格出口产品。在这种情况下，20世纪80年代经济危机之后的“抽梯子”政策便在“华盛顿共识”当中体现出来。而这次经济危机主要影响的都是发展中国家。

英国经济学家约翰·威廉姆森在1989年总结说，“华盛顿共识”提出的十项建议的前提是，为了创造财富，必须消除关税壁垒，开放市场以适应世界贸易。这十项建议主要是针对陷入巨大债务危机并受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美国财政部控制的拉丁美洲国家。把这十项建议应用到贷款利率高和期限短的拉丁美洲国家时，人们没有考虑到可能的不利影响。最终，由于1994年的墨西

哥危机，“华盛顿共识”失败了。这场危机是由墨西哥缺乏国际储备所引起的，并造成了全球性的影响。在提倡自由贸易的国家已经处于霸主地位之时，“华盛顿共识”因为促进了新自由主义思想的传播而受到了一些人的批评。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之后，“华盛顿共识”似乎已经死亡。2010年，在韩国举行的G20峰会期间，成员国签署了《首尔发展宣言》，旨在通过公平和持续的发展减少不平等和解决全球贫困问题。

一些经济持续增长的国家，如巴西等，已经注意到“抽梯子”战术的作用。因此，在遏制气候变化协议的谈判过程中，一些国家利用这种战术为自己的高碳排放量辩护，以达成有利于自己的协议。这些国家声称这是自己发展经济的需要，还认为目前提倡减排的国家早已通过无限制的排放实现了自己的发展。

英国的贸易保护主义

自由市场是最强大的武器。

——俾斯麦

1651年10月9日，英国通过了第一部《航海法案》。奉行重商主义原则的英国所制定的法案是一系列的法律性限制，旨在保持英国殖民帝国的贸易利益。为此，英国规定在其帝国内部，只有英国船只可以与其殖民地进行交易，同时阻碍殖民地拥有可以与宗主国相匹敌的工业结构。

在荷兰独立战争后，英国贸易所处的局面非常不利，而1647年，西班牙帝国对荷兰贸易解除禁运，极大地推动了荷兰的国际贸易，所以英国颁布了这项法案。通过颁布该法案，英国政府想要遏制荷兰的海上优势，尽管该法案也影响了法国和西班牙等其他强

国，但是荷兰以对英国宣战的方式做出了回应。最终，马丁恩•哈珀兹佐姆•特罗姆普领导的荷兰海军败给了罗伯特•布莱克领导的英国海军，这标志着荷兰强国地位的衰落。

建立商业垄断的结果明显对英国非常有利，因为英国的海关收入增加了。英国商人以低价购买商品，然后以高价售出，并将获取的利润投资于工业，而殖民地则成了专属市场。英国保障了商业和工业进程的连续性，并成为国内秩序的保护者和国外利益的捍卫者。在一个世纪里，英国船队的规模翻了一番，从而使英国成为世界上的主要海洋强国。

在近两个世纪的时间里，航海法案的连续性为英国贸易提供了支撑。其经济影响不仅引发了英荷战争，还成为美国独立战争爆发的原因。直到1849年，该法案才被废除，因为此时在全球实行自由贸易更有利于英国的利益。

在巩固世界经济大国地位的同时，英国举国上下依然反对自由贸易。18世纪末，在对法国和西班牙的战争中，相当多的英国知识分子认为：为了贸易利益，英国应该继续与这两个国家进行海战，不能与法国和西班牙实现和平，以免与这两个国家进行自由贸易。但是在18世纪的最后25年中，当机械化使英国成为全球工业产品供应商之后，英国政府成为自由贸易的拥护者，因为他们知道没有人可与其竞争。

美国第18任总统尤利西斯•S．格兰特（1869—1877年任职）意识到英国人通过诡计获利颇丰，美国人也可以采取同样的做法来盈利（美国这样做了，多年后成了经济大国）。格兰特具有远见卓识，推动了全球化，而全球化又成为推动美国在全球发展的杠杆。但是格兰特估计错了全球化过程的时间，因为美国人只花了一个世纪，而不是他预测的两个世纪。

舞厅的看门人

当他不让你进去时，舞厅的看门人是你最大的敌人；当你已经进去时，他就成了你最好的盟友。

——哈伊梅·坎姆玛尼

八国集团可以与西班牙著名记者哈伊梅·坎姆玛尼所指的舞厅看门人相媲美。它可以追溯到当时的美国、日本、德国、意大利、法国和英国6个世界经济大国于1973年成立的六国集团（简称“G6”）。后来，加拿大和俄罗斯相继加入该集团。这8个国家应该是世界上工业化程度最高的国家，但是如果以经济发展速度为标准来衡量，中国和印度也应该位列其中。然而，由于在这个精英俱乐部中，各国能够从自己利益出发就影响全球经济和政治的决策进行协商，达成共识并采取立场，因此它们希望这个集团不要扩大。

核俱乐部的排他性

“舞厅看门人”战略也被用于1968年签署的《不扩散核武器条约》（TNP）。该条约限制世界许多国家发展和拥有核武器，但是不限制美国、英国、法国、苏联（俄罗斯）和中国——这些国家在条约签订前就进行过核试验。从那时起，190个主权国家签署了《不扩散核武器条约》，承诺不进行核试验。印度、巴基斯坦和以色列从未签署过这个条约（南苏丹刚刚诞生，鉴于其面临的局势，也没有签署该条约），但是它们拥有核武器。据说，以色列通过从美国获得的转让技术而掌握了核武器，很显然美国的这种行为动摇了《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的根基。另外，朝鲜于2003年退出了《不扩散核武器条约》，并进行了核试验。而伊朗，在20世纪50年代开始从美国获得援助以发展军事技术，但是在1979年伊朗革命后这种援助停止了。在20世纪80年代后期，伊朗又开始开发民用核技术，

但是因美国怀疑伊朗将其用于发展核武器而实施了制裁，伊朗于是放弃了发展民用核技术。

《不扩散核武器条约》规定核技术不得转让，无核国家承诺不发展核武器，而有核国家同意自愿削减其核武器。绝大多数主权国家已经在法律上承诺不拥核，而联合国安理会仍然愿意采取措施，确保没有新的国家拥有核武器，从而使五国俱乐部（和几个被“溺爱”的国家）长期存在。

核武器问题可以说是国际舞台上最虚伪的问题之一。自相矛盾的是，2015年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指出，“不负责任国家或恐怖主义国家可能使用核武器和核材料，对我们的安全和福祉构成更大的威胁”，而美国正是唯一一个对平民使用过核武器的国家，而且还是两次。但是，这并不妨碍美国将其他想要发展核武器的国家看作“流氓”国家或“不负责任”国家。

美国前总统巴拉克·奥巴马在2008年竞选期间做出承诺，要建立一个没有核武器的世界。尽管这是奥巴马获得诺贝尔和平奖的主要原因之一，但是这个承诺最终落空了。美国和俄罗斯于2010年签署了《第三阶段削减战略武器条约》，该条约将这两个国家的战略核武器数量限制为不超过1500件，但是由于在乌克兰发生的事件，该谈判于2014年12月中断了。

确实，全球有效核弹头的数量已大幅减少，从1986年的64500枚减至现在估计的10315枚。[(1)]

另一个事实是，作为核巨人，美国和俄罗斯一直在对其核武器库进行现代化升级。事实上，俄罗斯在其经济财富持续发展的同时，将近1/3的国防预算用于改善其核武库。另一个未解决的问题是核弹头问题，因为条约限制了核国家可以拥有的弹头数量，但是

从未提及破坏性能力。这些限制不包括战术导弹（用来攻击有限目标的小型核弹头），它被人们意外使用或未经授权使用的风险更高。有消息称，这些可能未列入战略削减计划的武器，美国拥有约500件，俄罗斯拥有约2000件。

至于朝鲜和伊朗所构成的核威胁，需要将其置于适当的背景下分析：朝鲜有10枚核弹头，相比之下，美国有4700枚，而俄罗斯有4500枚；截至2017年9月，朝鲜进行了6次核试验，而美国为1032次，俄罗斯为715次；在爆炸当量方面，有记录的苏联核试验最大爆炸当量为1961年的50百万吨，而美国的核试验最大爆炸当量为1954年的15百万吨，远大于2017年9月朝鲜核试验所达到的约60千吨级爆炸当量（值得注意的是，在广岛投下的原子弹爆炸当量为大约16千吨）。[(2)]

对于核动力航空母舰来说也是如此。在世界上目前使用的12艘核动力航母中，有11艘属于美国，另一艘属于法国。同样，在这个星球上，只有五个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拥有核动力潜艇：美国、英国、法国、中国和俄罗斯。尽管巴西和韩国分别打算在法国和美国的帮助下拥有核潜艇，但这些“舞厅看门人”显然不愿意让其他国家加入精英俱乐部。

正如美国战略分析家法里德·扎卡利亚所指出的那样，美国与俄罗斯加在一起，拥有世界上85％的核武器，但是美国却告诉其他国家，即使是只制造一件核武器，在道德和政治上都是令人讨厌的事情。而美国却持有数千件带有核弹头的导弹，还不断地制造和试验新的核导弹。所以，美国的这种谴责是相当空洞的。

地缘政治分析家乔治·弗里德曼认为，美国试图阻止所有新兴大国崛起。美国的战略将包括长期消耗一切威胁者，使其陷入既无法终结又不能轻易放弃的冲突当中。

4．让你的邻居变得更穷更弱

不比较不知道大小。

——乔纳森·斯威夫特

占据主导地位的国家总是希望周边的国家不如自己，所以很自然地制定了一系列战略，使邻居变得更穷更弱。纵观历史，西方大国运用手段来保持其主导地位的先例不胜枚举。

德国政治家、普鲁士总理伯纳德·冯·布洛认为，英国参加“一战”的主要原因是，德国建造了一支强大的海军舰队，威胁英国的海上霸主地位，进而危及英国在海上贸易中的主导地位。他还认为，在“一战”之前，英国的两个关注焦点——工业和殖民地，迫使英国人将德国视为其竞争对手和劲敌。

法国反对西班牙加入欧洲联盟是为了维持法国农产品在欧洲的主导地位。法国人很担心，由于没有关税，西班牙农产品在进入欧洲共同市场之后会更有竞争力。虽然法国的反对未能奏效，但是很明显，法国希望保持一种经济上的优势地位。

在我们这个时代，美国认为其邻国墨西哥非常令人讨厌。美国希望邻国保持一定的稳定性，但是不希望邻国快速发展成一个强大的竞争对手。墨西哥有1.25亿人口（还有3500万名墨西哥人或墨西哥裔移民居住在美国），人口增长速度比美国高50％。墨西哥正在从手工业制造跨越到高科技工业生产，同时墨西哥还拥有大量石油储备和蓬勃发展的旅游业，可能在几年之内成为世界十大经济体之一。更糟糕的是，墨西哥的工资是美国的1/10，因此竞争非常激烈。这可能是现任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宣布改变两国贸易关系的原因。

伯罗奔尼撒战争

如同后来几个世纪中经常发生的战争那样，伯罗奔尼撒战争（前431—前404年）也是一个经典的故事。古希腊历史学家修昔底德认为，战争的起因是：斯巴达认为自己是地区霸主，它感受到了也想成为地区霸主的竞争对手——雅典的威胁。

修昔底德在《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一书中，从各种角度对这场战争的发展进行了分析。纯粹的军事角度包括：战略、战斗、武器、将军和战斗人员。政治角度包括：参与冲突的每个城市的内部政治环境，以及该地区的区域关系形势。

尽管经济与这场战争的后果高度相关，也是导致冲突爆发和进展的关键因素，但是有关这场战争经济方面的问题极少受到关注。这种在历史上多次发生的区域性地缘政治竞争，虽然是两种相反的政府体系——雅典民主和斯巴达寡头的冲突，但是其爆发的根本原因是经济竞争。

公元前445年，斯巴达和雅典签署了《三十年和平条约》，雅典承认斯巴达仍是伯罗奔尼撒半岛的霸主，作为补偿，雅典可以发展自己的海上力量。但是多年后，斯巴达意识到雅典正在控制地中海市场，这使雅典变得越来越富有和强大。此外，雅典还利用了由雅典政治家阿里斯泰德于公元前478年创建的城邦联盟——提洛联盟。提洛联盟原是为了对付波斯的侵略而创立，它给雅典带来了巨大的力量。联盟所有成员都为旨在保卫联盟免受波斯袭击的行动提供部队、船只和资金。雅典的成功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建立了这种联盟，使其能够获得大量资金，这反过来又推动了雅典自身的社会和政治发展。

为了充分了解雅典在公元前431年与斯巴达开战时的情况，我们必须回顾过去。在提洛联盟的早期，尽管一些成员对雅典不断增长的权力和在联盟内的特权地位持怀疑态度，但是联盟仍然得以维系，因为所有成员都得益于雅典所推动的贸易。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联盟内部的凝聚力日益减弱，因为雅典以维持备战所需为由，滥用其主导地位，对其他成员增税，还强迫他们使用自己的货币。公元前453年，联盟的一些成员拒绝缴纳雅典所要求的征税，而雅典对这种滞纳行为实施了惩罚。

公元前449年，雅典与波斯帝国签署《卡里亚斯条约》，结束了提洛联盟与波斯帝国之间的敌对状态。战争结束后，提洛联盟的许多成员质疑联盟的作用，因为促使其成立的原因已经消失了。雅典希望保留赋予其权力的联盟，并想将之前联盟的成员变为新帝国的臣属。雅典最终控制了250多个城邦，并对该地区的海上贸易实行了绝对的控制。

在这个发展过程中，雅典需要扩大其贸易，以获得更多的利润来维持社会支出。雅典的社会支出主要是为了取悦下层阶级和构成其舰队中坚力量的水手。为此，雅典希望接管邻近地区的主要金矿和银矿。

斯巴达最初没有将雅典所领导的提洛联盟的贸易增长视为对其统治地位的威胁。但是当由斯巴达人领导的伯罗奔尼撒联盟的成员意识到其经济受到威胁时，开始对提洛联盟成员的贸易设置障碍。这使得雅典考虑对构成竞争的敌对城邦实施封锁。

提洛联盟的一个主要经济和军事竞争对手是伯罗奔尼撒联盟成员之一的科林斯。这是一个拥有优越地理位置的富裕城市，能够控制一些主要的海上和陆地贸易路线。对于雅典来说，科林斯令人垂

涎：这个城市向整个地中海地区出口了许多备受追捧的产品，并在关乎爱奥尼亚海统治地位的西西里市场上挑战了雅典的垄断地位。

随着伯罗奔尼撒战争的发展，雅典在达达尼尔海峡失去了大部分舰队和领土，它再也无法从黑海获得货物，特别是作为食物基础的谷物。斯巴达人充分利用了雅典人食物短缺的局面，最终迫使他们投降。

失败之后，在斯巴达的军事和政治控制下，雅典失去了战前的经济繁荣，更无力恢复这种繁荣；伯罗奔尼撒半岛的其余城邦同样承受了战争所带来的巨大经济代价，希腊人陷入了贫困。值得注意的是，其中一个经济后果是伯罗奔尼撒联盟的许多城市都不得不借钱，特别是向所有希腊人的共同敌人——波斯人借钱，这是令人惊讶的。在某种程度上，波斯人通过经济战意外地战胜了历史上的宿敌。

战争的另一个附带影响是，在先前由雅典船只控制的海域，海盗活动日益频繁，这对日渐衰弱的贸易更为不利。战争造成了大量人口死亡，这对由于缺乏在田间劳作或在海上贸易的人力资源而早已陷入衰退的区域经济产生了负面影响。

俾斯麦体系

1871年，德国在普法战争中击败了法国，巩固了德国的统一并组建了以威廉一世为皇帝的德意志帝国。《法兰克福和平条约》规定，除了将两个富饶的省份——阿尔萨斯和洛林割让给德国外，法国还得向德国支付巨额的战争赔款（后来，德国在“一战”中战败，也被迫割地和赔款，这引起了强烈的报复情绪，为下一次世界大战埋下了伏笔）。法国陷入了对和平的渴望和全面的政治崩溃，而俾斯麦恰好利用了这一点。这位德国首相意识到法国人对和平的

渴望，通过所谓的“俾斯麦体系”，到“一战”爆发前削弱了法国23年。其目标是孤立法国并防止其重新武装，同时通过适当战争手段维持德国在欧洲大陆的霸权地位。1873年到1877年，为了建立外交同盟，俾斯麦投入了大量的政治力量，以确保法国的共和政权战胜保皇党。准确地说，俾斯麦的目标是推翻法国总统帕特里克·德·麦克马洪和他的保皇党盟友。为此，俾斯麦在法国的邻国西班牙、比利时和意大利建立了一条自由和反教权政府的警戒线，目的是支持法国共和主义者击败麦克马洪的保皇党。事实上，俾斯麦毫不费力地使法国于1877年变成了一个共和国。俾斯麦的遏制政策是相当务实的，根据自己的利益来制造和取消共和政府，但是这引起了一些欧洲国家的极大疑虑，它们对德国的霸权主义愿望颇为担心。

1871年到1878年，德国通过三皇联盟与奥地利和沙皇俄国结盟，三国相互承诺在遭受第三国侵略时进行共同防御，而在德国侵略第三国时，共同提供军事支持。而奥地利和俄国两国之间，只互相承诺共同防御外来侵略。这个联盟通过柏林会议于1878年最终解决了奥地利和俄国之间在巴尔干半岛的领土争端。后来，意大利也加入了这个联盟。德国、奥地利、俄国和意大利之间的第二个联盟持续到了1887年。当时，为了遏制俄国在奥斯曼帝国的扩张，英国也加入了这个联盟，并于1890年签署了《地中海协定》。在这一年，威廉一世的继任者——威廉二世皇帝将俾斯麦解职，并终结了俾斯麦联盟体系，大力推行扩张主义政策，最终引发“一战”。

普罗克拉斯提斯之床

希腊神话里有这样一个故事：在一个偏远地区，有一个叫普罗克拉斯提斯的旅店老板，为过往旅客提供住宿。如果旅客的身体比住宿的铁床短，普罗克拉斯提斯就强行拉长旅客的身体，使之与床

一样长；如果旅客的身体比铁床长，普罗克拉斯提斯就将身体长出的部分斩去。这个神话广为流传，经常被用来指那些不能容忍与自己的标准不同的人。一旦他们意识到某人不符合标准，就会采取措施加以“规范”。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他们往往不择手段，会使用身体暴力、精神折磨或是社会性的谋杀。

在地缘政治中，一个国家为防止其对手——特别是其邻居在军事、经济、战略等领域脱颖而出，就会出现这种情况。

邻居并不总是宿敌，也不一定是与本国发生过多次武装冲突的入侵者，也许只是经济、宗教、意识形态和地缘政治领域的竞争对手，也许与本国还保持着一定的外交和商业关系，即使这种关系是虚伪且缺乏稳定性的。也许邻居与你参加了同样的政治和军事联盟。换句话说，应用此战略的邻居被视为竞争性“朋友”。希腊和土耳其都是北约和联合国的成员，但是这并不能阻止他们相互怀疑，并时常处于紧张局势。

从2017年6月初起，沙特阿拉伯对卡塔尔渐生敌意，而之前两国关系非常友好。两国具有相当多的共同点，本应继续保持友好关系，但是卡塔尔似乎犯了一个不可原谅的错误，那就是不愿屈从于地区强国沙特的主张。沙特人指责卡塔尔支持该地区的极端主义团体（如基地组织和伊斯兰国）。但是在沙特的指责背后，除了所涉及的经济利益纠纷之外，也有争夺逊尼派伊斯兰世界的最高宗教权力的原因。

此外，沙特阿拉伯凭借自身强大的优势挑战邻国卡塔尔，沙特拥有约3000万人口和近50万人的军队；而卡塔尔仅有200万人口和1.1万名士兵。很明显，沙特有足够的能力击败卡塔尔。

邻国的这种敌对中夹杂着宗教、经济和地缘政治因素，还有其他外部利益的刺激，这使得该地区的局势极不稳定，无法实现持久的和平。

几个世纪以来，一些国家一直试图保持对邻国的相对优势，以避免邻国对自己构成军事或经济威胁。有时，也试图让邻国变为自己产品的重要市场，所以它们也希望邻国稳定一些。但是当邻国构成威胁时，对其采取的首要措施则是使其内部不稳定，包括扶植或煽动其内部的反动组织。紧张局势加剧，通常会引起不同程度的武装冲突。

在当今世界，相隔万里的国家也犹如近邻，国家之间的竞争范围早已扩展到全球。削弱邻国的手段多种多样：经济手段、政治手段、外交手段和军事手段。但是，每一种手段的使用都要服从于自身利益，要保持对其他国家的相对优势，所以使邻居相对弱势是维持现状的一种形式。

5. 伪装和隐瞒

评判事物时，人们往往不是根据它的本质，而是根据它的表象。

——巴尔塔沙·葛拉西安

“你没有的，就假装有；你有的，就藏起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红衣主教儒勒·马札然提供了许多通过假装和隐瞒而使自己获益的例子。西班牙内战时期的政治家佩德罗·赫兰兹曾说：“国际政治一直就像纸牌游戏一样，玩家如果想赢牌，就必须非常小心地藏好手里的牌。”以中立而闻名的瑞士，就用了高超的技巧，把自己打造为全世界的朋友。

欺骗的艺术

在战争中，欺诈总是光荣的。

——马基雅维利

很明显，混淆和伪装使别人无法了解你的真实面目，这是一种地缘政治战略。通过伪装和欺骗，隐藏真实意图并低调发展，当引起别国注意时，自己早已经具有强大实力。

在伪装和隐瞒上，必须是低调行事的老手，才能做到不被人看穿。伊拉斯谟在他的作品《愚人颂》中说："装作愚蠢是最大的智慧。"确实如此，因为有时候最好显得软弱无力，以免引起敌意或嫉妒。对于国家也是如此，最好隐藏本国所拥有的资源，以防止其他国家意图占有这些资源。通过马基雅维利的一句话"政治是欺骗的艺术"，我们可以得出结论：在地缘政治中，欺骗是最高的艺术。

真相是什么

会卖货的人卖的价更高，不在于东西本身如何，而在于看起来如何。

——巴尔塔沙·葛拉西安

许多国际干预行动都是打着人道主义或生态问题的旗号，甚至是通过制造敌人的方式进行，以隐藏背后的真实意图。美国2003年入侵伊拉克的理由是伊拉克拥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这与为阻止对手经济增长或确保自己经济增长，而禁止或限制某些材料的生产甚至是对其实施禁运，以及对可能影响国民经济的产品征税等做法如出一辙。

乔治·W. 布什在《反恐战争宣言》中，创造了所谓的全球共同敌人：国际或全球恐怖主义。这是一个自2001年以来一直没有被定义的概念，充满错误和模糊性。综上所述，面对任何国家的干预行为，我们都应该试着认清其背后隐藏的真正动机。在进行经济、军事、生态或人道主义干预之前，人们所宣传的干预目标和理由，有一些符合事实，但大部分都是虚造的。这些干预往往是既定的国家政治、经济和地缘政治目标，而这些目标往往不是高尚的。

6. 突破点

每个民族或国家都有内部弱点，而其对手往往知道如何利用这些弱点削弱其实力甚至是将其踢出局。得到支持和指导的民族主义、分裂主义、社会冲突或颠覆运动，都是阿喀琉斯之踵，可以成为竞争对手的突破点。

中国军事理论家乔良和国际关系学者王湘穗谈到了发现和利用敌人弱点削弱其实力的重要性。通过游击战争、持久战争和网络战争等，可以获得一个突破点。在所有这些方法中，攻击的重心应该是可能给对手造成最大心理冲击的点。

美国利用了西班牙的弱点

每个超级大国都有阿喀琉斯之踵，无论看起来多么强大，终究有弱点。在1884年至1885年的柏林会议上，欧洲列强瓜分了非洲大陆的殖民地，后来又瓜分了亚洲的殖民地。美国没有参与这两次瓜分，而是将扩张的矛头指向了离它最近的地区——加勒比地区。起初，多任美国总统曾想要购买极具战略价值、农业价值和经济价值的古巴岛，但是西班牙一直拒绝这笔买卖。1868年革命以后，由于资产阶级的出现和宗主国对古巴的政治和贸易限制，古巴的民族主义情绪开始高涨。古巴爆发了反抗西班牙殖民统治的解放战争。美

国的媒体将古巴革命者描绘为自由战士，而西班牙的媒体将美国政府描述为小偷——尽管与古巴没有任何关联，美国却打算吞并这个小岛。

美国声称为了保护岛上美国居民的利益（这其实只是干预的借口），于1898年1月向古巴派遣了“缅因号”战舰。同年2月，该战舰在哈瓦那沉没，引发了美西战争，战争的结果是美国获得胜利，西班牙帝国走向没落。西班牙在所谓的“1898年灾难”中丧失了古巴、波多黎各和菲律宾等殖民地。那时，在伊莎贝尔二世的统治结束后，西班牙遭遇了政治和金融危机。美国则利用古巴的民族主义情绪削弱西班牙，以便在岛上施加影响。

脆弱的地缘政治重心

布热津斯基认为，即便是最强大的国家，也有一个非常重要和必不可少的重心，或者说有一个痛点，一旦受到干扰，就会完全失去稳定性。美国的全球地位直接取决于它能否在欧亚大陆保持优势地位。其观点是欧亚大陆不仅是地球上最大的大陆，也是美国的地缘政治轴心。简而言之，欧亚大陆将是全世界真正的重心，所有超级大国都在不知疲倦地为其而战斗。

布热津斯基的说法与英国地缘政治家哈罗德·麦金德众所周知的理论非常接近，后者把中亚称为“世界岛”，认为“谁统治了东欧谁就可以控制中心地带；谁统治了中心地带谁就能控制‘世界岛’；谁统治了‘世界岛’谁就能控制世界”。

在这种脆弱的地缘政治愿景中，富勒回忆说，由于日本的大部分原材料和谷物都需要经日本海和黄海从中国东北和朝鲜半岛运来，所以商船是日本的战略重心。没有商船，日本的生存将受到威胁，这成了它的“痛点”。

谁都有弱点。避免被对手利用弱点的主要方式是确定弱点所在，并清楚其脆弱性。然后，就要隐藏弱点并尽可能地保护它。

7．促进分裂

善者，敌军人众，能使分离而不相救也，受敌而不相知也。

——孙膑

打破现有的权力结构并阻止较小的实体团结起来，这是一种至少可以追溯到罗马帝国的战略。“一战”期间，英国认为阿拉伯的叛乱将击败德国的盟友——奥斯曼帝国。因此，阿拉伯人的起义将使战争有利于与德国作战的英国人。

在“二战”中，丘吉尔竭尽全力让苏联撕毁与希特勒达成的协议，还迫使苏联与德国作战并支持同盟国。在这之前，大英帝国还维持了印度不同民族之间的区域边界，其目的是使各民族之间不断发生领土纠纷和摩擦，以免它们团结起来一起争取独立。在“二战”后，印度取得了独立，但是这些摩擦继续存在，使得英属印度最终分为了6个国家：印度、巴基斯坦、尼泊尔、孟加拉国、不丹和斯里兰卡。

1973年，由于赎罪日战争（10月6日至26日），石油输出国组织的阿拉伯成员国被禁止向美国和荷兰出口石油。同时，其中的一些国家将能源部门国有化。7年当中，石油价格从每桶3美元涨到35美元左右。作为世界主要的石油消费国，美国及其主要合作伙伴从那时起，就开始煽动石油输出国组织成员国的分裂，以防止这些成员达成新的协议，从而引起石油价格波动。

在冷战期间，美国外交政策的设计者在多民族社会中看到了一种潜在的工具，可以用来在与美国利益相悖的国家制造不稳定因

素。同时，这也是与美国关系良好的国家所具有的弱点，可能被敌国用来在与美国利益相关的区域制造混乱。

同样，正如奥利维尔·昂特莱格所评论的那样，我们可以从英国战略家富勒的著作中得出一个论断：一直以来，英国极力反对由一个大国单独主导欧洲。英国的想法不是完全消灭对手，而是削弱对手的实力，使欧洲大陆保持平衡。

分裂的阿拉伯人

英国利用阿拉伯人对土耳其统治的不满，承诺帮助阿拉伯人建立一个从叙利亚到红海和波斯湾、从大马士革到麦加的阿拉伯国家，以换取阿拉伯人帮助英国击败奥斯曼帝国。侯赛因于1916年6月向土耳其人宣战，5个月后宣布自己为阿拉伯国王。

美国总统伍德罗·威尔逊于1918年1月8日提出了十四点原则，作为协约国与同盟国之间和平谈判的基础。其中第十二点指出，阿拉伯人以及之前受奥斯曼帝国统治的其他民族“拥有无可置疑的主权及绝对不受干扰的自主发展机会”。

然而，当英国任命的叙利亚国王——埃米尔·费萨尔，在1919年1月的巴黎和会最高委员会上提出阿拉伯独立的论点时，他的讲话备受冷落。虽然费萨尔认为阿拉伯人曾与奥斯曼帝国全力作战，忠诚地为协约国的事业奋斗，所以有权获得协约国家的支持，但是事实是他的主张与法国希望独霸叙利亚的野心相冲突。

如果考虑到时任英国驻开罗高级专员亨利·麦克马洪爵士曾许诺给侯赛因的大片领土，侯赛因的儿子费萨尔所提出的主张是非常合适的，因为他要求大叙利亚以及希贾兹的阿拉伯各国立即完全独立。这里的大叙利亚包括目前的叙利亚、黎巴嫩、约旦、以色列和

巴勒斯坦权力机构。作为交换，费萨尔将接受外国在巴勒斯坦的调解，并接受英国控制美索不达米亚的主张。

结果是费萨尔的叙利亚王国只短暂地存在了一段时间。而侯赛因保留了他与麦克马洪所有的来往信件，他知道英国违背了对他的承诺。这些信件可以说明：英国需要有一个穆斯林盟友来对抗奥斯曼帝国，并说服侯赛因发动阿拉伯人反抗奥斯曼帝国，以此作为实现独立的一种方式。侯赛因和阿拉伯民族主义者当时认为有了英国人的承诺，欧洲人不会控制该地区。但是糟糕的是，在与侯赛因谈判的同时，英国还与阿卜杜拉·阿齐兹·伊本·沙特（又称伊本·沙特）领导的中部阿拉伯君主国签署了一项条约，英国同意每月向其支付相当可观的一笔经费。经过多年征战，在付出了近50万人的伤亡和上百万人流离失所的代价后，伊本·沙特夺取了麦加和麦地那，并于1932年最终建立了现在的沙特阿拉伯。后来，英国人曾策划阻止沙特人统一整个阿拉伯半岛，以便尽可能地将印度洋与波斯湾隔离开来。这一切就像是一场闹剧。英国的唯一目的是直接控制一些有利可图的石油和天然气产地。

自封的伊斯兰国于2014年6月宣布自己的首领为哈里发，并希望终结《赛克斯—皮科协定》[(3)]划分的中东格局并再次建立伟大的阿拉伯国家。当然，英国、法国和美国都不会允许其这样做。

与英国和法国在“一战”期间对阿拉伯人的鬼蜮伎俩相类似，1920年4月，战胜国法国、英国和意大利在圣雷莫达成了协议。根据该协议，这些国家不仅瓜分了战败国奥斯曼帝国的领土，还将安纳托利亚东部划给了亚美尼亚人和库尔德人。该条约为库尔德人提供了位于亚美尼亚南部边界迪亚巴克尔市附近的领土。最重要的是，根据该条约，库尔德人也有权脱离奥斯曼帝国，建立一个独立的国家。当穆斯塔法·凯末尔·阿塔土克在1923年被任命为土耳其共和国第一任总统时，库尔德民族独立的希望日渐渺茫。凯末尔下

达的第一批命令当中就有关于取消库尔德人上述权利的内容，而曾经作出承诺的欧洲列强则袖手旁观。

分裂的利比亚

布拉德·霍夫写过一篇文章，主要描写了在2016年美国总统大选期间，希拉里·克林顿的数千封电子邮件被泄露给新闻界的事情。在文中，他解释了美国2011年袭击利比亚的原因。霍夫强调，西方国家为叛乱活动提供支持，就像它们在中东其他地方所做的那样，其中一些叛乱涉嫌与基地组织有联系。就利比亚而言，来自英国、法国和埃及的特种作战部队在利比亚和埃及边境训练民兵。这种训练在2011年2月最初的公众抗议发生前不到一个月就开始了。因此，民众起义就是由国外势力煽动的。

这些外国特种作战部队向叛乱分子提供了武器和物资，包括大量的AK-47步枪和弹药。这与法国《解放报》2011年收集的消息相吻合：法国对外情报机构——对外安全总局（DGSE）向卡扎菲的反对者提供了大量武器。在这些武器装备中，有机枪、突击步枪、榴弹发射器，甚至还有“米兰”反坦克导弹。这一情况后来被法国武装部队发言人蒂埃里·巴克哈德所证实。

弗朗索瓦·蒂阿尔指出：美国、英国、法国等西方大国以及跨国公司（经济力量），为了最大化地获取利润和控制原材料，已经瓜分了世界。他还在《被瓜分的星球》中说：“瓜分世界是多年累积的结果，大部分的瓜分是在富裕而强大的国家的帮助下所进行的，这些国家这样做是为了确保它们的战略和经济利益。”根据这位法国战略家的说法，从现在起到下一代人长大的时间里，很有可能会有30多个新国家以民族或教派的名义诞生。伊拉克、叙利亚和利比亚等国的现状表明蒂阿尔的理论可能是正确的。同样，这也可能发生在一些欧洲国家，因为那里的分离主义势力也越来越强。

卡普兰说，欧洲越团结，与华盛顿的关系就越紧张。目前，唯一能使欧洲成为美国强大竞争对手的办法就是实施真正统一的外交政策，制定强有力的共同安全和国防政策，建立单一军队和统一情报部门，从而创造丘吉尔所渴望的欧洲合众国。最接近这一点的是欧洲宪法的诞生，但是由于法国等少数强国害怕失去特权地位而保持沉默，该宪法从未得到批准。不仅如此，英国脱欧成功，难民问题也日益紧张。这些情况使这个想法越来越像一个乌托邦。从某种意义上说，欧盟更像是从华盛顿搬来的，因为其代表美国的利益要多于代表欧洲公民的利益，然而，正是这些欧洲公民在为欧盟的运转支付经费。

根据卡普兰的说法，美国永远不会允许欧洲真正统一，更不会让欧盟与俄罗斯联合起来，因为这将意味着巨大的地缘政治和经济的威胁。尽管如此，鉴于欧洲一直是白宫的盟友，并且在面临新的挑战的时候，欧洲过于弱小对美国没有什么益处，因此未来将如何发展还有待观察。在一个全球化日益加深的世界当中，从多边的角度来说，美国知道必须与盟国站在一起。欧洲意识到，单个国家在国际社会中没有足够的分量，如果各国想要维护自己的利益，就必须保持团结，而且是越来越团结——至少在理论上应该如此。但是，一个威胁是通常被称为“双速度”的欧洲，也就是说其中一小部分发达的国家追求更紧密的团结，而放任其他欧盟成员落后。如果真是这样，那将是欧洲走向团结的另一个障碍。

如果你无法一次性消灭所有敌人，你将不得不一个接一个地去消灭。为此，最好的办法就是分裂他们。这是适用于诸多方面的普遍法则。当然，它也有效地适用于地缘政治。但是有时候，因为无知，可能适得其反，即让对手团结而不是分裂。古希腊历史学家色诺芬曾警告说：“老板同时对所有下属表示不满是一个很大的错

误，因为这将使他们许多人产生恐惧，被迫采取敌意，并且团结起来对抗老板。”这可能发生在现任美国政府身上。

8．间接统治

统治这个世界的是那些幕后的人物。

——本杰明·迪斯雷利

在阅读《间接统治》时，我们就会想到大国所使用的所有战略伎俩。它们不是通过强加意志的方式捍卫自己的利益，而是通过在文化和经济上间接控制欠发达国家的方式来实现其目的，这种做法被称为“新殖民主义”。

根据历史学家迈克尔·科菲的说法，“二战”期间，苏联外交部长莫洛托夫在美国帮助欧洲复兴的倡议“马歇尔计划”中看到了美国控制欧洲大陆的借口。而事实是，美国的援助对于欧洲重建来说是决定性的，而同时，这也使得欧洲到目前为止一直是美国忠实的盟友。

微妙和不易察觉的间接统治，在国际舞台上发挥着巨大作用。每当直接方法无效时，这种间接战略就会发挥作用。正如布热津斯基所指出的那样，美国的全球体系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它所支持的外国精英间接施加的影响力。美国政府是一位熟练的间接统治者。为了使其能源、政治和战略利益占上风，美国不仅使用了帝国主义的各种典型做法，还采用了一系列不那么直接的战略，从施加经济影响到建立军事或安全存在。

根据洛洛特和蒂阿尔的说法，大国经常使用低强度冲突来加强对较弱国家的控制。通过这种方式，这些冲突与经济和政治控制的其他要素结合在一起。例如，弗里德曼指出，白宫更喜欢阿拉伯地

区的石油由沙特王室和其他海湾君主国掌握，因为这些王室和君主国是“孱弱”且不受欢迎的，所以它们将始终依赖美国的支持。

作家阿敏·马卢夫在《凶恶的身份》中说：“许多国家的公民怀疑现代化是由美国所代表的外国文化所植入的特洛伊木马，他们认为全球化是美国化的同义词。”这一观点与社会学家乔治·里泽尔创造的“麦当劳化”一词有关。虽然不是对麦当劳公司的批评，但是里泽尔用这个美国快餐连锁店举例是为了描述现代社会的趋势——随时寻找立即可用的同质化东西。这与间接统治战略非常类似，这种战略将全球化或21世纪的社会确定为集体性的麦当劳化。

通过艺术和文化进行间接统治

根据美国经济活动办公室的说法，自1999年以来，艺术和文化领域一直保持正增长。艺术和文化领域对美国经济的贡献，每年超过7000亿美元，几乎占美国国内生产总值的4.5％。艺术和文化产品也是美国第二大出口产品。

该领域包含不同的活动分组，例如通信服务、建筑、广告和美术等，其中比较突出的是电影。欧洲视听观察站称，全球电影市场的分布方式使美国产品占据近70％的市场份额，而剩余的部分则由欧盟（26.2％）和世界其他地区（3.8％）分享。

电影，这个拥有世界市场并且每年投入数十亿美元制作的行业，不仅仅是为了讲故事。在具有强烈吸引力的虚构故事背后，隐藏着的是美国的价值观。简而言之，隐藏着美国人的生活方式及其对世界的善恶看法：谁是好人，谁是坏人。在冷战电影中，“坏人”是苏联人；现在，坏人是恐怖分子。五角大楼长期以来在美国电影制作中发挥着重要作用。1927年，由加里·库珀担任小角色的无声电影《翼》，在拍摄时依靠美国军队的帮助，重现了“一战”

的空战场景。当美国参加“二战”时，这种合作变得更加紧密，被视为向本国公民宣传的一种形式，以鼓励美国人入伍和支持战争。

合作并没有随战争一起结束。1949年，五角大楼制定了影视行业与美国武装部队的合作手册。根据协议，如果电影制作符合要求，制片方可以进入军队的军事基地拍摄，也可以使用一些资源（包括坦克、直升机、潜艇、航空母舰等，还可以借用美国军人），这为电影制作者节省了大量资金。但有一个前提，即满足某些要求，包括有助于塑造武装部队的良好形象，有利于“人员招募和挽留”计划等。

2017年7月初，汤姆·塞克和马修·奥尔福德在Insurge Intelligence网站上发表了一篇文章，在文章中他们得出的结论是，美国军方、中央情报局和国家安全局在800部成功的电影和超过1000部电视节目中发挥了影响力。塞克和奥尔福德按照“信息自由法”，调查了超过4000页五角大楼和中央情报局的文件。这些文件展示了美国政府如何操纵舆论并阻止制作批判军方或情报机构的电影，以及如何对近年来一些最受欢迎的电影施加影响。为了不损害自身形象，五角大楼通常拒绝为一些电影提供支持或试图改变这些电影的主题，这些电影一般都会涉及诸如军队自杀、越南战争或伊朗门事件等问题。

通过这种方式和审查制度，好莱坞成为美国国家安全体系的宣传工具，美国借助它在社会中培养一种有利于战争的心态，使国民支持政府在国外使用军事力量。很明显，政府想营造一种总体印象：美国士兵总是好的，总是推动“人权”和“民主”。简而言之，他们永远是所有电影里的英雄，或者至少是绝大多数电影里的英雄。毫无疑问，传递这种形象和价值观也是一种间接统治的方式。

间接统治的另一种形式是制造恐惧感。具体是指在人群中灌输一些可能隐藏在他们身上的威胁，虽然威胁可能是真实的，但是被放大到了使人们自愿服从操纵并成为傀儡的程度。这种战略的完美执行使人们接受被指挥、被操纵的状态，而且一旦确信危险即将来临，人们甚至会坚持不懈地要求被指挥、被操纵。

菲利普·津巴多坚信恐惧是国家操纵公民的最佳心理武器，公民宁愿牺牲自己的自由来换取他们无所不能的政府所承诺的安全。根据这位社会心理学家的说法，小布什政府在“9·11”事件后宣布对恐怖主义开战，就是发现恐怖主义是对国家的主要威胁，必须用一切必要的手段来消灭恐怖主义。菲利普·津巴多认为，为了给侵略活动寻求民众和军事支持，一些西方国家使用了这个策略。

世界性压力集团——索罗斯

2016年8月15日，黑客网站DC Leaks公布了2576份来自乔治·索罗斯创建和资助的开放社会基金会的内部文件，全球性集团如何通过媒体影响世界各地的公众舆论，随即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索罗斯因为在1992年搞垮英格兰银行而发家，并且他控制着一个覆盖全球40个国家的全球非政府组织网络。泄露的大量内部信息表明，索罗斯和他的团队在2014年乌克兰政府有争议的变革之前、期间和之后通过开放社会基金会进行了干预，而非政府组织——乌克兰国际文艺复兴基金会也是由索罗斯创建的。

DC Leaks公布的文件披露：为了推翻民主选举产生的乌克兰总统维克托·亚努科维奇，并让反对俄罗斯的新总统佩特罗·波罗申科执政，索罗斯认为有必要在欧洲，特别是在与俄罗斯具有紧密的文化和宗教联系的希腊削弱“对俄罗斯的理解”。为此，必须特别努力推动在反对俄罗斯的同时支持乌克兰新政府的舆论。为了实现这一目标，有人提议在希腊开展针对报纸、广播电台以及社交网络

前50位大咖的宣传活动。同时，应该在其他欧洲主要国家推广这场支持乌克兰的宣传战，该战役旨在污蔑俄罗斯对乌克兰问题的立场。首先从抵制与索罗斯支持的意大利“五星运动”、西班牙“我们可以”党和希腊激进左翼联盟等“反建制”政党相悖的行为开始。

泄露的文件中有一份引起了特别关注，它解释了开放社会基金会和乌克兰国际文艺复兴基金会如何操纵欧洲记者报道波罗申科政府和克里姆林宫。其内容分为三个主要部分，根本没有顾及新闻自由的民主原则。例如调查性新闻，选择来自5个目标国家（德国、法国、西班牙、意大利和希腊）的记者，并资助他们在乌克兰进行长期调查旅行。不指定他们应该写什么，而是向他们建议一些文章，并对可能适得其反的文章进行否决。

根据网站上提到的内容，生于匈牙利布达佩斯的索罗斯，被认为是在过去20年内发生在世界各地的所有革命和政变的设计师和推动者。DC Leaks认为，索罗斯资助了美国民主党及2016年总统大选的民主党候选人希拉里·克林顿，以及世界各地的数百名政客。从DC Leaks的门户网站还可以免费访问开放社会基金会的内部相关组织，那里提供索罗斯的工作计划、战略、优先事项和其他活动。至于与希拉里的关系，披露的文件显示，为了影响其他国家，克林顿基金会和开放社会基金会之间存在密切合作。

除了DC Leaks所揭露的问题，索罗斯的形象也是非常有争议的。在各种报道中，人们指责索罗斯不仅资助气候变化理论的倡导者，还资助世界各地的许多激进活动。目前，由于意识形态差异，匈牙利维克托·奥尔班政府与索罗斯之间存在着一场特别的斗争，奥尔班指责索罗斯资助的布达佩斯中欧大学已经成了匈牙利支持移民力量和支持自由派非政府组织的大本营。

干预选举进程

2016年12月下旬，当俄罗斯情报部门在美国总统选举中所谓的干涉成为头版新闻时，记者肖恩·迪克森·卡瓦纳夫发表了一篇关于卡内基梅隆大学政治与战略研究所政治分析家多夫·莱文的研究文章，该研究揭露了美国试图影响其他国家的选举。在查询了许多消息来源，包括解密的美国情报文件、前中央情报局特工的回忆录、国会对情报服务活动的报告以及冷战时期的外交档案和学术研究之后，莱文得出结论：从1946年至2000年，美国秘密干涉了45个国家的81次选举，从20世纪50年代的菲律宾到20世纪90年代的尼加拉瓜，当时的美国中央情报局甚至还通过泄露信息破坏古巴桑蒂诺主义者的形象。这还没有包括反对华盛顿利益的候选人当选时美国所采取和支持的政变活动。

美国所采取的行动根据具体情况不同而多种多样，包括鼓动宣传、支持喜欢的政党和候选人等。虽然这些干涉外国选举过程的活动大部分都是在冷战背景下发生的，都是为了抵消苏联对左翼政党的影响，但是莱文声称，1991年之后，当铁幕拉起时，美国仍继续干预外国的选举，包括1996年的俄罗斯选举。

最后一个已知案例发生在2017年5月初，即法国第二轮总统选举前不久，当时自由候选人埃马纽埃尔·马克龙的数万封个人和工作电子邮件被泄露给社交网络，据称这些邮件是几周前被盗的。显然，这种泄露是为了中伤马克龙，以有利于他的对手——极右翼的玛丽娜·勒庞。根据某些分析人士的说法，马克龙是法国左翼力量的候选人，得到了共济会和犹太复国主义的支持，还可能得到了大多数欧洲媒体和欧盟机构的支持。一些人认为，这种被称为“MacronLeaks”的操作，受到了俄罗斯的操纵，而另外一些人认为这可能是一种“冒充敌方”的操作，使其他人将操作归咎于第三

方，恰恰是为了诋毁勒庞，同时也是对公开支持勒庞的俄罗斯的诋毁。[(4)]与2016年美国大选期间发生的情况不同，当时泄露的候选人希拉里的电子邮件都是真的，而根据研究人员的说法，所泄露的马克龙的电子邮件有真有假。

民主的幌子

美国最具争议的组织之一是美国国家民主捐赠基金会（缩写为NED）。该基金会创建于罗纳德·里根担任总统的1983年。从那时起，该基金会一直致力于在世界范围内“促进民主”。

在冷战背景下，美国资助了一系列通过各种组织推动苏联尊重人权和政治多元化的活动，苏联领导人将这些活动视为具有明显颠覆企图的行为，认为这些活动是为了颠覆其支持下的社会主义国家的现有秩序。在其成立的最初几年里，美国国家民主捐赠基金会将其工作重点放在东欧国家，特别是波兰。其中最重要的活动包括赞助爱沙尼亚良心囚犯帮助中心（1986年）；为美国—立陶宛协会和乌克兰人权协会提供资金（1988年）。在1989年乔治·H. W. 布什当选美国总统后，美国国家民主捐赠基金会开始资助其他机构，如亚美尼亚民族自决党。

除了华盛顿和莫斯科之间的竞争之外，美国国家民主捐赠基金会也从未停止对美洲大陆政治形势的关注。因此，在1984年，该基金会资助了巴拿马的一位总统候选人，这位候选人是诺列加将军的支持者，因此受到中央情报局的青睐。6年后的1990年，该基金会又完全赞助了右翼代表马克·巴赞竞选海地总统的活动。20世纪90年代初期的几年里，为反对菲德尔·卡斯特罗，该基金会又为古巴裔美国人国家基金会捐款。自乌戈·查韦斯担任总统以来，委内瑞拉政府一直在谴责美国国家民主捐赠基金会通过资助反对查韦斯主义团体干涉该国政治。

为了在其他国家履行其使命，美国国家民主捐赠基金会通过其资助的各个机构展开行动，例如“自由之家”“美国国际事务民主协会”和“美国国际共和研究所”。“自由之家”主要由美国政府资助，旨在“促进民主、人权和政治自由”。该机构成立于1972年，总部设在华盛顿，在10多个国家设有代表处，每年都发布有关全世界范围内政治自由状况和新闻自由状况以及民主治理的年度报告。在这些年度报告中排名较低的国家会遭受重大声誉损失，这可能意味着由于面临着不稳定的威胁而导致国际资金被撤回或投资者外逃。

“美国国际事务民主协会”也和美国国家民主捐赠基金会一样，成立于1983年，因其与美国民主党有关，所以得到政府资助。与“自由之家”类似，该组织通过其位于华盛顿的总部指导遍布70多个国家的办事处，并与“倾向自由和进步意识形态”的国家和国际组织保持联系。另外，美国共和党也有另一个隶属于美国国家民主捐赠基金会的组织，即“美国国际共和研究所”。该组织侧重与持保守意识形态的组织发展关系，并与美国国家民主捐赠基金会分享资料和信息。此外，还有另外两个由美国国家民主捐赠基金会资助的组织：国际私人企业中心和美国国际劳工团结中心。

美国国家民主捐赠基金会的批评者声称，虽然它是一个私立机构，但是其大部分收入来自美国国会，这说明它只是美国政府的一个工具，为实现美国的政治目的和维护其国家利益服务。可以毫不犹豫地说，自成立以来，该基金会及其资助的组织，一直通过向媒体、政党、工会和反对执政政府的各种民间组织提供支持，在不符合美国政府政治取向的国家内制造不和谐和分歧。实际上，美国国家民主捐赠基金会与中央情报局做着同样的事情，尽管其方式更加透明。

一般情况下，应该尽可能避免直接对抗，这样会产生更大的影响。卡斯蒂利亚（西班牙古国）有谚语说“苦干不如巧干”，这当然是正确的，不过还有一句谚语说“诡计终归不是力量”。

这就是大国的做法，无论其军事力量多么强大，都不如使用其他形式的统治手段更有利可图，因为这样被统治者不易产生对统治者的怀疑和反感。

9．曲解法律，抹黑敌人

永远以公正为名、以法律为掩护的暴政，是最残酷的暴政。

——孟德斯鸠

19世纪，普鲁士首相俾斯麦说，尽管利用法律加以伪装，但是所有政府都是纯粹地根据自己的利益决定自己的行为。1975年，澳大利亚的两位教授约翰·卡尔森和内维尔·约曼斯使用了“法律战争”（lawfare）这一术语，意思是将武器战争转变为文字战争。这个词汇在2001年由查尔斯·J．邓拉普撰写的一篇文章而引起关注。在文章中，邓拉普将“法律战争”定义为将法律用作战争的武器。虽然这位美国司法部门的将军，专注于研究阿富汗塔利班的国际合法性，但是他将几个世纪以来交战各方一致使用甚至滥用的概念重新公布于众。几个世纪以来这个概念被用于决定哪些战争从宗教、道德和法律的角度来看是正义的。

乔良和王湘穗引入了一个他们称之为“国际法之战”的新概念，他们认为，这个概念就是指抓住机会，创造有利于自身利益的新法规。

进化和应用

疯狂的毁灭不论是以集权主义的名义造成，或以自由民主的名义造成，对于死者、孤儿和无家可归者有什么分别？

——圣雄甘地

2011年，北约在联合国的授权下对利比亚进行军事干预，联合国做出授权是因为面对发生的针对班加西平民的袭击，援引了“保护责任”原则。但是，这项旨在保护平民的任务，最终演变成支持利比亚反政府武装，推翻该国政府的过程。确实，卡扎菲政权犯下了罪行并侵犯了该国公民的人权，但是北约的行动却是为了石油利益。这个北非国家是非洲的第三大产油国，在战前每天生产近160万桶石油，占世界石油总产量的2％，仅次于尼日利亚和安哥拉，欧洲石油公司也在这个国家有相关利益。

为什么干涉某些国家的冲突而不干涉其他国家的冲突？为什么法国在非洲一些国家的势力范围内部署了部队，并敦促欧盟也部署部队？是什么使军事干预合法化？“9·11”事件后，小布什所宣布的反恐战争，依靠国际社会接受的原则及国家或国际法律，实现了美国的地缘政治和地缘经济目的。这正是国家用来保护自己合法性的“法律战争”战略，这种战略使得国家可以钻法律的空子，使其行为合法化。特别是自17世纪以来，一些国家将自卫、自我保护和必要性作为对另一国开战的正当理由。在21世纪出现了一个新的理由——保护的责任。

乍一看似乎没有什么可以质疑的，因为其逻辑是帮助那些遭受统治者迫害的人。但问题在于，这些国家援引的原则没有明确定义，因此可以自由地解释该原则。当一个国家将主权、不干涉内政、人权等概念当作借口，对另一个国家进行军事干预时，这种情况经常发生。基辛格认为从这个意义上说，当民主、人权和国际法等概念被交战各方用作战斗口号时就有了不同的解释。

探寻冲突的正当性和合法性并不是新鲜事。如果冲突和战争与人类的历史一样古老，那么解释和证明冲突和战争的想法也是如此。古罗马著名政治家西塞罗认为，战争的合法性取决于道德概念，道德概念成了“正义战争”思想的萌芽。“正义战争”的理论诞生于中世纪时期，出自基督教思想家奥古斯丁·德伊波那、托马斯·德·阿基诺、弗朗西斯科·德·维多利亚、弗朗西斯科·苏亚雷斯和乌戈·格罗提乌斯等人之手。这些人一直想将合法宣布战争（战争权）和合法开展战争（战争中的权力）的标准具体化，并确定战争中的限制。在19世纪和20世纪，在国际法的框架下以及在联合国的模式下，使用武力的合法性最终变得正当。

随着国家概念的出现，道德原则让位于主权，这反过来又产生了两个原则：国家独立和不干涉别国内政的原则。根据正义战争理论，进行人道主义干预时，可以打破这些原则，以履行保护其他国家人民免受本国政府侵犯的义务。从历史上看，这些干预措施往往用于在国外保护本国公民。19世纪，国际社会承认国家主权的一个先决条件是：国家有能力保障内部秩序及保护在国外公民的生命和财产安全。1813年至1927年间，美国为保护在国外的本国公民，至少动用军队70次。

人道主义干预与主权责任的概念密切相关。如果一个国家不能或不愿意保护自己的人民，或者这个国家本身就曾大规模、系统地使用暴力来侵犯人权，那么按照联合国框架内的保护责任原则，就可以对这些国家实施合法干预以保护其国民。

到目前为止，一切似乎都是合理的。但是如果联合国有义务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更具体地说，假如由联合国安理会负责确定什么会对国际和平与安全构成威胁，那么应当如何客观地制定一项原则，如保护责任原则？对该学说的主要批评是应用时做不到客观。拥有否决权的联合国安理会五个常任理事国负责决定捍卫其他

国家人权的地点和方式，但是这不可避免地取决于它们自身的地缘政治和经济利益。这就是法律战争战略发挥作用的地方。除了联合国安全理事会组成的特殊性之外，援引保护责任原则也会造成严重危险，因为以伟大原则的名义进行干预而损害其他国家的利益，是历史上最为武断的做法之一。

根据10票赞成、5票弃权（常任理事国中的俄罗斯和中国投了弃权票）而通过的安理会第1973号决议，利比亚是第一个被使用了保护责任的国家。但是对这一决议的不同理解也导致了对这一原则的质疑。2017年6月初，在马德里的西班牙外交学院举行的一次会议上，国际法院15位法官之一——摩洛哥法官穆罕默德·本努纳表示："当2011年我们以保护该国国民的名义杀死了卡扎菲时，保护责任的概念就消亡了。"

那么叙利亚呢？为什么在叙利亚没有运用保护责任？因为这是一场不同的冲突：不仅涌向欧洲的难民浪潮证明平民并没有得到保护，而且城市、医院和难民营还遭受了系统性的攻击。各个大国在叙利亚存在利益冲突。在叙利亚，保护责任显然不是客观地用来保护平民基本人权免受侵犯的工具。看看各国在叙利亚的利益冲突：其一，俄罗斯在叙利亚不仅有巨大的经济利益，还有强大的地缘政治利益。另外，叙利亚的塔尔图斯海军基地还是俄罗斯在地中海唯一的港口。为了保持自冷战时期起就存在的影响力，俄罗斯不希望叙利亚被美国和欧洲掌控。其二，伊朗认为叙利亚领导人巴沙尔·阿萨德是其在该地区的重要盟友。这不仅是因为两国都是什叶派政府（与伊斯兰教逊尼派相对立的教派），而且还因为叙利亚是伊朗在该地区唯一的阿拉伯盟友。与叙利亚保持良好关系能够使伊朗与黎巴嫩真主党保持联系，进而通过真主党威胁以色列。其三，受到传统盟国和其他阿拉伯国家支持的美国，以阻止伊斯兰国发展的理由盘踞中东。其四，中东地区这个舞台，还涉及其他"演员"的利

益，如土耳其和以色列。当奥斯曼帝国在“一战”中战败后，法国和英国在该地区“建立”了许多国家，也有很多相关利益。毋庸置疑，虽然各方都说他们正在打击恐怖主义团体，但是他们都没有做的一件事就是保护平民。

还有一个例子，就是长期处于内战状态的也门。自2015年3月爆发冲突以来，该国出现了严重的人道主义危机和大规模饥荒，造成数以千计的平民伤亡，这引起了联合国人道主义事务协调办公室的极大关注。该地区的其他利益相关国家也参与了这场冲突，如沙特阿拉伯（逊尼派）领导了多国联军打击也门胡塞反政府武装（什叶派）。也门是一个有趣的案例，因为胡塞反政府武装可以趁机控制曼德海峡，而每天有380万桶石油要经过此海峡运输。此外，考虑到索马里当前微妙的局势，如果也门彻底动摇并落入恐怖组织或海盗之手，将对苏伊士运河往来的交通造成严重损害，最终会阻碍世界经济发展。

根据全球保护责任中心的说法，在叙利亚、苏丹、伊拉克、也门和厄立特里亚正在发生大规模犯罪，需要采取紧急行动。在南苏丹，局势也十分危急，如果不采取措施加以制止，将发生大规模杀戮和暴行。但是这些情况可能不会在媒体上出现，也不会促使联合国安理会援引保护责任。

该规则缺乏明确性，而且其在利比亚的滥用会对该规则造成破坏，因为各国完全按照自己的意愿将该规则运用于冲突中，以捍卫自己的立场。该规则本应该是与维护人类安全这一神圣责任相关的不可动摇的重要原则，却由于援引的国家不同，而具有了双重标准，完全变成了保护国家利益的一种战略。

战争一旦爆发，法律就会退居次席

在战争中，任何一方都不能被宣布为不义，因为战争的结局决定了正义是在哪一方。

——伊曼努尔·康德

一旦敌对行动开始，各国就只有一个目标——赢得战争。历史经验表明，胜利者将是书写历史的人，所以我们看到的历史总是有利于胜利者的。因此，他们会毫不犹豫地采取他们认为有效的任何方法，即使采取这些方法会违反他们曾签署和批准过的国际法律，包括武装冲突法律（如日内瓦和海牙的法律）和经济领域的其他法规等。

有必要回顾一下罗马军事家和政治家盖乌斯·马略所说过的话。他因将公民身份授予为其在高卢作战的雇佣兵而备受指责，对此，他说："由于战争的噪音，我听不到法律。"

识破国际法的骗局

法律是蜘蛛网，大苍蝇触犯法律，没事；小苍蝇触犯法律，却会被法律之网逮住。

——奥诺雷·德·巴尔扎克

2016年10月底，冈比亚宣布退出国际刑事法院。这是在一周内第三个宣布退出设在海牙的国际法庭的非洲国家。另外两个国家是南非[(5)]和布隆迪。这三个国家的决定基于同样的理由：国际刑事法院的工作重点是追捕非洲人，至少是优先考虑追捕非洲人。这些国家将其描述为一个国际高加索法院，并指责该法院是为新殖民主义的利益服务。冈比亚新闻部长博江发表激进言辞称："自国际刑事法院成立以来，至少有30个西方国家犯下了战争罪。"

事实是，根据联合国的倡议，随着《罗马规约》的签署，国际刑事法院于2002年7月1日成立。尽管根据2004年1月4日的协议，其工作需要与联合国进行协调，但是作为联合国机构之外的独立司法机构，国际刑事法院的设立在理论上标志着人权保护工作取得了重大进展，该法院负责审判危害人类罪、战争罪、种族灭绝罪等罪行。

有一些人有充足的证据认为，国际刑事法院过分关注非洲事务，而忽视了在世界其他地方所发生的暴行。2009年3月4日，国际刑事法院下令逮捕苏丹总统奥马尔·巴希尔，因为苏丹政府在2003年至2008年期间对达尔富尔地区的平民犯有战争罪和危害人类罪。国际刑事法院下令逮捕的另一位国家元首是利比亚的卡扎菲，案件在2011年卡扎菲去世后终止。刚果民主共和国反政府组织——刚果爱国者联盟前领导人托马斯·卢班加·迪伊洛于2012年7月10日被国际刑事法院判处14年徒刑，其罪名是在2002年至2003年期间，在刚果（金）的伊图里地区征募儿童兵参加战争（国际刑事法院的首项判决）。与卢班加·迪伊洛一起，另一名被监禁在国际刑事法院的非洲领导人是查尔斯·泰勒。查尔斯·泰勒曾于1997年至2003年担任利比里亚总统，2012年5月他被联合国特别法庭判处50年徒刑。

问题在于，作为国际刑事法院诞生基础的《罗马规约》尚未得到许多国家的签署或批准，其中包括世界上一些有影响力的大国，如美国、俄罗斯等。对于许多国家来说，大国不愿意服从国际管辖权是法律只对弱者有约束力的另一例证，因为强者永远不会服从于任何国际组织，哪怕他们是这些国际组织的创立者或者重要成员。问题的关键在于，《罗马规约》第126条规定，国际刑事法院只对签署和批准该规约的国家有效，因此该法院对未签署和未批准该规约的国家或其公民都没有管辖权。2016年11月16日，俄罗斯总统普

京宣布撤回2000年对《罗马规约》的签署。当然，该规约也从未得到俄罗斯的批准，因此俄罗斯顺理成章地退出了国际刑事法院。俄罗斯宣布撤回对该规约的签署，是因为国际刑事法院的一份公报中将克里米亚视为被俄罗斯占领的领土。

弱者并不缺乏批评强者的理由。2002年8月2日，小布什政府执政期间，美国国会无视国际法，通过了《美国服役人员保护法案》。该法案禁止任何美国机构与国际刑事法院合作。由于这个法案，国际刑事法院无法引渡美国人，国际刑事法院的人员无法在美国境内进行调查，不允许美国向国际刑事法院成员国提供任何军事援助。更糟糕的是，该法案还明确授权美国总统使用一切充分必要的手段，使以国际刑事法院名义或应其要求，而被拘留或监禁的美国公民或盟国公民获得释放。

显然该法案与国际刑事法院的基本原则相悖，也破坏了国际法的根基。在2016年11月中旬，国际刑事法院检察官办公室表示，有充分理由相信，部署在阿富汗的美军可能犯有战争罪，特别是曾对被关押在秘密拘留营中的囚犯实施酷刑和其他虐待行为。正如我们所看到的那样，他们仍然招摇过市，没有受到任何惩罚。西班牙政治家曼努埃尔·弗拉加曾说，“追寻完美的社会秩序，反而使虐待大行其道”。他的这句话用在这里可能是对的。

为什么以色列不归还戈兰高地

由于“六日战争”（1967年6月5日至10日），以色列从叙利亚夺走了戈兰高地。之后，联合国安全理事会于1981年通过第497号决议裁定，宣布以色列吞并戈兰高地的行为是无效的，不具有国际法律效力。然而，以色列已经完全忽略联合国，全然不顾国际合法性，一切都是以自己的国家利益为出发点。对以色列来说，戈兰高地战略地位十分重要。首先，这片地广人稀的土地是以色列的主要

水源，可以用于建设新的犹太人定居点。而且这个高地可以控制整个以色列北部，因此绝对不会归还给叙利亚。自1973年赎罪日战争以来，以色列与叙利亚仍然处于宣战状态。此外，在叙利亚发动攻击时，这个高地可以作为战略纵深地带。以色列担心，如果将戈兰高地归还叙利亚，真主党支持的巴勒斯坦恐怖组织会盘踞于此，更容易对以色列发动袭击。

布什和他的反恐战争

可以诉诸暴力的人，不需要诉诸司法。

——修昔底德

2001年9月11日，在恐怖袭击发生几个小时后，时任美国总统乔治·W. 布什在椭圆形办公室向全国发表讲话，宣布将对恐怖主义者及其支持者采取打击行动。根据理查德·A. 克拉克的说法，当演讲结束后，国防部部长拉姆斯菲尔德向布什总统指出，国际法只允许使用武力以防止未来的攻击，而不是作为惩罚手段时，布什总统愤怒地喊道："不，我不在乎国际法怎么说，我要给他们一点颜色看看。"对法律的不屑一顾不只是这些，他还授权中央情报局在全世界各地建立秘密监狱或者在审讯嫌疑人时使用酷刑。正如法里德·扎卡利亚所说的那样，小布什政府多年来一直吹嘘其对国际条约和国际组织的蔑视。

在恐怖主义问题上，美国肆意妄为。美国随意将一些组织和个人列入恐怖分子名单，也随意将一些国家定义为支持恐怖主义的国家。由于缺乏所有国家或国际组织都使用的统一标准，一些组织、个人甚至国家进入了一些名单，而没有进入另一些名单。此外，进入或不进入名单取决于制定名单国家的利益，很显然名单缺乏正当性理由。因此，阿尔巴尼亚族科索沃解放军先后两次被列入和被剔

除出名单。古巴也是一样，经过多年的努力，它终于被剔除出名单。事实是，这些名单通常仅用于对目标不同的个人和国家实施制裁，只是充当施压工具。据克拉克说，在两伊战争期间，为了方便伊拉克申请贷款以促进美国政府支持的某些商品的出口，里根政府在1982年将伊拉克剔除出支持恐怖主义的国家名单。

根据法国分析家拉彼威尔和蒂阿尔的报告，“9·11”恐怖袭击事件发生后，布什政府在基地组织、哈马斯和真主党等组织明显威胁的基础上建立了全球威胁警报。这种威胁导致五角大楼制定了“全球反应”学说，主要是为了保护美国利益，而不是在反恐方面进行有效的国际合作。以维护国家利益的名义违背国际法，布什政府将“预防性战争”的概念正式化了，使得自冷战结束以来的国际关系突然变得军事化。记者塞马斯·米尔恩说，在反恐战争的框架下，2003年英国首相布莱尔保证说，由于美国和英国军队入侵伊拉克而导致的平民死亡人数远少于萨达姆政府统治时期一年的死亡人数。事实是，据国际特赦组织估计，萨达姆时期与政治镇压有关的死亡人数每年数以百计；而在美英入侵后的5年内，估计平民死亡人数有15万—100万人。

美国袭击叙利亚

2017年4月，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决定袭击叙利亚空军基地，理由是在前一天由该基地起飞的飞机对平民投放了沙林毒气，作为美国武装部队最高指挥官，他根据美国宪法第二条授予的权力做出上述决定。

虽然美国宪法规定宣战的权力属于国会，但是行政部门有权力在极端紧急的情况下宣战，这可能是出于国家安全、国家自卫或在国外保护本国公民的原因。从这个意义来说，这并不是美国第一次

利用法律，在没有国会具体授权的情况下在国外使用军事力量，因为2011年干预利比亚时也这样做过。

在国家安全受到严重、紧急威胁的情况下，即出现问题的时候，需要采取武力行动。实际上，总统的权力比外表看起来要大得多，总统只需要知道如何动员公众舆论，使其成为白宫立即开战行动的理由，就足够了。

此外，总统通常使用的一个论点是，国会的授权不是必需的。因为尽管军事行动的力度可能非常大，但是其实施的时间和空间都非常有限。另外一个允许总统直接下达行动命令的理由是人道主义，如之前所做的那样，说袭击叙利亚是为了防止叙利亚政权继续对其平民使用化学武器。

简而言之，在需要时，美国便能给出充分的理由，使国家参与特定的行动，尽管这些行动与其所宣称的目标没有多大关系。“国家安全”这个含糊不清的词语就像一个大筐，几乎所有符合当下政治利益的东西都可以往里装。

国际法会经常引起争议，这种争议使得其为在国外的军事干预辩护变得更难。从理论上讲，除了自卫情况外，只有在联合国安理会通过决议后，一个国家或国际组织才能在外国土地上进行军事行动；但实际情况是，联合国经常被绕过，如1999年北约轰炸贝尔格莱德的行动就是这样的。

自冲突开始以来，至少有50万人死于叙利亚，更不用说数百万流离失所者和生活在非人条件下的难民。美国的举动突然间使得死亡的方式似乎比死亡人数更重要了。这一举动背后隐藏着一些虚假的理由，其中夹杂着美国的内部政策和地缘政治警告，很可能针对

美国的强大地缘政治竞争对手——中国和俄罗斯，也针对占据了中东大部分地区且与华盛顿的盟友们对抗的伊朗。

值得一提的是2015年11月20日联合国安全理事会通过的第2249号决议。根据该决议，考虑到这些恐怖主义组织对国际和平与安全构成前所未有的全球性威胁，各成员国同意协调应对基地组织、“伊斯兰国”及其在叙利亚分支机构的活动，但是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允许任何国家或国际组织攻击主权国家叙利亚的部队。这是一项含糊不清的决议，因为它没有具体规定对这些恐怖主义组织采取何种合法行动，或者哪些国家或国际组织有权采取这种行动，这很像之前在其他国家发生的情况。

违反国际法的《外层空间条约》

《外层空间条约》（1967年）规定了管辖各国在包括月球和其他天体的外层空间探索活动的原则，也规定了外层空间是全人类的财产。因此，外层空间不能被任何国家占有，也不能以其他任何方式对其宣示主权、使用权或占领权，无论这个国家的科学或经济发展程度如何。相反，为了和平目的，整个国际社会可以对外层空间进行探索和使用。截至2017年9月1日，129个国家签署了这项条约，虽然其中24个国家还没有批准该条约，但是后来又出现了其他协议，如管辖各国在月球和其他天体上活动的《月球协定》（1979年），对未来外层空间的自然资源勘探和开发活动进行了规范。

尽管如此，乔治·W．布什总统于2007年10月签署了一项命令，规定美国有权拒绝任何可能将太空用于敌对目的的对手进入太空。更糟糕的是，在2016年11月8日奥巴马任期结束时的联合国大会上，美国拒绝制定任何可能限制其使用外层空间的条约或限制性规定。在该届会议期间，就防止外层空间军备竞赛进行辩论时，有4个国家弃权了，其中包括美国。此外，美国还是投票反对不首先

在太空放置武器的4个国家之一。尽管有其他国际条约的阻止，美国还是在积极寻求赢得利用小行星的竞赛。2015年11月25日，奥巴马签署了允许在太空天体进行采矿的立法提案，该提案后来得到了国会的批准，这使得美国可以开发小行星为自己谋取利益。这部空间法的官方正式名称是《美国商业空间发射竞争法案》，明确允许美国公民可以为了谋利而开采空间资源，小行星采矿公司有权获得外层空间的财富。

17世纪，雨果·格劳秀斯在荷兰提出了“国际法”概念。根据这个概念，所有主权国家都是平等的，为了维护主权而开战是合理的，但是这种想法实质上是一个乌托邦。根据卡普兰的观点，和平与战争之间的界限经常被混淆，只有符合自身力量和利益时，国际协议才会被维护。爱因斯坦同意这个想法，他在1932年7月底致西格蒙德·弗洛伊德的信中哀叹“法律与强力总是不可避免地如影随形”。

乔良和王湘穗认为，每个国家对国际规则的承认或拒绝通常取决于它们自己的利益。小国希望利用这些规则来保护自己，而大国则希望利用这些规则来控制小国。换句话说，世界上存在两种对国际关系的解释：一种解释是国际关系必须建立在国际合法性的基础上（弱国的看法），另一种是国际关系取决于每个国家的地缘政治权重（强国的看法）。因此，国际法既不受强国尊重，也无法由弱国强制执行。

10．你下去，我上来

“你下去，我上来”这个充满了政治寓意的表达，于1933年在古巴杂志上首次出现之后，便风靡起来。它描绘了该国几届总统的频繁变动，也批评了只担任了一天总统的阿尔贝托·埃雷拉及在民众暴力起义（其中美国驻哈瓦那大使馆的干预对结局起了决定性作

用）后上台的卡洛斯·曼努埃尔·德·塞斯佩德斯，还批评了富尔亨西奥·巴蒂斯塔领导的军事政变。这种动荡在拉蒙·格劳·圣马丁掌权时才结束。可见，为取得政治权力和为保持政治权力而斗争是一项没有尽头的工程。

这个表达言简意赅，没有比它更好的短语了，它准确地定义了对权力的争夺。总是会有这样或那样的人，无论其意识形态如何，总想掌控社会；也有人或团体总是试图把处于权力顶峰的人拉下来。无论是在个人关系领域还是国家关系领域，我们都可以看到这种情况。

“你下去，我上来”是一些国家的政治家惯用的伎俩，他们有时甚至以理想的名义或者怀揣对美好未来的憧憬而犯下暴力罪行。唯一的输家是人民，他们被操纵、被欺骗、被利用。公民不会知道为了争夺权力，在最高层真正发生了什么。如果公民最终了解了真相，会对政治家的阴谋诡计感到震惊，因为这些政治家本应该专注于人民的福祉。一旦建立了官僚机构，官僚机构就凌驾于赋予其生命的人民之上，而且会在那些傻傻地以为官僚机构会使生活更舒适的人们身上滥用权力。

桌上的拳头

法国作家阿敏·马卢夫在《世界的不协调》中说，当你的权力脱手时，对手的自发性反应是压制你和攻击你，而不是感谢你。出于这个原因，霸权国家必须不时地发动打击并展示其权力，以免想要占据其位置的国家过于自信地发动进攻。这就是被俗称为“把拳头放在桌子上的做法”，是一种警告蠢蠢欲动、想要夺取权力的人的方式。

革命

如果革命被理解为突然发生的根本性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宗教变革过程，并往往是激烈的、暴力的，那么今天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有可能发生新的革命运动，因为今天的世界联系更加紧密，革命运动能够迅速传播到全球或至少传播到其中大部分地区。

马克思关于阶级斗争的理论在富国与穷国的对抗中继续有效。这种情况由于显著的人口差异而得到强化，因为贫穷国家人口不断增长，而富国因为人口出生率低和老龄化严重而备受困扰。除此之外，尽管国家收入水平在提高，但是在欠发达国家中普遍存在明显的不平等。当前发达的网络使边缘化群体看到了其他国家的现实，看到别国居民不用特别努力，却过着富足的生活，由此产生了一种不公正感。在社交网络中，人们展示了生活中最幸福时刻的图像，给旁观者创造了一种幻觉，即这种福祉是伟大的、容易实现的。从逻辑上讲，这种感知促使人们渴望达到同样的生活水平，有时这种渴望甚至是不可抑制的。

这些情况引发了不同的情绪。一方面是对这些更先进社会的渴望，另一方面是一种被边缘化的感受和挫败感。大规模的移民运动已经把这种渴望变成了事实，但是大规模的暴力对抗和全球范围内的新阶级斗争也可以使一切被打回原形。这可能是一场以大城市为中心的国际性动荡，之所以会发生在大城市，是因为在那里集中了世界上的大多数人口。“国际大都市动荡”的概念既有趣又令人担忧。一切都表明，下一次巨大的全球动荡，将把城市作为一个战场。动荡越大，解决起来就越复杂，居民就越痛苦。

伊斯兰地缘政治

在伊斯兰教中，宗教与政治之间存在着密切的关系，这种关系影响着个人生活和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记者何塞·哈维尔·埃斯帕扎认为伊斯兰教是一种宗教信仰，也是统一这种信仰周围一切的

政治形式。这种意识形态能够吸引并迎合最弱势的群体，正如在非洲和美洲各地所发生的那样。历史学家丹尼尔·马西亚斯·费尔南德斯指出，伊斯兰教是为反对在伊斯兰世界中建立的殖民大国而诞生的，所以今天它可以被用作反对西方国家的权力和影响力的机制。

西格蒙德·弗洛伊德在《一种幻想的未来》中写道：“如果我们试图消除欧洲文化的宗教，只能通过另一种学说体系来实现。从一开始，这种学说就会具有宗教的所有心理特征及其自身神圣性、刚性和不容忍性，而且为了维持其权威，同样会禁止思考。在这种情况下，只有一种将宗教信仰和政治结合起来的体系才能在欧洲取代宗教（基督教）和政治意识形态（民主），它就是：伊斯兰教。”

根据马西亚斯的说法，这可能就是沙特人的目标：他们实施了历史上最大规模的伊斯兰主义资助活动，将相当一部分的石油收入用于资助世界各地的伊斯兰组织，并将瓦哈比传教士派往全球的各个角落。2016年12月，德国报纸《南德意志报》发表了一份由德国情报部门编写的报告，该报告警告说瓦哈比主义在欧洲和世界其他地区的扩张符合沙特阿拉伯谋划的战略。该战略得到了波斯湾其他国家的支持，其目的是逐步建立新的社会模式。

众所周知，宗教具有神话般的力量。现在想象一下，与宗教相关联的意识形态是基于平等和社会正义原则，具有解放性，令人充满希望。对于某些类型的人来说，宗教的这种吸引力非常强烈，因为他们认为自己在其所生活的社会中被边缘化了，被忽视了。若说“宗教是人民的鸦片”，那么可以更进一步得出结论：宗教和意识形态的混合物是最有效的毒品，使吸食的人不仅没有抵御能力，并且完全受其控制。

无论权力表现为何种形式，它总是被那些未能分享权力的人所渴望。因此，在权力顶端的那个人永远不应该忘记：围在他周围的不是朋友，而是竞争对手，因为永远有人想要取而代之。有时，强者很难完全意识到力量的丧失，因为夺取其权力的一种方法是让他名义上继续挥动着指挥棒，但是他的实际权力已经被削弱或完全剥夺。

11．近水楼台先得月

只要有机会负责分配某些东西，强者会毫不犹豫地把最好的部分留给自己。有时，强者是以神秘莫测的方式做到的；有时，又是以很明显的方式做到的。强国尽可能将这种行为发挥到极致，尤其是利用那些最无助和无知的人，这如同曾在非洲发生过并且仍在发生的那些事情一样。

无知的人无法意识到这种令人愤怒的做法，因为拥有熟练外交手段或高效情报机构的国家知道如何利用这种脆弱性从中渔利，也就是使谈判看起来是建立在互惠互利的基础之上。即使受害国的人民完全了解这种鬼蜮伎俩，也无法摆脱，因为那些强国知道如何压迫甚至贿赂受害国的领导人。

杜兰德线

英国强行划出杜兰德线一事提供了一个典型案例，可以体现强者在谈判时通常如何获得最大利益。英国人于1858年建立了英属印度，而在19世纪末，俄国积极向印度方向扩张，因此，英国人想尽可能在其与俄国之间的空间获得更多土地。为了实现这一目标，他们认为最好的解决方案是建立一个“屏障国家”作为战略缓冲区，就是阿富汗。这样做也能够阻止罗曼诺夫帝国进入梦想的热带海洋——阿拉伯海和印度洋。因此，1893年，英国政府得出结论：需要

在英属印度与其西部邻国阿富汗之间建立官方边界。这项任务交给了英属印度外交大臣亨利·莫蒂默·杜兰德爵士。这位爵士要比被谋杀的两位前任幸运得多。

同年11月11日，莫蒂默·杜兰德与阿富汗埃米尔阿卜杜勒·拉赫曼·汗签署了一项协议。这位埃米尔因此被他的臣民指控为伦敦的傀儡。该协议中，英国做出保证，如果阿富汗遭到任何外部敌人的侵略，英属印度将保护阿富汗人及其王国。11月12日，《杜兰德协议》达成，这使得阿富汗获得英属印度的大量援助。但是，从签署的那一刻起，杜兰德线就成了不断冲突的根源。首先，阿富汗失去了50％以上的领土（整个东部，现在是巴基斯坦的西半部），也失去了出海口，变成了内陆国。杜兰德线还制造了人间悲剧：这条线成了一个人为边界，将位于阿富汗中部和东部的普什图人各部落划分在两个国家，使得主要位于南部的俾路支人骨肉分离。这种划分原则漏洞百出，没有考虑到生活在两边的人，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它已变成了一个重大问题，导致矛盾横生，冲突不断。但是对英国人来说，这一结果是积极的，实现了他们的地缘政治目标：由于杜兰德线所提供的战略纵深，俄国人无法靠近有“王冠上的宝石”之称的印度。在这场英国和俄国争夺中亚控制权的“伟大游戏”当中，真正的输家是阿富汗及其人民。

从签署之日起，阿富汗人就不认可这个协议。阿富汗方面的签字人——埃米尔阿卜杜勒·拉赫曼·汗完全不懂莎士比亚的母语，这份只有一页纸的文件是用英文写成的。也有人认为，该条约有两个副本，用阿富汗的普什图语和达利语写成，但人们却从未见过，是否存在仍然是未知数。火上浇油的是，那些相信存在两个副本的人，也认为这两个副本与英语版本在措辞上略有不同。据说协议的期限是100年，所以一旦这个期限结束，从阿富汗分出的土地必须归还给其合法所有者。但是从巴基斯坦的角度来说，这是不可想象

的，因为那意味着这个国家将不得不放弃其一半的领土，所以喀布尔任何严肃的行动都会立即被巴基斯坦人视为宣战，也就是说，巴基斯坦具有足够的理由做出军事反应。虽然阿富汗政府在随后的条约中确认了杜兰德线的合法性，但是世界历史的这一页仍然是无法抹去的，因为它很容易产生暴力和人道主义灾难。

美国参加“二战”

在“二战”期间，美国政府坚信其必须为了自己的利益而与德国作战。如果希特勒控制欧洲国家并形成统一的欧洲，甚至占有苏联的自然资源和人力资源（这意味着德国将具备技术和原材料的强大组合），那么他将目光转向美国就只是时间问题了。而且对美国来说，德国不仅会成为经济对手，也将成为军事对手。美国坚信，一旦希特勒主导了欧洲并控制了亚洲和非洲的能源矿产之后，将会从南美开始，一步步蚕食美洲大陆。美国政府绝对不允许这种情况出现。然而，直到欧洲在对抗中被充分削弱的时候，美国才出手进行干预。通过这种方式，美国政府确保欧洲国家不会对其利益构成威胁。相反，欧洲国家别无选择，只能屈服于美国的帮助。

还是一样，强者负责发牌，并且拿到最好的牌。众所周知，大鱼最后吃掉小鱼，或者至少是试图吃掉小鱼。小鱼别无选择，只能培养躲避危险的能力，并且将命运交给运气。

12．别人能为你做的，你就不要自己做

成功永远不要靠自己一个人的100％的力量，而要靠100个人中每一个人的1％的力量。

——让·保罗·盖蒂

历史上一直使用的战略之一，就是让别人为你全力投入做事，永远不要亲自做其他人可以为你做的事情。特别是涉及不正当行为时，自己亲自行动可能会暴露。你可以通过给予报酬，让其他人为你做事。通过欺骗和诡计来哄骗他们为你做事，将更有效，因为他们不仅不会有丝毫怀疑，甚至会自愿和热情地完成这项工作。

“精致”的行动通过引入行动者，增加作战筹码。红衣主教儒勒·马札然说：“要确保把需要付出巨大努力而又不会收获名利的任务分配给别人。”可以补充的是，即使能够获得名利，也最好还是找别人来做，只有这样才会带来更大的好处。

私掠船的使用

至少从13世纪开始，西方国家在海上间接实施这一战略的方式之一就是使用私掠船。政府向一些水手提供《委托证明》或《委托书》，授权其为了维护本国利益，可以用绑架、抢劫甚至击沉等方式来对抗敌对国的商船。

这只不过是典型的海盗行为——攻击船只并劫持旅客，抢夺货物或强占船只，有时要求勒索赎金，但是这些行为受到所谓的合法性保护。各国在战争时期使用该战略削弱敌人的经济，迫使他们使用海军舰队来保护海上航线。这样可以使各国暂时增强海军能力而不需要任何支出，因为这些私掠船可以通过抢夺来获利。

17世纪和18世纪，私掠船在西方大国的舰队中占很大比例。私掠活动利润丰厚，并得到了当局的批准。每个国家都有明确规则来分配战利品，通常情况下，出售抢来的船只和货物所产生的利润，会在私掠船长和船员及其代表的国家政府之间分配。即便私掠船的船主不是船长，也会分给船主一部分。

在正式规定私掠船行动的文件当中，通常会指出对外国船只的打击行为应该遵守战争的规则。但实际上，各国政府通常不会规范这些私掠船的行动，除非对其有利。私掠船也有一定的优势，那就是被视为军队的一部分。当然，想要对别国私掠船采取行动的国家并不总是承认它们是军队的一部分，因为它们不想与私掠船背后的国家公开宣战。

使用私掠船的国家主要是英国（英国是最善于使用私掠船的国家）、西班牙、法国和荷兰。也有一些拉丁美洲国家使用私掠船，但是所占比例要小得多。最典型的案例是英国私掠船长——弗朗西斯·德雷克。这位探险家和奴隶主，是继英国政治家兼海军上将胡安·塞巴斯蒂安·埃尔卡诺之后的第二个乘船环游世界的航海家。对于多次受到德雷克私掠船袭击的西班牙人来说，他是彻头彻尾的海盗，还领着英国薪水。而英国人则认为他是英雄，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一世授予他最高荣誉，以表彰他为私掠船事业所做出的重要贡献，并封他为爵士。他曾俘获两艘装满金银的西班牙船只，其中一艘是历史上最值钱的船只。

私掠船的使用在16—18世纪间达到顶峰，一直延续到19世纪。在美国独立战争期间，美国人用私掠船装备了他们的常规海军部队。在18世纪末，法国革命者在大西洋和加勒比海海域使用私掠船封锁美国和英国的航道。在美国南北战争中，北方和南方都通过私掠船行动获益。

为适应当前形势，私掠船的模式与自冷战结束以来激增的私营军事公司无异。政府与私营公司签订合同并授予它们权力，允许它们使用武力为国家谋利。

虚伪旗帜下的行动

事实证明，在人类的所有冲突、战争和对抗中，使用各种各样的战略和手段是司空见惯的。温斯顿·丘吉尔曾说：“战争中真理是如此宝贵，以至于要用谎言来捍卫。”在这种斗争和对抗的背景下，国家和政权所使用的资源之一就是执行归咎于第三方的秘密行动。

虚伪旗帜下的行动简称“伪旗行动”，目的是让第三方对实施的行动负责。第三方国家或第三方组织，可以是自己公开的敌人，也可以是自己潜在的对手；或者是未来盟友的竞争对手，或者是能够与敌人相互对抗和消耗的国家或组织。但是，对其的指控可能只是一个借口，甚至是随机选择的理由。

所采取的具体行动各不相同，可能是恐怖主义袭击，也可能是动用军队进行的攻击或破坏行为（制造火灾、破坏物资等）和颠覆行为。这些行动既可以在物理层面上实施，也可以在通信系统和网络空间中进行，涉及政治和军事领域。

上述行动从本质上来说是秘密行动，因此必须由经过训练的人员来执行。这些行动通常由情报部门策划和指导，或至少由其协调。情报部门将使用自己的人员（在专业技术人员支持下的代理人或操作人员）、军队特种部队成员或为此目的而雇用的其他人员。

必须考虑到，情报部门的隐秘性和专业性对实施上述行动非常有利。情报部门以各种方式直接参与行动，是执行行动的中枢机构。有明显的证据表明，情报部门是这些行动的真正推动者。

如果这些行动是以最秘密的形式进行的，那么这些虚伪旗帜下的行动是如何被曝光的呢？事实是，其中许多行动，无论是历史上的还是现在的，都很难被完全曝光。此外，在许多情况下，很难了解这些行动的确切意图，这也就使得曝光这些行动变得更加困难。

然而，其中一些行动被用文字形式记录下来，因为独立记者和研究人员的分析，以及相关文档的解密（有些行动没有被全部曝光，因为相关数据已经被删除）。在某些情况下，这些行动是因其执行者在临终前悔改而曝光的，或是因为敌对情报部门给予了行动执行者更大利益而使其公布这些行动。

这种特殊行动也经常被用来鼓励人们进行战斗，以及在面对敌对行动时获得人民的支持。普鲁士战略家克劳塞维茨指出，为了军事行动的成功，统治者、军队和人民之间坚实且牢不可破的思想和利益共同体是不可或缺的。实现公民动员的最常见方式是对敌人进行妖魔化，完全诋毁敌人，甚至将敌人描绘成没有人类底线的猛兽，以鼓励全国人民满怀仇恨地与敌人作战。而这一切，通常是利用引发公众舆论的谎言来实现。为了实现这些目的，一些国家通常采用信息战、心理战和通过媒体操纵民众。

在战术领域，可以开展类似于伪旗行动的伪作战，由穿着敌人制服的己方军队实施。这种战略通常是为了获取实地信息、了解对手的活动或消灭对手领导人。正如拿破仑警告的那样："在合适的地点派出一名间谍，其效果超过战场上的两万名士兵。"

历史上，伪旗行动的案例比比皆是，然而只有少数行动被人们所知晓。历史上最著名的伪旗行动是公元64年尼禄在位期间的罗马大火，这场大火最终被归咎于基督徒。在20世纪，有记载的一些伪旗行动，多由日本、德国、英国、土耳其、美国等国的军事或情报部门实施。

现代雇佣兵—私营军事公司

私营军事和保安公司被用来执行一个国家不能或不想直接动用自己的资源去执行的行动。由于冷战结束后军事力量的减少、不对

称冲突的增加，以及西方国家因担心造成军人伤亡，拒绝将其部队投入冲突，在过去20年中对私营军事公司的使用大幅增加。

目前，私营军事公司不仅常常介入军事冲突，而且其行动范围已经扩展到了其他领域。例如，打击毒品贩运和海盗行为，保护非政府组织和联合国提供的人道主义援助，或者在阿富汗、巴基斯坦和伊拉克打击恐怖主义活动。

这些公司通常属于政治和经济权力集团，或与其联系在一起。它们的注册地址通常在避税天堂，并经常更换注册地址以逃避监管。这些公司每年有数百亿美元的收入，并通过购买尖端武器和军事技术，实现武器装备的升级。雇佣军通常来自军队、情报部门和警察部队，但是也有帮派成员，平均年龄在35—40岁。

与正规部队相比，使用雇佣军的优点很多：经济上更节省，不再需要时可以立即终止合同；雇佣军不需要任何形式的社会福利（养老金等），也不需要培训费用；同时还能提供高度的信任，因为雇佣军的大多数成员都是专业人士。同样，雇佣军提供的卓越效率（经验丰富、资源充足等）也确保了秘密行动的保密性，不会因为造成伤亡而受到公众舆论谴责，同时具备高度灵活性和专业化。尤为重要的是，使用雇佣军能够避免战术限制（警告）和责任。

但是，雇佣军也会引起一定的不便，例如违反国际法。在许多情况下，该组织并不遵守相应的劳动法律，用较低的工资雇用发展中国家的人员，还不为他们提供社会福利。

到目前为止，由于各国之间的差异和行业的全球化，以及随之而来的阻碍监督的金融工程和多重利益纠纷，监管雇佣军的努力都是徒劳的。《日内瓦公约》于1977年批准的《使用雇佣军国际公约》不包括监管私营军事和保安公司，主要因为它不符合“雇佣

军”的定义。这同样适用于联合国1989年批准的《反对招募、使用、资助和训练雇佣军国际公约》。《蒙特利尔文件》（2008年）规定了对私营安保行业的监管。虽然有17个国家批准了该文件，但是却无法强制要求各方遵守这些原则。

总之，私营军事和保安公司都是中间媒介，服从各国的经济和政治利益，但是不需要顾及公众舆论，而且各国政府不必为其承担责任。

美国的间接战略

美国在越南战争之后，或许受之前失败的冒险经历影响，已经将直接干预战略改变为更间接的战略，更多地雇用第三方来实现其目的。根据理查德·A. 克拉克的说法，与在朝鲜和越南的做法截然相反，美国借助巴基斯坦军队的情报部门，最终在阿富汗击败了强大的苏联红军。巴基斯坦军队情报部门利用美国、沙特政府和慈善组织所给予的资金，将武装水平还停留在19世纪的阿富汗战士和数千名阿拉伯志愿兵变成了一支劲旅。总的来说，美国每年在阿富汗的战场上花费不超过6亿美元。

2001年，当美国进入阿富汗以针对“9·11”事件进行报复性军事行动时，这种趋势得到了加强。为了消灭塔利班的势力，美国雇用了北方联盟的武装分子，并由少数美国特种作战士兵领导。10年之后，为击败利比亚的卡扎菲，美国将盟国拖入战争。在叙利亚和伊拉克的激烈冲突中，美国主要利用库尔德人与所谓的伊斯兰国战斗。

弗里德曼认为美国应该建立联盟。在这种联盟关系里，其他国家承受较大的对抗或冲突，而美国以经济利益和军事技术对其进行支持，并向它们承诺，在必要时，美国将派出军队。美国前总统奥

巴马所定义的“从后面领导”对这一政策进行了总结。也就是说，继续手持指挥棒，以一种更难以察觉的方式，隐藏美国的影响力。根据竞选期间的演讲，现任美国总统特朗普似乎有兴趣扭转这一趋势，不过当他坐到椭圆形办公室时，还是延续了这一政策。

恐怖分子操纵妇女和儿童

各种恐怖主义团体都会利用妇女和儿童执行各种任务，因为他们认为这样能够更好地实现该组织的目标。这种操纵最典型的做法是让妇女和儿童执行自杀式恐怖主义袭击，正如尼日利亚经常发生的那样，妇女和儿童被迫沦为人体炸弹。

对于恐怖组织来说，使用妇女和儿童进行自杀式袭击具有重要的战术利益。它容易获得世界媒体的关注，其轰动效应远高于男人执行袭击的效果。通过这一点，恐怖组织实现了其主要战略目标：让全世界把目光转向他们的事业。此外，妇女和儿童可以进入通常禁止或限制男性进入的地方，遇到的安全检查更少，无论是在市场、医院还是在街上，她们都更容易伪装。利用妇女和儿童的另一原因是成年男性短缺或成年男性忙于其他工作。

一个残酷的结论是，使用妇女和儿童进行自杀式爆炸是对人类进行操纵和剥削的最极端形式之一。妇女和儿童在恐怖主义组织领导人的手中变成了无足轻重的物品。

把罪行归因于其他人

2002年5月8日7时45分，在巴基斯坦人口最多的港口城市、金融和商业中心——卡拉奇发生了一起离奇的袭击事件。一名司机引爆了一辆装满爆炸物的车辆，在他旁边、停在喜来登酒店门口的是一辆载有5人的巴基斯坦海军大巴车。袭击造成14人遇难，其中11

人是法国舰艇建造局（DCN）的法国雇员，此外还有十几名受伤程度不同的伤员。遇难的法国人的工作是为建造最新一艘Agosta 90B潜艇提供技术援助。1994年，在爱德华·巴拉迪尔担任法国总理期间，法国与巴基斯坦签署了一项合同，向后者出售3艘Agosta 90B潜艇，合同金额为8.2亿欧元。

由于发生在美国的“9·11”事件刚过去不久，舆论第一反应是基地组织发动了这次袭击。6个月后，奥萨马·本·拉登向这次袭击事件发出了一条祝贺信息，使得外界更加猜测是基地组织发动了袭击。事件发生后，巴基斯坦当局立即逮捕了100名嫌疑人，但是几天后又被释放。有趣的是，自杀者的身份从未被确定。2002年7月至12月期间，巴基斯坦警方逮捕了另外3名嫌疑人，其中一人后来成功逃脱。媒体提供的信息显示，被捕的两人是克什米尔境内恐怖主义组织的成员，一个是所谓的炸药制造商，另一个是在袭击发生之前一直待在车内的人。两人于2003年6月30日在卡拉奇被反恐怖主义法庭判处死刑。

直到2009年，这次袭击仍然被法国政府和巴基斯坦政府归咎于基地组织及其分支机构。但是在死者亲属公布为寻求真相而做出的新闻调查后，官方说法开始受到质疑。有人提出了一个假设，即这次恐怖袭击是对中断出售潜艇合同中应支付的佣金费用的报复行为，佣金可能高达约3.27亿欧元（是合法的支付，直到2000年法国立法仍允许在大规模的国际武器销售中收取佣金）。甚至有人怀疑此事与政治献金有关，即流入法国中间商手中的大部分佣金资助了一些政治党派。（类似事情可能也发生在法国与沙特阿拉伯签署武器合同的过程中，特别是签署出售Sawari II护卫舰的合同。）

希拉克就任法国总统几个月后，下令取消了商定的佣金，可能是因为他怀疑这些佣金资助了其竞争对手巴拉迪尔的竞选活动。这一决定导致佣金代理人损失约1.2亿欧元，他们不仅曾承诺将部分

资金交给法国政客，而且还承诺向巴基斯坦人提供大量资金，包括巴基斯坦三军情报局（ISI），这个部门正迫不及待地等待着这笔资金。

大多数研究人员认为，领土监视局（DST）——法国反间谍机构和法国国内安全局（DGSI）的前身，从一开始就已经了解到事实。甚至认为在卡拉奇袭击事件发生前，DST便一直在监视这个网络的人员。这些人员都是一个销售大型武器项目的国际佣金代理网络的成员。DST在第一时间就拒绝提供揭露袭击真实动机的文件，理由是该文件被归类为绝密文件。其目的或许是为了避免法国和巴基斯坦之间的紧张对峙——不是战争对峙，至少也是外交对峙。那时法国恰好需要维持与巴基斯坦的良好关系，因为在“9·11”事件后，巴基斯坦是进入阿富汗的大门。

来自媒体和遇难者家属的压力推动了司法调查。两名法国法官扭转了调查恐怖主义袭击的思路，开始调查可能参与行动的巴基斯坦特勤局的军人和特工。面对关于袭击动机和袭击者身份的不同说法，2009年5月5日，巴基斯坦司法当局释放了被定罪的两名嫌疑人。

最近，其他一些调查显示，巴基斯坦人可能已经发出了一个信号，法国雇员被杀可能与曾和法国女人结婚的美国记者丹尼尔·佩尔有关。2002年1月，这位《华尔街日报》记者被绑架，几周后被绑架者杀害。正如卡拉奇爆炸事件所发生的那样，最初的假设也指向了恐怖分子，但是后来人们发现，绑架者曾向美国当局发出一封信，要求履行美国和巴基斯坦之间签订的关于交付F-16战斗机的合同。

经过多年的司法程序，事实尚不清楚，而且非常可能永远不会清楚。不幸的是，伤者和遇难者亲属笼罩在真相的阴影当中，与被

谋杀的人一起成为这个故事的输家。或许此事只属于许多类似事件中为数不多的被披露的那几件，那些未披露的通常都归因于所谓的“全球恐怖主义”。

邪恶没有旗帜

没有阴谋的理论，只有阴谋的事实。2500年前，希腊剧作家埃斯库罗斯说：“在战争中，第一个受害者是真相。”无论是政治战略领域还是战术领域，此种说法都可以延伸到任何冲突、危机或紧张局势。一些人类群体毫无顾忌，迫切希望将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他人。这种希望驱使他们为实现目标而采取一切手段，而不管这种手段是不是谎言和背叛。

人类的激情已经成为并将继续成为一个永恒的弱点，一旦有机会就会运用阴谋和诡计。技术进步只能用于新的手段和程序，而不能抑制或引导感情，因为受到罪恶折磨的人类灵魂总是易于陷入虚假和残忍。当一个人具有巨大权力时，会因其有决定他人生死的能力而变得骄傲自大，从而更加虚假和残忍。

在整个历史长河中，伪旗行动一直是永恒的，是一种与政治和军队一样古老的做法。指责其他国家、组织或团体犯有事实上并未犯下的罪行，是一直沿用至今的战略，这样做可以为未被公民或盟友许可的行动提供正当理由。一旦生存或利益受到威胁，人类内在的邪恶就会促使他们为赢得对抗而不择手段，哪怕这些手段是最恶劣的。为了成功完成伪旗行动，统治者通常会用情感来激励国民。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会用一个混合了现实和虚构的模糊故事，编造一个戏剧性的蒙太奇，摧毁国民精神防线，使他们不得不站在政府一边。通过这种方式，很容易引起国民对敌人的极大仇恨，并以最凶狠的方式投入战斗。

13．制造敌人

如果没有敌人，就制造敌人。世界上不少群体似乎感到需要有一个对手，能促使自己内部团结，并使自己的努力和雄心有明确的目标。

当一个社会确信自己的存在或既定秩序受到威胁时，往往会建立一种机制以加强其成员之间的团结，使人们服从统治阶级的统治。在领导人的精心管理下，这一战略可以确保百姓——哪怕是那些最热爱和平的百姓，也愿意为了保卫祖国和捍卫自己的生活而呼吁战争，尽管战争组织者的真正目的并非如此。

制造敌人的目的也是为了转移民众对国家内部问题的注意力。历史上，这样的先例非常多。一些西方大国运用该战略是为了控制人口和盟国，以进行世界性扩张，扩大军队和情报部门，促进军事工业发展。

这一战略原则也被用来维持现状。布匿战争期间，罗马元老卡托鼓励罗马人在迦太基变得过于强大并对罗马构成威胁之前，对其发动第三次战争，但这一提议遭到了罗马上层统治机构罗马元老院激烈的反对，尤其是遭到所谓的“西庇阿派”的反对。“西庇阿派”认为消灭迦太基对罗马人不利。他们认为，迦太基是罗马人当时唯一的对手，消灭迦太基会使罗马人被胜利冲昏头脑，导致罗马帝国最终走向衰落。

北约重塑自我

自1991年华沙条约组织解散以来，北大西洋公约组织一直试图重塑自我，以为其继续存在寻找理由。北约逐渐扩大行动领域，超出了1949年《华盛顿条约》第六条规定的范围，认定自己可以在世

界任何地方采取行动。因此，在巴尔干半岛的波斯尼亚、科索沃和塞尔维亚采取行动之后，北约又在阿富汗和利比亚采取行动。最重要的是，北约重新发现了一个强大的对手——俄罗斯。通过设定俄罗斯这个对手，北约可以有理由部署部队和投入资金。

目前，美国一直支持以北约为军事代表的西方国家与俄罗斯保持敌对状态，目的有两个：一是将俄罗斯作为新兴竞争对手加以抑制；二是为欧洲盟国制造一个敌人，以使它们服从美国、向美国寻求保护，并为此而购买武器。美国的地缘战略目的是：防止俄罗斯和欧洲其他国家走到一起。正如弗里德曼所说，俄罗斯和欧洲结盟将产生一种几乎无法控制的力量。

正如我们之前所看到的，俄罗斯和欧洲联盟将意味着出现一个拥有各种能力（技术、能源、人口、市场、文化、军事等）的超级大国组织，这将是对美国政府的一个真正威胁。由此看来，美国利用乌克兰问题挑起欧洲人和俄罗斯人之间对抗的原因，可能是两者不仅在地理上接近，还有共同利益，甚至从历史和文化联系来看，他们本应该成为兄弟。美国成功地说服了欧洲各国领导人。不知道是因为天真还是因为屈服于美国的压力，欧洲各国领导人已经被巧妙地拉入陷阱，一直倾向于使公众舆论支持他们的反俄决策。日益严峻的紧张局势，以及在接近的空间内展示军事实力，最终可能会导致引发公开战争的事件发生，这将使欧洲的土地重新变为战场，给欧洲带来灾难性的后果，使其在几年内无法恢复与其国际影响力相匹配的地位。

军事工业——敌人的母亲

美国为了维持其强大的军事工业，经常煽动大众，制造敌人，这种做法备受批评。伊朗和朝鲜经常被认为是可能攻击其地区竞争对手的狂热国家，这使得周边国家不得不过度购买军备。大多数情

况下这些军备是不必要的，唯一的用途就是为该地区的军备事业做出贡献。例如，沙特出于对伊朗的担忧，在2012年至2014年，成为世界第二大武器买家（仅次于人口总数是其40倍的印度）。2016年更成为第一大买家。同样的情况也发生在阿拉伯联合酋长国，这个国家领土面积较小，人口也只有900万，但是这并不妨碍其在2012年至2016年成为世界第三大武器买家。在亚洲的另一端，为应对假想的朝鲜入侵的威胁（如果长期部署在韩国的25000多名美国士兵受到朝鲜的袭击，将迫使美国直接与朝鲜开战），韩国总是居于世界第十大武器买家的地位。

作为主要武器供应国，美国从中获得了巨额利润。具体而言，美国武器的主要买家中有沙特阿拉伯、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和韩国。武器销售并不是透明的，因为可以用其他产品加以掩盖，如后勤设备、战斗支援设备或两用技术。另外，世界上也没有规范武器买卖的普遍准则。

据拉彼威尔和蒂阿尔介绍，就朝鲜问题而言，美国辩解说其在图勒（格陵兰岛）设置基地是出于这个亚洲国家的核弹道导弹的威胁。但实际上，美国在格陵兰的军事存在只不过是其继续冷战的另一种方式，通过导弹防御系统和其他陆地和海洋武器（海面和水下）复制霸权地缘战略。这就是俄罗斯的看法，俄罗斯认为这些武器的部署只是为了或者至少是为了针对自己。

将卡扎菲妖魔化

西方国家军队于2011年3月19日进攻利比亚之前，对卡扎菲进行了妖魔化报道，其明确目的是让迫在眉睫的军事行动得到公众舆论的支持。在进攻前两周的3月2日，英国记者贾斯汀·马罗齐在英国第二大报纸《每日邮报》发表了一篇文章，称卡扎菲政府不仅有化学武器，还准备使用这些武器。马罗齐认为，利比亚反对派与卡

扎菲对抗是为了在利比亚实施民主，反对派将遭到化学武器和生物武器的屠杀，且卡扎菲不会有任何迟疑。

马罗齐还详细叙述了这些武器对人类产生的可怕影响。为了支持他的推理，他说他的信息来自“西方情报部门的大量军人和专家”——这类文章的常见来源。他还编造了具体的细节，说尽管卡扎菲在2003年承诺销毁这类武器以重返国际社会，但是这个有悖常理的领导人保留了10吨化学产品以制造芥子气，还有650吨其他材料以生产各种化学武器。关于生物武器，这位英国记者援引前利比亚司法部部长的话称，卡扎菲仍然拥有炭疽和神经性毒剂（如沙林），甚至还可能有转基因天花病毒。马罗齐甚至宣称，卡扎菲拥有1000吨铀粉，可以制造出一种原子弹。根据马罗齐的说法，卡扎菲与朝鲜、伊朗、伊拉克等国家有着友好关系，所有这些国家都被列入了美国总统乔治·W. 布什的“邪恶轴心”名单，所以卡扎菲在2003年做出的裁军承诺值得怀疑。这位记者在整篇文章中坚持认为，利比亚反对派的武器装备很差，隐含的意思是要求向反对派提供足够的武器以对抗利比亚的独裁者。简而言之，他鼓励西方公民和领导人攻击卡扎菲政权。必须得说，最终利比亚没有对任何军队、人民使用其所描述的任何武器。

同样是关于利比亚的情况，霍夫在其文章中提供了另一个例子，是关于希拉里在美国总统竞选期间泄露的电子邮件。文中提到，为了获得西方公众舆论对攻击利比亚的支持，她也采取了妖魔化卡扎菲的媒体战略。因此，某些记者报道说，卡扎菲的部队用大规模的强奸行为作为战争工具（甚至为此向部队发放某种药片）。尽管包括国际特赦组织在内的一些国际组织否认了这些指控，但是谣言在整个西方媒体上传播，使西方公民相信了卡扎菲的野蛮行为。有人指责卡扎菲将尸体运到北约轰炸过的地方，然后宣称是西方国家进行的杀戮，这也被证明是错误的。

一切都是针对共同的敌人。制造敌人，使人们相信现在或不久的将来存在与其他社会、意识形态或国家发生冲突的可能性，这不仅是进行社会控制的一种形式，也会使领导者具备非常强大的凝聚力，也许是最强烈的凝聚力。

14. 维持均势

权力的平衡永远不会是静止的平衡，其成分永远处于流动之中。

——基辛格

多年来，西方大国一直在感兴趣的领域寻求和维护平衡的霸权意志，它们想确保任何对手都不会在该领域脱颖而出，从而维护自己的领导地位。英国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在两次世界大战期间，英国的优先目标是维持欧洲的力量平衡，使其他任何国家都没有足够的力量来支配欧洲大陆。因此，英国一直愿意用霸权主义力量支持那些被认为最弱的国家。

奥巴马政府使伊朗成了地区霸主，这对伊拉克、叙利亚、黎巴嫩和也门有直接影响，并对巴林有潜在影响。这使从波斯湾到土耳其的那些逊尼派占多数的国家以及以色列都产生了可以理解的担忧。最有可能的是，特朗普政府将试图重新实现力量的平衡，不过其不会用和平的方式实现。

如果看看大国的手段，那么特朗普在继续奥巴马实施的战略方面做得不够也就不足为奇了。也就是说，在让伊朗和中东的什叶派壮大之后，美国现在转而想要对付他们，从而制造该地区的永久性冲突。分裂的阿拉伯和伊斯兰世界，将无法控制该地区的所有石油和战略通道，这是西方列强在一个多世纪里对该地区实施地缘战略

的目的之一。没有什么奇怪的，正如弗里德曼指出的那样，美国必须尽可能地确保世界和所有地区的力量平衡，以消耗潜在敌人的力量并转移对美国的威胁。

一个奇怪的战略是德国继续在其地缘政治环境实施的战略。根据蒂阿尔的说法，德国试图控制东欧，以防止东欧重新落入俄罗斯之手。为此，在波罗的海、中欧和巴尔干半岛，实行了明确的反俄罗斯政策，以使俄罗斯远离亚得里亚海沿岸。与此同时，德国人也试图与土耳其保持良好关系，以便通过它进入黑海的战略通道。

建立和维持平衡也尤为重要，因为这能够为稳定与和平提供一些保障。至于如何尝试实现这种平衡，法里德·扎卡利亚提供了两套基本方案，虽然是就欧洲情况提出的，却具有普遍适用性。其一是英国的做法，英国曾试图对崛起和有威胁的大国实施一种平衡战略；其二是俾斯麦所采用的那种策略，他选择与所有大国交往并与各大国保持友好关系，进而试图使德国成为欧洲国际体系的中心轴。

基辛格认为，对权力平衡的挑战源于两方面：一是当一个大国的力量提升到可以成为霸权国家的时候；二是当一个国家处于次要地位并想要获得与大国相同的级别时。根据基辛格的说法，在当今世界，随着霸权国家（指美国）的衰落、欧洲的衰弱和世界的分裂，全球大国和区域大国之间正在产生再平衡。

在地缘政治中，大国一直寻求平衡，但平衡总是不稳定的。这就是国际格局总是在变动的原因。

15．有些谎言会持续下去

谎言重复千次，就会变成真理。

——约瑟夫·戈培尔

如果说舆论一直很重要，那么赢得公众舆论、征服“思想和心灵”、赢得思想战争就越来越重要。让社会相信某件事、某个观念的方法是一遍又一遍不厌其烦地重复它。

1933年至1945年间担任纳粹德国国民教育与宣传部部长的约瑟夫·戈培尔就是这么认为的，并说了一句有关这种战略的名言：“如果撒谎，就撒弥天大谎。因为弥天大谎往往具有某种可信的力量。”

对虚假信息进行宣传的做法被一些西方国家政府所效仿。历史上多次出现政府操纵公众舆论以谋利的事件。1981年至1987年间担任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的威廉·J．凯西曾说：“当美国公众所相信的一切都是假的之时，我们的造谣体系便成功了。”在战争中，人们对这种操纵工具的使用愈加频繁。马朗什认为，现代战争的秘密武器之一是提供虚假信息。而富勒认为，宣传战旨在主宰民众的思想和鼓励有利的公众舆论：把敌人变成恶魔，以唤醒每个人潜在的本能；争取中立各方以颠覆对手的公众舆论。

随着新技术的出现和我们对“即时性”信息的依赖，未经分析的信息和缺乏背景的信息大量出现，社会面临着“被洗脑”。这会误导公众舆论。大量的调查和统计也是如此，其结果很容易被操纵。

当损害自己形象的真相不小心被发现且不能否认时，当事人（无论是人还是媒体）会通过攻击信息来源而做出反应。这就是维基解密揭露希拉里的电子邮件后的遭遇，舆论关注的焦点是谁将信息泄露给公众，而不是电子邮件的内容。

作为传播理论先驱之一的哈罗德·德怀特·拉斯韦尔深入研究了“一战”期间对公众的操纵术。其著作《世界大战时期的宣传技巧》中的一个观点是：宣传的实质是利用媒体在人群当中注入一个特定的想法，将公众舆论推向某个方向，以便在不必诉诸暴力的情况下实现个人对特定政治意识形态的依附。似乎我们能得出这样的结论：如果我们没有意识到我们正在被洗脑，那可能是已经被洗过了。

万花筒的千种颜色

每当你发现自己和大多数人站在一边，你就该停下来反思一下。

——马克·吐温

拉蒙·德·坎波亚莫尔在其诗歌《两个灯笼》中写道：“世界看起来是玻璃的颜色。”借用这位西班牙现实主义诗人的话来解释，生命是透过玻璃看到的颜色，是我们观察到的色调。这种色调取决于我们阅读的报纸、看到的电视节目或听到的广播。这些媒体创造了一种“人工”场景，很少与客观现实相吻合。有时我们甚至连一种颜色都察觉不到，只有真相的阴影若隐若现。

换句话说，我们可以用肉眼、望远镜和显微镜观察世界，这些都是有效的观察方式。事实上，我们面对的是万花筒般的镜子，它有吸引力、使人晕头转向，但并不清楚。我们所认为的现实只是一种娱乐，只是为了阻止我们看到幕后发生的事情。正如诺姆·乔姆斯基所说，呈现给我们的世界图景与现实没有丝毫关系，关于每个问题的真相都隐藏在谎言之中。

1807年，美国人约翰·诺维尔致信已经执政6年的美国第三任总统托马斯·杰斐逊。在信中，他请教如何办报纸，因为他打算办一份报纸。

杰斐逊于同年6月14日回信，信中他对当时的媒体进行了批评。关于办报纸，他说："仅限于真实事件和合理原则。但是我担心这样的报纸不会有太多的订阅者。报纸上现在登的消息，没有一样可以相信，置身于这滩浑水中，连真相本身都值得怀疑。这种说假话的实际程度只有那些能够运用今天的谎话来面对事实的人才能知晓。我真的很同情我的同胞们，因为他们从生到死，通过阅读报纸，一直相信自己已经了解了世界上所发生的事件。我要补充一点，那些从不看报纸的人比看报纸的人更了解情况，因为什么都不知道的人比那些脑袋里充满谎言和错误的人更接近真理。"

时至今日，杰斐逊两个多世纪以前写的话不仅没有失去有效性，还可能比以往更加真实。在现代世界中，每个人（至少是较发达国家的人）每天都被海量信息所淹没，其信息量几乎比其祖先一生所获得的信息还多。但是，我们绝不能错误地将接收信息等同于明智，因为真正的智慧基于质疑和自我分析。实际上，信息量越大，虚假信息越多。

里根时代的媒体

大多数人用借来的眼睛看、耳朵听，活在没有品味和未经过判断的信息当中。

——巴尔塔沙·葛拉西安

根据各种解密文件，里根政府曾发起一项心理行动计划，用于对抗苏联在西方国家非常活跃的宣传活动。随着时间推移，这项计

划逐渐得到增强并越来越复杂，旨在影响目标国家的公众舆论以及美国自己的公众舆论（特别是为了克服“越南综合征”），以获得有利于美国利益的民众支持。

制定和实施这一计划的任务被交给了中央情报局，具体由沃尔特·雷蒙德领导的一个专门从事秘密行动的小组负责。这个小组被纳入了国家安全委员会，以加强对它的领导。由于担心苏联在南美洲和中美洲的渗透，美国在哥斯达黎加、古巴、萨尔瓦多、危地马拉、洪都拉斯、尼加拉瓜、巴拿马和秘鲁等国开展了各种宣传和信息操纵活动，也在其他与美国利益高度相关的国家，如阿富汗和菲律宾实施了上述行动。

一些解密文件里提到，这个秘密行动小组曾采取行动，试图影响世界社会主义政党，以及影响在意识形态上接近社会主义的欧洲政党领导人，以维护美国的利益。其中一个重要任务是发现目标国家的脆弱性，为了达到目的，只要有可能，他们就默许和纵容记者和编辑操纵新闻、编造新闻，并抹杀对自己不利的新闻。

1983年1月，美国总统里根签署了关于国家安全的第77号指令，被称为“国家安全公共外交管理指令”。该指令反映了加强与公共外交有关事项的必要性。这些活动随后被归纳为“战略沟通”。

使用造谣手段传播虚假新闻

欺骗别人比让他们相信自己被骗更容易。

——马克·吐温

记者艾德里安·陈在2015年发表的一篇文章中，披露在圣彼得堡有一家名为互联网研究所的俄罗斯公司，该公司显然是在为克里

姆林宫工作，通过散布虚假信息来影响互联网和社交网络。据陈说，这家公司由数百名20多岁薪水丰厚的年轻人组成，他们担任了推手[(6)]。他们应该对在美国传播的一些最臭名昭著的虚假新闻负责。

陈叙述的第一起案例，发生在2014年9月11日的路易斯安那州南部的圣玛丽镇。在“9·11”事件发生13周年之际，一个危言耸听的消息开始传播，消息称在圣玛丽镇的一家化学品加工厂发生了严重事故，并敦促市民采取保护措施。在几分钟内，社交网站Twitter上就有了来自许多不同账户的数百条消息，提供的数据似乎无可辩驳。根据目击者的叙述和图像信息，可以看到火焰吞噬了工厂。一个视频来自附近加油站的安全摄像头，通过这个视频可以看到爆炸的瞬间。通过来自远处的另一个视频，可以看到黑烟柱。

一个没人能看出破绽、经过细心制作的YouTube网站视频显示，一个人在电视上看到了这个消息，为此添加并创建了维基百科页面，该页面显示了视频对象。为了提高可信度，该镇的居民被列为证人。一些主要媒体、记者和政治家，无论是地区的还是国家的，都开始收到关于这场灾难的大量信息。不久之后，在一个精心制作的YouTube视频中，伊斯兰国声称对此次袭击负责。

类似事情并不是第一次发生，在2013年的下半年已经多次发生过，只不过规模较小。在这些事件中，影响最大的是2013年12月13日，人们通过Twitter传播在亚特兰大爆发埃博拉疫情的消息。与圣玛丽镇的情况一样，他们广泛使用了在该区域迅速传播的新闻和错误视频。操作者付出了巨大的努力，正如YouTube视频所示，穿着防护服的医护人员在亚特兰大国际机场运送受害者，甚至看到一个细节：一辆卡车停在一个带有机场标志的停车场。

CNN效应

媒体的全球化导致你被电视洗脑，而互联网为你消除了过去所有的阻力。

——保罗·卡维尔

20世纪90年代出现了媒体引领外交政策的观念。所谓的“CNN效应”来源于这家美国公司的产品——每天24小时播放世界各地正在发生的事情。这种新闻的即时性制造了现实，因为电视频道决定了什么是新闻、什么不是新闻。通过这种方式，媒体成了世界舆论的制造者，对一些国家的内外部政治行动产生了强大影响。

根据一些研究，CNN对某些事件的不断报道对政府决策产生了重大影响，如第一次海湾战争和摩加迪沙的战斗。实际上在20世纪90年代初的索马里内战期间，对饥荒的报道似乎便已说服了乔治·H．W．布什总统派遣28000名士兵以支持人道主义志愿者。而史蒂文·利文斯顿和托德等的研究，显示媒体只是反映了政府的政治意图。在索马里境内的“重建希望行动”中，根据政府计划，媒体报道了来自索马里的消息，政府的计划是引发公众对索马里发生的战争的关注。

口袋人

当不能再通过武力控制人们时，为了使他们不会感觉到自己生活在异化、被压迫的条件下，就必须改变其意识。

——诺姆·乔姆斯基

用于控制和制服人的手段之一，是灌输非理性和令人瘫痪的恐惧感。这种恐惧感只有在强者的保护下才能被克服。这种地缘政治战略就像口袋人的故事——口袋人在黑夜里徘徊，寻找迷路的孩子，然后把他们抓住，放在一个大口袋里。父母用这个故事提醒孩

子们不要晚回家或者独自一人上街。强国也会用这个故事来警示弱国在危险世界中独善其身的弊端，或者用这个故事来引导民众。

这一战略最令人厌恶的论点是“全球恐怖主义”。“全球恐怖主义”实际上只影响了世界部分国家，甚至可以说它对半数欧洲国家来说都不是一个令人担忧的威胁。东欧国家或波罗的海国家都是这么认为的。

“‘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等概念也是如此，这种概念错误地暗示全球大多数国家已经加速核军备竞赛。事实上，除了那些已经拥有核武器的国家外，只有朝鲜和伊朗能够加入这种竞赛，所以扩散这个词显然是夸大其词，“‘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这个概念是完全错误的。

“有组织的犯罪”是另一个例子。虽然对腐败的弱势政府或失败的国家来说这是一个严重的问题，但是对发达国家来说，它只不过是一个社会危害。一旦这些国家认为“有组织的犯罪”的存在是严重的威胁，便会立即修改目前被罪犯利用的宽松法律。如果决定消灭这种犯罪，发达国家就可以在短时间内铲除这种有组织的犯罪。

正如美国记者兼编辑亨利·路易斯·门肯所说：“在某种程度上，政治操作的目的是通过一系列虚构的魑魅魍魉来威胁民众，使人们惊慌失措（并因此而请求保障安全）。”

谁在控制媒体？

证据表明，有一种非常强大的力量将媒体拖向一个独特的思想方向，媒体能够以一种非常有效的方式将任何敢于谴责这种社会控制战略的人击垮。

研究表明，现在有6家公司直接或间接控制全球95％的主要媒体（电视、广播、印刷媒体、电影制片等），这些公司旗下集中了1500份报纸、1100种杂志、2400家出版社、1500个电视频道和9000个广播电台。以下列出包括影院在内的主要媒体集团，要了解它们真正的经济实力几乎是不可能的。

• 美国康卡斯特，世界第一。

• 美国华特迪士尼公司，世界第二。自2000年以来的主席和2005年以来的首席执行官是犹太人罗伯特•艾格。

• 美国时代华纳，世界第三。由犹太人杰拉尔德•M．李文领导。

• 美国二十一世纪福克斯，世界第四。主要股东是鲁伯特•默多克。

• 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国家娱乐公司的主要拥有人和董事会主席——犹太人萨姆纳•雷德斯通，与其家人一起控制哥伦比亚广播公司。

• 美国维亚康姆：美国最大的公司之一。雷德斯通作为国家娱乐公司的大股东和董事会主席，控制维亚康姆。

• 德国贝塔斯曼。

• 巴西环球集团：拉丁美洲第一。

• 美国赫斯特公司。

• 法国拉加代尔集团。

• 美国新闻集团：主要股东是默多克。

• 墨西哥电视公司。

• 日本索尼公司：其媒体业务主要通过索尼美国公司在美国开展，包括索尼公司图片娱乐。

• 法国维旺迪。

可以看到，其中10家是美洲的公司（主要的8家是美国公司）；3家是欧洲的公司（2家法国和1家德国）；亚洲只有1家，但它的媒体业务也是在美国开展的。

过时感知战略

许多国家像公司一样，通过营销和广告，促使社会以越来越快的速度购买、处理和更换消费品，目的是向消费者灌输拥有最新产品的愿望。但是这些新产品并不比以前的产品好多少，灌输这种愿望的目的是使消费者在真正需要产品之前就已经购买了产品。这就是心理学中所谓的“过时感知”。

有趣的是，当前消费社会的宣传已经使人们相信，如有必要可以丢弃仍然完全有用的物品。也就是说，人们采用与其想法和欲望相一致的决策，其准则通常由流行、时尚决定，而把一个常识——用钱满足真实需要扔在了第二位。矛盾的是，欲望将人们与根据其所拥有的东西而虚构的幻想联系在了一起，阻止人们欣赏和享受其能力所及的一切。

谎言和后真相

在一个复杂的社会中，紧迫性和即时性统治普遍存在，进行认真、可靠和公正的分析越来越困难。研究和独立分析变得越来越少。大多数媒体都依赖于信息源，但这些信息源的可靠性却值得怀

疑，它们通常会受某些利益集团的操纵或限制。例如，在未经分析的情况下发布耸人听闻的消息，且优先选择最吸引人但缺乏严谨性的标题。

16. 把大众传媒作为武器

大众传媒的目的不是告知公众发生了什么，而是根据占主导地位的公司的想法来塑造公众舆论。

——诺姆·乔姆斯基

当前不断的信息轰炸创造了一种思维幻想，即我们是完全自由的，我们是自我独立意识的所有者。但是很多时候，我们的思想受到阻碍，以至于无法清晰地思考。我们以为自己在思考，并得出了自己的结论，但是事实却并非如此。

虚假信息之战

即使是最专业的分析家，也可能做出错误的评估，不是因为他们不了解程序，而是因为他们忽略了要分析的信息来自哪里。我们以某种方式——有时是非自愿的方式——获得的信息是片面的、被有意渲染的或缺乏客观性的。信息被完美地用来控制民众并向其强加品味、倾向、思想和生活方式，甚至是可以做什么或者不可以做什么。

即使是那些完全了解情况的人，想要摆脱这类信息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获取替代信息和不同信息源，不仅复杂，还涉及费用问题，尤其是需要更多时间。在我们生活的这个世界里，节奏是如此之快，时间是一种很少有人能买得起的奢侈品。

通过媒体强加主导思想的一个例子是不同国家媒体对关于叙利亚和伊拉克的冲突的报道。这一方面的报道一直由半岛电视台（卡塔尔）、英国广播公司（英国）、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美国）、法国24电视台（法国）和天空新闻（英国）向世界其他电视台提供。新闻机构——路透社（总部设在伦敦，是位于纽约的汤森路透集团旗下的一员）也向世界提供报道。换句话说，报道要么来自盎格鲁—撒克逊国家，要么来自其他两个国家——卡塔尔和法国，这些国家在报道冲突时会为自己的利益考量。

2016年10月30日，路透社报道发生在巴格达市场的汽车炸弹袭击事件时，陷入了发布虚假新闻的丑闻当中。报道称袭击事件造成8人死亡，30多人受伤。然后有人发现播放的视频是不真实的，在视频中可以看到有两个人在策划所谓的袭击，以及爆炸发生后有多人靠近现场并假装成受害者。

主要由英国广播公司和路透社提供的关于朝鲜的消息也是如此，这些消息往往采纳了韩国情报机构提供的信息，显而易见这意味着消息内容有失公正性。

简而言之，世界主要新闻机构对民众收到的最终信息产生了巨大影响，除了那些有能力派出自己记者的新闻媒体外，其他媒体从这些新闻机构引用的消息越来越多。这意味着，在许多情况下，从这些大型发布机构获取新闻的媒体仅是把收到的信息加以制作改编以适应其受众，并不会将其与其他来源进行对比。当前新闻更新迅速，也阻碍了人们对传播的内容进行深入分析。

战争中的媒体操纵

富人发动战争，死去的是穷人。

——让·保罗·萨特

为了鼓励人们接受战争之神的召唤，或者至少让他们不阻止领导人发动战争，领导者通常会进行某些操作。当然，他们相信公理和好运会帮助他们。

对战争事实的歪曲包括如下手段：向民众隐瞒开战的真正理由和相关利益集团；将战争描述成不可避免的、正义的、拯救性的、善意的甚至是人道主义的；承诺以很少的代价或不付出代价就能快速而光荣地获得胜利；把对手塑造成邪恶、荒谬和笨拙的。

为了达到这个目的，领导者必须尽可能地歪曲历史、地理和现实，以造成集体性失忆症。只要人们支持政府的军事行动，或者至少不要公开反对军事行动，那么任何手段都将被视为有效的。

为了达到这些目的，领导者将采用媒体宣传和信息操控的手段。现在的军事行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需要这些手段，以使军事行动看起来是成功的。这些手段看起来只是纯粹军事行动的补充，但是现在它们至少具有相同的重要性，因为战争首先要赢得国内民众的支持和同意，至少民众不反对战争。

领导者坚持不懈地灌输一系列想法，使人们确信他们需要战争，并为最终的伤亡、可能在战斗中造成的灾难以及产生的巨额费用做好心理准备。为了这一目的，最先开展的行动是将对手妖魔化。如果对手的声望已经被质疑，就把对手描述成魔鬼。如果对手已经声名狼藉，就把对手的一切污点曝光或者放大。这样做的意图是，让公民认为，政府必须采取行动来对付这样的怪物，以结束其对平民犯下的卑鄙罪行。

信息行动追求的另一关键目标是组织人们了解领导人开战的真正动机。将混合了经济利益、地缘政治利益甚至个人利益的诉求隐

藏在保卫民众的伞下是很常见的，尽管民众的权利并没有得到尊重。这种做法是对联合国保护责任的扭曲。

如果有人大胆反对这种冒险，很快就会被指控叛国并受到声讨。

在这里不可避免地要提到赫尔曼·戈林说过的话。在纽伦堡审判之际，这位曾被希特勒指定的接班人与美国军事心理学家古斯塔夫·M. 吉尔伯特进行了以下对话。

戈林：为什么人们想要战争？为什么一个衣衫褴褛的贫穷农民要冒着生命危险参加战争？他能获得的最好结果不过是健康地回到自己的农场。当然，普通人不想要战争。俄罗斯人不想，英国人不想，美国人不想，德国人也不想。这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决定国家政策的毕竟是领导人，将人们拖入战争是一件简单的事情。

吉尔伯特：这是有区别的。在一个民主国家，人们可以通过选举产生的代表表达自己的意见，在美国只有国会才能宣战。

戈林：哦，那很好，但是，无论能发出声音还是不能发出声音，人们都随时被领导者牵着鼻子走。很简单，领导者所要做的一切就是告诉人们：他们受到了攻击，并谴责和平主义者缺乏爱国主义，使国家面临危险。这放之四海而皆准。[(7)]

古巴战争期间小报报社的诞生

战争从不宣称自己是战争，而是说只是对杀人狂徒的自卫行为。

——乔治·奥威尔

在1898年的美西战争期间，新闻界在动员美国人方面发挥了关键作用。那些年美国诞生了所谓的“新闻小报”。这种只关注销量的报纸，对古巴发生的任何事件，不管事件本身多么微不足道，都会加以夸大，甚至在没有可以吸引公众的新闻时，还会编造新闻。

那时，主要报纸之间对名声和销量的争夺十分激烈。编辑约瑟夫·普利策和威廉·伦道夫·赫斯特之间的竞争也十分激烈。这种竞争表现为《纽约世界》和《纽约日报》的竞争。正是这种竞争导致了小报的出现。赫斯特对当时驻哈瓦那记者的回应已经超越了今天我们在新闻学院所学习的内容。尽管收到了提供血腥新闻的指示，但是记者发现自己所处的环境十分平静，一无所获。就在那时，赫斯特明确告知记者：“你提供照片，我才能鼓动战争。”

结果是，小报不断鼓动美国民众，让他们督促美国政府与西班牙开战。小报夸大或伪造了西班牙当局在古巴岛上犯下的过激行为，以激发美国民众捍卫古巴人被侵犯的人权。最典型的例子是1898年2月15日美国缅因号战列舰沉没，一系列激进、夸张的媒体宣传活动由此爆发。美国派遣这艘军舰前往古巴的使命是保护美国在岛上的利益，至于该军舰沉没的原因，尽管人们进行了彻底的调查，但是美国从未澄清过。不过，这并不妨碍普利策和赫斯特的报纸煽动同胞对西班牙人的仇恨。他们把西班牙人描述得十分糟糕，将他们视为野蛮人和无情的罪犯。通过新闻轰炸，他们让人们从心底记住了令人震惊的标语口号——“记住缅因号，与西班牙一起下地狱”。这已成为那些想要参战的人的口号。通过操纵美国国民，美国领导人终于发动了战争，这是多年来的经济和地缘政治利益纠纷而引发的战争。

古巴叛乱分子也广泛使用新闻报道的手段，出版了两份免费向民众分发的报纸，以告知民众斗争的进展并获得民众的支持。这种

与民众沟通的方式如此重要，以至于领导独立革命的领袖——古巴将军安东尼奥·马塞奥称这种新闻是起义的炮兵。

媒体为情报部门工作

媒体是地球上最强大的机构。它们有能力使无辜的人有罪，这就是力量。因为它们控制着群众的思想。

——马尔克姆·X

有关媒体和记者为国内外情报机构工作或服务的消息很常见。有人甚至还指出，最出色的新闻调查是情报部门或警方故意泄露的结果。证明这种说法几乎是不可能的，因为很难找到可靠证据，而想要揭露真相并试图将真相公之于众的人常常有生命危险。

这不仅仅是冷战中紧张局势的结果，即使在今天，欧洲许多国家的记者或多或少地直接受某些国家的影响，并为其服务，而且其程度远超过我们的想象。就美国而言，许多研究人员和中央情报局的前雇员都得出这样的结论：从建立至今，中央情报局对美国媒体和外国媒体施加了巨大影响，其目的是修改传播给公众的信息，以有利于美国的利益。

知更鸟行动

一个经典例子是所谓的“知更鸟行动”，该行动于1948年由战略事务办公室（简称“OSS”）转交中央情报局负责。在“二战”期间，OSS已经创建了一个欧洲记者网络。

战争结束后，美国国务院设立了政治协调办公室。该机构于1948年与特别行动办公室合并之后，立即成为中央情报局里发展最快的部门，雇员数量从1949年的302名增长到3年后的2812名，同期

预算从470万美元增加到8200万美元。据研究人员称，这种做法影响到了800多家新闻媒体。

在这次行动的框架内，中央情报局先与一位有影响力的记者或编辑联系，然后由他们负责招募其他记者，这些记者不一定知道替谁工作或为了什么目的而工作。但其中一些记者的观点和文章一定会在数百家媒体反复出现。中央情报局向记者提供机密信息，然后让这些记者写文章并署上自己的姓名。记者们因所写的文章获得了极高的专业声望。相关媒体获得报酬的另一种方式是大量的广告合同。所以，为情报部门利益服务的报纸和电视频道的广告收入大幅增加。

这些旨在影响媒体的活动，目的是向民众传播有利于政府的信息。这些活动一直是并将继续成为情报机构的普遍做法。事实上，这种做法不仅被用于传统的纸媒（报纸和杂志），还被用于电视、广播、电影和文学，近年来也被用于互联网和社交网络。

这种战略的应用范围比想象的更广泛，不仅大国这样做，中等国家甚至小国也试图对著名媒体施加影响，即使一些媒体的影响力仅限于部分区域而不是全球。一种常见的情况是，两个竞争激烈的邻国，会利用它们的情报部门在对手国家发布有利于自己的新闻。

乌多·乌尔夫科特是德国近代杰出的政治分析家和记者。他曾多年担任德国知名报纸《法兰克福汇报》的助理编辑，其政治观点和立场非常有争议。他支持极右翼势力及反对穆斯林，并对西方政治持批评态度。尤为引人注意的是，他在2014年出版的《被收买的记者》一书中说，德国和美国的情报部门贿赂德国的记者，让他们写有利于北约和美国的文章。如果记者们拒绝成为亲西方宣传活动的帮凶，就会面临失去工作的威胁。他还指责美国中央情报局收买德国、澳大利亚、英国、法国、以色列、约旦、新西兰等国的记

者，让他们制造有利于美国的虚假新闻。正是这本书让他失去了在《法兰克福汇报》的职位。乌多·乌尔夫科特说，虽然这本书极为畅销，但是德国的各大媒体上被禁止谈论这本书。任何试图违反这项禁忌的记者都面临立即失去工作的威胁。

在他谈到的众多事件中，乌尔夫科特讲述了德国政府的对外情报部门在2011年代表中央情报局向他提出，如何在他的报纸上插入以下虚假新闻：利比亚总统卡扎菲参与生产有毒气体。为此，德国对外情报部门向他提供了机密信息，以便他能够以自己的名义发布，最终他这样做了。鉴于《法兰克福汇报》的影响，这一消息引起了国际反响。

2017年1月13日，57岁生日的前一周，乌尔夫科特死于心脏衰竭。去世前，他告诉俄罗斯媒体《今日俄罗斯》：“我已经做了大约25年的记者，被教会的是撒谎、背叛，而不是向公众说实话。”他还说：“最近几个月，德国和美国媒体正试图将欧洲拖入与俄罗斯的战争。这是一条不归路，我要站出来坦白：我在过去所做的一切都是不对的——操纵人民，制造针对俄罗斯的宣传；我的同事们过去做过和正在做的事情也是不对的，因为他们允许自己接受贿赂，背叛人民。不仅背叛德国人民，而且背叛全欧洲人民。”他还声称：“大多数美国和欧洲记者都在为情报部门工作；尤其是英国记者，他们与美国人建立了更密切的关系，并与中央情报局合作。”

乌尔夫科特非常担心对俄罗斯发动战争的可能性与日俱增，这可能意味着欧洲的毁灭。他说：“我非常害怕欧洲发生新的战争，我不想再次经历这种事情。战争永远不会是孤立的，总会有人推动它，政治家这样做，记者也是如此。我们背叛了我们的读者，将他们引入战争。我不想继续这样做，我厌倦了这种宣传。我们生活在一个香蕉共和国[(8)]，而不是一个有新闻自由的民主国家。”

乌尔夫科特认为，美国以相对简单的方式直接或间接地操纵德国记者。各种跨大西洋组织跟随德国主要媒体最著名记者的脚步，并接近年轻的新闻记者，诱使他们为自己效劳。这些组织邀请记者访问美国，并为他们支付所有费用。一旦到了那里，记者就被那里的政治力量以某种方式俘获。

对于那些更容易认同美国目标的人，这些组织会寻求与他们合作；为了考验他们，开始会让他们做一些小事。一旦确认了他们对美国事业的忠诚，将会向他们提出更明确的要求，当然也少不了贿赂他们。

许多乌尔夫科特的忠实追随者将他的死亡看作阴谋，认为这是一起中央情报局组织的谋杀案，发生在西方国家和俄罗斯关系紧张的时期，美国以一种“谨慎”的方式消灭了一个令他们讨厌并且与北约和美国立场相反的人。乌尔夫科特曾在多个场合评论说，因为揭露情报部门在新闻界的渗透，他处于危险之中。

17. 同化思想

那些虚妄地认为自己拥有自由的人，是无可救药地被奴役的人。

——约翰·沃尔夫冈·冯·歌德

在当今世界，技术（智能手机、互联网、卫星通信等）的发展使人们的观点更具有多样性，甚至对主流思潮产生冲击。

如果我们详细分析正在发生的事情，将看到我们受到媒体的巨大压力，我们也受到几乎不可能打破的思想潮流的巨大压力。弗洛伊德已经预见到这一点，他指出，压力由“懂得如何获取力量和强制手段的少数人，强加于具有反抗性的多数人”。尽管我们享有自

由，但是我们生活在这样一个世界——在这个世界里，任何我们不想听到的观点都会被排斥；在这个世界里，一个人可以被社会性地“杀死”，可以被逐出所有领域之外，只因为提出了与强加给人们的思想不同的观点。在这个世界里，获得成功的是那些不断重复咒语和陈词滥调而不加思考的人。相反，任何冒险质疑强加的内容，并提出普遍概念的人，注定要遭到最严重的失败。

这种事情也出现在学术领域和会议领域，某些人只因为持有不同观点或者敢于怀疑普遍化的观点，就被“演讲者黑手党”排除在外。“演讲者黑手党”这个封闭的群体，由相互依存的朋友构成，他们以连续方式相互表达相同的想法。只有持相同观点的人，才能进入这个俱乐部。这个俱乐部通常在经济上受到国家情报部门的支持，以传递有利于国家的信息。

因此，出现了很多问题。例如，我们是否真的为自己思考？我们的思考是自主的，还是由别人来告诉我们要思考什么？环境、社会适合我们吗？我们可以有不同的想法吗？是否有可能在先进社会中表达不同的思想？如此多的信息是不是只会让我们变成“高明的傻瓜”？

沉默的螺旋

人们不会反叛的时刻终将到来。他们不会长时间从屏幕上抬起眼睛来关注正在发生的事情。

——乔治·奥威尔

时至今日，伊丽莎白·诺埃勒-诺伊曼于1974年提出的沉默螺旋理论仍然有效。对于这位德国政治学家来说，公众舆论的概念（有人更喜欢称之为“已发表的意见”）只不过是强加于社会的、

对现实的一种特定、有趣的观点。个人别无选择，即使其思维是朝另一个方向发展，也只能调整自己的态度，以适应每个时刻、每个环境的主流趋势。她认为，社会压力对人们有如此强烈的控制，以至于很少有人敢于反对主流思想，因为他们害怕被边缘化，甚至被完全排斥出社会团体。

法国知识分子亚历克西斯·德·托克维尔是古典社会学之父，在18世纪中期解释法国教会的案例时，他也指出了这一现象："那些继续相信教会教义的人害怕因为自己的忠诚而受到孤立，他们害怕的是孤立而不是错误，所以他们宣称赞同多数人的意见。"智利记者鲁本·迪图斯认为，沉默螺旋理论可以通过四个基本假设来解释：人们天生害怕孤立；社会有可能将偏离的个人边缘化；由于这种恐惧，个人试图跟上主流意见；因衡量结果而影响意见的表达或隐瞒。

这导致现在的人们以更间接的方式表达他们真正的想法，其中之一是匿名评论。因此，一个好的社会学实验会分析这些评论，以确定公民的真实想法。这种情况越来越普遍，看其他人对某一观点的评论也很有意思。从这一切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主要媒体喋喋不休地重复的内容，与大多数人的观点大不相同；这些匿名评论及对其的评价是真诚的，因为在匿名评论时，不存在因发表意见而受到侮辱的风险。这种情况已经在一些国家最近的总统选举和民意投票结果中显示出来。虽然主流媒体宣传的是根据民意调查得到的结果，然而实际结果却令人感到惊讶。参与民意调查时，人们表达的也不完全是内心所想，因为担心被认出身份。不过，最后人们投票时，选择的不是强加给自己的，而是自己内心所想的，他们知道投票是完全保密的。

图腾和禁忌

在欺骗行为很普遍的时代，说实话成了一种革命行为。

——乔治·奥威尔

即使在最发达的社会中，西格蒙德·弗洛伊德在《图腾和禁忌》中提出的理论仍然完全有效。他说，历史上所有人类群体都有自己的图腾，它代表了这个族群被识别出来的神圣价值观，也是后来宗教的起源。同样，他们也有禁忌，即被禁止的东西，因为那些东西被认为对族群有害，或者因为其违背了他们的传统和文化，这成了法律法规以及行为准则和道德规范的起源。

虽然“图腾”和“禁忌”这两个词听起来只适合过去，但是它们在现代世界中的重要性超出预期。所有社会仍然有其“神圣”和“禁止”元素，尽管它们已经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变化，与古人并没多大关系。在某些情况下，这些元素的转型异常迅速，比发生过多次变化的前几个世纪快得多。通过这种方式，有些涉及“图腾”与“禁忌”的主题实际上不可能提供另类愿景，即使其有无可争议的科学研究支持，也不会冒着被社会边缘化或无情批评的风险。在技术先进的社会中，昔日的人身暴力已经变为网络暴力，这种暴力可能会对那些遭受痛苦的人造成更大的伤害。

单一思想的胜利表明，灌输比启发更容易。同样重要的是，通常情况下，正是那些为自由而哭泣和斗争的人，试图限制他人的自由。正如诺姆·乔姆斯基所说：“如果你相信言论自由，那就意味着你正是为驳斥你不同意的观点而支持言论自由，否则，你就不会赞成言论自由。”

18. 利用穷人

宗教知道如何与穷人交谈，并吸引他们投入自己的怀抱。

——阿敏·马卢夫

政府通常会说他们做某事或者不做某事是为了贫困者、边缘人群和被排斥在社会之外的人的利益。虽然原则上，国际组织和富裕国家都希望促进贫穷国家的社会、经济、政治发展。然而，这种善行实际上也是用于追求地缘政治目的。许多革命是以穷人的名义发动的，最后革命精英夺取了政权，成了另一个更具压制性的政权。

在许多情况下，一些团体吸纳贫困者、边缘人群，宣扬对他们的物质和精神“救赎”。动员他们非常简单，只需向他们提供一个有吸引力的想法，向他们承诺一个更美好的未来，甚至告诉他们，他们将是拥有特权的，至少不会有什么不平等。谁会不响应如此讨人喜欢的言语呢？特别是今天，媒体有可能知道世界各个角落正在发生的事情，不公正的观念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强烈。尽管内心深处，人们怀疑空口承诺，但是对那些生活在贫困或不稳定之中的人来说，任何一根稻秆都可以成为救命稻草。他们想的是，自己没有什么可损失的，至少还有收获的希望，无论是眼前还是未来。

对奴隶制的操纵

关于美国内战的真正动机，有一种观点认为，废除奴隶制主要是为了获得部分人口的支持，以增强作战能力，而不是亚伯拉罕·林肯所说的理想主义果实。从林肯的一些陈述中可以推断，他对在短期内终结奴隶制甚至实现种族平等持怀疑态度。南方和北方之间的主要矛盾可能是关税标准不一致，林肯提倡保护主义，而南方捍卫自由贸易政策——林肯认为自由贸易政策只会使英国受益。

我们必须牢记，在历史的长河中，奴隶制和经济密切相关。在公元前3500年的苏美尔人著作中，就有关于奴隶作为社会一个阶层

的内容。尽管今天某些地方仍然存在奴隶，但奴隶制度只延续到了19世纪末。

当社会开始积累财富并拥有剩余商品时，就会考虑社会差异化和将人力用于不那么有吸引力的任务。这些富裕的社会认识到将被俘的敌人变为奴隶比杀死他们更有利可图。随着工业革命的发生，这种背景发生了变化，因为生产和劳动的机械化意味着人工劳动不再具有与以往一样的重要性，而且养奴隶比使用机器更昂贵。因此，美国南北战争的主要战略原因或许是以农业为主的南方与以工业为主的北方争夺经济权力。南方以农业为基础并认为畜奴更有利可图；而北方认为奴隶制完全没有必要，甚至是新社会无法承受的负担。

以穷人名义进行的战争和革命

接近那些不幸的人，并把他们抱在怀里！

——何塞·马蒂

列宁说过，穷人、工人和失业者支撑着游击队的事业。事实上，正是这位革命领导者发动穷人，推翻了沙皇政权，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俄国革命爆发的根本原因是社会的不平等、贫穷、政治动荡以及沙皇的无能统治和残酷镇压。例如，1905年1月22日，在圣彼得堡的“血腥星期日”事件中，沙俄帝国卫队镇压了工人的抗议并杀死了数百人，包括妇女和儿童。

有人说革命总是依靠人民主权理论去夺取权力，虽然方式不同，但是右翼极端主义者也利用人民和危机。对于革命者来说，要击败的敌人是富人和特权者，而右翼极端主义运动却把一切错误都归咎于外国人和不同政见者。这就是纳粹的行动方式，他们指责犹

太人应该为“一战”后德国的贫困负责，并谴责一切雅利安人以外的人。在今天的欧洲，在经济和社会危机的背景下，一些人毫不犹豫地指责移民和难民；各种政党为获得更多选票，将移民与安全问题联系在了一起。

有些西方国家将自己视为普遍正义的捍卫者，声称自己寻求善恶之间的明确界限。当然，这些国家总是按照自己的衡量标准来定义捍卫者的概念，并以捍卫人权和消灭贫困的名义为自己的军事行动辩护。虽然在某些情况下，它们也会做一些公益之事，但是其背后却隐藏着更为重要的地缘政治利益。

1798年5月，法国政府派拿破仑·波拿巴率领一支庞大军队征服埃及。法国政坛对埃及感兴趣的理由并不新鲜：在一个世纪前，德国哲学家戈特弗里德·威廉·莱布尼茨曾建议法国的路易十四控制埃及以破坏荷兰在该地区的地缘政治权威。然而，法国这时的敌人是英国，所以路易十四的计划是通过埃及去联合印度攻击英国。该任务的地缘政治目标是破坏英国的影响力和权力，它运用了穷人战略以证明军事干预的合理性。在1797年，法国驻埃及领事就曾表示，由于埃及人民正在受到一个腐败的压迫性政府的迫害，所以进行干预的时候到了。正如安东尼·F. 朗所说，法国大革命思想体系提出有义务去解放那些被落后政府压迫的人。

对该战略的另一种解读是人道主义援助。典型的例子是法国与一些非洲国家（主要是前殖民地国家）的关系：通过人道主义援助、经济往来和军事合作继续保持密切的经济和政治关系。正如政治地理学家雅克·列维所详述的那样，后殖民时期，法国势力在非洲的存在使得法国公司能够获得农产品和矿产资源，并拥有法国定价和管理的金融体系的独家使用权。

人道主义援助具有根本性的副作用，改变了人们的饮食和消费习惯，使他们成了未来潜在的消费者。历史中的大突破、大成就通常是在混乱、灾难、战争等情况下取得的。长期以来，不少人利用混乱、灾难、战争等最迫切的情况，获得了巨大的财富。总有人渴望从穷人身上获利。在非洲、中东甚至在欧洲的难民营，寻求保护的穷人常常被有组织的犯罪集团敲诈和剥削。这些有组织的犯罪集团以帮助为幌子出卖求助者，或者利用他们从事卖淫和毒品走私等犯罪活动。正如法国哲学家和人权活动家让·保罗·萨特所说：“无序是已建立秩序的最好仆人……所有混乱和破坏都会使弱者更弱，富者更富，强者更强。”

由演员乔治·克鲁尼和人权活动家约翰·普伦德加斯特所创立的旨在监督武装冲突期间资金流动的哨兵组织，于2017年6月发布了一份报告。报告指责南苏丹的一些将军和高官在国家陷入混乱且遭受严重人道主义危机的情况下仍然攫取大量财富。具体来讲，南苏丹政府军陆军中将马利克·鲁本·里克的年薪超过了4万美元，他在肯尼亚商业银行常用账户的流动资金超过了300万美元，多笔转账金额甚至超过70万美元。这笔资金可能来自在南苏丹设立的各种外国公司的黑幕交易。对于一个因为战争有250万人流离失所，超过10万人死于饥饿的年轻国家来说，这是一个真正的丑闻。

如果把“干预”和“人道主义援助”两个概念结合在一起，就会得到“人道主义干预”——用英国社会学家马丁·肖的话说，西方一直以此为借口进行军事行动。这些人道主义干预在帮助、拯救穷人和弱者方面或多或少可能是合理的，甚至可能真正是为了促进人类发展和保障人类安全。但是最重要的问题是：为什么只在某些国家实施人道主义干预，而不在其他国家实施？这些问题的答案与为什么利比亚问题适用保护责任原则，而叙利亚或南苏丹问题却不适用保护责任原则的答案相同。

人道主义援助及对贫困人口的援助，也被用于波斯尼亚、科索沃、阿富汗和伊拉克的军事干预行动当中，根本目标是为了实现军事和地缘政治目的。这是根据时任美国国务卿科林·鲍威尔2001年所说的话得出的推论，当时他试图说服非政府组织前往阿富汗作为“倍增力量”为白宫服务。

军事行动与人道主义援助之间的关系复杂，从人道主义行动角度来看，要找到军事行动的理由并不容易。因为人道主义行动的原则基于中立性、公正性和独立性，所以，如果人道主义行动是为军事目标服务，那么这些原则就会受到侵犯，甚至被完全扭曲。但我们也不能忽视一个事实：有时，为了很好地执行任务，人道主义行动需要一支保障其安全的军事力量的支持。

后现代的“老虎”

卡普兰谈到了一种新的后现代的“老虎”，这种“老虎”就是指那些面对真正的不公正而咆哮的人群。他们对战争和以平民为目标的国内冲突咆哮，在面对社会和政治危机时也是如此。“老虎”由来自欠发达国家的渴望改变的公民和来自发达国家的沮丧的年轻人组成。正是在最发达的国家，大多数年轻人有机会获得高等教育，也就产生了更强的挫折感——一个重要的不稳定因素。这些年轻人花费了大量时间和精力接受教育，却无法获得相匹配的工作，他们越来越担忧，越来越感到自己无法成为中产阶级，甚至担心自己陷入贫困。“老虎”同样包括一些老年人，他们担忧自己的未来和后代的未来。如历史上曾经发生过的情况那样，“老虎”可能被某些宗教团体或任何类型的激进团体利用。

19. 挑拨离间

有内部问题的敌人已经成熟，可以被征服。

——马基雅维利

如果不能用武力击败你的敌人，可以尝试在敌人内部挑拨离间，直到敌人原本强大而坚不可摧的墙壁看起来像泥捏的一样。这一战略，与分化敌人和寻找对手的薄弱点一起，已经多次被证明是非常有效的。任何社会，无论表面上如何统一，都会有心怀不满、受到委屈或被边缘化的人，以及可能由于个人问题而试图对社会造成损伤的“有毒的人”。因此，想要征服一个国家，首先关注的不是其地图，而是了解并利用其内部的紧张局势，挑动内部矛盾。其次，有一个非常古老的做法，正如马基雅维利警告的那样：一个成功的入侵战略的起点，在于支持当地少数民族反对多数民族，这样便可削弱其国家的力量。

这种既隐蔽又有效的战略，被一些西方国家广泛使用。例如，在19世纪和20世纪初，英国和其他欧洲国家政府鼓动中东的阿拉伯人发动叛乱以消耗奥斯曼帝国，并向反对土耳其领导人的少数民族提供武器和装备。在同一时期，为了控制中东地区，法国挑动叙利亚两个大城市——阿勒颇和大马士革之间的宿仇，鼓动所有穆斯林少数民族——阿拉维派或德鲁兹派反对逊尼派。通过利用该地区的宗教少数派和少数民族，巴黎实现了对该地区的有效控制。

沃尔特·格利茨认为，具有德国犹太血统的纽约银行家为俄国革命提供了资金，因为他们憎恨沙皇。自1881年亚历山大二世去世以后，俄国政府一直对犹太人实施迫害。德国意识到，如果俄国不发生革命，自己将永远无法在“一战”中获胜，所以德国支持俄国的革命。因此，在“一战”期间，德国皇帝向反对沙皇的代理人提供了4000万到8000万马克的贷款。

在“一战”期间，德国设计了一个在美国和墨西哥之间制造冲突的阴谋。德国外交部部长于1917年1月16日通过电报向德国驻墨

西哥大使建议，如果爆发战争，应该建立德墨联盟。作为对墨西哥向美国发动武装进攻的回报，德国将帮助墨西哥收回已属美国的得克萨斯州、新墨西哥州和亚利桑那州。但是这封电报被英国海军部队截获和破译。

在“二战”期间，德国军事情报局第二处负责一项特殊任务，包括支持外国的叛乱、暴动和破坏运动。1941年，日本特工与印度、马来西亚和缅甸的民族主义团体建立联系，为他们的独立事业提供秘密的支持。出于这些目的，东京于当年1月向日本驻新加坡总领事发了一封电报，命令他激起叛乱，使用政治阴谋，加强宣传和情报。出于同样的目标，从1939年开始，日本人一直在努力挑动英属印度士兵的不满。

所谓的民主国家也经常使用这种战略。1973年在智利发生的推翻社会党总统萨尔瓦多·阿连德的政变中，美国便投入了大量资金。执政的美国民主人士也是如此，即使他们有能力掩盖自己的真正利益。据理查德·A. 克拉克说，在克林顿执政时期，美国国会于1995年底批准了一个秘密议案，为中央情报局的秘密行动提供资金，目的是颠覆伊朗政权。作为反击，伊朗议会公开批准了针对美国的秘密行动资金。

1980年，萨达姆·侯赛因进攻伊朗时所宣称的理由是阿亚图拉·霍梅尼号召在伊拉克占多数的什叶派发动叛乱。这种做法现在也可以复制，因为伊朗可能利用在沙特阿拉伯占少数的什叶派，也可能利用波斯湾沿岸产油国家中的什叶派。这对沙特阿拉伯来说无疑是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特别是在其与伊朗的关系非常紧张的时刻。伊朗人可能在巴林也使用了同样的伎俩，因为动员占多数的什叶派人口对抗他们的逊尼派领导人相对容易。简而言之，通过鼓动内部分裂来破坏这个国家的稳定是保留招数，一旦伊朗感觉自己受到极大威胁时，很可能会使用这一招。至于挑拨离间，乔治·弗里

德曼的理解是，伊朗被高山环抱，几乎不可能通过传统方式入侵。伊朗的边界几乎都是险峻的山脉，只有东部与阿富汗和巴基斯坦接壤地区的山脉不那么高耸。因此，美国只能努力煽动类似推翻苏联政府的革命，却从未取得成功。

美国人总是对抗拒其权威的人采取“挑拨离间”的做法，就像在古巴那样。有证据显示，在美国中央情报局策划的反对卡斯特罗政权的众多行动之中，有一个没有付诸实践的“好时光行动”。行动内容包括：散发色情材料，材料中所描述的场景是卡斯特罗与众多外国美女一起待在一个摆满各种进口食品的房间里。这种材料以传单的形式在哈瓦那散发。传单照片上还印有一句话：“我的食物不同。”这种类型的行动被美国情报部门成功地运用于其他案例中，用败坏一个人声望的方式来降低其影响力。今天，利用社交网络和适当的传媒手段，情报部门可以在不到24小时的时间内毁坏一个人的形象，即使这个人身居高位或享有巨大的社会认可度。

对于伊斯兰世界，乔治·弗里德曼认为美国的战略目标是让其陷入混乱，难以团结在一起。当穆斯林互相争斗时，美国将赢得战争。与此类似的是英国反对欧洲统一的战略，英国认为统一的欧洲对英国的安全构成威胁，英国无法容忍欧洲这个旧大陆在军事上由法国和德国来主导。

年轻人的脆弱性

卡普兰指出，年轻人最有可能推动革命和变革，这种推动力可以用来煽动这些国家的内部颠覆，事实确实如此。自2011年起，阿拉伯各国发生的动乱正是如此。虽然不乏内部原因，但是真正引发动乱的是怀有某种意图的外界力量，而这些意图与参加动乱之人的福祉毫无关系，这在叙利亚的动乱中得到了证明。

事实上，动乱并没有发生在存在着其他地缘政治利益的地方，如巴林，占人口大多数的什叶派受占少数的逊尼派领导，但是并未发生动乱。因为在这里发生动乱既不符合沙特阿拉伯的利益，也不符合美国的利益。如果巴林发生动乱，朱法尔的美国海军基地可能落入伊朗手中，这将使伊朗在控制波斯湾时拥有巨大的优势。

美国在巴林的军事存在始于1950年，当时美国海军租用了英国在1935年建立的朱法尔海军基地。巴林于1971年完全独立，美国与巴林达成协议，以获得对基地的控制权。目前，在该基地常驻约4400名军事和文职雇员，为中央司令部和第五舰队的海军提供服务。2016年11月，英国也在巴林首都麦纳麦建立了一个新的海军基地，以供其空军使用和停靠驱逐舰、扫雷船。

美国在西班牙统治下的古巴挑拨离间

实际上，在1898年美国向西班牙宣战前的近一个世纪内，美国政府已经在支持古巴的持不同政见者和反叛分子。1809年，杰斐逊总统趁法国入侵西班牙之机，在古巴挑起了一次叛乱。他的继任者詹姆斯·麦迪逊于1814年策划了反对西班牙当局的阴谋，不过只得到了在岛上拥有房产的美国人的支持。美国第11任总统詹姆斯·诺克斯·波尔克（1845—1849年任职总统），一个狂热的西班牙的反对者，再一次推动美国业主的叛乱，但是因没有古巴人的支持而失败了。在古巴反抗西班牙殖民统治的十年战争期间（1868—1878年），格兰特总统公开支持古巴人的起义。格罗弗·克利夫兰总统虽然保持明显的中立立场，却没有采取任何措施阻止叛乱分子从美国领土获得后勤供给。最后，威廉·麦金利总统（1897—1901年任职总统）决定支持古巴独立。

为了削弱西班牙在古巴的地位，以满足自己的地缘政治利益和商业利益，1895年11月，美国承认叛乱分子的政府为合法政府。一

个美国工会立即通过古巴人设立在纽约的办公室为该政府提供了300万美元的贷款。此外，华盛顿还向叛乱分子派出军事顾问，指导他们使用火炮。

在西班牙和美国正式开战之前，经常有数十艘船只在美国港口装满了供应品后驶向古巴海岸。西班牙外交部门一直努力阻止美国这样做，美国当局对西班牙的反对完全持消极态度。据估计，在为古巴叛乱分子提供补给的大约80船货物中，只有一半在美国港口被拦截，仅有4艘在靠岸之前被西班牙海军拦截。

通过邮件搬弄是非

1944年至1945年，在“二战”期间，中央情报局的前身——美国战略服务办公室开展了所谓的“玉米片行动”，目的是打击德国人的士气。这一战略包括向德国人发送虚假信件，信件中包含了反对希特勒政权的宣传，因为邮件是在早餐时间派送的，该行动便因此而得名。利用对邮政专用火车的空袭行动，其他飞机在火车残骸附近撒满虚假信件，其目的是让这些信件随后被收集，并被当作真信件派发出去。

美国战略服务办公室从有德国邮政工作经验的纳粹囚犯那里收集有关信息，还从流亡者那里和德国电话簿中收集数据。通过这些方式，美国特工能够确定德国200万名居民的地址。为了达到宣传目的和心理效果，他们在信封内装进颠覆性的材料，信封外面印有希特勒面部的邮票图案被篡改成了头骨的形式，上面的政治性口号“德意志帝国”已经被改为“毁灭的帝国”。

这个行动因如下原因非常不成功。其一，战争阶段，德国一些地区的邮政部门运转极不规律。其二，由于战争，许多德国人不得不离开常住地。其三，因为信件没有回复地址，出于对柏林政府的

忠诚或者因为害怕，大多数收到这些信件的人没打开信件就把它销毁了。其四，信封上的某些拼写错误提醒了德国邮政员工，德国情报部门最终成功阻止了该行动。

美国中央情报局在叙利亚的行动

根据中央情报局1983年9月14日的一份秘密文件，美国情报机构在两伊战争期间采取了许多行动，以反对叙利亚的阿萨德政权。因为叙利亚对美国在黎巴嫩和海湾地区的利益构成了威胁，尤其是因为叙利亚是伊拉克石油管道的缓冲区域，这对减少伊拉克的经济压力从而迫使伊朗结束战争是必要的。为了加强对阿萨德的胁迫，美国秘密地在伊拉克、以色列和土耳其精心策划军事威胁。

该文件还披露：因为叙利亚支持亚美尼亚的恐怖主义，支持土耳其库尔德边境的伊拉克库尔德人，支持在叙利亚北部活动的土耳其恐怖分子，所以，土耳其对叙利亚非常不满。美国利用这种不满情绪，让土耳其政府考虑对叙利亚北部的恐怖主义营地发动单方面军事行动。

该文件还详述了叙利亚如何直接干涉美国在中东的利益，因为叙利亚拒绝从黎巴嫩撤军，使得以色列继续占领该国南部。伊拉克—叙利亚石油管道[(9)]的关闭是导致伊拉克陷入金融灾难的主要因素，加剧了海湾地区战争的国际化危险。该文件补充说，对阿萨德采取的外交手段又失败了，若希望维持在叙利亚的影响力，那么美国就必须通过威胁叙利亚领导人的地位和权力来实现这一目标，主要是军事威胁。

1986年7月30日，由“外国颠覆和不稳定中心”编写的题为《叙利亚：一场戏剧性政治变革地点》的中央情报局秘密文件，则提出了不同的方案，目的是将阿萨德总统赶下台并引起该国的其他

根本变化。该报告已经预见到，政府对逊尼派反对者的轻微行为所采取的过度反应，可能引发重大骚乱，甚至会演变为内战。报告还提到，叙利亚阿拉维派统治的存在，有利于苏联的利益。但是若占多数的逊尼派获得政治控制权，那么苏联的地位将因其对阿拉维派政府的支持而大大受损。至于美国在叙利亚的利益，该文件指出，美国更希望叙利亚政府由逊尼派领导，并愿意保障来自西方的援助和投资。另外，该政府不大可能加剧与以色列的紧张关系。

该文最后警告：叙利亚境内可能存在逊尼派极端主义者夺取政权的风险，最终可能建立一个伊斯兰共和国，并增加对以色列的敌意，还会为恐怖主义团体提供支持和庇护，这些观点在当前仍然有效。多年来，美国一直试图促成叙利亚的政权更迭。根据维基解密中公布的消息，美国驻叙利亚大使馆于2006年12月13日向美国国务院和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发出级别为“秘密”的一份报告，该报告将叙利亚描述为经济稳定但是存在微弱反政府力量的国家。除了通过建清真寺和发展商业活动扩大影响力外，估计伊朗人还积极联络什叶派，并使逊尼派变得更贫穷。集中在叙利亚东北部和大马士革与阿勒颇的库尔德人也被视为可利用的弱点。

该文还提到，尽管叙利亚政府采取行动打击与基地组织有关的团体，但是以叙利亚为基地的极端主义分子有所增加。令人奇怪的是，该文建议将反对叙利亚政权的伊斯兰主义者边缘化，因为很难明确这些团体对叙利亚构成何种危险，尽管从长远来看，这些团体毫无疑问将成为主要威胁。该文建议，将上述弱点转化为干预叙利亚政府决策、颠覆叙利亚政府的机会，并让叙利亚政府为其错误付出代价。

美国在古巴创建了一个颠覆性的社交网络

美国政府破坏古巴稳定政局的最新战略之一是建立一种社会网络，促进古巴青年对哈瓦那政权的抗议。为此，2009年，美国国际开发署被委托创建一个名为ZunZuneo的社交网络。

第一个目标是获取被选为目标的50万古巴公民的数据。这项工作被委托给一家与美国政府有关联的公司。为了维护假面目，其负责人向注册的人发送了有关足球或天气的信息，以及一些吸引年轻人的主题信息。为了迷惑古巴当局，美国政府通过外国机构和两家工具性公司的账户资助了这项操作，其中一家工具性公司在西班牙注册，另一家在开曼群岛注册。

社交网络的管理者还发起了一场宣传活动，并继续设计假广告，使ZunZuneo看起来像一个商业项目。不久，该网站在古巴青年人中流行起来，很多人渴望加入这个诱人的数字世界，它在短时间内拥有了成千上万的用户。但是那些使用它的人并不知道，美国政府未经他们的同意而存储了他们的个人数据。通过这种方式，情报专家分析了用户的性别和年龄，并根据他们与政权的关系将其分为五类。当该社交网络拥有了4万用户时，卡斯特罗对它产生怀疑，并多次试图获取相关信息。最后，鉴于古巴政府对该网络的不信任，其负责人于2012年9月关闭了该网络。

美国如何在敌对国家挑动是非

巴西历史学家、外交政策和国际关系专家路易斯·阿尔伯特·莫尼兹·班德伊拉，对美国政府如何将自己的意志强加给反对其利益的国家进行了独特的分析。由于迫切渴望统治全球，美国会采取一切必要手段来对付任何拒绝屈服于其意志的国家，无论这个国家在欧洲、美洲还是地球上的其他任何地方，也无论其政府的政治派别如何。

莫尼兹认为，美国政府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坚定地想迫使各国走自己划定的路线。他指出，处于衰退时期的霸权势力比扩张阶段更为危险。为了控制“偏离轨道”的国家，美国政府会利用其情报部门、非政府组织和基金会开展心理战，以动摇和推翻那些敢于与自己作对的政府。在所使用的众多战略中，一个重要战略是利用和放大所有国家内部都存在的不满，以制造不稳定和混乱。可能的话，还会制造一种印象，使人们相信这些混乱是自发的和善意的，从而避免产生任何对外界操纵的怀疑。如果最终实现了政府更迭，特别是通过大众需求和民主原则实现的，那么美国就成功了。为了颠覆既定秩序，美国会充分利用媒体、互联网和社交网络，并操纵舆论，促使该国民众发动示威游行，反对该国政府。

莫尼兹表示，为了推翻反对美国的政府并控制其政权，美国正式使用了“政治挑战”一词。其主要内容包括行动规划和民众动员，以攻击敌视和反对美国的国家。从这个角度看，可能不止一个国家正在遭受这种“政治挑战”。

将语言用作搬弄是非的工具

语言常被用来引发分歧，既被用在民族主义和分裂主义的过程中，也被用在战争中。例如，在前南斯拉夫境内，当时的官方语言是塞尔维亚—克罗地亚语，人们对这种语言进行加工，以产生各种不同的语言。因此，波斯尼亚的三个民族，各自讲不同的语言。通过这种方式，本应该作为社会元素的语言多样性，成了政治家追逐权力的工具。

语言多样性可以转变为具有分裂倾向的对抗，在许多情况下，这种对抗已经演变为暴力事件。正如历史多次展示的那样，很容易变成一种螺旋，除非这个螺旋最薄弱的部分被完全毁坏，否则很难逃离。语言所具有的统一或分离作用，甚至比种族或宗教更强大。

网络空间的是非

网络空间被越来越多地用来影响对手的心理，甚至是影响理论上的盟友，最终目的是操纵对手的民众并使其忠于自己。这就是欧洲地缘政治分析权威安赫尔·戈麦斯·德阿格莱达上校所说的“基于感情的行动”。当前的现实导致控制人们的思想成了重心，其手段包括通过信息操作和心理战影响对手的决定能力、信念和意志、价值观等。简而言之，现在，心理效应比物理效应更重要，屏幕的力量赛过一个装甲师。因此，网络空间已经成为现代战场，成为行动的优先战区。

传播虚假信息的典范

2017年3月30日，托马斯·里德向美国参议院情报委员会提交了一份关于俄罗斯将在美国开展信息行动的报告。这些行动是半隐蔽的或隐蔽的情报行动，旨在影响对手的政治决策。

上述报告引用了前联邦德国国家安全部负责此类行动的第十局局长罗尔夫·瓦根布雷斯上校对传播虚假信息的描述。作为这一领域的专家，瓦根布雷斯说：“对于强大的对手，只能通过有条不紊、细致的努力，利用其劣势和该国精英的弱点击败他们。”里德补充道：“实践证明，最有效的方法是利用对手的弱点来击败他们，一定要放大现有的弱点，因为社会越分化，就越容易受到伤害。”

里德认为，国家间第一次大规模的网络间谍活动始于1998年下半年美国政府所谓的“月光迷宫攻击”。自2015年以来，越来越多的间谍活动采取了新的技术方案。2015年5月和6月，发生了名为“沙特电缆”首次公开的虚假信息操作，目的是为了试验新的战

略。它先攻击目标、盗取材料，然后在伪旗下创建特定过滤网页，最后将文件提供给维基解密，以进行伪装及广泛传播。

20．利用宗教

没有宗教，怎能在一个国家里维持秩序？宗教是让平民安静的绝佳方式。

——拿破仑·波拿巴

人类天生能够被形而上学所吸引，这种形而上学在历史上一直被滥用。戈培尔——一个令人毛骨悚然的人物，认识到了操纵的奥秘，他意识到宗教可能是影响地缘政治的重要因素。他说：“必须承认神秘主义者的植物化倾向是存在的。不利用它将是愚蠢的。”

在19世纪末，法国社会学家古斯塔夫·勒庞对人类的群体行为进行了研究。他认为，一个人在群体中行动时失去了知识水平，他的情感会更加激烈。因此，一个人或一群人，因为共同利益、信念或者两者的结合而产生某种共同的感受也就不足为奇了。这些感受包括爱情、仇恨、依附、奉献、恐惧、好奇等，它总能够对大部分人群产生巨大影响。这些感受中的一个重点，便是宗教热情。

宗教战争的背后往往是政治或经济权力的斗争，领导人利用这种宗教热情来怂恿民众为自己服务。正如基辛格所说，宗教在为地缘政治目的服务时就是“武器”。

政治对宗教的操纵并不是什么新鲜事。从古罗马时代到现在，宗教已无数次被用作对某些国家或团体采取行动的借口，这些国家或团体或多或少影响了行动者的政治或经济利益。此外，宗教也成为各种虐待行为、享乐主义者的避难所。正如历史所表明的，在新

教改革之际的16世纪，许多封建领主皈依新教的唯一目的是接管天主教会的财产。

在“一战”期间，奥斯曼帝国的主要宗教领袖宣布发动圣战(10)，并指责俄国、法国和英国袭击哈里发的意图是消灭伊斯兰教，宣称所有国家的穆罕默德传人——包括处于英国、法国或俄国统治下的传人，具有利用自己的身体和财产进行圣战的宗教义务。事实上，正是奥斯曼帝国——一个统一伊斯兰世界的领导者，通过伪装成圣战的战争冲突向各个方向扩张。

宗教和地缘政治里有时会融入某种神圣信念，就像一个国家认为自己是被上帝选中的一样，今天的美国即是如此。在迈入这个千年之际，前巴勒斯坦外交部部长纳比勒·沙阿斯传出消息说美国第43任总统乔治·W．布什已经决定根据上帝的命令在阿富汗进行大规模军事干预，稍后将在伊拉克进行大规模的军事干预。布什的立场并不令人惊讶，因为正如皮埃尔·M．加洛伊斯所说的那样，艾森豪威尔将军于1953年曾宣布说命运赋予美国领导世界的责任。

领导人使用宗教政治法典来鼓励和动员民众，是非常有效的战略。马基雅维利强调，在部队中要保持对宗教的恐惧和尊重，士兵害怕受到人类的惩罚，也害怕受到上帝的惩罚，因而变得更加顺从。马朗什认为没有比高度积极的战士更好的武器了，没有什么比宗教狂热更能鼓舞战士。在这个背景下，认为永恒力量站在自己一边的人不会害怕死亡。

虽然近年来宗派冲突有所增加，但是宗派主义并不是中东分裂的主要原因，甚至从来都不是。尽管逊尼派与什叶派宗教的差异被用来证明和支持外部干预的合理性，但是也门的冲突本身并不是宗教冲突，而是因为两个地区领导大国——沙特阿拉伯和伊朗的地缘政治利益和愿望发生了冲突。

圣战作为战斗的驱动力

一切宗教都不过是支配日常生活的外部力量在人们头脑中的幻想的反映。在这种反映中，人间的力量采取了超人间的形式。

——恩格斯

阿拉伯语“圣战”一词的字面意思是“努力”，在伊斯兰教传统中这个词有宗教和军事的双重含义：其一，打击一个人的基本情绪，如生气或骄傲；其二，捍卫伊斯兰教免受外来侵略。这种双重意义在中世纪已经过时，根据对穆罕默德《圣训》的不同解释，人们建立了不同类型的圣战，例如：心的圣战、语言的圣战、金钱的圣战、剑的圣战等。

公元632年，穆罕默德去世，接替他的哈里发将圣战视为凝聚不同部落群体的一个因素。具体实践中，宗教情感包含着一种引导部落去战斗的方式，人们在战争中受到暗示，变成圣战者。激起宗教热情带来了实际的好处，信众增加，财富增加。所有这一切，加上对被征服者财产权的尊重等措施，确保了新学说的迅速传播。

从那以后，历史上多次发动圣战。19世纪末，当俄国人利用共同的基督徒身份，说服亚美尼亚人与自己一起同土耳其人作战时，土耳其人也利用穆斯林的团结意识对俄国人发动圣战。在“一战”开始时，奥斯曼帝国苏丹向盟军宣布圣战，目的是挑动法国的北非殖民地、英属印度殖民地和埃及殖民地以及俄国高加索和中亚的穆斯林人起义。

而在非洲，领导人为了控制穿越沙漠的交通线路而宣布圣战一事也司空见惯。他们通过这种方式鼓舞战士，使战士们相信自己是为信仰而战。在1809年的富拉尼圣战期间建立的索科托或富拉尼帝国的哈里发就是这样做的。还有人试图在波斯尼亚战争期间呼吁圣

战，但是结果不佳，因为号召力度没有那么强。最近一个宣布全球圣战的是在叙利亚和伊拉克中产生的“伊斯兰国”，尽管已经设法吸引成千上万的战士加入其中，但是他们也并未取得所期望的成功。

圣战组织由领导者、宗教人士、知识分子、虔诚的资产阶级、弱势群体和狂热分子组成。如果用建造一幢大楼来比喻，那么领导者就是提供创意的人、工程的推动者。在宗教团体中，伊玛目负责传播思想，变成了黏合剂，将上层和大众联系在一起，就像建筑的广告商。乌里玛是决定什么符合宗教信仰的人，就像负责质量检查的人。知识分子阐释想法，使其具象化，并对其进行扩展，使普通人也能够理解，他们是建筑师。为了使建筑物变得坚固，资产阶级贡献了金钱，代表了建造者的形象。弱势群体是小工和泥瓦匠。最后，狂热分子是建筑物的管理员，负责最积极的行动。

知识分子由具有扎实的知识背景的人组成，其中许多是大学生。尽管这些大学生接受了培训并具有能力，他们并没有得到社会的认可，这就是他们感到沮丧的原因。对于他们来说，圣战成为促进社会阶层流动的方式。在突尼斯——一个有1000万人口的国家，竟有7000人加入了在叙利亚和伊拉克的“伊斯兰国”。据估计，被视为圣战者的人中40％有过大学学习经历。突尼斯年轻人的沮丧程度很高，他们认为自己无法获得与付出相匹配的回报。工作要么被精英垄断，要么报酬不高。

那些为工程提供资金和为工人提供避难所的人是虔诚的资产阶级成员。这些保守的中产阶级，受到意识形态的高度激励，并参与伊斯兰运动，部分原因是他们担心西方的价值观正在侵蚀他们的社会。

武装的基础是弱势群体。他们是施工的主体，是使建筑物最终成形的泥瓦匠和技术人员。他们被剥夺权利、没有未来、不受国家保护。招募工作旨在激励他们开展斗争，反对不公正和压迫，争取社会变革，建立新秩序，摆脱悲惨生活。他们的边缘化或对边缘化的感觉导致他们探索其他方式，来为自己的生活赋予意义，但是生活往往是偏离轨道的。因此，这种阶级斗争、政治社会革命和宗教热情的混合使他们准备好被召唤。

这种情况不只伊斯兰国家有，在欧洲一些大城市的郊区也时有发生。虽然社会援助已经非常慷慨，但是仍有成千上万的年轻人把自己视为流浪者，感到沮丧，感觉自己脱离了社会——一个接纳了他们的祖父母、父母以及他们自己，却没有给他们身份认同的社会。因此，他们容易被利用，被纳入以宗教目标为幌子的政治行动。他们完全相信所做事业的正义性，他们认为必须不惜一切代价捍卫他们的宗教，即使是献出生命。对他们来说，信仰已成为其存在的最重要意义。

基督教圣战

有上帝的时候，就是一切都被允许的时候。

——拉法尔·桑切斯·菲尔里希奥

从11世纪末到13世纪末发生的八次宗教战争，虽然都由宗教问题引发，但都有政治、社会和经济因素。封建领主利用宗教热情，促使成千上万的人联合打击异教徒和破坏教皇利益的其他团体，并试图开辟与东方进行商品交易的新的贸易路线。除了信仰及对名誉和荣耀的渴望之外，参加宗教战争的西欧领主和骑士也受到了经济利益的驱使，他们尤其想通过获得财富和土地来提高其社会地位。

故事里那些骑士虽然是顶盔掼甲的，但是大部分人都是社会地位非常低的人。

神秘的军事冒险始于伊斯兰教创立之初不断扩张的几年，穆斯林在638年控制了耶路撒冷。教皇格雷戈里六世发起了为前往圣地朝圣的基督徒提供援助的运动。他的继任者乌尔瓦诺二世在这个想法中又加入了一定的地缘政治内容，他不只是将这场运动作为对拜占庭皇帝的支持，还要让教皇完全保留对宗教的绝对领导。

乌尔瓦诺二世在攻陷耶路撒冷两周前就去世了，并未看到圣地落入自己军队的手中。他认为宗教激情和军事战术的巧妙结合带来了极好的结果。大马士革一位穆斯林神职人员也注意到了这种情况，预言叙利亚的任何一个城市都没有足够的力量来抵挡基督徒的冲击。他明白，抵御进攻的唯一方式是创立每个穆斯林都有义务参加的事业，一场捍卫领土和伊斯兰教的斗争，那就是圣战。之后的多年甚至随后几个世纪，人们多次以基督教信仰或穆斯林信仰的名义在圣地发生冲突。尽管有些人的宗教感情是真诚的，但是精神和物质利益都以伊斯兰圣战或基督教圣战的形式结合在一起。

宗教热情和武装战斗的结合催生了宗教骑士团——基督教的圣战者，一个代表是基督和所罗门圣殿的贫苦骑士团——圣殿骑士团。这种新的军事宗教骑士团需要一种学说，以消除那些以宗教名义拥抱十字的人们对于握紧刀剑的抵触。于是，正义战争的概念诞生了。

1128年，鲍德温二世意识到在战斗中使用僧侣战士的优势，派雨果·德·帕英前往欧洲，号召人们加入僧侣队伍并为圣地筹集资金。圣殿骑士团首任团长雨果·德·帕英说，犯罪和内疚不在于行为，而在于意图。因此，为了复仇而夺走敌人的生命是犯罪，而为了精神的纯洁去这样做，就不是犯罪。随后，西多会修道院院长

——克莱尔沃的圣伯纳德写了一部作品《新骑士颂》，成了圣殿骑士团理想的支柱。在这部作品中，圣伯纳德给出了圣战的道理和对异教徒使用暴力的理由："基督骑士凭良心去杀戮，并悄然死去。他去世时就得救了，因为他是为了基督而进行杀戮……他值得拥有无限的荣耀……把所有罪孽的生产者抛弃在主的城市之外，这些罪人梦想从基督徒那里抢夺他们藏在耶路撒冷的宝贵财富，梦想玷污圣城和占有上帝的圣所。"

时间流逝，穆斯林中出现了具有巨大宗教热情的领导人。这些领导人激励他们的部队从基督教异教徒手中夺取他们认为是伊斯兰教财产的任何土地。其中最主要的领导人是库尔德人萨拉丁·尤素夫，他以萨拉丁之名而闻名于东方和西方。对这位穆斯林领袖最具精神影响力的是努尔阿丁。在努尔阿丁统治叙利亚30多年间，将宗教信仰变得极端，认为对先知的模仿即使在最微不足道的细节中也应该适用。他严格遵守信仰，使之成为一个有效的政治因素。他那夸张的奉献，赢得了普通民众的赞赏。奇怪的是，努尔阿丁的做法与乌尔瓦诺二世1095年号召光复圣地的做法并没有多大区别。

"一战"中的犹太人

宗教对穷人来说是真的，对智者来说是假的，对领导者来说是有用的。

——塞涅卡

1917年11月2日，英国外交大臣亚瑟·詹姆斯·贝尔福起草了一封致犹太族群在英国的代表——莱昂内尔·沃尔特·罗斯柴尔德男爵的信。通过这份被称为"贝尔福宣言"的文件，英国政府承诺在"一战"中期通过犹太复国主义运动鼓励在巴勒斯坦为犹太人建立一个"国家"。英国对犹太复国主义的这种慷慨表现有一个隐藏

的目的。英国人相信，由于这份文件，居住在美国和俄国的众多犹太人会向各自的政府施加压力，要求其加强对欧洲战争的参与。

高加索北部

在近代史上，高加索北部的穆斯林多次受地缘政治利益的操纵。高加索在欧洲大陆的东南部，位于黑海和里海之间，是欧洲和亚洲之间的门户，其地缘战略的重要性非常突出。俄国对这一地区的争夺可以追溯到彼得大帝的时代。为了使奥斯曼帝国远离自己，彼得大帝在18世纪来到该地区。从这一刻起，强国利用宗教分歧在该地区谋求利益一直是该地区爆发冲突的根源所在。19世纪，奥斯曼帝国和英国利益之争加剧了东正教与伊斯兰教之间的冲突。对于伦敦来说，主要的利益是防止或至少阻碍俄国向地中海和印度洋以及波斯战略要地扩张，如果俄国实现了其目标，将对印度和欧洲之间的重要动脉构成严重威胁。对于奥斯曼帝国来说，高加索地区的完全伊斯兰化是其向东扩张的关键。

在“二战”期间，德国在该地区也有自己的利益，控制该地区能使其立即获得巴库的石油资源，并继续向伊朗扩张。由于伊朗的重要战略地位和丰富的能源储备，德国一直渴望占领伊朗。因此，柏林鼓励土耳其参加对高加索地区的占领。希特勒设计了一个实现高加索国家独立的计划，并且打算让这片土地的勇士与其并肩作战，这可以使其控制高加索的油井，并完成对英属印度的战略围攻（另一部分是由日本负责）。为此，德国的间谍部门策动高加索北部的穆斯林团体反对苏联，甚至设法让一些人加入了德国军队。

苏联担心发生全面叛乱，决定将高加索北部至少150万名穆斯林驱逐到中亚，甚至还驱逐了红军中绝大多数的高加索北部穆斯林。成千上万的男子、妇女和儿童被驱逐，至少有一半在路上死于

斑疹伤寒。尽管赫鲁晓夫在1956年允许他们回到自己的家乡，但高加索北部穆斯林对俄罗斯的仇恨植根于灵魂深处。

今天，这个地区仍然是一个世界性的火药桶。经济和地缘战略因素使俄罗斯和美国都认为该地区是战略要地。不仅因为它处在欧洲和亚洲之间，还因为它富含碳氢化合物和铀矿床。长期以来，俄罗斯一直怀疑美国会利用这个地区的不稳定性来阻止其向南扩张。失去对该地区的控制，将使俄罗斯面临一些主要能源供应被切断的危险。考虑到这一点，俄罗斯公开指责亲西方的格鲁吉亚支持一些与俄罗斯对抗的高加索北部穆斯林群体。俄罗斯甚至无条件地为伊朗的核发展提供支持，可能也是因为担心一旦撤回支持，伊朗将支持高加索北部地区的圣战者，尽管伊朗至今还没有采取这种做法。

纳粹德国对伊斯兰教的利用

我们有足够的宗教理由互相仇恨，我们没有足够的宗教理由互相热爱。

——乔纳森·斯威夫特

在“二战”期间，第三帝国想要博得伊斯兰世界，特别是阿拉伯人的同情，承诺如果阿拉伯人与德国一起反对盟军，将帮助他们从法国和英国等大国的殖民统治下独立。德国在与苏联开战之后，也向高加索等地区作出了帮助其独立的承诺，使他们加入对抗苏联的斗争中。

训练穆斯林志愿者组成部队的想法来自党卫军头子海因里希·希姆莱。一些历史学家认为，希姆莱这样做并不完全基于纯粹的战略原因，他自己也倾向于伊斯兰教。德军中的穆斯林部队特别引人注目。845德国-阿拉伯步兵营就是其中一个，该部队起源于1943年

1月建立的德国-阿拉伯部队指挥部（德语缩写为KODAT）。它由两个突尼斯营、一个阿尔及利亚营和一个摩洛哥营组成，并由德国军官和士官指挥。这支有3000多名士兵的穆斯林队伍得到了耶路撒冷大穆夫提的批准。德军在北非战役中失败后，该队伍被迫进入意大利避难。进入意大利领土后，改编为上述的845营。这支队伍最初有600人，来自不同的伊斯兰国家。包括居住在法国的阿拉伯移民及叙利亚、伊拉克、埃及、约旦和巴勒斯坦的志愿者，他们组成的第二营加入了845营。

由穆斯林组成的德国部队中最著名的是党卫军第十三“弯刀”武装山地师。它属于武装党卫队，于1943年2月创建，由来自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以及克罗地亚的穆斯林志愿者组成。其主要任务是与后来成为南斯拉夫国家首脑的铁托领导下的游击队进行战斗。几个月后，一支拥有两万多兵力的部队建成了，其士兵们都佩戴一个绿色的土耳其帽，每个营都配有一个阿訇，每个团配有一个毛拉。

1944年，德国人在巴尔干地区建立了另一个由穆斯林组成的师。该师由阿尔巴尼亚人组成，称为斯坎德培师。德军于1941年进入苏联后，高加索地区的穆斯林也被纳粹用作进攻力量。当年12月，他们开始用从苏联手中解放出来的穆斯林战俘组成部队。同样，用克里米亚鞑靼人和伏尔加鞑靼人，以及其他来自中亚的穆斯林创建了部队。

德国用苏联控制地区的穆斯林组建部队的目的之一是试图让土耳其加入德国一方，对于实现控制中东和高加索所需油井的目标来说，这将是一个巨大的优势。事实上，在1942年，德国军队发动了以夺取高加索油田为目标的“蓝色行动”，但是因缺少部队使得最初的成功没有得到巩固。而土耳其则保持了含糊不清的中立立场。1939年10月，土耳其与英法两国签署了互助协议。但是当希特勒的

军事进攻看起来不可阻挡时，土耳其人开始接近德国人，这种关系深深地扰乱了盟军。1945年3月，当德国的失败开始变得明显和迫在眉睫时，土耳其向德国和日本宣战。

希特勒的军队中有犹太人

虽然有些矛盾，但是一些历史学家声称，“二战”期间约有15万犹太人在德国武装部队服役。这些士兵大多数都不是“纯粹的”犹太人，只是混血家庭的后代。1940年4月8日，政府免除了这些半犹太人在国防军中服役的义务，入伍的人都是自愿的，甚至接受过长时间的调查。据估计，这些犹太人中有大约3万人因战争中的表现被授勋，大约有两万人获得晋升，有人甚至成为将军。最突出的案例是在1974年至1982年担任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总理的赫尔穆特·施密特，尽管其有四分之一的犹太血统，却曾获得过一等中尉的军衔。

以信仰的名义

争夺权力的斗争并非是为了捍卫价值观；相反，价值观被用来为获得权力而服务。

——尼古拉斯·J. 斯皮克曼

把宗教作为战争武器或利用宗教为某一行为辩护是一种常用的做法。狂热的宗教人士努力去说服其信徒，并不意味着其与信徒的真正利益相同，甚至他们的真正利益通常与宗教信仰毫不相关。其隐藏的目标主要是政治、经济方面的内容，而这些内容往往隐藏在令人眼花缭乱的信仰之中。

历史表明，许多精英利用宗教热情为自己谋利。对于大多数人而言，宗教热情更多地取决于感性因素，而不是理性因素，而这种感性因素往往又不是很正确。普通人的宗教情感已经被用作实现地缘政治目的的推动力。或许，唯一的安慰就是本杰明·富兰克林的话：“如果有了宗教，人类还如此邪恶，那么没有宗教会怎么样呢？”

21．万事留余地

与敌人和解的大门总是敞开的。

——巴尔塔沙·葛拉西安

在《用兵之道》中，马基雅维利警告说，永远不要让敌人绝望，因为这将使敌人变得无法预测和更加危险。没有比在洞穴底部、走投无路的熊更危险的敌人，因为绝望会激起它的潜力。正如中国古代军事家孙武所建议的那样：“围师贵阙，穷寇勿迫，此用兵之法也。”这种情况发生在各国民众身上，当除了死亡之外没有别的出路时，他们的决心和力量会增强。这同样适用于国际关系和地缘政治。

所有这一切给我们带来了关于网开一面的战略格言：我们必须始终向对手敞开大门，以免把他逼到完全绝望的极端。

诺尔巴往事

诺尔巴建于公元前5世纪，能够俯瞰庞廷沼泽区。由于这个城市与沃尔西人的土地相邻，战略位置重要，罗马在公元前492年对该城市殖民。在沃尔西人战败并与罗马对抗多年后，诺尔巴遭遇了一系列的战争，战争持续了150年，被称为“拉丁战争”。后来，

罗马共和国的内战期间所发生的一切导致了诺尔巴的终结。希望成为独裁者的罗马将军西拉率领超过4万人的军队进入意大利半岛。那时，诺尔巴人民对其他被征服城市的命运已有耳闻：居民解除武装后被分尸，城市被移交给了掠夺者。面对敌人的残暴行径，尚未陷落的城市顽强抵抗。诺尔巴因其结局而闻名于世。

在没有替代方案的情况下，当西拉的部队闯入这个城市时，市民自杀或互杀，以避免落入敌人手中。随后他们还将这座城市烧成灰烬，避免敌人获得战利品或展开报复。最后，尽管西拉努力重建这座城市，但是它已经失去了战略意义，被普利尼奥长老认定为一个已经消失的城市。如果侵略者能够网开一面，也许这个城市会投降，其战略价值就能得以保留。当然，让它以有尊严的方式失败，效果会更好。就像罗马征服者在其他城市所做的一样，如果被侵略者主动投降，罗马就会给予他们权利，留下土地，以保证他们能够提供贡品和士兵。

努曼西亚——卓越的历史榜样

如果罗马领导人在公元前4世纪读过中国的《孙子兵法》，肯定不会迫使伊比利亚城市努曼西亚顽强抵抗。《孙子兵法》建议，不要攻击绝望的敌人，而应该为其留下一条生路。后来，“努曼西亚抵抗”被用来形容处于危险境地却决绝抵抗的人。

在距离现在的索里亚市几千米远的塞尔梯贝里亚市所发生的事情，在今天仍然值得借鉴。公元前133年的夏天，小西庇阿——普布利乌斯·科尔内利乌斯·西庇阿·埃米利安努斯所统帅的罗马军队围攻这座城市，这个城市的居民宁可自杀也不投降。这些勇敢的塞尔梯贝里亚人和罗马人之间的冲突由来已久。罗马人20年中多次进攻这个城市，但是都被当地人击退。伟大的罗马共和国渴望结束这种屈辱，罗马元老院便决定摧毁这个无礼的城镇。首先，他们用

各种障碍物把这个城市围起来，如坑、塔、栅栏和大堤。他们修建了又高又厚、长约10千米的城墙，每30米设置一个塔楼，配备弩弓和弹射器，由弓箭手和投石手看守。罗马人希望像以前无数次发生的那样，受围困的居民被饥饿和疾病折磨，很快就会祈求怜悯。但是，当罗马人看到努曼西亚人宁可集体自杀也不投降时，惊得都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努曼西亚人和村庄一起走向毁灭，只剩下了灰烬。

西庇阿能够享受到的，不过是以胜利者的姿态押着被俘的50多名努曼西亚人走过罗马的街道。但是从那一刻起，努曼西亚的名字已经在历史书上被铭记。

地缘政治的“逃生阀”

在复杂的国际舞台上，应该有调节国家冲突的“逃生阀”，这样就可以防止紧张局势的加剧。典型例子是冷战期间的代理人战争或仆从国战争。它是指两个或多个国家间接利用第三方对抗，从而避免直接对抗，主要是通过私人团体、雇佣军或间谍进行的。冷战时期，许多国家都利用了这种代理人战争。这种情况发生在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中，美国和苏联各支持一方，向他们提供资源，以便在内战中获胜，尽管后面隐藏了两国争夺世界霸权的地缘政治企图。

代理人战争避免了两个可以毁灭对方的核国家之间的直接对抗，进而避免了毁灭性世界大战的爆发。

22. “好好先生”

夸人总比骂人强。

——西班牙谚语

好好先生战略是指所做之事不仅符合共同利益或社会期待，还能维护自己的利益而不使他人产生疑虑、控制而不引起反对、征服，不造成局面紧张。这个战略非常有效，可以迷惑对手，以最狡猾的方式，实现自身利益。

好好先生很像变色龙，它知道如何伪装。在武力方面，好好先生战略很被动，不直接对暴力做出反应，但这是一种积极的不反应战略，因为应用这种战略的人能够继续实现其计划，运用智力手段解除强大对手的武装。

原则上，对于那些没有任何其他办法或没有足够能力的人来说，好好先生战略似乎是恰当的。但是，这种战略有时不会成功，因为需要很长的过渡期。最重要的是，我们永远不要忘记，没有比放火的恶魔更糟糕的恶魔。

软实力

约瑟夫·奈在20世纪80年代后期提出“软实力”这个概念，指一个国家不诉诸武力便能说服别国为自己做事的能力。这位美国地缘政治学家于2004年重新提出这一想法，并将其应用于“9·11”事件后的美国外交。奈认为，如果想要强迫别国改变长期偏好和态度，各国就必须将软实力和硬实力结合起来。

在企业、基金会、大学和其他民间机构的帮助下，美国将其价值观和世界观输出到世界其他地方。美国的电影产品在各大洲备受欢迎，美国的故事和美国人的生活方式影响了其他人。正如奈所说，美国既注重赢得战争，也注重征服思想和心灵。基辛格也曾说

过："无论多么巧妙的外交政策，如果只是诞生于少数人的头脑中，那么它既不会成功，也不会进入任何人的心里。"

美国的野心

根据巴西历史学家莫尼兹·班德伊拉的说法，自柏林墙倒塌和苏联解体以来的历届美国总统，无论属于哪个政党，都只考虑一个目标：对世界的全面统治。其思想基础是，美国有义务在全球宣扬民主、基本自由和人权，必要时甚至可以违背接受者的意愿，并用血与火来实现这一目标。

这种救世主观点使白宫的主人毫不怀疑美国在拯救世界、保障世界和平与安全方面扮演着不可或缺的角色，以为自己是在履行命运赋予它的神圣使命。莫尼兹所述与基辛格一致，基辛格说："美国的使命是在必要时通过使用武力来实现民主。"这句话并不缺乏论据，美国自1776年诞生以来，只有21年没有参与任何战争。

在大肆宣扬的利他主义外表背后，隐藏着美国的经济利益需求和根深蒂固的地缘政治野心。无论总统是温和的还是严厉的，他的背后总是站着占主导地位的经济精英。莫尼兹指出，精英们利用金融业、军事工业集团、情报机构、巨大财富家族、强大的宗教势力以及包括能源公司在内的跨国公司等赋予他们的权力，促成了历届政府的重大的世界性决策。

莫尼兹说，每当华盛顿挥舞自由和民主的旗帜，介入世界事务时，其目的都是继续保持其在地球上的主导地位，而结果总是一样的：混乱、暴力、破坏和灾难。

美国对陆、海、空、太空和网络空间的总体控制政策始于克林顿政府所实施的"美国新世纪计划"，其主要目标之一是扩大北

约。乔治·W．布什在全球反恐战争的背景下推动这项计划，奥巴马通过参与所谓的“阿拉伯之春”行动以及对利比亚的袭击继续这项计划。

奥巴马的8年任期形象地诠释了“好好先生战略”。作为第一位入主白宫的非洲裔美国人，一场全球性的媒体宣传活动为他打造了友善、谦虚和宽容的人物形象，不仅修复了其前任布什对美国声望所造成的损害，还掩盖了前几任美国总统的霸权主义倾向。莫尼兹回忆说，奥巴马虽将“永久战争”修改为“国外应急行动”，但行事方式不变，甚至更加恶毒。在许多情况下，它的行动是隐蔽的，例如使用特种作战部队或无人机进行袭击。更何况，美国不仅在阿富汗、伊拉克和叙利亚投下成千上万枚炸弹，还向沙特阿拉伯出售大量的武器。在2015年，调查新闻局编写的一份报告估计，自前一年起，仅在巴基斯坦境内就发生了414次无人机袭击，其中“被消灭目标”的人数是2445—3945名。这些人中，421—960个“目标”是平民，其中还包括172—207名未成年人。据说，美国政府将在无人机袭击地区遇害的所有男性都称为“战斗人员”。

23．创造需要

毫无疑问，伊拉克政权仍然拥有有史以来最致命的武器。

——乔治·W．布什

当某人拥有或者可以轻松获取一个东西时，激发别人对这个东西的需求，可能是最好的获利方式。在市场经济中，营销者要分析消费者的行为，确定他们的需求，并制定涵盖这些需求的战略，从而吸引顾客，并使其成为老顾客。当这些需求不存在时，要创造需求。事实上，最受赞赏的营销大师是那些在客户还没有提出需求之前就开发产品的人。地缘政治也是如此。

根据马斯洛需求理论，当人类最基本的需求得到满足后，就会发展另一种更高层次的需求。这可以扩展到国际舞台。当一个国家有或多或少的紧迫性需求时，如果另一个国家可以识别并利用这些需求，甚至促进需求的增加，就能为自己谋利。例如，一个国家，无论多么仁慈和平和，都必须保护自己免受潜在敌人的侵害。同时，总会有一个军火工业发达的国家，愿意主动为其提供军火。如果前者并不特别相信自己有这种需要，后者就会发出警告或暗示，促使其扩张军备。

艾略特·温伯格收集了一些信息，说明为了说服公众相信入侵伊拉克的必要性和紧迫性，美国政府是如何编造数据的。温伯格认为，来自尼日尔的浓缩氧化铀问题是一个骗局。据说，发现的物质不能用于制造核武器，移动生物实验室实际上生产了用于气象气球的氦气，无人机舰队只包括一个不起作用的巨大模型，萨达姆没有自己的地下掩体迷宫……最可笑的是，2001年至2005年，美国国务卿科林·鲍威尔的“可靠信息”的主要来源是10年前一位研究生撰写的一篇分析文章。

这里，我们有必要回顾一下军火工业在美国的重要性。根据美国国会研究服务处的一项研究，仅在2015年，美国就售出了460亿美元的武器。五角大楼证实，2016年的军售保持了同等水平（给出的数字是将近340亿美元，但是没有包含向科威特、卡塔尔和巴林销售的其他70亿美元，由于预算的原因，它们都包含在2017年的项目中）。仅奥巴马政府执政的8年间，就批准出售了超过2780亿美元的武器，比布什任内多出一倍多。这些武器中的大部分都以打击恐怖主义或保护自己免受来自伊朗意外攻击的名义销往中东国家。事实上，根据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的研究，在2012年至2016年，购买武器的主力是沙特阿拉伯（据估计，在奥巴马8年任期内，美国向其出售了约1200亿美元的武器装备）、阿拉伯联合酋长

国和土耳其。2017年5月，特朗普紧随前任总统的脚步，向沙特出售了价值1100亿美元的武器。一个月后，在海湾危机中，他卖给卡塔尔36架F-15战斗机，价值120亿美元。在向中东盟国出售武器的同时，白宫利用伊朗和沙特阿拉伯之间争夺地区霸权的斗争，加强了对可能攻击美国的人的封锁和孤立。

主流政治话语倡导和平与进步性裁军，但是当人们知道仅仅美国每年就有数百亿美元军售时，这种政治话语就显得空洞极了。虽然一些国家的领导人在国际论坛上倡导和平，但是这些国家的国防预算却在增加。在目前正在进行的任何冲突中使用武器，是宣传军事产品优点的最好方式，叙利亚成了新设备的试验场。

这种创造需要的战略，清楚地表明经济利益如何影响国际政治。毕竟，这些几乎具有无限生产能力的大国，明白大规模的生产依赖于大规模的消费。无论多么令人难过，战争一直是一个带来“繁荣”的事业。

24. “疯子”

改变你的行为，这让其他人感到困惑，尤其是你的竞争对手。

——巴尔塔沙·葛拉西安

历史上，许多著名人物都采用了近乎疯狂的伎俩摆脱困境或达到目的。如今，许多人都采用这种战略，以便在不利的环境中取得成功。这应用了道家的原则，该原则认为任何人都不想要缺乏价值和效用的物品。许多社会学实验证明了这个原则的有效性。例如，将相同的物品遗弃在街道上，但是在某些情况下标明其购买价格，而在其他情况下不标。大多数情况下，只有当人们认为他们可以拥

有超出内在价值的经济价值时，才会拿走这个物品。这个战略同样也可以应用于地缘政治领域。

“疯子”尼克松

正如尼克松和基辛格所说，疯子战略是这位美国总统在冷战背景下的外交政策的一个特征，其目的是结束越南战争。这种战略依赖于他所拥有的庞大核武库。他不得不采取不规则和令人不安的行动，以便让世界上其他国家相信他疯狂至极，甚至有可能使用核武器。换句话说，就是为了吓唬其他国家的领导人，使他们别无选择地顺从美国总统的意愿。

在1968年的总统竞选期间，尼克松承诺结束越南战争。但是他担任总统一年后，战争仍在继续，苏联支持的北越与美国支持的南越没有达成任何和平协议的迹象。因此，尼克松决定使用他的秘密武器，即疯子战略。媒体散布谣言，说他是一个激进暴力的反共产主义者，他不怕按下核按钮。这种形象是由尼克松本人和他的国家安全顾问基辛格精心雕琢而成的，关于他精神状态不佳的谣言也是两人的共同杰作。

在基辛格的学术文章里，这个战略自20世纪50年代中期就已经随着核武器军备竞赛流传开来。1972年4月19日，尼克松告诉基辛格，希望由他向苏联领导人传达信息。根据五角大楼的文件和白宫的录音带，当天下午，这位国务卿在苏联驻美国大使的陪同下飞往莫斯科。飞行期间，基辛格和尼克松进行了电话通话，被苏联大使听到。在电话中，美国总统威胁说，如有必要，将轰炸北越。他想让苏联人相信他能胜任一切，基辛格也是这样传达信息的，并呼吁苏联人和他一起阻止尼克松的“疯狂”。

内阁负责人哈里·罗宾斯·霍尔德曼描述了尼克松对这一战略的骄傲。他解释了尼克松如何让北越人相信，他已经准备好采取一切行动来结束战争，并认为胡志明会屈服于美国。但是北越人更精明，并已做好牺牲的准备，没有落入陷阱里。其间，双方互有昂贵和破坏性的军事行动，如1972年圣诞节的轰炸行动。在“后卫II”行动中（12月18日至29日，25日除外），美国在越南北部（主要是河内）投下至少20000吨炸药。官方数据显示有1600名北越人丧生，但据估计，死亡人数不止这些。最后，1973年1月8日，双方都坐在了巴黎的和平谈判桌旁。

特朗普是否采用了这种战略？

我们必须想方设法，使我们的每一项行动都能为我们提供伟大人物和优秀天才的名声。

——马基雅维利

2017年4月7日，美国用从两艘驱逐舰发射的59枚战斧巡航导弹，袭击了叙利亚的沙伊拉特空军基地，理由是巴沙尔·阿萨德政权对叙利亚公民使用化学武器。前一天，特朗普多年来一直对叙利亚所保持的政治立场发生了180度的转变。美国总统之前多次在中东国家采取与军事干预相反的立场，也不愿意让美国人参与任何并不会直接对美国国家安全构成影响的任何冒险。

突然间，特朗普让世界大吃一惊，他没有事先与盟友商量，也没有对事实进行独立和客观的调查，就对一个主权国家发动突然袭击。除了地缘政治因素（与俄罗斯的竞争，制止伊朗在该地区的扩张，遏制什叶派集团对以色列的威胁）和内部政治利益（在选举过程中有关其与普京关系的争论，来自共和党内部和其他游说团体的

压力），特朗普本可以使用疯子战略。那样的话，他就会表现出一种战略上的不可预测性，以便使其潜在对手处于一种焦虑状态。

目前，不确定的是，特朗普是否会履行他的承诺，使美国陷入某种孤立主义，或者恰恰相反，将会开始一个坚定的干涉主义阶段。但是毫无疑问，这种疯子战略将会让其获得惊喜，这是任何成功的地缘政治和军事行动必须满足的一个特点。

25. 协同作用

众所周知，共同努力的总和大于单独行事能够获得的结果，这被称为“协同作用”。在地缘政治领域，国家间的协同表现在永久性的或为特定时刻和特定情况而创立的联合体或联盟，如联合国、北约等，也包括为了共同利益而失去部分权力的联盟，例如欧盟。联盟的目的多种多样，包括维护和平与安全、相互防御、保持经济优势等。

超级大国也会被迫加入某些联合体，不过，加入条件是该联合体由它领导，就像美国一样。事实上，布热津斯基认为，美国的全球霸权主要得到了全球性联盟体系的支持。

有时，国家间的结合是相对不自然的，也就是说，成员具有意识形态差异，是共同敌人或共同利益促成了结合。基辛格举了一个例子：为对抗共同的对手——美国，伊朗与塔利班政权甚至基地组织之间达成的某种有限合作或默契。

伊朗伊斯兰革命的必要性被解释为允许逊尼派和什叶派分裂以外的合作以促进更广泛的反西方利益，包括向逊尼派的圣战组织——哈马斯提供武器以对抗以色列，根据一些分析家的说法，也包

括与阿富汗塔利班的合作。基辛格补充说，一些报道表明，基地组织的特工也得到了伊朗的某些支持。

有时，联盟会受到一些强大的外部压力，这些压力来自某些国家或非国家力量。在“一战”前夕，俾斯麦认为中欧的一个潜在主导国家不断冒着风险，诱导所有其他国家加入联盟，就像18世纪反对路易十四和19世纪初反对拿破仑的联盟一样。在同一个欧洲，英国已经依靠针对共同敌人的军事联盟来反对试图统治该大陆的国家。

在当今高度复杂和不可预测的世界，由于面对气候变化、流行病、有组织犯罪等普遍威胁，各国对伙伴关系的需求正在增长，尽管伙伴关系总是暂时的。

26. “香槟杯”

如果你要组织派对，请确保你的仆人能够获得一些好处。

——儒勒·马札然

这里说的香槟杯，类似盖茨比的盛大派对上搭成大金字塔形的香槟杯，香槟从最上面的香槟杯一直流到最下面的香槟杯。如果所有客人的杯子都是满的，没有人会抱怨。在政治与国际关系中，都会发生同样的事情。香槟杯战略的核心思想在于分享，或使参与者相信，他们在分享权力、想法、文化和资源。记住，要让最底层的参与者也能感受到这种分享，以避免出现抗议和革命。

在社会中，如果最底层的人也能收到这种金黄色的液体，哪怕数量更少、温度更低，社会的金字塔才会保持稳定。确保利益惠及社会所有成员就足够了，这样会使民众对政府的总体满意度尽可能提高，从而促进社会和谐。

面包和马戏团

在古希腊，城市最富有的人为所有公民组织节日和宴会，以缓和阶级之间不平等的矛盾，这便是“面包和马戏团”思想的起源。它描述了为整个城市做好事的意愿。在罗马，“面包和马戏团”的应用是不同的，因为社会不依靠贵族公民的财富来生存，而是依靠征服。卡普兰得出的结论是，罗马帝国给予其国民自由是为了阻止他们反抗。皇帝想在国民当中保持声望，而皇帝和他的臣民之间的联系和交汇点在马戏团中体现出来。控制国民的一种方法是，让他们感到自己参与了大事，与他们分享品味、表演、财富、胜利等。因此，国民不会质疑阶级不平等、战争等问题。

事实上，“面包和马戏团”这一概念是由罗马诗人尤文纳构思的，每日的面包和频繁的角斗士游戏使人们感到高兴，并分散了对国内外政治的注意力，这将有效缓解国内矛盾。

今天仍然有许多“面包和马戏团”的例子，也有“人民鸦片”的例子。一些人将罗马帝国与美国社会进行比较：快餐、宣扬暴力的影视节目以及对战士的偶像崇拜，使大多数美国人不会怀疑军事干预和用来杀人的无人机的合理性。

没有香槟，石油也可以

说起金黄色的香槟，我想起了我们这个时代的液体黄金——石油。2005年，沙特阿拉伯制订了一项计划，每年有20万名沙特阿拉伯人可以出国留学，所有费用都由国家用石油收入支付。该计划已经实施了十几年，但是由于原油价格下跌，沙特阿拉伯现在面临赤字问题。2011年，科威特向每位公民提供3500美元，加剧了海湾富国与中东其他国家之间的差距。每个科威特公民都有权获得政府给予的房屋或婚后购买房屋的贷款，目前等待的人有几十万。当无法

继续享有这一福利时，所有人都会认为液态黄金停留在了顶部，底层的杯子将是空的，口渴的饮酒者最终会摧毁整个玻璃杯金字塔。

27. “驴子和鞍子”

农夫可能清楚，有一些驴子总是撕咬和蹦跳，避免有人给它套上鞍子。一开始农夫用棍棒或胡萝卜让驴子屈服，但是过了一段时间，由于它们是如此固执，屈服变得不可能了。也许它们的叛逆、执着最终使它们避开驮货的负担，不过，因为无法为主人服务，它们也有可能被杀死，这是倔驴必须承担的风险。

另一些驴子则相反，它们很快就会接受鞍子。有些驴子将被爱抚和称赞，被主人称为最有效率的、最特别的、最勇敢的、最幸运的驴子。这个可怜的家伙永远不会放弃身上的负担。如果有一天，它累了、痛了或者老去了，想要摆脱沉重的行李，驴夫会指责它是一个忘恩负义的叛徒，会打它，让它老老实实地继续工作。即使它不反抗，当它不可避免地变得无用时，也会被送往屠宰场。尽管驴子曾经做过很多贡献，但是一旦它们提出抗议时，没有人会再喜欢它们，反而会非常讨厌它们，对它们的贡献更没有丝毫感谢。

军事的鞍子

没有经过意识形态培训的士兵是潜在的罪犯。

——托马斯·桑卡拉

完美的驴子不仅不会抗议，还会为鞍子给它带来的生活感到高兴。所有职业军人都是如此，他们相信自己的工作具有重大意义，必要时他们愿意为这个使命献出自己的生命。对于那些为保护同胞而选择军人职业的人，佩德罗·卡尔德隆·德·拉巴尔卡把他们的

职业称为“诚实人的一种宗教”。这没有任何批评之意，如果存在批评之意，也是针对那些为了一己私利而发出命令的人。

许多军人通常忽略战争所隐藏的利益——首先是地缘政治利益和经济利益。这些利益与发动战争所用的口号几乎没有任何关系。

地缘政治的鞍子

在地缘政治层面上，一些进行军事冒险的国家也同样如此。这些冒险通常与这些国家和其人民的真正需要和利益没有多大关系，它们这样做只是为了取悦那些请求与它们合作的大国。尽管在某些情况下，这些军事行动更具象征性而非有效性。然而，对于这些国家来说，套上这些不必要的鞍子可能是一个可怕的负担，因为最终它们很可能把那些没有必要得罪的人变成自己的敌人。

今天，在世界各地与和平有关的行动或各种低强度冲突中，我们可以找到许多例子。这些例子给人的印象是，有些国家没有认真考虑它们在这些行动中的使命。这些行动只会让行动的发起者受益。

战争宣传

所有的战争宣传，所有的呐喊、谎言和仇恨，总是来自不参加战争的人。

——乔治·奥威尔

法国作家加布里埃尔·切瓦利耶在其自传体小说《恐惧》中，以极端的现实主义和严酷的态度描述了他和同伴作为士兵参加“一战”时所经历的艰辛。他们在战壕中痛苦得几乎无法生存，既害怕死亡，又期待命令。与此同时，那些利用权势逃避前线的人和那些

从战争中获益的人，却拔高了战争的价值，并鼓励他们继续英勇战斗。切瓦利耶在介绍中评论：

在前线时，我还年轻，他们宣称战争是净化和救赎。而我们看到的事实是：黑市交易、谴责与背叛、枪击和酷刑、传染病和饥荒，当然，还有英雄主义。但是，占极小比例的英雄主义并不能拯救占极大比例的邪恶。另一方面，真正的英雄很少。

切瓦利耶痛苦地指出，人是愚蠢无知的，他们的痛苦来自于此。他们不喜欢独立思考，一味盲从。人类是温顺的羔羊，这使军队和战争成为可能。人类成了自己的愚蠢与谦卑的受害者。

战争是一场骗局

只有当富裕阶层认为战争对他们有利时，才会支持战争。

——乔治·奥威尔

美国人克里斯·赫奇斯是一位资深战地记者和普利策奖获得者。他在一篇题为《真正的敌人在内部》的文章中表示，我们最大的敌人是军国主义者和从战争中受益的人。他们把由种族主义衍生出来的恐惧作为废除公民自由、镇压不同政见者和扼杀民主的工具。战争只能使像洛克希德·马丁公司、雷神公司和诺斯罗普·格鲁曼公司这样的企业致富。军事力量的存在使得全球性大公司能够扩大市场，掠夺石油、矿产和其他自然资源，同时保持对人民的镇压，即使他们已经被腐朽和野蛮的政权榨干。美国将军史沫特莱·达林顿·巴特勒更能说出战争背后隐藏的真实情况。巴特勒将军从未当过普通士兵，时至今日仍然是美国海军陆战队历史上最年轻的少将和获得荣誉最高的军人。1935年退役后，他发表了一场演说，

后来变成了一本书——《战争是一个球拍》，也可译为《战争是一场骗局》。

这本书谴责了那些为了华尔街的利益而动用美国武装部队的行为，详细介绍了美国是如何干预拉丁美洲以满足美国主要公司利益的。这些公司利用纳税人所供养的军队，为自己谋利。巴特勒将军说道：

战争是一种欺诈行为。一直都是这样。战争可能是最古老的、最容易赚钱的，也肯定是最恶毒的。一些人在战争中获得了巨大的财富。在“一战”期间，在美国至少有21000人成为百万富翁或亿万富翁。这些百万富翁中有多少人曾背着步枪？他们中有多少人挖过一条战壕？有多少人知道在一个老鼠肆虐的庇护所中饥饿意味着什么？是否经历过诚惶诚恐地躲避手榴弹、弹片和机枪子弹的不眠之夜？有多少人挡住了敌人的刺刀？有多少人在战斗中受伤或死亡？……战争使战胜国获得更多领土。新领土立即被少数人占用，这些人也是利用战争的鲜血获得美元的人，而付出代价的人是人民。

在书中，巴特勒总结了自己的军事生涯和所忍受的“鞍子”：

我曾在美国武装部队最具战斗力的单位——海军陆战队中服役30年零4个月。我的感觉是，我像一个高素质的强盗，一直在为华尔街的大公司和银行家服务。总之，我一直是为资本主义服务的匪徒。通过这种方式，在1914年，我确保了美国在墨西哥特别是坦皮科的石油利益安全。在我的帮助下，美国将古巴变成了一个花旗银行可以在那里平静地攫取好处的国家。我为布朗兄弟哈里曼国际银行公司参加了1902年至1912年在尼加拉瓜的“清洁”活动。1916年，我为了美国的大制糖商，给多米尼加共和国送去了“文明”。1923年，为了美国水果公司的利益，我“整顿”了洪都拉斯的事

务。1927年，在中国，我加强了标准石油的利益。我获得了奖章和晋升。但是当我望向未来时，我想我可以给阿尔·卡彭一些建议。他作为一名黑帮分子，在一个城市的3个地区开展活动。作为一名海军陆战队员，我在3个大洲开展活动。国旗跟着美元走，士兵们跟着国旗走。

毫无疑问，对于一个感到沮丧的英雄来说，这是痛苦而具有讽刺意味的话，因为他被操纵，为了与人们所说的荣誉和国家概念无关的目的而战斗。但是这些话语也是勇气的见证。巴特勒将军是一个独特的例子，很少有军人——哪怕是已经退休的军人——有勇气以这种方式进行表达，即使他们对战争的真正原因了然于胸。

为了避免被别人套上“鞍子”，一个人需要有个性、有自己的标准、有广泛的知识和一定的能力。不过，环境和社会压力有时候让人难以拒绝“鞍子”，甚至有人自愿被套上“鞍子”，为了他们眼中的幸福生活。

---

(1) 估计还有6000多枚核弹头等待被拆除，这是一个特别费力和昂贵的过程。有大约4000件核武器可以使用，另外1800件核武器处于高警戒状态以便能够快速使用。许多核武器被拆除，不是出于人道主义原因，而是出于经济原因，因为其在可操作情况下的维护是非常繁重的。无论如何，我们不可能确切地知道完全可以使用的核武器的数量，因为这是一个国家严格保护的机密。

(2) 一些专家将此数字提高到60，但是没有提供确凿的证据。不同专家和专业机构提供的数字介于50千吨至300千吨之间。大多数人认为小于100千吨，很可能接近60千吨。

(3) 《赛克斯—皮科协定》是英国和法国于1916年5月16日签署的一项秘密协议。该协定事先得到了俄国的同意。目的是在奥斯曼帝国战败后，划分中东地区的势力和控制范围。通过该协定，法国将控制黎巴嫩、叙利亚和伊拉克北部；英国将控制外约旦和伊拉克南部；受到国际共管的巴勒斯坦没有被列入独立的阿拉伯地区。1917年十月革命之后，由于有关巴勒斯坦的内容不符合其利益，苏维埃俄国退出该协定。该协定在“一战”后得到了国际联盟的认可。

(4) 同样的是，奥巴马曾表示支持马克龙。欧洲媒体认为，这位美国前总统对法国政治家马克龙的支持是鼓舞人心的。

(5) 2017年2月22日，南非一家法院宣布因为政府事先未与议会协商，所以其决定违反宪法。当年3月8日，南非撤回了退出国际刑事法院的请求。

(6) 推手：在数字世界中，发布具有挑衅性、不相关性的虚假消息的个人或组织，其目的是制造麻烦并影响其他用户的反应。

(7) 吉尔伯特是美国陆军军官和情报人员，懂德语，在囚禁德国空军总司令、盖世太保创始人戈林的监狱里担任心理学家。谈话于1946年4月18日发生在囚禁戈林的牢房里，没有证人，也与司法程序无关。吉尔伯特在日记中记录了这一对话。

(8) 指有强大外国势力介入的非民主国家。

(9) 这条800千米长的管道由苏联于1952年4月建造和开通，始于伊拉克的基尔库克油田，接入叙利亚海岸的巴尼亚斯。这是美国在2003年入侵伊拉克期间，遭受轰炸的首批目标之一，以剥夺萨达姆的重要收入来源。

(10) 在阿拉伯语中，“圣战（yihad）”一词是阳性的。不过西班牙皇家学院却将它与西班牙语的阴性名词“guerra santa（圣战）”联系在了一起。本书在以阴性形式提到圣战时，是指guerra santa的概念。

第五章　足以致命的错误：统治世界的教训

> 虽然几个世纪以来，我们一直在重复说：“我们必须学习过去，以免重蹈覆辙，并创造更美好的未来。”但是，大家总是犯同样的错误，一次又一次地重犯那些古老的错误。

1. 忽视各国人民的特质

情报分析的基础是，绝不能根据犹太教和基督教的感性判断他人。

——亚历山大·德·马朗什

无论是进行商业合作还是战争，了解其他民族的文化传统、思维方式以及生活方式十分重要。在不了解一个民族特性的情况下与其开战是愚蠢的。作战之前，必须了解这个民族的历史、价值观、行为方式等。《孙子兵法》里讲：“知彼知己，百战不殆；不知彼而知己，一胜一负；不知彼，不知己，每战必殆。”

迈克尔·霍华德认为，历史上的所有战争有一个共同因素，即作战方对战争的倾向。这种倾向有时仅限于统治精英阶层，有时会扩展到整体社会。有些人认为通过武装冲突解决问题是自然的、不可避免的和公平的。正如皮埃尔·塞文特所指出的那样，地域文化对人类行为有显著影响，每一个社会的观念受到其结构、文化和历史的影响。出于这个原因，即使全球化倾向于某种程度上的同质化，也不会出现两个以完全相同的方式思考和行事的民族。即使知道这一点，问题通常还是源自没有人有兴趣了解“他人”，包括了解和理解他们的心态、关注点和愿望。这种由于狂妄自大和资本罪

孽而导致的对他人的不理解和蔑视，是那些已经摒弃了当前先进和进化标志的文化固有的特征，正如现在西方世界所发生的那样。

霍华德指出，尽管并不同情敌人，也应该去了解敌人的问题。这可以概括为冷漠的同情心，它意味着理解别人的立场，但自己不去捍卫或分享这些立场。这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因为不是所有国家或民族都会换位思考。

误解比比皆是

2003年，在开始入侵伊拉克之前，大多数英美媒体认为，伊拉克人将用鲜花迎接英国和美国军队，抵抗也将会很快崩溃。

——索马斯·米尔恩

尽管历史提供了经验教训，但是在阿富汗、巴基斯坦、伊拉克和也门一再发生同样的错误。这些都是近年来系统性爆炸和无人机袭击激增的地方，为未来的几十年埋下了冲突的祸根。

在西方国家，人们普遍对东方特别是伊斯兰国家一无所知。根据佩德罗·赫兰兹的说法，在大多数问题上，东方人的视角与西方人不同。塔奇曼指出了同样的分化，他认为东方的语言习惯于隐藏实质内容，有时甚至没有实质内容。

马基雅维利在《君主论》中指出，即使拥有强大的军队，为了进入一个地区，统治者也必须始终得到其居民的支持，因此要了解这些居民的特性。他举了法国国王路易十二的一个例子。这位国王花了很短的时间征服米兰，而失去米兰也同样用了很短的时间，因为那些为他敞开大门的人在对他们的信念和未来的福祉感到失望之后，就不能再忍受这位新君主了。就像色诺芬所说的那样，人们会奋起反抗那些想要统治他们的人。

苏联人就没有充分重视阿富汗人民的特性。在阿富汗战争期间（1979—1989年），苏联犯下的错误导致至少15000名士兵死亡（确切的数字仍然是国家秘密）。尽管以前从未在大战中遭遇失败，但是苏联却被装备较差和无组织的民兵击败了。

作为对“9·11”事件的回应，华盛顿决定对阿富汗进行军事干预，这是一种缺乏远见的表现。美国领导人应该更加关注好莱坞的一部电影《第一滴血3》。这部电影于苏联从阿富汗撤军前的1988年上映。它颂扬了阿富汗战士反抗苏联入侵者的壮举。陶德曼上校的导师被苏联俘虏，越南老兵兰博去营救他。当陶德曼被苏联军官审问时，他对审讯他的人说：

“你们低估了你们的敌人；如果你们知道他们的历史，你们就知道，这些人从未向任何人投降过，他们宁愿死，也不愿被入侵的军队奴役；你们无法击败这样的人民。我们在越南犯过这样的错误，现在轮到你们了。”

这部由彼得·麦克唐纳执导的电影是为了“向阿富汗勇敢的圣战者”致敬。但是这种情况并不是唯一的。1985年，美国总统里根在白宫椭圆形办公室会见了阿富汗圣战者，并公开表示：“这些绅士是像美国创始人一样的道德楷模。”事实上，这种表达方式虽然夸张，却是1982年所谓的将哥伦比亚航天飞机“奉献给为自由而勇敢战斗的阿富汗战士”的翻版。

一直被误解的普什图人

一个想复仇的人，总会阻止自己的伤口愈合。

——弗朗西斯·培根

普什图人目前有4000多万（阿富汗有1380万，巴基斯坦有2660万）。1893年，当英国决定将杜兰德线作为阿富汗和英属印度分界线时，普什图人就被分在了两个国家。当时，在阿富汗有普什图、塔吉克、哈扎拉、乌兹别克和土库曼等民族，仅仅在普什图人当中就有60个不同的部落。后来，在这60个部落当中又产生了另外4个完全不同的部落。由于只有对家庭或氏 族负责的政治结构，这个组织一直为其独立感到自豪，这就是为什么各个部落从未接受在喀布尔所建立的政权。

普什图人有5个多世纪的历史，也有人认为希腊历史学家希罗多德在大约2500年前记录了他们的存在。这个传奇民族所遵循的法律，是他们口头流传的准则——普什图瓦里。该准则收集了他们社会中真正作为支柱的一些原则：melmastia，意味着热情好客的责任和对客人的保护；nanawati，意味着为逃犯提供庇护；badal，意味着对任何侮辱、盗窃财产、侵犯个人或家庭声誉以及伤害或杀害亲属的复仇。

大多数西方人都很难理解最后一个关于复仇的概念，尤其是在那些复仇行为不常见的国家。在天主教的传统中，人们几乎不可能理解复仇的意义。在这些社会中，当有人成为受害者时，无论多么严重，受害者被灌输的思想是宽恕，而不是复仇。

当一个普什图人认为自己是受害者时，特别是有近亲因此死亡时，无论需要多长时间，他都有义务报复。每当普什图营地遭到空袭或一群普什图人被无人机轰炸时，他们的家人就不得不对袭击国的士兵或公民进行报复。

英国作家奥尔德斯·赫胥黎曾这样说：“现代战争以难以想象的速度和广度在进行最大程度的破坏，其所造成的不公正现象远远大于其所要修正的不公正现象……战争不会结束战争，在大多数情

况下，它们会导致不公正的和平，这使得复仇战争会不可避免地爆发。”

不屈不挠的阿富汗人

其实，只要多阅读史书，就可以避免苏联人和美国人过去所犯的想要征服这些部落的错误。1897年，丘吉尔去了阿富汗之后，描述了他对普什图人的印象，他的描述迄今适用，他描述道：

除了在收获的季节或当自我保护迫使他们暂时休战时，普什图族部落总是参与某些私人或公共的战争。每个人都是战士、政治家和神学家。每个大房子都是封建堡垒……每个村庄都有自己的防御能力。所有家庭、氏族、封地都在培养战斗能力。众多的部落和部落联盟都有要跟别人算的账。没有什么是会被遗忘的，没有什么债务可以被拖欠。

尽管如此，仍然有人想让这样一个不屈不挠的民族屈服，那些一次又一次这样做的人，只会被不屈不挠的阿富汗人民所组成的人墙击得粉碎。

彼得雷乌斯的教训

负责指挥美国第101空降师的大卫·霍威尔·彼得雷乌斯于2003年到达伊拉克。这位将军不仅是西点军校的校友，还凭借有关越南战争研究的论文在普林斯顿大学取得博士学位。初到伊拉克之时，他面对这样一个混乱和死亡交杂的国家似乎一点也不胆怯。他觉得自己有机会在摩苏尔施展所学到的关于非常规战争的一切知识。他的灵感来源于法国中尉大卫·加吕 拉于1964年撰写的《反叛乱——理论与实践》一书。在研究了十年关于世界上一些国家的颠覆战术之后，加吕 拉被分配到了阿尔及利亚。在那里，他创立了新

的学说，并记录在自己的精彩论文中。彼得雷乌斯于2006年12月出版的有关美国反叛乱理论的新作，几乎完全基于加吕 拉这本书。

2004年6月，当彼得雷乌斯担任伊拉克多国联军指挥官时，因指挥失误而臭名昭著。彼得雷乌斯将军回忆说，在加吕 拉著作法语版本的序言中有一句话：直到最近，对于在国外的军事干预，是继续还是匆忙撤离，人们仍处于争论之中。但是加吕 拉教导说，没有当地大多数人的无条件支持，就什么也做不了；没有一个被大多数人承认合法和尊重的政府，还是什么也做不了。

2008年10月31日，彼得雷乌斯担任驻扎在斯图加特的美国中央司令部的司令官时，恐怖主义者不断从与巴基斯坦交界的地区入境，与塔利班一起攻击人数较少的国际部队，阿富汗世界面临着越来越多的游击队攻势。彼得雷乌斯为自己设定的目标之一是赢得阿富汗人民的心灵和思想。这就是他曾在伊拉克用超过11亿的美元所做过的事情。他在阿富汗创建了一支人数超过10万的安全部队，重组了之前被解散的军队，并推动了无数的重建项目。这一切都是为了让阿富汗人负责自己的安全，并逐步将这项繁重的任务从多国部队的身上卸下来。

为了这个目标，美国必须明显改善当地人的生活质量并满足他们的需求。一个复杂的问题是，对于大多数阿富汗人民而言，自由主义或人权是他们的文化世界中几乎不存在的词汇。实现该目标需要很长的时间，也许需要投资建立一个可与传统伊斯兰学校、经学院相媲美的教育体系。

彼得雷乌斯并不是没有意识到，与伊拉克相比，阿富汗也许更加难以驾驭。伊拉克的大部分人口都是受过教育的，而且伊拉克具有许多现代元素，曾经建立过稳固的国家，具有维系国家的民族感情，还拥有丰富的石油储备。阿富汗人则是完全不同的——他们大

多生活在中世纪，预期寿命仅为47岁，对部族和部落的忠诚度高于对国家的忠诚度，他们甚至没有国家和国境的概念。而且，阿富汗的领土比伊拉克领土大50％，更加险峻和荒凉；阿富汗的人口数量尽管与伊拉克相似，却更加分散和分裂；更不用说几乎不存在的通信渠道了。

彼得雷乌斯在阿富汗任职一年，尽管投入了巨大的人力和物力，还是留下了一个陷入混乱的国家。

马格里布是怎样的

费尔南多·奥斯瓦尔多·卡帕兹·蒙特斯上校于1931年写了《摩洛哥山地战争模式》一书，在书中讲述了他在20世纪初的里夫战争中的经历。他指出，马格里布人并不是卑鄙的敌人，不能贬低他们的价值。在许多情况下，他们作为真正穆斯林所特有的蔑视死亡的价值观应该被崇拜。这些人的勇气和坚韧是非凡的，他们耐心地等待敌人的撤退，追求获得新的勇气，并以一种不寻常的方式成长。他还将摩尔人（与西班牙接壤的非洲北部土著人）定义为狡猾的、有手腕的、善变的、一贯恶劣的。

这位西班牙军人提供的最好教训就是：蔑视对手并不是在战争中应该采用的战术，更多地了解对手可以避免更大的伤亡，赢得战争。

莱奥蒂——用学校和医院获胜的将军

法国将军休伯特·莱奥蒂给出了如何对待不同民族的一个积极范例。他率先尝试改善19世纪欧洲列强在世界所建立的军队与殖民地居民的关系。

在北非，他将军事行动与政治和社会行动相结合。其最初的战略是，放弃以前常用的通过使用武力迫使殖民地人民屈服的方法，只使用能够保证与当地人接触的轻微武力来支持社会和经济发展。通过这种方式，尽可能地使殖民地人民接受外来者，并防止反对运动的出现。

当莱奥蒂作为准将被派往奥兰地区平息反抗时，这种战略的运用达到了最辉煌的时刻。在上司给予他行动自由并授予他对政治管理的控制权之后，这位法国将军决定不对叛乱分子使用武力，只在极少数情况下有限地使用武力。他通过提供保护，并承诺提供医院、学校及其他社会福利赢得了部落的归顺。

1911年，他被派往摩洛哥时，采取的措施包括尊重当地习俗、促进经济和创造就业机会。他只在极端情况下才使用军事手段，以确保安全和作为威慑力量。

对越南人民的误解

美国在越南惨败，因为他们并没有考虑到这是一个宁死不屈的民族。1963年，当美国扩大其在越南的军事行动规模时，尼基塔·赫鲁晓夫向一位美国高级官员说：“如果你们愿意，可以去越南的丛林中战斗。法国人在那里打了7年仗，最后他们不得不离开。也许美国人可能坚持更长的时间，但是你们最终也会离开。”

北越军队的指挥官武元甲对所发生的一切做了最好的总结：在1000年的统治中，我们没有被同化。越南人民拥有不屈不挠的爱国主义精神。法国人说我们在奠边府不能获胜，但是我们获胜了。当美国进入越南时，很多人也说我们无法获胜。简而言之，决定胜利与否的是人为因素。

关于这场非常不对等的战争，巴巴拉·W. 塔奇曼批评美国政府低估了越南人对其目标的执着。他说，美国误判了敌人的动机，忽视了北越的民族主义热情和对独立的热情。塔奇曼补充说，美国人不知道如何正确解释斯多葛主义和东方宿命论。

简而言之，美国人犯了一个错误，就是不了解越南的历史、传统和民族性格。实际上，在任何有关越南历史的书籍中，他们都可以发现越南长期以来对任何外国政权都抵抗到底。用基辛格自己的话说，当华盛顿试图与河内政权谈判时，遇到了虔诚的列宁主义者。他们认为自己代表了不可避免的未来、绝对的真理和卓越的道德辨别力。他们也不愿意让步，只接受美国立即全部撤出和废除西贡政权，不接受除此以外的任何其他提议。

对俄罗斯人的误读

任何一个忽视民族性格的军事冒险都注定要失败。俄罗斯人习惯了战争和艰辛，经济制裁或任何其他措施都不会使他们屈服。他们爱国、好战，有强大的凝聚力，忠于其领导者，有统一的语言，并与特殊的历史和文化相联。严寒使俄罗斯人拥有无与伦比的耐力，不受任何挑战的影响。基辛格明白这一点，他认为俄罗斯人习惯于在抵抗中创造丰功伟绩，并且能承受最可怕的匮乏，就像在抵抗拿破仑和希特勒入侵的过程中所展示的那样。

利德尔·哈特清楚地描述了“二战”期间俄罗斯士兵的情况，他们与德国人曾面对的其他战士完全不同。哈特强调，俄罗斯人极度克己和遵守纪律。他们以最大的韧性进行战斗，拥有惊人的抵抗能力，这使敌人很少能够找到攻击的切入点。

电影的内容

每个国家制作的电影都很好地反映了其国民的特质，因为它们展示了整个社会的特点。我们从这些电影中可以获得很多信息，如关于人们行为的信息，甚至还有适用于外交政策的原则。就美国而言，许多电影和电视剧都显示出非常重要的地缘政治信息。在动作片方面，好莱坞是毫无疑问的世界大师。这些动作片提供了宝贵的信息，让我们了解美国如何对国际事务做出反应。这类电影有如下特点：

• 许多情况下，使用武力和暴力是最佳方案。

• 许多情况下，最终结果非常具有可预测性。

• 极其壮观，吸引观众的注意力。

• 强烈的善恶二元论，总有一个人或集体充当当下的“坏人”，他们通常表现为笨拙的、野蛮的、不道德的、不公正的。当然，他们在“好人”面前，明显是最终输家。

• 有强烈的文化优越感，认为自己负有天赋的使命。

• 尽管不那么明显，但“复仇”是许多电影的主题。

野蛮人来了！

色诺芬曾说，世界上任何地区的人都是在吃饭、喝酒、洗澡、躺下或睡觉时更容易被征服。物质丰富和精神颓废的社会，最终会被野蛮人征服。这些野蛮人没有任何东西，想占有一切。因此，关键的问题是，当今的“野蛮人”是谁。

最糟糕的是，直到野蛮人站在城墙的门口，文明人才会意识到这一点。正如霍华德写的那样：“在一个安全和宽容的社会中受过

教育的诚实人会发现，强硬、无情的狂热分子对任何安排都不感兴趣，只对斗争感兴趣。”谈判是不可能的，他们甚至连谈判一词都不知道，只对征服、摧毁敌人和建立一个新社会感兴趣。

如果被侵略者以最大的决心奋战，还有生存的希望，但是过度富裕、惯于放松，以及多年的和平与幸福，使得他们几乎没有还手之力。

2．最大的优点也是最大的弱点

最大的就是最小的。

——维克多·雨果

你可以击败力量是你十倍的强敌，但你必须在敌人没有做好准备时，出其不意地采取行动。一方面，强大的力量本身并不能保证胜利，因为缺乏智慧将使这种力量失去效力。另一方面，乍看弱小的对手，会有效使用有限的资源，让强大的对手大吃一惊，甚至使对手惨败。

炫耀力量也会暴露弱点。在大卫和歌利亚的故事中，歌利亚大约2.5米的身高以及他的50千克的盔甲，使他变得笨拙和缓慢。其所面对的是几乎衣不蔽体的大卫，大卫利用他的技巧，以及有利于他的方式战斗，在足够接近歌利亚，但是歌利亚无法攻击到他的范围内，大卫用他的投石弹弓给歌利亚致命一击。

巨大的军事力量可能是一把双刃剑。中国军事理论家乔良和国际关系学者王湘穗说，最强大的国家往往是敌人最多、最受威胁的国家。这正是美国的情况。马朗什认为，美国及其盟友的原始力量，是基于人的世俗主义、不守纪律、不尊重传统美德和寻找人造

天堂等特点；而其所面对的“政治士兵”，是以信仰为动力，后者为了达成目标，往往愿意做出最大的牺牲。

不对称的概念

有这样一个寓言，一只蚊子走近狮子，并对它说：“我不怕你，你并不比我强壮；你除了可以用爪子抓和用牙齿咬，还有什么力量？我比你强多了。如果你愿意，我们开战吧。”蚊子嗡嗡地叫，然后用毒针刺破了狮子的鼻孔下面没有毛遮盖的皮肤。狮子开始用自己的爪子挠被叮咬的地方，直到晕倒。这个故事告诉我们，即使是最弱小、最微不足道的生物，也可以结束丛林之王的生命。也就是说，那些处于劣势的人，会攻击对手最柔软和最脆弱的地方。

战斗中的不对称性一直存在，每一方都在寻找一种战胜对手的方式。不对称对抗是历史上最常见的。

在伯罗奔尼撒战争期间，只发生了两次大型地面战役：曼提尼亚战役（公元前418年）和提洛战役（公元前424年）。修昔底德提到，鉴于雅典海军和强大的斯巴达步兵之间力量的不对称，最常见的行动是突然袭击、围攻，以及对农田的系统性破坏和在井水里下毒。

亚历山大大帝因公元前334年的格拉尼库斯战役而闻名，在这场战役中他击败了波斯人。而在公元前333年的伊萨斯战役中，他击败了大流士三世领导的60万波斯人，其中超过四分之一的波斯人死亡，而他只有15万人的军队，其中只有300人战死。[(1)]

弱者在战争中取得胜利的最典型的例子之一是西班牙的独立战争（1808—1814年）。在这场战争中，西班牙人民拿起武器反对法

国占领者。大约200支游击队平均每天可以消灭40名法国人。他们使用的是不规则的战术，包括狙击落单者及伏击小股卫队，凭借耐心和毅力，在7年中共歼灭50多万法国人。拿破仑·波拿巴感叹：“啊，西班牙战争，那该死的战争是法国悲剧的起源。”“二战”期间，当纳粹将军们放弃入侵西班牙以控制直布罗陀海峡的假设目标时，希特勒言语犀利地说：“想都不要想。西班牙人是唯一真正勇敢的地中海人，他们会立即在我们的后方组织起游击队员。没有西班牙人的许可，不能进入西班牙。”

托马斯·爱德华·劳伦斯根据“一战”期间阿拉伯人对战土耳其人的经历，在他的著作《游击战》中，给出了弱者战胜强者的建议：在某些方面具有决定性的优势；从来不向敌方士兵透露行踪；拥有完美的智慧；充分利用宣传；创建一支充满活力、装备精良但是规模较小的队伍；寻找并专注于对手最薄弱的环节；参与道德战争而不是实际的战争；在运动中打击敌人，不是施加压力而是打击；使用爆炸性力量；尽最大可能采用不规则手段；拥有群众的支持；拥有充分的机动性；等等。毛泽东领导的游击战是劳伦斯游击战略的应用典范。

无论是在阿富汗还是在伊拉克，侵略者的战略目标是扩大冲突，造成更大伤亡，创造永久的不安全感，削弱民族凝聚力，迫使其政府采取有利于侵略者的决定。擅长心理战和媒体战的大师，都将行动的重心放在制造舆论和控制思想上，将语言和思想当作战争的突击部队。

恐怖主义

受政治、宗教、极端主义意识形态影响的武装团体，无论其追求的目标是什么，都习惯于利用恐怖主义。恐怖分子不仅想在军事

上战胜极具优势的对手，还想让自己的事业获得合理和合法的宣传，以获得资金和支持者。

这些组织知道恐怖主义是一场演出，所以建立了高度专业化的宣传机构。通过这些机构，他们尽最大可能进行媒体报道，其目的是恐吓国内外的公众舆论和政治决策者。

恐怖分子完全知道，在当今世界，没有任何东西比图像更具影响力。他们必须向全世界宣告，他们的威胁无处不在。他们知道行动和宣传同等重要，他们用公众的反应来衡量行动成功与否。简而言之，正如玛格丽特·撒切尔所说，恐怖分子一直想得到宣传，那是他们的氧气。

网络空间为恐怖分子提供了廉价的、即时的并且具有一定程度保护性的平台。一些西方媒体间接或直接传播、扩散了网上的信息，这可能有助于恐怖分子的壮大。但是，民主社会里的公民又有知情权。该如何衡量呢？

“千年挑战”的教训

2002年8月底，美国联合部队司令部宣布：“‘2002千年挑战’——历史上最伟大的军事演习，取得了圆满成功。”

事实并非如此。这个计划了近两年的演习，持续了3个星期，耗费了2.5亿美元。涉及所有军队（陆军、海军、空军、海军陆战队和特种部队）和行政当局（国家安全委员会、能源部、国务院和美国国际开发署）的成员近13500人。全美计算机编程领域最负盛名的专家为其服务。参与演习者大致分布于9个真实的军事地点和17个虚拟地点，敌人是虚构的中东国家。大多数专家认为假想敌是伊拉克，也有人说是伊朗。

演习目的是验证当时的新颖概念——“军事变革”理论，出现了“基于效果的行动”“快速和果断的行动”“互动联合计划”和“行动评估网络”等术语。遗憾的是，表面的成功下面，隐藏的是一个巨大的失败。

美国海军陆战队中将保尔·范瑞普担任敌军部队负责人，对演习的真实结果深感失望。出于这个原因，在演习结束之前，他向一些同僚发送了一封电子邮件。在邮件中，他指出，应用一些错误的理论可能给陆军带来可怕的后果。范瑞普真的很生气，他不害怕名誉扫地。正如他所说的那样，结果从开始就被操纵了，因为只能有一个赢家——美国军队。

在这场历史上最昂贵的虚拟行动中，美国的一个假设是，有一名敌国将军（范瑞普的角色，红方）反抗他的政府，并打算将武裝起义扩展到整个国家。美军还假设有4个恐怖组织支持反叛者。

一开始，范瑞普不得不面对蓝方所拥有的世界上最好的42种不同的计算机系统，但是这并没有使他感到任何恐惧。相反，他们将自己的军事才能发挥到了蓝方难以想象到的极致。蓝方的威胁和武力不仅没有阻止他们或使他们心灰意冷，反而使他们变得越来越好战。蓝方拥有一切手段和材料，而红方只有一些轻型飞机和小型船只，其中许多船只是渔船。

蓝方上万人登陆红方领域，并在其海岸布置了一支神勇的海军力量，以迫使红方接受他们的条件。蓝方发出了最后通牒，敦促红方投降。一切似乎都支持蓝方。他们的超级计算机用近千种不同的方式分析了反叛分子的反应。所有人认为他们是明确的胜利者。然而，范瑞普决心战胜他们。

凭借强大的技术，蓝方破坏了电缆并切断了所有通信，红方的整个电磁波谱完全受其控制。然而，范瑞普设法避免了这种封锁，用摩托车骑手传送最机密的命令，用灯光和旗帜引导飞机起飞和降落。知道自己被窃听后，他引导敌人误解自己的意图，并分散敌方的注意力。

由于是在本国进行军事演习，范瑞普最大限度地利用了对本国国土的了解和人民的支持。他命令所有可用的小船和飞机在蓝方船只周围“随意”旋转，以造成混乱。当蓝方认为这些力量无害并撤回对他们的密切监视时，范瑞普利用分布在全国的大量尖塔发送信息，命令自杀式船只、导弹部队进行大规模攻击。经过一个小时的轰炸，蓝军遭遇了巨大损失：海军的骄傲——包括航母和最强大巡洋舰在内的16艘战船“沉没”，“死者”总数上升到2万多。蓝方陷入了彻底的绝望。

面对这样的失败，演习的总负责人决定倒转时钟，使沉船重新漂浮。通过布置一个新的反导系统，阻止了范瑞普再次使用之前使用的导弹。他还复活了被红方消灭的有利于美国的当地领导人，同时迫使范瑞普断开他的雷达，以免造成干扰，并移动部队，让蓝军可以在没有阻挠的情况下登陆。

从那时起，范瑞普发出的指示须由他的参谋长乔治·尤特上校修改。在现实生活中，这个退役的上校是由联合部队司令部聘用的，他的直接上司是空军准将吉姆·史密斯——演习的总负责人。如果不想失去工作，尤特就得发出与范瑞普命令相反的指示，范瑞普最终因为不愿意继续这场闹剧而退出了演习。

在演习结束时，范瑞普写了一篇非常严肃的报告，共20页。根据他的说法，演习的主要推动者——时任国防部部长唐纳德·拉姆斯菲尔德和在他庇护下崛起的将军们，都不希望一位退役军人扰乱

他们已经为波斯湾制订的计划。也许，演习的败笔在于选择了范瑞普中将——一个只知道如何赢得战争（包括模拟战争）的军人。他成为被夸大的“军事革命”中最糟糕的噩梦。作为克劳塞维茨的忠实追随者，他在越南的经历证实，战争本质上是不可预测的、令人困惑的，看似不那么有能力的敌人也可以使用所拥有的手段来获得胜利。

这项演习提供的教训是非常宝贵的。但是，应该吸取这些教训的人，却懒得去了解这些教训，继续犯着同样的错误。

高估自己

掌握过多的信息并不能保证更大的成功。相反，过多的信息会成为沉重的负担，不仅会延缓决策过程，而且还能导致失败。此外，拥有大量信息可能会使人产生过多的信心，并阻止可能有的相反意见。值得记住的是，当有太多的选择时，正常人的思维机制往往被限制。

个人、集体和国家在历史上经常发生的错误，是一直坚信自己拥有比实际更大的能力。在明显缺乏远见的情况下，这将导致其与对手之间发生激烈的对抗，因为他们相信自己能够击败不如自己的敌人。那些认为自己弱小的人往往更加谨慎，试图避免直接对抗，寻求通过其他更有益的方法来克服困难。

没有弱小的敌人，更没有不对称的敌人。就像在武术中，面对体格壮硕、肌肉强健而相对笨拙的拳击手，柔道武者会将自己的灵巧和敏捷转化为优势，利用对手的力量和重量制服他。

3．为意想不到的事情做准备

一个政治家必须愿意根据运气的指示和事物的变化而做出改变。

——马基雅维利

预测未来很明显是一个不可能完成的挑战，所以我们必须始终为意想不到的事情做准备。用现代术语来说，那就是预防“黑天鹅”——那些意外发生并产生巨大影响的事件。在当前多变的世界中，这类事件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有可能发生。

最好的办法是，永远做好最坏的打算。军事方面，即为最危险的情况设置安全措施。不要妄想当前的良好局面会一直持续，也不要认为在过去适用的解决方案在将来会继续有效。

行为方式适应所处时代的人将获得成功。为了应对不可预见的意外情况，自己的头脑必须是做好准备的、积极开放的和灵活的。灵活的头脑使你能够迅速适应外部环境。灵活并不意味着自由放任，要有计划，也要清晰地意识到计划可能不会完全实现。

战争也需要灵活，没有人能用一种战略赢得所有战争。作战需要数学上的精度，但是不能机械地进行重复。战争作为一门艺术，需要更多的直觉而不是数学演绎，如此方能掌握战场上的永久性变化。

尽管听起来令人惊讶，但是必须要考虑失败的可能性，做好失败的准备。遵循克劳塞维茨经典战争理论的人与赞同瑞士将军安托万·亨利·德·约米尼思想的人之间总是不断产生争论。约米尼认为，只要通过分析并应用基于数学和科学原理的适当程序，就可以保证胜利。克劳塞维茨强烈反对这种方式。他认为它忽略了战斗者的身体和心理影响、道德因素和指挥官的个性。战争充满偶然性，总是不可预测的。任何技术都不能完全消除意外。马基雅维利警告

说：“最容易做到的事情，就是敌人认为不可能实现的事情。人们越是不害怕的事物，越能伤害到他们。”达尔文曾说，活下去的不是最强大的物种，也不是最聪明的物种，而是适应性最强的物种。

当今世界的不可预测性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大。从公元1世纪到工业革命最火热的1900年，人们的生活方式几乎与他们所有的祖先一样，或者至少风俗变化的周期要以世纪来计数。但是在当前时代，一切却都以惊人的速度变化。

世界正在经历全球化，也有人因不想失去祖先的生活方式、思考方式和组织方式而拒绝全球化。人们的世界观多样化，这些世界观很难相互理解。更糟糕的是，很多人生活在一种不可饶恕的傲慢当中。他们认为不接受他们的生活方式和政治制度的其他人不仅是错误的，还是愚蠢的。他们认为自己的生活方式和政治制度远远优于地球上的其他人。这种信念会导致他们试图将自己的制度输出到其他地方，尽管这些地方没有申请也没有条件接受这种输出。

以时尚为例。在西方国家，“乞丐式”衣着获得了胜利，也就是说，人们热衷于购买和穿着满是破洞的衣服和裤子，这是对世界上数亿贫困者的真正侮辱。西方公司经常把他们的工厂搬迁到欠发达国家，因为工人的工资非常低，税收也非常低。

4．幻想快速获胜

侵略者总是有一种轻松、快速胜利的幻想。

——曼努埃尔·弗拉加

人们常犯的一个错误是认为战争将是简短而容易获胜的，最小的努力和痛苦可以换取巨大的好处。这并不新奇，通常军队进入战

斗时，都无视对手的反应能力，相信自己会迅速赢得战争胜利且没有任何损失。

这在历史上屡见不鲜。斯巴达参加伯罗奔尼撒战争时，确信自己将轻松地战胜雅典，以最低的成本获得更大的权力和威望。在美国内战期间，南方完全相信自己将取得胜利，因为它具有军事优势，还相信一个需要棉花的欧洲会站在他们那边。希特勒相信“闪电战”——既是一种战术又是一种战略，将迅速而有力地取得胜利。同样是在“二战”中，日本认为自己有能力发动一场可以在其认为合适时通过谈判来结束的可控制的战争。当美国考虑介入越南战争时，也发生了类似的情况，因为美国政府中没有人怀疑美国会用军事霸权实现目标。

领导者和人民都会犯错

约翰·G．斯托辛格总结说，引发战争的最重要因素是一系列误解，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领导者对自己的看法、领导者对对手的看法、领导者对对手意图的判断，以及领导者对对手能力和力量的理解。

不要把战争责任只归咎于领导人，有时国民也对战争过于兴奋。有的人从一开始就把战争当作一个机会，认为通过战争会获得奖牌和荣誉。

今天的欧洲也会重复同样的危险，年轻人受到电视、电影、互联网和电子游戏的误导，陷入某种黩武主义，尽管大部分人从未真正拿过枪，甚至连军事演习都没参加过。

第二次布尔战争

1899年10月11日，与南非布尔人开战时，英国完全相信自己将非常轻松地取胜。这种推理似乎并不缺乏理由。在前一年的9月2日，英国军队在苏丹的恩图曼战役中大败当地的穆斯林。由英国将军霍雷肖·基奇纳指挥的英国和埃及联军，其数量只是阿卜杜拉·伊本·穆罕默德所统帅军队的一半，却在鏖战近5个小时后，消灭了近5万人的穆斯林军队，己方仅仅损失了48名士兵。在这场战争中，正规军的纪律是胜利的重要因素，技术优势则更重要——欧洲人用来复枪、机枪和火炮迎战大多使用长矛和前端装填步枪的对手。

当英国人看到其近50万人的军队将要在南非面对武器落后、组织松散的5万名布尔人时，相信自己会迅速获胜。但是，布尔人这样应对：他们没有选择公开对抗，而是采取了游击战术。这使得英国对支持游击队的平民（大部分是白人）采取了最严酷的暴力手段，将他们监禁在历史上首次出现的集中营当中。大英帝国经过3年的战斗，最终取得了胜利，消灭了由布尔人创立的奥兰治自由邦和德兰士瓦共和国。但是，英国人付出了惨痛的代价——牺牲了近5万名士兵，花费了数亿英镑。

俄罗斯和芬兰的冬季战争

1939年11月30日，苏联利用几天前发生的边境事件，入侵了邻近的芬兰（1917年，芬兰才摆脱了罗曼诺夫帝国一个多世纪的统治，取得独立）。在全面的扩张主义行动中，苏联的战略目标是保证位于苏芬边境的列宁格勒的安全。为此，苏联需要控制芬兰的领土。

这场冬季战争一开始，力量就非常不平衡。苏联的领土面积比芬兰大50倍，人口多26倍，拥有大约6500辆坦克和3800多架飞机。而芬兰只有大约30辆坦克和100多架飞机。在这种极不平衡的背景

下，没有人认为芬兰能赢。参与行动的部长们，毫不怀疑芬兰会在年底前陷落。

很少人预料到，尽管力量悬殊，但芬兰人仍尽一切努力保卫自己的领土。他们决定实施游击战，消磨苏联人，使其疲惫不堪，直至撤兵。芬兰人民则无条件地支持芬兰军队，并为他们提供后勤保障。芬兰人还研发了由易燃液体制成的简易爆炸物。因其令人毛骨悚然的特征，这些爆炸物被幽默地称为“莫洛托夫鸡尾酒”，以嘲笑当时苏联的外交部部长——莫洛托夫（原名维亚切斯拉夫·米哈伊洛维奇·斯克里亚宾，俄语意思为“锤子”）。莫洛托夫定期通过广播发布信息，声称苏联军队没有向敌国人民投掷炸弹，而是投放食物，使他们不会因饥饿而死亡。而并没有处于饥饿状态的芬兰人，选择了具有讽刺意味的反宣传，称苏联炸弹为“莫洛托夫面包”，并说他们会为这些食物配上一些“饮料”，而这种“饮料”就是“莫洛托夫鸡尾酒”。

极端寒冷的天气，加上险峻的地势，使苏联战车不能发挥作用，而恶劣的天气条件也使空军无法支援地面部队。芬兰军队充分利用这一点来攻击苏联的后勤，使苏军无法得到有效的供应。

芬兰人不顾一切地抵御了苏联的入侵，并付出了巨大的代价。到1940年3月，大约26000名士兵牺牲，几乎所有坦克和一半的飞机被毁。但是苏联付出的代价更大，大约15万军人死亡，3500多辆坦克和500多架飞机被毁。

从纯粹的战略角度来看，最终的平衡也是不确定的。一方面，苏联实现了所追求的部分目标：芬兰不得不将其领土的十分之一割让给苏联人，其中包括卡累利阿的大部分地区。但是另一方面，苏联仍然无法控制其所渴望的其他芬兰领土。而且苏联暴露了其军事上的弱点，这刺激了希特勒在一年多之后开始入侵苏联领土。

沙特阿拉伯的失误

沙特阿拉伯对也门的袭击提供了一个最新例证。

由于担心亚丁——也门总统阿卜杜拉布·曼苏尔·哈迪的堡垒落入叛乱分子手中，担心伊朗将利用亚丁在也门施加影响，2015年3月25日，沙特阿拉伯开始对胡塞武装进行空袭。当时，年轻的沙特阿拉伯国防大臣穆罕默德·本·萨勒曼宣布，这将是一场快速、简单的战争，不会对己方造成伤亡，并且会取得完全成功。

穆罕默德·本·萨勒曼于3月26日启动了由其政府资助的10个国家的联盟。他认为这个联盟如此强大，几天之内就能击败也门的反叛分子。想到联盟由巴林、埃及、阿拉伯联合酋长国、约旦、科威特、摩洛哥、卡塔尔和苏丹等众多富国或其军队组成，而且美国和英国还会为其提供后勤支持，谁都不会怀疑，“暴风雨行动”一定能立即取得最终的胜利。

然而，沙特阿拉伯还是在也门陷入了困境，没有任何迹象表明其能够在也门建立一个稳定的政府，或者在目前的绝对混乱中实现一些和平。

穆罕默德·本·萨勒曼——世界上最年轻的国防部部长（1985年出生，自2017年6月起是沙特阿拉伯的王位继承人），应该在发动“暴风雨行动”行动前，读读北也门的内战史，这对他来说是大有裨益的。在1962年至1970年间的这场冲突中，埃及和苏联支持由阿卜杜拉·萨拉勒领导的共和派人，对受沙特阿拉伯庇护的伊玛姆·巴德尔国王发动了政变。为了支持新成立的共和国，埃及总统纳赛尔决定向也门派遣7万名士兵。但是埃及军队在也门遭遇了保皇派的顽强抵抗，不得不面对一些勇敢、坚定的战士——他们在战斗

中几乎立于不败之地。看到无法取得胜利，纳赛尔最终撤回了他的部队。

5．不尊重他人的宗教信仰

意识形态流逝，宗教仍然存在。

——阿敏·马卢夫

伟大而聪明的领导人明白，要尊重被统治者的宗教信仰。

印度士兵的反叛

1857年，印度士兵（从大英帝国领取薪水的印度军队士兵）的反叛是由多种复杂原因引起的，但是毫无疑问，文化和宗教方面的冲突是重要因素。

一方面，英国东印度公司的官员与当地军队之间的密切关系（这使他们能够很好地了解当地人的文化）随着时间的推移而逐渐淡化。这主要是由于英国指挥官的家属不断来到印度，指挥官们更加重视与本国军官和官员的交往，英国人逐渐远离了当地人的语言和传统。

另一方面，印度教徒将现代技术的引入视为对其生活方式和社会经济组织的威胁。这加深了印度人对英国人在东印度公司接管的领土上逐步引入欧洲习俗的担忧。英国人也禁止了印度人的一些传统做法，例如女孩出生时将其杀害、要求寡妇为她丈夫殉葬等。此外，英国实施的司法制度被视为明显不利于当地人。

叛乱分子在反叛时声称的主要原因是，英国人引入印度的1853式后膛“恩菲尔德”步枪的弹筒包装纸涂有动物油脂。在打开枪膛

装填子弹前，士兵需先用嘴咬破涂有动物油脂的弹筒包装纸，印度土兵表示他们不愿意这样做。如果是猪油，那将是对穆斯林的冒犯；如果是牛油，那将是对印度教徒的极端挑衅，因为对于他们来说，牛是神圣的动物。即使英国尽最大努力说服军队，这不是动物脂肪，并建议印度士兵用自己认为合适的物质涂抹弹筒包装纸，或用手而不是牙齿来撕开包装纸，但是谣言还是传遍了全军。

士兵中的印度教徒和穆斯林（有近20万人）确信，英国人故意破坏他们的宗教信仰，强加欧洲人的宗教价值观，因此，没有商量余地，叛乱就这样爆发了。在德里和密鲁特，很多印度人认为英国干涉本土文化的目的是将印度基督化，所以叛乱分子宣布："印度教徒和穆斯林的兄弟们，快点加入我们，我们要打一场宗教战争……异教徒决定清除所有的穆斯林和印度教徒。"

维多利亚女王对这次起义印象深刻，她称整个国家都要进行一天的忏悔和祈祷。在水晶宫，女王与25000名听众一起见证了浸信会传教士——查尔斯·斯特金的煽动性宣言："印度教徒的宗教只不过是可以想象到的最恶劣的污垢。他们崇拜的众神不值得一丝尊重……必须从鞘中拔出剑，以斩断成千上万不忠的臣民。"传教士的话语包含了圣战号召的所有特征，特别是只从字面上理解时。在坎普尔，一名姓尼尔的英国准将强迫被抓的反叛者舔西方受害者的鲜血。在白沙瓦，40名叛乱分子被绑在大炮口上，最后被"炮决"。在伦敦，《泰晤士报》建议在每一棵树和每一个屋顶上都要悬挂一名叛乱者的骷髅。在福音派传教士眼中，叛乱的发生不是因为英国人强加了其他信仰，而是因为现代化没有得到足够和快速的实施。

次年，英国东印度公司解散，伦敦重组其军队并改革了印度的行政金融体系，将其更名为英属印度，直接处于皇家领导之下。

对穆斯林犯下的错误

塞缪尔·P. 亨廷顿认为，西方国家向全球推行其价值观和制度，维持其军事和经济优势，并介入伊斯兰世界的冲突，这引发了深深的敌意。

西方国家甚至对伊斯兰国家的选举过程进行外部干涉。伊斯兰世界得到的教训是，遵循民主原则参选并不能保证获得权力，更不用说保持权力，因为在西方国家的大力支持下，当地精英永远不会允许在一个与西方利益相关的国家建立一个伊斯兰政权。因此，为了控制一个国家，唯一的选择是诉诸暴力。

在21世纪初的伊拉克，英国忽视宗教的意义，造成了悲剧性后果。当时，英军巡逻队遭到伊拉克叛乱分子伏击后，决定追捕袭击者。这些袭击者躲藏在一座清真寺，英军士兵也进入了清真寺。但是，他们携带武器进入清真寺的时候，没有意识到他们正在犯下伊拉克穆斯林眼中的严重罪行。此事引发了反对英国军队的大规模示威游行，英国用了近一个月的时间才重建起与该地区居民的关系。即使是对英军的入侵最不怀有敌视态度的人，也对英军携带武器进入清真寺表示强烈反对。

另一个例子发生在阿富汗境内。2012年2月中旬，在巴格拉姆空军基地（美国在阿富汗最重要的机场）附近的帕尔旺省拘留中心，6名美国士兵收集了在当地图书馆找到的所有《古兰经》以及其他伊斯兰著作。美军士兵认为被拘留者可以利用这些书传播伊斯兰教或交换情报，因此认为有必要将这些著作毁掉。

2月21日凌晨，来自基地的一些阿富汗工人看到一辆货车在一辆军车的护送下来到垃圾场。一男一女两名美国士兵，从卡车上卸下装满书的袋子，将它们扔进焚烧坑。乍看没有什么异常，因为两

个士兵既不重视自己所做的事情，也没有试图隐藏什么。好奇心驱使阿富汗工人靠近，当看到被焚烧的是《古兰经》时，阿富汗工人先是震惊，接着是暴怒，向美国士兵喊叫，说这是他们的圣书，不能烧，并阻止美军士兵继续这样干。

面对这种意外的反应，美军士兵离开了垃圾场。但是被扔进焚烧坑的两袋《古兰经》已开始燃烧。目击者试图扑灭大火并取出袋子，但是只救出了部分《古兰经》，还是有十几本《古兰经》被全部或部分焚毁。

拿着从火里救出来的《古兰经》，阿富汗工人赶紧通知在基地的其他阿富汗人。一些阿富汗人怀揣着半烧焦的《古兰经》离开了基地，向基地外的同胞们讲述了这一事件。消息像野火一样迅速传播开来。

几个小时后，2000多人聚集在基地门口，以愤怒甚至暴力的方式表示抗议。消息渐渐传遍了整个国家。抗议活动不断扩大，并在某些情况下演变成了专门针对外国人尤其是美国人设施的暴力行为。除了平民以外，在喀布尔守卫森严的阿富汗内政部，一名执勤的阿富汗警察向一名美军顾问中校和一名美国指挥官开了枪。该事件最终造成50人死亡，200多人受伤。

抗议活动并不仅限于阿富汗，也蔓延到了邻国巴基斯坦，尤其是边境地区，成千上万的人因为对无人机的频繁袭击不满，而举行反美示威游行。

与此同时，塔利班也没有浪费这个打击敌人的机会，积极促进示威活动，鼓励阿富汗人要求美国撤出所有外国军队，并指责外国军队不尊重他们的宗教、传统和文化。他们还呼吁阿富汗军队和警察奋起反抗北约部队。

经过长时间的调查，2012年8月底，美国军方通知媒体，已经就烧毁《古兰经》的行为对6名士兵进行了行政处罚，但是却未提供进一步的细节。美国军方表示，上述士兵的行为既没有恶意，也没有对伊斯兰教的不尊重。毫无疑问，他们不知道《古兰经》是所有穆斯林最神圣的物质对象，这是“文化情报”的巨大失败。

2017年9月5日，驻阿富汗的美军在帕尔旺省分发宣传单，内容是一只狮子（代表阿富汗军队和警察）追逐一只狗（指塔利班）。宣传单设计者在狗的图案上加上了塔利班旗帜的一部分，却未发现旗帜的这一部分写有“沙哈达”的句子——“万物非主，唯有真主，穆罕默德是安拉的使者”，也忽略了狗被穆斯林视为不纯洁的动物一事。

塔利班立即利用这一错误，动员民众反对外国军队和喀布尔政府，并对巴格拉姆空军基地发动自杀式袭击，以报复美军对伊斯兰教的侮辱。还有一些机构发出了谴责声明，例如该省省长穆罕默德·阿西姆要求追究责任并将责任人提交审判。

局势变得紧张起来，第二天，部署在阿富汗的美国联合特种作战部队的总司令——美国将军詹姆斯·B. 林德被迫向公众道歉，请求公众原谅，以求不再有新的示威或袭击。

聪明的统治者

波斯皇帝居鲁士具有卓越的能力和非凡的智慧，他尊重被征服的中东各国人民的民族和宗教情感。公元前539年，他解放了大约40000名犹太人的后裔。这些犹太人在半个世纪前被尼布甲尼撒二世俘虏并囚禁到巴比伦，居鲁士准许这些犹太人返回巴勒斯坦重建他们的宗教团体。在巴比伦，居鲁士下令，所有宗教都是合法的。居鲁士的继承者——大流士一世，通过一种特殊制度来推行阿契美

尼德帝国的行政管理区域，其特点是允许每个省自由地信仰之前皈依的宗教。在占领埃及期间，亚历山大大帝意识到与埃及神职人员交好的政治重要性，所以在他所经过的城市，他都要参观城中的寺庙并向众神献祭。

如果有人以绝对不合理的方式选择死亡和杀戮，那是因为他的宗教信仰。这与其是否有学识无关，因为智力并不能排除狂热主义。所有宗教中都有极端主义者。他们可以为了捍卫他们的信仰而成为真正的野蛮人。在处理宗教问题时，必须要小心谨慎。

---

(1) 击败大流士三世也就终结了波斯帝国，尽管这个帝国还有近百万步兵、4万名骑兵、200辆战车和15头大象。亚历山大大帝仅拥有4万名步兵和7000名骑兵。即使力量相差如此悬殊，仍有30万名波斯士兵丧生，而希腊人的损失是100名战士和1000匹马。

第六章　无法摆脱的罪恶：统治世界的恶果

恐惧、荣誉和利益是驱动人类活动的三大要素。

——修昔底德

美国军事历史学家维克多·戴维斯·汉森谈论战争时，说技术会发生变化，但是战争的动机、情感和措辞却一直在重复。傲慢、贪婪往往都会驱使将军们开战，汉森也毫不犹豫地说，情绪和利益通常是大大小小的战争爆发的真正原因。

无论一个人是多么公平、公正、聪明和善于反思，也不能完全避免虚荣、嫉妒、贪婪等。汉森认为，冲突在本质上是非理性的，往往是有血有肉的人类冲动的结果，其中也伴随着对荣誉、利益的追求。

接下来，让我们看看，由于无法摆脱的永恒冲动和低级本能，人类在地缘政治中犯下了哪些致命罪恶。

1．自私

几千年来，人类的激情和动机几乎没有变化。

——卡普兰

个人的自私和集体的自私是世界发展的真正动力。但是，必须区分正面的自私（寻求自身利益，同时也有利于第三方）和负面的自私（寻求自身利益，但是或多或少会对第三方造成伤害），负面的自私往往比正面的自私更广泛和更普遍。

即使是世界上最慷慨和最敬业的人，如传教士或绝对利他主义的非政府组织工作者，他们帮助其他人也是因为在其中获得了满足

感，尽管这种满足感是无意识的。

无论国家怎样掩饰自己的真实目的，其所做的一切都是有计划的，并非为了慈善。没有任何人或社会群体会永久地、有意识地做损害自己利益的事。也许母亲对孩子的感情除外，这是唯一出于爱和无私奉献的例子。当母亲在后代身上倾注无限的感情时，她的内心也会感到无比欣慰。

俾斯麦非常清楚，“大国政策唯一的有益基础是自私”。这种伪装的自私使戴高乐和其他欧洲领导人努力劝说美国结束越南战争，因为他们担心美国将注意力和资源全部投入亚洲，如此会损害欧洲的利益。意识到这一现实的布热津斯基认为，美国要充分地将理想主义与自私相结合，以发挥其全球影响力。

2．欲望

悬浮在天堂和地狱之间的人类现实是永恒的。

——乔治·弗里德曼

欲望在整个人类历史中都占据重要地位。以其不可阻挡的情欲而闻名于世的俄罗斯的叶卡捷琳娜大帝和英王亨利八世的事迹都表现了个人欲望如何影响政治。

近几十年中，最引人注目的案例是1998年美国时任总统克林顿的丑闻，克林顿因为与白宫实习生莫妮卡·莱温斯基的丑闻，在政治上备受压力。据报道，从1995年11月到1997年3月，莱温斯基至少9次与总统发生过性关系，有几次甚至是在椭圆形办公室。就在国会准备对这位总统进行弹劾之时，12月中旬，克林顿下令对伊拉克实施“沙漠之狐行动”，原因是萨达姆·侯赛因与联合国视察员在消除大规模毁灭性武器方面缺乏合作。在保护“国家利益”的借

口下，连续4天，美国向伊拉克发射了200多枚导弹。通过这种方式，暂停了对克林顿弹劾投票，最终其免于失去总统之位。

克林顿在几个月前已经使用过这个战略。在因“拉链门”事件被叫到大陪审团面前的3天之后，即8月20日，美国对苏丹和阿富汗实施了代号为“无所不至”的行动，对位于这两个国家的可疑恐怖分子基地进行了轰炸，官方理由是报复两周前基地组织恐怖主义分子对美国驻内罗毕和达累斯萨拉姆大使馆的袭击。

3．懒惰

原则上懒惰似乎应该被排除在外，但是懒惰也在国际关系和地缘政治中发挥着作用。那些满足于现状的民族或者认为自己的发展水平更高的民族，往往会变得懒惰和粗心，不会意识到其他“饥饿”的民族想要尽一切努力夺走他们的财富和福祉。现实是，没有遭受苦难的人不会进步，因为感觉不到发展的需要，所以就蒙上了自己的眼睛，无法看到有许多人想要夺走他们的一切。

历史上那些被认为懒惰的国家，因为受到气候的影响，或拥有大量可直接获取的自然资源，或具有非常特殊的优势，整体比较散漫、萎靡。对于被入侵和被征服的事实，也是满不在乎，因为由其他人决定他们的命运，并没有使他们感觉到不便。相反，在很多情况下，他们对此感到很满意，因为无论统治者如何变换，他们的生活都没有什么改变，还是可以继续“唱歌和跳舞”。

4．贪婪

人类是忘恩负义、容易变心的，他们善于伪装、逃避危难、追逐利益；当你对他们有好处的时候，他们整个是属于你的；但是当危险来临的时候，他们就背弃你了。

——马基雅维利

在地缘政治领域，贪婪可以被理解为对自然资源的过度渴望，并试图掌控所有资源，甚至是不真正需要的资源。

一些西方国家的领导人，对亚马孙热带雨林（世界上最重要的生物多样性和自然资源保护区之一）所表现出来的过度关注即是如此。这引起了巴西人的极度担忧。这些领导人的讲话肯定不会让人无动于衷："与巴西人的想法相反，亚马孙流域不属于他们，而是属于我们所有人。"（美国副总统艾伯特·戈尔，1989年）"巴西需要接受对亚马孙流域的相对主权。"（法国总统弗朗索瓦·密特朗，1989年）

针对原油的战争也是如此。第一次海湾战争时的联军指挥官美国将军诺曼·施瓦茨科普夫说："如果科威特出产的是胡萝卜而不是石油，他们就不会把我派到这里了。"

贪婪无非就是过度渴望拥有尽可能多的财富，但是从不与其他人一起分享这些财富。它是一种永不满足的罪恶。

5. 愤怒

愤怒只会导致伤害和杀戮。

——巴尔塔沙·葛拉西安

嵌入每个人内心的愤怒，是暴力的发动机。这种愤怒有巨大的毒性，即使非常温和的人有时也会变得暴力起来。愤怒也在指导地缘政治行动的时候起着主导作用。当愤怒导致暴力循环时，真正的问题就出现了。这种暴力就像从斜坡上滚下的雪球，不仅很难制止，而且其最原始的野蛮性还在不断增加。不要忘记德国哲学家和

诗人弗里德里希·尼采所说过的话：与恶龙缠斗过久，自身亦会成为恶龙。

古典主义者也害怕愤怒。吕齐乌斯·安涅·塞涅卡将愤怒比作一种酸。这种酸对储存它的容器所造成的伤害，远比将其倾倒在任何物体上所造成的伤害大得多。这种反思与阿尔伯特·爱因斯坦在1932年写给西格蒙德·弗洛伊德的信中所提出的内容相似："人们的内心深处有仇恨和毁灭的欲望。通常情况下，这种激情处于休眠状态，只有在非常条件下，才会迸发出来。但是调动这种激情，使之成为一种集体癫狂的力量，相对而言并不太困难。"

6．嫉妒

在生活里的所有紊乱中，嫉妒是唯一没有人承认的紊乱。

——普鲁塔克

如今，嫉妒可能与对不公正的看法联系在一起。目前的卫星电视和互联网等，使世界上的大多数人能够更容易地了解世界其他地区正在发生的事情，而在几年之前，通信手段还没有这么发达。这种对世界其他地区的了解深受物质主义的影响，而物质主义提倡的幸福在于对物质的占有。这使得弱势群体开始思考，为什么他们不能享有其他人所享有的丰富物资。这曾推动了寻找"地球天堂"的移民运动，但是它只不过是嫉妒的一种形式。从某种意义上讲，嫉妒不一定是有悖常理的，甚至经常是合法的，人们只是渴望拥有与其他人相同的东西。

嫉妒有两种类型：一种是一个人渴望通过个人努力——勤奋学习或辛苦工作，拥有在别人身上所看到的东西。这种嫉妒具有建设性，是合理、合法地推动进步的发动机。正如西班牙作家米格尔·

德·塞万提斯所说的，“野心——慷慨的野心，是那种想要改善自身状况又不损害他人的野心”。还有一种嫉妒是以卑鄙和下流的手段，牺牲他人的利益来满足自己。遗憾的是，第二种嫉妒比第一种嫉妒的范围更广泛。

在各国之间也存在嫉妒，国家之间存在的差距，是产生不稳定及冲突的重要因素。根据伯恩哈德·冯·比洛的说法，在“一战”之前，德国人从未被人爱过；但是随着他们的进步，他们开始被憎恨。这也是皮埃尔·塞文特所看到的。他认为，自古以来，富裕和人口稀少的土地一直吸引着贫穷和人口过剩地区的人们。世界上没有比既是富人又是弱者更糟糕的事情。

历史上因为享有特权地位和享受最大权力引起他人嫉妒而导致衰败的典型例子，就是圣殿骑士团。圣殿骑士团积累了大量的财富并组织了一个高效的经济体系，结果却引起了国王和教皇的嫉妒。满怀嫉妒的法国国王，于1307年发动了一场消灭圣殿骑士团的运动。最终，圣殿骑士团的大部分财产都落入了法国之手。

7. 傲慢

一些国家总认为自己是最先进和最发达的国家，还鄙视、羞辱甚至想要改变其他人类群体的生活和社会组织方式。

塞缪尔·P. 亨廷顿在他的著作《文明的冲突》中巧妙地描述了西方的傲慢：

“在西方文明之中，人们对其文化的普遍性深信不疑，并相信他们的优越权力尽管在衰落，但赋予了他们将这种文化扩展到全世界的义务。因此，西方和伊斯兰世界之间存在冲突。伊斯兰世界的人们坚信自身文化的优越性，但是担心自己的权力处于劣势。”

在1848年的一次演讲中，英国外交大臣帕默斯顿勋爵毫不掩饰地表达了英国人的傲慢态度：“我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英国人在道德、社会和政治方面处于文明的顶端。我们的任务是向其他国家展示道路并引导他们前进。”

在那些身居高位特别是担任公职的人身上，傲慢也时有发生。教皇亚历山大六世说，统治者从不听取真相，最终也不想听到真相。或许正如康德指出的那样：拥有权力，不可避免地损害了自由判断的理性。从这个意义上说，由于短视、缺乏信息和历史创造力，美国统治者相信他们的民主制度和生活方式可以应用于任何地方。

乔治·弗里德曼说，理想主义总是等同于骄傲。历史上，以理想的名义制造了太多的痛苦和悲剧。一些人挥舞理想主义的大旗，发动了很多不必要的战争，毁灭了很多国家，夺去了很多人的生命。被自己的想法所蒙蔽的理想主义者往往无法理解他人的想法，通常也不愿意去理解他人的想法。

8. 野心

世界上最大的邪恶是什么？非常清楚，是对权力和金钱的野心。这种野心是已经发生及将要发生的所有不幸的万恶之源。

——季诺

《为什么有战争？》收集了爱因斯坦和弗洛伊德之间的通信，引起了人们对信件内容的关注。在信中，爱因斯坦提出了要与弗洛伊德讨论的问题：有没有办法使人类免受战争的蹂躏。希特勒上台之后，爱因斯坦决定放弃德国公民的身份，并移民美国。

这封信深刻反思了人类的野心，例如人们对权力的渴望和对金钱的膜拜。对权力的渴望是所有国家统治阶级的典型特征，这种渴望能够持续下去，是因为得到了另一团体的行动支持，这个团体的动机纯粹是谋利。我尤其注意到，这个规模不大却十分坚定的团体，将战争、制造与贩卖武器看作扩大个人利益、增强个人权力的机会。对于大多数人来说，战争意味着损失和痛苦，这一小团体是如何做到扭曲大多数人的意志，使其为自己的野心服务的？（在所提到的大多数人当中，不包括那些选择了战争作为职业的士兵，因为他们相信自己是为了捍卫民族的最高利益而战斗。）

毫无疑问，对权力的渴望也引发了其他一些愿望，例如支配他人、获得大量金钱以满足各种欲望等。他们以其他人的利益为代价使自己脱颖而出，因为所有一切都建立在比较的基础之上，为了让自己更好，其他人就必须更糟糕。

后记

要想获得真理，必须在一生之中把世界上所有的事物都怀疑一次。

——勒内·笛卡尔

在日益复杂的世界当中，受技术特别是通信技术发展的影响，各种变革迅速发生，我们这个时代存在着巨大的不确定性。

目前，大国只是通过代理人和所谓的“混合战争”开展这种斗争。而“混合战争”包括经济胁迫、恐怖主义、犯罪活动及引发内乱等。在这种情况下，在全球范围内，通过经济进行的对抗显得十分突出。所有国家都积极或消极地参与其中。大国之间也持续发生地缘政治斗争。这种斗争的实质，是通过情报机构、外交部门、特种部队和全球范围内的文化输出发挥自己的影响力。

网络空间已经变成了对抗的主要战场，斗争的方式主要有盗取数据、破坏或篡改系统和服务器等。此外，还有其他因素导致了世界的不稳定，例如：不受控制的大规模移民运动、全球变暖、一些国家对权力和扩张的渴望、健康风险、不可预测的自然灾害、恐怖主义和世界诸多地区的不稳定等。最重要的是，唐纳德·特朗普担任美国总统后，新的世界秩序正面临极大的不确定性。

解决之道在于和平共处。每个国家，无论大小，都能够根据自己的意识形态体系和所处环境（发展程度、历史、文化等）发展，同时，不把自己的意识形态强加于人。

和平共存与和谐相处，并不要求所有团体和个人完全融合，更不要求大多数人拥有一样的生活方式。只要所有人能够融入社会，

具有存在感，能够分享权利和义务，能够容忍差别就足够了。社会的共同原则应该是对法律的完全尊重。

同样，必须保证普遍的和平，资源必须在国家内部和国家之间公平分配，否则总会有不稳定因素。遗憾的是，现实社会并不是这样的，而且有很多人怀疑这样的社会是否会在未来出现。正如我想说的那样，人类的野心、控制欲、对财富和荣誉的渴望、骨子里的不善良、对他人的蔑视等，构成了一个人类似乎无法逃离的恶性循环。

本书所描述的地缘战略被一些西方大国反复使用。它们经常披着人道主义的外衣。这些国家在叙利亚和伊拉克当前的冲突中利用大众传媒，使人们越来越难以了解事情的真相。目前在欧洲建立的难民营中所发生的恐怖场景就是对穷人的利用。

“抽梯子”仍然是强国的一个基本手段，强国不希望其他国家也登上统治世界的高塔，因此不让其他国家拥有核武器或使用其他货币进行贸易。

被大肆吹嘘的国际司法体系只不过是一些西方大国手中的工具。正如我们在中东等地发生的冲突中所看到的那样，国家司法体系成了这些国家随意使用的工具。

为了掩盖对权力的攫取，西方大国使用“香槟杯”战略。为了出售大批武器，这些国家制造敌人，创造需要。

宗教热情被某些人利用，但是大多数时候，其背后的真正目的被追随者忽视了。追随者经常毫不犹豫地采取最野蛮的行为来捍卫自己的信仰。

“促进分裂”是一个经过精心计算的、使全球巴尔干化的战略。这种始于欧洲的战略，可能由某种强大的力量所领导，影响到了所有大陆，其目的是更好地控制世界。

“间接控制”也可以通过控制燃料和能源来实现。水也是如此——由于城市人口的增长和生活水平的提高，水的直接或虚拟消费将会增加。

从我在本书中揭露的所有内容可以推断，没有好与坏，也没有更好与更坏，因为所有国家都以自己的方式和拥有的手段追求相同的目标。实际上，好或坏，总是主观的。所有情报部门和军队基本上都做同样的事情：捍卫自己国家的利益。

致谢

我首先要感谢Ariel出版社的主任弗朗西斯科·马丁内斯·索里亚，正是他鼓励我写这本书。没有他的良好建议和不断支持，就没有这本书的诞生。

我也必须感谢我的家人。我的孩子们一直给予我鼓励，当我被其他活动累得喘不过气的时候，他们鼓励我不要放弃。此外，我的女儿艾琳，像专业的记者一样，督促我严格地修改内容。

在写作过程中，有很多艰难的时刻都是我的妻子陪我度过的。如果没有她的陪伴，我相信我永远不会完成这本书。

我也有幸获得了一些好友和学生的大力支持。他们在获悉我将写这本书时，就主动提出要提供帮助。他们像文献专家和研究人员一样，为我提供思路，帮助我修改草稿。

还有一些同事为本书的写作提供了帮助。空军上校安赫尔·戈麦斯·德阿格莱达毕业于参谋学院，是一位有能力、有才干的军事专家。陆军中校德尔芬·马里尼奥·埃斯皮涅拉曾任首相办公室技术顾问，现供职于工程师部队，是一位颇具查找错误天赋的军人。国民警卫队成员路易斯·安东尼奥·贡萨雷斯·弗朗西斯哥是一位杰出的研究员和分析家，一直为我提供建议。丹尼尔·马丁·门松是军事历史和战略的爱好者，他不遗余力地向我提供宝贵的帮助。社会活动家马里奥·桑切斯·格拉萨是良知的代言人。克拉拉·帕拉西奥斯·费尔南德斯显露了超常的积极性和工作能力。努里亚·赫尔南德斯·加尔西亚也在本书的撰写过程中，发挥了关键作用。

当然，我要把最热烈的感谢送给你们所有人——我的读者们，感谢你们不厌其烦地拿起这本书。我希望这本书能对你们有用，也希望你们能喜欢阅读这本书。

经纬度

大国霸权

5000年
世界海陆空争霸

SUPERPOWER
HEGEMONISM

英美是怎样
一步步
主宰全球的

[日] 宫崎正胜 —— 著　　米彦军 —— 译

21世纪前20年，最具颠覆性的世界史作品之一

解密5000年来，全球制霸的接力棒到底是如何传递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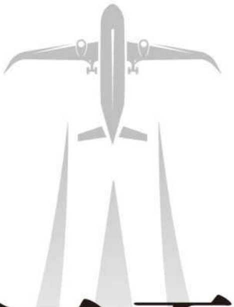
复旦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　日本研究中心研究员　冯玮　倾情推荐

浙江人民出版社



SUPERPOWER
HEGEMONISM





大国霸权

5000年世界海陆空争霸

[日] 宫崎正胜 —— 著　米彦军 —— 译

浙江人民出版社

浙江省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章图字：11-2019-396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大国霸权：5000年世界海陆空争霸/（日）宫崎正胜著；米彦军译. —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20.7

ISBN 978-7-213-09753-9

Ⅰ．①大… Ⅱ．①宫… ②米… Ⅲ．①世界史－通俗读物 Ⅳ．①K109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20）第095504号

HAKEN NO SEKAISHI by Masakatsu Miyazaki
Copyright © 2019 Masakatsu Miyazaki
All rights reserved.
Originally published in Japan by KAWADE SHOBO SHINSHA Ltd. Publishers, Tokyo.

This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is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KAWADE SHOBO SHINSHA Ltd. Publishers，Tokyo c/o Tuttle-Mori Agency, Inc.，Tokyo
through Hanhe International (HK) Co.，Ltd.

大国霸权：5000年世界海陆空争霸

［日］宫崎正胜　著　米彦军　译

出版发行：浙江人民出版社（杭州市体育场路347号　邮编：310006）

市场部电话：（0571）85061682　85176516

责任编辑：沈敏一

责任校对：姚建国

责任印务：聂绪东

封面设计：今亮后声 HOPESOUND pankouyugu@163.com

电脑制版：尚艺空间

印　　刷：北京阳光印易科技有限公司

开　　本：710毫米× 1000毫米　1/16

印　　张：14.75

字　　数：148千字

插　　页：4

版　　次：2020年7月第1版

印　　次：2020年7月第1次印刷

书　　号：ISBN 978-7-213-09753-9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市场部联系调换。

序

《三国志·吴书·吕蒙传》中有一句话：“光武当兵马之务，手不释卷。”曹操的儿子曹丕撰写的《典论》中也有一句话：“上雅好诗书文籍，虽在军旅，手不释卷。”可见自三国始，“手不释卷”就作为一个成语开始广泛流传，意思是“书本不离手，形容勤奋好学”。但是，我却认为，如此解释“手不释卷”有以偏概全之嫌。

我们知道，每个人读书的目的虽不尽相同，但概而言之无非两种：一是出于功利，二是因为嗜好。如果出于功利，像我读康德的《实践理性批判》和《判断力批判》那样“手不释卷”，当然堪称“勤奋好学”。原因很简单，作为历史学教授，我除了历史学知识，还必须用哲学思想来填充自己的头脑，说到底，我读此类晦涩难懂的书是职业所需。如果出于嗜好，“手不释卷”则显然难以被认定为“勤奋好学”。这是因为有些书对我们有强大吸引力，甚至到了令人废寝忘食的程度。按鲁迅在《而已集·读书杂谈》中的说法，“凡嗜好的读书，能够手不释卷的原因也就是这样”。我从小喜欢看书，经常“手不释卷”，却也经常为此而挨骂。因为，在我父母看来，那是“看闲书”，是不好好学习，浪费时间。所以说他们会认为我“手不释卷”是“勤奋好学”才怪。

宫崎正胜写的书，正是能够令人因为“嗜好”而“手不释卷”的书。按照我的评价，他是属于教师中“舌头”和“笔头”双全的学者。说宫崎正胜“舌头好”，是因为他原先是北海道教育大学专攻国际交流史、世界教育史的老师，后来又担任日本广播协会（NHK）“世界史”节目的全职讲师。他往往能纵论天下，并且深入浅出，让观众如醉如痴。说宫崎正胜“笔头好”，是因为他写了

《世界史图解》《从地名与地图看世界史》《航海图的世界史：海上道路改变历史》《酒杯里的世界史》《舌尖上的世界史》等著作。他观察世界历史的独特视角和引人入胜的叙述方式，让这些书都成了畅销书。

当然，阳春白雪和下里巴人，大家各有所爱。我作为世界史教授，当然清楚畅销书未必真正具有学术价值。我之所以喜欢并愿意推荐宫崎正胜的《大国霸权：5000年世界海陆空争霸》，不仅是因为这本书具备让喜欢历史、嗜好读书的朋友“手不释卷”的基本要素，更是因为这本书展现了作者俯瞰世界的独特视角。

被誉为“指导未来历史研究的制宪人”的爱德华·卡尔，在《历史是什么》一书中写道：“历史是历史学家与历史事实之间连续不断的、互为作用的过程，也可说是现在与过去永无休止的对话。”为什么是“永无休止的对话”？因为，历史研究有三要素：史实、史料、史家。史家是通过史料认识史实的。前辈史家有意的筛选和无意的疏漏，使后辈始终有理由质疑，他或她的论述是否真实？而后辈史家能否以新的视角和视野，对历史重新进行考察也是一个问题。就这个意义而言，历史研究也是不断求“真”的过程，尽管这种“真”或许永难求得。正所谓“虽不能至，心向往之”。

什么是历史？在汉语中，历史指“过去的事”和“记载和解释过去的事的学科”。在西方语言中，无论是英语的history、法语的histoire，还是瑞典语的história、西班牙语的historia，均源于古希腊语Ἱσ τ ο ρ ία ι ，意为“对过去事实的记载”。也就是说，中西方对“历史”的释义，并没有差别。当然，如何记述“过去的事实”，即便是史学家也迥异其趣。概括而言，主要分为两种。一种是直线型，即把历史分为古代史、中世纪史、近代史、现代史。这是最为正统的叙史方式。例如，吴于廑、齐世荣主编的《世界史》（六卷本），就是遵循这种体例。还有一种是区域型，

即将世界各国分别划入不同的文化或文明区域进行研究。例如，德国历史学家奥斯瓦尔德·斯宾格勒在《西方的没落——世界史的形态学概论》中，划分出8种发展各异的文化，接着逐个细致考察其各个时期的不同现象，揭示不同文化产生、发展、衰亡及毁灭的逻辑规律。复旦大学历史系张广智教授在《西方史学史》中评价道："在20世纪的德国乃至西方史学中，斯宾格勒占有重要的一席之地，他是影响深远的文化形态史的创立者。"

但是，宫崎正胜的这本书，既不是按时期，将世界历史划分为古代至现代，也不是按区域，将世界历史划分为不同文化，而是明确提出"世界史可以分为陆、海、空三个阶段"。按照他的观点，"陆地是指亚洲和欧洲大陆，海洋是指连接大陆的大西洋、印度洋、太平洋，空域则由飞机飞翔的天空和因特网的网络空间组成。蒙古、英国、美国是分别于世界史的陆、海、空三个阶段相对应的三个霸权国家"。阿拉伯裔美国学者、世界体系理论代表人物珍妮特·L．阿布·卢格霍特在其1989年出版的《欧洲霸权之前：1250—1350年间的世界体系》一书中，曾提出在16世纪现代世界出现之前，就已经存在一个先进的"13世纪世界体系"，这个体系覆盖了从西北欧到中国的广袤地区，由西欧、中东和远东三个中心地区组成，三者均衡发展，不存在统辖整个世界体系的霸权势力。但是，宫崎正胜在《大国霸权：5000年世界海陆空争霸》里表明，他并不认可这种说法，恰恰相反，他正是从"霸权"的角度，为我们讲述了一部不一样的世界史。总之，我认为本书既能为欣赏"阳春白雪"者提供专业启示，又能为喜欢"下里巴人"者提供知识营养，值得大家都来一读。

冯玮

2020年3月31日

前言
世界史可以分为
陆海空三个阶段

蒙古、英国、美国意味着什么

文明自诞生至今，大约过了5000年。在这长达5000年的世界史中，有很多霸权国家。如果仅允许列举三个最著名的话，大多数人会选择蒙古、英国和美国。

在过去5000年中，世界史的主要舞台按照时间顺序排列分别为：陆、海、空。即具体可以分为陆地的历史、海洋的历史和空域的历史。在这里，陆地是指亚洲和欧洲大陆，海洋是指连接大陆的大西洋、印度洋、太平洋，空域则由飞机飞翔的天空和因特网的网络空间组成。蒙古、英国、美国是分别于世界史的陆、海、空三个阶段相对应的三个霸权国家。今天，美国正作为天空的霸权国家君临天下。但位于亚欧大陆的中国也越来越强大，在世界上的地位已经举足轻重。

尽管世界史发生了从陆地到海洋再到空域的这一结构性变化，可是日本属于岛国，因此一直以来日本人都不去理会这些变化而自顾自地生活。不过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日本的广岛和长崎化为一片废墟，这让日本人首次确确实实地意识到了“世界”的存在。

我们可以说第二次世界大战前的日本人没有学过世界史。可是为了在化为焦土的国土上实现复兴，日本人又不得不了解现实世界和世界历史。1949年，即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四年之际，日本进行了教育改革，出现了“新制高中”。随后，新制高中开设了世界史

课程。但是，1949年在日本大学里只开设了东洋史学科与西方史学科。众所周知，东洋史学科主要讲的是中国的王朝更替史。而西方史主要讲欧美各国为主的历史，它形成于19世纪的欧洲，是立足于所谓的基督教式进步史观。在江户时期以前，日本是以中国为学习榜样的，但在明治维新以后，日本便改以欧洲为学习榜样了。所以，东洋史对日本人理解中国不可或缺，西方史对日本人理解欧美至关重要。然而，不论东洋史还是西方史，都不是世界史，都不能用来真正理解世界。

日本在东洋史教学中应用了王朝更迭、变迁的理论框架，这一框架产生于2000多年前，可以说非常陈旧。相比之下，日本的西方史受到进化论的强烈影响，属于一门年轻的学问。对日本人来说，东洋史和西方史都是日本人所接受的外国文明的一部分。外国文明是日本人模仿的对象，但日本人在模仿中并没有用自己的头脑来思考世界。

到了19世纪，欧洲的西方史构建起强大的体系，并把东洋史纳入到了这一体系当中，最终形成了世界史的框架。在这种情况下，日本的学校开始开设世界史课程。对岛国日本来说，世界史的产生是一件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大事。

随着苏联解体，冷战结束后，经济全球化进程加速，亚洲经济在世界上的地位越来越重要。因此，有必要编写新的世界史。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人们深感有必要大幅度地对世界史框架进行修改。当时，我也在思考这个问题。正因如此，我入选世界史框架制定委员会，这个委员会负责制定日本高中《世界史》的教学大纲。

制定一个什么样的《世界史》教学大纲，才能让学生从整体上把握世界史的全貌、了解世界的变迁，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经过委员们的不懈努力，最后制定的世界史教学大纲概要，由以下三

个部分组成：其一，各区域世界和交流；其二，一体化的世界；其三，当代世界和日本。制定这一教学大纲，旨在让学生们从这三个部分掌握世界历史。这就是在1999年发布的《世界史A》的简单教学大纲框架。接着，委员们以上述三个部分的框架为基础，制订了学习目标，详情如下：

1．从风土、民族、宗教等角度论述以亚欧大陆为中心形成的各区域世界的特征。在这部分中，教师主要应讲述各区域世界的相互交流，因为这是世界一体化过程中的重要过渡阶段，让学生们意识到这一点至关重要。

2．16世纪以后，世界范围内商人的商业版图不断扩展，工业革命后，资本主义制度也随之确立起来。在这一历史背景下，世界一体化进程加速。在这一阶段，我们应该让学生了解欧洲的动向以及日本等亚洲国家是如何应对欧洲的动向的。

3．当今世界一体化进程加速，我们应让学生理解当今世界的大环境和一体化进程，在此基础上再让学生就人类的课题进行思考。与此同时，让学生理解世界的动向及其与日本的关系。

上述世界史教学大纲的概要介绍得枯燥且抽象，我们简而言之可以概括如下：其一，亚欧大陆有着悠久的“陆地”历史，其代表性的霸权国家是蒙古帝国；其二，海洋占地球表面的七成，大航海时代以后，海洋国家开始支配陆地国家，人类进入海洋国家主宰的历史阶段，海洋国家主宰的历史阶段持续了约450年，这一阶段的霸权国家是英国；其三，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飞机和因特网等将世界连为一体，从而进入了空域的历史阶段。空域的历史阶段刚刚开始，其代表性的霸权国家是美国。

如果我们对蒙古帝国、英国、美国这三个霸权国家的形成过程，以及由这三个霸权国家维持的世界秩序进行比较，就可以清楚地看到世界史按照时间顺序发生了陆、海、空三个阶段的变化。

因此可以说，在日本高中历史教科书《世界史A》中，就是分陆、海、空三个阶段来讲述世界史。在这一框架下，让学生理解世界一体化的进程和霸权的位移，掌握世界变迁的轨迹。此前的世界历史教科书只不过是为考生应试而编写的知识的罗列，杂乱无章。这次编写的世界史教学大纲与以往不同，可以让学生理解世界史的结构，简单易懂。

换个角度来说，人类文明出现以来已经过了5000多年。在这5000多年间，15世纪中叶以前属于陆地的历史，15世纪中叶至20世纪初属于海洋的历史，而空域的历史则刚刚经过一个世纪。当今的历史书籍非常重视世界一体化这个视角，而研究世界一体化的美国历史学家麦克尼尔和法国的历史学家布罗代尔的著作，更是广受读者欢迎。日本处于亚洲和欧美的过渡带，更应研究世界一体化。日本作家和辻哲郎写的《闭关锁国》和《风土》、饭冢浩二写的《东洋史和西方史之间》等研究世界一体化的著作也是脍炙人口。

综上所述，世界史的主要舞台是陆地、海洋、空中，陆、海、空的代表性霸权国家分别是蒙古帝国、英国、美国，本书将在各个阶段霸权秩序的形成和维持进行论述的基础上，对世界史的构成进行深入剖析。我相信本书对读者思考世界史问题定会大有裨益。

宫崎正胜

2019年6月

目　录

序

前言　世界史可以分为陆海空三个阶段

导读　霸权从陆地向海洋、空域的转移

陆海空的历史年表

霸权从陆地向海洋、空域的转移

对陆地和海洋的概观

对陆地、海洋、空域这三个霸权进行比较

第一编　陆地霸权和蒙古帝国

第一章　陆地世界是经过长年累月形成的

干燥地带产生了农业

四大文明都发祥于干燥地带

商人是连接农民和草原牧民的桥梁

地中海是干燥之海与交易之海

陆地世界的成熟引起的精神革命

马背上的游牧民主导着陆地世界

陆地世界向湿润大地扩张

第二章　波斯、罗马、秦等在陆地世界建立的地区霸权

波斯帝国和罗马帝国

东亚的“飞地帝国”—秦和汉

第三章　欧亚大陆经济一体化始于阿拔斯王朝

伊斯兰教诞生于不毛之地的阿拉伯沙漠

阿拔斯王朝通过商业统一了的伊斯兰世界

第四章　蒙古帝国是如何掌握欧亚大陆霸权的

陆地世界的重组始于大草原

通向和平的蒙古帝国之路

忽必烈连接欧亚

北京将草原之路和海路连在一起

第二编　海洋霸权和大英帝国

第五章　欧洲人发现海洋，进入大航海时代

亚欧大陆是大洋中的岛屿

陆地世界依然如故

人们了解了大西洋、太平洋的大致情况

移民扩大了殖民地，海洋产生了资本主义

从海路也能到亚洲

第六章　在小国荷兰、英国主导下向海洋世界转型

从寒冷的海洋掀起的世界重组大潮

荷兰因为鲱鱼而成为海上马车夫

英国是如何取代荷兰的

大西洋三角贸易迎来鼎盛时期

第七章　工业革命和信息革命为英国的霸权打下了基础

机械制造的棉布让陆地世界的经济崩溃了

铁路、蒸汽轮船、电信改变了世界面貌

第八章　英国确立海洋霸权是否太顺利了

没有进行战争而扩大势力的新模式

各陆地帝国崩溃的过程

海洋世界通过贸易、经济、阴谋对陆地世界进行重组

第三编　空域霸权和美国

第九章　移民大国美国在新大陆发展迅速

欧洲的扩张改变了新大陆

美国向移民大国、海洋帝国转化

第十章　欧洲各国衰落了，美国经济一枝独秀

对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反思

美国发明了飞机、汽车和收音机

第十一章　美国掌握的空域霸权及中国的和平崛起

美国掌握霸权是从亚洲开始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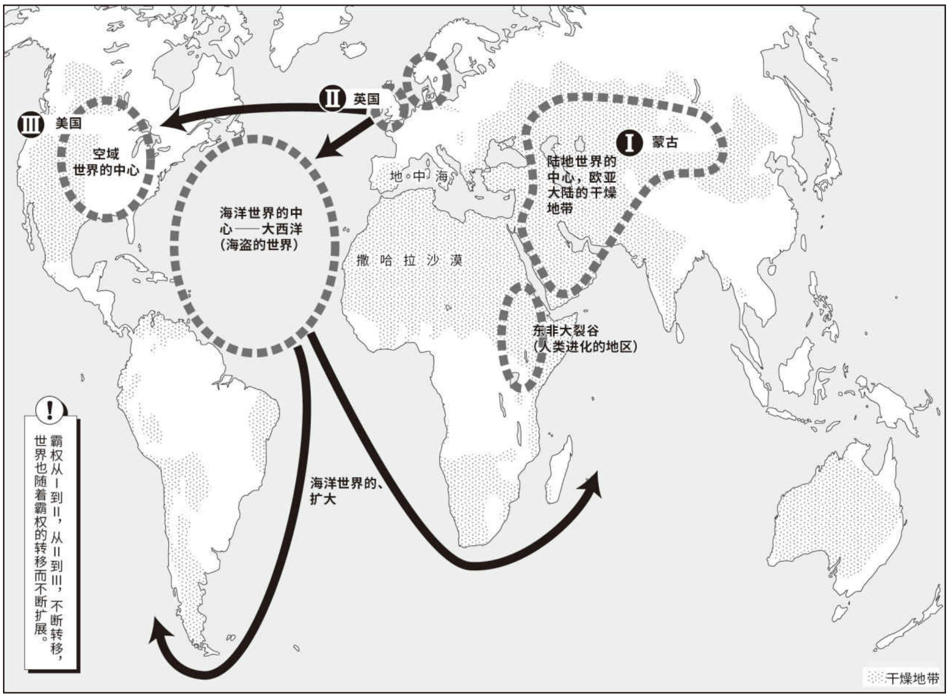
真正意义上的空域霸权始于互联网

“霸权企业”GAFA以及中国的应对措施

参考文献

返回总目录

导读
霸权从陆地向海洋、空域的转移



霸权转移的三个阶段

陆海空的历史年表

文明诞生

约1万年前	在气候干燥的约旦种植麦类。
前3000年	四大文明诞生。
前550年	波斯帝国整合了三大文明。
前330年	亚历山大大帝征服了波斯帝国。
前3世纪	中国人在气候干燥的东亚大地上建立了秦王朝。
前2世纪	在气候干燥的东亚大地上，汉王朝和游牧民族

	相争。
前1世纪	罗马在地中海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海洋帝国。

- 陆地历史

4世纪	拜占庭帝国和波斯萨珊王朝相争（4世纪至7世纪）。
4—6世纪	游牧民族南下，游牧民族统治着中国气候干燥的地区。中国江南、朝鲜半岛、日本列岛等气候湿润的地区开始有政权建立。
7世纪	阿拉伯游牧民族建立阿拉伯帝国。
8世纪	阿拔斯王朝在亚欧大陆建立巨大的商业贸易区，在印度洋、孟加拉湾、南海，人们利用季风进行航海活动，开展贸易，亚洲进入大航海时代。
10世纪	宋朝建立，中国的经济中心南移至气候湿润的地带。
11世纪	突厥人建立塞尔柱帝国。欧洲进行中世纪农业革命。

第一次转换期

- 陆地历史

13世纪	蒙古帝国统一了亚欧大陆的气候干燥地区。
15世纪	世界进入大航海时期，人类发现了“海洋”世界。
16世纪	甘蔗种植园等发展起来。新大陆的白银开始在全世界流通。

17世纪	“海盗的后裔”荷兰掌控了地中海，在世界海洋上取得霸主地位。荷兰在世界各地开展贸易，因此有“海上马车夫”之称，资本主义得以发展起来。

II 海洋历史

18世纪	霸权从荷兰转移到英国手中。英国发生工业革命，环大西洋地区发生革命，大西洋地区建立了民族国家政治体制。
19世纪	欧美国家铁路建设发展迅速，发生了第二次工业革命。南北战争结束后，美国社会实现了重组。之后，美国经济突飞猛进。

第二次转换期

III 空域历史

1869年	能通行蒸汽轮船的苏伊士运河通航，世界进入电气时代。
1903年	《巴拿马运河条约》签订。莱特兄弟进行了第一次飞机试飞。
1914年左右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飞机开始应用到军事上。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飞机开始应用到民用领域。
20世纪后半期	美国确立了空域霸权，喷气式飞机开始普及。
20世纪末	由于因特网的发展，电子网络空间开始覆盖全球。

霸权从陆地向海洋、空域的转移

陆地和海洋关系密切

我们生活在地球上，陆、海、空是我们主要生活的空间。为了对陆地、海洋与天空的关系有个整体印象，我首先从水循环的角度就海洋和大气循环支撑着陆地生活这一点进行说明。

地表的七成是海洋，也就是说水有的是，要多少有多少。然而，世界史的大部分篇章却是在沙漠、草原这类干燥的大地上展开的。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结果？

首先我们知道，地球上的水的97.5％是海水、湖泊和地下咸水，淡水只不过占2.5％。海水不能饮用，也不能用来灌溉麦类和水稻。而饮用水和农业用水使用的几乎都是海水经蒸发之后降下的淡水，都源于大海。在赤道附近海水大量蒸发，每天将大量的淡水送往世界各地，形成在全球范围内的循环。在赤道地带一整年高温持续，海水蒸发，不断产生巨大的积乱云。积乱云在上升过程中，一边带来大量的雨水，一边跟随地球的自转而移动，就这样，它变得越来越干燥，最后停留在南北纬23° 26′（南北回归线）附近。

结果，亚欧大陆上形成了广阔的干燥地带，干燥的大地成为世界史的主要舞台。就是说，如果没有海洋的话，我们的陆地世界史是不能成立的。

以前，人类是无法想象水循环全貌的，而今情况完全不同了。我们通过气象卫星可以观测到全球的云的移动，在互联网的网站上也能够实时看到大气的循环。我们就像大魔术师用魔镜确认全球范围内水的移动一样，能居高临下地观测全世界的情况。相信很快，我们对世界史的理解也会发生变化。

历史开始于干燥地带

世界史的大部分是在亚欧大陆东西向的带状干燥地带展开的，因此亚欧大陆的历史悠久。与此相对，日本等所属的温带湿润地区的文明历史较短。为什么历史会开始于条件较为恶劣的干燥环境呢？

众所周知，人类诞生并最初进化的地方是东非大裂谷。在东非大裂谷，类人猿开始用两条腿直立行走，继而进化为智人（Homo sapiens）。然而，由于冰河期的到来，智人的生活条件持续恶化，不得不移居到其他地方。智人离开东非大裂谷后向东迁徙，逐渐来到了气候干燥地带。

在多年前，我写了一本书，名叫《风改变了世界史——季风、偏西风、沙漠》。在这本书中，我就智人的迁徙进行了论述。东非大裂谷基本上是干燥地带，不过智人迁徙到的地方生存环境更恶劣。智人来到了与东非大裂谷相邻的北非、地中海、西亚，乃至中亚、黄河中游等干燥地带。他们从此进入长期忍受干燥和饥饿的历史时期。

从干燥地带的人类在约旦种植麦类开始算，至今已约1万年；从文明在大河流域产生开始算，已有约5000年；从波斯帝国建立开始算，已有约2500年；从阿拉伯帝国建立开始算，已有约1350年；从蒙古帝国建立开始算，已有约800年。干燥地带的历史不仅包含着干燥这层含义，还包含着由干燥而带来的人类与饥饿的斗争、围绕着水和粮食的斗争，在中东、中亚、中国、印度、俄罗斯的部分地区，时至今日这些斗争还一直持续着。概观气候干燥地带的历史，可以从中发现一个清晰的脉络，即气候干燥地带那些创造历史的人们从约3000年前开始，不断向较为肥沃的温带湿润地区扩张。4世纪至5世纪，东亚地区不断对气候湿润的地带进行开发。在这一

时期，日本列岛进入了农耕社会。在11世纪左右（相当于十字军东征开始的时期），欧洲的农业生产获得了长足的进步。但相比较而言，日本在湿润地带进行农业生产的历史要比欧洲长。古代中国，人口占全球人口的20％，与其说是一个国家，不如说是一个世界。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中国既有气候干燥地带的农民和畜牧民，也有气候湿润地带的农民，还有在近代、现代产业社会中出生、长大的市民与商人。也就是说，中国的居民结构复杂，造成中国社会的层次更多、更复杂。

15世纪发现的规模宏大的海洋

占地表面积七成的海洋把大陆作为岛屿分隔开来。古代的波利尼西亚人属于海洋民族，创造了灿烂的海洋历史。在公元前的一千几百年，波利尼西亚人从东南亚沿着一个个岛屿辗转来到东太平洋并在这里定居。在9世纪之前，波利尼西亚人已经发展出庞大的生活区域和居住区域。

波利尼西亚人制造了帆船，上面有一种叫作“浮子”的装置，可以防止翻船。波利尼西亚人乘着帆船，利用星星、风和海流，进行航海活动。在1000年左右，波利尼西亚人在占地球表面积1/3的太平洋上开辟了属于自己的领地，具体包括夏威夷群岛、新西兰、智利的复活节岛，这片海域大致呈三角形，因此被称作波利尼西亚三角地带。时至今日，新西兰原住民毛利人的语言在夏威夷依然能够通用。这一点真令人惊叹不已。

尽管波利尼西亚人进行了大规模的航海活动，但是这一活动并未能将世界史从陆地时代转变为海洋时代。这是因为波利尼西亚人的海洋世界是孤立的，并未跟世界史的主流——干燥大地的历史连为一体。

8世纪，在阿拔斯王朝的统治下，印度洋被纳入世界史——这是亚洲的大航海时代。可以认为这是陆地的阿拉伯帝国让海洋处于从属地位的一个历史事件，但这并非是以海洋为中心对世界进行了重组。

从15世纪中叶开始，世界进入了大航海时代。亚洲的大航海时代与世界范围内的大航海时代有所不同。这是因为大西洋远离亚洲，必须通过欧洲才能到亚洲。在开发大西洋过程中，人们发现大西洋的面积要超过亚欧大陆，以陆地为中心的世界开始向以海洋为中心的世界过渡。该过渡第一阶段的主角是伊比利亚半岛的葡萄牙和西班牙，第二阶段的主角则是寒冷北海地区的海盗后裔荷兰、英国。与此同时，在哥伦布等人前赴后继不断航海的探索下，地球的形象在人们脑海中形成了，而后，哥白尼又将其进行了系统化和理论化。人们这才意识到地表的大部分是海洋，曾几何时，欧洲人认为亚欧大陆是“唯一的世界”，而今欧洲人意识到事实上亚欧大陆只不过是一个大型的岛屿而已。这可以看作欧洲人通过大西洋而认识了世界。

世界进入陆地从属海洋的时代

海洋世界对陆地世界进行了重组，其中17世纪至18世纪属于重组的准备时期，19世纪属于重组的完成时期。与长达5000年的陆地世界史相比，海洋世界史包括过渡期才有500年，时间非常短。

从世界范围看，海洋统治陆地这一现象发生在日本明治维新到日俄战争这段时间。在这段时间里，铁制的大型船只实现了量产，连接陆地的蒸汽轮船航线被开辟，使得海洋统治陆地成为可能。英国抓住这个机遇，掌握了世界霸权。当海洋将各大陆连在一起时，就形成了真正意义上的世界，这样一来世界史就变得非常简单。

17世纪以来，世界开始向海洋连接陆地的时代过渡，在这一过程中，北海周边的小国荷兰、英国做出了贡献。在16世纪的宗教改革时期，在荷兰和英国兴起的新教主张脱离教皇统治的天主教欧洲，建立新欧洲。当时，英国与荷兰的商业和手工业发达。本来，荷兰和英国较弱小，但是由于拥有正确的地理观、掌握先进的航海技术、具有新型价值观和社会观，所以能按照自己的意愿改造世界。这样一来，欧洲的中心开始从地中海周边向英国、荷兰所在的北海周边转移。德国的法学家卡尔·施米特在《陆地和海洋》中指出："大航海时代是人类历史上发生的，最重要的空间革命时代。"由于广阔无垠的海洋进入了人们的视野，唯一的亚欧大陆的陆地"世界"蜕变成为多种多样的岛屿中的一个。

英帝国创造了西欧居领导地位的世界

1867年，日本明治维新。之后，爆发了甲午战争和日俄战争。在这一时期，世界史从陆地时代向海洋时代过渡，其前提条件是蒸汽轮船将世界各地连在一起，以及海底电缆的铺设使得远程通信在全世界普及。19世纪全球化进程迅速发展，英国利用这一有利条件掌握了海上的霸权，可以说英国是很幸运的。不久，英国统治了世界陆地的1/4，在第一次世界大战（1914—1918）开始前，更是拥有了世界股票市场的一半股份。从18世纪下半叶到19世纪初，工业革命和资产阶级革命相继发生。在大西洋周边爆发了美国独立战争、法兰西革命、拿破仑战争、拉丁美洲独立战争（总称为"环大西洋革命"），加速了欧洲和美洲的一体化进程。由于欧洲和美洲新大陆关系密切，所以在互动中不断发生变化：在政治上建立了近代民族国家，在经济上走上资本主义道路，最终形成了现代化的大西洋世界。"海洋世界"就这样首先出现在大西洋周边，英国继而将海洋世界扩展到亚洲、非洲。

19世纪中叶，亚欧大陆干燥地带的各帝国（如奥斯曼帝国等）已经由盛转衰，甚至开始崩溃。以英国为领头羊的欧洲列强开始走上世界争霸之路，占据了大量的殖民地。在霸权国家英国的主导下，世界形势发生了巨大变化。英国等欧洲列强在短时间内破坏了当时存在的体制和秩序，建立起新秩序。世界发生了巨变。究其原因，有以下几个因素：

奥斯曼帝国、莫卧儿帝国、清王朝内部矛盾不断激化，国家迅速衰落；

欧洲发生工业革命，出现铺设铁路的热潮；

19世纪70年代以后，发生了第二次工业革命，钢铁开始出现，机械工业发展迅速；

枪支等火器有了革新；

列强开始瓜分非洲；

向蒸汽轮船过渡的时代开始到来；

海底电缆铺设，远程通信开始普及。

陆地霸权崩溃，英国建立起新的世界秩序，海洋从而开始支配陆地。英国首相迪斯雷利甚至说："我们可以把英国的首都迁到印度。"卡尔舒米特对迪斯雷利的这句话做出了象征性的阐释，指出英国属于海洋帝国，应优先考虑英国在全世界的经济利益，而不应拘泥于本土。所以，首都应当迁到能募集到大量工人的印度。

20世纪以后，美国开始掌握空域霸权

19世纪70年代，第二次工业革命开始。之后，重化工业逐步发展起来，武器制造也随之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与此同时，战争大规模发生。而战争需要消耗大量的财力，可以说是综合国力的较量。首先体现这一变化的是航空武器的出现。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航空武器开始普及，进入可以从空中向陆地和海洋发动进攻的时代。第一次世界大战主要在欧洲进行，第二次世界大战则波及全球。两次大战后，亚欧大陆的各陆地帝国纷纷崩溃，欧洲诸大国也趋于没落。这时，世界霸权逐渐转移到位于新大陆的美国手中。美国一跃成为霸权国家，成为世界的执牛耳者。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和苏联争霸，开始了冷战。这也为美国加强霸权提供了借口。美国将世界霸权从海洋转向空域，从亚欧大陆转向美洲新大陆。1971年，美国黄金储备严重不足，美元不得不进行贬值，这就是“尼克松冲击”。由此美国的霸权也动摇了。之后，美国着手构建空域霸权，通过互联网在全球创建虚拟空间（cyber space），开发IT技术，实现了世界经济的金融化。美国空域霸权的核心内容是通过IT企业构建全球性平台。曾几何时，欧盟、包括日本在内的亚洲国家经济实现了高速增长，对美国的霸权形成挑战，美国则想方设法挫败了这些国家，巩固了霸权。这一点着实令人感到意外。

今天，中国拥有世界1/5的人口，吸引美国企业到中国投资，学到了美国的技术，自身实力得到了增强。在此基础上，百度、阿里巴巴、腾讯等公司成长起来，形成巨大的平台。中国政府公布了“中国制造2025”这一宏伟蓝图，力争在2049年新中国成立100周年之前在工业领域达到世界先进水平。可见，中国已悄然起来。

对陆地和海洋的概观

海洋面积占七成，陆地面积占三成

历史和地理的关系密不可分。要想从陆地、海洋、天空的角度思考世界史，前提是要对地球的轮廓有一个概观。下面我们就简单复习一下世界地理知识。一般来讲，我们在小学到中学期间都要学习世界地理。通过学习，我们知道世界由四个大洋（印度洋、大西洋、太平洋、北冰洋）和七个大洲（欧洲、亚洲、非洲、北美洲、南美洲、大洋洲、南极洲）构成，海洋和陆地的面积占比分别为七成和三成。北半球和南半球相比，陆地所占比例有很大的不同。北半球的陆地面积占北半球全部面积的近四成，而南半球的陆地面积占南半球全部面积的不到二成。因此在历史上亚欧大陆的气候干燥区域是世界史的中心，南半球由于远离亚欧大陆，开发较晚。从人口来看，北半球人口占全球人口的92％，南半球人口仅占8％。

在世界的陆地面积中，气候干燥区（荒漠、草原）占48％，湿润地带占39％，寒冷地带和亚寒带占13％。其中，荒漠地带是指年降水量为250毫米以下的地带，草原地带是指年降水量在500毫米以下的地带。有趣的是，日本的年降水量为1600毫米，不分雨季和旱季，气候非常舒适，这在世界上也是少见的。因此，以日本为例去思考世界和世界史是绝对不合适的。日本不缺水，说到底是一个特殊的地区。日本人如果看不到这一点，就理解不了世界，日本人的世界观也不会脱离闭塞的窠臼。

干燥地带和寒冷地带的优势何在

在亚欧大陆，从北到南依次分布着寒冷地带、干燥地带和湿润地带，这三个地带沿东西方向形成带状。其中和世界史关系最为密切的是从撒哈拉沙漠到西亚、中亚、中国北部的气候干燥地带（亚欧大陆大干燥地带）。实际上，地中海应该属于干燥地带中的“干燥的海”。

亚欧大陆南部受到季风的影响，属于降雨多的湿润地带，适合种植水稻。水稻的收成是麦类的数倍。多雨湿润地带的人很少向其他地区发动大规模的侵略，原因是骑马技术不够娴熟。

寒冷地带的气温最低的月份可达零下30度以下，气温最高的月份也在10度以下。北欧、东欧、西伯利亚、加拿大等亚欧大陆和北美大陆的北部属于寒冷地带。在北海、波罗的海周边，海盗起着主导作用。由于气候寒冷，物资匮乏，这里的人依靠海盗和经商谋生。如瑞典的海盗参与了基辅罗斯的建国，而北海周边的荷兰、英国则率先发展出了资本主义，随后荷兰和英国主导了世界史从陆地向海洋的转换。

对陆地、海洋、空域这三个霸权进行比较

霸权的定义

本书的书名中有“霸权”二字，由于霸权的产生，世界史从陆地向海洋、空域过渡。霸权在英语中是“hegemony”，该词源自古希腊语，指的是雅典率领古希腊城邦结成的联盟对抗波斯帝国。霸权是指国家地位，表示这个国家拥有强大的军事力量、经济力量和丰富的天然资源，具有压制其他国家的实力。不仅如此，霸权国家还会以自己为中心形成、维持和主导霸权国家实行统治的体制框架。世界史从陆地向海洋、空域过渡的过程中，霸权国家分别主导着各个阶段的世界的形成，维持着这一体制框架，一直位于该框架的核心。在世界史的陆、海、空各个阶段，霸权的内容和实质也有所不同。

用一句话来概括，陆地的世界是指部族（血缘集团）在亚欧大陆各地林立的状况。在陆地的世界，有实力的部族通过互助或连姻维持霸权，利用人们希望规避大范围争斗的愿望，维持稳定的粮食生产、维护霸权。表面上掌握霸权的部族采取了王朝的形式，实质上还是属于部族的联合。陆地世界的霸权是靠强大的军事力量获得的，之后部族间希望维持和平，调整利害关系，保障粮食生产的顺利进行，建设和维持道路和水路等基础设施。

我们知道，海洋占地表面积的七成，所以到了海洋连接陆地的时代，海军、商船、制海权、殖民地、势力范围等海上的实力，成为获得霸权的必要条件。欧洲以近代国家取代王朝，这种模式开始在全世界推广。拥有海军力量和经济力量的国家获得霸权。到了19世纪，英国成为霸权国家，构建了由欧洲国家将世界的大部分区域作为自己的殖民地来统治的体系。之后，经过第一次世界大战、第

二次世界大战，欧洲没落了，位于新大陆的美国通过飞机和互联网在全世界构筑了空域的霸权，这一霸权体系一直维持到现在。

陆地、海洋、空域霸权的特色

下面总结一下陆地、海洋、空域霸权的不同之处。

第一种类型——陆地霸权（如蒙古帝国）。

干燥气候区的历史占世界史的大头，在这部分历史中，部族式的结合构成世界的基础（在中东和韩国，时至今日部族依然有重要的地位），王朝不断更迭。有实力的部族建立王朝，维护和平，保障粮食生产的顺利进行。与此同时，通过部族的结合，王朝能支配广阔的土地和大量的人口。随后，王朝的版图不断扩大，最终形成帝国。但部族之间的结合非常复杂，如果强大的部族联合体能够维持和扩大各个部族的利益的话，就会结合在一起；如果各个部族的利益丧失的话，部族的结合体就会解散。因此，霸权总是不稳定的。

如果出现了强势领袖或者部族，就会出现大帝国，如果领袖或者核心部族的能力低下的话，部族联盟就会解体，帝国也会随之消失。陆地的历史很长，罗马帝国、阿拉伯帝国等大帝国接踵而至，而规模最大的帝国则是蒙古帝国，它治下的部族结合体横跨亚欧。

第二种类型——英帝国构建了海上霸权。

海洋将陆地连接起来是最近几百年的事情。海洋霸权国家要想构建海上霸权，海军、商船船队、殖民地等都不可或缺。此外，为了维护自由贸易、国际货币体系等，必须维持和巩固国家间的秩序和殖民地统治。为此，霸权国家制定了国际规则，并划定势力范围。另外，欧洲列强为了发展资本主义经济，对世界进行了重组，

为从陆地世界过渡到海洋世界提供了方便。同时，欧洲列强提供价廉的航海图，制定在公海航行的规则，为充分利用海洋提供了种种便利。

以海洋为中心的世界秩序是一个完整的体系，它使得财富集中在少数几个欧洲国家手中。欧洲列强在亚洲、非洲等大洲的许多地区进行殖民，构建了殖民地统治体系。霸权国家作为执牛耳者，它们一面调整着各国的利害关系，一面维持着殖民地统治。

第三种类型——构建了空域帝国的美国。

美国构建了空域霸权，毫无疑问，空域霸权需要具有绝对优势的空军、海军和陆军航空兵的支撑。陆军、海军是军事力量的基础，对维持空域霸权是不可或缺的。美国是新兴的霸权国家，其霸权是由北约组织等军事同盟、分布在全世界的军事基地、具有压倒性优势的军需产业来维持的。经过两次世界大战洗礼，趁英国没落之际，美国获得了霸权。实际上，美国的霸权还是由世界性硬通货美元支撑着，这使得美国在世界经济中的霸主地位令其他国家望尘莫及。

空域的霸权是新兴强国美国在短期内获得的，而美国也是从模仿英国起步的，也就是说美国几乎原封不动地继承了英国的海上霸权。不过，美国基本上没有殖民地，所以不能照搬19世纪的殖民地体系，不过美国以美国的各州组成的合众国为模板，建立了由190多个国家组成的联合国。这样一来，美国企业可以在全世界自由投资，获取利润。

美国在获得霸权之初，就受到苏联的挑战。因此美国和苏联开始了冷战，而以此为背景，美国的霸权体系日臻完善。1973年，美元与黄金脱钩，不能再兑换黄金。20世纪90年代，美国的互联网和

IT技术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开始构建电子空间的霸权，其主力是以GAFA（谷歌、苹果、脸书、亚马逊）为代表的巨无霸级的IT企业。其实，位于新大陆的美国本来是英国的殖民地，表面上美国标榜消除殖民地、建立公平的世界、尊重人权、普及民主制度，继而创建联合国、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实质上是通过国际主义原则维持霸权。然而，特朗普总统上台后提出了“美国优先”的口号，变更了美国迄今为止的路线。冷战结束后，形成了美国一家独大的霸权体系，而今这一体系开始出现拐点。

由此可见，海洋霸权和空域霸权具有连续性，其作用是多方面的，主要是维持全球性的经济体系和扩大通商贸易，其详情如下：

维持世界和平与治安；

维护国际水运航线和航空路线；

制定法律，保护财产权；

灵活运用国际货币制度；

维护自由贸易体制；

调整经济景气指数；

保障人力、物资和资金的移动；

搞好全球的环保工作。

正在进行的空域霸权的争夺

掌握霸权的强大势力会出现在人们意想不到的地区，其出现的形式也是令人难以预测的。在本书中主要讲蒙古帝国、英国、美国

三个霸权国家，这三个国家顺应世界史的潮流，称霸世界。而这三个国家做梦也没有想到能够掌握世界霸权。

迄今为止，霸权都是在原有的世界秩序崩溃时，通过战争获得的。

蒙古帝国运用强大的骑兵征服了花剌子模、金朝、基辅大公国、阿拔斯王朝、南宋等国家之后，建立了世界霸权。

英国以卓越的海军力量为坚强的后盾，与西班牙、荷兰、法国、亚洲各帝国进行了长期的战争，将自由贸易推向全世界，在此基础上获得了世界霸权。英国获得世界霸权的具体过程如下：

英国从1651年制定《航海法案》开始，到1815年在拿破仑战争中获胜为止，共经历了10次战争（3次英荷战争、7次英法战争）；

工业革命；

在美国独立战争以后的约100年间，英国与欧洲列强展开协调，与此同时，为了扩大其在亚洲和非洲的殖民地，还进行了一系列战争；

铺设铁路、海底电缆、开设蒸汽机船航线；

与沙皇俄国、德国开展外交战。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英国组合使用了上述方法。

美国获得霸权的具体过程如下：

美墨战争、美西战争；

第一次世界大战；

第二次世界大战；

美苏冷战。

越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等在亚洲进行的战争。

经过上述一系列战争，美国取得并维持了世界霸权。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唯一一个不断进行战争的霸权国家只有美国。而今，世界各大国一直在开发核武器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另外，经济全球化趋势不断加深，各大国之间相互依赖程度不断加深，大国之间很难爆发战争。通过战争实现霸权的转移几乎是不可能的。

可以预见，今后是通过贸易战等复杂的过程发生霸权转移，还是通过毁灭性的战争实现霸权转移，现在还很难说。

第一编
陆地霸权和蒙古帝国



第一章
陆地世界是经过长年累月形成的

干燥地带产生了农业

发现有缺陷的麦类实属幸运

陆地世界史的起点就是农业的出现。约1万年前，在东非大裂谷和亚欧大陆干燥地带的结合处，即约旦的溪谷等地出现了农业。说起来，农业的出现与发现有缺陷的麦类关系密切。通常，麦类一成熟，植株就将种子播撒到大地上。为了保存种子，不断繁衍后代，这是理所当然的做法。但人们偶然发现的这种小麦，因发生变异，麦粒竟然不直接落在地上，而是以麦穗的形式存在，这对人类来说是幸运的事情。而农业，就是从人类选择合适的麦类来栽培开始的。与此同时，人类也从收获不稳定的狩猎、采集等向定居生活过渡。这就是古代历史上的农业革命。

一般来讲，植物都有苦味与涩味，这样就可以防止被动物吃掉，保存下种子，从而不至于灭绝。然而，生长在干燥贫瘠的大地上的麦类吸收不到产生毒素的成分，保护自己种子的唯一方法便成了从土中吸收硅素，形成坚硬的壳来保护种子。因此，要食用麦子，必须将麦子磨碎后加工成面粉，再把面粉做成面包。

另外，偶蹄目家畜的习性是雌性以雄性为核心过群居生活。人们掌握并利用这一习性饲养偶蹄目家畜，经营畜牧业，从中获得奶、肉、皮等物。干燥地带的草叶、茎含有丰富的纤维质，动物吃大量的草叶和茎，并且必须有反刍能力。绵羊、山羊、牛都属于反刍动物，这一切都说明畜牧业和气候干燥的大地之关系密切。

为什么麦子的种植会在荒漠地带推广

亚欧大陆的干燥地带由广阔的荒漠、草原和内海构成。但是，麦类只能在特定的荒漠地带生长。荒漠地带降水很少，但干燥气候区生产的麦类大部分出自于此，原因何在？这是因为，在距今5000年左右之时，由于地球暖化，北纬30度附近的中纬度地带越来越干燥。比如占非洲1/3面积的撒哈拉草原变为撒哈拉沙漠，很多牧民沦为难民，移居至荒漠地带的大河（大河的水源来自湿润地带的降水以及周围高山的冰雪融水）流域，麦子的短缺问题更加严重。为此，人们不得不利用荒漠地带大河的水来灌溉旱田。随后，周边有更多难民移居到这里，带来了丰富的劳动力，他们修建堤坝、水渠等，发展灌溉农业。灌溉是指以维持植物的生长为目的，通过人工将水引到田里的一种方法。但仅依靠简单的工具将大河的水转变为农业用水绝非易事。国王、祭司利用自己的权威，通过官僚组织工匠和民众，实施人海战术才使得依靠从外部流来的河水发展灌溉农业成为可能。由于水利、灌溉系统的完善，荒漠地带出现了大片的旱田。

城市是水的控制中心

由上述可知，将荒漠改造为旱田绝非易事。在由久野收翻译、由岩波新书出版的《人类——过去、现在、未来》中指出：控制水位的高低，在洪水退去之后划分界限，强制人民服劳役，征收各种税赋，监督交易，编纂法典，在边境巡逻，这些是出现大河文明的必要条件。考古学家曼福尔德也指出：维护灌溉设施是一项相当复杂的工作，负责这一工作的国王、特定的部族、神官、官僚等为了维护灌溉设施，向百姓征税。这便属于一种“give and take”，亦即既有所得又有所予的关系。而这对麦子的大量生产是不可或缺的。负责水利灌溉的特殊群体住在大村落里，这些大村落不久就演

变为城市。而城市是人工维持水利灌溉体系的控制中心，也是人们聚集的中心，其出现促进了社会的发展。随着城市的形成，人类社会发生了变动，我们称之为“城市革命”。埃及、美索不达米亚、印度河、黄河四大古文明便成为陆地世界的四个核心地带。

下面我们看一下四大文明及其各自的特征。

四大文明都发祥于干燥地带

古埃及文明—尼罗河的赠礼

每年夏季，尼罗河上游的埃塞俄比亚高原上都会刮季风，带来持续的降雨，雨水汇入青尼罗河，最后流入地中海。每年的6月至10月，尼罗河河水大涨，甚至洪水泛滥，就是由于季风带来的大量降雨造成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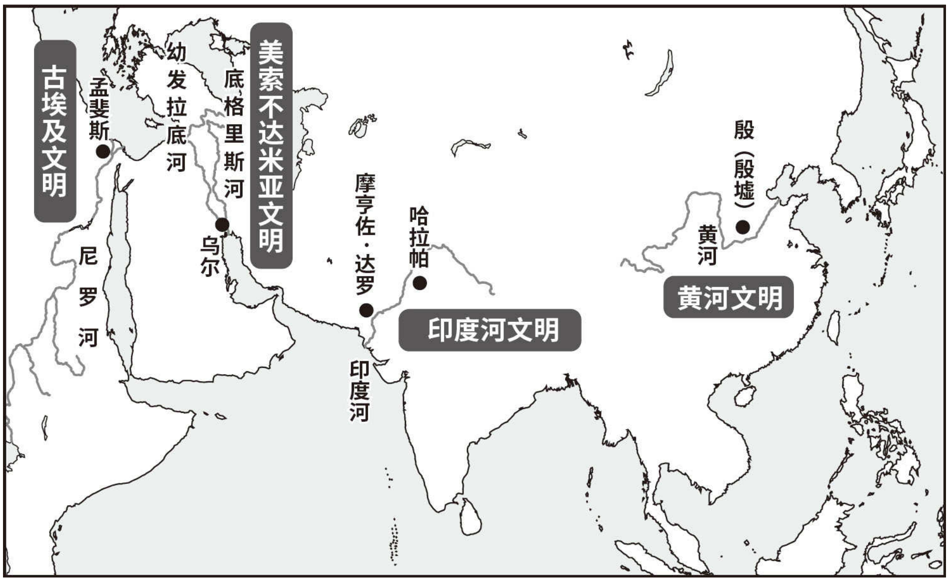
埃及王国首都孟斐斯的年降雨量为26毫米，尼罗河中游的底比斯降水量仅为1毫米。但尼罗河从源头流到这里，统治者还是动员了大量劳动力修建灌溉设施，将沙漠变为粮仓，堪称人间奇迹。与此同时，尼罗河两岸出现了区域性城市。法老在统一尼罗河流域之后，这些城市失去了独立，纷纷被置于首都孟斐斯的管理之下，接着又成为法老的官僚、祭司们统治各地的根据地。埃及的东西两面是沙漠，北面靠海，南面是瀑布。因此，埃及和牧民的交流较少，属于循环型农业社会。而且，埃及一年由洪水泛滥期和旱季这两季构成，所以埃及人在旱季进行农业生产。这是埃及的特色。也就是说，埃及文明属于孤立的文明。因此，埃及文明没有成为世界史的中心。

农牧民混杂的美索不达米亚文明

美索不达米亚的意思是“两河之间的土地”的意思，位于现在的伊拉克。在美索不达米亚平原，每年的水量、洪水泛滥的季节各不相同，原因是土耳其东部的山区冰雪融水是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的源头，而控制水量的难度很大。突发性的洪水和水量过小经常令人们烦恼不已。如挪亚方舟的故事就是以美索不达米亚平原上发生的洪水为原型的。

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这两条河的水量有限，只能在容易灌溉的地区开垦农田，因此位于河口的苏美尔地区最先得到了开发。苏美尔地区的中心城市乌尔的年降水量约为120毫米，与美索不达米亚文明整个历史上的最大城市巴比伦的年降水量相同，大体而言它们都属于荒漠。不过，每个城市都建造了砖砌的神殿塔，通过神的权威来维持城市的秩序。

美索不达米亚的城市具有排外性，对周围的畜牧民不断入侵严防死守，结果逐渐以有实力的城市为中心形成了城邦国家联盟。在此基础上，由实力最强城市的守护神来主持众神会议。相应地，最强城市的僭主演变为国王，国王作为“守护神的总管”统治着广大地区。而拥有强大的军事力量的畜牧民也被置于国王的统治之下。为了维护生活习惯不同的多民族国家的统治秩序，国王以神的名义制定了法律。其中在公元前18世纪颁布的《汉穆拉比法典》最有名，该法典强调“同态复仇”。



干燥地带产生的四大古文明

由和美索不达米亚交易的各城市支撑的印度河文明

因为古印度文尚未得到解读，关于印度河（现在的巴基斯坦）文明尚有诸多不明确之处。不过，当时有摩亨佐·达罗、哈拉帕等城市，最兴盛时有4万多人，城市规划非常合理。印度西部的洛塔尔是个港口城市，有很浓的商业气息，经由波斯湾的巴林岛，和美索不达米亚的各城市开展贸易，交易棉布、木材、红玉髓等物品。甚至在苏美尔人建立的城市乌尔也设有印度河商人的居住地。但在公元前1800年左右，印度文明衰落了，原因如下：

受到西南季风的影响，气候干燥；

人们乱砍滥伐导致沙漠化；

地壳变动，印度河的河道发生变更。

之后，雅利安人从阿富汗方向入侵，征服了构筑印度河文明的达罗毗荼人。雅利安人一边制定等级制度，一边向东迁徙，并于公元前1000年左右在恒河流域的湿润地带栽培水稻。

唯一与海洋隔绝的内陆文明—黄河文明

与古埃及、美索不达米亚相比，黄河流域雨量相对充沛，几乎都是年降水量在500毫米以下的草原地区。因此，黄河流域不修建灌溉设施，便可以种植粟，所以农业形态完全不同于西面种植麦子的文明。当时，小城市称作邑，大城市称作大邑。大大小小的城市修建在黄河中游，都用黄土版筑的城墙围着。其中，最先得到开发的是黄河的支流渭水流域。那里接连出现了殷商、周两个王朝，它们是邑 的联合体。殷商通过占卜实行神权统治，占卜的结果用甲骨文这种最古老的汉字形式记录下来。周朝实行的是最典型的血缘统治，这一制度就是封建制度。

黄河文明与古埃及文明、美索不达米亚文明、印度河文明有所不同，属于封闭性的内陆文明。原因是：黄河发源于中国西北，绵延5400多公里，长度排在世界第六。黄河从上游的兰州附近到西安之间，曲曲折折地流经黄土高原，冲走了每平方米约37千克的黄土。因此，黄河下游流速很慢，泥沙以年10厘米的速度淤积，时常洪水泛滥，三年之内河道可能发生两次变更。

不过，从戈壁沙漠刮来的偏西风带来直径为0.05毫米以下的细小黄沙，透水性和通气性良好，只要有水，黄沙就会汇集成为肥沃的旱田。传说中最初的王是黄帝，皇帝住在用黄色的瓦铺的宫殿里，穿黄袍。这些习俗都是源于将黄河视为神圣的想法。

商人是连接农民和草原牧民的桥梁

商人卖给农民肉和奶，卖给牧民麦子

由于文明形成于大河流域，所以在大河流域的周边也居住着很多不会种粮食的牧民和商人。商人们充分利用城市的道路、水运、海运，让粮食在更广阔地区循环、流通。商人就是连接农民和牧民的桥梁。那时，商业的基本形式是行商，干燥地带商业的主要内容是用农民生产出的粮食交换牧民们饲养的家畜、出产的乳制品。其实质是在更广阔地区用碳水化合物换蛋白质。商人们不仅掌握着居住在干燥地带的各个部族的信息，而且还创造出简单的表音字母和金属货币，建立起在更广阔地区进行商品交易的机制。

城市的特殊性在于比较富裕，富裕的城市给商人们提供了活动的场所。人类在本性上总是希望和别人不一样。也就是说，人最注重外表。如统治阶级喜欢用庶民无法得到的奇珍异宝装饰自己，喜欢吃珍馐美味。换句话说，统治阶级希望通过这些东西来夸示自己的与众不同。

为了满足统治阶级的这一欲望，商人们会到遥远的地方去采购奢侈品和奇珍异宝：蓝色的宝石琉璃在美索不达米亚很受欢迎，但琉璃的产地在阿富汗，且容易产生静电，因此特别受到珍爱；美索不达米亚人也喜欢琥珀，但其产地在波罗的海的爱沙尼亚湾；乳香在埃及等地炙手可热，其产地是东非和阿拉伯半岛南部；制造木乃伊所不可或缺的“没药”产于阿拉伯半岛南部；黄河流域的人们喜欢玉，玉的产地是昆仑山麓；子安贝可以用作货币，其产地是越南南部。尽管生产和分配是当今世界史的中心课题，但从交易这个视角进行的研究还很不够。而不谈交易经济，是无法讨论世界的发展的。

畜牧民有了马匹后转化为游牧民

草原地区不产麦，畜牧民生活靠的是饲养绵羊、山羊、马、牛、骆驼等牲畜。畜牧民在使用马匹作机动力之后，管理的家畜数量大幅度增加，活动范围也随之扩大了。由此，使用马匹的畜牧民变成了游牧民。因为一直维持着原来的狩猎生活，游牧民的生活极为简朴。游牧民的主要活动是管理着以雄性为中心群居的偶蹄目家畜。这些家畜对游牧民来说就是“移动的粮仓”，游牧民的衣、食、住依靠家畜的乳、肉、皮革、腱来保障。游牧民还把家畜的粪用作燃料，物尽其用。游牧社会是氏族、部族结合而成的，每个区域都维持着认同感。到了夏季，游牧民分散放牧，到了冬季聚集起来生活，周而复始。游牧民御寒越冬的时期正好是家畜繁殖的时期，所以每个草原区域都要维持秩序和合作关系。时至今日，在中东、朝鲜半岛等亚欧大陆地区，部族依然有着巨大的影响力。游牧民往往和沙漠绿洲中的农民、商人和睦相处。但是，游牧民经常受到寒冷气候、家畜瘟疫等的威胁，为了获得粮食，经常侵扰农业社会，所以在历史上有时也会出现游牧民建立的大帝国。

地中海是干燥之海与交易之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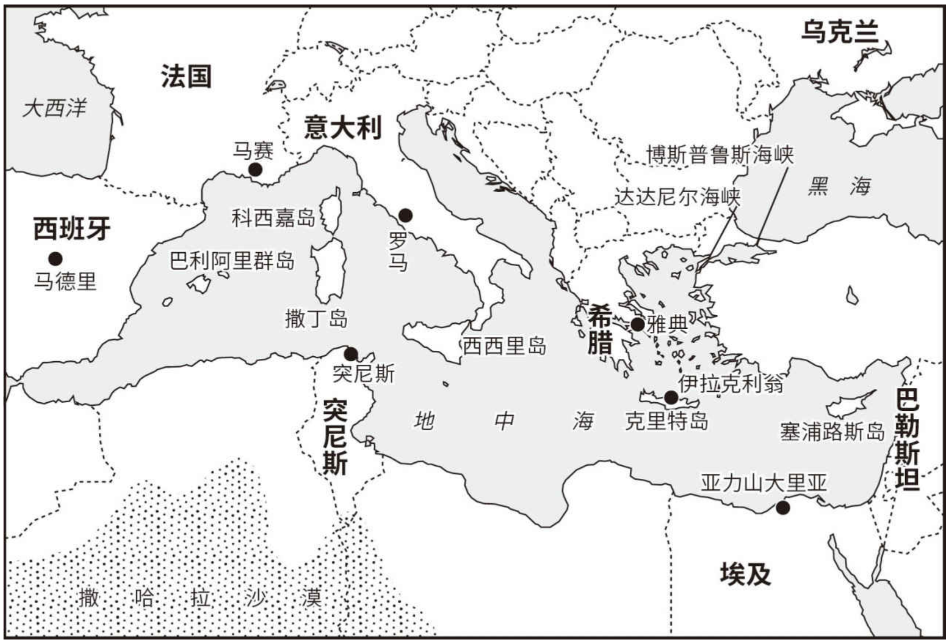
地中海夏季无风干燥，冬季大浪滔天

地中海是世界上最大的内海。地中海南面是占世界沙漠面积的1/4的撒哈拉沙漠，其面积约是地中海面积的2.7倍。地中海的东南面是阿拉伯沙漠。不过，地中海的北岸处于欧洲的西风带控制之下，冬季雨量充沛，夏季炎热干燥。17世纪，荷兰商人将波兰、德国等波罗的海南岸国家产的麦子销售到地中海地区。因此，干燥的地中海地区才得了救。因为这个原因，从19世纪开始编写的西方史反而忽视了地中海的干燥性。其实，地中海和西亚地区一样都属于干燥地带，商人们从周边地区将粮食运到这里销售。我们知道，荒漠的年降水量在250毫米以下，草原的年降水量在500毫米以下。下面列举的是地中海沿岸主要城市的年降水量，由此可知地中海城市的干燥程度。

克里特岛的克诺索斯约为500毫米，雅典约为400毫米，亚历山大里亚约为340毫米，加尔塔哥约为470毫米，罗马帝国的首都罗马约为870毫米，马赛约为550毫米，马德里约为460毫米。

看一下地图就可以发现：地中海被连接意大利半岛、西西里岛、突尼斯的南北线分为东西两部分；在地中海中央部分有一系列的小岛；地中海由很多小海组合而成，容易航海；地中海南面横亘着比地中海面积大很多的撒哈拉沙漠。

地中海的夏季是经商的季节，人们划着船就可以在广阔的海域进行贸易，埃及周围是沙漠，主要的交通路线是和东地中海相连的尼罗河。另外，地中海通过黎巴嫩和叙利亚、西亚相连。



地中海诸国主要城市

腓尼基人创造了地中海商业模式

克里特岛的克诺索斯最先通过和古埃及开展贸易活动繁荣起来。在公元前17世纪，位于克里特岛北面的桑托里尼岛海底火山爆发，从而引发强烈的地震和海啸，这令克诺索斯遭到了灭顶之灾。

后来腓尼基人恢复了克里特岛和古埃及开展贸易的传统。公元前12世纪左右，腓尼基人开始定居于黎巴嫩，并在狭长的海岸平原上从事农业生产。但仅靠农业生产无法生存下去，腓尼基人便开始在地中海从事贸易活动。黎巴嫩生产杉木，是上好的木材，腓尼基人利用木材制造了龙骨船，以城邦国家希顿、提尔为中心开展贸易活动。接着，腓尼基人由东向西开辟了航线，将地中海中部的岛屿连接在一起，创立了地中海商业模式。腓尼基人用腓尼基语给这些岛屿命名。如塞浦路斯（岛）在腓尼基语中是“丝杉”的意思；西西里（岛）在腓尼基语中是“拿着铁锹的人”或“农民的土地”的意思；萨丁（岛）在腓尼基语中是“神最初留下足迹的地方”的意

思；科西嘉（岛）在腓尼基语中的意思是“森林多的土地”的意思；巴利阿里（群岛）源于腓尼基人的最高神“巴尔”；地中海航线的终点西班牙在腓尼基语中的意思是“兔子多的土地”。从这个意义来看，地名就是“历史的化石”。

到了公元前9世纪，腓尼基人在西西里岛对岸的突尼斯地区建起了殖民城市迦太基（在腓尼基语中的意思是“新城市”的意思），西地中海成为腓尼基人的内海。

希腊人从腓尼基人手中夺走了地中海的霸权

希腊人在地中海开展贸易活动要比腓尼基人晚数百年。不过希腊人把地中海航线从爱琴海延伸到黑海周边。巴尔干半岛的海岸线非常复杂，从北面和南面吹来的风有利于希腊人的航海活动。希腊人在巴尔干半岛南部、小亚细亚沿岸地区、黑海周边、爱琴海的各岛屿、西西里岛、意大利半岛南部修建了1000多个小规模的殖民城市，构建出一个海洋帝国。

在西方史中，研究重点是雅典，以它为例着重讲希腊文明的普遍性，对其他的城邦国家的研究则远远不够，结果反而忽视了希腊文明的海洋性特征。在公元前5世纪，雅典是个大城市，拥有约20万人，其中5万人是奴隶。但雅典气候干燥，2/3的小麦和所有的奴隶都是从黑海北岸的乌克兰进口的。相应地，葡萄酒、橄榄油、武器、陶器、银则出口给乌克兰。连接乌克兰的达达尼尔海峡和博斯普鲁斯海峡便成为希腊人的生命线。

希腊人采取了巧妙利用地中海周边军事力量互相牵制的策略。公元前334年至公元前324年，马其顿国王亚历山大东征。公元前264年至公元前146年，希腊人在罗马的帮助下最终战胜腓尼基人，获得了地中海的商业霸权。

陆地世界的成熟引起的精神革命

宗教、哲学是如何产生的

文明出现后的2500年左右，各个文明所在的区域纷纷产生了独特且系统的世界观、社会观，即发生了精神革命，出现了宗教、哲学。时至今日，其影响依然根深蒂固。精神革命的成果，之后成为在各地形成的帝国的文化基础。德国哲学家雅斯贝尔斯首先发现这一亚欧大陆的文化现象，并将这一现象称为人类的轴心时代或者基轴时代。

以草原和荒漠为起源的宗教－琐罗亚斯德教和犹太教

伊朗也称波斯，位于干燥大地的中央，面积是日本的4.5倍。公元前7世纪，琐罗亚斯德注意到昼夜呈规则性循环这一现象，并用善神光明神阿胡拉•玛兹达和恶神黑暗之神的斗争，来阐释自然和社会。最终光明神获胜，并进行最后的审判。这就是琐罗亚斯德教的基本教义。

昼夜循环不断重复，琐罗亚斯德教将此看作是众神的激烈斗争。可以说，琐罗亚斯德教是草原的宗教。随后，琐罗亚斯德教成为波斯人建立的阿契美德王朝和萨珊王朝的国教。在伊斯兰教形成前的1000年时间里，琐罗亚斯德教是西亚的核心宗教。

居住在沙漠周边的巴勒斯坦犹太社会中，沦为“巴比伦之囚”（前586—前538）的苦难经历塑造出以赛亚、耶利米等杰出的预言家，非常有权威。这些预言家和他们认为的唯一神耶和华订立了契约，在此契约的基础上形成了犹太教。耶和华和基督教的上帝、伊

斯兰教的安拉等都属于绝对性的唯一神，可以说是荒漠之神。犹太人是商业民族，活动范围很广，和为数众多的不同文明接触。因此，犹太教中吸收了美索不达米亚“同态复仇”思想、伊朗和中亚的琐罗亚斯德教的最后审判的思想等来自荒漠和草原的思想。众所周知，后来的基督教和伊斯兰教是在犹太教的影响下出现的。

雨季和旱季产生了佛教等印度宗教

印度的恒河流域出现了为数众多的城邦国家。在此背景下，重视祭祀仪式传统的婆罗门教进行了改革。于是，迦毗罗哲学发展起来，其主旨是发现掌握并理解宇宙真理的方法。最基本的命题是轮回，意思是痛苦的循环以及造成痛苦的罪孽。

轮回思想的形成源于夏季季风造成的洪水灾害和冬季季风造成的干旱，两种气候周而复始，循环往复。于是，人们开始研究修行方法，从痛苦中解脱出来。公元前6世纪至公元前5世纪，出现了佛教和耆那教。可以说，这些属于季风式宗教。

诸子百家一应乱世诸侯的要求，研究统治的原理

黄河下游由于黄土淤积，平均每三年便发生两次洪水泛滥。一直以来，蒙古高原上都生活着强大的游牧民族，而汉民族则生活在内陆地区。在内陆地区，春秋战国时期持续了500年左右，其间战乱频仍。由于军事斗争周而复始，战争规模和国家的疆界不断扩大，最终秦朝在战争中统一了列国。

春秋（前770—前476）末期，开始出现锋利的铁器，结果促使战国时期（前475—前221）各国的争战更加激烈，各诸侯国都致力于富国强兵。为此，各诸侯国都在寻求新的统治理论。在这一背景

下，学者们云集各诸侯国都，培养弟子、创立学派，竞相兜售自己的学说，出现了以孔子、墨子、孟子、荀子、庄子等学者为代表的诸子百家。诸子百家为了顺应诸侯们对富国强兵的诉求，研究各种各样的问题，成为具有强烈政治色彩的各种后世思想的雏形。有诸子百家学说做后盾，位于封闭的空间内人们不断开展政治斗争，终于诞生了大一统帝国。可以说，诸子百家是实践性很强的学问。

连接陆地与海洋的商人社会培育了希腊哲学

希腊气候干燥，粮食很难自给自足，不得不依靠海上贸易维持生计。要种植小麦，年降水量需要达到500毫米，可雅典的年降水量只有400毫米。不过，海洋让希腊文明有了独特的境遇。在地中海世界，海洋将陆地世界相对化了。在陆地世界被认为是想当然的事情成为希腊人学问的研究对象，对干燥气候的大地进行刨根问底，成为希腊文明的一大特色。

在希腊首先发展起来的是用以研究万物本原的自然哲学。泰勒斯（约前624—约前546）不同意干燥大地的一切都是产生于土的学说，另辟蹊径地主张产生于水。恩培多克勒主张世界万物都是由土（大地）、水、气、火这四种元素构成的。正因为希腊人生活在海洋与大地这两个世界相连接的地方，才产生出如此独特的想法。

希波战争（前500—前449）以后，大商业城邦国家雅典发展出成熟的都市文明。苏格拉底以雅典为例，对都市文明采取了批判态度，结果在大众审判中被判处死刑。苏格拉底的弟子柏拉图主张“理想国”，亚里士多德综合各学派思想，批判柏拉图的“理想国”思想。可以说希腊哲学是将陆地文明相对化的海洋培育的商业民族学说。

马背上的游牧民主导着陆地世界

骑马技术的发明是军事掠夺的开始

干燥大地的另一个侧面就是散居在草原上的畜牧民族。畜牧民族的社会基础是部族这一血缘集团。时至今日，沙特阿拉伯、伊朗、韩国（曾经一度附属于蒙古、清朝的游牧民族）还保留着部族制度。

草原上的马匹将畜牧规模扩展至以前的10倍以上。一般来说，维持一个家庭的生活，需要200只羊。但绵羊等家畜吃的是草，所以一片草地只能养5个家庭。正是这个原因，畜牧民保持10公里的距离生活着，并互相联系。当时，马匹是草原上必备的交通工具，畜牧民使用马匹就转化为游牧民。最早让人们见识了游牧民实力的是黑海北岸的斯基泰人。在公元前6世纪左右，斯基泰人发明了可以在马上射箭的短弓和由骑兵主导的机动性集团军作战方法。之后，出现了马背上的游牧民族这一支强大的军事力量。随后，骑马技术逐渐在草原的各部族普及，他们把农耕民族当作掠夺对象，屡屡进行劫掠。

游牧民的军队通过骑马技术可以快速、自由地集中和分散兵力。由于开发出了短弓，不仅有助于骑马技术的提高，连马上的弓箭射程也达到200米以上。因此，游牧民在军事上占到了绝对优势。斯基泰人的马具在草原上普及，和马匹一起发挥作用，使得游牧民成为干燥大地上的霸主。

游牧民意识到商业征服的重要性

游牧民都以部族为单位生活，通过召开部族长会议，选出单于或者可汗，以维持各部族之间的团结。当出现了能干的领导人时，游牧民族会瞬间成为支配广大领土的游牧帝国。当能干的领导人不在了，游牧帝国就会土崩瓦解，分裂为一个个部族。因此，游牧帝国实质上是为了保障粮食等物资的稳定供应而形成的。

在世界史的行进过程中，游牧民族起着很大的作用。游牧民族依靠饲养家畜和狩猎而维持生计，生活很不稳定。一有机会，游牧民族就想征服农耕社会，让农耕民族纳贡。与此同时，游牧民族还想征服绿洲地带的贸易区，让商人们纳税。看得出来，游牧民族往往打算通过上述方式过上稳定的生活。也就是说，贫困是游牧民族进行掠夺的主要原因。

农耕民族固守传统，游牧民族则有所不同，必须灵活应对经常发生的自然环境变化。相对来说，游牧民族的思维方式很灵活，如有必要，会将从商人那里获取的情报和游牧民族自己的军事力量结合起来，向亚欧大陆扩张势力范围。

游牧民族不光进行战争和侵略，游牧民族和农耕民族之间还相互依存。斯基泰人和希腊人进行贸易，蒙古高原的匈奴和汉王朝、西方的巴克特里亚（安息，亦即现在的伊朗）交易丝织品和马匹，就是典型的例子。《史记·大宛列传》曾对这一情况进行了描述：“自乌孙以西至安息，以近匈奴，匈奴困月氏也，匈奴使持单于一信，则国国传送食，不敢留苦。”

陆地世界向湿润大地扩张

降水丰富的湿润大地为何开发很晚

在最初的文明出现大约3000年后，陆地世界终于开始从干燥地带向湿润大地扩张。湿润地带的中心包括亚欧大陆南部的季风地带（恒河流域、中南半岛、东南亚岛屿、长江流域、朝鲜半岛、日本半岛）、北面的北欧、俄罗斯等。基于以下原因，湿润地带的开发非常滞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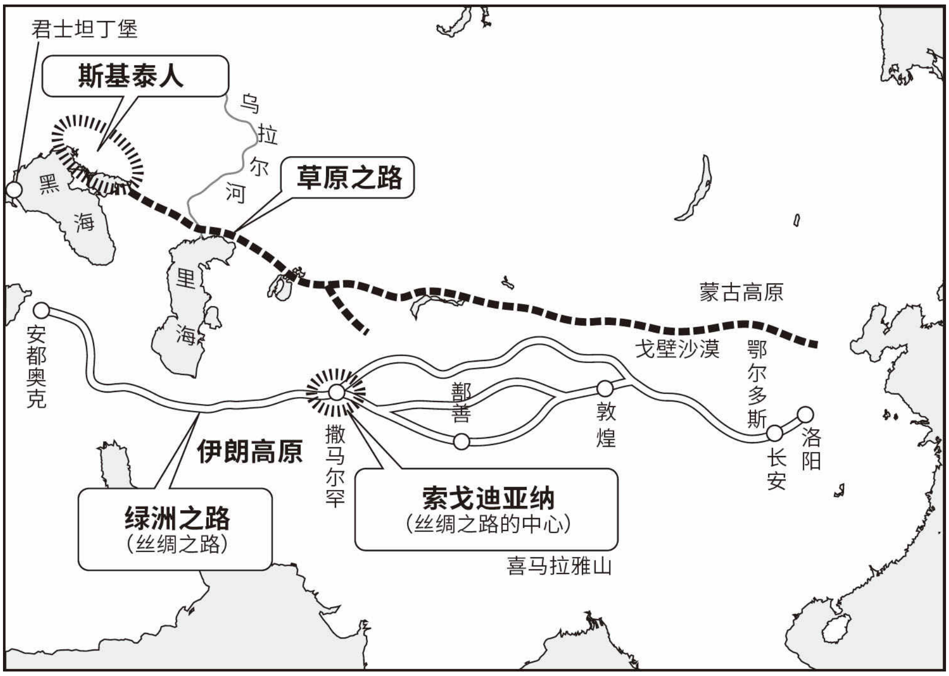
人类社会开始于东非大裂谷地带，在干燥地带发展起来，干燥地带的民族在军事上占优势，湿润地带很难独立于干燥地带；

湿润地带，植物繁茂，开发起来非常困难；

季风地带存在雨季和旱季；

欧洲普遍低温，农业不发达。

以下笔者将介绍一下全世界主要的湿润地带的情况。



中亚的交通要道

恒河流域粮食产量大，不易受到游牧民族的袭击

在距今约3000年前，游牧民族雅利安人从阿富汗地区侵入湿润地带的恒河流域，在这里种植产量大的水稻，建立了许多城邦国家。之后，恒河流域成为印度的中心，这一湿润地带的文明又影响到中南半岛、东南亚的各个岛屿。

在印度半岛北部耸立着喜马拉雅山脉等大山脉，进入印度的入口只有兴都库什山口。因此，欧亚大陆干燥地带的游牧民族入侵印度的次数很少。恒河流域属于湿润地带，一直以来都是小国或者部族林立，并流行着各种宗教。但是，这些宗教最终都统一在印度教之下，印度教信仰多神论，令各个小国终于形成松散的联盟。

长江流域独立于干燥地带之外非常困难

汉王朝灭亡后，天下大乱。胡骑（游牧民）非常活跃。到了4世纪，有五个游牧民族，又称“五胡”，占领了黄河中下游，建立起很多国家。这就是五胡十六国时代（304—439）。汉人被迫移居长江流域、朝鲜半岛和日本列岛。在这一混乱时期，湿润地带得到了开发。所以说，魏晋南北朝时期（220—589）是一个东亚的湿润地带通过民族大迁徙得到开发、发展的过渡期，也是日本历史的黎明时期。

在中国，通古斯族的鲜卑人建立北魏，统一干燥地带，史称北朝。北朝和湿润地带的南朝对峙。中国进入南北朝时期（420—589），后来游牧民族鲜卑人与汉人通婚的后裔征服了南朝。接着，又建立起隋朝、唐朝，最终将整个中国纳入干燥地带的统治之下。

鲜卑人通过与汉人的统治阶层通婚，同化到中国社会（汉化）。另一方面，鲜卑人夺取了豪族的土地，通过均田制、租庸调制、府兵制加强了统治。隋朝、唐朝是由干燥地带的王朝统治南部湿润地带的王朝。到了10世纪末，在长江流域种植的水稻成为中国的主要口粮，俗话说“苏湖熟，天下足”（江南的苏州、湖州丰收的话，粮食就够全中国人吃）。北宋、南宋、明朝等王朝都是以湿润地带（长江流域）为基础建立的。

不过，干燥地带的民族利用马匹作战，具有强大的军事实力。金（女真人）、元（蒙古人）、清（满族人）等游牧民族统一了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并统治了很长时间。最后的清王朝是由满族、蒙古族通过军事力量建立的典型干燥地带王朝。当今的中国成为陆、海、空力量兼备的大国。中国共产党强调党的领导，旨在为全中国人民谋福祉，为世界和平做贡献，与以前的部族统治有着天壤之别。这一点在后文会详细论述。

朝鲜半岛和日本列岛都是以种植水稻为主，但是政权形式不同

刚才讲到，由于“五胡乱华”，4世纪至5世纪，汉民族南迁，对东亚地区产生了重大影响。此次民族大迁徙的影响波及朝鲜半岛的新罗、百济以及日本列岛西部的大和王朝，它们此后陆续建立了以水稻生产为基础的湿润地带的政权。但是朝鲜半岛距离蒙古高原和中国东北很近，以至于高丽被元朝征服，朝鲜王朝被清政府征服。由此观之，湿润地带的政权很难独立于干燥地带的政权。

日本四面环海，一直维持着湿润地带的社会体系，没有被干燥地带的政权征服，这在东亚地区算得上是一个例外。日本列岛属于高温多湿地带，降水量是世界平均水平的两倍以上。而且，日本是亚洲最北的种植水稻地区，水田密布，产量很大，因此，日本自古就享有“丰苇原瑞穗之国”的美誉。

欧洲以规模优势弥补产量低的劣势

阿尔卑斯山以北的欧洲属于农业社会，原住民凯尔特人被罗马帝国征服后，便被置于地中海这一干燥地带的民族的统治之下。由于游牧民族日耳曼人进行了民族迁徙，日耳曼人和罗马人开始民族融合，受到地中海干燥地带的影响越来越强烈。处于高纬度地带的欧洲因为气候寒冷，一粒麦种在生长过程中只能增加三粒，长期以来仅靠农业无法维持生计。因此，封建领主们收不到租，只能在直接经营的土地上让农奴耕作，向农奴征税，以此来维持生计。距今1000年前，日耳曼人发明了用牛、马拉犁耕作的方法，大大提高了生产效率。他们通过耕作广阔的土地，弥补单位土地产量的不足，促使欧洲发生了中世纪（11世纪）农业革命。之后，欧洲才能作为

农业社会存续下去。过去欧洲一直被森林覆盖，让感觉阴森森的，这时摇身一变成为有光明和希望的地方。

第二章
波斯、罗马、秦等在陆地世界建立的地区霸权

波斯帝国和罗马帝国

在陆地世界的各地区产生帝国的背景

前6世纪，波斯帝国建立，统一了种植小麦的美索不达米亚、埃及、印度河流域三大文明区域。另一个统一了美索不达米亚、印度河流域与黄河流域三大文明区域的蒙古帝国则在1200年后出现。波斯帝国和蒙古帝国都是横跨亚欧大陆的大帝国。在它们之间的约1700多年之间，陆地世界的各帝国兴起又灭亡，此起彼伏。这些帝国被海洋、沙漠、高山隔开，在各个地区称霸。之所以在地中海、西亚、印度等地出现帝国，究其因是这里有广阔的粮食生产基地。

游牧民族通过马拉的战车、骑兵部队不断征战，建立了帝国。分散在各地的部族结合在一起是游牧民统治帝国广阔疆域的基础。位于帝国中央的部族将官僚和军队派到各地进行统治，形成松散的统一体。在帝国内保障粮食的供应和流通非常必要，帝国内的居民之间的交流是有限的。因此，帝国有必要建立粮食的分配和供应机制。帝国接替了商人的工作，使粮食等物资的流通区域范围更广、更稳定。

英国的历史学家阿诺德·汤因比对形成帝国的机制进行了归纳：

使用驿站作为交通手段；

驻屯军和殖民地；

地方制度；

首都；

统一的语言和文字；

法律制度；

历法；

度量衡及货币；

军队；

官僚制度；

公民权。

从公元前6世纪至公元前1世纪末，亚欧大陆各地建立了4个区域性帝国，按照帝国形成的前后顺序归纳如下：（1）波斯帝国（前550—前330），波斯帝国是最初的干燥地带大帝国；（2）孔雀王朝（约前324—前180），以种植水稻作为主要的经济来源，孔雀王朝是最早的湿润地带帝国，中心区域在恒河流域；（3）秦帝国（前221—前206）是东亚帝国，以栽培粟米为主要的经济来源；（4）罗马帝国（前27年—476或1453），统一了地中海地区，是世界上最早的海洋帝国。

这四大帝国，波斯帝国建立于公元前6世纪，罗马帝国建立于公元前1世纪，中间相隔500年。

游牧民族建立的波斯帝国统一了栽培小麦的地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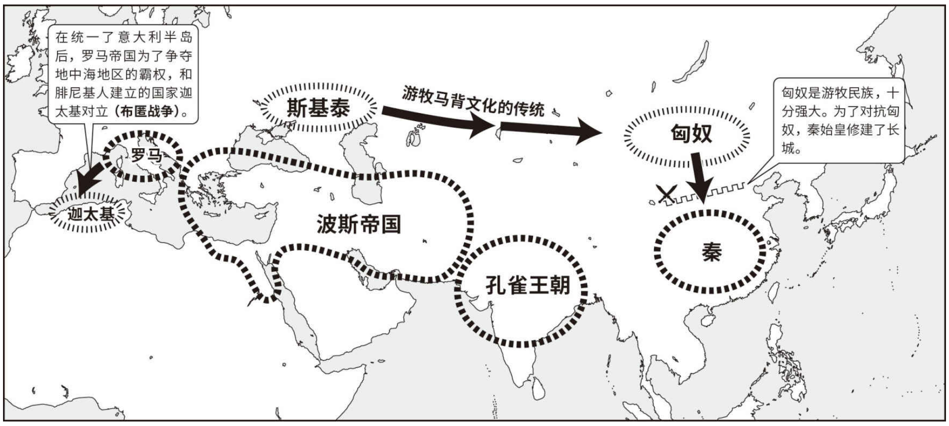
世界上最早的帝国是由游牧民族波斯人在伊朗高原（面积约是日本的4.5倍，地表的八成是沙漠）西南部的帕尔萨地区建立的波斯帝国。大流士一世（前522—前486年在位）时期，波斯帝国统治着爱琴海至印度河流域之间的广大地区。波斯帝国之所以能够统治广阔的疆域，是因为各地区的部族非常团结。波斯帝国的部族统一了埃及文明、美索不达米亚文明和印度文明，让小麦等粮食在帝国的广阔疆域内流通。

波斯国王为了加强自己的权威和波斯帝国的霸权，称自己是琐罗亚斯德教的绝对神阿胡拉・马兹达的代理人。亚述人建立的国家灭亡后，游牧民族波斯人乘机利用两匹马拉的战车南征北战，成就了霸业。大流士一世将整个帝国分为20个行政区，这些行政区都称为行省，波斯国王将波斯部族、米底人部族派到各地当地方长官，整个帝国实际上是由波斯人进行统治的。

粮食流通是波斯帝国的一项重要工作。为了搞好这项工作，波斯帝国进行了道路建设。除此之外，波斯帝国还开始使用字母和硬币。原则上，由波斯帝国的各行省征收银和砂金，用以铸造货币。

在征服小亚细亚的吕底亚之后，大流士一世把吕底亚国王克洛伊索斯铸造的钱币引进波斯帝国，将这种钱币作为通货，强制在帝国内部流通，从而强化了波斯帝国的统治。波斯国王用从帝国内的各地征收上来的金、银铸造货币，强制波斯帝国从地中海到印度河流域的广大区域使用这些货币，从而促进了小麦等粮食的流通。

从波斯帝国中央派到各行省的总督在各地的城市模仿波斯帝国的中心地区，修建府邸、征收租税、维持军队。大流士一世非常尊重波斯帝国内的各民族、各部族的风俗习惯。在西亚地区，部族的力量强大，这是理所当然的。正是因为这个原因，波斯帝国能够存在200多年。



欧亚大陆的四个帝国

亚历山大未能继承霸权

一般来讲，出现在世界史上的帝国，在统治100年至200年后就会灭亡，而帝国也会在兴替中不断重复。原因如下：

各地区、各部族之间的差距拉大；

占统治地位部族的军事力量下降；

权力斗争；

被统治部族对占统治地位的部族不满的蓄积。

就波斯帝国的情况而言，波斯帝国使用两匹马拉的轻型战车作战的战法已经过时，是波斯帝国灭亡的一个重要原因。帝国的敌人斯基泰人使用的是骑兵作战方式；另一个敌人希腊人使用的则是重装步兵作战方式，步兵手持长6米的长矛，排成方队作战，非常强悍。

新兴的马其顿帝国位于希腊北部，靠近黑海，通过开发银矿得到了大量财富。有了财富作后盾，马其顿帝国融合了斯基泰人的骑兵作战方式和希腊人的重装步兵作战方式，建立了强大的军事大

国。马其顿国王亚历山大二世20岁时，也就是在公元前334年，开始东征波斯帝国。由于采用了新式的军事技术和战法，亚历山大在4年后征服了波斯帝国。公元前333年，亚历山大在和地中海东岸安纳托利亚的边界上打了一场名叫伊苏斯的战役。这场战役决定了霸权的归属。亚历山大率领4.5万人打败了大流士三世率领的60万人的军队。如意大利半岛的城市庞培的马赛克画便描绘了这场战役。画上骑马的亚历山大对乘着轻型战车的大流士三世紧追不舍。这一点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伊苏斯战役

乘着两匹马拉的轻型战车的大流士三世（右）和骑马的亚历山大

亚历山大在灭亡波斯帝国之后，对军队进行了重组。他试图从中亚入侵印度。但是，亚历山大在印度西部边境终止了远征，回到古都苏萨。为了抵御亚历山大对印度的军事进攻，恒河流域最大的国家摩揭陀不断加强军队建设，增强军事实力。摩揭陀后来通过军事征服在印度建立了第一个帝国——孔雀王朝。孔雀王朝是种植水稻地带建立的第一个帝国。

公元前323年，亚历山大32岁时染上疟疾后猝死。当时亚历山大的孩子刚刚出生，一时间群龙无首，部将纷纷争权夺势。最后马其顿帝国发生分裂，其部将建立了三个比较大的国家。罗马共和国便乘东方混乱之际，在布匿战争中获胜，统一了西地中海地区。之后，罗马的屋大维又灭了埃及，统一了地中海地区。公元前27年，罗马帝国统一了包括埃及、叙利亚在内的地中海周边国家，成为世界史上第一个海洋帝国。西方史中讲，在罗马帝国建立之前，罗马内部进行了激烈的权力斗争。大体而言，罗马帝国是继承了波斯帝国、希腊的城邦国家、迦太基的政治遗产的海洋帝国。

在布匿战争中陆地力量战胜了海洋力量

住在黎巴嫩的腓尼基人将地中海变成一个商业海域。腓尼基人是一个商业民族，他们在东西方向上打通了地中海中部的岛屿，开辟航线，并在迦太基建立殖民城市，垄断和统治着西地中海地区。而且，迦太基还扼住了通往西地中海的唯一海峡西西里海峡的咽喉。

地中海被意大利半岛、西西里半岛、突尼斯连成的线一分为二，并通过墨西拿海峡和西西里海峡连为一体。其中，墨西拿海峡水流速度快，船舶很难通行。

为了在地中海称霸，腓尼基人建立的迦太基和希腊罗马联军进行了三次战争，史称布匿战争。在战争中，陆地强国罗马打败了海洋强国迦太基，地中海的霸权归属罗马。战争过程如下：

腓尼基人和代表新兴势力的希腊争夺东地中海的商贸权；

公元前9世纪，腓尼基人以迦太基为据点统治西地中海地区；

公元前272年，罗马通过军事手段统一了意大利半岛，之后统一了希腊的各殖民地，这些殖民地大部分位于意大利南部，称作玛格纳·格雷沙，即大希腊；

希腊的殖民城市叙拉古和迦太基争夺西西里岛，希腊请求罗马派援军；

罗马认为这是进军西西里岛的良机，派军援助希腊；

公元前264年至公元前146年，罗马与迦太基进行了三次布匿战争，罗马取胜；

罗马获得了西地中海的统治权。

殖民地和大量的物资支撑着

在布匿战争进行的同时，罗马向处于分裂状态的东地中海地区的霸主希腊发动了战争。公元前31年，在亚克兴海战中，罗马战胜了希腊。公元前30年，罗马灭亡了东地中海地区的强国埃及的托勒密王朝（前305—前30），吞并了埃及的商业城市亚历山大城。当时亚历山大城号称“除了雪，应有尽有”。公元前27年，罗马统一了东西地中海地区，成为世界上第一个海洋帝国。罗马帝国不仅统治着意大利半岛，地中海广大地区也成了罗马帝国的行省。这些行省由希腊等被征服民族的商人作为包税商征税。首都罗马的人口迅速膨胀至100万，一年里有4个月的粮食都是从埃及运来的。

罗马长期征战，行省的大量物资流入罗马。其中最重要的是东地中海地区的深厚文化底蕴，当它传入首都罗马时，罗马共和国开始出现希腊化的倾向。罗马对外征战的主力是由公民组成的重装步兵。但这时，公民已经转化为罗马市民，早已徒有虚名。而罗马帝国的新贵族通过对外战争和对行省的统治积累了大量财富，开始用

面包和娱乐收买民心。一旦得到了贫困的罗马市民的支持，他们便可以整天忙于权力斗争。经过多年斗争，最终恺撒（前100—44）的养子屋大维（前63—14）获胜，他于公元前27年任罗马帝国元首（第一公民），罗马共和国成为罗马帝国。因为这个原因，恺撒的名字被附加在皇帝的称号上。到了后来，神圣罗马帝国皇帝称恺撒，俄国皇帝称沙皇都源于此。罗马帝国分为12个行省，由罗马中央政府向各地派遣行政长官。有1000多年历史的海路和8.05万公里的军队专用道路成为罗马帝国的大动脉。

波斯的萨珊王朝和罗马帝国同归于尽的原因

在亚欧大陆西部的干燥地带，打算复兴波斯帝国的萨珊王朝和继承罗马帝国衣钵的拜占庭帝国（又称东罗马帝国）争斗不休。330年，罗马帝国将首都从罗马迁至黑海入口处的君士坦丁堡。395年罗马帝国分裂后，这里成为东罗马帝国，也就是拜占庭帝国的首都。随后，萨珊王朝和拜占庭帝国进行了激烈的战争。拜占庭帝国的查士丁尼大帝（527—565）征服了北非的汪达尔王国、意大利半岛的东哥特王国的同时，萨珊王朝因游牧民哈扎尔人的入侵而衰落。而后，拜占庭帝国与萨珊王朝的战争不断升级。到了6世纪，萨珊王朝和拜占庭帝国开始相互进攻对方的首都，两国相争导致双方都衰落了。

这时候，阿拉伯沙漠的阿拉伯游牧民崭露头角，他们给萨珊王朝和拜占庭帝国迎头一击，成为新的霸主。这一点是谁都没有预料到的。

东亚的“飞地帝国”—秦和汉

中国的内陆型帝国和种植小麦的文明迥异

黄河流域经常发生大规模的洪水灾害，以至于每两三年黄河就会改道。中华文明的特色可以列举如下：

降水量较多，还可以利用地下水，但农业经营规模较小，缺乏大规模的水利工程和灌溉工程；

蒙古高原上存在着强大的游牧民族，中国没有足以阻挡游牧民族侵略的天然屏障，因此中国的农业社会必须增强凝聚力，并加强军事力量；

中国存在着固有的天命思想，主张中国的统治者是在执行天帝的意志，必须实行中央集权式的统治；

为了加强对广阔疆土的农民部族的统治，使用了大量的官僚。

中国幅员辽阔，语言因地而异。时至今日，上海话、福建话、广东话等地方话还在使用。而汉字是官僚等使用的政治性文字，对幅员辽阔的国土保持统一起着重要作用。

在埃及、美索不达米亚、印度河流域等种植小麦的地区，商人为了进行交流而创造了简单的表音文字字母，字母不断被越来越多的地区接受。而中国有所不同，是通过官僚这一特权阶层使用的汉字将各地联系在一起的。人们必须学会使用难懂的文字，才有可能跻身统治阶层。

汉族和游牧民族的你死我活的斗争是宿命性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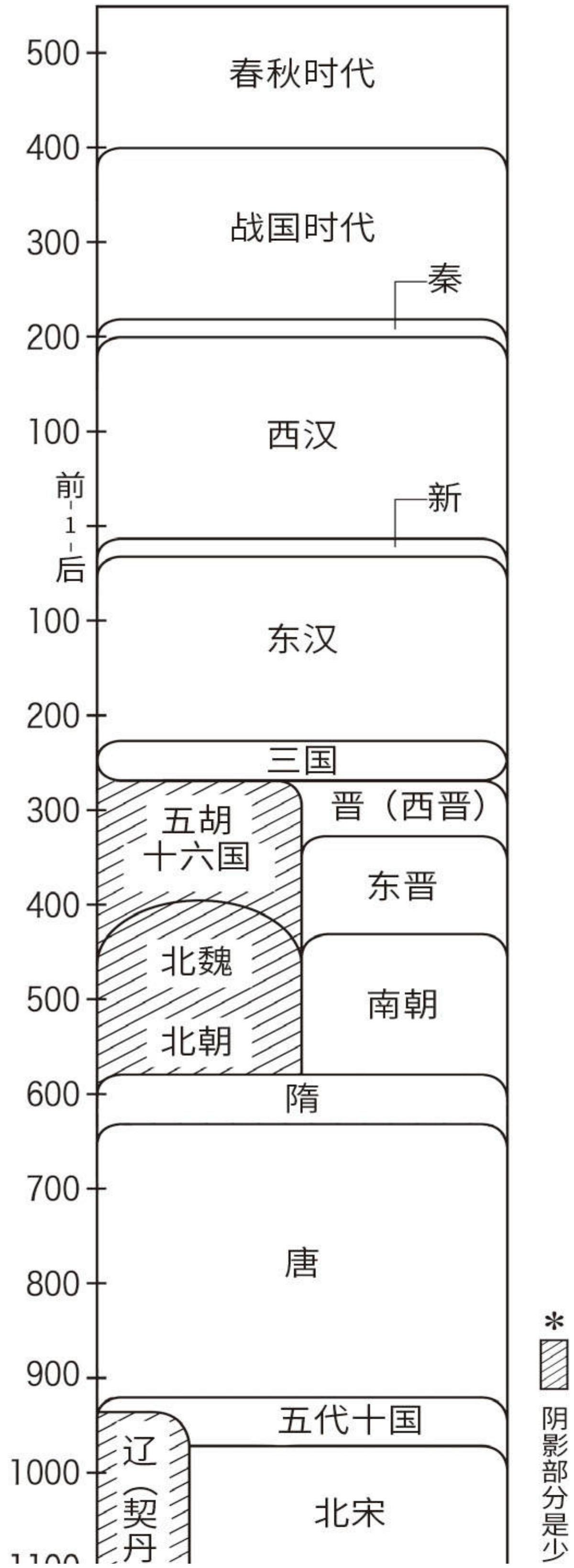
公元前221年，秦王嬴政逐步消灭战国七雄，统一中国。嬴政自称始皇帝，即秦始皇。他自称皇帝是认为自己具备传说中的三皇五帝之德，作为天帝的代理人，被赋予了统治天下的权力。秦始皇先是制定法律，将自己的意志明文化的同时在全国实施。随后又统一了文字、货币和度量衡，实现车同轨、书同文。他实施郡县制，将全国的土地变为自己的直辖土地，并通过集权式的官僚机构进行统治。战国时期，燕国、赵国等国为了防御游牧民的入侵，分别修建了长城。秦始皇统一六国后，将这些长城连在了一起，组成了秦长城。随后，秦长城便成为农耕民族和游牧民族的分界线。几乎同一时间，蒙古高原上的匈奴人引进了斯基泰人的骑马技术，变得非常强大。秦始皇把长城作为抵御匈奴人入侵的屏障。有史以来，农耕民族和游牧民族的冲突不断重复。为此，继承了秦朝的中央集权衣钵的历代王朝必须维持强大的国力，才能与游牧民族抗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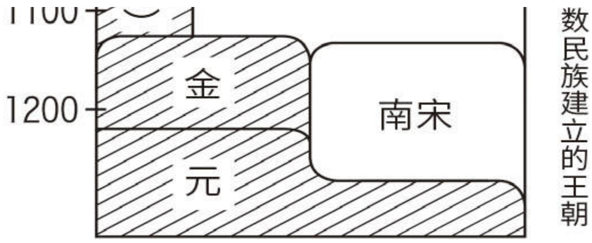
但是，中国历代王朝这样做付出的代价也不小。为了增强军事力量和发动战争，中国的历代统治者给农民带来了沉重的负担。民众往往不堪重负，发动起义，导致王朝灭亡，周而复始。秦始皇死后不久，秦朝便因为农民起义灭亡了。

相继建立帝国的是游牧民族而非汉人

中国的历代王朝都是由部族进行统治的，部族的兴衰以王朝兴替的形式表现出来，周而复始。汉王朝延续了约400年，在汉武帝在位时期（前141—前87），汉朝的国力达到了顶峰。另外，汉武帝和北方的游牧民族匈奴进行了长期的战争，农民负担沉重，地方豪族势力不断增强。结果，汉王朝在3世纪初灭亡了。之后，进入了魏、蜀、吴三国鼎立时期（220—280）。晋统一三国后不久，游牧民族进入中原，中国又进入十六国时代（304—439）与南北朝时代（420—589）。结果，最终掌握霸权的是游牧民族鲜卑人建立的

国家。鲜卑人夺取了汉族豪族的土地，实施均田制。隋朝（581—618）和唐朝（618—907）都是以均田制为基础、拉拢汉人地主而建立的具有部分鲜卑血统的王朝。





中国的王朝兴替史

之后，北宋、南宋、明朝都是农耕民族汉族建立的王朝。相对地，北方的游牧民族在军事上有绝对优势。蒙古人建立的元朝、满族人建立的清朝统治了农耕地带和游牧地带，也建立了大帝国。不过，鲜卑人、蒙古人、满族人等游牧民族长期统治中原地区也是不争的事实。魏晋南北朝以后，总体来看，北方游牧民族在军事上占优势，江南的湿润地带不得不接受北方游牧民族的统治。

第三章
欧亚大陆经济一体化始于阿拔斯王朝

伊斯兰教诞生于不毛之地的阿拉伯沙漠

伊斯兰教是统一阿拉伯半岛的精神支柱

拜占庭帝国和波斯萨珊王朝在军事上长期对立，这一过程持续了数百年，最终令二者都衰败了。此后，干燥地带的霸权迎来了重新洗牌的时代。这一时代的特征是各部族相互争斗，群雄割据，最终新兴势力依靠强大的军事实力崭露头角。在争霸斗争中首先唱主角的是阿拉伯半岛的阿拉伯游牧民。从地图上能看到，沙漠占阿拉伯半岛的大部分，阿拉伯半岛也是西亚最干燥的地区。正是在这一时期出现了一神教伊斯兰教。伊斯兰教能够提高凝聚力，掌握伊斯兰教的核心权力的虽仅有200人左右，但却得到为数众多的部落拥护。伊斯兰教出现于此时纯属偶然，世界发生转型更非是一蹴而就的，而是由很多现象和事件相互交织，形成趋势，转型才得以实现。阿拉伯半岛发生转型的具体经过如下：

拜占庭帝国和萨珊王朝的战争日益激烈。商人们用骆驼驮着财产和商品经商；为了规避战争风险，商人们开始选择从叙利亚经阿拉伯半岛西岸的通道；

由于牧民很多成为商人，阿拉伯半岛的部落之间贫富分化加深；

麦加商人穆罕默德创立了伊斯兰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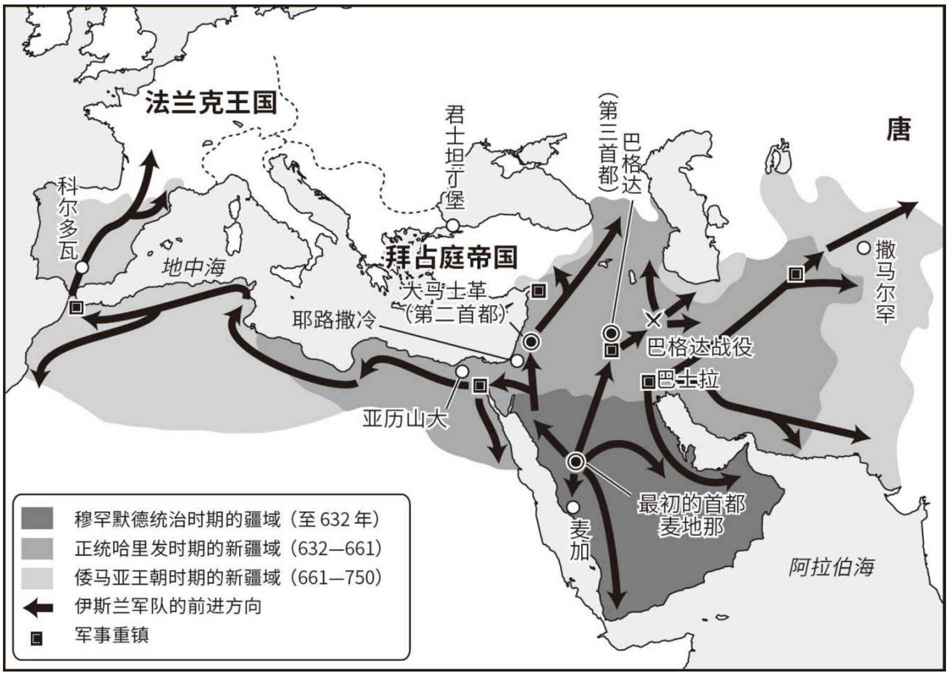
为了在阿拉伯半岛的部落战争中占据优势，各部落加强了和伊斯兰教的联系。

穆罕默德（570—632）受犹太教和基督教的影响创立了伊斯兰教，并自称为“最后的先知”。穆罕默德认为神只有一个，这就是安拉。安拉和犹太教的耶和华、基督教的上帝一样，都是荒漠的全能神。当时，阿拉伯半岛的人均寿命为40年。穆罕默德却是在过了40岁之后开始创立伊斯兰教，在最初传道的20年时间里仅有400人信仰伊斯兰教。但当时，阿拉伯半岛的每个部落仅有200人左右。由此可见，穆罕默德的400名信徒算得上是一支较强大的队伍。因此，很多部落首领都希望和穆罕默德联盟，穆罕默德利用自己的威望和政治才能将阿拉伯游牧民聚拢在自己麾下，兵不血刃地占领麦加。进而，穆罕默德于630年统一了阿拉伯半岛。穆罕默德在统一阿拉伯半岛后不久就突然去世了。为了避免因穆罕默德的去世而造成混乱，伊斯兰教规定将穆罕默德的继承人称作哈里发的同时，将统治权交给哈里发。伊斯兰教把穆罕默德传达的神谕称作“古兰”（意思是值得读的东西），并对这些神谕进行整理，使之成为信仰的根据，这就是《古兰经》。

阿拉伯游牧民的征服运动

伊斯兰教会为了防止分裂，就让游牧民出去夺取财富。每隔一段时间，哈里发便会组织阿拉伯游牧民开始进行远征。伊斯兰教会最初想征服的是沙漠的商业中心大马士革。由于时机得当，征服大马士革的军事计划获得圆满成功，游牧民也得到了大量的战利品。之后，伊斯兰教会的军事力量大幅增强，以此为基础，他们进一步远征属于拜占庭帝国的埃及、包括叙利亚在内的地中海南部。就这样，萨珊王朝灭亡了，拜占庭帝国也衰落了。就这样，由拜占庭帝国和萨珊王朝维持的世界秩序在阿拉伯游牧民族的打击下崩溃了。拜占庭帝国最后在与阿拉伯游牧民的战争中使用了石油做成的火焰发射器，俗称“希腊火”，这才守住了首都君士坦丁堡和帝国。可是地中海商业的支配权已经落到了穆斯林手中。

为了师出有名，阿拉伯游牧民为征服外民族的活动披上了宗教外衣，美其名曰“圣战”。7世纪至14世纪是游牧民族兴盛的时期。7世纪以后的阿拉伯半岛的阿拉伯游牧民、11世纪以后的中亚突厥人、蒙古人都是游牧民族兴盛时期的主要代表。其中，阿拉伯人征服运动的具体过程总结如下：



阿拉伯游牧民的征服活动

636年，阿拉伯人打败了号称拥有20万大军的拜占庭帝国，占领大马士革；642年，阿拉伯人征服了谷仓地带埃及，一直进攻到利比亚东部，将地中海南部收入囊中；

637年，阿拉伯人打败萨珊王朝的军队，吞并了今天的伊拉克南部；萨珊王朝的国王离开首都，逃到伊朗高原；

642年，萨珊王朝尝试进行了最后一次反攻，以惨败告终；651年，萨珊王朝的国王被杀，萨珊王朝灭亡。

阿拉伯人在沙漠周围建立军事重镇，以此为据点向四周扩张。与此同时，哈里发任命了远征的司令官，命其全权处理军事事务。在战争中，将士们获得的战利品全部换算为货币，其中的1/5上交给哈里发，剩下的4/5分配给将士们。征服的地区分别由各个实力雄厚的阿拉伯部落来统治。在这些地区，人们尊重传统，部落首领向当地人征收人头税和土地税。由此可见，阿拉伯帝国是一个结构较为松散的结合体，帝国内民族不同，文化传统也不同。

此后，阿拉伯人靠西亚、埃及等农耕民族来养活，过着寄生生活。通过对外军事扩张，约130万名阿拉伯人从阿拉伯半岛的不毛之地扩散到叙利亚、埃及、伊拉克、伊朗。在同一时期，阿拉伯人采用了伊斯兰历法，编纂了《古兰经》，巩固了伊斯兰社会的统治基础。

逊尼派和什叶派相争，是阿拔斯王朝建立的前奏

阿拉伯人通过对外军事扩张，建立了倭马亚王朝（661—750）。这个王朝是通过有实力的部落组成部落联盟这一传统方法维持统治的。与此同时，阿拉伯人为了加强部落的统治，还充分利用伊斯兰教进行集权。

661年，第四代哈里发阿里（阿里是先知穆罕默德的堂弟，娶了穆罕默德的女儿）被暗杀。阿里的两个儿子哈桑和侯赛因在和叙利亚总督穆阿维叶的战斗中阵亡。于是，哈里发的头衔被倭马亚家族（穆阿维叶一族）独占。这时，阿里的拥护者们组成了什叶派，什叶派打着阿里的旗号，要求真主安拉的信徒一律平等。另外还有一派是保守派逊尼派，是以势力强大的游牧部落为核心组成的，最终什叶派受到强大的逊尼派的压制。属于逊尼派的倭马亚家族是个强大的部落，掌控叙利亚的大马士革，倭马亚家族的人轮流担任哈

里发，创建了倭马亚王朝。倭马亚王朝可以说是由以倭马亚家族为核心的部落联盟形成的帝国。之后，倭马亚王朝将版图从中亚扩张至伊比利亚半岛。为数众多的被征服的民众皈依了伊斯兰教。实力强大的阿拉伯部落属于特权基层，致力于维护本阶层的特权。因此，社会矛盾不断激化，治安也随之恶化。

阿拔斯王朝通过商业统一了的伊斯兰世界

阿拔斯王朝统一伊斯兰世界的契机是迁都巴格达

从倭马亚王朝变成阿拔斯王朝，并非仅仅是政权的更迭，也包括在这一阶段阿拔斯王朝统一了伊斯兰世界。阿拉伯人通过将实力雄厚的部落结为联盟，加强统治。在进行统治时，阿拉伯人并不拘泥于民族，而是以伊斯兰教为纽带把各个民族维系在一起。通过这种方式，阿拉伯人和波斯人建立了合作机制。这样一来，由通过军事征服的“征服时代”向在伊斯兰教这一国际秩序下从事经济活动的“经济时代”转型。阿拉伯帝国的中心从与地中海相连的地区向与印度洋相连的地区转移。于是，印度洋被纳入阿拉伯帝国的版图，伊斯兰式的经济活动也扩大了范围。叙利亚和伊拉克虽然距离印度洋很近，但这一中心的转移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阿拉伯帝国将经济活动的中心从干燥的地中海，转移到干燥地带和湿润地带的连接处，并进入将东非、西亚、印度、东南亚、中国南部连在一起的印度洋。这样一来，阿拉伯帝国便转型成为陆地和海洋的大商业帝国。

正是出于以上这些原因，阿拔斯王朝的第二代哈里发曼苏尔（754—775年在位）动员10万劳动力，花费4年时间在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相交汇的要地修建了新都巴格达。巴格达是个圆形的要塞，其基本功能是军事和政治中心，后逐渐发展为一个将印度洋和内陆的商路相连的国际商业城市。

将亚欧大陆和非洲相连，东西交流频繁

各种各样的商品集中到巴格达，同时各种各样的文明也在巴格达交汇。因此，巴格达成为国际城市。干燥地带的性质迥异的各种文明在巴格达融汇为“真主安拉创造的文明”。9世纪，哈里发马蒙（813—833年在位）修建了名为智慧宫的研究场所，里面有学校、图书馆、翻译部门。在那里，哈里发有组织有计划地让基督教聂斯托利派的信徒将希腊语文献翻译成阿拉伯语。阿拉伯人不仅发扬光大了印度数字和代数学，还在中国炼丹术的影响下发明了炼金术。此外，阿拉伯人还在医学和哲学方面取得了长足的进步。这一切，都对欧洲文明产生了重大影响。

由于阿拔斯王朝有大量人口集中在巴格达、巴士拉等大城市，为了保障粮食供应，他们恢复了伊拉克南部的农业生产。与此同时，阿拉伯人还从印度运来了大米、白糖、橘子、柠檬、棉花等。此外，阿拉伯人还在非洲东岸购买了大量的黑人奴隶，让黑人奴隶去除旱田里的盐分，以经营大型农场。

穆斯林商人利用帆船、骆驼、马匹在亚欧大陆的大部分地区和非洲大陆做行商。9世纪，形成了以海路和陆路为中心的巨大的伊斯兰贸易区。其中，海路将地中海、印度洋、中国南海连在一起；陆路则将北非、拜占庭帝国、俄罗斯、西亚与丝绸之路连在一起。

北欧海盗和犹太人在南北的毛皮交易中异常活跃

养蚕技术传到西亚之后，丝绸价格不断下降。因此北方森林中产的毛皮取代丝绸成为新的奢侈品。9世纪至10世纪，伊斯兰贸易区与俄罗斯、波罗的海海盗之间的商业贸易额大幅度增加。新兴的毛皮交易将本来分属于南北的干燥地区连在一起，形成了巨大的贸易区，使得亚欧大陆的经济活动更加频繁，规模更大。

穆斯林商人生长在沙漠地带，没有胆量和技术进入草木繁茂的森林捕野兽、搞毛皮。可是，伊斯兰社会对毛皮的需求却不断高涨。住在波罗的海沿岸的瑞典商人抓住这个商机，积极开展毛皮交易。

北欧海盗从波罗的海出发，使用浅底的海盗船，沿河岸收购毛皮、蜂蜜、奴隶等。随后，他们利用注入里海的伏尔加河将毛皮运到草原地带。当时，位于里海北岸的伏尔加河口的突厥族哈扎尔汗国成了毛皮交易的中心。撒马尔罕商人、犹太商人等云集这里。特别值得一提的是犹太商人，他们精明强干，起着主导性作用。所以哈扎尔汗国便以犹太教为国教，吸引犹太人到这里做生意。

北欧海盗往来于波罗的海、东欧、里海之间，被斯拉夫人称作罗斯人（意思是划船的人）。一般认为罗斯人就是俄罗斯人的词源。罗斯人后来演变为基辅人，基辅人建立了俄罗斯的前身基辅大公国（9世纪至13世纪）。基辅大公国不仅通过和拜占庭帝国开展贸易而繁荣起来，还引进了西里尔字母和希腊正教，为俄罗斯的建立奠定了基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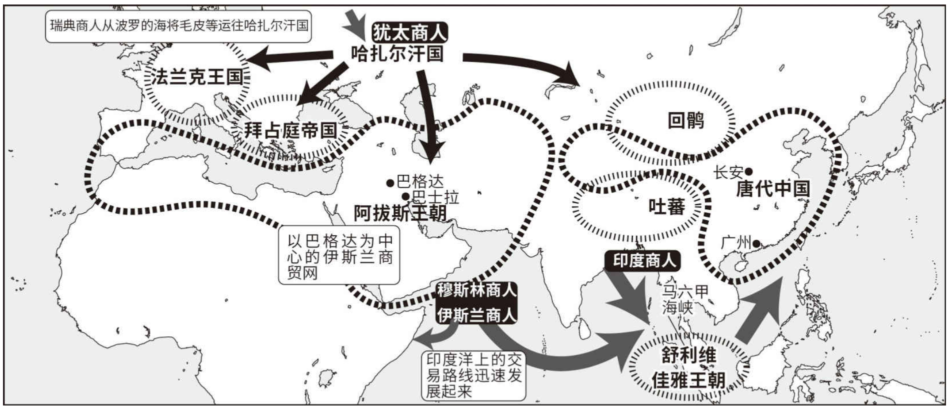
北欧海盗通过毛皮交易获得的银币属于称量货币，这种货币在北欧和东欧地区流行后，促进了货币经济的发展。考古学家曾从北欧海盗的坟墓中挖出了20多万枚银币，而这些银币竟然是在丝绸之路的中心撒马尔罕铸造的。这说明，住在沙漠的撒马尔罕商人也在从事毛皮交易。

另一件可以作为类比的事情就是：听说非洲的苏丹盛产黄金，价格便宜，穆斯林商人们便穿过撒哈拉沙漠，来到苏丹的尼罗河的大弯曲部，用在撒哈拉沙漠中采掘的岩盐、纺织品和日用品换到了大量的黄金。这是纵贯撒哈拉的贸易。

海路贸易

在阿拔斯王朝统治期间，最值得一提的经贸领域大事，是利用季风航行在中国南海、印度洋上，开展商业、贸易活动。穆斯林商人、波斯商人、印度商人、马来商人、中国商人等开启了“亚洲大航海时代”。可是，他们贸易的海域仅仅局限在欧亚大陆的南部边缘，结果就是世界史没有发生全球规模的从陆地向海洋的转换。具有浓厚的伊斯兰地区特征的帆船有高高的桅杆和巨大的三角帆，船板用椰子纤维缝在一起，用纤维等物塞住缝隙，防止进水。这种帆船在世界上也是少见的。伊斯兰式帆船往来穿梭于波斯湾、印度、东南亚、中国沿海地区等。值得注意的是阿拉伯海、孟加拉湾、岛屿众多的中国南海等地属于季风气候，每年的风向定期发生变化。所以，人们在这些海域开辟了定期航线，即开辟了途经马六甲海峡，全长约900公里的通往中国的航路。从波斯湾的巴士拉到中国广州，他们还开通了直航航线，行程单程为一年，往返则为两年。海运运输量很大，这是陆路的丝绸之路比不了的。因此，大量的物资来往于亚欧大陆。

在阿拔斯王朝鼎盛时期编纂了短篇故事集《一千零一夜》，这本书也称作《天方夜谭》。如后世的《鲁滨孙漂流记》和《格列佛游记》等作品都是以《一千零一夜》“航海家辛巴达的冒险”为模板的。辛巴达充满了冒险精神，反映了当时的海上贸易情况。伊斯兰的航海家们使用名为卡玛尔的简单装置，用以测定北极星和地平线的位置，来给船只定位，进而利用季风，从事航海事业。实际上，通过观测天体来定位也就是穿越荒无人烟的沙漠的方法。



阿拔斯王朝统治下的发达的辛巴达式海路贸易

第四章
蒙古帝国是如何掌握欧亚大陆霸权的

陆地世界的重组始于大草原

游牧民族土耳其人颠覆了阿拉伯帝国

11世纪，中亚大草原的游牧民族突厥人控制了阿拉伯帝国，陆地世界出现了新的变化。

10世纪时，国际贸易的发展，造成了贫富悬殊，再加上逊尼派和什叶派的斗争愈演愈烈，阿拔斯王朝开始衰退。什叶派便趁机在埃及建立了法蒂玛王朝，在巴格达建立了白益王朝。

阿拔斯王朝的逊尼派是统治阶级，生活富裕。他们从往来于丝绸之路的商人那里购买了大量的军事奴隶。这些军事奴隶主要是中亚游牧民族突厥人的子弟。逊尼派通过这个方法维持军事力量和统治。虽然，逊尼派采用突厥佣兵，在提高战斗力方面暂时起到了作用。但是，这一措施也为突厥部落依靠军事力量征服阿拉伯帝国埋下祸根。这一变化的开端是突厥人中的塞尔柱部落在全部皈依伊斯兰教后，出人意料地占领巴格达。接着，什叶派把哈里发作为傀儡来控制的同时，建立了白益王朝。最终，塞尔柱部落推翻了白益王朝，从阿拔斯王朝的哈里发那里获得了世俗统治者苏丹的称号，塞尔柱帝国（1037—1194）就此取代阿拉伯帝国。阿拉伯的哈里发本来打算在军事上利用突厥人打仗，结果突厥人却窃取了王朝的统治权，真是世事难料。尽管塞尔柱帝国通过合法手段夺取了阿拉伯帝国在各地的征税权，但是突厥部落的习俗与伊斯兰帝国的习俗不符，突厥人之间不仅争权夺利，而且无法为富裕的农耕社会带来稳

定的社会秩序。由于突厥部落的互相争斗，阿拉伯帝国分裂出的小国在西亚、北非各处纷纷建立。

与此同时，突厥部落从东面的山区入侵拜占庭帝国。拜占庭帝国处于危急存亡之秋。于是，拜占庭帝国皇帝向罗马教皇乌尔班二世（1088—1099年在位）请求援助。罗马教皇为了夺回圣地耶路撒冷，组建了十字军。从1096年至1291年，罗马教皇与西欧各国国王断断续续派出军队进行十字军东征。

亚欧大陆的脊梁在地理学上占优势

中亚草原游牧民的崛起给陆地世界带来了重大变化。从匈牙利草原到俄罗斯干草原、蒙古高原直到中国东北平原，东西横贯8000公里的大草原在地理学上具有重要的意义。因为这里只要出现强大的骑兵部队，马上就可以统治干燥地带及其周围地区。大草原是将伊斯兰世界、中国和俄罗斯联系在一起的亚欧大陆的脊梁。而大草原的西部和东部便是突厥人和蒙古人活跃的地区。

蒙古人登上历史舞台的时间稍晚，但他们利用以下三个条件统一了亚欧大陆：

由于游牧民族突厥人的进攻，伊斯兰世界陷入一片混乱；

中国东北地区的金征服了中国的北方，南宋对金称臣，中国处于混乱的分裂状态；

乌克兰人建立的基辅大公国不断衰落。

最终，蒙古人统一了亚欧大陆的大部分国家和部落，建立起大帝国，堪称壮举。从公元前3000年开始，亚欧大陆一直分为农耕社会、游牧民地区和商人居住的区域，而今终于实现了统一。由于东

西方交流的不断扩大，处于亚欧大陆边陲的欧洲人对陆地世界的关注不断增强，对世界的认识也不断拓展。在东方，蒙古人将主力部队留在蒙古高原的同时，派出远征军，经过数次远征，建立了蒙古帝国（1206—14世纪）。蒙古帝国可以说是以蒙古人为核心的各地游牧部落的联合体，或称利益共同体。它由以下四个部分组成：

蒙古高原、中原地区、中国东北，称作元；

伊斯兰世界，称作伊儿汗国；

中亚，称作察哈台汗国；

俄罗斯，称作金帐汗国。

通向和平的蒙古帝国之路

有威望的领导人和骑兵部队是蒙古帝国的强权所在

蒙古帝国以蒙古部落为核心，统一了亚欧大陆的各部落，进而掌握了亚欧大陆的霸权。杉山正明在《蒙古帝国的兴亡》中指出：“蒙语中的乌古斯是指部众、人类团体，这个词在阐释蒙古帝国时非常有效。”从这里我们能看出，乌古斯这个词中土地、领域的含义较淡，主要是指部落。蒙古帝国的统治者通常称汗或者大汗，但蒙古帝国是大汗及下属的多个汗组成的二重结构的多元复合体。

部落的复合体是通过强大的军事力量实现的。铁木真幼年丧父，经过长期征战，在40多岁时统一了蒙古高原。在这一过程中，蒙古人形成了以部落为基础的集权式战斗集团。1206年，铁木真称汗，即成吉思汗（1206—1227年在位）。他模仿金朝的军事制度，制定了千户百户制，将蒙古人重新划分为95个千户。由此可见，游牧民族中如果出现有威望、有能力的领导人，就可以把众多部落团结在一起，继而做大做强。如果再建立起一支强大的骑兵部队，就更是如虎添翼。当时，西夏支配着丝绸之路东部的贸易区，地位非常重要。所以成吉思汗统一蒙古高原之后，马上派出强大的骑兵部队和具有羌族血统的西夏作战。与此同时，成吉思汗和统治着中亚西半部、具有突厥血统的花剌子模王国签订协定，打算扩大蒙古帝国的贸易区。成吉思汗知道，游牧民族要想富裕起来，最有效的方法就是保护商人，获取税收。但是，在西亚地区，他的声名还不够显赫。

因为丢了面子，成吉思汗开始采取行动

即便是今天，在干燥地带，权力仍旧是和军事力量相结合的，即有威望、有威信的统治者的面子比什么都重要。统治者如果不够强大的话，家长式的部落统治就无法实现。如土耳其的凯末尔等统治者都非常重视面子。蒙古帝国也是一样，也很重视面子。蒙古帝国建立后采取的第一个举措就是建立与中亚的联系，但这件事情进展不顺，令成吉思汗丢了面子，结果导致成吉思汗开始远征。

1218年，为了巩固对干燥地带的商业的支配权，成吉思汗向中亚的新兴势力花剌子模国（1142—1231）派去了由450名伊斯兰商人组成的使节团。使节团让500头骆驼驮着成吉思汗送给花剌子模国王的礼物前往花剌子模。然而，当成吉思汗派出的使节团抵达讹答剌时，当地的地方长官以涉嫌从事间谍活动为由杀害了成吉思汗的使节，夺走了成吉思汗送给花剌子模国王的礼物，史称讹答剌事件。成吉思汗对此提出严重抗议，后又再次向花剌子模派出使节，而这次使节团成员竟然被剃掉胡须后赶了回来。要知道，在干燥地带的国家，被剃掉胡须是最大的耻辱。

为了维护自己的面子并一雪前耻，成吉思汗不得不派出远征军。也就是说，讹答剌地方长官的行为成为蒙古人称霸亚欧大陆的导火索。1221年，蒙古军队灭亡了花剌子模王国。成吉思汗在1227年灭亡西夏后不久去世，可以说是在完成了对中亚大草原和丝绸之路的控制后，成吉思汗的生命才走向终点。之后，蒙古人从草原上派出大规模的骑兵部队，征服了伊斯兰世界的东部、中国、俄罗斯，统一了干燥地带，建立了大帝国。

在第四代蒙古大汗之前蒙古军队将伊斯兰势力驱逐出欧亚大陆

蒙古部落分阶段一步步征服了阿拔斯王朝、金、北面的俄罗斯，分别在上述地区建立了以蒙古人为中心的政权。大草原将伊斯

兰世界、中国、俄罗斯联系在一起。可见，蒙古人充分发挥了大草原在地缘政治上的有利地位。第二代蒙古大汗窝阔台汗征服了俄罗斯的基辅大公国和中国北部的金，把蒙古帝国的统治范围扩展至亚欧大陆。蒙古人在蒙古高原上修建了新首都哈拉和林，在大草原上每隔约40公里设立一个驿站，制定了驿站制度，以加强蒙古高原和西部的东欧草原的联系。由此，蒙古大汗的特使一昼夜便可以在大草原上行进450公里。

第四代蒙古大汗蒙哥（1251—1259年在位）彻底摧毁了阿拔斯王朝的首都巴格达后，把北非以外的阿拉伯世界纳入蒙古帝国的版图中。这以后，阿拉伯人统治下的和平时代结束了，蒙古人统治下的和平时代开始了。据阿拉伯史学家说，在巴格达沦陷之际，蒙古人对巴格达市民进行了长达7天的掠杀。此后，伊斯兰世界的中心转移到埃及的开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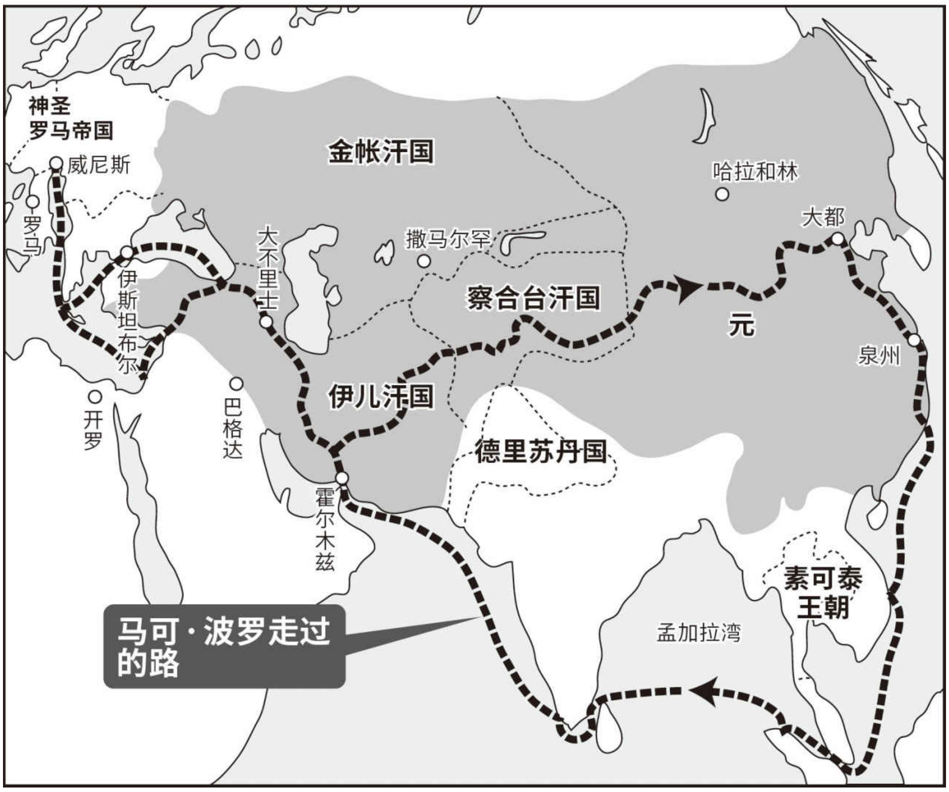
忽必烈连接欧亚

蒙古帝国转型为军事帝国、商业帝国

和阿拉伯帝国一样，蒙古帝国统治着亚欧大陆的各民族、各部落。为了保持稳定，蒙古帝国也从军事帝国转型为商业帝国。当时蒙古人虽将人口分为四等，但是，蒙古人在评价人时重视的不是民族出身，而是才华、能力。正是靠着这个，蒙古人才建立了地跨亚欧的大帝国。

第五代蒙古大汗忽必烈（1260—1294年在位）统治时期，威尼斯商人被归于色目人，即二等人。马可波罗在元朝为官17年，后来在《东方见闻录》（即《马可·波罗行纪》）中就蒙古帝国为了有效统治处于干燥地带的欧亚大陆而设立的驿站制度做了如下说明：“从元朝首都大都（今天的北京）修建出很多道路，通往沙漠等地区。蒙古大汗的使者从大都出发，沿着这些大道往前行进，每隔40公里，就能够到达一个驿站。每个驿站都建有又大又豪华的驿馆，这是供大汗的使者休息的地方。房间里的床上有丝质的被褥，非常奢华。除此之外，使者需要的重要东西应有尽有。驿站里还饲养着400多匹马，是为大汗的使者准备的。而且，有时候使者们要疾驰在没有道路、荒无人烟的山区。即便是在这种地方，蒙古大汗都设了驿站。这些驿站里既有馆舍也有马匹和马具——其他的驿站有什么，这里也有什么。”

蒙古帝国的版图



马可·波罗走过的海路和陆路

忽必烈于1279年灭了南宋，将整个中国纳入蒙古帝国的版图。此前，他已按照中国的习惯，于1271年将国号定为元。忽必烈在欧亚大陆将“草原之路”和“海洋之路”连接在一起，并以伊儿汗国的大不里士（今伊朗）和元朝的大都为中心，构筑了亚洲的环形交通贸易网。之后的清王朝是以蒙古帝国为模板建立起以东亚为中心的大帝国。在当今世界，仅有陆地霸权是不够的，甚至海洋霸权的时代也已经成为过去，正值空域霸权的时代。

“陆地”的货币是银子，而元朝使用纸币

穆斯林商人和蒙古帝国的关系是公平交换，“有所予有所取”。如果要把部落和城市、农村结合在一起，商人的作用必不可少。蒙古人巧妙地利用了穆斯林商人、犹太商人和中国商人。通过给予商人一定的权利，实现了干燥地带贸易区的一体化。同时，银

币成为通用货币。不过，蒙古人在中原地区只流通纸币，他们把从中原地区收集的大量白银运到白银极端匮乏的伊斯兰世界，获得了大量利润。就这样，亚欧大陆的经济实现了一体化。

忽必烈禁止使用铜钱，规定统一使用纸币。纸张廉价，能够随心所欲地印钞票，蒙古人得以通过合法手段进行掠夺。有趣的是，西亚的伊儿汗国白银匮乏，也想模仿元朝的做法，流通纸币，甚至还从元朝请来印钞的工匠。但是，由于商人强烈反对，纸币的发行以失败告终。

蒙古的霸权给世界带来的影响

亚洲环形交通贸易网由草原之路和海洋之路构成，规模庞大。蒙古帝国充分利用这一交通网络，给干燥地带的周边带来了巨大影响。亚欧大陆各地受到蒙古帝国有形无形的压力，令各地的传统社会发生了重大变化。其详情如下。

1．对东亚地区的影响

1259年，蒙古人令朝鲜半岛的高丽臣服。1279年，南宋被元朝灭掉，东亚纳入蒙古帝国的版图。干燥地带的游牧民族吞并了位于湿润地带的农耕民族。NHK电视台曾经播放过韩国的古装片中出现了蒙古式的烤肉。本来，朝鲜是佛教社会，禁止杀生，但蒙古人却改变了韩国的饮食习惯和社会习惯。也就是说，蒙古的游牧民文化给亚洲带来了重大影响。

日本列岛四面环海，在征服南宋之后，蒙古人派大型舰队前来征服日本。这就是文永之役（1274）和弘安之役（1281），为此日本人将蒙古人称作元寇。马可·波罗解释说，忽必烈远征日本的目的是从日本获得黄金。日本人虽经过浴血奋战打败了入侵的蒙古

人，但为了抵抗蒙古人入侵日本，镰仓幕府给家臣们造成了巨大负担。不仅如此，镰仓幕府还无力论功行赏，抚恤更是无法兑现。结果1333年，镰仓幕府灭亡。

另外，蒙古人的侵略扩张促进了东亚的交流和贸易。这一点是不容忽视的。日本和元朝的贸易额超过了日本和宋朝的贸易额，日本的很多禅僧长期留在中国。商人和僧人在回国时将中国的生活文化和佛教文化带回了日本。

2．对东南亚的影响

1254年，蒙古军队占领大理国。1287年，蒙古军队征服缅甸。但后来蒙古军队三次远征越南的陈朝，均以失败告终，不过触发了连锁反应。当时在印度支那半岛北部的泰族人南下，形成一大势力。泰族人在北部建立第一个王朝素可泰王朝（1257—1350）。在阿瑜陀耶（大城王朝）时期（1350—1767），泰族人更成为印度支那半岛的核心商业力量。

在元朝，泉州是穆斯林商人的活动据点。从泉州到爪哇岛的航线上，常有海盗出没。1292年，信诃沙里王朝灭亡，满者伯夷王朝（1293—1520）取而代之。进而，满者伯夷王朝推翻了以苏门答腊岛为统治中心的三佛齐王国（7世纪—14世纪），从而控制了马六甲海峡。三佛齐王国在被满者伯夷王朝推翻之际，商业贵族们移居马六甲海峡地区。这使得马六甲王国（15世纪初—1511）成为商业王国。

可见，在13世纪的蒙古帝国冲击下，处于湿润地带的东南亚也进入大变革时期。

3．蒙古帝国对伊斯兰世界的影响

西亚地区被纳入蒙古帝国的版图之后，伊斯兰世界统治下的和平时期结束了。伊儿汗国把首都从巴格达迁往与草原大道相连的新都大不里士。随后，大不里士发展成为人口达100万的大城市。但是，由于政治中心转移到了草原，西亚也开始走向衰落。埃及马穆鲁克王朝（1250—1517）的首都开罗在此基础上，逐渐成为伊斯兰世界的经济中心。

4．蒙古帝国对俄罗斯的影响

基辅公国被蒙古人灭亡后，伏尔加河流域等地区也落入蒙古人手中。之后，在长达200年里，蒙古人和突厥人统治着俄罗斯。在俄罗斯，把干燥地带来的游牧民族的强权统治称作“蒙古人的桎梏”。那时的俄罗斯人信仰了东正教，民族凝聚力增强，才免于被同化，这在民族精神和社会习惯上与当今的俄罗斯社会一脉相承。但曾是里海北岸的毛皮交易中心的哈扎尔汗国，却被蒙古人灭亡了。哈扎尔汗国以犹太教为国教，国家灭亡后，很多犹太教徒移居波兰、立陶宛。这些人便是东方犹太人的始祖。从19世纪末到20世纪，东方犹太人又大举移民美国。

北京将草原之路和海路连在一起

在陆地世界搞基础建设

1260年，忽必烈继任为第五代大汗。第二代大汗窝阔台的孙子海都汗对忽必烈十分不满，纠集草原的3个汗国起兵讨伐忽必烈，这就是持续了40年的海都之乱。14世纪初，海都死后，海都之乱方才平定。受海都之乱的影响，蒙古帝国分裂为农耕社会和游牧民社会。随后，吉普察克汗国也扯旗造反。一时间，忽必烈政权危险重重，只得开始加强对中国地区的统治，以稳固后方。为此，忽必烈政权的重心开始南移，定都于大都，即今北京。

马可波罗在《马可·波罗行纪》中写道：“就归忽必烈支配的臣民、领土、财宝而言，从我们的祖先亚当开始直到今天，是从未见过的。忽必烈掌握着很大的权力。”忽必烈以强大的军事力量为后盾，统治着游牧民族和农耕民族。忽必烈尊重佛教、犹太教、伊斯兰教、基督教的信徒们，允许他们参加各自的礼拜活动，主张各宗教是平等的。通过这一措施，在忽必烈的统治下，实现了多文化的共存。蒙古帝国和阿拉伯帝国有所不同：蒙古帝国不把宗教作为加强帝国统治的手段，而是坚守游牧民族的传统，尊重部落和各地区的传统。在蒙古帝国，伊斯兰教、基督教等一神教和佛教、道教等多神教并存，统治者通过部落的联盟维持霸权。

忽必烈统治欧亚大陆的构想

忽必烈花费25年时间修建了首都大都。大都是一座大城市，周围环绕着35公里的土城墙。据说，在鼎盛时期，大都的人口达100万。蒙古帝国把大都定位为世界的中心，大都正门的南面是干燥地

带的草原之路和中国地区的大道路网的起点，把亚欧大陆的其他部分和中国连在一起。

在蒙古帝国的干线道路上，蒙古人还修建了设施完善的驿站，这些驿站由兵部管辖。仅在中国，蒙古帝国就修建了1400个驿站。就这样，中国的道路和覆盖亚欧大陆的四大汗国的道路网实现了互通互联。蒙古帝国不善于统治农民，所以采用在流通领域征税的办法来充盈国库。元朝大约80％的国库收入是从食盐的专卖业务中获得的。盐商要想得到利润丰厚的食盐，必须用银子购买政府发行的盐引。然后商人再用盐引来换食盐。由于食盐专卖是政府的主要财源，所以元朝让盐商大发横财。蒙古帝国从盐商那里获得大量白银，进而将白银流通到伊斯兰世界。可以说蒙古帝国通过盐业专卖制度达到了一石三鸟的效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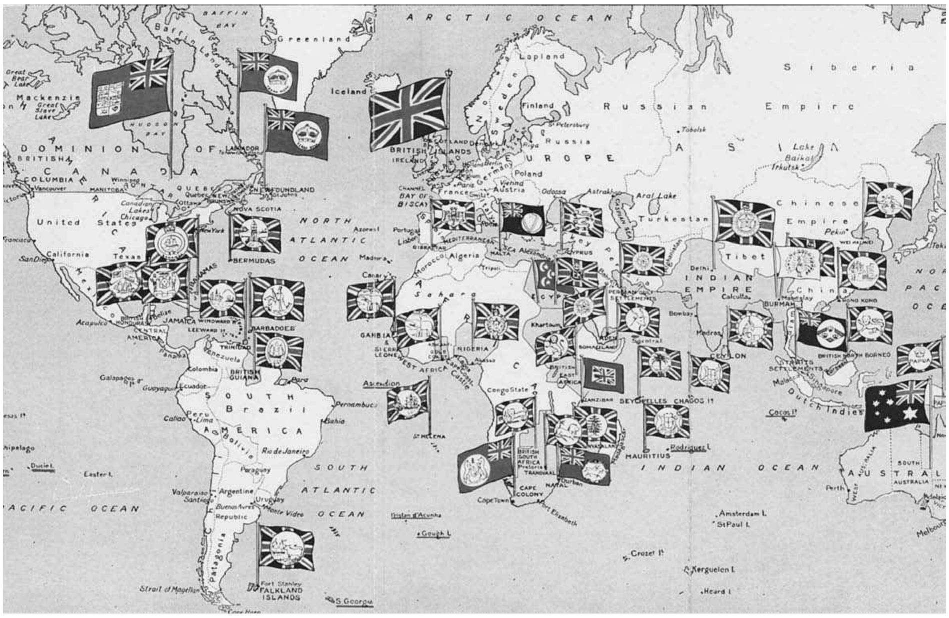
元朝首都北京与海路相连

在蒙古帝国时期，连接印度洋和中国南海的季风航路经台湾海峡延伸到东海、黄海、渤海。位于波斯湾的霍尔木兹海峡小岛上的港口霍尔木兹，以及中国福建省的泉州是当时的中心港口。在海上，中国商人和印度商人活动范围的分界线是印度南部的科伦港。在西面，穆斯林商人利用小型帆船，活跃在印度洋上。在东面，中国商人利用中国式帆船活跃在东南亚和南海海域。

元为了养活大都庞大的人口，必须从江南的鱼米之乡，即杭州等地运来大量大米。另外，还要从印度洋、东南亚运来香料、香木等物。这条航线和运输粮食的航线在大都重合，重合点就在大都中心位置的积水潭（意思是将所有的水源集中在一起形成的湖）。这是一个巨大的港口，在这里奢侈品和粮食交易非常活跃。

东南亚和印度的大量物产运到泉州。这些物产和江南的大米及其他粮食一起通过东海、黄海、渤海的航线运到直沽（今天的天津），再沿着白河逆流而上抵达通州，从通州再顺着大运河通惠河航行50公里，来到积水潭。通惠河上每隔5.5公里建一个水闸，共建有14个水闸。

第二编
海洋霸权和大英帝国



第五章
欧洲人发现海洋，进入大航海时代

亚欧大陆是大洋中的岛屿

从地球印象的革命到海洋时代

大航海时代开始于15世纪中叶，大航海时代的含义，简而言之，就是欧洲人在亚欧大陆的远方发现了广袤的海洋世界，该世界与亚欧大陆干燥地带的特点迥异。那时，人们先是发现了位于西方的大西洋（其面积约是日本海的78.5倍），不久人们又在大西洋发现了南北长东西窄的美洲新大陆。进而，人们又发现了太平洋。这样一来，人们就逐渐了解了占地表面积70％的海洋。到那时为止，人们还认为干燥地带是“唯一的世界”。而当人们知道了海洋的存在之后，以干燥地带为世界的中心的世界观被颠覆了。在欧洲人中如下认识逐渐普及：亚欧大陆只不过是漂浮在广袤海洋上的一个岛屿而已。这就是“空间革命”或称“地球印象革命”。空间革命一直延续到19世纪下半叶，最终引起了世界框架的大转换，在这个框架中海洋处于核心位置。由于欧洲人重新“发现”了地球，所以开始在世界上占据优势。蒙古帝国灭亡后，在亚欧大陆的干燥地带，依然重复着帝国的兴衰更替，没有发生质的变化。从这一点来看，欧洲人的优势地位也是很明显的。

大航海时代开启之后，人们的世界观发生了巨变，视野不断拓宽，对世界的理解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今天，由于互联网的发展，出现了虚拟空间，发生了空间革命，迎来了全球重组时代。因此，很多问题仅在日本列岛内部是解决不了的，必须要从全球化的角度看待问题。我们有必要把“空间革命”作为世界史的结构转

换来理解。笔者认为当今我们应该学会预测时代发展的趋势，制定蓝图，大胆地实行教育改革。

在蒙古帝国时期，关于中国基本情况的介绍和日本盛产黄金的传说传到西方，并广受瞩目。受此诱惑，哥伦布（1452—1506）不惜冒着生命危险，打算开辟一条从大西洋到中国的航线，以获取财富。以此为契机，欧洲人开启了大航海时代，进入一个全新的时代。自古以来，欧洲人认为大西洋是“神话之海”，是没有利用价值的海洋。大航海时代开始后，欧洲人给大西洋重新定位，认为大西洋是“欧洲和西面的亚洲之间的海域”，也是与亚洲大陆相隔的一片海洋。基于这一认识，世界史开始发生转变。

在之后的半个世纪，欧洲人逐渐搞清了大西洋的大气环流系统和洋流系统。不仅如此，欧洲人还发现了非洲西南端的好望角、南美洲最南端的合恩角。这样一来，大西洋、印度洋、太平洋这三个大洋就连为一体，人类也向海洋时代迈进一大步。由此，各地的湿润地带通过海洋连在一起，和新大陆也连为一体。干燥地带是世界中心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西欧各国穿梭于大西洋、印度洋、太平洋，并向美洲大陆殖民。在此基础上，欧洲各国的势力不断膨胀。在大航海时代，人们逐渐认识到是海洋把各大陆连接起来了，这一认识进一步推动了世界的一体化。从大航海时代到19世纪末的500年间，由于大洋把大陆连在一起，人们对世界的认识从以亚欧大陆为中心的世界开始向全球规模的世界转换。这就是世界一体化的过程。

源于亚洲的技术助力海洋世界的扩展

海洋世界扩展的前提是航海方法从沿岸航海法向海洋航海法的转换。大航海时代使用的主要航海工具和航海技术都是在蒙古帝国时期从亚洲传到欧洲的，之前欧洲没有自己的技术。此前，欧洲使

用的是横帆，后来欧洲人从伊斯兰世界引进了三角帆纵帆。纵帆能够应对风向的变化，即便是在逆风情况下也可以前进。纵帆是在刮季风的海洋上航海过程中发明的，能够应对各种风，性能优良。

人们确定船只方位的罗盘针就是在蒙古帝国时代和火药一起从中国传到欧洲的。不久，意大利各城市开始普及印着罗盘针方位的海图。以前的沿岸航海方法必须以陆地的目标物为参照物，有了海图就可以不参照陆地的目标物而航行在大海上。

陆地世界依然如故

帖木儿帝国没有能够再现蒙古帝国的辉煌

在大航海时代以后，欧洲人的世界观发生了变化。而在干燥地带，游牧民族建立的帝国继续兴亡交替。蒙古帝国崩塌后，各地的政权纷纷独立，都野心勃勃地想以游牧民族的军事力量为后盾建立规模庞大的区域性蒙古帝国。帝国的大规模化成为常态，但陆地世界的框架本身并没有发生变化。

在14世纪的亚欧大陆，西面的帖木儿帝国（1370—1507）想重建蒙古帝国；东面的明王朝（1368—1644）则想以江南的湿润地带为中心建立一个农耕帝国。帖木儿雄心壮志，很有威望，梦想重建蒙古帝国。但是由于年事已高，无力完成梦想，也就没有发生历史的逆转。在统一伊斯兰世界后，1405年，帖木儿欲率领20万人前去征服明朝。然而，当时帖木儿年事已高，已经连马都上不去了。结果，帖木儿没有能够和明朝的永乐帝（1402—1424年在位）交战，就撒手人寰。

蒙古帝国是通过传统的手段将各部落连为一体在短时间内建立的，在有威望的统治者去世后就瓦解了。明王朝则是由于下述4个原因衰败并灭亡了：

蒙古势力死灰复燃；

明朝实施海禁政策，禁止商人从事对外贸易，重农轻商，但当时欧洲的大航海时代已经来临，明朝的海禁政策逆时代潮流而动；

满族人开始崛起；

明末爆发了农民起义。

陆地世界持续存在的四大帝国

17世纪，在亚欧大陆的干燥地带存在着奥斯曼帝国、俄罗斯帝国、莫卧儿帝国、清这四大帝国，一直持续到19世纪。俄国从金帐汗国的统治中独立出来后，由俄国的彼得大帝（1682—1725年在位）推动了俄国的欧化进程。那时，俄国居民的2/3居住到了注入里海的伏尔加河流域。此后，俄国与欧洲的联系得到进一步加强。与此同时，俄国也实施对外军事扩张的政策。实现这一政策的基础是将哥萨克人变为俄国专用的骑兵部队来源，而游牧民族突厥人的骑兵一直以来都是哥萨克人的核心。也就是说，干燥地带的帝国在规模上有所扩大，但是在结构上依然如故：

第一，在东地中海和西亚地区，奥斯曼帝国（13世纪末至1922年，1453年征服了拜占庭帝国）不断扩张势力。控制了东地中海地区的商业。受此影响，支撑着文艺复兴的亚洲贸易衰落了。热那亚等地的意大利商人开始移居葡萄牙的里斯本，尝试进行大西洋贸易，为开启大航海时代奠定了基础。

第二，在欧亚大陆北部的森林地带，俄罗斯在军事上利用突厥游牧民哥萨克骑兵，建立了罗曼诺夫王朝（1613—1917）。到了17世纪，为了维持日益枯竭的毛皮资源，征服了面积为日本面积26倍的西伯利亚。之后，俄罗斯利用哥萨克骑兵在中亚、东欧和中国东北进行军事扩张。

第三，帖木儿帝国的末代皇帝被突厥人的一支——乌兹别克族赶出中亚后，从阿富汗进军印度，征服印度后建立了莫卧儿帝国（1526—1857）。在莫卧儿帝国，信仰伊斯兰教的突厥化蒙古人统治着信仰印度教的印度人。

第四，号称第二个成吉思汗的努尔哈赤，建立了后金。在此基础上，女真人和蒙古人联手，征服了中原、西藏、青海、内蒙古等地，建立了清王朝（1644—1911）。

人们了解了大西洋、太平洋的大致情况

葡萄牙在西非探险

葡萄牙是位于伊比利亚半岛的小国，面积仅为日本的1/4，它经过和穆斯林的激烈斗争后，才建立了国家。但让欧洲人认识蓝色海洋大西洋的却是葡萄牙人。

德国的历史学家、哲学家埃伦斯特·卡普把世界史分为河流文明、内海文明、海洋文明三个阶段。其中，葡萄牙便是引领欧洲从内海文明阶段进入海洋文明阶段的主要力量。一开始，葡萄牙的探险活动集中在非洲西岸，但随着探险活动的进展，葡萄牙人得到了意外的收获。迪亚士发现了好望角，意识到大西洋与印度洋是相连的。从这里我们可以发现，让世界史发生转型的未必都是大国。葡萄牙是个小国，人口仅有100多万，而且它和西班牙接壤，边境线长达1200公里。所以葡萄牙只能靠采取政治联姻的方法，防止强国西班牙的侵略。而且，葡萄牙能够开展农业生产的土地仅占其国土面积的7％到8％。为了生存，葡萄牙只能向海洋寻求生路。

促使葡萄牙向大西洋进军的关键人物是航海王子恩里克（1394—1460）。恩里克认为在非洲内陆地区有一个信基督教的国王约翰王。恩里克便打算与约翰王合作，征服摩洛哥的农耕地带。恩里克先是在非洲最南端的厄加勒斯角设立了培养航海家的学校、造船厂、天体观测所，然后又聘请阿拉伯和意大利的船员们，给学员们讲解航海技术和地理知识，把他们培养成航海家。在新时代，培养人才是第一步。

经过上述努力，恩里克获得了丰硕的成果，在奴隶贸易和黄金贸易中获利丰厚，恩里克去世后，葡萄牙将航海事业委托给实力雄

厚的商人。1488年，迪亚士抵达好望角。以此为契机，葡萄牙开拓了前往印度的航线。

创业者哥伦布看到的“幻影”

哥伦布宣称，横渡大西洋，开辟亚洲航线，可以从中找到商机。因此在1492年，他得到西班牙女王伊莎贝拉的援助，率领120名水手从西班牙的巴罗斯港出发向西航行。哥伦布乘坐旗舰圣玛丽亚号，120名水手分乘包括圣玛丽亚号在内的3艘船。他们先是在加那列群岛等待顺风的到来，然后一行人借着冬季季风航行了约1个月，最后抵达位于加勒比海边缘的巴哈马群岛中的瓜纳哈尼岛。

在这一路上，哥伦布认为加勒比海就是中国海；误认为古巴是中国大陆的一部分；断定伊斯帕尼奥拉岛就是日本。很明显，哥伦布的看法是错误的。哥伦布前后共进行了4次航海，直到去世哥伦布还一直认为面积为日本海2.8倍的加勒比海是中国海。或许这是因为作为探索者，哥伦布不愿意放弃自己打算去中国、日本的梦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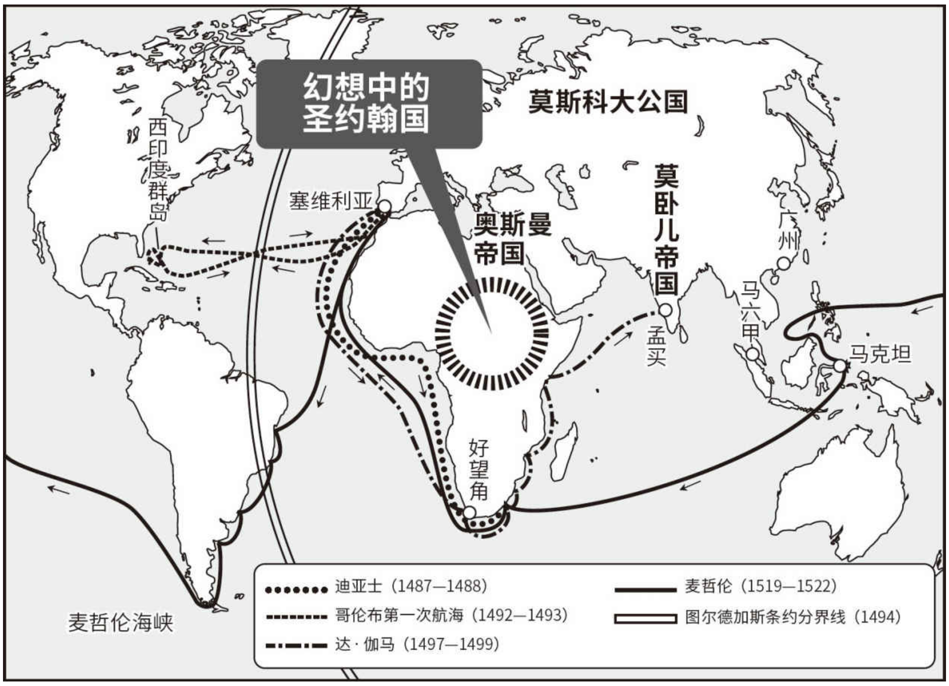
哥伦布的功绩在于开辟了横渡大西洋的航线，具体情况如下：其一，在非洲海面上的加那列群岛利用冬季风航行至加勒比海，到达新大陆；其二，顺着向北流的墨西哥湾洋流回到欧洲。此后，欧洲人便利用季风和最高时速达9公里的墨西哥湾洋流进行航海，加勒比海（面积仅次于地中海的内海）甚至也被认为是欧洲的一部分。之后，西班牙人从西班牙南部的安达卢西亚移民新大陆。一些犹太人为了避免受到迫害，移民新大陆。美洲新大陆变为第二个欧洲。

麦哲伦环游世界

1519年，西班牙的卡洛斯一世（1515—1556）打算开拓从西班牙到香料产地马六甲群岛（也称香料群岛）的航线。这是因为葡萄牙皇室通过和亚洲开展香料贸易获得了丰厚的利润，而西班牙从新大陆获得的利润没有想象得那么多。

于是，西班牙皇室请求中世纪以来的德国的富豪、金融家富格尔出资，雇用麦哲伦探索前往亚洲的新航线。麦哲伦是葡萄牙航海家，曾经在东南亚进行航海活动。但他在祖国葡萄牙受到冷遇，才向西班牙皇室寻求一个施展自己才能的机会。当时，欧洲把美洲新大陆看作亚洲的一部分，并不认为航海是困难的事情。

1519年8月，麦哲伦率领265人分乘5艘船起航。他们先沿大西洋南下。其间，由于智利海峡（后来被命名为麦哲伦海峡）的洋流速度很快，麦哲伦一行非常幸运，仅用一周时间就穿过海峡，来到一片平静的大海。1520年，麦哲伦把这片大海称作太平洋，意思是和平之海。



始于葡萄牙的航海和探险的时代

太平洋面积很大，约占地表面积的1/3。麦哲伦一行人航行了100多天一直找不到陆地，很多船员因患坏血病而丧生。1521年，麦哲伦一行途经关岛来到菲律宾群岛，首次证实地球是圆的。之后，麦哲伦在与菲律宾群岛土著人的争斗中丧生。麦哲伦虽然去世了，但却搞清楚了地球的大小、陆地的位置和所占比例，做出了重大贡献。

由于发现大洋而出现的新想法

在前面，笔者一直使用“海洋世界”这个词，严格来讲应该使用“大洋连接大陆的世界”。从哥伦布的航海到麦哲伦环游世界，欧洲人经过一系列航海活动，逐渐意识到地球的表面大部分是海洋，干燥地带只不过是被蓝色海洋环绕着的岛屿而已。以此为开端，世界史发生了巨变。之前人们一直认为亚欧大陆的干燥地带是唯一的世界。但经过一系列的航海活动，人们终于意识到亚欧大陆的干燥地带并非一个完整的世界，而是被海洋包围着的一个小世界。不久，这一认识由哥白尼、牛顿等以物理学的地理观体系化了。就这一点，卡尔·施密特在《从世界史角度考察陆地和海洋》（日经BP经典作品出版社出版）中指出：“这一时期，可以用‘新世界’这个大胆的词汇来讲这个问题。先是西欧和中欧各民族的意识发生了变化，最后全世界所有人的意识也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也就是说，意识变革才是真正意义上的“空间革命”。

移民扩大了殖民地，海洋产生了资本主义

打着基督教的旗号统治新大陆

西班牙人最初占领的是以伊斯帕尼奥拉岛为中心的加勒比海域。航海回国后，哥伦布从美洲带回了当地的特产辣椒。本来，哥伦布打算把辣椒当作胡椒在欧洲推销。但是，辣椒太辣，根本卖不动。哥伦布还认为伊斯帕尼奥拉岛就是盛产黄金的日本，结果在这里也没有获得足够量的黄金。即便如此，还是不断有人从西班牙的安德卢西亚等地前往加勒比海地区殖民。于是相应地，天花、流感等疾病跟随着西班牙人来到这里，导致土著居民几乎死亡殆尽，劳动力严重不足，西班牙人的殖民事业面临危机。

为了获得劳动力，殖民者开始新大陆探险活动。西班牙人先后发现了位于墨西哥高原的阿兹特克帝国和位于秘鲁的印加帝国，这两个帝国都位于山区。之后，西班牙人用武力征服了这两个帝国，并得到了墨西哥、安第斯地区的大量财富。西班牙国王将墨西哥定为新西班牙的领地，将秘鲁定为秘鲁副王的领地，持续不断地殖民。

由于殖民活动，美洲新大陆逐渐欧洲化。为进一步殖民，殖民者向原住民宣读了西班牙国王的布告：“土地归西班牙国王所有，西班牙国王以原住民信仰天主教为条件，将土地和原住民的统治权委托给了殖民者。”之后，殖民者不经原住民的同意，单方面强行按照布告内容实施。由此可见，西班牙殖民者打着传播基督教的旗号将殖民活动和武力征服正当化了。荷兰人、英国人来到美洲大陆的时间比西班牙人晚了一步。不过，荷兰人和英国人没有打着传播基督教传教的旗号，而是打着传播欧洲文明的旗号进行征服和殖

民，但实际上仍是继承了西班牙人的做法，换汤不换药，都是为了将欧洲人的殖民活动正当化。

在西班牙人征服美洲新大陆之前不久，美洲新大陆的人口估计在8000万以上。而当时西班牙和葡萄牙的人口合起来也不足800万，全欧洲的人口才6000万。新大陆人口比欧洲的人口还要多。然而，新大陆的原住民不了解世界形势，对西班牙人、马匹、火枪等感到莫名的恐惧。西班牙人带来的天花、流感等也使新大陆的原住民人口锐减。正是由于以上因素，西班牙人得以在短时间内征服了美洲新大陆。

白糖培育了资本主义经济

海洋这个空间只有通过开展商业才能产生财富。和寒冷的欧洲不同，欧洲人最初登上新大陆的地方属于温暖的亚热带气候区，因此殖民者开始在新大陆经营大型的种植园，获利丰厚。亚热带、热带的产品在欧洲可以卖上好价钱。殖民者通过海洋运输筹集劳动力，低成本地大量生产商品，在欧洲市场上高价出售。这就是资本主义的雏形。就大西洋的代表性商品作物而言，16世纪至17世纪是白糖，18世纪是棉花。殖民者从其他地区获得廉价的劳动力，在新大陆经营种植园，支撑起了欧洲城市的发展。这就是资本主义经济运行模式。这一模式构成了当今世界的经济发展的框架。

16世纪，巴西开始种植甘蔗，17世纪至18世纪加勒比海诸群岛开始种植甘蔗。甘蔗这种作物在收割后，蓄积糖分的部分就会凝固，甜味随之急剧下降。因此收获之后，应立刻熬成糖。因此，种植园一般都附设有简单的制糖工厂。正是这些工作，要求甘蔗收割时和制糖生产时大量使用黑人奴隶。

甘蔗可以在一年中的不同时期种植，一整年都有甘蔗收割。因此，保障有足够的劳动力十分重要。估计从16世纪到19世纪，从非洲运往巴西和加勒比海的黑人奴隶的数量达1500万以上。

廉价的墨西哥白银在陆地世界流通

1545年，玻利维亚发现了波托西银矿。接着，墨西哥的萨卡特卡斯也发现了银矿，大量的白银被开采出来。在采掘和加工白银的过程中，殖民者强制原住民劳动，用混汞法提炼白银。因此，白银的开采和冶炼成本都很低。

16世纪至17世纪上半叶，西班牙每年从新大陆经大西洋把大量的白银运到旧大陆（即欧洲等地），其产量足足是欧洲的六七倍。欧洲得到了大量廉价的白银，与因白银匮乏而烦恼的亚洲大陆相比，占据完全优势。据说，从1503年至1660年，约有15000吨白银在墨西哥加工成银圆（即墨西哥银圆或者西班牙银圆），运往西班牙。这些银圆40％成为西班牙王室的收入，剩下的60％经日内瓦商人等行商之手运往欧洲各地。当时，天主教国家和新教国家之间的宗教战争正如火如荼。所以，从新大陆运到西班牙的白银的大部分被用于支付雇佣军的工资，白银因而分散到欧洲各地。西班牙是在与伊斯兰世界的宗教战争中建国的，而今又成为天主教国家的核心力量。可以说从新大陆流入欧洲的大量白银使得宗教战争长期化和大规模化。大量的廉价白银从新大陆流入欧洲，导致欧洲的白银价格暴跌。16世纪至17世纪上半叶，物价更是上涨了三四倍，这一过程被现代人称为价格革命。正是由于长期的通货膨胀，欧洲经济发展越来越快。

从海路也能到亚洲

葡萄牙人为了找到胡椒来到亚洲

亚欧大陆的干燥地带有强大的帝国阻隔着道路，欧洲人不能通过陆路到达遥远的亚洲。到了大航海时代，欧洲人为了获得亚洲的香料、棉布、丝绸等商品，走海路来到印度、东南亚、东亚。其中，最先走海路来到亚洲的是葡萄牙人。为了从亚洲获得香料，1497年，葡萄牙国王曼努埃尔一世（1495—1521年在位）派达·伽马率船队到印度。船队由规模不大的4艘船和约170人的乘组人员组成。达·伽马绕过好望角之后，沿着非洲东部沿岸的伊斯兰贸易区摸索北上。在肯尼亚港，达·伽马一行雇了穆斯林向导，乘着季风于1498年到达印度西岸的加尔各答。达·伽马的这次航海活动花了两年零两个月的时间，乘组人员中有100多人丧生，可以说比哥伦布的航海还要困难，但是达·伽马从印度的加尔各答带回了胡椒，其价格仅为欧洲市场的1/60，给葡萄牙皇室带来了丰厚的利润。葡萄牙国王尝到甜头后自称“印度洋之王”，把胡椒贸易作为葡萄牙王室的事业来推进。此后，葡萄牙王室每年只派出两艘船前往印度。这是因为欧洲的胡椒市场规模很小，葡萄牙王室为了维持胡椒的价格，限制了每次派往印度的船只数量。



墨西哥银圆

这两枚墨西哥银圆（ 或称西班牙银圆） 制于1768年，由波托西银矿开采出的白 银铸造而成。

胡椒在欧洲很受欢迎。究其原因，是因为欧洲的森林盛产橡子，欧洲人可以用橡子做饲料在森林中养猪。而杀掉猪之后，如果能给猪肉涂上胡椒粉，便可以消除猪肉因放置时间稍久而产生的异味。所以，香料便成为欧洲人食用猪肉不可或缺的作料。

在亚洲，干燥地带是政治统治的中心，而湿润地带的政治统治力量薄弱。因此，小国葡萄牙可以利用大炮和火枪侵占这里。葡萄牙模仿威尼斯统治地中海的做法，在果阿、马六甲等战略要地构筑要塞、设立商馆，以管理印度洋、东南亚的货物贸易。但是，葡萄牙人口仅有100万，在印度洋周围设立大量军事据点，动用大量军舰统治广袤的海域是很困难的。尽管如此，葡萄牙还是为欧洲人走海路入侵亚洲奠定了基础。葡萄牙称霸的时代维持了很短的一段时间，海运大国荷兰从葡萄牙手中夺走了印度洋、东南亚的香料贸易支配权。1623年，英国与荷兰在香料群岛发生冲突（安伯伊纳事件），英国战败，放弃东南亚，只好将扩张的矛头瞄准印度。

西班牙入侵菲律宾和白银贸易

新大陆出产白银的1/3是从墨西哥的阿卡布尔克港横渡太平洋运往西班牙的殖民地菲律宾马尼拉的。这是为什么呢？原来，当时明朝实施海禁政策，禁止民间商人从事对外贸易。西班牙人便在马尼拉用白银购买明朝商人走私到这里的丝绸、瓷器。来自新大陆的白银价格约是东亚白银价格的1/3，因此交易对西班牙人和明朝走私商人都很有利。

大量的墨西哥白银流入东亚，使得明朝的走私贸易和日本的朱印船贸易活跃起来。明朝称墨西哥白银为“银圆”。西班牙帆船装载着在马尼拉购买的中国商品，利用黑潮，沿日本海岸北上，在三陆海面乘着偏西风回到阿卡布尔克，史称马尼拉•加列温贸易。运到墨西哥的丝绸、瓷器等商品则横渡大西洋，向西抵达欧洲。这时的西班牙，一面与葡萄牙对抗，一面致力于开拓海运网络。

第六章
在小国荷兰、英国主导下向海洋世界转型

从寒冷的海洋掀起的世界重组大潮

荷兰人、英国人是北欧海盗的后裔

由于欧洲人支配着大西洋和新大陆，在全球范围内，世界秩序实现了重组。这是分两个阶段进行的：

第一阶段是大航海时代，葡萄牙和西班牙起了主导作用；

第二阶段是17世纪以后北欧海盗的后裔荷兰人、英国人活跃的时期；西班牙宗教情怀浓厚，没有能开拓新的时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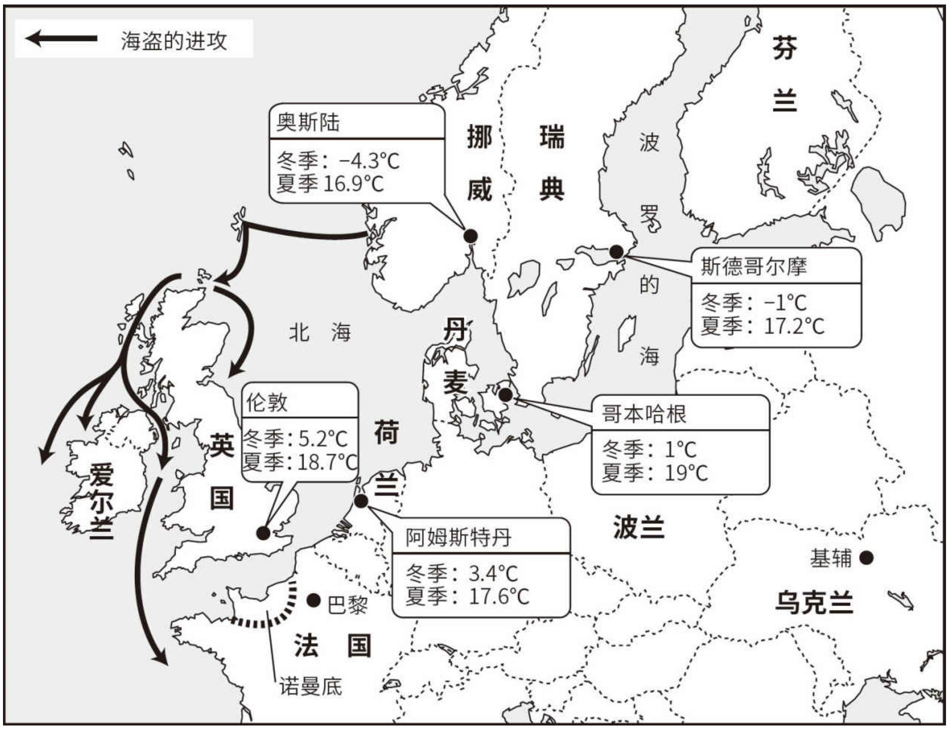
在15世纪和16世纪，海洋世界不断拓展，西班牙把天主教势力的扩张看作是神的意志。西班牙按照这一逻辑，不断在新大陆建立殖民地。但是，海洋世界从真正意义上对陆地世界进行重组则要到17世纪以后。在这一过程中起主导作用的是居住在北海、波罗的海的北欧海盗后裔——荷兰人和英国人。北海、波罗的海地区天气寒冷，物资匮乏，长期以来生活在这里的人们生活困苦。荷兰人、英国人通过宗教改革，摆脱了教皇、神圣罗马帝国皇帝的控制，建立起新教国家。他们大力发展海运，将海洋世界的主导权从西班牙手里夺了过来。

英国与荷兰都濒临北海，阿姆斯特丹到伦敦的距离与东京到大阪的距离大致相同，一天就能到达。16世纪至17世纪两国都是靠打败西班牙才出人头地的。荷兰经过80年断断续续的独立战争（1568—1648），才从西班牙独立出来。而英国是在1588年与西班牙的战争中获胜，才从西班牙手中夺取了大西洋的霸权。

这以后，英国为了和掌握欧洲大陆霸权的法国争夺北美殖民地，又断断续续进行了80年的战争。接着，英国灭亡或者削弱了亚洲的各帝国，最终于19世纪后半期，通过海洋统治了世界1/4的领土，建立起霸权国家。英国通过上述一系列行动雄辩地证明，只要通过海上力量掌握了占地球表面积70％的海洋的霸权，就能掌握比亚欧大陆干燥地带的帝国还要强大的霸权。英国在积极向海外扩张过程中，建立起民族国家、议会、资本主义经济，对外大力扩张殖民地、自治领，开展自由贸易，发行国债和纸币。可见，英国在近代独领风骚。

寒冷让北欧海盗走上掠夺、殖民之路

与地中海相比，人们对荷兰和英国濒临的北海以及北海北面的波罗的海知之甚少。下面笔者就对北海及波罗的海的情况进行简述。从北欧到俄罗斯的西伯利亚，寒冷地带（亚寒带）呈带状分布。在寒冷地带，最冷月份的平均气温不到零下30摄氏度，最温暖的月份的平均气温在10摄氏度以上。濒临波罗的海的城市（斯德哥尔摩、奥斯陆、哥本哈根）、濒临北海的城市（阿姆斯特丹、伦敦）的冬季和夏季的气温如上一页图所示。



北海、波罗的海地区

北欧海盗活跃的波罗的海、北海的夏季平均气温大致与日本北海道的钏路、稚内相同；冬季，波罗的海和北海受墨西哥湾暖流和偏西风气压的共同影响，要比北海道的钏路、稚内温暖得多。也就是说，波罗的海、北海冬天的气温和日本的青森、岩手等大致相同，夏天的气温大致和日本北海道钏路、稚内的气温大致相同。北欧尽管处于高纬度地区，但这里的人们依然从事农业和渔业。但因北欧的气候条件原因，北欧地区的麦子产量很低，人们只能依靠海上贸易维持生计。正因如此，北欧人还进行掠夺和殖民活动。在北海和波罗的海，寒冷成为对外扩张的原动力。

英国的根在北海

北欧海盗住在波罗的海和北海的周边。因为住在欧洲北部，也被称作诺曼人。在历史上，有一个术语叫中世纪温暖期，指的是800年至1300年，北欧处于温暖期的时候。北欧海盗的扩张开始于9

世纪。在伊斯兰世界，俄罗斯的毛皮成为有代表性的奢侈品。于是，住在波罗的海最里面的瑞典海盗开拓了毛皮之路。不久，海盗们在位于森林和草原的交界处的乌克兰设立据点，建立了基辅公国（9世纪至13世纪）。基辅公国就是俄罗斯的起源。

9世纪中叶，挪威海盗在北海沿岸的各河流沿岸进行掠夺，十分猖獗。西法兰克国王对此束手无策，最终决定将塞纳河下游的土地赐给海盗首领（这就是诺曼底公国）。这是因为，在北海周围，各种海盗势力争斗不已，形势十分复杂。西法兰克国王这样做的目的是通过绥靖政策加强巴黎的防卫。与此同时，诺曼底公国的海盗首领征服了英国，建立起了诺曼王朝（1066—1154）。等于是英、法两国的命运被连在了一起。这一状况一直持续到英法百年战争（1337—1453），经过英法百年战争，英法两国以英吉利海峡为界划分边界。由此可见，英国的根在北海。

被诺曼人征服的原住民盎格鲁—撒克逊人大体而言都是海盗。因此，可以说英国是海盗的后裔。英格兰吞并了威尔士、苏格兰、爱尔兰之后，建立了联合王国。9世纪以后，海盗在格陵兰、纽芬兰岛殖民。但是，这属于海盗的自然扩张，并不属于改变地理认识的空间革命。总的来说，9世纪是海盗的扩张时期。

荷兰因为鲱鱼而成为海上马车夫

“地球是上帝创造的，而荷兰是人创造的”

荷兰的乞丐游击队、英国的清教徒、法国的胡格诺派教徒等属于新教徒，更是开拓海洋世界的主力。由于宗教改革兴起，北欧诸国纷纷举起新教的旗帜，脱离了南欧的教皇的控制。虽同样是新教，但路德派和加尔文派互相憎恨，势不两立。路德派比较保守，对商业行为和借钱生利的行为采取了零容忍的态度。相比之下，加尔文派在对利息进行限定的基础上允许放贷生利。他们还信奉预定救赎学说，即认为人在死后会不会得到上帝的救赎，是被预先决定了的。在此基础上，他们允许通过航海活动追求财富，因此在大西洋进行航海活动的很多人是加尔文派教徒。荷兰的面积和日本的九州大体相同，是个小国。荷兰国土面积的1/4位于海平面下，维持国土相当不易。荷兰人民在艰苦的环境下，养成了与困难作斗争的不屈不挠精神。荷兰有句话很有名：“地球是上帝创造的，而荷兰是人创造的。”

荷兰的海运业始于捕鲸和鲱鱼捕捞

17世纪，荷兰人建立了运输系统，运送粮食、木材等只用其他国家一半的运费。荷兰人能够做到这一点，是因为实现了船舶的大规模生产。当时荷兰的船舶年产量达200多艘，比欧洲其他国家产量总和还多。而且，荷兰人实现了造船工序的标准化，通过使用材料制造机和吊 车提高了造船效率。

17世纪末，荷兰船的价格是英国船价格的50％—60％。说起来，荷兰的造船业如此发达，与荷兰渔民向大海的狂风大浪挑战的精神关系密切。正是荷兰人，发现斯堪的纳维亚半岛的北面是北极

鲸的渔场，于是荷兰的捕鲸者迅速占领并垄断了欧洲的鲸鱼油市场。荷兰人从捕鲸中获取的利润超过了与亚洲进行香料贸易获得的利润。过去，濒临波罗的海的德国城市吕 贝克曾大量加工腌制鲱鱼。但17世纪后，以前集中到波罗的海产卵的鲱鱼不去波罗的海产卵了，于是德国吕 贝克的鲱鱼腌制业便衰退了。荷兰人抓住这个良机，每年1月至3月，在北海捕获大量的鲱鱼用盐或醋腌制之后运往欧洲各地。

按照基督教的习俗，为了纪念基督在十字架上受难而死，从复活节前的第40天开始，进入四旬节，禁止吃肉。在这40天中，全欧都只能靠吃鲱鱼来获得蛋白质，因此鲱鱼的销量很高。1620年，荷兰有2000条渔船从事鲱鱼捕捞。阿姆斯特丹的市民说，“阿姆斯特丹是用鲱鱼刺建起来的”，由此可见，荷兰是靠鲱鱼发家的。腌制鲱鱼，需要优质食盐。起初，荷兰从葡萄牙的盐田进口食盐。到了16世纪末，葡萄牙的盐田资源枯竭，荷兰人只得到加勒比海寻找食盐。于是，荷兰人创建了荷兰西印度公司。

另外，荷兰粮食匮乏，需要从波罗的海南岸进口粮食。荷兰人从波罗的海南岸购入粮食后，又销售到地中海地区。由此阿姆斯特丹成为粮食的集散地，获取了丰厚利润。粮食贸易成为荷兰最赚钱的生意。荷兰的城市发展了起来，1622年，荷兰居民的60％居住在城市，其中的3/4居住在人口在1万以上的城市。在城市发展的同时，荷兰的海运业越来越发达。

荷兰东印度公司进军亚洲

在大航海时代，各国都开拓了多条航线。以海运立国的荷兰人则把这些“线”转换成了“面”。其主力军是荷兰东印度公司，它是商人们将各航运公司合并而成的。1595年，荷兰人绕过好望角，参与到亚洲的香料贸易之中。1602年，荷兰设立东印度公司。不

久，该公司便拥有了1万至1.2万人的陆军和40艘至60艘军舰。由此，荷兰东印度公司这个庞大的组织，垄断了亚洲的海运业。1619年，荷兰人在爪哇岛修筑了雅加达城，作为荷兰东印度公司的据点。

之后，荷兰人为了在加勒比海获得食盐，腌制鲱鱼，开始进军大西洋。为此，荷兰人设立了荷兰西印度公司。当时，西班牙国王兼任葡萄牙国王。荷兰从葡萄牙手中夺取了亚洲的贸易权。在较短的时间内，荷兰占领了爪哇、苏门答腊、香料群岛、斯里兰卡等地。荷兰的各个城市的经济是靠海运业支撑的。荷兰人还插手东亚的贸易，他们于1600年在平户、长崎修建商馆，用中国的生丝和日本廉价的白银进行交易，获利颇丰。

葡萄牙人往来于澳门、平户、长崎之间，开展贸易活动。西班牙人则往来于马尼拉和福建诸港口之间，开展贸易活动。为了切断葡萄牙、西班牙的贸易航线，确立在政治上、经济上的优势地位，荷兰开始致力于对台湾海峡的控制。1624年，荷兰人攻克台湾南部，修建了热兰遮城，进而控制了台湾海峡。之后，荷兰东印度公司不理会明朝的海禁政策，从明朝的走私商人那里购得生丝，出口日本，获利颇丰。

荷兰以公海为武器削弱葡萄牙、西班牙的力量

相比起干燥地区规模庞大的帝国，海洋国家主要是靠海运、贸易、殖民活动发展起来的，所以即便本国是小国也能成为海洋大国。反过来讲，正因为是小国，如果不利用占地表面积七成的海洋，是无法实现经济增长的。如伊丽莎白一世（1558—1603年在位）使英国转型成为海洋国家便是如此。为伊丽莎白效力的沃特·罗利曾说：“控制海洋的国家就可以垄断贸易，垄断贸易的国家就可以称霸世界。”这句话和前面所说的是一个意思。

荷兰在商船数量方面占绝对优势。但是，葡萄牙、西班牙先于荷兰垄断了海洋世界。荷兰要进军大西洋、印度洋，必须终止葡萄牙、西班牙对海洋世界的垄断地位。之前，葡萄牙和西班牙已经利用教皇的权威瓜分了海洋世界，即1494年葡萄牙和西班牙在大西洋签订的《托德西拉斯条约》。之后的1529年，葡萄牙和西班牙在亚洲又私下签订《萨拉戈萨条约》，重划势力范围。葡萄牙和西班牙通过这两个条约划定了各自的大西洋到亚洲的势力范围，阻止其他国家的船只进行航海和贸易。

1609年，荷兰的法学家格劳修斯的杂志《海洋自由论》创刊，他以罗马法为根据，主张任何国家在公海上航行是自由的。格劳修斯认为公海是公共财产，打算以此为根据维护荷兰的国家利益。

之后，荷兰和英国都主张为了扩大贸易和保障公海的安全，掌握霸权是必要的。要将海洋和各大陆连接在一起的话，公海这一概念更是必不可少的。到了19世纪，公海这一概念成为世界各国的共识，公海意味着世界各国的公共空间。人们把从陆地开炮所能到达的水域定义为领海，这样一来，海洋的大部分是公海。英国认为维持这一海洋秩序是霸权国家（英国）的责任和义务。

荷兰为何轻易将霸权让给英国

如上所述，荷兰是欧洲最大的船舶制造国、海运国。它主要从事粮食贸易，将波罗的海地区产的粮食卖给干燥的地中海地区，赚取巨额利润。以此为基础，荷兰垄断了欧洲境内的贸易。在亚洲，荷兰驱逐葡萄牙，垄断了东南亚的香料贸易。荷兰还垄断了和白银产量较大的日本的贸易。设在阿姆斯特丹的商品交易所成为欧洲的经济中心，荷兰法定货币荷兰盾是当时世界贸易结算时使用的通用货币。在这之前，荷兰在与西班牙进行独立战争期间，曾通过发行国债来筹措战争经费，这令荷兰成为有名的战争国家和重税国家。

正因如此，在17世纪上半叶，荷兰的经济发展达到顶点。所以，有的学者主张17世纪是荷兰称霸世界的时期，19世纪是英国称霸世界的时期，20世纪是美国称霸世界的时期。但是，一般认为荷兰仅具有维护霸权的军事能力，并没有掌握霸权。

荷兰的经济规模小，在政治上采用了联邦制，比较松散、脆弱。荷兰更致命的弱点是保护商船的海军力量薄弱。之所以荷兰的海军力量薄弱，是因为荷兰的财政能力无法承受军事开支的负担。英国海军是国家力量的根基，装备精良。而荷兰与英国不同，在发生战争时，荷兰将商船武装起来支援荷兰海军。荷兰从西班牙独立后，仅过了3年就开始与英国打了三次英荷战争（1652—1674）。荷兰战败，承认了英国的海洋霸权地位。由于荷兰采用了联邦制，没有中央政府，欧洲各地的商人又云集于此，荷兰并不执着于取得霸权。之后，荷兰商人专心做生意，在英国投资，助力英国成长为霸权国家。如果没有荷兰人的话，欧洲资本主义的历史完全将是另外一番情形。



荷兰的扩张（17世纪）

英国是如何取代荷兰的

英国与荷兰不同，积极投资海军

英国的正式名称是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由英格兰和被其征服的威尔士、苏格兰、北爱尔兰组成。因它是个联邦国家，统治起来较为困难。英国位于高纬度地区，农业生产不发达，所以只能依靠放羊、海上贸易和海盗活动维持生计。换句话说，英国是个小国，只能在海上寻求出路。因此，英国不断和西班牙、荷兰、法国进行战争，向海外扩张势力。到了近代，克伦威尔在清教徒革命中掌握了政权，开始向大西洋发展。光荣革命后，英国与荷兰联手，加强了海军力量，随后便和法国在北非进行了长达100年的殖民战争。英国能够做到这一点，是因为在光荣革命中议会掌握了主权。英国政府为偿还发行的国债，需要课税，英国议会批准了英国政府的课税请求。这一措施提高了英国国债的信用。从光荣革命到拿破仑没落的约125年间，英国的征税额增加了15倍。不过，英国皇家海军通过发行国债来维持军费，这成为英国获得霸权的原动力。

英国政府通过发行巨额国债，筹措了大量军费，建成军事大国。下一个霸权国家美国继承了英国的这一做法。尽管英国的财政总是赤字，但是伦敦的金融界一直支持英国财政。一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前，伦敦金融界一直持续对英国皇家海军进行巨额投资，令英国得以维持海洋霸权。

为了保持霸权，英国海军一直维持着可以同时击败两个主要敌国的舰队的实力。这就是海军力量“双强标准”主义。英国掌握了欧洲近海、大西洋和亚洲的制海权。可是英国国内资源匮乏，要依靠扩充海军力量维持霸权，英国国民必须做好负担重税的心理准

备。另外，宫廷犹太人是制定英国金融政策的专家，荷兰人也积极投资英国皇家海军。正是这两股力量维持了英国的霸权。

英国通过战争夺取了西班牙的霸权

1588年，在格拉沃利讷战争中，英国打败了西班牙的无敌舰队。这是英国成为海洋帝国的起点。英国从西班牙手中夺取了海洋霸权后，在英荷战争中打败了荷兰。光荣革命后，英国进一步加强了海军的力量。最终，英国继承了大航海时代的遗产，成为唯一的海洋霸权国家。

英国继承了海盗的基因，这一点与荷兰有所不同。英国国王公然允许海盗行为，赋予海盗船袭击敌国船只的权力。海盗在加勒比海域从事奴隶贸易，袭击外国商船，获利丰厚。英国就这样一步步瓦解并削弱了霸权国家西班牙的国力。其背景是新教国家在这方面形成了默契。英国的清教徒、荷兰的乞丐游击队、法国的胡格诺派等认为海盗行为是天主教和新教之间的战争，就是说把海盗行为合法化的同时，通过海盗行为挑战西班牙的霸权。新教国家在欧洲周围比较守规矩，尽量克制着海盗行为，而在新大陆的近海地区则一反常态地大肆地袭击西班牙的船只。在加勒比海域，由于西班牙殖民者带来的天花肆虐，原住民几乎灭绝，盘踞在牙买加岛的海盗们便和英、荷、法等国的海盗联手频繁袭击西班牙船只。从此，西班牙再也不能无视英国的敌对行为了。1588年，西班牙将无敌舰队派往英吉利海峡，征讨英国。这支无敌舰队由130艘军舰、海员1万人、陆军1.9万人组成。英国舰队迎头痛击西班牙的无敌舰队，在英吉利海峡打败了西班牙的无敌舰队。

结果，岛国英国取代西班牙掌握了海上霸权。英国掌握了大西洋的支配权。从1610年至1650年的40年间，英国的贸易额增至原来

的10倍。荷兰海运业发达，有“海上马车夫”之称，但英国还是利用军事力量击败了荷兰。

大西洋三角贸易迎来鼎盛时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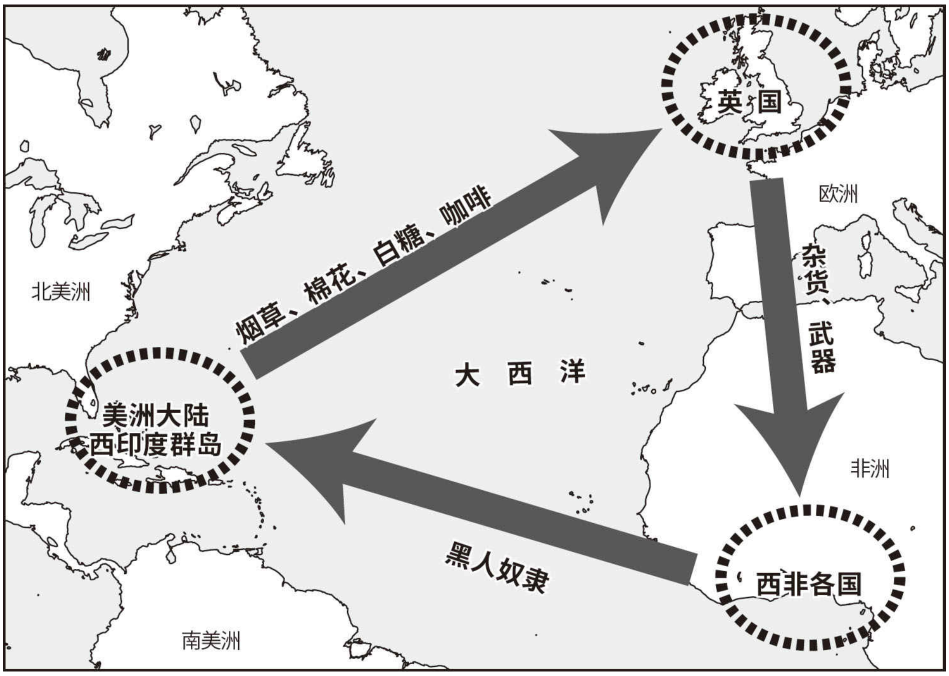
白糖贸易和奴隶贸易规模越来越大

如前文所述，加勒比海域的原住民几乎被殖民者消灭干净了，这里成为信仰新教的海盗们的巢穴，加勒比海盗进入全盛时期。到了17世纪下半叶，加勒比海的各个岛屿取代巴西，开始大量种植甘蔗。18世纪，牙买加岛成为世界最大的甘蔗产地。英国将白糖、奴隶与欧洲的毛纺织品等欧洲物产结合在一起，构筑了大西洋三角贸易。很快，大西洋三角贸易也进入了全盛时期。

干燥地带的农业经营方式是向农民征税，之后进行再分配。但甘蔗种植园的经营方式与此不同，其性质属于商业式农业，是以往来花费很长时间的大西洋为中介的。欧洲人移居新大陆，经营大型农场，用甘蔗大量生产白糖。之后种植园主将白糖在欧洲市场销售，获取丰厚的利润。

白糖很甜，很受消费者青睐，一度供不应求，这造成巴西和西印度群岛需要大量的劳动力来种植甘蔗，但原住民因为天花等疾病死亡殆尽，劳动力匮乏。于是商人通过奴隶贸易，将黑人奴隶贩运到这里，在种植园从事劳动。为了经营种植园，种植园主必须购买黑人奴隶、黑人奴隶的口粮、农场设施、农具、加工白糖的工厂、风车等生产资料，然后才能生产出白糖。

在亚热带，甘蔗成熟需要一年半的时间。因此，种植园主如果合理安排甘蔗的种植时间，就能够持续性地收获甘蔗。不过，甘蔗在收获后不久甜味就会下降，必须尽快加工成白糖。因此，需要大量的黑人奴隶去做这些工作。



大西洋三角贸易（为方便阅读，大西洋的东西距离被缩短了）

18世纪，英国的奴隶商人引进了大量运输方式，降低了交易成本，垄断了奴隶贸易。英国奴隶贩子以每人2英镑至3英镑的价格买进奴隶，再以每人25英镑至30英镑的价格卖给种植园主，简单计算一下可以看出获利10倍。那时，英国的利物浦港、法国的南特港等都是奴隶贸易的中心。

为了卖白糖而卖咖啡

新大陆生产了大量的白糖，白糖大量流入欧洲市场。白糖本来属于奢侈品，而今成为大众化的调味品，这就是白糖革命。由于这个原因，英国的白糖消费量剧增，白糖开始出现在百姓的餐桌上。这样一来，有必要进一步增加白糖的消费量。在这种情况下，为了维持和增加白糖的消费量，欧洲人开始从也门的摩卡港进口咖啡。咖啡本来是伊斯兰世界的饮品，这时也开始被欧洲人接受。欧洲随之也出现了咖啡馆，人们把这里作为社交的场所，非常流行。咖啡和咖啡馆在欧洲普及后的17世纪伦敦，咖啡馆有3000多家。

荷兰商人和英国人竞相进口咖啡，获取高额利润。荷兰人在爪哇岛栽培咖啡取得成功，在与英国人的竞争中获胜。英国东印度公司遂放弃了咖啡生意，转而开始从中国进口红茶。白糖配着咖啡、红茶来饮用，产生了新的嗜好和文化。白糖、咖啡、红茶开始出现在欧洲的餐桌上，并成为连接美洲、亚洲、欧洲这几大商贸区的标志性商品。

第七章
工业革命和信息革命为英国的霸权打下了基础

机械制造的棉布让陆地世界的经济崩溃了

棉布的变革

海洋世界的发展促进了工业化的发展。为了将广阔的海洋形成网络，将各大陆、各地区连接在一起以扩大海运业和贸易，必须充分利用科学、技术和工业将来自海洋交易的利润最大化。为此，需要摸索、构筑一种经济机制。

在18世纪60年代，英国发生工业革命。工业革命的贡献如下：

出现了新的动力——蒸汽机；

建立了机械和工厂制度，有助于高效大量地生产；

出现了生产工业产品的工业化城市；

通过扩大铁路和蒸汽轮船的运输网，推进向海洋世界的转型，为英国的霸权奠定了经济基础；

工业革命巩固了资源匮乏的欧洲的经济基础，使欧洲成为世界的中心。

那么，工业革命是如何发生的呢？原来，发生工业革命的契机是印度产的棉布。印度产的棉布廉价，可以染成各种颜色，且吸收性好、结实耐用，在英国很受欢迎。但也令英国的毛纺织行业因此受到重创。毛纺织行业联合会便向英国议会呼吁制定法律，禁止进

口和使用印度棉布。结果，英国国内的棉花商把麻混入棉花里织布，维持利润。然而，廉价的棉麻混合布只能在英国国内生产。具有讽刺意义的是，由于毛纺织业者的抗议，棉布生产反而在英国扎下了根。

当时正值由白糖、奴隶贸易、毛纺织品构成的大西洋三角贸易鼎盛时期。随着白糖、奴隶贸易规模的扩大，从英国进口的毛纺织品供不应求。结果，棉布弥补了这部分供应缺口。大量的棉布出口到西非、加勒比海域。1750年至1770年，英国出口到大西洋地区的棉布的数量激增至约10倍。

拯救劳动力不足的棉花行业

这样一来，英国的棉纺织业虽然繁荣，但棉花纺线工艺依然是手工作业。于是，棉纺织商人便开始悬赏招募能够发明提高纺线效率的工具、机械。1767年，纺织工哈格里·伍兹发明了手动的珍妮纺织机，可以大量生产棉纱，但是不结实、容易断。1769年，假发行业的阿克莱特又发明了水力纺织机，该纺织机借助水车的力量，纺出了又细又韧性强的棉纱。这种水力纺织机将多个工序综合在一起，实现了自动化生产，是真正意义上的纺织机。最初，利用附近的铅矿中排出来的地下水运动水车做动力，但是没有大的落差的话，水车不会转起来，非常不方便。如果要在港湾城市设立工厂，有必要开发出新的动力。于是，烧煤的蒸汽机应运而生。

英国的寒冷气候是发生工业革命的原动力

英国气候寒冷，人们一般会使用煤炭御寒，所以英国煤炭需求很高。恰好，煤炭也是蒸汽机的主要燃料。本来，气候寒冷是不利

条件。但是，对英国的工业革命来说反而成为有利条件，不能不说这实属幸运。由此可见，地理条件对社会变革起到了重要作用。

英国的冬季非常寒冷，为了取暖需要木炭。于是，人们砍伐森林，烧制木炭。即便如此，木炭仍供不应求。在寒冷的冬季，对英国人来说，燃料比小麦还要重要。不过，大自然的造化是很神奇的，树木倒下后，虽然被埋到地下，可由于气候寒冷，不易腐烂，碳化形成大量的煤炭。但是，煤炭采掘出来之后，地下水会灌入坑道，排水又成了一个很大的难题。1712年，纽科门发明了用于排水的大型蒸汽机，把用锅炉烧的水蒸气送入气缸，将活塞推上去，喷射冷水，蒸气用完会再将活塞压下去。由此可见，寒冷的气候和木炭供不应求促进了蒸汽机的发明。

为了大量生产棉布，需要有替代人力、水车、转动机械的新动力。值此之际，需要对纽科门的简单、低效的蒸汽机进行改良，使之小型化，成为运转机器的动力。而完成这项工作的是瓦特。1782年，瓦特提高了蒸汽机的效率，使之成为取代水车的动力蒸汽机。

随后，蒸汽机的发明引发了一系列连锁反应。首先就是，人们可以通过机械进行棉布生产了。1784年，卡特莱特发明了以蒸汽机为动力的织布机，1785年，发明了缪尔纺织机，能够纺出大量纤细而优质的棉纱。以蒸汽机为动力的机械使得纺纱工序、织布工序实现了自动化。这就是工业革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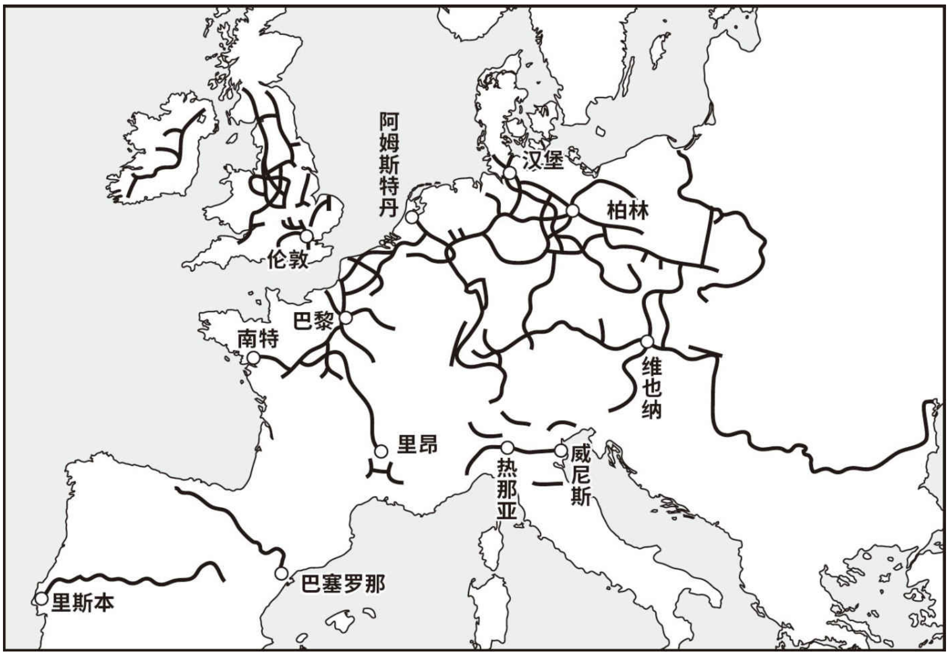
英国人以加勒比海地区的种植园生产的廉价棉花为原料，通过机械大量生产棉布，令棉布成为大西洋贸易的主要商品。19世纪20年代以后，英国大量出口机械生产的棉布，使得印度的棉纺织业遭到毁灭性打击。印度沦为英国的棉布销售市场。机械大量生产的棉布价格低廉，陆地世界的经济崩溃了。

铁路、蒸汽轮船、电信改变了世界面貌

铁路改变了陆地世界的面貌

煤炭很重，运输困难，成为工业革命时期的一大难题。而且，煤矿位于英格兰东北部的纽卡斯尔，远离工业地带。因此，为了实现煤炭的廉价运输，必须修建铁路。这一时期，斯蒂芬孙为铁路的实用化做出了重大贡献。1825年，斯蒂芬孙制造的旅行者号机车牵引着35节客车车厢以时速18公里的速度行驶在达灵顿和斯托克顿之间，全长45公里，试车成功。1830年，在棉花进口港利物浦和棉纺织工业城市曼彻斯特之间，开通了世界上第一条实用性铁路，全长45公里，时速为40公里。

铁路高速稳定，运输量大，减轻了运费负担，很快就得到普及。为了修建铁路，铺设铁轨，制造列车，修建车站、铁道桥、隧道是必不可少的。因此，铁路建设涉及的行业很多，成为牵引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铁路从英国逐渐普及到德国、法国等欧洲大陆各国以及美国，欧洲兴起了铁路建设的热潮。铁路建设成为扩展海洋世界的强有力的手段。亚洲、新大陆等也开始铺设铁路，铁路的铺设加快了殖民地的资源运往欧洲的速度。



欧洲铁路网（约1850年）

首先是在各地殖民地的原料产地和港口之间铺设铁路，将内陆地区的物资运输到港口，再把西欧的工业产品运到殖民地的内陆地区。在这一过程中，铁路起到了关键作用。铁路的铺设，加快了陆地世界向海洋世界的转型。铁路成为英国等海洋国家集中性支配陆地财富的一种遍布全球的基础设施。

一直到第二次工业革命蒸汽轮船才出现

海洋将陆地连接起来，蒸汽轮船定期航线的开设，加快了世界一体化进程。不过，蒸汽轮船有很多问题需要解决，仅是蒸汽轮船航线的开设就花费了六七十年的时间。为了学习蒸汽机的制造方法，美国人富尔顿到法国巴黎留学。1807年，富尔顿发明了蒸汽轮船。他应用水车工作原理，用蒸汽机转动安装在船侧面的水车，这种设计方式属于外轮式。蒸汽轮船很快应用在河流和内海上，但是在航行距离长的外洋上一直没有使用蒸汽轮船，原因如下：

蒸汽机一旦发生故障，船就只能漂流；

蒸汽轮船需要装载大量的煤炭才能远航，导致无法装载乘客和货物。

这些因素妨碍了蒸汽轮船在外洋上的普及。最早制造出远洋蒸汽轮船的是英国的铁路技师布鲁奈尔。布鲁奈尔制造的大西部号于1838年横渡大西洋，全程用了约15天时间。1853年，美国的海军准将佩里率领四艘蒸汽轮船来到日本，逼迫日本开放港口，与美国通商贸易。当时，佩里还带着好几艘煤炭补给船，绕过非洲最南端的好望角，沿印度洋北上，在中国补给煤炭之后，经冲绳到达浦贺。

在19世纪50年代，蒸汽轮船只占到船舶总量的8％左右。在这种情况下，海洋稳定地连接陆地是不可能的。因此，要使蒸汽轮船成为构筑海洋世界的强有力的工具，就要制造大型船舶并降低生产成本、提高性能、开发出煤炭补给技术、缩短航线。在第二次工业革命中，钢铁性能和产量的飞跃性提高，使得上述要求成为可能。

用铁替代木头制造船舶

客船、货船运输不断发展，导致用于造船的木材短缺，与之相应，船舶的制造成本猛增。到了19世纪60年代，开始用钢铁制造船舶。铁和水的摩擦较小，船速提高了两成左右，船的重量也仅为木制船只的1/3。这一结果令人喜出望外。和木材资源不同，铁可以大量生产，也可以制造大型船只。同时，蒸汽机也得到了改良，连接欧洲、亚洲、美洲的定期航线迅速发展起来。

到了19世纪80年代，开发出了钢铁预制板工艺，在短时间内就能够制造大型船舶，数万吨级的大型船舶不断下水。1885年，钢船开始普及。在钢船制造领域居于领先地位的是掌握海洋霸权的英国。截至1892年，英国制造的钢船数量占全世界的八成，是毫无疑问的造船大国。

蒸汽轮船航线和煤炭补给网络

1860年，英国开设了欧洲至亚洲的蒸汽轮船定期航线，俗称帝国航线，可以抵达印度的孟买、加尔各答，斯里兰卡的科伦坡，新加坡，马来西亚，中国的香港、上海，日本的长崎、横滨。民间的蒸汽轮船公司的船只也可以航行在这一航线上。这便是属于陆地世界向海洋世界转换的基础设施建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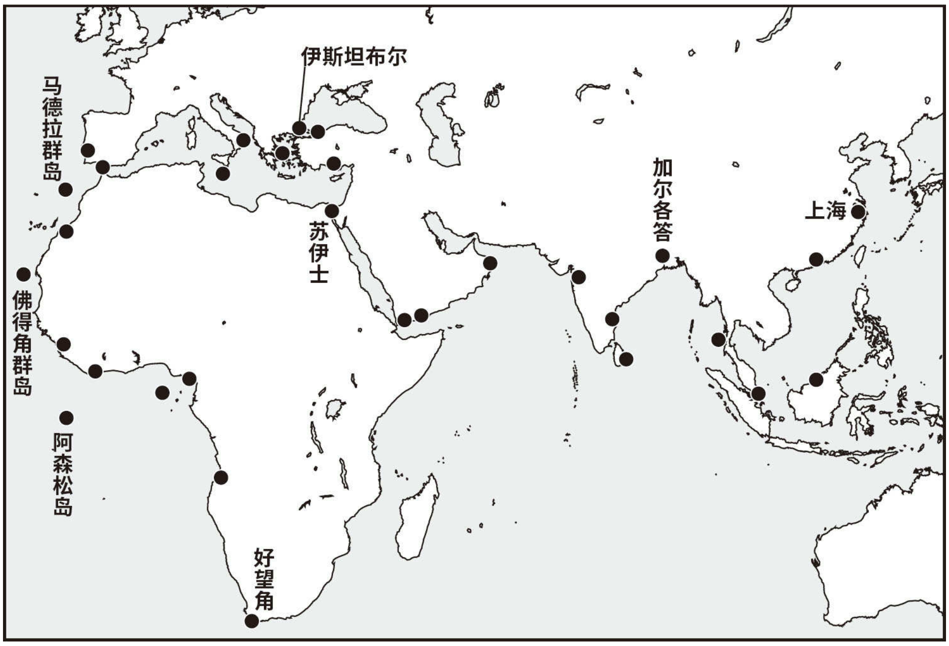
往来于定期航线的蒸汽轮船主要是邮轮，英国海军部给蒸汽轮船公司一定的补贴。欧洲各国和日本也都模仿英国的这一做法，给邮轮补贴，以维持航线的畅通。由此可见，定期航线是靠国家政策的支持才得以维持下来。

另外，商船在得到煤炭补给的情况下才能进行远距离航海。世界各地都建起煤炭补给场所，由海军守护着煤炭补给站。这一措施加速了海洋和陆地的一体化进程。19世纪60年代，日本开始了明治维新。从明治维新到甲午战争的这段时期，正是蒸汽轮船取代帆船的转型期。从1868年至1879年，海上运输的费用下降了一半。蒸汽轮船的定期航线在全世界普及，西欧各国的城市和殖民地连在一起，由此产生的货物吞吐量超过了欧亚大陆的干燥地带，实现了世界史从陆地时代向海洋时代转型。

1869年，苏伊士运河通航，地中海和印度洋连在了一起，欧洲和亚洲的航线缩短了1/3。

1910年，英国船占通过苏伊士运河的船只的总吨数六成以上。由此可见，亚洲的蒸汽轮船航线上英国船只占了一半以上。在英国的主导下，亚欧大陆的陆地世界向海洋世界转换。英国标榜自由贸易，通过蒸汽轮船、铁路将工业产品运往世界各地，破坏了各地的传统产业。

1914年，巴拿马运河通航，大西洋到太平洋的距离缩短了一半以上。



英国的煤炭补给基地

蒸汽机不仅可以运转工厂的机械，还是铁路、蒸汽轮船的动力。可以说蒸汽机是陆地世界向海洋世界转换的推进力。铁路和蒸汽轮船推进了19世纪的全球化进程。英国利用这一有利条件实现了海洋的一体化。

海底电缆加速了信息的传递

19世纪下半叶，在电信系统实现高速化的同时，形成了信息传递网。1857年，第一条横穿大西洋洋底的海底电缆开始铺设。但是，这条电缆故障频发，很不稳定。到了1866年，连接美国和欧洲的电信电缆终于稳定下来。这是因为，在铺设海底电缆的地方，有的水深在8000米以上，施工难度很大，需要有大型的蒸汽轮船装载大量电缆。所以英国和美国合作，把铺设海底电缆作为国家项目来实施。一下子解决了通信不稳定的问题。1872年，伦敦和东京之间

开通了电信服务。海洋里障碍物很少，可以用于情报的高速传递。英国通过控制电信，逐步将伦敦变为世界经济的中心。英国通过电信网络处理世界的金融、汇款、保险等业务，各国的贸易结算也在伦敦的金融市场用英镑进行。

英国通过电信构筑了金融系统，贷出资本、获得利息，收取各种各样的手续费，其他国家的经济发展支撑着英国的经济霸权。英国通过掌控世界的通信体系保障了世界经济基准的决定权。英国把亚洲的“陆地世界”分为一个个区域，纳入了以自己为中心的世界经济体系之中。

20世纪，美国以互联网为中心推进了信息革命。20世纪90年代后，互联网开始在世界普及。以此为背景，美国对世界的金融和商业进行了重组，并将其作为获得霸权的工具来使用。早在19世纪末，英国已经构筑了与美国类似的体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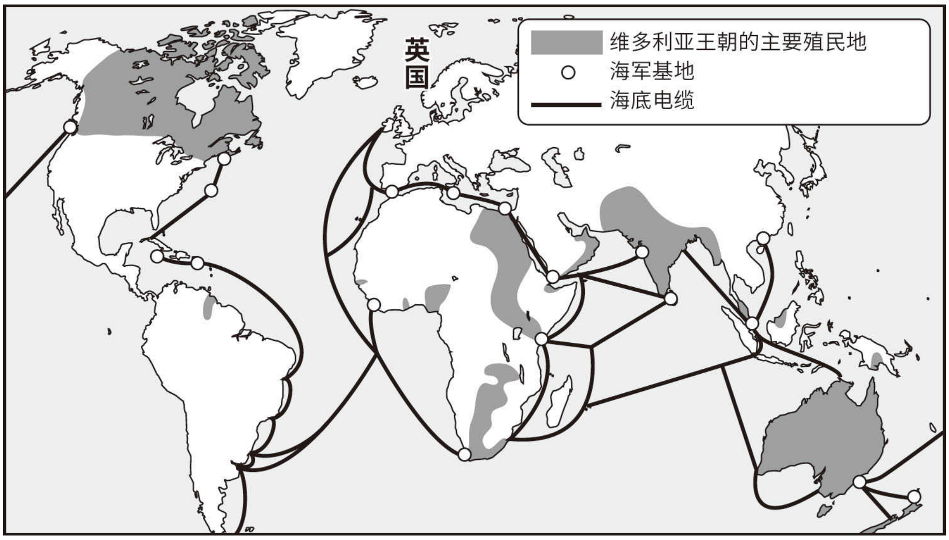
第八章
英国确立海洋霸权是否太顺利了

没有进行战争而扩大势力的新模式

西方民族国家瓜分和统治陆地世界的时代

在英国发生工业革命时，在欧洲大陆爆发了法国大革命。接着，拿破仑又进行了一系列的战争。以此为开端，大西洋沿岸发生了一系列的政治变革，史称“环大西洋革命”。

此后，欧洲脱离了部落林立的状态，建立了一系列近代民族国家。民族国家的前身是17世纪中期形成的以国王为所有者的中小主权国家，史称威斯特伐利亚体系。这一体系依靠国际法、条约、外交惯例、势力均衡来维持和平，与由帝国统治广大地区的亚洲政治体制形成鲜明对照。以国王为所有者的主权国家，在资产阶级革命中王权被推翻，主权转移到了国民议会。在拿破仑称霸欧洲的过程中，根据代表资产阶级的国民议会所制定的法律，来实施中央集权统治的近代民族国家概念不断普及。这一国家制度、政治制度能够适应海洋世界的发展。19世纪至20世纪，欧洲列强忙于建立殖民统治体系，瓜分和统治陆地世界，亚洲、非洲迅速沦为殖民地。以英国为首的欧洲国家利用他们在热兵器上的绝对优势，从海洋上包围陆地世界。从而出现了世界史上没有过的近代民族国家瓜分世界的新现象。殖民化在世界上扩张，在客观上导致从海洋上推进世界一体化的进程加快了。



维多利亚王朝时期的主要的海底电缆（约1900年）

英国霸权的建立和殖民地自治领的产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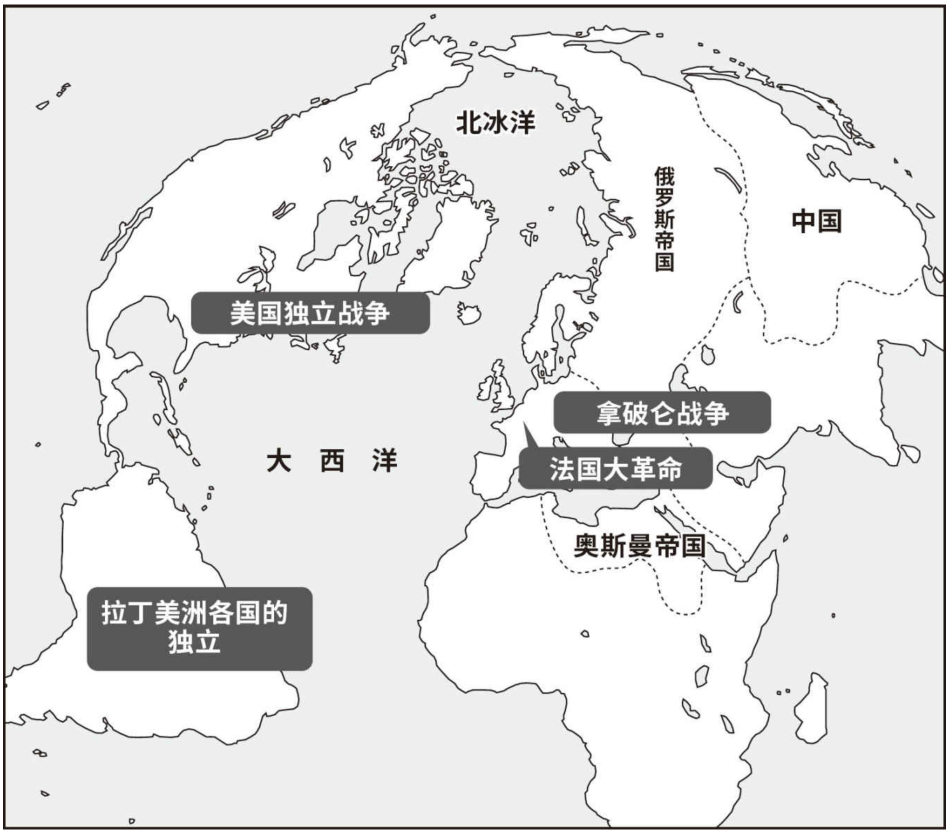
英国获得的第一块殖民地是加勒比海的牙买加岛。紧接着，英国和法国在北美大陆进行了长期的殖民战争，最后英国战胜了法国。之后，英国在北美建立了殖民帝国，和西班牙并驾齐驱。

本来，英国是个小国，人口仅为法国的1/3。英国只能靠发行国债维持庞大的军费开支，进而使财政赤字不断积累，并终于迫使英国政府不得不通过向殖民地征税来渡过财政难关。英国的这一举措遭到殖民地人民的坚决反对，1775年，更是引发了美国独立战争。为了挽回在北美的颓势，法国向美国派出援军并提供武器援助，欧洲各国也支持美国的独立战争。美国的独立战争一直持续到1783年，北美大陆和欧洲都卷入了这场战争。

结果，美国的独立战争以英国的失败而告终。英国花费了3/4个世纪的时间才获得的这块殖民地，因美国独立而发生根本改变。英国虽然失去了北美这块殖民地，但是却因为殖民地兵力收回，可以用在别的地方，而为19世纪的英国霸权建立了基础。美国独立

后，以州为单位建立了新型的国家。此后，英国尽量避免与欧洲国家发生战争。19世纪，英国只参与了拿破仑战争（1803—1815）和克里米亚战争（1853—1856）。英国把精力集中在获取殖民地，扩大势力范围。同时，开始改变战略方针，把工作重点放在巧妙地开展情报收集、分析等谍报活动上，利用部落对立、民族矛盾和宗教矛盾等扩大自己的势力范围，尽量避免动用军事力量。另外，英国在与法国的殖民战争及美国独立战争之后，自治领的统治形式在各殖民地形成，并迅速成为英国殖民地的核心。

在美国独立战争爆发前不久，英国派詹姆斯·库克两次航海到南太平洋的高纬度海域，结果发现了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并开始让英国人移民到那里。南半球的陆地面积仅占全球陆地面积两成，其余都是海洋，因此英国人殖民澳大利亚意义重大。



环大西洋革命

英国在美国独立战争中失去了十三个殖民地。与此同时，很多对英国国王效忠的人移居加拿大，加拿大成为英国的自治殖民地。然后，英国又向南非、拉丁美洲进行经济渗透。19世纪上半叶，南半球几乎全部纳入英国的势力范围。

英国把亚洲、拉丁美洲纳入经济势力范围

拿破仑战争前，英国一直是债务国，但其巧妙利用拿破仑的大陆封锁令，在拿破仑战争之后转变为债权国。英国向被拿破仑占领的荷兰的势力范围进行渗透，非洲最南端的开普敦和亚洲的斯里兰卡这两个原属于荷兰的殖民地便这样被英国收入囊中。接着，英国又占据了马六甲海峡周边的战略要地马来亚、马六甲、新加坡等地，为英国从海上入侵亚洲打下了基础。

19世纪初，西班牙逐渐衰落，其在拉丁美洲的殖民地相继独立。西班牙曾打算动用其在欧洲的军队镇压拉丁美洲的独立运动。英国对此表示坚决反对，同时还支持拉丁美洲的独立运动，并把从西班牙独立出来的拉丁美洲国家纳入英国的经济势力范围。其中，对英国来说最重要的是获得了巴西的金矿。18世纪末，世界80％的黄金产自巴西。英国和葡萄牙签订条约，允许巴西进口英国的毛纺织品。英国则通过出口毛纺织品获取了巴西的大部分黄金。英国利用从巴西得到的黄金确立了金本位制度，大量发行英镑纸币。19世纪末，世界贸易使用英镑结算，这为英国的经济繁荣奠定了基础。

各陆地帝国崩溃的过程

亚洲连续发生争夺天下的战争

19世纪中叶，亚欧大陆的各帝国和以英国为首的海洋世界之间发生了争夺天下的战争。当时，亚洲的各帝国已进入衰退期。而经过工业革命、环大西洋革命，英国的国力则蒸蒸日上。1869年，苏伊士运河开通，帆船被蒸汽轮船替代，电信逐渐普及，来复枪、机关枪等武器不断推陈出新，海洋国家把陆地世界的帝国远远抛在后面。

以英国为首的欧洲列强，随即和清政府进行了第一次鸦片战争、第二次鸦片战争；在莫卧儿帝国引发了叛乱；在奥斯曼帝国引发了希腊独立战争、埃及独立战争。欧洲列强就这样不断削弱了亚欧大陆各帝国的实力，拼命将其纳入海洋世界。英国和亚洲相隔甚远，因此所需要的陆军尽量在亚洲当地招募，而英国则通过海上的力量统辖全局。结果，尽管不断和法国等欧洲列强产生摩擦，亚欧大陆各地区的传统社会还是逐渐从属于海洋世界。19世纪，以英国为首的欧洲各国在世界各地争夺殖民地。

近代化让奥斯曼帝国衰败

在西亚，奥斯曼帝国一直实行政教合一的统治，但此时的统治也在逐渐崩溃。因拿破仑远征埃及、希腊的独立战争等事件，来自欧洲的世俗的民族主义不断高涨，奥斯曼帝国开始从内部分裂、崩溃。我们可以看到，位于粮仓地带的埃及在法国的支持下，加强了军事力量，谋求从奥斯曼帝国独立出来。之前的几个世纪，巴尔干半岛的斯拉夫人为奥斯曼帝国提供了大量的人才。而今，巴尔干半

岛的斯拉夫人掀起了民族运动，这导致了奥斯曼帝国的衰败。另一方面，伊斯兰势力处事保守，也限制了近代化进程。

东地中海和中东是英国入侵亚洲时的战略要地，英国在这里起着扼制法国和俄罗斯扩张、保持实力均衡的作用。由于英国控制了苏伊士运河，所以在这一地区占据优势。

经过克里米亚战争（1853—1856）、俄土战争（1877—1878）、柏林会议（1878），奥斯曼帝国的领土逐渐减少，税收也自然相应地减少。1854年以后，奥斯曼帝国从欧洲各国的银行借款次数达17次之多。由于负担不起债务，奥斯曼帝国的关税被抵押给了其他国家的银行。此时的奥斯曼帝国已经“病入膏肓”，离死期不远了。在奥斯曼帝国内部，政府主张走近代化道路，站在保守的伊斯兰势力的对立面，最终令奥斯曼帝国在内部分崩离析。雪上加霜的是，奥斯曼帝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还是战败国，1922年，奥斯曼帝国终于谢幕。根据塞克斯皮克协定，原属于奥斯曼帝国的阿拉伯地区沦为英国和法国的殖民地。

莫卧儿帝国灭亡，印度沦为殖民地

在印度，英国东印度公司趁莫卧儿帝国的分裂和混乱，花了100年时间将印度置于英国的统治之下。到了19世纪中期，英国东印度公司为了进一步进行殖民扩张，派遣印度雇佣军入侵缅甸、阿富汗。结果，印度雇佣军对英国不断进行侵略日益不满。

当时，英国东印度公司采用最新式的步枪。为了防潮，弹药都用涂了油的纸包了起来，而涂纸用的油是动物性油脂。在使用新式步枪时，雇佣军士兵需要咬破包装纸，再把弹药装填到枪膛里。雇佣军士兵中的印度教信徒认为包装纸上有可能被涂抹了牛的油脂，牛是神圣的动物，对此非常不满。雇佣兵中也有伊斯兰教徒，这部

分人怀疑包装纸上使用了猪油，也非常不满。而这便是印度雇佣兵发动叛乱、印度爆发独立运动的导火索。未几，印度雇佣兵起义军推举已丧失统治权的莫卧儿帝国的老皇帝为首领，向印度全国呼吁复兴莫卧儿帝国。1858年，起义被英国政府镇压下去，莫卧儿帝国灭亡了。

1877年，英国建立印度帝国，推举维多利亚女王为帝国皇帝。从此，亚洲的人口第二大国印度沦为英国的殖民地。在之后约70年间，印度作为殖民地支撑着英国的繁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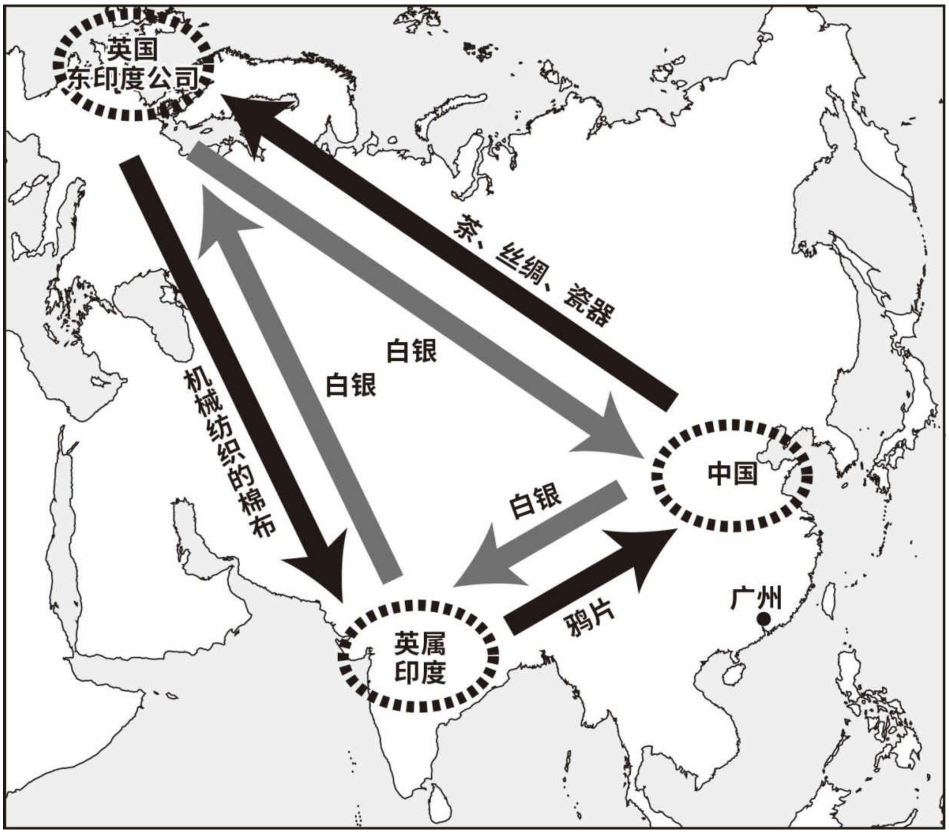
在鸦片战争中，英国利用蒸汽轮船打败了清帝国

18世纪，英国东印度公司垄断了清朝的对外贸易。在此之前，英国民众流行喝红茶之风，对红茶的需求量很大，英国东印度公司便希望从中获取利润。为了购买红茶，英国东印度公司需要筹措大量的白银，这令英国东印度公司非常头疼。于是，英国东印度公司将印度孟加拉地区种植的毒品鸦片走私到中国，以赚取的白银。

结果，白银大量外流导致中国的银价涨至两倍。清帝国的农民需要用铜钱购买白银纳税，银价一上涨，便造成在短时间内，税金翻倍，农民生计维艰。当时的中国是农业大国，农民生活困苦彻底动摇了其国本。

于是，清政府任命林则徐为钦差大臣取缔鸦片走私，防止白银外流。林则徐派军队包围了广州的英国商馆，命令英国负责贸易的官员交出鸦片，并把这些没收的鸦片销毁了。英国人惊恐万分，狡辩说鸦片是商品，悍然发动了第一次鸦片战争（1840—1842）。

我们看到，英国在亚洲搞的是三角贸易：用英国的棉织品换购印度的鸦片，用鸦片换购清朝的红茶，再将红茶卖给英国民众。林则徐禁烟使英国在亚洲的三角贸易崩溃了。



连接英国、中国、印度的三角贸易

英国派往中国的远征军共有2万人，其中大部分是从印度派来的。同时，英国海军还派来了14艘蒸汽机驱动的炮舰，其声势浩大，给清政府的军队带来了心理上的巨大压力。随后英军向长江流域展开攻势。清政府担心战争进一步升级，剥夺了主张进行彻底抗战的林则徐的指挥权。就这样，清政府采取了向英国妥协的方针，于1842年与英国签订了《南京条约》，第一次鸦片战争结束。通过《南京条约》，英国得到了以下好处：

清政府给予英国战争费用补偿，对没收并销毁的鸦片进行赔偿，金额达600万银圆。

英国获得了进行自由贸易的据点香港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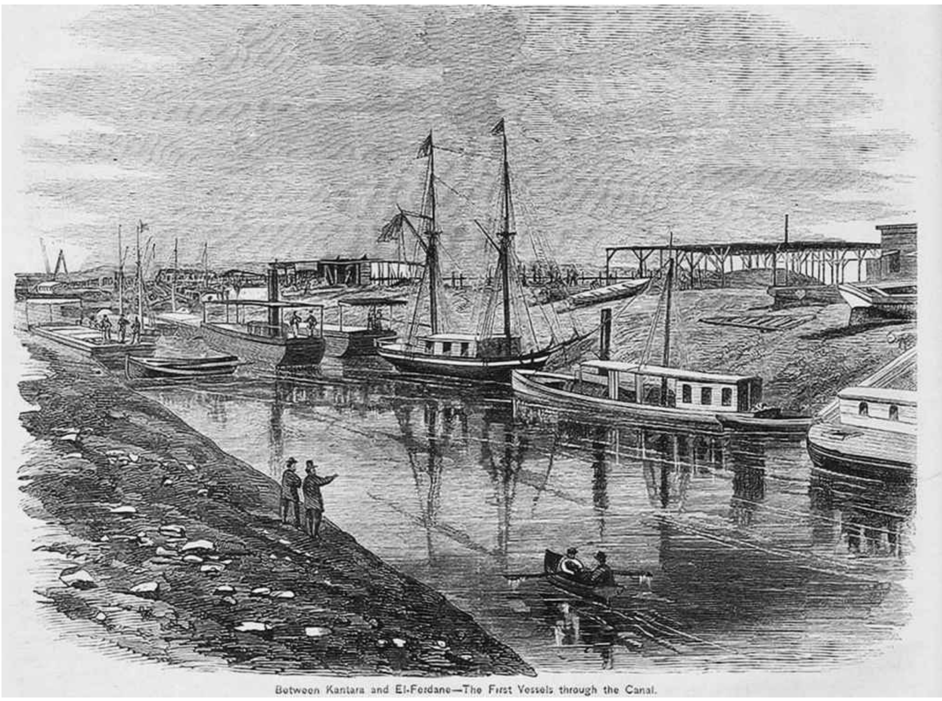
第一次鸦片战争前后，清政府允许鸦片买卖，白银继续大量外流，农民的生活进一步恶化。在这一背景下，农民进行反抗，最终导致太平天国运动（1851—1864）爆发。不久，英法发动第二次鸦片战争，从中国攫取了更多特权。英国标榜自由贸易，而殖民地正好遂了他们的愿。因此，英国把香港作为与中国开展贸易的据点，把中国的香港和印度的孟买、新加坡等用航线连在了一起。

海洋世界通过贸易、经济、阴谋对陆地世界进行重组

控制了令人垂涎三尺的苏伊士运河

如上所述，19世纪60年代，蒸汽轮船取代了帆船，交通工具更新换代。蒸汽轮船将大陆的各地连接在一起，形成交通网络。在战略要地，人们建了煤炭储存所，因为蒸汽轮船在补充煤炭后才能继续航海。之后，技术不断取得进展，1868年至1879年期间，海上运输成本减半。

日本进行明治维新的时机非常好。在蒸汽轮船取代帆船成为海上运输的主力，欧洲列强大规模入侵亚洲之前不久，日本就基本上完成了明治维新。1869年，苏伊士运河开通，加速了蒸汽轮船运输网络的形成进程。法国外交官、技师雷赛布成功地主持开凿了苏伊士运河。埃及总督赛义德帕夏曾经跟雷赛布学习骑马，因此在雷赛布开凿运河时提供了很多支持。开凿苏伊士运河花费了约1860万英镑，由法国和埃及分担了这项费用。苏伊士运河开通后，伦敦到印度孟买的航行距离缩短了5300公里，仅为原来的1/3，航程也缩短了24天。英国打算通过海洋控制亚欧大陆，对苏伊士运河更是垂涎三尺。埃及负担了开凿苏伊士运河总费用的70％，导致自己陷入财政困难。埃及不得不卖掉苏伊士运河44％的股份。而法国在普法战争（1870—1871）中刚刚战败，筹措不到巨额资金购买这部分股份。



苏伊士运河开通后不久的风景（19世纪）

这对英国来说是个很好的机会。英国首相迪斯雷利认为，英国必须想方设法购买苏伊士运河的这部分股份。于是，迪斯雷利自行做主，从犹太人罗斯柴尔德那里借来4000万英镑，购买了苏伊士运河公司44％的股份。当时，罗斯柴尔德要求迪斯雷利拿东西做抵押，迪斯雷利说："我拿英国做抵押。"这句话后来广为流传，脍炙人口。

之后，埃及发生内乱。英国乘乱于1882年军事占领了苏伊士运河地区。1888年，各国在君士坦丁堡大会试图签订一个国际条约，条约规定所有国家都有平等利用苏伊士运河的机会。但是，英国迟迟不愿批准这一条约。最终，英国利用第一次世界大战将埃及变为自己的保护国，1936年更让埃及允许英国军队驻扎苏伊士运河地带。苏伊士运河成为海洋帝国英国的战略要地。

英国在争夺非洲殖民地中占优势

英国殖民时期，英国探险家利文斯顿到东非传教时失踪了，美国记者斯坦利为了搭救利文斯顿，前往东非。结果，在营救过程中，斯坦利发现东西贯穿非洲中部的热带雨林的刚果河非常有经济价值，并就此做了报道。于是，比利时国王利奥波德二世马上成立刚果国际协会，宣布将筹备建立刚果自由国，并将其作为自己的私有领地。英国、葡萄牙等国对此提出异议，与比利时的矛盾加深。这时，德国还没有殖民地，俾斯麦首相居中仲裁。为了解决这一问题，举行了柏林会议（1878）。在会议上，各国指出非洲文明程度很低，可以看作是“无主之地”，最先在这里建立统治秩序的国家有权统治该地。这就是先行占有权，这被作为瓜分非洲的原则而获得会议通过。之后，欧洲列强开始来到非洲，争夺殖民地。仅用了20年时间，非洲除了埃塞俄比亚之外，全部沦为列强的殖民地。

在争夺非洲殖民地过程中，英国又占据了优势。塞西尔·罗德斯是英属殖民地开普敦的首相、金伯利钻石矿的矿主。正是塞西尔·罗德斯创建了英国南印度公司，他打算在开普敦和开罗之间铺设铁路，以便将整个非洲置于英国的统治之下。与此同时，法国、德国、意大利也都在非洲获得了殖民地。

1884年，布尔人在南非发现了世界最大的金矿。当时，英国以黄金为基础发行英镑纸币。然而，英国黄金缺口较大，于是发动了第二次布尔战争（1899—1902），这场战争遭到了全世界的谴责。尽管如此，英国还是打败了顽强抵抗的布尔人，占领了南非，获得了大量的黄金。

英国缔结日英同盟的目的

英国的海军非常强大，但是陆军较弱，只能依靠外交和谍报工作弥补陆军力量的短板。为此，1902年，英国和日本缔结日英同盟。日英同盟和日俄战争改变了东亚和日本的历史。在甲午战争

中，中国战败。以此为契机，欧洲列强开始大肆瓜分中国土地。鸦片战争以来，一直是由英国一国垄断在清帝国的权益。但甲午战争后，俄国、德国也开始在华北扩张势力范围，英国垄断中国权益的局面结束了。俄国拥有世界最强大的陆军，是英国的强劲对手。而德国也在加强海军的力量，为了扼制德国，英国不得不与俄国联手。

俄国利用第二次鸦片战争的时机，在中国东北进行扩张，并加快了对西伯利亚以东地区的建设、开拓步伐。1895年，俄国与德国、法国联手干涉日本与清政府的战后处理事务。通过这一措施，俄国得到了辽东半岛的旅顺、大连，还得到了在东北北部铺设西伯利亚铁路的权力。德国则得到了山东半岛的青岛。

1900年，义和团运动爆发。俄国乘机军事占领中国东北，进而想把朝鲜王朝置于俄国的统治之下。尽管英国在中国的权益受到俄国的威胁，但英国在亚洲没有能够与俄国对抗的陆军。而且鉴于英国与俄国的关系密切，英国也不能和俄国发生正面冲突。因而，英国想利用日本的陆军阻止俄国的南下。1902年，英国与日本缔结英日同盟。

俄国利用法国资本铺设横跨西伯利亚的西伯利亚铁路，1904年西伯利亚铁路大致竣工。日本感到了巨大威胁，依靠英国发动了日俄战争。在1902年缔结的《英日同盟条约》规定："假如日本和一个国家交战，英国保持中立；假如日本和多个国家交战，英国参战。"俄国和法国也缔结了同盟关系，因此缔结英日同盟的目的是牵制法国，阻止其参战。1904年，日俄战争爆发。英国积极开展谍报战，对俄国海军采取了非合作态度，从侧面帮助日本。由此，英国通过外交策略和谍报战弥补了陆军的短板。

英国以国际货币英镑为后盾推进自由贸易

英国政府动员2000万英国普通民众移居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等地。组合运用贸易、移民、谋略、军事等手段，从海上对世界各地的传统社会进行了重组。不仅如此，英国从海上将殖民地的行政官、商人、军人送往世界各地。结果，在维多利亚王朝的统治下，英国获得了相当于大不列颠岛91倍的土地（接近全世界地表陆地面积的1/4），统治着3.72亿人（世界人口的1/4），成为世界史上最大的帝国。

在世界的广大区域，情况复杂多样。英国在标榜自由贸易的同时，获得了治外法权、低关税出口商品的权益和最惠国待遇。毋庸赘言，这些对拥有强大的经济力量的英国来说是有利的。

霸权国家英国将纸币英镑作为对世界各国的结算手段，将世界各国纳入自由贸易体系。在这一时期，犹太人罗斯柴尔德家族更是以“宫廷犹太人”的身份，负责财务、金融方面的工作。

英国海军制作全世界海洋的海图，以低廉的价格提供给各国的商人，同时打压反对自由贸易的各种势力，反对扩大领海。此外，英国海军打击亚洲的海盗，努力扩大世界贸易。没错，这就是霸权国家应该做的工作，而这也确实符合英国的国家利益。对海洋帝国英国来说，在大洋上开设航线并加强控制，就是在维护英国的生命线。控制航线上的战略要地是重中之重。如前文所述，英国成为苏伊士运河的大股东，控制着马六甲海峡。

英国海军守卫着英国的航线，而这些航线也对民间的轮船公司开放。英国在航线上建了煤炭补给站和通信网络。19世纪下半叶，世界商船一半以上是英国船。当时航线上有40万乘客和乘务人员。伦敦郊外的格林尼治成为测定世界的经度和时间的基准地点。伦敦的船舶保险集团罗伊斯给船舶定级，后来这成为世界的标准。

英国的海军统治着世界的海洋，英国的商务轮船公司掌握着世界经济的命脉；在全世界铺设的海底电缆把信息、情报集中在伦敦；英国还在全世界铺设了铁路。《英国扩张史》的作者，历史学家西里指出海洋帝国英国掌握霸权的方式很独特，他说道：“在世界的所有地方发生着各种各样的问题，这些问题都需要通过专业知识和专业技术来解决。而这些问题都是由英国一国解决的。这种情况史无前例。”英国首相迪斯雷利对出现英国这样的海洋帝国也颇有感慨：“翻看史书，自古至今从未见到这样的先例。真是很奇妙！”对英国来说，成为霸权国家之路可谓一帆风顺。

第三编
空域霸权和美国



第九章
移民大国美国在新大陆发展迅速

欧洲的扩张改变了新大陆

大城市人口增加导致全世界发生了巨变

19世纪，城市化进程加速，欧洲人口约增加了1亿。为了养活这些人，欧洲需要保障粮食供应。可喜的是，在蒸汽轮船和铁路保障了粮食的大量运输的同时，开发出了冷藏技术，这样在运输过程中食品便不会腐烂。这十分有助于海洋运输体系在全世界扩展。在19世纪，丰富多彩的大自然遭到大规模破坏，变为支撑城市生活的农场、牧场。

原来，美国中西部奔跑着数目庞大的野牛。而今，这里被开发成种植小麦的大农场和用铁丝网围起来的养殖肉牛的牧场。牛仔们驱赶着肉牛到最近的火车站，之后肉牛被运往芝加哥屠宰后加工成牛肉。从南美的阿根廷到巴西南部，横亘着的100多万平方公里大草原，现在也被开发成牧场，放牧牛羊。澳大利亚的内陆部分是干燥的大平原，这里本来是澳大利亚原住民生活的地方。但英国人从本土把羊带到了这里，令这里变为大牧场，放养着数百万只羊。

与此同时，欧洲殖民者向人口稀少的地区移民，不仅加快开发步伐，还建了牧场、农场，使得地球生态系统发生了巨变。世界各地的粮食运输量从19世纪50年代的400万吨激增至19世纪80年代的1800万吨。其中大部分是运往欧洲的。

欧洲移民涌向美洲大陆

欧洲人口激增，导致大量人口向外移民。4000多万欧洲人为了寻求美好的生活向世界各地移民。在1820年之后的100年间，3600万欧洲人移居北美洲地区；360万人移居南美地区；200多万人移居澳大利亚、新西兰；还有很多欧洲人移居亚洲、非洲。

在欧洲，资本主义经济不断发展和城市化进程不断加快，令很多欧洲人移居各大洲，促进了世界的欧洲化。到了21世纪，移民的方向和19世纪以来的倾向有所不同，即发生了逆转。亚洲、非洲的移民、难民纷纷涌向欧洲，成为令欧洲烦恼的问题。在欧元区内，移民、难民问题也成为一块心病。正因如此，欧洲各国右翼势力抬头，纷纷排斥外来移民、难民。这已是众所周知的事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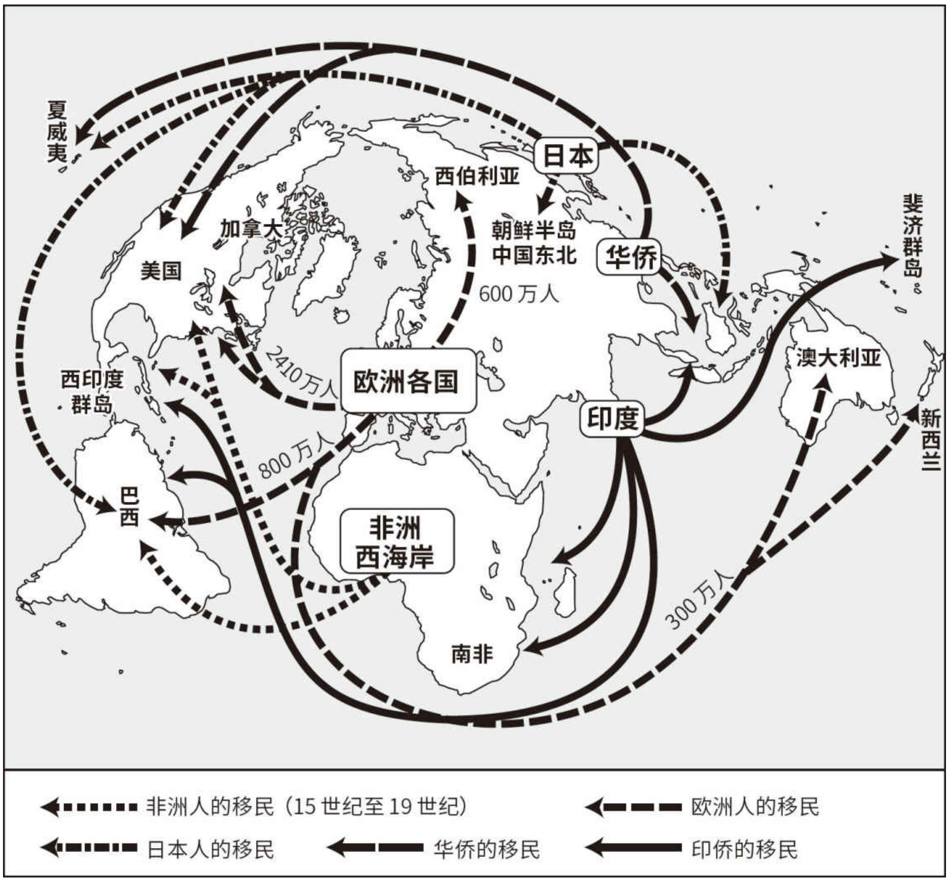
美国向移民大国、海洋帝国转化

“第二个欧洲”在新大陆发展起来

美国是由海洋世界产生的新型国家。19世纪20年代至40年代，美国不断推行西进运动，最终成就大陆国家。美国的边境线从大西洋沿岸向西移动的过程，也是来自欧洲的移民用枪杆子吞并原住民居住地的过程。尽管欧洲的移民通过移民和开拓活动培养了进取精神，即今美国价值观的雏形，但这对原住民和黑人来说却是屈从于欧洲移民的暴力的过程。当时，欧洲白人的扩张具有上述两面性，但欧洲人还是普遍认为这是天意或者命运所致。

1848年，加利福尼亚发现了金矿。从美国东部约有10万淘金者蜂拥到加利福尼亚，掀起了所谓的“淘金热”。

旧金山原来只不过是一个荒凉的村庄，在很短的时间内发展成一个大城市。向美国西部的移民不断增加，使美国成为大陆国家。在这一过程中，保守色彩很强的草根派美国人逐渐增多，他们标榜“美国利益优先”。1845年，美国吞并了得克萨斯。1846年至1848年，美国发动了美墨战争。1853年，美国从墨西哥购买了亚利桑那州南部希拉河流域。这样一来，美国从墨西哥夺走了1/3的土地。通过这一系列扩张，美国的国土面积扩大至建国初期的4倍。



15世纪以后劳动力的流向

在悲惨的南北战争之后，美国经济获得了迅速发展

美国北部属于大工业化，南部则属于种植园经济，二者的经营性质迥异。而且美国南北方的人们各怀鬼胎，对美国的国家蓝图的看法也不一样。美国就像补丁构成的国家一样，没有秩序。而美国南北战争（1861—1865）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爆发的。

1860年，共和党的林肯当选美国第16任总统，他主张循序渐进地废除奴隶制。以此为导火线，美国南部宣布脱离美利坚合众国，南北战争爆发。1865年，美国内战结束。在这场战争中，约有65万人战死，其中，北方约有36万人战死，南方约有29万人战死。在南

北战争中的阵亡人数约是美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死亡人数的两倍。

南北战争后，美国采取切实措施，取得了很好的效果：

实行关税保护政策，调高税率，把关税定为47％；

大量铺设铁路，形成网络（在1890年之前，增长为原来的6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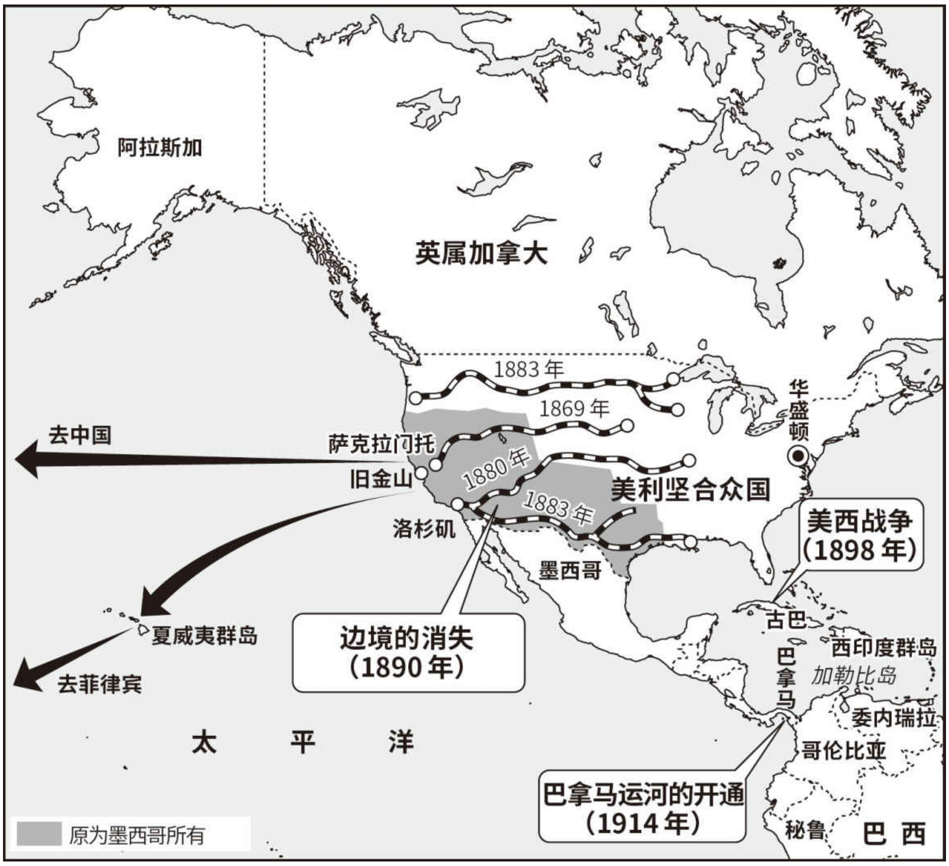
根据霍姆斯—特德法，无偿向移民提供国有土地；

铺设横跨美国大陆的铁路，扩大西部市场；

美国北部的资本向南部投资；

国外移居美国的移民人数大量增加，促进了工业的迅速发展。

美国下大力气铺设铁路，开发西部。虽然美国是个新兴国家，其工业生产能力却在很短时间内便超过英国，跃居世界第一位。一直以来，美国人认为未开拓的荒地是无限的。而今，未开发的荒地已经消失了。



19世纪下半叶的美国及其周边国家

美国把扩张的矛头指向中国，向海洋世界发展

19世纪末，美国成为新大陆的移民大国。之后，美国逐渐向海洋世界扩展势力。这时的美国采取了以下两个步骤：

向未得到开发的太平洋进军；

趁清政府混乱，浑水摸鱼。

海军上校阿尔弗雷德·马汉写了一本非常著名的书，名叫《海权论》。1890年，阿尔弗雷德·马汉提出了新的国家战略，指出要实现这一战略，必须加强海上的力量。阿尔弗雷德把美国看作是夹在大西洋和太平洋之间的岛屿，认为美国在地缘政治学上比欧洲有优势，美国应该利用这一优势成为海洋帝国。具体来讲，阿尔弗雷

德主张美国应该和大西洋对岸的英国进行合作，垄断太平洋对岸的老大——中国的市场。

1898年，在美西战争中，美国打败了西班牙，控制了连接大西洋和太平洋的加勒比海。不仅如此，美国还占领了太平洋上的夏威夷、关岛、菲律宾，为向中国扩张奠定了基础。美国国力日益强大，企图在经济上控制中国。这可以看作新大陆对旧大陆的逆袭。

美国的最优先课题是建设巴拿马运河

为了在经济上控制中国，美国有必要保障从大西洋沿岸到太平洋的物资、人员、资金的海上通道。当时，已经开通了连接亚洲和欧洲的苏伊士运河。美国也模仿开通苏伊士运河的做法，以举国之力开凿巴拿马运河。美国政府投入3.75亿美元巨资，于1914年开凿了全长80公里的闸门式运河——巴拿马运河。这样一来，巴拿马运河将美国东部和西部从海上连在了一起。由于巴拿马运河的开通，纽约和旧金山之间的航程缩短了一半以上。

在巴拿马运河开通那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第一次世界大战是工业等综合国力的较量，给欧洲各国带来了沉重的负担，欧洲经济因此崩溃。以英国为首的欧洲列强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衰落了。德国、俄国、奥匈帝国、奥斯曼帝国或衰落或消亡。英国、法国也沦为债务国。在这种情况下，欧洲列强无法维护在中国的势力范围。美国、日本和社会主义国家苏联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实力大增，趁着欧洲列强的衰落开始争夺对中国的控制权。虽然苏联是欧亚大陆的陆地大国，但对美国来说，日本才是最大的敌人。

第十章
欧洲各国衰落了，美国经济一枝独秀

对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反思

英国受到德国的挑战

19世纪末，德国、美国通过技术革新逐渐崛起。一直以来，英国以占绝对优势的工业为后盾，经济繁荣，出现了“英国统治下的世界和平”这一局面。而在19世纪末，英国的工业优势地位丧失了。1870年，英国的工业生产总值占全世界的32％，可到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前不久，这一比值降至14％。尽管如此，英国依然是金融帝国、殖民帝国，掌握着世界霸权。

在工业领域，美国、德国因为有廉价的劳动力，处于有利地位。德国和美国在重化学工业等领域占优势，成为新兴工业国，国际地位不断提升。美国和德国实行保护关税，采用新型的企业经营和资金筹措方式，向英国控制的自由贸易体系和金融体系发起挑战。特别是德国和英国的霸权争夺战不断激化，在政治上、军事上发生对立，致使世界形势越来越不稳定。

德国为了巩固统治基础，从建国之初起俾斯麦首相就采取了与国际社会合作的态度，为的是孤立法国。但是，德国最后的皇帝威廉二世受美国的战略家马汉的影响，不仅将德国的未来寄托在海洋扩张政策上，还向英国的海上霸权发起挑战。也就意味着陆军强国德国打算向海洋帝国转型，而要实现这一转型的关键就是海军力量。但德国海军的基地在波罗的海的基尔港，所以德军只能在日德兰半岛开凿军用水道，使军舰可以直接航行到北海。这就是基尔运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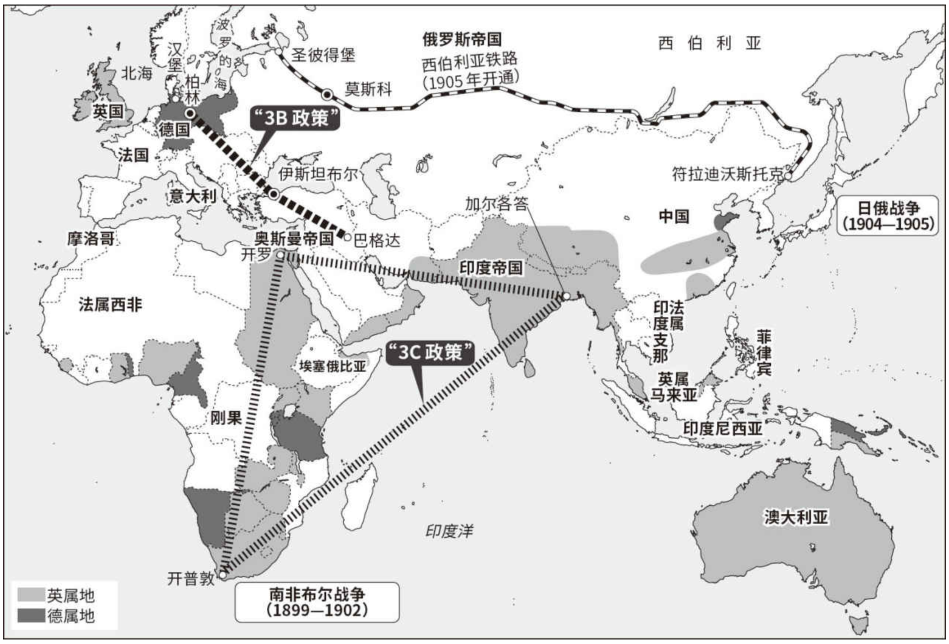
1895年，威廉二世出席基尔运河开通仪式，发表了有名的演说，称“德意志帝国的将来在海上”，并宣布德国转型为能够与英国对抗的海洋帝国。然而，德国正处在从农业国发展为工业国的阶段，无论在海洋帝国所需要的技术上还是在经济实力上都与英国有很大差距。

当时，英国为了在军事上维持海洋霸权的地位，采取了“两强标准”（参见前文），维持了在世界上排第二位的海军国家的两倍的军事力量。然而，德国想在短期内建设超过英国的海军力量。1898年之后，德国开始加速建造大型军舰。英国为了与德国对抗，建造了超大型弩型战舰。随后，德国也建造了相同规模的军舰。英德两国的军备竞赛不断升级。以前的海盗之海（北海和波罗的海）演变成军事对抗和军备竞赛之海。在这种情况下，德皇威廉二世拉拢奥斯曼帝国，非常露骨地邀请奥斯曼帝国一起来实施世界战略，向英国支配的印度洋进军。1898年，德皇威廉二世访问奥斯曼帝国首都伊斯坦布尔，以无偿提供援建为条件，获得了巴格达铁路的建设权。由于铺设了连接巴格达到伊斯坦布尔的铁路，奥斯曼帝国立刻被置于德国的统治之下。实际上，德国的计划是铺设从柏林经伊斯坦布尔到巴格达的铁路。为了与德国对抗，英国积极开展外交活动，与俄国、奥匈帝国联手，打算在巴尔干半岛阻止德国的东进。结果，这些举动激发了斯拉夫人的民族解放运动，欧洲各国的对立加深。德国、奥匈帝国、意大利组成三国同盟，英国、法国、俄国组成协约国，形成两大阵营。由此可见，德国和英国都打算通过武力让对方屈服。

此外，列强为了争夺势力范围，斗争日渐激烈。德国开始实施海洋战略，从巴格达的外港巴士拉向波斯湾、印度洋扩展势力。而英国的海洋政策是以印度洋为中心统治非洲和印度。德国采取了“3B政策”，亦即将柏林（Berlin）、拜占庭（Byzantine，即伊

斯坦布尔的旧称）、巴格达（Baghdad）连在一起的政策。而英国采取了“3C政策”，亦即将开罗（Cairo）、开普敦（Cape Town）和加尔各答（Calcutta）连为一体的政策。德国和英国以军事力量为后盾进行了激烈的争夺。

两国争夺霸权的斗争毫不退让，欧洲各国都被卷入其中，最终导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结果就是，以德国、英国为首的欧洲列强衰落了。



“3B政策”和“3C政策”

军备竞赛最终导致悲惨的世界大战

1914年，奥匈帝国皇位继承人斐迪南大公夫妇在波斯尼亚首都萨拉热窝被暗杀，这就是萨拉热窝事件。奥匈帝国对波斯尼亚拥有行政权，但对事件的善后处理非常不合理，结果导致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德国、奥匈帝国、奥斯曼帝国、保加利亚4国和协约国一方的24个国家作战。第一次世界大战是规模空前的一次大战，

整个欧洲一分为二，成为交战双方。尽管第一次世界大战旷日持久，但实际上支撑战争的是各国的综合实力。

经过第二次工业革命，武器技术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因此，在战争中可以进行远距离的饱和性攻击，攻击无法将士兵和平民分开。如轰炸机从空中进行轰炸，根本无法区分军事人员和非军事人员。战争的性质发生了重大变化。军用飞机从空中对地面进行攻击，区别陆地和海洋已经意义不大了。在这种情况下，交战国在陆地交战的同时也会伴随海战和空战。这样一来，战争就发展为经济、政治、军事等综合国力的较量，男女老幼全体国民都被卷入战争，造成的损失无疑是巨大的。

此外，由于开发出了远程大规模杀伤武器，战斗人员的心理麻木了。这是因为即便杀伤力再大，由于眼睛看不到，便也感觉不到战争的残酷。第一次世界大战是综合国力的较量。在这次大战中，英国和欧洲列强将19世纪从殖民地搜刮来的财富消耗殆尽。因此，英国的霸权开始动摇。

参战各国为了打赢第一次世界大战，都实行物资管制，实行全民动员。除了士兵和在后方工作的军事要员之外，所有的国民都被迫在军需工厂劳动。一直以来，妇女被束缚在家里，此时也走向社会，这是因为妇女不得不替代男子在军需工厂劳动。也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欧洲等地的妇女开始参政。

美国发明了飞机、汽车和收音机

美国开始意识到空域力量的重要性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英国耗费了大量的军费。结果战争结束后，英国也衰落了，霸权转移到新大陆的美国手中。不过，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世界金融中心才从伦敦转移到纽约。

美国是继英国之后的海洋大国。不仅如此，美国还拥有强大的空军力量。因此，美国的霸权得到了加强。制造飞机需要组装很多零件，这促进了美国科学和技术的进步。此外，驾驶飞机也需要高度复杂的技术，这都需要进行训练。因此，要加强空域力量，科学、技术、教育的进步是不可或缺的。陆地力量、海上力量并不完全等同于陆军力量和海军力量，同样空域力量并不完全等同于空军力量。美国通过空军力量掌握世界霸权之后，在第一阶段就控制了连接世界的飞机、喷气式飞机的空中网络。在第二阶段，美国会通过互联网掌握全世界的霸权。空域力量由航空公司、众多的机场、航空产业、保障飞机安全航行的系统、能源保障系统、飞行员的培养、飞机的检修、航空技术人员的教育体系等构成。美国拥有强大的空域力量和海上力量，这两种力量形成合力，最终掌握了军事霸权。美国计划在将来控制全世界的飞机航线、航空制造业。

从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美国的空域力量就占优势

飞机的历史很短。在日俄战争爆发前不久，美国才刚刚发明出构造极为原始的飞机。但就是这一发明，带领人类进入了开拓空域的时代。莱特兄弟受老鹰在飞行中通过扇动翅膀调整动作的启发，在滑翔机上安装了操纵机翼和方向盘的驾驶装置。1903年，莱特兄

弟驾驶着引擎驱动的飞机进行了4次飞行试验，平均时速达52公里。但首次试航滞留空中的时间为59秒钟，飞行距离仅有260米。那时谁都没有想到世界会因为飞机而发生决定性变化。1909年，法国人路易·布莱里奥驾驶飞机，成功横渡多佛尔海峡。不过，这时的飞机仅能乘坐一人，飞行几十公里而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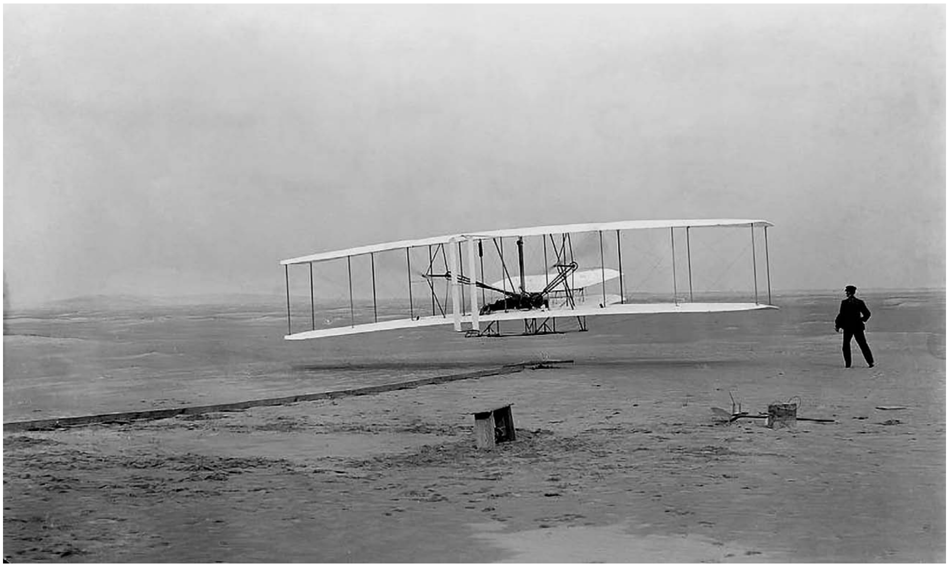
使得飞机发生质变的是以工业化和综合国力为基础的战争。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飞机首次被用作武器，各国实现了飞机的规模化生产，并提高了飞机的性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时，飞机只不过才有470架，在之后4年时间里，世界各国生产了约17万架飞机，其中德国生产的最多，达到4.8万架。当时轰炸机时速达到200公里，续航时间为8小时，主要用于毁坏城市等。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飞机应用到了民用领域。当时的飞机时速在100公里以下。为了与铁路竞争，提高利润，还开通了夜间航班。桑特哥·朱波利写的《星球王子》中讲了一个飞行员的故事。这个飞行员在法国航空公司工作，负责向非洲运输邮件。比利时为了防止刚果的钻石被劫，专门成立了航空公司运输钻石。1927年，美国悬赏2.5万美元，由飞行员驾驶飞机飞越大西洋，中间不允许着陆。美国人林德巴格进行了挑战，花一昼夜半的时间从纽约飞到巴黎，中间没有着陆。

历史上首次出现大量生产、大量消费的时代

美国掌握霸权之后，发生了一件史上从未有过的事情。这就是随着大规模生产和世界贸易的深化，人们开始吃饱饭了，大部分人被从饥饿的恐惧中解救出来。由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美国成为世界最大的债权国。之后美国利用电力发展起电器产业、收音机等通讯产业、汽车产业等。20世纪20年代，进一步出现了舒适的城市生活方式，这就是美国生活方式。

美国引进了大量生产、大量消费模式，利用汽车进行运输。而且，在美国，通过连锁店引发了流通革命。这样一来，商品的价格大大降低，商品充斥着市场。这即是美国式的新生活方式。此前，陆地世界最大的难题就是无法解决饥饿问题。而美国通过大型农场大量地生产粮食，成功地解决了这一问题，美国的一般百姓也能买得起汽车、收音机、家电产品。因此，职业体育比赛、爵士乐等大众文化也开始流行起来。与此同时，美国式的物质至上主义、享乐主义的倾向越来越显著，由此进入大众消费阶段。陆地世界是很难实现大量消费的。而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美国在大量消费的支撑下，进行大规模生产。此外，美国以科学技术为后盾，进入空域时代，人、商品和资金的移动都可以在空域进行。



1903年，莱特兄弟在北卡罗来纳州的沙丘上进行首次飞行的照片驾驶者是弟弟奥维尔，站在右边的是哥哥威尔伯

美国尽管是经济大国，但是在获得霸权问题上犹豫不决

表面上看，英国、法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是战胜国。是英、法两国使奥斯曼帝国土崩瓦解，随后又通过《塞克斯—皮科协定》

瓜分并统治着阿拉伯地区。不仅如此，英法还在东欧构筑了新的势力范围。然而，欧洲经济萧条，财政恶化，终令英国的霸权开始动摇。英国勉强维持了英镑贸易区的金融中心地位。

美国不是战场，就把钱借给各国，成为最大的债权国。因此，经济霸权转移到美国手中。然而，美国想成为霸权国家的意愿并不强烈。美国拒绝把欧洲的债务一笔勾销，也不同意减免欧洲债务，这一举措严重影响了欧洲的经济复苏。19世纪20年代初，美国议会制定并通过了提高海关税率法，这无异于关闭美国市场，封杀欧洲各国解决贸易赤字的道路。

第一次世界大战末期，在美国总统威尔逊的倡议下，国联成立，为的是保障国际社会的安全。但是，美国参议院坚持孤立主义立场，不同意美国加入国联。在美国国内，华尔街是少数派，保守色彩浓厚的农村势力根深蒂固。因此，美国选择了孤立主义道路，没有以霸权国家的身份担负起维持世界稳定的责任。当时，贸易占美国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不足一成，美国也没有和外国竞争的经济规模和专业知识。所以，美国只能采取重视国内的孤立主义立场。在外交政策上，美国最热心做的一件事情就是在东亚扩张。在华盛顿召开的一次由美国主导的会议上，英日同盟解体了。美国为了自己的利益极力阻止自己的竞争对手日本向中国扩张。

第十一章
美国掌握的空域霸权及中国的和平崛起

美国掌握霸权是从亚洲开始的

太平洋战争是美国霸权构想的一环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英国和法国不仅夺取了战败国德国的领土和殖民地，还让德国支付条件十分苛刻的战争赔款。1929年，世界性的经济危机发生，欧洲经济受到重创，德国经济也不能幸免，而支付战争赔偿进一步加重了德国的经济危机。这令德国民众的不满情绪高涨。这时，纳粹打着民族主义的旗号，利用德国民众的不满情绪，取得了政权。

1939年，德国的希特勒和苏联的斯大林签订了《苏德互不侵犯条约》和瓜分波兰的秘密协定。之后，苏、德夹攻波兰。这样一来，英、法对德国宣战，第二次世界大战全面爆发。1940年，德军攻克巴黎。同年，德国与日本、意大利缔结三国军事同盟。1941年，德国为了夺取位于今阿塞拜疆的巴库油田，进攻苏联。两个月以后，美国总统富兰克林·罗斯福和英国首相丘吉尔于1941年8月14日，在大西洋的一艘军舰上举行会谈，发表了《大西洋宪章》。《大西洋宪章》包括了不谋求扩大领土、不变更领土、民族自决、贸易自由和海洋航行自由等内容。美国和英国联手，向争夺霸权迈出了第一步。美国要获得霸权，就必须在太平洋、东亚地区和欧洲战场参战。

以偷袭珍珠港为契机，空中力量开始在战争中起重要作用

1941年，日美进行谈判。日本因为侵华战争已持续多年，国内经济恶化。美国趁此机会，要求日本从中国撤军，并脱离德意日三国军事同盟。为了与美国抗衡，日本和苏联签订《日苏中立条约》，进驻法属印度支那。由于日本对抗美国的意图日益明显，《赫尔笔记》指出，“如果日本不从中国撤军，美国就停止向日本出口石油和钢铁”，以此措施制裁日本。然而，早在日本偷袭珍珠港一年前，美国领导人就打算参加第二次世界大战，并确信能够获胜。

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日本下定决心对美国开战。1941年12月7日，日本袭击驻扎在夏威夷珍珠港的美国太平洋舰队，对美国不宣而战。美国于同一天对日宣战，太平洋战争爆发。在这里需要注意的是，美国把要求日军撤出中国和对日本实行石油、钢铁禁运巧妙地结合在一起。

本来，控制太平洋、抢占中国市场是美国的传统世界战略。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美国实施这一战略的最大障碍就是日本。也就是说，美国和日本发生战争只是时间问题。另外，美国也希望找一个合适的借口在欧洲战场参战。在美国国内，共和党反对战争。这对执政的民主党来说是个棘手的问题。抗日战争处于胶着状态，日本经济萎靡不振。罗斯福的民主党政府瞅准这一时机，向日本政府发出通牒：“如果日本军队不撤出中国的话，美国就停止向日本出口石油和钢铁。”美国政府这样做的目的是刺激日本向美国宣战，是一种挑衅行为。

对此，日本政府在没有进行深思熟虑的情况下就决定向美国开战。日军在日本政府向美国宣告断交前不久偷袭珍珠港。美国政府巧妙利用日军偷袭珍珠港一事在美国国内大造声势，使得反对战争的共和党也无话可说。在这一形势下，美国积极备战，做好了与日本决战的准备。

最近的研究成果认为，起草《赫尔笔记》的是美国财政部的官员怀特。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召开了布雷顿森林会议，决定把美元作为基准货币，实行固定汇率制度。以此为契机，美国掌握了世界经济霸权。在这一过程中，怀特起着主导作用。如果这是事实的话，可以说刺激日本向美国宣战是美国的亚洲战略和战后霸权构想的重要一环。

德意日三国军事同盟规定："假如同盟国中的一国与第三国交战的话，其他两个国家也要向第三国宣战。"如果日美战争爆发的话，意大利和德国也要向美国宣战。也就是说，美国从亚洲参与了欧洲战场的战争。在太平洋战争中，日本失去了制空权。这导致日本的各个城市化为焦土，工业遭到毁灭性打击。从此，日本再也无力与美国对抗，美国消除了进军中国市场的障碍。

日本偷袭珍珠港之后，美军深刻认识到："巨炮大舰的时代已经过去了，空中力量开始在战争中起主导作用。"战舰的规模再大也无法抵御来自空军的进攻。于是，美国的军事战略开始转型。美国开始大规模生产战斗机、轰炸机，并着手研究雷达，将战舰切换为航母。以日军偷袭珍珠港为契机，美军从海上力量向空中力量转型。

开发喷气式飞机，构筑空中力量

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战争规模远远超过第一次世界大战。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不仅战败国德国、日本、意大利受到重创，连战胜国英国、法国、苏联也蒙受巨大损失。唯独美国获益匪浅。美国空军在欧洲、日本，以及海上都发挥了机动性好、破坏力强等优势，由此取得了胜利。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只有英国和德国使用喷气式飞机做战斗机，其速度是螺旋桨飞机的两倍。可以看出，美国在喷气式飞机方面落后于英国和德国。

美国意图掌握空域霸权，苏联则运用火箭技术与美国对抗。可以说冷战就是通过空军力量争夺霸权。美国通过确保庞大的军费开支，维持着占绝对优势的航空战斗力。不仅如此，美国还致力于开发喷气式民用客机，控制着世界航空运输业。20世纪50年代末，波音公司、道格拉斯公司开发了民用喷气式飞机。20世纪60年代，美国开发出波音747飞机，能够运输大量乘客。之后，航空运费下降，喷气式客机翱翔在世界的天空。空域时代到来了。

在美国主导下，在世界范围内形成了空运网络。不过，空运网络只是美国霸权的一部分，而且是美国空域霸权的第一阶段。制造飞机的工序非常复杂，需要组装数百万个零件。当今，美国波音飞机与法德合作成立的空中客车公司，垄断了世界航空制造业，向世界供应大量的喷气式飞机。

据IATA（国际航空运输协会）讲，2018年的飞机乘客总人次为43亿。由于廉价航空公司（LCC）的大量涌现，估计在2036年，飞机乘客会达到78亿人次。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中国的航空运输普及很快。估计到2022年，中国的飞机乘客将超过美国。由于中国的航空运输量猛增，波音公司和空中客车公司为了确保中国市场，不惜出让部分技术，打算和中国进行合资。今后，中国的民用飞机生产商肯定会获得飞跃式发展。

标榜民主和树立假想敌是美国获得发展的武器

在19世纪，英国率先垂范，建立从海上连接各大陆的体系，并以此维持霸权。而当时美国属于新兴国家，国内还未完全统一，要和英国争霸，还面临诸多困难。但在争霸之际，美国模仿的对象却非英国莫属。英国当时争霸靠的就是纸币英镑、贸易结算体系、自由贸易、海军力量、谍报系统等。然而，在爆发世界经济危机之后，世界各国经济萧条。随后第二次世界大战，又令国际社会和经

济受到重创。因此，美国采取切实措施，使得世界经济复苏，让各国支持美国称霸。这样一来，美国在短时间内构筑起霸权体系。在这一过程中，美国国内并未取得一致意见。所以，美国不断设定法西斯、日本、苏联、中国等为假想敌，把这些国家看作是对美国的威胁。美国政府打着保卫美国的旗号，不断加强海军、空军、海军陆战队的力量，构筑起霸权体系。

在20世纪30年代，美国为了摆脱经济危机而实施罗斯福新政。在这一时期，美国民主党已经为战后的霸权体系描绘了蓝图。罗斯福总统确信美国会参战并获胜。因此，罗斯福动员美国国务院和财政部精心设计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获得霸权的路线图。美国获得霸权的构想是："向美国民众宣传第二次世界大战是民主国家和法西斯国家的战争，在与苏联、中国联手打倒法西斯后建立联合国。在联合国的领导下建立民主的世界秩序。美国在其中起到主导性作用。"美国的霸权构想的核心内容是"不要再发生不幸的世界大战"。

在1945年举行的雅尔塔会谈中，罗斯福、丘吉尔、斯大林三人签署了《雅尔塔协定》。该协定描绘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世界发展蓝图。

三个会议是美国获得霸权的基础

1944年至1945年，召开了三个国际会议。美国在这三个会议上提出了建议，为确立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美国的霸权地位奠定了基础。详情如下：

就设立联合国事宜，召开敦巴顿橡胶园国际会议。根据会议精神，1945年设立联合国，最初由51个成员国组成。美国、英国、法

国、苏联、中国是常任理事国，在安理会中拥有否决权。设立联合国的目的是解决国际纠纷，维护世界和平。

就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世界经济秩序，召开布雷顿森林会议。在会议上决定实行固定汇率制，规定美元是唯一可以和黄金兑换的纸币。这样一来，美元就成为国际货币。美国通过货币、金融手段从经济上掌握了世界霸权。国际货币基金（IMF）、国际复兴开发银行（亦即世界银行）起着维护美国的经济霸权的作用。

就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设定民用飞机航线和民用飞机的销售，召开芝加哥民用航空会议。在会议上，美国主张建设覆盖全球的民用飞机航线网络。由此可见，美国把飞机的制造、销售定位为霸权的一部分，旨在掌握世界航空业的主导权。在芝加哥民用航空会议上，决定设立国际民用航空组织（ICAO），其目的是讨论并解决飞机的销售、航线的开通、航运技术、航空管制、机场管理、反恐措施等问题。在国际民用航空机构下面设立国际航空运输协会（IATA），其实质是世界民用航空公司协会。该机构的职责是通过设定世界航运路线和对飞机票实行结算，建立全球性的客机运行网络。英国曾经依靠蒸汽轮船控制全世界的海洋。美国也模仿英国的做法，通过飞机控制全世界的天空。

美国在短期内建立了霸权机制

1989年，冷战结束。在冷战结束前的美国的霸权具有下述特征：

美国和英国合作，基本上继承了英国的霸权模式；

美国的军事力量的核心是强大的核力量和空中力量；

美国宣传第二次世界大战是民主国家和法西斯国家的战争，美国以维护民主、人权、世界和平的卫道士自居，在谋求霸权过程中争得美国民众的支持；

美国打破19世纪的殖民体系，创造对美国企业有利的营商环境；

美国利用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地位维护自己的霸权；

美国将美元定为唯一可以与黄金兑换的货币（黄金美元本位制），实行固定汇率制——通过这些措施，建立了以美元为主导的国际货币体系；

美国废除保护性关税，推进自由贸易；

美国主导构建民用航空特别是喷气式飞机航线网络。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美国的工业生产总值占世界的一半以上，美国的黄金储备更是占到世界总储备的3/4以上。不过，美国毕竟是新兴国家，人们还不太认可美国的霸权地位。因此，美国有必要在世界濒临饥饿状态时，建立霸权机制。于是，美国以“民主国家和法西斯国家之间的战争”的领导者自居，主导建立联合国，在短时间内构筑起霸权体系。美国基本上是靠美元的力量建立的霸权。美国通过把美元作为唯一的国际货币，为取得霸权奠定了坚实的经济基础。从1944年至1973年，美国一直维持着美元黄金本位制。

美苏冷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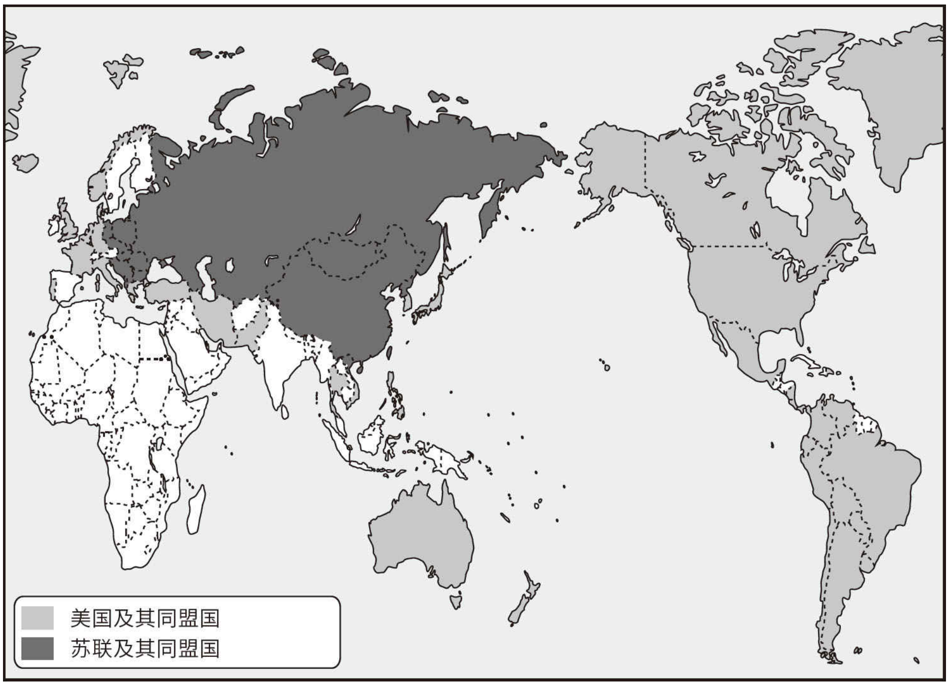
从1946年至1989年，美苏之间的冷战持续了约40年。美国拥有海上力量和空中力量。而苏联将东欧作为自己的势力范围，拥有强

大的陆地力量。苏联在意识形态上为社会主义，和美国对抗。这就是冷战的实质内容。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并走上了社会主义道路。美苏对立扩展至世界各地，朝鲜战争、古巴危机、越南战争等战争相继爆发。美国采取各种措施封锁、包围苏联。东西两大阵营开展了旷日持久的核竞赛。

到了20世纪60年代中期，美苏两国利用冷战带来的恐慌，管理并操纵本国民众、同盟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国军队规模急速膨胀。维持庞大的军队并控制加入北约组织的同盟国，对冷战中的美国来说是不可或缺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苏联经济不振，物资匮乏。尽管如此，苏联通过华约组织控制着东欧各国。对美国和苏联来说，冷战是符合国家利益的。但是，冷战没有永远持续下去。这是因为苏联的经济状况急速恶化。

不论在技术层面还是在财务层面，苏联和美国相比，都有很大的差距。不论在军备竞赛还是在经济竞争中，苏联都不是美国的对手。最终，戈尔巴乔夫的改革以失败告终，不得已选择了结束冷战。之后，苏联解体。1991年，成立了以俄罗斯共和国为核心的独联体。波罗的海三国、乌克兰、白俄罗斯、格鲁吉亚、中亚五国脱离独联体。俄罗斯的人口仅比日本多1000万。苏联解体后，形成了美国一家独大的态势。中国则一直执行改革开放、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国策，国家政治经济形势稳定。

苏联解体后，美国霸权体制的性质发生了变化。当时，经济全球化趋势日益明显。美国开始将资本和技术向中国转移，利用中国的廉价劳动力获得丰厚利润，中国成为世界工厂。“中国制造”行销全球，中国经济获得了飞跃发展。由于美国和中国处于“蜜月期”，世界经济结构发生了变化。



美苏冷战(1959)

真正意义上的空域霸权始于互联网

美元危机和“空域世界”的重组

美国致力于稳定美元纸币的币值，并在世界各国流通。通过这一措施，美国维持着其经济霸权。以前，干燥地带的帝国为了维持霸权，致力于保障小麦的生产消费循环。相较而言，二者有异曲同工之妙。然而，从20世纪50年代后半期开始，美元的流通开始出现问题。这是因为美国的国际收支赤字不断扩大。美元从美国大量流出，世界各国的美元储备增加。但由于美元纸币发行量过大，世界各国对美元的信心开始动摇。1958年至1959年，在这短短的两年时间里有相当于34亿美元的黄金流出美国。为了维护美元的币值，美国尝试限制美元的交易。但人们对美国的这一措施十分不满，便在伦敦建立了欧洲美元市场，将美元在欧洲投资，不返回美国。美国政府要求各国政府停止用美元兑换黄金，但是收效甚微。因此，美元持续贬值。

1971年，人们预测美元会贬值，于是纷纷在外汇市场上抛售美元。1971年8月，美元币值下跌严重，美国政府明显支撑不住了。于是，尼克松总统迫不得已停止了美元和黄金的兑换。这就是“尼克松冲击”。1973年1月，主要的资本主义大国开始实行浮动汇率制。美元变成了不可与黄金直接兑换的纸币，美国的霸权地位开始发生动摇。但是，美元依然是石油买卖的唯一结算货币，总算维持了世界基准货币的地位。大约在同一时期，爆发了第四次中东战争（1973）和伊朗革命（1979）。受此影响，石油价格猛涨。又由于美元大幅下跌，造成了通货膨胀。石油危机的爆发导致能源成本的暴涨。

欧美企业打算用廉价的劳动力来应对能源成本的上涨。为此，欧美企业将资本和技术向劳动力低廉的亚洲各国转移。一直以来，日本和德国在制造业上领先世界。而此时，中国、韩国、新加坡、东南亚各国、印度等凭借引进的先进技术很快地实现了工业化，经济快速增长。

在这一背景下，美国将军用互联网技术转为了民用，将互联网用作维持霸权的手段。20世纪90年代之后，互联网获得了迅猛发展，在全世界范围内普及。与此同时，美国构筑了支撑金融资本的互联网技术体系。在这一体系中，金融产业、信息产业处于主导地位。美国利用互联网技术进入空域霸权的第二阶段。美国创造了全世界范围内的电子空间，这堪称第二个大航海时代。通过这一策略，美国重构了霸权。

一些国家因经济全球化和财政困难而衰落

美国采取了经济的金融化和企业的跨国化政策。这一政策减少了美国的税收。税收的减少削弱了美国的国力，动摇了国民的生活基础。另一边，英国则利用在海洋世界积累的财产在全球范围内建立避税天堂，给全世界企业带来了减轻税负的机会。可以想见，英国正在试图夺回世界金融霸主之位。“本国利益优先”并非是美国的独创。

即便在21世纪，各国的利益冲突不断。因民族传统、文化不同，世界各国在政治上进行合作乃至统一是很困难的。英国脱欧、欧盟内部矛盾重重便是明证。在政治层面，陆地世界的思维依然根深蒂固。历史上形成的民族矛盾、宗教矛盾根深蒂固。国际社会依然没有能够制定出新的规则。

在这种情况下，全球性大企业为了谋求利润的最大化，以国际竞争加剧为由要求政府减税。与此同时，这些大企业将企业向劳动力价格低廉的地区转移，还利用避税天堂逃税。经济活动的跨国化趋势越来越明显。由于税收减少，国家财政捉襟见肘，政府的债务增加。美国国内贫富差距拉大，移民、难民大量流入美国。这些问题都需要解决。随着国际化进程的不断继续，需要加强基础设施建设。恐怖主义者有可能攻击电脑的服务器，必须予以防范。这些都需要投入大量的资金。因此，财政支出不断增加，国家财政日益捉襟见肘。在这一背景下，民粹主义逐渐抬头。民粹主义标榜主权在民，主张少数服从多数，反对精英主义。共和党的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改变了此前的国策，主张美国利益至上。英国也举行公投，决定脱离欧盟。这些现象都属于民粹主义的抬头。

以金融风暴为契机中美之间产生矛盾

与此同时，跨国企业为了压低生产成本，不断把工厂迁到国外。结果，除了武器生产、飞机制造等领域之外，美国制造业纷纷衰退。于是，美国在世界范围内推动了经济的金融化。其具体做法是利用20世纪90年代的互联网普及，凭借IT技术发展金融业，依靠服务业促进经济的增长。

如上所述，在冷战结束后，美国制造业开始把工厂迁到人口占世界1/5的中国。19世纪以来，美国的世界战略之一就是独占中国市场，而今美国以外包业务的方式实现了这一愿望。由美国企业负责研发，由设在中国的工厂生产从服装到电脑等各种各样的产品。历史学家尼尔·范克逊将这种现象称作“中美国”，意思是中国产业界成为美国企业的承包公司。

冷战结束后，苏联解体。受此影响，俄罗斯经济一直在衰退，GDP甚至排在了韩国后面。乍一看，美国的霸权稳如磐石。然而，

美国通过把债权证券化，令金融产品、金融衍生产品泛滥。美国金融界在全世界范围内为赚取利息而忙得不亦乐乎。2008年，雷曼兄弟公司危机爆发，美国金融业遭到重创。美国政府通过滥发美元纸币，向巴西、俄罗斯、印度、中国、南非等金砖五国投资，让金融业摆脱了金融危机。但是，美国的一般企业、民众并没有享受到经济复苏的实惠。美国国内贫富差距拉大，民众十分不满。

由于雷曼兄弟公司危机，中国的对美贸易萎靡不振。于是，中国政府投资4万亿元，在内陆省份修建高速路、高铁，加大交通基础建设的力度。通过这些投资，中国为世界经济的复苏做出了贡献，中国的国际地位提高。习近平当选总书记之后，本着互惠互利的原则，提出并推行“一带一路”倡议，为中国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谋福祉。

“霸权企业”GAFA以及中国的应对措施

IT巨人GAFA

20世纪90年代之后，美国的空域霸权从航空产业转向了IT产业。美国通过IT产业支配并利用互联网产生了全球规模的电子空间。美国多角度、多层面充分利用全球的电子空间功能，在短时间内重构了霸权。而今，GAFA已经成长为电子空间企业的巨头。美国通过GAFA成功地对经济霸权进行了重组。GAFA是指谷歌（Google，搜索引擎）、苹果（Apple，生产、提供苹果智能手机）、脸书（Facebook，拥有12亿用户的社交媒体）、亚马逊（Amazon，通过亚马逊电子市场进行零售）。不过，为了构筑全球规模的网络，美国的IT技术扩散到世界各地。中国的华为、阿里巴巴、腾讯、百度等巨型IT企业迅速发展起来。

在世界文明形成的时期，陆地世界分为埃及、美索不达米亚、印度河流域的小麦地区和黄河流域的粟米地区。同样，互联网平台也分为美国区和中华区。GAFA通过引进大数据、AI等技术，加强了美国的经济霸权。GAFA的资产与德国的国内生产总值相当。IT巨人GAFA运用IT技术成为人类历史上第一批霸权企业。GAFA不是帝国、国家，而是提供服务的企业，它们获得了巨额的利润。这一现状象征性地体现了空域世界霸权的形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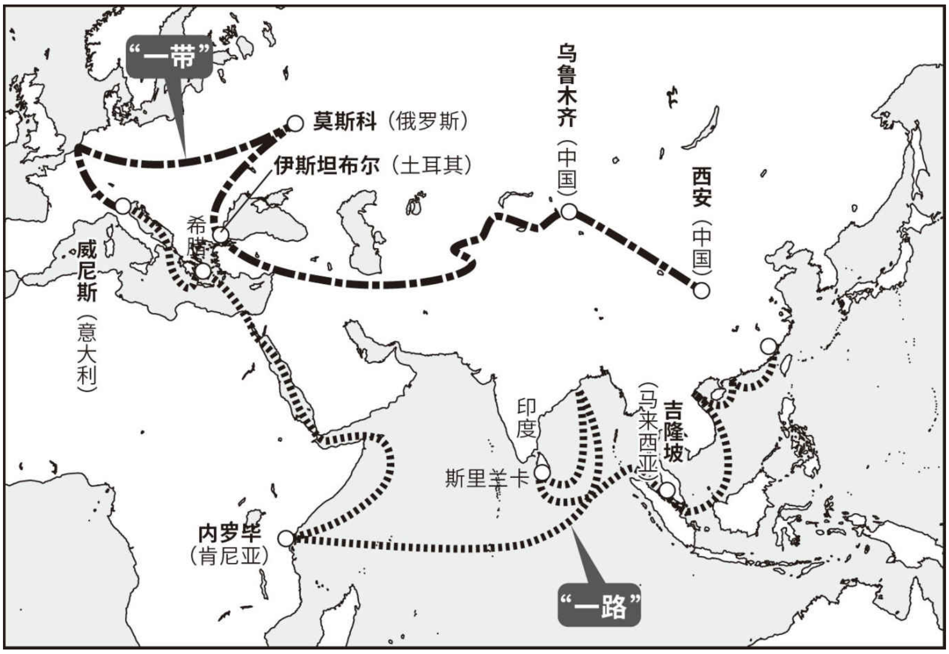
中国的“三级跳”

中国在国家主席习近平的领导下，在陆、海、空全部领域追赶美国，朝着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目标前进。可以说中国排除万难，以三级跳方式朝着既定的目标迈进。在美国实行“中美国”政策期

间，中国积累了庞大的美元外汇储备。中国以此为后盾积极推动人民币的国际化和“一带一路”倡议。

中国的城市人口和农村人口分别占总人口的45％和55％，土地归国家所有。属于农村户口的农民工为城市提供了劳动力，支撑着城市的经济繁荣。

中国为了捍卫自己的主权，扩充海军、建造航母，大批量生产飞机。不过，从历史上看，中国是典型的内陆国家，近代以来海上力量并不强大。20世纪20年代至40年代的革命时期，红军、八路军、解放军实际上都是陆军。中国要将军队的中心转移到海军上绝非易事。中国非常重视空中力量的建设，扩展了喷气式客机的规模，世界最大的机场北京大兴国际机场已竣工。中国的无人机技术在世界上也处于领先水平。在电子空间领域，阿里巴巴、腾讯、百度等利用中国占世界1/5人口的优势，构筑了平台，短时间内中国成为与美国比肩的IT大国。



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

现在，世界正处于IT产业的大变革时期，IT产业被誉为第四次产业革命。第四次产业革命的核心内容就是从4G向5G转换升级。中国把发展IT产业作为国策，在这个领域投入了巨额资金。以4G向5G转换升级为契机，中国将在空域世界确立优势地位。

中美围绕5G竞争激烈，结果将会如何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描绘了宏伟蓝图，要让中国在建国100周年亦即2049年之前成为世界的制造大国。此外，中国政府还公布了《中国制造2025》，计划在2015年后的10年，下大力气推进制造业的数据化、网络化、智能化进程，跻身制造业强国行列。为了促进经济增长，中国政府要重点发展信息通信、机器人、宇宙航空产业、海洋工程、尖端铁路交通、节能汽车、电力装备、农机装备、新材料、生物医药等。这些领域几乎囊括了经济领域的各个方面。

如前文所述，世界面临的紧要课题是从4G向5G转型升级。这一工程即将在2020年启动，这是支撑IoT（物联网）、AI（人工智能）社会的基础设施。5G的通信速度快，是4G的100倍，而且容量更大，每平方公里能够连接100万个终端和装置。使用5G就可以实现IoT亦即物联网，建筑物、电器、机械、汽车、医疗器械等所有东西都可以通过互联网连在一起。可以说5G是通信技术的变革。

美国认为，如果中国在5G技术上掌握了主导权，将导致美国利用互联网获得的霸权地位面临挑战。于是，中美两国围绕着5G技术，在全球范围内展开了激烈的竞争。2017年在高科技领域在世界上排第一位的产品中，美国有24种，日本有10种，中国有9种。中国在手机通讯基础设施基站的建设技术、监视器方面处于世界领先地位。基站建设在从4G向5G过渡中不可或缺。在这方面，中国的华为是世界第一，约占30％；中国的通讯器械大公司ZTE排在世界第四位，约占13％。华为技术实力雄厚，发展迅猛。美国政府和美国

国会都担心中国以向5G过渡为契机，夺走美国在IT产业的主导地位。因此，美国开始采取措施打击华为。2018年12月，华为的财务总监孟晚舟在加拿大被捕。这个事件读者们记忆犹新。时至今日，问题依然悬而未决。

空域世界在IT技术的支撑下，将会合理、高效运转。实际上，空域世界和陆地世界、海洋世界息息相关。人类生活在陆地和海洋，企业单纯为了增加利润而破坏陆地和海洋环境是不可取的。

估计在不久的将来，互联网和历史上形成的两个世界会发生矛盾。那时应该从由陆、海、空构成的世界史的角度重新审视这个世界。

参考文献

A・コーン 星野芳久訳“都市形成の歴史”（鹿島出版会・1968）

A・トインビー桑原武夫他訳“図説歴史の研究”（学研・1975）

A・トインビー長谷川松治訳“爆発する都市”（社会思想社・1975）

B・ルイス 林武他訳“アラブの歴史”（みすず書房・1967）

E・J・ボブズボーム 安川悦子他訳“市民革命と産業革命二重革命の時代”（岩波書店・1968）

陳高華佐竹靖彦訳“元の大都マルコ・ポーロの時代の北京”（中公新書・1984）

D・モーガン 杉山正明他訳“モンゴル帝国の歴史”（角川選書・1993）

E・ウィリアムズ川北稔訳“コロンブスからカストロまで―カリブ海域史（I）（II）1492―1969”（岩波現代選書・1978）

F・カーティン 田村愛理他訳“異文化間交易の世界史”（NTT出版・2002）

F・ヒッティ 岩永博訳“アラブの歴史上・下”（講談社学術文庫・1983）

藤田弘夫“都市と国家―都市社会学を越えて―”（ミネルヴァ書房・1990）

J・パーカー浅香正訳“同時代史的図解世界史”（帝国書院・1988）

H・フランクフォート曽田淑子、森岡妙子訳“古代オリエント文明の誕生”（岩波書店・1962）

I・ウォーラーステイン川北稔訳“近代世界システム－農業資本主義と「ヨーロッパ世界経済」の成立”（岩波書店・1981）

I・ウォーラーステイン川北稔訳“近代世界システム1600―1750”（名古屋大学出版会・1993）

稲垣栄洋“世界史を大きく動かした植物”（ＰＨＰ研究所・2018）

岩村忍“文明の経済構造”（中公叢書・1978）

伊豫谷登士翁“変貌する世界都市都市と人のグローバリゼーション”（有斐閣・1993）

ジャネット・L・アブー＝ルゴド佐藤次高他訳“ヨーロッパ覇権以前（上）・（下）”（岩波書店・2001）

ジョルジュ=ルフラン町田実他訳“商業の歴史”（白水社・1986）

スコット・ギャロウェイ渡会圭子訳“the four GAFA四騎士が創り変えた世界”（東洋経済新報社・2018）

木内登英“トランプ貿易戦争日本を揺るがす米中衝突”（日本経済新聞出版社・2018）

慶応義塾大学地域研究センター編“地域研究と第三世界”（慶応通信・1989）

クリュチェフスキー八重樫喬任訳“ロシア史講和1”（恒文社・1979）

小林高四郎“東西交流史ーシルクロードを中心として”（西田書店・1975）

杉山正明“モンゴル帝国と長いその後”（講談学術文庫・2016）

松田武・秋田茂編“ヘゲモニー国家と世界システム20世紀をふりかえって”（山川出版・2002）

松田寿雄“アジアの歴史ー東西交渉からみた前近代の歴史像”（岩波書店・1992）

ミシェル・ボー筆宝康之、勝俣誠訳“資本主義の世界史1500ー1995”（藤原書店・1996）

三船恵美“中国外交戦略その根底にあるもの”（講談社選書メチエ・2016）

NHK取材班編“大モンゴル3大いなる都巨大国家の遺産”（角川書店・1992）

岡田英弘“世界史の誕生”（ちくまライブラリー・1992）

愛宕松男“東洋史学論集第4巻元朝史”（三一書房・1988）

愛宕元“中国の城郭都市殷周から明清まで”（中公新書・199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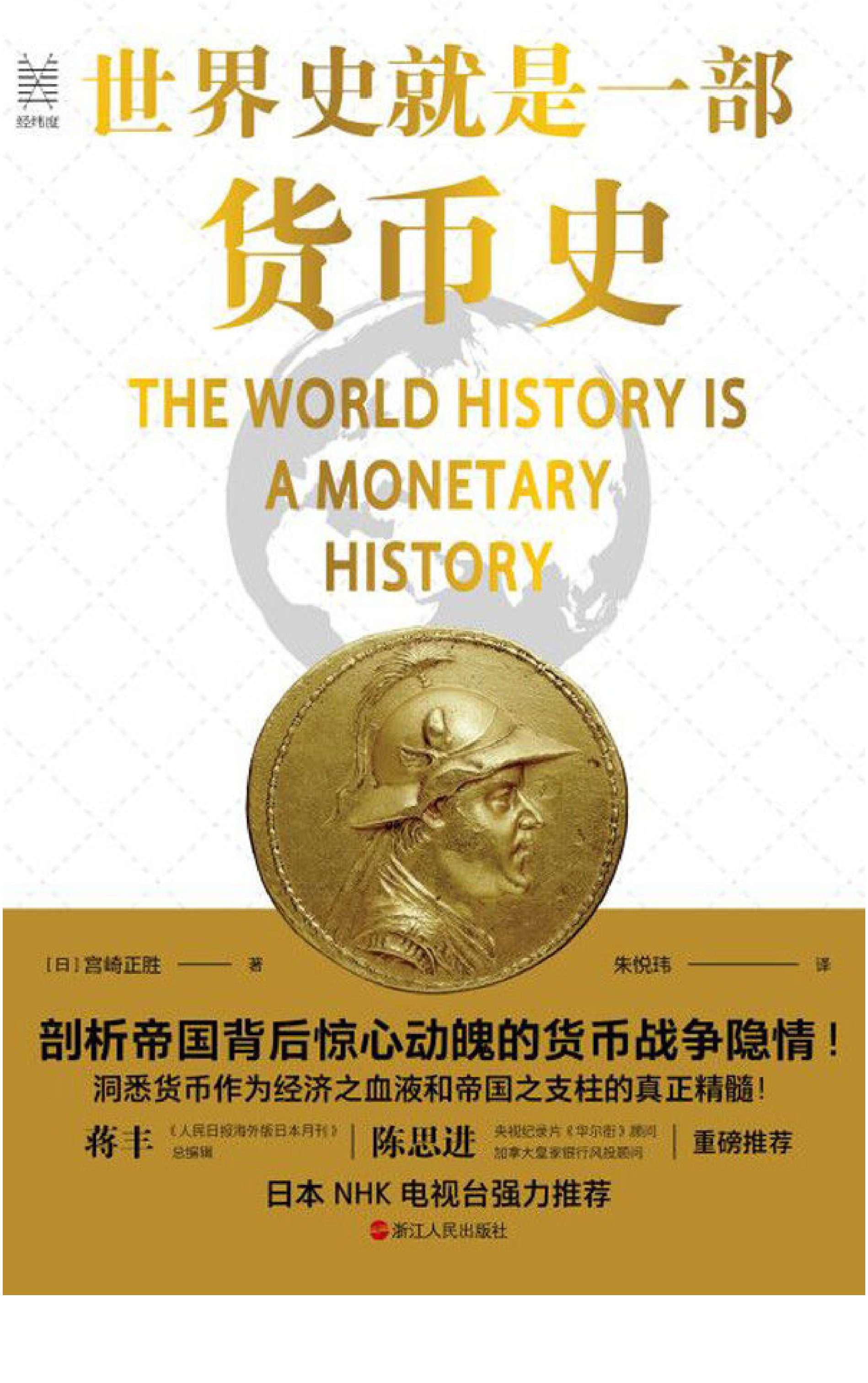
佐口透編“モンゴル帝国と西洋”（平凡社・1970）

佐藤圭四郎“イスラーム商業史の研究坿東西交渉史”（同朋舎・1981）

嶋田襄平編“イスラム帝国の遺産”（平凡社・1970）

杉山正明“大モンゴルの世界ー陸と海の巨大帝国”（角川選書・1992）

S・W ・ミンツ川北稔他訳“甘さと権力ー砂糖が語る近代史”（平凡社・1988）



世界史就是一部
货币史
THE WORLD HISTORY IS
A MONETARY
HISTORY
[日] 宫崎正胜 —— 著
朱悦玮 —— 译
剖析帝国背后惊心动魄的货币战争隐情！
洞悉货币作为经济之血液和帝国之支柱的真正精髓！
蒋丰 《人民日报海外版日本月刊》总编辑
陈思进 央视纪录片《华尔街》顾问 加拿大皇家银行风投顾问
重磅推荐
日本 NHK 电视台强力推荐
浙江人民出版社



THE WORLD HISTORY IS
A MONETARY HISTORY





世界史就是一部货币史

[日] 宫崎正胜 —— 著　朱悦玮 —— 译

浙江人民出版社

浙江省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章图字：11-2019-397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世界史就是一部货币史/（日）宫崎正胜著；朱悦玮译．—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20.7

ISBN 978-7-213-09732-4

Ⅰ．①世… Ⅱ．①宫… ②朱… Ⅲ．①货币史—世界 Ⅳ．①F821.9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20）第078442号

SEKAISHI NO SHINSO WA TSUKA DE YOMITOKERU by Masakatsu Miyazaki
Copyright © 2018 Masakatsu Miyazaki
All rights reserved.
Originally published in Japan by KAWADE SHOBO SHINSHA Ltd. Publishers，Tokyo.

This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is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KAWADE SHOBO SHINSHA Ltd. Publishers，Tokyo c/o Tuttle-Mori Agency，Inc.，Tokyo
through Hanhe International （HK）Co.，Ltd.

世界史就是一部货币史

［日］宫崎正胜　著　朱悦玮　译

出版发行：浙江人民出版社（杭州市体育场路347号　邮编：310006）

市场部电话：（0571）85061682　85176516

责任编辑：陶辰悦

助理编辑：尹晓捷

责任校对：杨　帆

责任印务：聂绪东

封面设计：今亮后声 HOPESOUND pankouyugu@163.com

电脑制版：尚艺空间

印　　刷：北京阳光印易科技有限公司

开　　本：710毫米×1000毫米　1/16

印　　张：16

字　　数：157千字

插　　页：4

版　　次：2020年7月第1版

印　　次：2020年7月第1次印刷

书　　号：ISBN 978-7-213-09732-4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市场部联系调换。

序一　在纵横比较中梳理历史观望未来——为宫崎正胜先生《世界史就是一部货币史》作序

欣闻日本著名大众史学家宫崎正胜先生的《世界史就是一部货币史》中文版出版，我首先要点一个“赞”！

编辑邀请我写一篇序言，确实让我有些为难。我于1983年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但我选修的是中国古代史中的明史。又因为我当年高考的时候数学只得了8分，连带的“后遗症”就是我对经济史不感兴趣。后来，偶然了解到我已故外公、美国哈佛大学汉学教授杨联升先生曾经撰写过《中国货币与信贷史》，我便也硬闯“货币史”的大门，囫囵吞枣地阅读了一些相关书籍。杨联升先生的著作，实际上是他1949年在哈佛大学开设中国经济史课程的讲义，是在美国“讲中国的故事”。而《世界史就是一部货币史》中文版的出版，可以看作是这位日本学者在中国“讲世界的货币史故事”。在积极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让世界更了解中国，让中国更把握世界”的今天，可以说本书的意义已经超过货币史、乃至世界史的范围了。

当然，本书不是第一本在中国出版的货币史书籍。据我了解，近年来相关中外学者的著作在中国频繁出版，甚至出现了世界货币史类书籍热潮。2007年11月，日本学者黑田明伸的《货币制度的世界史》中文版在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2009年9月，英国学者弗格森·高诚的《货币崛起：金融如何影响世界历史》中文版在中信出版社出版；2011年，意大利学者的《货币史——便利的交换体系》中文版在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2013年12月，中国金融学家陈雨露、杨栋的《全球货币通史》在广东旅游出版社出版；2018年4月，苗延波的《货币简史》在人民日报出版社出版；2018年7月，

彭兴庭的《不一样的极简货币史》在法律出版社出版；2019年，与此相关的日本学者板谷敏彦《世界金融史》中文版在机械工业出版社出版；2019年10月，陈雨露重新修订的《世界是部金融史》在江西教育出版社出版。

这些图书的出版，肯定不是编辑们拍脑袋决定的，它反映了市场的一种需求。这种需求，应该是中国改革开放40年来，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一路走来，人们对货币不仅有了新的认识，也更需要新的了解；这种需求，让货币史从金融专家的课堂上走下来，进入寻常百姓家；这种需求，表达了中国读者对世界了解的层面不再停留在物品的方面，而是逐渐转变到货币方面；这种需求，内在地显露出中国读者思维、思路、思考的提升，也是中国融入世界的一种表现。

1988年，我到日本留学，先后师从日本史学家横滨市立大学教授加藤佑三先生、九州大学教授川胜守先生。他们对我最大的影响就是在历史领域治学不要大而论道，而是要从小处入手，从侧面入手。加藤佑三先生对中日近代开国史中的不平等条约进行比较，提出新说，确立了自己在日本史学界的地位；川胜守先生对中国明清时期江南菜籽油进行研究，为此翻遍当时所能找到的地方志，撰写了由日本文部省资助出版的博士论文，确立了自己在日本史学界的地位。本书作者宫崎正胜不再像以往那样围绕着民族、国家、权力者、意识形态的角度洞悉世界史，而是从货币与经济的维度考察世界史的变化，从横向世界史中梳理纵向货币史的发展，从纵向货币史中比较横向世界史的不同。这种治学，不仅需要扎实的史学基础知识，更需要大视野的拓展和比较能力。了解这样的世界史，不仅可以知道当时发生了什么，更可以预测未来会发生什么。因为，无论历史如何变化，都有一定的规律。学习历史最大的益处，就是可以把握历史的发展规律。

宫崎正胜先生早年毕业于东京教育大学历史系。有意思的是，日本各地教育大学的前身，在近现代历史上都是叫师范大学的。尽管“师范”这个词来源于中国，但把它加在学校之前，则是日本的再创造。此举也对中国教育体系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今天中国各类师范学校、师范学院、师范大学的存在，可以说是受了日本师范教育体系的影响。但是，1945年日本战败以后，带有“师范”名字的学校，都改为“教育”院校了。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事情？这是因为：日本战后差点儿把汉字废除了。所以，把“师范”一词废除，也就在情理之中了。话扯得有点远了。其实我想说，宫崎正胜先生毕业于东京教育大学，我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因此有一种亲近感，有一种文化连带感。因此，我很愿意为这本书作序。

至于本书内容，我不想做导向性的评论。记得散文大家梁实秋在《读画》中说过：“我想画的最高境界不是可以读懂的……画给人一种心灵上的享受，不可言说，说便不着。”我觉得，这段话，也适用于这篇序言。

是为序。

《人民日报海外版日本月刊》总编辑　蒋丰

2020年3月于东京“乐丰斋”

序二　用货币解读世界

感谢浙江人民出版社，让我为日本著名作家宫崎正胜所著的《世界史就是一部货币史》赘述几句。作为一个经济学者，沉思良久后，决定以“用货币解读世界”为题作序。

刻在货币上的王朝烙印

不知大家注意过没有，中国封建王朝历史上，有一个共通的现象：每个政权在建立之初都会做两件事，一个是立刻收集前一个王朝的官府卷册；另一个就是发行自己的货币。即便是明末李自成那个仅存不到两年的大顺朝，也造了名为“永昌通宝”的货币，来替代明朝的纸币和铜钱。

第一件事大家肯定明白，收集官府卷册为的是快速了解前一个王朝的机构设置以及百姓情况。但发行自己的货币又是为什么呢？要知道这时候市面上可是不缺货币的！如果挖掘深层次原因就会发现，发行新货币代表的是真正的改朝换代。用新的货币将旧的货币剔除掉，以此来表示新王朝的合法性和正统性。

的确，要扫除前朝的阴霾，最好和最简单的方式莫过于在发行新货币的同时废除旧货币。货币，也就是钱，是百姓买卖东西必备的。历史上使用新货币就等于让人们从最基本的衣食住行中明白，已经改朝换代了，现在皇帝位子上坐的人变了。

如果放眼国外，也几乎都是这个样子，比如本书讲到，在古希腊或古罗马，每逢新君主登基，一般都会发行新的货币，并在货币上铸造自己的头像，表示前一个君主已经远远离开大家了，现在是本君主管事儿了。

书中还有一个关于法国的例子，从14世纪开始用的法郎，其上的头像也是仿照国王的样子来的。到19世纪，拿破仑三世时期更是将自己的各种头像往硬币上放，带胡子的、不带胡子的、带橄榄枝的……总之就是告诉大家一点，现在是拿破仑三世掌权，其他人都是过去时了。

如果你有收藏货币的爱好，在中国按年号，在外国按君主名，真能排出一个历史年表，甚至还能根据货币的成色确定当时的政治和经济状况。所以说，货币的历史实际上就是文明的历史!

英美不遗余力前赴后继地制造世界货币到底为了什么？

这本书中有很大的篇幅在讲述世界货币的形成和发展。的确，历史上曾有过一系列“准世界货币”，如腓尼基人的腓尼基金银币、希腊和罗马的法定货币、中国的铜钱等，它们都具备“世界货币”的某些特性，但它们都不具备条约保证，也不能在全球范围内通用。随着各国贸易的发展，中世纪以后，黄金逐渐取得世界货币的垄断地位。到19世纪，由于英国国力强盛、货币币值稳定，与黄金挂钩的英镑纸钞便成为第一种非金银的世界货币。20世纪初，美国凭借全球一枝独秀的经济，使其法定货币美元成为继英镑后的第二种世界货币。

能成为世界货币，说明英镑和美元有其特殊性，这本书为大家作出的总结如下：

1．能与黄金挂钩；

2．可兑换性强；

3．货币的价值具有相对稳定性；

4．能为一些国际性团体提供资金保护；

5．被全世界普遍接受。

成为世界货币既需要这几点，反过来又能巩固这几点。英美两国在各自的历史时期，担当着世界秩序的“维护者”，因此他们不遗余力地将自己的货币变成世界货币，完全是出于自身考虑，法定货币越安全，自己的国家就越安全。

书中也提到1929年至1933年大萧条时期，那时正是世界货币由英镑到美元的转变时期。当时，各国经济纷纷崩溃，只能各想办法渡过危机。英法两国凭借殖民地搞内需拉动；美国搞新政；苏联搞社会主义五年计划……德国、意大利、日本这类国土面积小的后起工业国，不得不按照“西方经济学”上说的“破窗效应”去做，即“如果国内经济调控扛杆全部失效，就只能发动战争”，于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就因货币经济问题而爆发了。

中国的人民币离世界货币还有多远？

说完了英美，回来提提中国。中国这30余年发展极快，经济和社会发展的许多指标年年增长。可喜的是，除巴基斯坦外，一些非洲国家也开始把人民币作为区域性国际货币使用。人民币成为世界货币的曙光已经显现。

从经济角度来说，人民币成为世界货币的门槛有哪些？

首先，要拥有贸易逆差。相信这点很多读者不会明白，明明顺差赚钱挺好，为何非要逆差赔钱？但是，如果没有贸易逆差，怎么才能让别国获得你的货币呢？顺差获得的是对方的货币，逆差则是让对方获得你的货币。只要让对方大量地持有你的货币，那么你的

货币就是世界货币! 中国离这个目标比较远，虽然出口产品数量巨大，但却不足以令这些巨大数量的商品形成贸易逆差。

其次，要成为国际清偿手段。国际清偿手段就是要成为国家储备资产，这是一国货币国际化程度的最高标准。对国家而言，国际储备是资产方，即成为其他国家的储备资产，意味着本国货币实际上已成为另一国国家信用的支柱。说通俗点，就是一国注资给另一国。如果注资达到50％以上，就拥有控股权了。对我们个人而言，意味着本国货币信用度更高了，在其他国家经商或旅游不用兑换外币，能直接使用本国货币。有趣的是，在非洲一些国家，人民币已经逐渐成为他们的国际清偿手段，如一种硬通货般的存在了。

最后，要实现货币自由兑换。自由兑换并不是我们说的去哪个地方玩，然后兑换该国货币用于消费，这叫被动兑换。这里指的是主动兑换，即在某国或某人发生不可抗力的事件时，该国会主动兑换另一国的货币，用以自保。现在，美元和欧元都可以实现自由兑换，而人民币还没有做到这点。

虽然人民币还没有完全具备这三点，但已经在国际清偿手段与货币自由兑换上迈出了自己的坚实脚步。其实，英国和美国的法定货币在成为世界货币之前，也是举步维艰，花了很多年时间才成功实现。历史给了我们答案，但我们不能照抄答案，生搬硬套。而是要在学习别人的同时，进行创新。本书的最后告诉我们，今天的“一带一路”倡议就是中国在货币新的历史进程上的创新尝试。

另外，本书在重要章节的最后，提供了二三十个“解读货币历史的关键”的小提示，不仅让我们学到了货币历史知识，并且串 起了整个世界货币史，给我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

加拿大皇家银行风险管理部资深顾问、央视纪录片《华尔街》

顾问　陈思进

2020年3月10日

目　录

序一　在纵横比较中梳理历史观望未来——为宫崎正胜先生《世界史就是一部货币史》作序

序二　用货币解读世界

导读　从货币的角度透视历史

货币驱动世界

从货币出现到英镑成为世界货币

20世纪中期崛起的美元成为不兑换货币

货币的转变与电子货币、比特币的登场

为了把握瞬息万变的国际局势

第1章　4000年前，商人让“钱”流动起来

货币出现之前的“钱”是什么样的

埃及为什么没有将“黄金”当作“钱”来使用

美索不达米亚的“代币（token）”

商人选择银块的理由

支持“用钱解决问题”的《汉谟拉比法典》

第2章　从麻烦的钱到简单的钱——促进“货币”出现的硬币革命

硬币这一伟大发明促进了“金钱”的大量流通

“再也没有比发行金钱更赚钱的生意了”

迈达斯王的黄金神话与亚里士多德的金钱观

利用货币强化统治的波斯帝国

波斯帝国每年将36.7吨的白银制成货币

亚历山大将自己的肖像刻在硬币上的原因

“工资（salary）”与“金钱（money）”都起源于罗马

大量发行货币导致罗马帝国灭亡

第3章　为什么中国的货币不是金银而是“廉价的铜钱”

与经济和财政相关的汉字中都有“贝”

秦始皇发行大量廉价铜钱，成为经济的掌控者

中国的铜钱上有孔洞的原因

铜钱是皇帝统治的象征

第4章　从伊斯兰世界的“票据”到欧洲的“纸币”

倭马亚王朝发行并广泛流通的安拉硬币

穆斯林商人开创“亚洲大航海时代”

经济扩大导致“白银不足”，促进票据和支票发展

“长期票据革命”促进欧洲纸币的诞生

作为票据原材料的“纸”是什么时候传过去的

经济发展，最赚钱的是金融从业者

让意大利经济飞速发展的伊斯兰计算法

第5章　元朝时期，中国为什么在欧洲之前成为“纸币帝国”

因铜钱不便携带而开发出来的汇款票据——“飞钱”

11世纪末在北宋出现了全世界第一张纸币

世界上第一个全部使用纸币的国家——中国

第6章　16世纪新大陆的白银流入旧大陆造成的“压倒性影响”

大航海时代，动植物与白银一起流动

新大陆的白银解决旧大陆白银不足的问题

过多的白银给欧洲带来的变化

新大陆的白银给亚洲经济注入活力

“元”来自世界货币“西班牙银元”

第7章　长期的英法殖民地战争促使国债与纸币诞生

鲱鱼使荷兰成为海运大国

荷兰东印度公司为什么有超高分红

资金过剩催生“郁金香泡沫”

打倒无敌舰队的是西班牙自身的财政困难

击败荷兰建立英国海上霸权的克伦威尔

光荣革命后国债在英国固定化的原因

民间性质的英格兰银行为什么能够发行纸币

法国和美国的民间商人也开始发行纸币

牛顿提出的金本位制成为欧洲的货币体制基准

尝试将不兑换纸币与国债挂钩的约翰·劳

南海泡沫事件也因国债而起

第8章　从银币到纸币的时代与英国的货币改革

爆发于酒吧中的美国独立战争

环大西洋世界的近代化

法国大革命以通货膨胀开始，以更严重的通货膨胀结束

利用拿破仑战争拉开“金融时代”序幕的罗斯柴尔德家族

英国如何提高英镑纸币的信用度使其成为流通货币

打破银本位制！英国的豪赌

金本位制的普及与纸币时代的开始

英国的货币符号“£”还残留着银本位制的影子

以大萧条为契机，从世界工厂变为世界银行

因黄金爆发的布尔战争

被鸦片击溃的清朝白银经济

第9章　新兴国美国的中央银行诞生

7000多种纸币和713家银行

为什么美国经济在南北战争后飞速发展

林肯因为得罪了民间银行所以遭到暗杀？

拯救1907年金融危机的大富翁摩根

不保证兑换黄金的美元

第10章　从英镑到美元的时代

全面战争使欧洲衰落，美国趁机崛起

华尔街为什么要拯救战败的德国

美国的新资本主义和福特T型车

汽车社会催生“连锁店时代”

美国的股票泡沫崩溃与金融危机

导致全球性经济危机的“美国优先”

列强的绥靖政策促使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

日本侵略中国原因之一——中国的币制改革

美国出人意料的经济战略

名为“布雷顿森林体系”的谎言

第11章　习惯了不兑换纸币的世界被电子货币席卷

存在结构矛盾的美元霸权

美元不再兑换黄金

用石油来保护美元

“双层结构”的货币与“证券革命”

“全球化经济”开始

日元升值导致的房地产泡沫使日本经济崩溃

美元升值导致亚洲货币危机

美国与中国的双赢交易

从“以自己为中心的美元”独立出来的欧盟

“证券革命”因雷曼危机受挫

中国“一带一路”倡议的目标是什么

电子货币是时代发展的必然趋势

第12章　从世界史的角度分析比特币不能成为货币的原因

比特币真的是革命性产物吗

能够私人制造的比特币很难具有公共性

塞浦路斯事件使比特币引发关注

区块链技术能够改变货币的概念吗

附：参考文献

返回总目录

导读　从货币的角度透视历史

货币驱动世界

当今世界，不管是政治还是经济都处于不稳定的状态，而导致这种状态的主要原因之一，就是1971年的“尼克松冲击”（也称“美元冲击”）。

所谓尼克松冲击，指的是美国共和党出身的总统尼克松宣布暂停美元纸币与黄金挂钩的政策，这意味着之前实行的布雷顿森林体系（以美元为基准的单一国际货币体系）迎来了终结。

由此，一直以来以黄金作为价值担保的美元，由世界货币变成了普通的法定货币（即不能兑换金银的货币）。由于美元的货币价值每天都可能发生变化，因此建立在美元基础上的世界政治与经济也会变得不稳定，对世界各国的贸易造成影响。

如果你要更深层地寻找造成“世界动荡”的原因，其实还要从“世界史的变动”中去寻找。因为大多数世界史的转折点都与经济的转折点相一致。因此，有经济之血液之称的“货币”，可以说是解读当今世界的关键之一。

这一过程长达2500余年，货币从中经历了从银币到纸币再到电子货币的发展过程。本书将以货币的历史为主轴，对世界史进行分析。

现在就让我们首先了解一下货币的漫长历史，把握整体的情况吧。

从货币出现到英镑成为世界货币

距今大约4000年前，人类开始将“银块”当作钱使用。前6世纪，小亚细亚地区的人们通过硬币革命使钱的概念得到了进一步普及。

前550年，世界史上第一个大帝国——波斯帝国建立，全世界第一种货币也随之诞生。货币，指的是由国家保证其价值并强制流通的“钱”，可以说它与单纯的钱的概念有所不同。

到前3世纪，统一中国的秦朝为了加强中央集权而将货币统一为“半两钱”。货币的历史由此开始，延续至今已有2500余年。

随着商业规模的扩大和经济的发展，东西方世界银币和铜钱不足的情况愈发显著，于是人们逐渐开始采用“纸张”作为货币的材质。但是因为纸张本身几乎没有任何价值，所以必须通过信用使其具备“表面的价值”。

在中国，宋朝时官方就发行了纸质的货币——交子，到了元朝更是用纸币取代了铜钱。

但在以“金”“银”作为货币的伊斯兰世界，民间商人则通过票据等信用经济弥补了货币不足的问题，这就是“票据革命”。

伊斯兰世界的“票据”普及地中海的国际贸易区之后，被意大利的各大城市效仿。继而由犹太商人传播到了荷兰，当时的荷兰因为宗教改革，正处于宗教战争和殖民地战争导致的财政困难中，此举恰解了燃眉之急。接着，“票据”又被传播到了英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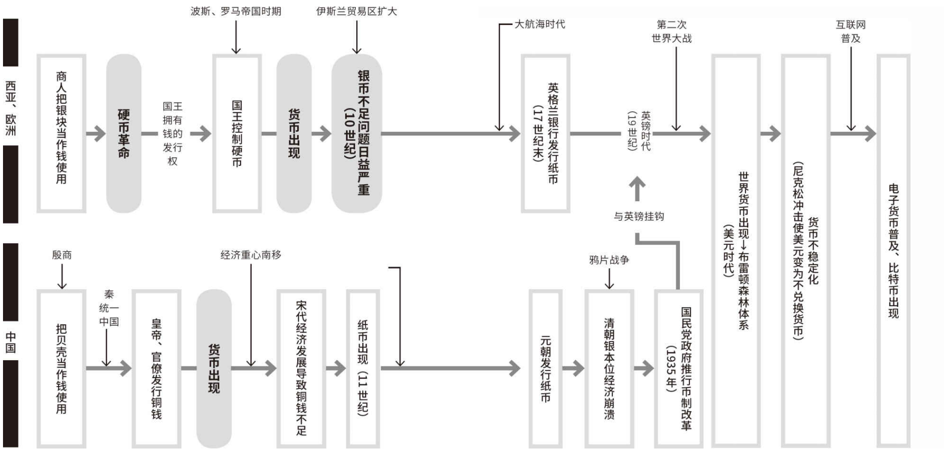
17世纪末的光荣革命后，英国与法国的对立愈发严重，为解决财政问题，英国开始发行国债，为政府筹集战争资金的民间商人

（英格兰银行）获得了纸币的发行权。

本书将从票据出现一直到英国发行纸币这数百年间信用经济的持续发展称为“长期票据革命”。

随后，席卷欧洲的拿破仑战争（1803——1815）使欧洲进入“金融时代”。那时，英国开始发行英镑，英格兰银行因独占货币的发行权而成为中央银行。

19世纪，英国发展为强大的日不落帝国，19世纪后期，采用金本位的英镑纸币取代了银币成为世界货币。



世界史上货币发展的两个分支

20世纪中期崛起的美元成为不兑换货币

20世纪上半叶爆发了两次世界大战，以英国为首的欧洲国家接连出现财政危机。美国趁机崛起，其法定货币美元也成为世界经济的驱动器。

美元正式成为世界货币体系中心地位的转折点起于1944年召开的布雷顿森林会议。这次会议决定，由唯一能够与黄金挂钩的美元以固定汇率为全世界的货币提供价值担保。这一新的世界货币体系被称为布雷顿森林体系。

但实际上，美国并没有足够的黄金储备来维持这一体系。让一个国家拥有相当于全世界流通的等价黄金储备，完全是一种不切实际的幻想。

1971年，美国终于不堪重负，时任美国总统尼克松发表电视讲话，宣布美元与黄金脱钩。美元成为不兑换货币。之前与美元挂钩的各国货币，也纷纷成了由各国中央银行担保价值的“纸片”，这就是尼克松冲击。尼克松冲击导致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并使世界一下子变得动荡起来。

货币的转变与电子货币、比特币的登场

从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到现在的半个世纪，也是世界经济发生剧烈变化的时期。

一方面，美元摆脱了黄金的束缚之后，发行规模不断扩大。与之相应地，华尔街爆发“证券革命”，经济泡沫越吹越大。货币作为投资手段愈发受到世人的重视。

另一方面，20世纪70年代兴起的互联网，到20世纪90年代已成为金融交易的重要媒介。在这一背景下，电子货币的规模扩大到了整个世界。

在互联网的支持下，金融经济似乎建立起了新的机制，但随即到来的次贷危机导致的雷曼危机（2008年），对证券经济造成了毁灭性的打击，在其后很长一段时间都处于恢复期。

与此同时，2008年在网络上出现的基于区块链技术设计开发的比特币，立即吸引了大量目光，甚至有人将其吹嘘为互联网终端的“世界货币”。就像民间金融从业者在英国和美国发行纸币时采取的行为一样，利益的驱使让金融从业者采取各种手段来美化比特币。

但比特币本身却存在着许多问题，比如，作为其依托的互联网因为机制过于复杂而缺乏透明性，安全性也无法保证，而且也没有任何人对其“价值”提供担保。更重要的是，仅凭短短几年的时间，就能创建出一个超过英镑和美元的“世界货币”体系吗？这一点非常值得我们思考。

为了把握瞬息万变的国际局势

从文明诞生至今，已有5000余年的历史，要想对世界在这5000余年里发生了怎样的变化进行通俗易懂的说明，着实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

传统的世界史大多以国家、民族、意识形态为核心，而且站在欧洲的角度看世界。但如果只站在欧洲的角度对战争和外交等事件进行分析，便无法理解整体的世界变化过程。

在现代世界，货币是最强大的武器之一，因此经济与货币的变化才是最大的问题。

一直以来，日本对货币的关注度很低，课堂上讲授的世界史也对货币的历史言之甚少。但是，货币及货币体系是现代社会的基础，要想绕开货币的概念去把握世界史是完全不可能的。

为了洞悉瞬息万变的国际局势，搞清楚自己的位置，明确未来发展的方向，就必须充分地了解货币的现状及历史，并以此为基础，客观地认识整个世界。如果本书能在这方面为大家提供一些帮助的话，将是我最大的荣幸。

第1章　4000年前，商人让“钱”流动起来

货币出现之前的“钱”是什么样的

货币诞生于前6世纪，刚好在四大文明诞生（大约5000年前）和现代社会的中间点上。首先，让我们简单了解一下货币诞生之前的“钱”的历史。

最初，人类进行的是最朴素的以物易物，但随着交换次数的增加，最常用的生活必需品开始成为“交换证”。小麦、椰枣、织物等都充当过“交换证”，它们相当于物品货币。这就是最原始的“钱”。

以物易物的交换最初只在小型村落和部族等共同体内部进行，后来则发展到与共同体外部的其他村落和部族进行交换。由此，出现了农民与牧民之间的交换。

从西亚到黄河流域中部的干燥地带，生活着许多以畜牧为生的牧民，他们的生存离不开小麦，而他们自己又无法种植小麦，于是农民与牧民之间的交换就变得频繁起来。

随着交换的范围逐渐扩大，让农民与牧民之间的交换更加便利的“商人”应运而生。不过，商人往返于农民和牧民之间从事交换活动，必须拥有满足以下三个条件的“交换证”：（1）便于运输；（2）不会腐坏且价值稳定；（3）农民和牧民都不会拒绝交换。

这就是最原始的“钱”的概念，当时的商人充分利用了人们对物品的信仰以及物品本身的特点。西亚的商人用银块当作钱来使

用，黄河流域的商人则用贝壳。

为什么当时的商人选择这两种东西来当作“交换证”？

首先我们来看西亚为什么选择银块。

金属的英文“metal”来自希腊语“μ έτ α λ λ ο ”，原本的意思是“月亮”。

在金属之中，与月亮的颜色最为接近的就是白银。希腊神话之中的月之女神阿尔忒弥斯就乘着一辆由白马拉的白银战车驰骋于夜空之中，她手中拿着银弓，射出散发着银色光芒的箭。

月亮通过阴晴圆缺反映时间的流逝，是永恒的标志。商人利用银块与月亮之间的关联性，使城市居民、农民以及牧民都认可了其所具有的价值。

实际上，银块在日常生活中几乎毫无用处，只是因为其外观和稀缺性而使人产生出“有价值的幻想”。所以银块逐渐成为“交换证”，为以物易物的循环提供了保障。

然而，在东亚地区，一种产于南海的小贝壳充当了“钱”的作用，这是一种名为“贝币”的小贝壳。对于以大家族为中心种植谷物的黄河文明来说，贝象征着族群财富的积累以及谷物的丰收，是繁荣的象征，因此备受珍视。

由此可见，不管在亚欧大陆的西边还是东边，被用来当作钱使用的物品，必须具备让绝大多数人都接受的宗教性、神秘性以及美好的寓意。



贝壳

埃及为什么没有将“黄金”当作“钱”来使用

在文明诞生初期，黄金是埃及的特产，但埃及却一直没有将黄金当作钱来使用。

一方面是因为黄金的产量不足以支撑整个货币体系；另一方面，也是最主要的原因就是该地区没有出现像美索不达米亚那样的农民和牧民之间的大规模交换。埃及的周围除了沙漠就是海洋，属于封闭的农业社会，单纯的物物交换持续了很长时间。

每逢洪水期，尼罗河的水位上涨，将沿岸非常广阔的土地都变成肥沃的农田，为埃及社会的运转提供了强有力的保障。尽管埃及人拥有修建金字塔的砂石技术，但在农耕方面却完全依赖尼罗河稳定的洪水，因此没有修建灌溉网络，城市化发展缓慢（只有孟斐斯和底比斯能称得上是城市），埃及社会整体就是一个“巨大的乡村”。

尼罗河上游的努比亚地区（今阿斯旺到苏丹之间的区域）出产大量的黄金，约占当时世界产量的九成，但这些黄金都被法老以“我和太阳神一样，身体是由黄金组成的”为由据为己有。黄金被铸成金锭由法老统一管理，在需要时再加工成道具和装饰品。因此，黄金在埃及并不是钱，而是一种权威财产、宗教财产。

后世的考古学家在法老图坦卡蒙（前14世纪）的墓穴中发现了共计110千克的黄金陪葬品，其中包括一个重约11千克的面具，这说明古埃及的黄金是维系法老尊严的重要工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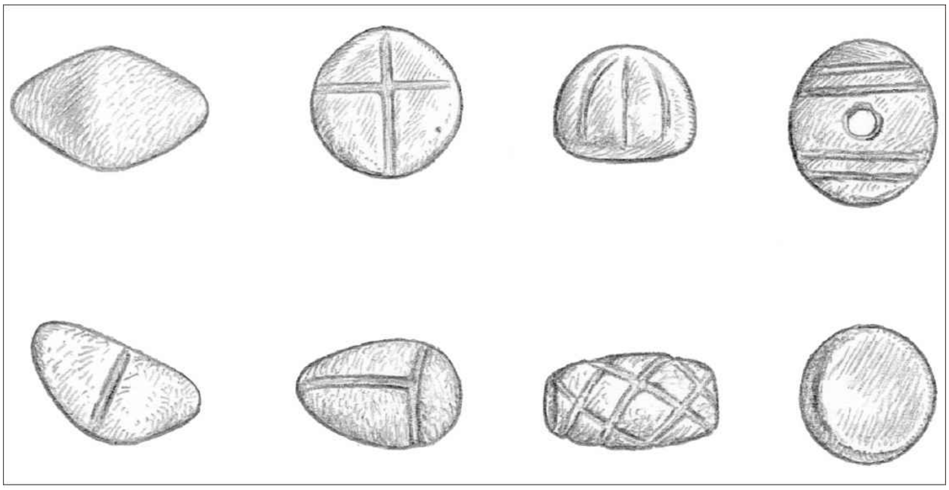
美索不达米亚的“代币（token）”

美索不达米亚（现伊拉克）的农业用水来自小亚细亚东部的高山融水，水资源严重缺乏。为了保证充足的农业用水，当地人需要大量地修建堤坝、水渠、蓄水池等水利设施，而城市作为建筑中心也在美索不达米亚各地发展起来。

在城邦之中，神官按照日历指挥农业生产，农田被视为“城市守护神的土地”，对城市经济进行管理的并非国王和商人，而是神殿。

据推测，农民收获的小麦被收进神殿的仓库统一管理，神殿则支付给农民与缴纳的小麦具有同等价值的“代币”。这个代币就是刻有几何图形的黏土板。

之前人们认为，最早的代币是城邦出现早期大量制造的长约2厘米的几何形状黏土制品，用于“对神殿仓库的物品进行管理和交换”。但现在人们普遍认为，当时人们使用的不是单纯的代币，黏土板上刻出的图形还可以表示物品数量。



长约 2 厘米的几何形状黏土制品



大约 5000 年前，
人们在黏土板上刻出图形来代表数量

美索不达米亚的“代币”

由于年代久远，我们现在很难知晓当时的实际情况，但在城市内部用神殿发行的代币来充当“交换证”换取小麦等物品，是完全有可能的。

不过，代币只是在共同体内部流通的钱，限于在共同体内部使用。而且由于小麦无法长期保存，所以有人认为代币也会随着时间的流逝而逐渐失去价值。

因为钱就是物品的“交换证”，所以对神殿来说，只要根据账本发行代币，保障代币与小麦之间的交换权，那么即便用不易保存的黏土做代币也没有任何问题。但是对共同体之外的牧民来说，这样的代币没有任何价值。

商人选择银块的理由

对商人来说，需要小麦的牧民才是他们的大客户。因此，商人需要一种所有人都认可其价值的交换证，这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钱”。商人通过不断尝试和寻找，终于找到了与月亮极其相似的贵重金属——银。

正如前文中提到的那样，银块能使人联想到散发出银白色光芒的月亮，所以不管城市居民、农民还是牧民，都认为银块是一种很特别的东西。“它代表月亮从天而降，为物品的循环提供秩序的保障”，当时的人大概就是这样想的吧。

掌控了西亚经济的叙利亚商人，在距今大约4000年前于安纳托利亚（小亚细亚半岛，即现在的土耳其）发现了银。商人们利用这种没有保质期、不会变质，而且价值也不会发生改变的银块，使商业活动扩展到更大的区域并能够保持稳定。

天然的银矿非常稀有，而且制成银块需要非常复杂的冶炼过程，这为商人提高银块的价值提供了有力的保障。

最初，银块可能是装在袋子里通过称重来进行交易的，但很快就按照一种名为“谢克尔”的计量单位来进行交易，创建这一制度的也是商人。由于银块没有保质期，无论何时都能使用，因此统治阶级开始通过积蓄银块来提高自身的社会地位。

解读货币历史的关键1

叙利亚和美索不达米亚出现银制的金属货币。
近现代的英镑和美元等表示金钱单位的词都和银有关。

支持“用钱解决问题”的《汉谟拉比法典》

在美索不达米亚，交易银块时的单位是“谢克尔”（180粒小麦的重量，大约8克）以及是“谢克尔”60倍重的“玛纳”（大约500克）。

美索不达米亚人认为东、西、南、北再加上天、地6个方向的“6”是表示“全部”的神圣数字，因此以6作为基础，采用60进制。

当时的人们认为倍数拥有强大的力量，因此将“谢克尔”的60倍定为“玛纳”（意为神力）。顺带一提，1谢克尔大约相当于当时劳动者一个月的收入。

《汉谟拉比法典》中有“以眼还眼，以牙还牙”的记述，但这一条款仅适用于贵族之间，而贵族和平民之间的问题可以用银（钱）来解决。

《汉谟拉比法典》规定，贵族打断平民的骨头需要赔偿1玛纳，打断平民的牙齿则需要赔偿1/3玛纳（大约167克）。从银块已经可以用来作为维持社会秩序的手段这一点上不难看出，银块已经在很大程度上得到了普及。

值得一提的是，现在以色列的法定货币单位也是“谢克尔”。

第2章　从麻烦的钱到简单的钱——促进“货币”出现的硬币革命

硬币这一伟大发明促进了“金钱”的大量流通

银块每次交易时都要称重和鉴定。随着交易变得愈发频繁，这些步骤就显得非常麻烦，那么怎样才能使交易变得更简便呢？

同时，埃及的黄金最终作为金钱开始流通之后，金与银之间应该如何交换也成为需要解决的问题（后世确定金与银大致的交换基准是1∶ 13.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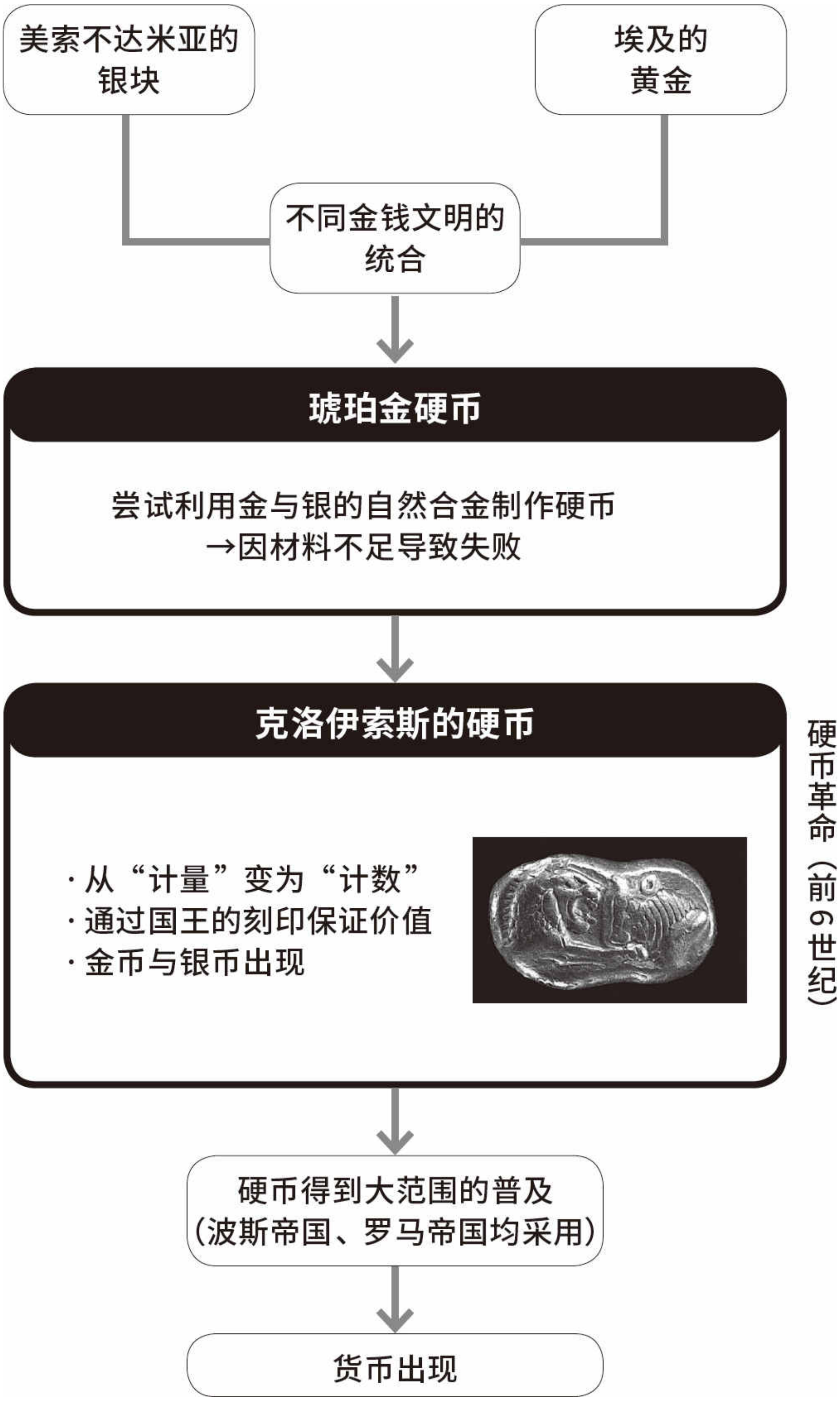
这两个问题对古代社会来说是非常重要的问题。

在这样的背景下，前7世纪，同时出产金与银的吕 底亚王国（今土耳其西部）开始制造以金与银的自然合金“琥珀金”为材质的硬币（即琥珀金币）。

尽管硬币诞生的原因尚无定论，但从选择琥珀金作为材质来看，或许最初的目的是将金与银统一起来。

但琥珀金的产量极少，金与银的混合比例也不均匀，所以这次尝试以失败告终。后来，琥珀金的硬币只被作为奖牌或勋章来使用。

前6世纪中期，吕 底亚王国的国王克洛伊索斯用金和银分别制作金币、银币，并取得成功。



硬币革命

克洛伊索斯发行的硬币正面刻有狮子的纹章，背面则刻有品质、重量的保证，每一枚硬币的品质和重量都是相同的。或许有人

觉得只是统一了品质和重量并将其刻在硬币上而已，没什么大不了的。但对金钱来说，信用和便利性是其首要的特性。硬币的出现，使金钱从每次交易都要确认重量和品质的“麻烦的钱”，变成了只需要确认硬币数量的“简单的钱”，金钱的流通一下子变得更加顺畅起来。

硬币上的纹章和刻印是信用的关键，而国王确定硬币的价值并为其提供保证，因此国王被看作是价值的创造者。同时，国王取代商人成为金钱的发行者，这使国王获得了庞大的财富。金钱的形式得到统一后，发行量激增，被称为“硬币革命”。

解读货币历史的关键2

前6世纪，硬币 在今土耳其西部开始普及，并引发“硬币 革命”。

“再也没有比发行金钱更赚钱的生意了”

由吕底亚国王克洛伊索斯发行的金币和银币在各地大受欢迎，吕底亚在很短的时间内就取得了商业上的霸权地位。他以高出成本的价格卖出硬币，获得了巨额的发行收益，可以说是一本万利。克洛伊索斯有一句著名的论述：“再也没有比发行金钱更赚钱的生意了。”

通过发行硬币获取的收益被称为“铸币税（seigniorage）”，同时，发行货币成了领主（seigneur）的特权。在克洛伊索斯之后，利用给硬币刻印的“价值”做担保这个一本万利的生意，被世界各地的皇帝、国王、贵族等效仿，从而成为统治阶级的“铁饭碗”。

由于硬币的发行方只有一个，克洛伊索斯因此成为西亚和东地中海经济的掌控者，进而攫取了巨额的财富。以致于在古代波斯语和希腊语中“克洛伊索斯”的意思就是“大富豪”，就连现代英语中也有“像克洛伊索斯一样有钱（rich as Croesus）”的说法。

从硬币出现到距今150年前的“纸币时代”的2000多年间，基本上就是王公贵族通过发行硬币赚取财富的时代。那时，向社会持续供应“经济血液”是皇帝和国王的特权。

商人出身的古希腊历史学家希罗多德这样记载道：

“吕底亚人是目前所知的最早利用金和银铸造硬币并将其当作金钱使用的民族，同时他们也开创了零售制度”。

硬币的出现，省去了交易时每次都要用“试金石”测量贵金属的纯度和重量的麻烦，使交易变得更加顺畅，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迈达斯王的黄金神话与亚里士多德的金钱观

吕底亚的帕克托罗斯河里有很多砂金，据说与迈达斯王的神话有关。

迈达斯王因为解救了酒神狄俄尼索斯的养父，被狄俄尼索斯赋予了一种能够将碰触到的一切都变成黄金的能力。迈达斯王一开始很高兴，便将石头和树枝都变成了黄金。但他想吃面包的时候连面包也变成了黄金，接着又不慎将女儿也变成了黄金。迈达斯王惊慌失措，他的生活乱作一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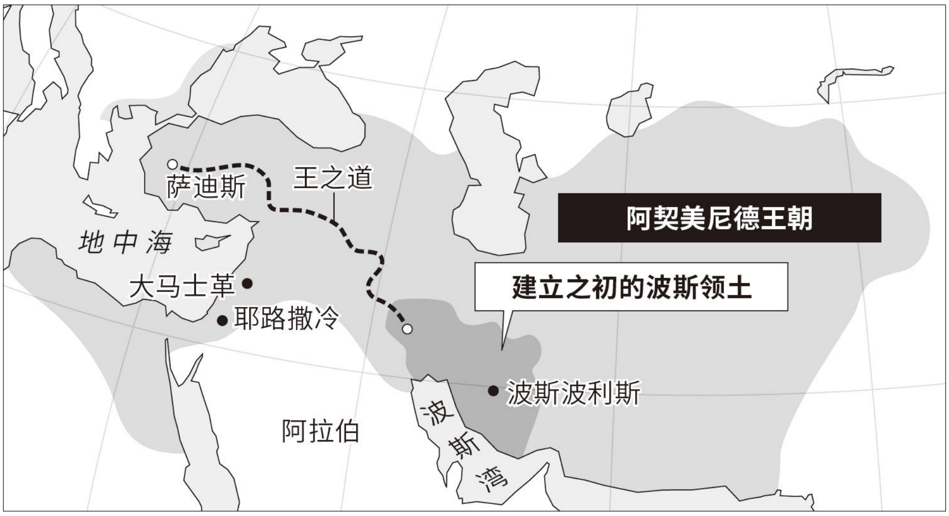
迈达斯王终于意识到了自己的愚蠢，狄俄尼索斯见迈达斯王可怜，便告诉他可以用帕克托罗斯河的水清洗自己。在迈达斯王接触到河水的一瞬间，转变黄金的能力就转移到了河水之中，将河砂变成了砂金。此后迈达斯王隐居到乡间，成为牧神潘的虔诚信徒。当然，这是一个警惕拜金主义的神话。

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在《政治学》一书中引用了迈达斯王的神话，指出硬币最初只是使物物交换变得更加便捷的手段，但人们却通过积攒硬币来赚取利润。亚里士多德将财产的获得方法分为“家政术”和“商业术”，认为后者过度追求财富是错误的。

在希腊语中，硬币被称为“ｖｏ́ｍｉσμα”，与意为“法律”的“ｖｏ́μοç”出自同一语源。同时，也有人认为“ｖｏ́μοç”有制造东西的意思。因此，也可以说，为了便于交换和流通而被创造出来的硬币，只是披着“公正”外衣的“道具”罢了。

利用货币强化统治的波斯帝国

前6世纪，游牧民族波斯人搭乘着马拉的小型战车冲出伊朗高原（面积约为日本的4.5倍，其中八成是沙漠和荒地），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帝国——阿契美尼德王朝（波斯帝国，前550——前330）。波斯帝国征服了吕底亚之后，将诞生不久的硬币制造和流通体系都纳入了自己的统治之下。



阿契美尼德王朝的最大领土

波斯帝国凭借强大的军事实力，在前6世纪中期占领了埃及、美索不达米亚、印度河流域等地，其统治延续了长达200余年。在此期间，波斯帝国发行了自己的货币（currency）。可见，货币是与政治挂钩的金钱，由统治者确定其价值并在领土内强制流通。

发行货币不仅给波斯国王带来了巨大的收益，还使人产生了帝国财政属于公共体制的错觉，有利于加强统治阶级的统治力。在此之后，各国都效仿波斯帝国，利用货币来强化自身的统治。

解读货币历史的关键3

公元前6世纪，波斯帝国诞生了全世界最早的货币。

波斯帝国每年将36.7吨的白银制成货币

波斯帝国要求各地的总督以税收的形式征收金和银，然后将这些金和银制成硬币流通。

最鼎盛时期的国王大流士一世下令制造刻有手持武器且具国王肖像的大流克金币（重约8.4克）和西格罗斯银币（重约5.4克）。正如希罗多德在《历史》中记述的那样，“大流士以高纯度的黄金制造硬币”，波斯帝国便通过制造如此高品质的硬币来彰显国王的权威。

据希罗多德记载，波斯国王每年从尼罗河流域到印度河流域的广阔领土上，以税赋的形式征收上来的银块重达36700千克，即36.7吨。

货币的普及使帝国的体制迅速渗透进国民的日常生活之中。在交换时被当作“交换证”的硬币作为帝国统一的有力象征发挥了强大的力量。

亚历山大将自己的肖像刻在硬币上的原因

前330年，波斯帝国被马其顿王国的亚历山大推翻。20岁就开始远征东方的亚历山大在征服波斯帝国时缴获了大量的金银等贵金属，他决定利用硬币来提高自己的知名度。

如何让世人知道自己是战胜了波斯帝国的新统治者呢？在平民生活中无处不在的硬币是最好的宣传手段。

尽管亚历山大在32岁时就英年早逝，但他仍然效仿波斯帝国和古希腊的货币体系，以德拉克马银币（4克）为样本发行了几十种金币、银币，并且都刻上了自己的肖像。据说这位自恋的国王对肖像的铸造者十分挑剔，只有经过他认可的工匠才能从事雕刻硬币的工作。

亚历山大利用硬币宣告权力交接的计划大获成功，其影响绵延数千年，时至今日英俊潇洒的亚历山大大帝仍然拥有大量的“粉丝”。亚历山大帝国的硬币样式也被罗马帝国和帕提亚帝国效仿。

“工资（salary）”与“金钱（money）”都起源于罗马

亚历山大死后，亚历山大帝国也随之分崩离析。

掌控东地中海商业的希腊商人为了排挤竞争对手腓尼基人，确立自己的霸权，决定借助罗马城邦的实力。结果在前1世纪末，在地中海周边出现了世界上第一个海洋帝国——罗马帝国。其实罗马最初的军事实力并不强，但与希腊商人联手之后就开始走上了崛起之路。

罗马城邦最早是伊特鲁里亚人为了运送从台伯河河口生产的盐而修建的中转站。前640年，罗马人为了摆脱在盐上对伊特鲁里亚人的依赖，在对岸的奥斯提亚修建了一个晒盐场。

奥斯提亚生产的盐通过台伯河被运往意大利半岛中部各地，为罗马的自给自足提供了强有力的经济支持。可以说，罗马共和国的经济基础就是“盐”（拉丁语“sal”）。

盐块（salarium）还被当作报酬发给罗马的重装步兵（由罗马公民组成）。后来报酬变成用银币支付，但被称为“Salarium Argentum”（意思是“用来购买盐的银币”），简称为“salary”。

“salary”后来引申为用来购买各种生活物资的“薪水”，继而又派生出“salaried man”（领取薪水的人），也就是我们现在常说的“工薪阶层”。

英语中金钱“money”的语源也来自罗马。

罗马帝国与波斯帝国一样，垄断了货币的发行权和铸造权，私自铸造硬币是违法行为。“mone”是帝国垄断发行的货币，语源来自女神朱诺的别名“Moneta”。在罗马帝国，只有女神“Moneta”，也就是“mone”的神殿拥有铸造硬币的权利。

为什么只有“Moneta”的神殿拥有铸造硬币的权利呢？

古代欧洲普遍认为经济事务属于家政，罗马帝国自然也认为财务是家政问题。因此身为天后的朱诺最适合负责硬币铸造。当然这里肯定也有利用神的权威来增加硬币信用的考虑。

大量发行货币导致罗马帝国灭亡

罗马帝国的征服活动在2世纪末告一段落，但为了抚养拥有公民权的没落士兵后代，政府必须承担庞大的财政支出。这种问题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社会保障费入不敷出。

但停止征服活动后国库空虚，前167年接手的马其顿银矿也宣告枯竭，加之税收不足，只有支出的七八成，罗马帝国一直被财政问题困扰。

为了提高硬币的供应量，罗马帝国开始减少硬币中的含银量，这就导致硬币的品质下降。虽然超发货币会导致通货膨胀，但在初期货币仍然能够保持之前的价值，政府可以利用这个时间差来获得资金，从而弥补社会保障费的不足。

如果以罗马帝国皇帝奥古斯都发行的银币作为基准，将罗马帝国领土扩张到历史巅峰的皇帝图拉真发行的银币的含银量减少了15%，以修建大浴场而闻名的皇帝卡拉卡拉发行的银币的含银量减少了50%。

最初接近纯银的罗马帝国银币，到3世纪末已经变成含银量只有5%的硬币，货币价值大幅下跌，物价反而持续上涨。严重的通货膨胀使罗马帝国走向衰亡。

罗马帝国最鼎盛的时期是五贤帝时代（96——180），五贤帝之一的皇帝图拉真将罗马的领土扩张到最大，约为590万平方公里（大约为日本面积的16倍），人口大约5500万。

罗马每年向地中海周边的行省以税收的形式征收30万吨谷物，其中2/3来自西西里岛和北非等地，剩余1/3来自埃及。因为地中海

气候区夏季降雨量极少，罗马只能依靠地中海周边的行省（殖民地）确保粮食供给。

随着罗马的过剩人口向外流出，罗马在地中海周边地区建立的城市和殖民城市数量多达5672个。

212年，皇帝卡拉卡拉宣布给予所有的行省自由人以公民权，这使得整个地中海区域罗马化，进一步加快了向殖民地迁徙的速度。但这一举措也使帝国中心区域的影响力减弱，政治显现出分裂的趋势。这就是经济变化导致政治混乱的典型例子。

很快，野心勃勃的地方军团各自拥立自己的皇帝并开始互相征战，罗马帝国进入军人皇帝时代（235——284）。在50年间，罗马帝国出现了26位皇帝，接连不断的内战和严重的通货膨胀加速了罗马帝国的衰败。395年，罗马帝国分为东西两个帝国。476年，西罗马帝国灭亡。

在罗马帝国衰亡的过程中，其基础设施建设逐渐荒废，粮食的供给渠道也越来越少，最鼎盛时期人口多达100万的罗马，到了6世纪时只剩下3万人。

第3章　为什么中国的货币不是金银而是“廉价的铜钱”

与经济和财政相关的汉字中都有“贝”

在黄河流域中部，有适合农业种植的黄土且降雨量适中，所以这里早在3600年前就开始种植耐旱的谷和黍等作物。很快，以“大邑（城市）”和“邑（村庄）”组成的殷出现了。

正如殷又被称为商一样，殷的商业交换十分兴盛，而交换一定离不开货币。那么，殷商的货币又来自哪里呢？

越南等南方沿海地区出产的贝壳因为使人联想到女性的生殖器和生育，被看作是丰收与富饶的象征，进而成为衡量价值的标准，这就是贝壳货币（贝币）。

殷人认为一族的兴旺是最重要的事情，所以对生育十分重视。因此在记录殷王骨占结果的甲骨文中，凡是与经济相关的文字其偏旁部首都有“贝”，后世的汉字也继承了甲骨文中的这一特点，比如“财”“货”“買（买）”“賣（卖）”“寶（宝）”。贝不但被作为交换的凭证，也被当作财产积蓄起来。

人类对贝壳的信仰不仅局限于殷，非洲、东南亚等地都曾经将马尔代夫出产的贝壳当作金钱使用。如今，加纳的货币单位“赛地（Cedi）”在当地语中就有“贝”的意思。

与美索不达米亚一样，黄河流域的农民与牧民之间的交易也非常频繁。汉字中有许多与牲畜有关的偏旁部首，比如“善”“美”“祥”“详”等。

解读货币历史的关键4

黄河文明最初使用贝壳作为货币。

秦始皇发行大量廉价铜钱，成为经济的掌控者

进入春秋战国时期（前770——前221）之后，黄河流域各地的大商人开始发行形状像刀的“刀币”和像农具的“布币”等青铜货币，这与吕 底亚发行硬币几乎是同一时期。

前221年秦统一六国之后，铸造大量廉价的铜币作为货币使用。中国幅员辽阔，想全面禁止假币十分困难，所以发行大量廉价的铜币反而是最安全的方法。

秦始皇利用君权神授的天命思想，以天神代理人的身份统治天下。自称天神代理人的秦始皇统一了文字、度量衡、货币，将流通的金钱变成由皇帝统治的货币。秦的货币是正中有一个方形孔洞的圆形铜钱，名为半两钱（因为重量为1两的一半）。秦始皇通过发行货币成为国家经济的掌控者。

但秦帝国的统治时间非常短，加上统治范围太大，之前诸国的旧货币依然在各地流通，因而无法彻底禁止旧货币和黄金的流通，半两钱只停留在基准货币阶段而没有得到彻底普及。



刀币



布币



半两钱

利用优秀的铸造技术大量生产廉价的铜钱是秦帝国货币的最大特征。货币渗透进百姓生活的方方面面，进而使帝国的统治直接对民众产生影响。

到了汉代，在汉武帝到汉平帝统治时期（前2世纪中叶至前1世纪，约140年），中央政府总共铸造了280亿枚铜币。货币系统正式在中国大地上运转起来。当时汉帝国不断与匈奴（北方游牧民族）发生军事斗争，庞大的军费开支也是促使政府大量发行货币的重要因素。

中国的铜钱上有孔洞的原因

与西方世界依赖的贵金属硬币不同，中国流通的货币是以廉价的铜为材质铸造的铜币。铜币虽然便宜但对铸造技术有较高的要求，且皇帝可以随意决定其价值，这对统治阶级来说是绝佳选择。

中国大量生产廉价的货币，通过“薄利多销”的方式从民众手中换取财物。关于铜钱上为什么有孔洞，有一种说法认为，这是为了将绳子穿过孔洞以把铸件的毛刺磨掉；还有的说，用绳子将铜钱串起来便于交易时计数。秦朝开创的将重量刻印在铜钱上的传统一直延续到隋朝。

唐朝最著名的铜钱当属纪念开辟新朝的“开元通宝”，以及唐朝后来发行的刻印年号的铜钱，这种铜钱不但在中国流传了下来，还影响到了东亚的其他地区，日本的“和同开珎”就是最典型的例子。

此外，中国的文字、文学、历法以及金钱样式等文化都对东亚地区造成了非常深远的影响。

铜钱是皇帝统治的象征

在中国，铜钱基本都是圆形中央有一个四方形孔洞的设计样式。有学者认为，圆形代表“天”，四方形的孔洞代表“地”，寓意“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表现出一种带有宗教性质的世界观。

中国自古以来就有“天圆地方”的说法，铜钱既有圆形的天又有四方形的地，象征皇帝的统治范围。中国历朝历代都由拥有权威的皇帝来履行中央银行的职责。

解读货币历史的关键5

在中国，货币的价值是由皇帝决定的，因此皇帝大量制造廉价的铜钱。

第4章　从伊斯兰世界的“票据”到欧洲的“纸币”

倭马亚王朝发行并广泛流通的安拉硬币

出生于570年的麦加商人穆罕默德，在犹太教和基督教的影响下创立了信仰安拉的一神教（伊斯兰教）。但当时的阿拉伯人普遍信仰的是多神教，因此经过20年的传教，穆罕默德的伊斯兰教只吸收了200名信徒，且大多数还是沙漠中的商人。

后来，穆罕默德统一了阿拉伯半岛的游牧民族（各族大约2000人），教团也摇身一变成了一个强大军事集团的“核心”。穆罕默德于632年去世。随后，教团的领导们选出哈里发为穆罕默德的继任者，同时，为了继续维持与游牧民之间的联系，教团开始了收益颇丰的大规模军事征服（即“大征服运动”）。

第一个被征服的目标是叙利亚的商业中心大马士革，当时的大马士革是相当于纽约的商业都市。成功征服大马士革之后获取的巨额战利品使阿拉伯的游牧民们尝到了甜头，于是他们不仅从拜占庭帝国手中夺取了叙利亚和埃及，还消灭了波斯人的萨珊王朝。

大征服运动之后，占领叙利亚的倭马亚家族将伊斯兰教团据为己有，建立起倭马亚王朝并世袭了哈里发的头衔。

倭马亚王朝第五代哈里发阿卜杜勒·麦利克利用“大征服运动”获得的战利品（据说在636年消灭萨珊王朝时获得了2.6万吨的白银），于695年将东罗马帝国的金币和萨珊王朝的银币统一，并推行由第纳尔金币（4.25克）和迪尔汗银币（2.9克）组成的金银复本位制，并且规定1枚金币能够兑换22枚银币。

倭马亚王朝还发行了铜币，这些刻有安拉名字的货币开始在欧亚大陆广泛流通。

在这些硬币上没有人物的肖像，取而代之的是出自《古兰经》的一句话，“安拉是唯一真神”。顺带一提，日本在708年发行“和同开珎”，与安拉硬币几乎处于同一时期。

解读货币历史的关键6

安拉硬币 在发行后成为在欧 亚大陆广泛流通的货币 。

穆斯林商人开创“亚洲大航海时代”

在将经济活动从印度洋扩展到孟加拉湾以及南中国海的阿拔斯王朝（750——1258）时期，伊斯兰世界从“军事征服时代”转变为“经济发展时代”。

阿拔斯王朝将首都从今叙利亚的大马士革迁到今伊拉克的巴格达，从此对印度洋的开发步入正轨。原本局限于地中海与西亚地区的小规模经济活动一下子发展成为囊括印度洋与欧亚大陆的大规模经济活动。

穆斯林商人以印度洋为中心，开创了从东非到印度、东南亚以及南中国海的“亚洲大航海时代”。伊朗商人成为欧洲在东方开拓的“丝绸之路”和“草原丝绸之路”的纽带，将欧亚大陆的海陆经济合为一体。

《一千零一夜》中收录的故事《航海家辛巴达》就发生在印度洋贸易区。辛巴达在西至非洲，东至斯里兰卡的印度洋上进行了7次冒险航海，获取了巨额的财富。

《航海家辛巴达》中提到的将3头大象抓回巢穴喂养雏鸟的大怪鸟，以及将肉块扔进堆满钻石的谷底引诱巨鹰将沾满钻石的肉块叼上来的故事，都来自在印度洋上往返航行的船员们的传说。马可·波罗的《东方见闻录》中也有类似的记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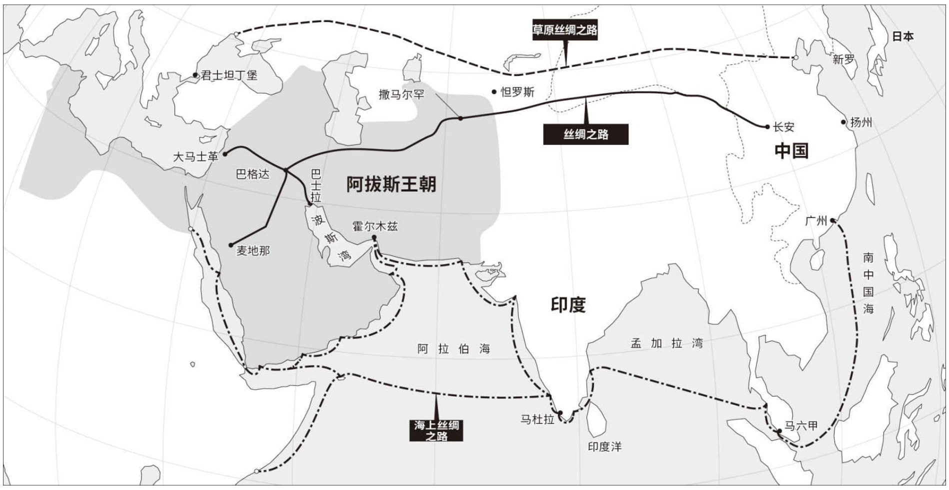
《一千零一夜》的故事发生在阿拔斯王朝最鼎盛的时期，也就是第五代哈里发哈伦·拉希德（786——809年在位）统治时期。当时，巴格达的人口多达150万，市内有6万座礼拜堂以及接近3万间浴场。相当于日本的奈良时代到平安时代的过渡期。

《一千零一夜》中这样写道：“哈伦·拉希德的威名响彻中亚的山丘、北欧的森林、马格里布（北非）、安达卢西亚（伊比利亚半岛）、中国边境。”

印度洋、孟加拉湾以及南中国海的海运是阿拔斯王朝的经济重心。穆斯林商人乘坐阿拉伯三角帆船往来于从东非到中国南部的广阔海域，将砂糖、大米、棉花、柠檬、黑醋栗、橘子、香蕉、蒸馏器（后来被用于制作威士忌、白兰地）、中国陶瓷等运往地中海。

印度洋上有季风，对航行非常有利，因此能够运送大量的货物。穆斯林商人还从非洲沿岸将象牙、黄金以及被称为“赞吉”的黑人奴隶运往伊拉克。

从波斯湾出发、途经印度洋，穿过马六甲海峡抵达南中国海。这趟从波斯湾到唐朝广州的海上航线，往返一趟需要2年的时间，但对当时的穆斯林商人来说却是轻车熟路。



亚洲大航海时代

据说当时广州有多达12万名穆斯林商人常驻，唐朝政府甚至专门为他们设置了拥有自治权的居住地（称为蕃坊），今天的莫斯科

也有类似的地区。穆斯林商人还北上至位于长江中下游的唐朝最大的商业都市扬州开展商业活动。

穆斯林商人通过新罗商人得知了关于日本的消息，因此，“黄金之岛倭国”的传说在9世纪末期就已经在巴格达流传开来。后来倭国改国号为“日本”，黄金岛在元代变成了日本的传说再次传遍欧洲。

在唐朝末期，穆斯林商人聚集的广州发生了一起出人意料的事件。

黄巢带领的农民起义军占领广州使得大量穆斯林商人不得不离开广州，将马六甲海峡周围的小岛作为据点。

穆斯林商人离开之后，给广东和福建的商人们留下了大量的商机，他们模仿阿拉伯三角帆船的样式制造了中国平底帆船，极大地促进了中国与东南亚之间的海上贸易。

到了12世纪，穆斯林商人与中国商人以斯里兰卡的港口科伦坡为界，穆斯林商人在西、中国商人在东，将广阔的海上贸易范围一分为二。

经济扩大导致“白银不足”，促进票据和支票发展

随着印度洋的开发和内陆商业的繁荣，亚欧大陆的经济飞速发展，白银的供应量逐渐跟不上经济发展的速度。10世纪，伊斯兰世界出现了白银严重短缺的问题。于是，阿拔斯王朝的商人们只能通过信用经济来弥补白银经济的缺口。“票据革命”的帷幕就这样静悄悄地拉开了。

票据指的是写明价值和支付日期的有价证券，通常，在市场上进行货币兑换的兑换商发行票据和支票来代替银币，票据第一次出现于960年。

支票原本是政府部门将财产委托给金融从业者时签署的命令书，10世纪时在民间普及，成为商人的汇款手段，据说当时在巴格达开出的支票能在摩洛哥取出现金。

英文中的支票“check”和冒险“risk”在阿拉伯语中是同一个语源。兑换商通过发行票据和支票建立起了信用交易体制。

“长期票据革命”促进欧洲纸币的诞生

伊斯兰世界的票据经由地中海的国际贸易区流转到意大利各个城市、荷兰以及英国，并且在英国进一步发展为国债和纸币。从10世纪至17世纪，票据的一系列发展被称为“长期票据革命”。

阿拔斯王朝先进的票据技术到17世纪末期发展成为国债和纸币的过程，堪称世界史上货币体制的巨大变革，其意义与古代的“硬币革命”不相上下。这次货币革命的大致流程如下：

10世纪，巴格达周边地区因为逊尼派与什叶派的冲突变得动荡不安，经济中心由巴格达向地中海地区转移。地中海地区在伊斯兰商人、犹太商人以及意大利商人的经营下成为国际化大贸易区，“票据”技术传到意大利各大城市中，13世纪，金融从业者通过票据进行贸易结算。

“大航海时代”之后的“商业革命”使全球经济中心从地中海转移到北海周边的荷兰、英国。当时被西班牙和葡萄牙驱逐的犹太商人在荷兰和英国使票据得到进一步的发展。

17世纪末，与法国长期进行战争而陷入财政困难的英国政府通过发行国债来筹集军费，国债成为政府筹集资金的重要手段。当时以极低的利息向政府提供贷款的商人联合起来成立了英格兰银行，获得了发行“不记名票据”（银行券、纸币）的权限，纸币由此出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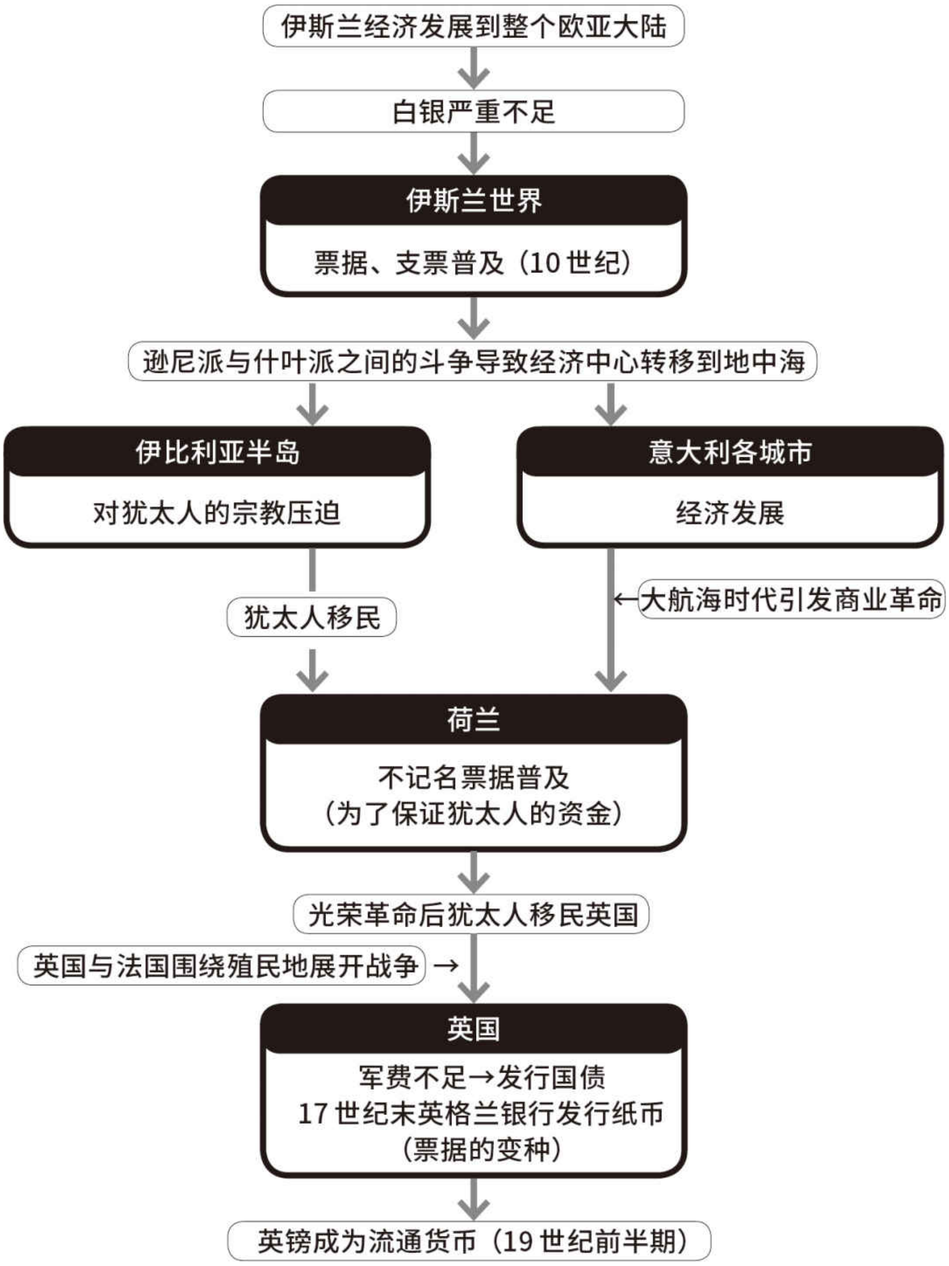
纸币取代银币可以说是“货币世界史”的关键转折。

“长期票据革命”时期欧洲动荡不断，宗教改革以及之后一系列的宗教战争、西班牙与葡萄牙驱逐犹太人、西班牙与荷兰和英国

的战争、英荷战争、英法第二次百年战争，令筹集军费成为当时各国政府的重大政治问题。

甚至说近代的货币体制就是从军费筹集的体制发展而来的也不为过。

不过，要想保证和维持纸币的信用，只有对金钱操作十分熟悉的商人才能做到。因此，货币的管理权随着“票据革命”的进行又从国王和领主那里回到商人手中。



“长期票据革命”（纸币出现）

解读货币历史的关键7

10世纪在伊斯兰世界出现的白银不足问题成为最终促使纸币出现的“长期票据革命”的契机。

作为票据原材料的“纸”是什么时候传过去的

票据是用“纸”做的，所以纸的普及可以说是“票据革命”的前提，而纸是在中国汉朝时期发明的。

阿拔斯王朝成立的第二年（751），阿拉伯人在恒罗斯战役中俘虏了唐朝的造纸工匠，造纸术就这样被传到了中亚地区。

800年左右，巴格达出现了造纸工厂，伊比利亚半岛和西欧地区分别于12世纪与14世纪开始制造纸张。纸的普及和“票据革命”几乎是在同一时期进行的。

金钱作为物品的“交换证”，信用就是其生命。信用的英文“credit”同时还代表“评判”“信誉”“信任”等意思。也就是说，人们将信用评价作为经济的基础。

经济发展，最赚钱的是金融从业者

银行的英文“bank”来自意大利语中的“banca”，而“banca”最早指的是兑换商人所使用的兑换桌。此外，赌博时用的筹码也被称为“bank”。

破产最早的意思是无法进行货币兑换，因此英文“bankrupt”的意思就是“破坏兑换桌”。

伊斯兰教和基督教都认为赚取“利息”是错误的行为且对其加以禁止，于是金融从业者只能利用自古以来有多种货币同时流通这一点，将“利息”说成是兑换的手续费，利用“兑换”来隐瞒自己收取“利息”的事实。

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佛罗伦萨的美第奇家族就是著名的金融从业者，在意大利的其他城市中都有实力雄厚的兑换商，在当时，金融从业者把自己伪装成兑换商可以说司空见惯。兑换商本身也有悠久的历史，如古希腊的雅典和古罗马就有许多兑换商。

欧洲最古老的银行是1407年在热那亚成立的圣乔治银行，这家银行进行兑换交易和投资业务，但没有像近现代银行那样吸收存款并给企业提供贷款的服务。

让意大利经济飞速发展的伊斯兰计算法

从印度传入伊斯兰世界的阿拉伯数字和十进制算法使大规模的商业活动变得更加便捷。

后来，阿拉伯数字和十进制算法随着11世纪后地中海商业的发展传入意大利半岛，并且迅速在意大利商人之间普及开来。

在当时的复式簿记中已经出现等号“=”，以及“贷方”和“借方”之间的平衡关系，可见商人已经将数学应用于实践之中。

现在全世界广泛使用的阿拉伯数字，是8——9世纪印度数字传入伊斯兰世界后的产物。经过“重组”，印度的数字发展成为一种技术，对印度数字和算法的改良可以说是伊斯兰文明实用主义的最佳体现。

阿拉伯数字开始应用的时期是正值白银缺乏问题日益严重的10世纪。可见，经济规模扩大和白银缺乏导致的“票据革命”与数学的发展也息息相关。

在阿拉伯数字传入之前，欧洲一直使用罗马数字，但罗马数字的演算十分复杂，当数额比较巨大的时候，用罗马数字需要写出一大串，所以其不适合进行大规模的商业交易。

与之相对的，阿拉伯数字只需要0——9这10个记号就可以表示任何数字，这种堪称艺术的先进算法彻底征服了意大利商人。

古代商人开发出了只需要非常少的几个字母就能进行交流的文字，十进制则是完全能够与之媲美的商人文明。算法的英文“algorithm”来自9世纪伊斯兰世界的大数学家、确立了代数学（algebra）的阿尔·花剌子模（780——850）。

现在“algorithm”仍被用来表示计算顺序和处理顺序的计算机术语。

十字军东征（1096——1291）使伊斯兰世界的大量文化和物品传到了欧洲，给欧洲文明带来了巨大的冲击，被称为“12世纪的文艺复兴”。

簿记也在1300年左右传入意大利，并且于1340年在商业城市热那亚以“复式簿记”的形式确定下来。

到了1494年，被后世称为“复式簿记之父”的数学家帕乔利（1445——1517）出版了数学和商业数学的入门书籍《算术、几何、比及比例概要》。

在这部著作中，帕乔利用部分篇幅对复式簿记的原理和技术进行了通俗易懂的解说。后来，这部分被命名为《计算与记录要论》单独出版并大受欢迎，16世纪还被翻译为荷兰语、德语、法语、英语等多国语言。

日本直到明治六年（1873）才出现“簿记”这个词。福泽谕吉将美国的簿记教科书《公立学校的簿记》（*Common School Bookkeeping*）翻译为日文并取名为《账合之法》，因为“bookkeeping”音译过来和“簿记”相似，而且有“账簿记录”之意，因此译为“簿记”。

第5章　元朝时期，中国为什么在欧洲之前成为“纸币帝国”

因铜钱不便携带而开发出来的汇款票据——“飞钱”

唐朝（618——907）在经历安史之乱（755——763）后，各地藩镇割据现象严重，均田制（国家将农田分配给农民，农民将收获的一部分缴纳给国家，到一定年限后国家收回农田的制度）土崩瓦解，政府只能依靠对江南的盐等课税维持收入。

政治的混乱也导致租庸调的实物税征收困难，于是唐朝政府开始通过两税法征收铜钱。这一变化使商品经济和货币经济都得到了发展。

但铜钱不便于大量运输，各地的节度使也禁止铜钱外流。为了不被节度使和强盗发现，当时的商人开发出了一种既安全又便捷的汇款技术。

这个技术就是被称为“飞钱”的汇款票据。唐朝商人在各大城市和商品作物的产地建立起商业网络，可以在大城市中用货币换取一种名为“牌”的货币兑换证明，到了其他城市之后将“牌”交给指定的对象就可以换取货币，而提供货币兑换服务的人则收取一定的手续费。

“飞钱”最早只在民间的商人之间流行，后来官方也意识到“飞钱”的安全性和便利性，于是在租税和专卖收益的汇款中也采用了这种方法。

11世纪末在北宋出现了全世界第一张纸币

从唐朝末年到北宋末年（960——1127），长江以南地区得到了持续开发，中国的经济中心从小麦产地转移到产量高出小麦几十倍的水稻产地。因此，中国农业社会的规模急剧扩大。据说只要苏州和杭州的水稻取得丰收，就足够全中国的百姓食用。

唐朝的首都长安是政治城市，到了夜晚路上就看不到行人了。而北宋的首都开封是经济城市，晚上直到凌晨2点仍然有夜市开放，行人也络绎不绝。到了早晨4点，商贩们便又开始新一天的商业活动。

随着主要粮食作物从小麦转变为产量更高的水稻，中国的经济规模也随之扩张，铜钱不足的问题逐渐浮出水面。

据说北宋在150年间发行了2000亿——3000亿枚铜钱、铁钱，但即便如此，铜钱仍然不够用。

由于铜的产量跟不上，北宋不得不将铁也作为制作货币的材料，四川就发行了铁钱作为流通的货币。但大额交易时，铁钱过于沉重难以搬运，极其不便。于是，民间的金融从业者开始用一种名为“交子”的票据来代替铁钱。

北宋地方政府也注意到“交子”的便利性，于是从商人手中收取了“交子”的发行权，然后根据手中铁钱的数量发行等额的纸币（称为“官交子”）。

在中国，纸币由政府而非民间商人发行。这就是世界上第一张纸币，与在欧洲由民间商人发行的从票据转变而来的纸币完全不同。

“交子”（纸币）发行起来十分容易，政府便开始滥发货币，导致纸币的价值下跌，造成通货膨胀，民众苦不堪言。通货膨胀成了政府从民众手中攫取财富的手段。

解读货币历史的关键8

世界上第一张纸币是11世纪末北宋官方发行的“交子”。

世界上第一个全部使用纸币的国家——中国

元朝（1271——1368）继承了宋朝流传下来的纸币。

元朝禁止使用铜钱，规定名为“交钞”的纸币为流通货币。因此，当时中国也成为世界上第一个全面使用纸币的国家。为防止造假，元朝的纸币上明确地写着“伪造者处死”的字样。

身为游牧民族的蒙古人没有控制土地征收税金的传统，反而对在流通过程中的税收非常重视。因此大量地发行纸币，是一个从民众手中攫取财富的非常便利的好方法。

位于西亚的伊利汗国（1258——1411）也想采用这种便利的纸币体制，于是从元朝邀请了工匠并尝试发行纸币，但当地商人不认可纸币的价值，遂以失败告终。

元朝的开国皇帝忽必烈（1260——1294年在位）对商业非常重视，将从波斯湾到中国沿海的“海上丝绸之路”和“草原丝绸之路”连接到了一起，创造出一个横跨欧亚大陆的商业路线（欧亚大陆环形经济区），为国际经济的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北宋使用的面值6万钱的“交子”



元朝流通的货币“交钞”

马可·波罗曾经沿着丝绸之路来到中国，并且在忽必烈手下工作了17年，后来他从海路经波斯湾回到威尼斯，又在与热那亚的战争中被捕。他在狱中口述的《东方见闻录》（即《马可·波罗游记》）记载了大量关于中国的信息，对当时的欧洲人来说是一次思想上的启蒙。

马可·波罗在书中对元朝进行了非常详细的介绍。关于“纸币”，他这样写道：“不管走到哪，都可以用纸币进行支付。也就是说，除了珍珠、宝石、金银之外的一切物品都可以用纸币购买。他们可以购买任何想要的东西，支付的时候只要拿出纸币就可以了。”



元朝时期中国与欧亚大陆的圆环网络

在马可·波罗看来，元朝人用几张纸片就能买到非常贵重的物品，实在是不可思议。

在马可·波罗之后，又有许许多多“无名的马可·波罗”来到中国追逐财富。意大利人普遍认为，“意大利面和冰激凌是马可·波罗带回来的东西”。现在史学界也认为意大利面最初是商人们随身携带的食物，后来被传到意大利成为当地的传统美食。

可以说，元朝时期，中国的欧亚大陆贸易为意大利的文艺复兴提供了坚实的经济基础。

解读货币历史的关键9

元朝时期，中国成为世界上第一个完全使用纸币 作为流通货币 的国家。

第6章　16世纪新大陆的白银流入旧大陆造成的“压倒性影响”

大航海时代，动植物与白银一起流动

从15世纪中期到17世纪中期的“大航海时代”，欧洲人（主要是葡萄牙人和西班牙人）对非洲、亚洲、美洲大陆进行了大规模的航海探索活动。大航海时代促使“旧大陆”和“新大陆”之间的动植物在短时间内进行了大规模的交流，这种交流被历史学家阿尔弗雷德·克罗斯比称为“哥伦布大交换”。

玉米、土豆、番薯、木薯、南瓜、西红柿、青椒、芸豆、花生、葵花籽、可可、香子兰、菠萝、鳄梨、番木瓜、火鸡等动植物都来自新大陆。

在这些来自新大陆的植物中，能够在贫瘠且寒冷的土地上种植的玉米、土豆被带到欧洲，番薯被带到东亚，木薯被带到非洲，它们都对当地的经济发展提供了巨大的帮助。

被带到美洲大陆的小麦、水稻、砂糖、咖啡豆、棉花等作物使种植园在美洲大陆蓬勃发展，马匹也成为重要的交通手段。西部片里印第安人骑的马就是从欧洲大陆传过去的。

除此之外，新大陆开采的白银极大地缓解了旧大陆普遍存在的白银不足问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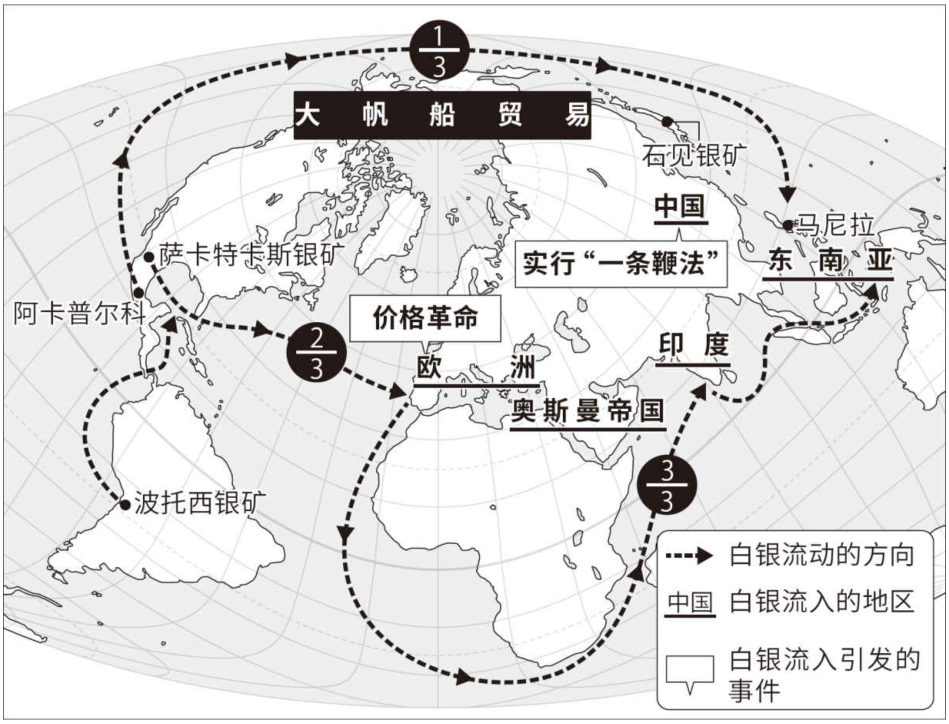
新大陆的白银解决旧大陆白银不足的问题

16世纪40年代，殖民者在今秘鲁和墨西哥相继发现大型银矿，并开采出了大量的白银。

特别是1545年，西班牙人对已经被印加帝国废弃的波托西银矿（现位于玻利维亚境内）进行了二次开采，结果令波托西一跃成为当时世界最大的银矿。在当时伊斯兰世界和中国都深受银币、铜钱不足的困扰时，新大陆大量的白银彻底拯救了亚欧大陆的货币危机，使亚欧大陆的经济重新焕发勃勃生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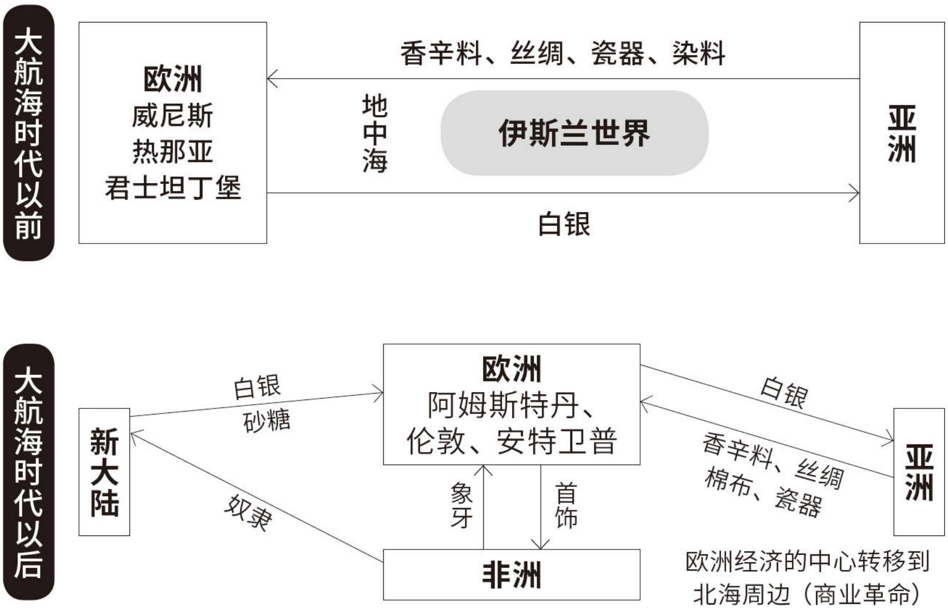
1571——1575年，波托西银矿每年出产的白银大约为41084千克，而1591——1595年，波托西银矿每年出产的白银大约为218506千克，产量跃升了4.3倍。

西班牙殖民者直接在今墨西哥建立了铸币厂，用当地出产的白银制造银币，因此西班牙银圆也被称为墨西哥银圆。其中有2/3的银币经过加勒比海和大西洋被运到位于西班牙塞维利亚的印度贸易局（因为当时哥伦布以为自己发现的新大陆是印度），其余1/3则横跨太平洋被运往菲律宾的马尼拉，用于购买中国的丝绸、瓷器等商品。



新大陆的白银从东西两面向亚洲流动

这在历史上被称为大帆船贸易。白银从东西两面被源源不断地送往亚洲。



大航海时代前后的世界贸易示意图

解读货币历史的关键10

16世纪，西班牙银元成为第一种世界货币 。

过多的白银给欧洲带来的变化

大航海时代之前，亚欧大陆深受白银不足和银价高涨的困扰。当新大陆的白银大量涌入欧洲和亚洲之后，反而因为供给过剩导致白银的价值急速下跌。这就导致事情变得复杂起来。

之前欧洲的白银大部分产自神圣罗马帝国南部，当地的年产量大约为30吨。但16世纪后半段，每年从美洲大陆涌入西班牙的白银多达200吨，而且这些白银都是利用旧印加帝国的强制劳动方式开采出来的，可以说成本非常低廉。

西班牙获得了如此多的白银，但却将绝大部分浪费在一系列的宗教战争上。因此大量的白银流入欧洲，100年间，白银的价格下跌了2/3，欧洲大陆陷入长期的通货膨胀之中。在历史上被称为“价格革命”。

随着资产价值的下跌，欧洲进入工商业者极为活跃的“通货膨胀世纪”。从15世纪开始就凭借神圣罗马帝国南部的白银来掌控欧洲金融的富格尔家族（能够与意大利的美第奇家族相媲美的大富豪）的时代宣告终结。

1453年，消灭拜占庭帝国的奥斯曼帝国曾经掌控东地中海周边的商业活动，成为连接亚洲与欧洲贸易的纽带。

但随着欧洲的经济重心从地中海转移到北海沿岸的荷兰与英国，奥斯曼帝国与意大利各城市都失去了经济优势，这在历史上被称为“商业革命”。

解读货币历史的关键11

新大陆的白银大量流入，导致欧洲爆发“价格革命”。

新大陆的白银给亚洲经济注入活力

在东亚，16世纪前半段由博多商人开发的石见银矿出产的白银（最鼎盛时期，其产量占全世界白银产量的1/3）和大量流入的新大陆白银，使当地经济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16世纪下半叶，西班牙在墨西哥的阿卡普尔科港口和菲律宾的马尼拉之间展开定期往返的大帆船贸易。新大陆白银（西班牙银元）的1/3都流入亚洲。

这些白银被换成明朝出产的丝绸制品和瓷器等，再经由新大陆送往欧洲。在大量白银流入东亚的时期，日本正是丰臣秀吉（1537——1598）统治的时代。

明朝福建地区的商人乘船经台湾海峡前往马尼拉，用丝绸和瓷器等中国特色物产换取白银。西班牙的商船带着明朝的物产顺着黑潮（日本暖流）一路北上，在三陆冲乘着偏西风抵达墨西哥的阿卡普尔科，然后再经由加勒比海横渡大西洋将货物运回欧洲。

最终，大量的白银从世界各地涌入中国。明朝民间商人的走私贸易规模越来越大，政府管理下的合法贸易反而无人问津。但对宋朝之后因货币不足导致经济发展缓慢的中国来说，白银的大量流入绝对是一件好事。

明政府从农民手中征收白银作为税赋，然后将白银卖给商人以替代铜钱，从而解决了多年来铜钱不足问题。这样就使民间的铜钱经济和税收彻底分割开来。

明朝还充分利用从新大陆流入的白银对国内体制进行了改革。

16世纪末，明朝推行的“一条鞭法”将田赋、徭役以及其他杂征汇总为一条，合并征收银两。在这之后，清朝（1644——1911）也采用名为“地丁银”的税收方法，统一征收银两和银元。

但将帝国的税收体制与世界市场的白银挂钩，也成为帝国统治的阿喀琉斯之踵。鸦片战争期间，中国大量白银外流和银价飙升，导致清政府迅速土崩瓦解。

解读货币历史的关键12

> 新大陆的白银被明政府用来调整税收制度（“一条鞭法”）。

“元”来自世界货币“西班牙银元”

西班牙在墨西哥设立铸造厂，利用当地的白银铸造银币，方便原料运输。这些银币被称为西班牙银元，但因为都是在墨西哥铸造的，所以也被称为墨西哥银元。



西班牙银元

全世界第一种世界货币

西班牙银元作为全世界最早的世界货币，在欧洲和亚洲广泛流通。

大量流入中国的西班牙银元作为称量货币（即流通时必须称量成色的货币）又被称为“银圆”“墨银”。

现在日本、中国、韩国等地的货币单位“元”，就来自当时的银元。

顺带一提，“dollar”的语源来波西米亚产的“joachimsthaler”银币（该银币自16世纪之后成为欧洲标准银），其中“thaler”为后缀，特指各类银币。

第7章　长期的英法殖民地战争促使国债与纸币诞生

鲱鱼使荷兰成为海运大国

17世纪，来自新大陆的白银数量减少了，气候状况恶劣导致粮食减产，使得欧洲大陆的经济发展陷入停滞。与此同时，宗教对立引发的战争导致的混乱局面长期持续。历史上将这一时期称为“17世纪普遍危机”。

在这一时期，西班牙殖民地尼德兰（荷兰）的新教徒团结起来，与信仰天主教的宗主国西班牙展开了长达80年的斗争，史称荷兰独立战争。

荷兰在战争期间夺取了欧洲海运的统治权。同时，荷兰在印度洋取代了葡萄牙的地位，在大西洋垄断了砂糖贸易，发展成为掌控全世界一半贸易往来的海运大国。

当时关于荷兰人的经济活动有这样的记载：“荷兰人像蜜蜂一样从各个国家汲取养分。挪威是荷兰人的森林，莱茵河、加龙河、多尔多涅河的河畔是荷兰人的葡萄园，德国、西班牙、爱尔兰是荷兰人的牧场，波斯和波兰是荷兰人的谷仓，印度和阿拉伯是荷兰人的后花园。”

不过荷兰世界贸易的基础还是在欧洲。

推动荷兰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是海运业，而造船则是其基础。1650年，荷兰的船舶有1.6万艘，船员大约有16.3万人。尽管荷兰只是一个小国，但拥有的船舶数量却是英国的四五倍。商船数量甚至比英国、西班牙、葡萄牙、德国的加起来还要多。

荷兰的造船业为什么如此发达？

原因正如日本谚语“木桶坏得越多，桶店的生意就越好”一样，每年冬天荷兰都能捕得体长约30厘米的鲱鱼，因此它们也被称作“冬天吃的鱼”。

14世纪，在波罗的海连接大西洋入口位置的狭长海峡中经常有大量鲱鱼前来产卵，汉莎同盟的德国商人大量捕捞鲱鱼后用盐腌渍，再卖到欧洲各地赚取巨额的利润。

汉莎同盟是中世纪后期以德国北部为中心垄断波罗的海沿岸地区贸易往来，控制欧洲北部经济圈的城市同盟。利用汉莎同盟成为海上武装势力的德国商人从维京人手中夺取了波罗的海贸易区，而盐渍鲱鱼正是波罗的海的代表商品。

然而好景不长，15世纪以后，鲱鱼不再到波罗的海产卵，鲱鱼渔场因此转移到了位于外洋的北海。

毗邻北海的荷兰当然不会放过这个商机。每年的1——3月，荷兰渔船都会在波涛汹涌的北海西部用流网捕捞鲱鱼。捕捞上来的鲱鱼直接在船上进行腌渍加工，然后送往欧洲各地，荷兰因此获取了巨额的利益。

耶稣曾经在荒野中断食40天，因此欧洲人在复活节前的40天里有不吃肉的习俗。除此之外，欧洲人每年还有90多天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不能吃肉。既然不能吃肉那就只好吃鱼，但河鱼的捕捞量十分有限，于是鲱鱼就成了全欧洲人民餐桌上的必备美食。

为了满足如此庞大的需求，北欧的渔民们开始在北海展开大规模的捕捞活动。1350年，渔民们开发出了在船上将鲱鱼装桶的技术，一时间鲱鱼捕捞业十分兴盛。

阿姆斯特丹商人深知鲱鱼的重要性，甚至自豪地宣称“这是建在鲱鱼骨头上的城市”。

荷兰东印度公司为什么有超高分红

实行联邦制且国力弱小的荷兰，要想在亚洲和新大陆站稳脚跟，必须让商人自己组建舰队并对殖民地进行统治。于是，荷兰给予商人许多特权，以便于他们筹集所需的巨额资金，因此“股份公司”就这样诞生了。

航海难免出现海难事故，因此出资者为了尽可能地避免因为船难导致破产的风险，只承担相当于自己出资金额的责任（即有限责任）。股份公司由承担有限责任的股东共同出资成立也是基于上述原因。

股份公司发行股票作为出资证明，任何人都可以在交易所购买这种证券，股东不仅可以获得分红，还可以等股票价值上升后卖出赚取利润。全世界第一家股份公司是1602年成立的荷兰东印度公司（简称“VOC”）。

由于当时海难事故十分常见，所以每当航海活动结束后，股份公司也宣布解散，出资者各自分钱走人。如果一直投资下去的话，最终肯定会赔本。

但对荷兰来说，必须由公司代替国家来组建海军，修建港口等基础设施，所以荷兰政府给予荷兰东印度公司从好望角到麦哲伦海峡的广阔地区进行贸易、殖民、军事行动等特权，荷兰东印度公司则需要通过给予股东高额的分红得以存续。

荷兰东印度公司为了弥补海难频发给股东带来的风险，约定每年向股东支付3.5％的利息。正所谓“高风险必有高回报”。据说荷兰东印度公司的分红在1606年高达75％。如此巨额的利润吸引来了更多的投资者，东印度公司的资本额在6年间激增了4.6倍。

1602——1696年，东印度公司给股东支付的分红都在20％以上，有时甚至超过50％。当时在荷兰商馆工作的荷兰人相当于在特别优秀企业工作的员工。

荷兰东印度公司在最鼎盛的时期（1699年）拥有战舰40艘、商船150艘、军队1万人，堪称当时世界上最大的企业。

资金过剩催生“郁金香泡沫”

当资金找不到稳定投资机会而选择投机时，就会产生泡沫。

在国土面积不大、国内经济规模也很小的荷兰，过剩的资金很难找到投资机会，于是催生出郁金香泡沫。

17世纪，地中海东部野生的郁金香被移栽到庭院之中，荷兰将其称为“宫廷之花”，颇受人们追捧。荷兰进口了大量的郁金香球根并进行品种改良，培育出了2000种以上形态各异、颜色多变的郁金香。在此过程中，稀缺品种的球根被标出较高的价格，逐渐成为投机的绝佳对象。

1634——1637年，郁金香的狂热爱好者开始进行相对买卖（买家与卖家之间的直接交易），但普通民众手中的“闲钱”也随之流入，导致泡沫开始产生。随着后来引入球根拍卖制度，郁金香的价格变得愈发离谱。

只要“倒卖”球根就能赚取巨额利润，再也没有比这更轻松的赚钱方法了。但谁也没想过价格暴跌的风险。

球根交易进一步扩大后，人们甚至开始交易“以特定价格购买球根的权利”（即期货交易），很多人甚至抵押家产以获取购买球根的本金，使得郁金香泡沫进一步变大。

一株因蚜虫寄生而突然变异且带有斑纹的“碎锦郁金香”价格高达3000荷兰盾，相当于一个富裕商人一年的收入，对平民来说简直是想都不敢想的天文数字。

1637年2月，眼见时机成熟的投机商人开始抛售，一直持续上升的郁金香价格突然开始下跌。这使普通民众产生恐慌，许多人都

跟着抛售手中的郁金香，结果导致郁金香价格瞬间暴跌至之前的1％。由于郁金香价格暴跌，买卖纠纷频发，即便荷兰政府出台了限制郁金香交易的法律也没能阻止泡沫的破灭。

郁金香泡沫崩溃后，荷兰经济陷入慢性通货紧缩中，长期利率也持续下降。结果，之前一直聚集在荷兰的资本转而流向经济成长更值得期待的新兴国家——英国。

打倒无敌舰队的是西班牙自身的财政困难

英国的都铎王朝（1485——1603）继承了维京人海上掠夺的传统，因此拥有大量“私掠船”。

所谓私掠船，指的是获得国家授权可以拥有武装的海盗船，主要在大西洋上袭击往来的西班牙商船。因此，由大型船、武器、船员、资金、销赃市场、资助人（如果被俘虏要尽全力解救）等组成的私掠船组织是能够获取巨额利润的合法海盗。

据说每艘私掠船平均能够获取3000——4000英镑的收入，其中1/5分给船长，剩余部分则被身为资助人的贵族拿走。虽然英国被称为“绅士之国”，但其统治阶级似乎对自维京人占领以来就植根于英国人心中的冒险主义情有独钟。

1588年，西班牙为了打击英国连续不断的海盗行为，集结130艘舰船、1万名船员以及1.9万名陆军士兵组成“无敌舰队”，对英国发动了多次远征，但却在1602年的多佛海峡海战中遭受重创。从此以后，大西洋的海上霸权从西班牙转移到英国手中。

被称为“日不落帝国”的西班牙的无敌舰队为什么会被当时还只是一个小国的海军击败呢？

原因有很多，比如，“无敌舰队的指挥官都是缺乏海战指挥经验的贵族”“无敌舰队以大型舰船为主，缺乏灵活性”“风向对无敌舰队不利”等，但最根本的原因在于西班牙的财政恶化，舰队得不到及时的补给。

西班牙明明有从新大陆涌入的大量白银，为什么会出现财政恶化的问题呢？原因出自以下几个方面：

1．与奥斯曼帝国的战争、荷兰独立战争、宗教战争等各种战争的军费开支导致西班牙的白银大量外流。

2．流放犹太教徒，使拥有优秀经济能力的犹太人大量迁往国外。

3．新大陆涌入的大量白银导致通货膨胀，西班牙国内产业急剧衰退。

4．每次交易都须缴纳消费税，使民众生活困苦不堪。

缺乏商业头脑的西班牙贵族不懂得如何充分利用从新大陆获得的大量白银，反而过于依赖流入的廉价白银，结果经济状况越来越糟。

西班牙国王腓力二世（1556——1598年在位）就因为财政恶化导致多次无法履行公债。16世纪末，西班牙王室的债务高达国内生产总值的2/3，完全无法负担无敌舰队的军费开销。

击败荷兰建立英国海上霸权的克伦威尔

在英西两国的海战爆发约60年后，英国克伦威尔（1599——1658）组建的清教徒铁骑军击败国王军，查理一世于1649年被处决，史称“清教徒革命”。

取得胜利的克伦威尔成为集“立法权、行政权和军事权”于一身的护国公。成为独裁者的克伦威尔为了树立威信，用武力征服了苏格兰和爱尔兰，还在加勒比海的牙买加建立了据点。

1651年，克伦威尔制订《航海法案》，这给荷兰的中转贸易造成了沉重打击。荷兰与英国进行了一系列的海战，最终英国取得胜利并从荷兰手中夺取了欧洲经济霸权。

重视经济发展的荷兰人在英荷战争之后尽可能地避免战争，转而通过投资控制了英国的经济活动。

克伦威尔死后，保守派的议会迎回了流亡国外的查理二世恢复王政。但查理二世的继承人詹姆斯二世拒绝与议会合作而且坚决要推行天主教政策，于是议会于1688年废黜了詹姆斯二世，将詹姆斯二世的女儿玛丽和她的丈夫荷兰执政（威廉三世）推举为新国王，詹姆士二世流亡国外。

教科书上将这场没有发生流血冲突的革命称为“光荣革命”，但实际上光荣革命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背景，那就是当时路易十四执掌的法国拥有强大的军事力量，并且对荷兰虎视眈眈。光荣革命意味着英国与荷兰联起手来建立了反法同盟。

当荷兰与英国建立同盟后，荷兰的犹太商人们立刻从繁荣发展的英国经济中找到了商机，纷纷前往伦敦定居，被称为“货币与金

融专家”的犹太人从此便在英国的金融界大放异彩。

光荣革命后国债在英国固定化的原因

光荣革命后的100年间，英国与法国在北美和印度展开了长期的殖民地战争（即英法第二次百年战争）。

路易十四治下的法国不仅人口是英国的3倍，还拥有欧洲最强大的陆军，但英国却最终赢得了战争，究其原因是英国拥有更加充裕的军费。

英法战争初期，英国开始出现国债。国债（national bonds、national securities）指的是17世纪末在英国发行的国家借款证明（国家发行的合约票据）。

中世纪的国王会强迫金融从业者和商人借钱给国家以充当军费，但由于国王有时候会赖账，所以商人们对借钱给国王这件事非常犹豫。但光荣革命后，国家主权从国王转移到了议会手中，国王的债务变成了国家的债务，并且议会承诺用税收来偿还债务，于是国债一下子变成了稳定的投资对象。

国债也被称为“sovereign debt”。“sovereign”本意为“至高无上的主权”，但在1648年的《威斯特伐利亚和约》后，欧洲进入主权国家时代，于是“sovereign”又转意为“王的主权”，主权转移到议会手中后，又变为“议会的主权”。国债之所以被称为“sovereign debt”，也是为了强调议会为债务偿还提供担保。

为确立了完善的国债制度，英国在战争期间凭借大量发行的国债获取了财政上的优势，从而有足够的资金增强军队实力，才得以在长期殖民地战争中战胜法国。

但国债只是国家的借款证明，一旦国家因为某些原因无法偿还就会变成废纸。而且，国债如果数额巨大也很难找到买家，所以政府为了筹集资金也想尽了一切办法，比如发行年金型的国债等。

解读货币历史的关键13

> 光荣革命后，国债在英国固定下来。

民间性质的英格兰银行为什么能够发行纸币

英格兰银行是1694年由苏格兰商人威廉·彼得森提议成立的，是直接向政府借贷战争资金的商业银行。

这种银行诞生的理由非常简单，因为发行国债是筹集巨额军费的唯一途径，而商人们则充分地利用了这一点。

英格兰银行最初的股东有1268人，而据说提议者威廉·彼得森早前是一名“加勒比海盗”。

光荣革命后登上王位的荷兰人威廉三世需要大量的军费来应付与法国之间的战争，作为以低利息从英格兰银行获取军费的代价，英国政府授予英格兰银行发行无记名盖印票据（银行券）的权利。

也就是说，由民间商人成立的英格兰银行，拥有发行代替金币票据的权利。通俗地说，就是可以发行纸质货币。

英格兰银行的“无记名票据”实际上就是英国纸币的原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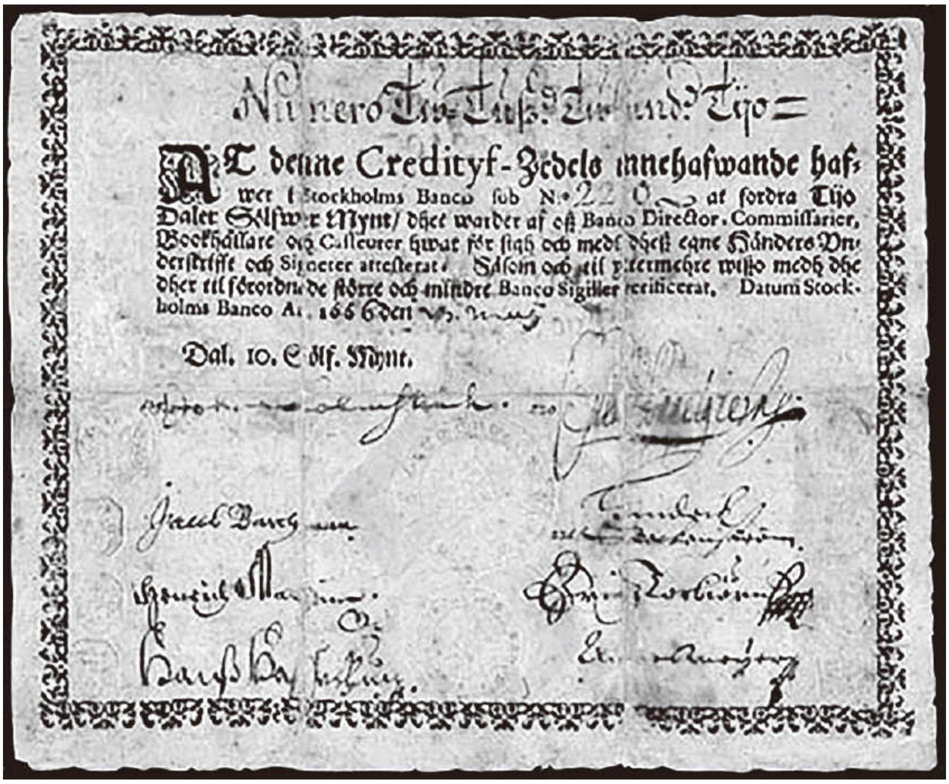
最初，纸质货币的发行是有期限的，但随着英法第二次百年战争的不断持续，发行期限也不断延长，于是纸质货币逐渐在英国社会中固定流通。

英格兰银行通过促进纸币流通（贷款）在民间赚取利息，部分纸币以购买国债的形式为政府提供资金。英国政府将财务几乎全权委托给了英格兰银行处理，商人们通过发行纸币赚取了巨额财富。

最初，“无记名票据”是犹太人在财产经常遭到没收的时代为保护私有财产而开出的票据。

只要票据上没有名头，那就无法确定这是谁的财产。英格兰银行以这种“无记名票据”为原型发行盖印票据，将其发展为纸币（银行券）。

为了避免伪造，初期的英镑纸币只有高额纸币，尺寸也很大，与票据十分相似，它以票据为原型，因此最初的纸币是有“利息”的。



银行券

英格兰银行承诺可以用银行券无条件交换（兑换）其金库中保管的金币，这也成为纸质货币“信用”的源泉。

解读货币历史的关键14

> 17世纪末，英格兰银行获得英镑纸币 的发行权。

法国和美国的民间商人也开始发行纸币

像英格兰银行这样垄断纸币发行权的银行被称为中央银行。

在英格兰银行成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它都以民间银行的身份发行纸币，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才被收归国有。大概此时，人们才终于认识到“货币具有公共性”。

在19世纪，英国作为全世界最强大的帝国，竟然允许民间商人发行纸币，现在看来或许有些不可思议，但实际上法国的中央银行和美国的联邦储备银行（FRB）都是民间银行，也有发行货币的权利。

由特定商人（银行家）发行货币，国家保证货币流通力的这一做法在历史上也持续了很长时间。

牛顿提出的金本位制成为欧洲的货币体制基准

17世纪末，欧洲大陆受亚洲经济的影响，银价持续上涨，而英国的银价则相对便宜，于是英国商人开始私自将银币熔炼成银块，然后卖到欧洲大陆以赚取利润。1690年，在短短半年的时间里，英国过去5年铸造银币的1/10以上都被熔炼成银块流到国外。

1696年，科学家牛顿（1642——1727）在财政大臣查尔斯·蒙塔古的推荐下出任位于伦敦塔内的皇家铸币局的监管。身为皇家铸币局的监管，除了领固定薪水之外，每当发行金币和银币时还能从货币铸造税中捞点油水，可以说是一个肥差。

牛顿后来升为皇家铸币局的局长，并提出以黄金为基准的全新货币体制，这也成为英国执行金本位制度的契机。

1717年，牛顿向财政部提出以下三点：

1．中国和印度的金价非常便宜，与银价不均衡，这导致欧洲的银价上涨，英国国内的银块流出。

2．廉价黄金的产地不在欧洲而在新大陆。

3．可以通过纸币弥补硬币缺口，但必须提高纸币的“信用”。

当时英国同时流通两种货币，一种是1662年之后的高质量机械制银币，另一种是一直流通的旧银币。但高质量的机械制银币由于含银量较高，因此被大量熔炼后卖到了欧洲大陆，导致英国只剩下低质量的旧银币。

于是，牛顿将目光转向了新大陆的廉价黄金。1717年，牛顿将之前种类繁多的金币都统一起来，开始铸造21先令的几尼金币（因使用几内亚产的黄金铸造而得名）。

牛顿希望以几尼金币为基准小幅下调黄金价格，将黄金与白银的兑换比率设定为1：15.21，这一比率被称为“牛顿比率”。

但这一举措并没能降低白银的价格，因此熔炼银币的做法仍在持续，银币在英国越来越少。但客观上这一结果却使金币成为英国的主要货币，银币成为辅助货币。

牛顿设定的金银兑换比率很快就成为整个欧洲的金银兑换基准。几尼金币作为基准金币流通了100多年，直到1817年被价值刚好相当于1英镑的沙弗林金币取代。

由于英国并没有禁止熔炼金币，因此7.32克含金量的沙弗林金币就成为英镑的均价，而其在随后的100年间一直霸占着全世界基准货币的宝座。

解读货币历史的关键15

18世纪初，身为铸币局局长的著名科学家牛顿奠定了金本位制的基础。

尝试将不兑换纸币与国债挂钩的约翰·劳

对发行国债的政府来说，最大的问题是寻找买家。商人们则抓住了政府这一需求蜂拥而至企图从中牟利。法国与英国相继出现的泡沫崩溃事件都与国债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18世纪初期，法国以密西西比公司的股票作为担保尝试发行纸币。密西西比公司是对法国在密西西比河流域（现美国的路易斯安纳）的新殖民地进行开发的公司，其经营者是苏格兰金匠的儿子，主张通过发行纸币来扩充财政的是约翰·劳（1671——1729）。

约翰·劳23岁时因为在决斗中杀死了情敌而被判处死刑，后在朋友的帮助下逃脱了。他逃到阿姆斯特丹学习金融技术，又回到苏格兰出版发行了关于货币与商业的著作。受英格兰银行发行纸币的启发，他认为这一制度还有拓展的空间。

当时，法国陷入与英国的长期战争深受军费不足的困扰，于是劳决定在法国发行不兑换纸币。他认为只要成立国有银行发行不兑换纸币就能使经济状况得到好转，还能获得巨额的发行利润，他坚信“只要保证信用和购买力，那么纸币和金银没有任何区别”。

为了实现这一目标，劳主动接近法国当权者，并成功获取了奥尔良公爵的信任。1716年，劳成立了拥有纸币发行权的私有银行——“通用银行”，继而开始发行不兑换纸币。此时距离英格兰银行成立大约过了20年。

通用银行在1718年变为国有银行，并更名为“皇家银行”，银行发行的纸币里弗尔成为法国的流通货币。波旁王朝下令所有的税收都要通过里弗尔纸币缴收，这极大地促进了不兑换纸币的流通，法国的经济也因此得到了好转。

但里弗尔纸币是不兑换纸币，所以本身没有任何价值。于是劳打算用特许公司（由王室授予特许经营权，垄断贸易和生产的公司）的股票来保证不兑换纸币的价值，并且在1717年获得了特许公司密西西比公司的经营权。

密西西比公司拥有对路易斯安纳地区的开发和贸易的垄断经营权。路易斯安纳这个名字来自路易十四，当时北起加拿大、南至墨西哥湾的密西西比河流域广阔的未开垦土地都是路易斯安纳地区的“经济空间”。

劳操控密西西比公司从自己的银行借贷不兑换纸币购买贵族手中的国债，贵族则用不兑换纸币购买密西西比公司的股票。

当时，法国国债在市场上的交易价格远远低于其票面价格，但将不兑换纸币作为中介，贵族们就相当于用国债的票面价格购买了密西西比公司的股票。而不兑换纸币和国债都通过密西西比公司的股票得到了价值保证。

要使不兑换纸币与国债之间形成良性循环，密西西比公司的股票必须保持升值。为了增加公司的收益，劳不仅从国家获得了烟草贸易的垄断权，还向路易斯安纳送去了许多殖民者和奴隶。位于密西西比河入海口的新奥尔良就是当时法国人为了有个落脚点而修建的城市。

劳想尽一切办法抬升股价，比如增加公司的贸易特权、给予股东高额分红、股票分割回购、对现有股东贴现发行股票等。对波旁王朝来说，能够帮助其偿还国债的密西西比公司简直是天降的救星，因此赋予了其诸多特权。

有了法国王室做后盾，密西西比公司的股票大受欢迎，不仅法国国内，以英国、荷兰为首的欧洲各国都竞相购买密西西比公司的

股票。仅1719年，密西西比公司的股价就上涨了18倍。

当时密西西比公司的股票一票难求，泡沫也随之产生。原本1000里弗尔的股价被炒到1万里弗尔以上，凡是购买密西西比公司股票的人全都赚了大钱。据说“millionaire”（百万富翁）这个词就是在当时产生的。

劳的能力得到法国王室的认可，被任命为国家财政长官，但泡沫总有崩溃的一天。

1720年5月，人们对无法继续取得收益的密西西比公司的股票热度骤降，股价暴跌。同时，由密西西比公司的高额股价做“信用”担保的皇家银行纸币也变成了废纸。法国经济出现了巨大危机，甚至有人认为这是后来法国大革命的导火索。

失去财富和地位的劳逃到意大利，最终在威尼斯去世。第二年，密西西比公司的股票全部作废，法国发行不兑换纸币以失败告终。

南海泡沫事件也因国债而起

密西西比公司的泡沫崩溃后，紧接着就出现了英国的南海泡沫事件。

成立于1711年的南海公司向英国政府提出，可以用发行股票获得的资金购买国债。当时英国政府因卷入西班牙继承战争（1701——1713）而在财政支出上承担了巨大压力，南海公司主动提出购买国债对政府来说简直是雪中送炭。

对南海公司来说，这样做当然也有利可图。南海公司是在拉丁美洲从事殖民地经营的公司，但当时拉丁美洲大多是西班牙的殖民地，想在西班牙的统治下赚取利益十分困难。

于是南海公司打算将国债变为公司股票，通过发行股票来赚取利润。1720年，南海公司发行了与其从政府购买的国债等额的股票，从中赚取了巨额的收益。

为了大量购入国债，南海公司必须尽可能抬高公司股价并将其卖出，以确保有足够的资金购买国债。于是南海公司通过给首相和财务大臣赠送股票的购买权（股票期权），换取了自由决定新发行股票价格的权利。

当议会通过“南海公司有权自由决定股票价格”的决议后，南海公司便开始大肆宣传英国将通过战争获得在西班牙殖民地进行奴隶贸易的权利，以此来推高股价。这一传言迅速传开，泡沫由此产生，南海公司的股票价格在短短半年里上涨了10倍。

南海公司的股票价格与国债的票面价格之间差额越大，南海公司的收益就越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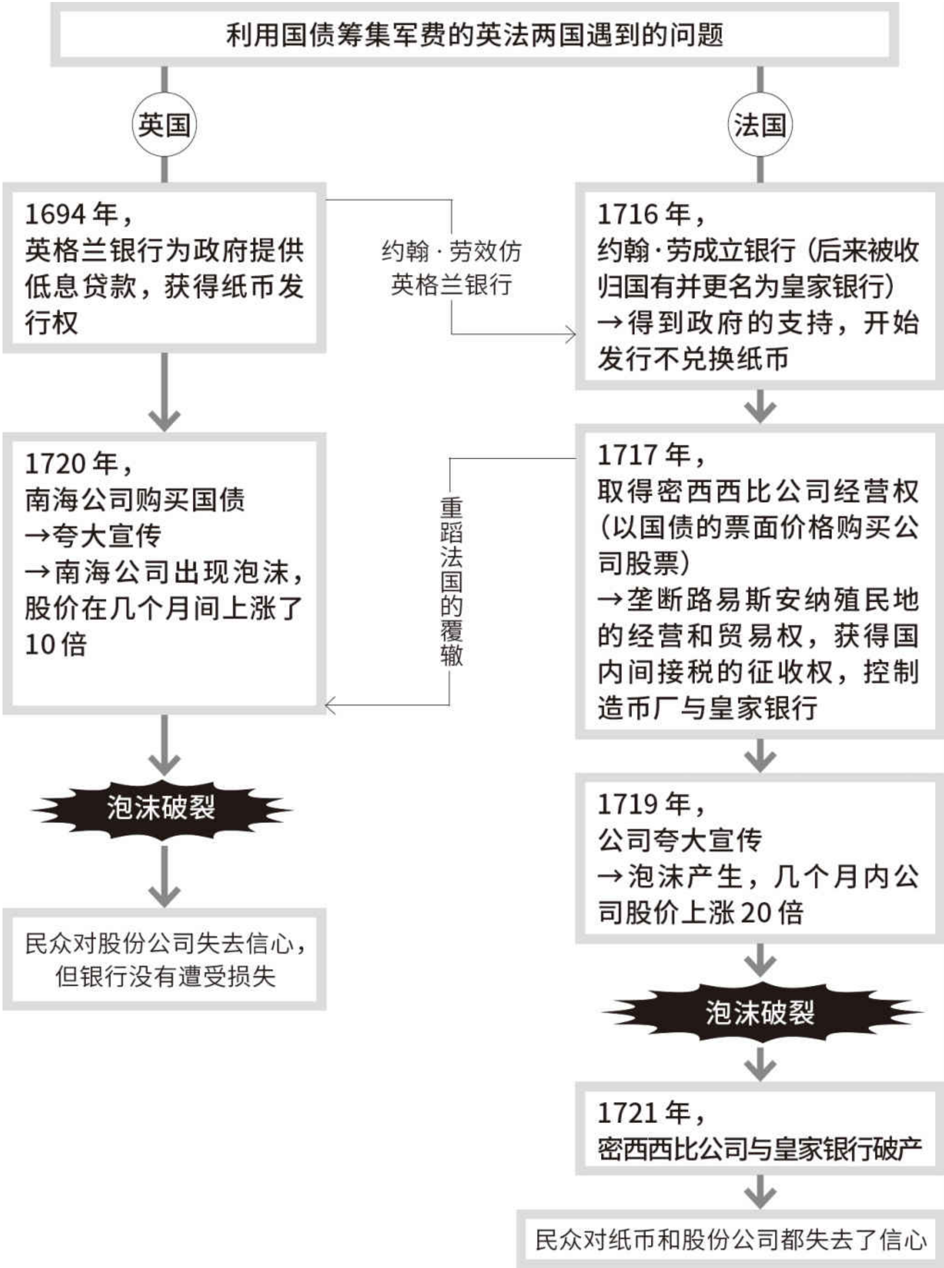
由于南海公司的股票得到投资者的追捧，出现了一票难求的情况，于是许多投机者抓住这千载难逢的好机会相继成立公司，每家公司的股价都迅速飙升，毫无根据的乐观期待催生出了前所未有的巨大泡沫。

但战争结束后，西班牙仍然牢牢占据着在拉丁美洲的贸易垄断地位，英国的奴隶交易也没能像预期的一样发展，南海公司的宣传被证明全都是谎言。

民众对南海公司股票的热情骤降，其股价在短短2个月内暴跌了4/5，许多投资者血本无归，这就是著名的南海泡沫事件。

就连当时身为铸币局局长的牛顿都没能幸免，据说他在早期的暴涨阶段小赚了一笔，但后来又大量购入南海公司的股票，结果损失了2万英镑。牛顿还因此感叹道："我能算准天体的运行，却无法预测人类的疯狂。"

而拥有优秀直觉的音乐家亨德尔则赚了个盆满钵满。



英法两国发生的泡沫破裂事件

第8章　从银币到纸币的时代与英国的货币改革

爆发于酒吧中的美国独立战争

18世纪末到19世纪初，新大陆与欧洲各国都接连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而引发这一切的则是美国的独立战争。

大航海时代之后，欧洲通过移民和战争在新大陆建立起殖民地。16——17世纪，西班牙与葡萄牙征服了中、南美洲。17世纪末后，英国和法国围绕北美的统治权展开了长达半个多世纪的殖民地争夺战，最终英国在与法国的七年战争（1756——1763）中获得胜利，确立了自身在北美的统治权。

但赢得七年战争仅仅只是一个开始。

英国之所以能够战胜人口是其3倍的法国，完全是因为凭借国债顺利地筹集到了足够的军费。但英国也因此积累了大量的赤字，总额高达1.3亿英镑。当得知要维持对北美新殖民地的统治，必须时刻保持1万人以上的军队之后，英国顿时坐立不安，寻找新的财源迫在眉睫。

于是英国决定对殖民地采取高压政策并且增加税金。当时英国执行的并非所得税体制，而是印花税与商品税。

但对殖民地的人来说，在遥远大洋彼岸的英国突然要求自己缴纳税金，是完全不可接受的事。于是聚集在酒吧里的当地民众群情激愤地展开了反抗运动，这也成了引发大变革的导火索。

美国独立战争的重要领袖之一本杰明·富兰克林曾经说过，“在费城，每25个居民就有一个酒吧”，事实上，殖民地的酒吧密

度远超英国本土。引领殖民地民众走向独立战争的历史事件——激进派组成“自由之子”、波士顿倾茶事件、列克星敦之战——都是在酒吧里制订计划的。

独立战争是错综复杂的奇妙战争。殖民地方面有1/3人口是主张独立的爱国者，还有1/10人口是主张服从英国的效忠派，剩下一多半人都是对独立与否漠不关心的普通民众。

在英国的统治下，殖民地连一颗钉子都要从英国进口，所以不管是武器还是弹药都不充足，几乎毫无战斗力。即便如此，殖民地的民众仍然决定为独立而战，多半是因为在酒吧喝醉了后的一时冲动。但很多事情就是这样，不去尝试一下永远也不知道行不行。

当殖民地开始反抗英国的时候，有人认为这是一个挽回势力的绝佳机会，这个人就是在与英国的战争中失败的路易十六。尽管法国和英国一样因长期战争使得财政捉襟见肘，但还是为殖民地提供武器援助甚至派遣军队。

有人说美国的独立全靠“印有波旁王朝百合纹章的枪”，在法国开始行动之后，与英国存在长期矛盾的荷兰和西班牙等国也闻风而动，纷纷前来支援美国独立。从这个角度来说，法国为了报仇雪恨而支持的美国独立战争，也可以看作是将欧洲诸国卷进来的大西洋战争。

环大西洋世界的近代化

欧洲人并没有意识到，战争在削弱欧洲各国影响力的同时，也将美洲殖民地的统治权转移到了移民后代的手中。

因此，在独立战争之后，南北美洲和欧洲各国都面临着一系列的连锁反应。大西洋世界接连出现的变化，可以分为4个阶段：

1．美国独立战争（1776——1783）；

2．法国大革命（1789——1799）；

3．拿破仑战争（1803——1815）；

4．拉丁美洲各国独立（1810——1820）。

这一系列的变革被统称为环大西洋革命。移民者取代欧洲各国获得了新大陆的统治权，欧洲以国王和贵族为中心的封建社会土崩瓦解，取而代之的是以议会为中心的民主国家。



环大西洋革命

法国大革命以通货膨胀开始，以更严重的通货膨胀结束

法国波旁王朝在与英国进行对抗的同时，还不顾自身的财政困难为美国提供军事援助。在美国获得独立的6年后，法国的财政终于支撑不住了。

不巧的是，当时还赶上了自然灾害导致庄稼歉收，1789年面包的价格上涨了70%，民不聊生。

诸事不顺的波旁王朝只好开始向拥有不纳税特权的贵族征收税金，但贵族们不可能放弃既得利益，这些目光短浅的贵族甚至将国家的危难当作是恢复自身势力的良机，要求召开三级会议。

所谓三级会议，指的是由三个等级的代表——第一等级为神职人员、第二等级为贵族、第三等级为平民——对重要议题进行讨论的等级制议会。

但三级会议召开后，第三等级对特权阶级的不满集中爆发，并宣布成立国民议会，要求制定宪法。

1789年，巴黎市民攻占了象征封建王权的巴士底狱，法国大革命爆发。在革命初期掌握主导权的国民议会之中，有一个组织义勇军参加过美国独立战争的贵族名叫拉法耶特，他以美国的《独立宣言》为蓝本，起草了《人权宣言》。

法国历史悠久，社会结构十分复杂，因此革命过程就像诸多文学作品中描述的那样充满了戏剧性。1793年，路易十六被送上了断头台，1795年，督政府的成立宣告革命过程结束。法国成为资产阶级统治的民主国家。

但法国大革命最初的导火索是政府的财政困难。1789年，革命政府为了应对财政难题，以收归国有的教会土地和财产作为担保发行了“指券”（5%利息的债券）。



法国大革命时期督政府发行带利息的债券——指券

指券原本只是一种以教会财产作为担保的期票，但在革命期间发行量不断增加，实际上已经变成了纸币。

由于督政府发行了大量的指券，在1795年引发了全世界第一次超级通货膨胀。最终指券只拥有票面价值的千分之三，成为完完全全的废纸，第二年便彻底被停止了发行。

督政府企图用国有土地交换指券来抑制通货膨胀，但拿破仑通过武装政变夺取政权后停止了对指券的回收。最终，指券使许多法国民众的生活陷入困境。

利用拿破仑战争拉开“金融时代”序幕的罗斯柴尔德家族

法国大革命后，利用征兵制组建起庞大军队的拿破仑，不但通过一系列战争，即拿破仑战争（1803——1815）守住了革命成果，还打败了欧洲各国联军，成为欧洲大陆的霸主。拿破仑战争使欧洲各国都需要筹集巨额军费，欧洲迎来了“金融时代”。

1806年，控制了欧洲大陆的拿破仑下令封锁欧洲大陆，全面禁止欧洲大陆各国与英国的贸易往来。正式向提倡自由贸易，并控制整个欧洲商业活动的“海洋帝国”英国发起挑战。

但身为农业国的法国并没能取代英国的商业实力，也没有英国那么多的殖民地，因此封锁令遭到俄国等农业国家的反对，并以失败告终。同时，远征莫斯科的失败使拿破仑的实力迅速衰弱，英国的经济霸权却没有出现丝毫的动摇。

但拿破仑时代使整个欧洲都变成了战场，军费的消耗呈现史无前例的增长。这使那些能够筹集到巨额军费的金融从业者拥有了影响国家的力量。

当时欧洲最大的金融从业者，就是利用拿破仑战争获取了巨额财富的罗斯柴尔德家族。这群来自法兰克福的犹太人充分利用信息网络和操控货币的技术在金融界崭露头角。

获得英国国籍的内森·罗斯柴尔德利用飞鸽传书率先得知拿破仑在滑铁卢惨败的消息，于是他故意在证券交易所大量抛售英国的年金型国债，使其价格暴跌，然后又在最低价的时候买了回来，赚取了巨额的利润，这就是著名的“内森卖空”。

这场导致拿破仑彻底失败的战争，却为罗斯柴尔德家族带来了之后足以掌控英国经济的巨额资金。

内森的成功，宣告欧洲从此进入金融时代，进入只要能够准确地把握政治局势就能赚取巨额利润的时代。罗斯柴尔德家族在法兰克福、巴黎、维也纳、那不勒斯都成立了银行，成为支撑维也纳体制的“欧洲银行”。这也是金融从业者取代贵族和军人，与政治家一起掌控权力的时代开端。

解读货币历史的关键16

以拿破仑战争为契机，欧洲进入“金融时代”。

英国如何提高英镑纸币的信用度使其成为流通货币

自1689年以来，英国与法国断断续续地进行了100余年的战争。因此，在17世纪末，英国只有1670万英镑的国债发行额，到了美国独立战争结束后的1783年就暴涨了14.7倍，变成2.45亿英镑，英国政府光是支付国债的利息就要拿出全年税收的40％，这导致其财政状况不断恶化。

在此情况下，英国又在1803年卷入了拿破仑战争，使财政一度面临崩溃的边缘，民众对英格兰银行发行的纸币也愈发缺乏信赖。

如果英国被拿破仑的军队击败，那么英国财政必将陷入危机，国债和纸币都会失去价值。充满不安的国民为了将手中的纸币换成金币纷纷涌向英格兰银行。

时任英国首相的小威廉·皮特下令暂停英镑纸币的兑换。因为如果不阻止金币从英格兰银行外流，英国就无法继续进行战争。

拿破仑战争结束后，皮特成立了“讨论重新开始纸币兑换方针的秘密委员会”，研究如何重新开始兑换纸币。

1816年，英国制定了货币法，开始铸造信用度更高的沙弗林金币。沙弗林金币的出现稳定了英国的金本位制度。因此，能够兑换金币的英镑纸币的信用一下子得到了提高。

直到1917年，沙弗林金币都维持着7.32克的含金量，为英镑纸币的价值提供了担保。当时的英国政府和英格兰银行都小心谨慎地维持着纸币的信用。

1821年5月，英格兰银行发行的纸币可以随时兑换沙弗林金币，而且英国政府对将金币熔炼成金块没有限制。英镑纸币开始与黄金画上了等号，并凭借极高的信用度在社会中固定下来。

身为英国中央银行的英格兰银行，储存了与纸币发行量等额的黄金，确保纸币能够随时与黄金进行兑换。结果，货币的材质从银币变成更便于制造的纸币。英国巧妙地利用极高信用度的英镑纸币，将世界经济命脉掌握在自己手中。

英镑纸币也遭遇过危机。1825年的伦敦金融危机波及了英格兰银行。许多人到英格兰银行要求将英镑纸币兑换成黄金。

这时，罗斯柴尔德家族的内森凭借家族遍及欧洲的金融网络筹集了大量的黄金，满足所有人的兑换需求，在保住英镑信用的同时也将英格兰银行从危机中拯救了出来。

罗斯柴尔德家族在英格兰银行拥有强大的影响力。英国的军费和财政经费都来自英格兰银行发行的英镑，因此，掌控货币发行权的罗斯柴尔德家族就相当于控制了权力中枢。

1833年，英格兰银行的银行券成为法定货币，这样一来，民众就不能拒收英格兰银行的银行券。

1844年，时任首相罗伯特·皮尔授予英格兰银行只能发行相应于其金储量的纸币的权限，曾经的民间银行变成了拥有英镑纸币独家发行权的中央银行，英格兰银行也成为后来各国中央银行的范本。

解读货币历史的关键17

19世纪中期，英格兰银行获得英镑纸币 的独家发行权，成为中央银行。

打破银本位制！英国的豪赌

对于19世纪的英国来说，如何战胜亚洲的白银经济是最重要的议题。由于银币存量极少，英国只能想尽一切办法让金本位制在全球范围内取代银本位制，让英镑变成世界货币。

19世纪上半叶一直是“金银双本位制”的金币与银币共存的时代，但白银经济在世界范围内具有压倒性的优势。由于新大陆开采的白银有很大一部分流入了中国和印度，英国在亚洲的贸易一直被白银不足困扰。

英国以巴西的黄金（18世纪巴西的黄金产量占全球产量的八成，出货港为里约热内卢）为突破口，试图将全世界的货币体系转变为“金本位制”。如果英国的计划取得成功，那么只要开动印刷机源源不断地生产出英镑纸币就将取代亚洲的白银。

然而这个计划存在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那就是英国没有足够的黄金储备为英镑纸币提供价值担保。当时谁也不知道全世界黄金的总量有多少，所以只要英国装出拥有足够储备的样子就可以了。

顺带一提，全世界开采出的黄金总量大约为183600吨（截至2014年），总体积相当于奥运会游泳池（50米× 25米× 1.8米）的4倍左右，而美国地质勘探所推测的黄金埋藏量只有56000吨。也就是说，世界上根本没有足够兑换英镑纸币的黄金。

英国必须想办法让别人相信有充足的黄金储备。

在加利福尼亚、澳大利亚、加拿大以及阿拉斯加相继出现的淘金热对英国来说简直是天赐良机。英格兰银行利用淘金热所催生出

的“黄金梦”进行了一场豪赌，并且成功地使英镑成为世界货币，进而控制了世界经济。

金本位制的普及与纸币时代的开始

19世纪下半叶，各地的银矿都得到了开发，冶炼方法也大幅提高。因此白银价格逐渐下跌，银币逐渐从主要货币沦落为辅助货币。最能够说明“银币地位下降”的就是英国的邻国——法国。

当时巴黎是欧洲最大的白银市场，拿破仑三世（1852——1870年在位）于1867年召集欧洲主要国家的代表举办了世界上第一次国际货币会议。

拿破仑三世在会议上提出，将法国法郎 作为欧洲的基准货币，并组建拉丁货币联盟对欧洲各国的货币提供支持。会议还提出将金银的比价固定为1∶ 15.5，“让白银重新成为流通货币”，“各国货币以固定汇率进行兑换”。但这些提案并没有得到其他国家的认可。

在北美洲，1889年召开的泛美会议提出发行以美元和墨西哥比索为基准货币的美洲银元。将银币作为美洲大陆各国的通用货币。

同年，美国共和党制定了联邦政府有义务收购国内生产的所有白银并铸造银币的“谢尔曼收购白银法”。共和党计划创建一个以纽约为中心的银币经济区与伦敦的黄金经济区相抗衡。

1893年，美国的经济状况不断恶化，民主党总统克利夫兰以银币会催生金融混乱为由废止了“谢尔曼收购白银法”，这导致白银价格暴跌，“美洲银元”的计划宣告失败。

后来“金本位制是东部与外国资本勾结提出的阴谋”的声音在美国中西部的农业地区愈发强烈，1896年的总统选举中，金本位制也成为两党争论的焦点。

共和党候选人麦金莱主张保留金本位制，民主党候选人布莱恩则以防止通货紧缩为由主张采取金银复本位制。最终共和党在大选中以微弱优势取胜，美国的金本位制得以保留。

另一边，英国在19世纪凭借强大的海军、信息收集能力以及金融能力称霸全世界。尽管只是一个小小的岛国，英国却控制着全世界1/4的人口与土地。“出口世界贸易的主要商品棉织品”“发行基准货币英镑”“拥有世界规模的贸易结算网”“国内的资金筹集体制完善”，这一切都是英国强大实力的证明。

19世纪下半叶，英国凭借能够大量印刷的英镑纸币成为控制全世界经济的金融帝国。于是有越来越多的国家认为“与英镑挂钩对自身有好处”。

与白银相比，黄金的产量更为稀少，因此在金本位制下必须大规模使用纸币。也就是说，金本位制的普及也意味着纸币时代的开始。

1871年，在普法战争中获胜的德国宣布发行能与金币兑换的马克纸币，有金本位制和金币做后盾的纸币顿时成为经济的宠儿。

美国和日本也分别在1873和1897年采用金本位制，开始发行纸币。日本凭借在中日甲午战争（1894——1895）中获得的巨额赔款确立了金本位制。1897年，日本在伦敦金融市场将获得的赔款全部换成黄金，取得了大约278吨的黄金储备。

就这样，金本位制从英国逐渐普及到全世界，世界各国实际上都导入了这种保证本国货币与黄金进行无限制兑换的体制。但国际上对此并没有明文规定。

解读货币历史的关键18

1870年以后，保证本国货币与黄金进行无限制兑换的国家越来越多，银币时代被金本位制下的纸币时代取代。

英国的货币符号“￡”还残留着银本位制的影子

英国在全世界的海外股票投资中占有43％的份额（1914年），利用这一优势，它巧妙地将亚洲的白银经济转变为以黄金为基础的纸币经济。这也意味着亚洲的金融体系被以英国为中心的欧洲金融体系取代。

顺带一提，英国的货币单位英镑“pound”全称是“pound sterling”。“pound”来自古罗马用来称量宝石和贵金属重量的单位“Libra”。“sterling”在古英语中的意思是“星星上的东西”。也有为金雀花王朝（1154——1399）铸造银币的斯特林家的纹章的意思。

由此可见，在中世纪英国采用银本位制，斯特林家效仿古代罗马1磅白银制造240个银币的方法铸币。因此英镑的货币符号“￡”就来自“Libra”的“L”。

以大萧条为契机，从世界工厂变为世界银行

经济总是在景气与不景气之间循环，一般来说，景气时的波峰越高，不景气时的波谷就越深。

1873——1896年，以维也纳证券交易所的股票价格暴跌为开端的经济危机很快就席卷了整个欧洲和美国。这场被后世称为“大萧条”（Great Depression）的经济危机持续了整整23年，其间物价下跌了30％以上。

工业化带来的过量生产以及殖民地体制带来的廉价农作物成为欧洲“大萧条”的主要原因。19世纪80年代，英国食品的进口额占全部进口的45％，国内地主阶级迅速衰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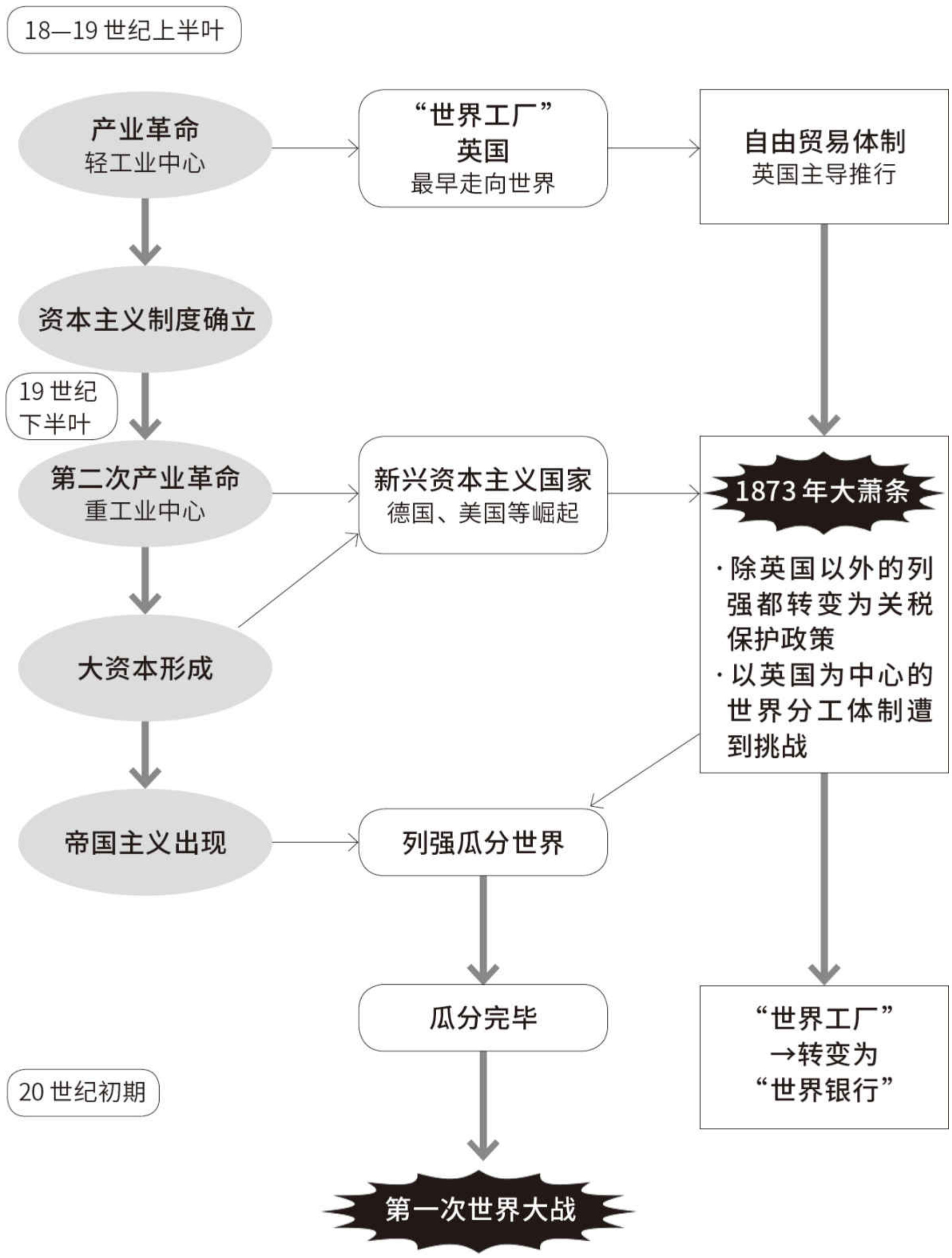
在不景气长期持续的时期还出现了第二次工业革命。电力及内燃机相继登场，铸铁变为钢铁，需要庞大设备投资的重工业成为产业的中心，英国失去了“世界工厂”的地位。

迫于殖民地要求实行自由贸易的巨大压力，英国失去了欧洲与北美的工业制品市场，只能集中精力扩大亚洲的“经济空间”，大量向印度、中东以及中国出口棉织品及消费品。

英国使用英镑进行贸易结算，并在19世纪末逐渐形成了以英镑在世界范围内流通的多元结算体制。英国摇身一变成为依靠利息和分红获利的“世界银行”，伦敦成为世界金融服务的中心。

英国对美国、澳大利亚、加拿大、印度、阿根廷等国的证券投资激增，1875年的投资额约为10亿英镑，20世纪初期增加到约30亿英镑。

英国利用在世界各地投资获得的利息和分红收入，以及与印度、东亚各国和奥斯曼帝国之间的贸易黑字来弥补在欧洲和美国的贸易赤字，维持着国际收支平衡。这样一来，伦敦就变成了世界经济的中心，实现了金钱与物资之间的良性流动。



英国从“世界工厂”变为“世界银行”

因黄金爆发的布尔战争

1884年，位于非洲南部的德兰士瓦共和国的威特沃特斯兰德发现了规模巨大的金矿。一直隐瞒黄金不足的事实以维持金本位制的英国顿时对此虎视眈眈。

德兰士瓦共和国马上将这片地区收归国有，对蜂拥而至的英国开采者采取分区授予开采权的租借制度。但1889年，该地区又在地表附近发现了蕴藏更加丰富的黄金矿脉，南非一下子成了全世界最大的黄金产地。

为了巩固金本位制，夺取南非黄金。英国不顾其他国家的强烈反对，悍然对布尔人的德兰士瓦共和国和奥兰治自由邦发动了侵略战争，史称第二次布尔战争（1899——1902）。

英国利用国债筹集了巨额军费，组织共计45万人的大军对抵抗的布尔人进行了惨无人道的毁灭式攻击，强行将两国吞并。

被鸦片击溃的清朝白银经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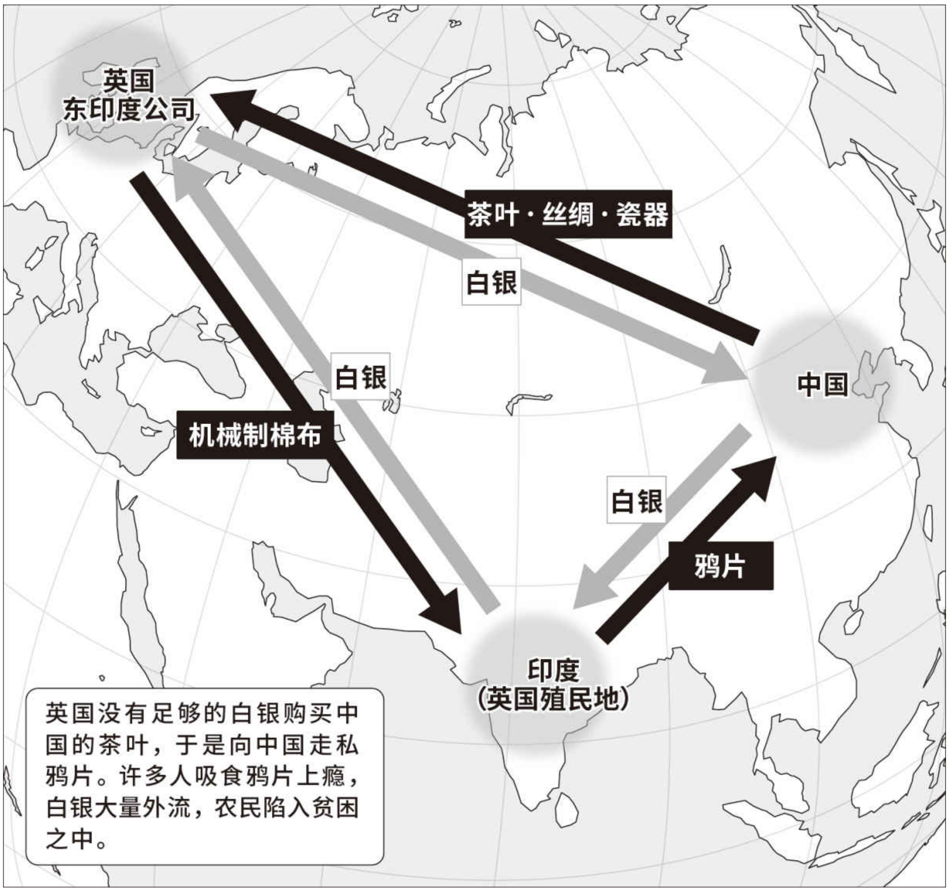
将铜钱作为流通货币的中国在明、清两朝获得了大量从新大陆流入的白银，明、清政府重整了税制，农民将粮食卖掉换取白银，然后缴纳白银与银元作为税赋，白银成为帝国统治的根基。

但英国和美国商人暗中从事的鸦片贸易却动摇了这一根基。大量白银因为购买鸦片而外流，导致白银价格上涨，农民陷入贫困之中。作为统治根基的白银，其价格不受控制的上涨，意味着清政府开始走向衰亡。

当时清政府只开放了广州作为对外贸易的港口。而对清朝茶叶有极大需求的英国几乎垄断了广州的所有贸易活动。

英国在工业革命之后对红茶的需求量激增，因此非常依赖从清朝进口的茶叶。

但英国却没有足够的白银来从清朝商人手中购买茶叶，英国国内市场甚至出现红茶断货的情况，成为非常严重的问题。



导致两次鸦片战争的三角贸易

于是，英国将在印度种植的鸦片伪装成药品走私到中国进行销售。

当时，中国国内有大约200万人吸食鸦片成瘾，大量白银从中国流向英国，结果中国国内白银价格迅速升高。

由于白银价格在短时间内飙升，农民需要交纳的税金一下子上涨了两倍，中国的农业社会开始崩溃。与农民八竿子打不着的地方发生的经济变化，却对农民造成了巨大的伤害。

清政府决定强令禁止鸦片流入，英国趁机发动了鸦片战争。战败的清政府不但支付了巨额赔款，还被迫割让香港岛给英国。从

此，英国在中国的鸦片贸易合法化，中国的白银继续大量流出，白银价格居高不下。

这一结果所导致中国国内矛盾激化，进而引发了太平天国运动，英国与法国又借此机会发动了第二次鸦片战争，将中国卷入以欧洲为中心的国际秩序之中。

后来，英国将在印度阿萨姆邦发现的茶叶命名为“帝国茶”（Imperial Tea），在印度和锡兰（斯里兰卡）的种植园里广泛种植。闭关锁国的中国经济就这样被英国的鸦片彻底摧毁。

第9章　新兴国美国的中央银行诞生

7000多种纸币和713家银行

20世纪下半叶开始，美国成为世界经济的领导者，这是众所周知的事实。在本章中，将专门介绍美国在新大陆建立经济中心及其取代英国的过程。

美国独立后，联邦政府为了加强自身权力，开始着手解决货币问题。

美国的第一任财政部长汉密尔顿认为，要想摆脱农业殖民地的状态，必须大力发展工业建设。于是，美国在1789年制定关税法，对80种以上的进口商品征收关税，并且在第二年开始对威士忌征收消费税。

美国不仅酒吧众多，而且还有很多酿酒厂，甚至就连妇女和小孩也饮酒，所以威士忌才被列为征税的目标。当然，酒吧里的常客们当然不会对此保持沉默。

对威士忌征税导致美国爆发了第二次“波士顿倾茶事件”，酿造业发达的西部各州民粹主义政治家煽动民众称“如果对威士忌征税我们就脱离联邦”，从而引发了巨大的骚乱。后来1800年美国总统换届后立刻取消了对威士忌征收消费税。

汉密尔顿还认为美国必须拥有发行纸币的中央银行，于是，在1791年成立了美国第一银行（First Bank of the United States）。由联邦政府出资20%，其他部分由纽约和外国的金融资本出资，认购期20年，大约相当于现在欧盟的统一货币欧元。

但南部、西部的农民与民粹主义政治家对此强烈反对。他们认为这样做是在帮助英国和犹太人金融从业者和与之勾结的纽约大银行来统治自己所在的地区。到1817年，美国第一银行的20年认购期结束，又成立了美国第二银行，也只筹集到80％的资金。

出身于西部的民粹主义者、美国第七位总统安德鲁·杰克逊（1829——1837年在任）上台后，认为北部的金融资本与联邦政府侵犯了各州的经济自主权，美国第二银行则通过停止发放贷款的方式与之对抗。1835年，甚至发生了针对杰克逊的刺杀未遂事件。

杰克逊在1836年取消了美国第二银行。此后的77年间，美国一直没有中央银行。

用现在的眼光来看这简直是不可思议的事情，如果一个国家没有中央银行，将会发生什么事情呢？

首先，各州政府获得了批准银行的权利。1830——1836年，美国的银行数量从330家增加到713家。州议会认为银行只是个人自发成立的组织，对成立银行没有施加任何限制。

结果，美国最多时竟然出现了1600多家银行，发行的纸币多达7000余种，伪钞更有5000多种。如此夸张的情况使纸币的信用一落千丈，据说这也是后来导致美国成为信用卡社会的原因之一。

1836年，联邦政府宣布，“可以用能够兑换硬币或黄金的银行券来购买公有土地”，这相当于认可了混乱的货币状态。

事实上，联邦政府对这一状况也是无能为力。这样的货币当然不可能得到国际社会的认可，所以当时国际贸易还是用英镑进行结算。

为什么美国经济在南北战争后飞速发展

美国自独立以来，北部一直致力于加强联邦政府的权力，创建一个“正常的国家”。南部是以农场主为中心的地区。而西部则一直致力于维持各州的自治。这三个地区之间的隔阂难以消除。

在这样的背景下，南部各州组成美利坚联盟国（Confederate States of America）并宣布退出美利坚合众国，于是，南北战争（1861——1865）爆发。

南部各州发行了名为“联盟纸币”的不兑换纸币来筹集军费，但因引发了严重的通货膨胀使纸币变成废纸，导致南部经济崩溃，战后被北部经济吸收。

南北战争之后，美国看似克服了内部的对立问题，但实际上并非如此。

在美国向工业国家转变的过程中，这两者之间的隔阂愈发严重。

两者之间的对立时至今日仍然没有消失，以纽约的金融和洛杉矶的IT产业为背景热衷于进军海外的民主党与坚持国内发展的共和党之间的斗争大有愈演愈烈的趋势。从当今美国的政治发展上不难看出，这就是美国最大的弱点。

1861年爆发的南北战争（1861——1865）在日本的教科书上被称为“奴隶解放战争”，但实际上这只是北部的政治宣传。

真正的南北战争是主张自由贸易的南部11州为了从实行世界上最高额保护关税的合众国独立出来而进行的战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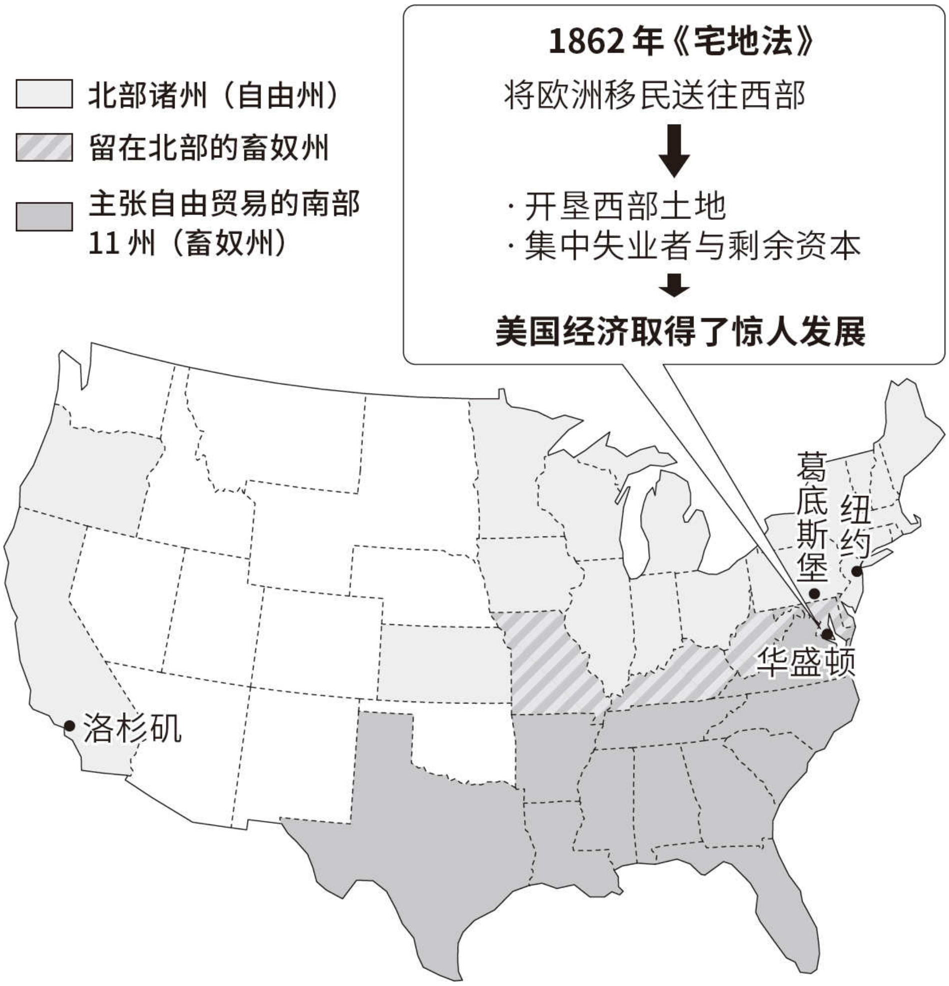
南部利用黑人奴隶在种植园生产的棉花，与英国保持着非常密切的经济往来。出于维护自身利益的需要，他们非常希望能够实现自由贸易。

而北部在南部出口的棉花上赚取了大量的资金，同样出于维护自身利益的目的，北部不惜动用武力来阻止南部独立。这就是造成南北双方共计牺牲65万人的南北战争的真相。

1862年，美国时任总统的林肯为了拉拢西部各州，颁布了《宅地法》。

《宅地法》规定，凡是在西部拓荒5年以上、年满21岁的美国公民或符合入籍规定申请加入美国国籍的外国人，只须缴纳一定的登记费就可以获得160英亩的西部国有土地。结果，不仅美国公民，就连欧洲的穷人们也纷纷涌向美国西部。

19世纪70年代至90年代，欧洲经济持续低迷（大萧条），因此“只要想办法买一张船票到美国，辛苦几年就能成为大地主”的“美国梦”传遍了整个欧洲大陆。



南北战争与美国经济的飞速发展

“北部”（大西洋沿岸的城市地区）：控制国内市场，意图富国强兵进军海外的企业家。

“中西部”和“南部”：满足于守护自己的土地和家族产业，反对增税和发动对外战争的保守派农民。

南北战争后，欧洲移民大量涌入西部，仅25年时间美国西部的土地就全部被开垦完毕。

在持续了20年的欧洲大萧条时期，谁也想不到美国西部竟成了接收欧洲失业者和剩余资本的“容器”，短时间内实现了惊人的发展，美国经济也因此取得了巨大的飞跃。

但美国城市与农村，以及北部与南部、西部的隔阂非常严重，直到现在仍然没有达成统一。这大概也是移民国家的通病吧。

林肯因为得罪了民间银行所以遭到暗杀？

战争需要巨额的军费。

在南北战争时期，不管是北部还是南部，都只能通过从英国的银行贷款来维持军队开支。财政困难的北部难以承担高额的国债利息，于是林肯总统要求政府管理下的国家银行发行货币来购买国债。

北部发行了合众国纸币，这种纸币因为用绿色的染料印刷又被称为“绿背”，现在的美元仍然继承了这一传统。

林肯不愿向银行支付利息，而是选择由政府发行不兑换纸币，以此来减轻军费负担。但这种做法显然损害了民间银行的利益，因此遭到民间银行的怨恨。

绿背纸币的发行额在1871年达到3亿美元，北部在战后的物价与1860年相比翻了一番。但在战争中失败的南部各州境况则更加悲惨，南部发行的纸币价值暴跌，物价上涨了90倍。

史学界认为，1865年，林肯遭到刺杀原因之一是他严重损害了银行利益。联邦政府后来收回了绿背纸币，货币的发行权重新回到民间银行的手中。

在南北战争时期，绿背纸币用来支付士兵的薪水。战争结束后，民间银行故意限制资金供应，营造出不景气的假象，民众认为这是政府收回绿背导致的。

1867年，欧洲主要国家齐聚巴黎，召开国际货币会议，决定以黄金作为唯一的货币准备金以及国际结算的支付手段。1873年，美

国停止铸造美元银币，并在6年后宣布绿背纸币可以兑换黄金。就这样，美国的绿背纸币与金本位制联系在了一起。

另一方面，美国在南北战争时期还以“比纸币更有价值”为卖点，利用民间小型投资者的爱国心，积极地推销国债。可以说，当时国债的发行为如今美国的证券投资业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由于对纸币的信任度很低，所以美国人更习惯于将资产变换为股票和债券。

正如前文中提到的那样，南北战争后美国接收了大量为了追求土地和美国梦而从欧洲涌入的移民，西部的开拓速度得到了巨大的提升。

美国在联邦政府的主导下开始修建横跨整个国家的铁路，经济状况蒸蒸日上，就连政治活动也处处都与金钱脱离不了关系。结果，政治家的腐败与互斗甚至比电视剧来得更加精彩。正如当时美国被称为“镀金时代”一样，那就是一个所有人都在为了金钱而四处奔走的时代。

拯救1907年金融危机的大富翁摩根

南北战争结束后，美国虽然凭借西部开发和铁路建设一举实现了经济腾飞，但小型银行依然众多，金融状况非常糟糕。

1907年，一次针对大型矿山企业的收购案以失败告终，负责为本次收购进行融资的银行失去了投资者的信任，从而导致挤兑骚乱。这次骚乱使民众对金融状况的不安扩散到全国范围，纽约证券交易所的股价瞬间下跌到之前最高值的一半。

随着金融危机的扩散，地方银行纷纷从城市银行取出现金，城市银行则从纽约的银行提取现金。纽约第三大信托公司纽约人宣告破产，董事长开枪自杀，金融危机达到顶峰。当时，美国并没有能够为银行提供资金担保的中央银行。

自从杰克逊总统取消美国第二银行之后，美国就一直没有中央银行。此时，美国最大的摩根银行履行了中央银行的职责，及时阻止了银行的连锁破产。

摩根大通动用自己的私人资金，又说服纽约的银行和信托公司一起建立了一个资金池，从而有效地阻止了因银行遭到挤兑而相继破产的危机。

第二年，美国上院对导致金融危机的原因进行调查，继而成立了国家金融委员会以应对将来可能出现的类似问题，并且着手制定相应的法律法规。

1913年，联邦政府终于和银行达成一致，成立联邦储备委员会（FRB），并且在全国12个地区分别成立联邦储备银行，从而确立

起联邦储备制度（为可能出现的金融危机储备资金）。这就是美国版的中央银行。

不保证兑换黄金的美元

联邦储备制度是由民间的大银行为主导确立的制度，民间银行可以通过这一体制赚取巨额的收益。这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货币体制，这一节将专门对此进行说明。

首先，美元被看做是联邦政府“依照联邦储备制度理事会决定发行的政府债务”的借款证明（联邦储备券）。美元的发行权委托给由民间大银行共同出资成立的联邦储备银行，按照以下顺序发行：

1．财务部根据联邦储备制度理事会的决定印刷联邦储备券（美元、联邦政府的债务证明），并直接交给联邦储备银行（无息贷款）；

2．联邦储备银行用联邦储备券购买国债；

3．联邦储备银行用银行资产为联邦储备券的债务提供担保；

4．联邦储备银行用联邦储备券购买国债获得“利息”。

美国作为一个新兴国家，没有英国那样拥有充足的黄金储备，而且联邦储备银行也只是民间银行为了发行美元而集资成立的，所以对美元和黄金的兑换问题一直避而不谈。

另外，美元以联邦储备银行的资产作为担保，所以和保证能够兑换黄金与金币的英镑不同，属于“价值不明的货币”。

欧洲的犹太人银行在美国金融界拥有巨大的影响力，这些犹太人金融从业者也与美元的发行存在着很深的联系。为了维护民间银行的利益，他们想尽一切办法将政府从美元发行中排除出去。

美国宪法规定“货币由议会发行”，所以联邦储备银行只能将自己发行的货币称为“联邦储备券”。当时世界上普遍采用金本位制，通过与黄金和金币的兑换来保证纸币的价值，而美国作为新兴国家却没有保证美元与黄金的兑换。

美元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一跃成为世界的基准货币，下一章中将对此做详细的说明。

解读货币历史的关键19

> 1913年，美国确立联邦储备制度（美国版中央银行）。

第10章　从英镑到美元的时代

全面战争使欧洲衰落，美国趁机崛起

第一次世界大战（1914——1918）是一场将大量平民卷入其中的“全面战争”，庞大的军费负担使“属于欧洲的时代”迅速崩溃。英镑引领世界经济的时代也随着英国财政的捉襟见肘而宣告终结。

在战争期间，新兴国家美国大量生产军需物资并出口到欧洲，一跃成为全世界最大的债权国。

黄金开始从欧洲逆流回美洲。没有黄金兑换义务的美元（联邦储备券）成为世界货币。

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欧洲各国都动员了大量的军队，其中英国大约900万人、法国大约850万人、俄罗斯大约1200万人、德国大约1000万人，在4年的战争中，累计出现近2000万人的死难者，可以说是真正的全面战争。

巨额的军费也让各国不堪重负，财政陷入困境。英国在战争期间每年用于军费的开销高达国家预算的70％。

世界货币的势力版图也被彻底改写。黄金的流动发生了前所未有的戏剧性变化，美元的影响力愈发强大。美国在1921年的黄金储备是英国的3倍，到了1932年，这个数字又翻了一番，是英国的6倍。

英国和法国为了继续维持19世纪确立的殖民地体制，企图通过牺牲战败国德国的利益来恢复自己战前的繁荣。正如英国和法国秘

密签订的《赛克斯——皮科协定》对中东地区进行瓜分所体现的那样，两国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在政治上的胜利者。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美国不但还清了战前的30亿美元债务，还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债权国。但美国仍然是一个由1870年之后激增的移民匆忙建成的新兴国家，所以在门罗主义（孤立主义）的影响下，继续采取与欧洲保持距离的传统外交政策。

因此，国内体制不够完善、存在严重地区分裂的美国还不足以成为世界政治的领导者。

欧洲各国也没有将美国放在眼里，英国和法国等老牌强国根本没想过属于欧洲的时代会发生改变。这种政治和经济上的不平衡，终于在20年后再次引发世界大战（第二次世界大战）。

解读货币历史的关键20

第一次世界大战使欧洲衰落，美国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债权国。

华尔街为什么要拯救战败的德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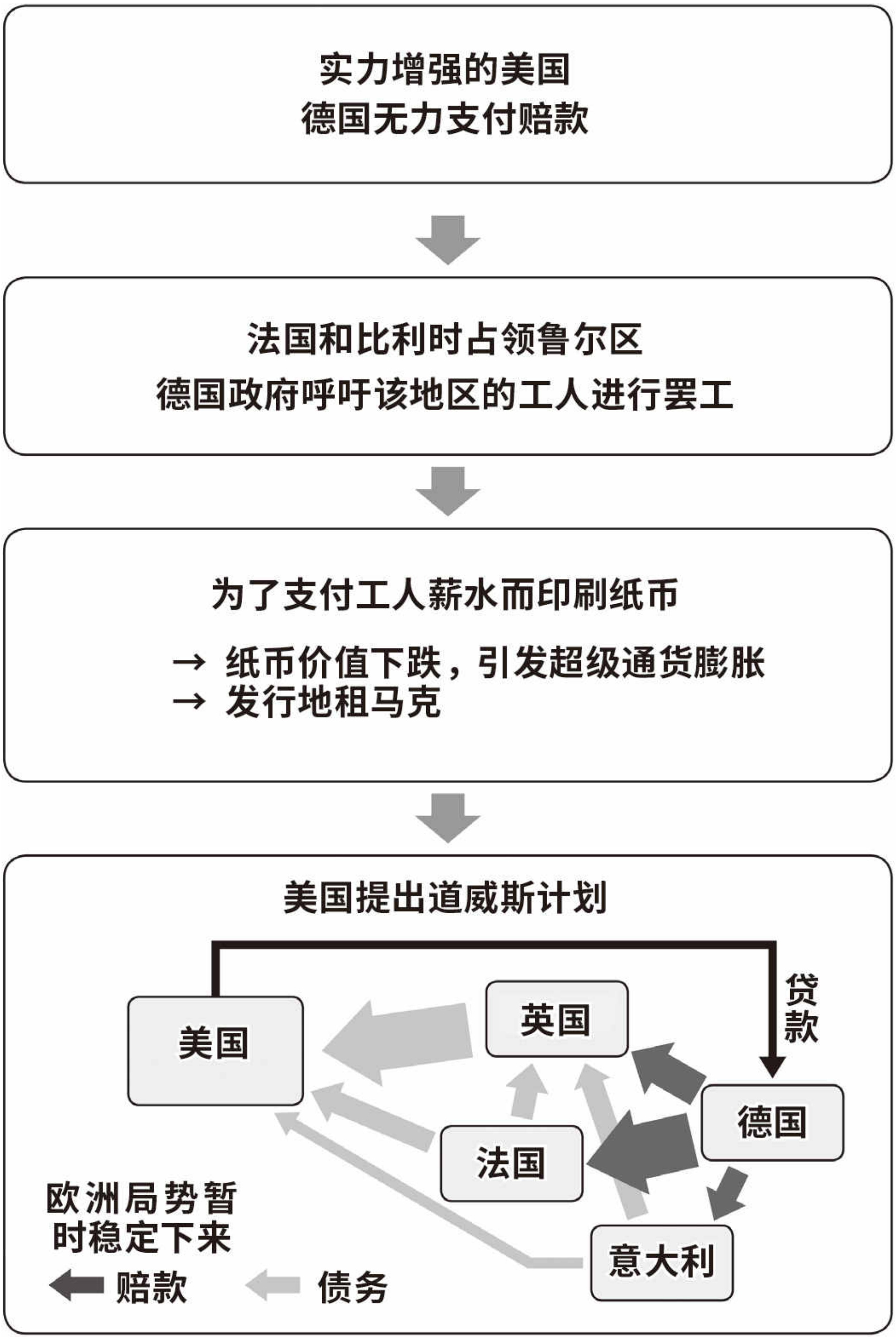
正如英国首相劳合·乔治的名言所称“把柠檬榨得一滴都不剩”，英法对德国的疯狂报复确实显得不够理智。

德国不但被夺走了全部的殖民地和其欧洲领土的13%，还被要求赔偿1320亿金马克的赔款。1320亿金马克如果换算成黄金的话大约是3.37万吨，相当于当时德国20年的GDP。德国根本不可能在短时间内拿出这么多赔偿金。

由于德国无法及时支付战争赔款，法国以此为由联合比利时占领了德国的鲁尔区。德国政府呼吁当地工人用罢工来进行抗议，于是鲁尔的工厂和矿山都无限期停工。政府为了支付工人薪水开始大量印刷纸币，结果导致严重的通货膨胀。

仅半年时间，马克纸币的价值就降低到之前的一兆分之一，引发了史无前例的超级通货膨胀。

德国经济部长亚尔马·沙赫特以国家的不动产作为担保发行新纸币地租马克，用1新马克兑换1兆旧马克的同时将回收的旧马克集中销毁，奇迹般地解决了超级通货膨胀的问题。



美国道威斯计划开始的原因

当时，拥有巨额欧洲债权的华尔街对欧洲经济的混乱状况极为不满，由美国银行家道威斯担任会长的特别委员会提出了一个解决计划。即让德国暂缓支付赔款，由华尔街对德国进行投资以帮助其重建，从而保证德国有能力支付赔款，这就是“道威斯计划”。

道威斯计划的具体内容如下：

1．美国为德国提供贷款

2．德国向英国和法国支付赔款

3．英国和法国归还美国的债务

这样一来欧洲的局势终于暂时稳定了下来。但从此以后，欧洲的经济就都在美元的控制之下了。



等待被烧毁处理的旧纸币

美国的新资本主义和福特T型车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20年，对美国来说是“黄金20年代”。享受着前所未有之经济繁荣的美国，通过大量生产与大量消费以汽车、收音机、家用电器为中心的廉价工业产品，迅速转变为大众消费社会。

特别是大量生产的汽车，成为将广阔原野变成巨大国家的原动力。

美国的铁路网络并不发达，这给民众生活造成巨大的不便。由于马匹和马车价格高昂，而且保养起来十分麻烦，所以汽车的出现对美国来说具有非常重大的意义。

汽车不像火车那样需要铺设铁路，只要在有公路的地方就能行驶。

出生于密歇根州的亨利·福特是爱尔兰移民的后代，这个信仰人人平等的少年在1896年成功地制造出了时速达到40公里的汽车。1903年，他成立了福特汽车公司，开始正式生产汽车。

福特的目标是制造出坚固耐用、操作简单的汽车，而且价格一定要便宜。最终他成功制造出了满足上述要求的汽车——福特T型车。

1909年，福特T型车正式发售，时尚的设计、最高时速可达72公里的优秀性能，以及850美元的低廉价格使其受到消费者的普遍欢迎，即便每年生产1万辆也仍然供不应求。

福特T型车的前身福特K型车的售价是2500美元。福特T型车之所以能够将售价降低这么多，是因为这款车采用了传送带式的流水

线生产方式。福特在芝加哥肉联厂参观时看到那里的牛肉都挂在轨道上移动，工人则站在轨道两边进行操作，于是他将这种流水线的方式应用到了汽车生产之中。

虽然流水线生产方式早就存在，但直到被福特采用后才在全美得到普及。福特对零部件的组装与流水线之间的关系进行了科学的分析，对生产工序进行了彻底的改良。

这项改动大幅提高了生产效率，之前需要12小时才能完成的车体组装工作，现在只需1.5小时即可完成。

而汽车的价格也在17年间从最早的850美元降低至290美元。福特T型车从1909年问世到1927年停产的18年间累计销售1500万辆。当时福特汽车占据了全球汽车市场大约一半的份额，宣布汽车时代的到来。

有如此强大的生产力作为后盾，美国人民的生活水平迅速得到提高。美国通过实现经济上的平等，将欧洲社会从未有过的“真正的民主”变为了现实。

汽车社会催生“连锁店时代”

为了满足大众消费社会所需的大量商品，20世纪20年代的美国出现了全国范围的销售革命。

在纽约和芝加哥等大城市中，有许多模仿欧洲样式修建的大型商场，生意十分兴隆。1929年，商场的总销售额高达40亿美元，占零售业总销售额的九成以上，但美国幅员辽阔，绝大部分都是农村地区，而农村人口根本无法享受到这一切。

随着汽车在中小型城市以及乡村的迅速普及，由同一个经营者在广阔的区域内开设多家店铺的“连锁店”经营方式也得到了推广。这种完全符合美国人生活习惯的经营方式立刻传遍了全国。

而在人口密度远不及大城市的乡村地区，选择一个与周边城镇距离相当的地区建造商业中心，让周围的顾客开车过来消费显然是最合理的选择。

通过大批量采购和统一的广告宣传来降低成本，给顾客提供更加廉价的商品。这种美国式的合理主义，大受居住在偏远地区居民的欢迎。

“不管是城市居民还是农村居民，都有平等购物的权利。”这句话成为当时零售业者的口号，“销售革命”遍及全国每一个角落。20世纪20年代的美国进入了“连锁店时代”。

美国的股票泡沫崩溃与金融危机

“杂货店老板、公交车司机、水管工、裁缝、酒吧侍应生，全都在炒股票。就连本应质疑这一切的知识分子也参与其中。”弗雷德里克·刘易斯·艾伦在《浮华时代》中如此写道。

美国在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债权国之后，同时取代英国成为世界上最繁荣的国家，大量生产带来了大量商品，激发出人们对金钱的巨大欲望。

当时美国拥有300家以上的基金公司，民众的投资热情高涨。从1924年到1929年的5年间，美国的股票价格上涨了5倍。仅1929年，就出现了265个投资信托基金。

尽管当时的投资信托基金利用的是杠杆原理，风险性极高，但小型投资者们仍通过抵押贷款的形式筹集资金，竞相购买风险巨大的投资信托基金。

谁也没有意识到，占世界工业生产总额42％的美国经济已经处于饱和状态。

1929年10月24日星期四，华尔街证券交易所的股票价格突然暴跌。这就是著名的“黑色星期四”。

就在前一天，很多人由于保证金不足而不得不卖出股票，导致股票价格进一步下跌，短短一周时间美国股市损失的金额相当于当时美国10年的财政预算。股价暴跌也导致小型银行相继破产。

美国时任总统胡佛相信美国经济有能力自我恢复，故没有对金融危机及时采取应对措施。结果美国的股价在半年时间里下跌了50％，更多的银行宣布破产。

据说当时美国有4305家银行破产，占全部银行的一半，可见这次金融危机有多严重。不过这也是因为美国小银行太多导致的。

银行破产使得企业难以获得贷款，结果企业也相继破产，失业者和无家可归者大量增加。1929年至1933年的4年间，美国的工业生产总额降低了一半。在金融危机最严重的1933年，美国失业人数高达1300万，相当于当时美国人口总数的1/4。

导致全球性经济危机的“美国优先”

惊慌失措的美国议会在1930年制定了《斯穆特——霍利关税法》，大幅提高所有进口商品的关税。美国的本意是通过限制进口来恢复本国经济，但这种想法简直大错特错。高关税导致物价上涨，反而使得美国的经济状况更加恶化，出口进一步减少。

吸取了这次的教训，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在美国的主导下，全球各国都相互合作旨在扩大自由贸易的范围。但如今共和党的特朗普上台后又再次高举起关税保护的大旗，颇有开倒车嫌疑。

美国在金融危机的影响下，许多银行相继破产。剩余的银行为了渡过难关，将投资在外的资本全部收回，结果美国泡沫崩溃带来的影响直接波及到全世界，这场爆发于美国的金融危机终于发展成为全球性的经济危机。

世界各国都放弃了金本位制，下调本国货币的汇率，争相扩大出口。结果导致国际贸易陷入停滞，英国和法国则利用广阔的殖民地发展“封闭经济”。

各国放弃金本位制后采用管理货币制度，一遇到财政困难就通过发行不兑换纸币来解决问题，从而导致通货膨胀愈演愈烈。

在货币与商品秩序土崩瓦解的20世纪30年代至40年代，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而这一切的罪魁祸首美国却充分利用地缘政治优势向同盟国大量出口武器和物资，第一个从经济危机中摆脱了出来。

解读货币历史的关键2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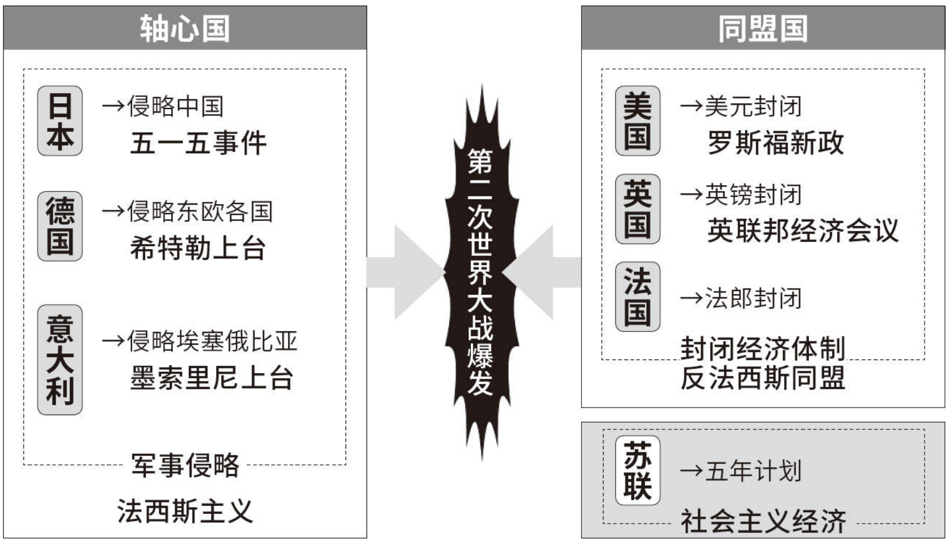
美国股票泡沫的崩溃导致1929年的全球性经济危机。

列强的绥靖政策促使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

随着全球性经济危机的不断恶化，自由贸易遭到破坏，世界经济持续低迷，经济崩溃的速度也越来越快。全世界的工业生产力下降了44％（之前最严重的经济危机时也只下降了7％），贸易额下降了65％（之前最严重时是7％）。世界各国都在重复着让人不忍直视的愚蠢做法。

此前一直高举自由贸易大旗的英国召集加拿大渥太华自治领和殖民地的代表签订了《渥太华协议》，确立起封闭经济的体制。这条协议规定，英联邦内的贸易都采取低关税，而对英联邦之外的商品则要征收200％的高额关税。这属于过度保护主义政策。法国也效仿了英国的做法。

大国纷纷选择了“本国优先”的政策，既没有资源、势力范围也不大的德国、意大利、日本等国为了谋求自身利益走上了战争道路。



从经济危机到第二次世界大战

当时国际社会并没有防止世界经济出现连锁衰退的协调机制，所以当大国遇到问题时往往会做出损害他国的行为。历史的经验和教训告诉我们，在这种情况下，国际舆论与国内舆论都承担着非常重要的责任。

令人绝望的经济萧条长期持续，各国不得不重新调整国债制度。之前国债主要被用于筹集军费，属于战争国债。而经济学家凯恩斯则提出，可以将国债用于公共投资（创造有效需求），利用公共事业来摆脱经济危机。

这就是著名的凯恩斯主义。从国民手中借钱来渡过危机，属于一种紧急措施。

德国在政府主导下修建公路，美国田纳西河流域管理局（TVA）进行的综合开发等都取得了一定程度的经济效果，证明发行国债来摆脱经济低迷是行之有效的手段。也就是用未来的借款来渡过眼前的危机。

全球性的金融危机导致美国的银行将资本全都收回，德国一下子失去了美国的资金援助，4年间有六成的工厂宣告破产。1923年，德国的失业率约为40％，失业人数达到600万以上，经济陷入近乎绝望的境地。

但德国议会没有提出任何有效的政策，失去希望的民众和没落的中产阶级只能将希望寄托在纳粹党的身上。

希特勒率领的纳粹党于1933年提出利用失业保险的储蓄金重建经济的计划。计划的主要内容是修建长达1.4万公里的“高速公路（Autobahn）”。这种大规模的公共投资可以吸收大量的失业者。

同年3月24日，纳粹党迫使议会通过了《授权法案》，该法案允许纳粹党可以制定任何法律而不需要经过议会的同意。然后，巩固了权力基础的希特勒开始执行建设计划。

德国修建高速公路是为了发展本国的汽车产业。1932年，德国的汽车拥有量是平均每100人一辆，与平均每5人就有一辆汽车的美国完全无法相比。因此这也被看作是恢复经济的良机。

希特勒要求工厂大量生产“大众汽车”，并且从工资里直接扣款用来购买汽车，以加快汽车普及的速度。德国通过大力发展汽车工业实现了经济复苏。

第二次世界大战经常被描述成“民主主义与法西斯主义之间的战争”，但历史上因意识形态而导致的战争少之又少。事实上，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的过程非常复杂，其中有民粹主义政治家为了转移国民的不满而将矛盾转向民族和领土问题的因素，但最根本的原因还是全球性经济危机使世界各国的经济都陷入了谷底。

纳粹德国与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失去波兰领土的苏联于1939年签订了《苏德互不侵犯条约》，两国约定共同分割、占领波兰。

在《苏德互不侵犯条约》签订后的第二个月，德军就向波兰发动了进攻，英国和法国为了维持自身在东欧的影响力而对德国宣战，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第二年，德国突然对法国发动闪电式袭击并且占领了巴黎，认为战争局势对德国有利的意大利和日本与德国结成三国军事同盟。

1941年6月，觊觎苏联巴库油田的德国，计划决定在3个月内打倒苏联，于是撕毁《苏德互不侵犯条约》并向苏联宣战。德国发动300万军队（占德军总数的75％）、2740架飞机（占德国空军总数的61％）以及3580辆坦克向苏联进军，苏联顿时陷入危机之中。

德国与苏联开战后，英、美两国盘算着帮助哪一方对自己更加有利。最终美国总统罗斯福与英国首相丘吉尔在大西洋上举行会谈，决定支援苏联。并且这样宣布道：

“第二次世界大战，是民主国家与法西斯国家之间的战争”。

事实上，这只不过是审时度势之后的选择罢了。英、美与苏联联手之后，第二次世界大战就变成了“民主国家与法西斯国家之间的战争”。

日本侵略中国原因之一——中国的币制改革

受全球性经济危机的影响，加上“九一八”事变后失去了东北市场，中国的经济更加低迷。

1934年，美国总统罗斯福实施《购银法案》，导致中国白银大量外流，中国流入美国的白银与上年相比增长了17倍，占美国从国外筹集白银总额的80％。

作为货币基准的白银大量流失，导致中国出现了非常严重的通货紧缩。

国民党政府于1935年聘请英国的李滋·罗斯担任财政顾问，并开始实行币制改革。具体内容包括通过管理货币制度发行不兑换纸币，将新纸币与英镑挂钩（金汇兑本位制）。

国民党政府将之前各家银行发行的纸币（银行券）和白银回收，将中央银行、中国银行、交通银行发行的法币（法律规定的货币）作为统一的货币。这意味着最后一个坚持银本位制的国家也转变为金本位制。

中国的纸币由英镑提供价值担保，所以英国和美国自然对中国经济有很强的影响力，而日本为了保护自身在东北与华北的既得利益，只能与国民党政府一决高下。于是在1937年，日本全面发动侵华战争。

解读货币历史的关键22

> 中国通过币制改革废除银本位制，转变为与英镑挂钩的纸币制度。

美国出人意料的经济战略

日本的侵华战争在中国人民的奋力抵抗之下，变成持久战，使得经济基础本就非常薄弱的日本陷入困境。就在此时，《日美通商航海条约》被撕毁，日本海军偷袭珍珠港，太平洋战争（1941——1945）爆发。

对美国来说，如何说服讨厌战争的保守派农民支持战争是最大的难题。珍珠港事件刚好给了美国一个绝佳的机会，善于宣传造势的罗斯福总统成功地激发出保守派农民的爱国主义热情，使他们全力地支持参战。

因为美国提出不再对日本出口石油和钢铁，为了保证战时的石油供应，日本又将战火烧到了东南亚和南太平洋地区。

由于日本、德国、意大利三国结成了军事同盟，所以当日本向美国和英国宣战后，德国与意大利也向美国、英国宣战。结果正如美国期望的那样，欧洲与亚洲的战场连成了一片。美国趁日本、中国、德国、苏联全都深陷战争泥潭之时将战争的主导权牢牢地掌握在了自己的手里。

就在美国民众因为珍珠港事件而群情激愤的时候，罗斯福政府及时推出了一种名为“战争债”的国债，美国民众争相抢购。美国投入了比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多10倍的军费扩大军需生产，使经济迅速得到复苏。而军费的一半以上都是通过战争债筹集到的。

本土远离战场并且能够大量生产武器弹药的美国对日本本土进行了大规模的空袭，给日本的经济造成了毁灭性的打击。

1945年4月，罗斯福突然病逝，副总统杜鲁门继任，在日本的广岛和长崎投下两枚原子弹，并且凭借核武器在战后确立了自身的军事霸权地位。在战争末期，美国占领了冲绳作为进军中国的据点。

第二次世界大战末期，美国的罗斯福与英国的丘吉尔、苏联的斯大林以及中国的蒋介石共同协商计划构筑起一个以三个支柱（联合国、美元、核武器）为支撑的战后霸权体制。这个体制主要包括以下几方面。

1．政治方面：废除19世纪的殖民地体制，由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美国、英国、法国、苏联、中国）维持世界秩序，实现以联合国为中心的世界新秩序。

2．经济方面：形成以美元作为基准货币的单一世界经济体系，利用《关税及贸易总协定》（GATT）促进自由贸易。

3．军事方面：利用美国的核武器垄断与“核保护伞”实现军事秩序。

名为“布雷顿森林体系”的谎言

正所谓，“19世纪是属于英国的时代，20世纪是属于美国的时代”，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美国的工业生产总值占全世界工业生产总值的一半，全世界黄金储量的3/4都集中在美国，世界局势变成美国一家独大。

英国花费了漫长的时间建立起全球规模的海洋帝国，又利用英镑小心翼翼地建立起自己的霸权体制。与之相对，美国不但顺利地实现了国内的一体化，而且在世界大战的帮助下，轻而易举地就建立起了属于自己的霸权。

1944年，45个国家的财政负责人齐聚位于美国新罕布什尔州的布雷顿森林，召开联合国国际货币金融会议。

这次会议决定将美元作为世界货币，1盎司黄金兑换35美元，各国货币与美元之间保持固定汇率，也就是固定汇率制。

给货币提供价值保证的黄金全都集中在美国，因此将美元作为基准货币也理所当然。

就这样，美国确立起战后世界的货币秩序体系。虽然各国的货币都需要先换成美元然后才能换成黄金，但总算是保住了货币的体面。这就是布雷顿森林体系（IMF体系）。

但现在看来，这一体系存在着许多缺陷。

19世纪，英国在建立英镑与黄金兑换体制时非常慎重，而美国则根本没有考虑过美元与黄金兑换究竟是否可行，只是在面对美元成为世界货币这个千载难逢的大好机会时，大言不惭地宣称自己拥有足够兑换全世界所有纸币的黄金储备。

虽然这显然是一种谎言，但世界各国还是设定了本国货币与美元之间的汇率。比如，经济处于崩溃状态的日本其货币单位是“円（圆）”，而圆的一圈是360度，所以1美元=360日元。如果出现国际收支不平衡的情况，货币价值可以适当波动，但在兑换市场上的汇率是固定的。

各国为了使本国货币能够兑换成黄金，必须拥有一定数量的美元或者美国国债作为外汇储备，美国借此机会将自己的国债普及全世界。联邦储备制度下美元与国债之间的关系也扩展到了世界范围。

在通商层面，美国的目标是全球化的自由贸易。但当时美国的生产力处于绝对优势的地位，因此世界各国反对全面自由贸易，于是缔结了以实现自由、多元、平等的自由贸易为目标的《关税及贸易总协定》。

另外，世界各国为了维护国际汇率制度的稳定还共同成立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美国出资17％），该组织可以为陷入货币危机的国家提供外币支援。

国际复兴开发银行（IBRD，通称世界银行，美国出资16％）负责为战后经济复兴和发展中国家提供经济援助。世界银行为有需求的国家提供比民间银行利息更低、时间更长的贷款。

日本在战后也从世界银行获得了巨额的贷款。东海道新干线、黑部水坝、首都高速公路等都是在世界银行的帮助下建设起来的，到20世纪90年代日本就还完了所有的贷款。

解读货币历史的关键23

美元成为唯一能够与黄金进行兑换的基准货币，
美元与各国的货币 维持固 定的兑换比率，采用固 定汇率制。

第11章　习惯了不兑换纸币的世界被电子货币席卷

存在结构矛盾的美元霸权

20世纪60年代，耶鲁大学的经济学家特里芬提出了“特里芬难题”，对战后世界经济的动荡进行了详细说明。

由于全世界只有美元能够与黄金进行兑换，随着世界经济规模的不断扩大，美国必须不断增加美元的供应。但这样一来就会出现以下的矛盾：

1．美国通过发行巨额的国债来增加美元的发行额度，但这种行为导致美国政府赤字越来越高，美元的信用度则持续降低。

2．于是，其他国家将美元兑换成黄金的需求就越来越高。

3．随着不断将美元兑换成黄金，美国的黄金储备将越来越少。

4．最终，人们对美元失去信任，布雷顿森林体系 瓦解。

美国与华尔街只构想了一个全球规模的货币体系，却从没想过如何维持。

美国拥有发行美元纸币的特权，所以不管是成为贸易逆差的消费大国还是每年投入巨额军费（占美国财政预算的17%，相当于当时全球军费总投入的1/4），都可以通过发行国债来解决。至于维持美元的信用度，那根本不在美国人的考虑范围之内。

美国不断发行美元，完全忘记了自己肩负着通过本国黄金储备维持美元与各国货币价值稳定的责任。

身为世界经济带头人的自觉不知何时变成了“美国优先”的利己主义，为了满足巨大的国内消费，美国不断地加印美元，给世界经济增添了不少“水分”。

美元不再兑换黄金

美国希望其他国家尽量降低用美元兑换黄金的要求，但不愿因美元汇率降低而使自身遭受损失的欧洲各国不肯收回兑换要求。为了维持美元的地位，美国必须不断用黄金兑换美元，美国经济陷入进退两难的境地。

此时发动越南战争的庞大军费对美国来说无异于雪上加霜。1971年，美元“将来还会继续贬值”的判断，导致许多投资者纷纷抛售美元。

由于无法承受国际市场大量抛售美元带来的压力，美国总统尼克松于1971年8月召开紧急电视会议，宣布“停止美元与黄金的兑换”。这个被称为“尼克松冲击”的事件堪称世界史的转折点。

失去黄金作为价值担保之后，美元变成了国债的购买证明。国际货币体系从黄金与美元本位制转变为美国债务本位制。这一时期，芝加哥的期货市场预测到了世界经济的转变，率先开始了期货交易。

美国政府最初在10个国家的帮助下尽可能维持固定汇率制，但“美元贬值”的势头难以抑制，最终，在1973年固定汇率制转变为浮动汇率制。于是，世界上所有货币都变成了没有黄金做担保的不兑换纸币。

做出这一历史性决定的美国总统尼克松曾经说过，“成功者总是能够当机立断”，但停止美元与黄金兑换恐怕是个仓促且错误的决定。

19世纪以来，欧洲一直认为纸币应该是“以黄金作为价值担保（金本位制）的纸币”体系，而美国却认为纸币是“没有黄金做担保的联邦储备券”。这两种对纸币在认知上的差异，最终导致了尼克松冲击，也给世界的货币体制带来了巨大的转变。

布雷顿森林体系只维持了25年便宣告崩溃，英镑与美元沿袭下来的金本位制也土崩瓦解，世界进入由各国的中央银行为“纸质货币”提供价值担保的不稳定时代。

随着金融时代的到来，不仅贸易结算，跨国投资和结算等也采用外汇，汇率波动变得愈发剧烈和频繁起来。

解读货币历史的关键24

尼克松将美元变为不兑换纸币，
纸币 不再由黄金提供价值担保。

用石油来保护美元

1985年9月，世界上最发达的5个国家的财政部长及中央银行行长齐聚纽约广场饭店召开会议（G5）。会议最终决定，已不再与黄金挂钩的美元成为不兑换纸币，同时世界上所有的货币也都成为不兑换纸币，这就是著名的“广场协议”。

当时，为了保证纸币的价值，各国政府和中央银行都导入了对纸币价值进行管理的制度（管理货币制度）。如果政府和中央银行对货币管理失败而导致经济问题，该国的纸币就会立刻变成废纸。由于各国的经济每天都在发生着巨大的变化，因此世界进入到由各国政府和中央银行通过协调来维持世界经济的“金融不稳定时代”。

原本当时世界各国应该联起手来寻找一个稳定货币价值的新方法，但拥有美元发行权的美国为了继续维持美元作为基准货币地位，想出了一个投机取巧的方法。

这个方法就是与当时世界上最大的产油国沙特阿拉伯达成一项协议，即在全世界范围内建立起一个只用美元进行石油交易的体系。这也可以看作是“石油美元本位制”取代了“金本位制”。

“双层结构”的货币与“证券革命”

与黄金完全脱钩之后，美国开始更加肆无忌惮地发行美元。

正如“美国最大的商品就是美元”这句话所讽刺的一样，美国不顾通货膨胀的风险超发美元，带头给世界经济“注入水分”。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一直到尼克松冲击的26年间，美元的发行量只增加了两倍，而在尼克松冲击之后的45年里，美元的发行量激增了约45倍。

货币发行量的增加必然会导致通货膨胀，精明的华尔街精英为了降低风险推出了“货币的双层架构”以应对通胀。虽然货币的价值因通货膨胀降低了，但资产的价值相应地升高了。所以只要将资金用于投资，就可以与通货膨胀相抵消。

这样一来，原本就拥有一定资产，可以将资金用于投资的人和没有资产用于投资的人之间的贫富差距被进一步拉大。美国百分之一的富裕人口拥有全国财富的一半以上，贫富差距十分惊人。

同时，美国还计划通过不断扩大经济规模来抑制过量发行纸币导致的通货膨胀。具体包括以下3项内容：

1. 通过对发展中国家进行投资提高全世界的经济水平。

2. 通过技术革新给生活各个方面带来改变。

3. 通过证券化扩大“投资”范围。

总之，上述一切行为的最终目的都是扩大经济规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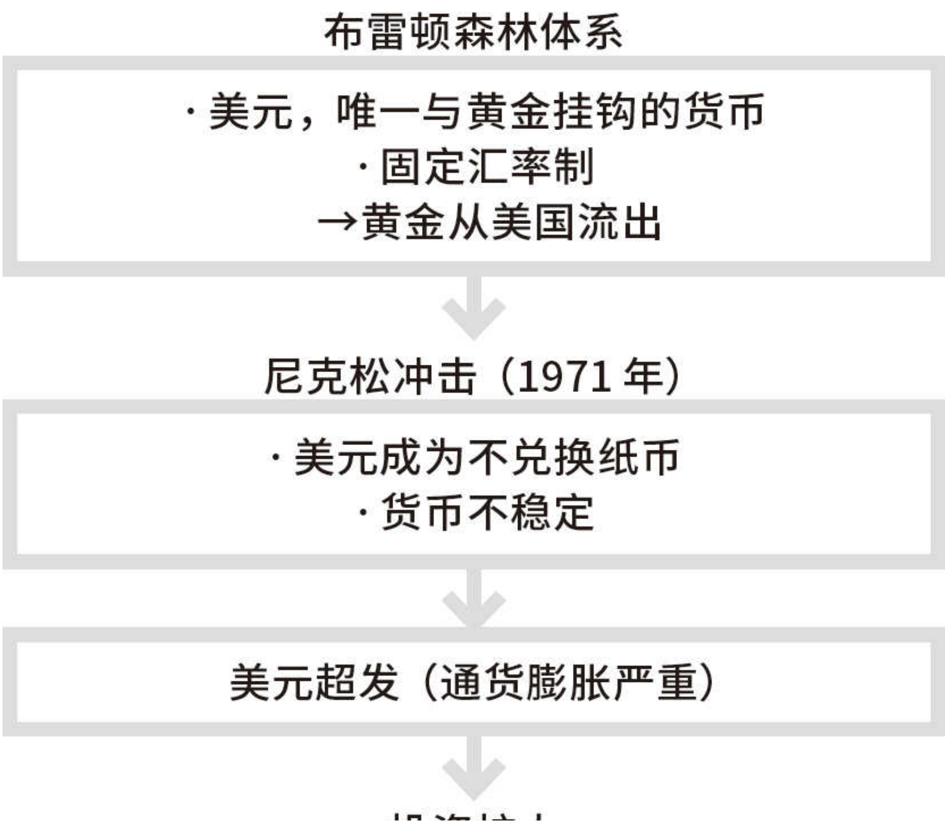
所谓证券化，就是将企业原本“卖不出去”的资产从资产负债表上清除，并通过发行有价证券来筹集资金的技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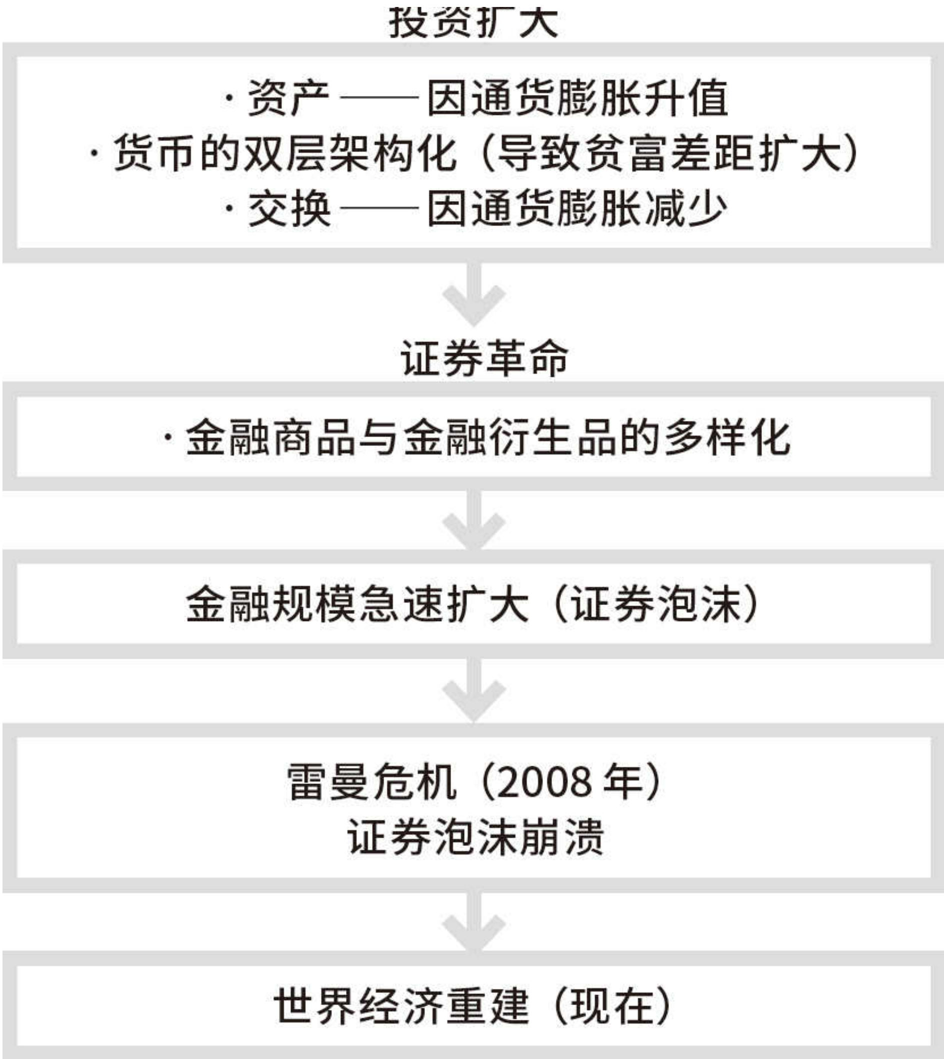
这项技术在20世纪80年代的美国得到了广泛应用，房贷、车贷、信用卡透支等多种形式的贷款方式纷纷出现，人们得到了许许多多的投资机会，同时让资产增值的方法和机会大量涌现。

金融商品和金融衍生品层出不穷，人们开始用投机的心理将资产用于货币、商品以及证券期货等交易上。随着互联网的普及，全球规模的大金融时代开启。各国都不遗余力地宣传“将存款变为投资”的重要性。

解读货币历史的关键25

> 尼克松冲击之后，用于投资的资金大幅增加，货币 向双层结构化和证券化方向发展。




投资扩大
·资产——因通货膨胀升值
·货币的双层架构化（导致贫富差距扩大）
·交换——因通货膨胀减少
证券革命
·金融商品与金融衍生品的多样化
金融规模急速扩大（证券泡沫）
雷曼危机（2008年）
证券泡沫崩溃
世界经济重建（现在）

证券革命（20世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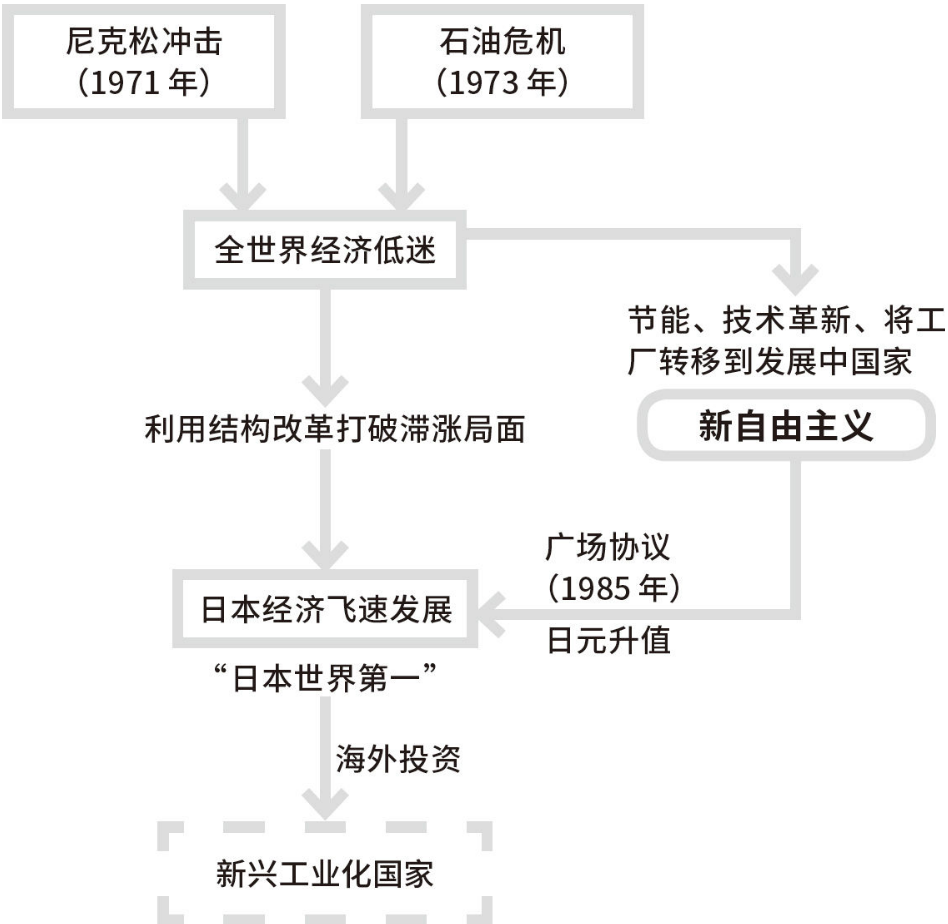
“全球化经济”开始

1960年，欧美石油巨头持续压低原油收购价格，沙特阿拉伯、伊朗、伊拉克、科威特、委内瑞拉这5个产油国组成了石油输出国组织（Organization of the Petroleum Exporting Countries，OPEC）与之进行对抗。

1973年，第四次中东战争爆发，石油输出国组织以此为契机推出石油战略，将之前每桶2——3美元的原油价格单方面上调4倍（即第一次石油危机）。石油输出国组织随后将油田、输油管、炼油厂等全部收归国有，从欧美石油巨头手中夺回了原油价格的决定权。

1979年，伊朗伊斯兰革命爆发，伊朗通过削减石油产量使原油价格飙升至每桶30——40美元（即第二次石油危机）。石油价格飙升给发达的工业国家带来了巨大冲击。

由于工业产品的生产成本大幅提升，世界各国的经济陷入低迷。与此同时，尼克松冲击导致的通货膨胀还在继续，结果世界经济就出现了经济发展停滞与通货膨胀共存这一前所未有的危机（即滞涨）。企业之间的竞争加剧，大型企业纷纷将工厂转移到劳动力价格低廉的发展中国家。这也使得全球化经济得到了巨大的发展。



全球化经济的转变

1967——1987年的20年间，承担着推动全球化经济发展重任的大型跨国企业的海外投资额增长了9倍。美国将国内生产的1/5都转移到了劳动力更为低廉的海外市场。

大型跨国企业为了逃避税收，将大量资金投放到世界各地的避税天堂。因此，民主国家的基础遭到破坏，依托实体经济生活的人——比如美国“铁锈地带”的劳动者——都失去了生活的基础。

但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却非常欢迎大型跨国企业前来落户。凭借大型跨国企业的资金和技术，韩国、中国台湾地区、中国香港地区、新加坡等新兴工业化经济体都取得了飞速发展。而劳动力更加

低廉的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中国大陆地区、越南等国家和地区也奋起直追。

如果说战后日本经济是亚洲经济成长迈出的第一步，那么在日本因土地泡沫破裂导致的“失去的20年”期间，新加坡、韩国等国家和中国台湾地区就迈出了亚洲经济成长的第二步，而中国大陆地区则正在带动亚洲经济实现第三步成长。因此，如果过分重视日本经济，会导致对亚洲经济成长产生错误的认知。

解读货币历史的关键26

石油危机与美元危机使世界经济向全球化发展。

日元升值导致的房地产泡沫使日本经济崩溃

世界经济转变为浮动汇率制结构，给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取得飞跃发展的日本经济带来了巨大灾难。

1985年，美国要求当时世界上最发达的4个国家帮助其降低美元汇率，各国签订了共同促使美元贬值的广场协议。利用政治力量实现美元贬值的美国终于控制住了通货膨胀的势头，20世纪90年代后半期，经济奇迹般地得到了复苏。

而日本经济则因为日元升值而陷入困境。广场协议后，日元与美元的汇率从20世纪70年代初期的1美元兑换307日元，变为1989年的1美元兑换120日元，日元升值了2.5倍。

日元升值使得日本的出口量严重下滑，日本经济严重萎靡。与此同时，韩国、新加坡、中国台湾地区、中国香港地区等地的经济飞速发展，亚洲经济格局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为了应对日元的迅速升值，日本银行采取了宽松的货币政策。但由于国内经济不景气，过剩的资金大量涌入不动产市场和股票市场，引起了不动产泡沫与股票泡沫。“日本第一”就像一句咒语，当东京的土地价格足够买下整个美国的时候，人们仍然认为日本的地价还会继续上涨。

就当人们还沉浸在疯狂之中时，日本的金融基础土崩瓦解。泡沫时期，不管多么疯狂的举动都被认为是理所当然的，当时的日本人只关注国内却不知道世界局势，政府也只采取内向型的政策方针，最终结果就是巨大的灾难。

日本是一个岛国，对世界局势的变化缺乏足够的重视，而这次泡沫崩溃就是日本付出的高昂学费。

1989年12月，泡沫下的日经平均股指达到历史最高的38915日元。但到了第二年10月，泡沫突然破裂，平均股价下跌到2万日元。

1990年，山一证券、长期信用银行、北海道拓殖银行等相继出现经营困难。股价暴跌、日元升值影响出口，日本经济走投无路。

日本银行在泡沫破裂后采取紧缩的货币政策力图恢复经济，政府则大量发行国债，计划以基础设施建设来刺激经济发展。日本银行和日本政府采取了完全矛盾的政策，结果导致日本经济发展长期处于停滞状态，财政赤字不断加剧。

20世纪90年代，以互联网为中心的第三次工业革命使数字化在全世界范围内得到普及，不幸的是日本经济并没有赶上这次浪潮。

美元升值导致亚洲货币危机

广场协议后美元大幅贬值使美国经济得到了喘息之机，但到了20世纪90年代下半叶，民主党的克林顿上台后与华尔街联手将美国逐步转变为金融大国。美国的金融从业者发现，只要将浮动汇率制与IT技术相结合，就能够在世界范围内赚取巨额的利润。

要想用金融赚取利润，首先要有本金。于是美国一下子从努力贬值美元转变为努力升值美元，利用高利息的国债从全世界吸收资金。1995年，1美元可兑换79日元，而3年之后的1998年，1美元就能换到147日元。

美元的迅速升值给当时经济迅猛发展的泰国、印度尼西亚以及韩国的经济带来了毁灭性打击。

20世纪80年代以来，借经济全球化的东风实现经济飞速发展的亚洲各国在世界经济转变为浮动汇率制之后仍然与美元维持着固定汇率，这被称为“钉住美元制”。

对亚洲各国来说，为了在吸引外资的同时防止通货膨胀，与廉价的美元挂钩是最好的选择。

但翻脸比翻书都快的美国却突然高举“美国优先”的大旗促使美元升值，使美元在短短几年间升值了80％。这样一来，泰铢和韩元等与美元挂钩的货币也随之升值，导致这些国家的出口受到重创。

1997年，国际大型对冲基金开始抛售泰铢和韩元。这种趁高价时大量抛售迫使其贬值，等价格探底时再买入赚取差额利润的方法被称为“卖空”。

当时泰铢和韩元的价值远远高出其实际价值，因此对冲基金凭借卖空大赚了一笔。尽管泰国与韩国的金融当局卖出美元收购泰铢和韩元以挽救颓势，但对冲基金的资金实力远在这两个国家之上。

随着泰铢与韩元的大幅贬值，两国的股价也一落千丈。最终，亚洲除了中国香港地区之外全都放弃了钉住美元制。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为陷入经济危机的泰国、印度尼西亚、韩国等国提供了大约360亿美元的资金援助，并要求这些国家在苛刻的条件下进行经济改革。

美国与中国的双赢交易

1989年11月，作为冷战象征的柏林墙被推倒。1991年年末，苏联解体。

美国历史学家弗朗西斯·福山在《历史的终结》一书中这样写道，“自由与民主取得了胜利，世界从此再无对立”。但事实上，历史却与他的预言完全相反。因为就在1991年，美国组织了多国武装部队，对伊拉克发动了海湾战争并取得胜利。但随着美国在中东的不断深入，终于在阿富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中吃到了苦头。

在1978年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国开始推行“改革开放”，走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

中国开始积极地吸引外资，这对从19世纪末以来就一直期望进入中国市场的美国来说，是一个绝佳的机会。中国有丰富的劳动力资源，且劳动力成本只有美国本土的1/10。

美国企业捷足先登，欧洲和日本企业也争先恐后地进入中国。中国利用来自农村的廉价劳动力，摇身一变成为“世界工厂”。

中国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吸引全世界的企业前来投资，同时学习先进的科学技术，实现经济飞速发展。

邓小平提出“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口号，优先发展经济。2001年，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凭借廉价的劳动力增加对欧盟和美国的出口，出口和国内投资成为支撑中国经济成长的两个重要支柱。

正如“中美国”（Chimerica）这个词的含义一样，美国的跨国企业在美国进行产品的设计和研发，然后委托给中国工厂生产，利用中国廉价的劳动力获取了巨额利润。

中国不满足于成为能够组装精密仪器设备的“世界工厂”。中国大力开发人工智能（AI）和物联网（IoT）等先进技术，同时国内“消费市场”越来越大，与美国的经济竞争愈发激烈。于是美国总统特朗普以保护知识产权为名提高关税，企图维护美国自身的利益。

从“以自己为中心的美元”独立出来的欧盟

由于美国采取本国优先政策，欧洲各国于1992年签订了《马斯特里赫特条约》，成立了欧洲联盟（EU），旨在统一欧洲市场，实现商品、服务、人员和资本的自由流动。

2002年，欧洲开始使用统一的欧盟货币“欧元”（1999年刚诞生时有11个国家加欧元区，2015年则扩充为19个国家）。

欧盟计划利用欧元消除各国之间的汇率风险，稳定欧洲各国的财政（比如为了维持欧元的价值，各国的财政赤字必须在GDP的3％以下等）。欧盟在世界经济转变为浮动汇率制后对反复无常的美元失去信任，因此促成共同货币欧元的诞生。

但本国货币英镑曾经作为世界货币的英国则对欧元持观望的态度。

欧元的强势出现对美元来说是个巨大的威胁。华尔街计划像曾经击溃日本经济那样击溃欧洲经济。当时希腊政府的债务危机波及西班牙与爱尔兰，最终发展成为整个欧洲的债务危机，这正好给了美国可乘之机。

2004年以后，东欧10国加入欧盟，欧盟的加盟国增加到25个。欧盟和欧元一时间风头无两。

欧盟由独立于各国政府的欧洲中央银行（ECB）发行欧元，并根据各国的出资比例进行分配，同时还拥有决定利息和调整汇率等金融政策上的权限。

但这样一来，欧洲各国政府就失去了金融主权，只拥有财政上的权限。英国不愿将金融权限拱手让人，因此拒绝采用欧元。

伦敦现在仍然是国际金融中心，占全球外汇交易额的四成，比纽约和东京加起来还要多。英国在撒切尔夫人时期凭借金融自由化政策吸引大量外资流入伦敦的金融市场，使得伦敦一直稳坐世界金融中心的宝座。

解读货币历史的关键27

2002年，欧洲开始发行共通货币欧元。

“证券革命”因雷曼危机受挫

21世纪初，美国为了缓和2001年IT泡沫崩溃带来的损失，长期采取低利率政策。

结果在移民国家美国出现了利用低利率政策投资不动产的浪潮，低收入人群利用贷款购买不动产的行为十分盛行。金融机构根本不考虑低收入人群的偿还能力，不断以较高的利率向他们提供次级抵押贷款。

金融从业者购买这些高利率债券，然后为了分担风险将其拆分开来与国债和股票等其他金融商品组合到一起，再卖到全世界。

2008年9月，由于大量的次级抵押贷款难以收回，证券泡沫破裂。由于证券的成分非常复杂，一时间人们搞不清楚出现问题的债权存在于哪个证券之中，以及存在的比率是多少，于是害怕自己遭受损失的投资者们纷纷抛售金融商品，导致金融恐慌爆发。证券公司、银行、保险公司等都遭受了巨大的打击。

在泡沫破裂的过程中，投资者们为了维护自身的利益采取了许多不负责任的经济行为，结果给全世界人民造成极大的伤害。

2008年，美国排名第四的投资银行雷曼兄弟因负债6000亿美元宣告破产。全世界最大的保险公司美亚保险（AIU）因经营无以为继而被美国政府收归国有。这次危机造成的影响极其深远，甚至比1929年的全球性经济危机给世界经济造成的打击更加严重，史称雷曼危机。

以投资银行（证券公司）为中心展开的“证券革命”也因此受到重创。

2009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推测全世界的金融机构因雷曼危机遭受的损失约4兆美元。证券泡沫破裂造成的影响，甚至还波及到不动产泡沫已经破裂的欧洲。

曾经直面经济危机的美联储前主席伯南克根据自己研究“全球性经济危机”的经验，提出应该大量印刷美元的建议，“像从直升飞机上往下撒钱”一样为金融市场注入资本，采取主动引发通货膨胀的政策。随着货币电子化的普及，如今只需要修改几个数字就可以大量地供应美元。

得到充足资金支持的美国金融业利用对发展中国家的投资以及互联网金融革新等获取的巨额利润重新恢复了活力，但这些增加的美元并没有流入贫困者的手中，美国的贫富差距被进一步拉大。

结果，2016年的美国总统选举结果可谓是让人大跌眼镜，推动美国成为金融帝国的希拉里·克林顿落败，被戏称为无名候选人的特朗普则巧妙地利用了民众的不满，成功当选美国总统。

解读货币历史的关键28

> 2008年，雷曼危机使走向证券化的世界经济遭受巨大的打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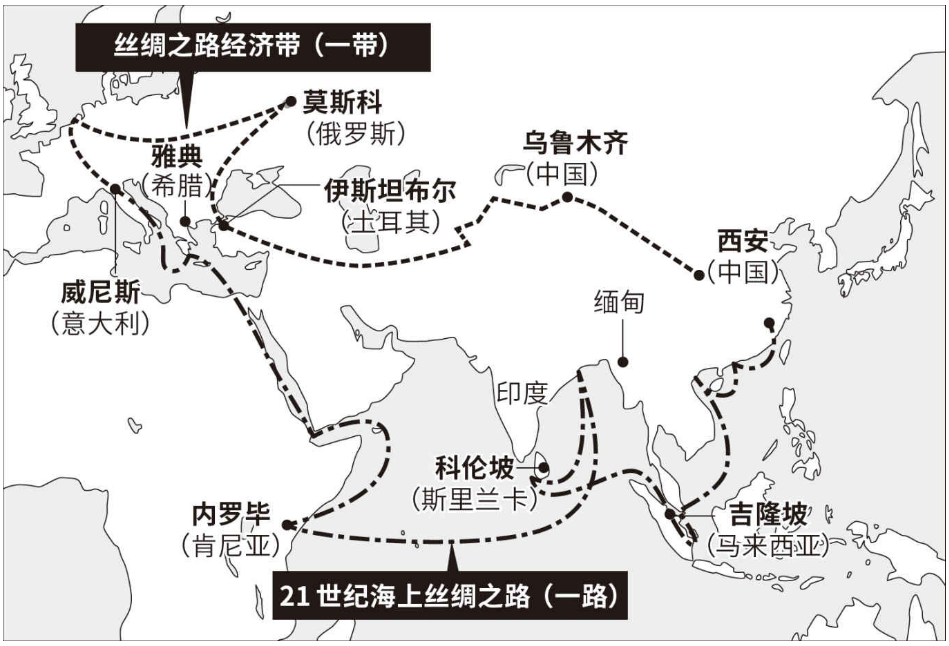
中国“一带一路”倡议的目标是什么

世界经济之所以没有被雷曼危机摧毁，多亏了亚洲经济的飞速发展，尤其是中国。中国在全球性经济危机的紧急关头拿出4万亿人民币对国内进行基础设施建设，内陆地区的高速铁路、高速公路等都得到了完善，“内陆农业地区”的开发进展神速。

内陆地区的基础设施建设是中国经济实现腾飞的必要条件。当时中国对美国和欧洲的出口急剧减少，需要投入巨额资金用于基础设施建设以带动经济持续发展。

2008年以后，中国又投入巨额资金用于沿海地区修建高速铁路和高速公路，以推动内陆地区的大规模城市化，重庆迅速发展成为不亚于北京与上海的大都市。

大规模的基础设施建设使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超越日本跃升至世界第二。但短期内的大量投资所导致的建设泡沫也给地方政府带来巨额债务，这使中国面临着泡沫随时可能破裂的危机。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和经济的持续发展，中国的劳动力失去价格优势，部分外资撤出中国市场。2012年，中国保持了接近30年的2位数经济增长率下跌到7％。



“一带一路”倡议

中国倡议的“一带一路”（The Belt and road）是“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简称。它将充分依靠中国与有关国家既有的双多边机制，借助既有的，行之有效的和平发展的旗帜，积极发展与沿线国家的经济合作伙伴关系，共同打造政治互信、经济融合、文化包容的利益共同体、命运共同体和责任共同体。

“一带一路”周边有64个国家，拥有全世界63％的人口，GDP占全世界总GDP的29％。中国通过将自身的影响力发展到欧亚大陆，将给19世纪以来由英国和美国组建的现代世界经济体系带来新的转变。

电子货币是时代发展的必然趋势

1990年以后，互联网在全世界迅速普及，虚拟空间覆盖了全球。与互联网具有极强亲和性的金融也随着大型计算机的应用而不断地扩展规模，电子化的大量数字在虚拟空间里来回往复。世界进入产生于互联网终端的电子货币取代纸币的时代。

尽管电子货币在安全性及强化IT行业主导权等方面存在诸多问题，但仍然无法阻止电子货币全球化的发展脚步。

作为信用卡社会的美国在IT技术的促进下，维萨卡的系统处理速度高达每秒2.4万件。电子交易使金融交易的速度得到了几何级数增长。

中国也进入到使用智能手机的无现金时代，纸币逐渐被以互联网为依托的电子货币所取代。而在银行网点数量不足的非洲，利用智能手机进行交易的方式也迅速得到普及。

新加坡、加拿大、爱沙尼亚等许多国家的中央银行也纷纷开始推行与纸币挂钩或者开发与研究取代纸币的电子货币。

个人资产也可以通过互联网的界面显示出来，现实中纸币的存在感愈发降低。许多企业发行的各种购物卡渗透进生活的方方面面，纸币与作为其“交换证明”的电子货币之间的界限已经变得越来越模糊了。

但虚拟的数字随时能够转变为纸币给电子货币的价值提供了保证，这也是不争的事实。

解读货币历史的关键29

随着互联网的普及，电子货币 在全世界得到普及。

各国的中央银行都在考虑将货币 的一部分替换成电子货币 。

第12章　从世界史的角度分析比特币不能成为货币的原因

比特币真的是革命性产物吗

在雷曼危机爆发的2008年，一位署名“中本聪”的人在互联网上发表了一篇关于利用区块链技术管理比特币的论文。

比特币又称为“虚拟货币”或“加密货币”，但准确来说它并不属于货币。

区块链指的是由互联网上的多台电脑共享交易记录，相互监视并将数据像锁链一样连接起来进行管理的技术（分散式记账）。数据块在互联网上每10分钟被记录一次并以锁链式保存，因此无法篡改，这也保证了比特币的安全性。

比特币的诞生主要有以下三个背景：

1．互联网与智能手机的普及。

2．货币的材质由纸转变为数据的可能性增大。

3．雷曼危机使证券泡沫破裂加快，人们对金融商品和资金失去信任。

因此，中本聪提出应摆脱中央银行的监管，让个人或企业可以自由地在互联网上创造数字货币。此外，由于比特币的发行量有限，所以不会出现通货膨胀的问题。

尽管倡导者说得很像那么一回事，但对于比特币为什么只有特定的个人拥有制造权限，以及用什么来担保其价值等关键问题却只字未提。

尽管比特币确实具有能够在本国货币信用较低的国家保证资产价值、方便汇款、结算成本低廉等优点，但缺乏为其价值提供保障的体制和安全技术都是难以解决的现实。

而比特币的支持者却声称比特币的生产需要消耗大量的电力和时间，因此具有与黄金等贵重金属同样的价值。比特币的特点包括以下几点：

1. 是看不见摸不着的虚拟货币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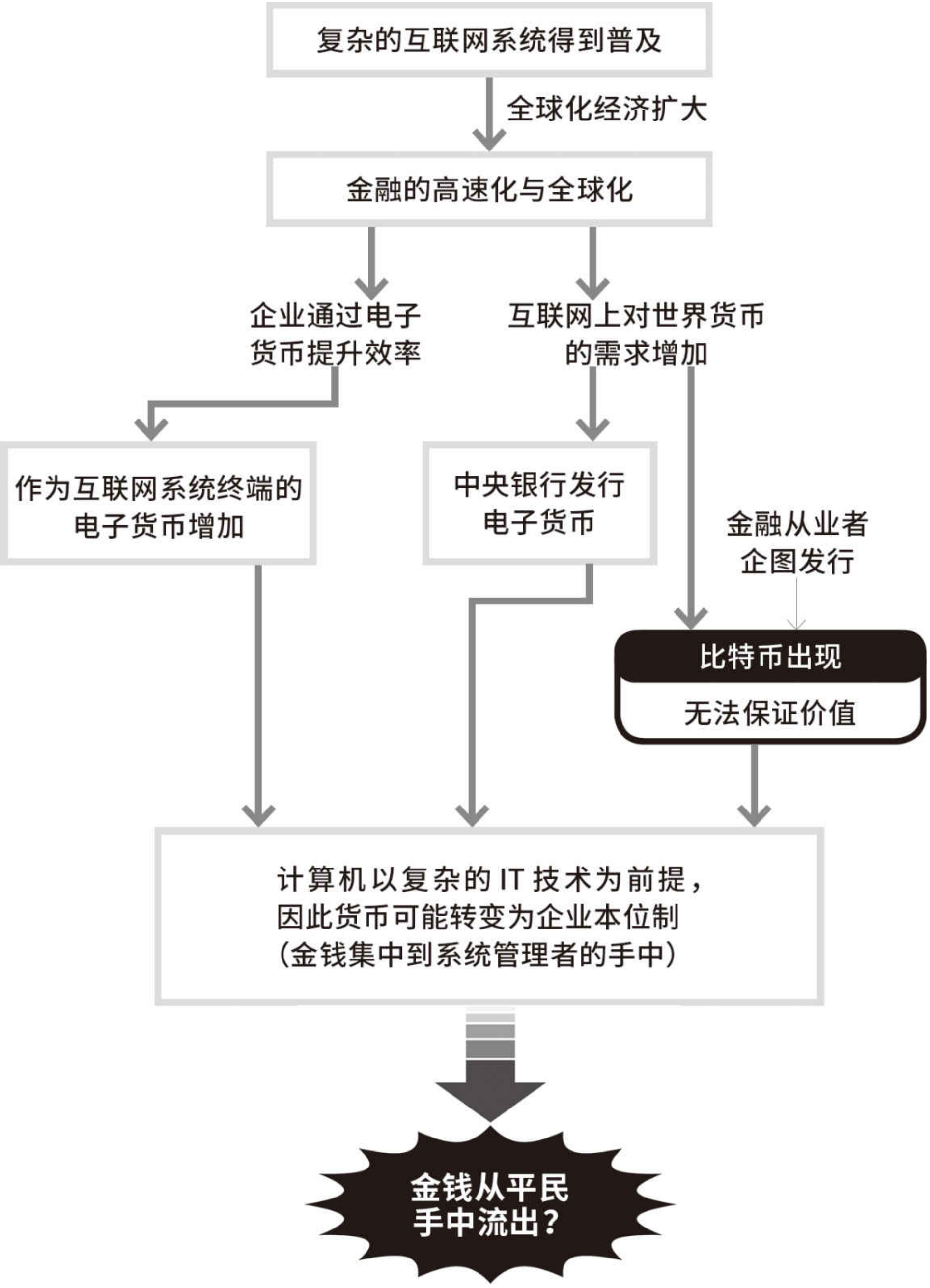
2. 实体是存在于计算机上的电子数据。

3. 能够独立于国家使用的国际货币 。

4. 由参与货币 网络的个人、企业来进行生产和发行。

5. 密码式安保体系 。

比特币将上面几个要素组合到了一起。维持这种体系以及生产比特币都需要庞大的费用，所以比特币具有非常高的价值，这就是比特币支持者的观点。



从纸币到电子货币

一个完整的货币系统，除了“货币本身”之外还需要“货币体系”，这两者缺一不可。目前，世界上的不兑换纸币采取的是由190多个国家的中央银行提供价值担保的体系，而在互联网上流通的无国籍比特币并不具有普通货币的公共性。

归根结底，还要看拥有货币发行权的国家在这个问题上做出怎样的选择了。

解读货币历史的关键30

> 将金钱的体制与区块链技术相结合的比特币 诞生。

能够私人制造的比特币很难具有公共性

从时价总额来看，比特币占全部的46％，俄罗斯人发明的以太币占全部的23％，仅这两者就占了总额的七成。因此本书将比特币以及之后出现的近1000种的所有代币都统称为“比特币”。

货币的定义是“国家为价值提供担保并强制流通的金钱”。因此，日本政府并不承认比特币属于货币。2017年，还取消了对比特币征收消费税。

事实上，日本政府似乎并没有将比特币看作商品，只是将其看作单纯的支付手段（工具）。

曾为民间银行的英格兰银行以给政府提供低利息的军费贷款换来了纸币的发行权，最终被收归国有，成为英国的中央银行。由此可见，货币的公共性是全世界的共识。

特别是尼克松冲击使货币变为不兑换纸币之后，由各国中央银行和政府实施行政管理货币制度好不容易才维持住世界货币的稳定。只有美国出于历史原因仍然由民间银行继续保持货币的发行权。

从英镑和美元纸币可以私人制造的时代直到现在，人们对货币的认识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结合上述情况来看，标榜“不受国家管理”的比特币，实际只能实现以下作用：

1．将货币管制严格国家的金钱送往他国。

2．洗钱。

3．应对经济突变。

4．企图一夜暴富的投机工具。

塞浦路斯事件使比特币引发关注

比特币的支持者坚称比特币本身是有价值的，并将比特币的制造过程称为“挖矿”，意思是就像开采黄金一样。但这实际上只是一种宣传而已，就像媒体经常用金币的图片来宣传比特币一样。

这些宣传都是为了让更多的人相信制造比特币需要花费巨额的成本，而且其总量是有限的，所以比特币拥有和黄金相同的价值。

比特币曾经是“只要拥有能够长时间运转的大型电子计算机，任何人都可以制造”的虚拟货币，亚马逊上甚至还出售过比特币的制作手册和制造用的计算机。但据说最近一些国家的专业“挖矿”公司利用专用大型计算机24小时不间断地进行挖矿作业，几乎生产了大约八成的比特币。

这样一来比特币就处于被垄断状态，那么比特币作为“民主的货币”任何人都能够制造的宣传口号也就不攻自破了。

比特币在发行初期的几年间一直默默无闻，直到2013年希腊债务危机导致“避税天堂”塞浦路斯也爆发了金融危机后才进入人们视野。当时，作为向塞浦路斯提供金融援助的条件，欧盟要求对其银行存款征收10％的税金，这就是“塞浦路斯事件”。

对于将资金都存在塞浦路斯的外国富豪来说，这个消息不啻于晴天霹雳。将资产转移到塞浦路斯的俄罗斯富豪们（塞浦路斯银行资产的1/3都来自俄罗斯）全都开始想办法保护自己的财产。

通过银行将存款转移到海外需要花费很多时间，而在这个期间存款很有可能遭到冻结。但能够利用电脑进行资金转移的比特币则

可以迅速且秘密地将资产转移到国外，可以说是保护资产的最佳选择，结果比特币的价格一下子暴涨。

现在全球经济局势瞬息万变，导致人们心中充满不安，加之有些国家对货币的监管非常严格，无法将资产转移到国外，因此比特币被一些人当成了转移资产的工具。

区块链技术能够改变货币的概念吗

现在，比特币还被当成一种投机手段，价格单日浮动10％——30％的比特币已经开始出现小型泡沫。这种小型泡沫使人生出“比特币本身具有价值”的错觉。

2018年，比特币交易所Coincheck遭到黑客袭击，价值463亿日元的“NEM”（一种虚拟货币）被洗劫一空。黑客还巧妙地通过暗网中开设的交易所换成了比特币，最终成功套现。这次事件也使人们对虚拟资产的安全性产生了巨大的疑问。

与此同时，有人提出作为比特币基础的区块链技术将彻底改变传统的货币概念。

区块链被称为“分散型公开记账技术”，进行交易的当事人双方可以不通过管理者就能够确认交易的真实性，作为电子货币不可或缺的技术，加拿大、英国、新加坡等国的中央银行以及摩根大通、巴克莱银行、瑞银集团等大型银行也在共同进行研究。

最近各大媒体都在报道关于比特币、区块链以及AI等前沿科技所带来的金融革新。关于货币未来的发展，就交给互联网和金融专家们去研究吧，而笔者对货币从银币到纸币再到电子货币的历史的讲解就在这里告一段落。

附：参考文献

青木康征“南米ポトシ銀山”（中公新書・2000年）

秋田茂“イギリス帝国の歴史”（中公新書・2012年）

浅田實“商業革命と東インド貿易”（法律文化社・1984年）

安部悦生“経営史”（日経文庫・2002年）

I・ウォーラーステイン著川北稔訳“新版史的システムとしての資本主義”（岩波書店・1997年）

石坂昭雄他“新版西洋経済史”（有斐閣・1985年）

板谷敏彦“金融の世界史”（新潮選書・2013年）

岩井克人“二十一世紀の資本主義論”（ちくま学芸文庫・2006年）

ウルリケ・ヘルマン著猪股和夫訳“資本の世界史”（太田出版・2015年）

エドウィン・グリーン著関哲行他訳“図説銀行の歴史”（原書房・1994年）

エドワード・チャンセラー著山岡洋一訳“バブルの歴史”（日経BP社・2000年）

M・ボー著筆宝康之他訳“資本主義の世界史”（藤原書店・1996年）

越智武臣“近代英国の起源”（ミネルヴァ書房・1966年）

金井雄一他編“世界経済の歴史”（名古屋大学出版会・2010年）

ジャック・アタリ著林昌宏訳“金融危機後の世界”（作品社・2009年）

大村大次郎“お金でわかる世界の歴史”（KADOKAWA・2015年）

川北稔“イギリス近代史講義”（講談社現代新書・2010年）

黒田明伸“貨幣システムの世界史”（岩波書店・2003年）

佐伯啓思“「欲望」と資本主義”（講談社現代新書・1993年）

ジョナサン・ウィリアムズ著湯浅赳夫訳“図説お金の歴史全書”（東洋書林・1998年）

ジョン・K・ガルブレイス著都留重人監訳“マネーその歴史と展開”（TBSブリタニカ・1976年）

ジョン・K・ガルブレイス著鈴木哲太郎訳“バブルの物語”（ダイヤモンド社・1991年）

ジョン・K・ガルブレイス著村井章子訳“大暴落1929”（日経BP社・2008年）

玉木俊明“近代ヨーロッパの誕生―オランダからイギリスへ”（講談社選書メチエ・2009年）

チャールズ・R・ガイスト著菅下清廣監修“ウォール街の歴史”（フォレスト出版・2010年）

中尾茂夫“入門世界の経済グローバリゼーション500年の歴史から何を学ぶか”（文眞堂・2013年）

中尾武彦“アメリカの経済政策”（中公新書・2008年）

中村勝己“世界経済史”（講談社学術文庫・1994年）

西川潤“新・世界経済入門”（岩波新書・2014年）

ピーター・バーンスタイン鈴木主税訳“ゴールド 金と人間の文明史”（日本経済新聞社・2001年）

ビル・トッテン“アングロサクソン資本主義の正体”（東洋経済新報社・2010年）

フィリップ・D・カーティン田中愛理他訳“異文化間交易の世界史”（NTT出版・2002年）

福田邦夫“世界経済の解剖学”（法律文化社・2014年）

水野和夫“人々はなぜグローバル経済の本質を見誤るのか”（日経ビジネス人文庫・2013年）

水野和夫＋川島博之“世界史の中の資本主義”（東洋経済新報社・2013年）

牧野純夫“ドルの歴史”（NHKブックス・1964年）

湯浅赳夫“文明の「血液」”（新評論・1988年）

マルコ・ポーロ愛宕松男訳“東方見聞録1”（平凡社東洋文庫・1970年）

リチャード・A・ヴェルナー著吉田利子訳“円の支配者”（草思社・2001年）


经纬度
アマゾン銀行が
誕生する日
2025年の次世代金融シナリオ
[日] 田中道昭 —— 著
Michiaki Tanaka
杨晨 —— 译
新金融帝国
智能时代全球金融变局
NEW FINANCIAL EMPIRE
未来30年全球金融格局预测
详解迫在眉睫的数字金融取代实体金融之役
2020—2050年新经济时代必备案头书
火币大学校长，工业和信息化部信息中心工业经济研究所原所长 于佳宁 博士鼎力推荐
阿里巴巴和腾讯比现有金融机构更接近于金融的本质。
——本书作者 田中道昭
如果不主动数字化，我们旧金融业企业将必死无疑。
——星展银行首席执行官 高博德
浙江人民出版社

新金融帝国

智能时代全球金融变局

アマゾン銀行が
誕生する日

2025年の次世代金融シナリオ

[日] 田中道昭 —— 著
Michiaki Tanaka

杨晨 —— 译

浙江人民出版社

浙江省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章图字：11-2019-394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新金融帝国：智能时代全球金融变局/（日）田中道昭著；杨晨译. —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20.9

ISBN 978-7-213-09782-9

Ⅰ．①新… Ⅱ．①田…②杨… Ⅲ．①金融—科学技术—研究 Ⅳ．①F830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20）第155210号

AMAZON GINKO GA TANJO SURU HI 2025 NEN NO JISEDAI KINYU
SCENARIO by Michiaki Tanaka.
Copyright © 2019 by Michiaki Tanaka. All rights reserved.
Originally published in Japan by Nikkei Business Publications, Inc.
Simplifi ed Chinese translation rights arranged with Nikkei Business Publications,
Inc. through Hanhe International (HK) Co., Ltd.

新金融帝国：智能时代全球金融变局

[日] 田中道昭　著　杨晨　译

出版发行：浙江人民出版社（杭州市体育场路347号　邮编：310006）

市场部电话：（0571）85061682 85176516

责任编辑：尚　婧　胡佳佳

营销编辑：陈雯怡　陈芊如

责任校对：陈　春

责任印务：刘彭年

封面设计：异一设计

电脑制版：尚艺空间

印　刷：

开　本：710毫米×1000毫米　1/16

印　张：20

字　数：206千字

插　页：4

版　次：2020年9月第1版

印　次：2020年9月第1次印刷

书　号：ISBN 978-7-213-09782-9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市场部联系调换。

序

欣闻日本著名经济学家田中道昭的新书《新金融帝国：智能时代全球金融变局》中文版即将付梓。承蒙浙江人民出版社的邀请，我在第一时间详细阅读了本书的清样，阅读后，深感这是一本值得每一位金融和科技从业者详细阅读的好书。这是因为，日式的金融科技创新虽然长期被我国金融业忽视，但却又是特别值得我们深入思考和学习的“合规样板”，其长期发展潜力更是绝对不容忽视。下面从我本人多次赴日考察学习的实际体会，谈谈为什么日本的金融科技领域非常值得关注。

我本人是中国人民大学金融学专业博士毕业，2018年之前在中央部委下属的研究机构工作，曾任工业和信息化部信息中心工业经济研究所所长等职务。后来，我还应邀主编出版过《2018中国区块链产业白皮书》等一系列行业报告。可以说，我对金融科技特别是区块链领域的关注由来已久，从2013年起，我便开始深入研究区块链等金融科技领域的发展，在2018年，我本人更是“All-in”（全身心地投入）区块链，以“链接产业、赋能实体”和普及“区块链思维”为初心，创办了“火币大学”，专门从事以区块链为代表的金融科技教育。

在过去的两年中，我曾多次率领由中国新锐企业家和投资人组成的火币大学“全球区块链领导者课程GBLP”游学团到日本考察学习，重点考察日本金融科技、数字金融、区块链应用以及相关监管法律政策的最新进展。在考察学习过程中，我们与日本金融厅综合政策局政策立案总括审议官松尾元信，日本央行Finech中心负责人副岛丰，日本参议院原议员、原外务大臣政务官滨田和幸等高级政治家和监管官员交流了日本金融科技领域的立法思路和监管原则；

我们向上智大学法学院教授森下哲朗、一桥大学法学院教授小川宏幸等金融科技领域顶级专家学习了日本前沿理论和最佳实践；我们和东海东京金融控股公司金融科技业务负责人全俊，日本区块链领军企业EMURGO CBO 吉田洋介，火币日本CEO陈海腾，亚洲通讯社社长徐静波，野村证券金融科技业务负责人等日本知名金融科技领军企业家研讨了中日金融科技的行业趋势和最新机遇。

经过和这些顶级专家的多次研讨交流，日本金融科技特别是基于区块链和加密资产的数字金融的产业形态，及其背后的日式创新逻辑也越发清晰，之前我们研讨的2020年行业趋势中的一部分正在成为现实，还有一些趋势因为“新冠病毒”疫情的原因推迟了，但我相信在未来一两年内也会一一实现。

恰巧我也看到，田中道昭先生的新书《新金融帝国：智能时代全球金融变局》更是通过大篇幅，系统性描绘了正在发生的日本和全球金融科技变革图景。其中不仅包括三菱日联金融集团、瑞穗金融集团、SMBC 集团这些日本老牌金融机构自我变革的案例，更有乐天、LINE、雅虎软银联盟、SBI等“跨界竞争”的新金融颠覆者的成长故事，读来有趣又有益，更有启发性。除此之外，他还花了不少篇幅系统性总结了全球范围内金融科技的领先企业的成功经验，其中重点描绘的案例包括亚马逊银行、DBS银行以及中国的阿里巴巴（蚂蚁金服）、腾讯等。田中道昭先生搜集了大量的资料以解读这些案例，深入浅出地提出了一些可参考、可借鉴、可利用的理论模型，读起来非常精彩。我觉得，读读日本专家眼中的中国互联网巨头金融科技实践，也是一件非常有趣且引人深思的事情，无论是金融科技领域的从业者，还是刚刚开始了解这个行业的“小白”，都能从中获得不少启示。

同时，我在书中也发现了一个严重的问题，由于日本经历了“失去的20年”，人口老龄化等问题也非常严重。同时日本近年来

在信息技术领域，特别是金融科技领域也没有特别显眼的成果，因此有些企业家认为日本创新势头已经大不如前，甚至认为日本在新一轮技术革命中“掉队”了，也就是已经落后于中国。但是，根据我之前的实际考察交流和深度研讨的结果，可以认为，书中所说的这种日本“掉队论”是站不住脚的，更是一种严重的误解，背后的原因就在于，中日两国在金融科技方面的创新逻辑和环境存在重大差异。尽管日本企业在具体的实践案例方面的知名度不如中国，相关企业的数量也少于中国，但是日本作为在金融科技特别是加密资产和数字金融领域率先立法和监管的国家，在立法原则、监管逻辑、应用普及等方面在全球范围内具有领先性。这种较为扎实、严谨、开放的监管环境，从长期看，是有利于产业健康持续发展的，因此未来亚洲金融科技的“领头羊”在哪里，这个问题现在还有一定悬念。

因此，我觉得我们应该严肃认真地研究日本学者对于金融科技的思考和研判，细致周到地观察理解日本数字金融领域最新案例，全面深刻地理解日式创新文化，并准确深入地把握日本对金融科技的监管逻辑，这对补齐我们的业务短板、规避风险、推动行业长期的稳健发展将会大有裨益，而文化和认知的“同频”，才能让我们真正有机会与日本领军企业深度合作，进军极具潜力的日本市场。

除去书中所叙述的内容，根据我们的观察，当今日本的金融科技行业有以下三个特点值得特别关注：

一是有预见性的立法和清晰的监管逻辑，使得日本的金融科技创新有着完善而优越的发展环境。例如，日本是全球第一个针对区块链加密资产全面立法的国家，其法律法规正在逐步覆盖区块链产业链上的诸多领域，相关监管水平在世界范围内处于相对领先地位。日本的加密资产监管以反恐怖融资、反洗钱、用户保护这三大要素作为出发点，重点针对八大问题进行监管，即加密资产盗窃风

险、虚假夸大宣传、托管机构的应尽义务、操纵市场等不正当行为、匿名加密资产的洗钱风险、交易平台破产清算、保证金杠杆交易以及加密资产发行。

另外，在日本金融科技监管体系中，行业自律组织同样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例如，JVCEA（Japan Virtual Currency Exchange Association）作为日本金融厅官方授权的加密资产交易业行业自律机构，是数字金融监管链条的重要一环。JVCEA会员单位由日本22家合法持牌的加密资产交易所构成，参照《金融商品交易法》对日本的数字货币交易所制定规则和标准操作程序，对各家加密资产交易所及其推荐的项目进行行业自律监管和资料审查，并有权对违反行业规则的公司采取行动。

日本国税厅则将加密资产交易所得的收益归入了“其他收入”栏目，这是全球首个在国家层面对于加密资产相关税收进行明确要求的法律规定。日本的加密资产监管体系已经覆盖加密资产的发行、项目的持续监控和信息披露、交易平台，最后以税收作为抓手，通过详细的法律法规和金融厅、国税局、JVCEA三大机构共同协作，组成了完整的监管闭环。可以说，日本的区块链应用、加密资产和数字金融监管体系对于全球各国的监管当局有着重要启示和样板意义。

二是坚决采用最新技术，紧跟产业前沿变革趋势。在我们参访日本央行的过程中，副岛丰曾表示：作为重要的金融监管机构，日本央行持续密切第跟踪研究区块链相关应用。日本央行虽然目前暂不考虑发行央行数字货币，但是正在密切跟踪研究区块链技术。我们看到，日本央行正在加快推进与欧洲央行合作基于Stellar项目的区块链跨境支付系统。在用于小额支付的稳定币方面，日本主要由商业银行等民间机构进行探索。例如书中就提到，日本三菱UFJ银行、瑞穗银行等已经推出稳定币。很多日本大公司更是已经在充

分探索后，建立了基于区块链技术的移动支付体系。在日本52190家店铺可以直接接受加密资产付款，其中包括电器连锁店Bic Camera、旅行连锁店HIS、六本木的奢侈品店等高知名度的商家。火币日本更是通过“区块链＋公益”的方式，为遭受火灾的世界遗产冲绳首里城进行加密资产链上募捐。日本大型的铁路集团JR日本铁路公司（Japan Railways）东日本公司发行的公共交通卡“西瓜卡”（Suica），也或将开放加密资产充值通道。

三是将新技术迅速普及推广到更多的产业领域。原定在2020年举办的东京奥运会，虽然因为“新冠病毒”疫情的原因推迟到2021年，但日本仍将使用区块链等技术用于食品溯源保障奥运村的食品安全，同时将用于反兴奋剂工作中。在教育领域，日本政府与索尼公司合作融合区块链和AI技术建立“智能学校平台”，旨在为每一个学生提供行针对性的精细化教育方案。在诸多区块链的应用中，感谢经济（Thanks Economic）也是一个很具日本特色文化的企业，有日本公司正在尝试用通证经济方式帮助人们表达感谢，让加密资产可以成为个体的荣誉勋章，用区块链实现“做好事，链上留名”的模式让人耳目一新。

为什么日本区块链创新应用普及发展得如此迅速？这和日本稳健扎实的创新风格有关。日本对区块链的包容和商业应用，正与日本企业的经营文化——古老企业现代管理思想紧密关联，不求短期利润最大化，只追求长期价值增长，并注重各利益相关人的紧密盟约关系，这使得日本企业非常注重能够长期创造价值的创新转型，正所谓“不鸣则已，一鸣惊人”。

日本丰富的区块链应用创新体现了这个行业发展的无限可能。21世纪20年代将是金融科技之大创新、大应用、大发展的“伟大十年”。据我研究判断，2022年中国以区块链应用为首的金融科技市场规模将达到千亿规模。21世纪20年代，区块链行业更是会加速进

入“区块链3.0”阶段，链接产业、赋能实体、纳入监管、合规经营将成为区块链行业的主旋律。有效合理的监管会成为行业健康持续发展的重要保障，而全球化的合规意识也将成为全行业从业者的“底线思维”。通过观察日本这一全球区块链“合规模板”，可以有效判断在合规环境下的经营战略，从而提前布局把握“区块链3.0”的时代先机。

是为序。

火币 大学校长、工业和信息化部信息中心工业经济研究所原所长

于佳宁

目　录

CONTENTS

序

导言　即将到来的2025年4月

感觉不到在进行银行交易的舒适体验

通过去现金化实现社会自动化

价值观的变化改变着金融

撰写本书的初衷

第1编　重新审视“金融应有的样子”之战

第1章　竞争格局

即将到来的世界

去现金化的本质和价值观

围绕霸权的三场战役

新一代金融业的主要参与者

第2章　新规范

可以模拟复制金融的时代

银行的作用和担保主义的界限

基于数据的本质性审查

现有金融机构的优势

第3章　基于金融工作经验的自我约束和问题意识

雷曼破产的元凶

“金融即是科学”的边界

忽略客户的商业模式

金融真的能创造价值吗

第2编　金融颠覆者的战略

第4章　亚马逊银行的诞生

“万能公司”的金融业务

全球最忠实于客户的公司

低价格＋丰富的产品阵容＋快速配送

大胆的愿景和超高速PDCA模式

“DAY 1”的精神

始于“一键”的结算和金融业务

无意识支付的科技

面向商家的融资——“亚马逊贷款”的革新

基于层状结构的精准预测

第5章　引领中国成为全球最先进金融科技大国的阿里巴巴与腾讯

以金融为业务核心拓展生活服务

比现有金融机构更接近金融本质

基于PEST分析不断发展的中国商业环境

第6章　阿里巴巴：以构筑世界第五大经济体为目标

担任盈利核心的蚂蚁金服

一切始于“支付宝”

一站式资产管理服务——“蚂蚁财富”

面向个人或企业的信用评分机制——“芝麻信用”

支援中小企业的“网商银行”

独创的保险产品——“相互保”

理解蚂蚁金服的两个关键点

第7章　腾讯：从社交、游戏到金融业务的展开

最大的优势是亲密且频繁的客户接触点

涵盖投资、银行、保险和信用评分

扩张平台的良性循环

中美分裂时代出现的风险

世界上最先进的金融科技大国——中国的今天

第8章　日本的金融颠覆者

构筑平台，扩大规模经济范畴

乐天：“经济体的超扩张”蓝图

LINE：在客户接触点的竞争中处于领先地位

雅虎软银联盟：推出热门话题的PayPay支付

SBI：继续“颠覆”的指数型成长公司

第3编　现有金融机构的反击

第9章　高盛和摩根大通的决定

雷曼冲击和金融科技的崛起

大型金融机构的反省和摸索

高盛：“最优秀与最聪明”的选择

摩根大通：对IT年均投资1万亿日元

第10章　日本银行的数字化转型

摆脱传统银行业务

三菱日联金融集团：打破创新困境

瑞穗金融集团：积极与有潜力的科技公司合作

三井住友金融集团：致力于打造开放式创新平台

日本的大银行还剩下什么

失去汇款手续费的收入

海外业务是大银行最大的风险因素

绝不能输的战斗

第11章　“全球最佳数字银行”——星展银行

“自我毁灭”的重生

公司核心业务的数字化

最强城市国家——新加坡的宿命

“自我毁灭”的议程

甘道夫转型计划

杰夫·贝佐斯如果有银行的话，他会怎么做

通过开放API创建“隐形银行”

数字化转型的成果

第12章　“金融4.0”来自日本

巴塞尔银行监管委员会的近期设想

我预想的2025年新一代金融蓝图

对日本金融机构的建议

新一代金融场景的关键点——区块链

新一代金融场景的关键点二——新的价值观

“金钱”到底是什么

新金融系统——“金融4.0”

返回总目录

导言　即将到来的2025年4月

2025年4月18日，铃木和夫（化名，32岁）在“Amazon Go四谷店”这家无人便利店买了份午餐，从该店步行至东京四谷地铁站仅需1分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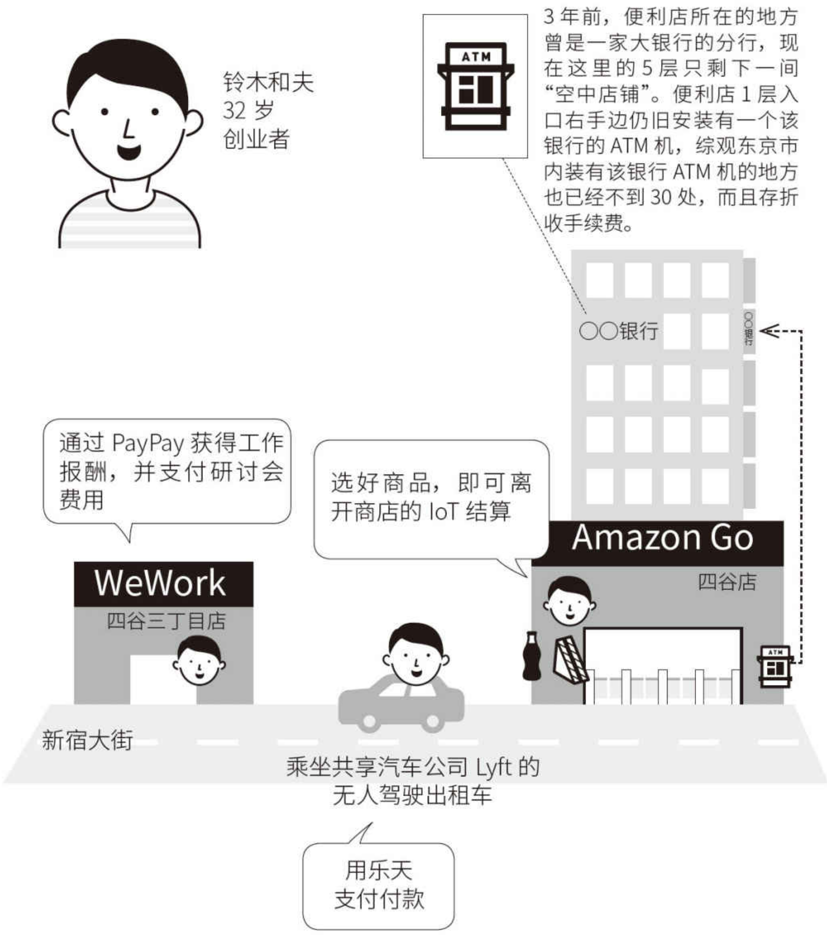
3年前，便利店所在的地方曾是一家大银行的分行，但现在这家大银行在同一建筑物的5层仅剩下一间“空中店铺”，该分行专门从事一些公司交易的业务。

截止到2025年4月，Amazon Go在北美已经拥有超过5000家店铺。就连4年前才开始引入的日本，也已经拥有300多家店铺。

四谷店是Amazon Go在日本开业的店铺中面积最大的一家。除了设有就餐空间外，还有开放式咖啡厅，为顾客自由地工作和学习提供便利。

由于这里之前是那家大银行的分行，所以Amazon Go便利店的入口右手边仍旧安装有该银行的ATM机。综观现在设有该银行ATM机的地方，即便在东京市内也只剩不到30处。

中年男性们习惯在存折上记账，但是自从存折收取手续费以来，大家开始普遍利用电子银行管理自己的账户。铃木也一样，在电子银行APP上管理自己所有的银行业务。对银行来说，存折虽然落伍了，但仍然被提供给有需求的客户。与存折一样，ATM机也仅限于在附近商店的现金消费者们，或是对去现金化有较强抵触者使用。我们认为，为了帮助继续使用现金的人而保留ATM机，被认为是颇具日本特色的一种行为方式。



即将到来的 2025 年 4 月

铃木和客户曾一起拜访过位于5层的那家大银行。那时，铃木一行和这家投资银行的业务代表，曾就一项方案进行了面对面的洽谈。从这一行动可以看出，即便到了2025年，还是会有不少人倾向于将专业性强、需要信任度的交易业务交由银行来打理。

感觉不到在进行银行交易的舒适体验

Amazon Go四谷店备有手机扫码和面部识别两种进店方式，选择哪种进店方式可由用户自行决定。不过，如果从无现金结算的角度看，前者属于物联网（IoT）结算，后者属于面部识别结算。

铃木在Amazon Go购物时，会使用亚马逊银行账户的自动扣款功能完成支付。在这里，支付币种是亚马逊在其规模经济贸易区内发行的通用货币——“亚马逊币”。3年前，亚马逊在日本成立了电子银行，自此以后便被许多人当作线上/线下分支机构以及日常生活的支付工具。亚马逊银行的宗旨是“感觉不到在进行银行交易的舒适体验”，即丝毫没有在实体店里进行消费的不适感。

通过去现金化实现社会自动化

今天，铃木选择了一份500日元的三明治和一瓶150日元的茶饮作为午餐，待他拿到手后“直接离开”便完成了购物和支付。要知道在两年前，车站对面的便利店里，午餐时间还经常能看到10人以上排队结账的场景。相反，在Amazon Go里面，即便人再多也都是十分便捷，还“拿完即走”。而且，Amazon Go里面售卖的三明治味道甚至不亚于附近西餐厅或茶饮店售卖的三明治。由此可见，Amazon Go无论是价格还是购物时间上都非常划算。

铃木一离开Amazon Go，就坐进了一辆停在便利店门口的自动驾驶出租车内，该出租车是由一家名叫来福车（Lyft）的共享汽车公司所提供。在日本，来福车共享汽车是来福车与乐天共同出资组建的，而铃木所使用的支付车费方式正是乐天公司出品的乐天Pay。早在6年前，铃木就看好已经上市的来福车公司，因此他将乐天积分兑换为原始股金，使用乐天Pay及其应用程序内的乐天证券，对来福车进行了小额股票投资，而且整个投资及运作过程完全都通过“乐天币”来完成。

2020年，日本便已允许部分自动驾驶汽车的运营。因此到2025年4月的时候，“自动化”早已渗透入社会经济各个领域。有了扫码支付和刷脸支付这样的物联网支付体系，随着去现金化不断加深，“自动化——无人化”和共享单车也开始在日本普及。

铃木乘坐自动驾驶出租车，在位于四谷三丁目的联合办公企业WeWork公司下了车。WeWork公司，这家专营共享办公空间的企业是由软银集团出资10兆日元经营的。2018年12月软银集团上市后便加大了对WeWork的资金投入，现如今WeWork已经拥有300多家分店。铃木来这里的原因，是为了参加中午1：30在这里举行的“面向作家的市场营销入门讲座”。趁着讲座开始前的时间，他在开放空间享用了刚刚购买的午餐。

WeWork的特色不仅在于能提供线下办公空间和公共社区，而且还能在线上提供虚拟公共社区。随着从事副业的人不断增加，人们在追求工作环境舒适的同时，也开始追求线上的舒适体验，因此线上社区的会员登录人数至今已经突破了300万人次。

这时，软银和雅虎共同出资创立的二维码支付公司PayPay，也已进入日常生活的各个方面。如铃木通过WeWork接订单、以作家身份获取的报酬、参加活动支付的费用等，都是用PayPay以无现金方式来完成的。铃木最近来自WeWork的进账比较多，所以他正好用PayPay的自动扣款功能支付了房租。3月，铃木出差去了东南亚的3个国家。在那些国家里主要使用的是支付宝，但是因为PayPay与阿里巴巴的支付宝有业务合作，因此为他在那些国家开展工作提供了许多便利。

价值观的变化改变着金融

现在像铃木这样不在某一特定的公司或组织工作，而是以发挥自己的特长和个性为工作内容的自由职业者越来越多。究其原因，一方面是由于注重发挥自己特长和个性的价值观风行；另一方面是由于科技不断进步，电子化与共享化越来越成为主流。

前几天，铃木从市谷搬到了四谷。他最担心的便是，以自由职业者身份能否入住。即便入住，住所能否比之前在大公司工作时住过的地方更好？令人欣慰的是，“信用评分银行”完美地解决了铃木的顾虑，顺利帮他实现了入住。

2018年以来，阿里巴巴集团提供的信用评分服务——“芝麻信用”在日本成为热议话题。结合日本自身的文化和特点，这项服务在日本逐渐演变成“日式信用评分”服务。中国的体系可以被认为是对人信用的监督，即“统制型”模式，而日本的体系则是人的信任加信用，即“互补型”模式。

以铃木租房子为例，除了铃木的收入以及他自由职业者的身份这两个硬性指标以外，在日本还会将他平常从周围获得的信任转化为具体分值，从而补充上述指标中的不足。比起学历、工作单位、年薪等信用指标，一个人本身所拥有的信任也越来越受到重视。科技的进步让人们实现了遵从人本心的价值观来生活。

尽管有些人看中的是传统型职业，但是随着像铃木这样从事多份职业的人不断增加，比起公司的名气和自己在公司的职位，对自我的认知以及对工作的态度变得越发重要。在一些多人联谊会上，越来越多的人不仅跟别人交换自己工作单位的名片，也开始交换自己在公司外的各种兼职工作的名片。比起公司的名气和自己的职位，个人的生活方式和工作方式越来越受到关注。

人不是单独地活在这个世界上的，因此信任十分重要。钱只不过是让这个世界能够更加顺畅运转的工具而已。而且，在2025年之时，每个人的个性和特长、生活方式和工作方式，以及最重要的价值——信任都会通过新的金融体系进行评价。

撰写本书的初衷

上述这个发生在2025年4月的小故事怎么样？这是我基于2025年4月可能发生的情形，再结合我自己对金融服务业的理解后编写的故事。尤其是在预测金融行业的未来时，我感觉在市场和科技的进化背后，人类价值观的重要性越来越高。

我于2017年和2018年分别出版了《亚马逊的大战略》和《2022年新一代汽车行业》两本著作。其中，《亚马逊的大战略》是我从自己的专业“战略与市场”和“领导力与使命管理”这两个角度出发，分析对国家及社会有重大影响的亚马逊战略计划对未来有什么影响。而《2022年新一代汽车行业》是我从新一代汽车行业的竞争格局出发，解读各大企业的营销战略，阐述与之相关的科技发展，明晰日本汽车行业的出路。

我本人是金融专业出身，之前曾在日本、美国和欧洲的金融企业工作过。即便是现在也仍然供职于金融机构部门，另外我还担任金融期刊《金融财政状况周刊》的轮流负责制审稿人。本书是我首次从自己的专业观点出发对金融行业进行分析，因此对我来说意义非凡。

本书以新一代为对象，分析解读各大企业的营销战略，阐述与之相关的科技发展，明晰日本金融行业的出路。和前两部著作一样，本书也可以作为学习新一代其他行业的“战略与市场”和“领导力与使命管理”的参考书籍。

本书选取了全球三大金融颠覆者（Disruptor）亚马逊、阿里巴巴和腾讯，日本金融颠覆者乐天、LINE、雅虎软银联盟和SBI，不断变革的美国金融机构高盛和摩根大通，以及日本三大银行、新加坡的星展（DBS）银行这些对象，对这些企业的金融竞争战略进行详细的分析。

本书的第1编介绍的是当前金融行业的竞争格局，令读者对新一代金融领域有一个整体认识；第2编介绍的是金融行业的各个颠覆者；第3编介绍的是传统金融机构的战略构想。

现实中，2025年4月可能和序章开头的预测完全不同。但伴随着美国金融机构的逆袭和中国金融行业颠覆者的不断前进，2025年4月全世界的金融业也许都会陷入更加残酷的境地。由于现实往往不是朝人们所期待的方向发展，因此在最后1章，基于巴塞尔银行监督委员会对未来的预测，我将从专业角度出发，详细阐述自己对2025年的金融业设想。

我衷心期待本书能为新时代的新金融创新贡献一份微薄力量，同时也能为日本金融业找到出路提供一臂之力。

第1编　重新审视“金融应有的样子”之战

第1章　竞争格局

即将到来的世界

让我们假设一下，现有的传统金融体系遭到破坏，然后被新一代金融体系取代，将是个什么样子。

以无现金支付为代表的金融科技（FinTech）所带给我们的便捷和舒适，相信有不少人已经感受到了。而这，便是本书要谈到的，即将到来的新一代金融体系。

想要全面了解新一代金融体系，原本就不是件容易的事。因为它的进化速度以及相关科技公司的经营战略，都和我们目前熟知的金融体系大相径庭。

例如，2018年乐天Pay和LINE Pay、软银与雅虎共同出资的PayPay等非现金结算服务备受关注，因此人们也称2018年为“去现金化元年”，可以说去现金化的潮流就是从这里开始的。

去现金化4.0

如果我们把信用卡时代叫作“去现金化1.0”，电子货币时代叫作“去现金化2.0”的话，那么现在我们常用的手机支付时代就应该叫作“去现金化3.0”。而即将到来的“去现金化4.0”则应是指刷脸支付、声纹支付以及物联网支付的时代。科技的进步，让这些原本听上去仿若“天方夜谭”的事物今已化作现实，进入我们真实的生活。

相信在支付宝和微信引领下，无现金支付方式飞速发展的中国，将会成为去现金化4.0时代的领路人。在被称为“中国硅谷”的深圳，肯德基甚至已经导入了刷脸支付的无现金结算体系。

在本书最后部分，我将以自己2019年3月在阿里巴巴总部——“智慧城市”杭州的体验为例，剖析中国金融体系的颠覆者阿里巴巴。希望通过我的分析，能让大家感觉到去现金化4.0时代已悄然来临。

物联网支付、声纹支付

自2018年，亚马逊面向消费者推出无人收银便利店Amazon Go以来，不少人已体验了无人化购物和支付。顾客只需用智能手机在类似自动检票机的入口处扫一下二维码，就可以识别自己的亚马逊ID，继而进入店铺购物。在店内，顾客只需从货架上选择所需商品后即可带货离开。离开时，电脑会自动结账，购物明细单同时自动发送到顾客手机上。这种运营模式在技术上就是物联网支付的一种。

同样，亚马逊声纹识别语音助手“Amazon Alexa”也让语音支付成为可能。用户只需对着装有语音助手的手机说一声“Alexa，给我一盒明治巧克力”，就能完成购物和支付。这种便捷性已经超过了手机支付。

尽管手机支付在不断普及，但我们现在已经发展到不需要手机的时代，面对这种更新换代的频率，不知大家能否理解已经出现的高科技企业呢？

真正的创新——价值观

在认识并理解新一代金融业时，我们要注意，这种“新”并不是要去追逐某项飞速发展的功能或服务，而是应体现在价值观上。对于价值观这个问题，我们一定要重新细致分析，而笔者撰写本书还有一个目的是揭示出“金融业应有的样子”。

去现金化的本质和价值观

当问及金融服务的价值观时，让我们再回顾一下什么是去现金化。之前说的去现金化在这里不仅是不需要现金，它还具有更重要的意义。

三个潮流

去现金化建设有三个主流，分别是去现金化、无人化与自动化、共享化与服务化。

在去现金化的先驱中国，我们已经看到去现金化正在促进无人化与自动化的向前发展，而无人化与自动化又进一步推动了共享化与服务化的进步。

我在《2022年新一代汽车行业》一书中对新潮流的描述如下：

特斯拉构建的新能源环保体系，即电动化；谷歌以更方便享受世界为目的的革新，即自动驾驶；优步和来福车从独立到共享，以革新都市设计为使命的发展，即共享服务，它们与亚马逊那仅靠说话就能办事的卓越用户体验一起，把各式各样的事物连接起来，实现智能住房、智能用车和智能城市，最终达到万物互联。

戴姆勒用“CASE”这4个字母作为上述新潮流的简称。在CASE（Connected 互联、Autonomous自动化、Share& Services服务与共享、Electric 电动）战略中，特别是自动化对其他3个组成因素的影响力最不容忽视。

在新一代金融业中，自动化是非常重要的。在日本，伴随着少子老龄化、结构性劳动力不足等问题，通过自动化迈向无人化是理所当然的发展趋势。而在这个过程中不可或缺的便是去现金化，因

为在结算时如果有人介入的话就称不上是无人化了。不仅是汽车行业，无人化与自动化已经逐步渗透到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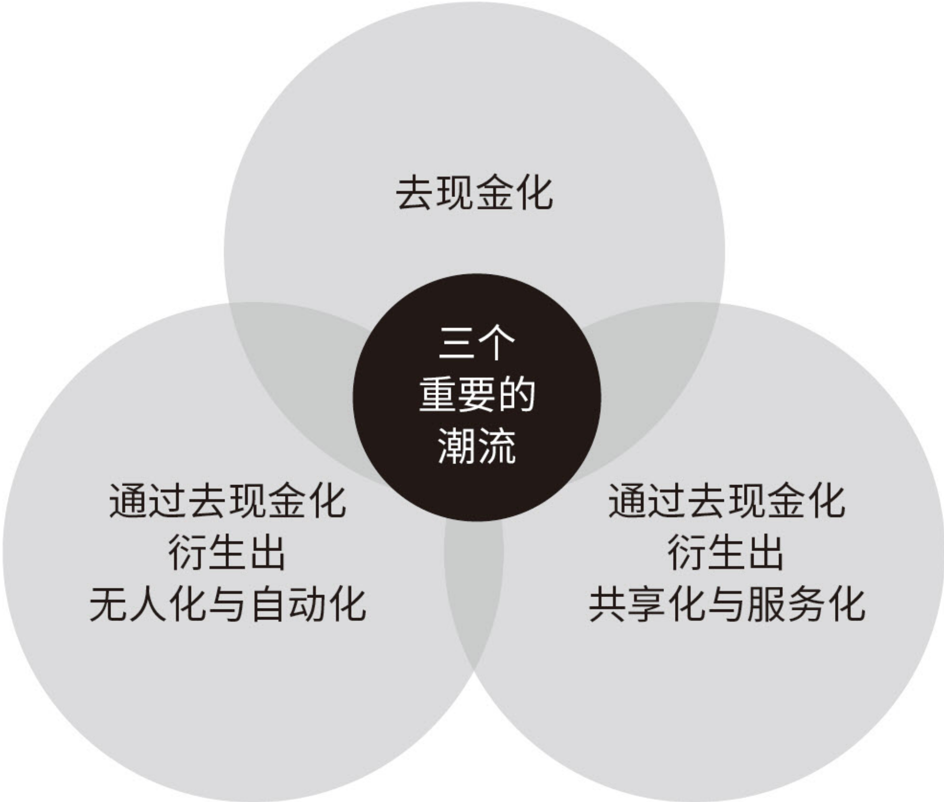


图1-1　三个重要的潮流

共享和可持续性

比刚刚提到的自动化与无人化更重要的是共享服务。制定企业的经营战略时，如果从政治（Politics）、经济（Economy）、社会（Society）、技术（Technology）这四个视点进行“PEST分析”，一定会发现共享和可持续性这两个关键词。

在此我想强调的是，这两个词已不只在书本里出现了。如2018年的夏天，大家已经意识到酷暑难耐不只是嘴上说说而已，已经真正能感觉到“再这样地球上就待不下去了”“地球环境已经越来越糟了”。

以环境变化为背景，投资环境（Enviroment）、社交（Social）和管理（Governance）方面经营卓越的企业，即“ESG投资理念”公司，已经开始在全球范围内普及。投资者中间更是出现了“要抛售那些不能持续发展公司的股票”的声音。

今天，可持续性已成为最重要的价值观之一，它因年轻一代中大部分人负债而形成。我有一个刚大学毕业两年的女儿，有一天她跟我说：“爸爸那个时代，可以买车过奢侈的生活，真好。但是到了我们这个时代，大家都那么做的话只会加速全球变暖。”比起奢侈地挥霍，共享、极简的生活方式已经成为当代大部分年轻人的主流价值观。

因此，共享化与服务化，与其说是商业观念，还不如说是一种价值观。

共享化随着去现金化慢慢走进我们的生活，令去现金化、自动化和共享化之间形成三位一体的关系。这方面的表率者阿里巴巴和腾讯，是怎么构建去现金化体系的？共享化又是如何普及的？说起中国的共享普及，就必须提到滴滴出行，该企业是由阿里巴巴和腾讯分别出资的企业并购而成，并购前这两家企业在共享出行市场属于竞争关系。

共享化，无论是自行车行业还是汽车行业，都属于去现金化的服务。它的最基本前提就是能使用智能手机进行操作。因此，共享化和去现金化就像一枚硬币的正反两面，本质是一样的。

1 科技公司与现有金融机构之争。

2 围绕客户接触点、客户体验以及与客户维持良好关系的斗争。

3 重新定义所有行业的秩序与格局之争。

图1-2　新一代金融业的竞争格局

围绕霸权的三场战役

围绕新一代金融行业的霸权之争，可以归纳出以下三个场景：

科技公司与现有金融机构

第一场战役是科技公司和现有金融机构之间的竞争。

本书中的科技公司特指以亚马逊、阿里巴巴和腾讯为代表的金融科技巨头以及新兴的高科技企业。这些公司拥有与现有金融机构完全不同的出身，它们以独创的平台、大数据与人工智能为武器，快速跻身于金融服务领域。他们打破传统金融行业的布局，将以颠覆为目标的“亚马逊效应”传播到所有行业。提起亚马逊，想必有些人对它的印象还停留在他们是做电子广告和网上书店的时代。其实这些印象已经是过去式了，如今的亚马逊正在逐步创建从“一键式”到支付、现金充值和融资等的综合金融服务。

与之相比，现有金融机构所具有的最大优势就是它们的品牌影响力和信誉度。这不仅对各国政治经济都具有某种程度的影响力，甚至能够延缓中国引领下新一代金融科技的发展，进而维持它们在

金融行业的霸主地位。现在，它们正在加速金融服务的数字化转型，向金融科技企业转型升级。

围绕与客户维持良好关系的战役

第二场战役是围绕客户接触点、客户体验，以及维持与客户良好关系展开。

在所有行业的业务中，被认为“理所当然”的便利性和快捷性，对传统金融机构而言，却并不是“理所当然”。传统金融机构比较缺乏与客户的接触，忽视客户体验以及建立与客户之间持续的良好关系这些服务理念。说白了，传统金融机构给人的印象就是不方便，因此被大家所嫌弃。如今，在大银行分行的柜台长时间等待办理业务的客户不断减少，而利用移动端支付转账反倒是司空见惯。反观金融科技公司最大的优势，就在于重视传统金融机构缺乏的服务理念，即通过与客户接触、追求客户体验的方式，与客户建立良好的关系。

虽然无法知晓像美国的GAFA（Google、Apple、Facebook、Amazon）以及中国的阿里巴巴、腾讯等金融科技公司，在追求客户体验的道路上走到了哪一步，但他们创建的“理所当然”似乎正在刷新传统金融机构的“理所当然”。可见，新一代金融业正以完全不同于传统金融业的方式脱颖而出。

重新定义所有行业的秩序和格局之争

第三场战役即为重新定义所有行业的秩序和格局之争。

从本质上讲，金融服务本身并不具有什么价值，因此与用车、在外面吃饭、买衣服等消费服务不同。人们不会在早上起来说：“今天好想消费金融服务。”但同时，金融已经与所有的消费服务

联系在一起，其影响力已经覆盖到所有行业。因此新一代金融业的诞生，以及它重新定义所有行业的秩序和格局是自然而然的结果。从历史上可以看出，金融行业本身的发展会产生创造性的破坏或是破坏性的创造。在这个过程中，掌握霸权的越来越有可能不是那些大型金融机构或金融科技公司。

下面，就让我们看一下参与这些战役的主角们的动向。

新一代金融业的主要参与者

亚马逊：涵盖了以支付为代表的主要金融服务

今天，曾以网上书店起家的亚马逊，已逐步发展为涵盖家电、时装和生活用品的“万能商店”。换句话说，亚马逊已成功转型为集物流、云服务、网络视频、无人便利店以及太空事业等产业于一身的“全能公司”。除此之外，亚马逊进军金融服务领域也不是新鲜话题了，比如面向入驻亚马逊的商家提供的信贷服务“亚马逊借贷”，用于结算服务的“亚马逊币”，帮助没有开设银行账户和信用卡的顾客实现网购的“亚马逊现金”和“亚马逊礼品卡”等，都算是一种广义上的存款服务。因此，集合了信贷、支付和存款这三大主要业务的“亚马逊银行”的诞生，只是时间问题而已。

亚马逊，以金融科技公司的身份跻身于金融行业，是推动新一代金融业大潮的佼佼者。但在此我也想强调，亚马逊绝对没有扩展金融业务以外业务的想法。

关于这一点，亚马逊与本书介绍的另外两个金融科技巨头——阿里巴巴和腾讯明显不同。亚马逊的创始人兼CEO杰夫·贝佐斯一心只想着提高客户体验，加强零售与电商交易，进而实现亚马逊规模经济的扩张。由此可见，金融只不过是杰夫·贝佐斯在实现规模

经济扩张的过程中的一件工具而已。其中，最显而易见的例子就是“一键支付”：过去需要在网上输入信用卡信息和住址等，才能完成从支付到配送等一系列的繁杂手续，现在只要如网站的文字所示，点击一下确认就可以完成。这项创新型的金融服务带来的便捷性，使亚马逊的零售与电商交易额呈现爆发式的增长。

相信未来出现的与亚马逊相关的金融服务，包括“亚马逊银行”在内，都将以扩张亚马逊规模经济为中心开展其业务。

阿里巴巴、腾讯：成就全球最先进的金融科技大国——中国

目前中国是全球最发达的金融科技大国。在中国，不仅金融机构的附带业务和周边业务在快速发展，就连金融机构原有业务上的自动化和数字化也在不断翻新。

中国新一代金融业的主要参与者是阿里巴巴和腾讯。尽管在中国，它们早已尽人皆知，但在日本和欧美地区，大家还没有像熟悉亚马逊那样熟悉阿里巴巴和腾讯，所以往往会忽视它们的潜力。但如果你能深入了解，必然会看到“阿里巴巴才是金融科技企业中的王者”“腾讯正在猛追阿里巴巴”这样的事实。

阿里巴巴和中国最大搜索引擎百度，以及提供社交网络服务的腾讯，并列为中国三大IT企业。阿里巴巴主营业务是企业间电子商务交易的1688.com、普通消费者之间C2C交易的淘宝、B2C交易的购物平台天猫等多个电商网络平台。除电商交易外，阿里巴巴还通过进军物流、线下分支机构、云服务以及金融服务业等，来扩张自己的规模。从这点来看，阿里巴巴的成长轨迹与亚马逊极其相似。

但是阿里巴巴和亚马逊不同，阿里巴巴从一开始便注意到了金融“支付”业务，并为此单独成立了蚂蚁金服。随后它便以二维码

支付的应用程序支付宝为核心，不断拓展阿里巴巴的金融业务边界。换言之，阿里巴巴规模经济的前提就是支付宝。由此可见，阿里巴巴最大的战略目标就是以支付宝为突破口，吸引用户使用阿里巴巴规模经济提供的各种生活服务，进而扩展阿里巴巴规模经济。

今天，支付宝已经渗透到中国社会的各个角落，在大城市，“不用支付宝就不能支付”的商店也已经屡见不鲜。支付宝俨然已经成了中国社会不可或缺的“基础设施及服务”（IaaS）之一。

在阿里巴巴提供的其他金融服务中，有一些服务项目甚至比银行更加亲民，而且阿里巴巴持有的包括金融商品在内的实质资金量，完全可以与大银行比肩。笔者在《亚马逊的大战略》一书中指出，未来在金融领域，阿里巴巴将完全处于领跑位置。

最让人惊讶的是，阿里巴巴甚至还抓到了传统金融机构忽视的“金融本质”。如果现在有人问金融存在的意义或金融应有的样子是什么，那么，阿里巴巴正好可以回答，因为其想要展现的部分，恰恰最接近于“金融应有的样子”。像我这种任职于传统金融机构的人也不得不承认这个不可否认的事实。关于这一点，我在后面还会继续详细说明。

腾讯是由主打社交软件“微信”，而被大家所熟知的知名IT企业。微信系统自带的支付服务——“微信支付”，与支付宝并列为中国最流行的两大移动支付手段。

如果对比支付宝和微信支付，我们会发现它们之间最重要的区别就是，前者的主体是支付服务软件，后者的主体是社交软件。前面我介绍过，新一代金融业之争有一场重要战役，那就是围绕客户接触点、客户体验，与客户维持良好关系的战役。尽管支付宝和微

信在客户接触点方面都做得很不错，但是支付宝本身只是个单独的支付软件，它的使用机会也仅限于“购物”时的付款。

相较之下，微信支付是与社交软件微信捆绑在一起的，因此给朋友发送信息时照样可以产生支付。从每天的使用频率上说，微信显然超过支付宝。因此，在作为新一代金融业霸权战争中的关键舞台之一，即“客户接触点”方面，微信支付要比支付宝更具有优势。

简单来说，腾讯以拥有客户优势的微信为中心，纵向统合以支付为首的金融服务，企图最终全方位支配消费者的生活服务。

那么依照同样的分析，在日本最有可能获得新一代移动支付霸权地位的，将是LINE支付。作为每天使用频率与客户接触点最多的平台，社交软件LINE的市场份额也是庞大的。

乐天、LINE、雅虎软银联盟、SBI：日本的金融颠覆者

在日本，金融科技公司与传统金融机构的竞争格局可以说十分清晰。下面将重点介绍作为日本金融颠覆者的代表的乐天、LINE、雅虎软银联盟和SBI。

它们中的大部分都在尝试沿袭科技巨头公司的商业模式，也就是从在线构筑平台，到发布支付应用程序的全过程。该模式中，最重要的环节是智能手机上构筑的平台。因为在新一代金融业中，能够与客户建立多大程度亲密且频繁的联系至关重要。

在这方面，拥有日本最大通信应用程序的LINE处于有利地位。随着通信应用程序的发展，LINE已进化成支持用户生活的“智能门户”。与此同时，LINE于2014年12月还推出了LINE Pay，LINE Pay

具有用户生活中必不可少的支付功能，可以说是LINE开展金融科技业务的基础。2018年，LINE公布了与野村证券联合推出的LINE证券信息，以及将与瑞穗银行合作成立的LINE银行添加至智能门户的计划。

毋庸置疑，乐天是日本金融颠覆者中最大的“综合玩家”，也是日本最大的网购市场之一，但实际上它2018年第三季度总销售额的35.7％却是来自金融科技领域。即便如此，乐天还是为日本提供了日本国内交易量最大的包括乐天信用卡、乐天支付、乐天Edy卡、乐天积分卡、乐天银行、乐天证券、乐天人寿和乐天财保等在内的全方位金融服务。但乐天拥有的最大资产，则是以乐天会员为中心的会员数、数据以及品牌。会员使用通用ID在乐天提供的各类服务中游走，形成了庞大的乐天生态系统（规模经济）。

雅虎软银联盟于2018年秋季推出了二维码支付服务PayPay。该支付服务将基于商务和支付业务渠道的数据，发展集借贷、投资及保险于一体的一站式金融业务。可见，在这点上雅虎软银联盟与乐天是一样的。

接下来是SBI控股集团。在苦苦挣扎的几家大型证券公司中，SBI证券在互联网证券领域当属第一。自2012年以来，SBI集团的账户数量以每年10.3％的速度持续高速增长，目前排名全日本第二，仅次于最大的野村证券。这几年开始，SBI集团制定的大战略已经不局限于“金融”和“日本”的框架，他们的口号已变为“以金融为核心，超越金融”。因此，它们正在尽可能采用虚拟货币和区块链等新技术，在日本和全球扩展业务。SBI集团由230家公司组成，他们试图通过提供多样化的服务来改变“社会”。

高盛、摩根大通：美国金融机构的反击

目前传统金融机构受到了以三大科技巨头为首的互联网公司的冲击。

但实际上，自从雷曼兄弟破产以后，美国金融机构的反击便已开始。它们采取的是一种“选择与集中”的生存策略。从业务规模上看，它们在扩大规模，实质上却是缩小，尤其是花旗银行通过缩小业务范围显而易见地带来了利润的改善。早在2015年，花旗银行就已经将面向个人的银行业务出售给了三井住友银行，并短暂性地退出了日本该业务领域。如此一来，他们将资源集中在公司的核心业务上，这便是“选择与集中”的一个环节的具体体现。

我们要说的另一个关键词是“数字化转型”。早在几年前，高盛和摩根大通已经在谋求向科技公司转型。正如我们稍后将详细讨论的那样，本书中强调的数字化转型不仅仅是指服务的数字化。摩根大通的首席执行官杰米·戴蒙曾宣称：“谷歌和脸书将是我们未来的竞争对手。”可以看出，他们所倡导的数字化转型是指“刷新公司的DNA”，即从根本上革新。

其中，高盛决定缩小其主要业务的贸易部门，并涉足人工智能便是一个标志。高盛是一家投资银行，在日本类似于证券公司，即专门面向机构投资者和大公司提供服务的银行。2016年，高盛设立了面向中产阶级的个人互联网银行GS Bank，以提供数字信贷平台Marcus，以期能进军日本市场。

值得注意的是，虽然都是在线银行，但Marcus与10多年前在日本出现的在线银行有很大区别。以前许多互联网银行只是传统银行将其部分线下业务置换成线上业务形成的在线银行而已，但是Marcus通过全流程的数字化操作和强有力的移动端策略等，完全彰显出了新一代金融行业的发展趋势。

更令人震惊的是，被誉为“最佳投资银行”的高盛将进军零售市场。如果高盛以其品牌影响力为零售业提供新价值的话，那么它在日本也可以获得可观的市场份额。

三菱UFJ金融集团、瑞穗金融集团和三井住友金融集团：日本大银行的数字化转型

由于以上原因，日本大银行在提供在线服务方面感到了危机。虽然开始得比较晚，但他们还是纷纷效仿美国的高盛和摩根大通，迅速步入了数字化转型的行列。率先开始数字化转型的是三菱UFJ金融集团（MUFG），其次是瑞穗金融集团（Mizuho FG）和三井住友金融集团（SMBC Group）。

在这里，我想先介绍一下三菱UFJ金融集团的数字化转型过程。三菱UFJ金融集团于2017年9月公布了“数字化转型战略”，并宣布开始从传统的银行业务改革。同时，在2018年度启动的中期业务计划中，数字化战略正在横向推动11个支柱产业的结构改革，我认为这恰好证明了数字化转型的本质，即“从公司的根本上革新”。

在他们的具体举措中，首先是强化交易渠道。自2007年以来，三菱UFJ金融集团的分支机构顾客数量下降了约40％，而选择在线支付的用户数量在5年内却增加了约40％。这意味着，三菱UFJ金融集团必须提供多种交易渠道来应对交易方式的变化才行。为此，他们首先扩大的是非面对面的交易渠道，比如智能手机应用程序和常见问题自动应答电话，具体包括促进使用面向个人的互联网银行业务，改善用户界面、用户体验以及扩充功能。还有就是以前只能在实体店办理的业务，例如重新发行银行卡和存折、变更地址等。

截止到2018年3月，在日本500多家分支机构中，已有100多家分支机构转型为新一代“MUFG NEXT”分支机构。而且三菱UFJ金融集团还在引入新型的ATM机“STM”。该ATM机可以处理可视电话呼叫、税收和生活缴费等交易，从而提高分支机构运营的效率。它们的目标是，到2023年将新终端的引入率提高到100％。

当然，人工智能和大数据的使用还是必不可少的。在服务台、票据处理、检索、销售支持和审查5个主体中，日本大银行提倡促进AI替代业务的政策，预计未来10年，接近40％的业务将被AI取代。

即便如此，仍不可否认的是，日本三大银行在数字化转型方面已经落后于美国金融机构。而且，在追求客户体验方面，热衷于在线服务的美国的金融颠覆者是更胜一筹的。

然而现在就断言“日本的大银行没有机会了”恐怕还为时过早，因为新加坡星展银行的经历正在为我们提供一种合适的生存技巧。

星展银行：世界第一的数字银行

传统金融机构的数字化转型中，星展银行当属世界第一。星展银行分别于2016年和2018年获得金融信息杂志《欧洲货币》授予的“世界最佳数字银行”称号。正如银行名字那样，它应当是世界上最优秀的数字银行。该银行总部位于新加坡，主要面向的市场是中国、印度、印度尼西亚和新加坡。

星展银行的前身是大约50年前诞生的新加坡发展银行，2009年开始逐步向数字化转型，而它改革的背后便是亚马逊、阿里巴巴和腾讯等科技巨头公司的崛起。与其他感受到科技巨头公司的威胁，

但却不愿数字化的传统金融机构不同，星展银行的管理层一致认为“逃避的话就只能坐以待毙”。

因此，星展银行决定实施数字化转型的速度远比日本的大银行快得多。为什么星展银行发展这么快？这是与新加坡的地理位置和历史特性紧密相关的。“日本就像加拉帕戈斯群岛，对外封闭”，这是典型的Japan Bashing的一种（因为它封闭，所以只能从海外传入），可是对内，日本却有一个庞大的市场。然而，新加坡是个小国，只有相当于东京23区的领土面积，可以说几乎没有任何资源，只靠自身立足是不可能的。在这种情况下，新加坡星展银行索性反守为攻，利用其在东南亚的中心位置，吸收了许多来自各国公司、各个领域的先进技术。简言之，新加坡从一开始就不可能成为“加拉帕戈斯群岛”。可见，星展银行对亚马逊、阿里巴巴和腾讯的应对措施要早于欧洲、美国和日本的传统金融机构。

换句话说，星展银行以科技公司为目标，而不是以欧美的金融机构为蓝本。而且星展银行也熟悉科技公司为金融业带来的新规范。这就是星展银行源于传统金融，却仍然可以从本质上进行数字化转型的原因。

星展银行试图提供的是优质的客户体验和客户旅程。除了数字产品和数字服务这些表面的数字化以外，星展银行还在尝试改变后台业务应用程序和基础设施，并在此基础上，建立适宜的企业文化。

“将公司的本质数字化”，这是他们的原话。这句话的意思是尝试在不抛开公司框架的前提下，替换公司内容，星展银行正在实施开展这项重大改革。对于刚刚启动其数字化转型战略的日本金融机构而言，星展银行的数字化转型中应该效仿的事情有很多。

第2章　新规范

可以模拟复制金融的时代

在第2章中，我总结了几点内容，希望大家先期对此有所了解。

首先，金融是可以模拟复制的。

诸如存款、贷款、汇兑等业务已不再被银行垄断。即便没有获得严格法律法规的约束，所有的金融业务也都可以被模拟复制，而今天以亚马逊为代表的金融颠覆者就实现了这一点。

金融颠覆者的垂直整合

其次，金融颠覆者对金融服务进行了垂直整合。

垂直整合在前文所述的两本书——《亚马逊的大战略》和《2022年新一代汽车行业》中都是重要的关键词。这可以说是新的参与者在统合自己领域以外的业务的同时，掌握控制权的举措。例如，为了增加零售与电子商务的销售额，亚马逊大力发展了支付业务。而且，从那以后亚马逊又开始扩大其金融业务，到现在已然囊括了所有主要的金融服务业务。阿里巴巴表现得更加直接：它以支付功能作为入口，将业务扩大到其他生活服务方面。腾讯则以社交应用为入口，垂直整合其金融业务，以支配消费者的整体生活服务。

其中成为赢家的是与客户建立了持续、良好关系的参与者。要想在新一代金融游戏中获胜，关键就看在智能手机平台上是否拥有更加亲密的高频互动。

客户体验也是关键之一，客户体验差的平台迟早会被淘汰。最后的结果是，客户与平台或公司保持平等关系的同时，建立起一种持续的良好关系。新一代金融业之战就像是平台大战，最终就是围绕着与客户的关系而展开的。

1	金融可以模拟复制。
2	金融颠覆者垂直统合金融（比现有金融机构更能发挥金融业的本来功能）。
3	金融也被要求“理所当然”的东西。

图2-1　新一代金融行业的格局和状况

摧毁传统

最后，在这样的时代，金融也被要求一些“理所当然”的东西。对日本的银行来说，一直以来“不方便”都是理所当然的。然而，在这个什么都可以通过互联网完成的时代，谁也不会愿意来到某个银行的分行，被迫在窗口等待，接受不太友好的服务。

另一方面，互联网企业呢？他们提供的是“方便”“省事”“不花时间”“自动完成”“愉快”“感受不到交易已经完成”等优质用户体验的服务，而这些和传统的金融机构提供的服务截然不同。

在围绕新一代金融行业的战争中，迫切需要变革的当属现有的传统金融机构。现在，并非提供现有金融机构认为“理所当然”的

服务，而提供互联网企业认为的“理所当然”的服务，将是十分紧迫的课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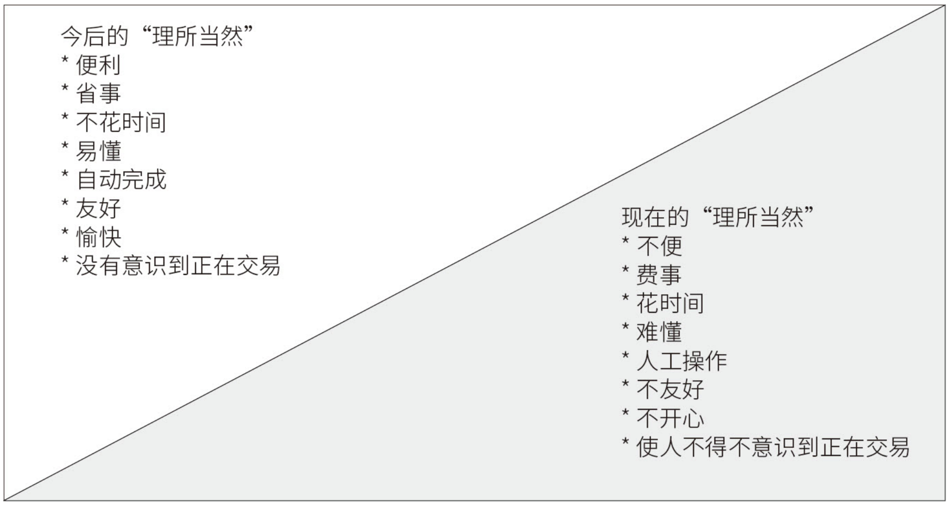


图2-2　现在的“理所当然”与今后的“理所当然”

其结果就是，我们所熟知的现有金融机构将会发生巨大的变化。那时，什么会被破坏，什么又将会保留下来？

被破坏的东西，就是所谓的“传统”。具体来说就是分支机构、人员和系统。金融行业的秩序也会被破坏，行业的领域（界限）会被破坏，其在业界的地位和影响力会被破坏。另外，现有的功能和存在的意义也会被破坏，甚至金融体系本身也会遭到毁灭性打击。

银行的作用和担保主义的界限

在此，让我们来梳理一下金融机构的作用。

银行的三大功能是金融中介、信用创造和结算，提供这些功能的三大业务是存款、贷款和汇兑。在这里，我想重点谈一谈金融中介，也就是把大家的存款集中起来贷给别人的业务。

金融中介，简而言之就是从资金盈余部门聚集资金，并将其融通到需要资金的部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银行作为金融中介充分发挥其作用。特别是在日本，以大企业和基础产业为中心的资金需求非常旺盛。当时，直接融资尚不发达，而面临的资金需求又十分旺盛，因此银行的金融中介功能显得尤为重要。

我们知道，为了满足企业和个人的资金需求，银行推出了借贷服务。在贷款审查中，银行采取了担保主义，而且面向个人的贷款业务重视其偿还能力，具体需要看该贷款人的职业和年薪。

银行的担保主义到现在也没有太大的改变，企业拥有多少担保额，很大程度上受企业信誉影响。个人贷款的时候，银行会检查贷款人在形式上有多少偿还能力，所以个人的年薪和银行方面可以获取到的现有贷款金额会被格外重视。从高度成长期开始的一段时间内，这种机制发挥了很大的作用，另外金融当局的金融政策也发挥了作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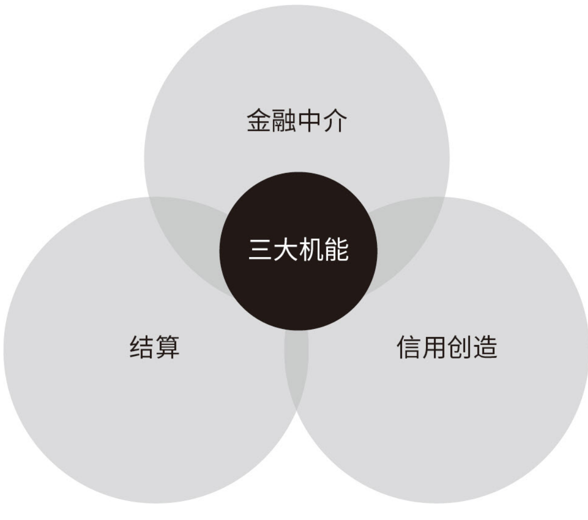


图2-3　银行的三大职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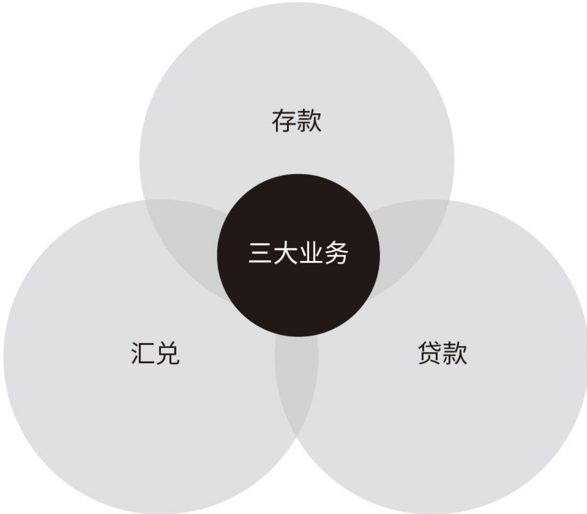


图2-4　银行的三大业务

对小微企业和个人的审查能力不足

近年来，无论是大企业还是基础产业都没有以前那样旺盛的资金需求了，而且让投资者出资的直接融资方式已全面渗透到各个行业。

取而代之的是，资金需求者变成了中小企业、小微企业或个人。那么，银行对他们是否充分发挥了金融中介功能呢？答案是否定的。银行并没有履行其三项主要职能之一的金融中介功能，这是因为对奉行担保主义的银行来说，它们缺乏对小微企业和个人的真实信用度进行评估审查的能力。

基于数据的本质性审查

像亚马逊和阿里巴巴这样的金融巨头，在开展贷款业务时，不是以担保为主，而是看中借方本身的信用，这一点的确与众不同。亚马逊和阿里巴巴利用它们自己的平台，把更本质的个人信用信息作为大数据积累起来，然后用于贷款业务方面。从这一点来看，金融颠覆者们比现有金融机构更接近于金融的本质。

尽管银行可以审查担保企业的信用能力，但是银行业界原本就没有以商流为核心进行审查的方法，这是因为他们没有活用企业的商流数据。虽然，银行拥有从企业到企业的汇款信息这一“宝藏”，但却没能将其作为大数据进行利用。

另一方面，在新一代金融玩家们拥有的巨大平台上，承载着商流、物流和资金流，我们可以将其称为新一代金融玩家们的三大功能。比如“亚马逊贷款”和阿里巴巴面向中小企业的贷款业务就是与商流连接的。亚马逊掌握着亚马逊平台上商家们的售卖信息，甚至通过“亚马逊物流营运”控制着物流，根据这些积累的数据来审查借方的信用能力，然后放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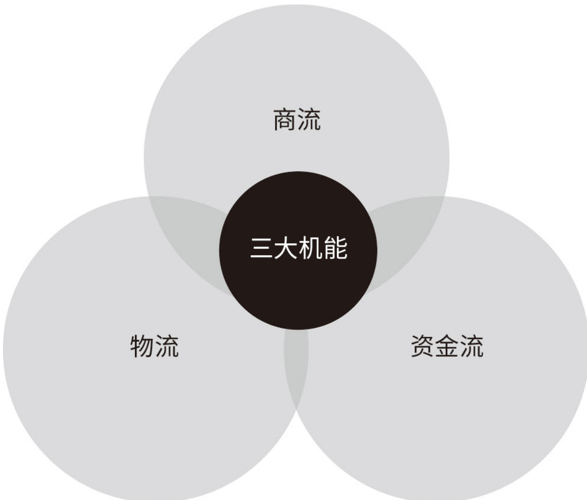


图2-5　金融颠覆者的三大职能

贷款给真正需要资金的人

换句话说，本标题即指银行在法人交易中，仍然像以前一样采取担保主义来贷款，而新一代的金融先行者则是从商流来贷款。

在面向个人的贷款中，到目前为止银行都在观察其偿还能力。但是那只是形式上的东西，真正的收入和贷款余额也不能完全掌握，完全有可能存在过度贷款的危险。而新一代金融玩家可以看到

商流贷款，积累的大数据背后隐含着个人的信用能力，比如“迄今为止是否守约”“原本的支付意愿”等。

包括日本在内的发达国家中，真正需要资金的是小微企业和个人。能够贷款给他们的不是以担保主义为核心的银行，而是阿里巴巴和亚马逊。在这样的现状下，意图革新现有金融方式，追求符合当前时代的金融方式的，不是现有金融机构，而是试图破坏他们的新一代金融颠覆者。

现有金融机构的优势

当然，现有金融机构的分支机构、人员和系统不会全部被破坏，他们会被重新定义，作为新的分支机构、人员和系统继续工作，这样就会产生新的行业秩序，产生新的行业领域。

银行的信任和信用功能还会继续存在，这两个功能正是现有金融机构存在的原因，所以不会被轻易取代。与社交应用程序集成一体的LINE支付的确很方便，并且可能会改变我们的生活方式。

但是，你会想在LINE或LINE银行里存取大额资金吗？现在即便可以在LINE支付上充值5,000日元使用，但由于担心“账户被盗”等情况，仍然有不少人对LINE支付和银行账户绑定在一起有抵触情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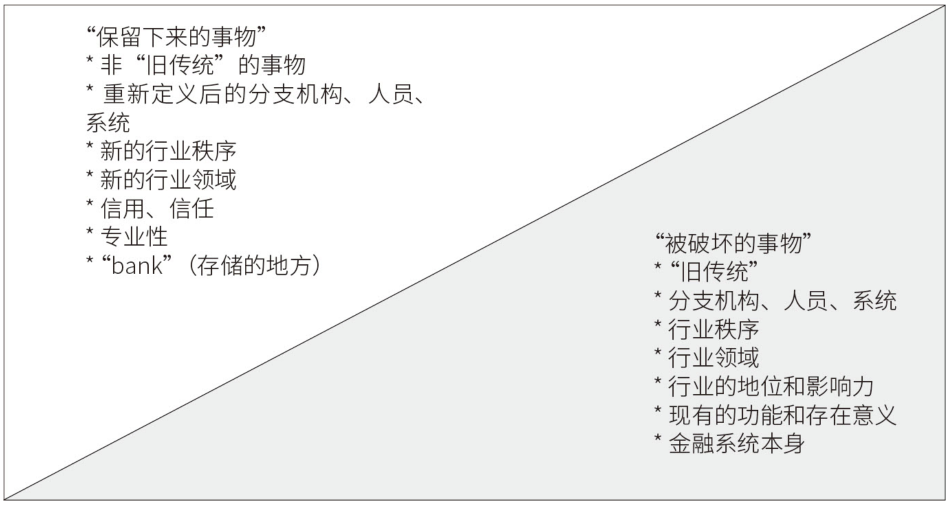


图2-6　被破坏的事物与保留下来的事物

和互联网企业相比，现有金融机构的优势正是这种信用和信任，也就是说银行如果连这个都失去的话就彻底告别金融业了。而且，作为“储蓄”场所的专业性也会留下来。“bank”是“储物处”的意思，那么以后的银行会不会也成为储存信息和数据的地方呢？

虽然说银行将成为“电商信息的储存处”“大数据的储存处”，但是，与互联网企业竞争的话，银行丝毫没有胜出的可能，反倒是有可能在这场战役中把自己逼上绝路。虽说到了“数据时代”，但是越来越多的人要求企业重视对客户隐私的保护。在美国，苹果和微软公司对客户隐私的保护得到了大家的好评。在活用大数据方面，落后于大型平台企业的日本大银行，提倡以自己的方式利用数据，但最重要的是切不可失去来源于客户的信用和信任。

第3章　基于金融工作经验的自我约束和问题意识

雷曼破产的元凶

在本章中，我想谈一谈自己的经历、价值观和问题意识，这也能帮助大家更好地理解为什么我要分析新一代金融行业。

我在前面说过，我从“战略与市场营销”“领导力与使命管理”等专业视点出发，分析了亚马逊与新一代汽车行业，并将结果分别整理成两本著作——《亚马逊的大战略》和《2022年新一代汽车行业》。但是作为商业人士，我的出身既不是IT业也不是汽车业，而是金融业。

我于1987年入职三菱银行工作，第一年便被分配到神保町分店，负责中小企业的贷款业务和外汇业务。我记得，当时13家都市银行都还在，但有一天早晨起来刷牙的时候，我还是听到了“太阳神户和三井合并”的消息。

第三年的时候，我被调回公司总部工作，之后经历了国内外大企业的大型项目融资。在项目开发部中，我做过海外炼油厂、液化天然气（LNG基地）、发电厂、酒店、购物中心、办公室等大型项目的开发融资，以及美国工厂的借贷扩张组合业务等工作。在此期间，我在芝加哥大学商学院留过学，后来于1997年7月被分配到新加坡驻当地的一家子公司，负责除日本本国外的大企业并购和融资等投资银行业务。

之后，我又跳槽到外资金融机构工作。自1998年以来，我陆续担任过花旗银行资产与证券部交易员、美国银行证券结构性金融主管、荷兰银行安室证券有限公司业务部经理等职位。

这里需要指出的是，我一直从事金融业务，其中多年从事包括项目融资和证券化在内的结构性融资业务。因此，接下来我将要阐述的问题意识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下形成的。

次贷危机的构造与本质

在雷曼冲击期间，我于2007年10月在银行专业杂志《银行法务21》上发表过题为《次贷问题的构造与本质》的文章。文章指出了7个问题，并认为“雷曼事件是资产证券化问题白热化的体现”。这些问题可能会有点不好理解，因为它是面向金融专业人员的。我将为大家具体阐述一下：

问题所在与性质——问题很复杂，相关当事者很多，而且这些当事者是世界金融的主要参与者。

作为金融的基本职能，杠杆的劣势已经显现出来。

金融、金融方式和金融商品的重要前提和假设正在遭受挑战。

具有市场影响力的金融商品的弱点也受到了挑战。

长期以来ABCP（短期证券化产品）的流动性低下问题以及美国银行和美国当局有关重新评估证券化商品的讨论可能会引发大规模的信贷收缩。

从原资产的次级抵押贷款到衍生产品CDO的派生过程非常复杂，由于涉及的当事者众多，因此要想出解决方案非常困难。

各种复杂的委托——代理问题不断出现。

然而在证券化业务中占据核心位置的人士们，很少愿意在当时站出来详细说明其原因。

金融应有的样子

我发表上述论点的出发点在于作为证券化业务当事者的反思以及使命感。我认为，我应该来揭示次级抵押贷款问题和雷曼破产的原因。在日本从事证券化业务的初期，我曾与会计师、税务师和律师合作制定新方案，还拜访过金融厅进行咨询。没错，我喜欢创造新事物，而且我热爱这份工作。

可是，我们的工作也助长了房地产泡沫出现，继而引发了次级抵押贷款危机和雷曼冲击这些前所未有的事态，这些都是不容否认的事实。

因此，我一直在思考现代金融的问题点和金融“应有的样子”。我的书《使命经营学》（*Subarusha Linkage*）中也对此进行了描述，虽然有点长，但请允许我引用其中一部分来阐明一下我的问题意识。

“……公司的目的终究是盈利，必须要在激烈的竞争中胜出才行。我们会听到一味地倡导企业对社会的使命和作用，而丧失了追求利益的企业经营不下去的声音；我们还会听到人们在颂扬美好的使命之前，会先聚集在财富那里听到的声音。”

追求利益的确是企业生存和成长的必要条件。但如果企业发展不顺，自然也就不会有健全的运营管理，更不可能支付员工满足的薪资和股东满意的分红，最终，一定会遭到企业利益相关者的抛弃。因此，最重要的是如何在使命和追求利润之间实现平衡。

最近我经常听到“可持续性”这个词。该词最初产生于确保连续捕捞而不减少海洋资源的想法，目前该词已经应用到了企业的经营管理之中。

那么，企业为了长期生存又应该采取哪些策略呢？

比如利益至上主义，即尽一切可能获取利润，而且完全不返还给员工和社会。这可能是短期内提高业绩、让企业成长的最佳方法，但这种短视的经营方式最终将被企业员工、客户乃至整个社会所厌弃，并且不会持续很长时间。与此相反，通过将利润返还给更多的利益相关者，虽然企业不能实现快速增长，但却能实现可持续性经营。

在雷曼冲击以前，比起可持续性，许多公司更奉行短期主义。短期主义是一种经营方式，即企业通过抬高股票价格以满足投资者追求短期盈利的效果。这一时期利益至上主义和效率主义占据了中心位置，极少有企业关注到使命的概念。

但是，当那场从次贷危机到雷曼兄弟破产，号称百年一遇的金融危机冲击了全球经济时，情况发生了变化。以股东优先为原则的短期经营理念最终引发了整体经济陷入崩溃，这时人们开始期待植入可持续性的新型经营理念。

在雷曼破产之前，我成为多家业务量飞速增长的房地产上市公司的客户。老实说，使命的概念还没有明确成形，我主要负责“如何提升公司股东的价值”“如何上市和提高股价”等一些当时的主流战略咨询。其中有几家公司的经营清楚地说明了，以使命为导向的观点对企业经营管理的重要性。

我负责的房地产A公司是一家快速成长的新兴上市公司。正如次级抵押贷款那样，房地产的证券化正当流行之时，A公司也效仿出售以房地产为抵押的证券，并赚取了利润。当时，大多数新兴的房地产公司和A公司一样，都是通过房地产的证券化来获利，并以此提高自家公司股价，以增加股东价值。因此，经营管理中最优先

的课题便是如何短期内有效地提高业绩，以及提高的业绩如何反映到股价上。

这位老总年纪轻轻，才华横溢，富有魅力，有望成为未来房地产行业的领军人物。但是，就在A公司实现华丽增长的时候，次贷危机爆发，雷曼破产冲击了整个房地产行业，大多数新兴房地产上市公司破产倒闭。A公司也陷入经营困难，最终也以破产告终。

现在看来，当时的房地产泡沫显而易见，但是许多已上市的新兴房地产公司都沉迷在这场游戏中，执着于争夺市场份额、赚取利润。老实说，当时大多数企业管理者都无法回应公司对于社会的使命和意义，使命的概念几乎完全被忽略了。

回头再看，雷曼破产之前，大多数企业追求短期的结果，利益至上主义和效率主义盛行，使命从未得到重视。当然我自己也是一样。

“金融即是科学”的边界

在今天，利益至上主义和效率主义得到了合理主义的支持，甚至于美国银行的经营理念还以利益至上主义和效率主义来解释合理一词。我在芝加哥大学攻读MBA学位时学习的金融学和计量经济学也完全是合理主义的极致体现。而美国的合理主义，尤其是芝加哥大学的计量经济学更是试图“量化一切”。没错，美国银行的经营管理也是如此。

量化和分析所有风险

我为银行杂志《银行法务21》（2007年1月号）撰写了一篇名为《ABL的意义和本质》的文章。其中，资产支持融资（Asset-

Based Lending，简称ABL）代表资产抵押贷款，具体包括以动产、存货、房地产、货币债权和知识产权等资产为抵押进行贷款业务。

资产支持融资从美国开始流行。当时，美国银行导入了以风险调整后的资本收益率和交易等级为代表的经济资本管理制度，随后这也成为美国银行经营管理的精髓，即量化、分析并管理所有的风险。

涉足金融的人们通常认为金融即是科学。确切地说，或许应该是“我想”认为金融就是科学。在经济资本管理中，它不仅可以量化信用风险，也可以量化商业风险和国家风险，并创造收益率。我们在每个部门、每个营业点、每个业务合作点以及每次交易中都可以进行风险管理。它细致缜密，可以被称为科学，我对此也给予了极高的评价。

过多的前提和假设

然而，实际上，雷曼兄弟的破产已经暴露出这个破绽，即“金融不能成为科学”。

问题出在哪儿呢？所有理论都是基于各式各样的前提和假设才能成立的，即使在金融领域也逃不掉这种宿命，因为前提和假设会随着理论的深度而增加。而且，如果单看每一个前提条件，总是会让人产生疑虑：“这个一直是对的吗？”证券化业务也是在一系列前提和假设的堆积下形成的事物。

在商业中，试图量化和控制本身是合理且必不可少的。但是，想要量化并尝试解决一切是不可能的。在我看来，次贷危机和雷曼冲击正好暴露了这种现实。

那么金融应该是什么样子的？在这些问题的推动下，我甚至一度脱离了我的金融职业生涯。

如果我们不重视这些问题，且不去思考未来金融应有的样子，雷曼兄弟的破产将会重演。

泡沫重演

撰写《泡沫故事》的经济学家约翰·肯尼斯·加尔布雷思说：“泡沫总是在发生。”为什么泡沫会重复发生？那是因为经历过泡沫破灭的人一时离开了市场，如果不将曾经遭受过重创的经验总结移交，那么下一代就不可避免地犯同样的错误。这就是为什么每次有泡沫时都会有人争论“这次一定不是泡沫”。即使在雷曼兄弟破产之前的房地产金融市场上，也总是能听到“过去没有折现金流的说法，也不存在什么抵押贷款”“过去的金融不是科学，现在的金融就是科学”的说法。

正如经济学家加尔布雷思所指出的那样：“虽然看起来似乎有新事物诞生，但本质上没有任何改变。”即便在泡沫的高峰期，最好的玩家也没能看穿这是泡沫。

我仍然清楚地记得，在1998年10月日本长期信贷银行破产前后，“下一个破产的是××”这样的传言不绝于耳，第二年雷诺就宣布将支援日产汽车。当时我在花旗银行工作，负责日产及其金融子公司的证券化业务，在与日产集团进行巨额证券化交易的时候，我亲身经历了负责企业并购的人员和日产内部相关人员不断奔走斡旋的场景。最终雷诺决定拯救日产并且成功结盟。

日本泡沫危机发生近10年后，雷曼冲击爆发。那些从事证券化业务的人放下了自己以前的骄傲，开始进行强烈的自我反省。于我而言，这也是让我离开金融行业的重要契机。

从那时起，我也不断地问自己：“金融真的在创造价值吗？”“金融真的在为客户解决问题吗？”

我认为加尔布雷思的观点完全适用于当前的“大数据-AI”时代。

傲慢与失控

雷曼冲击前的美国金融业，包括我在内都过度相信“金融创造价值”。金融本来就不是独立的，它通过与各种各样的行业结合来创造价值。但是，随着金融的独立发展，“钱生钱”的游戏开始失控。

失控的一部分就是上述所说的经济资本管理。

到现在，我仍然认为经济资本管理本身是一种很好的管理方法。

但在现实中，我们不可能量化所有的信用风险、市场风险、商业风险和国家风险。正如我前文所述，在量化之前，假设“所有的变量都要服从正态分布”之类的前提是必不可少的。但是，现实中并不是所有的变量都服从正态分布，这些假设上的错误导致本应如科学般精确的经济资本管理走向失败。

忽略客户的商业模式

美国金融机构的过激行为既包括过度重视投资者，也包括过分追求企业利润。

雷曼冲击之前，美国金融机构的商业模式可以简单地表述为“创造面向投资者的金融产品策略”和“打包出售策略”。那时候

美国金融机构的三大业务是打包、出售与交易。

打包通常被称为主要业务，是创造（发起）金融产品的业务，代表例子像银团联合贷款、股票和债券的重组，结构性融资和证券化产品的重组也被包含在内。该业务的主要工作是与发行方公司合作，也可以说是融资方的工作。

出售是指将重组的股票、债券和贷款等贩卖给投资者的业务。

交易则是指用公司的资金买卖股票和债券的业务。

综上所述，“打包出售策略”，就是将金融产品重组并出售给投资者的策略。

该策略本身的对错姑且不论，“过度”被使用却是真的。例如，为还款能力较低的人，也就是次级信用的人提供的重组贷款被称为“次级贷款”。将这种贷款债权出售并进行证券化即为证券化交易，在此过程中许多金融机构利用它们的子公司或业务关联公司开发出一笔笔面向消费者的次级住房贷款抵押债券。这对雷曼兄弟的破产造成了不小的影响，因为原资产的贷款和其衍生的金融产品都陷入了危机。

美国金融机构也是一样，传统银行的三大业务包括融资、结算和存款，这三项也是银行收益的主要来源。这在直接融资尚不发达，而大公司的资金需求也已强劲的时代没有任何问题。但是，随着时代的发展，大公司的资金需求也已呈现出低迷状态。为了填补这一空白，证券化业务诞生了，最终其竟然还扩张到了抵押贷款的部分。

获利的只有投资者和金融机构

由于这些高风险的金融产品成为获利的源头，美国金融机构公示的净资产收益率（ROE）高达15%。而从事这些金融产品的管理人员和专业操作人员赚取的报酬已经增加到从数亿至数十亿日元不等。

虽然不能仅凭高昂的报酬就说这种经营方式不合理，但是，显然只有投资者和金融机构受益于这种“打包出售战略”。

投资者不是金融机构的唯一客户。普通公民，也就是存款人和融资公司也是金融机构的重要客户。

不幸的是，“打包出售战略”严重偏向投资者的利益。同时，无论社会发展到什么程度，该策略中始终贯穿着“银行法则”。

这是一项旨在提高公司本身财务项目、改善管理指标并让股东满意的策略，但无法兼顾到其他利益相关者，例如存款人或融资公司就并不在项目之内。

这项策略严重违背以客户为中心的经营理念，当时的金融机构甚至没有意识到这一点，我也在进行自我反思。

对于轻视金融原有的功能而执着于谋利的金融机构，大家的批判声音也越来越多。

金融真的能创造价值吗

我一直在思考“什么是真实的”。在金融服务中，比起投机需求，真正需要关心的是本质需求。因此，如果要问什么是真实的，自然会想到本质需求。

房地产泡沫破裂和雷曼冲击爆发时发生了什么？在雷曼冲击前，除少数企业外，在纳斯达克上市的数十家新兴房地产公司已经

倒闭，只有获得银行支持的公司得以幸存。这与1991年泡沫破裂时的情况完全一样，一家公司能否幸存主要看是否能得到银行的援助。而银行只为一些实体经济运作良好的公司提供援助，比如稳定经营的公司和开展强大社交性业务的公司。

亲身经历了这些情况，我不得不思考金融是否真的创造了价值，金融的作用是什么，金融究竟应该是什么样子的。我觉得最重要的是摆脱短期主义并“以更加长远的眼光看待问题”。如雷曼冲击被认为是百年一遇的危机，我们看到了。但如果我们能看到200年、300年，甚至更长时间以后的话，或许我们会克服短期主义的限制。

r＞g的真相

关于“钱生钱”的争议一直以来都很大。在法国经济学家托马斯·皮克迪的畅销书《21世纪资本论》中，有一个公式“r＞g”十分有名，其中r指的是资本收益率，即投资股票或不动产获得的收益，g是经济增长率，即劳动所得收入的增长。我们理解的普通业务既可以通过生产并出售某种东西赚钱，也可以通过提供服务赚钱。然而在金融的世界中，货币本身没有狭义的“工作”行为，但是，通过“钱生钱”的方式能够获得超过普通业务的资本回报率。

那么金融如何创造价值呢？

雷曼冲击展示出“r＞g”的矛盾，令人感到金融并没有真正在创造价值。但是我不这么认为，金融真正的作用应该在其他地方。

在考察新一代金融时，我认为这是一个重要观点。如果不从这些根本问题上考虑，那么在数字化方面已经落后的现有日本金融机构将无法与金融颠覆者竞争，这是因为金融颠覆者正在解决这些根本问题。

从下一章起，我们将介绍金融颠覆者和现有金融参与者的发展动向以及新一代金融业的全貌。

第2编　金融颠覆者的战略

第4章　亚马逊银行的诞生

“万能公司”的金融业务

作为破坏现有金融行业的参与者，我首先想为大家介绍的是亚马逊。在问及亚马逊是什么样的公司时，只有极少数人会回答是金融公司。

的确，回答说亚马逊是世界上最好的在线书店早已不够全面。亚马逊现已成为一家万能商店，不仅销售书籍，还出售包括生活用品、家用电器、数字内容和生鲜食品等在内的诸多商品。甚至在“商店”之外，该公司已然发展成为“万能公司”，经营着云服务、语音AI甚至太空事业等各种科技业务。

如果看收入结构的话，最重要的当属亚马逊的云服务（AWS）了。为了支持亚马逊的网购业务，亚马逊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开发云计算系统，并且向公众开放。其云服务占全球云市场30%的份额，从销售额来看，它占到亚马逊总收入的10%，占营业利润的70%。

完成所有经济活动

因为所有的经济活动都在“亚马逊要塞”中完成，所以亚马逊规模经济诞生了。现在有许多人会说“无法想象没有亚马逊的生活”。

在最近两年，接二连三地出现关于亚马逊规模经济扩张的话题。亚马逊在2017年以137亿美元的价格收购高端超市Whole Foods后，于2018年1月启动了Amazon Go无人便利店的常规运营。这意味着，亚马逊零售业已从“在线电子商务”发展到“离线实体店”，并进化为在线与离线合并（OMO）模式。

AI语音识别助手“Amazon Alexa”也在不断地快速发展。亚马逊试图通过向第三方开放Alexa，让其渗透到人们所有生活服务中，其目的便是让Alexa成为独立的生态系统。

实际上，Alexa已被内置在包括智能扬声器在内的各类生活电子产品中，而且还被确立为语音识别AI。自2018年8月起，用户可以通过私家车上内置的Alexa在Whole Foods上下单，然后去分支机构选购商品。

2019年1月，在拉斯维加斯举办的CES 2019家用电器展上，主持人宣布配有Alexa的机器设备已经多达2万台。

试图进军所有业务的亚马逊目前正在发展与金融相关的业务，例如面向中小企业的“亚马逊借贷”和在线支付服务“亚马逊支付”，甚至有传言说亚马逊银行就要诞生了。

但是，仅听个别新闻的话，容易受其质量和速度影响，而且只依靠了解亚马逊当前的状况是无法预测亚马逊未来的。

三条承诺

对于亚马逊来说，金融的意义是什么？要想知道这一点，就有必要回顾一下亚马逊是个什么样的公司。

要了解亚马逊，就必须聚焦在亚马逊创始人兼CEO杰夫·贝佐斯的强烈使命，以及他的愿景之上，这也是我在《亚马逊的大战略》中一直强调的部分。具体内容请参考《亚马逊的大战略》。在本书中，我仅想介绍以下三点：

1 追求“全球最以客户为中心”的使命，贯彻执行对顾客体验的承诺。

2 对“低价 + 丰富的产品阵容 + 快速配送”的承诺。

3 对“大胆的愿景 + 高速 PDCA”的承诺。

图4-1　亚马逊的哲学 • 思想 • 执念

第一，亚马逊的使命是成为全球最以客户为中心的公司，而且对客户体验的承诺始终如一。

第二，对“低价+ 丰富的产品阵容+ 快速配送”的承诺。

第三，对“大胆的愿景+ 高速PDCA”的承诺。

亚马逊创始人的这些承诺被拔高到哲学层面，并在员工之间实现共享，这是亚马逊最大的优势。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看看这些承诺是如何体现在亚马逊的金融业务上的吧。

全球最忠实于客户的公司

亚马逊是一家以“全球最以客户为中心的公司”为使命和愿景的公司，他们把对客户体验的承诺做到始终如一。

这里的“客户”不仅是指电子商务网站上亚马逊的“消费者”，还包括在亚马逊上开店的商家、使用云计算云服务的公司，以及参与视频编辑录制服务（例如Amazon Prime Video）的创作者等，即所有聚集在亚马逊生态系统中的人。

“客户体验”这一术语本身可能并不罕见，如果你是参与网络或市场营销相关工作的人，可能每天都会听到。但是亚马逊将“全球最以客户为中心的公司”作为自己的使命与愿景，这种贯彻到底的态度是不一样的。

贝佐斯在餐巾纸上绘制的商业模型

在亚马逊成立之前，贝佐斯在餐巾 纸上随手写下的商业模式（稍后会详细介绍）中就已经出现了“客户体验”一词。这个小细节非常值得注意，因为它已经显示出亚马逊对客户体验的重视程度。

在此，让我们重新思考一下客户体验是什么。客户体验通常被理解为“客户体验的价值”，即客户可以通过产品与服务获得的体验的统称，比如“好用”“愉悦”“好理解”等。它最初是由市场营销学专家伯德·H. 施密特教授提出的概念。

而它现在已成为网络营销中重要的概念之一，我相信它也将成为未来世界营销中最重要的概念之一。这是因为，即使在高性能服务行业，仅仅依靠服务本身根本无法与其他竞争对手分出胜负。无论性能多么优越，客户也不会选择劣质客户体验的所谓优越服务的。

亚马逊的客户体验

这里我想谈一谈“对亚马逊来说”的客户体验。如果只是嘴上说“我们重视客户体验”是一件很容易的事。很多企业都提出了类似的愿景，但是只有亚马逊在贯彻执行上做得非常细致。

由于常年关注贝佐斯，我觉得“贝佐斯一定是这么想的吧”。以此为契机，我想如此定义亚马逊的客户体验：

第一，要回应人类与生俱来的本能和欲望；

第二，解决随着技术发展而变得越来越复杂的问题和压力；

第三，“感知”的科技；

第四，不让客户觉得他们“正在进行交易”。

回应人类的本能和欲望

对亚马逊来说，客户体验首先就是感知作为人类与生俱来的本能和欲望，并给予回应。对于客户“任性”的需求，亚马逊也打算予以正面回应。

就说我们日常使用的亚马逊网站，也在不断追求易于找到的（页面），易于看到的（画面），易于理解的（文字），易于搜索的（目标产品），从而令顾客易于选择，易于购买，易于接收，易于使用，易于继续等的设计。

在亚马逊的商业模式中，客户体验是最重要的概念。因此，它绝不会发布客户体验差的产品与服务。

在商业领域，电子书阅读器Kindle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在Kindle诞生之前，电子书阅读器市场由以索尼为首的许多家企业占领。但是，他们过于重视先发者的利益优势，以至于在客户体验还不好的时候就推出了产品，因此没能席卷整个市场。

贝佐斯对Kindle的开发制定了严格的要求。例如，一旦开始阅读，就要有一种自然的操作感，能够让人忘记在使用设备（阅读）的感觉；不向用户收取下载所需的通信费用；在Kindle发售之前，提供10万个标题以供下载。正是因为Kindle满足了上述这些严苛的要求，所以才取得了电子书阅读器市场的霸主地位。

“消费者永不满足”，这一点对贝佐斯的观察者来说也是相当熟悉的。贝佐斯也发表过这一声明：“比如进入一家餐馆，我会想这家餐馆怎么做会变得更好。”

也就是说，贝佐斯一直在思考如何让永不满足的消费者无限接近满足，这种执着超乎常人想象。贝佐斯有时会被认为缺乏常识，甚至被喻为“火星人”。众所周知，他的脾气非常火爆，所以在“一对一”的人际交往中，他并不是一个令人满意的人，但是他将亚马逊的以顾客为中心主义贯穿到亚马逊所有的商业活动中，而不是停留在口号层面，这或许正是贝佐斯极端的个性所致吧。正因为如此，亚马逊才能成为亚马逊。

利用科技解决问题

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亚马逊的客户体验正在解决越来越多的“问题”和“压力”。

亚马逊对于客户体验的追求永远不会停止。因为随着技术的进步，服务变得越来越便捷，当消费者的需求得不到满足时，消费者所感受到的不适也会随之增加。

请大家环视一下自己周围的生活环境，是不是发现就连以前不会在意的一些小事，现在都觉得可能会给自己带来影响。当你习惯了智能手机的快捷性和舒适性时，你连仅仅几秒钟的延迟都无法忍受。另外，试着思考一下，只买过一次东西的电子商务网站总是给你发送你毫无兴趣的电子杂志，这在以前是理所当然的事情，但现在却让人觉得烦躁。

在被称为“去现金化元年”的2018年前后，世界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在便利店和超市的收银台结账时，如果是一年前，大家会坦

然等待前面的人花时间取零钱进行支付，但现在这会让无现金支付的人感到不适。

在这样的时代，大家要求的客户体验只能是越来越好，正所谓“消费者永不满足”。

感知

尽管消费者永不满足，但是亚马逊提供的客户体验正在尽量满足日益复杂的客户需求。亚马逊通过“感知”技术可以实现这一点。

“感知”就是通过驱使感官来推测对方被什么所困扰以及想要什么。这是一种人类才具有的卓越能力，但是亚马逊正试图通过“IoT（物联网）＋大数据＋AI”的算法来获得超过人类的“感知”能力，并让这些成为客户体验的重要组成部分。

高精度的推荐功能就是一个例子。与贝佐斯曾经一起共过事的亚马逊数据前首席科学家安德雷斯·韦思在他的著作《亚马逊经济学》（文艺春秋，土方奈美译）中写道，“亚马逊以0.1人的规模进行用户细分”。这意味着，亚马逊会针对每个用户每时每刻不断变化的需求进行营销，例如根据用户购买或检查产品的历史记录、搜索时输入的关键词等大数据，AI会分析特定用户的心理和行为模式，针对每个用户的喜好去进行量身定制的推荐。换句话说，亚马逊使用“大数据＋AI”技术与用户实现了实时的一对一营销。

对亚马逊来说，客户体验是什么？

- 回应客户作为人类与生俱来的本能和欲望
- 解决随着技术发展而变得越来越复杂的“问题”和“压力”
- “感知”的科技
- 不让客户有“在进行交易”的感觉

图4-2　客户体验的哲学・思想・执念

不让用户有“在进行交易”的感觉

现在亚马逊的客户体验已经发展到让顾客感觉不到“正在进行交易”的程度。

这是一种舒适、快捷的服务，甚至让你感觉不到是在购物或付款，在无人收银便利店Amazon Go中尤为明显。到Amazon Go购物，你只需将智能手机放在自动检票口之类的闸机上，就可以通过验证你的Amazon ID进入商店，然后从展示货架上选货了。当你离开商店时，系统会自动进行结算并向你的手机发送收据。亚马逊提供的这种服务，让人甚至不知道自己在购物，这种方式将全面渗透到我们的生活中。

另外，我在西雅图体验过Amazon Go后确信，亚马逊推出无人收银便利店并不单纯只是为了提高生产效率和解决人手不足的问题，更是为了提高用户的客户体验。

低价格＋丰富的产品阵容＋快速配送

贝佐斯也经常提到他的第二个承诺，即低价格、丰富的产品阵容和快速配送。

如前所述，要不断满足极致化的客户需求并不容易，但是客户需求中也有一些部分是一直不变的。在被问到“亚马逊10年后是什么样子的”时，贝佐斯没有直接回答，但他却明确指出“消费者将继续追求低价、丰富的商品种类、迅速的配送，这在10年后也不会改变”。

但是，对“低价格、丰富的产品阵容和迅速的配送”的期望水平在10年前、现在和10年后必将大不相同。与客户体验一样，用户要求的水平也在不断变化。而且10年后的低价格、10年后的丰富的商品种类以及10年后的快递配送应该比现在更加发达。

AI预测并自动送达

人们对“快速送达”抱有的高度期待是最容易感受到的。20年前，要求快速送达的用户还很少，也不会认为这能成为可能，但是现在及时配送已经变得理所当然，仅仅忍受2—3天的等待时间就会让人感到焦虑。所以在我看来，贝佐斯应该能实现更快的配送，“无须订货，需要的东西由AI预测并送达”的速度感将会成为现实。

贝佐斯强调，要做到上述这点，建立周密的业务结构、收益结构和成本结构是必不可少的。如图4-4所示，在亚马逊的商业模式中，在客户体验的前面设有“低价格”和“备货”，表明贝佐斯对“顾客最先要求的是低价和备货”的认识。另外，在“低价格”的前面设有“低成本结构”，因为只有构筑低成本体制，才能持续提供低价格的商品。

大胆的愿景和超高速PDCA模式

贝佐斯的第三项承诺是对“大胆愿景和高速PDCA”的承诺。第一项他先是树立了“全球最以客户为中心”的宏伟愿景，并在同时反向考虑并实施“现在这里”要做的事情；第二项是高速执行PDCA模式，即超长期思考和速度的结合；第三项是强调要重视长期现金流，而不是短期利润，也就是重视追求基础创新的经营理念。

这种方法不仅限于亚马逊，在美国和中国的大型科技公司中也很常见。关于这一点，下面将会详细说明。

指数级增长

现代科技企业的成长，有时可以用“指数级数”来形容。作为反义词的“算术级数”是指每隔一段时间以1、2、3、4倍的方式增加，而指数级数是指以1、2、4、8倍的方式增加。这是当前美国科技行业中最重要的概念之一。

提出这个概念的是奇点大学的奠基人彼得·迪亚曼迪斯，他是X-Prize基金会的首席执行官，也是一位拥有15家太空和高科技公司的企业家，一言以蔽之，他就是美国科技业的大师。在迪亚曼迪斯的著作《BOLD穿透的力量》中，他总结的内容对贝佐斯等众多创业者有着极其深远的影响，其精髓是“从细微处开始大胆地想象，超高速运转PDCA循环，最终谋求修正轨道”。迪亚曼迪斯说，这才是获得指数级数式增长的关键。

6个D

迪亚曼迪斯认为，指数增长可以细分为“6个D”，从数字化（Digitized）开始，但不能一蹴而就。指数函数是“成倍增长”，从最初的0.01变为0.02时，增长是看不见的，从0.02变为0.04也是一样。因此，在数字化之后，将会持续一段潜伏（Deceptive）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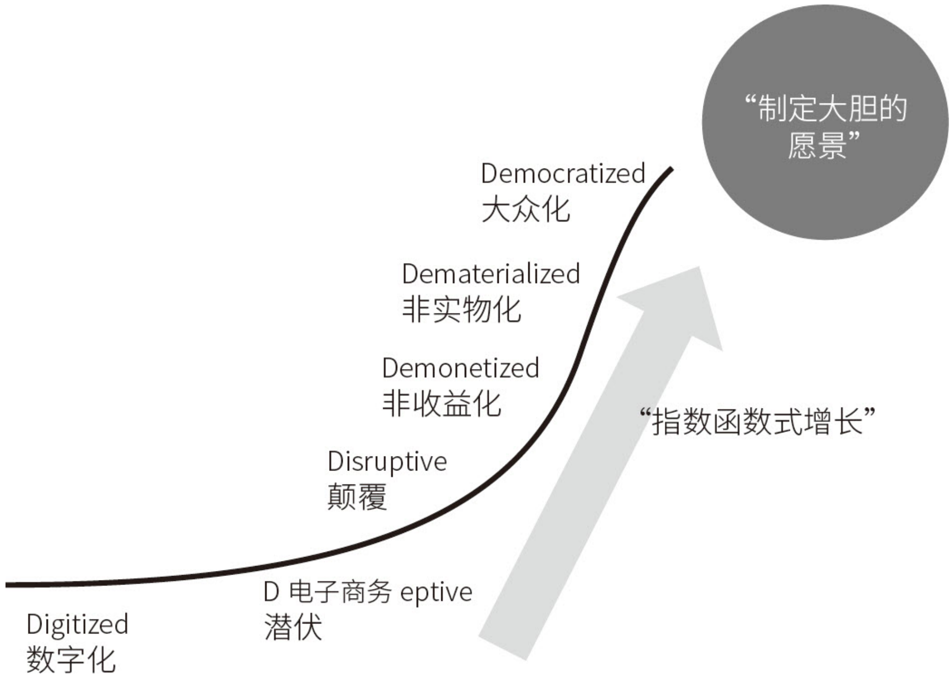


图4-3　指数成长型企业的"6个D"

但是，当你继续玩加倍游戏时，某个时刻开始会出现爆炸性增长。迪亚曼迪斯写道："如果我从位于圣莫尼卡的自家客厅直走30步（假设每步走1米），大概会穿过家门前的马路，但是如果你从同一地点出发并以指数方式行走30步，那么将到达一亿米之遥，也就是绕地球26周。"

指数级数式增长的结果就是颠覆（Disruptive）阶段的来临。随着一家公司以指数级数增长，其相关行业或其他公司会受到灾难性的影响。一个典型的例子是"亚马逊效应"，该效应是指，亚马逊的业绩增长迫使许多零售商店关门。据非营利组织地方自立研究所（Institute for Local Self-Reliance）统计，截止到2015年，1350万平方米的实体店铺真的已经变成了空房子。

我们正处在巨大的冲击之下，近年来许多人感受到了世界的飞速变化。在各个领域秘密进行的数字化运动终于迎来颠覆性阶段，

近年来成为热门话题的深度学习和自动驾驶也曾经历这样的过程才发展到今天。

颠覆性（Disruptive）发展之后是非收益化（Demonetized）、非实物化（Dematerialized）及大众化（Democratized）。

一切始于数字化

迪亚曼迪斯在说明指数级数增长的过程时，以数码相机进行举例。最初胶卷相机数字化的时候，并非一下子就席卷了市场。世界上第一台数码相机诞生时的像素数为0.01兆像素，即使成倍增加，也不会有太大变化，这就是潜伏期。但是，不久后就开始了爆发性的增长，像素数瞬间突破了“兆”的壁垒，到此，像素不断增加的数码相机“摧毁了”胶卷相机市场，开始进入“非收益化”阶段，而数码相机很快成为智能手机内置的“非实物化”产品，最后迎来每个人都拥有的“大众化”时代。

在此，我想再次强调指数级数增长始于“数字化”。

许多人已经看到或听到了“数字化转型”一词。通常，这意味着IT的渗透将使我们的生活朝着更好的方向发展，它不仅涉及系统化、网络化和云化、移动和SNS、大数据、人工智能、物联网、RPA（利用机器人实现业务自动化），还涉及技术战略和经营战略的话题。

但是“不仅仅限于此”这一点非常重要。

因为，数字化转型改变的不是企业的某些部分，而是企业的“全部”。重新定义使命、愿景、价值和策略是数字化转型的本质，除非从公司的基础上进行数字化，否则就不能期望指数级数的

增长。这并不是在形式上“引进某个新的系统和服务就可以了”的事情。

“DAY 1”的精神

现在，再次回到亚马逊的高速PDCA循环模式话题上。

贝佐斯的故事中一定会出现“DAY1”这个词。不仅如此，亚马逊的官方博客名也是“day one”，贝佐斯办公室所在的大楼也被命名为“DAY 1”。而且，在亚马逊的年报中还附有1997年亚马逊创业年的股东信函，上面也写着“Still DAY 1”。

这个词包含的信息是，对于亚马逊来说，无论何时，今天都是创业日。

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贝佐斯将“DAY 2”一词用于谴责遗忘创业初衷，不断衰退的“大企业病”上。

企业创始文化

贝佐斯一直坚持“DAY 1”，以免失去亚马逊的命脉——创新。对于持续创新而言，除了人员、事物、金钱和技术等因素以外，最重要的是坚守企业创始文化。因此，贝佐斯一直说“Still DAY 1”。

此外，贝佐斯还指出，重视客户是保持“DAY 1”活力的最有效方法。他还在年度报告中写道：“客户即使在幸福美满、生意兴隆的时候，甚至在万事如意的时候也会心有不满。”

只要做到以“客户为中心”，亚马逊就不会陷入“大企业病”，这也是现有金融机构在推进数字化变革时，“从企业根本上

革新，并摆脱大企业病”不可缺少的治病良药。

始于“一键”的结算和金融业务

上面我们介绍了亚马逊公司的特色和优势。接下来，我们将谈一谈“对亚马逊而言的金融是什么”。

我对于这个问题的看法可以归纳为以下三点：

第一，如前面所说，银行的三大主要业务，即存款、贷款、汇兑都可以模拟创造。即使没有银行的执照，金融颠覆者也可以利用数字技术开展与银行一样的业务，在这点上，亚马逊是众多金融颠覆者中的先驱。

亚马逊、阿里巴巴和腾讯，这三大巨头的业务领域已然超越了许多大型现有金融机构和金融科技公司。阿里巴巴以支付应用“支付宝”为切入点来扩大其服务范围，而腾讯则以社交应用“微信”为切入点试图垂直整合金融业务，进而全面支配整个生活服务。

而亚马逊已经复制了银行的三大业务——存款、贷款、汇兑业务。例如，为了增加零售与电商的销售额，亚马逊升级了结算功能（如“一键结算”等），并提供贷款业务（如“亚马逊贷款”等）及实质性存款服务（如“亚马逊礼品卡”等）。

亚马逊、其他金融颠覆者与银行的决定性区别在于，亚马逊是集商流、物流和资金流三位于一体的。亚马逊贷款是针对供货商和卖家提供的贷款业务，这对供给链上的金融服务之贡献是非常大的。

第二，比起现有金融机构，金融颠覆者更能发挥金融的基本功能。在发达国家，有资金需求的更多是小微企业和个人，然而向他

们提供资金的不是奉行担保主义的银行，而是能看到“商流”来出借资金的金融颠覆者。这一点在阿里巴巴身上很明显，在亚马逊也发挥了同样的作用。

第三，它把科技公司的“理所当然”带入了金融业，尤其是亚马逊还引入了“客户体验”的游戏规则。从全球角度来看，中国在这方面超越其他国家的科技成果处于领先地位，但由于阿里巴巴和腾讯的服务尚未渗透到其他国家，因此更容易理解的是亚马逊的客户体验。

加强商业模式的循环

为什么亚马逊要进军金融领域呢？为什么要开展存款、贷款、汇兑这三大银行业务呢？让我们深挖一下吧。

亚马逊通过运用贝佐斯创业时在餐巾 纸上绘制的商业模式（图4-4），拓展了亚马逊规模经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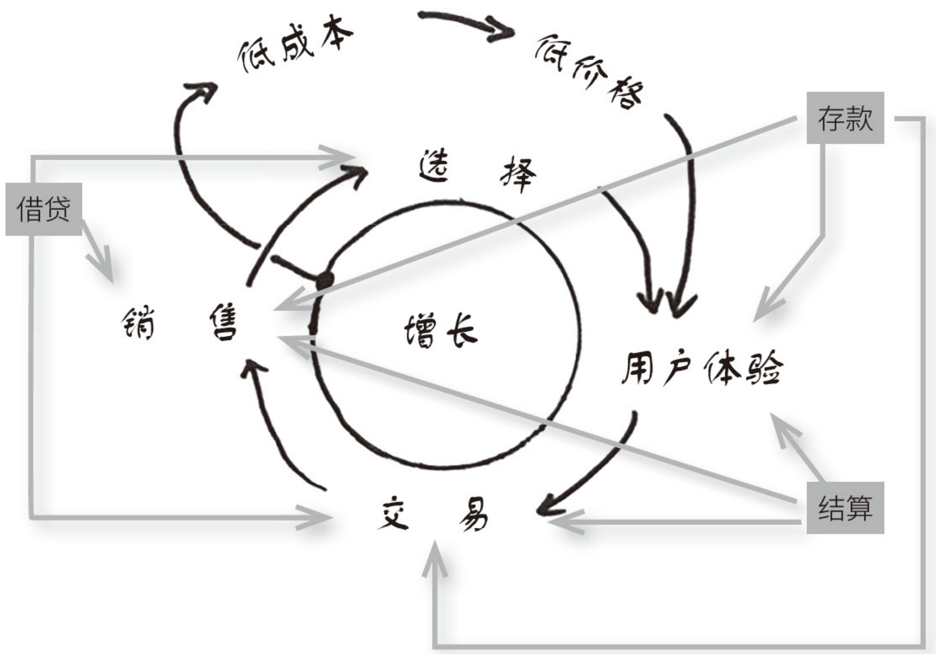


图4-4　亚马逊的商业模式与金融业务的关系

商业模式的核心是“增长”，在其周边可以绘制出以下循环图。

“增加选项（商品种类）”，即经营多种商品，对顾客来说，选项增加的话，“顾客的满意度就会提高”，一旦提高了顾客的满意度，“流量就会增加”，也就是说人们会聚集到亚马逊这里，继而会吸引大批“想在这里卖东西”的商家。“选项增加”→“顾客满意度提高”→“选项增加”→“顾客满意度提高”……如此形成亚马逊规模经济成长的循环模式。

总而言之，亚马逊的金融业务以加强这种周期性循环的方式促进了亚马逊规模经济的扩张。这将增加销售商的数量，直接支持销售商的业务，并有助于扩大产品线，最终整个亚马逊规模经济的流量也会增加。

让我们来具体看看吧。亚马逊提供的“贷款”功能之一“亚马逊贷款”，面向在亚马逊开店的商家（卖家），基于他们销售额的变动、顾客的评价等数据来进行信誉评估。利用这项贷款，商家提供的商品种类会变得更加丰富，商业价值也会增加。

“结算”功能也是一样，众所周知，一键结算是亚马逊爆发式增长的一大契机。从那时起，亚马逊持续投入结算功能的创新，例如Amazon Pay、Amazon Go和语音支付Amazon Alexa等。这在带来更加优质的客户体验的同时增加了流量。

创业以来，亚马逊一直在追求卓越的客户体验，也就是“最以客户为中心”的愿景，而且这一愿景和上述业务模型自始至今都没有改变。金融业务也属其中的一环，一键式付款方式极大地提高了客户体验。但我们要知道亚马逊进军金融业务只是促进亚马逊规模

经济扩张的一种方式，它并没有打算通过自身的金融业务来与其他企业争霸。

颠覆迄今为止的“理所当然”

如果要简单地表达亚马逊给金融业带来的破坏性冲击的话，那就是“以前不觉得理所当然的事情，现在变得理所当然了”。

如今所有的行业都在发生以下的变化。如在旧态依然的传统行业中，“不方便”“费事”“花时间”“需要人来完成”“不友好”“不悦”“迫使人意识到正在交易”等，这些都是“理所当然”的。这不仅限于金融业，零售、广告和出版行业都是如此，甚至可以说，它几乎存在于任何行业。

但是，把追求客户体验作为自己掌中宝的科技公司已经颠覆了这种“理所当然”，诸如“方便”“省事”“不花时间”“易懂”“自动提供”“友好”“愉快”“没有交易感”之类的在线服务已经变成理所当然的事情了。

今后，随着数字化转型在所有行业中的推广应用，这种新的“理所当然”将会普及，亚马逊当属先驱。

接下来让我们看看亚马逊开发的与银行的存款、贷款、汇兑这三大业务有关的主要金融服务。

无意识支付的科技

亚马逊最早开始的金融服务是与“汇兑（支付）”相关的服务。因为提高支付功能的便利性，对于促进重复购买、增加电商与零售额的效果最好，所以亚马逊才执着于支付业务。

亚马逊的创业始于1994年，1997年贝佐斯就发明了一键支付（One-Click）。从这个速度可以看出，贝佐斯可能在创业前就以实现“无意识支付”的客户体验为目标了。

一键支付，顾名思义，点击一次即可实现结算、发送的功能。买东西的时候，可以省去输入邮箱地址、卡片信息、送货地址等麻烦，“想要的东西马上就能买到”。因此，作为电子商务网站，亚马逊的便利性有了飞跃性增长。现在，网站如果不能一键完成购物的话，甚至会让人感到有些焦虑。想要在亚马逊以外的电子商务网站买东西的话，在付款的过程中会遇到不少麻烦，考虑到这一点，“购物全部在亚马逊上，一键搞定”的生活方式自然会得到大家的青睐。

因此，“无意识支付”可以提高客户体验的满意程度。当然，亚马逊自身也应该认识到“无意识支付”的重要性，在此基础上设计开发一键付款之后的结账服务。如今数量不断增加的无人便利店Amaz on Go既没有收银台，也不会让顾客感觉到在进行支付，它的起点就是一键支付。

Amazon Pay大幅提升交易额

接下来让我们看一看Amaz on Pay的重要性吧。Amaz on Pay是一项支付服务，允许用户使用自己的亚马逊账户登录亚马逊以外的电子商务站点，并使用其账户中注册的信息进行购买。通过在电子商务网站上引入Amaz on Pay，用户可以节省输入送货地址、电子邮件地址和信用卡等信息的时间和精力。尽管不是一键式操作，但它可以让用户仅需要很简单的两次点击即可安全顺畅地购物。从2017年开始，实体商店就使用Amaz on Pay进行支付。自2018年起，实体商店则开始使用二维码进行支付。

提供服务3年以来，上千家的电子商务站点已经引入了Amazon Pay。据亚马逊称，引入Amazon Pay之后的转化率（购买率）是引入前的1.5倍，新客户获取量达到58%。在Amazon Pay的服务页面上，详细刊载着电子商务运营商的评论和事例。

日本的眼镜品牌睛姿（JINS）也是引入Amazon Pay的企业之一。该公司于2007年开设了电子商务业务，销售额有了大幅度提升，但他们只有3种付款方式，即信用卡付款、便利店付款和货到付款。只是所有这些付款方式都需要注册会员，而眼镜的更换周期顶多是一年，只为偶尔购买就不得不注册成为会员似乎就成了一种负担。另外，许多用户似乎会在购物中途离开页面，再回来时还需输入信息，就会很麻烦。

这就是睛姿在2016年引入Amazon Pay的原因，自推出Amazon Pay以来，睛姿的转化率提高了30％。

“选择Amazon Pay进行支付的用户在网上的产品退货率很低。此外，在和热门在线游戏的合作产品中使用Amazon Pay进行支付的产品比例已经超过总数的40％。使用Amazon Pay的商家认为大多客户熟悉电子商务，对互联网具有亲和力。”（来自Amazon Pay服务页面）

亚马逊是一家不对外公开客户数的公司，却在2016年时透露，目前全球有170个国家和地区的3,300万人正在使用Amazon Pay。

Amazon Alexa语音支付

作为语音支付的一种，Amazon Alexa已经越来越流行。虽然使用内置Alexa的设备（例如Amazon Echo）进行购物的人还不是很多，但是有不断增加的趋势，“语音支付”这种表达方式在美国已经十分普遍。

Alexa的实用性也在不断升级，我也用过几次。有一天，我想买巧克力，就跟Alexa说："Alexa，帮我订个明治巧克力。"Alexa答道："明治巧克力价格是××，要订吗？"如果回答YES，它就帮我订；如果是NO的话，它就会推荐别的巧克力。

与文字输入相比，语音输入更简单，即便手在被占的情况下也能使用，最重要的是它"只需说话就能购物"，这使客户体验的价值达到了最高。"美国的语音支付已经开始变得流行，截止到2017年4月，美国已经有8％的人在使用语音支付。BII预测，未来5年使用语音支付的人将增长到31％，人数将从1,800万直接增至7,800万，到2022年，将会有1/3的美国人使用语音支付。"

在万物互联的物联网时代，作为支付设备的亚马逊购物按钮（Dash Button）诞生了，这是一款只需WIFI连接功能和两个按钮的小型物联网设备，用户可以通过按动按钮来订购事先设定好的产品，也就是说，连搜索产品这一环节都省略了。令人震惊的是，在2019国际消费电子展上，韩国LG公司展示了一款能够以数字方式显示所有亚马逊购物按钮的物联网冰箱，换句话说，甚至连付款设备也被数字化了。

也许你会认为，现在的亚马逊购物按钮是Alexa出现之前的一项服务，它通常被用于购买常用的家居用品，例如洗涤剂、厕纸和饮用水等。一旦下过订单，它将会持续推荐该产品，因此很有可能会被未来普及的语音支付所替代。实际上，亚马逊已经在2019年宣布停止推出新的亚马逊购物按钮。

通过Amazon Go实现物联网（IOT）支付

Amazon Go通常被当作物流业的一种新形式，但我认为，它将作为一种新的结算方式而引人瞩目。

Amazon Go于2016年在亚马逊总部所在地西雅图开始试运营。截止到2019年1月分支机构仅有9家，据说亚马逊正在商讨到2021年开设3,000家分支机构的计划。在CES 2019上，有很多人指出“亚马逊可以做到这一点”。

让我们再看一下Amazon Go的运营方式。购物的客人在自动检票机那样的闸机口扫描手机二维码，进行Amazon ID身份验证后入店，然后从货架上选取商品并离开，离开时系统会自动结算，购物收据会被发送到顾客的智能手机上。虽然Amazon Go的技术支持还未详细说明，但从亚马逊发布的信息来看，其所使用的物联网技术几乎媲美大企业最尖端的技术。

这项技术被命名为“Just Walk Out”。“计算机视觉”通过店内的摄像头对客人面部进行识别，观察客人在哪里做什么，“混合传感器”可以识别顾客在哪里取了什么商品，然后AI通过“深度学习”掌握客户行为，以超高的速度运行PDCA，进一步提高用户体验。

面向商家的融资——“亚马逊贷款”的革新

亚马逊面向商家提供了一项借贷服务，名为“亚马逊贷款”。

亚马逊公司网站表示：“短期运行资金贷款可以帮助经营者进一步拓展业务。”这项贷款的优点是，在线融资可以在短短的5个工作日内及时完成，并且采用简单的还款程序，每个月从结算的亚马逊账户中自动扣除卖家的销售额，贷款额度最高可达5,000万日元。

亚马逊在进行贷款审查时，评估所需的材料并非商业计划或房地产抵押品，而是亚马逊在商流、物流和资金流中积累的大量数

据。亚马逊会根据贷款公司过去的销售业绩和结算数据来判断是否提供贷款。

亚马逊之所以能够做到这一点，是因为亚马逊三位一体控制着的商流、物流和资金流。亚马逊以“亚马逊配送”的名义向卖家提供物流服务，所以清楚地掌握了商家的商品销售和库存状况。迄今为止，借贷业务是银行和非银行信贷机构的天下，但是亚马逊正在利用其商流、物流和资金流的数据成为面向企业借贷的主要参与者。

需要注意的是，亚马逊最终的目的是扩张亚马逊规模经济。通过向商家提供贷款不仅可以赚取利息，而且由于商家的业务增长，亚马逊的销售额也会增加。

具有存款功能的“亚马逊礼品卡”和“亚马逊现金”

在银行的三大主要业务中，监管最为严格的当属存款业务。毫不夸张地说，从大家那里收集资金存储起来的业务是银行存在的最佳理由。对银行而言，以自有资本比率为首，需要遵守许多严苛的硬性规章制度。

但是，“亚马逊礼品卡”和“亚马逊现金”在“保管用户资金”这一点上，可看作其具有广义上的存款功能。它不是以利率的形式，而是以积分的形式提供给用户银行存款所不能给予的实际利息。

“亚马逊礼品卡”是可以在亚马逊购物的礼品卡，可以在便利店或网上购买。有些用户购买“亚马逊礼品卡”当作礼品用于送人，也有作为付款方式使用。用户可以选择任意充值金额的礼品卡，每次在便利店、ATM或网上银行充值时，亚马逊普通会员最高可获2.0％的积分，高级会员最高可获2.5％的积分，对比0.001％

的银行储蓄利率和0.01%的定期存款利率，“亚马逊礼品卡”非常具有吸引力。

“亚马逊现金”（Amazon Cash），即所谓的预付费账户。一般在亚马逊上购物的话，用户需要开通一个账户，并绑定自己的银行账户或信用卡。“亚马逊现金”省掉了这种麻烦，直接让用户使用其存入亚马逊账户中的现金进行购物。

“亚马逊现金”的用户是没有银行账户或信用卡的人。在美国有一个词叫“unbank”，是指没有银行账户或正在接受非银行金融服务的人。根据美国联邦存款保险公司（FDIC）的一项调查，在美国，估计有3,350万家庭没有银行账户。在此之前他们无法使用亚马逊，但是“亚马逊现金”带他们走进了亚马逊规模经济。

现有金融机构甚至会失去“管理职能”

近年来，围绕金融业的争论中，有人认为金融科技将在未来主导市场，而现有的金融机构将仅剩下“管理职能”。关于这一点，我想引用《金融科技的影响》这本书的部分内容进行说明。

“……银行的业务仅限于账户的维护和管理。金融科技公司需要与银行建立联系才能给用户的账户存（取）款并查询余额，其他服务则全部由金融科技公司自己提供。说得极端一点，现有金融机构可能只剩下维护和管理其账户的功能了。如此一来，现有金融机构自然就很难脱颖而出。

“就像日本有3家通信运营商都经营苹果手机，那么消费者就不必担心选择哪家运营商一样，如果金融机构的客户只需开通账户，那么他们可以去任何一家银行，最终银行就会陷入与通信运营商一样的境地。”

但是，一旦像亚马逊现金这样的金融科技也能提供存款功能时，就连“账户的维护管理”都不再是金融机构的专属职能了。用户使用“亚马逊现金”充值，即使没有银行账户，日常生活也不会有任何麻烦。2018年，有报道称厚生劳动省考虑取消电子货币工资的禁令（共同社，2018年3月），也就是“可以想见在智能手机支付程序上通过转账来支付工资，即将成为现实”。在这种情况下，银行甚至连管理职能都可能要失去了。关于这一点的分析，可以参阅我在第8章的论述。

基于层状结构的精准预测

如上所述，亚马逊推进金融业务似乎是扩张亚马逊规模经济，并实现“全球最以客户为中心的公司”使命的必然结果。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没有预料到“亚马逊银行”的诞生反倒显得奇怪。

事实上，亚马逊正在试图全面进军银行业务，但是由于现行的各类复杂规定以及美国银行业的反对，亚马逊还未能做到这一点。尽管如此，亚马逊已经开发了法规许可下的信用卡业务以及金融服务，例如亚马逊贷款和Amazon Pay。

在亚马逊等美国大型IT企业进军银行业受阻的情况下，中国的阿里巴巴和腾讯，这些面向中国人开发的在线支付服务，却正在美国迅速地扩张。美国金融业在感受到来自中国IT巨头的攻势之时，已开始认真探讨并重新审视如何将银行和商业分离的硬性规定。今后我们有理由认为此举将鼓励IT巨头进入银行业，促进金融业界的竞争，进而提高美国银行在该领域的竞争力。我认为美国金融机构允许包括亚马逊在内的IT巨头进入银行业只是时间问题而已。

以虚拟货币为轴心运行“大数据＋AI”

我们知道，亚马逊如果要进军银行业的话，最先会从借贷和结算业务入手。

相较于云服务部门的客户银行，如果支持业务AI化的亚马逊开拓银行业务的话，那将会给业界带来比阿里巴巴和腾讯的到来更大的破坏性冲击。

说得更具体些吧。我们可以预想，亚马逊会以自己的虚拟货币为核心来拓展亚马逊规模经济，利用科技公司的技术，使用区块链和AI技术来打造新的金融和商业平台。

我相信，作为运用“大数据＋AI”技术，充分活用众多银行利用云服务经验的“AI银行”——“亚马逊银行”应该很快就会诞生。而且亚马逊很有可能成为本书最后一章提到的“金融4.0”时代的先驱。如果亚马逊在其自己的规模经济内发行亚马逊币，那么无论是在名义上还是现实中，都将会形成一个巨大的规模经济。

然后，没有实体分支机构、员工和庞大体系等陈旧体制的数字银行——AI银行便会诞生，它就是“亚马逊银行”，在为客户提供卓越的客户体验和快捷的服务的同时，致力于提高用户的便利性。在现实世界中，当Amazon Go的银行版分支机构以新的商店形态被推出时，无疑又将会成为现有金融机构的最大威胁。此外，似乎也没有什么依据可以完全否定亚马逊银行的诞生。

以亚马逊银行为核心的层状结构

图4-5总结了以亚马逊银行为中心的层状业务结构，它预测了亚马逊银行实际开展时的业务结构。



图4-5　以亚马逊银行为核心的层状结构

首先，云计算服务被定位为所有业务的基础架构。云服务将发挥亚马逊银行的大脑功能，并对外公开亚马逊银行的AI银行专业技术。这是亚马逊银行积累起来的，作为其新技术基础的专业技术。

位于云服务之上的是物流部门，也是电子商务&零售的命脉。控制物流是亚马逊的特色之一。随着亚马逊银行的开展，商流、物流和资金流将会得到三位一体的精准控制。

亚马逊银行在承担整个亚马逊资金流的同时，还将在连接各种结算（Amazon Pay）、语音结算（Amazon Alexa）和物联网结算（Amazon Go）中发挥作用。此外，从“银行”与“储蓄”的观点来看，我认为控制商流、物流和资金流的亚马逊银行具备作为“信息银行”开展业务的潜力。

单从支付功能来看，亚马逊银行的成立意味着，亚马逊将会与中央银行结算系统以及民间银行系统连接，也就是说亚马逊银行的账户将与Amazon Pay、Amazon Alexa和Amazon Go等直接关联。正如导言《即将到来的2025年4月》中预测的那样，即使亚马逊币作

为亚马逊独立的货币出现，也不影响亚马逊银行账户带给亚马逊和消费者双方极大的便利性。

作为亚马逊银行客户接触点的结算部分，Amazon Pay、Amazon Alexa和Amazon Go将能够吸引客户使用亚马逊提供的各种产品、服务和内容。这些服务包括：银行、证券、保险等金融服务，电商、零售、娱乐，配有Amazon Alexa的移动服务以及将Amazon Alexa引入生态系统的智能生活服务。

“将客户置于宇宙最中心”

亚马逊银行诞生之初，对现有金融机构最大的威胁是，在“以客户为中心”的使命下开展的银行业务以及与之密切相关的优质客户体验。正如我们在《即将到来的2025年4月》中预测的那样，亚马逊银行将会以“感觉不到在进行银行交易的舒适体验”为口号来开展业务。

依照贝佐斯本人的定义，以客户为中心的原则由倾听、发明和个性化三个部分构成：倾听并回应客户的需求，并以此为基础进行发明和创新。其中“个性化”的定义堪称绝妙，即“put them at their own universe”。其中文意思是，将顾客置于自己宇宙的中心，即为个性化。

当启动金融业务时，我想亚马逊可以活用其培育的“大数据+AI”技术，同时为多人定制专属于他们的金融服务。

例如，对于在亚马逊电商网站上交易的中小型企业，亚马逊通过利用他们在网站上积累的商流、物流和资金流等全方位数据，确认该公司真正需要的贷款金额和时机。在“动态定价”（使用AI的动态定价方法）决定的利率下，亚马逊不仅可以提供贷款，而且还可以提供财保和盈余资金管理等方案。

随着新一代内置Amazon Alexa的汽车的出现，亚马逊可能会拓展根据汽车的行驶距离来提供汽车保险的服务。

亚马逊提供的贷款和保险仅限于“用户使用的及想要使用的部分”，用于投资的盈余资金仅限于“用户余下的部分”，在这些方面，我想亚马逊比现有金融机构更加具有优势。

贝佐斯一直提及的“个性化”行为，再结合“大数据＋AI”，极有可能让亚马逊银行的诞生成为现实。

2025年，你会选择哪家银行

基于以上分析，我认为亚马逊银行的特色是，第2章图2-2中所示的“今后的理所当然”8个项目。即：

①便利

②省事

③不花时间

④易懂

⑤自动完成

⑥友好

⑦愉快

⑧没有意识到正在交易

正如在导言中所述，亚马逊银行诞生之初对金融领域构成的威胁是：亚马逊将垂直整合电商、核心零售业务与金融业务，并且能

够在生活的各个方面提供金融服务。

2025年，你愿意选择“AI化银行”还是“亚马逊银行”进行交易？这就决定了“亚马逊银行”诞生之日是否能够真正到来。

新加坡星展银行的首席信息官大卫·格勒希尔说：“如果亚马逊的贝佐斯从事银行业务，他会做什么？”沿着这个观点出发深入思考的结果就是，该银行会成为世界上最好的数字银行。希望通过本章的学习，读者能够以设计思维和批判性思维去看待问题。

第5章　引领中国成为全球最先进金融科技大国的阿里巴巴与腾讯

以金融为业务核心拓展生活服务

阿里巴巴和腾讯，与亚马逊一起并列为世界三大科技巨头公司，这两家来自中国的公司已经率领中国迈入全球最先进金融科技大国之列。

如果你认为“全球最先进金融科技大国”一词言过其实，那么我建议你先耐心阅读完本章内容。如果可以的话，请大家让自己在日本的中国朋友介绍一下阿里巴巴的应用程序——支付宝。虽然，支付宝在日本被定位为“面向海外中国旅客提供金融服务”的一款应用程序，但是我们会惊奇地发现，它不仅提供了详细的加盟店信息，还提供包括银行、证券、保险和共同基金，以及电子商务和其他服务等金融业务，使用户可以做到交易的无缝衔接。

正如下面所述的，阿里巴巴金融的独到之处并不仅仅停留在支付宝的表面功能上，也就是并非只有先进的无现金与二维码结算技术。阿里巴巴以电子商务为根基，拥有物流业务、实体店、云服务、太空服务和金融，已然成长为一家涵盖所有业务的国际型大公司，并不断拓展自己的规模经济，在这一点上阿里巴巴与亚马逊十分相似。

特别是在金融方面，阿里巴巴开展的业务远超亚马逊。从一开始阿里巴巴就致力于开展金融服务，尤其是在线支付功能。

截止到2018年3月的数据显示，支付宝的年度活跃用户有8.7亿，并且现在可以在40多个国家和地区使用。

而腾讯在其社交应用程序微信中内置了具有结算功能的“微信支付”。据2018年6月的季度报告显示，微信每月有大约超过10亿活跃用户。

以这两个应用程序为参考，我们能计算出中国的无现金支付比例已上升至80％以上。

比亚马逊更强的“金融霸权”意识

那么，阿里巴巴和腾讯执着于支付功能的目的是什么呢？

如第4章所述，亚马逊提供金融服务的目的是为了扩张亚马逊规模经济，而金融服务终究只不过是一种手段，这就是为什么亚马逊“不打算依靠金融业务获取霸权”的真实原因。

比起亚马逊，阿里巴巴和腾讯又是怎样的呢？对于这两家公司而言，金融是其商业模式的核心。阿里巴巴盈利的核心是支付宝，而且正在与另一家战略公司蚂蚁金服共同推动其金融业务。

以大量的微信用户为基础，腾讯的目标在于支配整个生活服务。凭借其优越的客户接触点以及可以从中获得的大数据，腾讯在金融服务方面要赶上已经领先的阿里巴巴应该不难。相反，以阿里巴巴为参照，腾讯可以充分发挥其后发的优势。

无论如何，对于中国这两家金融颠覆者来说，金融业务必不可少，而且他们争夺霸权的意识十分强烈。仅凭这一点，这两家公司对金融行业的威胁要大于亚马逊。

比现有金融机构更接近金融本质

支付宝已经是阿里巴巴电商平台的一种支付方式，而微信支付已成为社交通信平台（如腾讯通话和信息）多元化业务的一部分。换句话说，阿里巴巴和腾讯最初并不是金融参与者，但是现在他们已经成为世界上最大的两家金融科技公司。

他们为金融业带来什么价值？我认为他们“比现有金融机构更接近于金融的本质”。

在第2章中我曾说过，新一代金融参与者的三大功能就是：在其平台中拥有巨大的商流、资金流和物流。阿里巴巴和腾讯一直在其生活服务平台上融合商流、资金流和物流，累积与每位用户相关的大数据。这些数据将被用于开发新服务。更重要的是，它们将被用于测量每位用户的信用或成为信用评估的信息。

现有金融机构无法摆脱传统的担保主义，因此无法充分为真正需要资金的中小企业、小微企业或个人提供金融服务。换句话说就是，现有金融机构未能发挥金融本来应该发挥的作用。

另一方面，阿里巴巴和腾讯在其平台上积累了商流、资金流和物流等数据信息，并以此来评估需要资金的个人和中小企业的信用，给他们贷款。因此，我认为阿里巴巴和腾讯体现了现有金融机构所缺少的金融本质。

阿里巴巴的创始人马云认为：“如果将公司划分为富人和穷人的话，那么互联网就是穷人的世界。大公司拥有自己的信息渠道以及巨额的广告预算，而小企业什么都没有，因此小企业只能依附于互联网，而我将率领穷人革命。”

马云出生并成长在中小民营企业蓬勃发展的浙江省，因此对中小企业的生存竞争和发展困境非常了解。

阿里巴巴的电子商务用户和腾讯的通信用户不断增加，促进了他们各自平台上商流、资金流和物流的发展。例如，在资金流中，支付宝账户或微信钱包中会产生资金的积累，阿里巴巴和腾讯以此为纽带，提供相关的各种金融服务，进而与平台内外的服务相链接。

也就是说，阿里巴巴和腾讯两家企业正在利用平台内外的服务取代传统银行的业务功能，这就是“现有金融机构与科技公司之战”构图中出现的金融颠覆。

基于PEST分析不断发展的中国商业环境

毫无疑问，拥有阿里巴巴和腾讯两家企业的中国，将对未来金融业产生巨大影响，而这些超级金融颠覆者的出现，与中国本身的特殊环境也是分不开的。

因此，在进行单独分析之前，我们对中国的宏观环境进行了PEST分析，即从政治、经济、社会和技术的角度剖析它们对国家及产业变化的影响（图5-1）。

政治因素

在政治因素方面，中国的国家产业政策，特别是强国化和创新政策值得注意。

首先是强国化，其首要政策就是“一带一路”，这是一项从亚洲延伸到非洲和欧洲，从基础设施、金融、技术、制造业、电子商务和贸易等全方位领域构建中国规模经济的重要政策。同时，中国多次颁布“强国”政策，包括制造业强国、汽车强国和世界领先的人工智能强国，试图改变中国在国际秩序中的地位。

其次是在创新方面，“十三五”规划（2016—2020年）制定了创新驱动型经济增长的目标，并通过其他政策设定了新能源、节能、人工智能、数字创新和大数据等由国家战略支持的新兴领域。特别是在中国政府大力推行的人工智能领域中，阿里巴巴和腾讯均入选国家重点扶持企业。

接下来让我们看一看金融政策。2010年6月颁布的《非金融机构支付服务管理办法》（人民银行令〔2010〕第2号）显示，支付宝和腾讯等非金融机构提供支付服务时，必须具备提供最低限额的注册资本、出资人和反洗钱措施等一系列条件，并获得“支付业务许可证”。

2018年3月，《中国人民银行公告〔2018〕第7号》规定，境外机构进入中国电子支付市场提供服务时，应当在中国境内设立外商投资企业，取得“支付业务许可证”，并在独立完成支付业务系统、风险系统齐全以及个人信息处理妥当的条件下，适当放宽对境外机构的进入规定。这将建立一个完善的管理监督体制，平等地对待国内外资本，促使中国飞速发展的电子支付市场朝更健全的方向进化。

表5-1　中国的PEST分析

	中国整体	与金融的相关性
政治（P）	* 国家产业政策——强国化和创新战略 * “一带一路” * “十三五规划” * 受托执行国家建设方针政策的企业	* 金融政策——放宽对外资的限制，建立电子支付市场的监管体制 * 金融行政改革——加强中国人民银行的权限和功能

		* 加强对金融证券化的监管
经济（E）	* 中国制造2025 * 产业的智能化 * 互联网与各个产业的融合 * 创造新产业、新服务 * 减少农村贫困人口 * 共享经济	* 2013年利率自由化——现有银行的盈利能力下滑 * 放宽对金融整体的管制 * 2015年促进互联网金融健康发展的指导原则 * 传统金融机构向金融科技银行转型
社会（S）	* 提高生活水平，提升国民素质，强化国家治理体系 * 价值观的多元化，便利性和合理性 * 数字原生代 * 智能手机，社交网络	* 智能手机 * 社交网络 * 移动端支付 * 无现金 * 无人化・自动化 * 共享
技术（T）	* AI＋大数据，云，神经网络，计算，机器学习及深度学习，5G，机器人技术，自动驾驶	* AI * 人脸认证，生物认证，感应 * 金融科技（广义・狭义） * 区块链 * 无人化・自动化

同时，为了响应互联网金融的快速发展，面对金融业中合作的必要性以及竞争的白热化，中国实施了金融管理改革。在新的管理系统中，中国人民银行集中承担起草重要法律法规等职能。

另外，证券化相关的金融法规也得到了强化。例如，2017年12月，中国人民银行宣布，要求小额融资业者有义务将资产抵押证券（ABS）募集的资金纳入其资产负债表。一般情况下，金融机构通过证券化募集的小额资金不必计入资产负债表，这样可以将贷款权益比率控制在较低水平。据说消费者金融巨头蚂蚁金服等线上小额融资业者由于净资本较低，所以拥有大量小额贷款和ABS发行规模。

但是，在中国如果禁止ABS的表外化业务（Off-balance Sheet Activities），那么发行ABS的好处将会减少。实际上，在上述法规出台之后，蚂蚁金服等小额融资业者已经开始谨慎对待ABS融资。

此外，中国人民银行于2018年6月发布了《关于支付机构客户备付金全部集中交存有关事宜的通知》（银办发〔2018〕114号）。该管理规定要求支付宝和微信支付等不通过中央银行提供支付服务的支付机构，必须将用户账户存款金额的100％同额存入中央人民银行作为储备金。尽管这项措施对保护用户有利，但这也意味着支付宝和腾讯在业务开展上会受到影响。

经济因素

接下来，让我们看一下经济因素。

中国已经基本实现小康社会的建设，“十三五”规划指出，到2020年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达成这一目标的关键就在于经济增长。为了实现到2020年GDP和国民收入比2010年翻一番的目标，中

国将年均经济增长（率）目标定为6.5％。要完成这一目标，需要解决的重要课题包括，通过农业现代化减少农村贫困人口，工业化和信息化的融合发展以及创造新的产业和业务形式。“互联网＋”“中国制造2025”和“大数据发展指南”等独立政策也在不断促使产业智能化、互联网与制造业及其他产业的融合。

而且，中国也在推进共享经济的发展，以提高商品和服务的利用率、资源管理效率及整体经济的生产率。共享出行的滴滴等创新型企业已经出现，有数据显示中国共享经济市场的规模已超过3兆人民币。

特别是在金融领域，2013年推行的利率自由化对市场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这一政策加剧了银行间的竞争，缩小了存贷款利率差并降低了银行的盈利能力。自利率自由化以来，四大国有银行的净利润下降，增长速度放缓，而租金和人工成本不断增加，实体分店的运营成本也在上升，再加上宽松的金融管制，导致银行的盈利空间不断缩小。

在这种情况下，银行采取的措施是扩大数字化渠道或转型为“金融科技银行”。2017年，金融颠覆者与传统金融机构之间宣布达成战略联盟协议，比如隶属于阿里巴巴的蚂蚁金服和中国建设银行，腾讯和中国银行都签订了协议。这项协议是以2015年7月发布的《关于促进互联网金融健康发展的指导意见》（中国人民银行、工信部、公安部、财政部等部门联合发布）为依据的。该指导意见规范了互联网金融市场，包括互联网支付、网络借贷、互联网消费金融、基金销售、互联网保险和信用信息，鼓励传统金融机构利用互联网金融进行改革。

社会因素

社会因素又如何呢？在此我想指出的是，中国社会正在发生质变。人民的生活水平、国民素质、生态环境和国家治理已被列入“十三五”规划的目标项目中。据统计，拥有多元价值观的“80后”已成为社会建设的主力军，他们是使用智能手机和SNS的数字原生代。随着在线和离线合并（OMO）业务的迅速普及，他们自然而然地使用移动支付来追求便利和效率。最近，智能手机的发展新趋势开始在中国出现，这也将成为智能化扩展的助推器。

技术因素

最后一个是技术因素，包括AI＋大数据、物联网、云、神经网络和计算、机器学习和深度学习、4G到5G、机器人自动化（RPA）和自动驾驶等。面部识别、生物特征识别和感应技术的进化，让无须智能手机的支付成为可能，并促进了无人收银便利店的扩张。政府推动的诸如AI等方面的技术政策已经在政治因素那里介绍过，在此不再赘述。

广义上金融科技可分为四个领域，即基础设施服务、平台、融资和资产管理。

基础设施服务包括支付宝和微信支付等支付体系，以保障大数据、云和网络的安全性。

平台是指诸如阿里巴巴电子商务网站和腾讯通信应用程序之类的门户（Portal），还包括接受在线银行个人账户的存款，诸如支付宝账户和微信钱包之类的具备存储资金的服务。

融资包括P2P贷款、众筹和小额贷款，也包括消费者金融和房地产金融。

资产管理包括基金、货币市场共同基金（MMF）、证券、保险、信托和衍生工具。

从狭义的技术层面上看，金融科技还包括与区块链和虚拟货币相关的技术、人工智能、认证技术等。在中国，每个行业都有很多参与者，但由于中国加强了对金融科技的监管规定，比如上述禁止ABS表外融资的法规等，导致有些行业不得不退出市场。

以上就是阿里巴巴和腾讯所处的中国大环境。以建成小康社会为目标，拥有巨大的消费市场、赶超发达国家的跨越式创新技术以及“国家统制型”的特色政治背景，再加上经济需求和社会变化的相互作用，共同形成了中国今天的商业环境。

第6章　阿里巴巴：以构筑世界第五大经济体为目标

在世界银行的官方网站上，有一个“普惠金融”的概念，是指个人或企业通过值得信赖的方式可以获取方便且适合的金融服务，以满足自己的交易、支付、储蓄、信贷和保险等需求。根据这个定义，阿里巴巴和腾讯两家公司便是致力于满足人们生活中的金融需求，并使用技术来解决这些需求，可谓是通过技术实现惠普金融的公司。

首先让我们看一看阿里巴巴的业务概况。

阿里巴巴是其前董事长马云于1999年创办的一家互联网公司。该公司的使命是利用社会基础设施解决社会问题，愿景是构筑仅次于美国、中国、欧洲和日本的世界第五大经济体，战略目标是到2036年实现为全球20亿消费者提供服务，使1,000万家公司在阿里巴巴平台上创收。

阿里巴巴总部位于杭州，截止到2018年3月，约有66,000名员工。该公司于2014年在纽约证券交易所上市，2019年3月11日公布的市值高达4,676亿美元，入围全球前十强企业。据年报显示，2018财年（2017年4月1日至2018年3月31日）阿里巴巴的全年营收实现398亿美元，净利润达到110亿美元。2017财年的全年营收和净利润分别为229亿美元和69亿美元，两者均呈现出强劲的增长。

涵盖所有生活服务的业务开展

如图6-1所示，阿里巴巴集团的业务涵盖7个业务领域，它们分别是核心商务、当地服务、数字媒体和娱乐、云计算、营销服务、

物流、支付以及金融服务，这个巨大的平台几乎网罗了所有的生活服务。



图6-1　阿里巴巴的业务结构

注：上述信息均来自阿里巴巴集团官方网站。

核心商务是指电子商务网站的运营，这是阿里巴巴的根基，涵盖了B2C模式的“天猫”和C2C模式的“淘宝”等国内零售业务，B2B模式的“Alibaba.com”等国内批发和供应链平台的“零售通”业务，以及“天猫国际”“Ali Express速卖通”和“Lazada”等国际电子商务服务。

当地服务包括供应生鲜食品的超市“盒马鲜生”（阿里巴巴在2019年1月30日的新闻稿中宣布将其英文表示法从“Hema”改为“Freshippo”），提供饮食评价服务的“口碑”，送餐服务“饿了么”，导航地图服务“高德地图”等。数字媒体和娱乐包括视频服务平台优酷和土豆。

云计算由中国最大的云服务供应商阿里云提供，阿里云支持以支付宝为首的阿里相关所有服务内容。

在营销服务中，数据管理平台“全域营销（Unimarketing）”和“阿里妈妈”为天猫等提供大数据的存储和分析功能。

在物流业务中，“菜鸟物流”负责整个阿里巴巴集团的战略物流，目标是在中国所有区域实现24小时之内，在全球范围实现72小时之内的及时送达。

“蚂蚁金服”承担阿里巴巴集团的支付和金融服务，提供支付宝结算等服务。

从利润结构分布来看（图6-2），阿里巴巴的核心商务占2018财年全年营收的86％，可以说阿里巴巴仍然是一家电子商务公司。但是，在2015年至2018年之间，数字媒体和娱乐的营收年均增长率接近200％。同时，云计算收入也以年均170％以上的速度增长，在全球市场份额中排名第5，仅次于亚马逊、微软、IBM和谷歌。随着新零售战略的不断进化，菜鸟的战略性也不断增强。此外，拥有“AI＋大数据”的全域营销和阿里妈妈的潜力也是显而易见的。总而言之，阿里巴巴正在整合构建利用整个平台营收的体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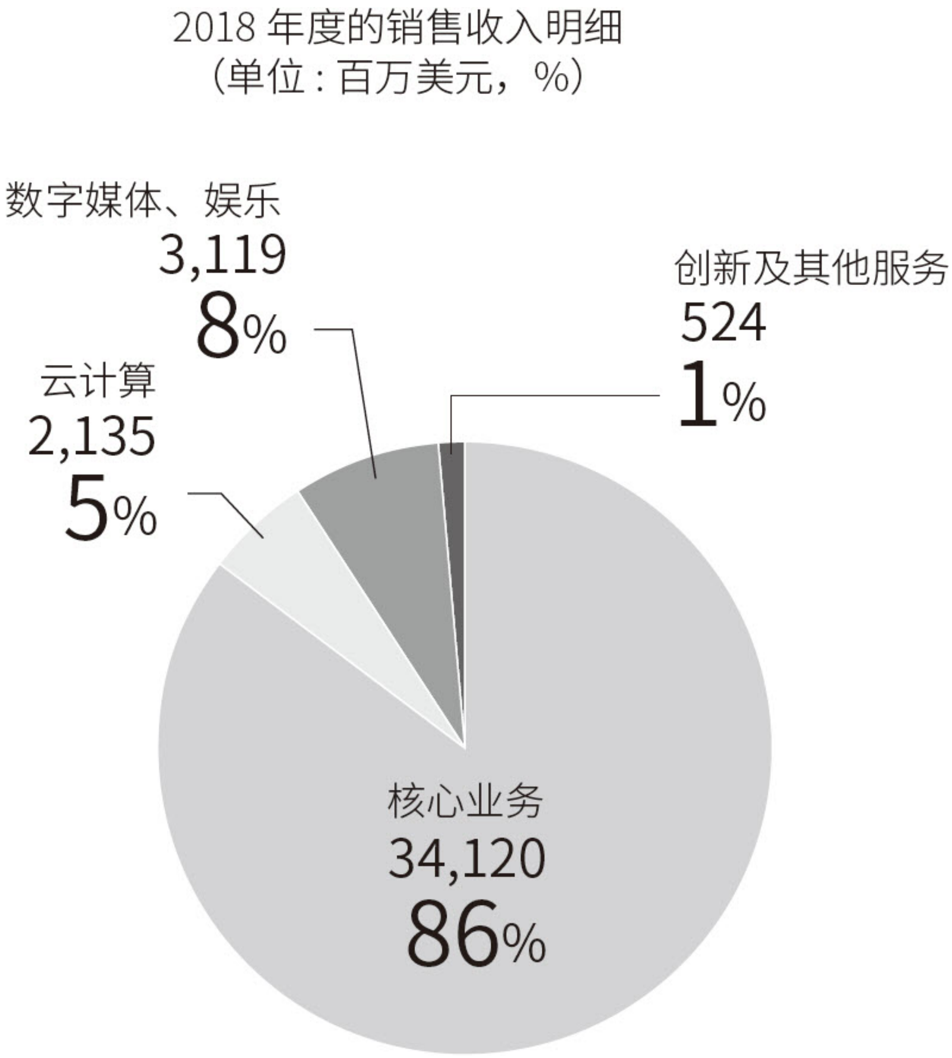


图6-2　阿里巴巴的收入结构

与亚马逊抗衡的后台服务

如果将核心商务、当地服务以及数字媒体和娱乐业务比作个人和中小企业的“前院”的话，那么阿里云、全域营销、阿里妈妈、菜鸟和蚂蚁金服将是支持它们的“后院”。

值得注意的是，“后院”不仅仅是用来支撑“前院”的。菜鸟本身就在利用最先进的技术，构建并运行由国内外快递公司共同组成的物流生态系统。如下所述，蚂蚁金服是垂直整合阿里巴巴集团金融业务的主要实体。而阿里云和全域营销、阿里妈妈一起，为加

入阿里巴巴的各行业公司提供云计算和“AI＋大数据”的相关服务，与云服务方面拥有最大市场份额的亚马逊云服务形成对抗。

阿里巴巴还在2016年10月提出了“新零售”概念。这一新词出现在2018年的年度报告中，即通过技术创新实现“线上线下一体化”，“让客户能够随时随地享受到完整的无缝体验”。换句话说，阿里巴巴的新零售通过“线上＋线下＋物流＋技术”来最大化客户体验，生鲜超市盒马鲜生和大润发被认为是其核心所在。追求客户体验的关键在于能否“与客户建立持续且良好的关系”，在亚马逊之前倡导新零售，表明了阿里巴巴在这方面的领导地位。

担任盈利核心的蚂蚁金服

让我们深入探究一下阿里巴巴的金融业务。

蚂蚁金服提供的结算、融资、资产管理和信用评分等金融服务，支撑着阿里巴巴的所有生活服务基础。从让用户可以更加舒适便捷地生活这点来说，蚂蚁金服一定是处于阿里巴巴盈利的核心位置。

蚂蚁金服最初只是一个部门，负责阿里巴巴的结算业务，最初挂靠于2004年成立的支付宝（阿里巴巴的子公司）。由于中国人民银行对外资限制的规定，接受日本软银等外企出资的阿里巴巴在2011年出售了支付宝的全部股份，将支付宝的业务彻底剥离。之后，支付宝的所有权被转移到马云等人于2011年新成立的浙江阿里巴巴商务有限公司之中，而该公司属于100%内资控股。2014年10月，公司更名为蚂蚁金服，并一直延续到今天。2011年5月，支付宝根据《非金融机构支付服务管理办法》取得了中国人民银行颁发的“支付业务许可证”。

阿里巴巴和蚂蚁金服之间的关系有点复杂，因此我想再做一些补充。自从2011年蚂蚁金服成立以来，阿里巴巴一直不是其直接股东。基于2014年的协议内容，阿里巴巴拿到了接受蚂蚁金服支付息税前利润（EBIT）37.5%的利润分配计划。然而，在2018年2月，阿里巴巴突然宣布将以接受新股发行的方式收购蚂蚁金服33％的股份，并同步终止其原来的利润分配计划。这样一来，蚂蚁金服实际上就又变回负责阿里巴巴集团金融业务的子公司。

“通过技术实现普惠金融”的意愿

蚂蚁金服还没上市，因此不能披露其收入结构或合并范围，但据路透社2018年4月18日的报道，2017年蚂蚁金服的全年营收已达89亿美元，税前利润更达到21亿美元，可以说是中国著名的独角兽公司。在阿里巴巴整体的营收与净利润中，蚂蚁金服大约占1/5左右，而且其中的55%来源于支付宝。

根据官网显示，蚂蚁金服是一家向世界提供包容性金融服务的“科技金融”公司。是的，不是大家熟悉的“金融科技”公司，而是用“科技金融”公司替代了。我认为这反映了“通过技术实现金融包容性”与“满足用户的金融需求”的强烈意愿，而不是利用金融服务和金融科技本身来盈利。

“蚂蚁金服的努力只为达成一个目标，那就是构建面向未来的数字金融生态系统，并利用科学技术为世界提供更多更平等的机会。”

通过技术创新建立开放式信用体系和金融平台，并为传统金融机构无法提供服务的个人、中小企业和小微企业提供安全、便捷以及普惠的金融服务，这就是蚂蚁金服。

一切始于“支付宝”

蚂蚁金服建立了金融服务生态系统，其中包括用于结算的支付宝、用于资产管理的蚂蚁财富、用于信用评分的芝麻信用以及在线银行网商银行，让我们逐一探究。

第一个是支付宝，据称它占了蚂蚁金服总营收的55％，也是生态系统的起点。支付宝作为一种支付手段，已经席卷全国，可用于各种生活服务，比如天猫购物中心和淘宝网等阿里巴巴的电子商务站点，盒马和大润发等阿里巴巴的新零售商店，第三方实体店或电子商务站点的购物，用电和天然气等生活缴费，出租车、公交车、地铁和飞机等交通支出，以及餐厅、主题公园和电影院等饮食和娱乐的消费支出，主要功能是通过安装在智能手机上的支付宝应用程序进行二维码支付。

二维码付款有两种方式，一种是用户将显示在自己应用程序屏幕上的付款码展示给店员，然后店员用读取器对其进行读取付款；另一种是使用应用程序屏幕上的扫描功能来读取店家摆放在收银台上的收款码进行支付。基本上大部分用户都是通过这些二维码来进行付款的。

原则上，用户不用支付任何手续费。如果用户持有智能手机，那么只需下载安装支付宝应用程序并与用户的银行账户绑定即可使用。对于引入支付宝付款的商家，支付宝也只收取较低的手续费。不论是对于用户还是商家，它都是一种有吸引力的工具，这也是二维码支付在中国可以迅速普及的主要原因。

所有服务的入口

支付宝结算还带有托管功能。托管是保证交易安全的中介，在用户和商家彼此看不见对方的在线交易中，支付宝保障了交易的安全性。购买商品的用户利用支付宝付款，同时付款金额将存入支付宝平台。然后支付宝平台将用户的付款信息通知卖方，卖方收到付款信息后给买家发货。买家收到货后检查货物内容，确认无误的话，支付宝才会把存入支付宝平台的付款金额转给卖方。如果商品有问题，支付宝将对买卖双方之间产生的问题进行协调，最终退款给买家。在中国市场，阿里巴巴崛起的背后离不开托管提供的安全保障。

支付宝不仅提供支付服务，还提供其他服务。

请允许我按照支付宝应用程序的界面显示进行解释。最上面一栏的“扫一扫”和“付钱”用来进行二维码支付，“收钱”提供拆分的计费功能，“卡包”提供打折和优惠等折扣服务。此外，支付宝还提供“转账”、“充值中心”、用于小额投资的“余额宝”、评分机制“芝麻信用”、用于小额贷款的“网商银行”以及保险服务“蚂蚁保险”等。除上述这些，支付宝还内置了第三方服务，例如提前预订餐厅、支付、点外卖、购买电影票、预订航班和酒店等生活服务。

当然，用户也可以从支付宝界面跳转访问阿里巴巴的天猫和淘宝商城，网站上的所有购物都是通过支付宝来完成支付的。支付宝以支付切入，为阿里巴巴的生活服务、金融服务乃至第三方服务提供了门户功能，并且界面设置一目了然，方便实用。

一站式资产管理服务——“蚂蚁财富”

蚂蚁财富是阿里巴巴在2015年8月推出的，针对用户的股票、基金、黄金和定期合约等资产提供一站式管理的金融服务。

其代表产品是“余额宝”，该产品从2013年开始提供服务，由蚂蚁金服控股的天弘基金管理运行。余额宝可以从支付宝应用程序中进入访问，并与支付宝账户相链接。

余额宝本身就是一种共同基金，但点击“余额宝”会发现其“访达”目的地还包括其他公司的共同基金。从这个意义上说，余额宝就是蚂蚁金服的资产管理门户。

余额宝的特点是，即使投入最低1元人民币的投资金额，也可获得高于存款利率的收益，并用作支付宝结算，还可在当天取款而不产生解约罚金。换句话说，它是一款具有高流动性和便利性的金融产品，截止到2017年第三季度，余额宝的托管资产已高达15,600亿元（约254,000亿日元），占中国共同基金市场总额的23％以上。

自2017年以来，中国银监会加强了对余额宝的监管力度，限制了余额宝账户中可存入和取出的金额，以及每日存取限额。此外，有报道称，中国银监会还在考虑限制当天的提款，这样一来用户使用余额宝的便利性肯定会大打折扣。但是毋庸置疑的是，余额宝有效地利用了大家支付宝账户中的剩余资金。

销售其他公司金融产品的平台

2017年6月，阿里巴巴推出了面向第三方金融机构的交易平台“财富号”，这是一项与余额宝一样备受关注的金融服务。

通过财富号，蚂蚁财富的用户不仅可以从蚂蚁金服购买金融产品，而且可以购买第三方提供的保险和定期存款等金融产品。就第三方金融机构而言，他们可以利用财富号平台扩大产品的销售渠道，节约促销费用。而对阿里巴巴和蚂蚁金服而言，可以扩大产品阵容，增加用户选择，以提高用户的便利性。

如此一来，第三方都将汇聚在阿里巴巴的大平台上，最终会产生正向的协同效应，即用户数量增加，平台累积来自商流、资金流和物流的大数据，并利用这些大数据强化自身。

面向个人或企业的信用评分机制——“芝麻信用”

阿里巴巴于2015年1月推出了芝麻信用，这是一项基于AI和云计算来分析个人或中小企业在阿里巴巴和蚂蚁金服上累积的大数据，并对个人或企业的信用进行单独评分的服务。芝麻信用是一种新的信用系统，与需要存款或查看还款历史来获取信用的传统信用体系不同。

创造“新的借贷经济”

芝麻信用的官网声称，芝麻信用弥补了在“新的借贷经济”中产生的信用缺口，消除了商业交易中常有的押金等客户费用和商家风险，使他们的交易建立在信用的基础上。这里的“新的借贷经济”也可叫作共享经济，2018年他们的目标是允许用户通过信用积分免除1000亿元的押金支付。

在芝麻信用官网上，个人信用评分有5个标准，即信用历史、行为偏好、履约能力、身份特质和人脉关系。信用历史包括交易和还款的历史记录，行为偏好包括使用购物和金融服务的历史记录和倾向，履约能力是指用户的稳定收入源以及资产持有状况，身份特质包括用户的学历和职业等基本信息，人脉关系包括人脉及信誉度等信息。

阿里巴巴利用用户在电子商务网站上的购物和支付宝结算来积累数据，并通过AI和云计算分析这些数据，进而得出用户的信用评

分。在信用评分等级中，“最优信用”等级的分值为700—950，“优秀信用”等级的分值为650—699，“良好信用”等级的分值为600—649，“普通信用”等级的分值为550—599，350—549之间的分值被认为是“信用欠佳”。和资产管理的余额宝一样，这些信用分数可以通过支付宝应用程序进行访问、登录和查询。

“利于找工作”，“利于找对象”

芝麻信用的评分不仅可以被用作消费者贷款时的个人授信度和无抵押贷款的证明，还可以被用于汽车租赁、酒店预订、房屋租赁、签证申请和公共设施的使用等各种服务，我觉得芝麻信用已经成为中国社会的基础设施。令人惊讶的是，它还有许多无形的好处，比如有利于“找工作”和“找对象”。

芝麻信用也是一种有益于商家的机制。该机制设定了多方面的标准，鼓励用户在日常生活的各个方面诚信守约，以提高其信用评分，这使商家能够以较低的成本吸引更加优质的客户。针对一些想要通过改善自己的信用记录和行为偏好来提高自身信用评分的低信用客户，阿里巴巴还推出了适合他们的营销和销售计划，以及产品和服务。

不过，芝麻信用的官网也指出，此信用评分是以商业交易为基础，不应与衡量社会信用的机制相混淆。但是在中国，每天都有炫耀或夸耀自己芝麻信用评分的场景，这也不足为奇。芝麻信用的分值越高，在中国社交的便利性也就越高。

无论如何，信用评分的提高将成为一种诱因，以鼓励用户进一步使用阿里巴巴提供的生活服务，这也将促使阿里巴巴能进一步积累商流、资金流和物流的大数据。很显然，芝麻信用是强化阿里巴巴平台的绝佳工具。

支援中小企业的“网商银行”

于2015年6月成立的网商银行（MYbank），是一家以实现普惠金融为使命，支持中小企业业务活动的在线银行。该银行的主要业务是为使用阿里巴巴电子商务网站（例如天猫和淘宝）的中小企业和个人提供零售和小额贷款。

小额贷款对象包括长途卡车司机、摊贩和经营网店的商家等，主要面向那些为了当天工作需要借入资金，并能够用当日的津贴或营收进行偿还的客户。具体来说，它提供的是针对中小企业和个人业主的“网商贷”，面向农民的“旺农贷”以及共同基金“余利宝”。根据网商银行网站显示，截至2018年6月，使用网商银行的中小企业已增至1,042万家，融资总额累计1.88亿元。此外，用户可以从支付宝应用程序中访问“网商银行”。

申请需要“3分钟”，审批仅需“1秒”

据该公司的网站显示，“网商贷”在线申请需要3分钟，贷款与否的判断仅需1秒钟，并且可以实现无抵押1元贷款。这种速度感和借贷的轻松感完全满足了小微企业的资金需求。

与芝麻信用一样，人工智能将根据阿里巴巴和蚂蚁金服积累的大数据进行审核。每日利率因信用额度而变化，信用额度越高，利率越低，融资成本也越低。

有趣的是，除了评估信用之外，申请人对资金需求的背景和原因也是审核资料之一。申请理由有“因为我们家分支机构十分有人气，所以我想增加员工数量，并开展促销活动”；“无法回收赊销货款，所以手头需要现金”，等等。人工智能可以通过大数据来判

断真伪，而且还可以通过大数据验证借贷理由。这些也正是金融科技公司与传统金融机构之间的本质区别。

独创的保险产品——“相互保”

最后，让我们简要地聊一下蚂蚁金服的保险业务。2018年10月，蚂蚁保险开始受理名为“相互保”的重大疾病保险业务，这是与信美人寿相互保险社共同开发的一款保险产品。加入相互保的条件是，用户已注册并成为阿里巴巴的电子商务会员，芝麻信用积分达到一定分值以上。当然，保险费用的支付通过支付宝完成。

按道理来讲，传统的相互救济保险服务理念，应该和围绕个人生活服务的平台彼此兼容，所以相互保被认为是使用大数据、人工智能和区块链等新技术实现相互救济的机制。顺便说一下，蚂蚁金服是信美人寿相互保险社和国泰保险的母公司，并与中国平安保险和腾讯等共同创立了在线保险公司——“众安保险”。

理解蚂蚁金服的两个关键点

从金融颠覆者的角度看待蚂蚁金服时，我想再强调两点：首先，蚂蚁金服利用技术和大数据已经在为用户提供传统金融机构应有的金融服务，例如支付、资产管理、信用评分和小额信贷等；其次，蚂蚁金服在阿里巴巴集团内部垂直整合了金融。

复制现有金融服务

正如我们反复指出的那样，在新一代金融行业中，金融可以模拟复制。现有金融机构已经不能继续垄断存款、贷款、汇兑这三大主要业务了。

基于自身特有的技术以及阿里巴巴集团积累的商流、资金流和物流的大数据，蚂蚁金服已经在提供金融中介和结算等业务功能。具体来说，支付宝提供了一种支付体系，支付宝账户中的闲置资金通过余额宝等方式以高回报率被运作，小额融资由网商银行提供给个人、中小企业和小微企业。蚂蚁金服旗下的“花呗”和“借呗”为用户提供消费者信贷服务，但是这些借贷方式因为过于简单的手续受到了大家的揶揄。

芝麻信用的信用评分被用于授信和无抵押贷款。尽管金融当局加强了对证券化融资的监管力度，但是网商银行的小额贷款还是可以通过发行资产抵押证券（ABS）与蚂蚁金服进行资金周转。

综合来看，我们可以发现蚂蚁金服以支付宝为切入点，模拟开展银行业务。但这还不是全部。阿里巴巴除了提供现有的金融服务和金融产品外，还在基于积累的大数据，积极开发用户专属的新金融服务与产品，以满足用户的生活和金融需求。

毫无疑问，蚂蚁金服所提供服务的客户体验值得赞赏，这一点是现有金融机构不具备的优势。

云、支付宝和芝麻信用的层叠构造

蚂蚁金服已经垂直整合了阿里巴巴集团的金融服务。图6-3显示了阿里巴巴集团的业务模型、金融平台支付宝和信用平台芝麻信用之间的层叠结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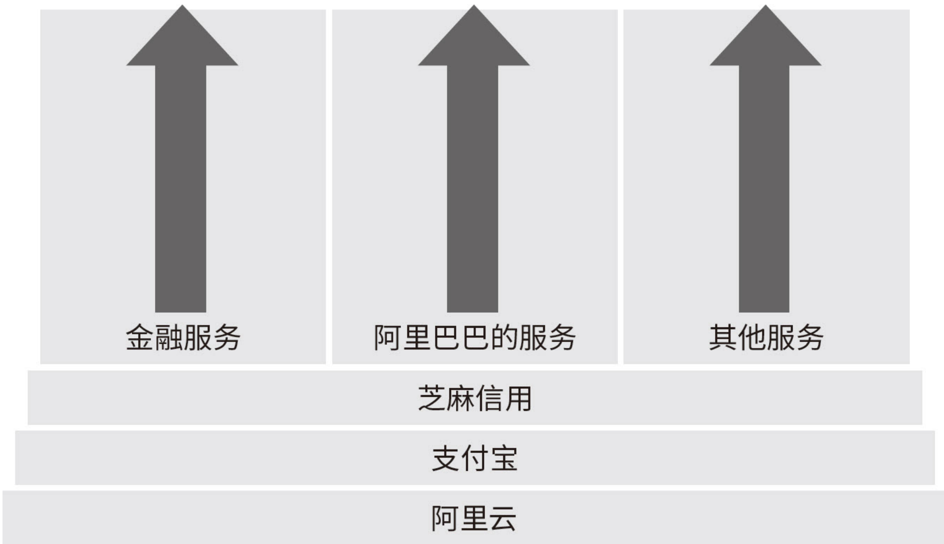


图6-3　阿里巴巴的商业模式与金融业务的关系

构成阿里巴巴集团所有服务地基的是云计算服务——阿里云。支付宝位于其上一层，在这里，我们将狭义上的支付宝定义为支付体系，将广义上的支付宝视作金融平台。狭义上的支付宝是指面向个人的金融服务，例如二维码收付；而广义上的支付宝作为阿里巴巴平台的入口，承担了蚂蚁金服内外的金融服务以及阿里巴巴内外的生活服务的门户功能。只要安装了支付宝应用程序，就能一站式地提高用户生活的便利性，这样看支付宝的确是一个金融平台。

芝麻信用位于支付宝的上一层。芝麻信用的信用评分是基于支付宝结算等阿里巴巴的生活服务平台上产生的商流、资金流和物流而得出的，可以用来支持阿里巴巴集团内外部的生活服务以及蚂蚁金服内外部的金融服务。这些数据还可以在芝麻信用上被存储和分析，进而完善信用评分体系。芝麻信用的分值高，用户就可以在更加优越的条件下，以更加舒适的方式享受金融和生活服务。作为信用平台，芝麻信用还负责改善阿里巴巴生活服务平台的质量。

刺激“我想用”的机制

在芝麻信用上方，有一系列使用支付宝作为客户接触点的服务。这些服务包括蚂蚁金服的结算和小额贷款等金融服务、阿里巴巴的电子商务和数字内容等生活服务以及由第三方提供的包括公共服务在内的各种生活服务。

因此，阿里巴巴集团已经垂直整合了包括第三方在内的金融业务。这样可以积累与商流、资金流和物流相关的大数据，加强金融平台支付宝和信用平台芝麻信用的建设，反过来也强化了阿里巴巴的生活服务平台，最终建立了一个良性循环。

阿里巴巴对客户体验的追求永无止境，重点不仅在于扩展技术和服务菜单，还在于重视客户体验的价值。

金融颠覆者对传统金融机构形成威胁的原因之一是获取新客户的低成本。阿里巴巴平台上布满了各种应用来刺激用户和商家“我想用”，最典型的代表是支付宝和芝麻信用。

如上所述，以“到2036年为全球20亿消费者提供服务”和“到2036年使1,000万家公司在阿里巴巴平台上创收”为战略目标的阿里巴巴正在努力建设世界第五大经济体。毫不夸张地说，成败的关键就握在蚂蚁金服的手里。

第7章　腾讯：从社交、游戏到金融业务的展开

如果阿里巴巴的根基是电子商务网站，那么腾讯的根基就是社交网络服务（SNS）。

腾讯是由现任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马化腾等人于1998年创立的互联网公司，总部位于深圳，截至2017年12月末，大约有44,000名员工。腾讯于2004年在香港证券交易所上市，截至2019年3月11日，总市值约为4,300亿美元。据年报显示，2017财年（2017年1月1日至12月31日）腾讯实现了全年营收2,377亿元，其中净利润724亿元。而上一年度的全年营收和净利润则分别为1,519亿元和414亿元。和阿里巴巴一样，腾讯的这两个指标均表现出强劲的增长势头。

腾讯的使命和愿景分别是“利用互联网的增值服务提高大家的生活品质”和“成为最受尊敬的互联网企业”。

腾讯的业务主要是社交应用程序和线上游戏。

社交应用程序包括即时通信的“QQ”软件，社交网络服务的“QQ空间”和通话通信的“微信”应用程序等。根据2018年第二季度报告显示，QQ、QQ空间以及微信的月活跃用户数分别为8.03亿、5.48亿和10.57亿。在月活跃用户数方面，微信仅次于脸书、瓦次普聊天软件（WhatsApp）和脸书桌面聊天软件（Facebook Messenger）。

腾讯的线上游戏业务除了开发并销售在线游戏以外，还包括运营全球最大的线上游戏社区。腾讯于2015年推出的王者荣耀（Honor of Kings），数据显示已有超过1亿次以上的下载量。不过其受到大家喜爱的同时，也引发了游戏成瘾等社会问题。

此外，腾讯还在开展数字内容业务，例如动画平台“腾讯漫画”、电影制作“腾讯影业”和在线音乐平台“腾讯音乐”；媒体内容业务，例如腾讯网和腾讯新闻；支付相关业务，例如云业务和AI业务。其中的腾讯音乐于2018年12月在纽约证券交易所上市。

维持高增长的6个重点领域

腾讯的收入结构可以分为3个部分（图7-1）。从2017财年的收入分布来看，腾讯收入首先来源于在线游戏和数字内容的付费服务和付费合同（称为增值服务），它们可以占到总收入的65％。在线广告收入占总收入的17％，支付相关业务、云业务等其他收入占总收入的18％。值得注意的是，尽管在广告商务模式中腾讯提供了强大的免费社交，但增值服务的收入实际上是在线广告收入的3倍以上。与上一年相比，增值服务带来的收入增长了约43％，在线广告带来的收入增长了约50％，来自支付相关业务、云业务和其他业务的收入同比增长了150％，可以看出腾讯“其他业务”带来的高增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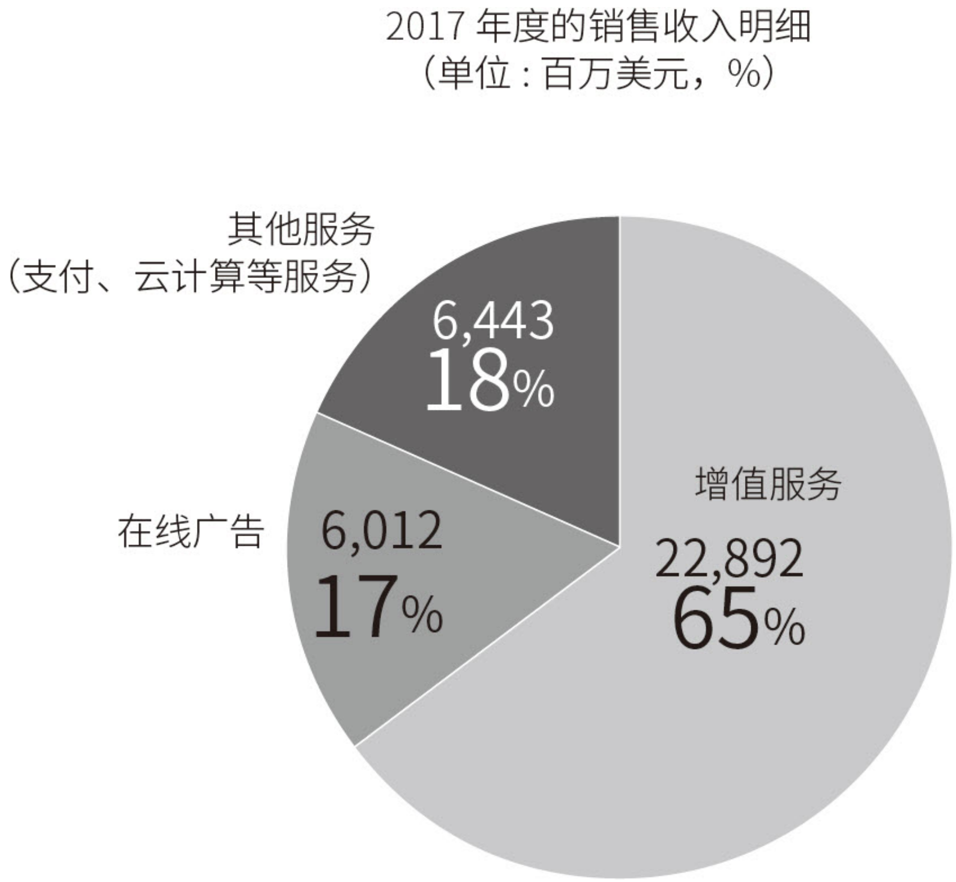


图7-1　腾讯的收入结构

在2017年财报中，腾讯重点介绍了“强化社交平台”战略下的6个业务领域，即网络游戏、数字内容和媒体、支付、云、人工智能和智能零售。智能零售是指腾讯计划模仿并希望超越阿里巴巴的新零售模式，拓展实体分支机构的业务。

其中，网络游戏、数字内容和媒体早已经是腾讯业务的支柱。而在支付方面，腾讯将战略性地活用微信支付来强化其金融科技业务。在云业务方面，腾讯紧随亚马逊云服务和阿里云之后，截至2017年年底，在全球范围内开放21个地理区域，运营36个可用区。

在人工智能领域，腾讯的“医学影像＋AI”业务已入选国家重点扶持企业，通过微信提供“微信智慧医院3.0”，开发“结直肠

肿瘤筛查AI系统”以及投资大型互联网医疗健康服务平台“微医”。这些都足以看出腾讯在医疗领域的野心和行动。

在智能零售领域，腾讯取得了“永辉超市”的股权，该超市是由仅次于阿里巴巴的第二大电子商务企业“京东”出资运营的一家连锁超市。永辉超市已经推出了小型购物超市“超级物种”，来对抗阿里巴巴的“盒马鲜生”。此外，腾讯还与沃尔玛建立了战略合作伙伴关系。

换句话说，中国的新零售行业是由“盒马鲜生＋大润发＋天猫商城＋零售通”组成的阿里巴巴阵营与“永辉超市＋超级物种＋沃尔玛”形成的京东—腾讯阵营之间的对抗。在结算体系方面，不可避免地，支付宝和微信支付已经形成了激烈的竞争局势。

扩展备受瞩目的“小程序”

腾讯于2017年1月推出了“小程序”。这是在微信应用程序中内置的一款应用程序，即应用程序内的小程序。由于它是一个应用程序，因此可以由第三方开发，像购物、交通、酒店、游戏、生活工具等各种生活服务已经开发出来，并内置在微信应用程序中。它的开发不像苹果之类的操作系统那么麻烦，无须向苹果等公司申请。而且用户也不需要下载或安装新的应用程序。只要是腾讯认可的内置应用程序，微信应用程序均可提供。从这个意义上讲，微信可被看作是像操作系统或基础设施一样的存在。

根据年报显示，截至2018年1月，微信已经提供了58万个小程序。如果微信内置的小程序与智能零售“超级物种”或微信支付绑定的话，微信用户和“超级物种”购物者也将被包含在其中。这样的结果，就是不仅促进了用户的商流、资金流和物流的积累，还强化了腾讯的社交平台。

此外，后发的支付宝也正在其应用程序中内置小程序。阿里巴巴也已经意识到小程序的战略性和重要性，未来其围绕小程序的发展动向将备受瞩目。

ICT百货商店

接下来我将引用腾讯2018财年第三季度的业绩报告内容，来聊一聊腾讯的商业模式，大家可以参照图7-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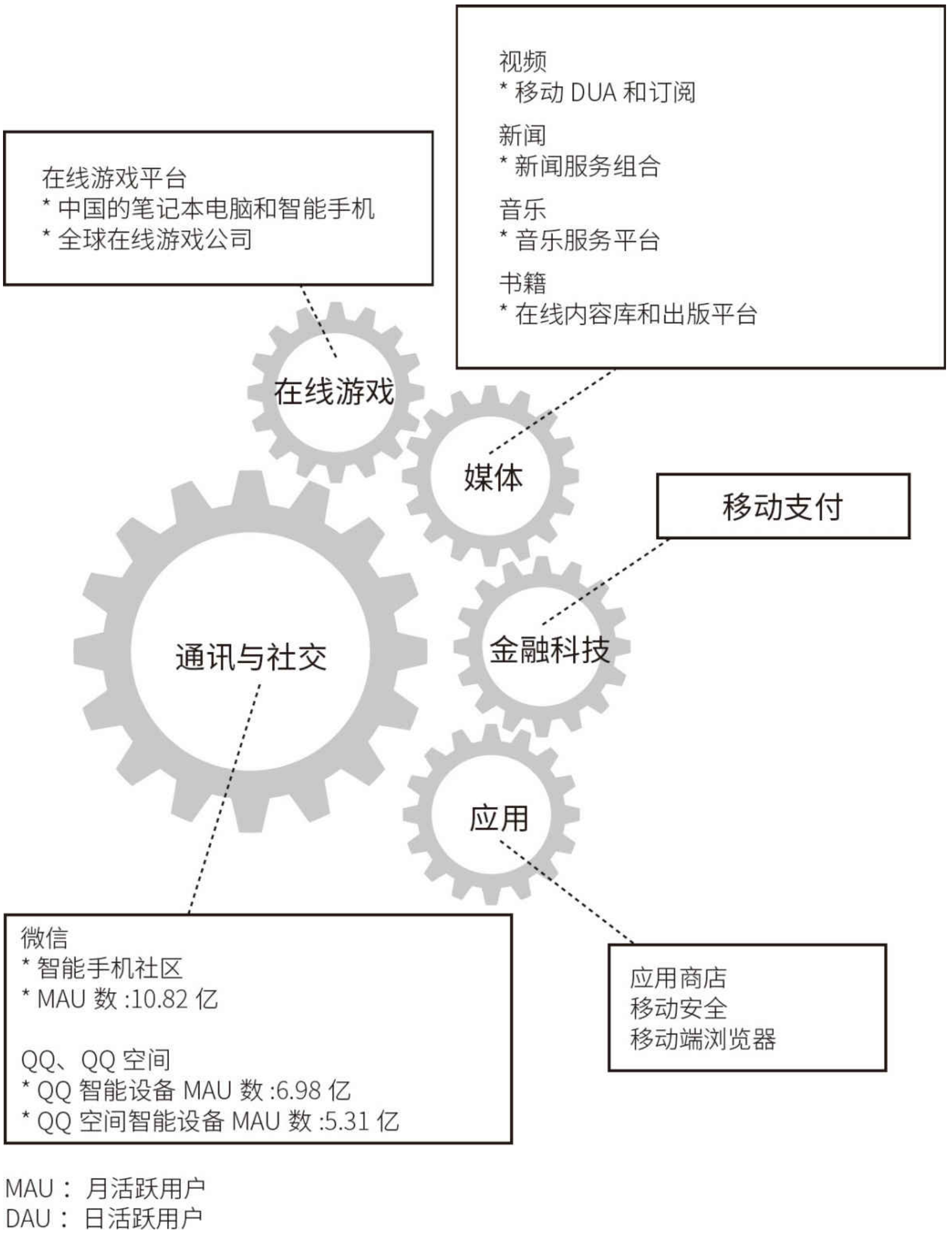


图7-2　腾讯的商业模式

注：以上数据信息来源于腾讯2018年第三季度业绩报告。

腾讯的通信与社交平台是个大齿轮，作为原动力驱动着4个小齿轮：网络游戏、媒体、金融科技和应用程序。社交业务的增长和发展也带动了其他业务的增长。也就是说，可以进一步添加更小的齿轮，即业务。

这是腾讯的多元化布局，从上文介绍的收入分布结构及其业务模型中也可窥见一二。2018年，对腾讯的大部分报道涉及其对IT、支付、视频和音乐内容、零售、网购、物流和行程预约等业务的投资和资本联盟。从腾讯的资产负债表可以看出，对适用股权法的被投资企业和合资企业的投资约占腾讯总资产的26％。

正如“强化社交平台”的战略那样，腾讯最大的优势就在于其社交平台上约10.57亿的用户基础。利用平台上庞大的用户基础，腾讯可以不断地增强自身实力，发展并进一步强化多元化业务。腾讯给人的印象是，它就是一家真正的“ICT百货商店”。

最大的优势是亲密且频繁的客户接触点

2013年推出的微信支付，是腾讯金融业务的核心。自推出以来，腾讯快速抢占了支付宝的市场份额，如今，它与支付宝形成了中国支付系统的双壁。

微信支付是在得到中国人民银行颁发的营业执照“支付业务许可证”之后才开展支付服务的，其实该证书最初是腾讯于2005年成立的子公司“财付通”获得的，这一点少有人知。因此微信支付的使用条款也都是以“财付通”的名义发布的。

根据2017年财报显示，腾讯控股有限公司旗下不仅拥有许多独立控股的合并子公司，还拥有即使没有控制权却具有行使力的关联公司和股权公司。此外，腾讯还与京东签署了战略联盟协议，所以说包括金融在内，腾讯的业务正是通过这些子公司和关联公司全面展开的。

下面我想比较一下腾讯的微信支付功能与阿里巴巴的支付宝。

利用“齿轮理论”，追赶阿里巴巴

微信支付是社交应用程序微信的“钱包”功能之一，为用户提供金融服务。其与支付宝的区别在于，支付宝是一个独立的金融服务应用程序，而微信支付是社交应用程序中的一种功能。

微信是一款社交应用程序，月活跃用户约为10.57亿人次。由于每次与朋友或熟人发送消息时都会打开该程序，因此微信使用频率以及与用户的亲密程度都要远高于支付宝。在腾讯的齿轮理论中（图7-2），作为最大的齿轮，通信和社交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不难想象以通信社交平台为根基的微信支付潜藏着多大的能量，而且也不难理解为何其虽然处于后发的劣势却在不断地靠近支付宝。

接下来，让我们看看微信支付的功能。

微信支付的支付功能和结构与支付宝没有太大的差别。微信支付可被用于所有生活服务中的结算，包括电子商务站点、实体商店、生活缴费和交通。和支付宝一样，微信支付也提供托管服务。由于竞争上的限制，微信支付不能用于天猫商城等阿里巴巴的电子商务网站，但基本上能使用支付宝的商铺，微信支付也都可以使用。

微信支付和支付宝一样，都是在手机端使用二维码支付，也有两种付款方式，一种是通过商店的阅读器读取用户自己智能手机上显示的付款码，另一种是用户使用自己的智能手机扫描商店展示在收银台上的收款码。微信钱包与用户的银行账户之间是关联的，所以用户可以在两个账户之间自由切换转出或转入现金。在给用户与商家带来便利性的同时，微信支付与支付宝展开了激烈的竞争。

不能在日本市场上使用的缘由

最近，在日本可以使用微信支付或支付宝进行扫码支付的商店（如全家便利店等）在不断增加。但是，他们的适用对象仅限于在日本观光的中国游客。目前日本人无法绑定自己日本的银行账户或利用现金充值，也不能使用微信支付和支付宝的扫码付款功能。

根据LINE在2018年11月27日发布的信息显示，微信支付将与LINE在日本市场展开合作，并与LINE Pay共享二维码；雅虎软银的PayPay也宣布与支付宝签署合作协议，但具体计划尚未公布。但最大的问题还是日本人不能在日本市场上直接使用微信支付和支付宝进行扫码付款。

这些说明了什么？日本和中国的市场性质不同，法律制度等监管环境自然也不一样。但是，如果重视“与客户保持持续且良好的关系”的话，微信支付和支付宝都应该希望直接提供二维码付款，在日本市场上与日本人建立直接联系。

提供与支付宝相同的所有功能

除支付功能外，微信支付还包括转账、手机充值、理财通、信用卡还款以及AA制付款的“go dutch”等功能。基本上微信支付可以提供与支付宝相同的所有功能。另外，它还可以链接到腾讯或第

三方提供的生活服务与金融服务、平台以及公共服务等页面。此外，微信还具有类似发压岁钱的“红包”功能，这项服务为其追赶支付宝做出了巨大贡献。

腾讯以微信支付为契机，捆绑了各种腾讯和第三方提供的服务，支配着用户的整个生活服务。微信支付和QQ钱包（在QQ上提供的支付服务）为满足用户在日常生活中产生的各种需求提供服务。可以说，为了实现腾讯“提高大家生活品质”的使命，微信支付做出了重大的贡献。

涵盖投资、银行、保险和信用评分

腾讯的金融业务远不止微信支付。同样，与阿里巴巴的金融服务进行比较是一个很好的方法。如果说蚂蚁金服的金融产品是“余额宝”的话，腾讯的就是“零钱通”；阿里巴巴的网上银行是“网商银行”（MYbank），腾讯对应的服务是“微众银行”（WeBank）；阿里巴巴的保险服务名为“相互保”，腾讯的对应服务名为“微保”；阿里巴巴的信用评分名为“芝麻信用”，而腾讯对应的名为“腾讯信用”。

零钱通是2018年11月腾讯推出的一款具有较高流动性的小额投资产品。用户可以从微信的“钱包”访问它，并且该账户与用户的微信账户绑定在一起。换句话说，用户可以从自己的银行账户和微信的“钱包”中提取资金，同时存入零钱通账户并管理自己的资产。此外，零钱通账户也可以像微信支付那样用于扫码付款、汇款和发“红包”。在投资回报率、存款限额和交易限额方面，我认为腾讯为用户提供的条件比“余额宝”更为优惠。据腾讯2018财年第三季度报告显示，腾讯管理的资产总值已超过了5,000亿元（约8.8万亿日元）。

零钱通就像支付宝的“余额宝”一样，以小额投资的方式有效运营微信支付“钱包”中的零散资金。原本使用免费通话和聊天的微信用户就有使用微信支付的动机，现在具有高流动性和便利性的零钱通进一步强化了这种动机。

微信的小程序和智能零售互相结合，在多元化发展的通信社交平台内促进了商流、资金流和物流的整合。这样一来，与阿里巴巴一样，腾讯的生活服务平台也得到了强化。

微众银行于2014年12月由腾讯等联合创立，是中国第一家互联网银行，总部位于深圳。其目标客户群与蚂蚁金服网商银行一样，是那些难以从银行获取贷款的个人、中小企业和小微企业。该银行的使命是“让金融普惠大众”，通过大数据的信用评级以及智能手机的脸部识别等高科技的帮助，为用户提供小额贷款。

面向个人的消费贷款有两种类型：消费贷款“微粒贷”和汽车贷款“微车贷”。微粒贷的贷款额度为500元—30万元。用户可以通过腾讯的应用程序微信和QQ，或者微信专有的微众银行应用程序轻松申请。审核需要5秒钟，到账需要1分钟。当然，微粒贷与用户的微信账号或QQ账户是相互关联的。

此外，腾讯还于2018年对总部位于柏林的数字银行N26进行了战略性投资。N26在欧洲拥有超过230万客户，并计划2019年进军美国市场。

微保是腾讯于2017年11月推出的面向微信用户的保险代理平台，包括医疗保险、汽车保险和旅行保险。腾讯还投资了互联网保险公司众安保险、和泰人寿及英杰华等保险公司并与之达成了合作协议，从这些也能看出腾讯对互联网保险业务的战略定位。

旨在全面运作，却最终迟到的信用额度

像芝麻信用一样，腾讯信用也会对个人的信用进行评分。分数越高，信誉度也越高。良好的信用评级不仅体现在金融相关服务方面，也会使用户在利用各种生活服务方面获得优惠。腾讯积累了包括来自通信社交平台微信、QQ和QQ空间的相关数据，微信支付的支付数据，网络游戏和数字内容的相关数据以及从智能零售获得的购买数据和行为偏好数据。腾讯通过AI和云计算分析这些大数据，进而得出个人的信用分数。

腾讯在2015年获得中国人民银行授权，与阿里巴巴集团的蚂蚁金服一起试行信用评分业务。然而，腾讯信用于2018年1月末仅仅试行了一天，其服务便全部停止。这是因为，腾讯发现自己的信用评分系统远落后于阿里巴巴的芝麻信用，因为后者早已广泛植根于中国社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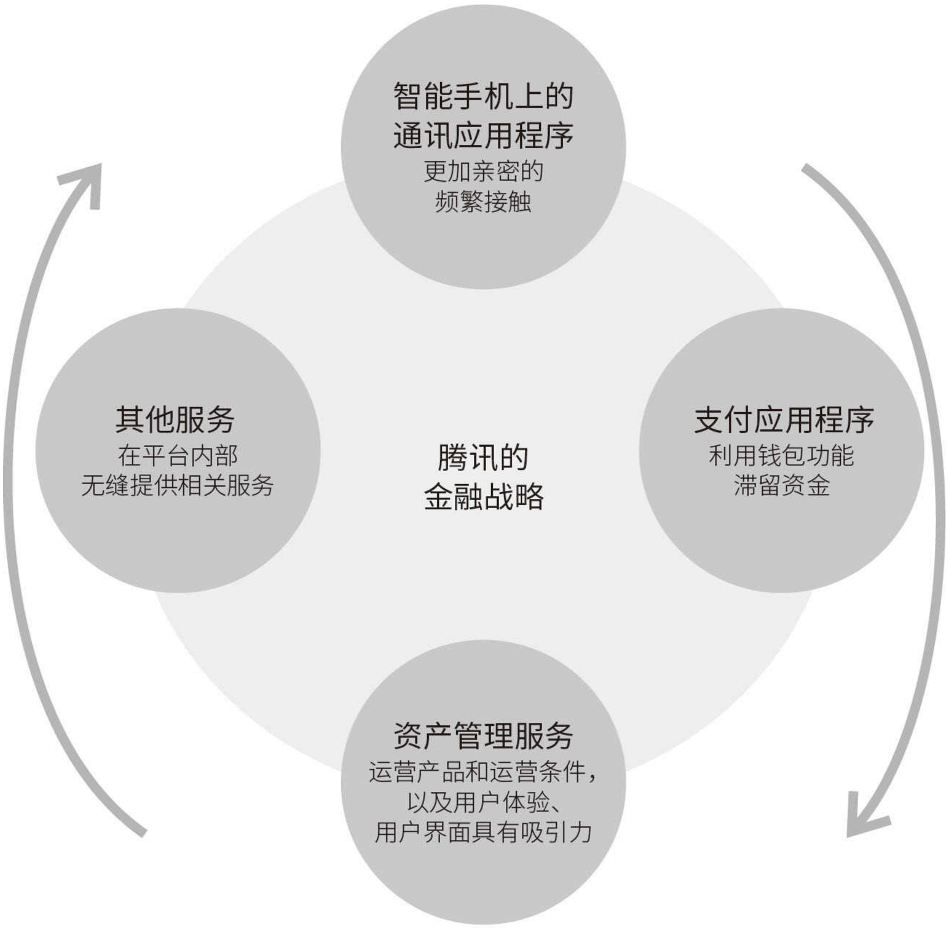
但微信毕竟拥有约10.57亿的月活跃用户，而且还拥有1.5亿网络游戏和数字内容的付费用户，因此我们不能否认它的潜力。

腾讯信用在与阿里巴巴的竞争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它充当着信用平台来优化通信社交平台的质量的同时，也加强通信社交平台的稳固性。信用平台随之一同强化了授信机制。这样，他们就可以通过提供更好的金融和生活服务，来满足用户的需求。

实际上，在2019年1月于广州举行的微信公开课上，微信支付的信用评分实验已经启动，名为“微信支付分”。腾讯已经虎视眈眈地全面开启信用评分业务。

扩张平台的良性循环

以上是关于腾讯金融业务的介绍，图7-3将会为您显示更多的腾讯金融业务和业务模型之间的关系。



* SNS 等核心业务的客户接触点
* 积累数据
* “大数据 +AI”
* 大规模定制
* 在核心业务中垂直整合金融
* 作为子目录提供各种服务
* 支付应用程序的钱包功能为银行、证券、保险等业务提供资金来源

图7-3　腾讯的商业模式与金融业务的关系

首先是微信支付。作为微信的结算服务，微信支付为用户提供了一种支付系统。在微信“钱包”里的闲置资金，便是银行、证券和保险等腾讯金融服务的资金来源。腾讯的零钱通以较高的投资回报率运作，而微众银行则向个人和中小企业提供小额信贷。由此可见，腾讯提供的卓越客户体验极具吸引力，且满足了用户在金融和生活方面的需求，并在通信社交平台内垂直统合了这些金融业务。

此外，平台内部以无缝方式衔接提供日常生活相关服务，为用户营造了一个更加方便舒适的环境，从而进一步增加微信的活跃用户数量。

很显然，以上这个过程会形成一个良性循环，即通信社交应用程序“微信”→支付系统“微信支付”→资产管理→其他服务。随着该良性循环开始运转，腾讯的平台将变得更加强大，金融服务也在平台基础上得到强化。

腾讯之所以比亚马逊和阿里巴巴更具优势，是因为腾讯与用户之间的互动更加频繁。腾讯提供的免费通信使其比亚马逊和阿里巴巴的电子商务更加接近客户。“与客户保持持续且良好的关系”便是腾讯最大的优势。

腾讯的“强化社交平台”战略就是要发挥这种优势，只要严格执行该策略，落后的腾讯不仅能够享受后发者的好处，可能还会超越新一代金融行业的领先者，即阿里巴巴和亚马逊。

但是，随着5G时代的到来，通过视频和VR与AR创建新的通信社交平台越来越成为可能。如果仍然依赖当前的商业模式，那么现有的业务将被彻底颠覆。腾讯当前平台和业务模式的最大优势就在于“尽管属于后发者，但是通过与客户之间的频繁互动，一定可以后来者居上”，这也是我对腾讯的兴趣倍增的最大原因。

中美分裂时代出现的风险

最后我想指出的是，从2018年春季开始白热化的中美贸易摩擦对预测中国的这两大金融颠覆者的未来具有重要的意义。近年来，许多专家认为，“一个被美国和中国分裂的世界即将到来”。

谷歌前董事长埃里克·施密特曾说过：“未来的互联网世界将被美国主导的阵营和中国主导的阵营一分为二。”

清华大学特聘教授阎学通曾说：“现在的疑问不是中美两极时代是否即将到来，而是它到来后会如何演变。”

但是，我不认为这仅仅只是一场短暂的贸易摩擦，相反，我认为中美之间的贸易摩擦将是一个长期过程，未来可能持续10年、20年，甚至30年，所以说现在中美贸易摩擦才刚刚开始。如果使用PEST分析政治、经济、社会和技术这四个方面，那么中美贸易摩擦就是“覆盖军事和安保在内的国力之战”，抑或是“美式资本主义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之战”，以及“技术霸权之战”。

中美关系的PEST分析

让我们仔细看一下PEST分析。

作为政治因素，美国和中国分别宣称“要把美国建设成军事强国”和“要让中国成为军事强国”。从政治上讲，这已经是覆盖国家安保在内的国力之战。

经济因素则多种多样，在此我觉得最应谈的是“美式自由市场资本主义”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之间的斗争。我们知道，阿里巴巴和腾讯等中国企业的崛起少不了政府的背后支持。尽管人们认可美式自由市场资本主义所取得的成就，但现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也在变得更加强大。

作为社会因素，就不得不提及美国特朗普政权带来的余波。自特朗普执政以来，美国的政治集权和对多样性的尊重已经有些倒退。但是，美国本身是一个移民国家，起源本就多样性。而且美国前总统奥巴马也曾呼吁要把美国建成一个尊重多样性的国家，后来

的尊重少数民族文化或全民健康保险制度（简称“奥巴马医保”）便是在这样的土壤中诞生的。尽管有些倒退，但美国尚未放弃作为一个尊重多样性国家的身份。在第45届总统选举中，因崇尚多样性而饱受争议的千禧一代更多投了特朗普的反对票。

作为技术因素，我认为中美的模式已经发生了变化。美国享有先驱者的利益，而中国享有后来者的好处。中国的技术已经在许多领域处于领先地位，而且中国也正在抢占许多领域的先发优势。

未来，人工智能领域是技术争夺之战的主要战场。为此，软银董事长孙正义曾制定了一项“人工智能集团战略”，该战略将积极投资人工智能相关的企业，因为人工智能将重新定义所有行业。

但是，人工智能只不过是一种手段。关键是人工智能究竟可以收集并分析多少大数据。换句话说，争夺的关键首先就是数据。在这方面，中国应该更具有潜力，因为国家可以从BATH（百度，阿里巴巴，腾讯，华为）等科技巨头公司获取大数据。

阿里巴巴进军区块链汇款的冲击

更令人震惊的是，自2018年以来，阿里巴巴通过支付宝开始涉足区块链技术下的国际汇款业务，而且已经将目标国家扩大到了菲律宾和巴基斯坦。

我不认为这是阿里巴巴一家公司的某一项金融服务。相反，这可能是“分裂世界”中金融产业的开端，它将在未来数十年间不断进化。

传统的国际汇款业务是由美国主导的中央集权系统——SWIFT（环球同业银行金融电讯协会）来管理运营的。但是众所周知的是，区块链是一种去中心化技术。在中国，个人之间的货币交

易已经发展到无须中央集权系统介入也可实现的程度。这次启动的国际汇款业务意味着中国将开启没有SWIFT的金融系统。在“分裂世界”中，阿里巴巴将成为金融领域的重要一隅。

世界上最先进的金融科技大国——中国的今天

在本章的最后，我想以阿里巴巴的根据地——杭州为例，介绍一下世界上最先进的金融科技大国——中国的今天（截至2019年3月）。

阿里巴巴西溪园区，一个无现金化的智慧园区

阿里巴巴受中国政府委托推广“AI＋智慧城市”业务，建立了坐落于杭州的阿里巴巴西溪园区。该园区由阿里巴巴总部、阿里巴巴第一家最先进的实体商业设施、阿里巴巴第一家未来人工智能酒店以及阿里巴巴员工的居住地共同组成，从外观看起来就像一个以无现金化为前提的智慧城市。园区总部大楼的屋顶上装有一块太阳能电池板，用于生产清洁能源——发电。

我觉得阿里巴巴智慧园区本身就已经形成了一个真实的生态系统，并且更有望成为中国未来智慧城市设计的范本。主要原因在于，阿里巴巴智慧园区肩负着打造“中国硅谷”——杭州未来科技城的重任，旨在成为1,000多家初创企业和快速成长企业聚集的高科技产业园区。

阿里巴巴的第一家未来人工智能酒店菲住布渴（FlyZoo Hotel）于2018年3月开始运营。客人办理入住手续时可以使用面部识别的应用程序，简单易操作。该面部识别还可用来进出电梯、房间以及健身俱乐部。进入房间后，阿里巴巴的语音助手——阿里OS可以为客人提供各种服务，只需讲话即可完成，包括窗帘、音乐、

房间的灯光以及室内空调的调节等。此外，机器人接待员还为客人提供客房服务和便利设施。在酒店吧台，机器人调酒师可以迅速调制出客户预订的鸡尾酒。

坐落在阿里巴巴总部和菲住布渴酒店中间的，是于2018年4月开业的阿里巴巴首个商业设施“亲橙里”。在这里，我目睹了无现金支付、自动化和无人化服务的开展，阿里巴巴网店的线下发展以及应用高科技的分支机构发展。最先进的新零售超市“盒马鲜生”位于地下一层，可以提供无现金支付的零售体验。该购物中心还提供无人卡拉OK室、无人休息和会议室租赁以及多部无现金自动售货机。位于顶层的电影院采用无现金且无电影票的自动化方式。

阿里巴巴的电子商务零售商店出售各种物联网家用电器，它们都配备了阿里巴巴语音识别AI助手，而且这些家电也被安装在酒店客房，只需说话即可支配。另外，“亲橙里”购物中心的服装店里还装有“虚拟试穿系统”，该终端可以根据图像识别并创建客户的虚拟形象，并使用虚拟形象进行各种试穿。在这里，顾客不仅可以从该终端使用支付宝购买自己心仪的商品，还可以通过阿里巴巴的视频网站观看有关热销产品信息的直播。商品可以通过各种方式介绍给顾客，当然顾客也可以通过各种方式购买商品。

这次体验中，我也使用了阿里巴巴投资的“滴滴打车”。

通过体验这些服务，我切身感受到，早已在智能手机上实现无现金社会的阿里巴巴想要“开拓未知领域”的野心，以及全面向“连智能手机都不需要的物联网支付”或“面部识别支付”转移的气魄。

正如我在第1章中提到的那样，我认为通过无现金方式实现社会自动化、服务和共享化更为重要。无现金化＋自动化＋服务＋共

享化是缓解城市地区拥堵和拥挤，解决人口稀少地区结构性人手短缺问题的重要手段。

科大讯飞，一家支持银行数字化的AI公司

在人工智能语音识别领域，科大讯飞不仅处于中国领先地位，它还负责阿里巴巴、腾讯和百度等科技巨头企业的语音识别技术。会议开始前用作说明的视频板实时显示了该公司从全国各地收集到的大数据件数，一天之内就超过了“47亿”件，在这里我真的感受到了威胁。科大讯飞还为中国银行的数字化和智能化做出了重要贡献。在中国的银行中，拥有无人化大堂的未来银行分支机构正在增加。在那里，只需通过触摸面板和语音识别AI助手即可办理各种银行交易业务。

在中国，部分地区已经可以使用“只需说话”的语音识别AI助手购买地铁票。

日本何时能赶上2019年3月的中国，基准试验至关重要。在金融机构的附带业务和表外业务中，金融科技和数字化正在发展的是欧美和日本，而在更具体的银行原本业务领域中，正在发展的是中国。更重要的是，在中国，技术正在解决社会问题并提供附加价值。因此，我们不能忽视中国的变化，要正视它的变化。

第8章　日本的金融颠覆者

构筑平台，扩大规模经济范畴

如果说全球排名前三的金融颠覆者是亚马逊、阿里巴巴和腾讯，那么乐天、LINE、雅虎软银和SBI无疑就是日本的四大金融颠覆者。

接下来我们将要介绍日本四大金融颠覆者，它们的商业模式都效仿科技巨头公司的商业模式。为什么这样说呢？

因为这四家公司都构筑了与智能手机兼容的平台并推出了支付功能。并以此为契机，丰富金融服务的种类，即在经营汇款、信贷、保险、投资和存款业务的同时，通过提供有吸引力的用户界面与完善用户体验，从而吸引用户使用该平台提供的其他生活服务。这种良性循环会不断地扩大“规模经济”。

通过智能手机与客户亲密接触

正如我们反复指出的那样，新一代金融的商业模式中有三个要点：

首先，是与智能手机兼容的平台，即是否可以与客户建立亲密且频繁的联系。众所周知，日本的四大金融颠覆者各自建立了具有自我特色的平台。其中，乐天是日本最大的电商，而LINE是日本最大的通信应用程序。

表8-1　日本四大金融颠覆者的比较

	乐天	LINE	雅虎软银	SBI
主要的客户接触点	电子商务和金融	社交应用程序	信息、电子商务和金融	金融
零售和电子商务	◎	○	◎	—
通信	○	○	◎	—
二维码支付	○	○	○	○
信用卡	◎	○	○	○
银行	○	○	○	○
证券	◎	○	○	◎
信托投资	○	○	○	○
人寿保险	○	○	○	○
财产保险	○	○	○	○
虚拟货币	○	○	○	◎

注：在本图中，“◎”代表各公司已公布的业务，“○”代表各公司今后可能开展的业务。

其次，与其他发达国家相比，日本的大银行在构筑新一代平台方面已经滞后。随着金融颠覆者的崛起，它们已经感受到了危机，不得已开始创建平台。尽管如此，许多用户仍旧认为网上银行仅具有转账功能，而银行柜台和ATM还是办理银行业务的主要渠道。

从这里来看，很明显仅凭构筑平台还是不够的。因为平台的用户界面和用户体验都遭到了质疑。在这方面，IT出身的金融颠覆者们就技高一筹了。在它们眼中，优质的用户界面和用户体验是它们发展的命脉，所以它们不折不扣地追求“更易于使用与更没有压力”的用户体验。

它们在金融领域也进行着同样的实践。可以说金融颠覆者与传统的大银行之间有着天壤之别。对传统的大银行来说，让特意来银行办理业务的客户在柜台等候被认为是“理所当然”的事情。当然，大银行表面上还是宣称，它们也在不断地强调用户体验和用户界面的重要性。但问题是它们对这种重要性究竟理解到了什么程

度。似乎它们并没有理解到其本质，即“真正的客户至上”到底是什么。

最后，是对数字化转型的态度。在这方面，金融颠覆者的优势也非常明显。数字化转型是“从根本上数字化整个公司”与“数字化所有业务”。换成在金融服务领域，要做到的就是“银行服务将对客户不可见”。这对于大银行来说，几乎就是对自己原有业务方式的全盘否定，因此要转型的话，痛苦是不可避免的。

想一想决定新一代金融模式成败的三个要点，我认为日本的科技公司在平台、用户界面与用户体验以及数字化转型方面，将极有可能颠覆现有金融机构的模式，这一切估计会在三五年后发生。

乐天：“经济体的超扩张”蓝图

在日本的四大金融颠覆者中，乐天是提供金融服务最多的“综合金融玩家”。

说起乐天，许多人对它的印象可能是像亚马逊或雅虎购物那样的电商网站。

但是，从实际情况来看，乐天正在建成日本首屈一指的金融科技公司。它不仅提供乐天银行、乐天证券、乐天生命保险、乐天损害保险等一站式金融服务，它还网罗了从信用卡“乐天卡”、电子货币“乐天Edy”，到用于乐天超级积分的“乐天积分卡”和二维码支付的“乐天支付”等线上线下融合的超便利付款方式。截止到2018年6月末，全日本引入乐天支付服务的区域已经多达120万处。从全年营收来看，乐天的金融科技业务占比较大，截止到2018财年第三季度末占总营收的35.7%。



图8-1　乐天的业务结构

综上所述，毋庸置疑，乐天已经是一家金融科技公司。且不用说与日本的大银行相比，乐天集团也许早已成为与中国阿里巴巴旗鼓相当的竞争对手。

用“乐天积分”连接

乐天卡是乐天金融科技业务的核心。截至2018年，乐天卡的注册会员已经超过1,500万人，交易金额达到7.5万亿日元，位列日本国内信用卡行业交易额的第一名。虽然日本银行的信用卡行业增长率是个位数，但是乐天卡却以每年20％的增长率逆势而上，呈现出压倒性的优势。

面向中小企业，乐天还提供了一项名为“超级商业贷款”的借贷服务。该服务与亚马逊借贷几乎相同，都是基于商业渠道获得的大数据来进行授信评估。2018年8月，乐天集团内部进行了重组，乐天信用卡有限公司接管了各项金融科技业务。

关于后发的乐天卡成长迅速的原因，乐天金融科技业务负责人细坂昌 幸作了如下解释：

“除了充分利用互联网来促进彻底的无纸化流程以及永久免年费之外，乐天还开发了可用于网上购物的积分计划——‘乐天超级

积分’。这一计划令即使是在实体分支机构，利用乐天卡支付也可累积1％的积分。而当时整个业界的积分率普遍还停留在0.5％。并且，我们在其他企业之前，就推出了智能手机端也可便捷操作的信用卡申请业务。”

乐天增长的背后是乐天卡，而乐天卡增长的背后是“乐天超级积分”。

乐天现在倡导的主题是“超级扩张乐天经济范畴”，关键词是“会员＋数据＋品牌”。在《乐天集团年报2017》中，有这么一段话：

“乐天为日本国内外提供各种各样的互联网和金融科技服务。这些服务的核心是我们公司重要的非金融资产，即以乐天会员为中心的会员体系、品牌和数据。乐天会员使用共通的ID，可以无阻碍地享用乐天提供的多样化服务，进而形成‘乐天生态系统（经济范畴）’。通过这些使会员的终身价值最大化，降低客户的获取成本，增加流通总额，提高企业价值。”

进军移动端是“超级扩张乐天规模经济”的立足点

那么，乐天规模经济的超级扩张的具体业务又是什么呢？

2017年12月，乐天宣布进军移动通信业务。自2014年10月以来，该公司一直在推出一款名为“乐天移动”的低成本智能手机，只不过该手机租借移动通信网公司（NTT DoCoMo）的线路运营，套餐费用有所限制。但从2017年起，获得自有线路的乐天开始大力发展自己的移动基础设施建设，它力争在数年内成为日本继移动通信网公司、第二电电（KDDI）和软银之后的第四家移动运营商。

截止到2018年1月，日本乐天市场流通总值的76.7％来源于移动端，而支持支付服务的“乐天支付”只有在智能手机上方可使用。移动端是支撑整个乐天规模经济的重要基础设施。如果能持续下去，那么乐天市场的流通价值自然也会增加，而且来自移动通信业务的通信资费将成为乐天稳定的收入来源。

除此之外，我们还可以预想到一些乐天的目标。如假设在“乐天移动”智能手机上安装乐天开发的应用程序，仅凭这一点就足以促进用户对该应用程序的利用，这将大大增加用户使用乐天服务（70多种）的可能性。由此可见，移动通信领域的发展也可以说是乐天迈向“乐天规模经济极端扩张”的基石。

2018年11月，乐天宣布与第二电电建立战略合作关系，通过直接租用第二电电的通信设备，开展移动通信业务，以节约时间和成本。

这种合作关系不仅使乐天受益，而且第二电电也可以利用乐天提供的支付和物流平台。具体来说，超过120万个乐天支付加盟店可以使用第二电电于2019年4月推出的au Pay服务，同时乐天也承担了第二电电购物网站“Wowma! ”的物流业务。换句话说，在通信、物流和支付这三个领域中，第四和第二运营商的资产可以互相利用，这将为第二电电的au规模经济和乐天规模经济发展提供巨大的便利。

乐天表示，通过这次合作将有利于尽快实现无现金社会，解决物流领域的社会问题，并在通信服务方面实现良性竞争，从而进一步提高市场上客户的便利性。

加速财险和共享用车等新业务的发展

实际上，乐天开拓的新业务并不局限于移动通信领域，乐天还通过收购朝日火灾海上保险公司，进入了财产保险业务，这样一来乐天就拥有了全方位的保险业务。可以预期，这将与乐天现有的服务产生协同作用，例如乐天旅行的旅行险，以及针对乐天民宿房东的火灾和家庭财产保险等。

2018年1月，乐天宣布与美国最大的零售商沃尔玛建立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乐天将与沃尔玛的日本子公司西友共同运营乐天西友网店。乐天拥有卓越的互联网技术，而西友提供的商品物美价廉，二者的联合可实现快速配送西友的生鲜食品和日用品。同时，美国的沃尔玛商店也将开始提供乐天的电子书服务。

此外，从2018年4月开始，乐天与日本大型连锁电器行Big Camera推出的“Rakuten Big”也开始运营。它不仅实现了线上线下融合，还支持乐天积分。

作为解析过新一代汽车行业的作者，我当然不会错过对共享用车的介绍。2015年，乐天给打车公司来福车投资了3亿美元，而该公司已在美国300个城市提供共享乘车服务。在市场份额上，来福车低于软银投资的优步，但用户的增加率要高于优步。

在投资来福车时，乐天社长三木谷浩史说：“来福车是未来的经济模式。通过建立人与人之间的协作，共享经济将从根本上改变服务业模式并惠顾到整个社会。来福车发掘个人和社会的潜能，像这样的企业掌握了未来发展的关键。”

根据三木谷社长担任代表理事的新经济联盟的报告显示，2015年共享用车市场规模约为1.65万亿日元，预计到2020年将翻一番。目前，新经济联盟正在游说取消对共享用车服务的禁令。共享用车业务获批后，乐天将通过在智能手机上安装打车应用程序，再次推

进乐天的共享业务。正如之前介绍的，该智能手机也是由乐天的移动端业务所提供。

无论如何，乐天将联合“会员＋数据＋品牌”的全部力量，稳步推进乐天规模经济的超级扩张。

扩大乐天品牌之间的交叉使用是关键

“乐天规模经济的超级扩张”一词首次出现在乐天2017年的年度财务报告中。从那时起，“超级扩张”就被定位为乐天商业模式中最重要的概念。

根据2018财年第三季度的财务资料，乐天的会员价值目前约为4万亿日元，未来更可达到10万亿日元。在这里，会员价值是指“所有服务利用人数× LTV”（LTV=终身价值），是衡量单个用户在其整个生命周期内为特定公司或品牌带来的收益的度量。

实现这一目标的关键在于扩大“交叉使用”。交叉使用是指乐天会员使用两项或两项以上服务，当一名会员平行使用乐天提供的电子商务、金融科技、数字内容和通信等70多项服务时，其会员价值就会提升。截止到2018年9月，乐天会员已超过1亿人，其中有69.2％的用户使用了两项以上的服务。

乐天的积分计划是促进交叉使用的引擎。乐天超级积分可以在利用服务时积累或使用，它扩大了乐天生态系统的客流，增强了客户黏性，比如重复利用多项服务，跳转别的服务或持续使用该服务。乐天超级积分计划进一步加速了这一进程。在乐天市场购物时，该计划服务可使用户最多获得高达15倍的积分，例如在乐天市场使用乐天卡可获得2倍积分，在乐天银行用乐天卡取款可获得1倍积分等。乐天规模经济就是一种使用乐天提供的服务越多，奖励并返还的积分也越多的规模经济。

在2018财年第三季度的财务报告中，说明了扩大交叉使用的方法，即“从乐天市场开始，然后以乐天超级积分为契机，进一步使用乐天旅行和乐天图书”。

此外，该方式还扩展到金融科技领域。例如，乐天卡与乐天银行之间的信贷担保，以及乐天银行与乐天寿保之间的房贷集体信用保险等。另外，乐天银行和乐天证券之间还存在协同作用，如即时汇款和金融中介就是其中之一。

因此，金融科技业务的交叉使用正在稳步扩张。乐天卡、乐天银行和乐天证券的交叉使用在2018年第三季度同比增长43.4％。启动超级积分计划前后，乐天银行和乐天证券报告称，通过乐天集团申请账户的数量增加了2.6倍。

通过交叉使用来扩展业务是乐天独有的优势，所以乐天规模经济也可以称之为“乐天积分规模经济”。

乐天规模经济的客户接触点是巨大的。以乐天市场、乐天旅游、乐天卡和乐天银行等为代表的每种业务都会聚集客户，也都会吸引客户交叉使用其他服务。通过ID联合进行的诱导毫无压力，并具有良好的客户体验，而乐天积分是连接每种服务的“催化剂”。

一次交付（One Delivery）计划

2018年，乐天宣布了“一次交付”和“一次付款”的新概念，旨在扩大乐天规模经济。

一次交付是指为了应对日益增长的物流压力，乐天将在2020年左右，通过建立独立的配送网络，为乐天市场进驻商户提供从仓储到配送的一站式服务。

具体来说，乐天计划扩大“乐天超级物流中心”以及自有配送服务“乐天快递”的配送范围。据可靠消息称，乐天“引入自动化的仓储设备，运营有效的管理物流配送中心，基于乐天的商业数据和AI技术预测订单，并通过与库存信息的结合优化库存配置，提高配送速度并削减仓储和配送成本”。因此，乐天的配送网络可提供从产品订购到配送的一站式服务。乐天在不断地融合商流、资金流和物流来扩张其规模经济，未来将形成与亚马逊和阿里巴巴的争霸之势。

一次付款（One Payment）计划

当下，“一次付款”的概念也在酝酿之中。这并不是某个特定服务的名称，而是所有商店都能使用相同的方式付款之意。

到目前为止，乐天市场上有多种付款方式，即刷卡付款、便利店付款、乐天账户付款和货到付款等。但是，每个商店都可以选择使用不同的付款方式，而这正是导致用户流失的间接因素之一。如果不能让用户选择自己想要的付款方式，则大约60％的用户将放弃交易或在其他站点上购买。

One Payment通过乐天支付的平台统一了付款方式。这样一来，商家将会享受到代办支付相关的服务以及统一入账周期的好处。当然，对于用户也有好处，比如丰富了支付方式，提高了用户体验等。到现在为止，如果用户在多家商店购物，并考虑一次性付款的话，那么只能选择每个商店通用的付款方式，比如信用卡支付。但是，在引入乐天支付后，就可以实现一次性支付，这必将大大改善客户体验。

除此之外，在2018年7月举行的“乐天EXPO 2018”上，还报道了以下信息：Omiya Sports位于新潟县长冈市总部，于2017年11月

推出乐天支付后，不仅增加了便利店付款和银行转账等预付付款方式，还获得了许多年轻的新客户。预付付款比引入乐天支付之前高出92.2倍，商店的整体营收也高出1.3倍，甚至还减轻了支付操作的负担。

“一次”的两层含义

实现全面物流服务的“一次交付”，以及提供统一付款方式的“一次付款”，都可以提升客户体验，继而加强乐天集团内部业务的协同作用，最终实现乐天规模经济的超级扩张。

我认为，“一次”其实具有两层含义：一是为客户提供一站式便利服务；二是加深集团内部协作，两点合一，最终得以打造统一的乐天品牌。

2018年8月，乐天进行了业务重组，旗下仅剩在线购物、移动通信和金融科技等子公司。从分拆的角度看，可能会有人觉得从形式上将权力下放给子公司会导致整个企业四分五裂。但是乐天的目标恰恰相反，它是通过强化集团内部之间的合作并产生协同作用，以此来增加乐天的“整体感”。乐天进军移动通信业务将增强乐天的整体性，扩大乐天在日本的规模经济，这也将成为乐天向全球扩张的契机。

乐天API经济将进一步扩大乐天规模经济

最后，我想说一下与外界一体化或连接的乐天API。在这里，API是指应用程序编程接口的缩写，是一种连接样式与机制，用于从另一个应用程序进入访问并操作某个应用程序的功能或管理数据。向其他公司开放API接口称为开放API。全球先进的金融机构已

经开始使用对外开放API。这是因为API有潜力从一个普通平台形成一个API经济的生态系统，而星展银行就是该领域的先驱。

2018年7月，乐天与美国的R Software公司确立了独家战略合作伙伴关系。R Software公司是一家专注于应用程序编程接口市场的公司，将为乐天提供API市场服务“Rakuten RapidAPI”。鉴于这个部分非常重要，我在此引用乐天签署合约时发布的消息进行介绍。

“RapidAPI是全球最大规模的API开发平台，该平台提供8,000多种丰富的API产品，为全世界50多万名开发人员所使用。近年来，随着各个企业、组织和公共机构对外开放其服务功能的API进行资源共享以来，一个开发了新业务的生态系统‘API经济市场’在全球范围内迅速崛起。在日本，自2018年6月1日起生效的《银行法》规定，金融机构有义务向外部业主提供API，并且以金融科技行业为首，已经有越来越多的企业参与到‘API经济’市场。这次提供的‘Rakuten RapidAPI’，通过启用日语功能，极大地提高了日本用户的便利性。”

通过使用“Rakuten RapidAPI”，开发人员可以更方便快速地购买满足其需求的API。此外，API的供应商为了制订有效的API销售方案，除大幅度削减销售所需的时间和成本以外，还可以将其API交付给世界各地的开发人员。乐天、乐天通信和R Software将继续优化日本以外的亚洲市场，并鼓励API供应商和开发人员使用它们的产品。

我认为进军API经济市场的计划将有利于进一步拓展乐天规模经济，并成为扩大乐天规模经济的好方法。这是因为开放的API具有升级支付系统，能发挥金融机构和企业传统优势的潜能。

乐天规模经济的演变

乐天于2019年2月12日举行了2018年第四季度与全年财务业绩报告会，并宣布了公司的一些重大变更。其中便包括建立乐天支付系统，进一步发展无现金支付业务；通过更新当前的乐天支付应用程序，所有付款方式都将被统一到一个名为“新乐天支付应用程序”的平台上等。另外关于金融科技业务，乐天也进行了整改，乐天将在乐天卡旗下设立银行、证券、保险等业务分公司。

在乐天集团的用户之间，使用乐天积分和乐天现金进行支付的人数正在增加。在金融领域不容忽视的是，以这些为原资产的证券交易也在增加。要知道，在乐天购物是“消费”，而购买证券是“投资”，二者对资金的利用方式完全不同。

此外，乐天证券还明确区分了“资产形成”（薪水等核心资金形成的长期财产）和“资产运营”（对剩余资金的运营）。因为乐天的目的是与客户建立持续且良好的关系，所以公司将重点放在前者的业务上。实际上，有数据表明，如果利用乐天证券来进行资产形成的话，将会大幅增加整个集团的可用资金。乐天证券还表示，“继续利用核心资金进行资产形成的客户是对乐天给予高度信任的人”。

近年来，大家经常使用“×× 规模经济”一词。在全球范围内，使用“规模经济”一词开展业务的平台已越来越多，比如亚马逊规模经济和阿里巴巴规模经济便是其中的佼佼者。

回看日本国内，就电子商务、旅行消费、金融领域而言，乐天可能构建了全球最大的规模经济。以前，乐天的金融业务主要被用来支持其核心业务电子商务的发展，但是今后，乐天则打算将其金融业务发展成真正的核心业务。此外，2019年3月来福车的上市，

给其最大的股东乐天带来金融及其业务扩展上的好处，在未来也将带来意想不到的影响。我一定会持续关注乐天规模经济的演变。

LINE：在客户接触点的竞争中处于领先地位

LINE Pay是LINE在2018年6月推出的二维码支付服务，以“加盟商引进费用为零，以及今后3年内免支付手续费”的重大赤字攻势引起关注。LINE Pay的策略是专注于去现金化尚不发达的中小型商店，并消除导入去现金化支付的障碍。目标是截止到2018年底，确保100万个商店加盟。

LINE Pay具有很大的优势。它被内置在2018年第三季度便已拥有7,800万用户的LINE上，所以不必专门下载新的应用程序。如果一口气扩大植入LINE Pay的分支机构数量，那么在用户易于启用和易于使用方面都将是巨大的进步。

以中国的腾讯为基准

LINE试图通过其通信应用程序，垂直整合所有生活服务，甚至包括金融业务。从这一举动可以看出，LINE明显在效仿中国的腾讯。

所以，如果我们能了解腾讯的支付应用程序“微信支付”席卷中国市场的经过，那么就能切身感受到LINE的潜力。

阿里巴巴的“支付宝”是中国二维码支付市场上的先行者。而微信支付比支付宝晚了10年。最初人们认为支付宝的根基不会动摇。但是，微信支付的渗透速度远超支付宝。有报道称，微信支付正在逆袭。我认为这种趋势上的差异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支付宝与电子商务网站链接，而微信支付是与通信应用程序链接所致。

我们只有在购物时才浏览电子商务网站。但是，每当有朋友或熟人联系我们或我们想要主动联系别人的时候，每天都要打开好几次通信应用程序。浏览通信应用程序的频率要比浏览电子商务网站的频率高出很多倍。腾讯通过这种方式，以使用频率具有压倒性优势的通信应用程序为平台垂直整合各种金融服务，进而丰富其他生活类服务。

仅在日本，就有7,800万名活跃用户

那么LINE又如何呢？它的月活跃用户已超过1.65亿人，仅日本就有7,800万名，或许这是日本最大的客户覆盖平台了。不仅在日本国内，LINE还在中国台湾地区，泰国和印度尼西亚提供通信应用程序的同时，涉足金融服务。LINE Pay的首席运营官长福久，就LINE进军金融业务的必要性做出如下解释：

“LINE于2011年6月作为通信应用程序开始提供服务。之后，随着用户数量的迅速增加，LINE又推出了‘智能门户概念’，旨在瞄准智能手机时代的平台。利用智能手机这一设备，无论何时何地都能与自己需要的人、信息、服务、企业和品牌建立联系，从而构建起一个完整的世界，并将包括视频、音乐、漫画、游戏等组成的‘内容平台’与提供诸如支付、招聘和O2O等生活相关服务的‘生活平台’融合在一起，旨在成为一个支持用户所有生活的平台。

“由于提供各种服务，不可避免地就需要客户付费。因此LINE于2014年12月公开了LINE Pay，目的是为了将用户日常生活中必不可少的支付功能添加到其智能门户中。LINE的定位是智能门户化，在此过程中首先便是要添加支付功能，来提高用户生活的便利性。”

LINE也和腾讯一样，以强大的通信应用程序为“武器”，跳出了社交网络企业的范畴进行发展。

广告营收在增长，但通信和内容方面发展停滞不前

LINE是日本四大金融颠覆者中发展最快的新兴企业。该公司成立于2000年9月，由韩国Naver公司100％出资。Naver是韩国最大的综合互联网公司，提供广告、内容服务和商业平台等业务。起初，由于是韩资企业，LINE的营收中约有30％来自海外业务。即便如此，但海外的会员注册数却一直停滞不前。2016年第二季度，来自中国台湾地区，泰国和印度尼西亚的会员人数还有9,500万人，到2018年第一季度却已经减少到8,700万人。

让我们看一下营收结构。一方面，LINE是一家以广告为核心业务的公司。截至2017年3月31日，公司2017财年总营收1,671亿日元，其中广告收入达765亿日元，同比增长39.9％。LINE的广告业务包括LINE官方账户、LINE表情贴纸、LINE积分、LINE@、时间轴（TimeLINE）广告以及作为门户网站广告的Naver等相关内容。尽管不如脸书和谷歌那样营收极端化，但可以看到广告营收占比最大，其增长推动着总营收的增加。

另一方面，通信和内容业务的增速一直在放缓或下滑。LINE的通信业务包括聊天、表情贴纸和装扮等，从2015年到2017年，增幅仅为1.05倍。LINE的内容业务包括游戏、漫画、音乐和占卜等，同比下降了20%。但是需要注意的是，内容本身的预期寿命很短。因为命中与否对营收的影响很大，所以说内容业务在商业模式中带来的收益注定是不稳定的。

其他业务显著增长

但是，值得注意的是“其他业务”的增长。尽管营收金额只有202亿日元，但从2015年到2017年，其增幅却高达3.37倍。

这其中也包括LINE Pay在内的金融科技业务。LINE 在2017年的支付交易额已超过4,500亿日元，全球会员注册数超过4,000万人，月交易量突破1,000万件。LINE已经在日本国内的罗森便利店和大型药妆店等连锁店扩展LINE的加盟店数，并与包括三大银行在内的50多家银行达成战略合作协议。

除此外，AI助手“Clova”已开始制作和推出。LINE首先于2017年发布了智能扬声器“Clova Wave”和“Clova Friends”，随即成为日本唯一一家拥有与亚马逊的Alexa和谷歌的Google Home类似的智能扬声器的公司。后来，随着第三方公司和个人可用的软件开发套件（SDK）的发布，Clova的可用功能（技能）已增加到120多个。尽管LINE是智能手机上的通信应用程序，但毫无疑问，它已将AI辅助视为智能手机的下一个平台。

与丰田、野村和瑞穗银行达成合作的意义

同样值得注意的是，与丰田的战略性合作扩大了Clova的使用范围。从2018年12月发售的新车开始，允许在车内安装使用Clova Auto。该服务有多种功能，即使在驾驶时，也可以通过语音输入接收或发送LINE消息，播放音乐以及查看目的地的天气。

通过这种合作关系，LINE的目标是进军汽车行业的新市场，而丰田的目标则是吸引LINE的年轻用户。丰田已经宣布安装亚马逊的Alexa，在此基础上，LINE只是其合作伙伴之一。虽然如此，能够与“世界丰田”建立合作关系对LINE而言，意义重大。

与此同时，无论是与LINE共同建立LINE证券的野村证券，还是与LINE共同建立LINE银行的瑞穗银行都在大放异彩。尽管LINE已在

东京证券交易所一部上市，但它仍然是一家初创公司。与各行业巨头合作对LINE来说，都是一笔巨大的资产。对于难以独自进入的市场，它将是最大的“武器”。

此外，LINE的其他业务中，还包括金融科技和AI并重的LINE手机。尽管在2016年该手机已经引入了廉价的SIM业务，但由于移动通信网公司等通信巨头降价的影响，市场份额占比一直停滞不动。2018年1月，LINE手机宣布与软银建立战略联盟。软银获得LINE手机51%的股份，LINE随即将目前租用的线路从移动通信网公司切换成软银。

对金融科技业务寄予厚望

LINE现在正在通过将核心业务——广告，与金融科技和AI结合来强化其“战略业务”。

同时，LINE也在积极开展投资业务。2018年9月，LINE进行了第三方定向增发，募集的资金具体将被用于开发金融科技和AI业务上。LINE发布的新闻稿中显示，该资金用于“扩大旨在建立新基础设施的移动汇款与支付服务的LINE Pay的支持范围，用户数量以及汇款与支付金额的广告宣传和促销费用”，以及用于“未来开展的金融相关服务之启动，以及管理相关的营运资金、系统投资、人事费用，还有各行业的国内外战略性融资之中”，以上共计约1,000亿日元（截至2021年12月）。此外，用于“开发其主打产品LINE Clova及相关服务的人事费用、外包费用和广告宣传费用”的部分大约在480亿日元（截至2021年3月）。

在继续发展广告业务的同时，对金融科技和AI业务进行战略性投资。在此我们可以看出LINE的两个意图：一是加强AI扬声器作为

后智能手机的基础设施，二是强化在LINE应用程序上部署金融科技业务。LINE将这两个战略意图整合命名为“智能门户”策略。

无论如何，对于战略业务之一的金融科技，LINE寄予了很高的期望。接下来让我们分别看一下LINE的金融科技业务。

LINE Pay真正的目标是庞大的支付数据

我想再次强调的是，LINE Pay是金融科技业务的核心。从LINE Pay开始，LINE的金融科技战略就是全面发展金融业务，例如资产管理、保险和借贷等都是其发展方向。

LINE Pay于2014年12月诞生，旨在通过LINE进行转账和支付。之后，LINE Pay将功能扩展到预付卡、二维码支付和快速支付。由于它被内置于LINE应用程序中，因此不必安装专用的应用程序。它的简便性使其在其他支付应用程序中脱颖而出。如今仍然有大约7,800万名用户在使用LINE Pay。

不仅如此，正如我之前提到的，二维码支付加盟店安装LINE Pay的成本为零，从2018年8月开始的3年内，使用二维码支付的交易再也不必缴纳手续费。此外，LINE Pay还采取了强有力的促销策略来促进大家对该程序的使用，比如基于消费的金额兑换积分的“我的色彩程序”。在2018年12月第三季度公布的财报中，“LINE Pay智能手机支付的支持地区已经突破92万个，并且年内将顺利扩展到100万个地区（包括72万个QUIC Pay支持地区）”。截至2018年7月，虽然它仍然低于已超过120万个地区（乐天支付＋乐天Edy＋乐天积分＋乐天卡）的乐天，但发展势头很猛。

然而，“零安装成本，无支付手续费”对竞争对手构成了严重威胁。这不是谁都可以效仿的，因为效仿的话就意味着放弃收入来源。

这是非金融玩家所特有的策略，他们不需要利用“支付本身”赚钱。而像Origami这样，试图通过二维码支付来赚钱的商家，将承受被淘汰的巨大压力。

那么，连手续费都免除的LINE Pay究竟想要什么？答案就是从支付服务中获取大量的数据。它将以此进行大数据累积，以便在新的金融服务中使用。就是说，二维码支付只是LINE拓展其业务的桥梁。

与金融平台公司合作，不断开拓新业务

实际上，LINE旗下的金融服务正在陆续登场。LINE金融有限公司于2018年1月成立，旨在进一步强化其金融业务，例如资产管理、保险、借贷和加密货币。

让我们具体看一下这些金融业务。例如，LINE证券是与野村证券合作创建的在线证券公司。著名的野村证券与初创企业合作的目的是什么？野村证券总裁森田敏雄在2018年8月13日作出如下回答：“在野村证券，50岁以上的客户占70％。因此，以年轻人为目标的方式，即所谓的‘资产形成阶层’，实际上不适合野村证券。这一点十分明显。LINE每月有7,600万名活跃用户。而我们只有531万个证券账户，大约是其规模的1/15。而使用LINE的用户中，50岁以下的占75％。换句话说，它抓住了野村劣势的客户群体。……所以说，LINE的证券业务相对薄弱。这就是我们达成战略合作的真正原因。”

LINE智能投资也已经启动。利用这项服务，客户可以轻松地在无人机、VR和角色扮演等熟悉的平台上，进行约10万日元的小额投资。该投资业务是LINE与日本第一家主题型在线证券公司FOLIO共同合作推出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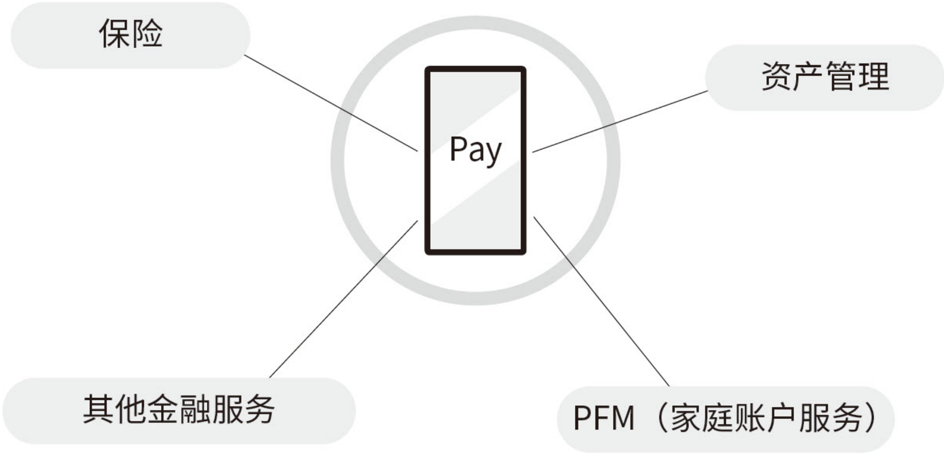


图8-2　LINE开展的金融服务

注：资料来源于LINE。

LINE还与日本财保企业——日本兴亚合作推出了LINE保险。客户可以通过智能手机在短短60秒钟内完成投保操作，保费从100日元起，并可以利用LINE Pay完成。

还有LINE银行。该银行是由LINE金融（51%）和瑞穗银行（49%）共同出资成立的银行。虽然具体的业务内容还不明晰，但是LINE的首席执行官出泽刚说："我们的重点是LINE Pay，现在其用户数量在持续增加。如果我们想为LINE Pay用户提供各种金融服务，最需要的便是大家日常生活不可或缺的银行业务。……虽然法律制度很严格，但对用户的服务仍存在改善的空间，我们能否应对挑战？"

LINE和瑞穗银行就"LINE信用"的合作开发达成协议，具体包括利用LINE使用情况等数据来评估个人的信誉度（LINE Score），以及面向个人推出的无抵押贷款（LINE Pocket Money）等服务。

可以实现垂直整合吗？

这表明LINE与现有金融机构正保持着良好的关系。出泽刚表示：“我们的基本方针是，在与现有金融机构建立合作关系的前提下开展金融业务。如果谋求应对金融特有的规制以及更加严格的运营体制的话，与拥有金融科技和经验的现有金融机构合作总比独自完成要好。”

当然，LINE也独自开发了许多金融服务，比如LINE家庭账本等。另外还有一些先进的服务，例如拥有750万名用户的Money Forward。据说，LINE未来还会基于7,800万名LINE的活跃用户进一步开拓市场。

此外，LINE也在进军通证经济（Token Economy）市场。LINE宣布了自己独立开发的区块链网络LINE Chain，以及在该网络中通用的货币LINK（面向海外）和LINK Point（面向日本）。从2018年10月开始，虚拟货币交易所BITBOX已经开始承认LINK（不包括日本和美国）。

如果可以将这些丰富多彩的金融业务垂直整合，那么LINE可能会成为新一代金融行业的赢家之一。虽然LINE有时会出现不正常登录等安全隐患问题，但相信通过与瑞穗和野村等巨头公司的合作将会迅速提高其信誉度。

风险与挑战

当然，与巨头公司合作一定存在着一些未知数。

在提高信誉度的同时，也可能存在一些风险，比如失去了LINE原有的速度感。此外，延迟进行数字化转型的巨头公司可能会阻碍未来LINE继续前进。

即便是与野村证券合作推出的LINE证券，最终也可能只落得是一种互联网证券，无法在新一代金融业中幸存。过去，闻名世界的野村证券也未能在在线证券上取得成功。其实互联网证券早在20年前就已诞生，而且发展迅速，但由于激烈的手续费竞争而发展疲软，就此才迎来了其商业模式的极限。

现在需要的是，数字化转型时代下新的数字证券和数字银行。换句话说，让用户享受到“无意识交易”般的优质用户界面与体验，并提供符合数字原生代的价值和生活方式的新金融产品。

与腾讯相比，今后LINE面临的挑战是，吸引客户从通信应用程序中访问使用金融科技和电子商务等其他服务。目前，LINE在客户接触点方面虽然具有压倒性的优势，但广告以外的服务增长并不如意。因此，就规模经济的规模而言，它不如乐天和雅虎软银联盟。

最后，我认为LINE主导金融业务的关键，取决于在金融方面获得的信用和信任。因为即使与野村证券和瑞穗银行合作，也仅仅是提高其信用，而获得信任是另一回事。LINE能否克服比科技更高的障碍，将是一个重要的课题。

雅虎软银联盟：推出热门话题的PayPay支付

让人记忆犹新的是，雅虎软银联盟推出的智能手机支付服务PayPay在日本一度成为焦点话题。PayPay是一项于2018年10月诞生的服务，是继LINE支付、乐天支付和Origami支付的又一位后来者。但由于其给加盟店的支付时限是最晚第二天到账，并且3年内免支付手续费，极大地保障了用户和加盟店的安全。

2018年12月，雅虎软银联盟启动了一项惊人的用户获取计划，即“100亿日元促销活动”。这意味着使用PayPay的用户，会得到与购买金额等值的20%积分返还，而且该积分可以用于以后的购物

（每人最高50,000日元）。在此基础上，1/40概率的用户可获得全额积分返还（每次最高100,000日元）。尤其是使用软银智能手机的用户，可获得全额积分返还的概率甚至高达1/10。

这引起了爆炸性的反应，促销活动原应持续到2019年3月，但计划准备的100亿日元预算很快就被用完了，家电商场的收银台前挤满了使用PayPay结账的顾客，场面一度陷入混乱，最后促销活动也不得不仓促结束。但就是在这短短10天时间里，PayPay吸纳了190万名用户。

竞争对手LINE支付或乐天支付推广过程中则从没有出现过这样的新闻。以前对智能手机支付持谨慎态度的许多用户，现在也都安装了PayPay来获取积分。换句话说，PayPay以100亿日元的投资获得了190万名用户与潜在用户，平均下来每个用户的获取成本为5,263日元。也有传言说，PayPay可能会推出相同促销活动的第二弹和第三弹。

像孙正义一样的超长期思维策略

许多人可能对这种大胆的策略感到惊讶，而我觉得这才是孙正义会采取的策略。2001年，他免费在街角分发高速互联网连接服务Yahoo BB的调制解调器，并立即获得了市场份额。孙正义是一位罕见的企业家和投资者，他以“未来可以持续发展300年”作为愿景，投资了许多公司。此外他还是一位超级富有远见的人，他的目标是“30年内让软银成为由5,000家公司组成的集团”。

这项“100亿日元促销活动”应该是从长期规划中反向推导出来的，不计短期利润的一种措施。短期内，二维码支付本身就是一项亏损业务。众所周知，阿里巴巴和腾讯的支付业务本身也都处于亏损状态。但是像阿里巴巴和腾讯一样，雅虎软银联盟也有许多回

收资金的方式。他们有一种商业模式是以PayPay支付为起点扩展整个规模经济，然后从整个规模经济中回收资金。

由于LINE Pay提供3年内免支付手续费服务，“不能通过支付手续费获利”，已成为二维码支付竞争中大家默认的事实。随着来自Mercari（C2C二手交易App）的Merpay等的加入，接下来二维码支付市场的争夺战将继续处于混战状态中。胜负相信会在3年之内见分晓，到时候可能仅会剩下两三家公司而已，幸存的参与者将会是那些不以支付交易而是通过整个规模经济来获利的公司。换句话说，二维码支付应用程序只是一个入口，公司从这里便可以访问电子商务网站、增加广告营收、链接金融业务，以此来获取利益。

幸存者之一的很可能是雅虎软银联盟。到时候，软银推动的共享乘车可能已解禁，包括向美国优步投资的77亿美元等，或许还会与PayPay合作。

但是，PayPay带来的并非都是好消息。一系列未授权信用卡的使用问题，以及“收到一笔无法识别的缴费通知”等问题常常被报道，而这些都是PayPay进一步拓展业务时必须克服的问题。

指数成长型企业常用的，尝试精益创业（lean-startup）的结果可以很好地解释它为何会被企业常常使用。这是一种在完善之前发布产品原型，观察用户的反馈，同时高速运转PDCA的方法。临时赶制出来的吸引客户的圣诞节销售，就与用户的反馈程度相关。

尽管如此，但问题仍然不断。在金融服务领域，让客户放心是重中之重，不能使客户放心的金融服务永远得不到多数人的青睐。目前，该应用程序的功能还仅限于二维码支付，而且还不能像支付宝那样“以支付应用程序拓展规模经济”，从而开展业务。我不能

否认这始于“仓促行为”，所以我想密切关注PayPay将来如何运转PDCA。

无缝链接各种金融服务

很久以前，一家名为雅虎的公司以链接到Yahoo ID的形式，针对“邂逅（媒体、广告）”，“搜索（检索、转换媒体、电子商务）”，“购买（购物车）”，“支付（钱包）”和“使用（服务、内容）”等一系列的用户操作，一下子提供了100多种具有特色的服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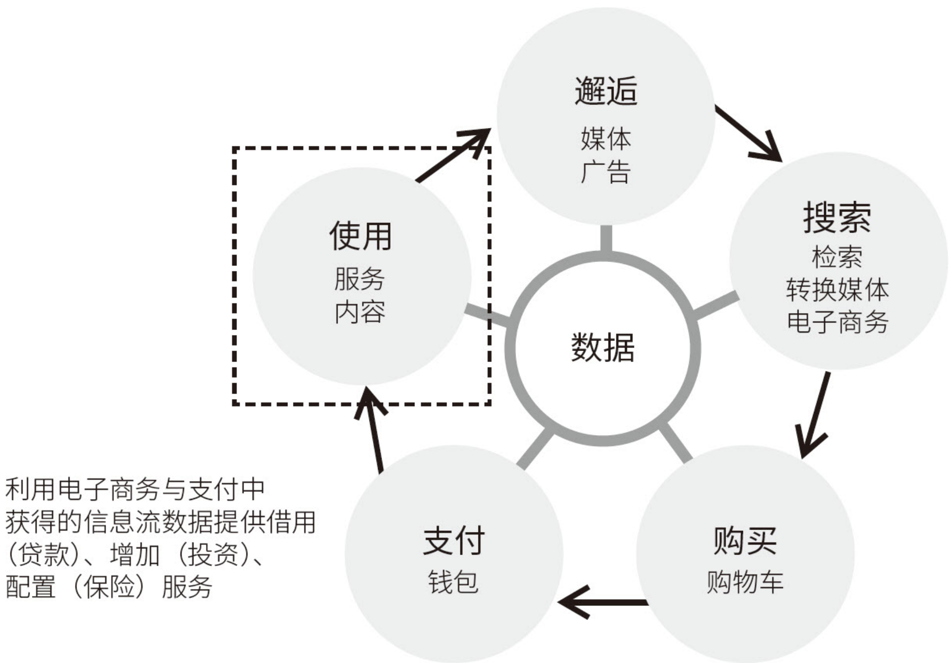


图8-3　雅虎的支付业务定位

注：资料来源于雅虎。

今天雅虎的高级会员数已达1,979万人，每月的登录用户ID更是超过4,000万人，由此累积的大数据可用于创建更优质的客户体验。像其他科技公司一样，大数据是他们最大的资产。雅虎的《日本综合报告书（2018）》指出：“我们将把从2018年起的数年间定为第三创业期，并努力加快向‘智能手机公司’和‘数据驱动公

司’的转型。毫无疑问，今后在解决‘信息社会’的问题时，能否取得生产力和创造力方面的数据将成为最大的关键。因此在创建服务时，不必依赖员工的经验和直觉，只需要建立一个‘数据驱动’轴，并沿该轴中心生成的结果切换系统，无缝连接集团的大数据，便可为客户提供最舒适的服务。除此之外，我们还将与外部各方合作并开辟新业务。”

旨在获取线下市场的数据

那么金融服务如何定位？

从上述内容我们可以看出，PayPay已表现出强烈的存在感。但与之相对，雅虎软银联合推出的信用卡“雅虎卡”、预付卡“软银卡”、互联网专业银行“Japan Net Bank”，以及为雅虎购物和为入驻雅虎的商家提供融资的“JNB商业借贷”等，却在金融服务领域一直没什么存在感。

那么PayPay的存在意义又是什么？雅虎最初有一项“雅虎钱包”的支付服务，可用来在雅虎上购物等。后来雅虎还利用“雅虎卡”强化了信用卡战略，进而掌控了实体店的支付服务。关于这一点，PayPay营销本部的广报室长伊东史博表示：雅虎为在线开展业务的企业提供了一种名为雅虎钱包的支付服务。这使它们能通过互联网扩展业务，扩大可以补充商业数据的场景。比如，在线上什么样的客户在找什么样的商品、购买了什么等数据，都可谓是为发展在线广告等数据业务奠定了基础。但是考虑到电子商务市场的规模，线下市场比在线市场要大得多。

雅虎在努力开发在线也可使用的支付服务的同时，还建立了一个即使在“离线域”中也可以收集数据的渠道，以便将这些数据的使用与其他业务的增长联系起来。在不断变化的环境中，使用二维

码支付这一新支付服务的可能性正在增加，它们将利用软银集团的管理资源，成为二维码支付市场的主要参与者，并在离线域中尽可能广泛地获取数据。

换句话说，Pay Pay的目标是使用离线数据。

而雅虎正在“使用电子商务和支付中获得的信息流数据，来提供借用（贷款）、增加（投资）和配置（保险）服务”。

到目前为止，在我的印象里，雅虎软银联盟提供的金融服务一直是分散存在的。但是，如果将PayPay确立为基础设施，用于捕获电子商务和支付中的信息流数据，那将会怎样？PayPay将成为无缝链接所有金融服务（例如借用、增加和配置）的门户，并改善客户体验。到时候“从支付应用程序开始的规模经济”也将应运而生。

软银集团的协同作用

软银也将金融科技列为其成长战略的支柱。雅虎是软银集团的子公司，与金融科技公司合作是自然而然的事情。

软银还表示，在未来几年中，从17,000名员工中转移9,000人到PayPay等新业务领域。如果这些人被用来开拓加盟店，那实力将是非常强大的。实际上，PayPay已在日本全国范围内建立了20个网点，并成立了一支名为“购物顾问（Shop Consultant）”的千人销售团队，努力在各地开展业务。没错，这种攻势正是孙会长的行为方式，即为了创建一项业务而不惜投入所有资源。

回想起来，从雅虎日本就能看出，软银集团是一家可以让企业快速成长的巨头公司。雅虎日本是于1996年由美国雅虎与日本软银合并成立的一家互联网企业。通过这些年的飞速成长，截至2019年3月，市值已超过1.4万亿日元。当雅虎美国从日本退出时，软银却

发现了雅虎日本的这种增长。这充分证明了软银集团不论是作为商业公司，还是作为投资公司都能有非常出色的表现。PayPay母公司兼软银集团通信子公司的宫内谦社长也曾说过，要创造第二个、第三个雅虎日本。

当前软银集团正在全方位地进行投资，包括通信、自动驾驶、半导体、电动汽车、电力和能源等有望快速增长的市场。如果将软银集团的协同效应投入金融服务会怎么样？PayPay支付的潜力将不可估测。

SBI：继续“颠覆”的指数型成长公司

2018年8月1日，有篇题为《证券支柱的个人业务下降》的文章出现在《日本经济新闻》的金融经济版面。“……总结各大证券公司在2018年4—6月期间的表现，股票市场的停牌减少了普通股的交易量，而且每家公司重点关注的信托业务收入也在显著下滑。许多公司通过零售来弥补债券交易部门的损失，这种变调已成为企业经营管理不安的来源。”

正如该新闻稿所指出的那样，在野村控股、大和证券和三菱UFJ证券控股的收益下滑的同时，SBI控股的收益逆势而上。其旗下的SBI证券发布的2018年4—6月的财务业绩显示，净营业收入289亿日元，同比增长23.9％；净利润99亿日元，同比增长30.5％。自2012年以来，其客户数量以年均10.3％的速度持续增长，2019年全日本排名第二，仅次于野村证券。政府已将iDeCo和NISA列为“催化剂”，并促进其销售，来促进“从储蓄到资产的形成”。iDeCo账户的数量已超过21万人，NISA账户的数量也已逼近第一名的野村证券账户的数量。

取得突破的不仅是证券，住信SBI网络银行2018年4—6月的业绩报告显示，该公司经常性营业收入39亿日元，同比增长33.9%；投资收益11亿日元，同比增长36.2%。总存款为4.65万亿日元，住房贷款达4.3万亿日元，在互联网银行中以压倒性的优势排名第一。

SBI财保于2008年开业，已签署的保险合同达100万份。SBI人保于2015年成为SBI的子公司，在办理住房贷款时要求贷款人加入的团体信用人保数量增加显著，并且保险合同的提交件数在一年内增长了4倍。

SBI成立于1999年，是一家专业的互联网证券公司（E-Trade证券）。它现在已成为日本四大金融颠覆者之一，正在试图颠覆现有金融行业。

SBI的飞跃成长适合用“指数”一词。该公司成立于泡沫经济破灭后的衰退时期。在高利率环境下，许多金融机构找不到借钱的企业，并且都因巨额不良债券而苦恼。在这种情况下，SBI是第一家实现数字化的公司，将证券、银行和保险等各种金融公司纳入旗下，同时将其并入网络基础架构中。

之后过了大约20年，“6个D”中所说的“潜伏”（参见第4章）时期已经结束，终于迎来了“颠覆”现有金融机构的阶段，这便是SBI当前所处的阶段。

将生态系统扩展到金融范畴之外

SBI起源于金融机构，其口号是“以金融为核心，超越金融”。截止到2018年3月，SBI集团拥有230家公司。除了证券、银行和保险，他们还将开发“资产管理业务”。该业务主要投资日本国内外的IT、生物技术、环境和能源以及金融相关的风险企业。此

外，它还在全球范围内开发“生物相关业务”，包括制药、保健食品、化妆品等全球业务。这些从多角度，以多重形式提供的服务早已超出狭义的金融范畴，有助于改善人类的生活方式。

从这个意义上说，SBI集团区别于曾一度在美国兴起的“集团公司”。在这里，“集团公司”是指多元化经营管理相互之间没有关联且开展不同业务的公司。

SBI社长北尾吉孝曾说过：“不论哪个行业，在互联网出现以前，每家公司基本都在为价值竞争，但是自从互联网问世以来，变成了为多家公司协同作用下产生的‘网络价值’竞争。我是这么看的，所以我有意识地创建了一个企业生态系统。”

客户可以任意使用生态系统中的各种服务，例如银行、证券和保险，而不用麻烦地转移资金，并且可以获得集团内部的协同效应，这就是SBI的目标。这样一来，试图依靠简单的传统方式生存下来的传统金融业务，如“从借贷业务中赚取利息”，“通过出售金融产品收取大量佣金来增加利润”等将被“摧毁”，而且很快暴露于“非收益化”的浪潮中。对无法适应数字化转型的玩家而言，不能从中赚取收益的服务将越来越多。

从虚拟货币中看到“全球扩张”的梦想

SBI在其他大型证券公司难以进入的领域，比如人工智能和虚拟货币领域，也具有重要的领先优势。那么我要问了，它的意图是什么？

实际上，对于虚拟货币而言，2018年是艰难的一年。2018年1月，在日本第二大虚拟货币交易所Coincheck出现新经币非法流出事件之后，以泡沫形式飙升的比特币，从超过200万日元的股价暴跌至60万日元，而且下降趋势尚未停止，到2018年年末已跌至30万

日元左右。因此，也有不少人指出“虚拟货币正在消亡”。据2018年《华尔街日报》报道：“数十个交易集团操纵了部分大型在线虚拟货币交易平台的市场，并在过去6个月中通过交易活动至少赚取了8.25亿美元，而有些人遭受了巨额的损失。”正如这则报道一样，目前还无法消除操纵价格等不透明的市场行为。

我预计会出现一个调整阶段，即价格上涨后出现停滞、低迷的时期。同时，不符合一定标准的“假冒”虚拟货币将被淘汰。

但是，作为虚拟货币的基础技术，区块链的巨大潜力并没有动摇。可以肯定的是，符合一定标准的虚拟货币将再次取得重大突破。

换句话说，虚拟货币市场也将经历指数型增长。

让我们再次看一下“6个D”。尽管货币的“数字化”导致个人投资者的资金流向虚拟货币市场，且虚拟货币市场的增长现在处于看不见的阶段，我认为这些都是“潜伏”阶段的特征。接下来，如果专业投资者（机构投资者）代替个人投资者进入市场，增加市场的稳健性，它将迎来“颠覆”阶段，转而进入爆炸式增长。只有在这个时候，才能重新给货币下定义。像素以倍式持续增长的数码相机，一下子“摧毁”了胶卷相机市场，数码相机已进入“非收益化”阶段，并随着智能手机一起迈入“非实物化”阶段，同样虚拟货币也将遵循一样的路径。

虚拟货币市场将再次繁荣。SBI期待着这样的未来。在2018年4—6月的财务业绩报告中，北尾社长介绍说，“预计未来虚拟货币市场将从目前的3,000亿美元扩大至40万亿美元，而未来只要10年便可达到其一半左右”。

瞄准“金融科技2.0”

2016年，SBI设立了“区块链推广办公室”，以迅速应对金融科技的挑战，并一举扩大其虚拟货币相关的服务。

SBI正在加大对虚拟货币等数字资产相关的高科技风险公司的投资，并努力完善由以下几种业务构建而成的生态系统，即运营交易所、创建并参与衍生品市场、保障安全性、开展面向机构投资者的资产管理、提供信息、发行Token以及ICO等业务。

SBI虚拟货币，于2017年9月注册了虚拟货币兑换公司，并开始接受新账户的办理。由于提供行业内最小的价差（买卖价格，现实中的手续费），其北尾社长所说的“以压倒性的优势成为第一交换所”即将成为现实。关于新经币非法流出事件引发的安全漏洞，SBI将通过与英国、丹麦和中国台湾地区的世界领先公司合作，来完善其安全体制。

瑞波币，是运营汇款平台Ripple系统中的通用货币，已经越来越被当作国际汇款手段之一。

对瑞波币的投资，是SBI扩大虚拟货币市场迈出的重要一步。利用瑞波币在汇款时间和成本上具备的压倒性优势，将扩大虚拟货币作为支付手段的使用，由此形成的稳定价格将推动市场本身的成长。

仅凭这些举动就能看出，SBI似乎呈现出指数型增长，并在不断推动完善其管理体制。

我将SBI的增长阶段整理如下。将证券、银行和人保等在线金融服务作为一个企业生态系统来运行，以此获得协同效应的阶段称为“金融科技1.0”。在第一阶段中融合区块链和人工智能等新技术，来改善当前服务的阶段是“金融科技1.5”。将区块链技术应用到所有金融交易中，并生成新服务的阶段称为“金融科技

2.0”。SBI的目标是今后的“金融科技2.0”，接下来将迎来真正的增长。

“以金融为核心，超越金融”

SBI集团的终极目标并不是控制金融领域。对于SBI而言，包括虚拟货币在内的数字资产终究不过是其全球扩张的工具而已。

投资拥有卓越技术的全球数字资产相关公司，并利用这些来整合技术，推动SBI集团的全球扩张。今后，区块链将不限于金融领域，还将进入医疗保健、法律事务、房地产、零售乃至行政管理领域，它的市场规模也将不断扩大。到时候，作为战略业务创新者，为各行业提供最新技术，引领下一代社会变革，这才是SBI真正的目标。这也是公司口号“以金融为核心，超越金融”的真实含义。

在财务业绩报告会上，北尾社长乐观地说道：“大部分业务将在今后二三年内迎来红利期。”我坚信这一定会发生。是的，SBI现在正处于发展金融科技的“潜伏”阶段，当它进入“颠覆”阶段时，金融业将发生什么，让我们拭目以待。

更新地方金融机构

与全球化相比，“振兴地方”也是讨论SBI时不可或缺的关键词语。

区域金融机构现在处于瓶颈期，由于日本银行的超低利率政策已经延长，致使其主要业务融资的利润一直处于低迷状态。再加上地方普遍存在的人口减少问题，甚至威胁到了一些金融机构的生存。实际上，根据金融厅的调查显示，106家地方银行中，超过半数（54家）处于亏损状态。朝日新闻于2018年7月，以90家地方银行为对象进行了问卷调查。超过80％的地方银行表示，“日本银行

的长期货币宽松政策”和“地区人口减少”是导致其陷入困境的主要原因。此外，超过50％的银行还抱怨“盈利能力难以提高”，这让人不得不担忧地方银行的经营状况。

在维持业绩的重压下，地方金融机构自身也开始出现问题。一直以来被称为“地方银行之王”的Suruga银行，在2018年3月被曝出篡改审查文件等非法融资问题，其金额竟高达1万亿日元；同年7月，东日本银行还被披露出非法融资和非法收取手续费等文件。尽管有些金融机构正通过跨区域重组等方法来寻求活路，但也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在这种情况下，SBI开始了前所未有的项目投资。SBI集团试图通过与地方银行的合作，来振兴区域经济发展。SBI的地方性战略既新颖又详尽，它不仅可以提高地方银行的盈利能力，而且还可以从整体上更新地方的商业模式。

通过合作与提供基金支持地方银行

尽管不为大众所知晓，但SBI集团近年来一直在积极促进与地方金融机构的合作。从2017年3月与清水银行的合作开始，到2018年8月，仅仅一年半的时间里，SBI与30家地方银行达成战略合作协议，并向地方金融机构的客户提供SBI证券开发的金融产品和在线服务，已经建立起与地方金融机构的合作机制。

比如，SBI与清水银行、筑邦银行合作，在当地创办了一家联合机构，为当地客户提供一站式金融服务，从而增加了托管资产和账户数量。此外，自2018年夏季以来，地方金融机构经手的SBI财产保险和人寿保险提供的产品件数急剧增加。其中，包括SBI财产保险提供的火灾、癌症和汽车等保险产品，以及SBI人寿保险提供

的面向住房贷款的团体信用人寿保险。这些实实在在的业绩有利于加强SBI集团与地方金融机构之间的关系。

在强化与地方关系的基础上，SBI集团已开始为地方银行提供更加具体的支持。“SBI区域银行价值创造基金”于2018年1月成立，是其最重要的举措之一。

地方银行都在为应对日本央行的超低利率政策和人口减少问题而苦恼，但如果利用最先进的技术，那么极有可能提高企业价值。“SBI区域银行价值创造基金”将通过投资这些有前途的地方银行（即收购股份），引进SBI集团拥有的金融科技相关技术，提高企业价值的同时，回收投资资金，这是一项长期的投资回报。SBI已经向价值创造基金投资了100亿日元，再加上来自其他合格机构投资者的投资资金，它的规模将高达1,000亿日元。

还有一项具体的举措是SBI区域复兴资产管理公司，这是通过与地方金融机构共同出资成立的资产管理公司。利用SBI集团的专业知识，协助管理地方金融机构提供的专有资金和客户存款，并通过合资企业管理来支持地方金融机构开展专业人才的培育，可谓是一举两得的好事。

与区域链接全球发展的成果

这些多样化举措的核心是，推进金融科技的引入和增强区域金融机构的服务。

我在之前说过，包括虚拟货币在内的数字资产只不过是SBI进行全球扩展的工具而已。SBI已决定投资拥有卓越技术的全球数字资产相关公司，并希望通过整合技术，在地方链接这些全球发展的成果，进一步强化地方业务的基础。

为此，SBI正在迅速建立起一个系统。

系统的核心是SBI金融科技孵化（SBI Fin Tech Incubation）运营的“金融科技平台”。该公司是SBI控股（60％），软银（20％）、日本IBM（10％）和凸版印刷（10％）共同出资成立的企业。通过引入链接技术到该平台，区域金融机构将能够以低成本自由使用投资方SBI以及其他国内外金融科技创业者提供的服务和功能。

除金融科技平台外，该公司还提供了由美国Neobank（一家为其附属金融机构提供新价值的公司）的Moven开发的移动端专用银行应用程序，以及瑞士的金融应用程序运营的保险中介应用程序Wefox开发的保险咨询支持平台，为区域金融机构增强服务提供必要的广泛技术支持。

在SBI控股宣布财务业绩后（2019年第一季度），北尾社长强调说：“技术具有重振地方银行的巨大潜力。”这句话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在欧美，“平台化”已经作为银行的一种新的商业模式变得越来越鲜明，例如有一家名为“挑战银行”的新兴银行，正在推广开放式API（一种在平台端提供的易于使用的多功能机制）。这是一种基于客户数据的协作，关键是可以在开放平台上创建多少B2B和B2C流量。SBI还投资了德国挑战者银行“Solaris Bank”。与地方银行的合作让人觉得平台金融机构有可能诞生于日本。

有机结合三个要素的策略

货币作为金融的基础，它有能力消除不同区域、拥有不同价值观的人之间存在的差异，并实现全球化。同时，不同地域的人也能感受到不同货币持有的力量。在考虑日本的主要课题——振兴地方

经济时，全球和地方对抗的想法将失去意义。从这个意义上讲，SBI集团从金融角度将全球和地方联系起来的战略是非常合理的。

图8-4总结了我对SBI集团的策略分析，具体采用的是，我在分析国家和巨头科技公司的竞争策略时用过的“五因素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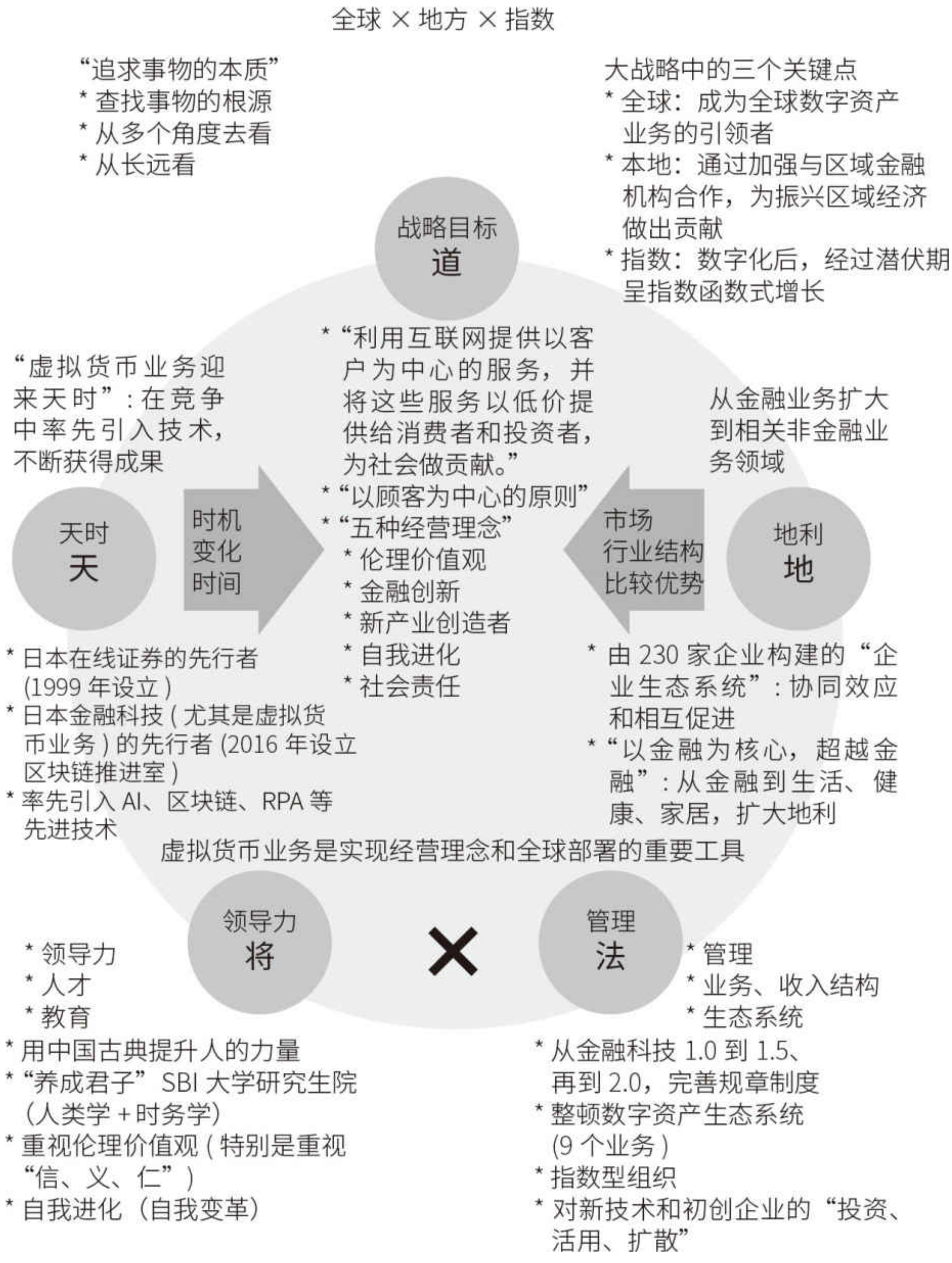


图8-4　基于五因素法对SBI 的大战略分析

虽然不能解释全部内容，但我想让大家知晓SBI集团发展的“全球”、“地方”和“指数”三个要素是如何有机地交织在一起并进一步形成为战略的。

我想再次强调，这一宏大的战略“并不是为了金融”。

正如前面所述，投资创新的技术，超越金融领域，作为战略业务创新者将新技术传播到各个行业，并引发下一代社会变革，才是SBI的终极目标。

随着金融科技的迅速普及，巴塞尔银行监管委员会已经预测出5种未来金融场景（请参阅最后一章），新的金融业务可能是与估值经济、ICO、区块链和会员费用等相结合的服务。

如此一来，亚马逊和阿里巴巴正试图在其数字业务中垂直整合金融，这对传统的以金融为主要业务的参与者构成了真正的威胁。我对以金融为主，从数字化起步的SBI集团充满了期待。

日本金融颠覆者应该克服的障碍

在本章的最后，我想说一些话。在我看来，在线银行和在线证券等在线金融，与数字银行和数字证券等数字金融看上去相似，但其实内容完全不同。

二者之间的本质区别就是，金融应该发挥其本来的作用，为客户提供真正的基于客户导向产生的客户体验，并获得客户对金融最重要的信用和信任，而且必须保持像初创公司那样的快速企业文化。

从这些条件上看，本章讨论的四家金融颠覆者，每一个都有自己应该克服的障碍。突破这些壁垒的真正的金融科技公司和数字金

融会出现在日本吗？可以说，这是日本通往未来金融世界的转折点。

第3编　现有金融机构的反击

第9章　高盛和摩根大通的决定

新一代金融业的霸权之争，是现有金融机构与科技公司之间的一场战斗。

其实，对科技公司而言，它们没打算变成金融机构。因为它们不需要，也不想成为金融机构，它们只想通过技术垂直整合金融业务。

另一方面，现有金融机构可能被迫做出否定自我的决断。而且现有金融机构正在加速向科技公司转型。

这场斗争的爆发地在美国。因此在本章中，我们将关注美国金融机构的发展趋势，以及其主要参与者高盛和摩根大通。

雷曼冲击和金融科技的崛起

雷曼事件引发的混乱是众所周知的。

由于美国金融体系陷入危机，美国政府投入了70万亿日元的公共资金，试图拯救濒危的金融机构。在雷曼事件爆发后，则几乎没有大型金融机构不接受国家资本入驻。后述的高盛集团，更是从沃伦·巴菲特（Warren Buffett）领导的伯克希尔·哈撒韦投资公司获得50亿美元的出资，才得以存活。同样，摩根士丹利也得到了日本三菱日联集团（MUFG）的救援。

当时，对美国金融机构的批判也达到了顶点。“忽略顾客的感受，无所顾忌的谋利，等泡沫经济破灭后，再用国家的钱，或者说是市民缴纳的税金来救援？”这已然超出了批判的层面，市民中自然而然地爆发出一种强烈的厌恶情绪。

据说，这种厌恶情绪为科技公司的金融服务带来了机遇，即促使金融科技兴起。民众们期待着新的金融参与者来取代现有金融机构，因此出现了利用不断进化的技术满足民众期望的新金融参与者。

“贝宝（PayPal）黑帮”

作为美国金融科技的鼻祖，其代表玩家是在线支付服务贝宝。它是为个人与个人、个人与小企业之间的交易提供中介服务，而且十分安全，因为它不需要将银行账户或信用卡等支付信息告知给对方。

贝宝成立于1998年，2002年被亿贝（eBay）收购，2015年再次被分拆出来，自此后便一直保持高速增长。现在，它已成为超过2.5亿人在使用的支付服务工具。

需要指出的是，贝宝给包括金融科技在内的科技行业带来了巨大的影响。贝宝被亿贝收购时流失了许多“元老级人才”，他们被统称为“贝宝黑帮”，这些人利用其网络和资金力量，不断成立新的企业。

其中的代表之一就是经营电动汽车特斯拉的埃隆·马斯克（Elon Musk），早在2002年他就创办了火箭开发公司Space X，并进军太空事业。除此之外，“贝宝黑帮”还包括领英（LinkedIn）的创始人里德·霍夫曼（Reid Hoffman）和YouTube的创始人之一查德·赫利（Chad Hurley）。有趣的是，这些初创企业实现跃进式发展的背后，总少不了贝宝出身的人才，“贝宝黑帮”成员创建的初创企业中，已有7家成长为独角兽企业，由此也能看出他们的存在感。

“教父”的智谋

“贝宝黑帮”的教父是彼得·蒂尔（Peter Thiel）。他是贝宝的创始人之一，现在以投资者和对冲基金经理的身份，不断投资各种公司。另外，彼得·蒂尔也是脸书的第一个外部投资者，他曾向脸书投资50万美元，上市后转手又以10亿美元卖出。

每当贝宝出身的人创办企业时，彼得·蒂尔都会投资。因此他投资了许多金融科技公司，包括健康保险在线平台奥斯卡（Oscar Health）、用于比特币支付的BitPay以及用于家计和资产管理服务的Mint等。

彼得·蒂尔还是科技公司的“教父”和思想上的领导者。总结他创业历程的著作《从0到1：开启商业与未来的秘密》（*Zero to One: Notes on Startups, or How to Build the Future*）是创业者的必读书目之一。

这本书的书名意思是“从头开始创建”。彼得·蒂尔在书中说：“复制内容当然要比创建新内容更容易。因为如果重复熟悉的方式，只会带来数量上的增加，即1变成n。但我们创建新内容的时候，每次都可以实现从0到1。创建事物的动作仅需要执行一次，但是却可以从中产生任何人都未曾见过的全新事物。”

如果不对创建新事物这一艰巨业务进行投资，美国的企业就没有未来。无论现在赚取的利润有多大，通过利用原有业务来迎合当今时代，以便继续确保利润的话，那么这些企业的结局将会是什么？可怕的是，它们的结局将比2007—2009年的环球金融危机中倒闭的企业更加悲惨。现在的“最佳实践”将最终陷入僵局，还未被尝试的新事物才是“最佳”方式。

寻找可以垄断的市场

在这本书中，他提出了“避免竞争，以垄断为目标”的理念。彼得·蒂尔认为确立垄断的商业模式可以决定企业的永续存在和发展。

“每个初创企业都是从小规模开始的，每个垄断企业都控制着绝大部分市场，因此任何一家初创企业都应该从小微市场做起。如果失败的话，在小微市场上就失败反而更好。道理很简单，小市场比大市场更容易控制。……一旦创造并主导了小微市场，就可以逐步扩展到稍大一些的相关市场。亚马逊就是这么做的。杰夫·贝佐斯（Jeff Bezos）自成立亚马逊以来，就抱有控制所有在线零售市场的愿景，他非常有意识地从书籍市场开始。……亚马逊逐渐扩展了其业务种类，终于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百货商店。”

彼得·蒂尔独特的“反向扩张”思维让他发现了可以垄断的市场。《从0到1：开启商业与未来的秘密》的第一章也是从“几乎无人赞成的重要真相是什么？”这一振聋发聩的问题开始。

即使在现在的金融科技界，活跃的“贝宝黑帮”也十分引人注目。迈克斯·莱文（Max Levchin）推出了在线支付解决方案Affirm，普雷莱·沙赫（Premal Shah）推出了小额贷款网站Kiva，比尔·哈里斯（Bill Harris）也成立了智能投资顾问（Robo-Advisor）的智能投顾平台Personal Capital。

当然，领导美国数字支付革命的贝宝本身也在不断地创造新事物，并积极地实施并购，继而吸纳金融科技领域的创新成果，以实现持续稳定的增长。

大型金融机构的反省和摸索

雷曼冲击后，大量人才流出大型金融机构，其中有部分人才便流入了金融科技公司。金融科技公司在接收这些熟悉金融知识的精

英后，在科技和金融领域得到了双向同步的发展。

但是金融科技市场并没有被新兴的金融科技公司所垄断。

在雷曼冲击的惨痛复原过程中，现有金融机构在反思自己的经营方式的同时，开始尝试摸索新的金融模式。高盛和摩根大通是现有金融机构的两大巨头，但它们也是最早启动数字化转型，并在金融科技领域取得显著成果的其中两家公司。

摩根大通首席执行官杰米·戴蒙（Jamie Dimon）关于变革即将到来的发言具有象征性意义。JP摩根以前在信用评级上曾落后于花旗集团，后通过与大通的合并经营得以生存。不过现在，它却成了美国名副其实的顶级金融机构。这与戴蒙推动的“向科技企业蜕变”的成功战略有很大关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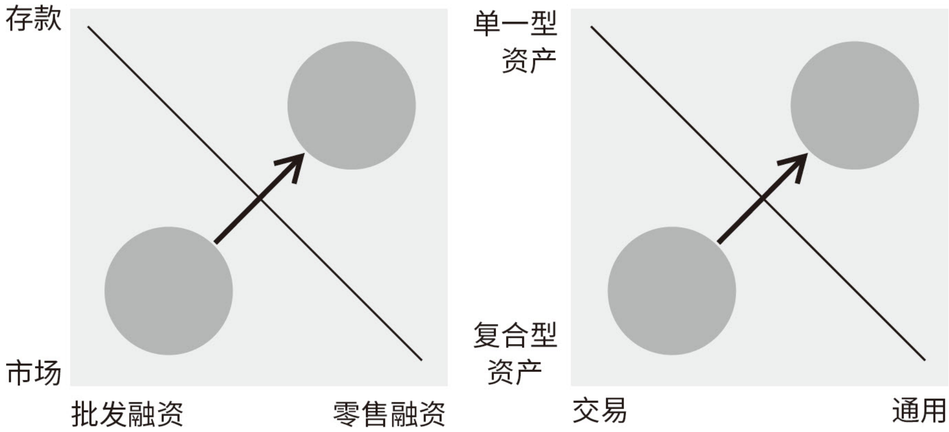


图9-1 《金融危机后银行业的结构性变化》要点

发挥应有的作用

雷曼事件过后，美国金融机构发生了怎样的变化呢？

自雷曼冲击发生后，到2018年春季以来，各相关部门已经发表了许多报告，其一便是BIS全球金融系统委员会出版的报告书《金融危机后银行业的结构性变化》（*Structural Changes in*

Banking after the Crisis）。这本报告书的论述内容详尽而深刻。在此，我想根据日本证券经济研究所发行的简约版介绍该报告书的要点。

BIS报告书中将银行分为4种类型，即零售融资银行、批发融资银行、普通业务银行和万能业务银行。

其中，零售融资银行和批发融资银行主要在筹集资金上存在差异。零售融资银行主要通过存款业务，即通过收集普通消费者的少量存款来筹集资金；而批发融资银行则是通过中间市场等从其他银行那里筹集资金。据BIS宣称，雷曼冲击前倾向批发融资的金融机构现已纷纷转向零售融资，其原因是通过存款筹集资金更加安全、稳定。

另外两种，即普通业务银行和万能业务银行，在运营的业务上也有所区别。普通业务银行就是“像雷曼事件前的美国金融机构那样，运营风险较高，并且需要巨额资本来运营的银行”，而万能业务银行除了运营交易性资产外，还运营“收益性低且风险性低的高流动性资产”。

总而言之，雷曼冲击前后的变化可以总结为：从批发融资转向零售融资，以及实现从普通业务到万能业务的转变。也就是说，现有金融机构意识到要控制风险，积极应对，从而发挥金融应有的作用。

以科技企业为目标

如果从全球规模来看雷曼事件对金融行业造成的影响，那么大家会发现这种影响是有地域差异的。

欧洲的金融机构，以德意志银行为首，都没有从雷曼事件中恢复过来。希腊等国出现了债务危机，不仅民间银行，就连国家自身也陷入了危机，ROE和贷款量更是没有恢复到雷曼危机前的水平。在此期间，欧洲的银行减少了国际业务和海外网点。来自市场的评价也一直都比较低。

与欧美企业相比，日本的金融机构受到雷曼事件的打击相对要轻一些。随着一部分欧洲金融机构的撤退，日本本土银行的海外事业有所增加。另外，中国和一些新兴国家也没有受到雷曼事件的较大影响。

与这些国家相比，美国的金融机构虽然遭受雷曼事件的打击较大，但是应对也非常迅速。

首先，通过政府的资本注入迅速修整和改善资产负债状况，并迅速强化相关规章制度。其次，雷曼事件爆发后，各国金融当局为了防止危机的再次发生，加强了银行的健全性规制（《巴塞尔协议》），其中包括自有资本比率、杠杆率、流动性规制等。此外，还引入了将高风险业务与银行分离的美国“沃尔克规则”和英国“栅栏原则”，虽然所有这些行动都倾向于抑制交易活动，但是美国银行仍然在推进这些应对措施。

最后，美国金融机构大胆执行了“选择与集中”策略。“选择与集中”策略有三个点，分别是事业、地区和顾客。对于每个点，他们都做出了“1—继续、2—加强、3—退出”的选择。

可以说，美国金融机构的数字化转型也是这种大胆的“选择与集中”策略的一环。

高盛：“最优秀与最聪明”的选择

作为美国金融机构反击的代表，首指高盛集团。

先让我们对高盛做一个3C分析，这样也可以看到美国金融机构向科技公司转变的必然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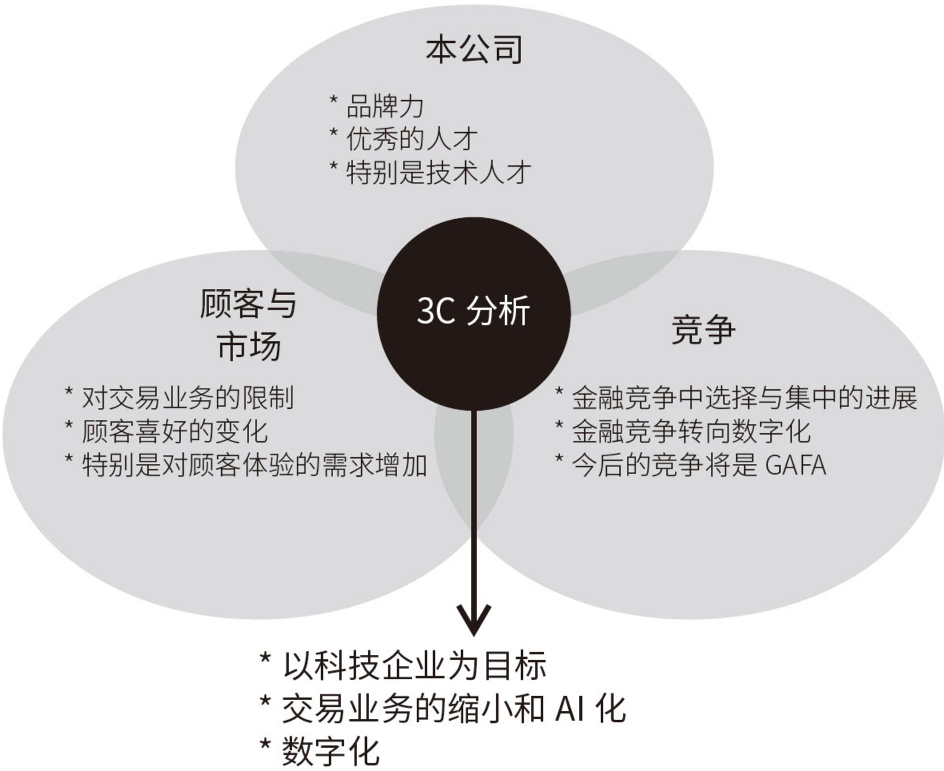


图9-2　高盛公司的3C分析

首先是，Company（公司）怎么样？虽说高盛集团给人的印象是在雷曼冲击下多少有些受损，但在当今的金融业界，它仍享有首屈一指的信誉度和品牌影响力。高盛拥有非常优秀的人才资源，其招聘时只选择“最优秀与最聪明”的人。他们的主打业务是交易投资，因此吸引了大量来自理工科和技术科的优秀人才。

其次，Customer（客户/ 市场）如何呢？在市场因素中，最重要的是对交易操作的监管。随着监管力度的不断加强，曾经的核心业务——交易业务带来的利润已大幅度降低。根据高盛年度报告显示，2006年交易营收占纯利润的68％，但到2017年已下降至37％。

相反，公司的本业投资银行部门，也就是股票和债券承销以及并购咨询业务正在不断扩大。由此可见，高盛集团正在向不受金融商品市场行情影响的业务进行结构性转变。

为了迎合这一转变，投资银行部门出身的苏德巍（David M. Soloman）于2018年出任高盛首席执行官，投资银行部门的约翰·沃尔德隆（John Waldron）则出任首席运营官。过去的高盛集团，其历任经营者都是出自交易部门。但是，他们担心高盛依靠交易业务将无法生存，所以便更换了管理团队。

最后，Competitor（竞争对手）怎样呢？推进数字化转型的金融机构管理层已经意识到即将到来的竞争对手是GAFA。毋庸置疑，这些兴起的背后原因就是金融科技。科技公司提供的客户体验，正好迎合了厌恶现有金融机构的客户的需求。高盛集团分析，其现有金融服务带来的4.7万亿美元收益将被竞争对手带走。

从以上的3C分析可以看出，高盛的目标是成为一家科技公司，缩小交易业务，实现AI化，实现数字化转型。

用AI对核心业务进行重大改革

高盛因其交易业务的萎缩和AI化备受关注。显然，这是为了应对来自科技公司威胁的策略。

2018年4月30日，高盛总裁苏德巍在加利福尼亚州比弗利山庄举行的米尔肯实验室全球会议上表示：“在股票交易方面，15到20年前我们有500多人负责定价业务，但现在只用3个人。”

苏德巍说：“在交易业务中引入更多技术，对客户而言效率提高了，但也带来了新的风险。”而对于高盛，这将带来人员配置的

转变，现在公司雇用了9,000名工程师，同时也增加了相应的专业监管人员。

苏德巍还表示，高盛对机器学习，以及基于过去市场经验进行预测方面做了巨额投资，而且他认为速度已经变得“比资本重要得多”。

如果是辅助业务倒也罢了，如此大幅度地改革以前的主要业务，足以表明高盛的“认真程度”。

传统的影子

让我们回顾一下，高盛到底是一家什么样的公司？

高盛是一家名副其实的具备权威和品牌影响力的金融机构，这里聚集着最优秀与最聪明的人才，历届的财政长官等管理层人员更是人中之龙。

在组织方面，高盛一直秉承着“顾客至上”的优秀经营理念。另外，传统投资银行的合作文化也得以保留。因为伙伴关系制有分摊风险和收益的一面，所以会形成牢固的伙伴意识。合作伙伴参与各种各样的业务，最高管理层制定团队决策是高盛集团的传统。虽说在雷曼事件中受到了重创，但是其组织整体的风险管理能力非常出色。

在这种传统影响下，高盛的组织文化优势体现在对组织和团队合作的重视程度上，这一点要远高于同行。高盛集团内部共享同一种文化，即重视共同承诺，爱惜人才，长期以来通过深谋远虑的严谨行为方式，不断改善和优化组织。

但是，以顶级权威和品牌影响力著称的投资银行，高盛在雷曼危机前后也被批判过于“傲慢”。并且因为他们的高收入，很快成为人们谴责和厌恶的对象。

这一点在美国商学院毕业生的就职活动中就得以体现。例如，在我曾就读的芝加哥大学MBA专业，大家找工作的首选目标就是高盛和摩根士丹利等投资银行。此外，还有一种流行的模式，就是先在麦肯锡、波士顿咨询集团等战略咨询公司或其他运营公司工作一段时间，然后选择自主创业。

而现在，名牌大学的毕业生都以供职于GAFA这样的科技公司为目标，而不是金融公司。高盛员工们拥有的骄傲和自豪早已大不如前。

全面开展数字化战略

在讨论今后的高盛集团时，不可或缺的就是接下来要叙述的数字化战略。相较于其他公司，高盛的数字化战略涉及整个金融机构。之前介绍的交易部门AI化只不过是其先行例子之一。数字化已经进入号称金融机构命脉的风险管理部门。

高盛对科技领域的投资也不容小觑，仅2015年科技投资支出就高达35亿美元。除对金融科技企业投资外，高盛还积极支持企业的IT开发，在不断推动交易等现有业务的自动化、高度化、效率化的同时，还不忘专注于开发创建新业务。

高盛集团中，科技人才占比也在显著增加。在晋升总经理的人数中，2004年工程师占比是1/16，2015年已上升到1/6。而且从整个集团来看，2015年9月末，集团共有员工37,000名，其中11,000名是工程师，在11个部门中均属于最多。此外，市场基础设施的专利数量高达90件，超过第二名摩根士丹利一倍多。

强化数据收集与分析

作为高盛集团数字化战略的组合，这里重点介绍Data Lake（数据湖）、Marquee和Marcus 。

与其他公司相比，高盛公司的数字化战略本质在于，加强数据的收集和分析，强化风险管理系统，提高决策的速度。

比如其中之一的“数据湖”，里面汇集的不仅是关于交易和市场的调查信息，还有来自邮件、SNS、博客记录中得到的所有相关数据。通过AI分析这些数据，然后提供给客户。高盛管理层的马蒂·查韦斯（Marty Chavez）说道：“有些客户不想冒险，而有些客户却在追求风险。我们的工作是帮助他们实现愿望，这便是高盛集团的服务根基。如果客户在考虑规避风险或追求风险时不给我们打电话，不向我们咨询，那么我们将无法开展任何业务。”“高盛之所以有价值，正是因为它拥有庞大的数据量。我们的工作就是让客户愿意联系我们，这也将带来惊人的信息量。利用这些信息为我们的客户提供更好的服务，这就是我们的工作。”

Marquee是一个法人客户可以在其公司内部使用的风险管理和分析工具平台。它可以提供用于获取和研究市场数据的GS Markets，以及用于销售和预交易的Simon等应用程序，从而可以提高交易的速度和透明度。

来自消费者数字银行Marcus的冲击

最有趣的是2016年10月开始的Marcus，这是一款面向普通消费者的公共在线金融平台。2016年，在强大的移动策略下，高盛对其业务进行重组创立了Marcus。这是高盛推出的面向零售的GS Bank数字银行业务。

高盛已转型为控股公司并获得了银行牌照，进而实现了零售融资。尽管如此，“高盛加入零售银行”这一消息还是震惊了业界。

高盛是一家面向机构投资者的金融公司，在其原始业务中仅与大型跨国公司交易，极少与个人往来。在某些情况下，它也为富裕阶层提供私人银行业务，但仅限于资产在1,000万美元以上的客户。

但是，Marcus的目标客户群是普通消费者，业务是面向他们提供无抵押个人贷款和储蓄账户。无抵押个人贷款可以为信用等级较高的客户提供最高4万美元的贷款，还款期限为3—6年，无手续费，只收固定利息。根据申请人的信用评分、过去的还款记录、还款期限、借贷目的等，利率在6.99%—24.99％之间浮动。

影响公司的命运

Marcus通过固定利率，无手续费，自由设置还款日期，回应了公众对传统金融服务的不满。由于整个借贷过程在线完成非常简洁，再加上“对消费者友善”和“易于偿还”而大受好评。另外，Marcus还可以开设最低1美元的储蓄账户，利率为2.25%，远高于美国平均水平的0.66%。

这些以消费者为中心的服务发挥了功效，Marcus正在快速增长，目前存款超过300亿美元，贷款也超过40亿美元，现正在考虑进军日本市场。

关于Marcus，前首席执行官劳埃德·布兰克芬（Lloyd Blankfein）说：“我认为Marcus将在未来几年影响我们的命运。”

“消费者的关注点已经从传统的实体分支机构转移到利用技术满足消费者需求的解决方案类型，在这个时机下我们成立了Marcus。我们可以利用稳定的财务基础、卓越的风险管理能力和技术，使高盛成为消费者金融的‘破坏者’。”

“在线消费者金融方面，我们的业绩并不长久，鉴于强劲的市场需求，我们正在寻找更多的投资机会。今后我们还打算直接或经由合作伙伴逐步扩大借贷商品的销售。”

在目标客户上，从富裕阶层向普通消费阶层转变。

在服务理念上，从傲慢的高盛转型为对消费者友好的高盛。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高盛在各个方面给出的最优秀和最聪明的回答是数字银行。它提供的不仅仅是现有银行业务的在线移交，而是客户至上的服务理念以及对追求客户体验的重视。因此Marcus完全具备了入主新一代金融行业的条件。

2019年3月25日，苹果在新服务发布会上宣布，将发行与高盛联合推出的信用卡“Apple Card”。虽然高盛还没有拿出作为发行公司的业绩，但苹果却选择它作为发行公司，原因就在于高盛拥有的品牌力和信誉。对于高盛而言，这是获得苹果高级优质个人客户群的绝佳机会，也有助于Marcus的业务拓展。在信用卡业务领域，虽然苹果和高盛的组合属于后发者，但其爆发力绝不容小觑。

摩根大通：对IT年均投资1万亿日元

与高盛一样，摩根大通是一家致力于数字化转型的美国代表性金融机构，摩根大通每年在金融科技领域的投资超过1万亿日元。该公司技术创新负责人乌玛·法鲁克（Umar Farooq）曾说：“我们是唯一拥有区块链平台的非科技类公司，在（除了区块链之外）

数据科学、机器人技术和人工智能方面，我们聚集了各领域的世界顶级人才，并形成了一个专业团队。”

摩根大通，包括其商业银行和投资银行，是成功扛过雷曼冲击的金融机构。2011年11月，它的资产超过美国银行，成为美国最大的银行，2010—2015年的净资产收益率一直稳定在10％左右。

硅谷来了

几年前，摩根大通的首席执行官戴蒙说过：“硅谷即将到来。”从该声明可以看出，随着互联网公司的兴起，现有金融业充满了危机感。因此，戴蒙认为应该大胆投资强化部门，比如他提出向金融科技领域投资1万亿日元的方针，与此同时缩小现有业务来彻底削减成本。

戴蒙在2018年年初曾公开表示“再干5年”，今后他将继续发挥自己的领导才干。总的来说，不贪图短期利润，而是从长期视角进行经营管理。摩根大通或许接触数字化的时机比高盛晚，但它是最早决定数字化的金融机构之一。

摩根大通也在积极与科技公司展开合作。摩根大通于2016年启动了“驻地”计划，通过邀请金融科技公司进驻办公室来支持业务开发。在金融科技领域投资的1万亿日元中，有30亿美元将被用作风险资本等新投资。2018年，摩根大通宣布将与亚马逊和投资公司伯克希尔·哈撒韦达成战略合作，共同开发与医学和医疗保健相关的并购业务。此外据报道，2020年摩根大通将在硅谷建立一个拥有1,000多名员工的金融科技基地。

面向个人的综合数字服务

摩根大通最引人注目的是，开通了面向个人的综合数字服务。这不仅已经超越了现有的银行业务，还将顾客的“日常生活”本身数字化。这点与中国的阿里巴巴和腾讯有重合的地方。具体来说，就是将客户的消费动向分析、家庭收支管理等与金融服务相关的生活服务全部纳入数字化范围。这种“关注日常生活”的视点，并不局限于普通消费阶层，也积极面向富裕阶层提供服务。

其中最具亮点的是移动银行应用程序Finn。对于讨厌实体商店而喜欢在线购物的千禧一代，所有服务均可通过智能手机完成，尤其是“在网上5分钟就能开设一个账户”，“用户可以事先设定什么时候把存款从支票账户转到普通账户”等功能更令他们欣喜若狂。

如果从每个功能来看，Finn就是诸多金融科技公司提供服务的后来者。但是，与金融科技公司最大的不同在于，Finn将每个功能与支票存款或活期存款结合起来开展业务。也就是说，Finn的独特之处在于，它从金融服务的核心到周边都有涉足。

在日本和美国，迄今为止还没有出现像中国的支付宝或微信支付这样的，试图以应用程序为入口主导整个金融服务的金融参与者。日本和美国的金融科技仅仅停留在其周边领域。

但是摩根大通正在通过API构建开放平台，同时推进企业本身的金融产品开发业务。

现有的金融机构擅长为客户创造有吸引力的金融产品。而摩根大通以Finn为切入点，有望将其业务扩展到股票和共同基金。如前所述，阿里巴巴面向支付宝用户开发了一种新的投资产品，摩根大通应该也可以做到这一点。

2019年2月，摩根大通宣布计划发行自己的虚拟货币JPM coin，这是美国的银行初次尝试面向企业提供快速支付的服务。关于虚拟货币，戴蒙认为其最大的劣势在于过高的波动率。因此，摩根大通把虚拟货币与美元挂钩，以此来缓和虚拟货币的过高波动性，确保了其作为新支付手段的稳固地位。在美国和美洲地区，区块链技术的实际应用已经正式开始了。

美国不变的部分

无论是摩根大通还是高盛集团，都是各自领域中最具影响力的金融机构，同时也都拥有极大的影响力。凭借这种势力，这两家金融机构在政治、经济、社会的各个方面都具有不容忽视的影响力。有人推测说，GAFA不能设立银行，很大程度上也是因为受制于它们的政治力量。

鉴于此，美国将与中国不同：在中国，像阿里巴巴和腾讯这样的大型科技公司已然接管了金融业；而在美国，高盛和摩根大通等顶级金融机构在推动数字化转型的同时，可能会垂直整合并发展在金融周边领域诞生的金融科技。中国的阿里巴巴和腾讯可以面向在美中国人提供服务，但是面向美国当地人正式开展服务是不容易被允许的。同样的，GAFA被允许提供促进其自身发展的金融服务，而与高盛和摩根大通的直接竞争相关的行动今后也可能会被阻止。

在日本，运营公司成立银行相对容易，但是在美国，对控股公司和集团公司的限制等因素导致运营公司难以设立银行。因此，即使是在新一代金融领域，区别看待变化的部分和不变的部分也很重要。

第10章　日本银行的数字化转型

摆脱传统银行业务

在争夺新一代金融业霸权的战争中，最艰难的莫过于日本的大银行了。

与第9章介绍的美国金融机构相比，日本在金融数字化转型方面已处于落后地位，这点不可否认。尽管金融颠覆者正在开发提供优质的用户界面以及用户体验的客户接触点，但大型银行与顾客的联系至今仍停留在柜台窗口和ATM机的商业模式。

外界环境正在朝着不利于大银行的方向变化，这一点从数据上看也很明显。

例如，随着智能手机和平板电脑的普及，银行正在飞速“向移动端转移”。在美国，用户选择银行的决定性因素已经改为“移动服务是否完善”。

根据商业内幕情报（Business Insider Intelligence，以下简称“BII”）的调查报告指出：在移动银行客户中，有64％的人在开设账户前调查了该银行的移动银行服务，有61％的人表示在移动银行不好操作的情况下会选择去银行。

另外，三菱日联金融集团，到2016年为止的10年间，到访银行窗口的客户减少了约40%，而其在线银行的利用率5年间增加了约40%。

在美国和欧洲，同样受“向移动端转移”的影响，银行的分支机构相继倒闭。

日本大银行对这些苦境也深有体会。它们否定了传统金融机构的老派行为方式，开始摸索新时代的数字化银行发展模式。

其共同的行动包括使用大数据和AI来提高运营效率，开发新服务。作为传统大银行的“遗留产物”，阻碍其变革的各分支机构和大量员工也在被重新审视。三菱日联计划到2023年为止，将有窗口接待的分行数量减半，然后增加自动化程度较高的新一代分行。瑞穗也计划到2024年将其所有网点转变为新一代分行，同时减少100家分行。三井住友表示，也将所有的430家分行转型为新一代分行。

与金融科技公司合作

与金融科技公司联手开发新服务也是一个显著的动向。与利用自己开发的服务对抗金融科技公司的企业不同，日本的大银行以开放式创新为目标，提供可培育金融科技的创业项目，并投资有前途的初创公司。例如三井住友金融集团（SMBC），与硅谷和纽约的加速器创新创业公司建立了合作关系，在当地设立了据点。在日本东京涩谷区，三井住友金融集团成立了一个名为“Hoops Link Tokyo”的创新中心，旨在建立一个由多元金融科技参与者组成的生态系统。

与可能颠覆自身的新兴金融科技公司共同携手创造而非一争高下，乍看之下这似乎是一种利益冲突的策略，但其实这种联手为大银行和金融科技公司双方都带来了好处。《金融科技的冲击》一书中列举了7条对金融科技公司的好处：

①可以向现有金融机构的客户提供贷款

②增加自身知名度和消费者信赖度

③提高对复杂金融管制和法规章程的理解

④能够获得风险管理技术

⑤提高资金筹措能力

⑥有访问全球结算系统的权限

⑦不用单独获取银行执照

通过与金融科技公司合作，现有金融机构还可以享有以下好处：

①不受传统系统的限制，可以尝试新想法

②可以利用大数据、人工智能等尖端技术为顾客提供服务

③能够以低于以往的成本，迅速为客户提供贷款等服务

④将可能在迄今为止无法进入的小微市场领域提供服务

⑤改善客户体验，并有望开拓千禧一代等新客户群体

实际上，到目前为止，日本的银行与金融科技公司之间的合作是违反银行法相关规定的。但是，随着2018年6月修订的新《银行法》实施以来，情况发生了变化。日本金融厅在明显察觉到日本已然落后于世界金融科技潮流的情况下，主导大银行引入一种将数据与金融科技公司联系起来的“开放API”，这将进一步加速大银行与金融科技公司之间的合作。

受此影响，日本大银行加快了数字化转型的步伐，以下是对日本各大银行对策的概述。

三菱日联金融集团：打破创新困境

在数字化转型方面，日本的先行者是三菱日联金融集团。之所以称之为“先行者”，我会在本部分的最后说明理由。

三菱日联于2017年9月发表了“数字化转型战略”，并宣布对传统银行业务进行改革，改革的四大支柱是商业、文化、过程和社会，具体措施可详见2017年5月颁布的《三菱日联再创造倡议》。另外，通过“基于数字化的业务变革”，营业纯利润将达到2,000亿日元。

能否成为让优秀工程师活跃的组织

在改革过程中，三菱日联设立了新职位，即首席数字转换官（CDTO）。此外，还成立了数字企划部，旨在通过活用外部知识经验来摆脱银行职员以往的思维模式。

首席数字转换官由首席信息官龟泽宏规兼任，他也是数字化转型方面的最高负责人。

首席数字转换官可能不被大家所熟知，但该职位是推进数字变革的指挥官，而且对该职位人选的要求非常高。如果是针对零售银行的数字化转型，那么就必须要熟悉零售业务，同时熟知传统金融系统和GAFA等科技巨头的最新技术。此外，还必须追踪阿里巴巴和腾讯等金融颠覆者的最新动向。这样的人才在大型银行中甚为少见。

除了首席数字转换官，数字化转型过程中还需要有优秀的工程师。如何吸引、录用并留住金融颠覆者也想要的优秀工程师，这也是首席数字转换官的工作。而这项工作的开展十分艰难。即便可以

聘请最优秀的工程师，但是如果不能提供一个可以让他们充分施展才能的工作环境，他们也会很快辞职并进入到竞争对手的公司。

首席数字转换官需要在如此广泛的领域发挥领导能力，不仅仅是三菱日联，其他各大银行也都设立并任命了首席数字转换官。被选拔胜任该职位的优秀人才中，许多被认为是下任行长的候选人，也是因为这个原因，所以要求高。

日本的大银行能否在金融数字化转型中生存下来，关键在于“能否吸引优秀的工程师，促进他们自主工作，更新营造出初创企业般的组织文化，从而产生创新”。

渠道革新与业务效率化

三菱日联的“基于数字化的业务转型”，是对2018财年启动的《中期管理计划》中确定的11项结构性改革支柱进行的横向推广。这也可以证明三菱日联抓住了数字化转型的本质，即“从企业的本质进行革新”。

说到其具体举措，首先是强化渠道。比如扩展智能手机应用程序和电话自动应答等非面对面渠道，这样就不必特意去实体分行办理银行卡或存折的重新开户、更改地址等业务。随着到访分行客户的减少，选择在线支付的用户增加等交易风格的不断变化，可以为客户提供多元化的交易渠道。

同时，人力化渠道也会革新。三菱日联计划将日本500家有人值班的分支机构中的100家分行转换成新型分行MUFG NEXT。该新型分行的特点是可以自动缴纳税收和公共服务费用，另外还设有通过电视电话向操作员咨询的窗口。这样可以提高店面的办公效率，最重要的是每家分支机构只需要安排2—3人就能运转。

通过谋求渠道的多样化和分支机构业务的自动化，为顾客提供随时随地都能连接服务的、无固定位置的渠道。

此外，三菱日联还在推进人工智能和大数据的应用。例如在服务台与票据处理、检索、营业支持和审查等五个业务方面鼓励用AI来代替，未来10年约40%的这些业务将被AI取代。

三菱日联已于2016年开始基于RPA的业务流程改革。RPA是指，用机器人代替个人在计算机上执行一系列任务，通过业务自动化来提高效率。适用业务包括抵押贷款文件的审查、国外汇款相关服务、股东大会议案的通知、支付数据的分析以及银行间结算的相关服务等。RPA今后将继续提高效率，最终将应用到2,000多种业务之中。

促进区块链的应用和开放创新

本来三菱日联就是银行巨头，最近更因为推进基于区块链的虚拟货币开发而受到关注。它立足于支付数字化的潮流，从日常支付到企业间汇款，再到银行间的结算，设定各种各样的使用场景并反复实证。

其实证之一就是引入MUFG coin，由于银行发行，价值稳定（1 MUFG coin=1日元），解决了虚拟货币一直以来“波动率过大且不稳定”、“货币发行者不明”等问题，今后将被用作可信赖的支付基础设施。另外三菱日联还与外部企业合作开发新服务，例如，2018年3月，以“活用MUFG coin的商业”为主题，通过举办编程马拉松等方式，不断探索新的金融服务。

龟泽说过：“不想只做成一个单纯的节庆日，优秀的想法都将会考虑用于商业化。”龟泽还表示，“也在设想构建全日本平台”。此话暗示了与其他银行合作的可能性。

此外，三菱日联在积极参与互联网企业擅长的开放创新。

三菱日联通过“MUFG API门户网站”向外部公开金融服务的功能，并积极与外部企业合作，为快速开展新的金融服务奠定了基础。而且三菱日联在海外成立了全球创新团队，加快与当地金融科技公司合作，并积极开展实证实验。到目前为止，三菱日联已经在硅谷、纽约、新加坡和伦敦设立了办事处。

另外，日本数字设计公司成立于2017年10月，是将以前的内部组织扩大成“创新实验室”，然后独立而成的一家公司。通过与外部工程师和34家地区金融机构合作等方式，来推动开发创新的客户体验并降低社会成本。

2015年以来，三菱日联也在支援为金融服务带来变革的企业家和风险企业，并致力于探索业务合作的“三菱日联数字加速器计划”的实施。因此，“三菱日联集团将全力以赴，通过草拟业务计划，支持原型建设，然后根据业务计划的方向选择合作伙伴以及成立联盟等，以全面支持向商业化的迈进”，其最终目标是创建新的业务。

三菱日联的另一个特点是，它正在进行脱胎换骨的文化改革。它的思维方式已经从“做到万无一失，不许失败，不苛责机会损失”转变为强调“重视速度，鼓励挑战，从失败中学习”等。由此也能看出三菱日联“从企业的内核进行数字化”的决心。

物竞天择，适者生存

最后，我想指出的是，三菱日联总裁平野信行先生在谈到数字化转型时常说的一句名言，那就是“要积极竞食”。这里面的“竞食”是指现有事业和新事业互相蚕食的意思。在创新理论中，“创新困境”被认为是企业颠覆性创新的最大障碍。

在美国，“最强大的金融颠覆者”亚马逊的首席执行官贝佐斯也敏锐地捕捉到了这种“创新困境”。亚马逊作为一家巨头企业，却仍然在尝试以颠覆性创新者的身份取得成功，而助其成功的原因之一便是贝佐斯毫不犹豫地蚕食了现有业务。

Kindle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亚马逊是一家以互联网书店起家的公司，所以电子书有可能与之形成竞争关系。但是，贝佐斯将时任图书部门主管调到了数字化部门，并对他说道：“接下来你的工作是打破你一直在做的事，希望你能夺走所有纸质书商的工作。”

一般人总是因为害怕现有事业被破坏而不敢大胆地制订计划，而三菱日联的总裁平野先生反倒在提倡“竞食论”，试图像亚马逊一样打破“创新困境”。外部有传言称，关于银行与信托的合并在三菱日联整个集团内部引起了分歧。但我认为这正是平野先生从长远的大胆展望中逆算金融机构的运营得到的行动。

银行自身正处在被破坏的巨大过渡期，在此期间不能缺少强有力的领导者，因此用相同的逻辑分析龟泽的任命才是正确的方式。

显然，银行不变身为科技公司就无法生存，因此下一代领导者对企业将采取重大改革措施也就不足为奇了。大型银行所需的数字化转型不仅是系统化、技术策略乃至经营策略，还需要通过数字化转型来颠覆自己。正因为如此，作为整个日本大银行的试金石，三菱日联的竞食价值绝对不可忽视。

瑞穗金融集团：积极与有潜力的科技公司合作

两年前，瑞穗金融集团在2018年的招聘会上曾表示：“希望能遇到不像瑞穗的人。”此举旨在招募创新型人才，打破旧态依然的金融机构特有的“以不失败为优先的保守文化”。在“从企业的内核变革”的数字化转型过程中，人才的更新也是不可缺少的。

瑞穗金融集团的官方网站上有一篇题为《积极开展金融创新》的文章，刊载了以下信息：

“作为大银行，我们已经积累了客户基础、信息基础和金融知识与技术方面的优势，但在革新创造、尖端技术和鉴别能力方面却并非稳如磐石。因此，我们将与这些领域的领军供应商以及金融科技公司合作，努力创建新业务，为客户提供更加优质便捷的服务，树立良好的品牌形象。”

2015年7月，瑞穗成立了“创业项目组”，旨在通过集团内部的横向合作创建新业务。2017年4月，瑞穗又设立了首席数字创新执行官，专门负责管理数字化创新业务，并将创业项目组编入数字化创新部，以此来推进跨组织界限的数字化。

通过引进移动计算稳步取得成果

让我们来看看具体的对策吧。

各项业务的运营效率不断提高。比如，瑞穗银行自2019年开始引入手写支票的读取和输入自动化系统，该系统是由瑞穗银行资助的新金融科技公司Blue Lab和IT咨询公司Sigmaxis联合开发的，在实证实验中，可实现80%支票处理的自动化。而且瑞穗金融集团正在扩大提供银行、信托和证券一体化服务的新分支机构，以削减传统分支机构的数量。

同时，客户接触点多样化与客户体验的改善也迫在眉睫。瑞穗金融集团于2017年10月在“瑞穗Direct”应用程序中导入了人脸识别功能，2018年春天开始推出智能手机支付的“Smart Debit”以及可以使用Smart Debit的智能手机支付应用程序“瑞穗Wallet”，因为不是信用卡而是从银行账户自动充值，所以支付的同时就完成了扣款。另外，2018年8月，瑞穗金融集团与JR东日本

铁道公司合作发行了“瑞穗suica”，这个也可以从瑞穗银行账户自动充值。

通过这些努力，瑞穗银行已经连续8年荣获日本国内行业团体移动计算推进协会（MCPC）大奖，该奖项旨在表彰在引入移动计算构建复杂系统方面取得杰出成就的公司或组织。

当被问及瑞穗银行的移动战略时，个人营销推广部数字渠道研发团队的西本聪说道：“我们经常看到各种对比QR和NFC的分析表，或是比较加盟手续费3%与1%的分析报告，但这些都不是来自顾客的视点。虽说考虑加盟商很重要，但是不论加盟店变得多么方便，如果没有顾客使用，那么服务本身也就没有任何意义。不是哪个好哪个坏，而是以客户为中心，思考如何提高客户体验价值才是关键。”

“达成无现金化，不仅可以节约8兆日元的成本，同时还可以削减ATM机的数量。为了实现这一愿望，首先要做的就是让用户可以方便地使用，一旦便利性提高了，那么利益的增加和成本的下降也会随之而来。也就是说，在转型过程中必须要普及并促进的，不是以银行或业界为中心的服务，而是提高顾客体验。因此，不要总考虑‘选NFC还是QR’，或是‘如果换成QR，加盟手续费会降低’，而是要思考‘即使星巴克很贵，为什么大家却依然购买’，我认为顾客体验非常重要。”

西本聪的声明强调了客户体验的重要性而不是银行的便利性，这是值得注意的一个信号，表明他真正意识到现有金融机构正在面临的挑战。

通过人工智能计算信用评分，进行贷款

通过与金融科技合作，瑞穗金融集团也在积极促进开放式创新。其中一个代表例子是2016年11月，瑞穗银行与软银共同成立的J.Score株式会社。想要贷款的客户可以通过回答问题提供数据，然后AI会基于此数据计算个人信用分数后发放贷款，而且所有流程都可在手机上完成。业务开展才半年，贷款额已达35亿日元，整体运营良好。

2017年6月瑞穗金融集团与WiL株式会社等共同建立了推进新一代商业模式创造的蓝色实验室（Blue Lab）株式会社，来开展支付平台的构建、AI和大数据活用的软件开发等业务。

瑞穗的网上银行利用LINE提供余额查询，利用Money Forward提供资金管理，利用Money Tree家庭账簿应用程序提供“终身存折”等金融服务；还可以使用Nest Egg提供的Finbee，这是一个与银行账户关联的自动储蓄应用程序。此外，资产管理机器人顾问“Smart Folio”根据客户对风险的承受能力，为客户提供最适合的投资组合方案。

2018年，瑞穗金融集团宣布与LINE联手创立LINE银行，初步定于2020年对外营业。对于新兴企业LINE来说，大银行拥有的信赖和安心可以助其强化金融服务，而对于瑞穗，可以看出其通过合作想要获取LINE的数字原生代用户的企图。

三井住友金融集团：致力于打造开放式创新平台

三井住友金融集团和三井住友银行共同成立了“IT创新促进部”，该部门被认为是三井住友金融集团的创新中心，旨在于整个集团范围内利用IT加强创新。

具体举措包括以下内容：

2015年三井住友银行与GMO合作成立了三井住友金融 GMO Payment，开始了支付代理业务；2017年又与NTT 数据等公司携手创立了提供生物识别平台的Polarify，并开发出一款基于面部、手指、声音等生物信息进行身份认证的应用程序。此外，三井住友银行还正在使用区块链、人工智能和物联网等技术进行实证实验。

三井住友金融集团正在倾全力打造产生开放式创新的平台。在海外，向硅谷派遣要员，加强与先进的风险企业和IT供应商的联系。同时，通过与全球规模的风险资本即插即用（PnP）联合，加深了与卓越风险公司之间的战略合作。

在日本国内也是一样，与风险公司联合举办了开放式创新创业大赛、小型编程比赛、基于金融API的编程马拉松等一系列活动。

2017年9月，作为开放式创新的据点，三井住友金融集团在东京都涩谷区开设了“Hoops Link Tokyo”。根据对三井住友金融集团的建议以及互联网上的信息，初创企业、市政当局、大学以及大型公司等都可以怀揣着自己的构想来此开展协作。此外，IT创新促进部的成员将常驻该据点，定期举办加速器项目比赛、研讨会和小型编程比赛等活动。

三井住友金融集团对分支机构的改革也在进行中，计划将目前约430家分支机构，在2020年3月之前打造成“下一代新型分支机构”，一方面通过自助服务和自动化来减少窗口业务，另一方面也要最大限度地满足来店咨询资产运营和贷款的顾客需求。2018年2月，三井住友金融集团宣布将其与微软共同开发的对话型自动应答系统应用到集团各公司。

日本的大银行还剩下什么

自2018年以来，金融颠覆者已经全面开启二维码支付业务，而且在日本去现金化的时机也越来越成熟。因此，网上关于已经不需要银行或关于银行消亡的言论也在不断增加，但大家也要注意到其实银行并非只进行支付业务。想要了解金融颠覆者的兴起带给现有银行的影响，就有必要好好分析一下银行的业务结构。在此，我想分析一下日本的银行将失去什么以及留下什么。

应该死守的大企业法人金融

银行最终必须要保留的“真正遗产”，而且需要再进一步加强的是信赖、信用和专业性。我认为，这些发挥优势的东西将会被保留下来，而不能发挥优势的东西很可能会消失。

让我们分别来看：

首先，客户是法人还是个人的区别。法人交易比个人交易相对容易留存，而法人交易中大企业交易也比中小企业交易更容易留存。

例如，需要高度专业性的大企业法人金融交易是大银行必须坚守到最后的业务。在个人交易上，面向富裕阶层的个人交易业务容易保留，而面向普通阶层的个人交易会受到金融颠覆者的巨大影响。这是因为金融颠覆者更擅长为一般个人提供优质的客户体验。

其次，从业务划分来看，存款、贷款、汇兑这三大业务中，受影响最大的可能是汇兑（结算）业务。金融颠覆者势必会更加积极地开展类似存款的服务，但目前只有符合一定条件的金融机构才能依据银行法提供存款服务。在贷款方面，大企业交易可能会留存，而中小企业交易更容易受到金融颠覆者的影响。

失去汇款手续费的收入

关于当下的焦点“支付”，虽然有很多方式，在此我想谈一谈时下热门的二维码支付。如图10-1所示，二维码支付位于阶层结构的顶部，对顾客而言是最直接的支付手段，该支付主要由信用卡、银行账户转账、现金充值三种方式支撑。



图10-1　二维码结算的层级结构

其中，在前两种方式中，尽管银行账户最终将成为支付的基础设施，但也不能忽视信用卡支付。虽然许多人认为，“如果智能手机上二维码支付普及，就不再需要信用卡了”，但实际上，这种支付在很大程度上还是与信用卡关联使用的。

另外，在支付服务中，几年后银行受到巨大影响的将是汇款。那时个人之间通过智能手机进行汇款将成为普遍现象，这可能会给银行带来极大的影响。利用二维码支付应用程序，会员之间的汇款只需要简单的操作即可完成，而且不需要手续费。

个人之间通过智能手机的汇款可以普及到什么程度取决于网络效应的作用方式。与SNS和手机普及时一样，当二维码支付的用户增加到一定规模时，可能便会一下子普及开来。这将可能会导致银行失去汇款手续费这一巨大的收入来源。

在此需要指出的是，银行为二维码支付提供的支付基础设施部分有可能会被留存，但是客户接触点由二维码支付承担。正如在前面指出的那样，从支付这一客户接触点出发开展各类业务的可能性较大，各家公司也以此为目标，开始了激烈的竞争。

基于上述状况，银行巨头瑞穗金融集团率先发行了数字货币“J-coin”，并推出利用智能手机进行二维码支付的“J-coin pay”。从银行账户到应用程序的充值以及反向操作转回账户，甚至用户之间的汇款都是免费的，这对瑞穗金融集团来说是一个巨大的优势。该支付联盟约有60家银行加入，预计今后会产生较大的影响力，但银行方面需要关注的是如何将二维码支付这一客户接触点与其他服务相结合，也就是现今阿里巴巴和腾讯已经实现了的收益模式。

科技公司通过将二维码支付引入自己的业务范畴来实现盈利，但如果不能制订出一个长期计划，则可能会导致支付带来的盈利减少。大家也都清楚，二维码支付本身在短期内是一项亏损业务，而且银行正处于向服务型公司转型的巨大变革中。后面，我将引用同样的分类方法对2025年新一代金融场景进行预测。

在介绍二维码支付的最后部分，我想提一下法律规章制度，这也是导致不同公司提供同样的服务，但却出现不同功能的主要原因。

二维码支付的现金充值需要预付款支付方式的发行者进行注册。虽然这个手续不用审查，只需要注册，但是要求业者支付50%以上的托管金。

为了链接到信用卡，需要注册成为负责处理信用卡卡号等正规经营者，而且这项注册需要经济产业省的审查，门槛很高。

银行账户自动扣款要求经营者注册电子支付代理商，这个门槛更高。另外，为了提取存储在支付应用程序等账户中的余额，需要在银行业或资金转移业进行登记，后者的情况还会要求100%以上的托管金。

支付是金融交易的核心，因此，在给客户提供高便利性服务的同时，根据银行法和资金支付法等对企业方也设定了较高的门槛。

对“理所当然”的认识有很大的差距

在大银行已经开展的“未来分支机构”中，我们可以看到银行真正保留下来的传统精华，就只有“分支机构、人员和系统”。

同时作为实体商店的“未来分支机构”，金融颠覆者以数字银行为核心，向外拓展业务。

不知大银行能否真正意识到，意图颠覆自己的科技公司所拥有的最大武器就是客户至上主义和客户体验，对此我认为它们很可能至今都执迷不悟。

形式上的模仿并非难事，不管是手机支付应用程序方面，还是开放式创新方面，大银行都在积极改革。但是，问题在于大银行能否做到科技公司所重视的价值观革新。抱着这个疑问，我能感觉到互联网企业的“理所当然”和大银行的“理所当然”之间还有很大的差距。

如果想与互联网企业一样贯彻客户至上的原则，那就必须要暂时放下作为大银行的骄傲，这可能还会伴随痛苦的自我否定。

现实中有些银行已经做到了，它就是新加坡的DBS银行。在下一章中，我们将重点讨论星展银行。

海外业务是大银行最大的风险因素

在此，我想介绍一下大银行的风险因素。本来应该从整体上论述经营战略的各个方面，但由于篇幅有限，我将重点放在了大银行的数字化转型战略方面。因此，接下来我也是从该战略上对大银行面临的风险因素进行简要说明。

亚洲金融危机的实际经验

1997年7月亚洲金融危机在泰国爆发。当时我正在三菱UFJ银行的新加坡办事处工作，该办事处负责东南亚地区的投资银行业务，例如银团贷款、项目融资、债券发行和并购咨询等业务。我一周的一半时间在新加坡，另一半时间在东南亚其他地区出差。

这场始于泰国的亚洲金融危机随后在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菲律宾、韩国和其他地区相继爆发，其中泰国、印度尼西亚、韩国受到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严格管制，形势十分严峻。

日本也非隔岸观火，面向亚洲其他国家、地区的贷款债券受影响而成为不良债券，又恰逢政府采取了财政紧缩的政策，于是在1998年爆发了金融危机。

在新加坡，我目睹了路透社等金融板块显示的其他货币对美元汇率每时每刻都在下跌的状况，至今我都还清晰记得。

当时三菱UFJ银行作为主要牵头人负责向印度尼西亚最大的制药公司提供银团贷款。在刚完成那个项目想松口气的时候，就遇到了亚洲金融危机。后来，那个制药公司也因拖欠债务，在年末召开了大规模的债权人集会，这也是印象深刻的情景之一。

在印度尼西亚，从秋天开始大家就在议论雅加达即将发生暴乱的风险，而实际上1998年就发生了暴乱。

当时，印度尼西亚在接受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支援之前，曾向中东国家请求过援助，这件事在日本鲜少被报道。最后由于美国介入，印度尼西亚接受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支援。

可能引发新的危机

那么，与亚洲金融危机的时候相比，现在的经济环境如何呢？从经常项目赤字的规模、外汇储备的规模、经济增长率、通货膨胀等代表国家脆弱性的经济指标来看，包括印度尼西亚在内的绝大部分国家都有了很大的改善。

但是，对于亲身经历过亚洲金融危机的我来说，2018年下半年印度尼西亚法定货币卢比下跌的动向引起了我的注意，这也是因为印度尼西亚近年来经常项目赤字不断扩大，很容易成为对冲基金的目标。另一个担忧是，在中美战争中，印度尼西亚已经被深深嵌入中美双方的供应链之中。

如前所述，与雷曼冲击后缩小海外业务的欧洲势力相比，日本的大银行扩大了海外业务。如果经济、政治时局动荡肯定会立即引发新兴国家的不安。如果是这样的话，全球受影响最大的金融机构很可能会是近年来积极扩大新兴国家融资的日本大银行。

因此，现在我们需要关注新兴国家的资金流出、银行危机、信贷紧缩、流动性危机以及经济危机等指标的变化。

我们需要认真思考日本能做什么，并付诸实践，这也是我想通过自己过去的亲身经历要传达的信息。

绝不能输的战斗

在第11章的最后，我比较了日本三大银行与欧美大银行以及星展银行的各项财务指标。从中可以看出，对日本三大银行的市场评价都很低，而且PBR（股价净资产比率）仅维持在0.5左右的水平。

定性和定量分析表明，这三大银行在盈利能力、资本充足率和回报股东政策等方面与国外大银行相比处于劣势。

另外，在日本，营业收入、纯利润等收益的绝对值受关注的倾向较强，而美国银行则不同，例如摩根大通的结算中强调各种收益率和红利比率等，这种倾向被认为是日本和美国之间本来就有的区别。美国银行如果不通过中央银行的压力测试的话就不能分红和购买自家公司股票。基于这样的背景，从比较分析中可以看出，执行这些举措的美国银行，在回报股东政策方面获得了好评。

在这些区别中，最值得注意的是，对日本三大银行的股票给予的低评价。

我将其视作“日本折扣”，以零利率为代表的日本金融政策导致的严酷事业环境、日本市场的前景、不得不依赖海外市场的事业结构，所有这些都造成了收益上不稳定的商业模式。

支撑日本的使命

这三大银行的业务受法规限制，再加上严酷的外部环境可能会造成其利润的下滑。尽管如此，三大银行仍肩负着日本金融发展，通过执行金融中介功能和信用创造功能支撑日本经济的重大使命。从历史上看，金融危机注定会再次爆发，所以必须加强金融法规和资本监管以预防危机。之所以需要金融监管，是因为这对日本经济和国民而言是必要的。

正因为如此，围绕着新一代金融霸权的战斗，无论是对大银行，还是对日本人来说，都是“绝不能输的战斗”，在金融监管下的现有金融机构必须要取得胜利。

因此，我们有必要好好效仿一下全球最佳数字银行——星展银行。

第11章　“全球最佳数字银行”——星展银行

“自我毁灭”的重生

新加坡有一家星展银行，吸引了全球金融界人士的关注。

星展银行闻名于世的契机，来源于金融专业信息期刊《欧洲货币》（*Euro Money*）对其的高度评价，该行分别于2016年和2018年两次荣获《欧洲货币》授予的“全球最佳数字银行”的称号。此外，在《环球金融》（*Global Finance*）杂志评选的“2018年全球最佳银行”中，星展银行被评为亚洲首个“全球最佳银行”。

星展银行原名“Development Bank of Singapore（新加坡发展银行）”，但现在开始有了“Digital Bank of Singapore（新加坡数字银行）”的含义。

通过盈利能力来量化数字化

星展银行战胜高盛和摩根大通等致力于数字化变革的著名银行，被选为“全球最佳数字银行”的理由是什么？让我们来看看《欧洲货币》杂志对星展银行做出的评价。

“星展银行在2017年11月做了一件不怎么起眼，但却极具创新的事情，那就是不仅仅单纯地谈论数字化战略，而是定量展现了数字化对盈利的意义。根据该量化分析，相较于到访分行的传统客户，在星展银行进行数字化交易的客户所产生的营业额是其两倍，拥有的存贷款金额也更多。而且获得数字化交易客户的成本比获得传统客户的成本要低出57%，然而数字化交易的客户人数是传统客户的16倍，且都是自发性交易。除此之外，传统客户交易可以赚取

19％的净资产收益率，利用数字化的客户交易可以赚取高达27％的净资产收益率。实际上，大家对首席执行官高博德（Piyush Gupta）评价很高，认为他是星展银行的‘杰夫·贝佐斯’，再加上这些量化事实的披露，引发市场分析师对星展银行的评价不断上升，星展银行当天的股价就上涨了4%，这足以证明数字化的强大力量。首席执行官高博德坚持认为，与破坏对峙的最佳方法是先进行‘自我毁灭’，但是在数字化的道路上，最重要的是如何赚取利润，以及知道为什么能带来利润。2017年，星展银行的市值增长了44％，而且它的股票已经开始被市场当作科技公司的股票进行评价。”

不惜与现有事业相争

就像《欧洲货币》所说的“不太起眼”那样，星展银行倡导的数字化转型乍看之下，会给人一种与美国银行以及日本银行的竞争对手相同的印象。

然而星展银行在世界上首次用数字证明了其数字化转型的成果，而且首席执行官高博德口中的“破坏”这一关键词，也暗示了为什么星展银行的数字化变革能够刷新整个企业，做到从根本上彻底革新。

作为现有金融机构，美国银行和日本大银行正处于尝试“自我否定”的阶段，如前所述，三菱UFJ银行高层领导表示“不要害怕竞食”，并表达出哪怕是在现有业务和新业务之间也要不惜互相竞食的态度。但是，它们的变革还在进行当中，而星展银行已经完成了超越自我否定的“自我毁灭”阶段，目前已处于脱胎换骨成为数字银行的阶段。

公司核心业务的数字化

“全球最佳的数字银行”——星展银行究竟是个什么样的银行？

星展银行成立于1968年，起初是新加坡政府的开发银行，现在已经在东南亚地区、中国地区和南亚地区等18个国家和地区设立了280多个网点，集团总员工约为24,000人。在控股公司星展集团控股的领导下，星展银行业务由新加坡和印度的分行以及分布在中国各地区和印度尼西亚的当地公司来负责展开。星展集团控股已经在新加坡证券交易所上市，市值约为642亿新加坡元（约50,000亿日元），新加坡政府拥有的淡马锡控股和其他金融机构等20家投资公司持有星展银行90％以上的股份。

如果看具体业务内容的话，星展银行涵盖了零售银行、资产管理、私人银行、中小企业银行、公司银行、证券经纪和保险等广泛的业务领域。

就规模而言，星展银行是东南亚最大的商业银行，该公司拥有企业客户超过200万家，个人客户超过880万个，总资产达5,180亿新加坡元（约40万亿日元），营业收入为119亿新加坡元（约9,000亿日元），纯利润为43.9亿新加坡元（约3,300亿日元），存款额为3,736亿新加坡元（约300,000亿日元）。

管理层提出的三个口号

看上去如此优秀的星展银行，自2009年开始效仿科技公司进行数字化转型。引领这场变革的是2009年加入公司的首席执行官高博德和前一年加入公司的首席信息官大卫·格莱德希尔（David Gledhill）。

星展银行在进行数字化转型时，提出了三个让人印象深刻的口号。

“公司核心业务的数字化！”

“将自己置身于客户旅程！”

“转型成一家拥有2.2万人的初创企业！”

“公司核心业务数字化！”意味着并非停留在提供在线服务和移动服务等前端的表面数字化，更重要的是对后端的业务应用程序、软件、中间件、硬件和基础设施，甚至管理层和员工的思维方式以及文化等进行全面审视。

“将自己置身于客户旅程！”是指重新审视自己作为银行的存在意义，并表达自己在新一代金融业中将扮演什么角色的看法。简而言之，这意味着未来的业务将从以银行为导向的交易过程（例如存款、贷款、汇兑），向以客户为中心，包括关注每个客户的生活方式、生活习惯以及满足客户需求的转变。星展银行还提出了“简单（simple）、无缝（seamless）、无形（invisible）”的概念，从顾客的角度看，让其享受到简单且无缝的服务，将感觉不到星展银行的存在。

“转型成一家拥有2.2万人的初创企业！”为了将公司的核心业务数字化，必须改变管理层和员工的思维方式，也就是从交易执行者转变为客户服务者。为此，星展银行通过公司内部编程马拉松、投资或收购初创公司来培养职员创新的思维方式和应对策略。

将自己置身于客户旅程，让银行变得隐形

在推进以上数字化转型时，到目前为止有两个阶段需要过渡，第一阶段是从2009年到2014年，第二阶段是从2014年开始。

第一阶段是为建立数字银行奠定基础的阶段。为的是消除银行系统的脆弱性，星展银行不仅增设了数据中心，还设立了安全操作系统和监控中心。而且星展银行一直在积极摆脱对工程和技术外包的依赖，现已实现85％的内部生产。另外，针对每个渠道、产品与服务、启动程序（信息管理系统等内部系统和基础设施），出售不必要的应用程序，购买需要的应用程序，以便搭建2014年之前成为数字银行的基础设施和平台。

第二阶段是整体构筑数字银行的阶段。首先以“从项目型向平台型转变”“组建敏捷的开发团队”等为主题推进数字化改革，同时贯彻“成为云原生”“加速产品和服务的市场投入”“通过API提高生态系统的性能”“基于数据挖掘、客户计算、测定和实验，贯彻执行顾客至上主义”“投资人与技术”等具体目标。

2018年5月，星展银行采用了“感受不到银行的存在，尽情享受生活”的理念，这是星展银行10年来一直提倡的“与亚洲共生，与亚洲共舞”的进化产物，明确展示了通过“自我毁灭”成为“隐形银行”，与顾客融为一体。

最强城市国家——新加坡的宿命

星展银行究竟为什么要进行数字化转型呢？这源于首席执行官高博德等经营团队与新加坡这个国家本身所具有的强烈危机感。

高博德对《欧洲货币》杂志说：“与金融颠覆者竞争的最佳方法是，先于他们进行‘自我毁灭’。”他列举了在主战场之一的中国，阿里巴巴和腾讯这些金融颠覆者的崛起。随之他又断言：“如果不主动数字化，我们将必死无疑。”格莱德希尔也说：“如果不早点行动，我们的功能就会被取代，变得完全没有存在的必要。”他们都表露出一种让人难以置信的强烈危机感。

在高博德担任首席执行官期间，星展银行的经营状况并不差，营业收入年平均增长率在7%以上，当期纯利润的年平均增长率在13%以上，可以说整体运营良好。但是，如果考虑到新加坡这个国家身处的环境，就该明白星展银行具有危机感是正常的，“必须自我毁灭”，这也是新加坡这个国家本身所传递出的信息。

不能寄希望于国内市场

众所周知，新加坡是个城市国家，国土面积约720平方公里，相当于东京23个区，人口仅560万人左右，所以不可能寄希望于扩大国内市场，而且新加坡几乎没有自然资源。但是，新加坡的经济发展水平令人瞩目，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约为6万美元，超过了日本。

这种快速增长的原因在哪里呢？其一便是发挥东南亚中心这一地理优势的“贸易立国”政策。在政府支持下，作为海外贸易的交通枢纽，新加坡自过去就积极从海外引进产业、企业和技术。

换言之，不能寄希望于国内市场的新加坡，是“必须要进军海外才能生存的国家”。因此，新加坡注定要对国外市场的动向和技术的发展趋势保持高灵敏度。

新加坡总理本人建议将“破坏”作为国策

新加坡总理李显龙在2016年8月的国庆集会政策演讲中提到，新加坡面临的经济挑战是科技进步带来的“破坏”。他以出租车行业出现的强大竞争对手优步和Grab为例，宣布要想与时俱进，就要将“破坏”纳入政策。优步进军新加坡市场，已然将出租车行业推向淘汰的边缘，并且新加坡还是全球第一个修改交通政策和法规来建设自动驾驶汽车（AV）的国家。

“一方面，对于高峰时段利用私家车通勤的人，每年征收1.5万美元的附加税，同时废除了‘汽车必须由人驾驶’的规定。另一方面，在住宅区的开发方面也做了一些规定，例如缩小道路宽度、提高道沿高度和减少停车场等，促使建设有利于AV、不利于私家车的智慧城市。”

你知道吗？令人惊讶的是，新加坡这个国家本身就已将“自我毁灭”作为国策，而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正是禁止优步在内所有共享乘车的日本。

与中国金融颠覆者的正面对抗

同一时期，中国也出现了“金融颠覆者”，它们正在破坏对星展银行来说十分重要的亚洲市场，而新加坡也在其内。

支付宝是阿里巴巴推出的一款支付应用程序，每年活跃用户数高达8.7亿人次。阿里巴巴以支付宝为切入点，捆绑了阿里巴巴提供的电子商务、零售、物流、媒体、娱乐等涵盖生活各个方面的服务，并且正在拓展为一款生活服务平台。而腾讯则以通信应用程序“微信”为入口，不断强化并扩大在线游戏、媒体、支付、公共事业、零售等多元化生活服务平台。微信每月约有10.57亿名活跃用户和1.5亿名付费内容的订购者。

上述这些金融颠覆者的共同特点是，它们已经复制了银行业务，拥有庞大的活跃用户量，而且由于主营业务不是金融，所以不需要通过金融服务本身赚取利润。但就是这些就已对现有金融机构构成了巨大的威胁。

“如果不主动数字化，我们将必死无疑。”

“如果不早点行动，我们的功能就会被取代，变得完全没有存在的必要。”

这不仅仅是对星展银行而言的。

在此我想强调的是，星展银行的危机感已经超过了竞争对手。对于以新加坡和中国香港地区为主战场的星展银行来说，中国的阿里巴巴和腾讯在中国和亚洲其他地区的崛起，已经是迫在眉睫的威胁。高博德等管理层感受到的危机并不夸张。星展银行之所以选择“自我毁灭”，正是因为“如果不这么做就无法生存”。

读到这里的人也都知道，在当下社会声称数字化转型的金融机构并不少见，但是，星展银行并没有停留在数字化表面，而是在绝境之中，从根本上更加彻底地快速完成了数字化转型。这正是星展银行的独特之处。

“自我毁灭”的议程

星展银行为每个业务部门量身定制了“自我毁灭”的计划（图11-1）。对于重点业务部门，比如占2017年全年主营业务收入44%的新加坡、中国香港地区的零售和中小企业交易，执行“在被毁灭之前先进行自我毁灭”。对于占全年主营业务收入4％的印度、印度尼西亚这些新兴市场的零售和中小企业交易业务，执行的是“销毁现有银行”。对于剩下的占全年主营业务收入52%的中国其他地区的零售，以及私人银行、企业银行等其他业务，星展银行表示将“以确保盈利性为目的进行数字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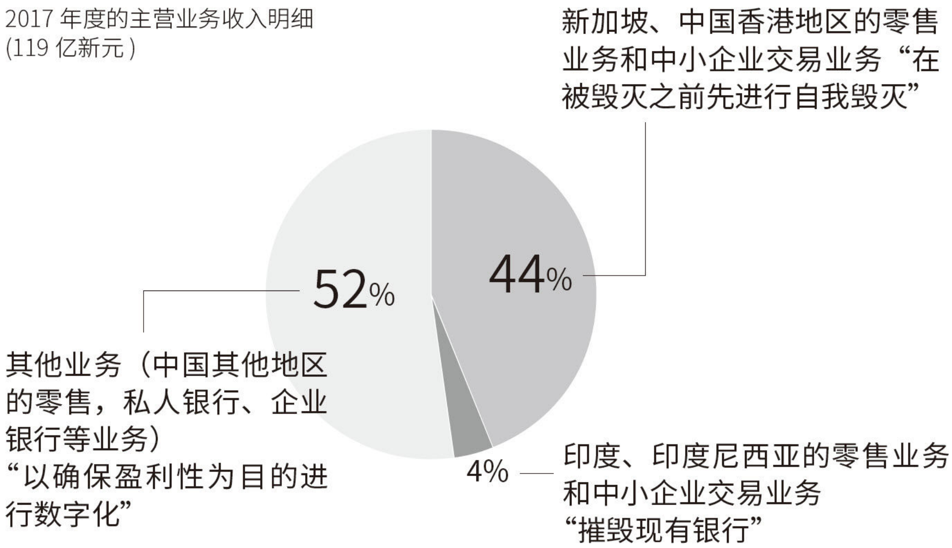


图11-1　星展银行的“自我毁灭”计划

注：资料数据来源于*Investor day* 2017。

基于上述安排，星展银行将以下四个支柱作为数字化转型的核心来展开革新。

成为云原生

在星展银行的数字化转型过程中，首先是“成为云原生”。

格莱德希尔说：“不仅仅是表面的‘口红’，连系统的核心也要实现云化。”除了技术的内化生产以外，借助亚马逊云服务进行云化也是一个重要的经营课题。

这是因为原生云可以削减庞大的运营成本。星展银行通过云技术，削减了硬件、软件和管理部门80%以上的人工费用，还加强了整个银行系统的弹性和可扩展性，提高了银行的信赖度。当前，包括硬件、平台软件、应用程序在内的所有业务部门都在努力成为云原生，截至2017年年末，66%的应用程序已经转移到云中，目标是到2018年将所有IT系统中的50％进行云化。另外，在2019年上半年，通过云化将使数据中心设备减少75％。

使用API改善生态系统性能

在星展银行的数字化转型中，第二大支柱是“通过API改善生态系统性能”。

这里先卖个关子，稍后我会详细说明，开放API是星展银行构筑生态系统的关键，以便为客户提供优质的客户体验和顾客至上的服务。不过现在，星展银行通过与会计软件Xero和企业管理软件Tally合作等，利用200多个API与60多家企业达成了合作伙伴关系，共同构筑生态系统。

贯彻执行顾客至上主义

然后便是第三大支柱，即“基于数据挖掘、客户计算、测定和实验，贯彻执行顾客至上主义”，这是对客户接触点的数字化。

例如，在零售银行部门，在线完成开户是理所当然的事情。此外，该部门还开始提供或介绍汽车、房产、电器买卖、签署合约、支付的一站式交易场所，以及相当于支付宝和微信支付的移动支付系统“PayLah!”，无压力购物体验的“Foodster on FB Messenger”，通过手机应用程序确认孩子何时如何消费的“POSB Smart Buddy”等服务。同时星展零售银行也在致力于发展将离线银行和在线银行合二为一的分支机构“Click and Mortar”，努力创造出“就像去自己喜欢的咖啡店一样去银行”的新的客户体验。

另外，私人银行部门提供在线资产管理平台iWealth，在线金库和资金管理模拟平台Treasury Prism等服务。在公司银行部门中，不仅有在线公司银行平台DBS IDEAL，还有面向中小企业提供相关专业咨询和服务的网络社区“商务舱”等服务。

在印度，通过企业管理软件Tally与API的结合，星展银行构建了可以让Tally用户使用其服务的平台。Digibank是一家没有分支机构设备的智能手机银行，在印度和印度尼西亚地区提供零售银行业务，而且在印度已经获得了超过180万名客户。

在星展银行的最重点区域——新加坡和中国香港地区，开设实体分支机构的空间很小；面向中国和印度尼西亚的海外战略，也受到出资限制等因素影响。但是星展银行并没有从地理位置上扩大商圈，而是通过银行本身的数字化，试图超越这些限制条件。如果是数字银行的话，当地政府的相关规章制度也比较宽松，还有扩张的空间。

投资人员和技术

在星展银行的数字化转型中，第四大支柱是“对人员和技术的投资”，也就是强化人员和企业文化。

正如前面提到的口号所说“转型成一家拥有2.2万人的初创企业”一样，为了从根本上拥有创新的思维模式，星展银行做出了各种各样的努力，制定了“贯彻顾客至上主义”、“数据驱动”、“承担风险，挑战实验”、“敏捷型”以及“成为不断学习的企业”五大方针，并且正在陆续公布具体措施。

例如，星展银行设置了学习空间“DBS Academy”，与初创企业等共同推出了合作空间“DBS Asia X”，并且实施和运营了许多创新举措，包括数字思维编程马拉松、API编程马拉松、战略研讨会、客户旅程和每日创新简报等。此外，星展银行还充分提供了与初创公司合作的机会，以及提供甘道夫计划（Gandalf）、DBS Learn、Horizon Class和Tech Boot Camp等学习机会。

星展银行的革新不仅停留在技术和物理层面上，还包括基础设施以及客户接触点的产品和服务的革新，人员思维层面的彻底变革。

最重要的是，接连采取“破坏”措施的星展银行本身更像是一家科技公司，而不是一个金融机构。编程马拉松最初似乎是程序员、图形设计师、工程师等聚集在一起进行软件开发的比赛活动，但星展银行却引入这样的方式来加强企业文化。

格莱德希尔断言道：“为了转换商业思维，必须革新企业文化。”如果在还未改变思维方式的情况下进行业务转型，是一定不能扎根的。这就是星展银行只保留业务框架，必须彻底更换内部（思维定式）的原因，也就是将公司核心业务数字化。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将星展银行的数字化转型理解为后端、前端以及人员与企业文化的“三位一体”式变革。

甘道夫转型计划

星展银行在推进数字化转型时，作为参照物的并不是同行业的其他公司。

目标是成为像Google、Amazon、Netflix、Apple、LinkedIn和Facebook这样的大型科技公司，所以星展银行在这些大型科技公司的首字母（G•A•N•A•L•F）中加入了自己的首字母D，决意成为“G•A•N•D•A•L•F（甘道夫）”的一员。

大型科技公司有许多值得星展银行学习的地方，例如，Google的开放源码软件志向，Amazon的AWS上的云操作，基于Netflix数据的个人推荐，Apple的设计思维，LinkedIn的“继续成为学习社区”以及Facebook的“普及到全世界所有人”。

如果有一家银行可以提供与大型高科技公司相媲美的客户体验，还可以利用“大数据＋AI”进行“感知”的服务，确实很有吸引力。

甘道夫是电影《魔戒》（*The Lord of the Rings*）的主人公，也是托尔金（John Ronald Reuel Tolkien）所著的《魔戒故事》（*The Lord of the Rings*）中魔法师的名字，用魔法的力量将银行“变形”为科技公司，甘道夫正在传递这样的想法。

杰夫·贝佐斯如果有银行的话，他会怎么做

格莱德希尔表示，他从“如果亚马逊的贝佐斯从事银行业会怎么做？”的角度深入进行了思考，得出的答案正是三个口号，即“公司核心业务的数字化”、“将自己置身于客户旅程”，以及“转型成一家拥有2.2万人的初创企业”。

星展银行从金融颠覆者那里学到的最重要的是平台战略，尤其是“将自己置身于客户旅程”，正是杰夫·贝佐斯创业时记在餐巾纸上的亚马逊的商业模式。

亚马逊的商业模式是“增加产品种类，客户选择变多”→“客户满意度提升，累积客户经验价值”→“流量增加”→“卖家聚集”→“品种增加，客户选择变多”→“客户满意度上升，客户经验价值将会进一步累积”→“增加更多流量”……通过无限循环这样的成长周期，不断扩张亚马逊规模经济。这显示了“低成本结构”的前提和贝佐斯的理念，即“客户首先要求低价格、多选择的商品”。

图11-2显示了星展银行的商业模式，包括“获取客户”→“与客户交易”→“强化与客户的关系”一系列业务流程，而这些是由星展银行拥有的客户数据以及以此为基础开发的生态系统形成的。

星展银行的生态系统涵盖了存储、管理、处理客户数据的云银行系统，以及通过银行内部API和外部API（开放API）提供的产品与服务。扩大“客户数据+生态系统”，也就意味着“降低客户获取成本”“降低与客户的交易成本”“增加每位客户的销售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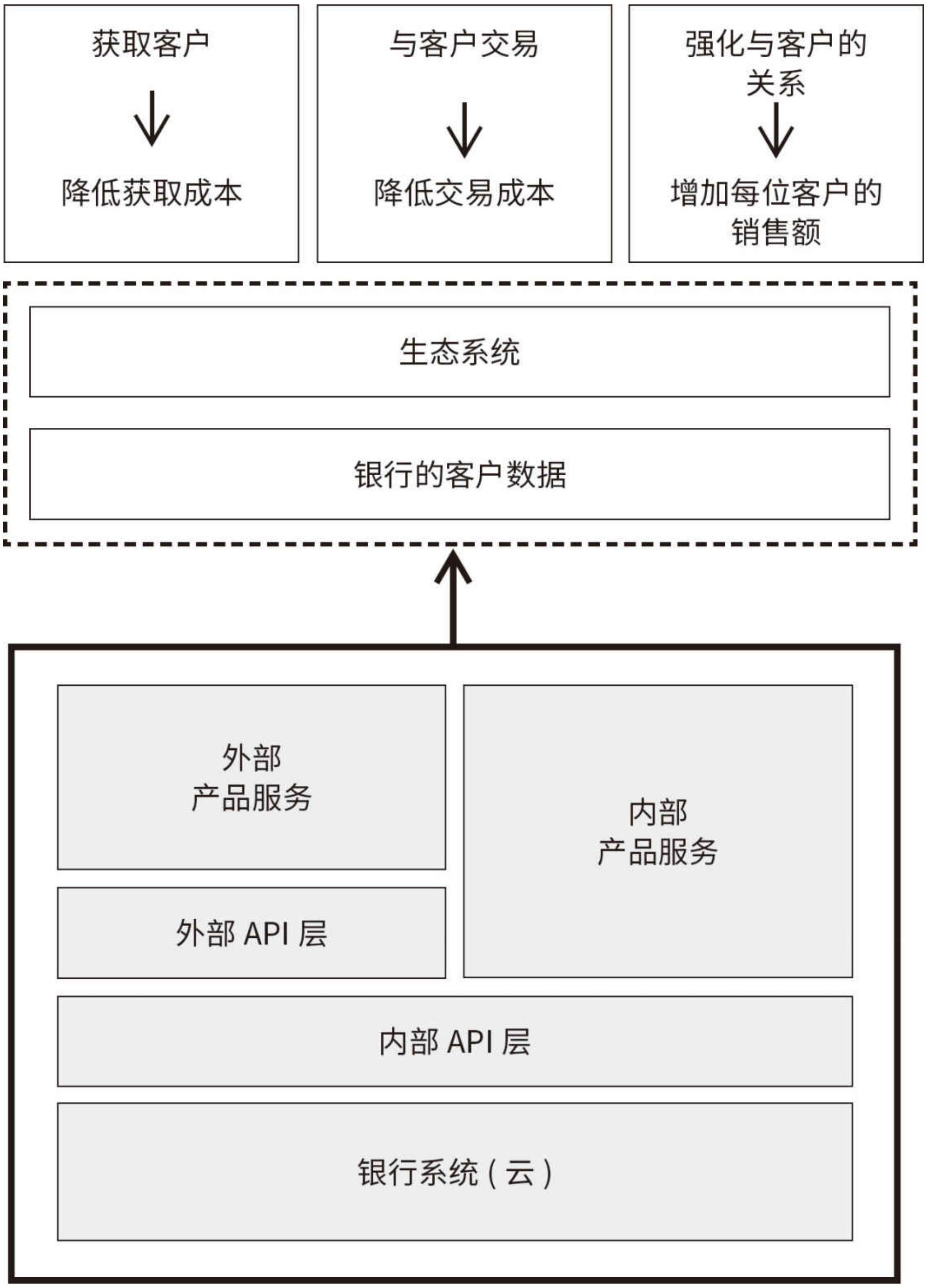


图11-2　星展银行的商业模式

注：数据资料来源于*Investor day* 2017。

通过对比亚马逊与星展银行的业务模式，我们可以看到二者之间的相似之处：以客户旅程为前提，与外部第三方共同构筑生态系统，使客户不仅可以享受金融服务，还能享受各种与生活相关的服务。服务的种类增加会提升客户满意度，以此累积客户的经验价值，这样一来流量就会增加，从而带来更多的第三方和运营商加入生态系统。为客户提供的服务种类和选择继续增加，进一步提升客户满意度，客户的经验价值也会进一步积累，这将进一步增加流量……

该业务模型的关键在于云原生实现的“低成本结构”和开放API构建的“生态系统”。

通过开放API创建“隐形银行”

接下来介绍一下开放API。除了星展银行之外，先进的金融机构也已经开始对外公开API，因为API具有构建生态系统或API经济的潜力。在日本，乐天正在推进开放API来扩张乐天生态系统。

扩大与升级金融服务的武器

API是应用程序编程接口的缩写，如前所述，它是指用于从另一个应用程序调用并使用某个应用程序的功能和管理数据的连接规范和机制，向其他公司公开称为开放API。公司内部与外部的服务通过API链接。开放API种类众多，包括向所有人开放的API（比如Google Maps）；在某些条款和规定下提供的API；向限定社区提供的API以及向分别签署合同的合作伙伴或合同当事方提供的API。

与金融相关的开放API包括“查询型API”，即允许外部第三方或运营商查询银行内部的客户账户等信息；以及第三方运营商直接向银行客户提供服务的“执行型API”。

执行型API可以扩展和发展金融服务，例如，通过银行的开放API，第三方运营商可以通过访问银行的客户数据来提供银行无法直接向客户提供的各种服务。这么做的结果就是，第三方运营商将获得更多的商机，银行客户将能够享受更多更便利的服务。

这对银行也有好处，通过与第三方运营商的合作，银行可以提高服务质量和改善客户体验，而且可以获得自身无法单独获取的有关客户的行为数据和位置数据，以便提供更加满足客户需求的服务。

执行型API正是星展银行与第三方运营商共同构筑生态系统，以“隐形银行”身份进入客户旅程的关键。在这里感觉不到星展银行的存在，实现了“感受不到银行的存在，享受生活”的愿景。

与麦当劳、Grab等60多家公司达成合作伙伴关系

说起星展银行的开放API，其中的代表例子是星展银行与会计软件Xero和企业管理软件Tally的合作。Xero是施和公司为全球158万家中小企业提供服务的会计软件，Tally是Tally Solutions公司在以印度为首的100多个国家为800万家以上中小企业提供服务的企业管理软件。Xero或Tally的账户通过在线企业银行平台DBS IDEAL与星展的银行账户自动链接，可以及时匹配中小企业的出纳信息和银行账户信息，使用户享受到便利的支付服务。

在星展银行的官方网站上，也有介绍其他开放API的例子。比如利用星展信用卡累积的积分可充当在第三方运营商进行购买的积分返还API；住宅购买能力的事前审查和向星展银行申请住房贷款等住宅购买支持API；通过第三方运营商的ATM机从星展银行账户提取资金的提款API；以移动支付系统“PayLah！”为代表，用于支

付、存款、交易分析以及设置使用金额上限的支付API；以及提供外汇比率和星展银行普通信息等信息供应API。

在星展银行中，这样的API目前已经超过200个，而且已经与麦当劳、Grab、Foodpanda和soCash等60多家企业达成战略合作。

如果游戏规则改变，也会自我改变

星展银行的开放API是令其金融服务“隐形”的绝佳工具，可以大幅度提升客户体验。

我在前文指出，银行的三大业务，即存款、贷款、汇兑已经可以复制。而且在“金融颠覆者”垂直整合金融服务的趋势下，金融也需要“理所当然”。所谓的“理所当然”是指“方便”、“不麻烦，不花时间”、“易懂”、“友好”、“愉快”以及“让人感觉不到×× 的存在”。

星展银行的数字化转型是指，在与新金融趋势对峙的同时，达成新的“理所当然”。也就是破坏现有金融机构的“理所当然”，比如“银行不方便，很难理解”，“在午餐时间，不仅是银行窗口，就连ATM机前面也要排队”等，再创造一些新的“理所当然”。

以亚马逊为代表的科技公司，已经将科技公司的“理所当然”带进了金融行业，将客户体验和“与客户保持持续且良好关系”作为游戏规则，淘汰不能遵循相同规则的传统玩家。作为现有金融机构的星展银行采取了同样的游戏规则，进行“自我毁灭”，这也证明了星展银行已经成功转型为一家科技公司。

如果游戏规则改变了，那么公司本身也应该随之改变。为此，“自我毁灭”是不可避免的，这也是从星展银行的数字化转型中学

到的教训。

成为金融颠覆者

被称为“隐形银行”的星展银行，已经成为把银行原本应该发挥的功能发挥出来的平台，无缝提供着金融中介、信用创造、结算等银行理应提供的服务。

亚马逊、阿里巴巴和腾讯等金融颠覆者的威胁在于，它们会将客户的商流、物流和资金流整合到其搭建的生活服务平台中，例如电子商务和社交通信等；并利用在那里获得的大数据和AI来创造优秀的客户体验，同时用来开发新的金融服务。

星展银行也一样，在通过开放API构筑的生态系统中，与客户建立持续且良好的关系才是其真正的目标。这样可以掌握客户的商流、物流和资金流，并将其作为客户的大数据进行累积，这个数据就是加入金融颠覆者的“武器”。换句话说，将与客户的商流、物流和资金流相关的大数据整合到后端、前端和人员与企业文化中，扩展生态系统，创建更加优质的客户体验和金融服务，同时建立与客户持续且良好的关系，不断循环这个模式正是星展银行推进数字化转型的本质。

在金融颠覆者崛起的过程中，现有银行害怕“竞食”，并且由于分支机构和系统等传统的基础设施，导致改革的步伐停滞不前。在这种困境下，如果金融颠覆者获得了信用、信赖和专业性，现有银行的传统基础设施都被破坏的话，将会完全被金融颠覆者取代。

与此相对，星展银行率先进行“自我毁灭”，在生态系统中融入客户旅程，选择成为“隐形银行”。这里星展银行最重视的是客户和构成生态系统的第三方运营商，所以实现了客户至上主义、重视客户体验的经营模式转换，这一点可以与金融颠覆者相提并论。

数字化转型的成果

鉴于以上内容，用户对星展银行的数字化转型给予了高度评价，这也是必然的结果。这种革新，最重要的不是追求表面，也不只是通过银行业务赚取利润，而是对客户体验的追求。

星展银行的数字化转型成果，表现在各种经营指标的改善方面。正如本章开头《欧洲货币》对星展银行做出的评价那样，数字化是星展银行创新的象征，与访问分支机构的传统客户相比，利用星展银行进行数字化交易的客户带来的销售额要高出2倍，而且2017年星展银行的市值上升了44%。

关键业务部门取得突破性成功

让我们仔细看一下星展银行的财务数据。在数字化转型中，星展银行最重视的业务部门是新加坡与中国香港地区的零售和中小企业交易，该部分占总营收的比重从2015年的38%增加到了2017年的44%（图11-3）；而且同一时期，总营收的年均增长率约为7.5%，而新加坡和中国香港地区的年均增长率达到了1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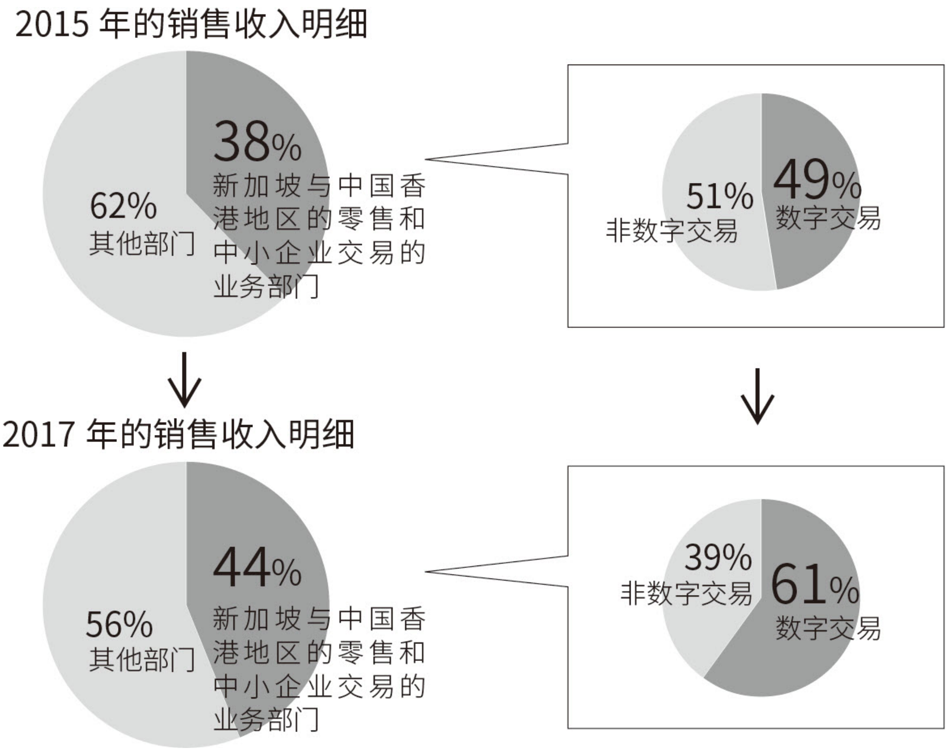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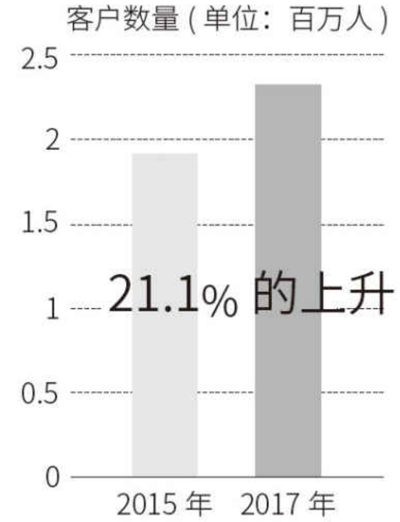
图11-3　星展银行数字化转型的成果——新加坡与中国香港地区的零售和中小企业交易的财务数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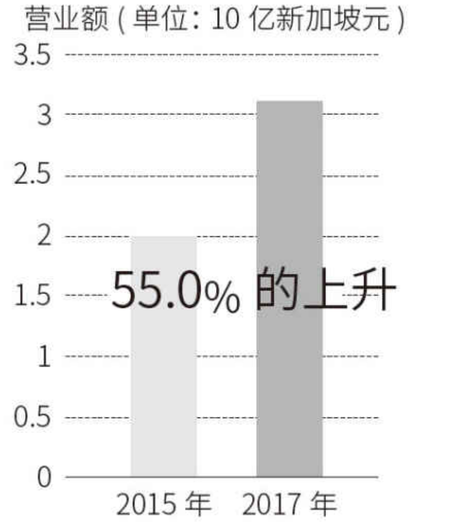
注：以上数据信息来源于*Investor day* 201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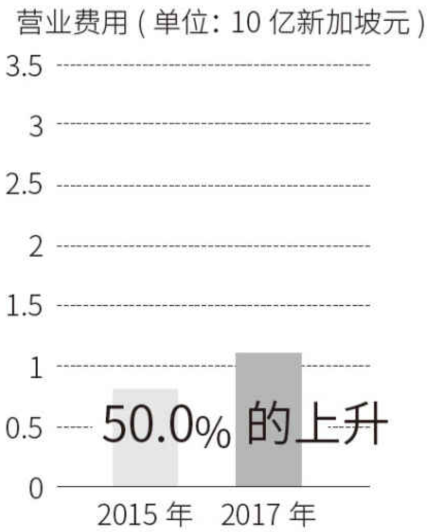
在2015年，重点业务部门营收（占全年营业收入的38%）的49%来源于在线和移动服务等数字交易，到了2017年，该部分营收（占全年营业收入的44%）中数字交易的占比上升到61%。也就是说，从营收增长率来看，数字交易和非数字交易趋势的差距是显而易见的，数字交易的年均增长率为23%，而非数字交易的年均增长率为-2%。数字交易的增加，提高了该部分在总营收中的占比。

接下来让我们看一下重点业务部门数字交易的客户数量等指标（图11-4）。从客户数量来看，2015年为190万人，2017年为230万人（增长21.1%）；从总营收来看，2015年为20亿新加坡元，2017年为31亿新加坡元（增长55.0%）；从营业费用来看，2015年为8亿新加坡元，2017年为12亿新加坡元（增长50.0%）；从本期纯利

润来看，2015年为12亿新加坡元，2017年为20亿新加坡元（增长66.7%），增势十分明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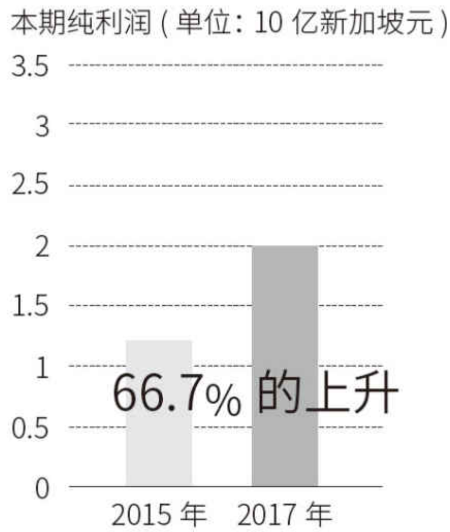






图11-4　星展银行数字化转型的成果——新加坡与中国香港地区的零售和中小企业交易的客户数量等指标

注：以上数据信息来源于*Investor day* 2017。

此外，客户人均营收从2015年的1,052新加坡元增加至2017年的1,347新加坡元，增长了28.0%；但客户人均营业费用只增加了13.6%。由此可以看出，在重点业务部门中数字交易绝对有盈利的能力。

39%的数字交易，带来69%的利益

接下来，让我们看看2017年星展银行最重视的业务部门中，数字交易和非数字交易的市场份额（图11-5）。在客户数量方面，重点业务部门总共拥有5,900万人，其中数字交易有2,300万人（39%），非数字交易有3,600万人（61%）；而且在该业务部门赚取的51亿新加坡元营收中，数字交易为31亿新加坡元（61%），非数字交易为20亿新加坡元（39%）。在纯利润方面，该业务部门的29亿新加坡元中，数字交易为20亿新加坡元（69%），非数字交易为9亿新加坡元（31%）。用收入减去利润后，我们可以看出，该业务部门数字交易与非数字交易的成本，即营业费用都是11亿新加坡元，或者说是各占50%。也就是说，重点业务部门中，数字交易客户仅占39%，却带来了61%的营收以及69%的纯利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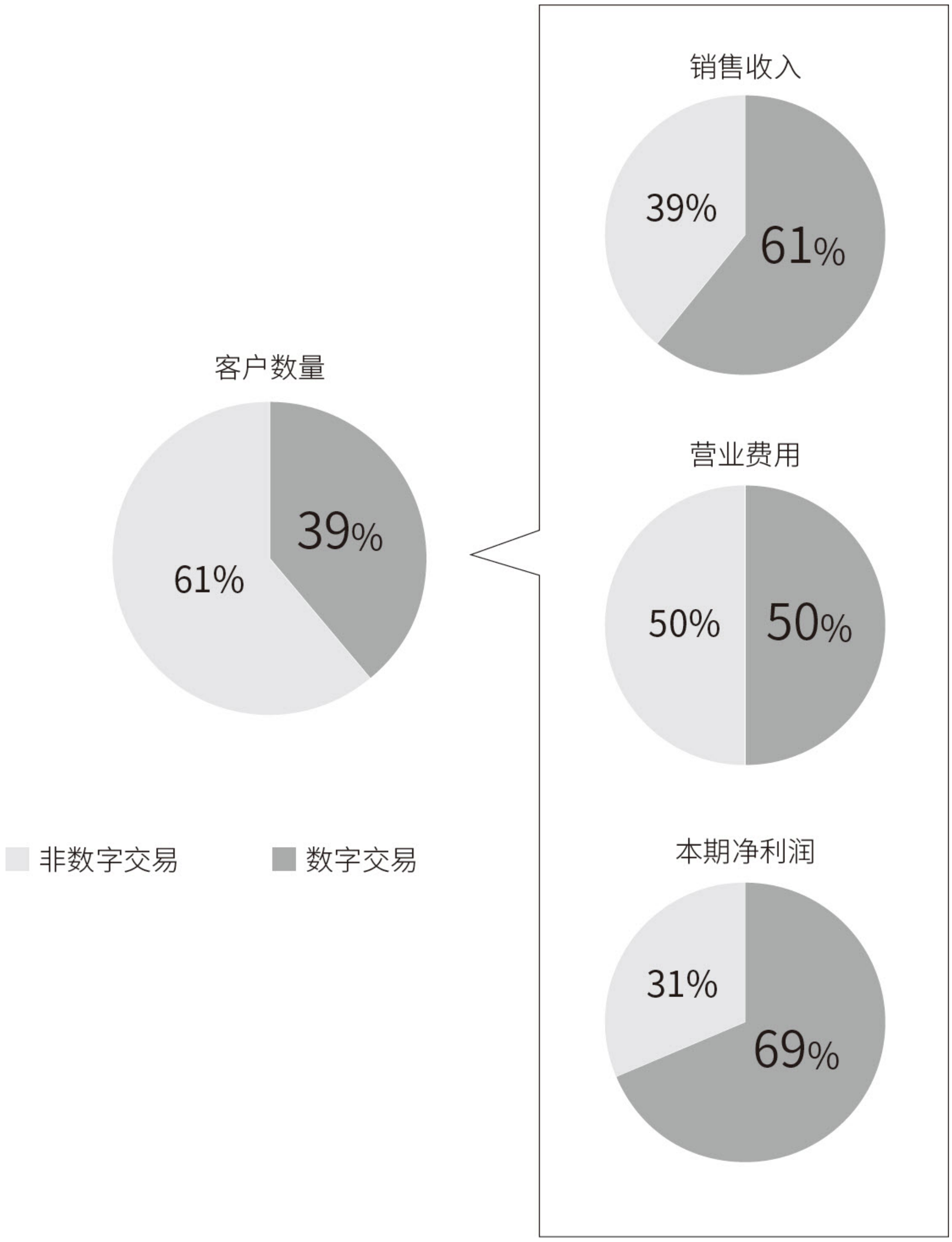


图11-5　星展银行数字化转型的成果——新加坡与中国香港地区的零售和中小企业交易的市场占比情况

注：以上数据信息来源于*Investor day* 2017。

此外，从重点业务部门2017年客户人均营收来看，非数字交易为600新加坡元，而数字交易为1,347新加坡元。在营业费用比率方面，与非数字交易的55%相比，数字交易为34%。在净资产收益率方面，非数字交易占19%，数字交易占27%。

以上数据表明，在星展银行最重视的业务部分，银行交易的数字化进展顺利，在数字交易中建立了低成本、高效盈利的机制，并且该部分的占比和战略性也越来越高。最关键的是，重点业务部门的数字化转型确实提升了星展银行的盈利能力。

小而强大的银行

如果将这些财务数据与美国银行和日本大银行的财务指标进行比较，那将会更加凸显星展银行的形象。与其他国家的竞争对手相比，星展银行虽然事业规模较小，但收益性很高，可以看出其高效的资本利用率。

图11-6、图11-7与图11-8详细对比了星展控股和8家银行巨头，即摩根大通（JPM）、花旗银行(CITI)、高盛集团(GS)、汇丰银行(HSBC)、三菱UFJ银行集团(MUFG)、三井住友银行集团(SMBC)、瑞穗金融集团、美国银行（BofA）的财务指标。



图11-6　规模的比较

星展银行在员工人数、销售收入、税前利润、市场价值、总资产等指标上都远低于其他银行（图11-6）。

但是星展银行的收益性较高，资本运转也很有效率（图11-7）。对比其他8家银行，星展银行的营收税前利润率为42.16%，排名第一。虽然人均营收在9家大型银行中排名第6位，但从人均税前利润来看，则仅次于高盛集团和美国银行，排在第3位。此外，净资产收益率为9.49%，仅次于摩根大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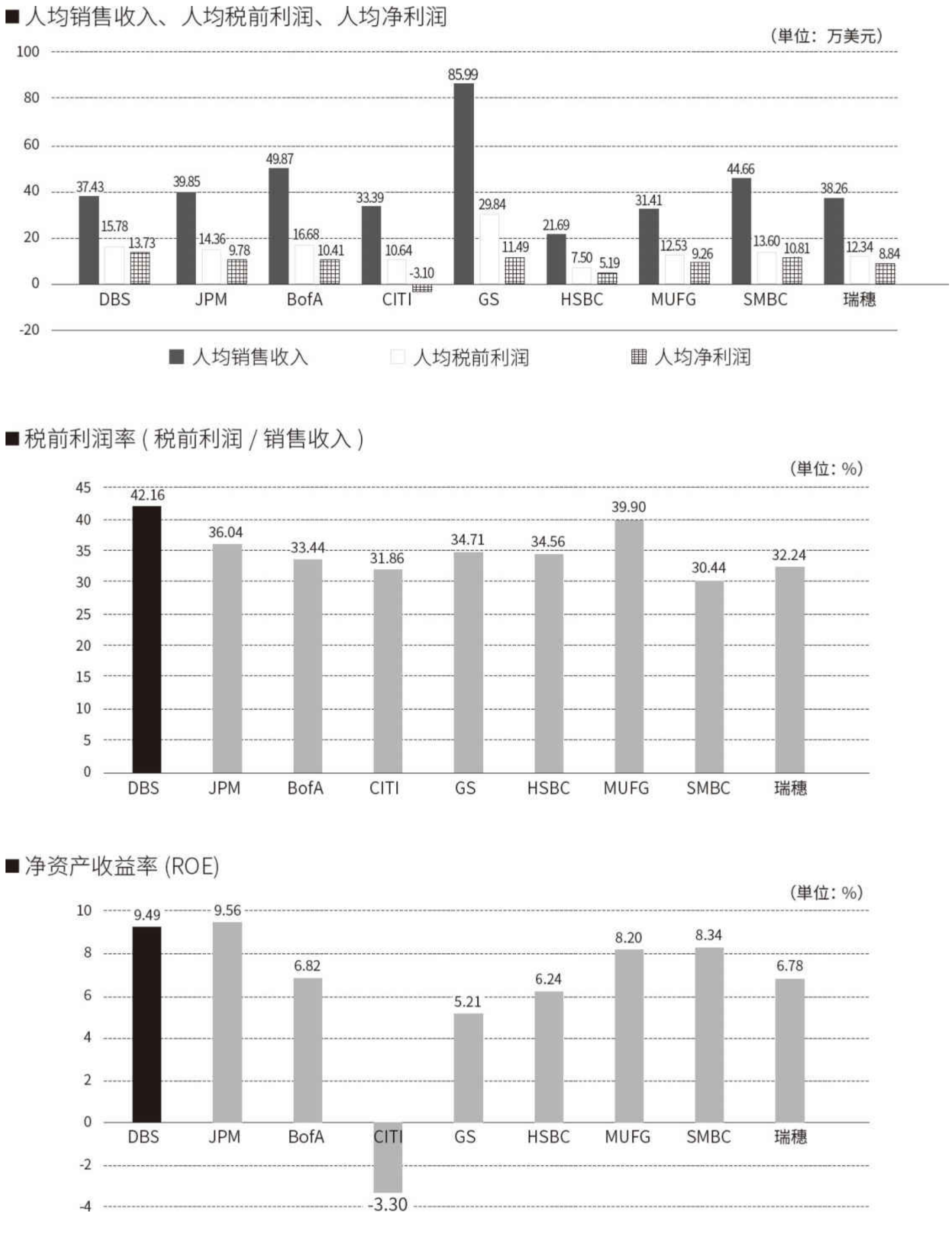


图11-7　收益性和资本效率的比较

从股票市场的评价来看，星展银行的PBR（股价净资产比率）为1.29，9家大型银行中，只有星展银行、摩根大通和美国银行这

三家银行的PBR超过了1。在安全性能方面，星展银行的资本充足率（CET1比率）为14.30%，仅次于汇丰银行的14.50％（图11-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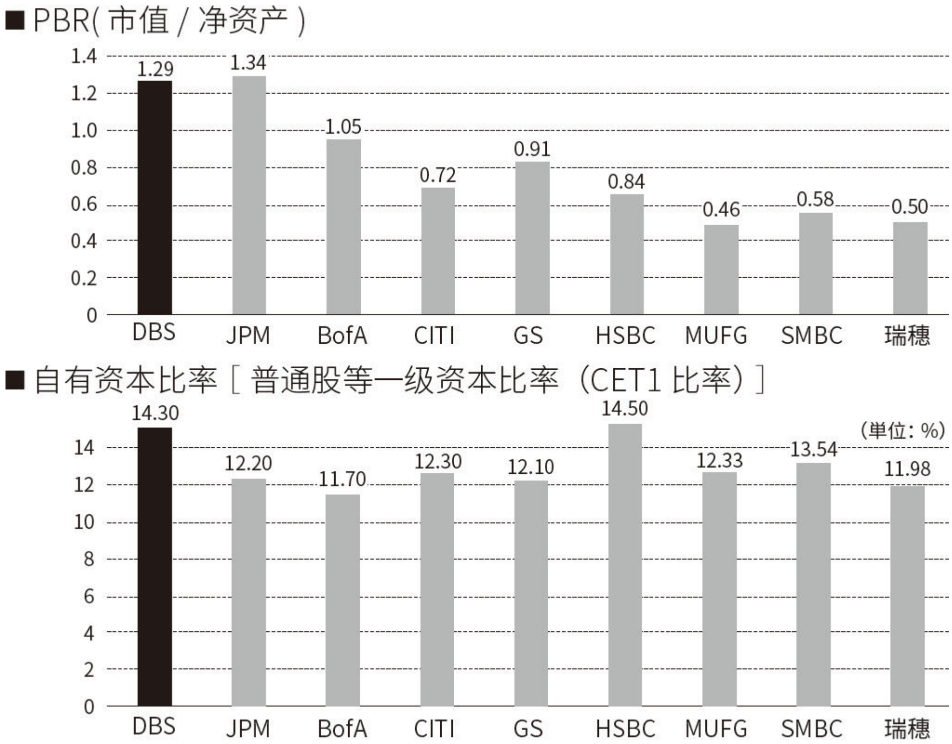


图11-8　市场评价和安全性的比较

总而言之，星展银行虽然业务规模小，但是无须花费太多成本就能高效盈利，进行稳健的运营，以此获得了投资者以及客户的高度评价，所有这些都是数字化转型的成果。《欧洲货币》杂志将星展银行评为“全球最佳数字银行”，《环球金融》杂志也将其选为“全球最佳银行”，原因就在这些数据呈现的结果上。

星展银行率先推进的数字化转型与美国和日本的银行推行的数字化转型是否相同？还是完全不同？在愿景和本质上有差异吗？这个判断得由每个金融机构自行决定。

第12章　“金融4.0”来自日本

巴塞尔银行监管委员会的近期设想

2017年10月31日，监督银行的最高权力机构巴塞尔银行监管委员会发布了一份题为《健全的银行惯例是什么：金融科技发展对银行及银行监管机构的影响》的实践报告。该报告在银行的企划和数字化转型部门一度成为热点话题，但却并不被大家所熟知。

在本章中，我想介绍一下上述这份报告中关于金融业的未来前景，以及我设想的新一代金融业与金融应有的样子。

巴塞尔银行监管委员会的报告以相对简洁的英文撰写，我认为这不仅对银行业的前景，而且对各个行业的数字化都具有参考意义，也推荐大家直接阅读原文文献，链接地址如下：

https：//www.bis.org/bcbs/publ/d415.pdf

巴塞尔银行监管委员会报告中设想了5种未来场景。这些场景分析的最大特征是，将提供产品、服务的商家分为“服务提供者”和“客户接触点”两类，这表明巴塞尔银行监管委员会也认为与客户的联系很重要，并且还探讨在不久的将来将这两项业务分开的可能性。接下来让我们具体看一看这5种场景。

“优化银行”：通过数字化得以改善的银行的主导

第1种场景是，现有银行业务通过数字化和金融科技得以改善，而且现有银行将继续主导该行业。也就是说，现有银行将追赶并应用金融科技公司配备的AI、大数据和云计算，通过数字化改善自身业务，在竞争中生存下来。报告中提到：“这些前兆中有些是可以看见的，但这种场景在总体上能有多大的支配力尚不清楚。”

“新银行”：新银行的控制

第2种场景是，现有银行将被称为挑战者银行的新银行取代，现有银行平台将被数字平台取代，现有的实体商店也将被数字商店取代，而在这场战斗中，拥有传统的现有银行从成本和速度上看可能会被淘汰。尽管有一些以新银行为目标的参与者已经出现，但还没有证据证明这种场景是有望实现的。

“分布式银行”：现有银行与金融科技公司之间的分工

第3种场景是，现有银行和金融科技公司将分担整个金融工作，可以想象双方不仅将在各自的擅长领域分工协作，而且还将在联合风险领域等展开合作，但前提是，客户可以利用多家金融机构，摆脱传统的仅能利用几家金融机构的惯例。

“降级银行”：现有银行的降级

第4种场景中的“relegated”，是“还原”、“降级”或“倒退”的意思。在这个场景中，现有银行将被新银行和金融科技公司淘汰。客户接触点主要被GAFA等大型科技公司和金融科技公司所掌控，而现有银行则降级为仅提供相关服务的供应商。该报告指出，尽管整个行业陷入这种境地的可能性很小，但从支付和在线借贷等业务业已能看出这个征兆。

“去中介化银行”：银行被破坏的场景

在第5种场景中，使用了术语“Disintermedia”（去中心化），但从内容可以看到，如图12-1所示，金融科技公司和大型科技公司将控制客户接触点和服务提供者双方。比起“去中心化”，

“银行被破坏”的表达似乎更加合适。虽然这是目前可能性最小的场景，但区块链技术下的虚拟货币不需要利用现有银行，即可实现事物价值的转移，这将使其成为这一场景的强大工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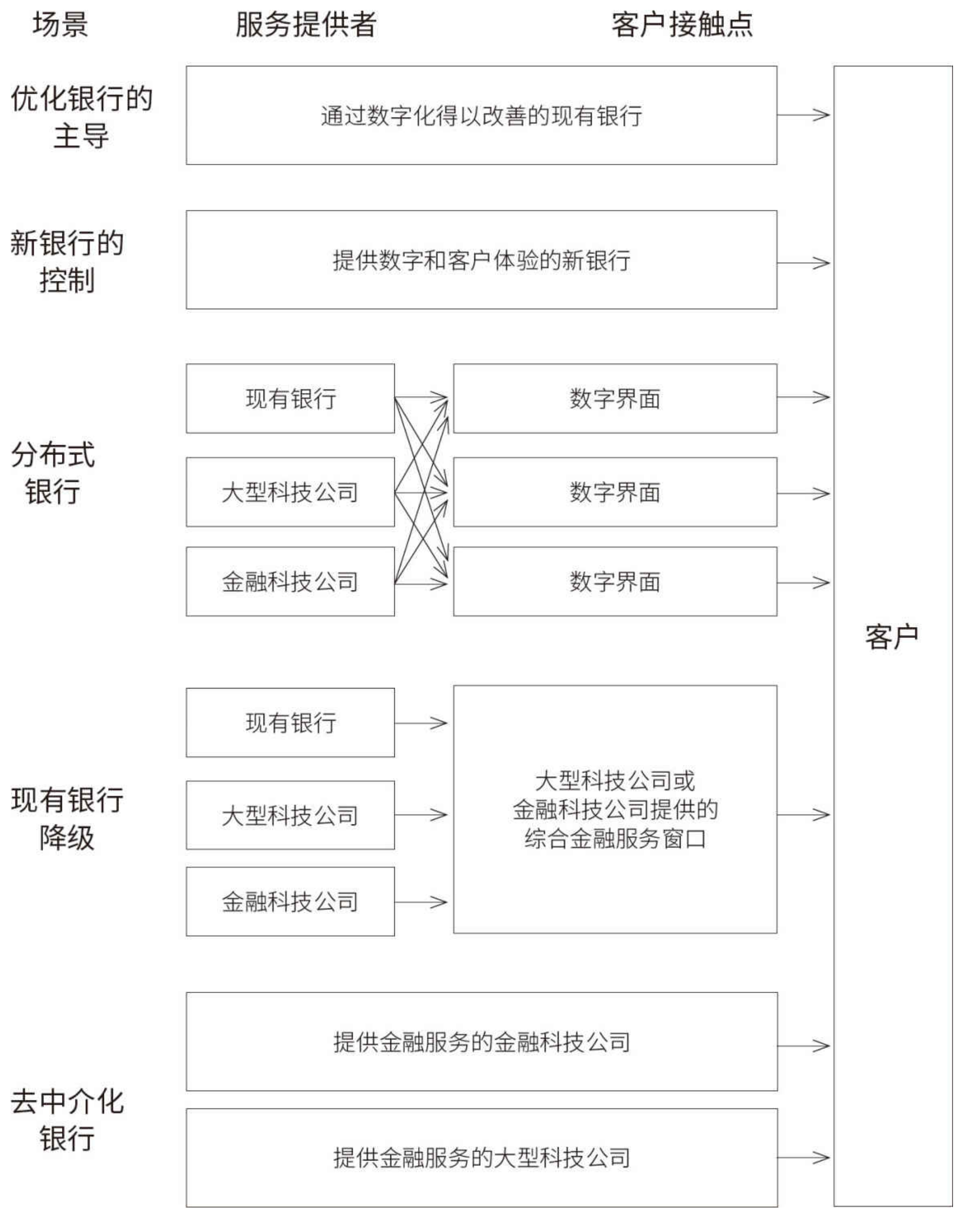


图12-1　巴塞尔银行监管委员会预测的“5种未来场景”

在巴塞尔银行监管委员会的报告中，我认为最重要的一点是，虚拟货币将是去中介化银行场景中强大的工具之一。

我预想的2025年新一代金融蓝图

基于巴塞尔银行监管委员会对未来银行的预测，我想谈一谈自己对2025年新一代金融的设想。

如第10章所述，首先最重要的是将客户分为企业和个人，再将企业分为大企业和中小企业，个人分为普通阶层和富裕阶层来进行设想。

在大企业交易中，我认为现有银行变身为“通过数字化得以改善的银行（优化银行）”的可能性最高。这是由于大企业交易作为公司金融的代表，是银行最专业的领域，因此与大企业现有的业务关系备受重视。

然而这一设想并不容易实现。随着大公司开始进入超出现有银行业务的数字化业务中，现有银行所需的数字化程度和服务水平便必将开始明显提高。除了客户期待的通过多种渠道享受的优质服务外，培养具备各个领域专业技能的高层次人才也至关重要。

我估计，中小企业交易业务将引发新银行的诞生，为此金融科技公司也将活跃起来，并有可能形成与现有银行共存的格局，尤其是科技公司将基于累积的商业大数据更加积极地开展借贷业务。

在现有银行和金融科技公司中，一方面将对自己提供的产品与服务标准化；另一方面，如何提高人工客服业务的生产效率和专业性也至关重要。对于区域金融机构而言，对已经开展业务的相关银行进行数字化，并提供某些附加价值将会成为一种生存策略。和大企业交易一样，有必要将数字化升级到可以为相关中小企业提供数字化支持的服务水平。强化人工客服业务的专业性，在地域密集型的利基市场中想要生存下去的金融机构也将出场。

	法人交易		个人交易	
	大企业	中小企业	普通阶层	富裕阶层
优化银行的主导	◎	○	○	◎
新银行的控制	△	◎	◎	○
分布式银行	△	◎	◎	○
现有银行降级	△	○	○	△
去中介化银行	△	△	△	△

图12-2　“5个场景”的可实现性

注：“◎”为高可行性，“○”为低可行性，“△”为不可行。

面向普通消费者的交易，无疑将对现有银行产生最大的影响。如阿里巴巴这样的科技公司从支付业务开始不断扩展各类生活服务，很有可能会让现有银行成为在技术公司搭建的平台上单纯提供银行基础设施或一次性金融服务的存在。

面向富裕阶层的交易可能是现有银行，尤其是大银行最想守住的业务领域。看看近期增加的大银行未来分支机构的布局，一方面面向普通消费者的交易通过数字化以节省人力，而另一方面明显让人感觉到大银行仍在致力于面向富裕阶层的交易。我认为该领域将可能诞生新银行，但是也有一些传统银行似乎正在开展全方位数字化以守住这一领域，这对后来者而言是一场残酷的战斗。

如上所述，在新一代金融场景中有几个重要视角，将客户分类为公司或个人，将为客户提供产品与服务的参与者分类为“服务提供者”和“客户接触点”，将参与者分为技术偏好或与客户关系偏好，同时还将根据是否偏好平台对参与者进行分类。可以肯定的是，上述分析中使用的方法对金融机构迟早要做的选择至关重要，现在正是需要选择和集中的时候。

对日本金融机构的建议

基于上述内容，我想给日本金融机构提几点建议。

之所以给在新一代金融业的战斗中处于最不利地位的日本金融机构提出建议，首先因为我自己是日本人，其次我希望这些针对日本金融机构的建议也能为其他参与者及不同行业人士提供参考。

三个要点

以下三点对日本金融机构思考新一代的战略和组织非常重要。

首先，要明确区分应尽早数字化的领域和作为传统仍将保留的领域，这将是最重要的管理决策课题。

其次，在决定要尽早数字化的领域，我们将把它作为重要的经营战略来执行，但是有必要注意，将数字化视为单纯的系统策略可能会导致似是而非的结果。

1 数字化一定会继续发展，因此要明确区分应尽早数字化的领域和作为传统仍将保留的领域。

2 在已决定尽早数字化的领域，将其作为重要的经营战略来执行。

3 在作为传统仍将保留的领域，需要加倍努力来精化人应该做的事情，并进一步提高银行的专业性和信赖性。

图12-3　三个要点

最后，在作为传统仍将保留的领域，我们需要加倍努力以精化人应该做的事情，并进一步提高银行的专业性和信赖性。

8家基准公司

在这里，我想具体介绍一下数字化策略和组织。首先是应该将哪些金融机构或企业作为基准，这需要对领先的金融机构进行彻底的分析。

表12-1　以中美8家大型科技公司为基准

公司名称	经营模式
亚马逊	学习亚马逊在数字化背景下，如何在其业务中贯彻客户至上主义与优质客户体验这些愿景和使命。
谷歌	学习如何利用数字化整理信息并从中获利。
苹果	学习在数字化过程中，如何拟定针对客户生活方式或存在方式的提案。
脸书	学习它如何利用数字化将人和组织连接起来。
阿里巴巴	学习其如何以数字化为主要“武器”，在中国社会构建基础设施并以金融业务为轴心扩展业务。
腾讯	学习它如何通过数字化来改善生活服务。
百度	学习数字化如何帮助其将复杂的事情简单化。

华为	学习该公司在下一代5G通信中想要实现的目标。

星展银行通过将美国科技公司作为竞争对手来实现数字化。如第9章所述，星展银行的目标是像谷歌、亚马逊、网飞、苹果、领英和脸书那样的大型科技公司。此外，格莱德希尔从“如果亚马逊的贝佐斯从事银行业会怎么做”的角度进行了深入研究。因此，我强烈建议日本金融机构以美国和中国的科技巨头公司作为基准，具体包括8家公司，分别是美国的GAFA和中国的BATH。后发的日本金融机构想要超越星展银行等先行者，就有必要了解这些基准公司的经营模式。

关于亚马逊，要学习它在数字化背景下，如何在其业务中贯彻客户至上主义与优质客户体验这些愿景和使命。

从谷歌，学习如何利用数字化整理信息并从中获利。

从苹果，了解它在数字化过程中，如何拟定针对客户生活方式或存在方式的提案是具有参考价值的。

从脸书，学习它如何利用数字化将人和组织连接起来。

从阿里巴巴，重要的是学习其如何以数字化为主要“武器”，在中国社会构建基础设施并以金融业务为轴心扩展业务。

从腾讯，学习它如何通过数字化来改善生活服务。

从百度，学习数字化如何帮助其将复杂的事情简单化。

从华为，重要的是了解它通过下一代5G想要实现的目标。

上述内容也是每家公司的使命，从这个意义上讲，我认为在企业的使命中思考如何实现数字化非常重要。在某些情况下，企业可能需要刷新一下自己的使命。

我还将以这8家公司为基准进行分析的结果总结在名为《中美科技巨头：从BATH×GAFA看中美高科技竞争》（*GAFA×BATH Beichu Megatekku no Kyoso Senryaku*）一书中，以供大家参阅。

体验设计策略

关于数字化战略可以提炼出许多重要的东西，第11章详细介绍了“全球最佳数字银行”星展银行的数字化战略。作为“自我毁灭”的议程，星展银行致力于“在破坏者之前先进行自己破坏”，“颠覆现有银行”，“通过数字化以获取利润”。作为数字化战略的支柱，我还想强调星展银行推进的“成为云原生”、“使用API改善生态系统性能”、“贯彻执行客户至上主义”以及“投资人员和技术”等策略。

在这一章中，我想谈一谈数字化策略的体验设计。

在本书中，我们反复提到了客户体验，在这里我想加入员工体验的价值，并且将设计客户和员工的体验价值这件事定义为“体验设计”。

让我们来看一下日本金融机构的体验设计吧。一直以来，日本的金融机构都是基于存款、贷款、汇兑等不同业务以及注重效率的流程来分配员工，并结合这些向客户提供服务。

为了革新这个过程，也就是改变日本金融机构过去认为理所当然的过程，有必要进行体验设计。重要的是，客户或员工是否能以自己的方式更加自然且舒适地接受或提供服务。

将客户行为视作客户旅程，设计一系列的客户体验，从感受客户的潜在需求到让他们接受公司提供的服务，甚至基于这些享受更舒适的生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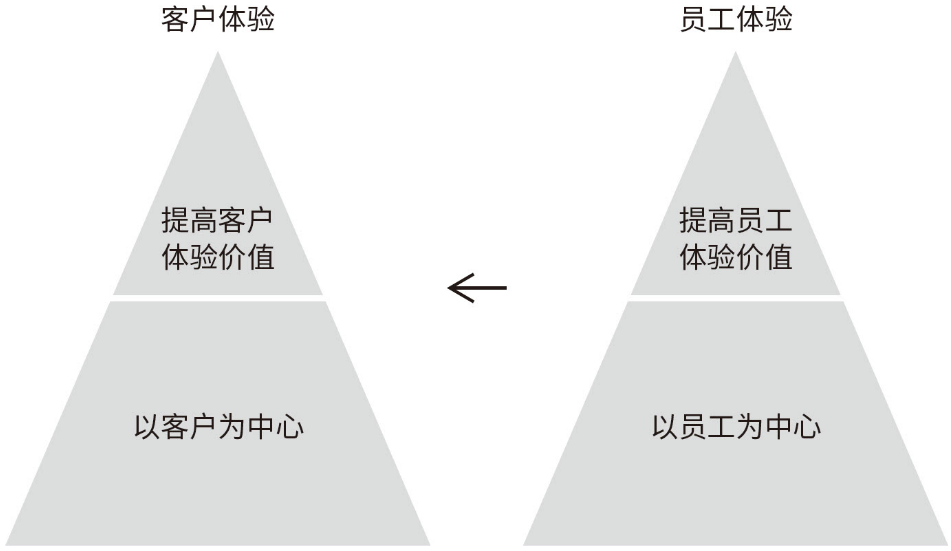


图12-4　体验设计

而关键在于，为了让员工提供优质的客户体验，企业为员工提供出色的体验就很重要。

体验设计的目的不仅是在系统上构建客户界面，还要确保客户即使在潜意识水平上也觉得自然舒适。

为此，除非客户感受到“与他们打交道的员工正在自然舒适地工作”，否则很难觉得这些员工拥有“出色的经验”。

有鉴于此，我们可以总结出体验设计的两个关键点：

设计员工体验，使每位员工都能发挥自己的特长和个性，并且能自然舒适地工作。

设计客户体验，使每位客户都可以获得他们内心期待的服务。

为客户提供优质的服务，与客户建立长期良好的关系，最重要的经营指标就是数字化，但同时，日本金融机构也必须注重经营其员工体验。

从橙色组织向青色（Teal）组织的变革

作为一家既能满足客户体验又能满足员工体验的组织，我最关注的是青色组织。

“青色组织”是一种组织策略，出自弗雷德里克·莱卢（Frederic Laloux）的*Reinventing Organizations*（组织再造）一书，该书自出版以来就获得了大量关注。虽然书中没有使用“客户体验”或“员工体验”等术语，但我认为，他们的实践过程中所提出的青色组织的想法值得参考。

Teal	进化、生态系统、内在正义
Green	多元、家庭、人际关系
Orange	达成、机会、追求成果
Amber	顺应、军队、集体的规范
Red	冲动性、狼群、欲望的满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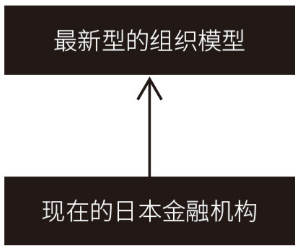


图12-5　从橙色组织向青色组织的变革

莱卢结合行业发展趋势，将组织模型的演化过程分为5类并以不同的颜色标注，该组织模型从红色→琥珀色→橙色→绿色，演变为第5种颜色青色，从而来匹配最高级的组织模型，所以称为青色组织。

就日本金融机构的组织发展而言，值得注意的是第3种橙色组织。该组织是基于产业革命诞生的一种行为模式，即将公司整体目标细分部署给各部门及员工个人，并通过各自达成的成就来实现目标，通过分析我认为日本许多金融机构仍处于橙色状态。

与橙色组织相反，在青色组织中，管理层和主管不用指示或管理员工的工作。青色组织的特征是，没有金字塔形的层级结构，所有成员齐心协力为社会提供价值。

在青色组织中，上述员工体验得以实现，员工有活力地自主工作，进而给顾客提供优质的客户体验。

《青色组织》中用大量篇幅介绍了荷兰一家大型家庭护理机构博组客（Buurtzorg）。博组客的特点之一，就是在那里工作的员工具有出色的经验，因此获得了较高的客户评价。该组织的特征包括，最多由12名员工组成的“团队”，以及鼓励每个团队根据博组客的6个目标自由行动。

在此我想表达的是，个人业主形式是荷兰相对普遍的工作形式之一，在这种每个人自己对自己负责的形式中，青色组织才能实现。换句话说，为了获得卓越的体验，员工必须为自己的行为和关系承担相应的责任。因此，如果员工仅主张自己的权利并将自己无法获得优质体验怪罪于公司的话，就难以实现青色组织。

这让我想起了星展银行，每位员工都被赋予了权利和责任，促使每位员工以自己为起点进行自主管理。

我将青色组织列为日本金融机构进行数字化时的必要组织，对学过青色组织的人来说可能会觉得难度太大。但是，想想“全球最佳数字银行”——星展银行所做的事情，我认为日本金融机构如果不进行这种组织变革，将无法在全球数字银行之战中幸存。

只有转型为青色组织，才能实现为客户和员工创造各自价值的体验设计。这就是为什么我们需要一种企业文化。在这种文化的熏陶下，员工可以像初创公司那样有效率、有活力地工作。然而对于在数字化转型中失去它的组织来说，这将是一场极其艰苦的战斗。

新一代金融场景的关键点——区块链

正如巴塞尔银行监管委员会的报告中所述，新一代金融场景中的关键点之一便是区块链。

区块链始于虚拟货币，这是基于西本聪发表的论文中提出的“比特币”开始运作的。

区块链也称为分布式账本。一定数量的信息被编译为一个区块，并将其作为最新区块链接到过去创建的区块。因为这些块与块之间互相链接，所以称之为区块链。

区块链具有难以伪造、系统稳定、维护成本较低等特点，现已被应用在以金融领域为首的各个行业中。

比特币，作为区块链起点的虚拟货币，被寄予成为新一代货币的厚望，市值也曾一度暴增。但是，由于无法即时结算，汇率波动剧烈，以及在违规操作和黑客攻击方面存在脆弱性等缺点，势头已大不如前。

从虚拟货币向加密资产的进化

在2018年11月召开的G20首脑会议的宣言中，已明确将虚拟货币计入加密资产。受此影响，日本金融厅也于同年发表了同样的声明。

G20等国际会议对加密资产进一步分类及定义进行过讨论，当前加密资产的分类如图12-6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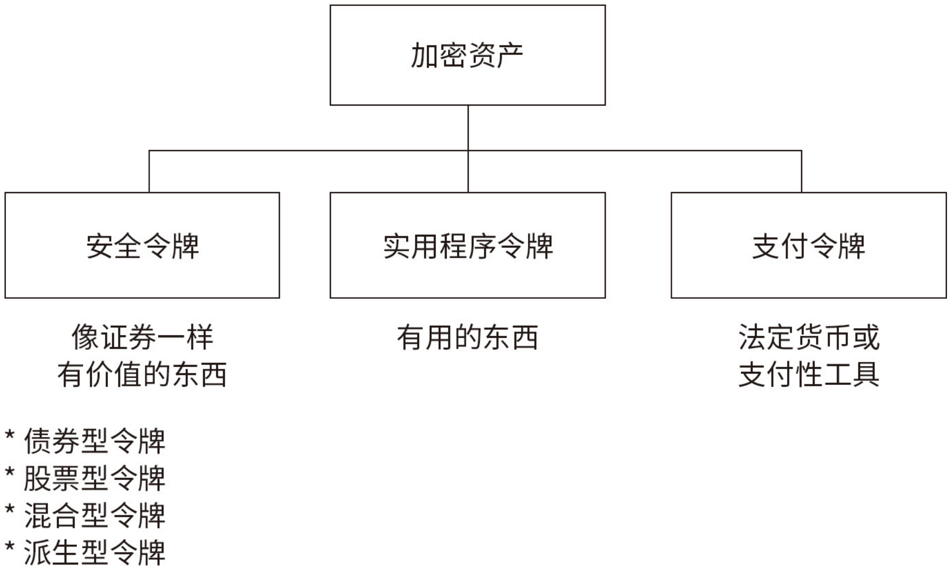


图12-6 加密资产的分类

首先，加密资产可以分为安全令牌、实用程序令牌和支付令牌，目前该分类方式已被瑞士和新加坡金融当局采用，并且有望在今后得以广泛普及。安全令牌像证券一样，是具有价值的东西，实用程序令牌是具有实用性的东西，支付令牌是法定货币或具有支付功能的东西。

到目前为止，大部分伴有初始代币发行（ICO）的融资被视为安全令牌。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几乎将所有ICO都看作“证券”，并且符合现有法律法规。同样在日本，几乎所有ICO有望以《金融工具交易法》为依据进行交易活动。

安全令牌进一步可细分为债券型令牌、股票型令牌、混合型令牌和派生型令牌，这种分类与现有金融工具的分类方式相同，不难预想金融交易正在向加密资产进化。

“虚拟货币并没有死”

随着虚拟货币被叫作“加密资产”以来，绝大部分安全令牌的ICO被视为“证券”。仅凭这一点来看，似乎“虚拟货币已经死了”。

但是，我认为虚拟货币并没有消亡，它反而在极度混乱中向前迈进了一步，并为“死去的事物”和“幸存的事物”下了明确的定义。

麻省理工学院媒体实验室以参加者身份在2019年CES的“区块链与媒体和广告的未来”分会场作了口头报告，并预测说：“区块链今年可能比较无聊，因为区块链今年正在被许多场合引入使用。”

在2019年CES上，中国的零售和电子商务领域的两大巨头——阿里巴巴和京东展示了区块链下的商品溯源系统。区块链的主要特征是，可以分散保存、共享同一数据，并能像链条一样在过去的数据之后叠加记录新的数据。利用这一特点，它们建立了区块链流通管理系统，旨在追踪食品的流通路径，以防食品造假。

日本也在推进区块链的实用化。随着去现金化的发展，小额结算交易日益剧增，三菱UFJ NICOS看准了这项业务，并利用区块链技术开发了用于新结算的基础设施。现在，结算处理速度在2秒以内，拥有全球最快的、每秒处理100万件交易容量的新的结算系统在日本诞生了。

另外，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于2018年6月宣布，虚拟货币中的比特币和以太币将不被视作证券，同时还公布将大多数ICO纳入监管范围。判断依据是被用作基础设施的区块链网络是否完全被分散化等，如果满足一定条件将不被认作是“证券”。

随后，日本的金融厅也做出了同样的决定，明确表示有“货币属性”的东西受《资金结算法》的限制，有证券属性的东西受《金融工具交易法》的限制。更具体一些，据金融厅研究委员会的资料显示，虚拟货币ICO可以分类为“没有发行者的虚拟货币”、“有发行者的虚拟货币”以及“有发行者并且发行者有义务在将来分配业务利润等”。对于前两类，将一如既往地使用《资金结算法》来应对，而对于被认作分红投资的第三类，和有价证券一样，正在探讨引入基于《金融工具交易法》的注册制。

进入2019年之后，又传来了大新闻，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的执行人罗伯特·杰克逊（Robert Jackson）表示，比特币ETF申请最终将可能获批。在比特币ETF通过审核之际，机构投资者有望加入虚拟货币市场。我个人觉得这项申请到实际获批还需要一年左右的时间，但是大趋势本身不会变。

我自己对虚拟货币未来的发展是深信不疑的。自2018年下半年以来，我经常从以前共过事的同僚们那儿听到，有关美国总部的优秀人才已经开始转向虚拟货币业务领域的消息。作为新一代的金融服务，以数字资产为对象的安全令牌业务开始受到关注。除此之外，美国金融机构也在暗中秘密筹备狭义的虚拟货币业务。

从这些动向可以看出，很明显“虚拟货币并没有消亡”，而是在极度混乱的局面中又向前迈进了一步，为“死去的东西”和“幸存的东西”给出了明确的定义。

新一代金融场景的关键点二——新的价值观

我认为在设想新一代金融场景时，还有一个重要的关键点，那就是价值观的变化。

在当今世界，所有变化都源于科技的发展。目前，各个行业都在发生变化，而且它们彼此之间相互影响，加快了变化的速度。在我的研究课题“新一代汽车行业”中，已经开始融合IT、电气、电子、通信、电力以及能源等各个领域。

新技术的商业化进度也提前了许多，一个典型例子是人工智能在全自动无人驾驶汽车上的实际应用。直到最近，人们一直认为它的实际应用将会到2025年，最早也要到2022年左右。然而，美国通用汽车在2018年1月便宣布，无人驾驶汽车会在2019年实现商业化；不久，谷歌也在2018年12月开始了无人驾驶出租车的商业化，它们的发展速度实属惊人。

科技的进步，也给我们的价值观带来了巨大的变化。现实生活中，每个人都可以发挥自己的个性和特长来创作一些东西并发布于世，通过这样的方式来“工作”的时代已然来临。

比如，通过个人与个人之间交易的二手平台应用程序而闻名的Mercari，只要有智能手机，就可以拍照上传，同时轻松出售东西。Mercari创建的平台正在影响人们的工作方式，并在试图改变生活方式的重心。

大家是否知道卷纸芯曾在Mercari上出售并成为热门话题？许多人一定会觉得垃圾卖不出去吧。但是，就有一些人会想要乍一看没什么用的厕纸芯。如果一次将几十个卷纸芯摆放在一起，就会发现它们可用于“小学生的手工材料”，这一新用途将创造新的价值。像这样能够找到发现全新价值的人，正是将我们每个人连接在一起的互联网技术。

一切都是资产

如衣服、家具、家电、杂货和小饰品等日用物品，不再需要的话就被称为闲置品，可以通过回收再利用等方式，总的来说就是为了减轻环境负担而被“资源化”。但是，Mercari已经让迄今为止完全没有价格的东西实现了“资产化”。

不只是现成的产品，那些擅长手工制作的人也可以发挥自己的才能创作配饰和手提袋等物件，然后挂在平台上出售。近年来，由于个人与个人之间新型交易市场的出现，日本国内的业余爱好市场正在不断扩大。

此外，物品的“资产化”不仅限于实物。用户还可以使用智能手机出售自己擅长或喜欢的无形物品。例如，如果你擅长绘制插图，就可以利用该技能来绘制并出售某人的肖像图片，因为像推特之类的SNS要求用户将肖像图用作个人简介的图标。

擅长写作的人、会做饭的人、逗人开心的人、擅长推荐电影的人、会唱歌的人……每个人的“技能”都可以在这里变现。

在公司工作已经不是唯一的“工作”方式了，如果能通过某种手段向某人提供某种东西，那将会产生相应的回报。所有的一切都是为了“创造某种东西”，而在这个过程中能够创造价值。

“Prosumer（生产性消费者）”和“Sellsumer（卖方）”

有些东西在现实生活中虽然重要，却很难得到周围的评价。例如，对人和善、体谅别人、支持别人、为别人加油等对人产生某种影响的行为，现在已经可以重新获得外界的评价了。

在以前，这些东西无法像技能那样直接与评价联系在一起。但是，在最新高科技蓬勃发展的区块链和基于这种技术扩张的数字货

币经济中，一种可以自由传递自己的想法并评价其对周围有多大影响的机制已经设计好了。现在这种系统已经投入使用，它可以根据每个人感受到的影响力进行评价，并提供数字货币作为奖励。

利用新的服务（如Mercari）或技术（如区块链），诞生了称为“卖方”的消费者。

1980年，阿尔宾·托夫勒（Albion Toffier）在《第三次浪潮》（*The Third Wave*）中指出，这次浪潮预测了信息革命引发的社会结构变化，其中出现了将生产者（Producer）和消费者（Consumer）合并后的一个词，“生产性消费者（Prosumer）”。托夫勒对该词的定义是，对于以生产为主的公司，个人通过参加公司的生产企划，即可产生创造新产品的消费者。

在Mercari的C2C平台上，有许多出售商品的“卖方”。换言之，消费者现在既是“生产性消费者”又是“卖方”。

影响工作风格的12种范式转变

最终人们的工作风格和工作方式也将发生巨大的变化。在日本，政府一直在推进工作方式的改革，但是像图12-7所示的因素要比政府的影响更大。包括副业在内，同时从事多种工作的并行职业等不受工作时间和场所限制的自由工作方式也变得流行起来。

1. **“超长寿社会”而不是“超老龄化社会”**
   从高龄者增加的视点，向从超级长寿世界已经到来的视点出发，构建新的工作方式和生活方式的转变。
2. **“并行职业”而不是“单一职业”**
   从在单一职场工作的单一职业时代，向不仅仅改变了工作方式和工作形态，而是作为毕生事业拥有多个职业的时代转变。

3. **“Prosumer和Sellsumer”而不是“消费者”**

从单纯的消费者，向自己参与生产、在C2C和P2P平台上直接销售的创造者转变。

4. **“自我实现欲求”而不是“缺乏欲求”**

从为了吃、为了活着、为了得到认可而工作，向为了实现自我和自己的存在方式以及实现自己的生活方式而工作的转变。

5. **“成长与贡献”而不是“金钱报酬”**

由于第4点的影响，在工作中从注重金钱上的报酬，向能否对自我成长和解决社会问题做出贡献的转变。

6. **比起“货币经济”更注重“评价经济、价值经济”**

从重视用货币评价的世界，向重视“评价=实际价值”“价值=真正价值”的世界的转变。

7. **“共享，订阅”，而不是“拥有，购买”**

从拥有或购买商品和服务，向重视经验价值、共享和使用订阅的世界转变。

8. **比起“提供的商品＆服务”更注重“对生活方式的建议和支持”**

从接受提供的产品和服务的需求，向接受反映自己生活方式的建议和支持这样的需求高度进化。

9. **“水平＆分散”而不是“垂直＆统合”**

从大公司的垂直和统合方式，向由于技术和价值观进化而形成的水平分工和分散化以及专业个体主导方式的转变。

10. **比起“个人成绩”，“团队成绩”更重要**

在职场和社会中，更重要的不是“个人成绩”，而是“团队成绩”。

11. **“简单、迷你”而不是“复杂、烦冗”**

从追求复杂、烦冗的状况，向追求简单、迷你的状况变化（当然也受到欲求减退的影响）。

12. “与AI竞争”不如“与AI合作”

不要认为人工智能夺去了人的工作，而是要区分人工智能应该做的事和人应该做的事，达成与人工智能合作的世界。

图12-7　影响工作方式的多重模式转变

一方面，积累自己一直从事的职业活动；另一方面，又能胜任多个职业的话，自然比起公司的名字和在公司的头衔，自己的存在方式以及对工作的价值会变得越来越重要。实际上，在各类人士聚集的交流会等场合，大家交换的不再只是工作公司的名片，越来越多的人也开始交换在工作公司外从事活动的名片。的确比起公司的名字和在公司的头衔，自己的生活方式和工作风格变得更加重要。

日本新经济公司的诞生

让我们再次把话题拉回到新一代金融产业。

上述关于社会和价值观的变化，是创造新金融系统和新平台的原动力。正如刚才所说，随着科技的不断进化，一直以来不被认可“价值”的事物也开始重新获得外界的评价。我认为新金融系统和新平台将会出现在C2C或P2P领域，比如前面介绍的Mercari，这是因为它与区块链、云资源、共享等新一代商务核心之间具有极高的融合性。*WIRED*的创刊主编，在美国科技界具有超级影响力的凯文·凯利(Kevin Kelly)在他的书中这样写道：“未来30年里，财富的最大来源——最有趣的文化创新——将出现在这个方向的延长线上。2050年规模最大、增长最快、获利最高的公司，应该是发现了现在尚未看见、尚未获得评价的新共享形式的公司。可以实现共享的东西包括思想与感情、金钱、健康、时间，以及满足了一定条件和合适收益的任何东西。”

Mercari已经不仅仅是“事物领域”的应用程序软件，还在英语课程等“虚拟事物领域”开展业务。此外，Mercari也在进行C2C的投资基金业务，我认为它正在试图通过成为P2P平台公司来创建Mercari规模经济。

Mercari还在创建并培育强大的二级分销市场。把不需要的东西拿出来“共享”也算是广义的共享经济，或者是从金融的角度来看，这是顾客衣橱中的库存流动化，也是动产、库存、广义的有价证券（包括演唱会门票等）等“资产流动化”。

我认为Mercari极有可能成为P2P平台公司，这是因为执行官山田进太郎多次强调“互联网本来就是赋予每个人权力的东西”，并对注重个人和团队能力的业务发展抱有很强的执念。

在日本，拥有像Mercari这样价值观的组织或个人也在陆续诞生。毫无疑问，日本有许多值得向世界夸耀的地方，比如细致、准确、认真、灵巧、礼仪、追求安全、高水平的国民素质等。

日本的出路是在于克服日本的弱点，还是在于活用日本的优点，到底朝哪个方向发展更令人期待呢？答案是显而易见的。

如果我们将这个话题置入新一代金融业来看，很显然日本应该利用自己的优势，以极致的认真和专业技术引领世界。日本大多数年轻人持有的“给予人力量”这一价值观本身就是一大武器。

在日本，Mercari等新经济公司的诞生创造了一个时代，在这个时代，每个人都可以发挥自己的特长和个性来创造新事物，并公之于众，以这种方式工作的可能性越来越大。

随着科技的发展，几乎所有的个人“技能”都可以变现，例如烹饪、绘画和写影评。而且，老年人累积的阅历和经验，让他们拥

有了许多宝贵的技能。

男女老少，每个人都能发挥自己价值的社会。

在现实世界中最重要的是转向真正有价值的社会。

向世界输出超长寿社会的结构。

在去中心化的P2P社会中实现超长寿社会。

利用区块链的分布式金融系 统来支撑实现超长寿社会的目标。

“金钱”到底是什么

那么“金钱”（货币）到底是什么呢？在此我再为大家谈一谈金钱的本质。

自从虚拟货币被日本媒体报道以来，越来越多的内容涉及货币的三项基本职能，即“价值交换与支付手段”、“价值尺度与计算单位”和“价值贮藏手段”。

在思考事物的本质时，我总是先看一下正在使用的定义，同时从全局出发俯瞰观察该事物被使用的样子，并以超长期的广角思维方式进行判断。

所以我认为，金钱的本质就是，使用它的人是否相信它真的具有一定的价值。

货币种类繁多，包括以贝壳、宝石、黄金、白银为代表的实物货币，不与黄金挂钩的信用货币，以及现在成为焦点的虚拟货币。

即便与黄金脱钩，美元也能确保其作为基础货币的地位，这是因为人们一直相信“即使没有实物资产黄金作后盾，美元也能作为

通用货币流通”。在政治、经济、社会、科技等领域，以及大时代的变化中，“现实中什么东西可以作为通用货币”这一问题本身也在发生变化。

重要的是，在人们的价值观发生巨大变化时，“现实中什么东西可以作为通用货币”，以及“货币应该代表什么样的价值”等问题也遭到了质疑。

寻找新指标和货币的新定义

随着政治、经济、社会、技术等领域的不断变化，人们的价值观也在发生变化，以GDP为代表的国民经济计算以及经济指标也开始寻求新的衡量尺度。

麻省理工学院斯隆管理学院教授埃里克·布莱恩约弗森（Erik Brynjolfson）等人的著作《第二次机器革命》（*Second Machine Age*）中，描述了在新时代寻求新的经济指标的动向。

“新指标将有不同的表现形式和测量方法，以下是已经在实际中使用的一些指标和测量方法。联合国开发计划署（UNDP）发布的人类发展指数是一项综合性经济社会指标，利用健康和教育等指标衡量社会的富裕程度和进步水平。开发计划署还在2010年引入了多维贫困指数（MPI），该综合指数根据营养、卫生条件和安全饮用水等10个指标来评估发展中国家的贫困状况。此外，该指数中的婴儿死亡率和其他保健指标是基于各国定期实施的人口保健调查（DHS）等数据计算而来，而且一些有潜力的项目也在参与这些指标的测量。经济合作发展组织（OECD）设立了‘经济状况与社会进步计量委员会’，在认识到经济和社会指标GDP的局限性下，探讨了追加其他附加信息的必要性。该委员会由约瑟夫·斯蒂格利茨（Joseph Stiglitz）主持，阿玛蒂亚·森（Amartya Sen）以及

让-保罗·菲图西（Jean-Paul Fitoussi）出席了会议。除了基本需求的满足度和社会福利的充实度以外，迈克尔·波特（Michael E. Porter）、斯科特·斯特恩（Scott Stern）和罗伯托·劳里亚（Roberto Lauria）等经济学家追加调查了自杀、财产权、学校出勤率、移民待遇、女性地位等各类项目，创建了社会进步指标。此外，不丹还推出了一个独特的指数——‘国民幸福指数（GNH）’，并得到了全世界的关注。民意调查公司盖洛普多年来一直在进行国民幸福度的调查。”

可以看出，上述内容主要也是因为人们的价值观发生了变化。《第二次机器革命》中还指出了4种无法以当前经济指标来衡量的资本，即知识产权、组织资本、用户生成内容和人力资本。

知识产权包括专利和版权等资本。组织资本是指业务流程、生产技术、组织形式、商业模型等资本。用户生成内容是诸如脸书、YouTube、推特和照片墙等用户免费发送的内容。人力资本被认为是四种资本中最重要的无形资产。

在这种情况下，我认为现在是时候对货币重新下定义了，让我们通过PEST分析来看一看。

在政治方面，面对大国紧闭，而大型科技公司却对外开放的对峙格局中，需要跨越现有国界与规模经济的新“货币”。

在经济方面，在自由资本主义和统制资本主义互相冲突的构架中，需要一种能迎合新资本主义的新“货币”。

在社会方面，诞生了前面介绍的新的价值和价值观，在此过程中，人们需要能够代表这些的新“货币”。

在技术方面，通过区块链和数字化等技术，已经具备了创造上述新“货币”的技术基础设施。

而且我还发现，象征寻求“货币”新定义的动向，也在寻找比特币那样的虚拟货币。

新金融系统——“金融4.0”

在本书的最后一章，我觉得应以“金融4.0”来命名下一代的新金融系统。这一概念是指“新一代的新金融体系，代表了新的价值和价值观”。

接下来我将详细说一下什么是“金融4.0”。

从使用的技术和基础设施来看，面对面的金融形式是“金融1.0”；基于互联网的金融形式是“金融2.0”；以智能手机为中心，阿里巴巴和腾讯等中国公司主导的仍在发展中的金融形式被称为“金融3.0”；可以充分利用分散型技术的区块链，以及作为新评价经济的基础设施的金融形式便应被称为“金融4.0”。

日本大银行和美国摩根大通正在致力于研究区块链技术下的数字货币，这意味着“金融4.0”的基础设施部分已经开始进入萌芽期。

我将“代表了新的价值和价值观的新一代的新金融体系”定义为“金融4.0”，其中最重要的是之前所述的价值观的变化。让普通人拥有的各种技能等在被视为持有新“资产”的情况下发挥威力的正是“金融4.0”。

“金融4.0”在某些方面与传统的资产流动化相似，但区别在于通过区块链进行管理、投资者购买的代币可以流通，而且个人可

以购买等方面。

各种定义发生变化

“金融4.0”将重新审视金融存在的意义。每一位金融参与者都被要求给出“在新金融业务中，自己的定位是什么？”的具体规划。

到时候，各种各样的定义会发生如下的变化：

“金融”的定义发生变化

“直接金融与间接金融”的定义发生变化

“目标资产”的定义发生变化

“数据”的定义发生变化

“风险和风险分析”的定义发生变化

“金融产品”的定义发生变化

金融的“用户界面/用户体验”发生变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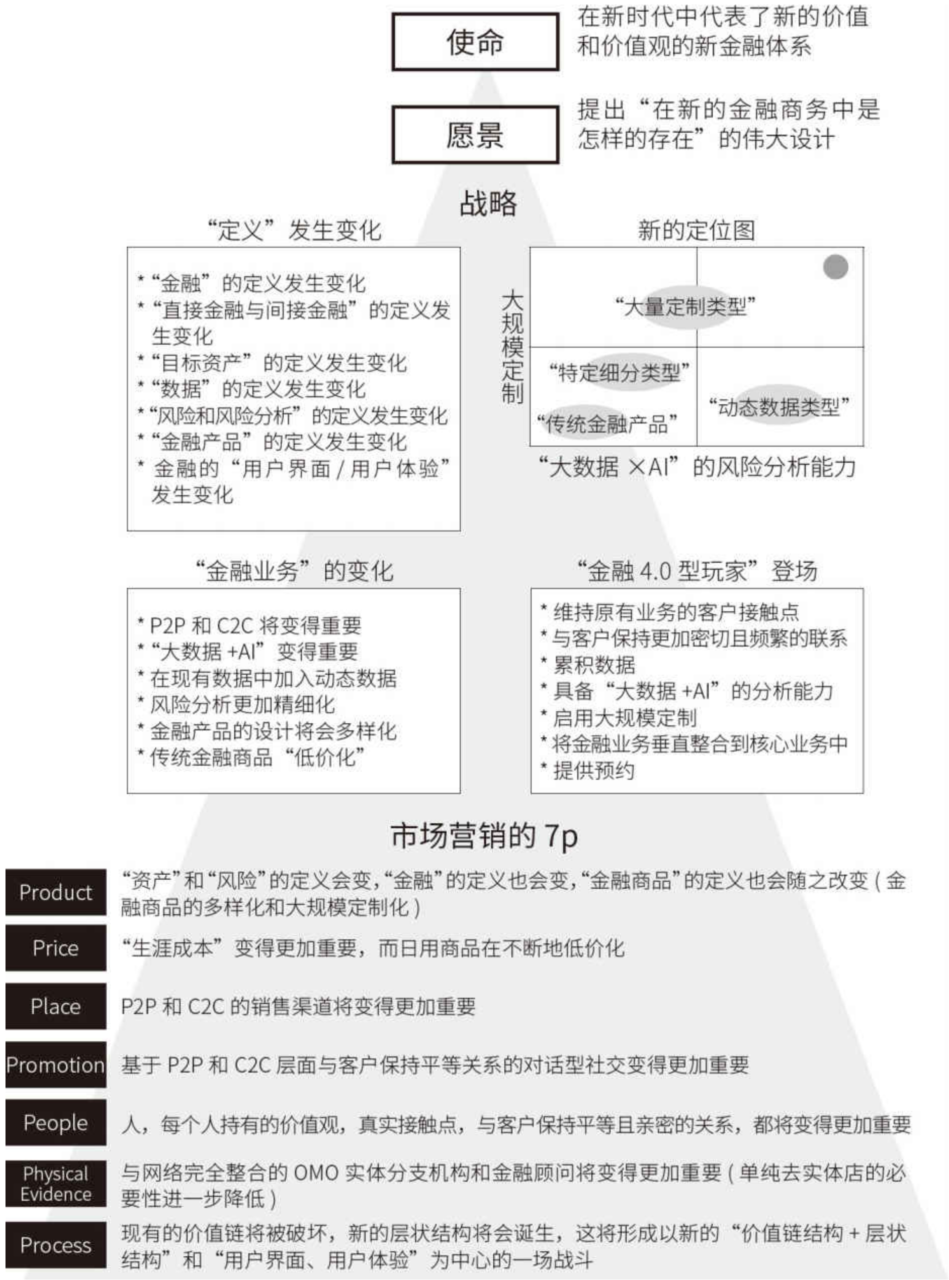


图12-8　“金融4.0”：2025年的新一代金融

金融业务本身也正在从以下几个方面发生变化：

P2P和C2C变得重要

“大数据＋AI ”变得重要

在现有数据中加入动态数据

风险分析更加精细化

金融产品的设计将会多样化

传统金融产品“低价化”

“金融4.0”之下将诞生新的参与者，它们具备以下几个特征：

维持原有业务的客户接触点

与客户保持更加密切且频繁的联系

累积数据

具备“大数据＋AI”的分析能力

启用大规模定制

将金融业务垂直整合到核心业务中

提供预约

最后让我们通过服务营销的营销组合——7P分析，具体看一看“金融4.0”。

在“金融4.0”中，“资产”和“风险”的定义变了，“金融”的定义变了，“金融商品”的定义也随之发生了变化（Product：商品与服务）。正如在介绍Mercari时所述的那样，作为金融对象的资产在扩大，提供的金融商品也会越来越符合每个人的需求，同时也在不断要求新的“原创”商品（金融商品的创造和开发）。

在“金融4.0”中，“生涯成本”变得更加重要，而日用商品在不断地低价化。一方面，必须重视与客户之间持续的长期关系；另一方面，一次性传统型金融商品的价格也在不断下降。

在“金融4.0”中，P2P和C2C的销售渠道变得越来越重要。新一代金融业的金融商品将通过客户与客户之间的联系得以扩张，在客户互相联系的世界中，仅凭金融机构一方的运营是无法拓展商品销售的。

在“金融4.0”中，基于P2P和C2C层面与客户保持平等关系的对话型社交变得更加重要。作为新传统幸存的平等关系和对话型交流，在未来实体分支机构中将变得越发重要，这部分工作需要人类来完成，而不是AI。

在“金融4.0”中，人、每个人持有的价值观、真实接触点、与客户保持平等且亲密的关系等，都将变得更加重要。这是7P分析中最重要的部分。

在“金融4.0”中，与网络完全整合的实体分支机构和金融顾问（真正的金融专家）将变得更加重要。在到访实体分支机构的必然性不断下降的同时，实体分支机构中幸存的要素也将更加明确。

在“金融4.0”中，现有的价值链将被破坏，新的层状结构将会诞生，这将形成以新的“价值链结构＋层状结构”和“用户界面、用户体验”为中心的一场战斗，毕竟，客户体验很重要。

“金融4.0”的“游戏规则”如第1章所述，这是围绕客户接触点、客户体验以及与客户之间保持持续且良好关系的战斗。

在这场战斗中，起初与规模经济并没有太大的关系，反倒是规模较大的金融机构因为传统“遗物”可能处于不利的地位。而较小

规模的企业可能会在获取客户联系、客户体验以及与客户之间保持持续且良好关系的战斗中占据优势地位。

作为结语，我想再次引用凯文·凯利的一段话。

“未来30年里，财富的最大来源——最有趣的文化创新——将出现在这个方向的延长线上。2050年规模最大、增长最快、获利最高的公司，应该是发现了现在尚未看见、尚未获得评价的新型共享形式的公司。可以实现共享的东西包括思想与感情、金钱、健康、时间，以及满足了一定条件和合适收益的任何东西。”

伴随科技的进步，今后会有越来越多的人进行合作、协调、协作，以创造新的价值。我认为上述中的可共享事物为了实现共享的“一定条件”中，最重要的是“信任”。也就是说，即使技术不断发展，事物实现共享并建立链接，除非在此建立的平台和机制得到信任，否则也将难以生存。因为不管是过去、现在还是将来，人们的潜意识里渴望得到的还是信任。

在新一代分散型金融体系和平台当中，不仅仅是信用，信赖也将获得评价，并且人们的多样性和个性将得到充分的发挥。如果以本书为契机，可以使这样的新金融体系和平台诞生在日本，对我来说那将是最幸福的事了。


经纬度
黑暗时代
帝国的崩溃与欧洲的新生
[英] 马丁·J. 多尔蒂◎著 王琳 杜永明◎译
THE 'DARK' AGES
FROM THE SACK OF ROME TO HASTINGS
MARTIN J. DOUGHERTY
打破误解 还原真相
所谓黑暗时代，从来都不是长夜无垠，而是晨曦穿行在黎明之前
浙江人民出版社

黑暗时代

帝国的崩溃与欧洲的新生

[英] 马丁 · J. 多尔蒂◎著　　王琳　杜永明◎译

THE 'DARK' AGES

FROM THE SACK OF ROME
TO HASTINGS

MARTIN J. DOUGHERTY

浙江人民出版社

浙江省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章图字：11-2019-263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黑暗时代：帝国的崩溃与欧洲的新生/（英）马丁·J.多尔蒂著；王琳，杜永明译．—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21.8

ISBN 978-7-213-10181-6

Ⅰ．①黑…　Ⅱ．①马…②王…③杜…　Ⅲ．①欧洲-历史-古代　Ⅳ．①K500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21）第111200号

Copyright © 2019 Amber Books Ltd, London
Copyright in the Chinese language translation（simplified character rights only）© 2021 Zhejiang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Co., Ltd.
This edition of The Dark Ages published in 2021 is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Amber Books Ltd.
Originally published in 2019 by Amber Books Ltd.
All rights reserved.
Simplified Chinese rights arranged through CA-LINK International LLC

黑暗时代：帝国的崩溃与欧洲的新生

［英］马丁·J.多尔蒂　著　王　琳　杜永明　译

出版发行：浙江人民出版社（杭州市体育场路347号　邮编　310006）

市场部电话：（0571）85061682　85176516

责任编辑：王月梅　方　程

营销编辑：陈雯怡　陈芊如　赵　娜

责任校对：陈　春

责任印务：刘彭年

封面设计：创研设

电脑制版：北京创智明辉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印　　刷：杭州丰源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710毫米×1000毫米　1/16

印　　张：16.5

字　　数：210千字

插　　页：4

版　　次：2021年8月第1版

印　　次：2021年8月第1次印刷

书　　号：ISBN 978-7-213-10181-6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市场部联系调换。

译者的话

欧洲的中世纪曾被大多数人视为暴力、残忍、倒退的“黑暗的中世纪”，文明的光芒似乎消失得无影无踪。这样就难以解释文艺复兴的兴起，毕竟若无地基，万丈高楼因何而立？而且，“黑暗的中世纪”也是对历史的狭隘解读，因为历史是多元的、连续的。

本书的独特之处在于通过客观的历史事实，用简明扼要的语言，尽可能地拨开迷雾，还中世纪以本来面貌。同时，辅以大量插图，给人以更加真实和清晰的感性认知。这些插图有些是臆想的作品，作者还对其进行了辨伪。无论图与文，都激浊扬清。于是，我们在阅读的时候，总感觉有一股清泉汩汩而出，温润了视线和心田。

中世纪早期被称为“黑暗时代”，是从罗马帝国崩溃到一个新的封建欧洲出现之间的过渡时期。

在黑暗时代，欧洲人发现了冰岛、格陵兰岛，并横跨大西洋，踏上了一个遥远的大洲，尽管时间短暂……

黑暗时代结束时，欧洲已经从部落社会过渡到封建社会，法国、丹麦、瑞典和英国等现代国家得以肇始……

这是一个尝试和发现的时代，而不是一个毁灭的时代。它开始于混乱，但结束于新的秩序……

余秋雨先生在《中国文脉》中写道：“专制的有序会酿造黑暗，混乱的无序也会酿造黑暗。”如果说，中世纪的黑暗是混乱酿造出来的，那么它同时也酿造了文明之光。只不过，人们专注于黑暗太多，往往忽略了这抹从微弱逐渐变得明亮的光芒。

对于中国读者来说，很多古代欧洲的历史人物和地名都很陌生，有的甚至还没有约定俗成的译名。因此，在翻译过程中，以下两点需要做特别说明：

第一，一些主要的人名、地名、民族名、战役（战斗、战争）名，以及具有重要意义的物品（如盾、剑、箭等），原文大都做了索引。但是，还有不少常规的地名和人名等，原书并没有在索引中呈现，为便于读者理解，译者大都在其第一次出现时加注了外文原名。另外，对原著中一些重复的索引词进行了适当的删减，并增添了一些新词（如增加了“麦西亚”“伦巴第”等），以便读者更清晰明了地辨识和使用。

第二，比较生僻或者容易混淆的词语、原著中的讹误和瑕疵、原著意思表述不完整或者需要特别予以说明的内容，中译本都做了注释。

本译作的出版，愿作引玉之“抛砖”，意在拓展人们对中世纪的新认知、真认知，增进对文明演进问题的深入思考。

杜永明

2020年4月15日

目　录

译者的话

引言

前罗马时期的欧洲

新视角下的统一罗马帝国

第1章　罗马帝国的崩溃

一个帝国的成长

太平岁月的利与弊

盛极而衰

罗马帝国分裂

匈奴人入侵

阿拉里克一世洗劫罗马

匈奴的进一步征服

匈奴王阿提拉的威胁

西罗马帝国的灭亡

第2章　从部落到蛮族王国

擅用飞斧的法兰克人

克洛维一世建立墨洛温王朝

克洛维之后的法兰克

“铁锤”查理

西哥特人

哥特战争

东哥特人

拥有海军的汪达尔人

汪达尔国王盖塞里克

盖塞里克之后的汪达尔人

伦巴第人

阿瓦尔人

其他日耳曼部落

阿兰人

保加利亚人

从部落到王国

第3章　卷入欧洲事务的不列颠群岛

后罗马时代的不列颠

盎格鲁-撒克逊大移民

诺森布里亚

麦西亚

威塞克斯

阿尔弗雷德大帝

东盎格利亚

肯特、埃塞克斯和萨塞克斯

不列颠群岛的凯尔特王国

皮克特人

爱尔兰和苏格兰

阿尔弗雷德之后的英格兰

第4章　发展中的教会

第一次尼西亚会议

罗马帝国晚期的基督教

皇帝与教皇的角力

基督教的传播

凯尔特教会

修道院和大教堂

基督教大分裂

伊斯兰教的兴起

第5章　来自北欧的海上突袭者

北欧人的武器和船

前维京时代

早期的袭击

扩张到俄罗斯

生活在拜占庭帝国的北欧人

北欧诸神和基督教在北欧的传播

早期海上探险

北欧王国海上探险的收获

登陆不列颠

挪威统一

第6章　黑暗渐去，封建王国出现

神圣罗马帝国皇帝

北欧突袭者的转变

斯堪的纳维亚王国

封建主义出现

从北欧人到诺曼人

英格兰的继承危机

黑暗时代的遗产

参考文献

图片来源

返回总目录

引言

“黑暗时代”一词含有混乱、野蛮和暴力肆虐之义，这是一个国家面临崩溃而非迈向繁荣的时代。在这个时代，生活就是为了活下去而不得不为之的悲惨挣扎。西罗马帝国衰亡后出现了黑暗时代，这种观点一直受到各种各样的质疑。然而不可思议的是，它仍广为流布。

欧洲的“黑暗时代”是对一个特定历史时期的模糊表述，它开始于古罗马帝国的衰亡，大致结束于中世纪诸王国出现。这个模糊的称谓中包含了很多定义更精确的时期。这其中也包含地域性的差异，比如在某一时段，一个地区可能享受着安定繁荣，而另一个地区则可能正在遭受战争侵蚀或瘟疫和饥荒的摧残。总的来说，可以认为所谓的黑暗时代，是指从西罗马帝国崩溃到诺曼底王朝在英国出现这一时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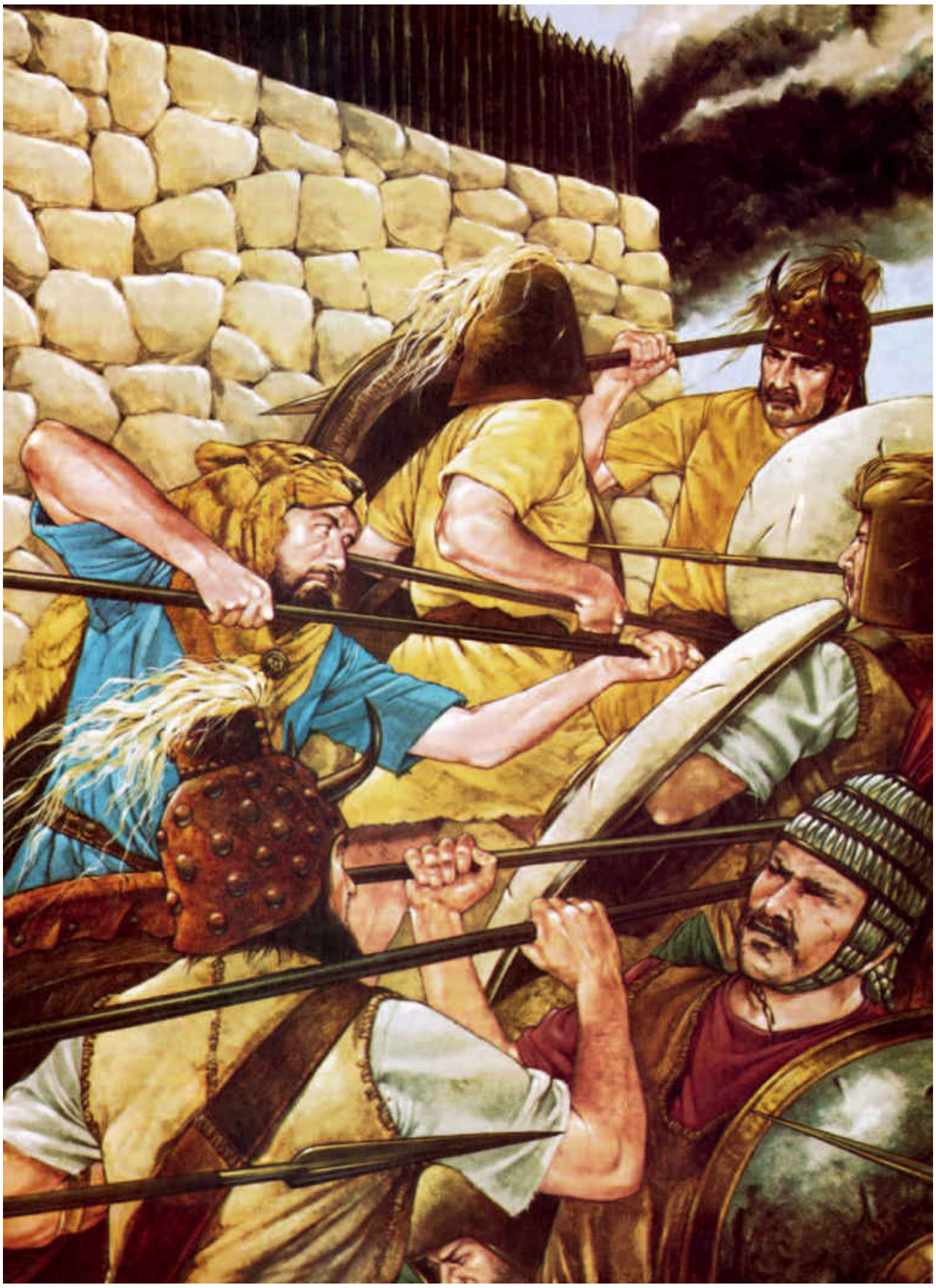


创作于1533年的作品，表现了罗马围攻阿莱西亚的场景。作品将16世纪的服饰和装备强加给了彼时的高卢人和他们的敌人。画面中罗马人在神圣罗马帝国双头鹰的旗帜下战斗，这也许意味着神圣罗马帝国继承了罗马帝国的荣耀和地位。

许多文明都出现过长达数个世纪的黑暗时代，希腊尤甚。希腊的黑暗时代从公元前1200年迈锡尼文明衰落开始，持续了大约400

年。这个时代也是跨度更大的青铜时代大崩溃的一部分。在这次大崩溃中，也有其他文明被摧毁。关于这一时期，我们所知甚少，因为它几乎没有保存下来任何记录。但很明显，这一时期的东地中海文明遭受了战争和政治动乱的蹂躏。

有迹象表明，在古希腊和地中海，一个又一个沿海城市遭到了有组织的破坏。因为人口大大减少，整片整片的土地几乎都被废弃了。崩溃是如此彻底，以至于后人以为在这之前发生的一切只是口述历史或虚构故事中的英雄传说和神话。相比较而言，欧洲中世纪的黑暗时代反倒显得温和了。



公元前1200年左右，迈锡尼文明衰落，这是席卷东地中海的更普遍灾难的一部分。人们对这之后的“希腊黑暗时代”知之甚少，只知道当时人口 数量急剧下降，城市废弃。

用“黑暗时代”这个词来形容一个文化程度较低、作品留存相对较少的时代，或许是合理的。然而，这一时代未必充斥着混乱和暴力。在西罗马帝国灭亡后，欧洲文明的发展程度的确大不如前，

或者至少不如从前那样辉煌。这一时期也确实存在大量的冲突和破坏，一些区域文明受到重创，甚至被连根拔起。

然而也是在这一时期，后罗马时代的国家竭尽全力建立了一种新的秩序，或者说使诸王国趋于一体化——虽然带有地方色彩。这些新兴王国是欧洲现代国家的基础。此外，探险家在遥远的海外发现新大陆并建立了殖民地，而商人则与非洲和远东建立了联系。

这一时期人们修建了伟大的工程，法律体系的主体也已出现。在657年的惠特比，建造修道院的希尔达并没有在蛮荒中挣扎度日；664年，参加惠特比宗教会议的人们也对自己的未来充满信心，他们认为自己可以计算出庆祝复活节的正确日期，还对计算方法进行了讨论。

前罗马时期的欧洲

罗马帝国崩溃，人们想当然地以为文明之光逐渐暗淡。在鼎盛时期，罗马帝国的疆域从地中海的一端一直延伸到另一端，甚至更远。它建立了一个统一的贸易、国防和法治体系。当然，这个体系并非尽善尽美，还是有一些缺陷的。宏大的版图和内部腐败，让帝国并不像一个偶然路过的观察者所想象的那样完美。尽管如此，罗马强大的国力依然使人们在对外开拓、学习和贸易上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深度。

在罗马帝国兴起之前，欧洲被分割成无数的城邦和部落。虽然城邦和部落之间的冲突不可避免，但这都是暂时的。大多数时候，部落之间的关系都很友好，相互之间也开展了长途贸易。在那个时代，距离是一个很大的障碍，旅行意味着要经过许多小城邦和部落的领土，而每一个小的城邦和部落都有各自的通行准则。商路上任

何一处发生冲突都会带来破坏性的后果，如果没有沿途国家的强力保护，商队就很容易受到攻击和劫掠。



表现布料和皮革贸易的浅浮雕作品，来自德国特里尔。罗马帝国的稳定有利于商业发展，商业对于帝国的生存至关重要。

前罗马世界并不存在现代意义上的民族国家概念，当时，地区差异比总体的相似性更为重要。雅典人和斯巴达人都是希腊人，但他们只忠于各自的城邦，也许还包括该城邦的盟友。非盟友城邦遭到攻击，他们可能无动于衷。如果竞争对手因此被削弱，他们甚至乐见其成。与此类似，北欧的部落群可能被贴上“高卢人”或“凯尔特人”的标签，但除了建立在部落联盟基础上的联系，各部落之间没有任何统一性可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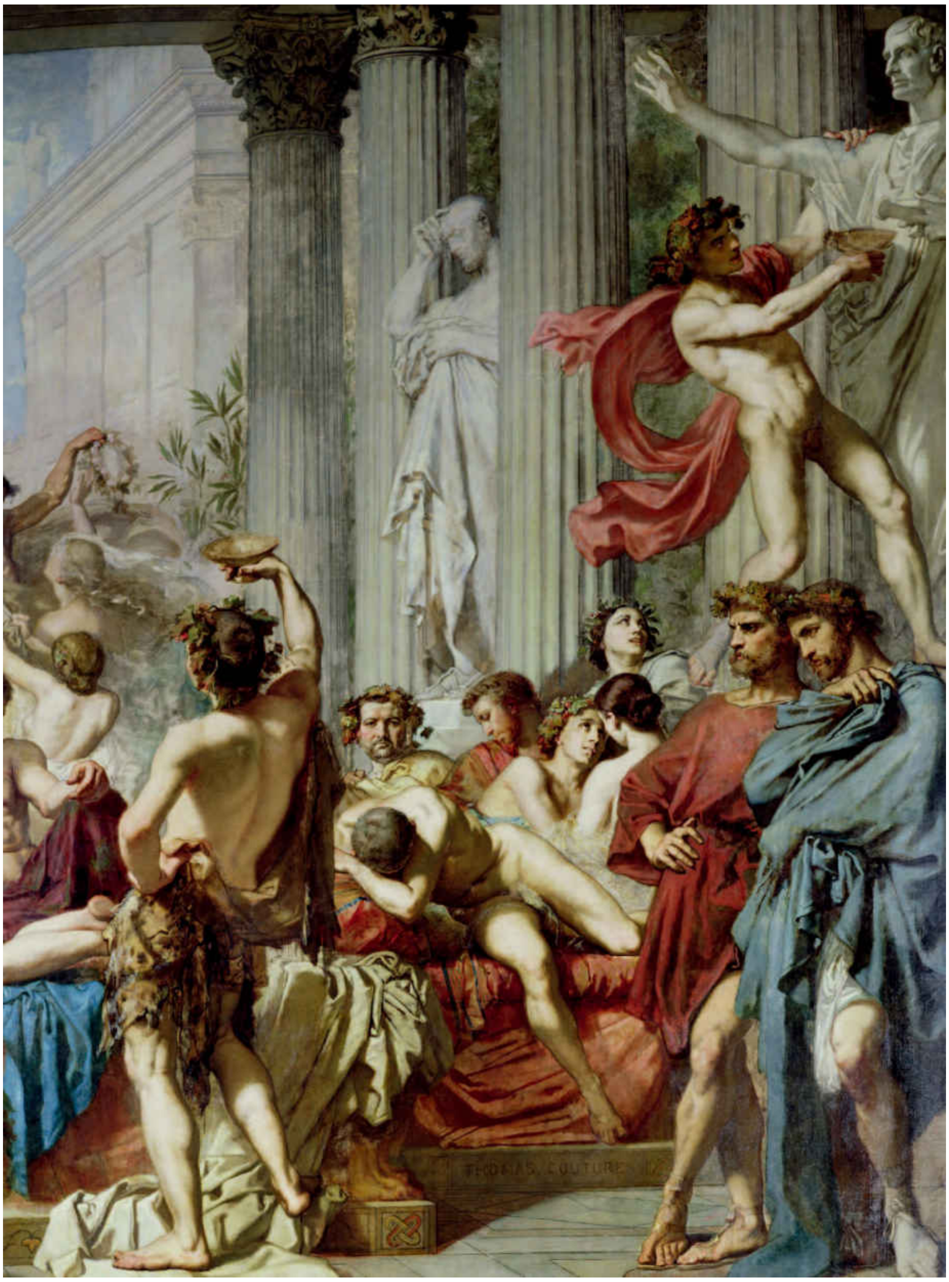
正是这种地区和部落的差异以及它们的各自为政，使得罗马——最初它是一个联盟城市共和国的领导者，后来成为一个帝国——有机会征服并统治欧洲和近东。各个部落和城邦可能会联合起来对抗罗马人的入侵，但它们不能组建系统的后勤和服从统一指挥与调度的军队。最重要的是，部落和城邦的联盟通常是暂时的。对它们来说，今天的盟国很可能就是明天的敌人。一部分人认为必须抵制罗马的扩张，于是他们进行了零星的抵抗。而另一部分人，要么屈从于罗马人的经济手段，要么在无法抗拒的形势面前乖乖认命。

新视角下的统一罗马帝国

尽管罗马帝国存在种种缺陷和内部冲突，但是大多数时间里它都是很稳定的，而且贸易和语言的融合也促进了它的繁荣。与部落或城邦相比，罗马帝国可动用更多资源来解决问题。它不仅经受住了艰难岁月的考验，而且完成了许多伟大的工程。在更稳定的环境中，学习研究和知识共享也得到了蓬勃的发展。



我们对古代欧洲世界的了解大多来自罗马著作。得益于罗马这个强大帝国的教育体系，我们才能看到更多的宗教文献之外的后罗马时代的记录。



一幅展现罗马颓废生活的作品，绘于1847年。文明的发展使得人们可以在生活中懒惰，并纵情享乐。一旦颓废压倒了活力，罗马帝国就注定走向毁灭。

鼎盛时期的罗马帝国似乎坚不可摧。退役士兵可以获得土地和酬金而不用交税（这种优厚待遇激发了他们的斗志和战斗力），使得整个欧洲不可避免地罗马化。这些富有且经验丰富的男人在家庭生活中使用其他地方的用人，他们传播了罗马的价值观，加之罗马

货币的推动作用，于是一个统一的欧洲文化体初现端倪。然而，帝国衰落了，留下了权力真空。随之而来的，是被东方入侵者骚扰的游牧部落时代。因此，当历史学家不合时宜地将黑暗时代的艰难与伟大的罗马帝国的不足之处进行比较时，就很少有人会惊讶了。至少在某些人看来，当时的人确实生活在一个黑暗的时代。辉煌灿烂的罗马文明之光已经熄灭，取而代之的是摇曳不定的微弱烛光。

可是，在这个黑暗时代末期，却出现了伟大的王国。基督教传遍了整个欧洲，人们建造起大教堂。中世纪出现的那些国家，后来演变为当今欧洲各国。也许，把这段历史看作一个过渡期而非黑暗时代会更加合适。在这个时期，古代世界逐渐被清除，现代世界的面目开始显现。

第1章
罗马帝国的崩溃

很难说罗马帝国是何时衰落的，或者从什么时候开始，它的衰亡变得不可避免。有人认为，可能早在哈德良皇帝（117—138年在位）时期，罗马的衰亡就开始了。哈德良下令在帝国的边缘地带建起永久性的防御工事，这标志着罗马扩张时代的结束。

所有帝国的早期都是扩张阶段，接下来是一段时间的巩固期，这个时期也可能变为停滞期。危机不可避免，实际上，危机延长了帝国的寿命。因为，克服危机需要投入巨大的力量，随之喷薄而出的新思想可以重振帝国，使它焕然一新。



罗马灭亡之时，常被视为西欧文明之光熄灭之日。出现这种观念，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很久之后出现的古典学者对罗马帝国理想化的想象。实际上，这一时期的真实情况要复杂得多。

看似和平与繁荣的黄金时代，在某些情况下会让国家失去动力和能量，已到中年的帝国舒适地打着盹儿，而在它的边界上已经出现了更年轻且富于活力的社会。这个时期，帝国中还出现了一种不

再关注外部世界的趋势，人们变得更加关注个人进步及其所需的内部动力。一场适时的危机，可能带来新一轮的扩张或重组；哪怕仅是让人们重新关注外部事务，也可以让一个帝国延迟它不可避免的衰落和灭亡。而同样的危机若出现于帝国四分五裂之时，则会引发突然的灾难性崩溃。

一个帝国的成长

在罗马共和国早期，边界上的部落对其存续构成了严重的威胁。这种威胁从未消失，但随着时间的推移，罗马人对自己的统治地位越来越自信。到了罗马帝国时期，对抗敌人的任务依然很艰巨，但在150年，连普通罗马市民都不再担心公元前390年的历史会重演。那时，高卢人的军队大肆洗劫了罗马。



不列颠尼亚北部的哈德良长城充分利用了自然地形，构建了一道令人生畏的屏障。建造这道屏障，意味着承认该长城以北的土地无法被征服。

共和国初期面临的危机迫使罗马进行改革和创新。公元前390年罗马遭洗劫后，军队改进了他们的武器和战术。第一次布匿战争（公元前264—前241年）时，为了成功对抗迦太基人，罗马人建立了一支海军。高卢人入侵意大利的威胁，迫使罗马社会发生变革，由此造就了堪称经典的罗马军队。罗马人还在盖乌斯·马略（公元前157—前86年）的领导下对军队的训练和作战方法进行了革新。

上述种种危机，不仅催生了罗马帝国的政治制度和军事思想，而且缔造了成为帝国利器的陆军和海军。有时候武力征服是必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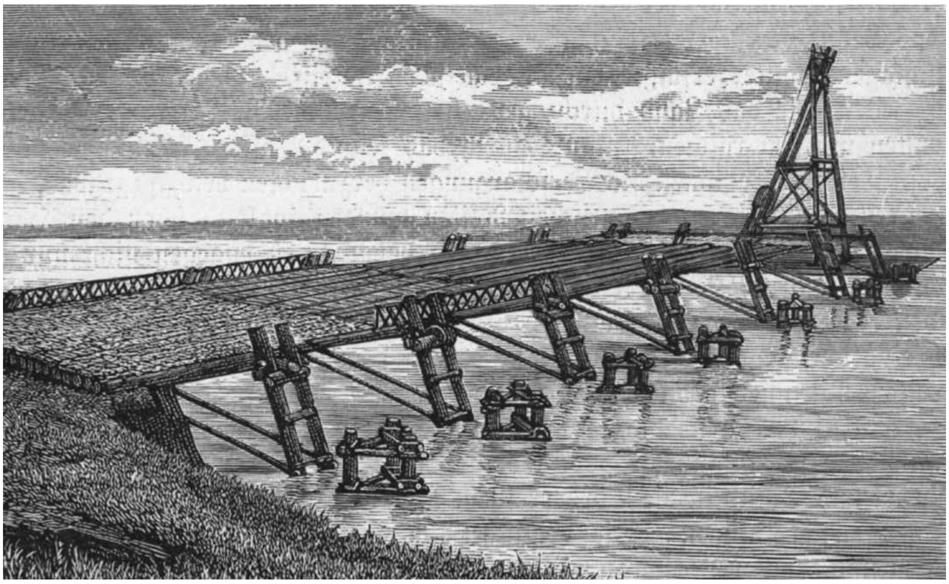
的；而在另外一些情况下，某种程度的和平归顺更为重要。然而，罗马的扩张，主要是以个人的野心为养料“成长”起来的。

最为典型的例子便是盖乌斯·尤里乌斯·恺撒，他策划了一场与其邻居高卢部落的战争，掀开了征服战争的帷幕。他的初心是通过战争抬高自己，或者从耗资甚巨的战争所引发的财政危机中抽身。目的达到了，但他并没有就此收手，而是继续对高卢的战争。他的许多行动是没有必要的，某些情况下，出兵的理由只是为谋取私利而精心编造的借口。恺撒进行了一系列冒险活动。比如他在莱茵河上架起桥梁，短暂地突袭不列颠。最重要的是，他树立了自己杰出的军事和政治首领的形象——在罗马社会，这两种身份是交织在一起的。同时，他还得到了一支身经百战的军队的支持。当恺撒返回意大利时，他的敌人望风而逃。于是，他在内战期间控制了罗马城，最终成为罗马帝国唯一的统治者。



第一次布匿战争时，罗马人若不想失败，就必须进行创新。他们并不是天生的水手，但经过创新，罗马摧毁了迦太基的海军力量，从而扭转了战争的局势。

恺撒并不是罗马帝国的第一位皇帝，但他的所作所为使罗马从共和国转变为帝国，也为之后的罗马政治定下了基调。手握大权外加有军队支持，或者有足够力量击败对手时，就可以染指帝国皇位。发动对外战争可能是必要的，但也可能只是一种权力游戏，这种游戏真正的目的是争夺帝国的控制权。



在莱茵河上架设桥梁是一种令人钦佩的行为，但并无必要。恺撒这样做，实际上是在炫耀战功，用以提升自己在罗马的地位，而不是捍卫罗马的利益。

越过卢比孔河

尤里乌斯·恺撒被召回罗马，但带着军队穿越卢比孔河进入意大利是被明令禁止的。恺撒认为这样做是想让他失去军队的保护，因此他宁愿犯叛国罪，也不让自己孤身踏入敌人的阵营。此

时，冲突已经无法避免。如果恺撒听从命令不带军队进入罗马，他可能会被悄无声息地解决掉，历史也会发生巨大的变化。



尤里乌斯·恺撒从来都不是真正的皇帝，但他的名字却成了“皇帝”的代名词。直至20世纪，俄国沙皇和德国皇帝的头衔依然来自恺撒的名字。

建立罗马帝国的这种方式既有其突出的魅力，也有明显的缺陷。强大的罗马军队掌握在奋发图强、雄心勃勃的人手中，就会成为帝国发展的有效工具。但这种工具指向内部和外部同样容易。当

皇帝的野心面向外部时，罗马会因此强大；而当内部冲突消耗了统治精英的注意力时，边界上的威胁可能会迅速增长。

太平岁月的利与弊

罗马帝国的强大使其治下能够在一段时间内保持相对的和平与稳定。通常认为，这段和平时期从公元27年持续到180年。当然，并不是到处都和平而安宁。但一个有效的统治体系和快速向一个地区调动军队的能力，确保了即使发生叛乱，帝国也可以在很短的时间内将其平息，面对外部入侵亦能迅速组织有效抗击。

罗马军队的演化

罗马军队最初与同时代的希腊城邦军队相似。主要的突击部队由重装步兵组成，重装步兵装备长矛，近距离作战。服兵役的公民需要自备武器和盔甲。这一时期，战争主要是上层社会公民的事情。小市民则进入轻装的支援部队。

这种模式在罗马城邦时期是足够应对局面的，尽管它能派出的重装步兵并不适应意大利的山地地形。这种模式使得组织化的步兵逐渐成形，最终形成了曼努尔军团。新的军团不再像昔日固定的方阵那样战斗，而是被细分为可以独立调动的步兵中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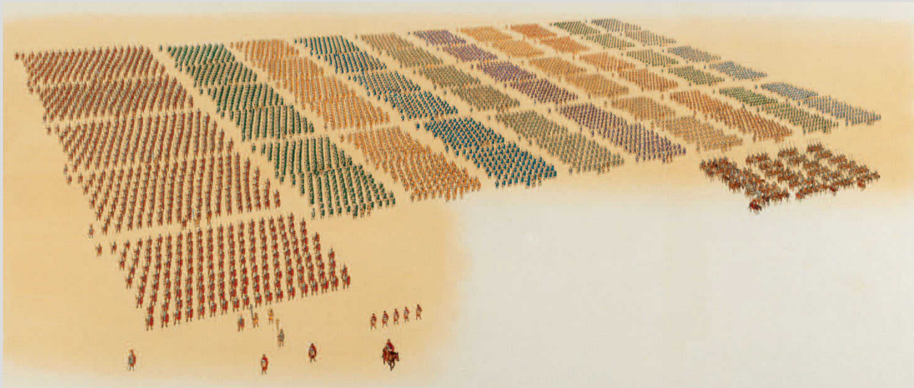
一个军团大约有4200名步兵，并有骑兵和轻步兵为其提供支持，整体是一支灵活的联合武装力量，足以应对大多数威胁。在对仍采用方阵作战的希腊军队的一系列胜利中，充分体现了这种新安排的优越性。最初，每个步兵中队的第三排由最有经验的战士组成，他们还在使用长矛，而前两排则使用剑和标枪作战。最后，所有的罗马步兵都改配短剑和短矛。

步兵中队这种组织体系运行良好，但它需要比方阵或无组织的士兵更高层次的训练。

罗马的实力与日俱增，对士兵数量的需求也日益增长，有时土地所有者和商人都得投身战争数年之久。由此对经济造成的破坏，削弱了国家力量，最终迫使罗马做出一系列彻底的改变。



面对蛮族敌人时，罗马的主要优势是一套复杂的战术体系 。军队之间相互支持，以便于缓解前线士兵的疲惫。



军团组织让复杂的战场机动成为可能，但要保证机动不陷入混乱，就需要训练有素的专业军队。

这其中最重要的变化，是改由国家提供武器和盔甲，而不再让个人负担。同时征兵的阶层范围扩大了，以此确保服兵役一事不再主要由最富有的公民承担。这次改革还产生了一个专业的士兵阶层，他们长期作战，受过正规的训练并且拥有丰富的经验。于是，在战场上士兵们可以有效地支援友军，国家也可以远距离调动军队。军团摒弃了组织化的骑兵和轻步兵这些兵种，代之以独立编制的辅助部队。

从此，意大利本土以外出生的人也可以通过在军团服役来获得完全的罗马公民身份。男性需要服25年兵役，服役期满后，他就会获得罗马公民的身份和相应的土地、金钱。在属于勇士和公民士兵的时代，为罗马打下整个帝国的军队是一支专业的武装力量，而且有强大的后勤保障。这在其他地方是不存在的。罗马帝国击败敌人不只是依靠军团的利剑，组织、训练军队和后勤的精心筹谋同样功不可没。

罗马帝国在117年达到鼎盛。这一时期的军事体系是典型的罗马模式，即重型步兵组成军团，军团的辅助兵团则为轻步兵、骑兵和弓箭手等特殊兵种。一个行省的军团要在另一个行省服役，这降低了军队同情当地叛乱的可能性。退役士兵在他们曾经服役的土地上定居，成为地主和商人，他们推动了当地的罗马化。在将来某一天，这也许会衍生出统一的欧洲文化。

危机和冲突威胁着这一时期的罗马，一如早期扩张时的境况。但它仍然是罗马最强大的时期，更重要的是，这是罗马一统天下的时期。危机是刺激帝国活力再现并使之强大的机遇，而非高悬于帝国头上的“达摩克利斯之剑”。因此，尽管边境并不太平，但帝国的未来看起来还是非常光明的。

也许罗马人对他们的未来太过自信，也许帝国实在太大了，即使是高效的罗马政府，也无法有效地运转这架庞大的帝国机器。随着泥土和木头被石块代替，边境上的临时防御工事变成了永久性的军事建筑；人们开始关注帝国内部而忽视了外部问题。与壮大帝国的力量相比，罗马人更看重帝国内部的权力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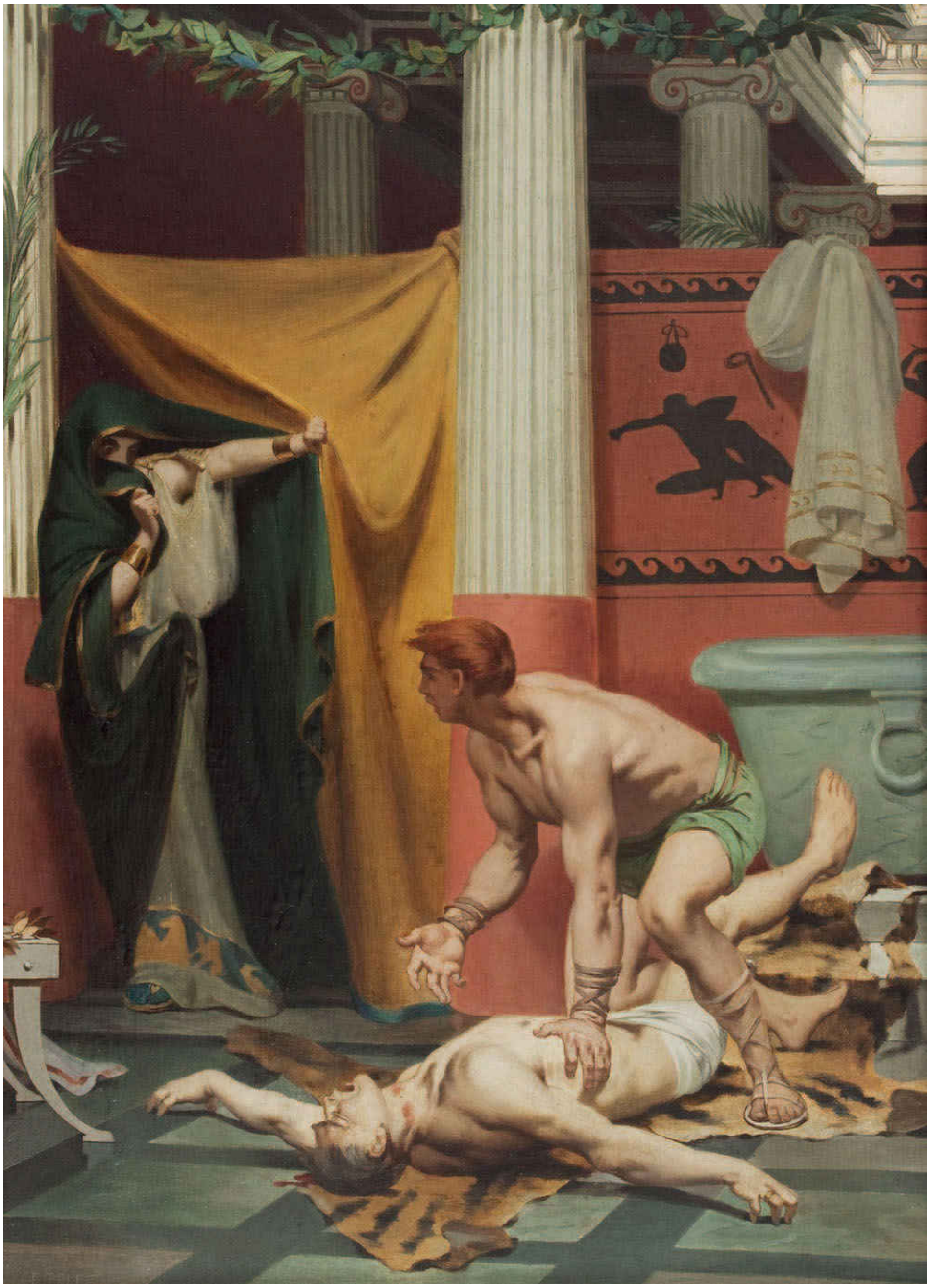
随着泥土和木头被石块代替，边境上的临时防御工事变成了永久性的军事建筑；人们开始关注帝国内部而忽视了外部问题。与壮大帝国的力量相比，人们更看重帝国内部的权力了。

盛极而衰

180年，罗马“五贤帝”中的最后一位——马可·奥勒留去世，这标志着罗马和平时代的结束。他的继任者康茂德在位时维持了一段时间的和平，但他统治期间被种种阴谋困扰。康茂德被刺杀后，193年，罗马爆发了内战，一年内出现了五位皇帝——这就是著名的“五帝之年”。

罗马之剑

“西班牙短剑”之于罗马军团的意义，尽人皆知。这种西班牙剑源自凯尔特人的武器。起初罗马人使用的是一种有沉重锋刃的希腊式短剑，这种武器后来被一种更适合砍杀的长剑代替。这种长剑看起来很像罗马军团的蛮族对手所使用的兵刃。后期的罗马，军队常常装备部落武器，罗马不再真正努力为各个军团提供统一的装备了。



疯狂的杀戮导致康茂德遇刺，他被一名职业摔跤手勒死。



禁卫军享有许多特权，比如服役时间比普通军团更短。他们也许还可以向皇位候选人勒索巨额财富。

腐败加上内部斗争，耗尽了帝国的力量。禁卫军理应是皇帝的贴身护卫，但他们收受巨额贿赂，而且胃 口越来越大，变得越来越像拥立皇帝的人——他们邀请想成为下一任皇帝的人出价“竞标”，而且这种邀请从某种意义上说是公开的。

这一时期的罗马军队发生了重大变化。边境上的军团驻地逐渐固定，其中一部分将士被抽离出去处理其他地方的问题。军团里年富力强的成员被派往动乱地区，对年老体弱士兵的部署则相对保守。与前辈相比，前线军队的作战能力自然是下降了。很重要的原

因是他们的心态偏于防守，不像以前的军团那样在持续的进攻中变得强悍。但边境驻军仍是富于战斗力的，而且他们可以从帝国内部的行省获得支援。

从帝国之外征募士兵成为一种惯例。在辅助部队服兵役的人不会被授予公民身份，但他的儿子可以因此获得在罗马军团服役的权利。用兵役换取公民身份的兵员机制持续为军队输送高质量的新兵，虽然随着时间的推移，罗马军队变得越来越“野蛮”。此处的“野蛮”意味着军队作战时不再使用曾经是中坚力量的组织严密、装备统一的军团战阵，而更乐于采用带有新兵原始作战风格的阵形。这是非常有效的措施，特别是在骑兵取代步兵，成为罗马军队主要进攻力量的情况下。军队不再按罗马军团的方式训练新兵，而是越来越普遍地利用他们已有的技能作战。

用兵役换取公民身份的兵员机制持续为军队输送高质量的新兵。

3世纪后期，帝国逐渐衰落并且四分五裂。经年累月的内部冲突和权力争夺，侵蚀了帝国的凝聚力，也削弱了处理危机的能力。罗马帝国需要一支庞大的军队来抵御外族入侵，同时还要防止自己人掏空国库，而此时的国库已不再充斥着来自被征服土地的战利品了。可政客们仍然将大量的金钱花在挫败彼此的计划和行动上，而不是用来解决帝国的问题。

防守型策略依赖于驻防地区坚固的防线，但如果这道防线被攻破，入侵者就可长驱直入，除非出现有力的反击。然而，很难组织这样的反击。3世纪末，许多城市遭到了洗劫。这实际上是一场军事政变。罗马的政治和军事事务交织紧密，事实上，任何一个有权势的人其本质都是军人。

罗马帝国分裂

284年，戴克里先在军队的支持下称帝。虽然帝国的危机暂时得以缓解，但要想彻底改变，仍需从长计议。他把治下区域分为东罗马和西罗马两个帝国，分别以拜占庭和罗马为中心，希望两片土地都能得到更有效的治理，进而使整个罗马帝国都得以繁荣。

罗马骑兵

在罗马早期历史中，一个军团包括300名骑兵，他们均来自上层社会。之后这个数字翻了一倍。骑兵的加入为早期的军团带来了机动攻击的力量，但重要的进攻还是由更庞大的步兵部队实施。

随着时间的推移，这支骑兵逐渐被淘汰，代之以辅助兵团的骑兵，而军团的所有成员均为步兵。骑兵组成一支单独的部队，作为军团侧翼。虽然骑兵人数比之前多了，但他们主要承担掩护、侦察和侧翼守卫的职责。

帝国的军队逐渐固化，心态上更趋于保守，骑兵通常在边境的设防区之间巡逻，应对外族入侵和小规模的叛乱。这一时期，帝国军队各支部队在装备方面差异很大，但骑兵大都配备几支轻型长矛和一柄剑，通常是罗马重剑，比以往步兵使用的西班牙短剑长出许多。事实上，步兵在一段时间后也开始使用更长的剑。

一些骑兵会使用长枪，而不是投掷长矛，他们大多数身穿鳞甲或锁子甲，并有头盔和盾牌保护。东罗马帝国的甲胄 骑兵和重骑兵的防护装备非常繁复，西罗马帝国骑兵的铠甲则较为轻便。

久而久之，这些武装的马背战士——通常来自蛮族而不是文明程度较高的罗马行省，成了罗马军队的主要攻击力量。步兵仍然重要，但是骑兵才能追击入侵者或击溃突击队。而且在战场上，罗马骑兵的威力也增强了。

西罗马帝国覆灭时，骑兵在大多数地区已被视作主要的战斗力量，成为一名骑兵是崇高社会地位的象征。可以说，骑士对整个欧洲的经营，始于罗马帝国的晚期。

但这个尝试并不成功。305年，戴克里先退位，随之而来的是一段时期的内战。此时，君士坦丁大帝出现了，他是罗马帝国分裂前的最后一位统治者。在他之后，帝国再次陷入分裂。君士坦丁大帝还皈依了基督教，而此前基督教的信徒曾遭到迫害。他这一举动使基督教成为罗马帝国的官方宗教，尽管这个过程并不顺利。



皇帝戴克里先试图建立一个拥有四个统治者而不是仅有一个皇帝的统治秩序，以此结束多年的内乱。

东罗马帝国重新把都城命名为“君士坦丁堡”，在分裂后走上了独立发展的道路。在中世纪，东罗马帝国参与过欧洲和中东的政治事务，并短暂地尝试过收复西罗马帝国。东罗马帝国后来成为拜占庭帝国，一直存续到1453年，彼时的欧洲正在经历后世称之为“文艺复兴”的运动。而另一边，西罗马帝国则要面对崩溃和被征服的命运。

匈奴人入侵

匈奴人的起源之地并不确定。据推测，他们来自遥远的亚洲东部，多年间一直向西迁移。罗马文献首次提及匈奴是在公元91年，据说他们生活在里海附近，也就是现在的哈萨克斯坦一带。

1世纪结束时，匈奴人对罗马并未构成多大的威胁，此时也没有哪个蛮族部落或部落联盟真正做到这一点。匈奴人离罗马太远，比其他部落的领地更远，他们也没有足够强大的力量挑战罗马军团。这一时期的罗马文献不仅对许多部落的真实身份语焉不详——也许是因为撰写者本身就缺乏明确的信息，而且倾向于用笼统的概括性文字来指代某个地区的人。对里海地区的部落，常用的名字是斯基泰人（Scythian）。



匈奴人战胜了阿兰人，吸收了他们的战士，以备日后进行更远大的征服。那些未被征服的人被驱逐到西方，他们在那里造成了巨大的破坏。

历史的车轮缓缓前进，部落联盟形成又瓦解。有时联盟会征服其他部落，成为一股更强大的势力，但是这股更强大的势力往往存

在时间短暂。有的时候，一些平时联系并不紧密的部落会组成统一的联盟；而另一些时候，联系甚紧的部落却可能从属于不同的群体。罗马人和其他外部落的人所说的部落联盟，更多是基于政治考量，而不是从自然或文化传统的角度划分。

阿兰人是活跃在4世纪后期的主要部落群体之一，他们可能起源于里海或咸海地区。罗马人在多年前就非常了解他们，而且一度认为他们是世界上最好的骑兵。阿兰人雇佣兵为许多雇主服务过。作为一个政治团体，他们曾在波斯与萨珊王朝作战；曾与帕提亚人短兵相接，也曾与他们并肩作战。后来哥特部落进入阿兰人活动的地区，阿兰人与雇主的联盟关系遭到破坏，这促使阿兰人在多瑙河和顿河两处建立了聚居点。这可能是匈奴人崛起的原因之一。一部分阿兰人支持和认可匈奴人，一部分则反抗他们。最终匈奴人取得了胜利，占领了以前属于阿兰人的土地，并把他们赶向西部。

阿兰人和匈奴人都欣赏机动而极具侵略性的战争形式。

阿兰人和匈奴人都在马背上用弓箭作战，他们都欣赏机动而极具侵略性的战争形式。传统的罗马军团并不擅长同这样的敌人作战，这在以前的战斗中已经显示出来。早在公元前53年，恺撒大帝的同时代人克拉苏率领的罗马军队，就倒在了卡雷地区的帕提亚骑兵脚下。

370年的罗马军队与克拉苏的军队已有很大不同。他们的装备不那么统一，但骑兵的数量要多得多，至少在机动性上可与匈奴人相匹敌。更重要的是，罗马帝国开始允许流离失所的部落在帝国的边界线内定居，以此构建出一个缓冲地带，来抵御外部敌人的入侵。

克里米亚的哥特人因匈奴人的入侵而被迫向西迁移，他们作为同盟者为帝国效力，而帝国允许他们在多瑙河沿岸定居。同盟者并不是罗马公民，但是帝国希望他们守卫自己居住的土地。这样罗马帝国的腹地就可以得到强悍的蛮族战士的保护。这一举措增强了帝国的防御力量，也消除了来自流浪部落的威胁。

这本来是一个有效的策略，前提是帝国与这些同盟者保持良好的关系。如果罗马行省的长官对这些部落过于苛刻，这种良好关系就不复存在了。定居多瑙河不久，哥特人就爆发了叛乱。一系列小型战斗最后升级为一场大的危机，于是皇帝瓦伦斯召集了平叛的军队。378年，瓦伦斯的军队在阿德里安堡附近与哥特人的步兵部队对峙，而哥特人的骑兵并不在场。但皇帝错过了发起致命一击的机会。他进军时一直犹犹豫豫，使得哥特骑兵有了足够的时间赶回，从而最终击溃了罗马军队。



哥特人在阿德里安堡取得胜利后，向君士坦丁堡推进，想趁罗马帝国选出新皇帝之前进攻他们的首都。但行动并没有成功，哥特军队也被迫撤退。

一些史学家提出，阿德里安堡之战标志着骑兵取代步兵，成为欧洲战争中的主要作战力量，为接下来几个世纪的军事奠定了基

调。尽管未来趋势已明，可彼时的情况是瓦伦斯皇帝在阿德里安堡被杀，军队损失惨重。这进一步消耗了帝国的军事力量。这次失利的后果之一是，帝国开始更加依赖同盟者而不是罗马军队。至此，保护罗马帝国的战士与前几个世纪的军团相比，只剩下最表面的相似之处了。

阿拉里克一世洗劫罗马

人们对西哥特国王阿拉里克一世的早期生活知之甚少。他大概在370年出生，可能生于一个很有权势的家庭。和当时的很多蛮族首领一样，他在罗马帝国担任军队的指挥官，最后成为将军。他所率军队的成员都是从自己的族人中挑选出来的。阿拉里克曾参与罗马皇帝狄奥多西——统一的罗马帝国最后一位皇帝，和西罗马帝国皇帝弗拉维乌斯·尤金纽斯之间的斗争。尤金纽斯要求承认其地位，但遭到了狄奥多西的拒绝。不仅如此，狄奥多西还镇压篡位者，在军队里招募了大批哥特战士。



这幅西哥特国王阿拉里克一世的画像出现了时代错误。他穿的这种结构严密的板甲，在他之后的几个世纪之内都不会出现。

394年，阿拉里克的哥特人军队在冷河之战中伤亡惨重。他认为，为了保全罗马人的性命，帝国对哥特人的牺牲冷眼旁观。但是哥特人受制于一项条约，该条约允许他们作为同盟者在巴尔干半岛居住，前提是他们要在得不到公民身份的情况下服兵役。狄奥多西死后，罗马帝国分裂成东西两部分。阿拉里克试图重新谈判条约内容。外交手段失败后，他在巴尔干半岛发起了一场掠夺运动，洗劫了几个城镇，以此来证明罗马需要哥特人为其提供保护。

哥特人和罗马人最终达成了一笔交易，阿拉里克与西罗马帝国结盟，征服东方。这笔交易看起来前景不错，但高卢人的入侵和其他威胁的出现，使得交易进展并不顺利。阿拉里克被迫等待它的盟友解决麻烦，这样西罗马帝国就很难按照约定给阿拉里克运送必需

的援军和财物。于是，哥特人又采取了强硬策略，开始向西进军罗马。

步兵对骑兵

罗马军团是一支强悍的战斗力量，它在面对步兵时优势最为明显。面对骑兵时，如果敌方骑兵偏爱手持武器，军团可以排成防御队形，静待敌人接近时用短矛和短剑进行反击；若遇到骑兵弓箭手，军团则处于极其不利的境地。

这导致罗马败于帕提亚人之手。军团需要辅助部队或盟军骑兵的支持，以对抗机动性强的对手，但他们远不如罗马军团那么可靠。

在公元前53年的卡雷之战中，帕提亚骑兵击退了罗马的骑兵援军，疲惫不堪的罗马军团既无援兵，又没有还击之力，于是帕提亚骑兵彻底击溃了一支庞大的罗马军队。由于匈奴和其他民族骑兵的不断入侵，罗马帝国不得不越来越多地使用自己的骑兵。



罗马被阿拉里克率领的西哥特人攻陷，多少有点让人摸不着头脑。虽然阿拉里克并没打算征服这座城市，但西罗马帝国也没有为捍卫它而做出任何努力。

西罗马帝国认为哥特人的这种行为是一种威胁，于是集结军队进行反击，并且屠杀阿拉里克的潜在盟友。这引发了一系列的变化，一些原本可能反对阿拉里克的力量转而支持他进攻罗马。哥特人在前往罗马途中洗劫了许多城市，不过他们故意绕过了当时西罗马帝国的首都拉文纳。

阿拉里克率军包围了罗马城，要求罗马人对其进贡，但他仍有意与帝国进行谈判。他没有进攻这座城市，而是把它当作“人质”，希望拉文纳能识时务。西罗马帝国采取了一些象征性的外交手段后，还是决心将野蛮人赶出意大利，并打算派出军队解决罗马的围城之困。这些动作很容易被哥特人察觉。

阿拉里克最终失去了耐心，他的军队洗劫了罗马，然后继续向西西里进军。他来到罗马，与其说是一个征服者，不如说是为了增加谈判的筹码。但西西里作为帝国的精神家园，没有任何谈判的余地和可能，阿拉里克对此也束手无策。他死于410年，他的继任者阿陶尔夫决定进军高卢。尽管阿拉里克没有看到这一天，但他的理想终于实现了。哥特人在高卢建立了一个新的家园，在那里他们不再受制于罗马人。罗马帝国失去了同盟者哥特人的支持，而且哥特人在迁往新家园途中还对帝国造成了破坏。在这种双重打击下，罗马人的帝国再也无力恢复元气了。

匈奴的进一步征服

匈奴首领鲁吉拉（Rugila）死于433年，死后权力移交到他的侄子布莱达和阿提拉手里。虽然常常被统称为“匈奴人”，但他们

军队的士兵来自许多不同的部族，包括哥特人、阿勒曼尼人和阿兰人。这些部族的骑兵基本与匈奴相似，但匈奴军队还包括大批步兵。匈奴军队还使用攻城武器来破袭城镇的防御工事。



我们所说的各种中世纪阿提拉的形象，更多地指创造这些形象的文化，而不是阿提拉本人。阿提拉不会把自己定位成一个西欧中世纪的君主。

匈奴人似乎比他们的对手罗马人更善于利用外族战士，也许他们对待外族战士更宽和一些。匈奴人作为敌人很可怕，而作为宗主却很慷慨，这两点在很大程度上保证了他们组成的联盟的稳定性。

于是，这些庞大而稳定的匈奴人联盟对罗马构成了严重的威胁，使他们能向罗马勒索巨额钱财。在435年和439年签订的条约中，罗马保证向匈奴人进贡，以此为交换，匈奴人放弃攻打罗马，而另寻其他目标。



阿提拉和他的战士焚烧阿奎拉城。这种残暴的行为曾是一种威慑的手段，相当于杀鸡儆猴。其他城市往往会选择和平归顺，以免被焚城。

也许罗马人认为他们做了一笔好买卖。作为对巨额进贡的回报，匈奴人同意保卫多瑙河地区，这样罗马军队就可以被派往其他地方。以这种方式让各个蛮族相互制衡是罗马当时的典型战略，而匈奴人以前的确在罗马的权力斗争中充当过雇佣兵的角色。于是，在一段时间里，匈奴人的注意力转向了其他地方，尤其针对萨珊波斯。这让罗马官员喜不自禁。毕竟，自己两个潜在的敌人相互争斗，终归是一件好事。

此时，罗马面临另一场危机。战争和瘟疫削弱了它的力量，它迫切需要重建，但支持它重建的资金远远不够。国力虚弱又招致叛乱，进一步消耗了帝国实力，外族入侵也随之而来。崛起于北非的汪达尔人，占领了罗马的阿非利加行省。这威胁到了罗马的粮食安全，因为阿非利加行省已经成为帝国谷物和其他食物的重要供应地。

此事决不能姑息。为了向阿非利加行省派出足够的军队，罗马将军团从巴尔干半岛等看起来受威胁不那么严重的地区撤出。这样对匈奴是非常有利的。他们宣布与西罗马帝国缔结的条约无效。罗马人试图谈判，但没有成功。441年，匈奴人横扫巴尔干半岛，并洗劫了沿途的城市。

尽管罗马人从其他地方召回了军队，试图阻止匈奴人的进攻，但匈奴人还是占领了一座又一座城市，大军直至君士坦丁堡城下。此时，为避免城破，罗马只好同意大幅增加贡品数量，匈奴人这才撤退。只是用钱买来的和平很少能持久，这次也不例外。

匈奴王阿提拉的威胁

445年，阿提拉在哥哥布莱达死后成为匈奴唯一的统治者。对于布莱达之死是否与他有关，众说纷纭。但阿提拉在他的兄长死后

发动了新的征服运动，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在劫掠了巴尔干半岛后，阿提拉挥师西进。

从典型的罗马人视角来说，西罗马皇帝瓦伦提尼安三世的妹妹霍诺里亚试图诱惑阿提拉，想让他提供帮助，逃避一桩包办的政治婚姻。她把自己的订婚戒指送给了他，阿提拉却认定这是在求婚。阿提拉要求得到西罗马帝国的一大部分作为结婚礼物，而且他坚持这是霍诺里亚的意思。瓦伦提尼安三世不愿满足阿提拉的要求，于是匈奴人选择向西进军。



阿提拉和他的军队，插图出自14世纪的《阿提拉之战》。作品中阿拉提被描绘成半人半狗的形象，是基督教的敌人。

除此之外，匈奴入侵高卢的其他原因此前已提及，大部分出于当时复杂政治的考虑。阿提拉可能想在日耳曼尼亚和高卢建立附属国，或者解决他的宫廷中因收留逃亡的外国贵族而引起的政治问题。不管阿提拉入侵的借口是不是迫使罗马履行婚约——他坚称自

己收到了求婚戒指，总之他决定入侵高卢，而且对图卢兹（今法国西南部城市）周围发展起来的西哥特王国发动了战争。



在加泰罗尼亚战场上，罗马和法兰克的联军阻止了阿提拉对西欧的入侵。法兰克人是联军的一员而非同盟者，这显示了当时罗马的衰弱程度。

这就是当时罗马事务——各方认真考虑阿提拉提出的组成联盟反对西哥特人的建议——的状态。匈奴人和高卢的其他部族都不同程度地出现起义的迹象，罗马的主要问题是何时镇压他们，而非是否要镇压。一个世纪前的罗马帝国能够解决自己内部的问题，只要它口授一份合约，就会有部族前来相助。而如今，危机一个接一个，罗马只能负重而行。

此时，帝国的生存依赖于巧妙地把对自己的威胁转化为敌对势力之间的威胁。理想情况是，在镇压当前的反叛者的过程中，顺势削弱另一个潜在的反叛者。但是，确定谁才是最大的威胁颇为困难，最终罗马决定放弃攻打国王狄奥多里克[(1)]统治下的西哥特人，并与之结盟。于是，弗拉维斯·埃提乌斯将军带领一支罗马军队与

西哥特人联合，联军最终于451年在加泰罗尼亚战场上击败了匈奴人。

当时，阿提拉的军队包括来自被征服部落的战士，例如阿兰人、格皮德人和哥特人。他征服了东欧大部分地区，最终被包括罗马在内的盟军而非罗马军团击败。值得注意的是，弗拉维斯·埃提乌斯在利用这场胜利做文章还是支持西哥特人之间犹豫不决。他可能希望狄奥多里克的军队实力受损，从而解除罗马的一大潜在威胁。最终，狄奥多里克阵亡，匈奴人也被从西欧赶了出去。

阿提拉死后不久，匈奴带来的威胁被其内部斗争所瓦解。匈奴人在多瑙河流域（现在的匈牙利境内）保留了部分实力，但它不再主导欧洲大陆上的风云。然而，他们引发的一系列事件导致西罗马帝国被摧毁，一个新的时代开始了。

西罗马帝国的灭亡

西罗马帝国的崩溃不是由某个具体原因引起的，而是一系列无法避免的事件诱发螺旋式下跌的结果。应对内部叛乱和外族入侵不仅大大消耗了帝国的财力，而且扰乱了作为资金来源的帝国经济。行省元气大伤，无力恢复繁荣，这不可避免地导致财政收入减少；而军事力量的削弱意味着必须通过支付巨额贡赋求取短暂的和平，这进一步掏空了帝国国库。

罗马逐渐衰弱，一些帝国之外或已经在帝国定居的蛮族意识到，这是在城市和贸易线路上展开掠夺的良机。还有一些人进入罗马，意图寻找新家园。在某些情况下，各部族在可资利用的最好的土地上抢夺劫掠，这是简单的机会主义。而更普遍的情况是，匈奴入侵造成了混乱，失去家园的人被迫加入迁移大军。

虽然匈奴人在5世纪中期已被打败，但他们依然给被征服的地方带来了巨大的混乱。为躲避他们的滋扰而选择逃离的部落，或因匈奴人入侵而失去家园的人们，只能向西迁移，这就导致他们与邻近部落的冲突。反过来，这些邻近部落也因此被推向更西部，由此造成更多的人流离失所。

于是，大规模移民的时代开始了，这被称为“民族大迁移”。部落间征战不休，罗马帝国的残余势力为争夺定居点而战。残存的罗马军队集结在一起，试图保卫帝国的部分领土，却徒劳无功。东罗马帝国走上了自己的道路，留下它西边的兄弟自生自灭。

大迁移开始时规模很小，只是几小群人向西推进。但到了5世纪后期，大量人群加入西行队伍。这些人都要吃饭，他们只能从经过的土地上获得食物，而这些土地还要供养本地的居民。冲突不可避免，破坏随之而来。对本地居民来说，组织有效抵抗从而拖住移民队伍的脚步，可能比不抵抗还要糟糕，因为这样会给当地造成更多的长期性破坏。西迁的脚步一旦停止，成千上万住在临时帐篷里的人就会搜刮走这片土地上的最后一点食物，而不是仅仅穿行而过。

骑兵族

至少从罗马时代开始，拥有马匹是崇高社会地位的象征，而加入骑兵也是大多数人的愿望。这一直是欧洲政治和军事事务中的一个重要特征。在罗马社会，元老院之下的第二梯队即骑士团。在早期军团中，他们是不可或缺的骑兵。在帝国后期，骑兵或者从蛮族征募而来，或者作为军队的专业人员培养出来。然而，饲养一匹马，维护一整套军事装备，都花费不菲。这意味着，在帝国覆灭后，服骑兵役将成为富人的专利，并最终成为财力的象征。

民族大迁移并没有对斯堪的纳维亚半岛产生太大影响，当地的文化依然按照自己的轨迹发展。斯堪的纳维亚半岛通过贸易和临时条约与罗马世界有一些联系，但它并不依赖于庞大的罗马经济。因为匈奴总体上是向西推进的，北方的土地不在他们的入侵路线上，所以斯堪的纳维亚半岛的文化能够继续发展，最终北欧人（或称“维京人”）出现在欧洲舞台上。民族大迁移时代，日耳曼人定居在遥远的西部，而斯拉夫人则迁移到欧洲东部新近腾出的地区。这些大规模迁移没有一个明确的开始之日，也没有一个明确的结束之期。但到700年，欧洲的面貌已经彻底改变。新的国家正在形成，其基础是融合了罗马思想和价值观的定居人群的文化。



比利牛斯山脉是西迁大部队的巨大障碍。一支侦察队或一支军队也许能相对轻松地翻越山脉，但整个家庭带着财产一起迁移就完全是另外一回事了。

当然，这一时期也存在破坏和冲突，其中一些是有意为之。但这时已经没有成群的野蛮人对罗马文明进行蓄意破坏了。然而，罗马的光芒从内部暗淡了下来，并被不断变化的新世界压得透不过气来。罗马的最后一位皇帝在很大程度上是西欧实际统治者的傀儡，而罗马人仍然称他们是野蛮人。



朱利乌斯·尼波斯是最后一个官方认可的西罗马帝国皇帝。他的继任者凭借武力上台，也以同样的方式被赶下台。罗马新的统治者是蛮族，他们很快就抛开了作为罗马人的一切伪装。

474年，东罗马帝国官员朱利乌斯·尼波斯（Julius Nepos）被派去治理西部的土地，他自封为皇帝。一年后，他被年轻时曾为阿提拉效力的将军欧瑞斯特废黜。欧瑞斯特在未经东罗马帝国许可的情况下，任命自己的儿子罗慕路斯·奥古斯都路斯为皇帝，即罗慕路斯二世。

罗慕路斯二世的统治时间很短。476年，他们与日耳曼赫留利人发生冲突，欧瑞斯特的军队叛变，转而支持另一个在罗马军队中占据高位的野蛮人奥多亚塞。罗慕路斯二世被废黜，但奥多亚塞并没有继承皇帝头衔。他自称国王，这标志着西罗马帝国皇帝称号的终结。

人们普遍认为，西罗马帝国的灭亡时间是476年。事实上，一些地区坚持自己西罗马帝国行省的身份，并延续帝国的治理方式。不过总的来说，西罗马帝国以及整个西欧此时已经由罗马人眼中的蛮族统治。年轻、喧闹、充满活力的新国家开始出现，欧洲进入中世纪早期。

---

(1) 阿拉里克之孙，418—451年在位。——译者注

第2章
从部落到蛮族王国

浩浩荡荡的西迁大军在行进路途中遭遇、征服了许多部族，这些部族的文化与西迁者的传统文化交流、碰撞，融合在一起，并且生发出新的文化。当流离失所的人们终于在新的土地上定居，这些新的部族和文化，就成为中世纪欧洲诸王国的源头。

“野蛮人”（barbarian）这个词的隐含之意是落后、盲目破坏或滥用暴力，但这并不是它最初的意思。这个词可能起源于古希腊人，他们认为自己文化以外的语言完全是些“bar-bar-bar”的噪音。尽管希腊人面对这些野蛮人时，有一种居高临下的态度，但他们还是愿意待其以公正和尊敬，有时希腊人会用另一个词——凯尔托伊（Keltoi，凯尔特人的拉丁文形式，下文统称“凯尔特人”）——来称呼这些人。



查士丁尼一世和他的妻子西奥多拉一度重新控制了罗马帝国西部和北非的一些行省。但最终，维持对罗马帝国辖区的控制超出了拜占庭帝国的财力范围。

现代所称的凯尔特人并不会这样称呼自己。希腊人用这个词统称北欧和西欧的那些野蛮人，这些人可能会用部落、氏族和家庭来称呼自己，而不是用内涵丰富的种族或文化认同之类的模糊概念。

凯尔特人并没有建造大规模的城市与古希腊人抗衡，但是他们建造了有组织的城镇和定居点，其文化也很发达。他们的金属加工技术非常先进，能够生产精美的珠宝和富有韧性的剑刃。希腊北部的凯尔特人有时在希腊城邦的战争中充当雇佣兵，有时也会与雇佣他们的希腊人开战。凯尔特人与希腊人之间的贸易关系总体良好，这就使得他们能够从希腊人那里获得必要的原料进行青铜加工。

始于公元前1200年左右的青铜时代大崩溃，导致凯尔特人与希腊人的贸易中断，这可能是凯尔特人转而使用铁器的原因之一。当时由于相关技术更为成熟，制造青铜工具要比制造铁制工具更容易。但是现实的需要迫使人们去创新，希腊的黑暗时代结束时，凯尔特人已经可以制造相当好的铁制武器和工具。



叶形剑刃是许多地区的凯尔特剑的特色。这些青铜剑标本是在爱尔兰发现的。

凯尔特人遍布欧洲各地，他们的文化与当地文化相融合。在由此创生出的社会中，凯尔特人与非凯尔特人的界限变得越来越模糊。罗马人把生活在如今的法国及其周边地区的凯尔特人称为高卢人，后来这个词也被应用到一般的凯尔特人身上。

虽然不像罗马人那样组织有序，但凯尔特人的部落是非常强大的。公元前390年，罗马遭到布伦努斯（Brennus）指挥的高卢军队的洗劫。当罗马人进入伊比利亚半岛时，那里的人（常被称为凯尔特伊比利亚人）掌握的造剑技术，给罗马人的首领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于是罗马军团也装备了这种独特的武器，不过样式与凯尔特伊比利亚人的有所区别。



公元前390年，为了从高卢人手中拯救罗马，各地需要朝贡，由此引发了一场关于度量衡的争论。据说，高卢首领布伦努斯将他的剑放到天平上，以此暗示罗马人：与征服者争辩是不明智的。



所谓的罗马短铁剑实际上是由凯尔特伊比利亚人发明的。罗马人在战争中见识到这种武器，之后用它来装备军队。随后，罗马帝国用更长的剑取代了它。

罗马军队学习了凯尔特人的经验，甚至他们手中的剑也来自凯尔特人，但欧洲大陆的高卢人最终败于罗马人之手。这主要是因为罗马拥有优越的组织架构和后勤能力。此外，罗马是一个统一的国家，而高卢诸部落并非如此。最终，伊比利亚、高卢和临近罗马的凯尔特人被罗马化了。但是他们从未完全失去自己的民族认同。

罗马军队学习了凯尔特人的经验，甚至他们手中的剑也来自凯尔特人，但欧洲大陆的高卢人最终败于罗马人之手。

因此，当流离失所的人群从东方来到这里时，他们的文化所取代的不仅仅是罗马文化，还有被罗马征服的古凯尔特民族的遗留文化。这些文化交流融合，并在6世纪时塑造了欧洲的新兴国家。

擅用飞斧的法兰克人

法兰克人是日耳曼人的一支，他们从莱茵河和威悉河（Weser River）附近地区向西迁移。他们不是单一文化的族群，而是一个部落联盟，他们也没有一个定义明确的称谓。在向西进军的过程

中，似乎每个成员群体都保留了自己的部族特色。他们定居在如今的法国和比利时地区之后，才融合生发出单一的文化。

关于“法兰克人”这个名字的来源，有多种观点。“Franks”一词的起源可能是“francisca”（法兰飞斧），部分法兰克人的成员部落偏爱使用这种投掷斧头。如果此说属实，“Franks”这个名字就是由罗马人强加给那些在交战中使用这种斧头的人的。这个词最早出现在257年左右的罗马著作中。当时的罗马资料称，法兰克人是野蛮而凶猛的战士和老练的水手，他们不仅袭击帝国的内陆城市，还袭击不列颠群岛的城镇，或抢劫英国海（今英吉利海峡）沿海水域的船只。



虽然不确定，但一般认为托尔比亚克之战可以追溯到496年。我们可以确定的是，克洛维带领法兰克人战胜了阿勒曼尼人。

随着罗马帝国的衰落，征募法兰克人为己所用远比与他们作战更有意义。于是，这一时期的罗马军团快速“蛮族化”，非罗马人组成的军队不是被训练成军团战阵，而是用他们原生文化的方式去战斗。当时的法兰克战士习惯徒步作战，一种叫作日耳曼式标枪的短矛是他们的首选武器。日耳曼式标枪可以投掷，也可以在肉搏战

中使用，和法兰飞斧一样。法兰飞斧可以单手挥舞，这种重斧是一种致命的短距离投掷武器，能劈开盾牌。在敌军密集的地方四下挥砍，可以伤及多个对手。

近战中，日耳曼式标枪和法兰飞斧经常与剑和匕 首一起使用，这就衍生出了典型的法兰克战术：先用长矛和斧头连击迎面扑来的敌人，砍翻敌人后径直冲向混乱和沮丧的敌阵。虽然法兰克人在后勤保障和军事组织方面从未达到罗马人的水平，但这种战术的威力并不逊于罗马传统的短矛配短剑的作战方式。

最后的军团

在罗马帝国最后的日子里，它的军队仍然被称为军团，但已经与过去高度组织化的军团相去甚远。军队分成许多小型编队，装备也更加轻型化。此时，罗马军团的士兵已不再限于重装步兵，长矛和弓箭以及传统的剑和标枪等各种武器都出现在军团里。一些军团仍然使用传统的装备，但是，无力护卫帝国领土的罗马军团，在缔造它们的那些先辈眼中，早已名不副实了。



4世纪法兰克人的着装以及他们的整体外观。此时，他们更多地表现出蛮族的风格。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的服饰和言谈举止逐渐演变成中世纪早期诸王国的风格。

法兰克人向西进入现在的比利时，最终到达高卢北部。他们为衰落中的罗马帝国提供了大量的战士。这些战士或者是罗马军队的成员，或者是保留自己旗帜的罗马盟军。最终，法兰克人成为罗马

帝国军队中数量最多的非罗马人成员。这一时期，他们还巩固了对山北高卢的控制。根据与罗马达成的协议，这片土地割让给法兰克人，这一协议很大程度上意味着罗马人对无力回天的现实最大程度的屈从——罗马帝国未能阻止蛮族侵略者占领这片土地，所以他们只能通过谈判的方式与对方做交易。事实证明，这样的安排是非常明智的。451年，法兰克军队帮助罗马及其西哥特同盟对抗阿提拉匈奴人；463年，他们帮助罗马对抗西哥特人。

克洛维一世建立墨洛温王朝

克洛维一世（465—511年在位）统治时期，法兰克已经成为一个王国，不再是由多个部落组成的群体。克洛维建立的王朝在历史上被称为墨洛温王朝，因为其祖父墨洛维赫（Merovech）曾与罗马军队一起与匈奴人作战。墨洛温王朝是西欧最早的世袭王朝之一，可以说是法国的缔造者。克洛维在与最后一位高卢僭主西阿格里乌斯的战斗中，彻底摧毁了罗马人对山北高卢的控制。486年，西阿格里乌斯的军队在苏瓦松被击败，此后克洛维成为这片土地上无可争议的统治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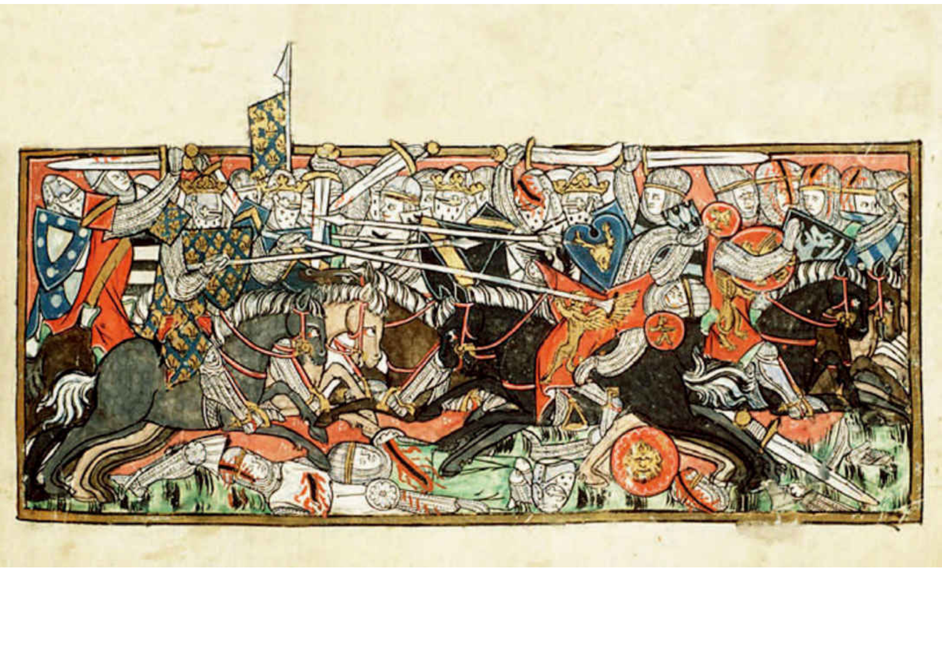


克洛维一世穿着紫色的衣服接受拜占庭皇帝的祝福，这是罗马帝国象征统治权的颜色。与罗马的联系仍然具有重要的意义，这种联系给予欧洲的新统治者一种官方正统的感觉。



西阿格里乌斯统治着一块仍自认为是罗马领土的飞地。他在苏瓦松之战中被克洛维一世击败，西罗马帝国的最后遗存被抹去了。

值得注意的是，西阿格里乌斯并没有逃往罗马的行省，而是去了西哥特王国的首都图卢兹，想把那里当作避难之所。然而事不遂人愿，西哥特国王阿拉里克二世拒绝庇护强大的法兰克人的敌人，把他交给了克洛维。西阿格里乌斯很可能被克洛维斩首了。



法兰克人和西哥特人之间的战争，士兵横握长矛骑马作战。此图可能不太准确，因为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这些全副武装的骑兵还不足以决定战争胜败。

对阶下囚或潜在对手仁慈是一种非常奢侈的行为，蛮族国王无法承受其后果，所以克洛维的这种行为在中世纪非常普遍。无辜的王室成员被处决并没有什么特别的原因，只不过是将来有一天他们可能顶着被处决的敌对国王的名义造反，至于这些亲族是否有过一丁点儿这样的念头，“克洛维”们根本不管不顾。

克洛维一世对待亲人也是如此。他的堂兄弟查拉里克（Chararic）和拉格纳查尔（Ragnachar）是他潜在的对手，他们曾派遣军队协助对抗西阿格里乌斯，但是查拉里克的军队在关键一战中退缩了。克洛维认为查拉里克是在两面下注，于是将他逮捕。起初，他强迫查拉里克和他的继承人成为修士。后来，克洛维听到了一些无心之言，于是确信他们正密谋背叛他，就将两人处死并吞并了他们的土地。

虽然拉格纳查尔曾在苏瓦松与他并肩作战，克洛维还是将其免职并最终处决了他。通过除掉对手并夺取他们的土地，克洛维成功地扩大并捍卫了自己的势力。他还对西哥特人发动战争，从他们手中夺取了包括兰斯（Reims）和巴黎在内的几个城市，并在阿勒曼尼人的协助下，挫败了西哥特人越过莱茵河进入其领土的企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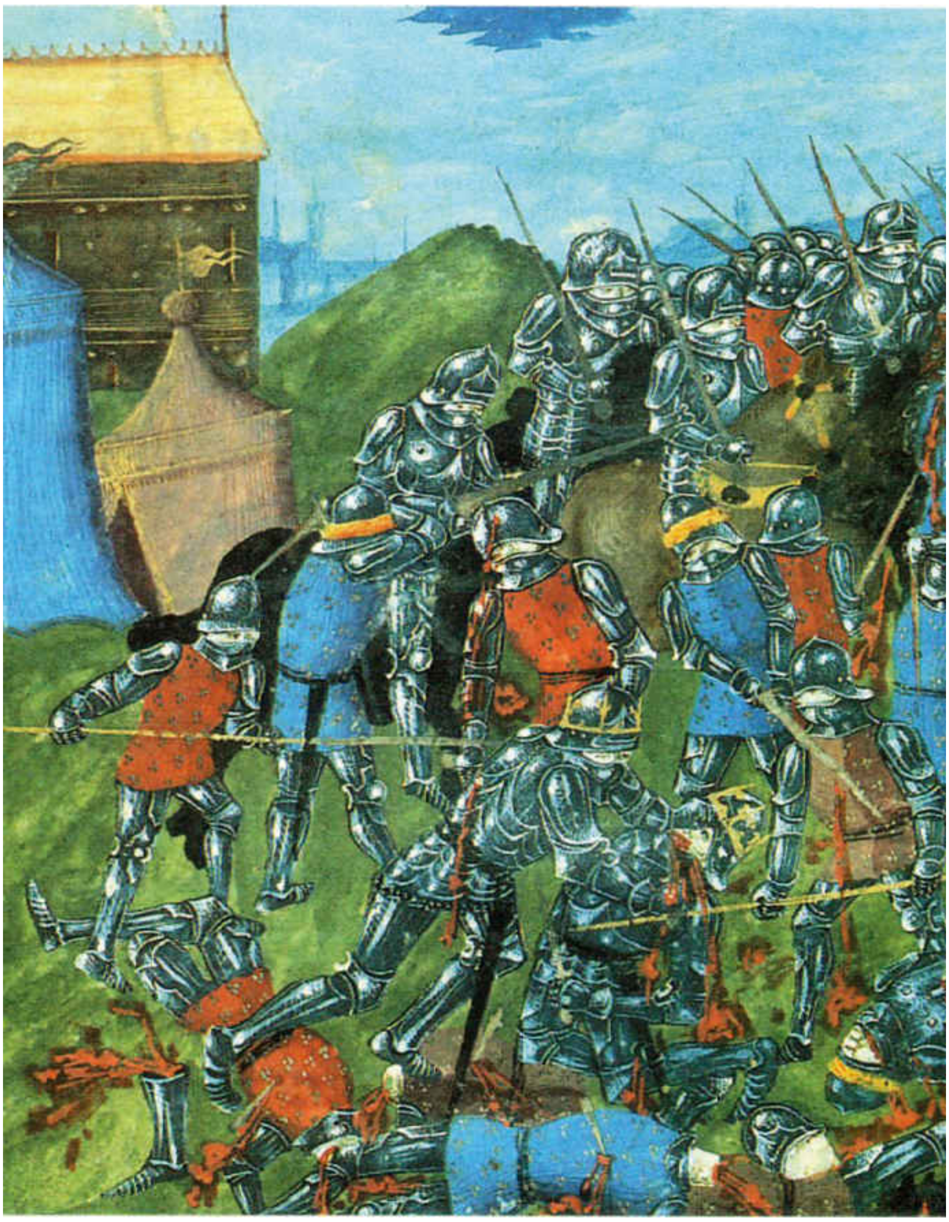
克洛维继承的不是一个富裕的王国，但他在早期战争中取得的胜利激励着他的追随者留在自己身边，而且他也能用战利品奖励他们。这里已经可以窥见中世纪政治-军事体系的端倪——一个有魅力的国王直接领导战士，而服兵役可以直接获得财富和社会地位。

尽管克洛维知道，皈依基督教能获得政治优势，但在与勃艮第基督徒克罗蒂尔德（Clotilde）结婚后，他似乎仍对基督教持反对态度。后来，取得对阿勒曼尼的胜利以及他的孩子患病康复这两件事，让他对基督教有了好感。于是，他热情满满地投入了新信仰的怀抱。这是促成克洛维与西哥特人重新开战的一个因素，战争进一步扩大了法兰西的领土。

基督教的阿里乌派和尼西亚派

4世纪早期，一位名叫阿里乌斯的基督教修士提出了一种观点：耶稣是由上帝创造的，因此依赖于上帝而存在，而非以前人们所认为的“三位一体”——三个部分共同组成了唯一的神。这种观点被尼西亚会议谴责为异端邪说，并使得早期基督教会严重分裂。

后来，两个教派信众之间的冲突持续不断。有时演变成迫害，有时则会扩大为欧洲新兴国家之间的重大战争。



15世纪表现武伊尔之战的绘画作品。战争双方都使用了15世纪的装备，这是中世纪作品中常见的错误。507年的战士不可能拥有如此先进的盔甲。

东哥特国王狄奥多里克与新近成为尼西亚派信徒的克洛维不同，他信奉阿里乌派，忠于支持他获得权力的皇帝，并服从皇帝的禁令，拒绝帮助西哥特的阿拉里克二世。

狄奥多里克娶了克洛维的妹妹奥多弗莱达（Audofleda）。狄奥多里克希望这次联姻是他与法兰克联盟的一部分，他也出于类似的考虑把自己的女儿嫁给了阿拉里克。这些王朝之间的盟约都不同

程度地陷入了僵局，拜占庭皇帝不支持阿里乌派联合起来反对尼西亚派，此举最终决定了狄奥多里克在这场冲突中的立场。不过，他确实吞并了一些领土，但这也助长了克洛维的野心。

最终西哥特人战败，阿拉里克二世被杀。西哥特人撤退到伊比利亚半岛，克洛维几乎完全控制了后来的法国地区，这并非巧合。拜占庭皇帝送给克洛维一件紫色长袍——罗马执政官的标志。此时罗马帝国的服饰仍然保有某种神秘感，而穿着这种服饰的统治者在很多情况下自视为或表现得像罗马帝国合法的继承者。这种联系从未完全消失。即使到了现代，在一些仪式和符号上，我们仍然可以看到理想化的古代罗马文明的影子，比如具有象征意义的火炬传递行为。

在一些仪式和符号上，我们仍然可以看到理想化的古代罗马文明的影子，比如具有象征意义的火炬传递行为。

克洛维在巴黎建立了都城。虽然东哥特人确实从他手中夺去了一些领土，但他死后留下了一个稳定而强大的王国。人们通常认为他死于511年，但也可能是513年。克洛维把王国分给了他的四个儿子，而不是指定一个儿子作为唯一的统治者。这样就结束了法兰克人短暂的统一，阻止了王国进一步对外扩张，而且搭建了权力游戏和内斗的舞台。

克洛维之后的法兰克

法兰克王国的分裂可能是灾难性的，但克洛维的继承者们愿意并且有能力限制他们的冲突，他们建立了为大多数人所遵守的最基本的“战争规则”。虽然这样可以在整体上避免巨大的经济损失，但贵族之间的权力游戏吸引了他们大部分的注意力，这就使法兰克

人无法一致对外。当然也有例外。比如在领土争端或政治利益之外，人们出于报复而发动战争。尽管如此，随着时间的推移，法兰克王国变成了四个相对强大的国家。

这四个国家中，阿基坦（Aquitaine）位于比利牛斯山以北的大西洋海岸，勃艮第位于巴黎东南，纽斯特里亚位于巴黎以北。法兰克人最初的家园则成为奥斯特拉西亚，它在现在法国的东北部和德国西部，横跨莱茵河。这些国家之间冲突不断，但在某些统治者手下又会部分甚至全部统一。纽斯特里亚的国王克洛塔尔二世就做到了这一点。在经历了一场漫长而痛苦的战争后，他于613年击败了奥斯特拉西亚的王后布伦希尔德。克洛塔用几匹马把布伦希尔德分尸。而对于其他对手，则采用了不那么残暴的方式吞并其土地。



墨洛温王朝的国王和王后，他们分别是：克洛维二世和巴尔希尔德、克洛塔尔三世、希尔德里克二世、提奥德里克三世和克洛维三世。在他们统治期间，实际权力移交给了宫相。



奥斯特拉西亚王后布伦希尔德被马分尸，这一事件（以不同的形式和不同的面貌）出现在许多欧洲传说和民间故事中。

尽管在某一段时间，克洛塔尔二世成功地使自己成为所有法兰克人的国王，但实际上他统治期间王权被削弱，而高级贵族的权力增加了。这最终导致了墨洛温王朝的灭亡。到7世纪中期，权力已

基本完成转移，墨洛温王朝的最后一位国王希尔德里克三世（ChildericⅢ）只是个有名无实的傀儡。751年，他被宫相丕平三世——人们熟知的“矮子”丕平——废黜。废黜过程相对来说比较仁慈，希尔德里克被送进了修道院，而丕平三世则成为加洛林王朝的第一任统治者。

“铁锤”查理

墨洛温王朝在最后几年荣耀尚存。绰号“铁锤”的宫相查理·马特成功地抵御了来自西班牙的摩尔人势力，这是欧洲历史上最伟大的转折点之一。他掌权的过程并不顺利，在一场关于继承权的斗争中，年轻的查理遭到了监禁。监禁的目的是避免他成为号召人们对抗国王的中心人物，但他在715年成功逃跑，并做了他的敌人一直畏惧的事情。



一幅17世纪的版画，画中人物为查理·马特。他是欧洲历史上最具影响力的人物之一。他在图尔之战中获胜，这使得基督教能够保持它在欧洲的统

治地位。

718年，查理·马特巩固了他法兰克王国最高统治者的地位，随后在巴伐利亚和阿莱曼尼亚发动了一系列战役。尽管遭到了有力抵抗，但摩尔人军队依然从伊比利亚半岛向法兰克王国逼近。此时，需要一种新的作战方法来对付他们。

查理·马特意识到，一支训练有素的军队是对抗纪律严明的摩尔人军队的必要条件，于是他开始筹集资金建立这样一支军队。他没收了教会的土地，用筹集到的资金组建军队，尽管这遭到了宗教官员的反对。不过，查理·马特还是建立了一支沉着而专业的军队。法兰克人在图尔附近占据了有利的防御位置，能够击退骑兵的多次进攻。如果面对的是一支经验不足的军队，这些骑兵的进攻就可以将其击溃。

图尔之战（有时被称为普瓦捷之战）击退了摩尔人对欧洲的入侵，但这并没有终结双方的冲突。查理·马特成功地将重骑兵纳入军队，再次击败了侵略者，最终解除了外敌入侵的威胁。查理·马特死于741年，死后王国被分给他的两个儿子卡洛曼（Carloman）和丕平三世，丕平三世建立加洛林王朝，取代了墨洛温王朝。

墨洛温王朝末期，中世纪法国初具规模。这个在中世纪历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的伟大国家终于出现。骑兵逐渐取代了使用标志性投掷斧头的法兰克步兵，这些士兵将成为随后一千年里欧洲战场上的主要力量。

骑兵逐渐取代了使用标志性投掷斧头的法兰克步兵，这些士兵将成为随后一千年里欧洲战场上的主要力量。

西哥特人

罗马史学家称西哥特人为“日耳曼民族”，但我们并不清楚他们在被罗马人称为日耳曼尼亚的地方生活了多久，甚至他们的具体活动位置也不明确。为了区分东哥特人和西哥特人，罗马史学家开始使用“西哥特人”这个词，但不是所有学者都这么过分讲究。事实上，在罗马文献中，哥特人最早被记录成一个斯基泰人部落。

图尔之战

人们对于图尔之战双方兵力的估计差别很大。可以肯定的是，倭马亚哈里发的军队已经深入欧洲，而且似乎有能力击败任何抵抗他们的势力。这支军队的主要攻击力量是轻装骑兵，他们能够进行小规模战斗或发起大规模冲锋。摩尔人骑兵一开始就主动进攻，他们能够从侧翼包抄并战胜纪律松散的对手。

摩尔人军队到达图尔时，数量庞大的战利品给他们造成了很大的负担。另外，行军途中不可避免的战事也让战利品受到了损耗。然而，这仍是一支需要小心应对的强大军队。查理·马特与同时代其他统治者不同，他认识到军队组织能力和后勤的重要性。他没有尽其所能地增加兵力，而是创建了一支专业化的步兵部队，为作战力量提供精良的盔甲和武器。更重要的是，这是一支可以用一年时间来训练的常备军，遭遇敌军时，其成员对自己的战斗力和同伴的可靠性都信心十足。

而另一边，摩尔人有点过于自信了。他们没有出兵阻止法兰克人占据有利的防御位置，导致摩尔人骑兵只能朝山上进攻敌人。战斗开始前双方僵持了六天，在此期间，摩尔人首领阿卜杜·拉曼认真考虑了他们的处境。法兰克人对寒冷的天气有更好的准备，而阿卜杜·拉曼需要决定他们是进攻还是放弃。摩尔人发

起了一系列骑兵冲锋，然而只是偶尔能够突破法兰克人的防御方阵。骑兵冲锋也许可以击溃一支经验不足的军队，但法兰克人在方阵内保留了后备力量，当闯入方阵的敌人在身后纠缠时，外围的人也有信心继续作战。

与此同时，一支独立的法兰克军队设法进入了摩尔人的营地。他们在那里释放了囚犯，由此引起了很大的混乱。法兰克人要带走摩尔人所有战利品所引起的慌乱和恐惧，把摩尔人战士从前线拉了回来。拉曼本人在召集军队时被杀，大军失去了指挥官。法兰克人无法徒步追击骑兵，只好改变了防守位置，静候时机。

现在，图尔之战的情形是这样的：法兰克人只要不溃败就能实现战略目标；而摩尔人则必须赢得战斗，才能继续这场行动。失去了指挥官并且被彻底击退后，摩尔人带着战利品撤退到伊比利亚。对图尔的防御性胜利阻止了摩尔人的连胜，但查理·马特未能乘胜追击或采取主动攻势，因为他无法用步兵对抗高度机动的骑兵。所以，战争依然存在，摩尔人骑兵时常入侵法兰克王国。与罗马军团发现自己需要骑兵来对付匈奴及类似的骑兵对手一样，在之后的几年里，法兰克人开始装备自己的骑兵，这最终使得欧洲出现骑士制度。



表现图尔之战的作品，内容离奇。真实的情形是，法兰克人用防御战术击退了摩尔人军队咄咄逼人的骑兵进攻。

“斯基泰人”这个词通常指公元前7—前3世纪生活在黑海以北地区的民族，但人们似乎将居住在黑海附近的所有族群统称为斯基泰人。哥特人也许与草原上的斯基泰人并无关系，甚至罗马人为他们假定的家园也存在一些疑问。

哥特人最初可能来自斯堪的纳维亚半岛或黑海以北的地区，尽管人们对此多有争论。最早的罗马学者对他们知之甚少，而且某些时候罗马学者的记载也不可靠。在波兰的格但斯克（意为“哥特人的城市”）附近发现过哥特式墓葬。但这里到底是他们的家乡，还是他们在一次大规模移民过程中居住过一段时间的地方，还存有争议。



骑在马背上的弓 箭手具有出色 的作战技能，如斯基泰人的弓 箭手。行进时，他们可以在没有马镫保护的情况下向各个方向射箭。

到1世纪末，罗马人对哥特人有了更多了解。塔西佗在他的著作《日耳曼尼亚志》中记录了这个族群，他们的体貌特征与日耳曼人非常接近：红头发，体魄魁梧而健壮，在战斗中十分凶狠。虽然哥特人显然更偏爱用步兵作战，但依照记载，他们也有成熟的骑兵。在战场上，骑兵可以作为一个纪律严明的整体（根据战场形势需要而随时）变换阵形。

早期的哥特人很少穿盔甲。罗马人有时用“赤裸”一词来描述他们，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什么都没穿。此处的赤裸意指赤膊、袒露胸膛，但肯定不是完全赤裸或是缺乏盔甲保护。虽然大量艺术作品表现的都是赤身裸体的野蛮人，且经常做出暴力或破坏的行为，但这似乎有些不切实际。除此之外，北欧的气候也不允许人穿得太

少。而且战士们如果没有鞋子和裤子的保护，会受到一种大量存在于他们家乡的多刺灌木的严重伤害。

典型的早期哥特战士仅仅装备长矛和盾牌。盾牌装饰丰富，不过他们大多数战争装备从外观上看都是朴素的。他们也使用弓箭、标枪、剑和匕 首，但没有统一的样式。战场上，战士们有什么武器就拿什么武器，而一支军队通常依靠领导者的个人魅力凝聚起来。领导者需要拥有超出追随者的勇气，追随者则应该与领导者的勇猛相匹配。这造就了一种凶猛而有力的战争方式，但面对纪律性更强的对手时，这种方式将会导致灾难性的后果。

到3世纪晚期，西哥特人显然已经接受了我们现在使用的这个名字，尽管它是由罗马史学家杜撰的。他们吸收了来自其他部落的人，其中一些人因为匈奴人日益严重的威胁而无家可归，西哥特人自己也感受到了压力。他们向南迁移到多瑙河地区，并请求罗马帝国允许他们以同盟者的身份在那里定居。



西哥特人入侵伊比利亚半岛的画面。部落居民被描绘成粗野和残暴的野蛮人，事实上，哥特人并不比当时的任何其他民族野蛮。



将罗马帝国划分给四个统治者的本意是能够更好地治理国家，但这最终导致了更多的冲突。李锡尼（东罗马皇帝）战胜了第一位蛮族出身的罗马皇帝“篡位者”马克西米努斯，但他于323年在阿德里安堡被君士坦丁打败。

哥特战争

罗马官员对哥特人非常残酷，由此引发了哥特战争。哥特人在阿德里安堡之战中击败并杀死了罗马皇帝瓦伦斯。双方最终签订了一项条约来终止这场冲突，条约允许西哥特人获得土地。在这段时

间，西哥特人越来越基督徒化。西哥特国王阿拉里克一世试图在他的臣民中推行一些罗马的习俗和制度，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效。如果历史没有向另外一个方向发展，拥有罗马-哥特式文化的西哥特人可能会为该地区注入新活力，甚至开创帝国的新纪元。然而，罗马坚持与西哥特人签订完全有利于己方的条约。于是，为迫使双方重新谈判，阿拉里克向西罗马帝国宣战。



东罗马帝国皇帝瓦伦斯。普罗柯比挑起与罗马皇帝瓦伦斯的争端，普罗柯比收买了附近的军团并用他们控制了色雷斯。瓦伦斯最初倾向于谈判，但后来决定诉诸武力。已听命于普罗柯比的军队背叛了瓦伦斯，致使他被生擒并被处决。

410年，阿拉里克领导的西哥特军队占领了罗马。纵使他们洗劫了这座城市，也无法说服罗马皇帝制定一个新的更公平的条约，所以阿拉里克决定继续推进。他打算经西西里前往北非，但他死

后，他的继任者阿陶尔夫选择南高卢作为目的地。阿陶尔夫和他的继任者们在图卢兹周围建立了一个王国，王国持续扩张，直到西哥特人控制了伊比利亚半岛的大部分地区。

与高卢北部的法兰克人的冲突也许是不可避免的，不过基督教会内部的分歧让冲突进一步加剧。西哥特人信奉基督教中的阿里乌派，法兰克人则信奉尼西亚派。可能早在502年，双方就已出现冲突，到507年，西哥特人与法兰克人的战争全面爆发。对于这场战争，多数人的看法是，法兰克人的统治者克洛维一世与他的阿里乌派邻居进行了一场宗教战争，但其目的可能只是征服土地。



19世纪晚期的作品，描绘了西哥特人洗劫罗马的场景。画中呈现的是赤身裸体的野蛮人摧毁文明世界伟大作品的形象。这种形象早应该被消除，但是很长时间里它仍然存在于一般人的想象中。

这场冲突在普瓦捷附近的武伊尔之战中达到高潮。当时的记载相互矛盾，而且往往带有偏见。一些人认为法兰克人得到了勃艮第的帮助，另一些人则对勃艮第避而不谈。阿拉里克的军队中既有西哥特战士，也有按照罗马风格训练和装备的军人，但他们都输给了法兰克人。虽然克洛维一世一度身处险境，但最终被杀的却是阿拉里克。阿拉里克的军队四散而逃，这为法兰克人进攻图卢兹打开了通道。

起源于特洛伊？

某些记载称哥特人是特洛伊人的后裔，这应该不太可能。这个说法可能更多的是给前罗马帝国暴发户式的野蛮统治者一个高贵的身份。而且他们并不是唯一一个声称源于古代特洛伊的族群。

据说罗马是由逃离被毁家园的特洛伊人建立的，不列颠则是一个罗马人或特洛伊人的后裔发现的。从这位祖先开始，不列颠诞生了一脉相承的传奇统治者，包括亚瑟王和不列颠各部落的首领。甚至在部分资料中，北欧诸神也居住在特洛伊城，每天通过魔法彩虹桥往返于阿斯加德（Asgard）和特洛伊之间。

其中一些故事显然是虚构的，另一些则可能有真实的内核。除了荷马《伊利亚特》和《奥德赛》的相关记载，人们对特洛伊城所知甚少，而这两部作品都取材于希腊黑暗时代流传下来的口述历史（也可能是虚构的故事）。考古发掘成果显示，在传说中的特洛伊城所在地，曾经矗立着一座伟大的城市。但除此之外，就没有其他有力的证据了。即使在古代，为从高贵的祖先到合法化权力这一传承编造族谱时，特洛伊也是一个传奇之地和自然之选。



至少在一些故事中，埃涅阿斯和他的儿子是建立罗马城的功臣 。这让罗马人联想到传说中的特洛伊城。

国王已死，首都遭到敌方掠夺，西哥特人撤退到伊比利亚，以托莱多[(1)]（Toledo）为新的首都。在接下来的两个世纪里，伊比利亚的罗马人和西哥特人之间的界线逐渐模糊，直至融合成一个全新的文化群体。7世纪早期，摩尔人强势入侵伊比利亚，但没有成功，因为他们遭到了西哥特人的顽强抵抗。图尔之战中，查理·马特指挥法兰克军队大败摩尔人军队，但是伊比利亚的冲突仍在继续。西哥特人从这些战争中崛起，为后来的西班牙王国奠定了基础。

东哥特人

“东哥特”一词似乎是对该部落名称的误读，只是罗马历史学家认为他们是东哥特人。东哥特人与西哥特人起源相同，他们有共同的祖先，东哥特人生活在黑海附近。对该地区的罗马各行省来说，他们有时是个制造麻烦的邻居。

匈奴人入侵时，已拥有了一大片土地的东哥特人，也未能避免被征服的命运。在西哥特人向西进入罗马帝国的时候，东哥特人被征服了。据说，他们的国王厄门阿瑞克（Ermanaric）在匈奴人入侵时，选择了自杀殉国。

向东扩张时，东哥特战士一直与匈奴人战斗，直至阿提拉去世。在狄奥多里克[(2)]的领导下，东哥特人于474年入侵西罗马帝国，并得到拜占庭帝国的首肯。出身日耳曼的首领奥多亚塞（Adoacer）废黜了罗慕路斯二世，从而结束了西罗马皇帝的统治。打败奥多亚塞后，狄奥多里克与拜占庭帝国重新结盟。



一幅6世纪的镶嵌画，表现了拜占庭皇帝查士丁尼和他的随从。查士丁尼在一段时间内收复了原西罗马帝国的一些行省，并灭掉了汪达尔王国。

东哥特王国建立于493年，他们的文化融合了罗马和日耳曼的思想。罗马的艺术和社会习俗被保留下来，东哥特王国与拜占庭帝国是两个国家，直到534年，二者关系一直很好。狄奥多里克的女儿阿玛拉逊莎（Amalasvintha）先是担任摄政王，后继承了王位，

但后来在一场宫廷权力斗争中被杀。她的表弟狄奥达哈德继承了王位，这引发了拜占庭帝国对东哥特王国的干预。

拜占庭帝国派著名将军弗拉维乌斯·贝利撒留出征，将狄奥达哈德赶下了台。面对拜占庭军队，东哥特人屡战屡败，于是他们推翻了狄奥达哈德，另选他人，但这位继任者也被拜占庭人击败。通过战争、内部阴谋和谈判等手段，贝利撒留以查士丁尼皇帝的名义控制了整个东哥特王国。

查士丁尼担心他的将军过于强大，所以将贝利撒留召回拜占庭，派其他官员去统治东哥特王国。东哥特人不喜欢这样，他们起来反抗新派来的统治者。在巴杜伊拉——也就是东哥特国王托提拉（Totila）的领导下，东哥特人的起义一度取得了成功。可是，巴杜伊拉在552年的一场战斗中被杀死，此后一年内起义被镇压。这之后，东哥特人的民族特性逐渐消失，成为南欧混合文化群体的一部分。

拥有海军的汪达尔人

和那个时代的其他部族一样，汪达尔人的起源尚不清楚。他们可能是从斯堪的纳维亚向南迁移的，曾在波兰留下过痕迹。汪达尔人这个名字应当出自罗马历史学家之手，他们也称其为“鲁吉人”。我们不太清楚汪达尔人的民族凝聚力如何，但可以确定，哈斯丁汪达尔人（the Hasdingi Vandals）在2世纪后期以同盟者的身份进入罗马帝国。与他们相近的希林吉人则定居在如今的西里西亚境内。

罗马和蛮族的关系经常出现问题，和汪达尔人的关系也不例外。汪达尔人有时为帝国效力，有时也是罗马帝国的敌人。汪达尔人信奉基督教阿里乌派，这使他们与信奉尼西亚派的罗马人极为不

同。在匈奴人入侵的压力不断增加的情况下，信仰不同可能是罗马帝国不允许汪达尔人入境的一个因素。然而，汪达尔人利用罗马人在莱茵河沿岸力量被削弱的时机，在406年强行进入了帝国。

其他日耳曼部落也在寻找安全的家园，而且竞争激烈，因此汪达尔人没有在高卢定居。他们从莱茵河沿岸一路推进到伊比利亚，在那里建立了一个王国，由君德里克统治，他同时也是阿兰人的统治者。为方便在地中海航行，汪达尔人建立了一支海军，这使他们最终能够进入北非。同时，他们还要与其他部落争夺伊比利亚的控制权，尤其是与西哥特人。

汪达尔国王盖塞里克

428年，君德里克去世，盖塞里克继位。此时，罗马世界正在进行一场阴谋活动，这为新的汪达尔国王创造了机会。一些资料称，罗马帝国北非总督博尼法斯（Boniface）被他的对手弗拉维斯·埃提乌斯诬陷叛国。局势越来越紧张，战争迫近，博尼法斯请求汪达尔人予以帮助。另一些资料则显示，出于对自身有利的目的，汪达尔人是北非战争阴谋的推动者。

不管真相如何，盖塞里克向北非派出了大批汪达尔人。文献中的数据是一致的，据说有8万人，但是这个数字还有探讨的余地。盖塞里克的势力当然很强大，事实证明，他们足以占领迦太基及其周边城市。最终，盖塞里克控制了罗马最重要的产粮行省。

很久以前，罗马在与迦太基作战时就被迫建立了一支海军，现在在相同的港口又出现了新的海上威胁。盖塞里克拥有一支庞大的海军力量，控制阿非利加行省后就能袭击地中海沿岸地区，以及掠夺商船。罗马人试图收复失陷行省，却失败了。442年，双方达成协议，罗马承认盖塞里克为汪达尔北非王国的统治者。



嗜血的野蛮人横扫敌人，这些野蛮人可以是欧洲任何一个后罗马时代的民族。这是19世纪的成见。画面中的主角是汪达尔人，他们正向罗马推进。

445年，政治形势发生了变化。西罗马皇帝瓦伦提尼安三世被罗马贵族佩特罗尼乌斯·马克西姆斯杀害，盖塞里克以此为借口宣布他与罗马的条约无效。盖塞里克声称，条约是他和瓦伦提尼安三世之间的协议，后者不在了，协议也就不存在了。西罗马帝国对这种解释持何种态度是无关紧要的，盖塞里克借此发动了对罗马的入侵，而帝国没有足够的力量阻止他。

盖塞里克在西罗马帝国的港口奥斯蒂亚（Ostia）登陆，然后向罗马推进。围城只会有一个结局，而且会对双方造成巨大的伤害，所以罗马人允许汪达尔人对城市进行掠夺，只要他们造成的破坏尽可能小。盖塞里克尊重这个约定，虽然汪达尔人对罗马的洗劫远比通常一座城市被攻下时经历的要温和得多，但他们的名字仍然成了“肆意破坏”的代名词。



445年，罗马沦陷并遭到掠夺，标志着汪达尔的政权到达顶峰。和许多有魅力的首领身后一样，盖塞里克的继任者并不像他一样出色，他留下的王国衰落了。

罗马在445年遭受的掠夺让拜占庭皇帝无法容忍，他把汪达尔人视为整个地中海地区的威胁。盖塞里克远不是通常意义上那种暴戾无知的破坏者，他懂得军队后勤保障的重要性，而且建立了一个

运转良好的情报网络。当得知有一支舰队正在集结并准备攻击他时，他迅速发起进攻，摧毁了该舰队的大部分船只。

> **罗马在445年遭受的掠夺让拜占庭皇帝无法容忍，他把汪达尔人视为整个地中海地区的威胁。**

468年，拜占庭再次试图推翻汪达尔的海上霸权，这一次行动是联合西罗马帝国进行的。汪达尔舰队不费吹灰之力就击败了罗马联军，迫使西罗马皇帝接受了与盖塞里克拟定的条约。此后汪达尔王国一直统治着地中海，直到478年盖塞里克去世。

> **468年，拜占庭再次试图推翻汪达尔的海上霸权，这一次行动是联合西罗马帝国进行的。**

有魅力的首领

魅力和能力在特定个人身上的结合——克洛维、阿提拉、盖塞里克、查理·马特以及其他首领——对早期欧洲历史产生了举足轻重的影响。这些人生前叱咤风云，但他们死后却因继任者才能欠缺而使得大业难竟。统治者的能力决定了一种文化或一个国家的兴衰，这种模式在整个中世纪早期都很常见。这一特点在战争中表现得尤为明显——国王逃跑或被打败，都可能使得原本胜券在握的军队被击溃。

盖塞里克之后的汪达尔人

汪达尔人的势力在盖塞里克时期达到顶峰，他去世后却迅速衰落。内部纷争削弱了王国的实力，也转移了汪达尔人对外的野心。这一时期，拜占庭的查士丁尼皇帝入侵北非。

汪达尔人的国王盖利默并不是盖塞里克这样惊艳的人物。他在拜占庭军队已经从陆路接近迦太基时才后知后觉，盖利默迅速制订计划，打算钳制并摧毁拜占庭军队。他向对手发起了进攻，后世称为特里卡梅伦之战。然而，盖利默的作战计划过于复杂，要依赖极其精确的时间安排，这根本行不通。结果，第一批汪达尔人的军队并没能阻止拜占庭人的进攻，而是被对方暴力解决了，于是汪达尔人的首都迦太基暴露在敌军面前；第二批汪达尔人的军队又被受雇于拜占庭的匈奴骑兵驱散。



糟糕的战略和战术决策让汪达尔国王盖利默在战场上频频失利。他逃离战场的举动导致军队崩溃，失败无可避免。

如果拜占庭军队没有往前行进，那么盖利默带领的汪达尔军队主力就绕到了拜占庭军队的后方。可是，到达原定位置之后，汪达尔人发现敌人已经离开。盖利默继续追击，却发现迦太基已被攻陷。他包围了被敌人占领的迦太基，拜占庭人寡不敌众，最终被迫出城战斗。虽然汪达尔军队人数更多，但拜占庭骑兵的凶猛让他们

感到惊恐。威势之下，主帅盖利默逃离了战场，汪达尔人全面溃败。

534年，盖利默被俘，汪达尔王国就此瓦解。此后，这个国家一直四分五裂，未能再次统一，而且汪达尔王国的残余力量也无力抵抗摩尔人的进攻。汪达尔人的势力或被分散，或与其他民族融合，北非汪达尔王国在历史上也就逐渐消失了。

伦巴第人

罗马历史学家在1世纪就知道伦巴第人的存在，虽然他们的记载是基于零散的或完全错误的信息。伦巴第人从斯堪的纳维亚迁移到东欧，沿途不断与其他部落发生冲突。他们在如今的奥地利定居了一段时间，后来又迁移到多瑙河地区。

直到6世纪中期，伦巴第人一直是罗马人坚定的盟友。伦巴第战士与拜占庭军队共同对抗东哥特人，与阿瓦尔人结盟对抗格皮德人。虽然战争取得了胜利，但联盟中阿瓦尔人得到的好处远远超过了伦巴第人，伦巴第人显得黯淡无光。

由于扭转局势无望，伦巴第国王阿尔博因带领他的臣民向罗马迁移。当时，托提拉领导的东哥特势力正在那里大肆破坏。这为他们的迁移创造了机会，阿尔博因可能主动利用了这次机会。也有人说，是罗马官员邀请伦巴第人到罗马定居，不过这种说法存在争议。

自568年起，伦巴第人进入罗马，并在维罗纳建立了一个王国。伦巴第人对帕维亚进行了长时间的围攻，但多数意大利城市几乎没有进行抵抗便投降了。王国建立后，阿尔博因就把他的新领土划分为诸公国，并允许各自的统治者有很大的自治权。结果，伦巴

第地区变得支离破碎，饱受内乱困扰，这也分散了它对外部威胁的抵抗力。

因其妻的教唆和煽动，阿尔博因在572年被暗杀。拜占庭帝国曾尝试把意大利作为领土收回，这阻止了已经四分五裂的伦巴第王国进一步分裂。外敌入侵的威胁促使伦巴第的公爵们选出一位国王来领导他们，584年，奥萨里被推上王位。奥萨里定都帕维亚，其统治一直延续到590年他去世。在位期间，他与法兰克人、拜占庭帝国以及民间叛乱者进行了持续不断的战争。

在占领帕维亚后，伦巴第国王阿尔博因建立了一套公爵领地体系。这导致了随后几个世纪里意大利支离破碎的城邦政治。



在占领帕维亚后，伦巴第国王阿尔博因建立了一套公爵领地体系。这导致了随后几个世纪里意大利支离破碎的城邦政治。

奥萨里的继任者阿吉洛夫与法兰克人达成和平协议，并采取行动巩固了自己对于众公爵的权力。在拜占庭帝国被其他冲突分散注意力的时候，阿吉洛夫趁机增强了王国的实力，他还使本国避免了困扰其他王国的宗教冲突。虽然在伦巴第王国内部，阿里乌派和尼西亚派基督徒也存在分歧，但相对而言，双方并没有发生直接的冲突或迫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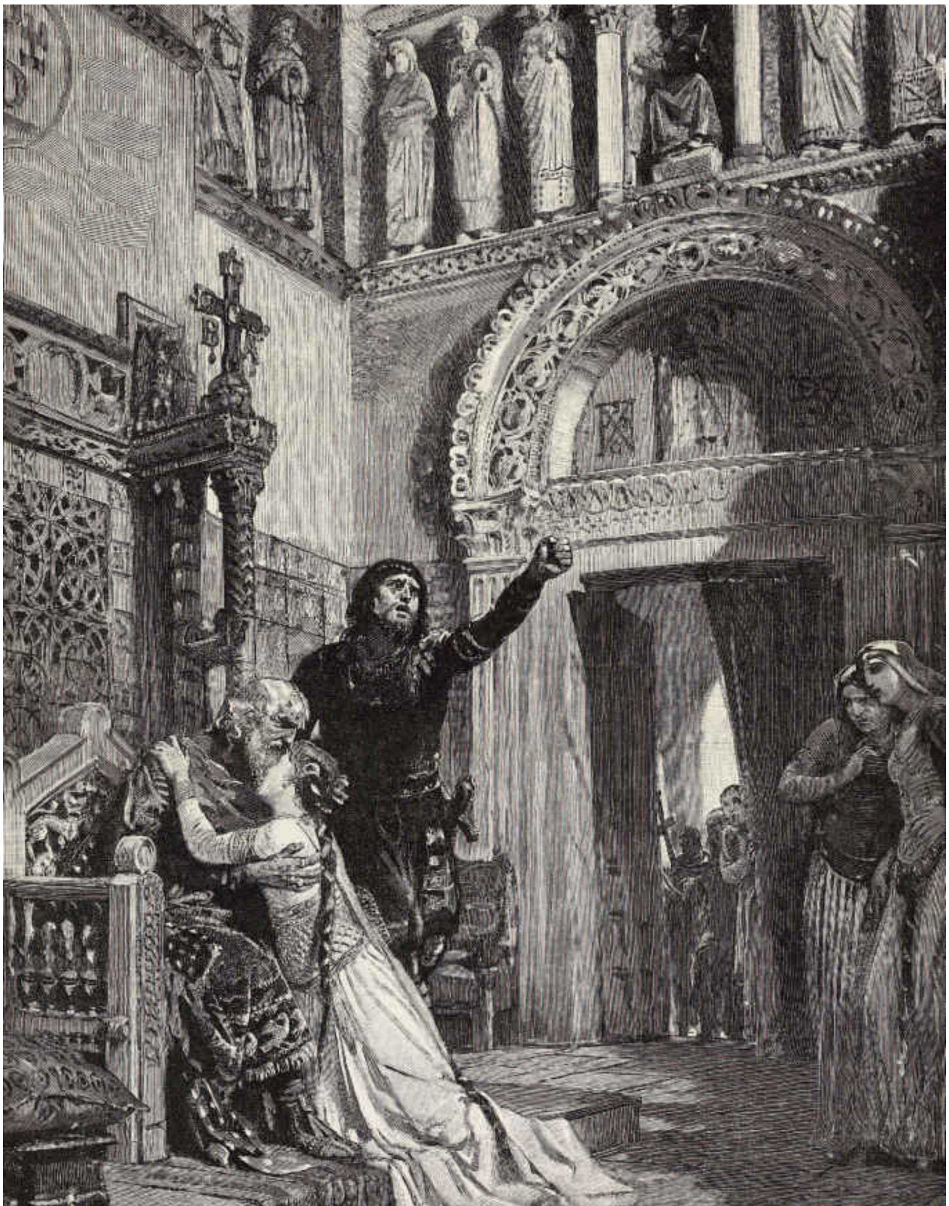
后来，伦巴第人的民族特征逐渐消失，他们接受了许多罗马帝国晚期的习俗。640年左右，伦巴第王国的势力达到巅峰，控制了意大利北部和南部的部分地区。然而，罗德尔德国王在他父亲死后不久即遭暗杀，致使伦巴第分裂成两个王国：一个以帕维亚为首都，另一个以米兰为首都。双方的冲突持续了许多年，直到柳特普兰德重新统一王国。

712—744年，柳特普兰德统治期间，伦巴第得到复兴。与强大的法兰克人的良好关系使王国得以向外扩张，但这只是短暂的全盛时期。柳特普兰德死后，他的继任者希尔德普兰德被拉奇斯公爵废黜。之后，拉奇斯做了一个奇怪的决定，退位并隐居于修道院。756年，他试图重夺王位。

拉奇斯向国王德西迪里厄斯发起挑战，他得到了教皇的支持。但德西迪里厄斯成功地镇压了叛乱，并让女儿与法兰克国王查理曼联姻，试图以此来巩固自己的地位。这段婚姻只存在于770—771年，771年，查理曼把她送回家，然后再婚了。

当时，查理曼和他的兄弟卡洛曼共同治理法兰克王国，德西迪里厄斯想利用这种不稳定的局面为自己谋取利益。德西迪里厄斯与卡洛曼结盟，企图推翻查理曼。但卡洛曼于771年去世，这一企图最终落空。德西迪里厄斯与教皇阿德里安一世发生了冲突，后者拒绝为卡洛曼的儿子们加冕，也不承认他们在法兰克王国的地位。结

果德西迪里厄斯与法兰克人之间爆发战争，他最终败于查理曼之手。尽管此后伦巴第公爵仍旧统治一些地区，但其实伦巴第王国已经结束了。



埃蒙加尔达（历史上更广为人知的名字是德西德拉塔）是伦巴第国王德西迪里厄斯的女儿，在与查理曼结婚一年后被送回父亲身边。随后伦巴第人和法兰克人之间爆发了战争。

阿瓦尔人

早在463年，罗马史料中就提到了阿瓦尔人，他们似乎与匈奴人有关。但是，这很可能是对两个不同部族使用了相同的名字，或者是罗马历史学家的误解。有证据表明，阿瓦尔人在被突厥人[3]击败后，从蒙古高原向西迁移。

也有这样的记载，6世纪中叶，阿瓦尔人出现在黑海以北的大草原上，他们有时充当拜占庭帝国的雇佣兵。阿瓦尔人控制了广阔的土地，最终进入多瑙河地区，取代了伦巴第人。他们的目标可能是在远离突厥的地方建立一个安全的家园，这使得他们在早期与周边部族产生了很多冲突。罗马军队禁止阿瓦尔人向多瑙河以南迁移，于是他们试图绕道北方向西迁移，但被法兰克人击退了。

他们的目标可能是在远离突厥的地方建立一个安全的家园，这使得他们在早期与周边部族产生了很多冲突。

在阿瓦尔人进入潘诺尼亚（Pannonia）之前，他们对这两条路线进行了反复尝试，但都失败了。阿瓦尔人与伦巴第人联合起来对抗格皮德人，但这个联盟并不稳固。阿瓦尔人设法使伦巴第人接受了一项完全偏向己方的交易，他们从中获得了巨大的利益。伦巴第国王阿尔博因为了巩固与化敌为友的格皮德人的同盟关系，娶了他们被俘首领的女儿罗莎蒙德（Rosamund）。这为他埋下了祸根，因为罗莎蒙德密谋要杀死他。据说，阿瓦尔人的国王巴彦用罗莎蒙德父亲的头骨做了一个酒杯，并把它送给了阿尔博因。阿尔博因很不明智地强迫他的新婚妻子用这个酒杯喝酒。

与此同时，伦巴第人向西进入意大利，阿瓦尔人因此控制了潘诺尼亚。582年，潘诺尼亚首都西尔米乌姆（Sirmium）落入巴彦的军队之手。与波斯人的战争分散了拜占庭军队的力量，因此阿瓦尔人占据巴尔干半岛长达数年。602年，阿瓦尔人惨败于拜占庭帝国

之手，但拜占庭帝国的军队在叛乱和瘟疫的双重打击下也陷入瘫痪，阿瓦尔人这才逃过被彻底摧毁的命运。

阿瓦尔人的力量被大大削弱了，他们的首领巴彦似乎死于大败之前，也可能死于瘟疫。他的继任者才能有限，但他们继续对拜占庭发动战争。阿瓦尔人最初是马背上的游牧民族，但到626年，他们已经有能力派遣海军进攻拜占庭了，虽然并未成功。不久，他们的属民保加利亚人起义，经过一场消耗巨大的战争，阿瓦尔人才重新控制了保加利亚人。阿瓦尔人的衰退仍在继续，而内部纷争加快了这一过程。795年，阿瓦尔人的残余势力试图与法兰克国王查理曼领导下的法兰克人结盟。

一开始，查理曼似乎接受了这一提议，最终他却征服了阿瓦尔人。799年，阿瓦尔人最后一次发动起义，试图维护他们的独立。这次起义被镇压后，阿瓦尔人成为法兰克人的属民。



后罗马时代，阿瓦尔人和其他野蛮人有能力制作美丽而复杂的装饰物品。这被认为是文明的标志之一。

其他日耳曼部落

罗马学者统称为日耳曼部落者，他们之间可能有文化上的联系，也可能没有。随着历史的发展和各个部落群体的迁移，部落之间相互交流融合，这一情况变得复杂起来。诸如汪达尔或哥特这样的名称，其内涵并不明确，而且是在某一特定时期由外族人使用的，所以这个名称可能包含了与该群体成员起源完全不同的人。这些部落很可能把自己定义为拥有当地身份的与其他部落有隶属或联盟关系的个体，而不是某个庞大的日耳曼、哥特或伦巴第民族的一部分。

许多部落是广义的日耳曼移民的一部分，而不是迁移活动主要的参与者，他们甚至觉得自己并没有参与更大的事件。他们仅仅是在寻找一个家园，让自己能够吃饱饭。我们可以这样认为，族人发现自己被卷入了超出首领控制的事件，他们试图最大限度地利用机会，渡过难关。现代学者对这些部落或部落群体知之甚少，因为他们已经在后罗马时代的大动荡中消失得无影无踪。不过，其中一些部落依然在历史上留下了自己的痕迹。

勃艮第人可能与许多日耳曼部落有共同的起源，也许是在斯堪的纳维亚半岛南部。后来他们似乎与其他日耳曼部落一起向南迁移到现在的波兰。塔西佗在公元98年的著作中提到了他们。勃艮第人是当代学者提出的称呼，他们实际是穿越莱茵河的汪达尔人移民的一部分。这支人群只遭遇了来自该地区已经罗马化的部落的微弱抵抗，就在莱茵河西岸定居了。

413年，罗马承认勃艮第人为联盟国，这其实意味着罗马已经无力驱离他们，只是希望能利用他们的兵力而不是与之作战了。勃艮第人逐渐向西迁移，并在垂死挣扎的西罗马帝国政治中占据重要席位。5世纪末，勃艮第国王耿多巴德成为一支所谓的“罗马军队”的将军，但被克洛维一世击败了。

马镫

虽然对欧洲引入马镫的问题存在激烈的争论，但人们普遍将其归功于阿瓦尔人。马镫可以让骑手站起来用力攻击对手，更重要的是，如果马绊了一跤或骑手在攻击时动作幅度过大，他仍然可以安全地待在马背上。因此，与那些不用马镫而容易脱离马鞍的人相比，使用马镫的骑兵在战场上生存的可能性更大，他们也可以在不靠近敌人武器射程的情况下尽可能深入地靠近对方。马镫并没有给战争带来革命性的变化，但它却有效地增强了骑兵的战斗力。阿瓦尔骑士和后来模仿者的成功，极其生动地展示了这种新装备的功用。因此，没过多长时间，所有的骑士就都有马镫了。



和许多伟大的发明一样，马镫在概念上很简单，但在实际使用时却非常有效。马镫很快成了骑兵的必需品。



查理曼针对阿瓦尔人的战争，标志着法兰克人从后罗马时代的野蛮王国过渡到中世纪早期的王国。

迫于东哥特人的势力，勃艮第人从纳博讷（Narbonne）地区向北推进，他们在里昂和第戎附近保留了一个王国，直到534年被法兰克人征服。此后，勃艮第成为法兰克人的领地，在法兰克人脱离日耳曼部落身份以后的很长时间里，它仍然在法兰克政治中扮演着重要角色。

格皮德人被罗马史学家归入哥特部落，两者可能有共同的起源。他们最终迁移到达契亚（Dacia），曾试图在多瑙河以南定居，但没能成功。格皮德人被匈奴人征服，阿提拉死后他们开始反抗匈奴人，希望能独立。后来他们的王国被伦巴第人和阿瓦尔人的联盟推翻，567年之后，王国便不复存在了。

撒克逊人占领了靠近北海海岸的北日耳曼地区，他们在罗马时代因沿海掠夺而臭名昭著。285—286年，罗马指挥官卡劳修斯打败了撒克逊人，这引发了一件不寻常的事情——卡劳修斯被指控从这场战斗中牟取暴利。如果是真的，这在罗马世界也不罕见；但如果卡劳修斯被判有罪，他将被处决。于是，他宣布自己是不列颠一个独立区域的统治者，并且创立了由当地人组成的海军。他在293年被暗杀，其统治只维持了几年。

撒克逊人（Saxon）的势力从此衰落，一些部落迁入不列颠，另一些则留在他们原来的家园。匈奴人入侵对他们的影响不像其他部落那样严重，他们也没有对欧洲大陆产生重大影响。迁移到英格兰的撒克逊人创造了那个时代的历史，留在欧洲大陆的萨克森人则逐渐被法兰克人同化。

阿勒曼尼人的范围比较广泛，可能包括苏维汇人。在这个问题上，罗马史料一如既往地含糊和矛盾。阿勒曼尼人被匈奴人征服并加入了他们的军队，阿提拉死后，阿勒曼人获得了短暂的独立。496年，阿勒曼尼人被克洛维一世统治下的法兰克人征服。虽然不再是一个独立的民族，但他们的遗产——日耳曼的法语名字依然存在。



一幅19世纪晚期的版画，展现了4—6世纪的某段时间日耳曼部落和匈奴人行军的场景。

阿兰人

阿兰人，或称阿拉尼人，最早出现在公元前1500年左右的印度史料中，其时他们自称雅利安人。雅利安是个形容词，意思是“文明的”。这个名称被各种不同的、可能也不相关的群体使用。阿兰人的祖先向东迁移，在高加索地区建立了自己的家园，在那里他们遇到了后来的保加利亚人。

阿兰人也在其他地方建立了定居点，尤其是多瑙河沿岸。他们早在公元前1世纪就为罗马帝国所知，虽然罗马史学家通常不清楚这些部族的具体身份。高加索地区的阿兰人被匈奴人征服，并作为盟军为匈奴人效力。这使得许多阿兰人部落向西进入欧洲，逐渐与当地人融合。

其他阿兰部落撤退到偏远地区，并且在阿提拉战败后回到高加索，重新拥有了独立的领地。他们的王国延续到中世纪，虽然有时

候他们从属于可萨人（Khazar）。965年，阿兰人战胜了被基辅军队击败的可萨人，这些可萨人后来又被蒙古人征服。当然，那个时候，欧洲的黑暗时代已经结束了。因此，高加索的阿兰人国家，是匈奴人西迁后少数幸存下来的蛮族王国之一。今天，阿兰文化的遗存仍然昭示着他们曾经的荣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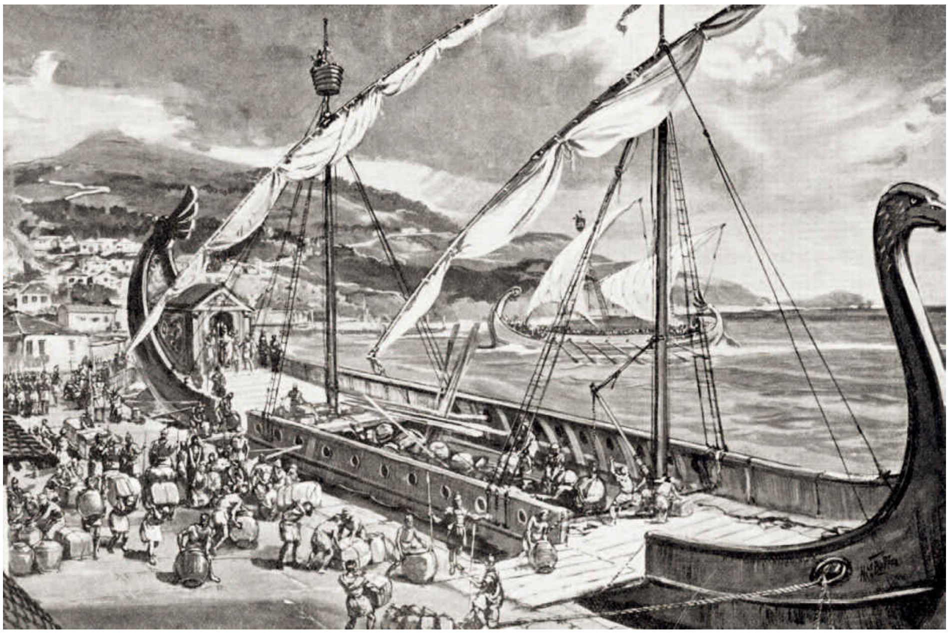
高加索的阿兰人国家，是匈奴人西迁后少数幸存下来的蛮族王国之一。

保加利亚人

欧洲历史学家所了解的保加利亚人，是里海和伏尔加河周围大草原上的游牧民族。他们最初的家园可能在中亚某个地方。匈奴人战败后，保加利亚人在亚速海附近定居下来。他们曾袭击拜占庭帝国，但后来又作为雇佣兵为拜占庭效力。

保加利亚人在6世纪下半叶与阿瓦尔人发生冲突，人数大为减少。但在库布拉特的领导下，他们东山再起，建立了一个短命的国家。库布拉特去世后，大约在642年，保加利亚人分裂成五个分支。其中一个分支与伦巴第人一起向西迁移，而其他人则融入阿瓦尔人和可萨人之中。保加利亚人控制了伏尔加河流域贸易区中至关重要的河段，直到1200年被蒙古人征服。

现代的保加利亚得名于移民到那里的保加利亚人。他们建立了一个帝国，并与拜占庭帝国结盟。随着时间的推移，保加利亚人融入了当地的人群。当地人大多是斯拉夫人或色雷斯人的后裔。保加利亚人的国家一直延续到11世纪，然后成为拜占庭帝国的一部分。后来它重新以独立王国的身份出现。其最近一次复兴在19世纪末，当时保加利亚已从奥斯曼帝国独立出来。



马可·奥里利乌斯·莫塞乌斯·瓦列里乌斯·卡劳修斯宣布自己成为罗马领土上的不列颠尼亚和山北高卢的皇帝。为了巩固自己的势力，他夺取了布洛涅的罗马舰队，用它来控制不列颠周围的水域。



一部关于9—11世纪拜占庭皇帝统治时期的编年史，由约翰·斯克里兹撰写。它是那个时期流传下来为数不多的与拜占庭有关的原始文献之一。

从部落到王国

7世纪，罗马时代晚期的大多数部族已不复存在，但后来出现了现代历史上我们所熟知的诸王国。它们不再是野蛮部族，而是定

居的人群，他们建造城市，还修建了伟大的石构建筑。在这些王国文化的某些地方，蛮族血统表现得仍然很明显，尤其在活跃程度和残暴方面。但这不是一个肆意破坏的黑暗时代，这是一个新时代的肇始。

雅利安人

“雅利安”（Aryan）一词与“阿里乌”（Arian）截然不同，后者是基督教的一个教派。雅利安的意思是“文明的”或“优越的”，雅利安人以此与他们所认为的未开化的野蛮人区分。一些民族以一种相当自满的方式，用这个词表示他们与生俱来的优越感。这个词和其他许多类似的词一样，在20世纪被“劫持”。它现在的含义相当令人不快，与最初的用法完全不相关。

蛮族王国时期见证了现代欧洲的开端，各部落人群定居的地方基本也是今天他们生活的地方。随着王国的融合，语言不断演变并具有区域特色，后来者的语言中也加进了拉丁语的词汇和习语。这就能够理解为什么现代欧洲许多语言具有相似之处——征服者到来时，法兰克、意大利和伊比利亚都居住着一直说拉丁语的人。当地语言和外来语言的融合，开启了现代法语、意大利语和西班牙语的演化进程。

法兰克人最终成为大移民的胜利者，建立了一个强大的国家。然而，这种胜利也是要付出代价的。法兰克王国进一步分裂，而且王国内部也并不总是和平的。其他一些国家失去了自己的名字和部分文化，但以新的身份出现在中世纪的舞台上。虽然并不存在名为东哥特或汪达利亚（Vandalia）的中世纪王国，但这些部族的居民对中世纪欧洲发展的影响却是深远的。



法兰克国王查理二世也是意大利国王，是所谓的“罗马人的国王”，我们现在称之为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在这里，罗马的意思是“欧洲的文明人”，而不是原来罗马帝国的延续。

---

(1) 西班牙古城，位于马德里以南70千米处。——译者注

(2) 东哥特国王（493—526年在位），其国家以拉文纳为首都，领土包括现在的意大利和克罗地亚部分地区。通过联姻等一系列行动，东哥特国王狄奥多里克也成了西哥特的摄政王，其影响力从意大利扩展到了西班牙、葡萄牙、法国西南部一带。后世称其为“狄奥多里克大帝”。——译者注

(3) 此处翻译出来的“突厥”一词，以及后文的这个词，原文都是“Gokturks”，我们认为应该是“Gök Türks”。——译者注

第3章
卷入欧洲事务的不列颠群岛

不列颠群岛见证了一系列的入侵，最早的入侵可追溯到最后一次冰河时代末期冰川消退之时。一波又一波的人陆续来到这里，带来了他们的文化和语言。有时候，他们甚至会取代这个地区的原住民。所以，并不是直到诺曼征服，英国统一才成为可能。此前早有征兆。

随着冰川的消退，以狩猎、采集为生的人们穿过一座大陆桥，从逐渐被海水淹没的欧洲来到不列颠群岛。同样，可能也有一座大陆桥让人们可以进入爱尔兰。后来海平面上升，进入不列颠的通道被切断了。当不列颠群岛不再与欧洲大陆相连，当地的文化与欧洲大陆的文化就出现了差异。不过，不列颠群岛并不是完全孤立的。



一幅15世纪的作品，表现了罗马入侵英国的场景。画面中身着板甲的士兵配备了中世纪武器。那个时代对历史没有科学的研究，人们通常认为，事物从古至今大致是一样的。

穿越狭窄的海域到达欧洲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但是不列颠和欧洲海岸的部族仍然保持着联系。贸易带来的不仅仅是商品和贵金

属，每一次贸易探险都伴随着思想和文化的交流。武装冲突则促进了新的武器和战术的传播。

当罗马人第一次冒险进入不列颠群岛时，这里大部分区域已被凯尔特人占领。他们到达的时间远比罗马人要早，而且取代了当时岛上的原住民。与欧洲大陆的凯尔特人一样，不列颠凯尔特人也是组织松散的部落和部落联盟，没有形成统一的国家，而且相互之间经常有摩擦。

罗马人对不列颠的征服是政治、经济和武力的结合——简而言之，是一种典型的罗马方式。一些部落积极寻求加入罗马帝国，或者先是静观其变，随后成为帝国的盟友，以避免被帝国征服；另一些部落则选择抗争或试图与这群后来者保持距离。但不列颠最终还是被征服了，并开始罗马化。



一堵墙需要有人防守，才能成为敌人的障碍。但是一套高效的信息传递系统，可以确保帝国把增援部队派往哈德良长城任意一处受威胁的区域。所有经过这里的军队，都不可能瞒过墙后面的驻军。

罗马探险家或士兵是否曾踏足爱尔兰还存在争议。但他们确实曾试图征服苏格兰。这次行动顶多取得了部分成功。罗马史学家塔西佗怀着钦佩之情记录了苏格兰人的勇敢和残暴。塔西佗认为，他们相当于欧洲大陆上高贵而独立的高卢人，直到罗马帝国征服了他

们。他还指出，尽管苏格兰人在战斗中可能一再失利，但他们只是隐匿到了乡间，日后肯定会卷土重来。他认为，哪怕只剩下几个苏格兰人，只要他们团结在一起，罗马帝国就永远无法控制他们的家园。

这种对苏格兰人的警惕可能在帝国高层也得到了呼应。罗马帝国边界上的第一个永久性防御工事就是沿着苏格兰南部修建的，罗马后来还建造了更著名的哈德良长城和安东尼长城（Antoninus Wall），这意味着帝国承认它在不列颠群岛的扩张已达到极限。但这些城墙不足以将苏格兰人挡在不列颠之外，这只是罗马采取的一系列措施中的一部分。这些措施包括与北方的部落建立良好关系，使它们能够在对苏格兰的战争中作为缓冲。

后罗马时代的不列颠

在罗马时代，一些后来成为英格兰组成部分的部族，都被不同程度地罗马化了。这也意味着它们处在罗马文化的辐射范围之中。罗马帝国从世界各地为其军团和辅助团征募战士。在某些情况下，罗马帝国会允许反叛者在遥远的行省服役，作为死刑之外的选择。萨尔马提亚的一个骑兵团就有这样的经历，有人认为这个团可能是亚瑟王骑士传奇的起源。

在某些情况下，罗马帝国会允许反叛者在遥远的行省服役，作为死刑之外的选择。

一些士兵和官员会在兵役结束后留下来与当地人通婚，以罗马—不列颠的方式抚养他们的孩子。其他影响更多是在风俗习惯方面，罗马人做事是卓有成效的。即使帝国瓦解了，人们也可以沿用之前的行事方式，而不是发明一种新的建筑方式或者商业模式。因

此，即使崩溃的帝国抛弃了罗马式的生活方式，它仍在不列颠延续着。

亚瑟王传奇

亚瑟王的传奇故事历经几个世纪的演变。故事的主角是一位名叫亚瑟的军事首领——而不是国王，早期的作品称他为巴顿山之战的英雄。后来人们认为这个传说可能有其他起源，比如后罗马时代的骑兵指挥官和部落首领。蒙默思的杰弗里在1136年左右撰写的《不列颠诸王史》（*Historia Regum Brittanniae*），可能是我们熟知的现代亚瑟王故事的开端。

蒙默思的杰弗里的作品部分基于英国历史，它通过各种各样的虚构人物，将亚瑟王和各种真实人物的家系追溯到一个名叫布鲁图斯（Brutus）的特洛伊/罗马英雄。意料之中，蒙默思的杰弗里的《亚瑟王传奇》（和后来的版本一样）充满了从威尔士神话中借鉴来的概念和时代错误。

现在《亚瑟王传奇》仍然很受欢迎。尽管不断有人试图重塑“真正的亚瑟王故事”，但它本身不过是从零碎的历史记录中分离出来的小说而已，而且这些历史记录本身的真实性也存在各种疑问。

不列颠人民“自行防卫”，这段时期算得上是不列颠黑暗时代的候选期之一了。这一时期不仅鲜有文字留存，整个社会也动荡不安。



《亚瑟王传奇》很可能是一个完全虚构的故事，其灵感来自许多历史人物。

410年之后，霍诺里乌斯（Flavius Honorius）[1]皇帝下令让不列颠人民“自行防卫”，这段时期算得上是不列颠黑暗时代的候选期之一了。这一时期不仅鲜有文字留存，整个社会也动荡不安。

这期间，城市衰落，建造房屋的材料从石头变成了木头，人们甚至回到了传统的凯尔特山堡。

我们知道，这时罗马硬币仍在流通，而且几乎没有发行新货币，这也不足为奇。与欧洲大陆的贸易似乎在短期内有所增长，货物通常包括日常用品和奢侈品。5世纪早期，帝国似乎经历了一段艰难时日，但它终会恢复元气。然而到了5世纪末，很明显不列颠人只能靠自己了。凯尔特文化的许多元素披着罗马文化的外衣重新出现了。旧的部落分支和新的派系让不列颠人分裂成多个区域政治体，并拥有各自的首领，冲突自是不可避免。除了内部争斗，不列颠人还面临其他部族的威胁，来自北方的皮克特袭击者（Pictish raiders），以及从东南部登陆并占据了一片领土的日耳曼部落。

旧的部落分支和新的派系导致不列颠人分裂成多个区域政治体，并拥有各自的首领。

盎格鲁-撒克逊大移民

人们认为盎格鲁-撒克逊人到达英国是“入侵”行为，从某方面讲这是正确的。因为他们在很大程度上是不受当地人欢迎的，而且这个过程包含了暴力。然而，他们对英国东南部的占领更多的是一种迁移行为，而不是蓄意进攻。新来者大多是撒克逊人、盎格鲁人和朱特人，他们从现在的丹麦、德国北部和荷兰出发，穿过北海南部到达不列颠。他们熟悉这些海域，多年来一直以突袭者的身份在那里活动。有些海上远征是针对已经遭受过多次打击的特定目标。有时候全家人都会成为突袭者，他们或者占据土地建造定居点，或者在赶走当地居民后接管他们的土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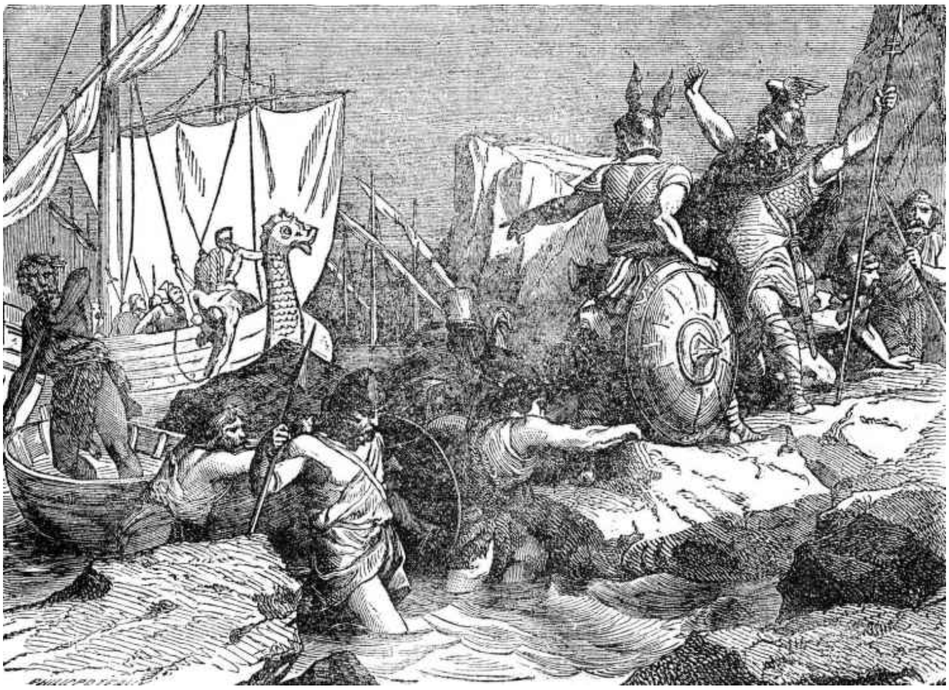


尽管不列颠人恳求罗马军队留下来保护他们，但罗马皇帝霍诺里乌斯还是将军队撤走了。

随着时间的推移，撒克逊海岸的人口不断增长，一部分是新生儿，另一部分是陆续抵达的新家庭。新来者向内陆推进，以寻求更多土地。这加剧了他们与不列颠人的紧张关系，并不时引发暴力冲突。但撒克逊人并不是不列颠统治者面临的唯一威胁，所以不列颠人决定利用撒克逊人，而不是与之交战。这是罗马人遗留下来的方法还是不列颠统治者自己想出来的主意，我们并不清楚。但无论如何，这件事之后都严重偏离了既定方向。

这一时期几乎没有留存下来的作品，后来的资料也零零散散，可能还带有很大的偏见。但似乎存在一位不列颠统治者——通常被称为沃蒂根（Vortigen）。他授予撒克逊人土地，作为回报，撒克逊人要服兵役。根据现存的记载，449年，沃蒂根安排撒克逊人的首领亨季斯特和霍萨协助他对付皮克特人。但他们背叛了沃蒂根，此举严重削弱了他的王国。不夸张地说，这一时期的记载是不可靠的。比如，一个名叫亚瑟的军事首领，靠着武器上各种神圣铭文的帮助，单枪匹马地杀死了大量撒克逊人，而且敌人的数目精准得令

人生疑。不过，可以肯定的是，撒克逊人在4世纪早期建立了自己的国家，他们的国家是后世英国政治版图的一部分。



亨季斯特和霍萨是撒克逊人入侵不列颠的传奇领导者。霍萨死于455年的一场战斗，而亨季斯特在现在的肯特郡地区做了国王。

沃蒂根

我们对这段历史知之甚少。沃蒂根在早期威尔士作品中被称为格洛瑟恩（Gwrtheyrn）。他还出现在一些虚构性很强的作品中，如作为早期亚瑟王传奇的一部分出现在《不列颠历史》中。但是早期编年史家带着偏见，后来的编年史家又发挥了太多想象，严重扭曲了他的生平事迹。不过，沃蒂根似乎确实是一个真实存在的历史人物。

现存的作品中，有一部出自6世纪中叶的吉尔达斯之手。根据吉尔达斯的说法，沃蒂根非常强大，他自称不列颠的至尊王。然而，这并不意味他掌管统一国家的人民，只是表明沃蒂根把自

己置于其他不列颠统治者之上。我们也不清楚有多少人认可他的地位。



国王沃蒂根希望利用撒克逊入侵者来对付其他敌人，他在449年与亨季斯特和霍萨签订了条约。

一些资料显示，当时保卫不列颠、抵抗撒克逊人的行动是由罗马人后裔安布洛修斯·奥雷连诺斯（Ambrosius Aurelianus）领导的。传说撒克逊人在巴顿山之战中惨败，但这场战役的地点和时间仍存争议。不列颠人一定取得了某种胜利，因为撒克逊人的威胁暂时减弱了。但是，在6世纪，新一批的撒克逊人开始涌入不列颠王国。

巴顿山之战

传统观点认为，撒克逊人（以及由此类推的盎格鲁人、朱特人和他们的盟军）在490—500年的巴顿山之战中遭遇惨败。但这

件事几乎没有明确的证据——战场位置不为人知，甚至参与者的身份也不明确。后世流传的故事中，亚瑟王几乎完全依靠神力，粉碎了撒克逊人的进攻。但实际上，关于这场战役唯一能确定的就是，盎格鲁-撒克逊人的扩张在一段时间内被遏制了，这场冲突也的确发生过。这一切并非不可能——在某个地方发生了一场“巴顿山之战”，盎格鲁-撒克逊人遭到沉重的打击，需要几十年才能恢复过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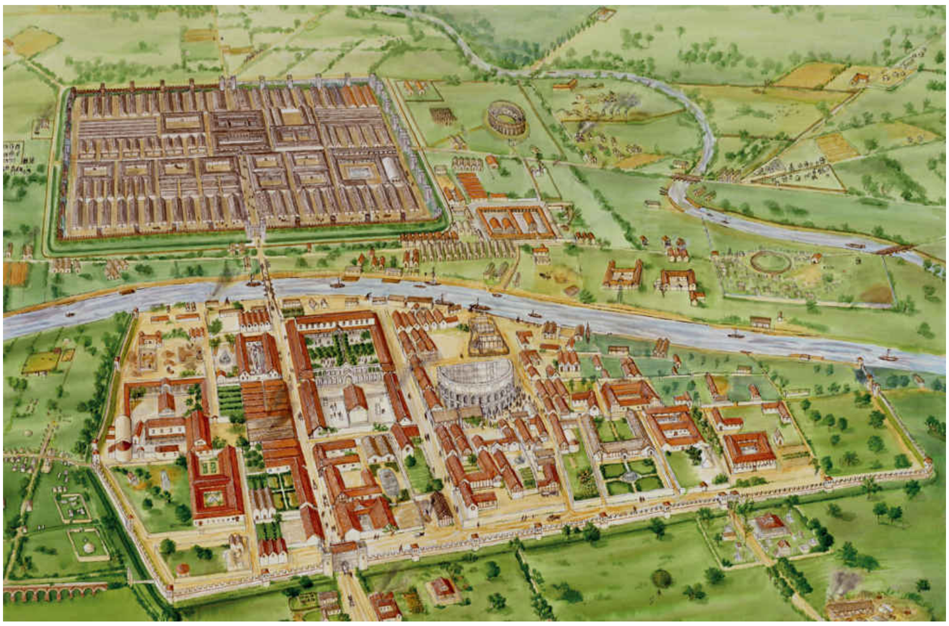
在罗马入侵之前，高山堡垒在不列颠很常见，其中一些在四百年后被重新使用。这些地方是长期有人居住还是在需要时作为避难所，尚存争议。

诺森布里亚

当日耳曼入侵者在英格兰东南海岸定居并向附近的地区推进时，不列颠的其他地方也出现了本土王国。不列颠北部的不列颠尼亚行省首府——爱波罗肯（在约克郡），在罗马人放弃不列颠群岛后仍然是行政中心。但是这个城市在衰落，常住人口也在减少。

随着人口向周围部落迁出及人口数量的普遍下降，一旦罗马文化元素的装饰被移除，不列颠就明显向着古老的部落生活方式回归。这个过程在北方进行得更快，带有凯尔特风格的北不列颠王国出现了。到470年，王国已四分五裂，爱波罗肯的统治者在几个国王中处于领导地位，但对其他人没有正式的支配权力。

547年，盎格鲁人占领了一个名叫贝雷纳恰（Berenaccia，或称伯尼西亚Bernicia）的王国。559年，另一个盎格鲁王国德伊勒诞生了。尽管现在的约克郡地区在当时已经允许一部分撒克逊人定居，但该地区一直不曾受到日耳曼移民的影响。大约在580年，爱波罗肯被盎格鲁人占领，他们在此建立了一个王国，这就是后来的诺森布里亚。



爱波罗肯城建于公元71年左右，当时是罗马军队的营地。关于这座城市，后人更熟悉的名字是约维克和约克。它曾是不列颠尼亚行省首府，也是几个世纪间军事行动的主要目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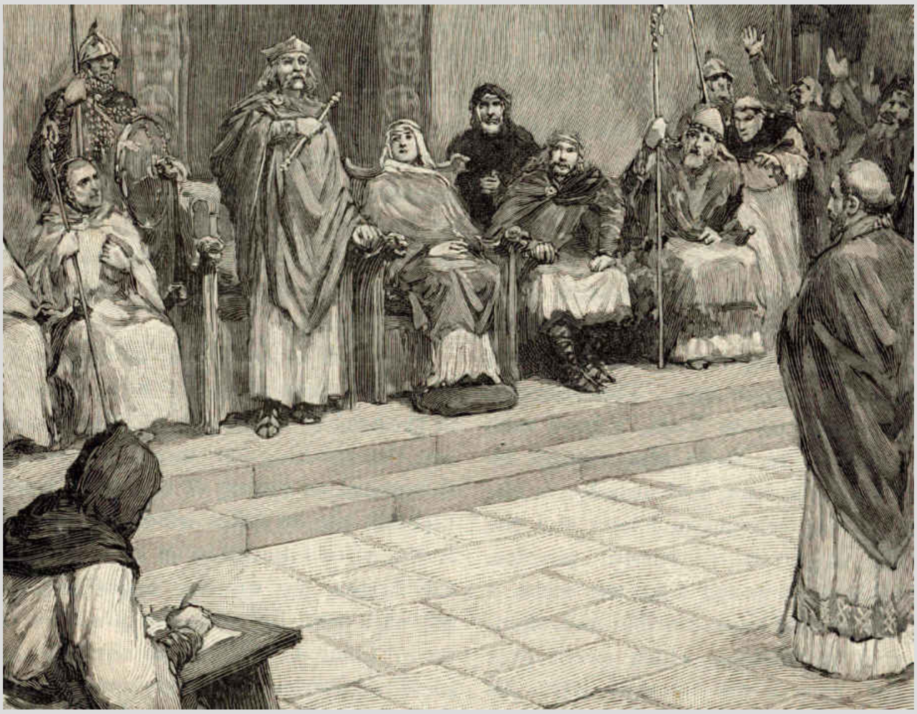
在切斯特之战后，国王埃塞尔弗瑞斯下令处死敌人身边的修士。

“诺森布里亚”这个名字取自“亨伯河以北”，这条河形成了王国的南部边界。伯尼西亚和德伊勒两地在最初的几十年里一直冲突不断，直到604年才被伯尼西亚国王埃塞尔弗瑞斯统一。但这并没能阻止内部分裂持续地削弱王国的力量。埃塞尔弗瑞斯试图把德伊勒地区的一些居民安置在伯尼西亚，以此来对抗这种分裂。王国的外部威胁也很多，尤其是南部扩张中的麦西亚王国。

埃塞尔弗瑞斯可能死于616年。他死后，被剥夺了继承权并在东盎格利亚流亡的埃德温王子寻到了回国的机会。埃德温控制了他的故乡德伊勒以及半统一的王国。他是一个有能力的领导者，进一步扩张了诺森布里亚的版图，这引起了他的邻居麦西亚和威塞克斯的重视。

诺森布里亚的宗教

尽管遵从凯尔特习俗的基督徒和遵从罗马习俗的基督徒之间关系紧张，但诺森布里亚仍然是基督教的中心之一。两派的紧张关系引发了内部冲突，促使诺森布里亚国王奥斯威主持召开了664年的惠特比会议。这次会议之后，诺森布里亚王国开始接受基督教中的罗马习俗。这一事件对基督教的发展具有重大意义——如果不是奥斯威，英格兰早期教会的一些主要人物可能就是遵从凯尔特习俗的基督徒了。



惠特比会议是不列颠教会史中的一件大事。后来，凯尔特教会衰落，罗马教会开始主导不列颠的宗教。

有关记录是零散的。冲突发生在哪里甚至是否发生过，文献方面也存在分歧。不过，有一场冲突是确实发生了的。麦西亚人尝试暗杀埃德温，之后又背叛了前盟友威塞克斯，不过这些行为都严重受挫。之后他们又联合威尔士的卡德沃隆（Cadwallon）向诺森布里亚进军。

后来，埃德温在战场上被杀死，诺森布里亚的势力大大削弱。他的继任者，埃塞尔弗瑞斯的儿子奥斯瓦尔德在军事方面并不出彩，但他取得了另一种形式的胜利。埃德温是第一个成为基督徒的诺森布里亚国王，他与异教的麦西亚人和威尔士人作战，因而被尊为基督教“圣人”。



建于657年的惠特比修道院被丹麦人摧毁。现在的遗存是1078年重建的，时间在诺曼征服之后。

奥斯瓦尔德死后，诺森布里亚再次分裂。他的弟弟奥斯威继承了伯尼西亚的王位，德伊勒则属于埃德温的表弟奥斯温的儿子。之后，这帮亲戚彼此敌对，原因不甚明了，可能宗教信仰不同。不管原因是什么，结果都很清楚，奥斯威在654年暗杀了奥斯温，并重新统一了诺森布里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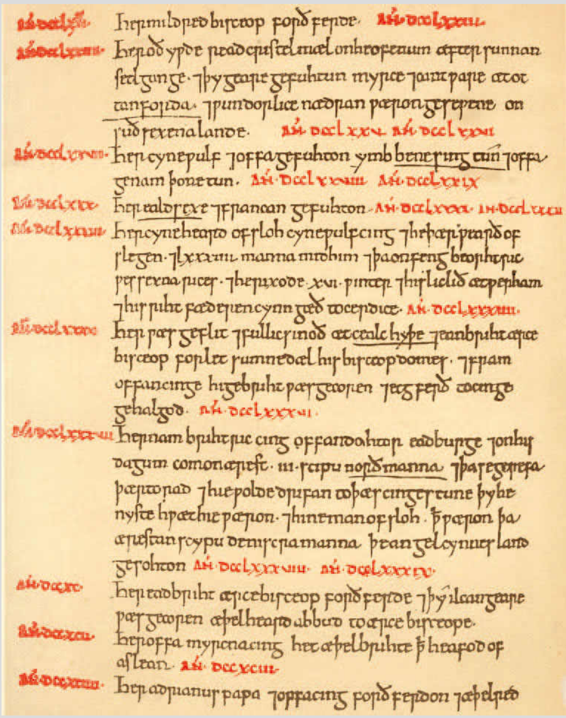
奥斯威随后袭击了麦西亚，在655年杀死了麦西亚国王彭达。他把王国的北部据为己有，把其余的土地分给彭达的儿子皮阿达。

皮阿达死后，奥斯威短暂地控制了整个麦西亚，但最终被赶回诺森布里亚与麦西亚的旧边界。

《盎格鲁-撒克逊编年史》

关于不列颠群岛后罗马时代的历史，我们所知的大部分内容都来自《盎格鲁-撒克逊编年史》——一部可以追溯到9世纪的著作。它记录的并不是一个时期的完整历史，而且有些地方带有明显偏见。但它与少数其他手稿一起流传下来，有非常重要的历史意义。

由尊者比德所著的《英国人教会史》，是这一时期另一部伟大的历史著作。意料之中，这本书围绕着宗教问题书写，这就使得《盎格鲁-撒克逊编年史》成为唯一一份记录非宗教事件的资料。



《盎格鲁-撒克逊编年史》有多份抄本，这使得它能够流传下来。

有一种观点认为，诺森布里亚王国建立于654年，在奥斯威统治时重新统一，而非在这个世纪早期才首次统一。到660年，它已成为不列颠最强大的王国。然而，强权并不等于稳定。这个强大的家族不断内讧，一任任国王相继登上王位，很快又被对手赶下台。

829年，诺森布里亚因内部分裂实力受损，成为威塞克斯国王爱格伯特的属地。此时，诺森布里亚被北欧人的突袭困扰，后来突袭升级，变成了全面的入侵。867年，互为死敌的伯尼西亚和德伊勒统治者握手言和，这段和平期持续了相当长的时间，足以让他们的军队联合起来对抗北欧入侵者。但他们在约克战败了。此后，诺森布里亚时而归属北欧王国，时而独立。再后来，诺森布里亚在英格兰国王爱德瑞德（Eadred）在位时并入其王国。

麦西亚

在后罗马时代的大部分时间里，麦西亚王国是亨伯河以南最强大的国家。它由一个半传奇的日耳曼人伊塞尔建立，时间可能早至515年，不过更普遍的观点是527年。伊塞尔和他的追随者通过东盎格利亚到达今天的米德兰（Mildlands）境内，并在一段时间内掌控了那里。然而，580—590年，国王克罗达将这些土地让给了居住在那里的日耳曼人，这成为东盎格利亚王国的基础。

麦西亚的扩张引发了与诺森布里亚的冲突。尽管像其他事件一样，资料不甚明确，但麦西亚军队很可能曾经卷入616年的切斯特之战。在这场战役中，诺森布里亚人击败了一支威尔士军队（是否有麦西亚盟军，存疑）。628年，麦西亚大举入侵威塞克斯，吞并了大量领土，随后击败诺森布里亚，杀死了国王埃德温。击败诺森布里亚后，麦西亚的领土进一步扩张。同时，他们在王国西部也有所斩获。

麦西亚的胜利并没有持续下去。一个重新崛起的诺森布里亚在信奉基督教的国王奥斯威的指挥下，打败并杀死了麦西亚的国王彭达。彭达的儿子皮阿达被允许保留半个王国，并成为一名基督徒。之后，皮阿达的统治被彭达的另一个儿子伍尔夫赫尔推翻。伍尔夫赫尔还对威塞克斯发动了战争。他在675年的贝德温之战中被击败，丢失了威塞克斯一部分领土。不久，伍尔夫赫尔去世，可能是生了重病。他的弟弟埃塞尔雷德一世继承了王位，在位期间重创诺森布里亚人，并利用这一优势来谈判边境协议。埃塞尔雷德一世娶了奥斯威王的女儿奥斯瑞斯（Osthryth），麦西亚与诺森布里亚的关系因此得到改善。

尽管身处种种阴谋之中，包括妻子在697年被谋杀，埃塞尔雷德一世在位期间还是成功地开创了一段长久的稳定期。甚至在他死后，这个稳定期仍然存在。他死后的历史不甚明晰，直到757年奥法登基。奥法为了登上王位，推翻了博恩雷德（Beornred）的统治，这件事对他来说毫不费力。他利用肯特王国的内乱，成功地发动了一次入侵，而且他在外交方面的措施也卓有成效。

尽管身处种种阴谋之中，包括妻子在697年被谋杀，埃塞尔雷德一世在位期间还是成功地开创了一段长久的稳定期。甚至在他死后，这个稳定期仍然存在。

奥法的女儿嫁给了威塞克斯国王贝奥赫特里克，奥法因此控制了威塞克斯。这一时期，麦西亚的使节还与欧洲大陆上强大的法兰克王国保持联系。另外，虽然也使用了暴力，但麦西亚兵不血刃就得到了东盎格利亚。这一事件有不同的说法。可能是在一次皇家访问中，奥法背叛了国王埃塞尔伯特；也可能只是在麦西亚控制了东盎格利亚后，奥法下令杀死了他。

麦西亚与威尔士的关系则更加混乱。我们都知道，奥法与威尔士人之间爆发过几次冲突，奥法堤（Offa’s Dyke）更是广为人知。有的人认为，奥法堤是阻挡威尔士人的防御工事，但当时关于这条堤坝用途的记录没有保存下来。它可能只是一个过度张扬的边界标志，意在提醒潜在的威尔士入侵者，他们想要进入的是不列颠最强大的国王的领土。



国王奥法被尊为不列颠共主，是凌驾于英格兰所有统治者之上的至尊王。他建造的伟大的土方工程奥法堤可能是一个边界标记，而不是防御工事。

奥法统治时期是麦西亚的高光时刻，之后它就衰落了。叛乱、暗杀和外部威胁削弱了这个王国的实力，825年，一支来自威塞克斯的军队击溃了麦西亚政权。威塞克斯国王爱格伯特带走了麦西亚的大部分财产，而残留的一小部分财产也不能发挥实质性作用了。不过，此后麦西亚依然存在了足够长的时间，并且抵挡住了早期北欧人对不列颠的入侵。874年，“维京雄狮”（the Great Heathen

Army）横扫麦西亚，北欧人占领了麦西亚的一部分领土，还扶植了一个傀儡国王统治剩余部分。

艾兰敦之战

825年是不列颠群岛历史上的一个转折点。这一年，麦西亚和威塞克斯之间爆发艾兰敦之战，结束了长期的敌对状态。关于这场战争的细节材料很少，甚至战场位置也有待确认。可以确定的是威塞克斯国王爱格伯特重创麦西亚的伯恩伍尔夫，占领了麦西亚的领土，为成功入侵萨塞克斯、埃塞克斯和肯特打开了通道。东盎格利亚随后也脱离了麦西亚的控制。在艾兰敦之战结束后的第四年，诺森布里亚国王承认爱格伯特为霸主，爱格伯特成为全英格兰的国王。

后来，阿尔弗雷德大帝崛起，成为北欧人的有力对手。麦西亚顺势与阿尔弗雷德大帝结盟，麦西亚人在北欧人的进攻中遭受了巨大损失，但这也促成了阿尔弗雷德的胜利。麦西亚在实行阿尔弗雷德的防御战略后，国力有所恢复，但最终在918年左右被威塞克斯吞并。

威塞克斯

威塞克斯是著名的神秘人物塞迪克酋长在519年建立的撒克逊王国。很多史料都提到了塞迪克，但通常都是片面或相互矛盾的记载。有观点称他曾与传奇的亚瑟王战斗过，甚至他就是亚瑟王本人，但这似乎不太可能。人们对塞迪克和他的生平知之甚少，但早期的威塞克斯王国在他们国王的统治下渐渐繁荣、壮大。

威塞克斯与诺森布里亚关系紧张，于是企图暗杀诺森布里亚国王埃德温。事情败露后，两国公然宣战。威塞克斯可能与麦西亚结成了联盟，他们的联军向北推进，与诺森布里亚军队交战，但被彻底击败。军事上的失败削弱了威塞克斯的国力，麦西亚趁机对其进行打压。接下来的一段时期，威塞克斯不过是一些小王国的松散集合，几乎不存在中央权力。

威塞克斯与诺森布里亚关系紧张，于是企图暗杀诺森布里亚国王埃德温。事情败露后，两国公然宣战。

674年左右，王国开始复兴。在几任国王的努力下，威塞克斯重新统一，收回了被麦西亚占领的领土。统一王国的最后一位国王是凯德瓦拉，他在自己征服的土地上用严酷手段对待异教徒，这赢得了基督教会的好感。凯德瓦拉在他生命快要终结的时候退位，前往罗马，在那里度过他最后的日子。他死后，王国很快就分裂了。



威塞克斯首任国王塞迪克是一个半传说性人物。他历尽艰辛，为自己的人民缔造了一个家园，建立起西撒克逊王国。532年，他的加冕仪式在温切斯特举行。



685年，凯德瓦拉夺得威塞克斯的王位。在位期间他领导了一场对萨塞克斯、肯特以及怀特岛的战争。

威塞克斯一直命运飘摇，直到786年贝奥赫特里克登基。他得到了麦西亚奥法王的支持，其统治一直持续到802年。贝奥赫特里克从婚姻中受益，与麦西亚建立了紧密的联系，他也因此挫败了被驱逐的爱格伯特夺权的企图。他的妻子是被艾德伯尔（Eadburh）毒死的。贝奥赫特里克死后，爱格伯特从他避难的法兰克王国返回。他在法兰克国王查理曼的支持下登上王位，并蓄谋与麦西亚开战。

825年，爱格伯特做好了充分的战争准备。他在对麦西亚人的军事行动中取得了一系列的胜利，占领了大片土地，使得威塞克斯更为强大。《盎格鲁-撒克逊编年史》称爱格伯特为不列颠的统治者。麦西亚人试图夺回被侵占的领土，爱格伯特挫败了他们的计划，让自己的儿子埃塞尔沃夫（Aethelwulf或Ethelwolf）统治麦

西亚。诺森布里亚承认了爱格伯特的霸权，从而消弭了爱格伯特可能发动的兵祸。

爱格伯特死于839年，继任者是埃塞尔沃夫。埃塞尔沃夫在位期间，不得不应对早期的北欧海盗袭击。在接下来的几十年里，这些袭击加剧，升级成全面入侵，但最初的入侵规模很小而且相对容易击退。在各种文献中，埃塞尔沃夫都是一位明智的统治者，懂得听取出自可信之人的金玉良言。但一些编年史家认为他太热衷于谈判和妥协，过多地参与宗教事务而忽略了王国事务。事实上，他留给儿子们一个稳定而强大的王国。





国王爱格伯特（左）重新建立了强大的威塞克斯王国；他的儿子埃塞尔沃夫在位时，国力进一步提升。威塞克斯因此成为北欧入侵不列颠群岛的主要反抗者。

埃塞尔沃夫的儿子埃塞尔巴德（Aethelbald）继承了王位，在位两年后去世。王位传给他的兄弟埃塞尔伯特，其在位时间是860—865年；接着王位由另一个兄弟埃塞尔雷德一世继承。这时，北

欧人的袭击已经变成了入侵，大批军队开赴战场。埃塞尔雷德一世的抵抗偶尔能够成功，但之后又屡屡失败。

阿尔弗雷德大帝

871年，埃塞尔雷德一世死后，他的弟弟阿尔弗雷德登上王位。当时的情况非常糟糕，英格兰的大部分地区都在北欧人的控制之下。东盎格利亚、麦西亚和诺森布里亚都沦陷了，威塞克斯面临的形势也非常严峻。阿尔弗雷德采取了游击战的策略，他在878年的埃丁顿之战中重创了北欧人。这次胜利后，双方就边境问题进行了谈判。此后，阿尔弗雷德大力加强王国的防御，否则协议也不可能一直有效。

陆军方面，阿尔弗雷德实施了新的服兵役规定。这提高了军队的战斗力和机动水平，使他们能迅速赶赴作战地点。为了应对北欧人袭击，他建立了一个名为“自治市”的坚固的城镇防御系统。虽然这些城镇无法抵挡一支主力军队的进攻，但它们可以拖住一支大型突袭部队前进的脚步。这样北欧人就失去了容易得手的目标，而阿尔弗雷德的军队则有了坚固的基地。



至少在一段时间内，阿尔弗雷德大帝击败丹麦首领古特鲁姆，阻止了北欧人向西方的扩张。可以说，阿尔弗雷德避免了北欧人完全征服英格兰。

盎格鲁-撒克逊战士

盎格鲁-撒克逊战士以典型的日耳曼步兵风格作战。一个贵族或国王会有几名私兵，他们是专业的战士，会装备最好的盔甲和武器。其余的作战人员根据需要增添，即使这些人不是职业战

士，他们也可能已经在（早先经历的）战斗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

长矛和斧头是首选的武器，此外还有标枪。一把剑或一把撒克斯（seax）——本质上是一把非常大的刀，或者一把小一点的匕首，则是次要选择。大多数战士只有一个盾牌来保护自己，富有的人会使用锁子甲和头盔，前提是他们能负担得起。

他们用最基本的战术。首领以身作则，士兵则要通过无畏的壮举来表现他们的勇气。双方先以标枪和箭投射对方，然后发起冲锋，最后以激烈的混战决定胜负。在这种情况下，无论哪一方先动手，伤亡人数都要比一场没有结果的小冲突高得多。



大多数情况下，盎格鲁-撒克逊战士的装备都很简单，长矛仍然是主要的武器。

另外，阿尔弗雷德还建立了一支舰队，这减轻了北欧人在海岸登陆或通过河流潜入内陆的威胁。北欧船只的优势是在开阔水域长时间航行，而这支舰队船只的优势是良好的适航作战能力。事实证明，这支舰队在战场上颇具成效，北欧人不能再随心所欲地袭击阿

尔弗雷德的军队了。于是，阿尔弗雷德可以集中精力对付主要威胁，而不是徒劳地追击已经准备返回船上的袭击者。阿尔弗雷德大帝不仅捍卫了英格兰人的王国，而且在北欧异教徒面前捍卫了基督教信仰。他首次团结了与英格兰国王政见不合的国王，一起面对共同的敌人，这是英国国家统一的开端。阿尔弗雷德也是一位立法者，他明白，维持有效的统治需要相应的智慧和制度。历史学家夸大了他的传奇，但他的虔诚、智慧和组织能力让世人钦佩。后世许多人以他为楷模。

阿尔弗雷德大帝不仅捍卫了英格兰人的王国，而且在北欧异教徒面前捍卫了基督教信仰。

东盎格利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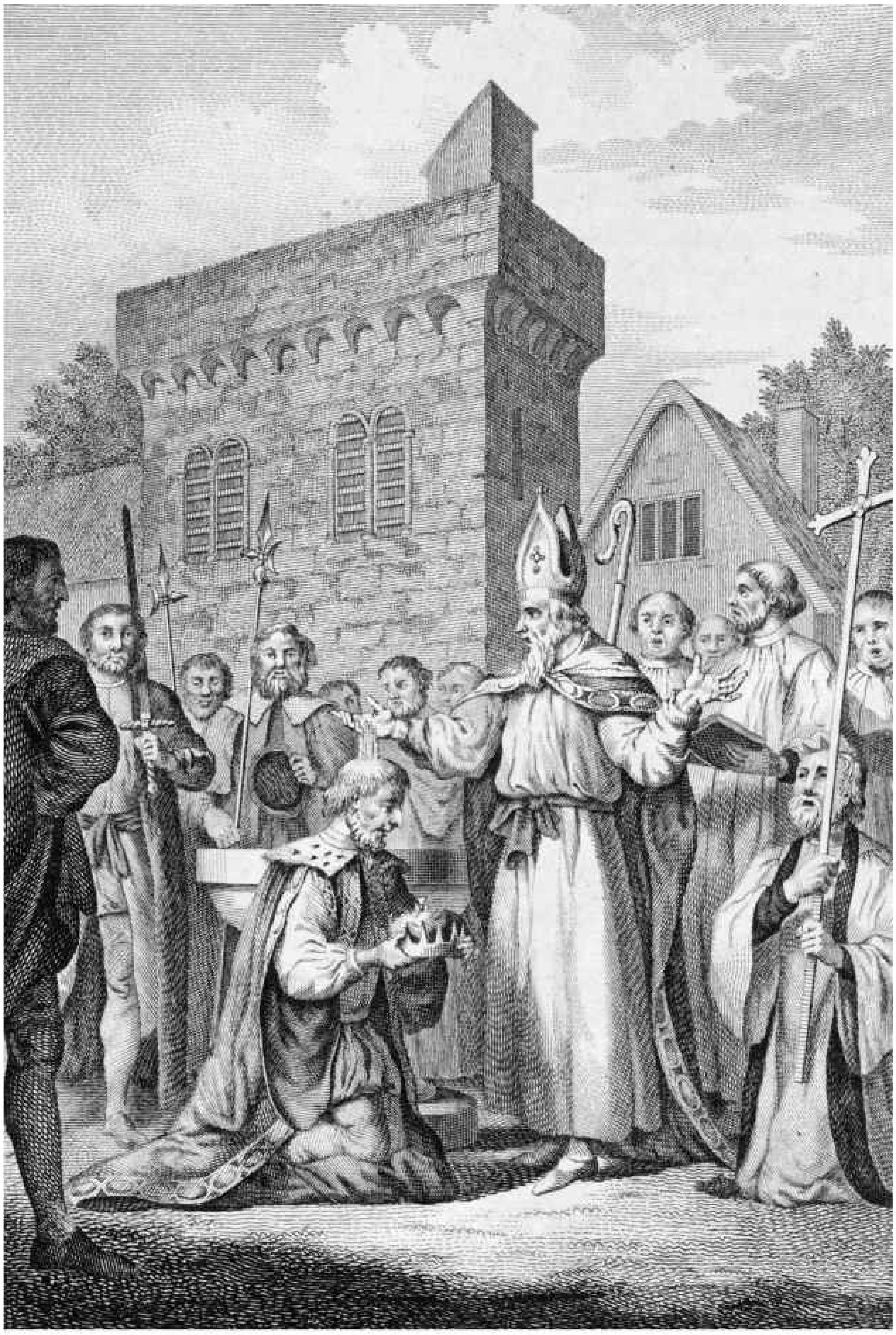
东盎格利亚王国出现在571年左右。此前一个世纪，盎格鲁人逐渐控制了该地区，此外还有大量的撒克逊人在罗马时代晚期定居于此。这里南方和北方的人联合建立了一个强大的王国，王国有过荣耀，也曾不可避免地衰退。盎格鲁人很富裕，国王和贵族的墓葬中有非常贵重的随葬品。通过萨福克郡的萨顿胡（Sutton Hoo）墓葬的随葬品，考古学家可以了解盎格鲁人和他们的日耳曼同胞的生活方式以及复杂的金属加工技术。

本土王国与来自欧洲大陆的新居民之间的事务，远比单纯的本土英格兰人与盎格鲁-撒克逊人之间的分歧要复杂。东盎格利亚是那个时代政治游戏的参与者，它主导的联盟超越了文化之间的差异，不会受其困扰。成为诺森布里亚国王之前，埃德温曾流亡东盎格利亚并得到庇护。诺森布里亚的埃塞尔弗瑞斯试图贿赂和强迫盎

格鲁人，让他们杀死埃德温。东盎格利亚人却站在埃德温一边，帮助他击败了埃塞尔弗瑞斯，夺取了诺森布里亚的王位。



这顶头盔是7世纪的东盎格利亚萨顿胡宝藏的一部分。宝藏的主人声名显赫，可能是位国王。丰厚的随葬品意味着这里曾经有一个强大而繁荣的王国。



埃德温的妻子是来自肯特郡的爱瑟堡公主，她是一位基督徒。在她的影响下，埃德温改信了基督教，传教士波莱纳斯为他举行了洗礼。这使诺森布里亚正式成为一个基督教王国。

埃德温非常感激东盎格利亚人，也对他们做出了回报。但这也带来了新的问题。东盎格利亚国王奥普瓦尔德（Eorpwald）皈依了

基督教，但是并非他所有的臣民都乐于接受这件事。他被兄弟里克特伯特（Richtbert）杀死。里克特伯特使王国改回了原来的信仰，直到奥普瓦尔德的另一个兄弟西格伯特（Sigeberht）继承王位，东盎格利亚人才再次回归基督教——至少在官方层面如此，而地方宗教习俗的改变比国王接受洗礼要慢得多。



埃塞尔斯坦国王统治时期发行的硬币，以此宣告他是全英格兰的国王。王国律法严明，并且对造币厂实行严密控制，此举意在加强经济实力。

645年，另一位被驱逐的国王在东盎格利亚得到了庇护。他是威塞克斯的森沃尔赫，被麦西亚的国王彭达赶下了王位。史料记载，森沃尔赫在东盎格利亚接受了基督教洗礼。可能东盎格利亚人热衷于帮助基督教同胞对抗麦西亚异教徒，但是毫无疑问，这一安排很大程度上出于私利——麦西亚的扩张对其邻国东盎格利亚的威胁日益加重。

东盎格利亚屡次败于麦西亚国王彭达之手。654年，他们成为彭达攻打诺森布里亚的盟友，虽然并不情愿。654年或655年，东盎格利亚和麦西亚联军被诺森布里亚国王奥斯威打败，东盎格利亚势

力进一步衰落。7世纪末，东盎格利亚成为麦西亚的属地，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820年。

821年，在国王埃塞尔斯坦的领导下，东盎格利亚开始尝试摆脱麦西亚的统治。但直到825年威塞克斯重创麦西亚，他们才取得成功。827年，虽然与威塞克斯结成了紧密的结盟并臣服于它，东盎格利亚再次成为一个独立的国家。此时，北欧人的袭击已经成为一个日益严重的问题。866年形势发生了根本变化。北欧人的军队不再是从前的突袭者，他们变成了征服者。东盎格利亚是最先沦陷的。随后北欧军队向北进入诺森布里亚。从这时起，东盎格利亚成为一个丹麦王国。

866年形势发生了根本变化。北欧人的军队不再是从前的突袭者，他们变成了征服者。东盎格利亚是最先沦陷的。

中盎格鲁人

大批人群迁移到了泰晤士河和特伦特河（the Trent）之间的地区，其中很多是盎格鲁人，他们被称为“中盎格鲁人”（the Middle Engli，Middle Angles）。

该地区是麦西亚王国的一部分，但中盎格鲁人保留了自己的文化传统。因此，他们是少数在黑暗时代的历史舞台上扮演了重要角色，但未被作为国家提及的群体之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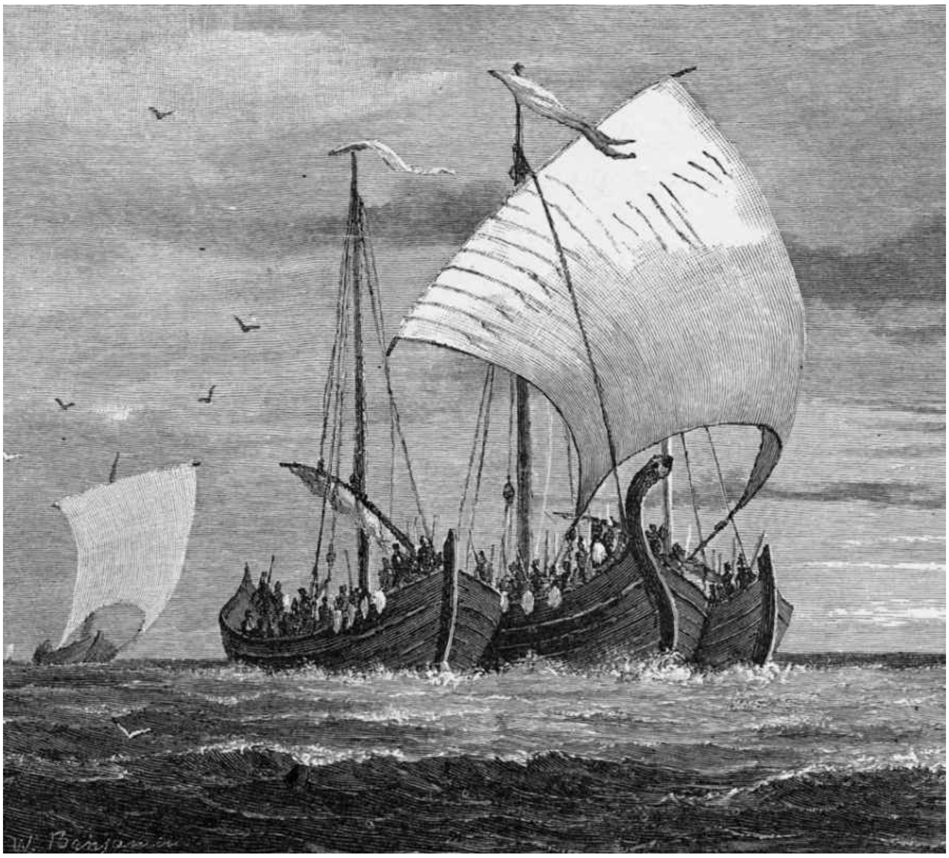
肯特、埃塞克斯和萨塞克斯

455年左右，日耳曼部落的朱特人占领了肯特（Cantware，或称肯特瓦尔）。虽然此前已经有了一些日耳曼定居者，但日耳曼人接管肯特始于盎格鲁人的首领亨季斯特和霍萨。肯特国王沃蒂根雇佣他们对抗皮克特人，亨季斯特和霍萨一开始似乎也是这么做的。但后来他们觉得，不列颠人更适合作为打劫的对象，而不是金主。

后来，霍萨被杀，亨季斯特在457年把不列颠原住民赶出了肯特。然后，一批寻找新家园的朱特人来到了肯特，一些撒克逊人和其他的日耳曼人也定居于此，这里成了最早的盎格鲁-撒克逊王国。王国进一步扩张领土，但遭到了安布罗修斯·奥雷连纳斯（Ambrosius Aurelianus）军队的抵抗。

传统观点认为，肯特王国建立于488年。王国似乎遭受了一场大范围掠夺，然后出现了一段巩固实力和人口增长的时期，不过这一时期的记录很少。他们很可能卷入了邻国的事务，尤其是埃塞克斯。和东盎格利亚一样，早在罗马时代，后来成为埃塞克斯王国的地方就有撒克逊人定居。这些人有的是同盟者，有的则从欧洲大陆迁移而来，与当地居民混居或占据新的地区。通常认为埃塞克斯王国成立于527年，但这个日期仍有争议。而王国建立之前，这一地区在肯特王国的支持下，可能已经部分统一了。

埃塞克斯（即东塞克斯）王国北部以自然地形为界，王国可能通过扶持当地代理人的方式控制了米德尔塞克斯（Midil Seaxe）地区。埃塞克斯和肯特关系非常紧密。事实上，如果不是中间隔着泰晤士河，它们可能会成为一个统一的王国。



英格兰海岸附近的人在见到北欧人的维京长船后，心生恐惧。一艘或两艘船可能是贸易远航，但一支舰队则意味着一次袭击甚至入侵。

8世纪早期，埃塞克斯成为麦西亚人的属地。后来麦西亚日渐衰微。825年后，埃塞克斯附属于威塞克斯国王爱格伯特。肯特王国曾经也附属于麦西亚的奥法王。他们在770年左右反抗麦西亚的统治，可能获得了短暂的独立，但在785年重新被征服。825年后，肯特和埃塞克斯都由威塞克斯统治。英格兰东部受到越来越频繁的北欧人突袭的困扰，而且突袭逐渐升级为入侵。尽管当地居民和威塞克斯领导的英格兰王国都进行了抵抗，但事实是，他们没有能力将侵略者驱逐出去。后来双方签订了和平协议，允许北欧人在东盎格利亚定居。但是，另一支入侵的北欧军队打破了这项协议，埃塞克斯成为北欧人控制地区的一部分，被称为丹麦区；而肯特则成了英格兰王国的一部分。

后来双方签订了和平协议，允许北欧人在东盎格利亚定居。但是另一支入侵的北欧军队打破了这项协议。

萨塞克斯（即南塞克斯）王国的命运与之类似。根据《盎格鲁-撒克逊编年史》，萨塞克斯王国是赶走或征服了当地居民的日耳曼入侵者在477年建立的。移民不断涌入，王国的撒克逊人口大量增加。关于它的历史记载很少，也许半传奇性质的巴顿山之战或类似的战斗确实发生过。大约在500年，撒克逊人的扩张基本停止了，这种突然的由盛转衰可能缘于一次重大的失败。

607年，威塞克斯对萨塞克斯发动战争，迫使萨塞克斯与麦西亚结盟。萨塞克斯在战争中幸存，而且随着威塞克斯的势力逐渐衰落，它的国力又有所恢复。然而好景不长，威塞克斯也复兴了，最终征服了萨塞克斯。7世纪初，萨塞克斯重新获得了独立，但后来再次衰落。772年，它被麦西亚的奥法王征服。奥法死后，796年左右，萨塞克斯最后一次独立，然后在825年再次成为威塞克斯的属地。此后，它成为威塞克斯统治的英格兰王国的一部分。

七王国

盎格鲁-撒克逊时期，不列颠岛上的东盎格利亚、埃塞克斯、肯特、麦西亚、诺森布里亚、萨塞克斯和威塞克斯，通常被称为“七王国”。它们的关系错综复杂，一些王国有时会被其他王国征服。这些国家最终都并入新兴的英格兰王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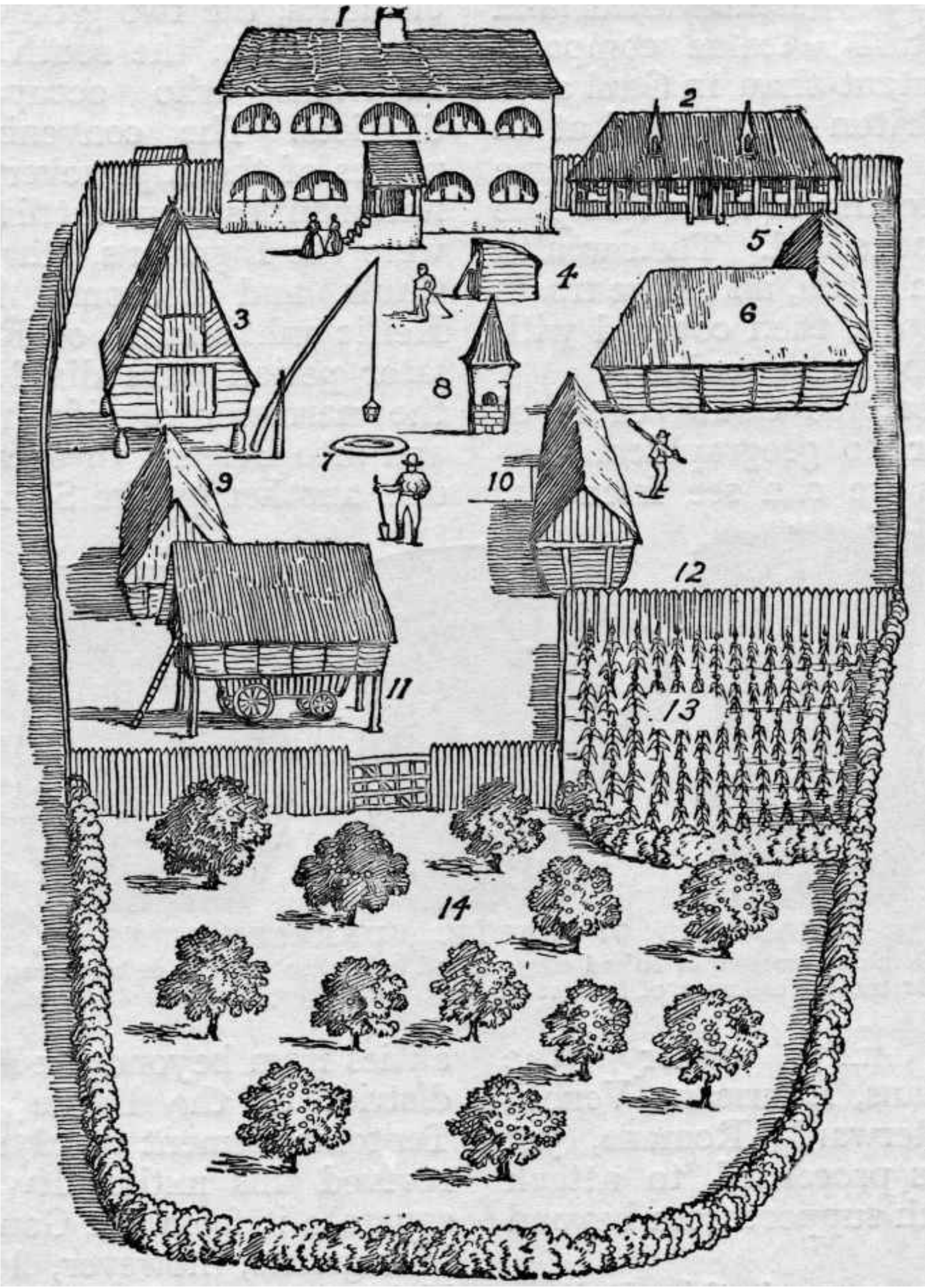
不列颠群岛的凯尔特王国

与关于七王国不甚详细的史料相比，人们对不列颠群岛的凯尔特王国所知更少。关于凯尔特王国的记载大部分出自到访爱尔兰、苏格兰和不列颠西部的宗教人士。他们下笔时就对事件不甚了解，而且还带着严重的偏见。

不列颠的凯尔特人被盎格鲁-撒克逊人驱赶到西部的威尔士以及今日的德文郡和康沃尔郡地区。在那里，他们和已经定居当地的凯尔特人相互融合。生活在今德文郡和康沃尔郡的主要是杜姆诺尼人（Dumnonii）的后裔。对罗马人的入侵，他们没怎么抵抗，而是平静地融入了罗马帝国。这意味着罗马对他们的统治很宽松，比起那些被征服的部落，他们保留了更多的凯尔特人特色。

因此在英格兰，相比其他地方的人，今德文郡和康沃尔郡的人受到罗马人登陆和离开的影响更少。杜姆诺尼亚王国在罗马时代就已出现，王国控制了今德文郡、康沃尔郡和萨默塞特郡（Somerset）的一部分。它不怎么参与英格兰其他地方的事务，但与威塞克斯发生过几次冲突。814年，威塞克斯的爱格伯特征服了杜姆诺尼亚王国的大部分地区。825年和838年，王国两次试图重新独立。他们与驻扎在爱尔兰的北欧人结盟，但还是在838年的辛斯顿之战中再次失败了。

诺曼人进入不列颠很久以后，威尔士的布立吞人（the Brythonic people）才从英格兰独立出来。罗马人放弃不列颠之后的几年里，威尔士人与其他地区一样，恢复了更接近于部落时期的生活方式。起初，他们的领地都很小，冲突很普遍。随着时间的推移，胜利者扩大了自己的地盘。



不列颠群岛上凯尔特人的聚落大都是这样规划的：1. 公共住宅；2. 夏季住宅；3. 粮仓；4. 公共鹅棚；5. 奶牛和山羊圈；6. 李子白兰地制作棚；7. 水井；8. 公共炉；9. 马厩；10. 猪圈；11. 玉米阁楼；12. 木栅；13. 玉米地；14. 果园。

6世纪早期，北威尔士众小片领地联合成立圭内斯王国（Gwynedd）。625年，国王卡德沃隆成功阻止了诺森布里亚的扩

张。在此之前，诺森布里亚人一直向西推进，把凯尔特居民赶出了英格兰北部。

圭内斯王国的军队与邻近的威尔士波伊斯（Powys）王国结成同盟，但613年，他们在切斯特被击败，而且最初卡德沃隆的情况也没好多少。事实上，他被赶到安格尔西岛（Anglesey），最后穿过了爱尔兰海。有些人认为他设法组建了一支新的军队，并通过杜姆诺尼亚返回不列颠，帮助他击败了麦西亚的彭达。

633年，卡德沃隆与麦西亚人结盟，进攻诺森布里亚。于是哈特菲尔德追逐战爆发了，诺森布里亚国王埃德温被杀死，随后诺森布里亚分裂成德伊勒和伯尼西亚。后来，卡德沃隆在天域之战中被诺森布里亚（主要是德伊勒）军队击败并杀死。随着诺森布里亚对威尔士的威胁减弱（至少在当时是这样），布立吞人的注意力逐渐转向自身。他们经常与麦西亚起冲突，内部冲突也很频繁。虽然有些统治者几近成功，但威尔士从未统一过。871年，圭内斯国王罗得里（Rhodri）成功地控制了波伊斯和塞西尔威格（Seisyllwg），他被称为“不列颠之王”，但实际上仅仅是“威尔士之王”。而且他并没有统治整个威尔士。



一般认为，633年或634年的天域之战发生于赫克瑟姆以北，靠近哈德良长城。今天，在人们推测出的奥斯瓦尔德击败威尔士和麦西亚联军的地方，竖立着一块标记物。

9世纪，北欧人的袭击变得越来越频繁。这主要是因为他们在爱尔兰和马恩岛（the Isle of Man）建立了基地。尽管当时形势

严峻，1057年左右，格鲁菲德·阿·卢埃林还是在威尔士建立了一个统一的王国。但是，他统治的时间很短。1063年，他被哈罗德·戈文森率领的英格兰军队打败，不久就被处死了。



在安格斯的阿伯莱姆诺发现的一块有图像的石板，其年代可追溯到8世纪。人们对皮克特人知之甚少，因为他们没有留下任何文字记录。他们只留下一些神秘的雕刻作品，比如这一幅，可能记录了战争或其他重大事件。

皮克特人

直到今天，苏格兰的皮克特人仍然非常神秘。罗马史学家对他们知之甚少，记载中还有一些没有根据的假设或者添油加醋的描述。皮克特人很可能是苏格兰原住民的后裔，他们与后来到达的凯

尔特人混居在一起。他们的社会状况似乎与罗马入侵时的不列颠相似。由于成功地抵抗了外族入侵和征服，皮克特人几乎没怎么受到罗马的影响。

比起罗马帝国，诺森布里亚王国对皮克特人的入侵程度更深。600年，皮克特人已经皈依基督教，相比于罗马时代，他们的文化也发生了很大的转变。来自爱尔兰的苏格兰人占领了英格兰西海岸，而皮克特人与诺森布里亚人也时常爆发冲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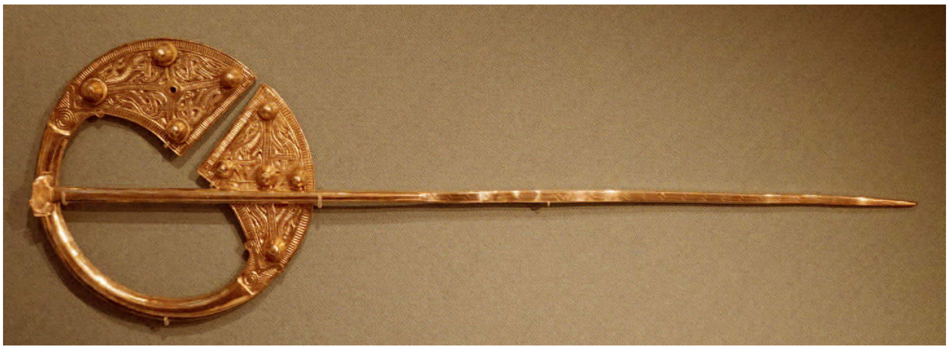
670年，皮克特人在两河之战中战败，之后他们生活在布鲁德·麦克·比尔的掌控之下。比尔是诺森布里亚国王的堂兄，诺森布里亚国王可能接受过他的朝贡并助他掌权，也可能并未干预。不管是否接受过帮助，布鲁德·麦克·比尔袭击了诺森布里亚，并且通过征服远至奥克尼群岛（the Orkney Isles）的皮克特人的土地，来壮大自己的力量。

在与皮克特人的战争中，诺森布里亚似乎过度自信了。685年，他们在敦奈克顿（Dun Nechtain）遭遇惨败。据尊者比德的说法，面对诺森布里亚的进攻，皮克特人佯装撤退，把敌人引到地形险要之处再进行反击。这场胜利，使得诺森布里亚直到7世纪末都无法再对皮克特人造成威胁。

698年，皮克特人击退了诺森布里亚的另一次入侵，这带来了20年的和平。但和平最终被内部冲突打破，冲突的焦点是他们该遵循凯尔特基督教的习俗还是罗马基督教的宗教习俗。这引发了十年内战，内战后来因为两派面临共同的敌人而停止。736年，皮克特人入侵苏格兰的达尔里阿达（Dalriada）王国，占领了他们的首都杜纳德（Dunadd）。接下来的几十年里，鲜有关于皮克特王国的记载。780年之后，皮克特人和苏格兰人首次统一在一个王权之下。

到了8世纪，占领英格兰的北欧人对苏格兰的袭击和入侵日益严重，苏格兰人奋起抵抗。这种压力使皮克特人和苏格兰人的文化日益融合。900年以后的编年史没有再提到皮克特人。这个时候，出现了统一的王国阿尔巴（Alba），它开始使用苏格兰的旗帜圣安德鲁十字旗。但这个王国存在的时间很短，1094年，国王邓肯二世已被称为苏格兰国王。

到了8世纪，占领英格兰的北欧人对苏格兰的袭击和入侵日益严重，苏格兰人奋起抵抗。



凯尔特人以复杂的功能性和装饰性金属制品而闻名。这枚环状胸针可追溯到8世纪。

爱尔兰和苏格兰

早期爱尔兰居民中不断有新移民加入，他们大多是凯尔特人，其社会形态以部落为主。地位较低的领主统治小片土地，效忠更高层次的领主。这种效忠关系是非常散漫的，再往上还要效忠中心地区的国王。这个时候冲突很普遍，中心地区的命运飘摇不定。爱尔兰五大省之一的米思（Meath）有权力中心的性质，是至尊王的所在地。至少在名义上，至尊王统治着爱尔兰其他所有的王国。

明斯特（Munster）地处爱尔兰西南，由三个小王国组成。它的东部是爱尔兰最大的省份莱因斯特（Leinster），北部是康诺特（Connaught）。阿尔斯特省（Ulster）位于爱尔兰东北部，它通过一条海上通道，与苏格兰保持联系。由于明显的地理原因，爱尔兰整体上——莱因斯特尤甚——卷入了不列颠凯尔特人的事务中，他们有时会与威尔士王国交战，而且经常庇护被迫出逃的威尔士高层人员。

根据传统观点，这就是后来爱尔兰人建立苏格兰王国的原因。爱尔兰东北部达尔里亚塔（Dál Riata）部落的费格斯·莫尔·麦克·埃尔克（Fergus Mór mac Erik）带领他的追随者穿过狭窄的海域来到苏格兰，建立了一个名为达尔里亚塔（DalRiata）的王国。然而，几乎没有考古学证据能支持这一点。爱尔兰的盖尔人（Gael）似乎进入了苏格兰、英格兰北部和威尔士。很长一段时间内，一部分盖尔人定居当地或与当地人相融合。这使得当地的文化带有一种与其他地方的皮克特社会不同的地域色彩。



费格斯·莫尔·麦克·埃尔克是一个传奇人物，信史几乎没有提到他。我们当然知道爱尔兰人迁移到了苏格兰西部，但是否在费格斯领导之下还有待讨论。

苏格兰之事

与英格兰和法兰克一样，苏格兰也有大量的古典文献。这些文献记录了它的古代历史和传奇国王的世系。其中一部作品被称为《苏格兰之事》，它讲述了一个不太真实的充满神奇的故事。

根据这个故事，斯科塔（Scota）是一位埃及法老的女儿，她嫁给了来自巴比伦的费尼厄斯·法赛德（Fénius Farsaid）。他们的儿子创立了盖尔族，并创造了盖尔语。其他版本的故事中，这对夫妇离开埃及前往西班牙，他们的儿子米利（Mil）在那里出生。米利带领他的追随者进入爱尔兰，推翻了神奇的丹南塔（Tuatha Dé Danann）。

后来，爱尔兰人开始用斯科塔来给自己取名，移居到苏格兰的爱尔兰人也是如此。因此，苏格兰人声称他们与生俱来的尊贵权利源自古埃及的法老。

这个故事可能很精彩，但它并不比特洛伊人（也可能是罗马人）布鲁图斯建立了英国，或者大名鼎鼎的特洛伊人起源于日耳曼部落更靠谱。

这些爱尔兰移民被称为“苏格兰”（当时作Scoti或Scotti），这个词最初用于所有盖尔人，而不是居住在不列颠的盖尔人。他们的王国莱格德（Rheged）占据英格兰西北部和苏格兰南部，在730年被诺森布里亚占领。达尔里亚塔则延续到9世纪，最终成为阿尔巴王国以及苏格兰王国的一部分。

阿尔弗雷德之后的英格兰

按照惯例，英格兰王国将从符合条件的候选人中选出国王，而不是像欧洲大陆一样采用长子继承法。因此，在埃塞尔雷德一世死后，王国没有任命一个摄政王来辅佐埃塞尔雷德一世年幼的儿子，而是将先王的弟弟阿尔弗雷德选为国王。

这对王国大有好处。阿尔弗雷德不仅成功击退了北欧人，还建立了政府官员学习培训制度，实施了一系列法律，并开始编撰王国

正史。这就是后来的《盎格鲁-撒克逊编年史》。阿尔弗雷德十分明智，他让掌管文教的部门抄录编年史并将副本分发至各地，于是《盎格鲁-撒克逊编年史》得以流传至今。



阿尔弗雷德大帝以英勇的姿态对抗来自海外的异教入侵者。直到16世纪，人们才给他的名字加上“大帝”的称号。

阿尔弗雷德于899年去世，他生前并未被称为“大帝”。他的儿子“长者”爱德华继承了王位，这并非毫无争议。阿尔弗雷德之前的国王埃塞尔雷德一世的儿子埃塞尔瓦尔德，已经错失王位一次，现在他觉得自己应该成为国王。爱德华当选国王并没有违背规则，他是由最有权势的贵族组成的议会——贤人议会选举出来的。但这并没有打消埃塞尔瓦尔德寻求帮助以武力夺取王位的念头。

905年，埃塞尔瓦尔德在一支来自诺森布里亚的北欧军队的支持下，入侵爱德华的王国，而后战败被杀。埃塞尔瓦尔德死后，双方罢兵和谈，但不久又有新的冲突。爱德华采取了巩固胜利的政策，以阿尔弗雷德大帝所开创的方式来加固城镇，并打击北欧诸国，逐渐扩张王国疆域。920年，他接受了北方英格兰国王的臣服。

924年，“长者”爱德华的儿子艾尔弗沃德继承王位，他的哥哥埃塞尔斯坦被任命为麦西亚的统治者。在一个大的王国里任用次级国王来管理领地，这是一种几百年前就存在的做法。但这样做，也可能因为埃塞尔斯坦不愿意臣服于他的弟弟。艾尔弗沃德在父亲死后两周就被杀了，我们不清楚埃塞尔斯坦是否涉及其中，但似乎有这种可能。埃塞尔斯坦后来成为全英格兰的国王。



“长者”爱德华理所当然地被选为阿尔弗雷德的继承人，但却面临来自埃塞尔瓦尔德的军事威胁。他明智地用父亲开创的方法巩固了自己的胜利，并且增强了王国的实力。

埃塞尔斯坦杀死了他的另一个兄弟埃德温，把他丢在船上任其漂流，没有留下食物和水。这样一来，面对其他可能有异议的人，埃塞尔斯坦就保住了他的王位（埃塞尔斯坦确信埃德温在密谋反对

他，但事实是否如此仍有争议）。他试图与北欧人和解，因此把妹妹伊迪丝（Edith）嫁给了约克的北欧国王西塞里克（Sithric）。



布鲁南布尔之战发生于何处，以及盎格鲁-撒克逊人是否动用了一支骑兵，都有很大争议。可以确定的是，这场战役在英国历史上极为关键，因为战后出现了一个统一的王国。

西塞里克的死为埃塞尔斯坦吞并诺森布里亚提供了借口，他占领了今康沃尔郡地区，扩大了自己的领土。937年，北欧人和苏格兰人共同入侵埃塞尔斯坦的王国。当年发生的布鲁南布尔之战是决定性的战役。关于此战的细节很少，《盎格鲁-撒克逊编年史》记载，五位国王和七位伯爵死于这场战役。埃塞尔斯坦取得了这场战役的胜利，这使得他的地位稳如磐石。而且，此战标志着他的王国从一个个单独的领地联合体变成了统一的王国。

埃塞尔斯坦为他的姐妹们安排了美满的婚姻，确保自己与法兰克国王和当时的其他政要结成联盟。940年，埃塞尔斯坦去世，此时他已经让英格兰的盎格鲁-撒克逊王国牢牢地屹立在欧洲政治版

图上。不管是生前还是死后，世人眼中的埃塞尔斯坦都是一个贤明的国王。他做了很多事情来保障穷人的生活，以维护王国的稳定。

不管是生前还是死后，世人眼中的埃塞尔斯坦都是一个贤明的国王。他做了很多事情来保障穷人的生活，以维护王国的稳定。

埃塞尔斯坦死后，他的弟弟埃德蒙一世继承了王位。埃德蒙与约克的北欧统治者奥拉夫·古斯弗莱松达成了一项协议，协议规定若他们中的一个人去世，他的国家将由另一个人统治。944年奥拉夫去世，埃德蒙一世的王国扩大到诺森布里亚。不久之后，他在斯特拉斯克莱德（Strathclyde）与奥拉夫从前的盟友开战。

王朝的谋杀

许多历史人物都因除掉潜在的对手而蒙上污名。但在那个时代，这其实是一种非常重要的策略。一个被废黜或被剥夺了财产的贵族可能会奋起反抗，一个人也可能因为支持一个根本不想争夺王位的人而变得权势显赫。对于中世纪早期野心勃勃的王子来说，暗杀自己的对手或那些阻碍其野心的人，都是很正常的事。

同样，通过暗杀敌对的统治者来创造政治或军事优势，也是一种有效且为大众接受的策略。事实上，面对一场破坏性的战争或内部权力斗争时，暗杀可能预先阻止或至少限制冲突，这对那些原本可能要遭受苦难的人是有利的。现代人也许不能接受一个靠冷血谋杀上位的统治者，但是，当时的统治者如果因为个人感情而不愿意实施对本国有力的谋杀，那他就不适合登上王位。无论如何，那些不愿意谋杀他人的人，最后很可能被他人谋杀。运用任何必要的手段解决对手，有时只不过是一种生存方式。

埃德蒙一世还积极参与欧洲大陆的政治活动，比如协助路易四世夺取法兰克王位。后来，他与一个叫里奥法（Liofa）的人酒后斗殴，被其杀死，英年早逝。里奥法在几年前被埃德蒙放逐，埃德蒙在奥古斯丁节那天看到里奥法后被激怒了，他袭击了里奥法，然后被对方捅死。

10世纪欧洲君主的特点，在上面这些事件中都有所体现。埃德蒙有时被称为“伟大的国王”，他在位时期极大地扩展了权力，镇压叛乱，而且能决定其他王国的命运。但当火气上头时，他会克制不住地在宴会上攻击别人。

946年埃德蒙去世时，盎格鲁-撒克逊王国已经建立。王国当时的主要威胁是日益强大的北欧诸国。当时政治形式复杂，北欧的一位王子“血斧王”埃里克登上了诺森布里亚的王位。后来他被人推翻。不久又重新执政，然后第二次被推翻。埃里克在一次伏击中被杀，这次伏击可能是英格兰国王埃德蒙的继任者埃德瑞德（Edred）精心策划的。



埃德蒙国王在位时经历了许多危险，比如战争和可能的暗杀，他都幸运地活了下来。可他最终还是径直走向死亡，这场事故是他一手造成的，而这件事本可以轻松避免。

978年，“仓促王”埃塞尔雷德二世登上英格兰王位。此时北欧诸国开始进一步征讨他国。埃塞尔雷德二世的绰号与“仓促”并无多大关系，这是盎格鲁-撒克逊语中“不明智的”一词的变体。无论如何，英格兰仍然无法抵挡北欧人的进攻。为了让王国免于遭受蹂躏或被征服，埃塞尔雷德二世开始向他们赔付丹麦金[(2)]，这笔钱的本质是国与国之间的保护费。



一份1220年左右的手稿中的“仓促王”埃塞尔雷德二世，他支付丹麦金的策略受到了世人的批评。但对他的国民来说，另一种选择要糟糕得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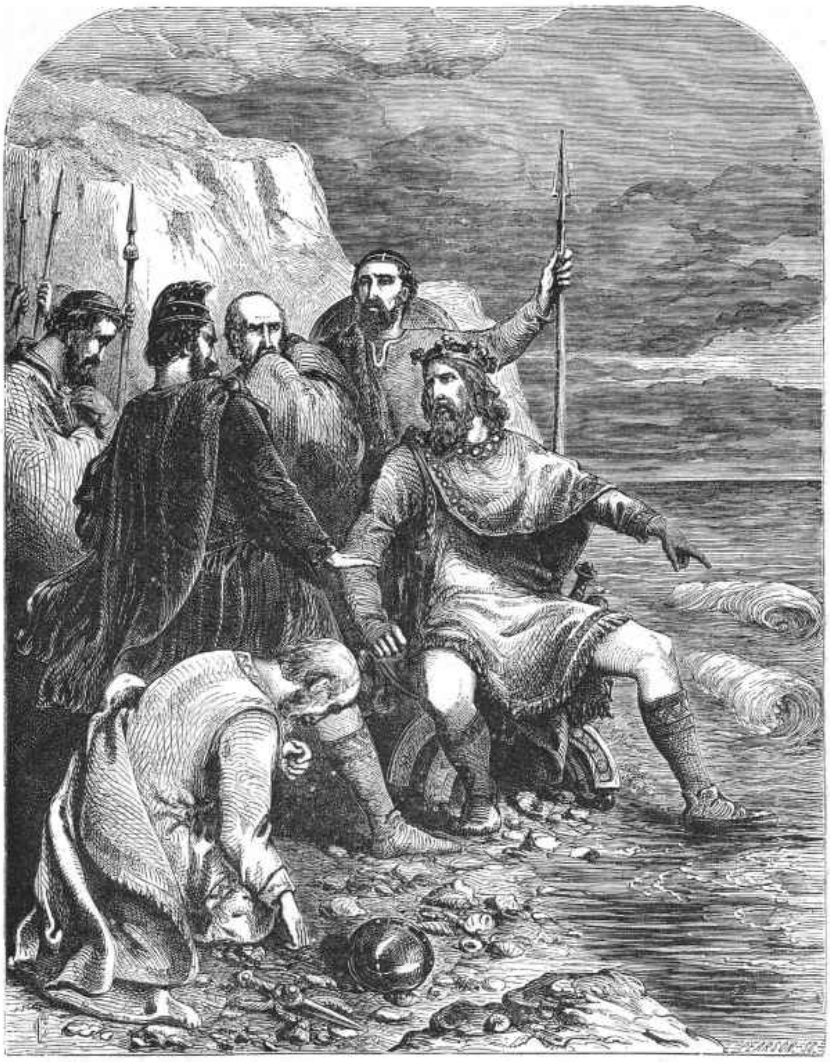
1013年，丹麦国王斯汶一世推翻了埃塞尔雷德二世，斯汶一世统治英格兰两年后去世。随后，埃塞尔雷德二世成功夺回了王位。他死于1016年，他的儿子“铁甲王”埃德蒙继承了王位，但埃德蒙在位时间短暂。更多的人支持斯汶一世的儿子克努特（或称卡纽特），所以这两位王子之间的战争，可以看作一次入侵，也可以看作一场内战或是君主镇压了一场叛乱。一切取决于按哪种视角。“铁甲王”埃德蒙取得了一些胜利，但最终还是被克努特打败了。他们签订了和平协议，威塞克斯王国划归埃德蒙。埃德蒙死后，克努特成了无可争议的英格兰国王。

在世人眼中，克努特是一个自负到认为可以控制潮汐涨落的傻瓜，但真实情况与这个流传甚广的故事大相径庭。克努特认为臣下过分地奉承自己，于是想通过命令潮汐退潮来表明，他知道自己的力量是多么微不足道。当然，潮汐没有按照命令退去，克努特此举是想告诉人们他并不是全能的。但这一行为却让他被当成一个傲慢的小丑，成为民间传说。克努特统治期间，北欧人对英国的威胁大大降低，一部分原因是他手握大权，另一部分原因是他控制了许多原本可能发动入侵或袭击的人。克努特同时还是丹麦国王，因此1018年后，他的王国陷入斯堪的纳维亚半岛的复杂事务中。他于1035年去世，王位原本要传给他的儿子哈德克努特。但是哈德克努特的弟弟“飞毛腿”哈罗德夺得王位，他最初在哈德克努特征战丹麦时被任命为摄政王。这似乎引起了兄弟不和。哈罗德死后，哈德克努特把他的尸体挖出来，扔进了沼泽里。

哈德克努特于1040年登上英格兰王位，两年后去世。当时王朝婚姻关系复杂，于是威塞克斯家族重返王位。诺曼底的爱玛是已故的埃塞尔雷德二世的妻子，她在克努特还是英格兰国王的时候嫁给了他。这使她的儿子阿尔弗雷德和爱德华成为克努特的继承人。

1037年他们访问英格兰时，阿尔弗雷德被囚禁并致盲，最终伤重不治，但爱德华活了下来。

1040年，爱德华被传唤到哈德克努特的宫廷。1042年哈德克努特去世后，爱德华继承了王位。他被称为“忏悔者”，因为他无比虔诚，可能有些太过虔诚了。尽管结了婚，但他没有子嗣，因此有消息称他立誓要保持独身。爱德华与他的岳父威塞克斯伯爵戈德温（Earl Godwin）发生了冲突。戈德温率先出兵，但是后来他发现自己无法获得足够的支持来击败爱德华，于是他接受流亡。戈德温伯爵手握强权，1052年，他率领一支军队重返英格兰，国王被迫接受他的回归。



Canute Reproving the Flattery of his Courtiers.

克努特认为侍臣对他的奉承太过无度，因此他通过潮汐服从自然规律而不是服从国王，来证明他的权力在自然规律面前是微不足道的。



“忏悔者”爱德华如果有儿子，他将是英格兰王位的重要候选人之一。然而，英格兰国王是选举出来的，而不是长子自动继承，所以英格兰时常发

生争夺王权之事。



1066年的黑斯廷斯之战终结了盎格鲁-撒克逊英格兰，也给所谓的“维京时代”画上了句号。这是外族最后一次成功入侵不列颠群岛。

戈德温伯爵有两个儿子，哈拉尔德和托斯蒂格。1066年，“忏悔者”爱德华去世，王位继承权出现了争议。戈德温的两个儿子都认为自己是王位候选人，威塞克斯伯爵哈拉尔德被选中。托斯蒂格当时是诺森布里亚伯爵，他对此提出异议。然而，还有第三位候选

人——诺曼底的威廉公爵，而且他也有武力夺权的打算。1066年，威廉公爵在黑斯廷斯之战中获胜，这次胜利开启了英格兰历史的新纪元。

---

(1) 霍诺里乌斯是一位西罗马帝国皇帝，395—423年在位。——译者注

(2) 从911年起，英国人为避免丹麦人的侵略而送给他们财物，因此简称为“丹麦金”。它后来演变为英国中世纪的土地税。——译者注

第4章
发展中的教会

尽管一直被镇压，但基督教还是成为罗马帝国的国教，进而成为欧洲最主要的宗教信仰。由于早期基督教的发展和传播主要是一些虔诚的教徒个人所为，并没有一个连贯系统的传教计划，因此基督教在具体习俗甚至核心信仰方面都不可避免地出现了分歧。人们一直在解决这些分歧，教会的历史很大程度上就是这样向前发展的。

虽然并不是每一位罗马皇帝都深有体悟，但罗马总体上明白宗教在治国方略中的重要性。到耶稣的时代，罗马已经认识到，干涉一个被征服民族的宗教，尤其是犹太人的宗教，是很容易激起反抗的。犹太人可以承受严厉的税收和普遍的压迫——虽不是不反抗，但这种反抗都不会发展成大规模的起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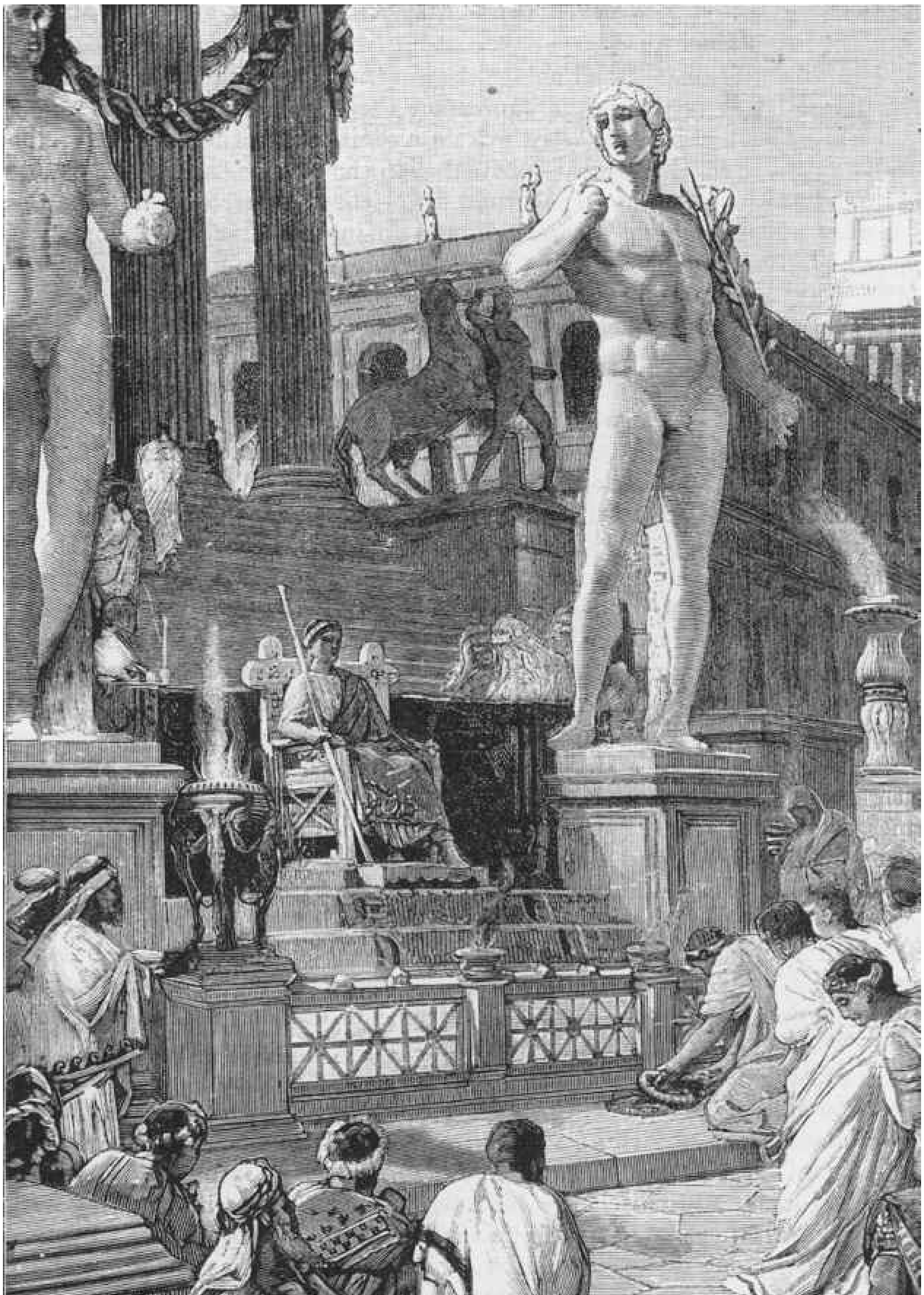
中世纪的作品，表现了公元66—73年第一次犹太人和罗马人之间战争（或称“大反抗”）的情景。图中，犹太领导人和历史学家约瑟夫斯被带到罗马将军维斯帕先（未来的皇帝）面前。

甚至以罗马习俗任命大祭司——任命一个支持者而不是一个由人民选出来的宗教首领，也不足以引发反叛。但当皇帝卡利古拉坚持把自己的雕像置于所有宗教场所时，犹太人发起了后世称为“大

反抗”的运动。卡利古拉宣称他是神，而对犹太人来说，把外邦神的雕像放在最神圣的地方，实在难以接受。

“大反抗”始于公元66年，最初罗马军队损失惨重，四年后，起义已基本被镇压。胜利的一方因为犹太起义者的强力反抗，而永远记住了这件事。在帝国内部传播宗教显然是不受欢迎的，它可能引发大规模的叛乱。外来宗教同样会挑战已经建立起来的帝国的信仰。

在罗马帝国，基督徒时常受到迫害。有时基督徒可以担任公职，但更多的时候，如果政府官员的亲属皈依基督教，这名官员就可能被解雇甚至处决。帝国发生过几次大的宗教迫害。一次在公元64年皇帝尼统治时期的罗马大火之后；一次在249—251年皇帝德基乌斯统治期间；最后一次大规模迫害是303年皇帝戴克里先下的命令。接下来，戴克里先的继任者君士坦丁开始在帝国推行宗教自由政策。



卡利古拉皇帝坐在卡斯特和波利克斯的雕像之间。他宣称自己是神，并要求人民崇拜他。他的臣 民中有一部分人可以接受这种行为，但犹太人不能。

第一次尼西亚会议

在基督教早期，各个教派之间不可避免地存在巨大的差异。325年尼西亚会议召开的时候，正式的主教制度已经设立。主教主持各地宗教事务，但教会习俗方面还没有达成一致。第一次尼西亚会议由皇帝君士坦丁召集，会议试图解决这些分歧，并在整个基督教世界制订统一的教义。

教会面临的最严重的问题之一是阿里乌争论。一位名叫阿里乌的神学家主张，与传统的三位一体——圣父、圣子、圣灵是一个整体的观点相反，创世之初只有上帝，上帝召唤出了他的儿子耶稣。这意味着耶稣与上帝不同，耶稣是一个单独的比上帝稍低层级的存在。这一概念的内涵是非常复杂的，传统三位一体论者无法接受阿里乌派的观点。

君士坦丁皈依

君士坦丁大帝是在“四帝共治”时期掌权的，当时罗马帝国由四个皇帝统治，他们各控制一个地区。君士坦丁被自己的军队拥立为皇帝，马克森提乌斯反对君士坦丁即位，并在罗马自立为帝。双方为帝位展开斗争，在台伯河（Tiber River）上的米尔维安（Milvan）大桥发起决战。决战的前一晚，君士坦丁做了个梦。梦境指示，如果他皈依基督教，胜利将属于他。

君士坦丁确实成功了，他成为暂时统一的罗马帝国的统治者。他将都城迁到君士坦丁堡，实行宽容的宗教政策，并且最终允许基督教作为帝国的官方宗教。在他的统治下，罗马的力量得到复兴，战胜了许多蛮族，这可能有助于罗马人接受新的官方宗教。



312年，君士坦丁大帝在米尔维安大桥上。和许多统治者一样，他重视宗教是因为它能在世俗事业中起到重要作用。



君士坦丁大帝召开尼西亚会议，希望在基督教内部建立统一的宗教习俗。尽管他的设想没有完全实现，但会议确立的习俗一直沿用至今。

尼西亚会议并没有解决阿里乌争论，但它确立了遵循三位一体论的《尼西亚信经》。这成为教会的官方标准。阿里乌派的信众被视为异端，阿里乌和他的支持者被流放，但阿里乌派的观点在许多地区仍然流行。后来基督教召开了多次会议，试图解决这个问题，但都没有什么结果。

阿里乌争论影响了欧洲新兴国家的政治。基督教信徒当时可能没有意识到，这将使他们卷入一种新的复杂局面。信奉尼西亚三位一体论的人发现，与皈依阿里乌派的人相比，拜占庭帝国对尼西亚信徒更加友好。这也影响了皇帝的态度。拜占庭皇帝有时会给各个王国施加压力，让它们不要帮助阿里乌教徒对抗尼西亚派教徒。

罗马帝国晚期的基督教

380年，狄奥多西皇帝宣布尼西亚基督教为罗马帝国的官方宗教，此时罗马帝国已经严重衰落。起初，帝国并没有一个权威的宗教中心，尽管皇帝可能自认为是教会的首领。当时有几个城市是基督教的中心，可能每个城市都认为自己是最重要的。有人称耶路撒冷是一切开始的地方；而罗马是被耶稣选为“磐石”建造教堂以及彼得殉道的地方；由于各种有影响力的人物——包括阿里乌，都居住在埃及的亚历山大，那里也是一个重要的基督教中心。



利波・万尼1365年左右创作的作品，画中人物是穿着法衣的彼得。他是第一位罗马主教，因此也是第一位教皇。

传统观点认为，彼得是第一位罗马主教。虽然基督教在罗马帝国的地位并不稳固，但罗马还是成了基督教在西方的中心。虽然没有正式的组织，但是西方的主教们依然承认罗马主教是“同侪之首”。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权威逐渐形成了我们现在所知悉的教皇制度。不过，这一切都经历了漫长的过程。“大祭司长”一词首次出现是在217年左右，这是教皇的头衔。这个词绝不是敬语，它原本的意思是“不赞成任何教会官员妄自尊大，试图对他人行使权威”。

尽管如此，大祭司长仍然成了教会的中心权威。早期的罗马主教虽然不曾拥有头衔，但也被认为是教皇。史料中基本不见历任教

皇的确凿记载，但基督教官方历史认定彼得是第一任教皇，随后是罗马的一系列主教，他们确立了教会的一些基本习俗。公元100年左右，科林斯人（Corinth）收到了一封信，人们认为这封信出自第四任教皇克莱门特之手。信中表示，反对无正当理由罢免教会官员，并敦促科林斯教会服从他们的主教。克莱门特的继任者圣厄瓦理斯多，可能在罗马创立了教区。



早期的罗马主教制定了许多沿用至今的教会习俗。克莱门特反对世俗政权罢免教会官员，他维护了教会的权威。

这一时期，教职的传承有时候并不明确，可能不止一人宣称自己应当担任教皇职位。当时，这些互相敌对的准教皇并未被称为“敌对教皇”[(1)]，但这个词后来可以说是恰如其分了。敌对教皇不是教会或基督教的敌人，相对于经过正规流程选举出来的教皇，他们只是声称自己可以担任教皇。当然，任何教徒都可以声称自己是教皇，但作为敌对教皇，他必须有大量的追随者，并且其主张必须合理。历史上的某些时候，很难区分谁是教皇，谁是敌对教皇，其名分往往要依靠政治甚至军事力量来解决。235年，希波吕 图斯成为第一个被认可的敌对教皇。他之所以成为敌对教皇，是因为通过合法选举而成为教皇的卡利克斯图斯一世（Calixtus I）反对他，但他最终与卡利克斯图斯的继任者庞蒂安（Pontian）和解。召开第一次尼西亚会议，就是要解决这种内部分歧。



希波吕 图斯反对赦免严重罪行的做法，并挑战教皇卡利克斯图斯一些关于信仰的观点。他作为敌对教皇时，罗马官员受到迫害。后来他与教皇庞蒂

安一起被囚禁。

在313年实行宗教自由之前，罗马主教们处于极大的危险之中。直到皇帝君士坦丁颁布《米兰敕令》，保证宗教信仰自由，他们才避免了被迫害的命运。而此前，已经有几位主教被流放或杀害。在这之后，主教的职位才变得不那么危险。虽然，教会官员依然不可避免地会卷入世俗政治，而且会造成新的风险。4世纪早期，皇帝霍诺里乌斯统治的是一个问题重重、日渐衰落的西罗马帝国，但他看到了控制一位教皇带来的好处。因此，欧拉利乌斯被推举上位，成为反对卜尼法斯一世的敌对教皇。但是欧拉利乌斯和皇帝之间存在分歧，这让他变得孤立无援，不久就被皇帝赶出了罗马。

皇帝与教皇的角力

东哥特王国征服意大利后，罗马也处于国王狄奥多里克的统治之下。所以狄奥多里克和后来的继任者能对教皇选举施加很大的影响，以至于王室支持成为候选人能否当选的关键。这种情况从493年一直持续到537年，直到拜占庭军队暂时收复了西罗马帝国的大部分领土。

虽然罗马换了统治者，但有些事情并没有发生太大变化。东哥特人任命的教皇西尔弗斯被皇帝查士丁尼废黜，由维吉勒斯取而代之。维吉勒斯曾是教皇候选人之一，但事实证明他非常不受欢迎，原本选择维吉勒斯为继任者的教皇卜尼法斯二世，最终被迫选择了另一位。

在东哥特之后，拜占庭时代对历任教皇选举的干涉也未见减少。皇帝有权批准或否决一名候选人，他通常会从与自己有来往的

教会官员中挑选中意的候选人。因此，这个时期有一条通往教皇职位的捷径，即充当皇帝的联络人并赢得皇帝的青睐。

皇帝有权批准或否决一名候选人，他通常会从与他有来往的教会官员中挑选中意的候选人。



教皇维吉勒斯卷入了围绕圣父、圣子和圣灵本性的争论。尤其是他对三部作品的谴责，导致了“三章论争”，这一论争在他死后还持续了很长时间。

从遥远的皇帝那里获得批准可能需要数月时间。在此期间，教会基本上是群龙无首。然而，这个审批程序可以确保皇帝得到一个他信赖的教皇，并彰显皇帝对教会的控制。因此，649年，教皇马丁一世没有获得批准就上任，皇帝大为不悦。马丁一世因叛国罪被抓，并送往君士坦丁堡受审。他没有被处决，而是被流放了，这个相对仁慈的做法却给教会带来了麻烦。

在现任教皇还活着——他被世俗政权而不是宗教力量赶下台，此时为新教皇祝圣似乎是一件令人不安的事，但教会别无选择。这意味着教会对皇帝的权威屈服。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7世纪中期拜占庭失去对意大利的控制。此后，伦巴第人和法兰克人轮番统治意大利。在此期间，法兰克国王赠送给罗马教皇一部分领土，罗马教皇由此在意大利建立了教皇国。



800年圣诞节，查理曼加冕。这实际上标志着神圣罗马帝国的建立，尽管当时并未使用这个词。查理曼扮演了教会的政治和军事保护者的角色。

这次事件被称为“丕平献土”，以发起人法兰克国王“矮子”丕平命名，教皇由此成为政治和宗教首领。赠予教皇的土地原本是拜占庭的领土，先被伦巴第人夺取，又被法兰克人占领。教皇自然对（丕平建立的）新的加洛林王朝怀有好感。800年，第一位受教皇（利奥三世）加冕的皇帝查理曼（丕平之子），向教皇献出了更多的土地。

基督教的传播

虽然传教活动只是依靠少部分人的努力，而且通常出于偶然，但在罗马时代，基督教还是已经传播到欧洲的大部分角落。罗马帝国崩溃后，基督教继续传播，这主要是由两个因素驱动的。其中一个因素是，基督教徒热切地希望与他人分享自己的信仰，于是一些人为了使遥远土地上的人皈依基督教而踏上旅程。另外一个因素是政治作用。已经与教会建立良好关系的统治者发现了与新皈依的人打交道的益处，而且宗教为对抗外来者缔造了一个共同立场。



丹尼斯是罗马皇帝德西乌斯派去改变高卢人信仰的七位主教之一。他在那里被处以砍头之刑，成了一位殉道者。

从罗马时代开始，统治者和将军就把战胜敌人视作应该皈依的迹象，或者主动提出如果新神能给他们带来胜利，他们就会改变信仰。尽管有些传教士只是四处游荡，向任何愿意倾听的人讲道，但在很多情况下，军政领导者都是传教士的目标。不过，传教士非常乐意让统治者皈依基督教，因为他们的臣民很可能以他们为榜样或者遵循他们的命令，也皈依基督教。

早期传教士的热情使他们的演讲颇具说服力，尽管他们演讲的技巧其实参差不齐。可以说，每当有一个鼓舞人心的牧师吸引全镇人的注意时，至少也存在一个激动的小丑，他的话对听众来说简直不可理喻。但演讲并不是传教士唯一的工具，展现自己的力量或为当地居民提供援助也是吸纳新教徒的重要手段。

传教士和怪物

在许多情况下，当地民众会向传教士求助，希望后者保护他们，使其免受野兽的伤害。当时，经常发生野兽杀死家畜或破坏乡村的事情。有时传教士会制造神迹，与怪物对抗，以及对野兽的错误行为进行训诫。此外，还有一些更为直接的做法。

传教士菲南接受格伦多查特（Glen Dochart）地区的人的请求，保护他们，使其免受一头野猪的伤害。他准备猎杀它。三天后，他发现了这只可怕的野兽，他用棍子猛击它的头部。菲南声称他的力量来自他的祈祷，可以推测，祈祷使他免于受到野猪巨大獠牙的伤害。尽管这个神迹很平凡，但除掉野猪对当地居民意义重大，这成为他们皈依基督教的重要原因。许多早期的使徒和传教士都是这样，他们以这种相当直接的方式证明自己的价值。

事实上，这些早期的教徒入教，有一种讨价还价的意味。无论是寻求胜利的领导者，还是希望治愈疾病的农民，许多聆听传教士话语的人都想知道，上帝能为他们做些什么。



围绕尼尼安有一堆相互矛盾的记载，在这些故事中，是他让皮克特人皈依基督教。这似乎不太可能，但他确实是加洛韦的第一位主教。

一些传教士通过破坏异教的圣物或仪式场所来展现他们信仰的力量。这一策略具有风险，但可以带来可观的收益。在一些情况下，宗教人物的住所可能成为朝圣之地，并逐渐融入当地文化。例如，尼尼安在加洛韦（Galloway）的威索恩（Whithorn）设立了一个神职部门，并担任首位主教，此地后来成为重要的修道中心。

尼尼安建造的这座粉刷成白色的石构教堂在当时的确令人印象深刻。作为一处宗教中心，它是教徒朝拜的对象。完成朝圣之旅的人通常会得到一枚徽章作为奖励，而如果罪犯去朝圣并带着一个标记回来，那他通常会得到免于责罚的机会。毫无疑问，有些人用卑鄙的手段得到了徽章，也许是偷偷摸摸地欺骗或谋杀，但许多人确实完成了朝圣之旅。

凯尔特教会

最早进入一个地区的传教士并不一定会成为该地区的守护者。事实上，他们大多数都没能获得更广泛的认可。用今天的说法，他们是基层传教者。通常认为，阿里斯多布洛斯在1世纪经西班牙将基督教传入不列颠群岛。他是不列颠第一位主教，但后来的传教士的光彩却盖过了他。

虽然在罗马时代，基督教就已经进入不列颠群岛，但不列颠的教会却有自己的风格。这很大程度上受爱尔兰的影响。相比于居住在欧洲大陆的人，不列颠西部的居民和爱尔兰的凯尔特人罗马化程度较低，因此他们对基督教信仰的理解是不同的。传统观点认为，爱尔兰皈依基督教是帕特里克的功劳。虽然在他之前和之后似乎也出现了许多传教士，但都不那么出名。

据说，爱尔兰突袭者在帕特里克英格兰的家中把他带走了，他作为俘虏度过了好几个年头。帕特里克的父亲是一名基督教执事，

但他本人从事政治方面的工作，而帕特里克对他父亲的信仰并没有特别上心。然而，在被囚禁期间帕特里克看到了异象，异象告诉他要逃走，然后作为一名传教士回来。在接受相关的宗教培训后，他照办了。

圣帕特里克定义了凯尔特教会的性质。他没有废除当时的习俗，而是把它们纳入基督教仪式中。这样，新信仰就更容易被大多数爱尔兰人接受。这一时期，爱尔兰成为基督教的中心之一，并向不列颠派遣传教士。

397年左右，在尼尼安的努力下，苏格兰人和皮克特人皈依基督教。人们认为尼尼安是苏格兰的第一位“圣人”，但对他知之甚少。他在加洛韦的威瑟恩建立的宗教场所现在仍然存在，但他远不如科伦巴知名度高。后者从爱尔兰搬到了爱奥纳（Iona）[(2)]，在那里建了一座修道院。从爱奥纳出发，科伦巴到达苏格兰和爱尔兰，说服达尔里阿达（Dalriada）的国王（以及人民）皈依基督教。苏格兰人也是从这个时候开始大规模皈依基督教的。



帕特里克被爱尔兰突袭者俘虏，被迫成为牧羊人。很长一段时间内，他的生活孤独而充满危险。他在自己的信仰中找到了力量，并决心将它带给其他人。



据说，在去不列颠之前，阿里斯多布洛斯是使徒保罗的旅伴。他被认为是第一个把基督教带到不列颠群岛的人。

正如阿里乌派和尼西亚派曾为“三位一体”问题争论不休，凯尔特基督教和东正教之间也有很多摩擦。凯尔特基督徒和其他基督徒一样——至少在他们自己看来如此——是同一个教会成员，不存在特别的凯尔特教会。尽管有许多人敦促他们遵从主流教会的习

俗，但在不列颠北部，包括诺森布里亚，普遍遵循凯尔特习俗。此时，这个国家的其他地方也越来越多地以罗马的方式接受基督教信仰——这很大程度上是受首任坎特伯雷大主教奥古斯丁的影响。

凯尔特基督徒和其他基督徒一样，他们都是同一个教会的成员，不存在特别的凯尔特教会。

出于解决这些分歧的期望，诺森布里亚国王奥斯威在664年召开了惠特比会议。惠特比女修道院院长希尔达是国王的亲戚，也是凯尔特教会坚定的支持者。尽管如此，主教会议还是决定此后遵循罗马的习俗，使英格兰教会与基督教主流保持一致。国王奥斯威曾经表示，彼得是罗马教会的创始人，持有通往天国的钥匙，拒绝他是不明智的。其实做出这个决定，政治原因可能与宗教原因同样重要。

凯尔特十字架

虽然人们对其含义的理解各不相同，但凯尔特十字架的发明还是被归功于帕特里克。这个十字架可能是把基督教的十字架叠加在圆上——圆象征异教徒的太阳或月亮，基督徒想以此作为上帝高于旧神的标志。这样做也可能为了吸引以前崇拜太阳或月亮的人。



凯尔特十字架的起源是有争议的。这个圆可能用来支撑十字架的两臂，使雕刻物更牢固。

什么时候庆祝复活节，是惠特比会议解决的问题之一。因为各自的习俗不同，罗马人和凯尔特人庆祝复活节的日期也不相同，这可能会造成混乱，并且破坏整个基督教会的可信程度。比起模糊且混乱的约定，一套统一有序的教会习俗更能给外人留下深刻的印象。此外，惠特比会议确保了凯尔特教会仍然是一个地方类型，并没有蔓延到其他地区。如果会议做出了不同的决定，像尊者比德这样的名人就可能带着一种对凯尔特的偏向来书写历史，而凯尔特教会可能会扩张到欧洲的其他地方。



据说，一位基督教“圣人”曾在加洛韦威索恩的尼尼安洞穴静修和祈祷。从那以后，这个洞穴就吸引了许多朝圣者，其中一些人在附近的岩石上刻上了十字架或日期。

修道院和大教堂

从世俗生活中抽身出来，专注于祈祷、斋戒和宗教仪式的做法，可能早在基督教出现之前就存在。耶稣在传道之前在荒野中斋戒，历史上也有关于修士脱离正常社会生活的记载。在某一时点，集中过宗教生活的想法占了上风。相关记录能够追溯到320年，这可能是关于原始修道院的描述。修道院在爱尔兰生根发芽，修士聚集地成为主要的学习中心和宗教中心。第一批传教士也是从爱尔兰的修道院进入苏格兰。活动在爱奥纳岛上的宗教团体是苏格兰基督教的中心，甚至连主教都遵从它的权威。



根据传说，希尔达解决了一场蛇灾，把它们变成了石头。在惠特比的悬崖下面能看到它们石化了的遗骸。

这样一个宗教团体，必须用严格的规则管理生活的各个方面。没有规则，一个宗教团体本质上就是另一个村庄。我们并不清楚早期的爱尔兰修道院是如何管理的。535年左右，本笃制定了修道院的生活规范，他借鉴了早期团体的习俗和经验。

我们并不清楚早期的爱尔兰修道院是如何管理的。535年左右，本笃制定了修道院的生活规范。

并不是所有的修道院都遵循本笃制定的规范，尤其在早期。但随着时间推移，这种模式变得越来越普遍。这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查理曼，他支持这一理念，并让《本笃会规》尽可能广泛地传播。这是一份很长的文件，概括性地讲述了修道院应如何运作以及修士的行为标准。修士的生活围绕祈祷和工作展开，他们在白天和夜间的特定时间举行宗教仪式。大部分修士的工作都很普通，因为他们必须供养自己，靠种地和维护房屋维持生活。他们还须努力抄写和

注释手稿，因为这是保存文献或撰写图书的唯一方法。因此，修道院还有产业，有时会通过贸易或售卖啤酒、奶酪、羊毛纺织物等变得非常富有。



本笃为修道院制定了一套规则，这成为整个欧洲修道院的标准。这套标准虽然严格，但本笃会修士的生活要比那些相信圣人需苦修的地方容易得多。



《本笃会规》规定了修士的职责，包括世俗工作、祈祷和抄写手稿。手稿就包括抄写该规则，以供新修建的修道院使用。

修道院在欧洲成为一股重要的政治力量。随着基督教地位的稳固，统治者越来越关心他们是否能进入天堂的问题。解决这个问题的办法之一是为修道院提供财政支持，而修道院要定期为赞助人的灵魂祷告。自愿或被敌人逼迫退出政坛的贵族也可以去修道院过退休生活。修道院的生活很艰苦，但是修士（或修女）的生活仍然比那个时代的农民要舒适得多。退出政坛的贵族在其他兄弟那里大概不会受到任何优待，但国王的遗孀退隐到修道院可能会过得非常舒服。

修道院的生活很艰苦，但是修士（或修女）的生活比那个时代的农民要舒适得多。

这一时期的文献主要是在修道院保存下来的。在宗教团体之外，识字的人很少，也很少有人有时间写下一部编年史。相较于个人收藏，文献保存在修道院的图书馆里流传下来的机会要大得多。因此，正是通过宗教人物的著作，我们得以了解黑暗时代。但是，这些人的观点往往带有主观偏见。

孤独的隐士

一些修士文化借鉴了孤独隐士的传统。这些隐士的生活环境通常远离文明和舒适，物资极度匮乏。许多隐士和一些早期宗教人士都居住在沙漠、洞穴或森林深处，一些教派也会在与世隔绝的地方建立自己的驻地。早期的爱尔兰修道院尤甚。那些遵循本笃会规的团体生活环境虽然没有那么严酷，但要求也非常严格。



隐士的生活远离尘嚣，但并不是完全或永久性地孤独生活。此图描述的是亚美尼亚的隐士普鲁登修斯拜访另一位隐士索里亚的撒多宁的情景。

吉尔达斯在其撰写于510年的一部著作中，把撒克逊人和其他日耳曼人入侵不列颠归咎于罪孽和宗教放纵。他记录一些事件是为了说明他的观点，而不是出于记录历史，而且有些记载非常模糊。尊者比德的一部撰写于731年的著作，则主要关注凯尔特和主流基督教习俗之间的差异。很多时候，对于一些宏观的事件，宗教资料往往只包含零散的、片面的或带有高度偏见的信息。



修道院建立在诸如岛屿和半岛之类偏远的地方，这样它们可以从世俗的政治中分离出来。不幸的是，当北欧掠袭者掠夺它们的财富时，其选址也使它们远离了援助。

修道院通常建在沃土之上，这样可以很容易地供养一个团体；或者建在偏远地区，使修士远离世俗事务。但北欧人袭击欧洲海岸时，这样选址的弊端就暴露出来了。比如，坐落在诺森布里亚海岸外小岛上的林迪斯法恩修道院，富有而缺少防御，并且由于位置偏远，援军很难及时到达。多数时候，在北欧人袭击中幸存的修士只能被迫抛弃他们的修道院。同样，其他地方也经常遭到袭击，但每次都能恢复元气，然后再次成为北欧人眼中的肥肉。

基督徒把北欧人的袭击描述成异教徒蛮族对上帝发起的战争，但实际上这只是简单的投机主义。不管出于什么原因，像卡斯伯特的墓地林迪斯法恩这样的地方，都不堪一击。在教士眼中，“圣人”遗骨落入敌手是不可想象的，所以林迪斯法恩的修士们带着卡斯伯特的尸体寻找新的安身之所。在诺曼征服之后，他们最终在达勒姆（Durham）建立了一个新的居处，这里后来成为一个大教堂。



这个雕塑作品表现了卡斯伯特的棺木在英格兰东北部转移的场景。棺材仿佛变成了一座移动的神龛，抬棺之人受到了所经村庄和城镇的款待。

基督教大分裂

罗马教会的习俗成为西欧基督教的主导习俗，最终消除了各地差异。罗马教会花了很长的时间才同化了不列颠群岛的凯尔特教会——主要是由于后者非常普遍，并为当地的基督教习俗添加了区域特色。不过，罗马教会的教义和以拜占庭为中心的东方教会差异巨大。

后来的拜占庭（或希腊正教）教会与罗马基督教有着相同的起源，但在发展过程中受到了不同的影响。拜占庭比罗马更接近基督教的发源地，它受到很多犹太人遗风的影响。这些元素与希腊人对

戏剧的喜好结合，创造出了一种别样的基督教会风格。两种基督教会之间的分歧始于313年的《米兰敕令》，随着东、西罗马帝国的分立，这种分歧不断加深。

拜占庭比罗马更接近基督教的发源地，它受到很多犹太人遗风的影响。

拜占庭教会奉持的习俗被称为拜占庭仪式，经安提阿（Antioch）发展后，在君士坦丁堡正规化。仪式最初是用希腊语进行的，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渐转变成当地语言。拜占庭教会确定宗教节日日期的方式不同于罗马教会，一些有关的仪式也不同。比如复活节，拜占庭的基督徒在圣诞节前禁食，庆祝复活节的关键仪式也与罗马教会不同。

尽管存在这些差异，希腊和罗马的教会仍保持往来，这种关系一直持续到1054年。虽然彼此习俗不同，但它们都承认对方的地位并且相信两者的核心信仰是相同的。然而到11世纪中叶，情况发生了变化。意大利的宗教团体原本遵循希腊式习俗，罗马教会却试图在这里树立权威，并想让人们接受罗马教皇是希腊和罗马共同的最高权威。

1054年，罗马教皇的一个代表团抵达君士坦丁堡。他们的任务是寻求帮助，来抵抗诺曼人对意大利的入侵，并说服拜占庭教会服从罗马教皇的权威。既是来寻求帮助，又要求对方服从自己，两种意愿混在一起，令人失望。他们自然遭到了拒绝。结果，罗马教皇和拜占庭牧首相互把对方逐出了教会。



313年颁布的《米兰敕令》，赋予所有罗马公民宗教信仰自由。类似的声明以前也曾发布，但这一次是由一个稳定的帝国发布的，帝国有能力执行。因此，这份声明具有持续性。

这一事件被称为“大分裂”，或“东西教会大分裂”，从此基督教会一分为二。两个教会还存在其他的分歧，其中一些非常严重，足以引起不和与激烈的言辞攻击，比如是否可以在圣餐仪式上使用发酵的面包。在大分裂之后，为解决这些问题所做的努力已经没有任何意义了。

到十字军东征时，西欧的天主教军队似乎并不认为拜占庭人是他们的同盟者，他们对东正教徒和犹太人、穆斯林同样残酷。如果大分裂没有发生，欧洲的政治和军事局面将会有很大的不同。事实上，如果拜占庭帝国与西欧仍然处于同一个宗教信仰之下，1453年拜占庭帝国最终覆灭一事可能就不会发生——至少不会以同样的方式发生。



教皇利奥九世试图加强对东方教会的控制，结果适得其反。随之而来的大分裂在罗马教廷和拜占庭教会之间造成了永久性的鸿沟。

希腊正教还是东正教？

“希腊”一词最初用于拜占庭，拜占庭帝国有大量的希腊人，文化也很有希腊特色。随着时间的推移，一些东正教会选择将它们的身份与拜占庭分离，并将“希腊”一词从自己的名称中去掉。然而在公元第一千纪，“希腊正教”一词一般可用于所有的东正教教会。

伊斯兰教的兴起

7世纪初，伊斯兰教创立，之后迅速传播，成为一个政治实体和世界三大宗教之一。其早期扩张由拉希敦哈里发国领导，而麦地那是历史上伊斯兰国家的第一个首都。从632年始，拉希敦的军队逐渐征服阿拉伯半岛，向北推进到外高加索，并沿北非海岸扩张到突尼斯。

伊斯兰教内部分歧引发了656—661年的内战，一个新的领导阶层由此诞生。这就是倭马亚哈里发国，它进一步扩大了伊斯兰国家的领土，使其延伸至伊比利亚半岛。这就使得倭马亚王朝与拜占庭帝国的冲突不可避免，但这种冲突主要体现在政治方面而非宗教方面。倭马亚王朝首都在大马士革，靠近拜占庭领土，于是不可避免地爆发了一场争夺中东主导权的战争。战争后来陷入僵局。高加索地区半游牧的哈扎尔人受到拜占庭的鼓动，与波斯萨珊王朝作战。萨珊王朝被倭马亚王朝征服后，哈扎尔人继续以同样的方式对抗新邻居。如此，拜占庭帝国的侧翼就免受倭马亚王朝扩张的影响。

战”。



656年在巴士拉附近发生的贾迈勒之战，也就是我们所熟知的“骆驼之战”。

倭马亚人在伊比利亚取得了很大的成功。他们对伊比利亚的西哥特王国南部海岸进行了一系列袭击，并于711年登陆伊比利亚半岛。西哥特国王罗德里克率军抵抗，在瓜达尔特之战中，西哥特人惨败。当时，关于这场战争的记载有很多是相互矛盾的，而且大致是不可靠的，因为各方军队都给出了夸张得可笑的数字。我们大体可以确定，西哥特人无法应对阿拉伯骑兵的高机动性战术，在溃败后遭到屠杀。

西哥特人无法应对阿拉伯骑兵高度机动的战术，在溃败后遭到屠杀。

这让通往托莱多（西哥特首都）的大门敞开了。西哥特人首都沦陷，国王阵亡，首都防御群龙无首。其他城市或者很快陷落，或者向快速推进的骑兵部队投降。西哥特王国的崩溃并没有给当地居民带来巨大的灾难。许多时候，投降的城镇只不过是统治方式发生变化：胜利者既没有把新的伊斯兰法律强加给民众，也没有强迫民众皈依新的宗教。这可能是一个明智的策略，尽可能地减少征服伊比利亚的阻力，实际上这些措施也真的达到了所期望的效果。



711年，西哥特人在瓜达尔特之战的失败，有时归咎于军队内部的背叛或政治分裂。其实，他们失败的原因可能是阿拉伯骑兵的高度机动性。

717年，伊比利亚半岛的大部分地区已经在倭马亚王朝的控制之下，军队开始越过比利牛斯山向图卢兹推进。推进的脚步因柏柏尔人的反叛而受阻，他们刚被倭马亚王朝征服不久，而正是柏柏尔人向阿拉伯军队提供了大量轻骑兵。这种扩张活动一直持续到732年。在图尔附近，阿卜杜・拉曼领导的伊斯兰军队被查理・马特率领的法兰克军队击败。



1862年的一幅作品，阿卜 杜·拉曼和他率领的军队。倭马亚人机动性高且悍勇，这迫使法兰克人需要建立一支训练有素的军队，而非一批战时才组成军队的战士。

这是欧洲历史上的一个转折点。阿拉伯帝国在欧洲的扩张终于停止，法兰克人开始成为西欧的主导力量。当然，冲突并没有结束，但欧洲伊斯兰国家的势力被限制在安达卢西亚地区。750年，倭马亚王朝被推翻，阿拔斯王朝建立，阿拉伯帝国在欧洲进一步扩张就不太可能了。

762年，阿拔斯王朝迁都新城市巴格达[(3)]，它继承了萨珊王朝的一些文化特色。这是所谓“黄金时代”的开始。这一时期，阿拔斯家族资助了很多艺术和科学活动，这带来了技术上的飞跃，使帝国站立在人类文明的前沿。

尽管文明发达，但在756—969年之间，阿拔斯王朝还是失去了很多领土，并且最终分裂成从摩洛哥、伊比利亚到中亚一带的多个伊斯兰国家。其中包括由倭马亚王朝成员阿卜杜·拉曼建立的后倭马亚王朝。阿拔斯政变期间，拉曼在大马士革，他跳进幼发拉底河，侥幸逃脱了追捕。经过漫长而危险的旅程，他在北非的突尼斯找到了避难所。

拉曼只是暂时得到了喘息。由于担心阿拔斯人的背叛，他继续向西行进，最后在伊比利亚停下来，在那里他获得了支持。趁哈里发内部权力结构分裂，他率军攻打新的阿拔斯统治者。柏柏尔人的反叛和安达卢西亚的混乱，让拉曼成功地占领了马拉加（Malaga）和塞维利亚（Seville）。柏柏尔人撤退到托莱多，而拉曼则占领了科尔多瓦。[(4)]不久之后，拉曼扫清了阿拔斯王朝在这片地区的势力。他在伊比利亚建立了一个独立的倭马亚哈里发国。王国的首都在科尔多瓦，拉曼的王国成了被驱逐或对新哈里发国心存恐惧者的避风港。王国的力量逐渐增长，直到他的军队能够挫败阿拔斯王朝试图重新控制安达卢西亚的企图，虽然这种反抗也很勉强。这时候，他统治着伊比利亚大部分地区独立的伊斯兰国家，但也有很多不安定因素。有的来自内部叛乱，有的来自不接受拉曼统治的城市，另外还有来自比利牛斯山的威胁。



778年，罗兰和他的骑士们在隆塞沃山口之战中英勇牺牲，建立了“圣骑士”或者说完美的基督教骑士的典范。“圣骑士”一词很可能是“pal ati ne”的变体，意思是高级领导者。

萨拉戈萨城（Zaragoza）希望能够独立于拉曼的哈里发国。受萨拉戈萨城之邀，法兰克国王查理曼派军队进入伊比利亚半岛。法兰克人最后被迫撤退，因为萨拉戈萨也不想成为法兰克人的附庸，因此它关上了大门。查理曼的后卫部队在隆塞沃山口进行的战斗成为传奇，被写入史诗《罗兰之歌》，流传不朽。萨拉戈萨城是拉曼统治安达卢西亚的最后一个障碍。783年，拉曼先是通过贿赂，后又通过武力，控制了这座城市。拉曼在城市中建造房屋、修筑道路，这促进了城市繁荣，也成为人们接受拉曼统治的一个心理因素。他还成立了一个由线人和信使组成的情报网络，不仅使军队能够及时得知并应对叛乱，还增强了政权的稳定性。因此，安达卢西

亚出现了稳固的后倭马亚王朝，一直持续到1031年。15世纪末，基督教国家重新统治整个伊比利亚半岛。

在西哥特教堂旧址上修建的清真寺，是后倭马亚王朝的伟大工程之一。它采用了罗马—哥特式的设计元素，还借鉴了叙利亚和阿拉伯世界其他地方的风格。这座城市成为一个文化和贸易中心，在西地中海的经济和政治中扮演着重要角色。他们与比利牛斯山地区基督徒的关系时好时坏，与西班牙北部的基督教国家也常有冲突。到800年，后倭马亚王朝已经成为一个文明而进步的地方，这里成为基督教世界和伊斯兰教世界思想交流的中心。



科尔多瓦清真寺原本是一座西哥特教堂，后来改建为清真寺，然后多次扩建。13世纪早期，它重归基督徒所有，开始具有西方大教堂的特征。

法兰克史诗

正如英格兰和苏格兰都有自己的古典文学体系（分别被称为“英格兰史诗”和“苏格兰史诗”），法兰克的传奇历史也被编成了一部史诗和编年史的合集，被称为《加洛林纪事》或《法兰西史诗》。这部文学作品的核心是《罗兰之歌》，相当于法国版的《亚瑟王传奇》。《罗兰之歌》融合了真实的历史和浪漫的想象，讲述了一群英雄的英勇坚守，是他们牺牲自己掩护了法兰克军队的撤退。随着“骑士”概念的广泛传播，罗兰和他同伴们的无私奉献和英勇牺牲，也成为骑士的典范。

---

(1) 原文是“antipope”。据后文可理解其意，即想当教皇并产生争夺行为的人，这才是“敌对教皇”的真意。——译者注

(2) 苏格兰沿海赫布里底（Hebrides）群岛中的一个岛屿。——译者注

(3) 它本是底格里斯河西岸的一个村落，意思是“天赐”。在阿拔斯王朝第二任哈里发曼苏尔的主持下，这个小村落成为该王朝的都城。——译者注

(4) 该词原文是“Cordoba”，位于西班牙南部，是安达卢西亚自治区的一个重要城市。原为腓尼基人和迦太基人古城；公元前2世纪为罗马人殖民地；6世纪西哥特人入侵，对它的破坏十分严重。8—11世纪，曾为后倭马亚王朝的都城，非常繁荣。12世纪，成为西班牙王国的重要军事基地。10世纪，该城有50万居民，曾是西欧最大的城市。这里有很多罗马和摩尔人遗迹，还有珍贵的阿拉伯白金建筑遗址。

第5章
来自北欧的海上突袭者

北欧人经常被误称为“维京人”，他们劫掠欧洲海岸的居民，被描述成嗜血的海上突袭者。这种描述有一定的真实性，但他们又不仅仅是突袭者。北欧人还是商人和征服者，他们也会在被征服的土地上定居。在“历史上最伟大的探险者”队伍中，北欧人当占有一席之地。

“北欧人”一词通常指现在的丹麦人、挪威人和瑞典人。虽然在大部分时间里，他们都未形成统一的王国，但却有共同的语言和文化，因此在需要的时候会进行合作。这种灵活性是影响北欧社会的主要因素之一。一个人可能这一年加入一个突袭者队伍，下一年去开展贸易，其余的时间则在家里照顾他的农场。北欧人是机会主义者，这是他们最主要的特征——如果没有富有且容易得手的目标，他们就不会突袭，而是进行远途贸易。



中世纪的作品，表现了北欧船只抵达不列颠的情景。较之其他作品，这幅画的时代错误较轻，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它创作的时间更接近北欧突袭者活动的年代。图中战士装备的是诺曼式盾牌，而不是他们特有的圆盾。

北欧人是日耳曼人，他们与最早进入欧洲的人群关系密切。若是如此，他们很可能是在上一个冰河时代末期冰原消退时向北推进的。他们沿河流、海岸和峡湾边缘定居，船只自然成为北欧文化的

重要特色。长途贸易和海上远征都需要各类船只来担负运输任务，正是这些贸易和远征给北欧人带来了“维京人”的绰号。关于这个词的起源，存在各种各样的说法。有人提出，这个词来源于早期斯堪的纳维亚语中的“海盗”一词，或者认为“Vik”是“远征”的意思。因此，维京人是指那些从事海上突袭或远途贸易的人，但这种称呼只在他们从事这项活动时适用。其余时间，他们只是从事农业或金属锻造等普通职业的北欧人。



伊斯曼托普是奥兰岛上一个铁器时代的环形堡垒，建于200年左右。这个堡垒使用了四个世纪，之后被废弃。该地似乎在900—1200年被重新占领。

北欧人的武器和船

公元前500年左右，斯堪的纳维亚半岛进入铁器时代，这带来了生产力的巨大飞跃。冶炼青铜的材料需要从别处运来，而铁矿石很容易获得。因此，铁制的武器、盔甲和工具也很容易制造。这对其他产业包括农业有着重要的意义。与木制犁相比，铁犁可以翻更深、更肥沃的土壤，并且可以在以前难以耕作的地方发展农业。

铁器时代的武器和个人防护也得到很大的发展。一个典型的北欧战士应该装备长矛和盾牌，弓箭、标枪和手斧也被广泛用于战争，虽然它们通常用作狩猎工具和农具，而不是专门的武器。担负得起更多武器的人会配备战斧，也许还有剑。

维京剑在整个欧洲流行起来。它是为切割设计的，而不是用来刺入，因此对手部的保护很少，刀柄不易于双手使用。在战场上，剑或手斧与盾牌配合使用，矛是主要的战场武器。





维京剑沿用了一种在欧洲流行多个世纪的使用模式，在此基础上有一些变化。有时它被描述成一种笨拙沉重的武器，实际上它相对较轻，而且平衡性也很好。

大多数北欧战士都不是职业士兵。一个有权有势的人也许能养得起几个装备精良的随从，但所有军队的主要构成者都是普通农民，其装备是他们能得到的任何武器。考虑到当时的社会性质，这意味着北欧可以迅速集结一支装备长矛的军队——其中一些人还有弓箭或标枪，最优秀的成员具备战斗经验。除了盾牌和厚衣服，一个普通的北欧战士可能不会有其他的个人防护用品了，除非他继承了一件盔甲或者得到了这样的战利品。比较富裕的人会有头盔，也可能有链甲。制作北欧链甲，要先把铁锻打成越来越小的小块，直到变成金属丝，然后把这些金属丝做成彼此衔接的小环。一件完整的链甲衣很沉，也非常昂贵。有些战士的链甲较小，只覆盖肩膀和上臂。可以再加上一块盾牌和一个坚固的头盔来掩护身体，这已经是一套非常昂贵的防护装备了。



虽然只需要较少的金属，也比剑更容易制造，但矛头仍然是战场上的有效武器。许多矛头足够锋利，既能劈砍，也能刺杀。

北欧的头盔通常设计简单，它由金属条的框架和弧形板的头盔主体组成，附带强化过的边缘和鼻骨前的铁条以保护脸部。这种头盔曾在欧洲大部分地区流行，我们今天称之为“星形盔”。防护设备在这个基本形制上也有变化，如使用面板、附加链甲来保护颈部、使用眼镜状目镜等，但头盔主体是朴实无华且实用的。我们几

乎可以肯定，与维京人相联系的“角盔”从未存在过——它在船上不会有任何作用，只能是一种负担。



7世纪的北欧头盔，发现于瑞典旺德尔的船葬遗址。头盔虽然有各种不同的设计，但都带有眼睛和脸部的保护装置。没有发现典型的“角盔”存在的证据。

北欧船只没有内部框架，而是用重叠的木板代替，从龙骨向外，每一块木板都钉在前一块上。横梁保证了结构的牢固度，并充当桨手的工作台，桅杆由龙骨上一根纵向的梁支撑。这种方法适合制造快速突袭船和大型贸易船。最初，北欧船只在沿海水域航行，随着造船技术的改进和航行技术的提升，他们开始在北海更广阔的水域上航行。最终，他们能够在大西洋上远航。



1867年在挪威的图恩发现了一艘北欧船只，这是现代人首次对北欧船只进行发掘和研究。这艘船由橡树建造，建造时间在900年左右。

在长船上作战，首先要让船靠近敌人，然后放箭。当两船靠近，便可以进行一场与陆地作战没什么区别的肉搏战。一般来说，一艘船上最勇敢的战士会站在船头，与所有上前的敌人战斗，直到自己获胜或受伤。这种船上没有船载武器，也不具备猛烈的撞击功能。事实上，这种长船的设计，使它并不能在与另一艘船碰撞后幸存下来。

龙船？

北欧船只有时被称为“龙船”或“德拉卡斯”。“德拉卡斯”这个词的起源并不清楚，似乎不是来源于北欧人。它可能指

船头上雕刻的蛇形生物，也可能是受突袭者侵扰的居民因为心生恐惧给北欧人起的绰号。最大的北欧突袭船和战船分别被称为“布塞”（Busse）和“斯基德”（Skeid），但较小的“斯奈克”（Snekkja）长船更常见。“卡尔维”（Karvi）长船则是一种比斯奈克更窄、更小的船，适合于侦察和小规模突袭。

北欧盾牌

北欧人使用圆形的木盾，盾中心有一个金属护圈。盾牌的正面是用皮革覆盖的几块木板，如果主人有兴致，可以对其进行装饰。这种盾牌很轻，不会妨碍机动性，也不至于太大而不方便拿着它在船上行走。虽然如此，一艘小型长船承载几个拿着盾牌的战士仍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于是人们将盾牌固定在船舷上，巧妙地解决了这个问题。这样也为桨手们提供了一种针对天气的防护——除此之外，几乎没有别的措施，而且这样一来盾牌也许还能在海战中挡住箭矢呢。



1930年的作品，表现了北欧船只航行的场景。这些船的帆虽然看着很普通，但非常实用，可以在海上进行长途航行。

举起盾牌可以抵挡敌人的攻击和箭矢，也可以与其他战士的盾牌叠加起来形成一道防御墙。但对于个人作战来说，轻盈是盾

牌主要的优势。盾牌不仅可以用来防御，它还可以使敌人的打击偏移，从而给自己留出完整的回击空间与时间，让敌人看不见持盾人手里武器的动作，甚至还能直接用作武器。用盾牌的边缘猛击敌人的脸虽然不一定能造成大的伤害，但会让对方步态不稳，这就为自己使用斧头或剑进行还击创造了战机。

船是运输工具而不是武器，甚至大型的商船也是浅吃水的。在发动突袭时，船可以冲到海滩上，战士们从舷边跳入海中，然后上岸。船也可以在浅水河道航行，既可袭击遥远的内陆，也可装载贸易货物。

前维京时代

维京时代始于793年，这一年北欧人袭击了林迪斯法恩修道院。然而，此前很久，北欧人就在欧洲出了名。斯堪的纳维亚半岛的日耳曼人与罗马帝国接触很少，而且时断时续，这主要是因为距离遥远以及罗马人对日耳曼人普遍怀有敌意。斯堪的纳维亚受罗马帝国崩溃和匈奴入侵的影响较小，也没有像东欧那样出现大规模的人口迁移。



旺德尔时代的头盔，颊革的设计可能受到了罗马头盔的影响。但是我们可以确信，此时北欧人头盔上的这种设计已经独立发展了。

瑞典的旺德尔出土了大量考古遗物，这些遗物的年代在550—793年间，因此这一时期被称为“旺德尔时代”。这一时期，欧洲已经恢复了稳定，法兰克王国成为西方的主导力量。斯堪的纳维亚半岛与法兰克王国和其他欧洲国家进行贸易，出口从其他地方得来的货物、生铁和铁制品。

斯堪的纳维亚半岛上的大多数人都是农场主，他们总体上都很富裕，但彼此之间的关系松散。小区域由酋长依靠个人魅力进行统治，随着时间的推移，更成功的领导者获得了更多的支持和财富，这反过来又增加了他们的影响力。随着酋长国的合并和壮大，在将来的旺德尔时代，大的王国最终出现。但是当时的大酋长都极其富有。他们的墓葬中有许多珍贵的随葬品，包括做工复杂的珠宝和制

作精良的武器。值得注意的是，在贵族墓葬中还发现了包括马镫在内的骑具。



斯堪的纳维亚人能够制作精致的金属制品。这种胸针在旺德尔时代很流行，后来逐渐被椭圆形的设计取代。

虽然北欧人总体上更喜欢徒步作战，但也有例外，许多首领拥有大规模的马群。当时的史学家指出，北欧人拥有欧洲最好的牲畜群，尽管他们不像其他文化的居民那样依赖马。因为海上运输和远途贸易在他们的生活中占据重要地位。

随着技术的进步，他们建造了更大的海船，北欧商人因此能够到达更远的地方，并且发现了不列颠和欧洲海岸这样潜在的袭击目标。沿海袭击并不是什么新鲜事。不列颠群岛那些富裕而不堪一击的修道院成了北欧人新的掠夺目标，相对而言，这种掠夺没有什么风险。终有一天，北欧人会袭击这些地方，这几乎是不可避免的。

沿海袭击并不是什么新鲜事。不列颠群岛那些富裕而不堪一击的修道院成了北欧人新的掠夺目标，相对而言，这种掠夺没有什么风险。

财富和货币

尽管硬币在其他地方已经流通了几个世纪，北欧人却没有自己的硬币。在古代世界，货币不是在信用的基础上发行的——它不代表一个值，但其价值与制造货币的贵金属重量相当。因此，硬币只是一种方便的计量方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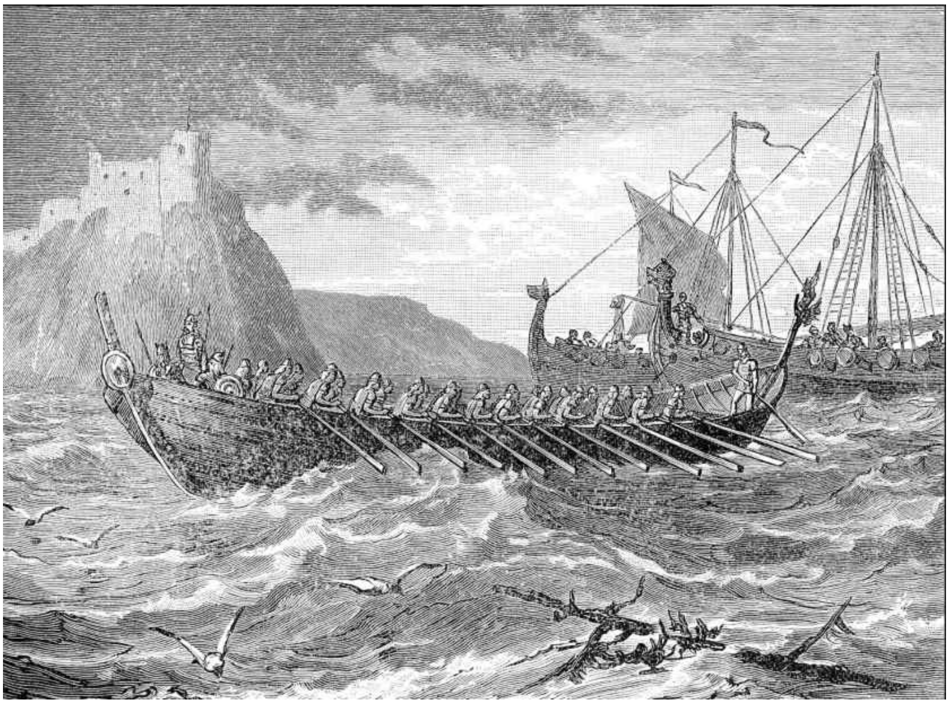
北欧人乐于接受并使用其他地方的货币，但他们大部分贸易都依靠其他各种物品中所含金属的重量来结算。这些物品可能是装饰品，在当时的许多地方，个人珠宝基本上是可穿戴的货币。粗银（Hacksilver）也被广泛使用。这些钱可以铸成条，从银条上砍下一部分，便于携带。也可以从富人家里的餐具或装饰品切下一块，当作大块银币。



这些硬币和手镯由阿拉伯银制成，通过位于现在俄罗斯和东欧的河流贸易路线被带到斯堪的纳维亚半岛。

早期的袭击

第一个遭到北欧人袭击的地方是林迪斯法恩修道院，时间在793年。应该没有人对袭击的猛烈程度感到意外。这是一个暴力的时代，沿海城镇多年来一直遭受这种袭击。从罗马时代起，英格兰东南沿海的一些城镇就开始设防，以抵御撒克逊人的海上袭击。此时其他地区也开始建造防御工程。



人们通常认为维京时代始于793年北欧人对林迪斯法恩修道院的袭击。但此前几年，北欧船只已在不列颠登陆进行贸易，偶尔也会发生战斗。武力冲突事件可追溯到787年。

在信奉基督教的欧洲，像北欧人这样袭击“圣地”简直是不可想象的，但是身为异教徒的袭击者当然没有这种顾虑。这次袭击被

当时的历史学家（也是基督教修士）描述成仇视上帝的野蛮人对教会本身的攻击。实际上，这个地方的宗教地位对袭击者并无意义。他们只是想掠夺，最好能获得大量财物而不用冒什么风险。林迪斯法恩恰好满足这些条件，因此遭到了攻击，除此之外并没有更深的原因。

然而，在接下来的几年里，情况似乎完全不同了。795年，突袭者袭击了赫布里底（Hebrides）群岛的爱奥纳岛，那是另一个大修道院的所在地。他们甚至开始攻击远至爱尔兰的目标。宗教场所不是唯一的受害者，任何可能带来良好回报的地方都是他们潜在的袭击目标。当时的袭击都是小规模的，所以不会出现严密设防的城镇。

战术上，北欧人通常突然到达附近的海滩，直指目标，战胜当地所有对手，然后在对手反应过来之前迅速撤退。有时候也会出现变化。他们可以顺着河流进入内陆，在复杂的袭击计划中，一个突袭队可以通过河流深入内陆，然后从陆地向目标进军，再通过不同的路线撤退，在预先安排好的地点与船只会合。突袭者还会偷走马匹，以提高行进速度以及携带战利品。



北欧人突袭爱尔兰的克朗麦克诺伊斯，是一场戏剧性的事件。海岸或河流附近的任何定居点都可能受到袭击，最方便攻击的目标会遭受一次又一次的袭击，直到它们建立起有效的防御或者被遗弃。



851年，北欧入侵者焚毁了英国东南部的坎特伯雷。放火焚烧定居点不仅是一种肆意破坏，还能起到分散防守者注意力的作用。

袭击的强度和频率都在增加。一些地方会被袭击多次，北欧人的目的是获取财富，而不是消灭当地居民，因此至少在某些情况下，暴力袭击的危害被控制在较低的程度。对袭击者来说最好的情况是，一个定居点遭受掠夺后，其社会生产还能够恢复，以便他们日后再次掠夺。因此，尽管有些突袭者会肆意破坏城镇和杀害俘

虏，将奴隶拿去出售也很普遍，但他们有时也通过展示武力然后接受贡品来达到目的。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做法逐渐演变成了缴纳丹麦金。

对袭击者来说最好的情况是，一个定居点遭受掠夺后，其社会生产还能够恢复，以便他们日后再次掠夺。

对800年的北欧人来说，抢劫一座城镇并杀死任何试图保卫它的人，并没有什么不对。的确，在北欧文化中，虽然窃取财产是不光彩的，但在战斗中赢得的东西——即使是一边倒的战斗，也可以被当作战利品。北欧史诗《埃吉尔萨迦》[(1)]中的一个故事体现了他们这种观念。埃吉尔和他的手下突袭一个农场，发现那里的居民正在睡觉，所以他们拿上想要的东西后朝自己的船走去。走到一半，埃吉尔意识到这样不符合当时人的观念，于是带着手下回到农场。此时居民已醒来，埃吉尔的战士杀死了男人，赶走了女人和孩子，并焚毁了建筑物。这场对缺少装备、人数众多的农民的胜利满足了他们的荣誉心，也让埃吉尔一伙人认为，这次突袭是合乎规则的。

冰岛萨迦

很多时候，我们对北欧文化和历史的了解来自许久之后才出现的传奇故事。北欧人没有留下文献资料，他们认为历史太过神圣，不能用文字记录。相反地，斯堪的纳维亚吟唱诗人以诗歌的形式将法律、历史和英雄传奇记下来，然后在需要时背诵出来。押韵可以让一个吟唱诗人确保他所吟唱的内容是正确的，而一种机智的短语——隐喻表达法，可以用来描述一种画面或帮助诗歌押韵。比如，一个慷慨的人可以称为“黄金的敌人”，一艘船可以称为“骄傲的海马”。

这些口述历史最终被书写出来，最著名的是冰岛修士斯诺里·斯图鲁松（Snorri Sturluson）的作品。他的作品撰写于1200年左右，而且可能参照了传说故事或不真实的史料。毫无疑问，他也带有偏见——不管是否存心，因为他的作品必须通过他所属教会上级的审查。尽管如此，这些传说仍然是了解北欧人生活、文化和宗教信仰的最佳资料。

扩张到俄罗斯

北欧人与居住在波罗的海另一边的人有联系，他们可以从芬兰湾渡过涅瓦河进入拉多加湖。从旺德尔时代开始，做贸易和探险的人就沿着这条路线前进。在北欧人经过的地区，总有少数人定居下来。这些地方是斯拉夫人的家园，这里有很好的生存条件。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北欧居民逐渐被称为罗斯人（the Rus）。



《散文埃达》和《诗体埃达》。《散文埃达》是斯诺里·斯图鲁松的作品，是一部阐述《诗体埃达》(作者另有其人)的著作。这两部作品虽然不尽真实，但从中我们可以了解到很多关于北欧人和他们生活方式的信息。

这一切究竟是如何发生的，仍有待探讨和论证。一些资料显示，现在俄罗斯境内的城市是由北欧人建立的，但具体的事实我们还不清楚。很可能精力旺盛、雄心勃勃的北欧人融入了当地的斯拉夫社会，并逐渐进入权力高层。这在那个时代很普遍，统治阶级和他们的直接支持者往往是战士。由于北欧人比当地人更好战，他们也就自然而然地扮演了这一角色。

北欧人不仅是战士，也是成熟的商人和熟练的工匠。他们定居后，促进了当地经济的繁荣。其中的两个城市——诺夫哥罗德和基辅，作为当地最重要的城市而尤其繁华。在那里，融合后的北欧人和斯拉夫人通常被称为“基辅罗斯”。“罗斯”一词最初可能是指斯堪的纳维亚的武士阶层，后来所有的斯堪的纳维亚人都被称为罗斯。

我们对这一地区的了解大多来自《往事纪年》——一部1100年左右参考基辅的各种资料写成的史书。根据这部史书，一位名叫留里克的北欧人建立了罗斯第一个王朝。[(2)]《往事纪年》称留里克王朝的人为瓦里亚基人[(3)]，这是当地人对北欧人的称呼，在拜占庭也适用。留里克和他的战士应当地居民的请求去镇压当地部落的叛乱，这场叛乱威胁着拉多加湖地区的贸易路线和定居点。



当时俄罗斯境内的斯拉夫人请求留里克和他的族众——也就是他们所称的瓦里亚基人，来处理他们围绕拉多加湖地区产生的部落争斗。

留里克建立了一个名为诺夫哥罗德的定居点。根据传说，这个定居点后来演变成为如今的诺夫哥罗德市。留里克于879年去世，

他的弟弟奥列格（Oleg）继承其权力，并领导了夺取基辅的战争。基辅由此成为罗斯国的首都。按照传统，王朝的继承人居住在北部首都诺夫哥罗德，罗斯国整体由基辅统治。今天，人们普遍认为留里克王朝是俄罗斯历史的开端。

基辅罗斯的繁荣，部分是由于它在东欧贸易路线上的地位。从拉多加湖地区可以进入第聂伯河和伏尔加河，然后一路航行到黑海和里海。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在沿途几个急流处需要进行水陆联运。通过急流处时，一般先把货物卸下来，从附近的陆路运输；等船开到河流深阔处，再将货物装到船上，开始新的航程。通过这种费力的方法，可以把整批货物从波罗的海运到拜占庭。



商队穿越东欧的大河，在几个急流处需要进行陆路搬运——一项费力且有时很危险的事情。一些港口处建有堡垒，这样做既可以保护这条贸易路线，又能从使用堡垒的人那里赚取钱财。

第聂伯河的陆上运输线路

第聂伯河上有七个大的急流，这些急流大都用斯堪的纳维亚式的名字。这些急流，当地人很可能早有他们自己的称呼，但商队航行途中，与当地人周旋的是北欧商人。北欧商人会告诉当地人这些急流的有关信息，于是商人们所言的急流名称就流传开来并被记录下来。为保护和控制这些急流处的港口而建造的贸易站和堡垒，逐渐成为北欧人掌控的主要群落，而贸易站和堡垒的所有者，则可从中获利。



第聂伯河是欧洲第四长河。北欧商队通过这条河进入黑海，并通过基辅在黑海沿岸进行贸易。

众所周知，北欧人与拜占庭帝国有着广泛的贸易往来，他们还利用丝绸之路交易来自东方的货物。我们至今没有弄清楚，北欧人往东究竟到了哪里？考虑到他们精力充沛和求知欲强的天性，他们很可能到了非常远的东方。关于北欧人到达中国，或者驾着他们的长船驶出长江口到达更远地方的说法，在现实中虽毫无根据，但确实不时冒出来。

众所周知，北欧人与拜占庭帝国有着广泛的贸易往来，他们还利用丝绸之路交易来自东方的货物。

生活在拜占庭帝国的北欧人

860年，罗斯国对毫无准备的拜占庭帝国发起了一场大规模的突袭，并洗劫了该帝国的城市。之所以说突袭，是因为罗斯国有可能清楚地知道他们国境以南的情况，而且知道拜占庭的大部分军队被调去对抗阿拉伯军队了。这一行动清楚地展示了瓦里亚基人的武力，以及拜占庭皇帝宁愿将他们收入麾下用于对抗敌人而不是与之为敌的事实。此后，罗斯国不时与拜占庭帝国发生冲突。

罗斯人和北欧人因此成为拜占庭雇佣兵的一大来源。最优秀或最有名的人会进入皇帝的卫队——瓦里亚基人卫队，此外任何战士都能在拜占庭谋生。在整个地中海地区，北欧战士都有很好的口碑，他们因用长柄斧作为主要武器而闻名。因为有太多的年轻人到拜占庭碰运气，以至于北欧人通过了这样的法律：一个人“在希腊”（即受雇于拜占庭帝国）期间不能拥有继承权。这至少能保证一部分战士在地中海生活一段时间后会返回家乡。

那些返回家乡的人在服役期间得到了丰厚的报酬，于是变得非常富有。他们带回家的财富促进了罗斯和斯堪的纳维亚经济的发展，但这样也鼓励了其他人去拜占庭服兵役。在其他时代，这样可能是人才流失——在这个例子中，更像是勇士的流失。但事实并非如此，许多后来颇有作为的北欧领导人“在希腊”期间学习了开展贸易的知识，而且巧妙地将学来的经验用在了其他地方。



皇帝西奥菲勒斯是众多拜占庭统治者中的一位，他受到瓦里亚基人卫队的保护。与西罗马帝国的禁卫军不同，瓦里亚基人通常远离政治，因此他们更可靠。

瓦里亚基人卫队存在的时间比维京时代更久。拜占庭帝国灭亡很久之后，他们仍然在与拜占庭皇帝曾经的敌人作战。卫队可以长期存在，并不只是依靠超强的战斗力。瓦里亚基人是外来者，与当地军队相比，他们不太可能被卷入宫廷阴谋，而且他们的民族文化高度重视忠诚。瓦里亚基人比其他军队更可靠，拜占庭皇帝非常重视这一点。他们可能略显粗野，热衷饮酒，以至于有“皇帝的酒囊”的绰号，但几乎在任何情况下，他们都是可以信赖的。

北欧诸神和基督教在北欧的传播

北欧人与他们的神关系密切，仿佛是家人。北欧诸神并不是遥远而可怕的存在，他们离人类非常近。尽管北欧人的神一般强大且受人尊敬，但如果有人觉得神让他失望了，他就可以责骂神。一个

人可能会对一个神发表长篇大论，要求帮助，并威胁说如果他的行动没有成功，他将不再崇拜这个神。



“诸神黄昏”之战，北欧大多数神在从怪物与巨人手中拯救残存的世界时死去。

北欧的万神殿非常复杂，它由两组神组成——埃斯尔和凡尼尔（the Aesir amd the Vanir），分别代表战争和丰饶。他们的敌人是巨人，北欧诸神推翻了巨人，成为世界的统治者。北欧诸神与巨人的冲突在所谓的“诸神黄昏”大战中结束，大多数神丧生于此战。最优秀的人类战士死后，其灵魂会在英灵神殿和弗尔克范格（Fólkvangr）的大厅里度过漫长的岁月，他们享用盛宴，为战斗做准备。

忠诚

对北欧战士来说，忠诚和尊重是相辅相成的。首领会给战士送礼物，为他们摆设筵席，待他们以尊重。作为回报，战士会对首领忠诚。若一个首领轻视战士，或者认为战士的忠诚是理所当

然的，那他很容易被发现。战士们也会放弃他而去选择更好的首领。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情况也发生了变化。北欧土地上出现了王国，军事组织的个人色彩愈发淡薄，但直率的忠诚和首领与战士相互尊重的传统仍然是北欧文化的重要特征。

“诸神黄昏”带来了巨大的破坏，无数凡人和神被杀，甚至世界本身也尽数崩坏。然而，这也是一个重生的时刻，战后世界建立起新的秩序，幸存者过上了富足的生活。在北欧宗教和哲学理念中，一切事物，包括神，都必定有一个结局。短暂但辉煌的生命胜过漫长而平凡的一生，给别人留下深刻的记忆，比一切其他事物都更为重要。

北欧诸神在社会中都承担了特定的职位，而且大多数都身兼多职。所以，诸神之父奥丁（Odin），是一个智慧且狡猾的国王，同时也是一个可以表演魔术的神秘人。托尔（Thor）最主要的身份是一位战士，但农民也很尊敬他，因为他带来了雨水。

北欧人通过商队贸易接触到基督教。传教士到达他们家乡时，他们并没有什么反应。而且，许多北欧人非常愿意承认基督教的神，他们已经有很多神了，再多一个也不会带来什么问题。考古学家发现过既可以铸造基督教十字架又可以铸造锤子的模具，锤子是北欧雷神托尔的象征。这表明北欧人可以容忍基督徒，宗教物品是存在的；或者还可以证明许多北欧人除了信奉他们自己的神，也崇拜基督教的上帝。



奥丁是一个复杂的神。他是一个可怕的战士，也是一个狡猾的国王，同时也是智慧的化身，还会施魔法。他有一匹名叫斯莱普尼尔的马，有八条腿，这匹马可以在各个世界之间奔跑。

早期的传教士可能被这种态度激怒了。他们认为北欧人应该放弃他们的旧神，皈依基督教，而不是接受并吸收新的神作为他们万神殿的一员。尽管某些修道院的文献可能会提到狂热和神圣的传教士改变了北欧异教徒信仰的事，但基督教在北欧的传播很可能是断

断续续的，而且完全没有达到传教士的期望。在有基督徒的地方，北欧人似乎接受了他们宗教的一些元素，但是并没有一个明确的大规模皈依基督教的时刻，而且北欧人也没有彻底抛弃他们的宗教。

最终，北欧诸王国变成了基督教王国。传教士更多的是说服人们相信基督教是他们唯一的宗教，而不是让他们接受它。似乎北欧人并没有欣然接受一神论的思想，经过很长一段时间，他们才变成“正统”基督徒。

政治需要是统治者转变信仰的一个原因，统治者信仰的转变又促使普通民众皈依基督教。当北欧王国变得更像欧洲诸国，并开始参与国际政治而不是一味掠夺时，与他们结盟便成为可能。对欧洲王国来说，同为基督徒的人比异教的野蛮人更适合做合作伙伴。这在民众层面同样适用。如果北欧商人是文明的基督徒，那他们就更容易被异国顾客接受。所以那些接受了基督教服饰的人通常在事业上更成功。最重要的是，北欧人是一个务实且信奉机会主义的民族。他们发起突袭或进行贸易，或者待在家里和农场里，这取决于什么能带来最高的回报。他们似乎以同样的方式对待宗教。不管当时的基督教史学家怎么想，洗劫修道院与信仰毫无关联。同样，他们接受基督教也出于务实的考虑。新宗教提供了机会，有优势，因此比旧宗教更可取。



符文石是在基督教传入斯堪的纳维亚前后创造的。这块符文石是“蓝牙王”在10世纪中后期命人创作的，上面刻的是基督的图像。

早期海上探险

任何海上航行都充满了风险，哪怕是沿着海岸到附近一个熟悉的地方。然而，北欧人在开放海域上冒险时，几乎没有任何应对天气变化的保护措施，只有最基本的帆。即使这条航线已经走过，由于洋流和变幻莫测的风向，实际到达的地点也有多种可能。一艘打算穿过北海驶向诺森布里亚海岸的船，实际上可能在东盎格利亚或苏格兰南部登陆。在这类航行中，没有复杂的导航设备，甚至没有好的航海图，水手只能朝着大致正确的方向前进，并希望一旦发现陆地便能识别出相应的地标。

北欧人在开放海域上冒险时，几乎没有任何应对天气变化的保护措施，只有最基本的帆。



北欧船只经常在船头雕刻龙头。除了龙，还有其他造型，包括蛇。但是考古学家并没有发现这种“龙船”的相关遗存。

穿越更广阔的水域更是一大挑战，早期前往大西洋的探险者甚至无法确定前方是否有陆地。很多时候，他们必须决定是继续前进，希望在补给品耗尽之前找到陆地；还是掉头返回，期盼到达一个对他们友好的海岸。毫无疑问，许多船只就是这样失踪的，而伟大的发现在很大程度上是偶然的。

北欧人知道不列颠群岛的存在，他们可以很容易地到达那里。先是沿着欧洲北部海岸航行，然后再转弯穿过狭窄的海峡就可以。只要船通过不列颠海岸，挪威西海岸的船员就相当确信他们可以向西航行到达不列颠。然而，这不是怯懦者可以胜任的航行。对于许多早期的水手来说，出发前看陆地的最后一眼，是非常令人心酸的。



北欧人把符文石留在他们定居的地方，符文石上通常刻着神话故事或英雄事迹。图中这块符文石是在马恩岛发现的。

沿着海岸航行，可以到达其他地区。环绕苏格兰航行可以到达爱尔兰和马恩岛，沿着欧洲海岸线可以进入地中海。北欧贸易船和突袭者会进入地中海，在那里待一段时间，然后再长途中转回家。他们通常让船只在夜里靠岸，但仍需要小心——如果被发现的话，当地人可能对他们不太友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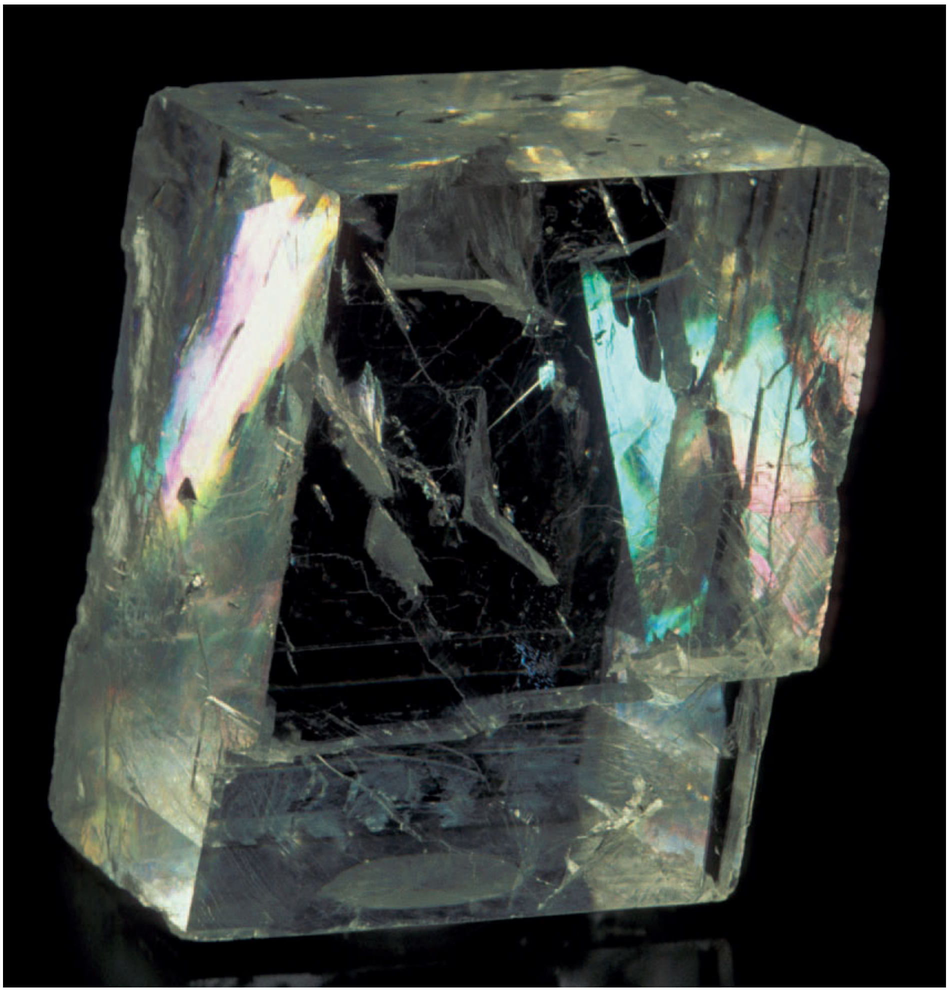
从熟悉的地方驶向茫茫大海，地平线是完全未知的。不过北欧探险队在825年左右发现了法罗群岛，并在那里建立了殖民地。有人认为，当北欧人到达时，这些岛屿已经有人居住了，他们可能是从奥克尼群岛或设得兰群岛（the Shetlands）过来的。爱尔兰修士迪克伊的著作中提到了从不列颠向北航行到达的岛屿，还记录了第一批登陆冰岛的北欧探险者是如何在那里发现一个爱尔兰修士团的。

因此，早期的北欧探险者可能十分确信，穿过未知的海域可以找到陆地。然而，在浩瀚的大海中，像法罗群岛这样的岛群不过是一个小目标，船被风或潮汐推离航线就很可能彻底错过它们。很明显，冰岛就是这样被发现的，水手们原本是向法罗群岛进发。随着岛上居民的增加，他们与大陆之间的交流加强了，导航精度也提高了，尽管只是基于经验法则——水手们了解了当地的洋流和天气模式。



时至今日，在北欧人的一些定居点，先人遗风尚存。在法罗群岛的克威威克，人们可以看到一千多年前北欧人生活的遗迹。

北欧人可能使用天然的极化材料来辅助导航。这些被称为太阳石的晶体，即使在阴天也可以指示太阳的位置，从而对航线进行估算。在北欧传说中提到过这些材料，而且存在一些可能是使用痕迹的证据。当然，这个理论是合理的——一些动物和鸟类能够看到阳光的偏振并将其用于确定方向。



冰洲石是一种可以使光极化的方解石。这可能就是一些传说中提到的帮助在开放水域航行的“太阳石”。

北欧王国海上探险的收获

人口向岛外迁移，一定程度上是机会主义驱使的——在其他人到达这些岛屿之前，早到的人可以拥有一些好的土地。此外，政治压力也是一个原因。到8世纪后期，北欧大陆上已经出现了一个个大的王国，然而并不是每个人都喜欢这样的王国。有些人宁愿更加独立，另一些人则试图远离他们的敌人。因此，设得兰群岛、奥克尼群岛和法罗群岛这些新发现的岛屿对他们就具有了某种吸引力。居住在小的岛屿上，对本质上是海洋民族的北欧人也很有吸引力。

发现冰岛后，出现了类似人口迁移的行为，新一波移民紧随着探险者的脚步到来了。《冰岛人之书》记载，到930年，所有的好土地都被占领了，尽管在这之后人口迁移仍在继续。随着时间推移，冰岛逐渐发展成一个独立的国家，它摒弃了君主制，转而实行一种更加民主的制度——阿尔庭[(4)]。冰岛作为一个政治实体，置身于欧洲事务之外。不过仍有寻找机遇的人在两地往返。他们通常用一年时间航行到冰岛，第二年返回。因此贸易探险需要付出很大的努力。然而，只要知道那里确有陆地，对勇敢的北欧水手来说，横渡危险的挪威海就是家常便饭。



从930年到18世纪末，每年都会在辛格韦德利召开国家议会阿尔庭。1928年，辛格韦德利成为国家公园，以保护其独特的文化遗产和当地的野生动物。

格陵兰岛可能是这样发现的。人们假设，如果从挪威向西航行能发现陆地，那么在冰岛的西部一定有更多的陆地。这一点在930年左右得到了证实，当时冰岛水手被一场风暴吹到了西方很远的地

方，他们说看到了陆地。然而，直到980年才进一步研究这个发现。在挪威已经被放逐的“红发”埃里克，因犯罪又被流放到冰岛3年。他一路向西探索，一直到达可以安全返回的最远的地方。他还研究了格陵兰的海岸。

“红发”埃里克登陆格陵兰岛时，那里的气候比现在暖和。格陵兰岛适宜居住，至少在有遮挡的地方是这样，埃里克在那里建立了一个殖民地。他的新家园缺乏造船用的木材，需要一个比斯堪的纳维亚和苏格兰更近的木材来源。986年，又有一名北欧水手——这次是前往格陵兰岛——途中被吹离航线，然后见到了陆地。格陵兰殖民地刚建立起来，“红发”埃里克的一个儿子列夫·埃里克松（Leif Eriksson）就带领一支探险队展开了更深入的探查。



矗立在格陵兰岛卡西亚苏克村的埃里克·瑟瓦尔德松——人们更习惯用“红发”埃里克来称呼他——的雕像。在埃里克的时代，这个村庄的名字是布拉塔利德。

列夫·埃里克松可能是在巴芬岛（Baffin Island）首次登陆美洲的，他并没有被那里的自然资源吸引。但在更深入的探险和与当地人的贸易中，巴芬岛确实成了一个登陆点。探险队继续深入，发现了拉布拉多海岸，那里有大量的木材。他们在美洲海岸外的一

个岛上度过了冬天。这座岛可能是纽芬兰，北欧人在1001—1002年的冬天住在这里。



列夫·埃里克松的船员是第一批在远处看到北美洲的欧洲人。不久之后，他们成为第一批踏上美洲的人。他们很可能在巴芬岛登陆，但是从未去过美洲大陆。

1009年或1010年，“红发”埃里克的女婿索尔芬·卡尔塞夫尼（Thorfinn Karlsefni）率领一支探险队到新领地上建立殖民地，占领了列夫·埃里克松的要塞营地。他带了65名追随者，其中5名是女性。北欧人在美洲的殖民是短暂的，殖民地在3年后就被遗弃了。在这期间，索尔芬的儿子斯诺里（Snorri）出生了，他是几个世纪以来唯一在美洲出生的欧洲人。

北欧人在美洲的殖民是短暂的，殖民地在3年后就被遗弃了。但在那期间，一个孩子出生了。

北欧人与当地人发生了冲突，他们称当地人为斯克瑞林人（Skraelings，“贱民”之意）。他们在贸易中欺骗斯克瑞林人，并虐待他们，还自信地认为凭借他们的武装营地和欧洲武器将不惧对方的报复。然而，北欧人的定居点被当地人围攻，这处殖民地无法维持，因此不得不遗弃。

1015年以后，已经没有北欧人生活在美洲了，尽管他们可能仍与那些没有完全断绝往来的美洲部落保持贸易联系。随着气候变冷，在格陵兰岛附近水域航行变得更加困难，格陵兰岛的殖民地没落了。陆地上冰层扩大和海水结冰，导致了殖民地的衰落和最终崩溃。[(5)]但是直到15世纪中期，仍有北欧人居住在格陵兰岛，殖民地彻底终结的日期是未知的。



列夫·埃里克松将他发现的地方命名为“文兰”。从那时起，这个词的含义以及具体位置一直争议不断。

索尔芬·卡尔塞夫尼在纽芬兰的殖民地是北欧人最西端的定居点，也可能是最西端的探险地。有一种说法流传很广，说维京人登陆了美洲大陆，并在那里留下了痕迹。但所有的证据都是不可靠的，或者是蓄意的骗局。尽管如此，维京人登陆北美的传说仍然很

有吸引力——考虑到他们的本性，大约1000年前北欧人驾驶他们的船只沿着圣劳伦斯河航行，是完全有可能的。

登陆不列颠

若是到达一处富饶的地方，北欧人就会定居下来，这种事情最初是很偶然的。北欧人没有像撒克逊人和日耳曼人那样大规模移民，可一旦发现新土地，就会有大量移民涌入其中。众所周知，北欧人从840年起就定居在都柏林地区。在政治上，他们最初只是其中的一股势力，后来成为当地主要的政治力量。冲突在这里非常普遍，但在大多数地区都没有敌我分明的情况。在不断变化的政治形势中，北欧人是当地人之外的一个派系，他们可能很容易找到盟友，也很容易找到敌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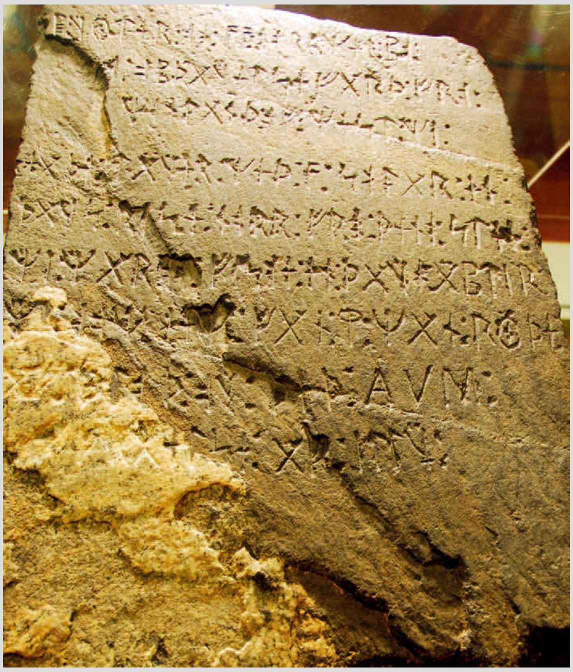
若是到达一处富饶的地方，北欧人就会定居下来，这种事情最初是很偶然的。

862年，罗斯人建立了诺夫哥罗德城，这是俄国北欧王国的开端。四年后，一个北欧王国在约维克（今天的约克）建立。很大程度上，这是诺森布里亚内部的问题。866年，一支庞大的北欧军队在东盎格利亚登陆；同年，诺森布里亚国王奥斯伯特被推翻，他的弟弟艾拉上位。在东盎格利亚度过冬天后，北欧人进入现在的约克郡，击败了国王艾拉。他们用可怕的方式处死了国王，又任命了一个傀儡国王，然后离开这里，踏上新的征途。

肯辛顿符文石

1898年，在明尼苏达州的肯辛顿发现了一块刻有符文的石头。这似乎证明了北欧人确实探索过这一地区，并可能在那里定

居了一段时间。这里还发现了其他人工制品，但无一例外，这些发现都是骗局。并没有北欧人在美洲定居的确凿证据。



当时发现肯辛顿符文石引起了不小的轰动，语言差异使得人们对此进行深入调查，然后发现这是一场骗局。



约克郡的约维克博物馆中有一个经过重建的典型的定居点。与当时的盎格鲁-撒克逊人以及其他民族的村庄相比，这些村庄并没有太大的不同。

当时的史学家把北欧军队称为“异教徒大军”。占领约克郡后，他们进入麦西亚，造成了巨大的破坏，后来又协商撤退到约克。尽管协议约定他们接受东盎格利亚的贡品，不去侵犯它，但869年异教徒大军还是征服了该地区，并进一步出击麦西亚和威塞克斯。最终，在878年的埃丁顿之战中，异教徒大军被威塞克斯的阿尔弗雷德大帝击败。886年签订了一份条约，把英格兰东部从诺森布里亚边界一直延伸到泰晤士河口的地区交由北欧人控制，这就是丹麦区。

挪威统一

斯堪的纳维亚半岛的部落逐渐合并、壮大，各地小王国慢慢形成了一个体系。在这个体系中，各地区酋长效忠于领主，领主对酋长有控制权。860年，在“黑发王”哈夫丹（Halfdan）治下，这个地区开始向统一大王国的方向发展。哈夫丹是“猎人”戈佐尔德（Gudrød）的儿子，他声称继承了父亲的王国，但是他也不得不与同父异母的弟弟奥拉夫争夺王位。哈夫丹的权势逐渐稳固，他通过征服和谈判相结合的方式，把其他小王国置于自己的控制之下。

哈夫丹大约死于870—880年，因为他的马掉进了一个冰冻的湖里。他年仅10岁的儿子哈拉尔德成为国王，年幼的国王成功地保住了父亲的大部分战果。但哈拉尔德后来的军事行动显然是为了赢得一个女孩的芳心。这个女孩就是霍达兰公主，他发誓在征服挪威全境之前不剪头发。他遵守了自己的誓言，在十年征战中被称为“海盗王”哈拉尔德，而且他终于迎娶了霍达兰公主。哈拉尔德后来被称为“金发王”哈拉尔德。

拉格纳·洛德布鲁克

我们对传奇人物拉格纳·洛德布鲁克知之甚少。

传说中，他穿着神奇的裤子（因“多毛的裤子”得名），这样可以保护他，使其免受被自己杀死的龙的龙焰伤害。后来，他被诺森布里亚国王艾拉俘虏并处死，拉格纳的儿子们征服了诺森布里亚，又杀死了艾拉。



《弗莱特岛记》记载了许多传说，包括“金发王”哈拉尔德的故事，说他释放了巨人多弗里。手稿中还包括奥克尼岛和法罗岛居民的历史，以及格陵兰殖民地的历史等内容。

并非所有人都乐意看到哈拉尔德统一挪威。在他统治期间，不时发生叛乱和外敌袭击，这些敌人在偏远的峡湾和苏格兰建立了基地。890年，哈拉尔德在如今的斯塔万格（Stavanger）附近击败了敌人的联军，巩固了他对王国的控制。哈拉尔德以前的许多对手以及那些不想被他统治的人，都迁到了新的地方。这加快了他对其他地方扩张和殖民的步伐。哈拉尔德死后，他的儿子埃里克继承了王位。埃里克的早期活动是真正的维京式突袭和劫掠，他不是一个温和的统治者。对于埃里克，人们更熟悉的是他的绰号“血斧王”，他的很多事迹都来源于不太真实的传说。为了巩固自己的统治，他似乎杀掉了自己的兄弟，不过他的统治后来被幸存的兄弟哈康推翻。



埃里克·哈拉尔德松，人们更熟悉的是他的绰号“血斧王”。他曾经是挪威的国王，而且两次成为诺森布里亚的国王。他传奇而丰富的一生体现了北欧人的冒险精神。

丹麦人或北欧人？

当时许多史学家把所有斯堪的纳维亚人都称为“丹麦人”，有时候这是不准确的。

通常意义上的北欧人还包括瑞典和挪威的居民，以及都柏林或冰岛等地北欧血统的人。当时的著作中提到的“丹麦人”几乎都可以用“北欧人”代替。

被赶下王位的埃里克一度重操旧业，成为海上突袭者。他到诺森布里亚碰运气，似乎英格兰国王埃塞尔斯坦将他送上了诺森布里亚王位，希望他在这里建立一个缓冲地带，以抵御其他北欧人和苏格兰人。但是，这个策略并没有成功。埃里克两次被赶出诺森布里亚，他的统治时间是947—948年和952—954年。他在954年的斯坦摩尔之战中被杀，这也结束了在诺森布里亚时断时续的北欧王国。

---

(1) 《埃吉尔萨迦》（Egil’s Saga）是10世纪久负盛名的六部北欧史诗中的一部，相当于古希腊的《伊利亚特》《奥德赛》。它讲述了一位中世纪战争诗人经历的许多维京式历险故事。在许多欧洲语言中，“萨迦”已成为一个标准名词，用来指中世纪冰岛或者挪威的英雄故事，或者指讲述一个家庭一代人以上重大事件的长篇记叙作品。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著名的北欧文学专家石琴娥研究员曾说：“冰岛萨迦是欧洲中古年代独秀一枝的文学瑰宝。”——译者注

(2) 俄罗斯历史上只有两个王朝。第一个是9世纪留里克建立的留里克王朝，1598年伊凡四世（雷帝）的儿子费多尔去世后，因为没有子嗣，统治俄国700多年的留里克王朝从此覆亡。经过数年混乱，又建立了与之存在血缘关系的第二个王朝——罗曼诺夫王朝，该王朝在1917年被二月革命推翻。——译者注

(3) 也译作“瓦兰吉亚人”，俄国历史上对诺曼人的称呼。8世纪，他们出现在东欧平原，经常抢劫财物，还掳掠人口为奴，并将之贩卖给拜占庭帝国。他们在征服东斯拉夫人后建立俄罗斯历史上的第一个封建王朝留里克王朝。——译者注

(4) 冰岛议会，每年夏天在辛格韦德利的野外开会，持续了10个世纪。参加议会的是36个地方首领，冰岛事务主要由他们来决断。他们依据的是不成文的法律，智者的声音能够起很大的作用，民众的呼声却不那么受重视。它比英国议会还早300多年，是世界上最早的议会。——译者注

(5) 维京人自身的生产和建设水平并不怎么高，因此，他们离开自己的家园去探寻的，更多是富裕的场所而不是土地肥沃、资源丰富的地方。于他们而言，这才具有掠夺的价值。从这个角度说，美洲大陆对他们的吸

引力就不如英格兰和爱尔兰那些富裕的修道院。此外，当时维京人武力不够，其武器的优势远不能和航海大发现时代的欧洲人相媲美。正是这些原因，使得维京人虽然很早就发现了美洲大陆，但却没有开发、建设这块新大陆，而是长时间地在英格兰等地展开掠夺。——译者注

第6章
黑暗渐去，封建王国出现

黑暗时代的最后200年，强大的封建王国出现了。这些王国将决定欧洲未来几个世纪的命运。其中最伟大的是法兰克王国，在其基础上，最终产生了法国、意大利和德国。

768年丕平三世死后，按照当时的习俗，他的儿子们瓜分了法兰克王国。3年后，丕平的长子卡洛曼去世，他的弟弟查尔斯——就是历史上大名鼎鼎的查理曼——成为法兰克唯一的统治者。



任何一座靠近河流的城市都有被北欧人攻击的危险，但北欧人在885年对巴黎的袭击是不同寻常的。因为这一次是围攻而不是突袭。

当时，查理曼与一位伦巴第公主成婚，公主的名字很可能是格佩加（Geperga）[(1)]。联姻使得他与意大利北部的伦巴第人结成联盟，但教皇对此并不满意。卡洛曼死后，查理曼成为统一的法兰克王国国王，但他的地位很不稳定。为了巩固自己的王位，他把格佩

加送回家，又娶了一位法兰克贵族女子。这一定程度上让伦巴第王国不满，于是伦巴第国王德西迪里厄斯决定为卡洛曼的遗孀和年幼的儿子提供庇护。



丕平三世遵循法兰克人的做法，把自己的领地分给儿子们，而不是把它完整地传给唯一的继承人。这种权力的细分削弱了王国，并且容易引起冲突。

772年，德西迪里厄斯和教皇发生争端，这给查理曼入侵和征服伦巴第提供了借口。此后，伦巴第王国成为法兰克人的领地，伦巴第的铁王冠成为后来神圣罗马帝国王权的一部分。此时距离神圣罗马帝国建立还有几年时间，查理曼正面临来自西方的反对。于是，查理曼对撒克逊人和他们的盟友弗里斯兰人（Frisians）出兵，接下来的30年里，他扩大了法兰克的疆域。

查理曼并不是一个仁慈的征服者，他对异教徒和那些不接受基督教信仰的人尤为严酷。这样做也许教皇是非常满意的，但却激起

了被征服者的恐惧和仇恨。他的征战并非一帆风顺。778年，应半独立城市萨拉戈萨的援助请求，查理曼进军伊比利亚。这场战争以查理曼的失败告终，失败的主要原因是萨拉戈萨改变了想法，不再向往法兰克式的统治。为防止来自伊比利亚的威胁扩大，查理曼允许他的儿子路易统治阿基坦。阿基坦位于现在的西班牙北部，路易通过一系列的战争，在此建起了法兰克人的据点。

随着西南边境形势的缓和，查理曼再次将注意力转向东部。他吞并了巴伐利亚，打败了衰落的阿瓦尔王国。而单靠武力不可能捍卫如此庞大的帝国，因为查理曼有效地平衡了各方势力。他与教皇保持良好的关系，这大有益处；与遥远的强国，如拜占庭皇帝和阿拔斯王朝哈里发，也保持联系；查理曼还插手英格兰王国的事务，尽管他与麦西亚奥法王[2]的关系并不好。



赢得胜利的法兰克人将原先伦巴第的领土献给教皇。这引发了伦巴第人的抗议，法兰克人与伦巴第人之间的关系 恶化。这又导致了另一次法兰克征

服——这次是由查理曼发起的。

查理曼统治下的法兰克帝国被划分成几个郡，每个郡由一位伯爵统治，他们管理领地并从中获利。这些伯爵大都是支持查理曼的贵族家族成员。他们一直支持查理曼，这对家族非常有利。这一时期，宗教人员在世俗权力中获得了豁免权。这种制度在查理曼去世后的很长一段时间仍然有效。

查理曼的统治是封建制度的开端，在接下来的几个世纪里，封建制度将主导欧洲。王室根据自己的喜好任命官员，支持王室的人可以享受高官厚禄。此时，经济措施促进了繁荣，如统一度量衡，并强制执行。经济的繁荣和强大，又促进了人们对经济政策的支持，从而增强了政权的稳定性。

799年，教皇利奥三世受到对手攻击，前来寻求查理曼大帝的庇护。于是，法兰克人出兵援助教皇，助他打败了对手，维护了自己的权威。这使得欧洲政治中出现了一个新角色——教会的军事保护者和教皇意志的执行者。

神圣罗马帝国皇帝

800年的圣诞节，教皇利奥三世为查理曼加冕，他成为“罗马人的皇帝”。此处的“罗马人”不是指罗马、意大利或早已消失的罗马帝国公民，而是罗马古典文明的继承者。“罗马人”本质上是欧洲的文明人，而查理曼是他们的皇帝——至少教皇利奥三世是这么认为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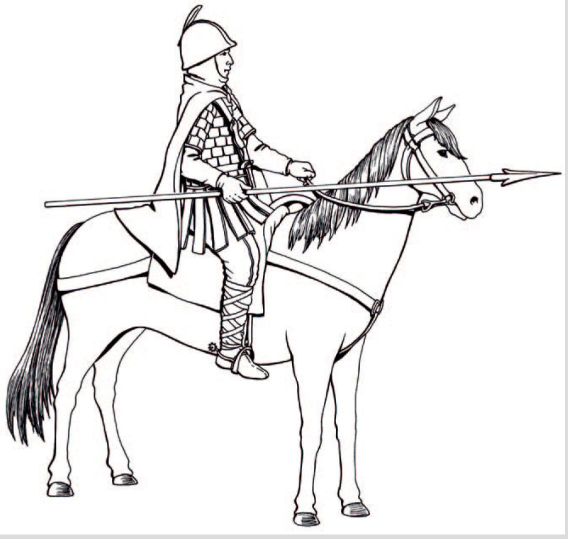
这次加冕授权查理曼可以对抗教皇的敌人，并确立了他作为整个基督教世界守护者的地位。然而，这并不意味着神圣罗马帝国突然在整个欧洲建立起来了。两年后，查理曼才开始自称“统治罗马

帝国的皇帝”。但是他似乎一直认为自己是法兰克国王，而非另一个更伟大的身份。

13世纪，人们才开始使用“神圣罗马帝国”这个名字。不过由一个强大的君主主持欧洲基督教事务的想法早已确立。814年查理曼去世，他的儿子“虔诚者”路易继承了王位。尽管路易遵循法兰克人的做法，将王国分给了儿子们，但他似乎自视为基督徒的皇帝。

加洛林战士

当时的文献记载，查理曼及其率领的加洛林战士全身披覆铁甲，但实际上我们很难获得加洛林战士装备的确切资料。关于他们的描述，有很多非常明显的时代错误，他们要么使用罗马风格的装备，要么穿戴再过500年都未出现的盔甲。很有可能，普通战士配备长矛和盾牌，也许还戴着头盔，但身体部位没有盔甲。精锐部队身穿高品质的锁子甲，长及大腿，他们手持长矛和剑，骑在马上作战。



加洛林王朝的骑兵形象。他们通常身穿鳞甲或锁子甲，头戴金属头盔。

路易的儿子们麻烦不断。他们时而合作，时而彼此争斗，最后联合起来反对自己的父亲。833年，路易被迫退位，但第二年他又复位。和解之后，路易的儿子洛泰尔（Lothair）加冕，成为法兰克传统的联合统治者。洛泰尔继承了他父亲的王位，但在那个时代，划分王国是法兰克人传统的统治方式。尽管有过短暂的统一，900年，加洛林王朝还是解体了。

在其内部政治形势和统治者的谋划之下，法兰克王国一直是分裂的。这样他们就不能团结一致抵抗北欧突袭者。后来的加洛林王朝统治者缺乏查理曼的才能和气魄，王国持续衰落。最终，卡佩（Capet）家族在987年登上了法兰克国王的宝座。尽管如此，他们的王国——在一系列新国王的统治下——在整个中世纪乃至更久以后，仍然存在。

北欧突袭者的转变

在加洛林王朝鼎盛时期，即使遇到非常强大的北欧人攻击，欧洲北部海岸也是相对安全的。在东部，查理曼跟留在欧洲大陆的撒克逊人打得如火如荼，因此他在面对北部的邻居时就急需援手。不过直到查理曼死后，北欧人的突袭才给法兰克王国造成严重困扰。

从820年开始，大量的北欧勇士沿着法兰克北部的河流，尤其是塞纳河，向法兰克的主要城市发起进攻。最初的突袭有13艘船，虽然被击退，但其他船只紧随其后。“虔诚者”路易的儿子们为争夺父亲的王国而征战不休，法兰克王国内部危机四伏。841年，北欧人发动了一场大规模的突袭，洗劫了鲁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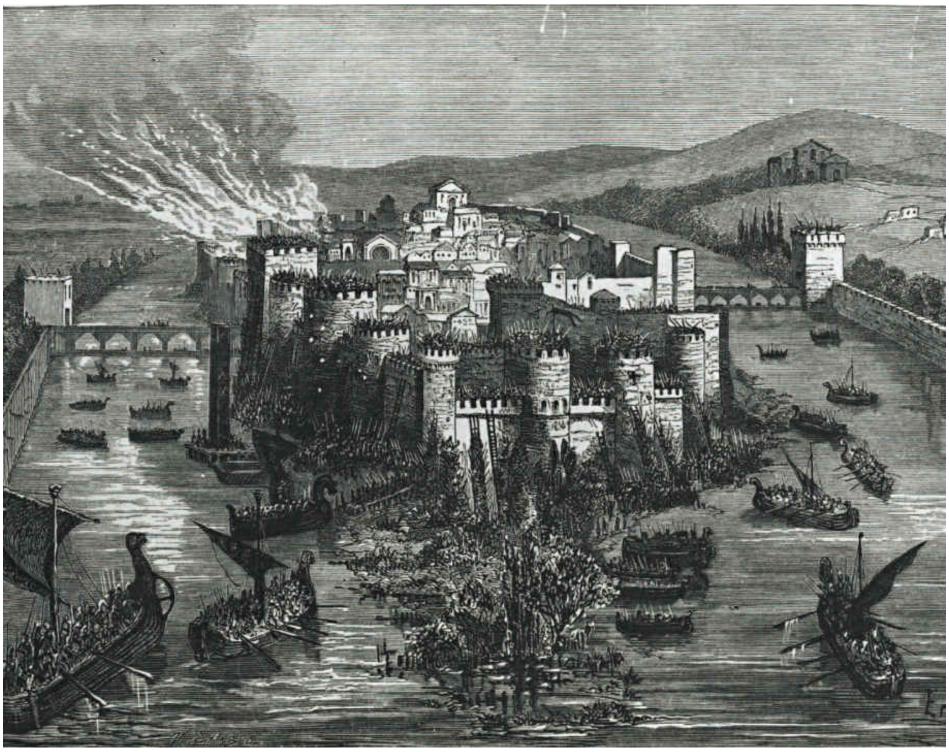
845年，尽管巴黎采取了防御措施，比如加固桥梁、建造河堡，但仍然遭到围攻。北欧人组织了一支120艘船的军队向塞纳河上游推进，途中遇到了“秃头”查理（查理二世）军队的阻击。法兰克人的兵力被河流分为两部分，北欧人集中力量先击败其中一部分，然后再向巴黎进军。到达巴黎后，北欧人发现大部分居民已经逃走，而且他们认为撤退时可能会受到“秃头”查理军队的攻击，处境不妙。但是，查理觉得巴黎被围困一事无法通过军事手段强行解决，于是他转而贿赂北欧人，让他们离开。

这是丹麦金的另一个例子，统治者付钱让北欧人离开他的领地。这正合北欧人的心意，因为他们可以腾出手去突袭别的地方，或者向这些地方勒索财物。勒索丹麦金，以及控制其追随者让他们以自己的行为为荣，这取决于北欧社会性质的转变。一个世纪以前，北欧四分五裂的部族和小王国不可能进行这种大规模的敲诈勒索——尤其是他们没有足够强大的领导者，可以阻止其他人来袭击他们锁定的目标。

851年，北欧人开始对法兰克王国进行又一次大规模的入侵。他们占领了鲁昂，将它作为下一步行动的基地。北欧人占领了修道院，但他们并没有抢掠和摧毁修道院，而是以此要挟法兰克国王，向他勒索更多的财物。事实证明，利用北欧人来对付北欧突袭是最有效的。从860年开始，“秃头”查理雇用了一批北欧人来保卫法兰克的河流，使其免受袭击。这对其他地方的人来说是不幸的——可能因为异教徒大军在法兰克王国讨不到好处，所以他们转向东盎格利亚并最终到达英格兰。



“虔诚者”路易并不是他父亲那样的皇帝。在查理曼与外部敌人进行战争并建立帝国的地方，路易在与他的儿子们作战，并努力保持不败。



巴黎的防御策略很糟糕，所以一支很可能由拉格纳·洛德布鲁克率领的北欧军队有机会围攻它。围城后，除了掠夺，北欧人还勒索了一大笔财物，作为撤离巴黎的回报。

876年，一支由100艘船组成的北欧舰队再次占领鲁昂。这支舰队造成了巨大的破坏，“秃头”查理只好又花了一大笔钱来摆脱他们。“秃头”查理在第二年去世，王位最终传给了“胖子”查理，但他的心思却在其他地方。所以，另一支北欧军队在886年进攻巴黎时，保卫这座城市的重任落在了厄德（Odo，是他名字的日耳曼写法，也叫埃德斯伯爵）伯爵身上。他打算依靠一座设防严密的桥来阻止敌人入城。守军成功地击败了北欧人的第一次进攻，但无法阻止他们围城。

最终，“胖子”查理帮巴黎解了围，他按照惯例贿赂北欧人，让他们去别的地方。不过，他还有其他的想法。他没有直接回去，而是花钱让北欧人进攻勃艮 第。这也许是一种巧妙的治国策略，让

现时的敌人对抗潜在的敌人。但这并不能阻止“胖子”查理的统治被推翻，最后厄德登上王位。

厄德死后，王位传给了“糊涂”查理。他要面对一个难题——北欧人逐渐在北部沿海地区站稳脚跟。事实证明，驱逐他们是不可能的，所以查理决定招募他们。911年，查理将沿海岸的一片狭长土地划给一个名叫罗洛的北欧人首领，他很可能参与了围攻巴黎之战，这就是诺曼底和它的法属北欧居民诺曼人。



查理二世在位时，王国内外交困。他被北欧人的突袭、不可靠的封臣 以及与兄弟日耳曼人路易的冲突等问题困扰，查理只好向他的敌人交付财物，以换取和平。



厄德伯爵在885—886年领导了一场成功的巴黎保卫战。后来他被选为法兰克国王，不过有很多人不接受。

罗洛成了一名基督徒，至少在官方层面，他成为诺曼底的统治者时，取了“罗伯特”这个名字。虽然与“糊涂”查理有协议，但他依然在其他地方进行突袭。在罗洛活着的时候，诺曼人可能没什么变化。但随着时间的推移，法兰克人的影响逐渐显现。一个世纪后，诺曼人已经变得更像法兰克人而不是北欧人了。

随着时间的推移，法兰克人的影响逐渐显现。一个世纪后，诺曼人已经变得更像法兰克人而不是北欧人了。



911年，罗洛在成为诺曼底公爵一年后接受洗礼。这是崇尚机会主义的北欧突袭者开始转变的标志。

伦敦桥要倒了

有人认为，《伦敦桥要倒了》这首歌起源于一次战事。当时人们尝试加固一座桥来抵抗北欧人袭击，但后来这座桥被北欧舰队摧毁了。

据说，北欧人在桥上系上绳子，然后大批乘坐长船战士猛力划船，将桥倾覆。不过，这个故事基本是没有依据的。

斯堪的纳维亚王国

与800年相比，950年的北欧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宗教信仰的变化和大的王国出现，改变了北欧的社会性质。此时，北欧人可以组建异教徒大军那样的大型军队了。但另一方面，北欧人正在失去他们原有的特性。800年，他们是进行海上冒险的野蛮人；但到了950年，他们建立了早期的中世纪王国，其政治与其他文明国度相似。

此时“血斧王”埃里克被同父异母的兄弟挪威国王哈康一世废黜，埃里克的儿子与哈康时有冲突，哈康在961年受伤死去。继承其王位的是埃里克的儿子“灰袍王”哈拉尔德。当时，丹麦由“蓝牙王”哈拉尔德统治，他支持灰袍王控制其日渐缩小的王国。这使得灰袍王能够东山再起，从丹麦国王的影响中挣脱出来。

蓝牙王后来又支持灰袍王的对手之一哈康·西古德松，他是哈康一世的儿子。哈康·西古德松暗杀了灰袍王，成为挪威国王，称哈康伯爵。作为对蓝牙王支持的回报，哈康伯爵将自己置于从属地位，使蓝牙王成为统一的斯堪的纳维亚半岛的国王。蓝牙王在960年左右皈依基督教，使斯堪的纳维亚至少在名义上融入基督教世界。他统治挪威的时间很短，974年战败后，他的权力大大减弱。986年左右，他被儿子斯汶·福克比尔德（即斯汶一世）废黜。



961年，挪威国王哈康一世在菲恰尔岛的战斗中受到致命伤害。他在位时多次与“血斧王”埃里克的儿子们发生冲突，包括“灰袍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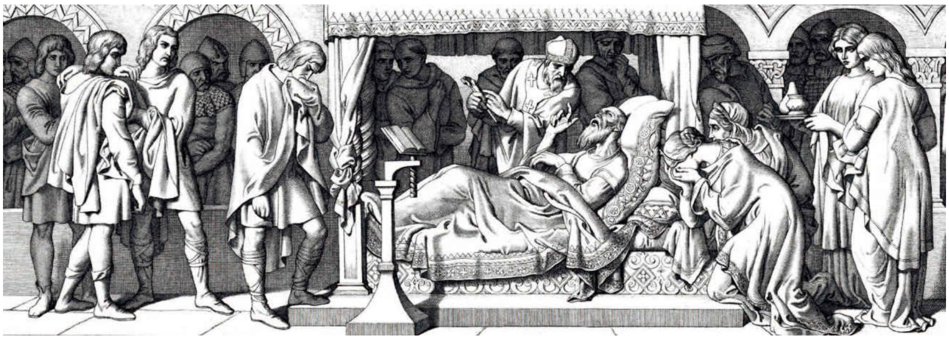
斯汶一世通过对英格兰发动攻击然后收取丹麦金的方式，增加了王国的财富，同时也加强了他对挪威的控制。1013年，他再次入侵英格兰，打败“仓促王”埃塞尔雷德二世，并短暂地成为英格兰的国王。他在加冕前几周去世，死后局势混乱。后来，他的儿子们

成为各自王国的王，其中一个儿子哈拉尔德加冕为丹麦国王，另一个儿子克努特加冕为英格兰国王。



最初，为了给王国提供财富，斯汶一世袭击了英格兰。这使得埃塞尔雷德二世下令屠杀居住在英格兰的丹麦人。斯汶发誓要报仇，他率军重返英格兰。有些地方屈服了，但他们在伦敦遭遇了激烈的抵抗。

克努特的两个儿子“飞毛腿”哈罗德和哈德克努特先后继承了英格兰王位，此后统治权又回到了“仓促王”埃塞尔雷德二世手中。后来，“虔诚者”爱德华（也就是众所周知的“忏悔者”）登上了英格兰的王位。爱德华没有孩子，也没有明确的继承人。于是，在他1066年去世后，引发了政治动乱。



“忏悔者”爱德华之死。当时并没有明确的继承规则，他去世后引发了一场争夺英格兰统治权的三方斗争。诺曼人胜利了，这标志着以北欧和盎格鲁-撒克逊势力为代表的旧秩序结束了，一个新的时代即将开始。

封建主义出现

封建制度起源于早期部落社会所建立的忠诚等级制度。从理论上讲，一个社会阶层对它的上层和下层都负有义务。社会上层大多是武士，武士阶层下面是工匠和商人，劳动人民则处在社会底层。贵族和国王拥有几乎不可撼动的权力，只有叛乱以及与同样强大的贵族的冲突能够威胁他们。

这个时候，马是社会地位的主要象征之一。许多表示“贵族”的词，如武士或骑士，都源于拥有马匹，但当时骑士精神尚未出现。这个时代的“骑士精神”不过意味着拥有一匹马，不过这也包含了对封建制度的期望。骑马战士地位的尊崇，人们期待他们是勇敢、可靠和忠诚的。这些因素最终发展为中世纪的骑士精神。

许多表示“贵族”的词，如武士或骑士，都源于拥有马匹，但当时骑士精神尚未出现。



封建主义产生于不太正式的部落等级制度。在封建社会中，各个阶层界限明确。虽然中世纪王国的起源逐渐被仪式和传统文化掩盖起来，但是这些王国是靠武力建立起来的，而非任何贵族遗产或神圣的权利。

封建制度下的武士阶层，同时也是小块面积领土的统治者，这样可以减轻供养军队的负担。理论上讲，封地的收益足够领主维持

他的各项支出，而领主有义务在上级领主发出命令时为其效劳。有战事需要时，领主会征召人员组成军队，来辅助这一小部分专业战斗员。有些人可能是职业战士，装备不如贵族，但经验丰富，技术娴熟。另一些人则是临时召集起来的，他们可能装备很差，战斗力不高。然而，这是一个军阀和后部落社会的时代。在这个时代里，普通农民或城镇居民也需要参加一些战斗。武器和作战技能在部落社会代代相传，这种传统并没有消失。因此，早期封建军队是介于大迁移时代的部落军队和下个世纪才会出现的中世纪军队之间的一种军事力量。

从北欧人到诺曼人

北欧人首领罗洛接受了“罗伯特”这个名字，并在“糊涂”查理将诺曼底割让给他之后，与法兰克王室联姻。他没有使用“诺曼底公爵”这个名号。事实上，除了名字以外，他并不是一个法兰克贵族。不过，他确实用极大的热情来维护法治。罗洛倾向于用重典，对轻微的违法行为也会施以严厉的惩罚。他还对法兰克法典进行修订，使其更为严格。罗洛时期的法律强调个人责任，以及人们有义务进行高尚的活动。

927年，罗洛退位，不久后去世。他把诺曼底留给了儿子“长剑”威廉。威廉的儿子——诺曼底的理查一世——是第一个使用公爵头衔的人。他统治期间，领地是按照封建制度组织起来的，这套机构此后一直沿用。他的女儿诺曼底的爱玛，嫁给了英格兰国王埃塞尔雷德二世，在他死后，又嫁给克努特。爱玛的儿子爱德华最终继承了克努特的王位，成为英格兰历史上最后一位盎格鲁-撒克逊国王。

长子继承制

对任何王国来说，统治者去世或卸任后，权力的平稳过渡都很重要。在部落社会，就有从几位候选人中选出新国王的传统；或者在现任国王的晚年为继承人加冕，二主共治。这种制度优势明显，它可以让王子在有经验的君主的监护下学习如何治理国家。在盎格鲁-撒克逊时期的英格兰，准国王拥有一个地区的统治权是很平常的事，这可以让他为将来统治一个国家做好准备。



国王在位时为继承人加冕，二主共治。就像查理曼与他的儿子“虔诚者”路易。这样可以消除人们对继承者的疑虑，还能让未来的国王系 统学习 统治事务。

在黑暗时代，许多国家并没有正式的继承制度。现知最早的一套制度是居住在莱茵河附近的萨利安法兰克人[(3)]的长子继承制。他们规定，王位由统治者的长子继承。如果统治者没有儿子，则选择最近的男性亲属——女性即使关系更近也被忽略。如果现任统治者没有后代，就追溯前几代人，找到其家族的次子分支，然后由这一支族人继承王位。只有实在找不到合适的男性候选人的时候，才会考虑女性统治者。

在中世纪，长子继承制或者说萨利安的长子继承制，变得十分普遍。不过，这种严格的继承制度有时候会被打破，或者某位候选人在必要时会让贤。

诺曼底的理查一世死于996年，他年轻的儿子理查二世继位。此时，诺曼底已经深深卷入了法兰克和欧洲的政治风云之中。诺曼底与法兰克的卡佩王朝关系良好，并协助法兰克国王取得了勃艮第公爵领地的控制权。理查二世还为被废黜的英格兰国王埃塞尔雷德和他的儿子们提供庇护。

1026年，理查二世的儿子理查三世继承了王位，他的哥哥罗伯特发动叛乱，理查三世被迫镇压。叛乱结束后不久，理查三世就去世了，他把领地传给了罗伯特。此时，诺曼底正被内部问题困扰，其中一些问题是理查和罗伯特冲突时遗留下来的。另一边，诺曼底的冒险家们正在意大利开拓领地。这是如何开始的说法不一，似乎是诺曼战士在进出“圣地”的途中卷入了意大利政治。十字军东征要在很多年以后才发生，但此时的贵族们非常乐意到耶路撒冷和其他“圣地”朝圣。他们有的是为了赢得教会的青睐，有的是出于真正的虔诚。



诺曼底的威廉一世通常被称为“长剑”威廉，他通过对外征服以及迫使法兰克国王路易四世让步来扩展领地。他与于格大帝联合起来反对法兰克王权，冲突最后以谈判的方式解决，威廉保留了自己的领地。



有时人们将诺曼底的罗伯特公爵称为“伟大的公爵”。但他被指控毒杀了兄弟才获得公爵头衔，这也使得他有了“魔鬼罗伯特”的绰号。

诺曼人对意大利事务的参与度逐渐增加，最终建立了一个西西里的诺曼王国，并在意大利南部有了很大的势力。1035年，诺曼底

的罗伯特一世去世。此时的意大利充满机会，是冒险家的乐园。然而，罗伯特的继任者威廉却在家门口遇到了麻烦。他是私生子，人们对他是否有继承权存在争议，他被迫通过一系列军事行动来巩固自己的权力。直到1047年，威廉的诺曼底公爵爵位才得以安稳。



中世纪早期，统治者宣称他们登上王位是出自神的谕示。此处展示了耶稣基督亲自为诺曼底的罗杰二世加冕的情景。

英格兰的继承危机

英格兰国王“忏悔者”爱德华没有子嗣。一种说法是他非常虔诚，曾发誓要保持独身，但这一点存疑。尽管如此，他还要用其他的方式来解决继承权问题。诺曼底的威廉是一个很好的候选人，他和爱德华是亲戚，他的公国在埃塞尔雷德被废黜后为其提供了庇护。威廉声称爱德华在1051年任命他为继承人，但是其他人质疑这一说法。爱德华的岳父威塞克斯伯爵戈德温权势很大，尽管在1051年被爱德华流放，他还是返回了威塞克斯并要求官复原职。他的女儿伊迪丝（Edith）和爱德华并没有诞下人们所期望的王室继承人，戈德温便野心勃勃地想让他的儿子哈罗德·戈文森登上英格兰王位。

第三个竞争者托斯蒂格是戈德温的小儿子，哈罗德的死敌。托斯蒂格和他的父亲一起被流放，后来和他一起回来，成为诺森布里亚伯爵。他为政苛厉，引发了叛乱，致使他在1065年出逃。托斯蒂格先在诺曼底的威廉处避难，后来又投靠了挪威的哈拉尔德·哈德拉达。他们共同策划了一场对英格兰的入侵，企图让托斯蒂格登上英格兰王位。

“忏悔者”爱德华死于1066年。他可能偏向于让诺曼底公爵威廉做继承人。他对威廉很有好感，还喜欢在宫廷中任用诺曼人，这惹恼了许多英国贵族。不管爱德华的愿望是什么，1066年1月6日，哈罗德·戈文森最终成为英格兰国王。



“忏悔者”爱德华死后，哈罗德·戈文森以近乎不得体的方式草率加冕，成为英格兰国王。一些人认为哈罗德篡夺了王位，而不是出于爱德华的意志继承王位。他在爱德华死后隔天举行加冕礼就是证据。

哈罗德意识到他的统治很不稳固，对于即将到来的危机，他做了力所能及的准备。威廉公爵最早可能在5月入侵，所以哈罗德在英格兰南部集结军队，自己则做好了出逃的准备。与此同时，托斯蒂格和哈拉尔德·哈德拉达开始袭击东部海岸，并于9月在诺森布里亚登陆。他们打败了当地的军队，占领约克，开始建立自己的势力。

对哈罗德·戈文森来说，时间是个大问题。他的大部分战士只能离开农场几个星期或几个月。一个统治者可能关心人民的福祉，也可能不关心，但若是让一支军队在战场上待太久，则会破坏收成甚至引发叛乱。南方的守军因为缺乏补给而被迫撤退，这使得威廉有机会入侵英格兰。对哈罗德来说，唯一可行的策略就是狠狠地打击托斯蒂格，然后对付威廉。

计划的第一部分进展顺利。在约克的斯坦福桥，哈罗德的军队向入侵者发起进攻并大获全胜，哈拉尔德·哈德拉达和托斯蒂格都

被杀死。他们的残军乘船离开，于是哈罗德抽身向南进军，对抗威廉的军队。1066年9月28日，诺曼底的威廉登陆英格兰，此时距哈罗德的胜利仅过去3天。威廉是一个谨慎而务实的统治者和指挥官，如果他的行动威胁到自己的地位，那他就会撤退。他小心翼翼地行军，步步为营，并且保证补给充足。10月14日，他遭遇了哈罗德的军队。

9月份，威廉击败了一支军队，哈罗德的军队在很多方面与这支军队相似。一群拿着长柄斧和大盾牌的职业战士组成核心部队，人数更多但缺少盔甲的长矛兵组成的主体力量为他们提供支持。战斗时他们用盾牌组成一堵墙，这是一支强大的步兵，但缺乏机动性和远程攻击能力。在很大程度上，这是一支属于旧时代的军队。

而另一方面，威廉的军队有步兵、弓箭手和骑兵，能够进行联合作战。尽管如此，威廉对哈罗德防线的首次进攻收效甚微。由于盾墙的良好保护，弓箭几乎没有给战士造成伤亡，而弓箭的供应很快就跟不上了。之前，威廉的对手大部分都有自己的弓箭手，他们会从地面上收集弓箭射回，这样箭就在战场上空来回交替。于是，英格兰人缺乏弓箭手反倒成了一种优势，这样威廉的军队就无法收回他们的箭。这一天的大部分时间里，英格兰人的盾牌都挡住了步兵和骑兵的进攻，但防线最终从内部崩溃。据说，威廉的骑兵假装撤退，把英格兰人从防御阵地上引出来。英格兰人的防御阵形一旦打开，威廉一方就发起了新的冲锋，并且冲破了防线。不过，这很可能并非威廉的计谋。佯装撤退，待对方追击再集结军队反击是很难做到的。更有可能的是，骑兵的进攻被打退了，这个时候非常混乱，骑兵撤退是真实的——至少威廉反击之前是这样。



哈罗德·戈文森战胜了由哈拉尔德·哈德拉达率领的北欧入侵者。这是一次重大的胜利，但它的光芒被几周后黑斯廷斯之战的失败掩盖了。

此外，英格兰军队中的一些人确实破坏了阵形。这个问题被粗暴地解决了，其余人继续战斗，直到哈罗德被杀。他的死亡是有争议的——贝叶挂毯对这件事的描述非常模糊，他是被剑杀死还是被箭射中眼睛而死，或者二者都有，都不重要。重要的是哈罗德确实被杀死了。在一个由首领魅力主导的时代，这样的打击可能导致军队崩溃。事实上，当天早些时候，威廉被杀的传言也让诺曼军队士气大跌。国王已死，英格兰人失去了信心，开始撤退。威廉的军队乘胜追击。尽管英格兰的后卫部队似乎表现出色，但是依然有许多人死在逃亡途中。

哈罗德的军队被击败后，威廉很顺利地征服了英格兰。诺曼人将面临叛乱和来自地方的抵抗，但最终他们会成为英格兰的主人。征服英格兰的军队是按照新时代的模式打造的，主力是装甲骑兵，其他兵种提供支援。这将是未来几百年的军队组织形式。

诺曼人将面临叛乱和来自地方的抵抗，但最终他们会成为英格兰的主人。

诺曼征服标志着一个旧时代结束了，一种新秩序将在整个欧洲出现。这是城堡建筑和严格的封建制度的时代，也是大教堂和皇室的时代。黑暗时代的武士国王让位给更狡猾的统治者，新时代统治者的权力主要体现在支持艺术发展和组建军事力量方面。



贝叶挂毯上写着“哈罗德国王被杀”。但我们不知道图中哪个人是哈罗德，是被箭射中眼睛的人，还是被剑刺死的人，或者这两种伤势他身上都有。

贝叶挂毯

我们对诺曼征服的了解大多来自贝叶挂毯，这幅毯子画面信息丰富又神秘。我们不知道被杀死的哈罗德国王究竟是画中的哪个人物，可能这两个都是，可能是其中一个，也可能都不是。因此，虽然哈罗德被箭射中眼睛而死的说法流传甚广，但真相如何

就不得而知了。黑暗时代一向缺乏准确的文献记录，因此想知道发生了什么、发生在谁身上、何时发生，都是非常困难的。



贝叶挂毯记录了一千年前发生的事件，尽管图中的一些信息很难理解。

黑暗时代的遗产

所谓黑暗时代，是从罗马帝国崩溃到一个新的封建欧洲出现之间的时期。从最严格的意义上说，这个词是恰当的——这一时期几乎没有留下文字记录，仅有一些零散的信息，但这绝不是一个暴力和肆意破坏的时代。这个时代当然存在冲突——其中一些甚至对整个地区造成了严重的破坏，但这也是一个成长和发展的时期。

在黑暗时代，欧洲人发现了冰岛、格陵兰岛，并横跨大西洋，踏足一个遥远的大洲，尽管时间短暂。两个伟大的宗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其教义和宗教格局已经具备了现代宗教的雏形，信徒分布地域也大致确定。这一时期还建造了一些伟大的工程，比如大教堂，以及今天仍然存在的道路网。

黑暗时代结束时，欧洲已经从部落社会进入封建社会。王国建立了完整的行政体系，而且会通过签订正式条约的方式解决国际事务。在这些一千多年前出现的新王国中，现代的法国、丹麦、瑞典和英国等国家得以肇始。虽然我们掌握的细节少得可怜，但我们知

道，这是一个探索和发现的时代，而不是一个毁灭的时代。它开始于混乱，但结束于新的秩序，它见证了古代社会的逝去和封建社会的开始。

虽然我们掌握的细节少得可怜，但我们知道，这是一个探索和发现的时代，而不是一个毁灭的时代。



一幅14世纪的微缩画，画中是一位国王和他的骑士。自罗马帝国覆灭以来，社会形态发生了重大变化，但中世纪的统治者仍然身兼政治家和战士两种身份。

之后，再也没有外部势力成功侵入不列颠；天主教会一直处在教皇的领导之下；在接下来的一千年里，法国成为欧洲事务中的强国……黑暗时代意义重大，这一时期建立的欧洲格局和政治制度一直延续到今天——现代世界发端于此。

(1) 第80页图注的却是埃蒙加尔达（Ermengarda，历史上更广为人知的名字是德西德拉塔，Desiderata），她是伦巴第国王德西迪里厄斯的女儿。——译者注

(2) 不列颠的亨伯河以北是诺森布里亚王国，以南为麦西亚王国。在后罗马时代的大部分时间里，麦西亚王国是亨伯河以南最强大的国家。奥法在位时麦西亚王国达到鼎盛，此后它就走向了衰落。——译者注

(3) 萨利安法兰克人建立了萨利安王朝（1024—1125年），他们有一套稳定的行政管理体制。——译者注

参考文献

1. Anonymous, *The Anglo-Saxon Chronicle*, Echo Library.

2. Brooke, Christopher, *The Saxon and Norman Kings*, Wiley-Blackwell, 2001.

3. Brown, Peter RL., *The World of Late Antiquity*, WW Norton& Company, 1989.

4. Brown, Peter RL., *The Rise of Western Christendom: Triumph&Diversity 200-1000*, Wiley-Blackwell, 2013.

5. Cantor, Norman F., *The Civilization of the Middle Ages*, Harper Perennial, 1994.

6. Gibbon, Edward, *The History of the Decline and Fall of the Roman Empire*, Everyman’s Library, 2000.

7. Halsall, Guy, *Barbarian Migrations and the Roman West*,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8.

8. Kelly, Christopher, *The End of Empire: Attila the Hun and the Fall of Rome*, WW Norton& Company, 2010.

9. Oman, Charles, *The Dark Ages 476-918 AD*, Independently published, 2017.

10. Wood, Ian N., *The Merovingian Kingdoms*, Routledge, 1993.

11. Wood, Michael, *In Search of the Dark Ages*, BBC Books, 2006.

12. Stenton, F.M., *Anglo-Saxon Englan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1.

图片来源

AKG Images（专业图片网站，括号内标示的是照片摄影作者）：（Peter Connolly）

Alamy（专业图片网站，括号内标示的是网站版块或照片所有者）：（Granger Historical Picture Archive），（Interfoto），（Ancient Art& Architecture），（Interfoto），（Science History Images），（Chronicle），（Bildagentur-online），（Pictorial Press），（Classic Image），（Interfoto），（Falkensteinfoto），（James Nesterwitz），（North Wind Picture Archives），（Classic Image），（Artokoloro Quint Lox），（Classic Image），（Oldtime），&（Chronicle），&（The Picture Art Collection），（Yolanda Perera Sanchez），（Artefact），（lunstream），（Prisma Archivo），（Austrian National Library/Interfoto），（Lanmas），（World History Archive），Lanmas,（Picture Art Collection），（Interfoto），（Chronicle），（Artokoloro），（Picture Art Collection），（Lanmas），（Classic Image），（Lebrecht Music& Arts），（GL Archive），（De Luan），（Classic Image），（Chronicle），（Chronicle），左边（Timewatch Images），（Classic Images），（Florilegius），（Ian Dagnall），（thera），（Chronicle），（N J Murray），（Sonia Halliday Photo Library），（World History Archive），（bilwissedition Ltd& Co. KG），（Chronicle），（Incamerastock），（Historical Images Archive），（Chris Hellier），（Chronicle），（Granger Historical Picture Archive），（Niday PictureLibrary），（Ian Dagnall），（Godong），（Chronicle），（Granger Historical Picture

Archive）,（Yolanda Perera Sanchez）,（DV Travel）,（Chronicle）,（Michael Sayles）,（Chronicle）,（imageBROKER）,（Prisma Archivo）,（De Luan）,（Barry Vincent）,（age footstock）,（Joris Van Ostaeyen）,（Granger Historical Picture Archive）,（Lars S. Madsen）,（Interfoto）, & -（Prisma Archivo）,（Chris Hellier）,（Artokoloro Quint Lox Limited）,（Minden Pictures）,（Falkensteinfoto）,（National Geographic Image Collection）,（Charles Walker Collection）,（AF Fotografie）,（Niels Quist）,（Mark A Schneider/Dembinsky Photo Associates）,（Interfoto）,（National Geographic Image Collection）,（parkerphotography）,（Prisma Archivo）, &（Falkensteinfoto）,（Photo ）,（Nigel Reed QEDimages）,（Interfoto）,（Historical Images Archive）,（World History Archive）,（Glenn Harper）,（Yolanda Perera Sanchez）,（imageBROKER）,（Timewatch Images）,（Chronicle）,（GL Archive）,（Yagil Henkin）,（Universal Images Group North America LLC）

Alamy/Heritage Image（Alamy图片网站的历史图片版块）Partnership

Amber Books/Art Tech（琥珀出版社）

Bridgeman Images（布里奇曼艺术图像图书馆，括号内为画作收藏方）：（Look& Learn）,（DeAgostini/Museo della Civilta Romana）,（Look& Learn）,（Musee d’Orsay）,（Severino Baraldi）,（Bridgeman）, &（Biblioteca Estense）,（Look& Learn）,（DeAgostini/Icas）, &（Look& Learn）,（The Stapleton Collection）,（Look& Learn）,（The Stapleton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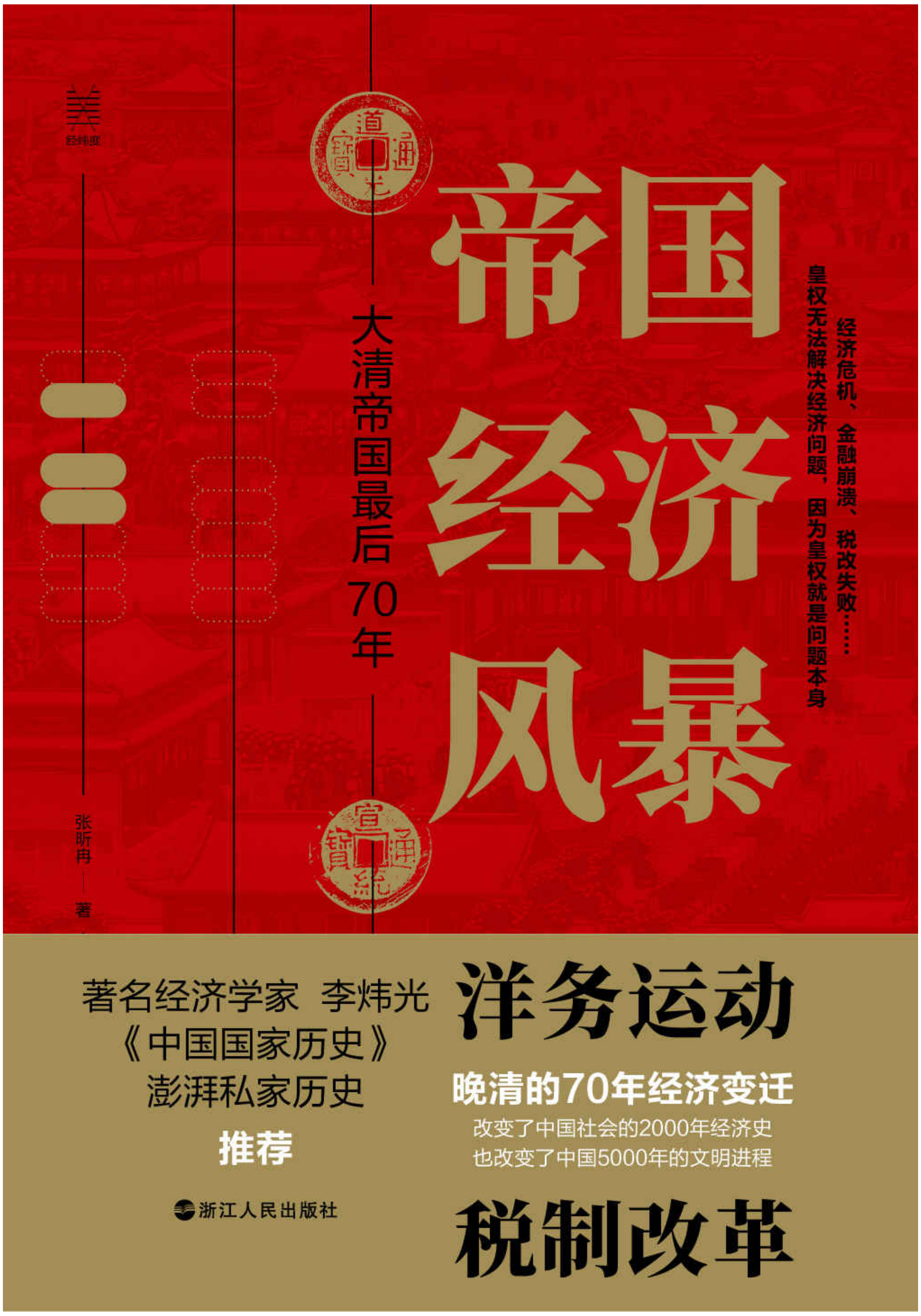
Collection）,（Biblioteque Nationale, Paris, France）,（The Stapleton Collection）,（Biblioteque des Arts Decoratifs, Paris/France/Archives Charmet）,（De Agostini Picture Library）,（Bridgeman）,（Bridgeman）,（De Agostini Picture Library）,（Look＆Learn）,（Biblioteca Nazionale Marciana, Venice, Italy）

Dreamstime（美国摄影机构，括号内为摄影作者或提供方）：（Veniamin Krasov）,（Oleg Bannikov）,（Edoma）,（Timawe）,（Giedrius Blagnys）,（Daniel M. Cisilino）,（Gunold）,（Toni Genes）,（James Kirkikis）

Getty Images（Getty图片网站，括号内表示图片收藏方）：（PHAS）,（Heritage Images）, 右（Hulton Archive）,（Bettmann）,（PHAS）, &（Werner Forman）, G?rald MorandGrahame）

Photos.com（图片网站）

Shutterstock（图片网站，括号内标示的是照片摄影作者）：（Gail Johnson）



帝国经济风暴
大清帝国最后70年
经济危机、金融崩溃、税改失败……
皇权无法解决经济问题，因为皇权就是问题本身
张昕冉 著
著名经济学家 李炜光
《中国国家历史》
澎湃私家历史
推荐
洋务运动
晚清的70年经济变迁
改变了中国社会的2000年经济史
也改变了中国5000年的文明进程
税制改革
浙江人民出版社

帝国经济风暴
大清帝国最后 70 年

张昕冉　著

浙江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帝国经济风暴：大清帝国最后70年/ 张昕冉著. —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21.9

ISBN 978-7-213-10184-7

Ⅰ．①帝… Ⅱ．①张… Ⅲ．①中国经济史—研究—清后期 Ⅳ．①F129.5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21）第115708号

帝国经济风暴：大清帝国最后70年

张昕冉　著

出版发行：浙江人民出版社（杭州市体育场路347号　邮编310006）

市场部电话：（0571）85061682　85176516

责任编辑：方　程　李　楠

营销编辑：陈雯怡　赵　娜　陈芊如

责任校对：戴文英

责任印务：刘彭年

封面设计：异一设计

电脑制版：北京弘文励志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印　刷：杭州丰源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710毫米×1000毫米　1/16　印　张：13

字　数：158千字

版　次：2021年9月第1版

印　次：2021年9月第1次印刷

书　号：ISBN 978-7-213-10184-7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市场部联系调换。

一个沉思着的民族往往要比兴奋中的民族更有力量。历史学应当提供这种力量。

——茅海建

序言

寻找晚清衰败中的财政原因

我记得，历史学者王树槐在《清末民初江苏省的财政》中曾讲道：“财政为行政之母，财政不健全，行政则无从发挥其功能。近代政治革新、社会福利措施、经济发展，无不以财政之健全与否为成败之关键：一在办事非钱莫行，一在筹款必有良方。近代中国政治、经济之失败，原因固多，而财政尤为其重要原因，清末如此，民初亦然。”

从这段话中，大家能看出，王树槐对财政之推崇备至。而我们将目光前推180年，观清末的70年之变革，可见其恰是这种财政收入的大转变之时。

有清一朝，财政收入以田赋为主，财政开支则以军饷为大头，两者几乎可以抵消。晚清之前，清廷收支大体平衡，通常略有结余。从户部存银看，乾隆朝后大体维持在常年在库六七千万两的规模，而嘉庆朝后急剧下降。到第一次鸦片战争爆发前，户部存银已不足乾隆时的三分之一。

从道光到咸丰年间，因为两次鸦片战争用度及其巨额赔款，还有太平天国等运动的兴起，清廷财政非但没有改善，反而因为内外交困陷入了彻底崩溃的局面。而令人无法想象的是，最终将清廷从内外交困的绝境中挽救出来的，竟然是厘金的横空出世。而厘金正是中国最早收取的商业税。同治初年，在厘金收入最高的时期，其所得甚至超过了清廷的年度财政收入。

估计大家已经猜到，为什么在我们的记忆中，清朝末期已然被外国打得千疮百孔，但仍旧能屹立不倒的真正原因其实就是财政收

入的增加。

而后，到了光绪年间，随着社会秩序的逐步稳定，清廷财政收入竟再次恢复至七八千万两。但是，这一时期虽然历年有结余，但总额不大，在机动财力方面仍是捉襟见肘，十分缺乏。这一弱点，在甲午和庚子年的两次打击下立刻暴露无遗，之后的巨额赔款让清廷财政再次崩溃。

是的，清末财政的急剧扩张，很大程度上是因为突破了之前的“量入为出、永不加赋”的祖制。如学者王业键所云：晚清财政的最主要问题是，“传统的轻赋政策成了阻碍国家进步的痛苦根源”。换言之，近代中国之所以一再落败，其中的一个重大原因就是清廷在财政上固守祖制，没能以合理的方式集中国民财富迎接当时的国际竞争。而这种失败的集中体现就是，近代中国有钱赔款，却没钱发展军备和重要产业，最终落得次次挨打、处处被动的悲惨局面。这种错误的财政政策引发的恶果，和同时期的日本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但也不可否认，近代中国的衰弱有很多原因，其中有产业和技术革新方面的，也有军事或制度、思想文化方面的。作为其中的重要一环，财政因素十分关键，而学界研究并不算多，这既有跨学科的原因，也和重视程度有关。张昕冉博士的这一作品，虽然只是通俗著作，但无疑开了个好头。同时，也希望能有更多的类似作品，为广大读者打开更多的历史窗口，获取更多的历史新知。

晚清民国史作家　金满楼

2021年8月

前言

19世纪下半叶，注定要在人类历史上占据重要位置。在这个特殊的时代，传统与现代、保守与变革、封建与共和，种种思潮前所未有地交织在一起，人类创造出的工业产值超过以往工业产值总和，新的科学技术迅速涌现并在实践中应用。历史上从未有任何一个时代能诞生这么多闻名世界的人物，也从未有任何一个时期集中出现如此丰富的人类智慧成果，推动历史的车轮向着现代滚滚前进。

一个终年生活在中国内地的普通农民，与一个玻利维亚波托西银矿的工人之间会产生何种联系？一个广州十三行的茶叶行商，与英伦三岛上的金融资本家们又会出现怎样的纠葛？虽然相隔万里，彼此不相识，却有一条看不见的纽带将他们连接在一起。商品的交换、贸易的往来，将世界逐渐纳入一个整体之中，尽管当时极少有人意识到这一点，但世界历史就在这细微之处前行。

当欧洲人意识到地理上的东方已不再是“文明世界”的终点时，旧世界那种彼此封闭而隔绝的状态也一去不复返了。虽然往来交通仍然阻隔重重，但在经济利益的驱动下，一批又一批的商人与传教士源源不断地出现在通往东方的航道上，他们带给西方人精美的茶叶与丝绸，也带给他们关于远东的最新情报。西方人对远东的概念发生变迁，昔日《马可·波罗游记》中所描绘的那个东方国度的富饶与繁盛，被愚昧与野蛮等名词所取代。在资本主义世界市场形成的过程中，任何封建的、落后的生产方式都会被这一浪潮被彻底吞没，并为其进一步扩张提供广阔的原料与市场。

一个日渐衰颓的庞大帝国，与一个野心勃勃的新兴强权，在世界逐步联为一体的过程中，两者不可避免地碰撞在一起，由此开始了被深深烙印在中华民族记忆里的屈辱历史。鸦片——一种提取自

美丽而妖艳之罂粟花的麻醉品，也脱离了其药物本质，最终变为人人唯恐避之不及的可怕毒品。

鸦片战争不仅是中国近代史的开端，也是中国近代财政危机的起始点。大清帝国的普通农民，祖祖辈辈在自己的一亩三分地上耕耘生活，对外界既无兴趣也无动力去了解。或许他们中的绝大多数并不知晓财政经济的内涵，为生计奔波，但他们却最能体会国家的荣辱兴衰所带来的后果。这是一副副鲜活而普通的面孔，也是一群被遗忘在历史角落的人。与那些闻名天下的大人物相比，历史的舞台很少给他们展现自己的机会。他们是躺在烟馆间吞云吐雾的大烟客，也是在席卷一切的可怕银荒中倾家荡产的普通农民；他们是路过厘卡被敲骨吸髓的普通行商，也是在晚清剧烈的政治变动中命运多舛的实业巨擘。他们是在灰暗的时代背景下映射出的一个个憔悴的影子，每个人都身不由己，宛若无根之萍，可谓时代之悲剧。

但这又是一个精彩的时代。晚清的政治舞台异彩纷呈，活跃着许多至今为我们耳熟能详的著名人物，他们或是中兴名臣、洋务干将，或是军阀、野心家……在晚清的政治舞台上，每个人都扮演着属于自己的重要角色。但对于今人来说，对历史人物的评判绝不能拘泥于忠奸之分、善恶之别，也就是说脸谱化地看待历史人物并不可取。如果回顾当时的财政经济状况，全面地看待这一切，或许就不难发现这些人物做出决策的动机。那时，亏空的国库、入不敷出的粮饷赋税、蜂拥而起的流民、蠢蠢欲动的封疆大吏以及四处横行的洋人，哪一个都让清政府焦头烂额。

这时，满是烂账的财政状况既是问题之因，也是问题之果。在全面危机下，任何一种激进的改革方案都不可能取得根本性成功，局部的小修小补也不能阻止整体性的财政系统崩溃。不知不觉间，帝国的根基被侵蚀殆尽，基层统治摇摇欲坠。面对内忧外患，人们

往往会将希望寄托于明君良将。无奈无财则事事不可为，无政则事事不可决，任何雄心壮志都无法付诸实践，最终只能流于形式。

在这个“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时代，既有的统治秩序面临着巨大的挑战，“天朝上国”的体面在现实的压力面前被彻底击垮——作为一国之门户的海关竟常年把持在外国人手中，这对于任何一个独立国家来说都是不可容忍的。然而，这一状况竟能长期存在，晚清统治者甚至习以为常。当然，这与西方人所带来的更高效完备的海关运作体系是分不开的。敞开的大门让外国资本在华畅通无阻，“商战”的概念从此在中国知识分子的脑海中生根发芽。

新经济因素催生出新的阶级，传统的“士农工商”四民结构在时代变化的浪潮中逐渐瓦解，商人阶级作为一种新兴的政治力量登上历史舞台，并在晚清急剧变化的政局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无论是力主“尊祖宗之法”的顽固守旧者都不得不承认，他们无力阻挡这种变革性力量，更无法改变封建统治秩序从根本上走向灭亡的现实。

那时，旧式金融机构的命运在新经济浪潮的冲击下岌岌可危，上海外滩林立的租界使馆与银行大楼更预示着中国金融业即将迎来巨大变革。唯独令人意想不到的是，银圆与铜圆竟然成为这场金融斗争的聚焦点。从开埠港口到内陆腹地，以货币为中心的变革一刻都未曾停歇，小小一枚银圆折射出的是近代中国金融事业的跌宕历程。

当轨道上传来蒸汽火车的轰鸣声时，任何顽固的障碍都难逃粉身碎骨的命运。铁路与机车不仅作为一种新兴的交通运输工具为人们带来财富与权力，更是在无形中冲破了人们脑海中固有的藩篱，让新式商业因素以铁道为中心迅速活跃起来。

在清王朝的末期，无论是洋务派还是维新派，抑或本国绅商与外国资本家，人人都意识到铁路延伸之处即经济利益所在。由于铁路外债的存在，路权与国之利权牢牢绑在一起，路权之争也随之上升到力争国权，激励着几代爱国者为之奋斗。清朝并非亡于外忧，而是崩于内患。铁路正如一条绵长的绞索，慢慢扼杀了庞大而臃肿的晚清王朝。在清政府将商民的信任消耗殆尽之时，民众终于抛弃了这个自己曾经竭力捍卫的政权，转向血与火的革命之路。

目　录

序言

前言

第一章　鸦片战争前的贸易危机

撬动世界的东方三角贸易

危机四伏的外交关系

中英贸易冲突

恐怖的“银荒”

鸦片下的博弈

第二章　晚清帝国的财政体系

严峻的人口危机

盐票与盐课

漕银与漕运总督衙门

户部银库亏空案

残酷的“土客之争”

厘金的诞生

裁厘的呼声

荼毒中华大地的鸦片

搜刮之法

地方势力坐大

财政比重的改变

第三章　走入死胡同的货币改革

传统铸币的没落

外国银圆的涌入

无奈的“白银保卫战”

自铸银圆

统一币制

“两元之争”

自铸铜圆之路

第四章　从银号到银行：清末金融业的跌宕起伏

爆发的银钱业

快速发展的金融业

山西商人的经营之道

暧昧的官商关系

来自外界的挑战

皇家银库

1883年上海金融风暴

走向现代银行的第一步——中国通商银行

玩不转的股票

夹缝中的山西票号

大厦将倾

第五章　“洋人的海关”

被迫打开的海关

洋人控制的海关

改革除弊

主权沦丧的代价

列强利益的调停人

总税务司赫德的野心

“卖”出去的海关税

赫德时代的结束

第六章　商战：商人的崛起

是绅是商？

重商主义

状元企业家张謇

深入政治的商人阶层

兴建商会

设立规章

买办的出现

萌生于买办的爱国商人

第七章　失败的改革

筹建海军

军费与赔款

钱都用在了哪里？

清理财政

瓦解

返回总目录

第一章　鸦片战争前的贸易危机

嘉庆二十五年（1820年）八月，随着嘉庆帝的意外身故，年已38岁的爱新觉罗·旻宁在一众大臣的拥戴下，接过了这个古老而庞大的帝国。他改元道光，希冀中国走上光辉大道。然而短短20年后，就发生了鸦片战争，进而改变了整个中华民族的命运。这段历史是屈辱且不幸的，中国人在半殖民地半封建化的泥沼中挣扎了百余年。每每谈及此事，我们常常会将责任归咎于统治者的昏庸无能或民众的麻木无知。如同人们对传统历史人物的解读一样，国家强盛是因为有忠臣良将，内外一心；而社稷衰颓就必然是主昏臣奸，钩心斗角。尽管这种脸谱化的描述很容易帮助我们解构大时代的悲剧，但这样往往难以窥见其背后的根源。以道光皇帝为例，他不同于我们固有认识中昏君或暴君的形象，他曾经亲手击毙闯入宫中的白莲教徒，即位后也是出了名的节俭。后人评价称："嘉庆以后，武力不竞，纪纲败坏，教徒纷起，民不聊生。但仁宗之淳厚，宣宗之节俭，均有可称。"就是这样一位看起来关心民生、坚决反对浪费的统治者，却在中国跨入近代历史的这个重要节点上做出了种种昏庸之事，而民族英雄林则徐个人的不幸遭遇正折射出那个大时代背景下的风云变幻。

对一般读者而言，看待历史往往会以各种重大事件为中心，看各类英雄人物在历史的舞台上施展手段，似乎趣味无穷，可对更深层次的经济及金融货币政策的思索却毫无兴趣。清朝作为中国最后一个封建王朝，正是在吸取了历朝历代兴衰成败之教训的基础上，方能以几十万之众统治中国近300年。如果说统治是一门艺术，那清朝统治者的手段是非常高明的。另外，其财政管理体制也颇为完善，强大的中央集权带来了财政权力的集中，各项度支也有了系统的规定。清政府完全可以以财权为链，牢牢地锁住地方上不听话的大小势力，或是羁縻边疆上那些蠢蠢欲动的部族首领，并在此基础

上维持军队对中央政权的忠诚，最终构筑起整个帝国稳固的根基。可一片欣欣向荣的背后，也隐藏着巨大的忧患，在“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下，这套看似完备的财政体系竟以惊人的速度崩溃，并连带引发了整个政治体系的动荡与解体。

从今天的角度来看，简单地批判当时帝国主义列强对中国的经济掠夺并不足以说明问题。清朝分析了历代王朝覆灭的原因并进行了有针对性的调整，避免了很多问题，即使相对于其他惨遭帝国主义列强蹂躏的殖民地，清朝的表现也是可圈可点。但它的统治集团没有想到，时代终究会变化，清朝始终有它作为一个古代封建王朝的局限性。僵化的政治体制和崩溃的财政体系使它不能实现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根本性变革，因而“历史周期率”的魔咒仍如梦魇一般挥之不去。偌大帝国多少才俊之士，却只能用旧有的思维解决问题，无法适应工业时代的到来，只有当洋人的坚船利炮抵在眼前时才大梦初醒：“时代变了。”

饱受屈辱之后，清政府尝试变革，也渴望变革。他们想方设法筹集资金，建设工厂，制造枪炮，聘请洋人，努力向工业化的目标奋进。一些近代落后国家就是通过这样的方式实现了国家工业化。土耳其和日本就是如此，可清政府却因《马关条约》赔掉了几十年的辛苦积累，从此不可避免地走上了覆亡之路。正如很多王朝的覆灭一样，清朝的晚期也饱受财政紧张的困扰，即使尝试过多次财政改革，甚至建立现代金融制度，可还是于事无补，最后只能眼睁睁地看着这条绞索一点点地勒进自己的脖子，以屈辱的姿态死去。如果没有看到实行这些财政措施所引起的一系列复杂的连锁反应，就难以真正认识晚清财政困局的形成原因及其经济改革的发展规律。但我们知道，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晚清及至近代一系列的重大变局背后都离不开经济的推手，它悄无声息地改变着中国乃至世界的格局，给予今人无尽的深思。

清帝国作为一个领土广袤、资源富足的庞大帝国，是中国封建王朝的集大成者，不过立国200多年后，也陷入了灭亡的境地。而且，清帝国的灭亡与以往封建王朝相比，蕴藏着更深层次的经济原因。其中，作为中国近代史开端的鸦片战争，无疑是极其重要的原因。而当我们将目光放到战争之前，会发现有许多看不见的隐患在此前已经埋下。

鸦片和茶叶这两种看似普通的经济作物是如何伴随着新世界贸易体系的建立，改变了整个东方贸易格局的？小小的一两白银又是如何撬动整个庞大帝国根基的？鸦片战争真的可以避免吗？面对这“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清朝君臣又会做出怎样的抉择？

撬动世界的东方三角贸易

自古以来，金银就是财富的象征，缔造了历史上无数的传奇故事。黄金与白银因其稀缺性和稳定性成为一般等价物，是人类文明进步的一大标志。中国古代的黄金因产量供给比较有限，所以相当贵重，一般并不作为货币使用，甚至很少流入市场。而白银的使用就比较普遍，唐宋时期白银就开始作为流通货币使用，但直至明朝中后期才实现白银货币化。中国并不是一个盛产白银的国家，为什么会选择这种贵金属作为市场流通的主要货币呢？

这跟地理大发现有关。自从新航路开辟以来，以葡萄牙人和西班牙人为首的欧洲人从美洲攫取了大量金银，但欧洲本土的市场无法容纳如此巨额的财富。换句话说，这些美洲的廉价金银虽满足了人们对物质的享受，但也悄无声息地带来了潜在的危机。它们流入欧洲后引起了广泛的物价上涨和货币贬值，即所谓的“价格革命”。巨额财富让欧洲人蒙受了巨大的损失，他们希望能有效地将这些意外之财花出去。然后，他们发现从那个神秘的东方国家——

中国，进口物资竟然能解决这个问题。而丝绸、茶叶、瓷器等东方产品马上成为欧洲上流社会青睐的对象。

而中国从明朝开始，政府就以白银结算税收，因此地方需要更多白银纳税，国库也需要更多白银维持国家运转，一时间对白银的需求量剧增。但中国自产白银远不能满足需求，便只能大量依赖进口。这样一来，美洲的白银，尤其是来自秘鲁和墨西哥的白银就源源不断地涌入中国。18世纪初，茶叶开始取代丝绸成为中国首要的出口商品，在当时那个没有国际通行的世界性货币的年代，就只能使用金银等贵金属进行结算，因此西班牙银圆和墨西哥银圆先后在中国市场上占据重要份额，成为东南沿海和长江流域通商口岸的主要货币。无论是中国还是使用白银购买中国商品的西方国家，在贸易中都得到了莫大好处。

在较长的一段时间里，美洲白银贡献了世界银总产量的八至九成。但好景不长，到18世纪末，美洲银矿就因为长期过度开采而日渐枯竭，美洲白银的减产进而引发世界银产量的下降。19世纪初，拉丁美洲大地上展开了轰轰烈烈的独立运动，一系列新生的独立国家自然不愿卑躬屈膝地向昔日的欧洲宗主国继续提供白银，于是强行收回白银开采权。

一向出手阔绰的欧洲老牌强国因此陷入了囊中羞涩的境地，他们拿不出更多的白银与中国开展贸易活动，各国的对华贸易额都开始下跌。此时孤悬于欧洲大陆之外的新兴霸主——英国，却敏锐地嗅到了商机。从康熙五十四年（1715年）英国人在广州设立商馆开始，英国竭力扩展对华贸易。在白银大幅减产的情况下，中英贸易额不但没有萎缩，反而大幅增长。到18世纪中叶，英国对华贸易额已超过欧洲其他国家对华贸易额的总和。18世纪末，英国进口的中国商品总值甚至已达到所有西方国家进口的中国商品总值的90%，可以说英国独揽了西方世界与中国的贸易。

英国对华贸易额如此之大，其中一个很重要的武器就是印度的棉花。在此之前他们也尝试过别的商品种类，比如毛纺织品和金属制品，不过这些商品不远万里运到中国，其高昂的生产成本和长途运输费用直接位高了价格，远远超出了中国普通老百姓的消费水平。不管是市场定位还是目标受众，都与设想的相差甚远，在当时中国这样一个以农业和家庭手工业为主的自然经济国家受挫也就不足为奇了，最后致使英国人血本无归。而印度作为“英国女王王冠上的宝石”，其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与充沛的廉价劳动力使之能够产出质地优良的棉花，正好符合当时中国长三角和珠三角地区蓬勃发展的棉纺织业的需求，印度为中国带来了物美价廉的棉花，也为英国人带来了绝好的白银替代品。

在当时中国唯一开放的口岸——广州，到处是繁华景象：每年农历四月到九月，外国商船顺着南方温暖的海风驶入港口，卸下成堆的货物；农历十月至次年三月，商船又满载中国茶叶及其他特产顺着凛冽的北风驶向南方。从明朝开始，这样的景象持续了数百年。乾隆四十年（1775年），英国开始将印度的棉花运往中国，棉花成为中印两个古老国家间第一次大规模交易的物品。到19世纪初，英国商人每年运往中国的棉花价值达到400多万两白银。直至鸦片输入以前，印度棉花一直是中国的最大宗进口货品。

英国人之所以要费尽力气把印度的棉花卖到中国，主要是为了换取茶叶。近代以来，茶叶和棉花都是开展国际贸易的重要物品，而中国也在这场空前的国际大交换中扮演了十分重要的角色。中国输出商品大部分为农副产品，优质茶叶、精美丝绸和土布等都是外贸商品的明星品类，西方人对此十分青睐，其中又以茶叶出口量最多。英国人对红茶的热爱大大拉升了其消费量，英商购买的中国茶叶从18世纪初的500担，到18世纪中叶的5万担，再到19世纪初的20万担，其增长率何止百倍! 而生丝和土布的对英出口额也不断增

加，英商购买生丝数量从19世纪初的不到1200担，增至19世纪30年代的8000担以上，增长了近6倍。[1]

在以前那个交通闭塞、人员交流往来极为不便的年代，商人们不得不赌上身家性命去做国际贸易。面对远方的惊涛骇浪，谁都不知道自己的未来是丧生于浩瀚大洋之中，还是载着满船财宝荣耀而归，这使得远洋贸易成为一项风险极大的商业活动。其直接后果就是外贸商品价格奇高，能够享用国际贸易商品的人也仅局限于上流社会。直到地理大发现之后，随着远洋航海技术的发展和交通运输工具的改善，平民才有可能消费得起原本价格昂贵的国际贸易商品，外贸商品多元化的时代从此到来。

中国出口的茶叶占据了英国人的下午茶时光，印度棉花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进口的外来原料，这无形之中也改造了中国传统的经济结构。在古代中国最重要的两个经济领域——农业和手工业中，这种变化尤为明显。包括印度棉花在内的许多种外来原料从东南沿海口岸输入之后，就立即由各级商人用车、船等交通工具运抵内陆，直接送到农民和小手工业者手中。如果把这套程序比作今天的物流的话，那么正是这些“快递员”在利益的驱动下做出了前人所没有做到的成绩，他们的工作是让一个“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农民也在不知不觉间参与到国际交换中去，为长途贩运作担保的银号也能在其中分得一杯羹。在它们的共同作用下，传统金融业的活力进一步迸发出来，新经济因素的种子在华夏大地扎下根来，当然身处其中的人们并不知晓。

这样一来，数量庞大的印度棉花有如白色的巨浪，直接冲击着中国传统的土纺织业。本来可以将植棉、纺纱、织布的整套流程集于一家一户，现在已开始分解并向着专业协作化的方向发展，2000年来坚固稳定的农业社会第一次在国际贸易的冲击下出现了裂痕。

来自印度的原棉和来自英国的机制纱布在中国织工的手中变成质地优良、手感细腻的布匹后，再卖给欧洲消费者。在这个交换过程中，数量众多的东西方劳动者和消费者都不可避免地参与到这场复杂的国际分工链条中来。原本身处世界两端，毫无交集的一群人因此发生了经济上的联系。这种在今天司空见惯的情形，在当时那个仍处于封闭状态的世界里却是极难看到的。身处其中的人并不能意识到他们已然打开了世界近代史的大门，奏响了近代大工业生产的前奏，也不会知道未来会产生一种新的经济体系。

一个新的三方贸易在东方形成。英国将商品卖到印度，再把印度棉花卖到中国，用于进口中国的茶叶。这是中国第一次如此深入地参与到世界经济链条中，也是第一次与西方人发生如此密切的贸易联系。中国的统治者在享受国际贸易带来的好处同时，却没有想到自己已无法从资本主义迅速扩张的浪潮中脱身。尝到了贸易甜头的西方新兴资本主义国家也不可能允许一个拥有庞大潜在市场的远东大国置身事外，何况它还守着闭关锁国的陈旧祖训。此时的中英贸易形势看似良好，实际上却潜藏着种种尖锐复杂的矛盾，甚至已达到难以调和的地步。

从当时中国来说，棉花与茶叶贸易仍属于正常的贸易范畴，中国长期居于贸易顺差地位，获取了大量的白银。但是好景不长，从19世纪上半叶起，棉花贸易就不断萎缩。一方面中国并不是很缺棉花，作为一个历史悠久的纺织大国和棉花种植大国，进口印度棉花充其量只能起到一种补充作用，“有没有它都能过年”。另一方面英国科技进步神速，“珍妮”纺纱机、水力纺机、机械织机、轧棉机、蒸汽动力织机等一大批新型纺织机器陆续出现。机械大大提高了纺织速度，棉花在工业革命时代得以迅速普及，需求量节节上升，自家的印度棉花自然不能再给中国人。

到19世纪20年代，葡萄牙、西班牙、荷兰、法国、普鲁士、瑞士、瑞典等与中国有传统贸易的欧洲大陆国家都不得不退场，英国几乎独占了整个中国市场。可英国人马上就无奈地发现自己已难以承受长期逆差的损失，于是他们决定使用一种附加值更高的商品作为对华贸易输出的主力，这就是鸦片。嘉庆二十五年（1820年），英国对华鸦片输出额首次超过棉花，鸦片成为对华出口第一大商品，中国的贸易顺差也从此画上了句号。

从中英之间的棉花贸易我们可以看出，至少在鸦片战争之前的很长一段时间内，是东方产品而不是西方产品在中国更受欢迎。按照当时中国唯一开放口岸广州的主要进口商品统计，1817—1833年，西方的产品货值不及东方产品的1/3。英国的东印度公司把整个印度视为一个商业组织，以盈利为目的进行经营。一方面从中攫取资源再与中国交易，另一方面换取西方需要的财物。即产品出自东方，盈利却在西方，英国人可谓收获颇丰。当然，殖民者不会考虑殖民地人民的利益。随着英国对海外贸易的依赖程度与日俱增，印度人遭受的压迫只会越来越深。与此同时，没有进入工业化的中国也面临巨大的危机。

危机四伏的外交关系

按照大多数人的理解，鸦片战争是英国商人向中国大量销售鸦片，中国迫不得已予以封禁而引发的。虽然这场战争的直接起因是虎门销烟，看起来有一定的偶然性，但实则是必然的结果。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没有哪个国家能够在资本主义扩张的浪潮中幸免。从另一方面来看，中英之间的冲突不仅仅是贸易，还有更深层次的政治和文化冲突，至少早在鸦片战争之前，冲突的种子就已悄然埋下。

大清帝国有一套朝贡制度。外国贡使每次入京觐见皇帝都带着礼物，大清帝国皇帝往往也给予更为丰厚的赏赐。朝觐结束后，使团还会拿出各类商品在会同馆陈列出售，令北京城的老百姓也有机会买到异域珍宝。一般这样的集市可以持续三五日，朝鲜这样的邻邦还会有更多优待，得到政府直接采买的机会。

不过西方人的到来，改变了这一持续千年的游戏规则。虽然清政府照样把他们视为远慕上国而来的朝贡国，但西方人自己可不这么认为，他们认为生意就是生意，何须分出个高低贵贱？矛盾自然由此而生。

引发冲突的直接原因是清朝的闭关政策。实际上，中国并没有完全将自己封闭起来，而是在对外交往的过程中逐渐形成了一种特殊贸易制度。康熙平定三藩之乱、收复台湾后，决定开放海禁，在皇帝的特别“恩准”之下设广东澳门、福建漳州、浙江宁波、江南云台山四个榷关。但到了乾隆时期，却又退回封闭的老路上，只限定广州一地通商，在别处交易均系违禁，可也正是这一政策阴差阳错之下成就了赫赫有名的广州十三行。不过，这也苦了那些外国商人，他们想要购买江浙生丝或是徽闽茶叶就只能去广东，再千里迢迢运到欧洲，中间必然会增加不少运输成本，到目的地后不知要霉坏多少。

而清政府也不好直接以官方身份与外国人做生意，所以一些官员便指派行商垄断外国进口货物的承销和中国出口货物的代购，允许他们自行确定经手的进出口货物价格。这样一来，行商就成为受政府委托、获得政府特许、专门从事对外贸易的商人集团。他们既协助朝廷，又代外商向广东海关纳税，不仅充当中外贸易中介，而且承担着管理外商的责任，等于是一群不拿朝廷俸禄的政府工作人员。外国人想和清政府做生意，要先过这一关。

政策上的阻碍，外国人还可以想方设法地得到通融，但是中国统治者以天朝自居的态度让他们倍感羞辱。乾隆五十七年（1792年），英国政府派出一支以马戛尔尼伯爵为首的庞大使团来华，这是英国政府派往中国的第一个外交使团。次年，使团抵达天津大沽，他们带来了不少欧洲最新的科技成果，例如天体运行仪、望远镜、地理运转全架、天球全图、地球全图等天文地理仪器，也有毛瑟机枪、连珠枪、铜炮、榴弹炮等新式武器。这些珍贵的礼品作为英国国力的象征献给中国皇帝，以显示自己的诚意。乾隆皇帝在热河避暑山庄接见了他们，然而文化和习俗上的重大差异使这次会见变得不那么愉快。

在英国人看来，这是一次庄重的正式外交活动，可在清政府看来，这是“远夷”慕义向化的朝贡使团，与周边那些小国的朝贡并无二致。清朝方面要求马戛尔尼等人以三跪九叩的大礼朝见皇帝，马戛尔尼自然不能接受，主张以觐见英国国王之礼朝见乾隆皇帝。双方各执一端，无法达成一致。在洋人面前丢了面子的乾隆皇帝大为不悦。

乾隆皇帝下诏说：“似此妄自骄矜，朕意甚为不惬，已令减其供给。所有格外赏赐，此间不复颁给。”并且他还给出了自己的理由：“朕于外夷入觐，如果诚心恭顺，必加恩待，用示怀柔。若稍涉骄矜，则是伊无福承受恩典，亦即减其接代（待）之礼，以示体制。此驾驭外藩之道宜然。”[(2)]

最后双方各退一步，英方同意行单膝下跪的礼节，中方也原谅了他们的“失礼”。乾隆皇帝在避暑山庄的万树园完成了这次接见，马戛尔尼递交国书，乾隆赐宴并赠送礼物后使团返回北京。清廷本以为马戛尔尼的“朝贡祝寿”任务已经完成，应当踏上归程了，没想到这些“英夷”竟提出了一系列狂妄要求。英国使团提出：一、允许英国商船在珠山、舟山、宁波、天津登陆，从事商贸

活动；二、援引俄商先例，允许英商在北京设立商行，买卖货物；三、请于舟山附近划出一个不设防小岛给英商使用，以便英国商船到此歇息，存放货物；四、允许广州附近的英国人自由往来，不加禁止；五、对从澳门运往广州的英国商货减免税收；六、让英国船货只按照清朝所定的税率缴税，不额外加征，并公布所定税率，以便遵行。我们可以看出，这些要求已经超过了正当的贸易需求，显露出殖民者的侵略主张，中国自然不可能答应。乾隆皇帝断然拒绝："天朝尺土，俱归版籍，疆址森然，即岛屿沙洲，亦必划界分疆，各有专属，此事尤不便准行。"(3)马戛尔尼使团多次与清政府进行交涉，都没有结果，在热河和北京坐了40多天冷板凳之后只好失望而归。

到了嘉庆二十一年（1816年），英国政府又派遣以阿美士德为首的使团来到中国，重提当年马戛尔尼使团的要求。显然他们还是没有吸取教训，在谒见清朝皇帝礼仪问题上争执不下。这次的结果更糟糕，使团连嘉庆帝的面都没有见就被遣送回国。从此之后，中英通过外交途径解决争端的道路被堵住了。

另外，清政府为防范外国势力"勾结内地奸民"，于乾隆二十四年（1759年）单方面出台《防夷五事》，嘉庆十四年（1809年）制定《交易章程》，道光十一年（1831年）又续定八条章程，对外国人的限制可谓一次比一次严厉。外商不仅不能在广州过冬，而且连女性家眷都不能带来，每月逢三、八日才能到附近游览散步，平时就只能老老实实待在商馆之内。朝廷对中国人与英国人任何形式的私下接触都不允许，如有违令者，必受重罚。对于当地官员来说，他们最关注的就是"夷人"是否安分守己，是否按时纳税。在他们眼中，只有万事太平才能保住自己的乌纱帽。清政府对英国商人的歧视与戒备可见一斑。

显然，这种规定只会严重阻碍对外贸易的发展。不仅如此，清朝的最高统治者对从事外贸的华商、华侨也毫无保护，而且倍加歧视。清朝闭关政策的影响无疑是恶劣的。相较于政策上的闭塞，精神上的自我封闭才是最危险的：它不仅关闭了对外贸易的大门，造成闽粤浙等沿海地区民生日蹙，对社会经济危害巨大，也妨碍了中国人对西方先进科技与思想文化的学习吸收。当西方走上近代工业化道路时，中国仍在茫茫黑夜中摸索，对外界一无所知。

此时的大清帝国从上到下都沉迷于天朝上国的美梦之中，全然不知赖以维系其宗主地位的勘合朝贡贸易体系已濒临崩溃，自身也风雨飘摇。放眼四方，越南为法国人所占，印度已沦为英国的殖民地，西班牙人则把菲律宾的华商势力清扫一空。日本的做法值得借鉴，从16世纪末西方殖民者来到日本后，德川幕府划定长崎一地通商，接纳外国商船。荷兰的“兰学”更是成为上层知识分子中十分风行的学说，为日本人了解外部世界打开了一扇大门。在学习大量西方先进科技与文化的同时，日本也得以逐渐摆脱中国的影响，清帝国的外交困境日益严重，以往坚实而稳固的朝贡贸易体系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

英国人把对清政府的厌恶通过笔记或游记的方式带回了西方，进而引发了整个西方世界的不满。在当时和后世西方人的笔下，这段时期的中西交往是令人愤慨和无奈的，中国意味着打压、侮辱、掠夺和腐败的一方，英国商人扮演了受害者的角色。中国的形象被肆意抹黑，这是清政府实行愚昧落后闭关政策的结果，也是后来一众英国议员叫嚣对中国实行武力“惩罚”的依据，虽然在清政府看来完全不是那么回事。满朝文武没人能想到，就是这些在他们看来不服教化的狂妄“英夷”，竟会在若干年之后带着他们闻所未闻的坚船利炮再次“造访”中国。

中英贸易冲突

在贸易方面，中英双方也积累了巨大的矛盾。中英贸易的第一个矛盾点集中体现在清朝长期保持贸易顺差地位，而英国处于贸易逆差地位。18世纪末，英国输出到中国的毛纺织品、金属制品和棉花三类主要商品的价值总和，仅仅相当于英国从清朝购入的茶叶这一项商品的价值。英国人想要购买清朝的生丝、土布、瓷器等商品，就不得不付出大量的银圆。据粤海关计算，仅广州一地每年平均就流入上百万银圆。“夷船必待风信，于五六月间到粤，所载货物无几，大半均属番银”[(4)]，这哪里是商船，分明就是满载银钱的宝船。

中英贸易冲突的第二个矛盾点就是清朝关税的透明度问题。任何一个独立主权国家都不可能任由外国商品冲击本国市场，所以往往会设立关卡，征收关税，以保护本国商民的利益，发展本国经济。税率根据实际情况适时而变，就如同一道城墙一般，在外国商品强势时提高税率，以关税壁垒的方式抵御外国的经济入侵。不过，在当时欧美国家已经有一个约定俗成的规则，即无论关税怎么变化，税率公开是基本原则。可英国人在东方碰到了一个“不讲理”的对手，以天朝上国自居的大清视对外贸易为羁縻四夷的手段。清康熙年间规定关税正额为白银4.3万两，而且这一规定一直延续到第一次鸦片战争时期。可让人没想到的是，随着贸易增长税、款增加，超收部分竟越来越多，到乾隆年间关税正额已超出85.5万两白银。

那么这些税有哪些种类呢？第一种税目是船钞。明代称梁头税。该税按照商船的大小分为三等，每艘征缴白银1400两至40000两不等。如果嫌太贵，实际征收时也可以打个七八折，当然为何打折、打几折也是大有学问。第二种税目是货税。“凡商船出洋进口

货物，按斤科税者为多，有按丈、匹、个、件者，各因其物，分别贵贱征收。”[(5)]这是按照进出口商品本身的价值征税，一般按照“百中取二”的原则征收，实际上附加税却往往超过正税数倍。第三种税目是规礼。这种税就很不讲规矩了，可以视为清朝官员的灰色收入。征收的手段，有强行勒索、吃拿卡要等，在到手之后再一同分赃。当时，这是海关约定俗成的规矩，这也是粤海关官缺一向被视作肥缺的原因。

不仅如此，当时的外国商人想要进口货物，必须先过火足、开舱、押船、丈量、贴写、小包等各类名色30条；想要出口货物，还有验舱、放关、领牌、押船、贴写、小包等各类名色38条。整个进出口贸易之艰辛可想而知。更糟糕的是，其征收的额度很随意，全凭征收者的心情，于是大把的银子就进了海关官员的口袋。外国商人要做成一单生意，困难重重，如此费心费力，自然会招致诸多不满。

雍正时期，曾决心整顿陋规，一举查出粤海关“规礼”数万两。虽然雍正将这些非法所得以归公的名义收归国库，但海关规礼照收不误，各国商人还是饱受其苦。如此混乱的关税制度和贪婪的官吏，让英国商人深受其害。同时，与其做生意的华商也被狠狠压榨，只是敢怒而不敢言。

中英之间贸易冲突的第三个矛盾点是“商欠”。所谓“商欠”就是清朝行商所欠外商的债务。行商作为中英贸易的中介，会代销英商货物并收取货款。英国人倒也乐享其成，货物交给本地商人代为销售自然不愁销路，大大减少了卖不出去的风险，卖得的货款就当作贷款放在行商那里，鼓励他们努力扩大销路，等时间到期再连本带息拿回，岂不美哉？这些商人心中的如意算盘打得很响，却没有想到大多数行商其实做的也是小本生意，手上没有那么多流动资金，一旦货物卖不出去，手上资金链断裂，就会面临无力偿还贷款

的境地。久而久之，利息越滚越多，债务人哪怕卖儿卖女也无法清偿，这笔钱也就成了烂账。

那时，没有今天的破产清偿和法律保护，发生跨国债务纠纷后清政府也没有有效的办法解决双方的矛盾，以至于后来“商欠”事件越来越多，数额也越滚越大。清政府虽曾三令五申清理商贸交易的尾欠，但直至鸦片战争爆发，商欠还有300万银圆。英国商人为了索要债款，有时令商船故意拖延不进港口，以示要挟，有时甚至会鼓动英国的印度殖民地政府派出军舰武力讨债，结果进一步恶化了中英两国的外交。

虽然中英之间的贸易关系有互补的方面，可就实际需求而言，两者并不平等。对于任何一个公司来说，出现长期现金净支出必然会导致亏损，进而使经营陷入困境。国家也是同样的道理，即使从新大陆获得再多的贵金属，也经不住如此花费。正在发展的工业革命更需要庞大的资本支持，英国人必须想办法扭亏为盈。

以英国为首的资本主义国家对华销售商品、开拓对华市场进而攫取更多利益的计划遭到深闭固拒，这是英国从未遭遇过的窘境。愤怒的英国人决心以一种特殊商品——鸦片作为对华输出的主要商品，从而深刻地改变了这个古老东方帝国的命运。

鸦片本来作为一种药品来到中国，它的主要成分生物碱——吗啡能够缓解病患的疼痛，但它同时也麻醉了中国人的精神，成为严重摧残中国人身心健康的元凶。猖狂的鸦片贸易和走私从根本上改变了中英贸易的格局，中国迅速从贸易顺差国转为贸易逆差国。道光十七年（1837年）时，英国输往中国的鸦片总值已经超过中国输往英国的商品价值总和，中方的贸易逆差已达800万两白银。而且，更多的白银是由鸦片贩子走私运输的，没有纳入官方统计。两

者相加，估计道光十三年（1833年）以后中国每年白银逆差1000万两，鸦片贸易和鸦片走私给中国社会带来深重的灾难。

恐怖的“银荒”

鸦片不仅是一种危害甚大的毒品，毒害人们的身体与精神，还会造成大量白银外流。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大额收支都用白银结算的国家来说，损失大量白银的后果是致命的。那么，为何小小一锭银两能够产生如此巨大的危害？清政府又对白银有着多大的依赖？

看似繁华的市场之下潜藏着巨大的风险。中国本身银矿不多，开采也不充分，白银基本靠对外贸易输入，这便意味着政府于无形中放弃了之前一直垄断的货币发行权，也就大大削弱了政府以铸币调控市场经济的能力。一旦银钱比价的这种微妙平衡被打破，政府就很难及时做出有效反应，进而引发经济的巨大动荡。这种情况在以往的农业社会中很少出现。因为在国际贸易不发达的情况下，资金的流动很少超出国境。可鸦片的到来改变了这一切，它的高成瘾性和高附加值，使它能迅速打败其他传统商品，占领市场。

鸦片倾销带来了银钱比例的失衡，进而引发巨大的社会危机，导致清代社会经济濒临崩溃。农民、小手工业者、小商贩等出售自己的产品时，一般都以铜钱作为交换中介。而向政府完税时，再把铜钱按照银价折算成白银。现在白银数量迅速减少，显然会导致银价上涨，银贵铜贱。19世纪初，一两白银能够兑换1000文铜钱。到19世纪30年代，一两白银已经能够兑换1700文铜钱，银价上涨幅度达到70％。后来甚至突破2000文大关，此后更是常年保持在每两兑换1800文铜钱以上的水平。

对于如此可怕的上涨幅度，损失最大的就是广大普通民众。不仅平日买卖要付出更多成本，赋税负担无形中也大幅上涨，大批平

民难以承受，继而陷入贫困。用一个简单的经济学原理解释，就是白银大量外流使国内市场货币流通总量减少；货币和商品流通速度明显放缓，令民众购买力大幅下降，从而出现商业萧条、店铺倒闭的现象；最后社会经济濒临崩溃，财政更加困窘。一场无法遏制的“烈性传染病”在整个中华大地上肆虐，所有参与经济活动的人都不可避免地卷入其中，“银荒”逐渐变成“民慌”。

某种程度上说，“银荒”危机就像一根导火索，点燃了本就蕴藏重重矛盾的中国社会。它也像一面镜子，折射出中国社会与经济危机产生的深层原因。直观地看，鸦片战争前后，中国的货币（尤其是白银）供给严重不足，导致农产品和手工业产品的价格不断下降，农业和手工业——这两个维持普通人民基本生活的生产领域损失惨重。

“银荒”一至，受压榨最深的无疑是农民。在种种苛捐杂税下，农民要缴纳每年所得的半数以上。即便如此，清政府还在想办法敲骨吸髓。虽然按照顺治十四年（1657年）的定例，各省缴纳地丁杂税的比例应该是银七钱三，但官府借口制钱笨重，不便运输，要求农民缴纳的米粮还要折色，有的甚至要先折钱再折银。钱价贵于粮价，而银价又贵于钱价，一来二去老百姓只能获得一点儿远低于其劳动成本的报酬。这样算下来，农民等于多缴了之前一倍的税负，“以昔日两年之赋，足今日一年之额”。正所谓谷贱伤农，农民辛辛苦苦劳作一年，结果往往是不敷工本，其直接表现就是他们的生活水平每况愈下。据统计，1840—1850年，农民的购买力指数降低了约1/3。等到土地已完全无法满足农民的生存时，农民如果不想变为饿殍，势必会化作流民盗匪，啸聚一方，危及统治秩序。

而在地主阶级和官僚阶层看来，农民作为最底层的劳动者和供给者，理所应当成为他们剥削的对象。虽然在朝廷的高额税赋下，地主因拥有更多的土地而要去承担更沉重的赋税，日子也过得紧巴

巴。但是，地主总有办法转嫁这些赋税，或者通过折色的方式不断加大对佃农的剥削与榨取，或者是隐瞒户口，“大户包揽小户，小户附托大户”，结果自然是“取偿于弱户”。对于此等无法无天之行径，官府却听之任之。毕竟很多地主豪强身上都挂着士绅的牌子，与官府有千丝万缕的联系。自古“君王与士大夫共治天下”，他们作为皇权在基层的代理者，受到了更多的优待。可以说地主阶级只是看起来压力很大，实际上他们早已把沉重的赋税转移到贫苦的佃农身上去了。

与之相比，商人也好不到哪里去。农业和手工业生产受到如此严重的损害，必然会导致商业萎缩与萧条。毕竟大批农民和小手工业者的贫困与破产，会导致其购买力严重不足，商人从事正常的商业经营几乎无利可图。这直接导致了商业萧条，大量商店关门，集市闭市，昔日繁华的江南一带呈现出萧瑟之象。在此种情况下，商品和货币的投机买卖活动却是愈演愈烈，不断引发市场的剧烈波动。

商业上的危机在当时的银号上淋漓尽致地表现出来。比如，“银荒”之前的北京可谓“万方辐辏，商贾云集”，千余家钱铺云集京城。“银荒”发生后，有的银号参与投机亏光了自己的本钱；有的放款收不回来，导致坏账严重；更多的则是遭到大面积的挤兑。民众深恐银贵铜贱的趋势愈演愈烈，争相前往银号提取银两，逼得银号大面积关门，情形一片惨淡。

大商人如此，小商贩和手工业者等就更为悲惨了。本来经营规模就小，资金也匮乏，就指望用薄利多销的法子维持生计。结果“银荒”发生后，商品销量急剧下降，小本生意利润微薄，现在钱价贬值速度如此之快，到手就等于亏钱，更何况要购买新的生产资料多半是要用白银的。不管再怎么提高售价，降低成本，也不可能赶上银钱比价上升的幅度，亏本几乎是不可避免的。

有血本无归者，就有赚得盆满钵满者。商业的萧条反倒给了高利贷投机资本以兴盛的机会。当时的行情，不管是做买卖还是投资实业，不仅无利可图，甚至还可能血本无归。商业资本在本质上是趋利避害的，在这种情况下必然会转向更为保值的土地，导致土地兼并的趋势进一步加快，农民破产更快。或者通过别的方式牟取暴利，比如当时的当铺，在经营典当业务中还会故意压秤。出银时一定要在每两上轻个两三分，进银时则要求足色，每两一定要重个两三分，一来二去就等于多收了四五分的利息。这实属“霸王条款”，可清政府无所作为，势单力薄的平民即使遭受如此盘剥也无处说理。

对银货的囤积居奇与肆意投机更是司空见惯。虽然此时的银号还没有现代银行的一些管控手段，但已经隐隐显示出私人垄断资本对市场的控制企图。这从另一个方面恶化了本就十分严重的“银荒”，经济陷入不可避免的恶性循环。

可以说整个“银荒”期间，除了少数投机者，几乎所有参与商品交换的劳动者、生产者及消费者都真切地感受到了这场规模浩大的冲击，并且无不损失惨重。

更令清政府头疼的是，不仅自己的几大重要税源都受到了冲击，而且流民越来越多。这些人就算不沦为盗匪，也会托蔽于豪强富户门下，成为所谓的“黑户”，实征地丁银数可以说是越征越少。各处榷关也因为商业萧条，榷税有绌无盈。至于盐税，老百姓穷得连盐都买不起，以至于到处充斥私盐，屡禁不止，盐课收入也随之大减。

清政府面临巨大的财政危机，财政收支盈余大幅减少，财政状况日益恶化。据载，乾隆五十四年（1789年）户部库存银数为6000

余万两，嘉庆十九年（1814年）骤降至1240余万两，至道光三十年（1850年）仅剩800余万两。

这足以证明“银荒”发生后，尤其到了19世纪中期，清政府的财政已困难重重。可“屋漏偏逢连夜雨”，“银荒”未完，“钱荒”又至。之前政府的各项财用全都要由户部的银库发放，“银荒”发生后，清政府可以说是急得焦头烂额，甚至连户部银库都已经入不敷出，已然严重危及统治根基，清政府自然是更为贪婪地从民间搜刮白银。这样一来，民间银两更加稀缺，飞速贬值的铜钱已经超出了人们的心理预期，大家争先恐后地用铜兑银，都不愿意使用铜钱。市场上又迎来了“钱荒”，民间市场一片混乱。可在朝廷看来，白银就是帝国的基石，一切都是为了维持统治，哪里还管民众的死活？

古语常言“开源节流”，道光皇帝倒是带头节俭，身穿带着补丁的朝服，可大清的贵族豪绅仍然奢侈无度，肆意挥霍百姓的血汗。事实上，“银荒”发生后，清廷的各项支出不仅没有缩减，军费支出还有增加的趋势，显然是出于维护统治的需要。中国本就缺银，找不到其他可以进口白银的渠道，白银的流通总量就无法大幅增加。统治阶级再怎么厉行节俭，如果不能解决缺银的根本矛盾，事态就不会有根本性的缓解。

“节流”不成，“开源”方面倒是花样百出。为了能够更加高效、彻底地盘剥农民，清政府想出了种种办法。比如“截串 ”之法，今年预征明年之税，明年复征后年之税。如此透支未来的潜力，以至于后来者无可复征。还有卖官鬻爵的“捐监”制度，美其名曰“捐纳”，实则是拿着豪绅富商的白银来填补空虚的国库。这些捐官的人走马上任之后，自然是想方设法大加搜刮，以弥补自己的损失。如此种种，放在历朝历代皆是亡国之象。统治者既不思如何减少“银荒”危害，又不思如何变法图强，无非是为一己之私将

压力层层下放，迫使底层农民破产，沦为流民。可官员想保住自己的乌纱，总要收齐税赋，于是中小地主也倒了霉，相继没落，整个帝国的基层统治千疮百孔。

鸦片下的博弈

面对内忧外患，清王朝统治集团不是没想过解救之法。既然祸首是鸦片，那是否应当立行禁烟呢？事实上早在鸦片战争之前，朝廷就为是否禁烟分为两派，展开了长达两年的论战。主张“驰禁”的认为，反正鸦片也是越禁越多，干脆就使其合法化。一方面能让国家多征税，另一方面也能节省禁鸦片的开支。甚至有人主张，可以鼓励有条件的地区自行种植鸦片，增加农民收入，抵御外国鸦片进口以避免白银外流。这种论调在今日看来颇为滑稽，可在当时竟颇有市场，而且受鸦片毒害最深的广东地区官员反倒最为支持此决议，足以说明其与毒贩利益纠葛之深。好在道光皇帝思路还是很清晰的，对禁烟一事比较坚决。正如林则徐所言，若不对鸦片立行禁止，就会导致“中原几无可以御敌之兵，且无可以充饷之银”。在清政府看来，前者虽然糟糕，但军事力量的薄弱对于自己这个“天朝上国”并不会造成致命的威胁，后者才更危险。观前明旧事，偌大的明朝正是因为财政紧缺，连军饷都发不起，才导致将士离心离德，最终亡国。这是清政府万万不愿看到的。鸦片带来的那一点利益，与帝国基础的崩溃所带来的巨大成本相比，简直微不足道，显然禁烟已成为不得不行之策。

可是，禁烟真的就如虎门的一次销禁那么简单吗？对于英国来说，鸦片已成为一项不可或缺的财政收入来源。据统计，从19世纪开始，在英国印度殖民地政府的财政收入中，来自鸦片贸易的收入比重越来越高，嘉庆五年（1800年）只占3％，道光十年（1830年）以后就超过10％。[(6)]而其中相当大的一部分都不是通过正规渠

道，而是通过走私的方式流入中国。今天我们已经知道，18至19世纪初的鸦片走私道路一般有两条：一条是靠英国散商在当地行商的庇护下夹带鸦片进入广州黄埔，再流入内地；另一条是沿海商人先在澳门购得鸦片，然后在外海分批卖给各家船户或直接销往内地。第二条路一度使澳门成为“西方向中国输入鸦片最主要的仓储地和转运站”。

可这个贸易体系却意外地遭遇到挑战。道光元年（1821年），有个叫叶恒澍的澳门屯户在广东杀人被抓，但在审讯时，叶恒澍揭发出自己作为中间商向广东很多官员行贿的细节，一时令整个官场震惊。他被改判为贩卖鸦片罪，案件也成为走私案件，后官府人员为了保住自己的乌纱帽，不仅断绝了澳门与黄埔之间的交通往来，还加大了对鸦片走私的打击力度。这等于抓住了行商的命脉，走私生意的难度陡然上升。在重重压力下，他们不得不放弃承保走私鸦片的外商船只。

可鸦片走私并没有因为官府的查禁而萧条，相反，快速增长的鸦片需求刺激着许多地方缙绅和富豪，甚至连官府差役等都贪婪地涌上来想分一杯羹。他们使用更加灵活快捷、易于躲避官府巡查的武装商船“快蟹”从伶仃洋的趸船接货，然后运往内地分销。这样虽然一定程度上增加了运输成本，但因为有地方势力的保护，鸦片贸易反倒更隐蔽地在地下迅速发展起来。即使官府前来查禁，他们也能提前得知消息，进行转移。很快，一个结构更加严密、分工更加明确的新型走私网络在整个广东沿海遍布开来。

此时，鸦片俨然已成为英国从与中国的贸易中获得最大利润的商品。放弃既得利益显然是不可能的，只有更多地倾销商品才能维持英国东印度公司的繁荣。

有人认为，英国人并不将鸦片视为毒品，毕竟阿片类药物在当时的英国也并不鲜见，但这并不意味着鸦片的存在就是合理的。18世纪末到19世纪初，英国民众可以在药剂师那里轻松地获取鸦片这种专卖药。被大资本家残酷压榨的工人用它缓解身心的疲惫，甚至连贫弱的母亲都会用含鸦片的“婴儿保静剂”减轻育儿的负担。滥用鸦片的情况如此严重，导致了一系列严重的社会问题。为吸食鸦片去抢劫、服鸦片过量中毒、吞鸦片自杀等事件屡见不鲜，犯罪率不断上升，社会秩序混乱。这一切都受到了人们的谴责，他们说鸦片“如此邪恶以致它是最大的民族罪孽”，“我充分相信这个国家怂恿这种罪恶的交易是极坏的，也许比怂恿奴隶贸易更歹毒”。显然英国人也明确知道这是一种易使人上瘾的毒品，但在利益的驱动下，他们毫无顾忌地对外倾销鸦片。这其中也包括不少上流阶层的贵族议员，这也是他们宁愿与这个看似强大的远东帝国开战，也不愿意放弃鸦片贸易的原因。

既然鸦片贸易如此卑鄙，中国方面是否采取了有效的措施以应对鸦片走私呢？答案并不如人意。虽然官方一直打击鸦片贸易，但如此大规模的鸦片走私显然不是英国单方面的行为。之前为鸦片走私商人承保的行商具有官方背景，之后参与其间的各路人马也有官府的影子，至少很多能从鸦片贸易中获得利益的官员是对查禁一事持消极态度的。鸦片在民间泛滥，足以显示清政府基层吏治的薄弱与腐败。

最为讽刺的是，鸦片居然越禁越多。1821—1827年的鸦片年均输入量9708箱，1828—1835年的年均输入量18712箱，1836—1839年的年均输入量又增至35445箱[(7)]，几乎每隔几年就翻一倍，且间隔越来越短。

道光十九年（1839年）初，清政府派林则徐赴广东查禁鸦片，并颁布《钦定禁鸦片烟条例》，试图以断绝鸦片来源与销售的方法

来遏制鸦片贸易。林则徐下令严厉打击外洋趸船和“快蟹”偷运活动，并包围外国商馆，勒令外商不得离粤，最后迫使英美等国商人交出了外洋趸船上的两万余箱鸦片，在虎门将其全部焚毁。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虎门销烟”事件。此事看似振奋人心，实则并未达到预期目的，广东的鸦片供应量很快便恢复到之间的数额。清政府并未意识到他们的对手不是几个洋人，而是一个遍布东南沿海的庞大走私网络，这种情况下只抓几个贩卖鸦片的商人、销毁一点鸦片根本就是治标不治本，鸦片的走私和运销体系仍然存在。

第一次鸦片战争失败之后，清政府的态度很快就软下来了。道光二十二年（1842年），奉命与英军议和的两江总督牛鉴在与英方代表璞鼎查的照会中表示“自禁吾华民之吸食耳”。道光二十三年（1843年）8月，耆英在广州与璞鼎查谈判通商章程时也表示“中国严禁鸦片各条例，均所以约束中国人民，未尝禁及外国”。也就是说清政府发现军力不及英国，为了不继续挨揍，就干脆不管鸦片的输入，只管中国人的吸食。这样一来，鸦片的泛滥就更严重了，光是上海一个口岸输入的鸦片就接近战前总量，以至于中国进口商品大多为鸦片所取代。

清政府软弱的态度被他国看在眼里，它们自然对中国更是轻视，进而提出更多不合理的要求，最终在第二次鸦片战争后鸦片贸易彻底合法化了。

而对普通农民来说，鸦片贸易只会导致一个恶性循环。由于鸦片要经过重重关卡才能到内地，价格被加得很高，大多数农民都吸食不起，所以很快就有人嗅到了商机。洋烟昂贵，本土鸦片市场又几乎没有供给，那自产自销岂不能最大程度降低成本来获取利润？所以大批农民放弃粮食生产改种罂粟，毕竟这比他们辛辛苦苦种粮食还要被官府盘剥要强得多。由于土烟不征关税且运输便捷，价格能比进口洋烟便宜一半，因而得以迅速扩大市场，甚至得到各省官

员的支持。面对鸦片的高额利润，连林则徐都慨叹道：“鄙意亦以内地栽种罂粟，于事无妨。所恨者，内地之民嗜洋烟而不嗜土烟。”但其后果也十分严重，大量土地被罂粟侵占不说，那些终日吞云吐雾的瘾君子哪里还能下地干活？这又加重了本就严重的人地矛盾和粮食危机。

当一个国家的社会秩序接近崩溃，基层治理几乎糜烂的时候，人们便为了自己的生存而顾不上他人，即使明知自己的亲友正遭受毒害。可以说，每一个人既是受害者也是加害者。事实证明，没有强有力的政府和有效的措施，便没有可能从根源解决问题，禁烟也只是权宜之计。

正如我们所知，禁烟最终失败。随着第一次鸦片战争的失败，道光二十二年（1842年），中英签订《南京条约》。这份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令经济主权面临极大的威胁，中国遭受着前所未有的内忧外患的困境，一个“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到来了。

---

(1) 戴逸主编：《简明清史》第二册，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833页。

(2) 故宫博物院编：《〈文献丛编〉全编》第2册，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8年版，第136—137页。

(3) 《清实录·高宗实录》卷一四三五“乾隆五十八年己卯”条。

(4) 《文献丛编》第十七辑，福建巡抚常赍奏，雍正五年七月十九日。

(5) 《钦定大清会典事例》卷一八八，第14页。

(6) John King Fairbank. *Trade and Diplomacy on the China Coast.*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53：64.

(7) [美] 马士著，张江文等译：《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第1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0年版，第239页。

第二章　晚清帝国的财政体系

无财则事事不可为，无政则事事不可决。财政于国家而言极为重要。财政收入关系到能不能有效维持地方统治，能不能进行国家建设，能不能给官员兵丁发放足够俸禄。古往今来，有多少强大的王朝没有死于外患，却倒毙于内忧，深究其中原因，往往都绕不开财政的失衡与崩溃。

中国古代王朝有为前朝修史的传统，为的是吸取前一个朝代甚至历朝历代的经验教训，以免重蹈覆辙。大清帝国同样如此，它沿袭明朝的政府机构，在中央设立内阁，六部中的户部专门负责全国的财政事务，职责范围相当大，可以管理全国的田亩、户口，征收赋税乃至发放俸禄。可以说，帝国全部的家底都要由户部负责，其重要性不言而喻。

下至各省，还有专门的布政使司，类似今天的省级财政厅。不过清朝统治者借鉴历朝历代的经验教训，深知财权的重要性，并不想让省级长官控制财政大权。所以布政使司并不听命于各省总督与巡抚，而是直接对户部负责，只能算中央对地方的派出机构。布政使也和地方督抚没有隶属关系，从而避免地方长官对财权的觊觎。客观地说，清政府在财政制度的设计上已颇为完善。

大体上说，作为一个农业国，清王朝主要在土地方面征收需要的税额。从清代的几大税赋项目来看，田赋占了绝对大头。清初按照人头数收税，将丁银和田赋合并上缴。但这样一来，隐匿户口或者依附豪强的事情就不可避免。这是个困扰中国封建社会2000年的问题，一直得不到有效解决。但康熙皇帝想到一个好办法，既然解决不了户口问题，干脆就废除人头税，于是以康熙五十年（1711年）的人口数作为征税标准，之后“滋生人丁，永不加赋”，正式废除人丁税。从雍正开始全面推行，把固定下来的丁税平摊到田赋

中，征收统一的地丁银，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摊丁入亩”。从那之后，清朝的人口数就一路飙升，在鸦片战争爆发前人口已突破4亿大关。

严峻的人口危机

清朝前期，财政收支主要以量入为出为原则，总体而言盈余较多。嘉庆、道光之前，财政仅在支出时分为起运与留存，收入则统一，可以说并不存在真正的地方财政。中央地方府衙经费均纳入国库系统，经户部核准支用，事后以奏销审核。正所谓“入有额征，动有额支，解有额拨，存有额储”，不管是收入还是支出，每一分钱都花得明明白白。

这样一个看似完备且稳定的财政管理制度是否存在隐患呢？事实上，它最大的问题就出在稳定上。试想下，作为清朝一个普通地方官员，自康熙以来已明确规定“滋生人丁，永不加赋”。人数增长对征收赋税并无帮助，唯一的依据就是田地数量，上级领导每年来调查田亩数量，以此订立征税标准。没多少变化还好说，如果增加，反倒提高了征税标准，给自己增加麻烦。若明年完不成指标，还要受罚。这样思前想后，倒不如少报增加的田地，以求无功无过。当时的不少官员都抱有此种想法，以至于整个清朝中期财政收入增长都极为缓慢。

问题是财政收入增长缓慢，人口的增长可并不缓慢。迅猛增加的人口严重超过了清朝统治者的预期，从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人口正式宣告突破1亿大关，每隔几十年人口就上一个新台阶。乾隆二十九年（1764年）突破2亿，乾隆五十五年（1790年）突破3亿，道光十四年（1834年）达到4亿人口。[(1)]这是一个史无前例的数字，从未有任何一个国家或集体达到过如此规模，也没有任何一

个统治者尝试过统治如此庞大的人口，清朝统治者面前是一条没有人走过的路。

所有人的吃穿用度都要花钱，以农业文明的生产水平要供养如此庞大的人口，实在让清朝的国库力不从心，结果财政的窟窿越来越大。当然最令清朝统治者头痛的还是人口与土地的矛盾，在土地总面积没有爆发式扩张的情况下，人口的过量增长一定会导致人均耕地的缩减。这是一个简单的算术题，却无人能够解答。

人均耕地面积的下降已到怎样严重的地步呢？康熙二十四年（1685年），人均还有27.92亩耕地，足可以养活一大家子；可是到150年后即道光十四年，人均耕地就只剩下2.84亩。

这个数字看起来不算太少，因为今日的中国人均耕地仅有1.3亩，而且还有下降趋势，相较而言清朝的人口危机似乎并没有那么严重。但事实并非如此，一方面今日的中国农产品哪个种类不足，就可以有针对性地进口以弥补国内需求，当时清政府显然没这个条件。另一方面古代并没有化肥农药，也没有播种机、收割机等现代科技工具，按照农业社会的耕种效率，辛苦劳作一年，能混个温饱就不错了。而且，这还是在朝廷减少赋税、风调雨顺、无灾无害的情况下才能勉强实现。万一遇上灾年，官府处置不好，就会出现饿殍遍地的结果。

据保守估计，从康熙二十四年到道光十四年（1683—1834年），粮食的人均生产量下降了一多半，仅有170千克。正因为普通自耕农极为薄弱的抗风险能力，他们才需要更多的土地去维持生存。如果无法达到这个条件，甚至连生存的底线都不能满足，那么帝国的稳定就会遭到严峻挑战。

面对如此严重的后果，历朝统治者一般都采用轻徭薄赋的政策来应对。在很多时候，这的确也是一种最为有效的办法。那么大清帝国的统治者又是怎么做的呢？税的确减了，但百姓的负担却没减。这并不难理解，由于人口总额的迅速上涨，分到每个百姓头上的税负额有所下降，但这个下降的幅度远远比不上人均粮食产量减少的幅度，其结果就是老百姓剩余的粮食仍然不足以供给自己的需要。

这似乎是一个无解的难题。土地与人口的结构性矛盾不可能得到根本解决，能够增加的荒地有限，但增加的人口无限，清政府不敢也不可能实施减少人口的措施，只能坐视情况恶化下去。从今天的角度看，提高土地产出率、发展科技是唯一可行的办法，也是未来的发展方向。不过清朝统治者可没有那么长远的眼光，在那个连蒸汽机的名字都没听说过的年代，指望统治阶级主动发展科技实在很不现实。

如果这个庞大的帝国是一台构造精密的机器，那么财政收入就是维持这台机器可以不断运转下去的基础。在嘉庆、道光年间，财政窘迫已经成为一个不可忽视的问题，各地都想出种种办法拖欠应缴税款，结果户部的存银一天比一天少。康乾盛世的辉煌悄然落幕，新的危机与挑战层出不穷。

并非大家都不愿救国家于危难，实在是有心无力。清朝官吏根本遏制不住贪污风气，赋税征收要收钱，起运要收钱，到了解运入库的时候还要收钱，基本上每过一手银子就少一点。朝廷当然会小心提防，发起高强度的反腐运动，但蛀虫们贪污的手法仍是层出不穷、花样翻新。

以额度最高的田赋为例。国家明确规定征收标准，到了地方就成了另外一个样子，各级官僚层层加征。开始还能控制在总额的

15%左右，之后越来越高。各地官员为了彰显自己的功绩，也为了多拿好处，把一亩地当成两亩来收，把一升的米当成两升来缴。还嫌不够怎么办？干脆谎报灾情，在获得朝廷税收豁免之后，自己再照征不误。在这种风气下，基本上到中央大员下至七品县令皆是争先恐后地征收。更令人惊奇的是，这种近乎明抢的手法居然能够延续100余年。综上所述，财政想不出问题都难。

盐票与盐课

自古以来中国就有盐铁专卖的传统，盐在历朝历代都受到国家的严格管控，当然清朝也不例外。户部有个专门的山东清吏司，它可不是只管山东一地，而是掌管全国盐课的征收。另外，产盐之地也设有专门的管理机构，比如富饶的两淮地区，就有专门的盐政官。

不过，不同地区的产盐成本各有差异，质量也不一而足，并不能一概而论。比如靠海的地方能晒海盐，有盐湖的地方可晒池盐，打井能抽地下卤水的能取井盐，矿物质丰富的还能得岩盐，没这些条件的地方只得花大价钱去外地购盐。

为了不让某些投机盐商从中牟利，清朝沿用了从前的盐引。赁借户部颁发的盐引，才能在指定盐场购盐，再到指定地点贩卖，相当于一张食盐运销准许凭证。商人要向朝廷交钱换来盐引才能合法贩卖食盐，否则就是犯法。

为了维持盐政秩序，避免出现混乱局面，清政府还设置了若干盐引地。每个盐引地覆盖一至数个省，而且不能随便跨省，本省之盐只能在本省使用。

但是，问题也是显而易见的，本地人想吃外地盐就十分麻烦。而且盐引地的划分本身也不科学，身在湘鄂之地，因为属于两淮盐引地，就只能等盐从江南运来，而不能吃近在咫尺的四川井盐；靠近省界的人想吃隔壁盐引地的盐也不行，因为盐引不通用。可再严厉的刑罚也挡不住民众的口腹之欲，靠近隔壁盐引地的民众不可能放着便宜的外地盐不买，去买运费高昂的本地盐，所以一大批私盐贩子应运而生，清政府屡次打击都无法根除，成了盐政的一大顽症。

盐引的发放也有很多问题。因为本身有准入门槛，并不是人人都能拿到，再加上发放者的品行无法保证，垄断的情况就无法避免。当时，垄断了盐引的两淮盐商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这些多来自徽州的商人们可谓富甲一方，当年乾隆皇帝下江南之时，扬州盐商就耗资数十万两为其修建行宫及享乐设施，一时风光无限。但是没过几年就出了“两淮盐引案”，从一起很小的舞弊案开始，最后揪出了几任两淮盐政及诸多盐商，涉案金额多达数千万两，一时震动整个朝野。

自那以后，清政府就加大了对盐商的管束，至少不再允许他们明目张胆地隐瞒收入。可盐政本身的问题，严重拖累了清政府的税收。道光皇帝登基不久，两淮盐区就出现了巨大亏空，如10年间积欠了6500万两白银，数不尽的私盐贩子遍布两淮各地，当地政府根本管不过来，以至于诸多盐商无盐可卖，场面相当凄惨。

危难之际，时任两江总督、总理两淮盐务的陶澍决心站出来改变现状。他仔细调查了当地的情况后，写了封《敬陈两淮盐务积弊附片》奏折上奏朝廷。折中历数两淮盐政弊端，但他并不是一味指责。后来，陶澍又上了封《再陈淮鹾积弊折子》的奏折，拿出了一套自己的解决措施。

道光十一年（1831年），陶澍开始对淮北盐区进行大刀阔斧的整改。但他的第一刀砍向的不是私盐贩子，而是两淮本地的盐商。在陶澍看来，这些过惯了舒服日子的盐商一个个都是“习惯淫侈，醉生梦死之徒”[(2)]，正因为不知自行经理，才让底下人随便糊弄，表面上又隐瞒掩饰实际情况，故意虚报奏销，甚至某些官船也参与到走私活动中。与他们相比，那些走私贩子都还算得上良心，至少他们不会从盐商那里拿钱。陶澍认为，当时两淮盐政如此败坏，与这些人的无德无能有巨大关系，如果任其发展下去，后果不堪设想。

他深知私盐贩子泛滥的根源，不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他们就如韭菜一样，割了一茬又一茬。针对这一情况，陶澍决定废止之前实行的盐引，改行盐票。盐票和盐引只是一字之差，却撼动了整个两淮盐商的基础。之前，清政府每年会根据两淮盐的产量与销售量制定一个“纲册”，规定每年盐引数，然后招商认引，满额即止。当然有资格获得盐引的盐商只有那么几家，中标非常容易，所以两淮盐商并不担心收益的问题。

但改行盐票就不一样了。按照陶澍的规定，盐票不论盐商的身份地位，只要交足盐课就可拿到，而且还是“随号呈验，当堂兑收”，程序十分清楚、简单。这么一来，之前没资格入场的中小盐商也有机会参与其中。只要有了盐票，他们就可以在规定区域内自由运销，省去了大量时间和成本。而且盐价由官府制定，商人不准随便抬价，之前靠垄断盐引发家致富的大盐商们失去了昔日特权，这对他们的实力是一个重大的打击。

但陶澍的手段还不止这些。官盐竞争不过私盐，成本居高不下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各种烦琐陋规比比皆是，买盐引要交钱，运销途中还要收费，一路上大小衙门、差役伙夫、船工劳力都要付出成本，自然不可能在价格上取得优势。陶澍将裁汰陋规作为一项重

要工作，把那些杂七杂八的费用砍掉大半，只要盐课交够各级官吏就不能随便伸手要钱，能跑一回路的也不用跑两回，有效降低了成本。

这一系列措施果真有效，不出数月，两淮盐价显著下降，盐商也有了更多干劲，私盐泛滥的情况也得到了有效遏止。见此情形，淮南乃至长芦、浙江、福建盐区都跑来学习先进经验，把这套做法学过去，都取得了不错的效果。

这样一来，旧有的本地盐引制也没办法继续维持，清政府又不可能全盘禁止民众从外地购盐，所以从咸丰以后，外省盐商到临近盐区贩盐就很少受到阻碍，只要交够过路费，就能顺利通过。

陶澍并不是最后一个改革者。咸丰十一年（1861年），时任两江总督的曾国藩为了解决湘军的军费问题，再次把目光投向盐课这块大蛋糕。他专门设立了淮盐招商局，积极召集商人入股并发行盐票。不过价格可不便宜，大票500引，行销鄂、湘、赣等省；小票120引，行销安徽。而且商人运销最低也要一票，多则不限，不少没购票实力的中小盐商就只能被排除在外。

作为两淮盐商的坚定维护者，曾国藩对外地盐商大举“入侵”的局面十分不满，毕竟这关乎自己辖区的税收问题。为了维护自己的利益，他坚定地要求“重税邻私”“严禁邻私”，甚至希望朝廷直接封掉四川井盐井灶，以断绝川盐输入。

对于这种只顾自己不顾他人的做法，四川总督十分不满，毕竟本省之盐对外出售，也能为己方提供财政收入。就连之后担任湖广总督的李鸿章也不情愿，明明川盐便宜，何必要食淮盐，养肥一批两淮盐商，于自己却无益处。最后经过讨论，双方达成一致意见，

湖广地区的配额是淮八川二或淮七川三，总之川盐不能超过半数，这才暂时平息了纷争。

同治五年（1866年），李鸿章又提出了“环运之法”。当时清水潭堤需要修缮，李鸿章就规定只有捐银修堤的人才能获得盐票，每票价值400两，相当于拿盐商的钱去修堤。虽然盐票价格不菲，但潜在收益巨大。因为购盐票者卖完盐后来年还能拿到盐票，并且一直可以拿到，相当于拥有一个专属身份。

显然这些措施都是有利于大盐商的。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朝廷规定“两淮盐票按年认捐本10万两，按引摊派”，再次出现票商垄断的局面。

漕银与漕运总督衙门

漕银也是重要的财政收入来源。自宋代以来，中国的经济重心已从北方转移到了南方，特别是东南沿海。要把这些地方的财政收入运抵京城就得走水路。开始运的是粮食，也就是漕粮，后来觉得不便，就折合成白银，即漕银。户部设立云南清吏司专门管辖漕政；淮安也有一个漕运总督衙门，总管漕银从征收到运输的全部流程。

漕运是大清帝国的命脉，南方富饶之地所产粮米源源不断地运抵京师，维持整个国家的运转。但这个运转了几百年的漕政体系却藏着巨大隐患。首先是费用问题。不管是漕务经费还是漕运定额，都是几十甚至上百年前定下的老规矩。地方物价和钱价都变了几轮，这些费用还没什么变化，一旦运河因战争断绝，超支就是难免的事。

其次是漕运长官推卸责任。若是漕运亏损，责任也会被归结为下属办事不力，或者是州县配合不力，自己并不会承担朝廷太多责难。而且漕运各级官吏都特别善于从船户商号那里收取规费，层层加码，让百姓苦不堪言。这样一来，漕运想不亏损都难。此外，河道长期淤塞，无人打理，过往船只宛如行于泥沼，运输费用增加，进一步提高了成本。

清王朝可不想坐视这条主动脉出现问题，自然也是想过补救之法，比如河运改海运，官运改商运。走海路可以免除狭小拥挤的河道限制，高挂云帆，破浪而行；官运制度老旧腐朽，就让以利驱动的商人来办理，以避陋规之害，可谓两全其美之法。

这个想法的确突破了以往的思维限制，明眼人都能看出来，这种做法可以有效地降低成本、节约时间。连魏源都称赞此法有利国、利民、利官、利商之“四利”和国便、民便、商便、官便、河便、漕便之“六便”。[(3)]道光年间就试图在江苏进行漕粮海运，自黄浦江出海北上。

不过这一举措遭到了守旧派的重重阻拦。不管是漕运总督衙门、押运船工，还是整条线上靠运河吃饭的人，都不想丢了自己的饭碗，所以他们屡屡上奏朝廷，请求撤回成命。道光二十八年（1848年），一件意想不到的教案令之前的海运设想付诸东流。这一年三月，几个英国传教士跑到江苏青浦县（今上海市青浦区）传教，结果与当地百姓起了冲突，最终在青浦县令的帮助下才得以逃脱。英国领事阿礼国借此大做文章，将其上升到国际争端的高度，然后直接把军舰开到了黄浦江口，漕船没法北上，京城的米价随之而涨。清政府只好同意惩处涉事官员，以换取英方解除封锁。此事过后，清政府再也不敢实行漕粮海运，只得回到老路上。

后来，因为南方太平天国和北方捻军的实力日趋壮大，漕运基本断绝，苏浙的漕粮都只能走海路抵达天津，总算在旧有的漕运体系上开了个口子，可其他省还是按照原有的路子走漕运。为了省去其中的麻烦，清政府要求其他有漕运的省份通通把漕粮折合成白银运输，一般每石漕粮能够折银三到五两。清政府完全可以拿这些钱在市场上甚至是洋人那里购买粮食，自海路运抵天津，以解决京城百姓的吃饭问题。在这种情况下，南方的漕粮就没那么重要了。

昔日繁忙的漕运总督如今成了摆设，在经历了一连串 的变故之后，清政府也不得不重新审视漕运存在的必要性。到了光绪年间，朝廷已有意向将老旧腐朽的漕运制度直接废除。意识到自己即将失业的漕运总督恩寿大惊失色，赶忙带着一众衙役幕僚向朝廷抗议，甚至提议以自己的驻地淮安清江浦为中心，把江苏一分为二，单设一个江淮省，漕运总督衙门在此继续办公。当时的江苏省北边归江宁布政使管，驻地江宁府（今南京市）；南边归江苏布政使管，驻地苏州府，所以恩寿的这个提议并不突兀。

当时正值晚清新政，新设的督办政务处与之前的军机处职能分割不清，双方经常对着干。政务处对划分江淮省的提议颇有兴趣，最终仅用两个月的时间就通过了这项决议。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一月，清政府正式宣布了江淮省的成立，治下包括江宁、淮安、扬州、徐州四府和通州、海州两直隶州。此议一出，江苏省籍的官员顿时群情激愤，一方面是这一决定并未征求广泛意见；更重要的是这样一分，原本的江苏省实力大为削弱，不复昔日江南重镇的地位。

最后仅过了三个月，这一决议就被撤销，江淮省也随之消失在历史的长河中，漕运总督衙门试图复出的梦想自然也化为泡影。

户部银库亏空案

漕运改革的过程并没有持续太久，因为随着西方殖民者的到来，一切都改变了。鸦片的大量涌入让中国变成了瘾君子的“天堂”，同时白银的大规模流出也催生了钱荒。

当英军统帅义律率领军舰驶至广州港的时候，清朝君臣还没当一回事，只认为是蛮夷侵扰，结果现实却狠狠地打了清政府一巴掌。随后英军舰队一路北上，大清帝国这才手忙脚乱地进行抵抗，但没想到竟会遭到可耻的失败。英军一路航行到大沽口，清政府不得不派琦善出面进行和谈。

和谈的最终结果就是签订了我们熟知的《南京条约》。毫无疑问，以这样的条件结束战争是屈辱的，但未必是最糟糕的。早在战争之初，因为自家的船追不上也打不过英舰，林则徐便在广东修建了一系列防御工事，试图用以静制动的办法抵御入侵。不想英军一路北上，定海、镇海、宁波等地相继陷落。同时，又因为清军的兵力部署十分分散，沿海兵力不足，朝廷只能从内陆省份紧急调兵前往浙江支援。俗话说，兵马未动，粮草先行，要调动军队，总要供给军粮，保障充分的后勤供给，这可不是一笔小开支。结果路途实在太远，一直到战争结束，军队也没集结完毕。

在这场长达两年多的战争中，清朝军费支出高达4000万两白银，比《南京条约》所支付的赔款2100万银圆还要高出不少。军费和赔款两项加起来估计达6000多万两白银，相当于当时清政府一年多的财政收入。这也难怪清政府宁愿不要面子也要尽快结束战争，毕竟战争实在太烧钱了。为了少花点军费，为国库减轻点压力，清朝君臣不得不打碎了牙往肚里咽，接受这种屈辱性的条约。

没有人会想到，战争刚刚结束，一桩突如其来的小事竟会揭发出一起深藏于暗流之下的腐败大案……

道光二十二年（1842年）十一月初二，有个叫张亨智的人想为自己的次子张利鸿报捐知州。此人在城里经营着一家万泰银号，于是就拿出1万多两白银送到户部报捐。正巧他的弟弟张诚保又是银库库丁，所以行事颇为方便。当时，张亨智的姐夫周二带着11袋银子来到银库，由于业务繁忙，一直等到晚上才开始交库。按照户部规定，银两入库时必须有人在旁边监视，逐一报数并登记在册，以免有偷漏之嫌。不过入库时，张诚保不知是有意还是无意，多报了入库的银两数，周二也是装聋作哑，很配合地完成了整个流程。结果是11袋银子只入库了7袋，余下的4袋被截留，大概4100两白银。

这种事在银库也不是一次两次，以往大家也就睁只眼闭只眼，但这次不知让哪个库丁说了出去。周二在回去的路上就被人堵住，强行索要封口费，否则就要报官。周二无奈之下掏了几百两银子，才得以走脱。回银号存好银子，本以为万事大吉，不曾想又有人直接找上门来敲诈勒索。张亨智可没那么好说话，直接就将其呵斥出去。结果就捅了娄子，几个没占到便宜的人便把此事上报给了官府。

衙门的人一看，大为惊诧，他们知道侵吞户部银款可不是个小案子，于是又将此案转交刑部。刚开始大家都没太当回事儿，在不少人看来，户部的银库亏空实在是司空见惯，这几千两白银也算不上大数目。调查了几个月也没实质性的结果，银库只是重申了规章制度而已。

可对于这件“小事”，偏偏有人就认真起来。当朝大学士潘世恩听闻此事，怒不可遏，满怀正义地向道光皇帝上了一封奏折，详细叙述了银库亏空案的来龙去脉，要求朝廷一定要严肃法纪，严惩此事。潘世恩的身份可不一般，他当时已经74岁，是经历过乾隆、嘉庆、道光的三朝元老，在朝中地位很高。这封奏折直达天听，道

光皇帝读罢大为震怒，皇帝本人素来节俭，朝服都打着补丁，不承想眼皮子底下竟会出此丑闻，于是命令军机大臣与刑部严加查证。

查证的结果远远超出所有人的想象。刑部方面报告称实应存银约1218.2万两，而统计存贮各项实存银两约292.9万两，实际亏银约925.3万两。道光皇帝知道户部银库有亏空，但不知亏空已达到如此惊人的程度，贪婪的蛀虫几乎要把整个银库都给掏空了。

此时的清政府，外要赔偿鸦片战争的赔款，内要治理黄河决堤，正是财政最为紧张之时，户部却出了这么大一个窟窿。显然这么大的亏空数额不是一两个人在短时间内就能做到的，必然是积弊已深。道光皇帝在震怒之余责令刑部要严查到底，拔出萝卜带出泥，涉事官员共计321人。

以这起户部银库亏空案为起点，清政府开始了立国以来规模最为庞大的一次反腐运动。最开始就是追缴欠款，办案官员根据主犯的供述，一条一条地深挖。可这也只能解决目前的问题，以往几十年甚至上百年的亏空可没法一一登记造册。

于是道光帝想出一个法子，既然以往的管事者无法自证清白，干脆就默认他们都有责任。从嘉庆五年至道光二十三年（1800—1843年）间的所有库官和查库御史都要按在任期间每月1200两的额度罚款，历任管库大臣每月罚银500两白银，查库大臣6000两白银，已故者减半。到最后，因为要查的人太多，连办案的人都不够，只好让他们暂且革职留任，以戴罪之身查罪。

当然还有追缴库丁、增加库银特别税等措施，希望能尽量弥补亏空。但现实情况是，即使采取了如此激烈的措施，总共追缴回来的银两也不到亏空额的一半，只能说勉强填补了一点窟窿。

恐怕连大清帝国的统治者也无法预料，这么一个看似普通的小事竟会引起如此轩然大波，大树的根须已经悄然腐烂，这起事件也不过揭开了冰山一角。更多更复杂的问题，已经不再是皇帝本人能够解决的了。对于自己的银库都不能做到有效监管，就更不必说对底下各级官僚的实际控制了。清朝这个庞然大物，已经有了瓦解的迹象。

残酷的“土客之争”

道光三十年（1850年）正月，一直在想办法堵窟窿的道光皇帝于北京驾崩。他的离开结束了一个旧时代，也开启了一个新时代。当时年仅19岁的皇太子奕登上帝位，并于第二年改元咸丰。也就在这一年，一个叫洪秀全的人在广西金田发动旨在推翻清政府统治的起义，这场起义大火很快便燃至全国。

太平天国运动的爆发植根于当地极为严峻的生存环境。在整个中国南方地区，民间有两大集团：一方是土家人，也就是很久以前就定居在本地的土著人；还有一方是客家人，他们的祖先为避战乱灾荒从遥远的北方迁徙至此。经济较为富足的南方吸引了四面八方的外地人，但土家人与客家人互相看不顺眼。前者认为后者在抢夺自己的生存资源，为求生存，他们不得不奋起反抗。

其实，很多本地人也不过是早点儿到来的客家人罢了，双方并无本质区别。但在资源困窘的情况下，矛盾就不可避免地激烈起来，基本上每年都会发生各种围绕着水源、耕地或其他财产的冲突。而且不同于一般的小打小闹，由于南方常常以大姓聚居，双方常常以整村为单位，出动人数少则几十，多则数千。人人手持自制的竹枪、长矛，甚至还有火药枪，械斗规模堪比小型战役。即使“敌人”可能只是相隔一条沟壑的邻村村民，但在群体意识的煽动

下，不会有人顾及邻里之情。在经年累月的仇恨渲染下，矛盾只会愈加严重。

洪秀全就生长在这样一个矛盾与冲突的地方。

生于广东花县的客家人洪秀全很早便感受到外界的压力。他自小接受传统儒家教育，熟读四书五经，19岁便被一家乡村私塾聘作老师，不过他并不甘心在偏僻的乡村中教书。道光九年至二十三年（1829—1843年），洪秀全连续4次考科举，都不幸名落孙山。失意的洪秀全只好寄意宗教，但偶然间得到了一本基督教宣传小册——《劝世良言》，便走上了传教的道路，之后他又成立了拜上帝会。

洪秀全的事业拐点发生在广西。在大山之中，本来能够耕种的土地就不多，再加上人口无节制地增长，普通农民的生存状况极为严峻，这为起义的爆发提供了绝佳的土壤。而广西的客家人境地更为糟糕，他们不仅面临官府无休止的压榨，还要忍受来自本地人的歧视与排挤，佃农、雇工和普通矿工成了客家人最为集中的几大职业。

正所谓哪里有压迫，哪里就会有反抗。客家人当然想要改变自己的命运，拜上帝会恰好迎合了他们的心里需求，两者自然而然地结合在一起，拜上帝会在广西的规模愈加壮大。在拜上帝会教堂的大门口，每天都能看到大批客家人扶老携幼，带着大包小包的财物前来投奔。除了首领洪秀全之外，冯云山、杨秀清、韦昌辉、石达开等拜上帝会的主要人物也都是来自广东的客家人。

事已至此，基本上广西的客家人只有两种身份：一是拜上帝会的教徒，二是拜上帝会的支持者。他们绝不会放弃任何一个可以改

变命运的机会，在多种因素的汇聚下，“以武力讨回公道”逐渐成为众人共同的呼声。

煅打的铁水已经通红，起义的号角即将吹响。当时的人谁都没有想到，这会是一场席卷大半个中国的起义运动。当时广西的盗匪多如牛毛，拜上帝会起事之初，清政府并没把它当回事。

这些打着“太平军”旗号的军队四处攻城略地，自广西而起，经湖南、湖北、江西、安徽等省，势如破竹地一路向北推进，最终定都南京，并将南京改名为天京。太平军所到之处摧枯拉朽，无情地撕开了清军衰弱的遮羞布。之前尚可以找理由说是洋人船坚炮利，不能与之敌，现在被一群不识刀兵的农民打败，清军各路将帅还能做何辩解?

在整场战争中，清军的表现更是受到各国使节的无情嘲笑。一路上清军都被太平军带着跑，围追堵截屡屡被其突破，精心布置的防线也如纸糊一般一戳就破。洋人看到清军拙劣的战术表现，对清政府更加失望。他们希望中国有一个既能够维护列强利益又不至于一戳就倒的有力政府。

现在一群“土匪”居然能将正规军打得一溃千里，并占据半壁江山，这突破了西方人对清军战斗力想象的下限。面对这种情况，他们认为两头下注更有利于自己的利益，所以转头和太平军接洽，希望能向这个清政府最大的敌人出售武器，以达到介入太平天国内部事务，甚至扶植起一个新代理人的目的。不过，这些来自岭南山坳的客家人并没有清政府这般好说话，他们断然拒绝了英国公使的建议。

丢了面子的英国人并不甘心，所以选择继续支持清政府组建“洋枪队”，共同打击大清帝国内部的“反叛势力”。双方拉锯十

数年，原本富庶的江南大地化作一片焦土，无数人背井离乡，颠沛流离。

时人常谓岭南之人好勇斗狠，不服教化。可现实是，残酷的生存条件似乎剥夺了一切美好的品德，生存的压力逼迫所有人不得不倾尽一切夺取生存资源。这些事情，朝中的王公贵胄恐怕看不见，也无法想象。广西的匪患历经整个清末、民国都未能得到彻底解决，其根本原因还在于经济上的不可调控。

厘金的诞生

为了应付层出不穷的内忧外患，库银大量支出。道光三十年（1850年），户部的存银总共只剩下800多万两。[(4)]相较于以前，已不能用窘迫来形容，更准确地说应该算是一穷二白。现在太平天国又席卷全国，清政府实在是无力支撑，只能另想办法。

为筹措钱粮，清政府采取的手段有加派田赋、漕粮、盐课，或者勒令捐输，又或者加征新税，如鸦片烟税等。可当时田亩荒废、漕运枯竭，人丁流离四方，财政已陷入山穷水尽的地步。清政府发现农民的钱收不上，又转而向商人下手，厘金就此诞生。这是清政府敛财的一大发明。

厘金的诞生来自一次偶然尝试。咸丰三年（1853年），扬州江北大营帮办军务的刑部侍郎雷以刚刚到任，就发现局势危急远超自己想象。作为防范太平军的前沿阵地，此处的防务漏洞多得像筛子一样，根本不能阻挡敌人的进攻。究其原因还是兵力太少，可府库哪有这么多钱养兵呢？雷以便发明了一种新的捐纳之法，即米商每销售1石米需缴纳50文钱。扬州为江南产米之地，各大米店鳞次栉比，以这些大米商的身家来说，每石米捐钱50文不是难事，算下来一升也就半文而已。

这一做法成功了。由于数额较少，商人并不排斥，所以很快就完成了捐厘助饷的目标。受成功的鼓舞，第二年雷以专门写了封《请推广厘捐助饷疏》上报清廷，报告自己在扬州成功筹款的经验，认为这种经验值得各地效仿，按照“值百抽一”的税率让商贾捐款。值百抽一的“一”为一厘，故这种新捐也被称作厘捐。[5]

此时的大清帝国正被太平军搅得焦头烂额，3年间仅军费开支就高达3000万两白银，为筹措镇压太平军的军饷，简直可以说是无所不用其极。看到雷以的这封报告，咸丰皇帝龙颜大悦，立即督促江北大营按照实际情况斟酌办理。这实际上默认了厘金制度的推广。

可能连雷以自己也没有意识到，他无意中的这一举动，竟会开了中国税收史上对商人征税之先河。在此之前，清政府都秉持着重农抑商的政策，把农民当成肥硕的绵羊，从他们身上拼命地榨取价值。毕竟作为一个名副其实的传统农业国，几乎所有的收益都产自土地。可是洋人一打进来，整个形势就彻底变了，清政府从他们身上学到了商业税的妙用，第一次意识到原来商人身上也有这么多利益。之前清政府虽然也有商税，但征收额度相较于正税来说极低。现在有了新的案例，于是终于开始转变旧有的思路，尝试以收取商税的方式填补财政亏损。

因其便利和高效，此后厘金制度迅速风行全国。厘金最初分行厘和坐厘，因为两者一动一静，故也称之为活厘与板厘。前者为通过税，征于转运中的货物，抽之于行商；后者为交易税，在产地或销地征收，抽之于坐贾。捐纳系统庞杂，且厘捐名目繁多，见货即征，不问巨细，“举凡一切贫富人民自出生到死亡，日用所需之物，无一不在被课之列”。毫无疑问，这种办法一定会对工商业造成极大抑制，严重摧残商品经济发展，因此也是清代著名恶政之一。

清咸丰三年至民国20年（1853—1931年），厘金制度实行了整整78年。这种本来只是用作应急的税种竟有如此强大的生命力，自有其特别的原因。大清帝国一直都有捐输和报效的传统，商贾为国家出力被视为一项正当的义务，而且按照厘金的规定，“值百抽一”似乎也不会造成特别大的负担。

可实际情况是，厘金制度刚刚实行，就遭到了从上到下的一致反对。不少官员都上奏抗议，表示苛捐太多，影响商民生计，至少也要整顿厘金，不要给老百姓增加那么多负担。普通老百姓承受风险能力太弱，腰缠万贯的大商人掏出1%不见得有什么负担，但被苛捐杂税压得喘不过气来的小商人本就处在破产边缘，1%的捐很有可能成为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

更何况，清政府嘴上说着“劝厘助饷”，可怎么个“劝”法？谁都明白这厘捐不是靠劝才能征来的，非要有强制措施才行，所以厘金制度实行起来就变了味道。

厘金出现以来，普适性超强。它如同万金油一般，各个将领督抚只要遇到粮饷短缺的问题，就会祭出这个“法宝”，所以一夜之间，围绕太平天国的势力范围，周边各地冒出大批厘卡，但凡有商贾经过，皆雁过拔毛。更神奇的是，这些厘卡之间居然还互不统属，各自为政，“一处而设数卡，一卡而分数局”。往左边走可能是江北大营所设，往右边走可能是江南大营所置，再往前走十里可能就会看到漕运总督衙门的厘卡……

如此种种，五花八门的厘卡把整个江南地区搅得民怨沸腾。毕竟过路费是不可能一次付清的，过一卡征一次，一路要征十余次，等到了目的地，恐怕资金也所剩无几了，自然无从开展商业活动。

更有甚者，还在厘金的基础上搞出了更多新花样。仅仅是对商贾收取厘金已经不能满足清政府的需求了，其他各种稀奇古怪的捐税也要加上。比如运米要收米捐，过船要收船捐，建房要收房捐，运茶、运丝乃至运送各种货物都要征收百货厘捐。不得不说，在敛财一事上，设卡者充分发挥了自己丰富的想象力。

既然说按照具体情况斟酌办理，那执行标准自然有所不同。大部分地区早就把“值百抽一”的规定忘到脑后，直接以2%的税率开征，甚至还有地区在此基础上继续翻倍。比如上海地区就是出于发达的商业经济原因，税率就达到了3%—4%，是全国最高的。[(6)]

对于从事出口贸易的商人来说，厘金就如同拦路虎一般，尤其为他们深恶痛绝。鸦片战争之前，大清帝国的拳头产品——茶叶远销海外，是清帝国一张闪亮的名片；如今茶商出口茶叶，不仅每百斤要交二两五钱的关税，还有一路上遭到各种厘捐的困扰。反观印度、锡兰的红茶，连出口税都不征收，其他各地的茶叶也不会有比中国更高的成本[(7)]。此消彼长，中国茶叶在海外市场的多年耕耘就这样毁于一旦。

此外，还存在一种特殊的商品厘捐。最典型的就是盐和鸦片，前者为国家重点管控的战略物资，后者是想禁又禁不了，只能任其流毒的特别“药品”。这两者的税率，比普通商品要高出数倍，有的时候甚至能让商贩入不敷出，堪称一种杀伤力巨大的武器。

当时，作为产盐重地的两淮地区受损最为惨重，盐厘达到了成本的1/4甚至一半。这种情况下对外销售几乎成了必定亏损的买卖，以至于昔日繁盛喧闹的两淮盐场竟然少有商人来往。至于盐价暴涨和老百姓的吃盐问题，设立厘卡者并不会在意。

普通民众受厘金所害者不知凡几，受损最为严重的就是中小商人和小手工业者了。他们几乎没有太多的抗风险能力，本来就生计艰难，如今处境更加窘迫，在他们眼中这厘卡卡的不是银子，而是他们的命。于是，不少小商贩抱着鱼死网破的心态，轻则罢工罢市，重则暴力抗检，用拳头发泄自己郁积已久的怒火，制造了不少群体暴力事件。

厘金制度让地方乌烟瘴气，清政府是否想过应对之法？事实上，由于各地的不满情绪太过激烈，清政府的确考虑过裁撤厘卡、缩减厘金的办法。但这也只是出于安抚人心的考虑，包括咸丰帝本人在内，朝野上下都没拿厘金当正事。按照他们的看法，明明只是按“值百抽一”的税率抽取而已，远不及正税，要不然为何叫“厘捐”而非“厘税”？这些“刁民”竟还是不依不饶、得寸进尺，实在没有道理。

更何况，厘金一事也关乎各地督抚的腰包，解决起来远非那么容易。在厘金制度中获益最多的就是地方官员，各地林立的厘金局以及厘卡源源不绝地为他们贡献收入，他们岂能轻易地放弃自己的利益？在整个太平天国运动时期，厘金平均每年都能为财政贡献超过1000万两白银[(8)]。这些钱很大一部分花在对太平天国的战争上，军费支出近半数来自厘金。

厘金如此重要，清政府干脆就甩袖子不管了——反正地方收入也有相当一部分要上缴朝廷，何必要跟钱过不去？但负责征收厘金的官员恐怕没想到，作为厘金征收的重要地区，整个江淮大地都被搅得天翻地覆，太平军来了要“捉清妖”，官军来了又要就地筹饷，再刮一层地皮。百姓没了活路，只好自求生机，有的落草为寇，有的当兵吃粮。朝廷发不出粮饷，他们就只能投靠相较而言条件更好的太平军。所以太平军越剿越多，花费也越来越大，最终成为清帝国的心腹之患。

虽然名为战时临时捐税，实际上镇压太平天国之后，厘金制度也没有半分收敛的意思，反倒愈演愈烈。一大批新的支出都需要厘金的支持，如洋务、赔款、铁路等。需要花钱的地方太多，清政府自然不想放弃这个宝贵的金山，甚至将它抬上不亚于正税的位置，算是变相承认了厘金的合法地位。

显然，清政府完全忽视了厘金的巨大隐患，这种制度对商业的摧残非常严重，为本国商品的滞销和外国商品的长驱直入提供了巨大“便利”，因此而造成的损失远高于清政府从中获得的一点点收益，完全是得不偿失。

裁厘的呼声

正因为厘金的损害如此之大，裁厘的呼声从厘金诞生以来就未停止过。除了受害最深的商人以外，洋务派、维新派乃至后来的革命派都对这种恶政深恶痛绝。理由也很简单，厘金对工商业的破坏绝不仅是征收的那一点捐税，而是涉及整个商业活动。

在清帝国末期，稍微开明点儿的人士都倡导和西方帝国主义国家打“商战”，而厘金这种损己利人的税种无时无刻不在威胁着他们的后方。商品卖不出去，就等于打仗没有子弹，战败是迟早的事情。所以不管是于国于己，支持工商业发展的人士都有充分的理由抵制厘金。

自太平天国运动以后，厘金又流行中国数十年，其间虽然裁了一些难以管理的偏远厘卡，但大多数有收益的厘卡还是保留了下来。因为有很多人要靠它们吃饭，想要彻底根除根本不切实际。所以如何真正地改造厘金，至少不使其继续危害商民利益便成为众人议论的焦点。大家提出的建议主要有“改厘为税”“改收统厘”等。

江西是第一个响应试办统捐的省份，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江西对省内需求量大的货物试办统捐。只收取法定的数额，余者不再追加，更不能随便补抽，收到了不错的效果，并获得商民的一致欢迎。江西巡抚、布政使柯逢时将这一结果上报户部，引起朝廷的重视。慈禧太后早就看这些地方实力派不顺眼，厘金收入由于地点分散且难以管理，逐渐成为地方官员的私人小金库，朝廷屡次查账都查不清楚，这也成为地方屡次敢于和朝廷叫板的原因。

如今江西开了这个头，朝廷就有理由正式推行，而且办法也很简单。如果运送货物到外省，只需要一次性把各厘卡的厘金交齐，一路上就不用增加额外的支出。这当然能够节省大量人力物力，减少不必要的开支。虽然户部吩咐下去，让各省一体遵行，不过大家的反应并不积极。只是应付差事，效果不敢恭维。

督抚们拿来应付的理由可谓五花八门。有的说，近的倒还好办，若距离太远又该如何？一路上厘卡这么多，想要统计清楚哪有这么容易？有的认为，运输商品的道路并不平坦，一路上不管是土匪还是自然灾害，各种突发情况层出不穷，遇到这种情况，除了绕路或原路返回别无他法。少缴的捐尚且能事后补上，多交的捐还能指望厘局从嘴里吐出来？为了保护商户利益，厘金统捐时机尚不成熟，“推求利弊，必使商情不致重困，然后再议改办统捐”。[(9)]这实在是强盗逻辑，征厘金时没考虑商户利益，反倒在裁厘时为商人大声鸣冤，无非惦记着自己的钱包。

江浙地区商业繁盛，商人的腰板也挺直很多，但也没好到哪里去。当地官府觉得，既然不让自己多收，就把收捐之权让予商人，自己从中收税就好，这样总不至于再受苛责。于是，各行各业的同业公会组织起来，在行业内设立认捐公所，由他们代替厘局收取厘金。而这些认捐公所的主事者们对其他商人并不手软，收捐力度不

亚于官府，搞得商户深感自己上当受骗，大骂认捐公所存心坑人。最后在一片反对声中，裁厘的措施到底还是没有维持下去。

在一众不求有功但求无过的地方督抚中，也有表现不错的“优等生”，如湖广总督张之洞。他清楚地意识到，裁撤厘金有益于国，更有利于民众，各省光顾着打自己的小算盘只会贻误大局、伤及己身，故对这种敷衍态度很看不惯。所以在张之洞的努力下，湖北的改设统捐工作做得尤为出色，共计裁撤29个厘卡，所有货物只在起始处征一次，此后不管沿途经过多少个，都不用重复征税，还革除掉不少其间藏匿的灰色地带，体现出张之洞裁厘的决心。

仅这些还不够，为了避免某些人偷耍小聪明，张之洞还精心设计了一种四联统捐票，每个湖北或者进入湖北的商人都备一张。捐票分作收执、查验、缴核、存根四联，商人自己一张，在湖北第一次查验留一张，厘局填票后上缴总局一张，局里备案再留一张。基本上各个环节所缴金额都有查验，谁吃拿卡要，谁中饱私囊，一目了然。

看似普通的裁厘之事为何就那么艰难？实际上各省督抚也有自己的苦衷。裁厘不是撤掉几个厘局就能解决的事情，背后牵扯到的利益关系千丝万缕，远不是几个人可以轻易撼动的。即使声名显赫如张之洞，也遇到前所未有的阻力，完全是靠着强大的毅力与决心才勉强推行下去。湖北如此，其他各省的结果就可想而知了，大多是嘴上说着要搞统捐，只需纳厘一次就不需再缴，其余厘卡只可作查验之用，实际操作起来却是另一回事，厘局照样存在，顶多少了些交钱的手续，但实际上该缴的钱一分不少。

晚清的立宪派作为工商业者的代言人，以裁厘之事为由，屡屡拿来说事，与守旧派斗得不可开交。领袖张謇对厘金尤其厌恶，他更希望以“认捐”的形式来解决问题，要把原先的厘卡全部裁撤干

净，由商人代管。不过在当时的政治局势下，这种想法简直是异想天开，地方官员自己都指望厘金多捞些利益，岂能允许地位低下的商人置喙。双方的争斗历经数年，直至清朝灭亡也没能解决。

厘捐说到底还是一种捐输形式，跟正常的商税是有所区别，两者并不能同等看待。一般的商税由榷关收取，多在交通枢纽之处，对来往商船马车征收一定数额之税，是名正言顺的正税，“纳税有定额而不容太苛，支销有限制而不容冒滥”[(10)]。可厘金就麻烦得多，就像通过另类渠道得来的灰色收入，名不正言不顺，却遍地都是。朝野上下无人不知，说是“值百抽一”，实际上抽取数额远高于此，根本没个准则。在商人眼里，厘卡与土匪的唯一区别就是过卡不用担心遭杀身之祸。

讽刺的是，这些对商人的危害恰恰是厘金制度在中国大行其道的原因。不拘形式、不限条例、因地制宜是厘卡得以实现遍地开花的重要法宝。朝廷很清楚这一点，所以将其与正式商税区分开来。

自始至终，厘金都处于一种“名不正言不顺”的尴尬境地。如果能真正纳入商税，把厘局改成榷关，裁撤多余卡点，统一到正税的轨道里，岂不是两全其美的办法？可现实当然没那么简单，厘金的成功正在于它的无序，如要将它纳入有序的轨道，那能够操作的空间势必会大大减少，反而不符合主事者的利益，因此裁撤厘金的事情在地方上遭到很大的阻力，迟迟没能真正推行。

太平天国运动以后，围绕着厘金收入的归属问题，朝廷和地方官员整整打了几十年的“嘴仗”。围绕着裁厘卡、降厘捐这个老生常谈的问题，朝廷一遍遍清查，地方一次次隐匿，双方如同猫和老鼠一样，终清一世，都没能真正地被解决过。

荼毒中华大地的鸦片

19世纪中后期，鸦片流毒于中国的形势已无可逆转，特别在鸦片战争后，清政府再不敢随便禁烟。打又打不过，禁又禁不了，朝廷只好采用“曲线救国”的法子，那就是对鸦片征税。加征到民众无法吸食的地步，自然就能收到禁烟的效果，还能大大增加财政收入。

清政府美其名曰“以征为禁”，实际上就是掩耳盗铃，允许毒品合法化。最早是咸丰四年（1854年）以鸦片厘金的形式在江苏开征，一时间大家全然忘记了鸦片带给国家及民族的惨痛记忆，其他沿海地区也效仿起来。

咸丰八年（1858年），中英签订《天津条约》。英国为了保持自己的商品继续在华倾销态势，规定洋货输入内地只需缴纳2.5%的子口税，其他包括厘金在内的各项内地税全部可以免除。这对于外国商品来说当然是个大好事。

而且在《通商章程善后条约》里，鸦片也借着“洋药”的名头在中国大行其道，鸦片贸易随后也取得合法化的地位，这个条约为各国的鸦片进入中国大开方便之门。但鸦片毕竟是毒品，就算再怎么冠上“药”的名头，对人的身心危害也有目共睹。鸦片利润之高实在令人发指，清政府也想从中抽成，所以鸦片虽受子口税限制，进入内地之后，能从中攫取多少“洋药捐”就看各地督抚的手段了。

即使已经取得如此特权，英国人还是很不满意，他们向清政府提出严正抗议，这倒不是他们关心中国人的身体健康，而是因为“洋药捐”太高，会影响鸦片的销售，进而威胁到英国的利益。所以，中英双方围绕鸦片厘金收多少的问题，展开了一场场唇枪舌剑般的讨论，最后在光绪十一年（1885年），清朝使臣曾纪泽远赴伦敦与英方达成《烟台条约续增专条》，明确每百斤鸦片，除30两白

银的海关正税之外，只需缴纳不超过80两白银的厘金就能顺利进口，这才结束了这场长达20多年的争论。

此后，鸦片在中国日益泛滥，主管海关的英国人赫德还将此事作为自己的一大政绩。因为海关是英国人在管理，不管是哪个国家进口的鸦片，只要能从中抽税，都有利于英国的利益。至于普通中国民众会因此遭受怎样的荼毒，并没有太多人在意。

如果买不起价格昂贵的洋烟，老百姓还可以选择本地土烟。本地的土烟价格较低，毕竟运输距离的大大缩短显著降低了成本，但真正使其被大众接受的原因在于土产鸦片种植面积广。

罂粟在国内泛滥的速度比洋人攻城略地的速度更快。19世纪50年代时，种植面积尚局限于云、贵、川等地，很难为外人所知。但在地方督抚发现罂粟可大肆敛财后，这种美丽而妖艳的植物便迅速扩展到大江南北，几乎除了新疆、西藏等偏远省份，每个省份都能见到它的影子。

到后来，土烟的产量已经远远超过洋烟，清廷干脆直接在湖北设立土药统税大臣一职用以管理，其他省份设分局。这些土烟每百斤可以提供30—40两白银的“土药捐”[(11)]，对于地方财政收入可谓“厥功甚伟”，而且这个税率较之洋烟要低不少，有力地挤占了洋烟生存空间。

鸦片的危害人所共知，几十年来要求禁绝的声音屡屡出现，可一直没收到太大效果，原因很简单，就是其中利益太过诱人。在清朝的最后几年，土洋药捐加起来甚至占到财政总收入的1/10[(12)]，是个相当庞大的数字。

但利润再大，在严峻的形势面前，清政府也不得不面对现实。进入20世纪之后，基本所有人都已认识到鸦片的危害至深。而且，

即使不考虑民众的呼吁，面对外在舆论的压迫，清政府也只能选择妥协。

此时的清帝国种种弊端已经到了积重难返的地步，重疾正需猛药，在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的新政时期，清政府终于打算拿鸦片这个硬茬开刀了。清政府首先与英国政府商议，要在两年后将印度输华鸦片数量减少10%。这一想法立刻得到了英国的同意，彼时的英国已露颓势，美国后来者居上，英国正需要保住自己的形象，故而中英很快达成一致意见。对于土烟试行统税，英国直接猛涨到每百斤征百两以上。

宣统元年（1909年）二月一日，新帝刚刚即位，盛大的万国禁烟会在上海隆重召开，中、美、英、法、德、日等十几个国家代表会聚一堂，商讨禁种、禁吸、禁运鸦片的重要议题，揭开了国际联合反毒禁毒的序幕。中国国内十几个省也很配合地拿出了自己的禁烟方案，主要办法还是加税。这次的力度更大，直接加至230两，基本堵死了农民贩卖土烟鸦片的路。

民政部和度支部信心十足地说，要在8年内实现逐步减产鸦片直至完全禁绝的目标，不过没过几年，清帝国就亡了，而这一设想也未能得到施行。

搜刮之法

前文提到的解决财政困难的方法仅仅是看得见的手段，看不见的手段就更是五花八门了。比如征收赋税时以银代实物，又比如发纸钞、制大钱，规定以含铜较低的大钱兑换更多制钱。清政府实行以银代实物、发纸钞、制大钱等的主要目的就从市场上搜刮更多财富，结果市场上银贵铜贱的趋势进一步加深，物价飞涨，百业凋敝，人民生活更为困顿。

还有一种办法就是鼓励“捐纳”。说是捐纳，实际上就是拿出更多的功名与官职供士绅购买。这种公开买官卖官的形式自古以来就不鲜见，每逢国家财政危机的时候，封建王朝就习惯性地用这种办法获取资金。

捐纳在清朝是和科举一样正式的当官途径，由于通过科举入仕实在太过困难。

为了不断绝这些人的当官梦，花钱买官就成了清政府给那些想要当官又缺乏能力的人准备的另一条路。在当时的社会条件下，赚钱可要比死读书容易多了，不少商人豪绅为了“光宗耀祖”，都不惜耗费巨资，以求博得一个功名。当然相对于科举入仕的“正途”，走这种“异途”所得的官职含金量就远远不足了。当然，为了避免出现大量庸官在任上胡作非为，清政府并不会给出太多实职，基本上以虚职为主，所以还能够基本维持官僚系统的秩序稳定。

不想花这么多钱买个虚职也没关系，还有一种办法能帮考生走“正途”入仕，那就是花钱买生员名额。这些名额在各省都有固定指标，很难增减，现在清政府为了筹钱，准许府州县学可以花2000两白银买学额，每省能拿10万两白银买个乡试中举名额。[(13)]地方官员为了增加本地中举人数，捞到更多政绩，也只好咬牙从兜里挤出一点银子。

不过买官卖官这种事，只有有和无的区别，没有多和少的差距。在尝到了捐纳带来的好处之后，卖官的口子只会越开越大。在遭遇了一连串 的财政危机之后，清政府终于为买官卖官之事大开方便之门。但乌纱帽子一旦发多了，质量自然就会严重缩水。

除此之外，还有一些临时性收入。比如国家遇到灾荒或者战乱等急需用钱的时候，一些大商人就会拿出资金予以支援，美其名曰“报效银”，到底是忠心为国还是官府强令就不得而知了。其中最主要的出力者就是两淮盐商，他们坐拥大小盐场，实力雄厚。昔日康乾时期皇帝数次南巡，盐商就贡献了不少银子，可以看出他们在国家政治中的作用。当然朝廷也不会白拿他们的报效银，多少还会给一定的补偿，比如减免盐商的税收、以高于市场价的价格收购，或是封个小官抚慰人心。某种程度上来说，虽是捐赠，但因为有中央政府的信用作保证，倒还不至于太过苛刻，甚至有时还能搭上官府的大船赚上一笔。

地方势力坐大

清政府实在负担不起庞大的开支，只得下放财权。简单来说，就是国家负担不起繁重的钱粮开支，干脆让地方督抚自己解决，拿多拿少全凭本事，清政府美其名曰：“以本省之钱粮，作为本省之军需。”户部还专门发放空白凭证作为劝捐的依据，让交捐人自行领用并填写登记，当然这同样成了地方官员随意加捐的理由。

湘淮军算是响应清政府号召最积极的一群人，战时为便宜行事，清廷准许统兵大员自行筹饷募兵。曾国藩的湘军首先自设粮台，庶务皆出将帅一人意旨，根本没有户部插手的余地。之后，个例渐为常例，临时变成常设，善后局、报销局、筹款局、支应局等也一并出现。以前没有权力征收的附加税现在都有理由加征了，而且这些新增捐税并没有数量限制。地方督抚大可以按照需要制定征收标准，至于老百姓的意见，并没多少人关心。

但清政府还是小看了地方督抚的腐败能力。直到户部报告称，地方解运款项日渐稀少，咸丰帝才意识到大事不妙。原来是地方的漕粮还有盐课等，不少都让督抚私自给截留了，户部派人去要却碰

了一鼻子灰。地方督抚声称，如今大敌当前，国家危难，这些宝贵的资金要用在最需要的前线，非是不愿，实是不可。面对五花八门的推脱理由，朝廷又不能强要，只能忍气吞声，等太平天国运动结束再做打算。

面对如此困局，哪还有人顾及清政府的难处？朝廷对地方上的情况也是一头雾水，摸不清楚地方虚实。朝中要用钱可是却不信任地方，所以咸丰帝改变了以往各省入库后再上报拨付京饷的规定，改成入库前就向户部上报指标，以免有人从中做手脚。清政府并不信任地方官员给出的收入数据，一改以往按余征拨的规矩，不管地方府库有无盈余，直接按照指标从地方要钱。(14)

虽然本意是维持足够的京饷，但这一招实在致命。财政有所盈余的省份倒还好说，因战乱灾荒等情况而财政窘迫的省份就十分麻烦了。他们有的连赈灾款项都凑不齐，还要应付皇帝的差事，实在是无计可施。自咸丰颁布指标之后，几乎每年都会遇到大批地方款项不能凑齐运抵京师的情况，而且数额还与年俱增。其中固然有太平军阻隔交通、运输不便的原因，但更多的却是地方无力满足朝廷要求，只能勉力维持现状。

户部催缴的命令如雪花般飞向各方，“勒限某月尽数解部交纳，以清款项”(15)“赶紧依限报解，并著分别补解”(16)“解不及半，或丝毫未解”(17)的表述充斥于各种文书之中，可见其急迫的心情。但清政府也不能暴力讨债，只期望国内战事早日结束，尽快恢复户部的正常收支。

京饷收入尚且如此，用于财政再分配的协饷就更不必说了。户部自己都收不上银子，哪还顾得了其他？所以，云、贵、甘、陕等靠中央拨付协饷吃饭的省份就十分窘迫，面临更为恶劣的财政危机。

这形成一个恶性循环，财政稍显富裕的省份或因战乱影响，或由于督抚私心，基本很难按时按量运抵京师。户部没钱周转，就不能拨付资金救济财政窘迫省份。所以，边远省份为了不被饿死，只能想法自救，比如从农民身上榨取资金。而那些不甘于官府压榨者就会沦为山贼盗匪，进一步加大了治安支出，以致财政问题愈加严重。

清王朝治下已然混乱不堪，以前持续了上百年的奏销制度也基本成了摆设。200多年来，清政府一直依靠这种审计方法来维持帝国庞大而高效的财政机器正常运转。可如今这台机器却出现多重老旧锈蚀乃至子系统各行其是的现象，奏销制度也自然变得运转不灵了。

以往一省一地按照规范定期上报，中央再照其数据进行核查即可。现在地方督抚和统兵将领都开始自设粮台，收入开支有巨大的操作空间，核查难度远超以往。户部因为筹款之事忙得焦头烂额，实在是没有余力加以细致核算，因此只能暂且默认现实，对督抚和统兵将领筹措军需之事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这种立国200多年所未有之事，为地方督抚攫取财权提供了莫大便利。以往天天盯着自己花销的“监护人”如今竟然撒手不管，自己可以任意支配各种收入，等于有了一个小金库。后来，除了军需事项之外，普通的收支也游离于奏销体制之外，是个衙门都搞起了自筹自用，清政府几乎失去了对地方财政的控制。

不少打着“自给自足”旗号的机构纷纷设立起来，比如善后局、报销局、筹款局、支应局等。听名字就知道，它们专门负责前线战争开支。不过它们的功能还不止如此，其权力迅速随着督抚的野心增长：善后局不仅能善军需之后，还有衙门内部的人员津贴和各项开支；报销局不仅能报军用之费，还有一堆与军事无关的民政

事项；粮饷局也不单单为前线提供粮饷，还有一批杂七杂八的事项。

而且，地方官府给出的理由往往都很冠冕堂皇。朝廷要搞洋务，地方要谋发展，哪项不需要资金？为达到兴办近代工业的目的，截留掉一些本该解运到京城的银两实属不得已。所谓“是以本地之款办本地之事，输纳于公家者无多，裨益于地方者甚大”(18)。对地方官员来说，能办成本地的要事才是最重要的，但对于中央财政来说，这绝对不是一个好事情。

最开始，朝廷还指望地方督抚拿钱办事，尽快平息内乱。可现实情况是，太平天国运动虽被镇压，但以湘淮系为主导的地方督抚已纷纷强大起来，其显著表现是财权从中央向地方的转移。本来管财政的布政使司与地方督抚并无隶属关系，自从湘淮军开了自筹粮饷的先例之后，布政使司基本上成了摆设。中央很难收到足够的赋税，权威日渐衰弱；而地方督抚却以独立的财权和兵权为倚仗，羽翼渐丰，最终形成尾大不掉之势。

户部对此也是相当无奈，这些非常规支出很难统计，更难以受到监管，以至于只有极少一部分能够被朝廷知晓。至于其他大部分资金究竟流向何方，可能只有那些地方官员自己知道了。

更何况这一大堆出自各种名目的筹款局在战后也没被撤销，仍然在各地发挥作用，继续为地方财政提供支持。拖了若干年之后，基本都成了老大难的历史遗留问题。这些机构承担的职责有筹款、支放，还有军需等项，不少驻守地方的士卒就指望它们供给粮饷。但随之而来的就是巨大的冗员问题，一大堆超出原本预计的“体制外”人员都需要官府花钱维系，令大清帝国的财政更为雪上加霜。

户部已是三番五次要求各省裁局撤所，尽快把这块经费节省下来，但督抚们的积极性都不甚热烈。个中原因也是显而易见的，这些筹款局极大方便了当地官府搜刮财物，而且他们不愿意损己之利，为朝廷分忧。如果遵从旨意裁撤局所，这些被裁撤的吏员生计问题可要地方自己解决，如果不能妥善处置，又会成为新的不安定因素。

所以这个问题一直没有解决，直到甲午战后，清政府欠了一屁股债，才下定决心对其动刀。不料戊戌变法百日而终，这个计划也就再次化作泡影。接着，庚子年清政府又赔出去一大笔款项，朝廷只好允许各省自筹银两，先把外债这个窟窿补上再说。

这似乎是一个没有办法解开的死结。清政府的权威在收钱这件事上所展现出来的作用越来越小，无论是严词呵斥，还是安抚怀柔，这些惯用的政治手段在最为现实的财政问题面前都失去了作用。偌大的清帝国，财政这个七寸竟会掌握在地方实力派的手上，这是立国以来从未有过的事。当然这里也释放出一个极为危险的信号，朝堂之下暗流涌动，大清帝国的政治格局将迎来新一轮的洗牌。

财政比重的改变

鸦片战争后，外国经济势力的不断入侵，关税成为清政府的重要财政收入来源。铁路等新兴交通方式的出现，也为清政府带来了滚滚财源。各国为了保证在华利益，对华大量借贷，以维持其经济权益及政治权益。清政府在漫长的外交角逐中也逐渐掌握了近代财政制度的运行规律，开始懂得利用国债聚敛民众财富，并且借助外国对华借贷，将自己与西方帝国主义势力绑在同一辆战车上。

清末财政收入，鸦片战争时为4000万两白银，甲午战争时为8000万两白银，清朝灭亡时已达3亿两白银。这么快速的财政增长，与新税源的开辟密切相关。其中尤以海关税为主，几乎是紧随财政增长的速度，海关税收开始是800万两白银，到同治十年（1871年）年突破1000万两白银，光绪十三年（1887年）突破2000万两白银，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突破3000万两白银。[(19)]

第二次鸦片战争后，进出口贸易迅速发展，与之相伴的是海关税的迅速增长。咸丰十一年（1861年），海关总税务司开始统计海关税时，尚不足1000万两白银，至宣统二年（1910年）已然翻了4倍。但归根结底，关税仍为列强把持，很多时候要作为抵押以支付对外国银行的借款，清政府只能得到少数，故称“关余”。

必要来源就是新兴的厘金。在镇压太平天国运动后，尝到了甜头的地方督抚也不愿放过这个收入颇丰的聚宝盆，此后厘金征收数额节节增长。在宣统三年（1911年）的预算案中，收入已达4418万两白银，占收入总额的14.6%，厘金成为支撑清政府财政收入的一项重要税种，清朝灭亡后依然存在，直至民国二十年（1931年）才废除。

至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关税厘金占财政收入总额已过半，达50.9%，传统的大项田赋则降至33.8%。农业税的下降与工商税的迅速增长正反映了晚清以来社会经济的增长和社会结构的变动。

财政支出上也出现了许多新的变化。早期财政支出主要是军费、官俸、皇室费用、工程费用等固定几项，晚期增加了许多新的支出科目，包括债务费、教育费、农商费、交通和邮政费、司法费、外交费、洋务费、对外赔款等现代财政预算中的支出项目，体现出晚清的近代化趋势。

今天的我们以更广阔的视角去看待各发达工业国的工业化历程，便可以发现，无论哪个国家，只要建立了集中统一且高效的财政制度，就能从地方上汲取工业化所需的资金。而清政府恰恰反其道而行之：财政收入体系松散不堪，地方官吏层层设卡，雁过拔毛，民间产生的极少的剩余价值多半进了各级官吏的腰包，中央政府能够支配的资源极少。这种情况下能够维持国家运转都是难题，就更不必说投资工业了。

所以在为求自救的洋务运动中，清政府实在无力支持庞大的工业建设资金，只能采取“官督商办”或者“官商合办”的方式。这其中，得到最大好处的也是地方官员和商人，以及投资借款的洋人，清政府既无能力也无可能将提取出的价值再次用于工业建设，并形成良性循环。

工业体系的建设是一个相当漫长且长期投入的过程，需要投入的人力物力不可计数，绝非建几个新式工厂、买几台新式机器，或是雇几个洋人技师就能根本上完成的。

大清帝国的统治者或许知道问题所在，但实在无力做出改变。大清帝国这台庞大的机器，已经运行了200余年，早已陈旧不堪。一个技艺精湛的工匠可以修修补补，勉强让其维持运转下去，但结构无从改变，早晚有一天要被拖进废旧垃圾处理厂。

---

(1) 周源合：《清代人口研究》，《中国社会科学》1982年第3期。

(2) ［清］陶澍：《陶澍集》上，岳麓书社1998年版，第155、160页。

(3) ［清］魏源：《魏源集》下，中华书局1976年版，第416页。

(4) 中国人民银行总行参事室金融史料组编：《中国近代货币史资料》第一辑，中华书局1964年版，第171页。

(5) ［清］王树敏、王延熙：《皇朝道咸同光奏议》卷三十七，文海出版社1969年版，第1985页。

(6) 彭泽益：《十九世纪后半期的中国财政与经济》，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158页。

(7) 彭泽益编：《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第二卷，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7年版，第311页。

(8) 罗玉东：《中国厘金史》下，商务印书馆2010年版，第38页。

(9) 见《两广总督岑广东巡抚张会奏商情不顺暂缓改办统捐折》，现藏于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

(10) ［清］戈靖：《奏为缕陈各省厘金利弊拟请援照关税报部折（光绪六年十月二十六日）》，现藏于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

(11) 罗玉东：《中国厘金史》下，商务印书馆2010年版，第416页。

(12) 黄天华：《中国税收制度史》，中国财经出版社2009年版，第626页。

(13) 《清实录·文宗实录》卷八十九。

(14) 《清实录·文宗实录》卷一一三。

(15) 《清朝续文献通考》卷六十九。

(16) 《清实录·德宗实录》卷八。

(17) 《清实录·穆宗实录》卷三一六。

(18) ［清］江西等处宣布政使司、［清］江西清理田赋税契总局编：《江南筹款总局整顿税契章程》第三卷，国家图书馆藏。

(19) 汤象龙：《中国近代海关税收和分配统计》，中华书局1992年版，第63—66页。

第三章　走入死胡同的货币改革

货币是我们生活中常见的购买媒介，平日购物或交易总少不了它。对于任何一个主权国家来说，拥有货币发行权都是维持金融稳定和金融安全的必要手段之一。细观中国古代的货币发展史，我们可以看到，凡是国家通行的货币，都在政府监督之下。政府不但对其发行数量进行调控，还规定成色和面值，并具有一套完整的铸造、检验、发行、鉴定的流程，这样即使市场上某种货币短缺，也不至于引发恶性的经济问题。

但是，这个过程并非一帆风顺，可以说任何一个朝代的政府都尽力将铸币权牢牢抓在手上，与私铸、劣钱等情况做长久的斗争。成功则商贸鼎盛，国泰民安；失败则市场混乱，经济崩溃，斗争的结果也与国力息息相关。清政府自然也是如此，他们沿袭着旧有的规定，试图将铸币权牢牢抓在官方手上，可在实际的实施过程中，却引发了一系列意想不到的后果。

传统铸币的没落

《管子》有云：“人君操谷、币金衡，而天下可定也。”自古以来，一个能够有效发布政令的中央政府必然会垄断货币发行权，不假手于外人。按照传统货币思想，钱乃“亡用器”“人主之操柄”，秦统一货币为半两钱；汉武帝禁诸郡国铸钱，专令上林三官铸造；宋元时期出现的纸钞也只能由政府印制，无不显示其政府垄断的特征。对于政府来说，要控制货币发行权就必然要垄断铸币，所以铜、铁等重要金属不仅是军工材料，还作为铸币材料而受到政府的严格监管。

问题是铜钱不仅价值低，还笨重，平时用于小买卖尚可，一遇到大宗交易就很麻烦。因清初规定银钱比价为银一两等于钱一千

文，一文是一枚铜钱，一千文就是一贯，也可称一串、一吊。可想而知，随身揣着这么多铜钱出去交易可不是件轻松事，动辄几十、上百斤，交易者不光要识数，还要练体力，流通性相当糟糕。纸钞倒是携带方便，可以满足大额贸易需求，可是不易保存、容易仿造。而且古代统治者又没有现代货币发行概念，一旦缺钱就在没有准备金的情况下大肆滥发，导致纸钞极速贬值，反而加速了王朝的衰亡。

有没有兼具两者优点的货币呢？明中后期市场上突然出现的大量白银便是一种。它大大活跃了市场经济，但它们并不是由政府开采铸造的，而是产自美洲，经由西方商人之手进入中国。政府一看自然是大喜过望，这岂不是天上掉馅饼的好事？于是，白银以其特有的流通性与稳定性适应了当时快速发展的商业经济，迅速跻身于主流货币行列。明朝大学士邱浚设计了一种“三币之法”，即“以银为上币、钞为中币、钱为下币”，这实际上是模仿了先秦时期“以珠玉为上币，以黄金为中币，以刀布为下币”的三币模式，属于一种复合型的白银流通制度。

张居正实行“一条鞭”法之后，连赋役征收都改成白银。白银一跃成为官方和民间都认可的货币，改变了铜钱和纸钞一统市场的局面。直至鸦片战争前夕，中国一直是钱银并行流通的局面，即大宗交易用银两，小额支付用制钱，一般以一两为界。在漫长的发展过程中，这套货币流通模式早已发展成熟并延续下来。

那么金属货币会不会有纸币滥发的问题呢？虽然看起来金属本身具有价值，不至于像纸币一样拿张纸印上数字图案就能从民间搜刮财富，但这也并非万无一失。只能说大部分情况下，印钱都是稳赚不赔的买卖。但有一种情况是例外的，那就是印钱成本太过高昂，甚至超出币值本身的价值。

道光年间，中国制钱的发行俨然是“群雄割据”的局面。当时的工部和户部分别设有宝源局和宝泉局两个中央造币厂，所铸之币用以供给中央军饷等各项开支。同时，地方也有自己的铸币厂，道光年间单是官方规定的制钱就有21种，出自宝泉局、宝源局、宝直局、宝晋局、宝苏局、宝昌局、宝福局、宝浙局、宝武局、宝南局、宝川局、宝陕局、宝广局、宝桂局、宝云局、宝黔局、伊犁局、阿克苏局、库车局、宝新局等铸币局，它们名前大多加有“宝”字，所铸造的铜钱也都有“道光通宝”的标识。

不过与中央铸币不同的是，地方铸币基本都在本省流通，很少跨区域流通。从商业的角度来说，这当然会加大交易成本，不利于商品流通。那么何必要在中央之外设立这么多地方铸币局呢？倒不是官方不想指定一种铜钱作为国家的统一货币，实在是心有余而力不足。按照当时的交通运输条件，首先，无力做到各地矿产汇至一处统一铸币；其次，就算铸出了合格的货币，也很难运往各地投放市场，也就是说高昂的运输成本始终是一道迈不过去的坎。

可要划定明确的铸造标准和金属含量，要求各省按此铸造又面临新的问题。如各省所采矿藏储量不一，成色不一，价格更是天差地别。在那个没有精确仪器检测的时代，想要得到一个统一的铸造结果实在是困难重重。矿产丰裕之处所铸货币成色好、成本低，矿产贫瘠之处所铸货币成色差、成本高，如此自然就不能全国通行。否则投机买卖之风大盛，国家经济也会陷入危机，倒不如让各省按照需求及实际情况自行铸造，以免扰乱外省市场。

这其中有临时应急之用，比如阿克苏钱就是道光年间为了应对新疆张格尔叛乱时，为解决军饷缺口临时赶制出的一批当五、当十大钱。但总的来说，各省铸币局的盈亏还是要自行承担。道光四年（1824年），福建省承受不了银贵铜贱的行情，率先停铸铜钱，各

省纷纷效仿，放弃了这项业务，以至于到了道光二十一年，只剩下云、粤、川三省还在铸币。

压垮各省铸币局的不仅是银铜比价的挑战，还有私钱。私钱在中国历史上屡禁不绝，虽然历朝历代的统治者都颇为头痛，却又不能从根本上铲除。不仅有个人为一己之私铸造私钱，甚至官方铸币局也会有工匠故意铸造不足值的铜钱，前者称之为“民私”，后者则称之为“局私”。相较于前者。后者虽然数量不多，但往往会造成更大危害。由于是官方铸造，即使偷工减料的铜钱也很受市场欢迎，但假币终究是假币，在使用过程中问题很多。如宝浙局就出过由于掺入太多砂土，铜钱一摔即碎的事情。相比起来，掺杂铅等贱金属都算得上“良心”，至少不会一不小心把钱摔没了。

“局私”的最大危害在于，它是一种官方制假的行为。官府一面要求严格查禁民间私钱，一面又自己铸造质量不合格的制钱，这无疑会严重降低政府的信用。而且还会起到糟糕的示范作用，最终使得私铸私销行为屡禁不止，越加泛滥。

清代银两与制钱一直属于不同的货币体系，且两者间无固定比价，而制钱通常以铜铸造。到了晚清，铜矿产量日益减少，洋铜价格昂贵，清政府维持货币供应量的做法就是想方设法地往其中“灌水”，即加入铅、锡等贱金属以次充好，甚至连完全不含铜的铁钱和铅钱都搞出来了，这简直是明目张胆地诈骗。结果铜钱价值远低于铜价，外国商人抓住这一时机，以银圆换取中国铜钱，一方面可获几乎一倍的暴利，另一方面也为发展本国工业提供了原料，而中国付出的代价就是严重的钱荒。

可是，清朝的银钱比例总要有充足数量的银圆与铜钱才能维持。本来银价就日渐高昂，市场上铜钱的供应量再日渐紧缺，必然会影响整个货币体系。官府自然不能允许这种事情发生，所以朝廷

严令各地铸币局不要考虑亏损问题，当务之急是尽快恢复市场上铜钱的供应。地方铸币局也很无奈，这种市场条件下肯定是铸造越多亏损越多，要维持铸币产能就只有一个办法——铸小钱，即将之前私下里偷工减料的做法变成常态，大家一起铸劣币。

这造成了恶劣的连锁反应：银价高涨，铸厂亏损——降低成本，改铸小钱——铜钱贬值，物价高涨——进一步抬高银价。可以看出，最终受害的是整个贸易体系和广大普通老百姓。

眼看这种办法无法维持，咸丰时期开始改铸大钱。所谓大钱，其实就是换了一种骗法，重新铸造面值更高的制钱以节省铜料，当时发行了一当十、一当二十、一当五十、一当一百四种面值，分别重五钱、一两、二两五钱和五两。但是投入市场之后发现，币值的下跌速度比预想的更快，大钱很快也变得“不经用”了。大小错出、轻重倒置的现象比比皆是，市场乌烟瘴气，民众不堪其扰。

外国银圆的涌入

官府铸造的制钱不能满足日常使用，更无法适应商品经济的发展。人们对白银的渴望越加强烈，不得不选择一种更加方便的新币种来解决交易需求，于是外国银圆便顺势登上了历史舞台。源源不断的外国银圆通过当时唯一开放的贸易口岸——广州大量涌入，主要是西班牙银圆，每年输入的数额在200万枚左右。

公元15世纪以来，随着新航路的开辟，国际贸易数额迅速增长，葡萄牙人和西班牙人为东西方大规模贸易拉开了帷幕。他们不仅带来了商品，也带来了银圆。公元16世纪，大批银圆从美洲、日本等地进入中国，这些外国银圆种类繁多，主要有西班牙银圆、墨西哥银圆、美国贸易银圆、日本银圆等，此外还有西贡银圆、秘鲁银圆、智利银圆等较为少见的银圆。其中，西班牙银圆首先以每年

200万枚的供应量迅速打入中国市场，并在市场上占据重要份额，很快就成为东南沿海和长江流域通商口岸的主要货币。

自鸦片战争之后到公元20世纪初的短短几十年，外国银圆竟占据了中国货币市场的四成以上。为何外国的银圆在中国如此受欢迎？这是有现实考量的，一个最直接的原因就是传统的银两太过落后。从名字能看出，外国银圆与中国本土的银两有所区别，虽然同样由白银铸造，但两种货币成色、重量不同，而且种类繁多，互不通用。

一般来说，一枚“初出银炉”的银锭必须要由公估局派人进行查验，这些公估局一般由当地商会或钱庄委派专人组成，查验之后再标注银锭的重量和成色，只有有了这些“身份证明”，银锭才能上市流通。

但问题在于，公估局只会鉴定一两以上的银两，一两以下的碎银并不会被纳入鉴定范围。另外交易时谁也不会细看，最多用秤衡量，这就给了奸商机会。用低成色银两冒充高成色，拿私铸银两代替官制银两等都是常用的手段，无论商人还是百姓都深受其苦。

更不必说银两还分虚实。银锭和碎银这些看得见、摸得着的银两都算作实银；此外还有一种虚银两，如九八规银。这是为了弥补实银供应不足的问题，在上海出现的一种在实银的重量上加以升水，再打九八折得到的通用标准银。后来很多地方都仿造上海的模式，搞出自己的标准银。比如海关有海关银（或称“关平”），天津有行化银，汉口有洋例银……其他各地也都有类似的虚银。这些标准五花八门，不光各省不同，一省之内往往都有几十种名目。它们的共同点是看不见也摸不着，纯粹只是一种计账单位，专门用于各地调剂金融和进行汇划调拨。

此外，复杂的换算足以劝退一大批普通商人，因为普通商人光是分清换算单位就足够费劲了。如果有人要从上海到汉口去交易一批商品，他就要带着一堆重达50两的宝银溯长江而上，宝银上面刻有铸造者地址、店号、人员名称甚至银炉号码。历经重重艰险到达目的地之后，并没那么容易交易。首先要分清两地标准银换算的差别，然后再兑换成当地的银两，大额交易用银锭，小额交易用碎银，最后刨去交易成本，将货物沿长江运回。能完成这套流程的不一定是杰出的商人，但他算术一定很好。

这只是理想情况，现实情况往往要比想象中的更为复杂。在整个交易过程中，商人可能遭遇兑换标准不同、银两成色不足、两地银两互不通用的问题，甚至当地官员的个人品行与职业操守也要考虑在内。这一切都构成了巨大的沉没成本，无形中给实施商业活动增添了难以逾越的障碍。所以说，晚清的商人是个高危职业，他们一方面必须有无比高超的耐心与心理素质，另一方面还要有极佳的运气，才有可能幸运地在时代浪潮中脱颖而出。

相对而言，外国银圆的优势就太多了。外国银圆一般都是机器批量生产出来的，又具有形制统一、价值稳定、便于核算等优点，在交易时不必逐一过秤称重及确定成色，大大简化了交易手续，节约了交易时间以及成本，因此它受到市场欢迎也就不足为奇了。由于银圆的规范性，检验起来也方便很多。一般银店收银之后会用笔在上面注明符号、写字画押，相当于防伪标签的作用，叫作软戳。不过这个办法并不保险，颜料稍加清洗就失去了效用，起不到防伪的作用。所以，银店更喜欢用硬戳的办法，就是直接用钢印把记号打在银圆上，这样一看便知真伪。但这也有缺点，那就是如果转手太多，戳记太密，银圆可能就跟废银没什么两样了。

但总的来说，外国银圆相较中国的银两还是有着巨大优势，比如最早打入中国市场的西班牙银圆，有很多是在西班牙的殖民地墨

西哥铸造的。有一种正面是西班牙国徽及皇冠，背面为东、西两半球及双柱图案；另一种是铸有各个国王头像的银圆。中国人民充分发挥自己的想象力，把前者称为“双柱”，后者称作“佛头”，两者则统称为“本洋”。后来，流行于中国的墨西哥银圆由于上面刻有鹰徽，也被称作“鹰洋”。

它们的共同特征就是雕刻精美，颇受中国人欢迎。在当时很多人看来，相较于外表坑坑洼洼、杂质又多的中国银两，这种外国银圆不仅好用，还能当作工艺品收藏，就像如今各国发行的纪念币一样，具有保值的作用。

但这种局面也潜藏着危机。因为在市场太受欢迎，需求量远远高于供给量，以至于洋钱不敷用度，其价值远超过本身币值，有些商人会借此换取中国的纹银以获利，当时的有识之士已经预感到这种现象将会导致极大危害。外国铸造的银币多少都有“兑水”，当时市场上一般以七钱二分为足银货币，而外国银币很多成色只有九成，甚至不足九成，拿到中国来使用照样畅通无阻。而且由于其制作精美，使用方便，市价还会高于七钱二分。这样一来老百姓不知不觉中就被外国银圆掏空了口袋，无形中造成中国经济利益的巨大损耗。

就这样，外国商人利用这个漏洞以银圆在中国收购白银，拿到国外再铸成银币，然后流入中国。试想，用一枚重七钱二分、成色不足九成的外国银圆和重一两、成色为九成多的纹银进行交换，显然是稳赚不赔的买卖。偏偏当时的民众还乐此不疲，积极拿自己手上的银两兑换银圆，足可见传统的银两多不受欢迎。

当时的中国可没有什么管理市场的政府机构，外国商人如此循环套利，反复赚取差价，攫取了中国大量的经济利益。按度支部的

统计数据，仅外国银圆一项，清代中国就有1.7亿两白银的利益外流。

西方商人就是利用这种不平等的贸易方式赚取了大量白银，而中国方面却对此茫然无知，甚至还在推波助澜。洋人以外国银圆购买中国产品，这在当时清朝的海关政策中被视为中国货物的出口，并非外国银币的进口，所以海关只收出口税，而不收外国银圆的进口税。这实际上是为洋钱的进入大开国门。但当时的人们并未意识到，其实外国银圆也是一种特殊的商品，这种过度的倾销会对国内货币市场造成相当大的破坏。

看到银圆有这样大的利润空间，列强自然眼红不已。那时，西班牙失去世界霸主的地位已近200年，墨西哥也刚被美国占领大片土地，不得不彻底放弃美洲霸主的梦想，凭什么它们还能拥有如此坚挺的货币？英国人首先站出来批评清政府的愚蠢，声称让如此巨额的外国银圆进入中国，甚至占据国家货币的关键地位是万万不可的，这会造成巨大的隐患。随后，英国却在香港建立了自己的铸币厂铸造银圆，声称“有着标准的成色和重量，将成为事实上完美和可靠的货币，很快被市场接受，并将取代本洋和鹰洋”。

后来，日本和美国也相继盯上银圆铸造这块蛋糕，争先恐后地插手。日本人于同治十年（1871年）铸造了自己的银圆，因币面上印有飞龙图案，所以也被称为“日本龙洋”。刚开始，这种银圆竞争仅限流行于中国的本洋和鹰洋，很难抢到市场份额。但日本有着自己独特的优势，那就是距离近、投放快。随着中日贸易关系的日益密切，日本政府要求到华的日本商人和军警都要自觉使用龙洋，用量越多越好，最好全部留给中国人。这种办法果真有效，与日方做生意的中国人多少都接受了这种新的银圆，不仅在日资企业集中的商埠港口，甚至在朝鲜、安南、暹罗等地都能看到它的身影。

无奈的“白银保卫战”

为了保住自己的钱袋子，清政府不得不打响一场“白银保卫战”。先是御史黄中模上了一道奏折，痛陈白银流失与外国银圆涌入之害，表示以后与洋人交易，只准用货物，不准用银，后来御史章沅也上了一折，要求严禁白银外流。

为此，朝廷专门发布上谕强调不准私易银钱和偷漏银两。作为当时唯一对外港口，广州自然成为严防死守的重点。两广总督李鸿宾专门于道光九年（1829年）和道光十年先后两次遵照上谕颁布《严禁白银出洋章程》。该章程的主要内容有两点：一是禁止在对外贸易中使用白银，只准以货易货，若有不足部分，双方只能以番银找给；二是要求各关口文武官员严加稽查，禁止内地纹银偷运出洋。虽然有了具体的“章程”，但要实现完全的禁银出洋并不现实，且不考虑各关口的稽查官员能否有效履行自己的职责。从可能性上来说，都19世纪中期了，还要搞以货易货，显然不符合实际，所以这套方案自然也未能执行下去。

当然还有人重新把目光聚焦到铜钱上。例如江西巡抚吴文镕、御史刘良驹、内阁学士朱嶟等，他们觉得问题如此严重，无非还是缺少铜钱。以前国家收支就是以制钱为标准，现在回归铜钱有何不可？而且他们认为解决问题的关键在于首先大力提升制钱产能，将其作为国家法定收支货币，继而降低白银的重要性，以鼓励中央及各地铸币局走上正轨。显然这个提议比前一个更不靠谱。白银是老百姓广泛信任并接受的货币，自然不可能说废就废。而货币作为一种固定充当一般等价物的特殊商品，一旦退出其本身的流通领域就会恢复商品的本质。毕竟洋人认的是白花花的银子，而不是笨重的铜钱，拿着一堆铜钱去参与国际贸易，只会让人嘲笑。

那么，有没有别的办法能规避金属货币的缺点呢？这时有人再次想到了传统的纸币。纸币在中国有着悠久的历史，宋朝就有了最早的“交子”，后来的王朝也发行过自己的纸币，不过由于没有准备金等保险措施，统治者也没有定量发行的意识，所以最后往往沦为搜刮民间财富的工具，在老百姓心目中毫无信誉可言。

清政府这次想要发行纸币又有何不同呢？咸丰二年（1852年），时任福建巡抚花沙纳上了一道奏折，表示可以让官府自行发官票当作银两流通，但又不能兑换成银两。这实际上是专门用来应对市场缺银的应急之举。既然有了银两，总还要有相应的制钱才能维持市场稳定，所以又发行一种新宝钞用来充当制钱，当然同样不能兑换。如此一来，市场上有了更多的银两和制钱可用，清政府还不用担心原料损耗，岂不两全其美？

这项提议得到咸丰皇帝的肯定，第二年朝廷正式下旨，要求完粮纳税一概应用新钱法。“官票银一两抵制钱二千，宝钞二千抵银一两，与现行大钱、制钱相辅而行。”[(1)]不过，这种美好的设想遇到现实就行不通了。对于广大普通百姓来说，任凭官府说得再天花乱坠，能拿到手上的才是真的，因此民间的抵触给官府的工作带来了很大麻烦。老百姓不愿用这种缺乏信用的纸币，拿在手上很难花得出去，就算不巧收到一张，也都直接存着不用。银票和宝钞说穿了不过就是一张纸，总不是随便写个数字就能当钱花的。货币没有老百姓的信心作保障，终究也不过是废纸一张。

清政府很晚才意识到这一点，所以这些银票和宝钞一直发行到咸丰后期，单是中央政府发行额就有825万两，[(2)]外地的发行额就更不可计数。收回自然是不可能的，只能让其继续在市场上流通，正是它们逐渐消耗了国家的信誉。

自铸银圆

继续让外国货币在中国市场自由流通，后果可想而知。最直接的危害就是丧失货币主权，威胁国计民生。任何一个主权国家都不可能容许这种局面存在，所以如何打好这场特殊的经济战，成为摆在统治者面前最棘手的事。

粤、闽、苏、浙四大沿海省份是外国银圆集中输入之地，禁行银圆也必然从这些地方下手。因此道光皇帝专门召集沿海督抚商议此事，可惜得到的回应并不如人意。两广总督卢坤表示，夷船带银圆来中国是为了做生意，要是把银圆一概禁止，洋人来了就没办法交易商品，到时若逼得他们非法走私，偷运商品金银，恐怕于海防更增压力。(3)

卢坤不是唯一提出反对意见的人，两江总督陶澍和江苏巡抚林则徐也不认为一概禁止就能解决问题。

某些中央官员仍然抱着打不过就禁的老套路，试图上书要求禁止民间流通银圆，痛陈外国银圆横行中国之害。可老百姓显然不会买账，有更保值的银圆谁还会用银两？禁行之法无果后，又有官员想将西方银圆重新拉回到用秤计量流通的旧方式中去，但是面对两者成色有明显差别的现实，这种办法也只能作罢。

种种办法都行不通，清政府只好自铸银圆。

铸钱并非简单的事情，要考虑面值、成色、样式及民众接受度等，决不能应付。可此时的清朝哪有多少懂得铸银圆的人呢，无奈只能先考虑从仿制起步，再徐图自制。

按照大家的设想，铸造面值一元的银圆成本应该按照外国银圆的行情，控制在七钱二分银。投放市场后，哪怕以九成成色为标准兑换，政府都不会吃亏，到时候不仅可以“抑洋钱而不予以利权，

平银价而渐绝其偷漏”，还能够使“目前之军需可以裕，将来之国用可以兴”，可谓两全其美。[(4)]

可惜在现实面前，这一设想被无情粉碎。调查发现，外国银圆仅在沿海的几个省份比较流行，内地人很难有机会接触，而且受长期以来各省“自铸自用”的影响，各地银圆种类参差不齐、区别巨大。如果仿铸沿海流行的外国银圆，拿到内地去用，恐怕很少有人会买账，到时候耗费巨资反倒徒劳无功。在缺乏监管的条件下，官府既无可能也没必要强行订立一个兑换标准让民众遵守，所以这个方案自然也就放弃了。

正当大家一筹莫展之际，张之洞决心接过这副担子。光绪十三年（1887年）正月二十四，时任两广总督的张之洞奏请自铸银圆，以抵制外国银圆。这次他拿出之前兴办洋务的经验，详细拟订了自铸银圆的方案：聘洋人技师，买西洋机器，专设钱局，一举解决技术人才和未来发展问题。值得一提的是，自铸银圆成色不以洋银的七钱二分为准，而是多加一分五厘有奇，改为七钱三分，并在上以汉、洋文标明“广东省造库平七钱三分”为证，以便对外贸易。

张之洞解释说：“铸成之后，支放各种饷需官项，与征收厘捐、盐课、杂税及粤洋关税项向收洋银者，均与洋银一同行用，不拘成数银色，务与外国上等洋银相等，银质较重而作价补水均与相同。商民趋利，自易风行，若日久通行，民间自行加价，亦听其便。闻外洋银圆，颇有盈余，虽每元办重一分五厘，断无方折。”[(5)]意思是，可别小看了这一分五厘，等到铸成之后，不管是征收税赋、拨给饷银还是支取库银都能和外国银圆一同使用。随后，使之逐渐深入民间。老百姓最为精明，自然会选择成色更高的自铸银圆，相信到时不费吹灰之力就可将洋银排斥出市场之外。

从本质上来说，张之洞的方案是要以价格战的方式夺取胜利。虽然增加了部分成本，却能获得更高的市场份额。不过户部方面对此颇有微词，他们认为，此法看似不错，可大清白银已大量流失到海外，银子都快成奢侈品了。现在就靠着以前的家底勉强维持市场，哪有余力让你在自铸银圆上加码，更何况某些人可能连这一分五厘的余利也不放过，搞不好新银圆一上市就让他们给熔了去换取那几厘钱。千万不要高估他们，毕竟盯着这好银子的人太多了。由于清朝民众造假能力太强，逼得官方不得不想方设法防伪，这就得在工艺上精益求精，又是一大笔支出。就算这些都能解决，习惯了洋银的民众也未必会买账，万一扔一大把银子连个水花都砸不出来，那可大为不妙。要知道清朝的国库实在是经不起如此折腾。

理由再多，归根到底还是一个字——穷。户部对自己的底子再清楚不过，拼财力去占领市场并非上策，所以光绪帝很快就下旨要求张之洞暂缓规划，等候旨意。不过，这旨意自此之后就没了下文，何时商议出解决办法也没有定数。张之洞可不会甘于等候，他立马着手在自己的地盘上规划起来，同年七月开工建造广东钱局，两年之后建成。

仅有钱局，没有技术还是不行，于是张之洞与英国汇丰银行商议，是否能够代为铸造。之所以选择汇丰银行，是因为汇丰有足够的银圆铸造经验，特别是优质银圆铸造经验。到时连银与其他金属的比例都不需多加调整，只要在模具上加上“光绪元宝”四字和蟠龙纹就能制出张之洞理想中的银圆。而且从香港铸造银圆再运至广东，总比千里迢迢从大洋彼岸运银过来实惠。

这个办法终于让朝中那些聒噪的反对者无话可说，毕竟张之洞用的是外国银行的条银，总不关乎国家的库存，因此得到了光绪皇帝和户部的肯定。虽然在汇丰银行的建议下，为不致奸人谋利，每

元库平七钱三分还是改为七钱二分，但张之洞还是颇为满意，因为清朝第一款自铸银圆即将在广东诞生。

遗憾的是，光绪十五年（1889年）十一月，张之洞调任湖广总督，未能见证银圆诞生。此后，继任两广总督李翰章继续执行张之洞的方案，于光绪十六年四月开炉试铸。李翰章兴奋地上奏朝廷："其质轻重大小及配合成色均照奏定章程，每圆重库平七钱二分，配九成足银；次则三钱六分，减配八六成足银；再次则一钱四分四厘、七分二厘、三分六厘，三种均减配八二成足银，较现在市行洋钱成色轻重，均属一律。"[(6)]这与张之洞的设想完全一致。此币正面刻"广东省造"等字，背面雕有蟠龙纹，故也称"龙洋"。它作为法定货币，完税纳粮皆可用，开启了中国自铸银圆的先河。

自铸银圆的成色应高于还是低于洋钱?直观上看，似乎应当使自铸银圆的成色高于洋钱，只有这样才能建立信誉，取得民心，占领市场。如光绪十五年（1889年），张之洞自铸七钱三分银圆时就是抱此想法，认为比七钱二分的外国银圆高一分，即可将其驱逐出去。结果却恰恰相反。实际上，这是经济学中的格雷欣法则在发挥作用，即人们常说的"劣币驱除良币"。当两种货币同价不同质（值）时，人们会把其中的高质货币储藏起来，而只把劣币抛入市场。因此，若使自铸之银圆的成色高于洋银，则中国自铸之银圆会迅速流入各家各户的储藏罐中，而留在市场上流通的仍是洋银。

那么，既有劣币驱逐良币之理，是否应当反过来使自铸之国银的成色略低于洋银呢?例如七钱一分?也不可。因为一种新发行的货币要进入市场为民众所接受，首要在于建立信誉，而一种金属铸币要建立市场信誉，成色为基础。若民众一开始就知道这是劣币，就不会接受它，更不必提流通了。经过权衡，张之洞最终还是选择了最为稳妥的七钱二分方案。

张之洞调任湖广总督之后，面临更为严峻的挑战。湘鄂之地不比两广，因地处内陆，对银圆的接受程度很低，且又为东西要冲、南北要衢，商贾云集，贸易鼎盛，本省有数的钱银大多都被外省的大商帮赚走了，所以要在此开铸银圆显然更为艰难。

但张之洞绝非轻言放弃之人，他并没有马上开炉铸造，而是经过细致的调查之后才拟订具体实施计划。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湖北银圆局落成并开炉铸造，“计大银圆，重库平七钱二分；其次为两开，重三钱六分；又次为五开，重一钱四分四厘；又次为十开，重七分二厘；又次为二十开，重三分六厘”。这次参照广东的成功经验，基本上对配比未做更改，而且未请外国银行协助，取得了不错的成效。

不过铸造出来是一回事，让民众广泛接受是另一回事。张之洞决心以铁腕手段推动湖北银圆在民众中的普及。首先在湖北省内要求厘金税课一律改征银圆，然后是官绅俸禄、财政拨付，以至于民间的钱店当铺都要使用本省银圆。而且张之洞将湖北银圆局交由南洋通商大臣经理，让“龙洋”在整个南洋通商大臣管辖范围内通行。他很有信心地认为，有朝一日这些“龙洋”定能够通行全国，畅通无阻，甚至行销海外。

张之洞的成功为各省督抚提供了一条新思路。光绪二十年（1894年），清政府要求南洋通商大臣和北洋通商大臣各自以官督商办的法子自行铸造银圆。可这次张之洞却提出了反对意见，他觉得铸钱不比开工厂、办实业，这是关系到国家命脉的大事，引入商股实在过于危险，如果不严加监管，可能会出现弄虚作假或偷工减料的情况。官铸更应慎重，要是指望这个来赚钱，那国家离崩溃也就不远了。

这一主张果真起了作用，由南洋、北洋通商大臣官督商办的想法最终不了了之。然而，银圆铸造权掌于各省督抚，各省所铸银圆重量、成色均存差异，全国货币市场混乱不堪。因此，实现银圆的国家铸造和银圆重量、成色的统一就成为清朝币制改革的当务之急。

统一币制

此时的清帝国，君臣对货币的认识仍停留在交换媒介上面。他们对现代货币制度几乎一无所知，更不清楚要由国家设立本位币制度以维护金融稳定，这都使得推动货币改革困难重重。所以，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军机处发电征求各省督抚意见，询问是否要改铸一两、五钱、两钱、一钱的时候，并未受到广泛赞同。

现实情况是，清帝国的工商业发展由于货币不统一的问题遭遇重重阻碍，特别是庚子年（1900年）国际银价暴跌近一半，八国联军侵华更是将数十年积蓄化作乌有。本息合计赔偿9.8亿白银彻底打破了整个清朝的赔款纪录，这个千疮百孔的国家是无论如何都拿不出来这么多钱的。

更可悲的是，清朝统治者被洋人一顿忽悠，以为西方国家实行金本位，赔款就得以黄金的价格付给对方。可他们没想到，此后英镑汇价竟然一路攀升，在金银兑换不等价的情况下，拿白银去兑换黄金，又被狠狠宰了一刀，这就是所谓的“镑亏”。据估计，清朝为弥补亏空，多花了整整800万两白银。

这时，清朝君臣终于意识到，统一币制已到了非做不可的地步。此外，英美列强也受够了迟钝缓慢的兑换过程，为了保证自己在华的经济利益，要求清政府必须尽快设立国家本位币制度。

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朝廷筹划彻底改革币制，但要先解决本位币问题。之前就是因为这个问题，清政府不得不承受巨额“镑亏”。国内银钱波动为国际资本在中国大把捞钱制造了绝好机会，它们在国际市场操纵汇率水平或者货币价格，在中国货币市场最为疲弱之时给予致命一击，赚得盆满钵满。

清朝币制改革有三条路。

第一条路是紧跟西方国家实行金本位，这算是最稳妥的，因为世界上有名的几大强国都在19世纪后半期逐渐实行金本位制度。现在用黄金衡量货币价值，得益于这些国家多年积攒下的家底。在欧洲，金本位是当时一种十分流行的本位币制度。有人认为跟在洋人的后面，至少不会承受“镑亏”的风险，也不会因为国际市场的汇率变动而受损失。但这种方法在实际操作中有困难，毕竟清朝的国库里存的多是银两，而不是金币。金本位是需要黄金作为储备货币的，所以这个办法不可行。

第二条路是实行金汇兑本位制。这种办法，不必有庞大的黄金储备，只要与其他实行金本位的国家保持固定比率就能发行纸币。当然纸币也失去了兑换黄金的功能，只能兑换外汇，将外汇作为准备金。这对于缺乏黄金的清政府而言似乎是条捷径，但最欢迎这种方式的却是洋人。如果把清政府的纸币和本国金本位下的货币挂钩，以后就更方便他们在大清帝国身上薅羊毛了。所以经过仔细考虑，这个办法也行不通。

最后一条路，也是最具可行性的一条路就是实行银本位。中国人已经用了几百年的白银，让他们贸然抛弃肯定是不现实的，且白银虽然没太多国库储备，但总要比黄金多得多。眼下可行之法是以白银为基础，实行银本位，以后再考虑与国际接轨，实行金本位。

在张之洞等人的力陈下，清政府最终放弃了之前的幻想，踏踏实实从银本位开始。

“两元之争”

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7月，天津设户部造币总厂。11月，清政府开始全面进行货币改革，统一银币。但由于本位币不定，引起了空前的“两元之争”，朝中官员为了本位币应采取“两”还是“元”这个问题争执不下。

计量单位为何会引起如此大的争议呢？事实上，这不仅仅是银两和银圆的差别，还关乎国家的脸面。一两银圆源于旧有的银两制度，七钱二分银圆则仿自流入的外国银圆。湖广总督张之洞、前直隶总督袁世凯和鹿传霖等支持以一两银币为准，度支部尚书载泽等则支持以七钱二分银圆为准。双方互不相让，前者认为事关国家主权问题，不能沿用洋人的规矩，中国老百姓用两作为计量单位已有几百年，岂是说改就改的？而后者则认为七钱二分的比重已随洋圆的广泛使用而为世人所接受，现在既然要改，倒不如一步到位，直接与西方银圆看齐。

两者都有道理，清廷最后决定以投票来确定计量单位。最终投票结果是，主张用一两的有十一省，主张用七钱二分的有八省，此外还有主张足色十成的四省和主张九成色的四省。看起来“一两派”似乎占了上风，光绪帝也发布上谕，打算以一两为重。但此时突生变故，光绪帝和慈禧太后十分蹊跷地相继病逝，朝中一时无主。

这么一来，原有的计划也只能搁置了。不过从实际情况来看，在外贸盛行的沿海地区用银两实在有颇多不便，上海总商会上书度支部为此大倒苦水，非要改回七钱二分。宣统元年（1909年），度

支部尚书载泽建议再议币制，把用“两”造成不便的原因归咎为张之洞和袁世凯的独断专行，“一两派”不甘示弱，双方掀起新一轮唇枪舌剑。

最终，宣统二年颁布《币制则例》，为这场漫长的争论画上了一个句号。根据《则例》，“中国国币单位，着即定名曰圆，暂就银为本位。以一圆为主币，重库平七钱二分。含纯银九层，合六钱四分八厘”，铸造“宣统元宝”龙洋，并决定停止各地自由铸造，将所有铸币权收归中央。度支部通电各省督抚收回所有生银与银锭，统一改用银圆，并筹备流通行用之法，同时在天津设立造币总厂，以期统一铸造银圆。但未过多久，辛亥革命爆发，清廷覆亡，银币没有来得及正式发行，仅有少数作为军饷的银圆流入市场。清政府灭亡时，发放的银圆也仅有2亿元，多是熔化外国和旧龙洋改铸。

自铸铜圆之路

铜价昂贵，清政府几乎所有自制铜圆的梦想都半途夭折，甚至可以说铸钱越多，亏损越多。光绪十四年（1888年），李鸿章在天津机器局试铸的时候就发现，铸造面值总额不足5万两的制钱时，工本竟然要花费10.7万白银，相当于要倒贴五六万两白银。[(7)]次年，张之洞尝试在广东铸钱局用机器铸造机制制钱，发现每个月居然要花费铜铅等工本费1.3万两白银，铸成制钱1.2万余两。虽然相较于李鸿章有所进步，但还是要亏损数百两。[(8)]

赔钱的买卖自然没人愿意做，所以不少铸币局停产，钱荒愈加严重。朝廷可以用银结算，可老百姓平时交易总不能也揣着一把碎银。钱荒逼得朝廷不得不认清现实：铸钱是亏本，停铸可是要命!必须尽快想办法降低成本，重开铸钱。

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钱荒的现象太过严重，代理两广总督德寿上奏诉苦。前任总督李鸿章给他出了个主意，为什么临近的港澳地区同样使用铜圆，就没有这么严重的问题？倒不如按照仿制外国银圆的办法，按照他们的模子成色，采取同样的工艺流程，自己仿制一批铜圆，至少也能解燃眉之急。

德寿接受了李鸿章的办法，立刻学习机制铜圆的经验，在广东开了机制铜圆的先河。德寿所铸之钱每枚重二钱，成色为铜九五，白铅四，锡一，100枚抵银圆一枚。制造成功之后，德寿惊讶地发现铸钱过程中竟然没有亏损，这一成功事例再次点燃了各省机制铜圆的热情。

后来，福建和江苏也相继制造成功，不仅没有亏损，而且制造出来的铜圆“模板分明，花纹精细”(9)。这些质量颇高的铜圆进入市场，很快就取代了质量不高的私铸钱。朝廷对此大加赞许，次年，光绪帝就发布上谕要求其他各省赶紧仿效。

利益比任何行政命令都来得有效，各省督抚发现铸铜圆不仅不会亏本，甚至还有可能赚钱，顿时来了精神。他们争先恐后地购置先进机器，建设造币厂。甚至有的省嫌一个造币厂不够，还要多建几个。最为夸张的是江苏，整整建了六个厂，单江宁就有三个，足见各省热情。事实证明，这一举措是正确的，不过几年时间，各省造币厂就扭亏为盈。

广东成为这场铸钱热的发源地，得益于优越的地理位置。作为很长一段时期内中国唯一开放的外贸港口，在与洋人打交道的过程中逐渐意识到外国银圆的优越性。且当地民风开放，故能得风气之先，贡献了中国第一枚自铸银圆与铜圆。

从今天的角度看来，清朝的货币改革无疑是失败的。清末虽然把银币定为法币，因清政府缺乏金融控制力，最终仍未真正将其变为本位货币。今日看来，清末铸造银圆和货币改革并不够彻底，但它为币制改革的现代化铺平了道路，有一定的积极意义。

后来的中华民国政府继续铸造机制银圆。但银圆、银锭混用对社会经济产生了较为严重的负面影响，如缺乏统一的货币进行结算、汇兑费用高昂等。1933年，政府宣布“废两改元”，真正实现了银圆对传统银锭的货币取代。而中国真正意义上的现代货币，要等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才出现。

---

(1) 张国辉：《晚清财政与咸丰朝通货膨胀》，《近代史研究》1999年第3期。

(2) 张国辉：《晚清财政与咸丰朝通货膨胀》，《近代史研究》1999年第3期。

(3) ［清］两广总督卢坤等覆折：《银圆出口未便禁止仍照旧章》，中国人民银行总行参事室金融史料组编：《中国近代货币史资料》第一辑，中华书局1964年版，第43—44页。

(4) ［清］福建巡抚吕佺孙折：《建议仿铸外国银圆》，中国人民银行总行参事室金融史料组编：《中国近代货币史资料》第二辑，中华书局1964年版，第191页。

(5) 见《两广总督张之洞奏请广东试铸银圆以备户部推广事》，现藏于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

(6) 见《两广总督李瀚章奏为进呈广东新铸银圆筹拟行用办法恭折》，现藏于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

(7) 《直隶总督李鸿章机铸制钱亏损工本无法筹补折（光绪十四年八月二十日）》，中国人民银行总行参事室金融史料组编：《中国近代货币史资料》第一辑，中华书局1964年版，568页。

(8) 《两广总督张之洞报告广东机铸制钱及行用情形折（光绪十五年八月初六日）》中国人民银行总行参事室金融史料组编：《中国近代货币史资料》第一辑，中华书局1964年版，第572—573页。

(9) 《闽浙总督许应骙闽浙兼铸铜钱折（光绪廿六年闰八月二十一日）》，中国人民银行总行参事室金融史料组编：《中国近代货币史资料》第一辑，中华书局1964年版，第873页。

第四章　从银号到银行：清末金融业的跌宕起伏

银行已有近千年历史，早在11世纪，意大利威尼斯和热那亚就已出现银行。那时由于商业的繁盛，各国商人都会聚于此，同时也带来了五花八门的货币。币种的不同给交易带来很大不便，于是一些钱币商们摆条长凳就做起了钱币兑换和鉴定的工作，这条长凳在意大利语中称作Banco，后在英语中变为Bank。自从1407年第一家银行在意大利威尼斯建立之后，欧洲各个强国都相继开设了自己的银行。

商业活动的进步催生了金融业。商人需要资金周转；而国家为维持政权稳定，会在丰年借入粮款，到了歉年再贷出。无论是私人还是国家，可以说自从有人类经济活动以来，借贷关系就不可避免地深入到每个人的生活中。

在古代中国，钱被称为“泉”，其意在宛如流水般通济四方。要实现这一目的，要有相应的金融机构予以调剂。中国早在唐朝就有了独立运营的金融机构，用于支取“飞钱”或“便换”，同时还开设柜坊，办理存款或代管业务。虽然没有今天如此花样繁多的金融业务，却也是中国金融业的开端。

清代的民间金融业可谓百花齐放，各色金融机构都在市场上占据了一席之地。在金融业最为鼎盛的时期，几乎所有生意人想要资金周转时都不愁找不到资金的提供者。需求少的找钱庄，需求多的找银号，它们背后的账局会提供坚实保障。如果急需资金，当铺的大门会随时为借贷者打开，为需要者提供及时支持。如果囊中羞涩，没有抵押物怎么办？没关系，印局的无抵押贷款“印子钱”能够解燃眉之急。如果这些办法都无从使用，乡间互助形式的合会还

可以提供帮助，更不用说到了后期，山西票号这个“巨无霸”的横空出世。正是它，一举改变了整个民间金融业的游戏规则。

这是一个不同于我们现代认知的经济社会，它有自己的形式逻辑与规律，提供从资金保障到解决经济纠纷的一条龙服务。它借着商品经济发展的东风而起，不同身份的人物在其中各司其职，营造出一个复杂而严密的民间金融生态体系。虽然没有政府的强力监管措施，也缺乏明确的法律法规予以规范，但商人们基于朴素的民间道德准则和内在的市场规范机制，还是让这个金融体系得以维持了下来。

爆发的银钱业

明清两朝是中国银钱业真正集中爆发的时期。从明代中后期开始，大量的白银涌入给民间商业注入了无穷动力，各大商业城市和工商业者如雨后春笋般在中国南方茁壮成长起来，银钱并行开始成为主流。朝廷不管是征收赋税还是发放饷俸，都是按照“银七钱三”的原则。在这种情况下，专事银钱兑换的金融机构应运而生。它最开始叫“钱肆”或“钱桌”，听名字就能感觉到一股浓浓的市井气息，而它的确也与百姓的生活息息相关。

乾隆初年，这些店铺开始升级。北方及西南地区称之为“钱铺”，江南地区称之为“钱庄”或“钱店”。店铺的主要工作就是收入银两，拿银两去钱市购买铜钱，然后再将铜钱兑出，赚取中间的差价和手续费。

与钱庄和钱铺类似的银号发展更加迅速。不管是启动资金，还是资本总额，银号都远超钱庄和钱铺。银号不仅收入银两，还将银两兑出。此外这些银号不仅经营平常的银两买卖，还能发行银票，

自己铸造银锭，上面盖有自家的商标，已具有初步的货币发行功能。

银钱业迅速发展，业务范围也不仅局限于兑换、汇兑或者保管业务，还延伸到存贷款等以前很少涉及的领域。这时的钱庄和钱铺、银号都手握雄厚的资本，实力绝非往日可比，它们甚至能决定一个行业的生死。

钱铺发挥作用的地方很多。因赌博而负债累累的人会找钱铺，因奢侈无度、铺张浪费而经济困难的人会找钱铺，甚至连各级官吏也会因为衙门缺钱而去找钱铺，毕竟清朝基层官员的俸禄是出了名的低，养家糊口都困难。

当然，由于条件所限，钱铺方面没那么多人手和精力去一一核实借款者的还款能力，所以一般都能借款成功。而且钱铺一般特别喜欢一掷千金的八旗子弟，因其信誉好，还款能力强，钱铺对他们也特别放心。一般旗人要兑换银钱，连保证质押都不需要，直接拿张纸写上身份姓名住址，盖个章记就能借钱，时人谓之“钱帖”。

钱铺的另一大主顾是牙行。当时各行各业都有牙行。牙行是做什么的呢？它们可不是普通的民间组织，而是得到政府承认的正式机构，其作用类似于现在的市场监督管理局，既有官方主导的，也有私人经营的。牙行能够凭借特权为买卖双方牵线搭桥，甚至还能代商人买卖运送储存货物、支付保管款项、代政府征收商税等，可以说市场上想做生意都得经过牙行之手。雍正十一年（1733年），朝廷觉得牙行太多，妨碍贸易，谕令改行额定牙帖制度，全国总共发牙帖18万张，以后再想拿到只能“退帖顶补”。

虽然门槛提高很多，但看在丰厚的利润回报上，大家还是争先恐后地参与其中。为了凑够高额的入场费，大家或集体入股，寄希

望于钱铺、银号的贷款。

而对于更多的行业来说，没有钱铺、银号简直就到了无法生存的地步。比如采矿业、交通运输业、大型生产业等一系列投入资金多、风险大、回收成本时间长的行业，不靠借贷的办法分散压力、降低风险，很快就会陷入生产经营困难的局面之中。而且对于这些行业来说，钱铺、银号简直比摆在案上的财神爷还管用，能在关键时刻帮助自己渡过难关。

对于银号本身来说，发放如此风险巨大的借款肯定要慎重，万一借贷人运输路上碰到意外情况，或者是偶遇什么天灾人祸，抗风险能力薄弱的店家搞不好就会资金链断裂，还钱的事恐怕也会落空。但腰缠万贯的大财主们可不会做无准备之事，他们放款会经过缜密的风险评估，风险要在可控范围内。

事实证明，银钱业的投入是有效果的。在商业经济发展的过程中，钱铺、银号与商人、放款人、借贷者之间构成了一个稳定的资金供应关系，从生产、运输、销售到最终分成等各个环节都离不开银钱业。每一个生产者、运输者乃至供货商都是链条的一环，成为钱铺、银号的忠实客户，为它们的壮大添砖加瓦。在银钱业最鼎盛时期，每次外地的银子刚刚运抵，就被各家钱铺、银号瓜分一空。

那么钱铺、银号如何评估贷款者的信用呢？这些金融机构对本地商家自然有充分的了解和足够的信心，它们会视规模等级不同的客户进行阶梯式放款。毕竟同为邻舍，大多数贷款者都会珍惜自己的名声，不会干卷款跑路之类的事情。当然也会有品德败坏之辈，干出伪造票据骗取贷银，或者私自分赃拒不认账之类的事，这也算是银钱业的经营风险了吧。

快速发展的金融业

清代除钱铺、银号外，实际上还有很多种金融机构，它们分别是账局、当铺、印局以及各种民间合会。

钱铺、银号为普通人的资金周转提供保障，为商人的生产经营活动保驾护航的则是账局。账局的资本规模一般很大，专门针对工商业字号甚至官员放款。由于经营账局所需资金甚巨，往往是合伙经营。

京城的账局就热衷于给官员放贷，毕竟京官缺钱。在贫富悬殊的京城，有钱的自己搞家账局经营，没钱的借债度日都是常事。因此官员对账局往往喜闻乐见，这些能与朝廷头面人物搭上线的账局若运用得当，能发挥巨大作用，借债者与被借者之间也能“加深感情”。这些借款被称作“京债”，数额较之普通借贷更为巨大，不过其间风险也不小，毕竟官场险恶。由于风险巨大，“京债”的利息往往要高于平常两三分。

大多数中小城市的账局没京城账局那么多资本，一般只能向商人或商号放贷，因为大家都是商人的身份，对彼此的主要需求和偿还能力心里有数。借贷关系建立在信用的基础上，所以相对来说偿还率高，风险性小。贷款方主要是晋商和徽商等经常需要长途货运的大主顾，另一些要进行零售分销业务的大商号也需要足够的资金支持。账局的经营范围相当广，连偏僻的城镇和农村都有分布，虽名为“放账铺”，但普通的小手工业者和小商人们也能在这里筹集到启动资金。

当铺就更加广为人知了。作为一种历史悠久的传统金融机构，任何人都可以去当铺抵押物品以换取一点救济时困的资金。明清时期，当铺已相当完善，连政府都参与了进来。清代内务府自掏腰包开了26家当铺，但是因为经营不善，最后被民间资本打得丢盔弃甲。

印局是可以提供无抵押贷款的高利贷机构。与正规贷款相比，高利贷的最大特征就是门槛低，甚至零抵押都能借到钱。它们发放的贷款每日或每十日就要还钱一次，本利合计，还一次盖一次印，故名“印子钱”。印子钱的数额仅为两三串，最多不过十来串，期限也比较短，有朝发夕收的，也有以百日为限的。但与所有的高利贷一样，印子钱利息很高，通常为月息三分至六分。这是个普通人难以承受的利息数，不少人因此被逼得家破人亡。

即使有这么多金融机构，最基层的乡村还是面临缺钱的问题，这时民间的合会就能发挥作用了。在“天高皇帝远”的地方，很多时候面对突如其来的困难，村民们就只能自发形成互助组织。合会一般有一个会首，为组织与领导者，带上一众亲朋邻里按期集会，每人出一点儿钱作会费，从而在关键时刻帮助受困者解决资金难题。

为了大家的财产安全，合会明立会规，写明借款明细与违约惩罚措施，印在会簿上交由每名参会者妥善保管。如果有人违约，则以地充抵，此外要从会中支取银钱，必须有专人作保，签字画押。

合会靠熟人关系连接而成，只有靠邻里乡党守望相助才能共渡难关。借款人与贷款者签订的是以血缘为纽带而形成的契约，违约者不仅会受到会约和会规的处罚，坏名声还会很快传遍十里八乡，别说是借钱，就算出门办个事都会遭人唾弃。正因为在乡村这个熟人社会，失信违约的成本太高，所以这种互助模式才能维持运转下去。

山西商人的经营之道

清朝道光年间，一个影响了中国金融业未来走势的重要机构诞生了，它就是票号。而票号，尤其以山西票号最为著名，它逐渐发

展成一个在全国拥有完整金融汇兑网络、拥有众多分支机构的巨无霸式金融系统，对中国近代金融业产生了深远影响。山西票号的诞生，要从200多年前说起，从山西商人的典型代表雷履泰说起。

雷履泰，一个从山西平遥走出来的农家少年，幼时因家贫，不得不弃学从商。或许是命运垂青，雷履泰在平遥城看杂耍时，与经过此地的西裕成颜料铺二少爷李大全相遇，两人相谈甚欢，于是李大全便让他到自家的颜料铺工作。雷履泰充分发挥出自己的经营才干，帮东家出力不少，很快便坐上了西裕成颜料铺大掌柜的位置。

不光在平遥城里，西裕成颜料铺在全国范围内都数得上号。除了平遥本地的总号外，北京、天津和汉口等地都有他们的分号，产品更是远销全国各地。雷履泰坐上这个位置，可谓风光无限，但他心里却不敢有半点懈怠。东家对他委以重任，他决心以自己所长干出一番事业，报答知遇之恩。

心思活络的他发现，彼时颜料铺主要经营一种叫铜碌的产品，但本地没有合适的铜矿。颜料铺只能从四川购买原料，顺江而下至汉口，再转运到山西，成品则主要运往京师或天津销售。在西裕成历任掌柜的苦心经营下，这套经销体系已传承了近百年，渠道已相当稳定，但雷履泰却发现其中有一个大问题。

商品在北京销售完之后要把货款原路押回平遥，但路途并不安全，即使有专人护卫，劫镖、丢镖的事也时有发生。所以他就学着京城商号经营汇票的经验，在自家的颜料铺里也开辟了汇兑生意，这样货款就不必长途运送，只需凭借一张小小的汇票就能从铺中取到现银。由于雷履泰一向讲信用，在平遥商界风评极佳，所以其他商号非常相信雷掌柜的为人，愿意把自家的货款存到西裕成颜料铺，或者在西裕成支取外地的货款。雷履泰也不会拒绝乡亲们的请求，顶多是收取一些手续费，即所谓“内贴”。

随着生意越做越大，雷履泰发现，做汇兑生意居然比老本行的收入还要丰厚，那何不专营汇兑呢？雷履泰与东家李箴视一拍即合，觉得此事可为，索性于道光三年（1823年）将西裕成颜料铺改组为日升昌 票号，总号位于平遥西大街。

日升昌 的异军突起为平遥带来了一番新气象。看到经营汇兑业务有利可图，一大批山西票号纷纷成立，并随着山西商人的足迹迅速进入全国市场。平遥财力最雄厚的侯荫昌 也适时而动，把自家的六家绸缎庄全部改成票号，而且位置就在日升昌 隔壁，显然双方是较上了劲儿。

在两家大票号的带动下，一大批山西商人加入进来，他们或为邻里，或为亲朋，总之都是以血脉同乡为纽带集合在一起，互相提携帮助。这批人像开连锁店一般四处扩展生意，在商场打下一片天地。冯桂芳 说：“今山西钱票，一家辄分十数铺，散布全省，会（汇）票出入，处处可通。”[(1)]票号的鼎盛时期到来了。

早期的山西票号的业务对象多在北方，既有商业汇兑的业务，也经营存放款。比如，有的商号要购置原料货物，但流动资金不够，山西票号可先行垫付，商号资金充裕时再补上垫款和利息。另一种情况则与之相反，商号会先给票号交纳货款，一段时间之后再向收款方缴纳，票号不仅不收汇费，还会付出一定利息。这种模式称之为“逆汇”，等于用一点利息买下资金一段时间内的使用权。这与现在的存款模式颇为类似。

19世纪60年代之后，山西票号进入了疯狂扩张时代。北至包头、张家口，南至香港，西至迪化（今乌鲁木齐），东至上海，甚至连国外的日本和朝鲜，都能看见山西票号的影子。奔波于全国各地的山西商人靠自己的努力编织出一张巨大的金融汇兑网，哪怕只

是在帝国边陲的一个小分铺存入银两，也能在繁华的苏杭之地足额取出。

在新进开埠的港口上海，山西票号迅速占领市场。19世纪50年代的上海尚无山西票号，到了光绪元年（1875年），便已有了24家分号。到后来，上海钱庄所存的各种公私款项都由票号经手，其财力可见一斑。同样在商业繁盛的九省通衢之地湖北，山西票号势头强盛，光绪七年（1881年）在汉口就有分号33家，汉口也成为全国票号最多的城市。

山西票号在各地顺风顺水，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它特有的“钞能力”。山西商人深谙为商之道，从不吝惜手里的银子，只要钱庄需要资金，就能很轻松地从票号手上拿到低息贷款。通过这种大把撒钱的方式，山西票号与各大商号钱庄都建立了良好的合作关系，它们的上下游资金流动都要仰仗票号这个巨型“水阀”进行调节，借助这个稳定的渠道，盈利自然不成问题。

另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强大的信用保障。这个时期，民众的口碑就是最好的广告。对于金融生意，最重要的资产就是信用，或者说是民众的信心。这比账上的真金白银更管用，有时甚至能决定金融机构的生死存亡。所以，山西票号格外重视自己的信用形象，他们遵守一个共同准则，那就是“以信为本”。

不管距离远近、金额多寡，票号都能准确、迅速地将资金送达到位；无论客户身份高低、职业贵贱，票号都秉持“认票不认人”的态度，以实际行动保障资金的万无一失。因此，当时很多人称赞道：“但有外行失信于票庄者，从无票庄失信于外行者。”商民最终选择山西票号也正源于此。

当时有一个流传甚广的事例。说是某日，一个沿街乞讨的老妇人到平遥日升昌 总部，拿着一张面值1.2万两银子的张家口分号汇票要求兑换。柜台伙计看了一眼，顿时吓了一跳，原来这张汇票是同治七年（1868年）签发的，距当时已有30多年了。1.2万两银子可不是小数目，有人觉得可以搪塞过去，不予兑换，毕竟一个老妇人也难去讨说法。不过掌柜不这么认为，他查了30多年前的陈年旧档，果真找到了与汇票相符的内容，于是如数兑换。这个故事流传出去，日升昌 名声更盛，山西票号重信守义的形象也在普通老百姓心中扎下了根。

日升昌 对自己的汇票如此有信心，离不开一套精致严密的防伪体系。众所周知，纸币是最容易造假的，即使在现代，也需要在纸张材料、油墨、刻板、印刷等多个环节严格把控，而票据的仿造更为简单。要知道，古代可没这么多先进的技术和设置，万一被居心叵测者看到流出的汇票，他们可以轻易地根据已有样式仿造出差不多的伪票，如果人人都拿着假票据去兑换，那票号距离倒闭就不远了。

为了避免这一情况，票号会在密码上做文章。一个很常见的方法就是用诗句来代表十个数字与单位，以及一年365天。比如，看到“堪笑世情薄，天道最公平，昧心图自利，阴谋害他人，善恶终有报，到时必分明”的诗句，你会想到什么？实际上这就是每月30天的代号。“生客多察看，斟酌而后行”，分别代表壹、贰、叁、肆、伍、陆、柒、捌、玖、拾，“国宝流通”则是代表万、千、百、十。

通过这样一套加密方法，令每张汇票都有了自己独一无二的“身份证”，票号只需对照密码本，就能查到相符的记录。当然这样也不保险，难防有心人破解出来，所以票号还会定期更换密码。密码本只有几个高级别的成员知悉，从而达到最佳的保密效果。在

今日看来，这种防伪技术并不复杂，但是它在清代用了上百年，具备不错的防伪效果。这一切不得不归功于从业者的保密意识之强、管理制度之完善。

票号作为一种典型的家族企业，东家和掌柜是一种委托和代理的关系，即一方出资，一方出智，类似于现在公司中的股东和职业经理人。双方各司其职，东家要订立票号的发展方针，确定业务方向，还有利润分配等；大掌柜则专司经营，即使是大东家也不能随意干涉掌柜的决策，更不能对号内大小事情指手画脚。如果东家不能遵守这个约定，那掌柜大可以甩袖子走人。作为专业性的稀缺人才，专业能力强的掌柜往往会受到各家票号的青睐，所以有眼力的东家不会轻易放走任何一个有潜力的掌柜。

光有强将还不够，精兵也是业务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山西商人想出了一种独特的激励办法，即股东出资为银股，掌柜伙计出力为身股，只要做得好，就能有身股。身股作为一种对优秀员工的嘉奖，全号上下都能从票号的发展中获得红利，士气自然就能够大大提升。不仅如此，员工的工资、年终奖、年假等福利措施也一应俱全。要知道那可是没有《劳动法》保护的年代，相较于同时期把工人当作机器使用的英国工厂主，山西票号给出的工作条件对中国最普遍的贫苦农民而言是相当优厚的。另外，山西票号在经营上有专业性分工，这也是它们能够迅速扩张的原因之一。

中国人自古讲究圈子，山西票号也是如此。票号内部人员，从大东家到伙计全部都是山西人，有人想要加入票号要先由保荐人“说项”，再经过多方面考察，包括身份背景、业务能力、道德水平等。这么一套烦琐的流程，普通人连进去的门路都找不到。而且票号内部的聘用与合作很多时候并不用合同，东家与受聘者一个口头协议就能达成，前者相信后者的忠诚，后者相信前者的信用，在此基础上才会达成合作。

这种办法放到现在来说，当然既不科学也不合理，但在当时自有它存在的缘由。山西票号本身就是一个封闭的小圈子，彼此知根知底，如果有人行为不端，很快就会传遍各家。到时不光亲友蒙羞，保荐人面上挂不住，自己名声也臭了，到最后落得个无人敢用的结局。这不是一个人的事情，而是关乎整个家族的声誉，所以正常来说不会出现大的问题。不过，这种方法也只能在小圈子里发挥作用，要搞成全国连锁乃至世界连锁，光靠血缘与地域关系肯定是不行的。不说有没有足够资本，光是找这么多山西本地人才就是个大问题。

山西票号有庞大的势力与财力，没有监管自然是不行的。可清代又没有银监会，要由谁来担负这个职责呢？这就需要行业内部自行组织的行业协会了，比如归化宝丰社、大同恒丰社、包头裕丰社等，这些名字中带“丰”的机构就是专门对票号进行监督管理的。这些机构的领导者被称作总领，由各大钱商轮流派人担任。它们的权力有多大呢？它们可以收缴假币，也可以调节银钱供应，还可以维持市场秩序，可以说跟现在中央银行的职能有部分相似。

票号与钱庄之间有着特殊的关系，前者会给后者放款，这样钱庄才能保证自己有足够的资金储备。如果钱庄碰上了经营或资金风险，票号还会主动出头，帮与自己有合作关系的机构解决问题。得到票号的保护，这个资格可不是谁都能拿到的，一定是有信用保障的钱庄。因此，票号和钱庄双方算是上下游的关系，显然类似于现在的中央银行和商业银行。

不过，这些民间金融机构再风光，也不能和国家意志相比。对于清政府来说，票号是不靠谱的，虽然很多时候自己也要依赖从票号那里借来的钱，但政府并不想把票号的那一套监管办法和管理手段拿到朝堂之上，更不愿意它们插手国家金融命脉。

暧昧的官商关系

除前文所述，还有一种不好宣之于口的事，那就是票号、钱庄等与清政府的关系。在古代社会，商户若想生意兴隆，一个重要条件就是打点好与官府的关系，甚至有时这还是决定性条件。而清朝有一种很流行的敛财方式叫作“捐纳”，说白了与以往的卖官鬻爵一样，都是拿钱买官。太平天国运动爆发后，清政府国库窘迫，为了筹钱无所不用其极，加大捐纳力度。但各省交上来的银子成色参差不齐，连归类统计都做不到，就更别提使用了。

这时票号就自告奋勇站出来，表示愿为朝廷分忧，它们与银号合作，把各省运解来的银子兑换之后再行上缴，这样就为朝廷省了不少手续。后来各省觉得千里迢迢押运过来再上缴实在麻烦，自己等得起，国库也等不起，于是就与票号合作，表示可以把上缴的银子存到票号，再让京城的票号代替自己兑出，以免长途运送。

于是票号顺理成章地将捐纳业务承包下来。有了一套风光的官方身份，做什么事情都方便了很多。甚至连日升昌 的大股东李箴视也花4000两银子捐了个知府，其他大大小小的票号当然也少不得为自家人安排个一官半职。虽然靠捐纳得来的基本都是虚职，但也足够光耀门楣了。而且在与官府打交道时，不必再低眉顺眼，对未来业务的发展大有好处。

当时，官场上的“老油条们”都知道，如果能与京城中的达官显贵搭上线，未来飞黄腾达的日子也就不远了。由于与朝中上层关系良好，票号就成了一个很合适的渠道。为求得紫禁城里一句好话，各路人物可是使出浑身解数，京城里的大票号每天都能收到大笔存款，白花花的银子把库房堆得满满当当。

既然捐纳的难题可以解决，那么地方上缴中央的京饷和中央拨付地方的协饷是否也可以通过此种办法办理？清政府刚开始自然是不乐意的，因为自古就有“严禁交商会兑”的要求，也就是说国家财政大事岂能轻易交于商人之手？不过，太平天国运动来势汹汹，全国上下都乱成了一锅粥。交通阻绝，路途不通，再要求款项及时到位显然是不可能的。从闽海关开始，粤、赣、川、湘等南方省份不愿意继续等待，早早地就开始利用票号进行京饷、协饷的汇兑。

可是，朝中还是有不少人仍然固执己见。他们声称没有各地运来的银子，京城银贵钱贱的局面岂不更加严重，因此要求票号为京城银荒的后果负责。但是，都火烧眉毛了，哪还能顾及银荒的后果？好在大多数人还是有头脑的，在各省纷纷选择票号汇兑的情况下，朝廷不得不放弃官运官解，装鞘运现的要求，允许京饷、协饷通过票号汇兑。

整个太平天国运动时期，山西票号为清政府做出的贡献可谓巨大。据统计，从同治元年（1862年）到光绪十八年（1892年）的31年间，依靠山西票号汇兑的京饷达到5857万两白银，平均一年189万两。可谓拯国家于危难，解财政之困厄。

镇压太平天国运动之后，双方的矛盾立刻显现出来了。虽然票号得到进一步的扩张，但在朝廷看来，山西票号头上的“民”字是一道迈不过去的坎。作为一国统治者，皇帝再如何昏庸也不可能容许民间金融资本把持国家财政命脉，更何况是公款汇兑这种敏感之事。

而且由于立场不同，双方对同一件事的态度也大不相同。比如很多学士家庭贫寒，连参加科举应试的路费都没有，票号就会择其优秀者予以资助，以期金榜题名之时互相扶持。可能在票号看来，

这是互惠互利的，但是从官府角度来说，结党营私的红线是绝对碰不得的。

还有很多票号为了巩固自己的政治地位，经常会使出“银弹”攻势，即结交朝中大员和地方权贵，希望其充当自己的保护伞。受资助者为了感谢票号，也会将大笔公私款项存入票号。在很长一段时间里，票号对存入的公款甚至连利息都不用支付，大可以放心地贷出去收息，靠这笔巨大的流动资金，哪怕资本总额只有十几万两的票号，也能放出上百万的贷款。

随着官商利益的进一步结合，两者的身份界限也变得模糊起来。商可以为官，官亦可以从商，不少官员干脆亲自“下海”，与商人合伙经营票号。在朝廷看来，官商勾结自古即是大忌，更何况赤裸裸的利益输送和假公济私？票号此举实在是居心叵测，必须予以严惩。

山西票号的掌柜们满以为自己帮助朝廷解决麻烦，大可以躺在钱堆上过日子，不过现实却给了他们当头一棒。朝廷对票号的“越线”行为深深忌惮，很快就揪出了许多帮助贪污官员隐匿赃款的票号，不少都被查抄资产并永久封停，山西票号也为此付出了惨痛代价。

后来朝廷直接发布谕令，禁止各省通过票号上缴银两，一定要现银运送，实在太远运不过来的，就指定一家银号在京城设立银炉，所产之银专门用作户部收入。这看起来是个两全其美的办法，用不着票号插手，也就减少了徇私舞弊的可能，但清政府还是低估了实施难度。利用票号进行汇兑有着明显好处，首先是安全问题，就算没了太平天国，这世道也不安宁，各种土匪海贼层出不穷，万一半道上出了差池，谁能负责？其次是成本问题，要保证安全就得雇镖师，一路上旅途劳顿，这押运费和路费又耗资几何？还有各省

的银两标准并不统一，运抵京城后还得重新熔铸，火耗也不是个小数目。说到底还是利用票号汇兑最为省心省力，故而各省纷纷反对朝廷谕令，此事便不了了之。

来自外界的挑战

山西票号几乎垄断了清朝的金融业，但它依然面临外部的挑战。洋行的进入便给了传统金融业沉重一击。到清朝末期，基本上人们都习惯用银圆了。不管是花旗银行、汇丰银行还是横滨正金银行，它们发行的货币在自己的利益范围内都获得了认可。更重要的是，这些外资银行的纸币还可以兑换银圆，这就使它们在与票号的竞争中获得了巨大优势。

另外还有经营方式的问题。在新的时代到来之后，传统票号猛然意识到老一套的办法不管用了，尤其是在天津、上海、汉口这些最早开放的外贸城市，传统票号在各个层面都遭到沉重打击，论资本储备、业务规范、存贷款利率，哪一样都比不过外国银行。

虽然金融业最重要的就是信用关系，但票号靠熟人保证信用，而外资银行则用契约，两者一对比，票号的劣势就凸显出来。以前在不大的小圈子里，客户与传统金融机构的信用是有保障的；可到了大城市，来自天南海北的客人并不一定会遵守票号的规矩，就算他们欠钱不还或是违背合同，票号也很难进行追责。反过来，外资银行这方面的问题就不太严重，有契约在手，违约者必会被追责。

皇家银库

相较于以前的王朝，清帝国的金融产业可谓相当繁荣，但浮华的背后却是不受政府监管的现实。大家都遵纪守法还好，如果有钱铺银号贪图厚利，故意操纵银钱价格怎么办？对于金融这种可以影

响国计民生的产业，清政府不可能视而不见，必然会采取有针对性的办法进行约束。

早在嘉庆年间，朝廷便下令“开张钱铺者，必令五家互出保结”，并沿用下来，成为定例。可到了后来，管理措施就成了空文，清末的钱荒如同飓风一般横扫各行各业，所到之处百业萧条。这让平时一直惨淡经营的钱铺嗅到了商机，它们削尖脑袋想要从中分得一杯羹。但它们大多资本窘迫，多的达千两左右，少的才一二百两。所以，滥发钱票之类的事就屡禁不止，无形中把本就高昂的银价再度抬高，整个北京城的金融体系几乎崩溃。

后来，清政府清理了一批又一批的官票，但钱价还是如同坐过山车一般骤起骤落。大多数钱铺经不起这样的刺激，纷纷出局。还是有几家实力最强者坚持下来，比如京城有名的银号“四大恒”，即恒利、恒和、恒兴、恒源4家联号，它们都集中在东四牌楼一带。其创办者大多是浙江宁波和绍兴人，他们充分发挥了江浙人士的经商头脑，而且与官场上各色人物关系密切，有足够倚仗在京城立足。

到了咸丰年间，清政府自己也组织了9家官银号，分作“乾”字号4家和“宇”字号5家，全都交由商人经营。

虽然清末经济混乱，可民间商业活动却很频繁，各家商号亦是水涨船高，到后来以四大恒为代表的大银号在京城更是一个赛一个地声名显赫，成为京城一景。

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官银号的银炉被大火焚毁。由于缺少银两补充，京城的一大批钱店不得不暂时停业，普通老百姓的生活也受到影响，处理不好又是一轮银钱波动。于是，清政府赶紧让户部拨款50万两白银，再加上内帑银50万两白银，紧急送往几大官

银号，这才勉强维持住市场稳定。这说明，几个实力雄厚的官银号的确已经具有了影响国家命脉的能力，甚至可以依靠自己的财力对经济实行一定调控，初步具有了国家银行的雏形。

朝廷对官银号如此支持，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它们也是皇室的大金主。官银号的一大客户就是内务府，内务府是为皇室服务的部门，皇族花费多赖于此。太平天国运动严重影响了清廷税收，这种情况下内务府也没钱。可皇族用度又不能削减，内务府只好转头求户部接济。根据户部的统计，从咸丰七年（1858年）到光绪九年（1883年）的二十几年间，内务府总共从户部借去了3265万余两银子和175万贯钱[(2)]，只是大部分都打了白条，且只偿还约1/3。这让户部很不高兴，皇家内库岂能屡屡向国家财政借钱，难道打仗不要花钱，国家建设不要资金吗？于是生硬地回绝道：“内府、外库定制攸分，各宜量入为出，不可牵混。”[(3)]意思是大家划清界限，量入为出，自收自支，可千万别搞混了。

向户部要钱不成，内务府只好把目光投向他们经常光顾的银号。内务府开始还放不下面子，认为只是临时借用而已，到后来就越发离不开银号。随着时间的推移，借款频率越来越高，借款额度越来越大。最后，银号借款竟然已占到内务府财政来源的一半以上，单是光绪二十年（1894年）为了给慈禧太后祝寿，内务府就从银号借了100多万两银子。

之前，银号看在朝廷的面子上，都会很爽快地答应贷款请求，但也扛不住年年如此。商人的钱也不是大风刮来的，自然心生不满，屡屡向当朝抗议，结果自然是白费工夫。清朝还洋人的赔款都很艰难，哪里还有余力考虑这些商人的请求？每年还款数额都不敷借款，以至于最后新债垒旧债，直到清朝灭亡也未能还清，又成了一笔烂账。

1883年上海金融风暴

光绪八年（1882年）是上海著名的大商人徐润最为志得意满的时候，作为当时全国最大的茶叶出口商和房地产商，他在商界可是大名鼎鼎。徐润常常先把房屋抵押给票号或银行，换取资金之后再购置房产，然后继续抵押。他还是个特别有商业眼光的人，每次他都能看中最具有发展潜力的地段，以低廉的价格买下，经开发后再高价卖出，一来二去就积累了大量资产。

上海优越的经济地位也为徐润的崛起制造了绝佳条件。彼时的上海可谓商贾云集、贸易繁盛，来来往往的商船把港口堵得水泄不通。在这样的基础上，外国银行、钱庄还有票号在整个上海遍地开花。以这三者为基础，一个新的东方“魔都”崭露头角，可以说任何人都可以在这里找到适合他们的金融服务。

这里就像一个沸腾的红海，是冒险家和投机者的乐园。光绪四年（1878年），李鸿章开办了开平矿务局，要在上海招股100万两。轮船招商局的经验告诉商人们，洋务企业盈利的可能性很大，所以大家都踊跃响应，很快便筹集到足够的资金。事实也证明他们的选择是正确的，新式企业的建立给他们带来了巨大回报。

有了先例，上海的商人一时对招商集股充满了热情，每次有新公司开市，都会围上来一圈想要入股的商人。在这种热烈气氛下，上海的股价一路攀升，进一步刺激了更多人投资入股。

可就在这时候，一个巨大的危机到来了。1883年初，一家叫作金嘉记丝栈的大商号因亏损56万两白银而倒闭。这引发了一系列连锁反应，金嘉记的倒闭让上游的40多家钱庄贷出的钱收不回来，为了弥补亏损，它们只好暂停发放新贷，并尽量收回旧贷。这下被收

回贷款的商号就麻烦了，正常来说，商号并不会预留太多流动资金，一旦资金链断裂，就是倒闭的下场。

果不其然，很快上海的商号就如同多米诺骨牌一样倒下，倒闭的商号没办法归还钱庄的贷款，所以连带着钱庄也倒下一大片。谁能想到一家商号倒闭竟会带来如此严重的后果！本来高涨的股市瞬间被打入冰点，整个市场陷入混乱。作为上海房地产龙头的徐润损失最为惨重，由于大部分房产都是靠抵押贷款而来，他的固定资产在这场风潮中瞬间蒸发大半，手上的股票几乎成为一张废纸，而且此时的徐润还身负250多万两白银的债务。他苦苦挨到光绪九年（1883年）十一月，不得不宣布破产，并拿出全部资产抵债。

一个在上海叱咤风云多年的商界巨子就这样倒下了，但危机带来的后果还远没有结束。

胡雪岩也是一位清代的著名商人，他原本是一名普通的徽商，靠着帮左宗棠的湘军办后勤起家，在各省开办了20多家阜康银号，是当时有名的“红顶商人”。可就是这么一个响当当的人物，却在晚年吃了大亏，甚至以一个悲剧的姿态从政治舞台上黯然退场。

光绪八年（1882年），胡雪岩在上海开办蚕丝厂。当年，浙江蚕桑叶遇到虫害，而且气候不好，出现生丝减产。胡雪岩以为国外也是如此，便花了2000万两银子买光了国内的生丝，据估计折合15000担，打算借此机会卖个好价钱。没想到意大利没受到气候影响，生丝丰收。洋人可不想让胡雪岩坐地起价，于是控制海关阻止中国生丝出口，胡雪岩进退两难，最后只能低价处理，亏损整整800万两。损失之巨，强如胡雪岩这般的大商人也难以承受。胡雪岩没有料到的是，这不是一场简单的投资失败，而是他商业生涯的终点。

胡雪岩曾帮左宗棠办后勤起家，从此得其赏识，后来左宗棠组建洋枪队“常胜军”，创立福州船政局，西征阿古柏叛军时，胡雪岩都出力不少。因此他官运亨通，平步青云，成为人人艳羡的红顶商人。

但麻烦也随之而来。左宗棠与李鸿章两人不和，作为左宗棠的得力助手，胡雪岩自然也不招李鸿章待见。此时李鸿章也有自己的钱袋子，那就是积极参与洋务的官办商人盛宣怀。李鸿章要扳倒左宗棠，必先拿掉胡雪岩，而这次上海金融风暴就是一个绝佳的机会。

因开办蚕丝厂而元气大伤的胡雪岩只好从自家的阜康银号调款来应对危机。但在李鸿章势力的刻意渲染下，正常的调款却被说成是挪用存款，于是生怕自己财产有失的民众纷纷到阜康银号取款兑现，一场规模浩大的挤兑风潮就此爆发。盛宣怀的商帮也行动起来，他联络各家与自己有业务关系的商号，共同参与这场对胡雪岩的阻击战。他们一方面散布对阜康银号不利的消息，一方面暂停自家商号与阜康的业务往来。

作为一个名声显赫的商业人物，胡雪岩的能力毋庸置疑。但如今，事态的发展已超出了胡雪岩的掌控范围，前来取款的民众几乎踏破了银号的门槛。另外，在盛宣怀的授意下，各大商号纷纷表示财力不济，不能向阜康银号抽借资金。而且外界各种不利消息充斥大街小巷，有的说阜康银号日不久矣，如今已在大批抽逃资金。有的则是更加言之凿凿，说是各地分店都在转让，有的已经人去楼空。内外交困，再加上恐慌情绪的无止境蔓延，阜康银号举步维艰。

就在这个当口，法国人也跑来凑热闹。中法战争爆发之后，法国军舰跑到吴淞口，声称要进攻江南制造局，整个上海人人自危，

商业进一步陷入严重萧条，物价急剧下跌，各钱铺赶紧收回贷款。这让胡雪岩的处境雪上加霜。光绪十年（1884年）的冬天，可能是胡雪岩人生当中最为难熬的一个寒冬。那一年，阜康银号分号在短短几个月里便纷纷倒闭。再然后，一纸“贪污挪用国家粮饷”的举报信飞至朝廷，给胡雪岩以致命一击。到了光绪十一年（1885年），胡雪岩不得不宣布破产。

阜康银号的倒闭震惊了全国。这可不是一家普通的银号，而是一家规模庞大、辐射全国的巨型银号。全国许多钱庄商号都与阜康有紧密的业务关系，这个庞然大物的倒下必然会砸死一大片钱庄，连京城有名的恒兴、恒和、恒利、恒源这“四恒”钱庄也没能逃脱厄运。

光绪十一年（1885年）9月5日，左宗棠在福州病逝。四个月后，胡雪岩也郁郁而终，此后盛宣怀崛起。

这场风暴并不限于上海，还波及全国乃至与清朝有业务关系的洋商，影响极大。无数普通商人和钱庄掌柜纷纷宣布破产。中国人可能是第一次体会到金融风暴的恐怖，在这场风暴中，传统的钱庄弊端暴露无遗。当时的钱庄仍然习惯靠信用贷款，很多时候并不需要抵押物。可当风暴真的到来，没有压舱物的巨轮很容易失去控制，并引发连环碰撞事故。而钱庄相较于票号本来就势单力薄，资本和规模都不足，更容易在风暴中沉没。从这之后，传统金融机构的处境变得越发恶化了。

走向现代银行的第一步——中国通商银行

在中国，银行这个名词最早出现于太平天国运动时期洪仁玕所著的《资政新篇》之中。另外，留洋归来的容闳也建议太平天国统治者要“创立银行制度及厘定度量衡标准”[(4)]。称其为银行，并不

是生搬硬套国外的词语，而是来源于中国本土化的改造。中国人习惯以“行”称呼各大商业机构，比如著名的广州十三行，或者是各业行当，那么经营银钱业的金融机构自然也就称之为银行。但这个名词真正在中国流行，要等到30多年之后。

光绪二十三年四月二十六日（1897年5月27日），上海外滩一家新成立的企业举办了开业典礼，引起了社会各界的瞩目。这就是著名的中国通商银行，其创办者是炙手可热的督办全国铁路事务大臣盛宣怀。作为中国人自己开办的第一家银行，中国通商银行可以说是中国银行业的开山鼻祖，并享有诸多殊荣。这样一家重要银行成立的背后又有怎样的故事呢？

19世纪60年代，洋务运动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一时间大江南北各个工矿企业都挂起牌子，但资金不足是个大问题。要搞工业、买机器、雇人员，哪个不是烧钱的生意？朝廷给不出太多的支持，洋务派不得不向外资银行或洋行大举借债。

这时候，中国第一个外交使团出使各国后终于归来，第一批留洋学生也在不久之后陆续学成归国。他们带来了许多国外的新闻，其口中的西方诸国之思想自由、风气开放简直闻所未闻，即使是思想前卫的新锐人士也不禁大为感慨。其中一点尤其引起洋务派注意，那就是西方人的银行在经济活动中发挥的各种功能。自1407年第一家银行在威尼斯成立，银行在西方已走过400多个年头，并发展出一套完整的汇兑、存储、抵押等流程，较之传统银行有明显优势。在欧洲历次大战中，各国都习惯以发行国债的手段筹集战争资金，银行对于工业建设的作用更是无法估量。

1870年的普法战争中，参战双方都充分利用了银行的功能。法兰西第二帝国战败，要赔偿50亿法郎，按金本位换算等于7.2亿两白银。法国竟然以银行发行国债的方式迅速还清了如此庞大的款

项，民众认购数量高达20亿法郎。大清帝国的官员们看着法国的动员能力，再看看自己所面临的财政状况，实在是五味杂陈，中国人第一次深切地认识到银行这种新鲜事物的能量。

同治九年（1870年），年仅26岁的盛宣怀成为李鸿章的幕僚。作为一个有理想有抱负的青年，他对国家的前途与命运抱有深深的忧虑，每日苦思救国之策。在李鸿章官署的这段日子，盛宣怀亲眼见证了轮船招商局、开平矿务局、上海机器织布局还有天津电报局等著名洋务企业的创办过程。在这个过程中筹款的难题一日不曾消散，财政窘迫如同一座大山般压在每一个人的心头，盛宣怀也有了建立银行的想法。

在盛宣怀的规划中，铁路和银行都是要紧之事：前者为工业之基石，后者乃筹资之良方。欲行工业建设，则两者不可偏废。但是铁路建设投资大，需求高，收回成本遥遥无期，而且有很大的亏本可能。搞银行就容易一些，最重要的就是资金到位，建成之后其预期收益也很可观。

当然，还有一个很重要的目的就是抢占金融市场。彼时的中国早已被外国资本渗透，在中国通商银行成立前夕，帝国主义国家在华设立的银行已有20多家，著名的有英国汇丰银行、法国东方汇理银行、德国德华银行、日本横滨正金银行和俄国华俄道胜银行等多家。盛宣怀知道，即使不为赚钱，只为守护住最后的经济阵地，不让外资银行肆意掠夺中国资产，也必须开办中国人自己的银行。

可办自己的银行谈何容易？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盛宣怀意外得知俄国人打算在京城开设中俄银行，海关总税务司的赫德也打算募集商股开设中英银行，心中更是急迫。他知道，此时被洋人占先可就大事不妙，于是赶紧上书请求创办中国人自己的银行，并请求张之洞、翁同龢等人进行协助。只是这个过程并不顺利，张之

洞意味深长地告诫盛宣怀："作为督办全国铁路的重要人物，虽然事极荣耀，却也危机四伏。你可知你现在可是众矢之的，多少人都指着这事做文章。你说是为铁路招股而设银行，可在别人看来就不是么那回事了，如果被扣上'专权'的帽子恐会断送大好前程。故设立银行兹事体大，关乎阁下声名，还望知之。"

张之洞也是一片好心，不忍看盛宣怀独自面对风险，所以主张设立银行一事还是由南北洋大臣一同招商开办，这样不管事成与否，都与盛宣怀无关。但盛宣怀想亲自创办自己的银行，于是再次陈述自己的想法，光绪二十二年十一月初二（1896年12月7日），光绪帝正式下谕允许盛宣怀招商集股，设立银行。中国人自己的银行终于有了眉目。

虽然有皇帝的支持，盛宣怀的银行之梦也并不顺利。先是西方国家跳出来阻挠。俄国道胜银行董事长听闻此事，专程赶到北京要求参股，把新银行改作中俄合办，并由盛宣怀出任督办。后来，法、奥两国也希望能将新银行与法奥银行合并，并开出了优厚的条件。

西方银行代表的要求遭到盛宣怀的严词拒绝，他表示中国人的银行就该由中国人自己来办，"通商银行更关紧要，势难与外国银行合并办理！"[(5)]以强硬的态度回绝了洋人。

除此以外，银行的设立也会触及传统银钱业的利益，所以顽固派想方设法地给盛宣怀使绊子。总理衙门对银行章程、账目管理乃至钞票发行流程等细节提出一大堆质疑。

此外，还有拿着盛宣怀个人问题做文章的，指其专权跋扈，颇为诛心。在当时不少人看来，中国通商银行就如同一个奇怪的四不

像，“不官不商，亦官亦商，不中不西，亦中亦西”[(6)]，实在是奇怪。

面对种种诘难，盛宣怀实在难以招架，关键时刻幸得李鸿章出面支持。以李鸿章在朝中的地位，就连总理衙门也拿盛宣怀没办法，只好同意了银行的建立及其章程。

解决了内外的阻挠，就要正式筹集股金。作为一家商办银行，商人对是否要引入官股还是颇有疑虑。大家心里都清楚清政府的底细，谁知道引入官股会不会让朝廷借题发挥，加以干涉。对此，盛宣怀出面向大家承诺，这些官方资金并不会作为股份加入，而是以年息5厘、6年为期分期借还，这样既能保证银行的资金，又能避免政府的过度干涉，大家可以安心经营。

经历了重重艰难险阻，中国通商银行终于成立。盛宣怀也履行了自己的承诺，这家银行的确成为中国人自己的金融机构。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成立以来的3年中，中国通商银行对工矿业的贷款共计214.8万两白银，分别占当年贷款总额的36%、26%和45%，其贷款对象有汉阳铁厂、萍乡煤矿等一大片工矿企业[(7)]，在中国近代民族工业发展史上占据了极为重要的地位。

玩不转的股票

甲午战争结束后，清政府面临巨额赔款，战争赔款加上“赎辽费”共计白银2亿多两，而彼时清政府的全年财政收入只有8900万两。巨大的财政压力沉重地压在每一个人的心头上。这时有人想到，既然西方国家可以以发行公债的方式筹集资金，那中国为何不可？

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初，詹事府右春坊右中允黄思永上了一道奏折，表示虽然政府没钱了，但民众兜里还有余钱，所以何不“合天下之地力人力财力，类别区分，各出其余，以应国家之急；似乎四万万之众，不难借一二万万之款”。即鼓励民众为国家慷慨解囊，似乎只要人人献出一点“爱心”，问题就可迎刃而解。

而这份爱心用何表示呢？黄思永的办法是股票。说是股票，其实更类似公债，至今很多国家都将此作为筹集资金的重要手段。按照光绪帝的想法，可以先发行总额为1亿两白银的股票，分为100两、500两和1000两3种，年息5厘，以田赋和盐税作抵押，分20年还清本利，前10年付息，后10年本息并付。王公贵族和将军督抚以下的所有人，不分官职高低都要购买股票，起个带头作用。他信心十足地认为，用这种办法，于国家、商民均无损失，肯定能收到奇效，估计一年就能收回成本。

不过他忽略了一件事，想要达到国家、民众双赢的结果，一个必要条件就是清政府遵守按时还款的原则，且本息丝毫不差。否则民众损失资金，国家丢掉信用，只会是双输。

为避免双输，黄思永坚决不同意由官府发行股票，他深知下面的官员是个什么样子，股票发下去能被民众顺利认购的，恐怕只有一成之数，所以必须由民间金融机构负责发放，才更稳妥。按照规定，指定一些有资质的票号，允许它们发放股票，并在到期后为商民发放本息。最大的难题是怎么说服大家购买股票。虽然这种股票名字是“昭信”，取“就认股数目以昭信守”之意，但清政府信用堪忧，万一官府翻脸不认人，这些股票恐怕全都会沦为一堆废纸，所以没人敢把宝压在官府的信用上面。即使清政府承诺，昭信股票允许抵押、交易，就算不满意也可以随时脱手，不至遭遇太大损失，还是无法打消商人们的疑虑，以致应者寥寥。

这给了各大票号很大的压力。清政府给各省都下了摊派指标，还有相应的奖励标准：募集债款白银10万两以上的人，由各省报请授奖；花1万两以上购买股票者可授予官位。所以票号只能硬着头皮接下任务，至于如何卖出足够的股票，就要看大家的神通了。官银号背靠大树好乘凉，借着与官府的关系，吸纳了大量股金，刚刚成立的通商银行发挥作用，认购了一大批。但京外的票号就没那么好运，基本只能指望官绅和商会的支持。

上海源丰润的掌门人严信厚虽身家百万，也不得不恳求钱业同人伸出援手，共克时艰；湖南巡抚陈宝箴则亲自召集各绅商开会，动之以情晓之以理，勉强凑够了数额。其他各省也是如此，把富豪绅商专门请来，非要让他们赞助一笔不可。

虽然光绪帝再三强调“商民人等愿借与否，各听其便”，可落实到地方，就完全不是那么回事了。在“业绩”的压力下，各省只能想出种种法子“劝募”。他们找遍了本省有名的绅商和钱庄，以半胁迫的手段要求大家倾囊相助，搞得怨声载道，股票在各地都受到抵制。

商人的不情愿直接体现在市场上。由于昭信股票允许售卖转让，大家都不想让这块烫手山芋留在手上，于是拼命想办法转手，哪怕是半价出售也要让出去，以致这款股票人人避之不及。不过，这倒便宜了不少投机者，他们拿着无人愿领的股票哄骗不知情者，把这潭水搅得更加浑浊。

昭信股票仅发行了半年多，总共发行1000万两。中国第一次发行公债的尝试就这样落幕了。政府的信用破产是发行不利的主要原因，连劝募者自己都不想买的股票，要求民众接受谈何容易？而更多有指标任务的地方官员，为了完成指标，只得强行摊派。在当时

的社会条件下，股票的确不是能够轻易玩转的事物。但不可否认，这次失败也为后来者提供了很多有益经验。

夹缝中的山西票号

作为当时中国金融业的翘楚，虽然山西票号拥有自己发行的银钱票，但清政府并不认可，度支部很明确地要求：“从接到客文起半月内，各省未发行的银钱票，无论官商行号不得继续增发，已经流入市场的要逐步收回。”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的《通用银钱票暂行章程》中更是明确规定：“自章程颁发之日起，新设的官商银钱行号不得发行银钱票。其余经政府批准可发行银钱票的各行号，只得以现行发放数额为准，不得超越。”看得出来，朝廷的严厉管控彻底断了票号拿银钱票做正式货币的念想。

此外，票号还遇到了与银号相同的问题，即官府习惯性的欠债不还。票号和官府关系不睦，于是清朝官员想办自己的国家银行的时候，商人不愿意奉陪了。光绪三十年（1904年），户部计划筹资设立户部银行，资本总额400万两白银，户部自己筹一半，还有一半以招商入股的方式筹集，结果应者寥寥。于是户部只好向江浙丝绸商人求助才筹得资金。

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被清政府寄予厚望的户部银行正式成立，他们满怀信心地表示“以中国之银，供中国之用”，以为清朝必然可以由此摆脱被外国资本掐住脖子的命运。3年后，可能是认为户部银行的名字不能代表整个清帝国，所以换了个招牌，叫大清银行。这也算是官方钦定的中央银行了。

作为中央银行，当然不能自己管理自己。按照《大清银行章程》，度支部会派监理官对大清银行进行监管，户部也有监事员进

行监督。除此以外，地方政府也有权利对地方各支行进行监管。这是中国第一次以法律的形式确定对银行业的监管方针。

户部银行成立之后，票号就不再经营官款汇兑业务，而且各省的官银钱局也纷纷成立，银号钱庄有了强劲的竞争对手。

在数百年时间里，中国的银行业从钱铺到银号，再到后来的票号，总体上都处于一种野蛮生长的状态。它们既不用在官府注册，也不需受到政府监管，更没有针对性的法律法规。缺乏契约约束是它们有别于现代银行的一个重要特征。19世纪后期各种银行纷纷出现，清政府意识到需要对银行业进行监管。

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度支部制定了《银行通行例则》，对银行的性质做出了明确规定，需要有以下业务才能注册银行："一、各种期票汇票之贴现；二、短期拆息；三、经理存款；四、放出款项；五、买卖生金生银；六、兑换银钱；七、代收取公司、银行、商家所发票据；八、发行各种期票；九、发行市面通用银钱票。"这是第一次对银行业务做出了如此详尽的定义，而那些只兑换银钱的钱铺银号则被排除在银行范畴之外。如果不具备银行资质，今后都不能再进行存款汇兑业务。

这等于断了票号、银铺的生路。蔚丰厚票号北京分号经理李宏龄心急如焚，他亲自给山西各总号的负责人写信，表示票号到了生死存亡的关头，再不赶紧改组成银行，恐怕山西票号真的就成历史名词了。他还在信尾写道："或问开银行后即可保票号不废乎？不知正以票号不能久存，故立银行以补救之。纵使票号尽废，有银行尚可延一线生机，否则同归于尽而已。"

其实在早些年，票号在国内金融业还是很有话语权的。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袁世凯就托人询问山西票号是否要加盟天津官

银号。那时山西商人们担心有诈，并未同意。后来筹建户部银行和改组大清银行的时候，户部都希望山西票号能够出资入股，共同组建中国第一家中央银行。但对朝廷并不信任的山西商人一口回绝：“不仅不入股，人亦不准加入。”

当时，山西商人以为自己躲过了一次大麻烦，没想到最麻烦的事情还在后面。而面对巨大的经营困境，山西商人只能想法自救。李宏龄联合多地票商一致请求总号顺应时势，赶快成立银行，但总号并不太想改变现状。李宏龄几次亲面总号的负责人，也未有成效。李宏龄在山西票号退出历史舞台之后还写了回忆录，叫作《山西票号成败记》和《同舟忠告》，痛陈票号失败经验，不过那已是后话了。

大厦将倾

随着清帝国的日渐衰微，山西票号的经营困境也越发严重，而就在帝国最后的日子里，一场新的危机席卷而来。

20世纪初，汽车工业的兴起带来了全世界的投资热潮，其中尤以橡胶工业为重。作为不可或缺的一种汽车原料，橡胶的价格在世界市场一路攀升，在中国，这种神奇的材料被称作橡皮，而上海的金融市场也热衷于炒橡皮公司的股价。

当时，一个叫麦边的英国商人满怀梦想创办了一家叫作兰格志拓植的公司，并在上海贩卖橡胶股票，他相信自己能够在这片神奇的土地上创造辉煌。然而在当时的上海，有太多像他一样的商人，麦边公司的橡胶股票如同大海中的一朵小浪花般毫不起眼。为了宣传自己的股票，麦边苦思冥想，写出了一篇长文，名叫《今后之橡皮世界》。在文中，他详尽地描述了橡皮的作用，并勾勒出一幅美好的图景，将橡皮描绘成一个未来世界不可或缺的重要商品。

可能连麦边自己也没想到，这篇文章一经刊出，就收获巨大反响，不少人看到这则报道，争先恐后地投资橡皮股票。而在大洋的另一端，伦敦的橡胶股市也迎来了爆发。从1909年起，橡胶的股价如坐火箭一般猛涨，1910年股价已达到153便士，是1908年的5倍。而彼时橡胶种植的成本是多少呢？只有18便士。

高昂的利润冲昏了每个人的头脑，不管是投机者还是普通商人，他们将整个市场的温度炒得越来越高。一大堆橡胶公司的股票在市场上突然冒了出来，打着各式各样的旗号进行兜售。兰格志的股价更是在几天内就从100两白银迅速飙升至1000两白银，最后在经历一个月的暴涨后，稳定在1400—1500两白银。这是个令人难以想象的成绩，也是一个罕见的商业奇迹。

见此情形，无论是外资银行还是上海本地的钱庄都纷纷出手。他们不仅给出优惠贷款条件，而且近乎无条件地对外放款，自己资金不够，就找票号要钱或者进行同业拆借。这诱得投资者将资产大把抵押进去，以换取更多资金去购买股票，股价溢出票面价值十几二十倍都是正常，堪称20世纪的第一场全民炒股。“人类从历史中学到的唯一教训，就是人类没有从历史中得到任何教训。”在利益面前，大家好像都忘记了20多年前那场恐怖的上海金融风潮，毫无顾忌地投入全部身家，但是很少有人能够察觉到，致命的危险正步步逼近。

橡胶股市的泡沫越吹越大，破灭的风险也越来越高，一切都只是时间问题而已。1910年中，作为橡胶市场最大消费国的美国意识到泡沫即将来临，宣布对橡胶限制消费。一石激起千层浪，国际市场的橡胶价格在到达顶点之后急转直下，连带着整个上海橡胶的股价也一路下跌，再度引发一系列连锁反应。昔日价格高昂的橡胶股票今日却如同废纸，人们争相抛售，投资者的损失已不能用惨重来

形容，倾家荡产、负债累累者不知凡几。由于追不回贷款，一大堆票号、钱庄也都面临着倒闭的结局。

按理说，这个时候国家应该及时救市，大清银行也该承担起中央银行的职能，总不能坐视金融产业崩溃。可在这个关键时刻，朝廷还指望从票号调款，用以偿还庚子赔款。但市面上实在无银可用，无钱可调。宣统二年（1910年），上海著名的源丰润票号亏损2000多万两白银，宣布倒闭。上海最大的票号义善缘苦苦撑到宣统三年二月底，也宣布倒闭。以这两家龙头票号的倒闭为首，一场可怕的金融海啸再次席卷上海乃至全国，其造成的后果不亚于前文所说的金融风暴。

这场金融海啸给试图转型的传统金融业以致命一击。商人投机、民众盲从、官府失职，共同酿就了一系列惨剧。这其间每个人都是受害者，同时每个人也都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票号的命运与中国传统社会结构息息相关。

小小的平遥在19世纪的中国缔造了一个传奇。崛起的22家票号，在全国77个城镇设立分号400余家，其盛况可谓空前。在20世纪新时代的曙光刚刚到来之时，这个庞大的金融网络很快便走向衰落。

过多依赖对传统经验的复制，使山西票号失去了一次拥抱现代金融的机会。它们并不是没有想过挣扎求生，也不是没有做过转型的努力，但扎根已深的票号终究无法摆脱附生的巨树，等到帝国真的土崩瓦解之时，山西票号自然也是难逃厄运。

---

(1)　《用钱不废银议》，中国人民银行总行金融研究所金融历史研究室编：《近代中国金融业监管理》，人民出版社1990版，第46页。

(2) 《清内务府档案文献汇编》，《国家图书馆藏历史档案文献丛刊》，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

(3) 《清内务府档案文献汇编》，《国家图书馆藏历史档案文献丛刊》，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

(4) 容闳著，沈潜、杨增麟评注：《西学东渐记》，中州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第20页。

(5) 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市分行金融研究室编：《中国第一家银行——中国通商银行的初创时期》，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年版，第89页。

(6) 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市分行金融研究室：《中国第一家银行——中国通商银行的初创时期》，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年版，第85页。

(7) 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市分行金融研究室：《中国第一家银行——中国通商银行的初创时期》，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年版，第45页。

第五章　“洋人的海关”

海关是一国之门户。在鸦片战争前，关税一直不是清朝财政收入的主要部分。因为当时天朝“不借外物以通有无”，土地产出的资源就可满足人民所需，海关的重要性长期被忽视。

直到鸦片战争结束，英国人根据《南京条约》要求清政府开放广州、福州、厦门、宁波、上海五处通商口岸，海关在清政府中的地位才有所改变。之所以选择这五个地方，是因为这里本来就有海关的建制。早在康熙时期，粤海关、闽海关、浙海关和江海关就坐落于此。

外国的商品进入另一国必先缴纳关税，这是西方各国通行的惯例。高关税壁垒可以筑成一道外国商品难以逾越的高墙，直接影响商品输出国的利益。英国人对此印象深刻，在拿破仑战争时期，法国人就是用这一招对付英国的。法国人曾直接对英国商品实施严格的禁运措施，不许任何装载英国商品的货船进入，自认为可以通过这种措施扼制住英帝国的命脉。

这一措施被称作“大陆封锁政策”。法国人利用这一政策，刚开始就打了英国人一个措手不及，英国各种产品纷纷积压，让英国商人损失惨重。不过，彼时的欧洲经济联系密切，法国人不能完全替代英国人，产出足够其他欧洲国家使用的产品。于是走私盛行，各种挂着中立国旗帜的货船仍源源不绝地把英国商品运至欧洲大陆，以致大陆封锁政策不攻自破。

但中国不一样，这里的人们没有形成对英国商品的依赖，也没有那么多需求。英国人要想毫无顾忌地输入商品，就必然要拿到打开大门的钥匙，也就是对海关乃至关税的控制。

被迫打开的海关

按照《南京条约》，进出口关税必须由双方商定，“秉公议定则例，由部颁发晓示，以便英商按例交纳”。但英国并不想跟清政府议定关税，英国人自己拟定了要比鸦片战争前更低的关税税率，并在第二年拟定的《五口通商章程》中得以顺利实施。

见有利可图，美国人和法国人也随即加入。在道光二十四年（1844年）的中美《望厦条约》和中法《黄埔条约》中，明确要求中国想要变更海关税率的话，必须与美法两国商量，否则无效。这完全破坏了中国的关税主权，为西方商品的涌入打开了大门。

西方国家打开中国大门后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摒弃公行制度。之前只有广州一口通商的时候，外国人想要在华做生意要经过十三行。列强明确在《五口通商章程》的“海关税则”中要求废除公行，让他们能够自由地与中国人做生意。

按照这个海关税率，大部分商品从量征税，也有一些从价征税，有的“值百抽十”，有的“值百抽五”。[(1)]但不管哪一种，进出口税率都远远低于以前。而且哪怕是同一种商品，在中国和外国享受的待遇也远远不同。外国商品进口到中国，只需缴纳连之前一半都不到的关税；而中国商品要想出口到外国就变得无比艰难，英、法海关都给中国商品设定了八成以上甚至是几倍以上的税率。[(2)]这样做的结果就是中国一直以来的王牌出口产品，如茶叶、丝绸之类很难出现在外国平民家庭，只有王公贵族才有机会享受。这种区别性的关税税率制定，让中国陷入了只能挨打却不许还手的窘境。

当时的中国可以说是世界上关税税率最低的国家，甚至比不少列强侵占的殖民地还低。在外国人眼里，这是一个几乎完全开放的

自由市场，也是一个近乎不设防的宝地。因为有着比以往更低的税率，引来了一大批希望在遥远的东方寻找财富的冒险者。每天广州外海都围绕着一群群的走私船，它们凭借着灵巧轻便的船型，伺机而动，清朝水师拿它们毫无办法。广州因此成为走私商品的重要集散地，这里云集了来自世界各国的产品，包括美洲的烟草、印度的棉花、欧洲的纺织品等。

走私一直是困扰清政府的老大难问题。走私虽然能让当地百姓以便宜的价格买到之前闻所未闻的洋货，可对当时的两广总督祁贡来说却十分被动。他不仅要治理两广地区，还肩负着清政府委派的外交使命。如今，不仅海关不能自主，还让洋人的走私船开到附近海面上，实在有辱国体。所以，祁贡向英国全权大使璞鼎查提出抗议，要求英方对英国走私贩子严加管控，不要任由其进入中国。

璞鼎查对此十分恼火。这些走私犯的行为让英帝国很没面子，也会影响他们和清政府上层的正常交往，危及了英帝国的整体利益。所以，璞鼎查在《虎门条约》中专门加了一条："倘访闻有偷漏走私之案，该（英）管事官即时通报中华地方官，以便本地方官捉拿；其偷漏之货，无论价值、品类全数查抄入官，并将偷漏之商船，或不许贸易，或俟其账目清后，即严行驱出，均不稍为袒护。"[(3)]清政府与美法两国也有类似的协议。

那么，这项规定真正实施的成效如何呢？答案并不如人意。自从《南京条约》签订后，在中国最活跃的是英国商人，参与走私最多的也是英国商人。对这些走私者，有能力也有可能对他们进行管辖的只有英国领事。但显而易见，英国领事并没有履行自己的职责，无论是领事还是英国商人，他们都觉得对英国人的裁决应当掌握在自己人手中。如果连英国上层都默许了这种行为，那还有谁可以对这些走私犯做出公正的审判呢？[(4)]

稽查走私行为、处置走私商人本来就是一个主权国家应有的权力。即使在鸦片战争之后，各种条约也都规定中国拥有对走私犯的管辖和审判权，《通商章程善后条约》“海关税则”中就明确写着：“通商各口收税如何严防偷漏，自应由中国办理。”但英国人对此视而不见，走私行为在官方的庇护下愈演愈烈。

如怡和洋行等英国商行都或多或少地与走私行为有所牵连。也正因如此，他们对遏制走私的行为尤为抗拒，想出百般理由加以推托。非要坚持只有英国领事在场时，进行“公正公开”的审判后才能对这些走私者作出处罚。至于清政府，根本无权对其做出任何处置，哪怕只是没收货物或者罚款。他们甚至把此事告到英国外交部，要求英国政府以外交手段施压，逼迫清政府允许他们走私。

走私屡禁不止，美国、法国也因此获利。为了保证自己的在华利益，英国人意图全盘控制中国海关。

洋人控制的海关

鸦片战争后的一段时间里，海关虽然被洋人插手，而名义上还归属于清朝，外国商品想要进入中国不能绕过海关。但西方商人并不满足于他们已有的权益，总是试图获得更多的权益。上海局势的动荡恰好为他们提供了一次绝佳机会。

太平天国运动之后，各地的起义运动纷纷涌现。不少打着“反清复明”旗号的地下帮会与社团也借着这个机会公开反清，一时间着实让兵力分散的清政府头疼不已。咸丰三年（1853年）九月，一个令人震惊的消息传来，作为贸易重镇的上海竟被小刀会攻占，这令整个上海人心惶惶，市场一片萧条。苏松太道吴健彰当时主管江海关，他之前查处青浦教案有功，与洋人的关系也不错。可在此紧要关头，他竟放弃江海关，跑到外国租界躲了起来。

江海关暂时失去作用，但外国的商船可不会停。上海的经济萧条无疑会损害洋商的利益，这是他们不愿意看到的，于是西方国家决定联起手来保卫自己的权益。不过，他们的第一步不是帮助清政府镇压，而是盯上了江海关。小刀会前脚刚占领上海，英国驻上海领事阿礼国后脚就拿出了一份《海关行政停顿期间船舶结关暂行章程》。大意就是为了维持海关正常运转，英国领事馆有权向到沪商船代为征收关税。美国人也拿出了与此相似的关税处理意见。当然，这些“代为征收”的款项并没有落到清政府的腰包里。

在尝到征收海关税所带来的甜头后，英美便不愿意归还关税权，以种种理由拖延移交关税。为了关税和海关的控制权，吴健彰几次上门讨要都无功而返。英国人给出的理由是战乱未平，清军无力保护，只能由英国暂为接管。而且他们嘲笑吴健彰在上海遇到危险时逃跑，现在上海全为“叛匪”所占，能维持海关正常运转就不错了，清政府居然还想要回被他们自己抛弃的权力。

吴健彰很生气，他又和两广总督联系，要来了几艘帆船，停在上海附近海面上充当移动海关。结果英、美、法等国领事一致无视了这个移动海关的存在，认为这种几艘船组成的所谓海关根本不具有合法性，更没有征税的权力。

不过，这种情况也不能一直持续下去，毕竟只是个“暂行章程”，不具备长久的法律效力。在清政府的再三反对下，英、美、法等国领事也不得不考虑新的办法。他们决定扶持一个服从于列强的海关，而且这个海关对所有到华的外国商品一视同仁。

咸丰四年（1854年）二月，新海关在上海虹口落成，英、美、法领事都发出公告予以承认。清政府满以为这是收回海关主权的第一步，却不承想这竟是列强攫取中国海关控制权的开始。新海关既是在列强的支持下设立的，就必然要受制于对方。就在这年六月，

英、法、美等国领事决定联合起来接手中国海关。对此，阿礼国宣称：完全不能指望中国人公平有效地征收关税，唯一能够拯救海关的办法就是让西方人参与海关的管理。然后，在未经清政府批准的情况下，英国领事阿礼国、美国领事马辉、法国领事伊担私自与吴健彰达成协议，大家各出一人组成上海税务司，还专门设立了一个“关税管理委员会”。这个委员会在海关内部设有办事处，不仅能检查船舶和开具各种相关单据，还有权对中国的海关记录进行核查。这个委员会实际上就是领事馆管理江海关的工具。

洋人这种越俎代庖的行为让清政府很生气，在上海税务司成立不久后，吴健彰被革职，以警示天下。为了表示对清政府配合态度的感谢，英、美、法三国借出了护卫领事馆的武力，花了半年多的时间终于将上海城内残余的小刀会势力“清剿”干净。

关税管理委员会也不是一无是处。存在期间，“夷税”的增加尤其引人注目。从这个歧视味十足的名字就能听出来，这是一种专向洋人征收的税种，也是海关的一项重要税源。在鸦片战争之后五口通商，夷税成了一种新增税收，区别于传统征收的常税。它的地位却很尴尬，既没有前例可以借鉴，又没有新规可以实行，清政府也搞不明白应该把它放在何种位置。

夷税和常税混在一起，实在不便于管理和征收。道光二十四年（1844年）苏松太道宫慕久在上海黄浦洋泾浜以北设了查验所，专门征收外国商船货税，后来也被称为新关，以区别于原先的旧关。除了上海的江海关之外，闽海关在厦门、南台，浙海关在宁波，都设起了自己的新关，粤海关虽然没有另设，却也把夷税、常税分开征收。

虽然夷税的数量开始并不算很庞大，但在洋人眼里，这块税收有着丰厚的挖掘潜力。随着中国国门大开，外国商品大量流入中

国，其中的收益十分诱人。总税务司走马上任后，夷税收入的增长突飞猛进。根据江海关的统计，咸丰四年至五年（1854—1855年），夷税收入达176万两白银，较之前几年增加了近两倍。

改革除弊

接替海关首任总税务司英国人李泰国职位的，是他的副手、28岁的罗伯特·赫德。赫德是一个很有能力的人，根据多年来在海关总税务司的工作经验，总结出海关工作的种种弊病，并拿出了一套切实可行的提案，受到了恭亲王等人的青睐。

作为中国第二任总税务司，在1863—1908年的46年间，赫德一直执掌中国海关。能够在这么重要的职位上安坐半个世纪，赫德自有其过人之处。与性格强势的李泰国不同，赫德颇通人情，尤其懂得中国官场上的种种繁复规矩。他尽力结交朝中实力派人物，并在各种政治势力中左右逢源，这都为他履行总税务司的职务提供了巨大便利。

总税务司虽然由英国人担任，但明面上还是清帝国的政府机构。因此如果皇帝对其不满意，被撤换的可能性仍然很大。而且，这个位置虽然耀眼，麻烦也不少：如何与中国的各级官僚打交道？如何平衡海关内部各派系的矛盾？以及怎样切实地增加海关收入又不影响英帝国的利益？这些都是总税务司需要解决的问题。

赫德很清楚自己的处境。作为清政府的正式官员，他不能完全抛开清朝的利益。当办理洋务的郭嵩焘问赫德：“君自问帮中国，抑帮英国？”赫德只是隐晦地表达了自己的立场：“我于此都不敢偏袒。譬如骑马，偏东偏西便坐不住，我只是两边调停。”

赫德上任之后，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革除海关弊病。之前的清朝海关人浮于事，腐败丛生，内部管理一塌糊涂。而赫德一上任就引入英国的海关管理制度与人事制度，严格约束内部职员的行为。他很细致地对所有职员的工作作出规定，严禁滥用权力、参与贸易、收受贿赂，而且要分工明确、权责一致、流程清晰，让海关的运行效率大为提升。

之前海关经费用的是包税制，上级部门定好额度，下面按此数目交齐即可，若有超额，就进了工作人员的腰包。这个数字具体究竟有多少，恐怕永远都不会有人知道。而赫德却不一样，所有收入全部按规定记录下来并如数上缴。海关人员的俸禄和运行经费按照需要的额度向上申领，增减均有节制。

而且，考虑到之前的海关账目就像个筛子一样，大部分资金都不知所终，赫德大大加强了对账目的管理和审计。他专门设了一个稽查账目的官职，每年往返于各地海关查账，并且赋予其极大的权力。所到之处，海关税务司必须亲自迎接，把各种账本和票据全部搬出来交其过目。稽查官员都有一双敏锐的眼睛，哪怕一个数据对不上，也要彻查到底，整个海关也会因此受到牵连。

当时的清朝恐怕还没有一个衙门能做到如此严格的审计和检查。在巨大的审计压力下，海关职员为了自己的乌纱帽，徇私舞弊的行为较以前大为减少，逼得海关一跃成为中国最为清廉的部门。而且在赫德的一番操作下，海关收入几乎年年都有盈余，职员待遇也水涨船高。

有了收入，这些资金存在哪里也是个问题。赫德不信任旧式金融机构，他将海关银两存放在英国人开办的丽如银行里，后来又改存到汇丰银行。

赫德不仅想打造出一个国际性的海关，他还希望扩大海关的职权。华商购买新式轮船做生意，赫德表示中国人搞不定这项新事务，便将其置于海关管理之下。然后赫德又称，按照欧洲的规矩，轮船均需经过检疫方可入港，这项任务自然也交予海关。既然要对轮船检疫，那么顺便查个货物，看看是否有走私情况也很正常。最后，为了保障这些轮船通行顺畅，摸清附近海域水文状况、探明潮汐海流情况等海务工作也被海关承揽下来。所以到最后，轮船从出港到入港的全部事宜都成了海关的分内事。

当然对于往来的商船来说，这个改变未必是一件坏事。之前他们要想平安地回到港内，可以说是麻烦重重。先是海港缺乏必要的指示物，最多只有几个土堆或者瞭望台，一不留神就找错了方向；然后是复杂的水流和潮汐环境，深藏于暗流之下的礁石足以让任何一个经验丰富的渔民身处险境，即使在近岸航行，这个风险也不会减少太多。这就导致当时出海的渔民商人只能指望两件东西，一是经验，二是运气，而且后者所占的比重往往更大。

而赫德承包海务之后，带来了新变化，使得岸上有灯塔，海中有浮标，港口有修缮，设施有更新，山上有气象站，手中有海文图。出海的船只再也不用担心迷失在茫茫大海之上，回港的船只也不必担心卷入暗流之下，沉睡于幽深的海底。

赫德的工作成果，清政府和英国都比较满意，所以他能在这个位置上待了很多年。

主权沦丧的代价

厘金这种让中国商人唯恐避之不及的税种，其实也是洋商厌恶的对象。虽然创建厘金的初衷是为了筹集对抗太平天国的军费，但它很快就脱离了原有范畴，成为一项让各路商人叫苦不迭的恶税。

一路上林立的厘卡抽光了商人的资金，也抽光了百姓的元气，即使是远渡重洋而来的洋货亦不例外。本来进口货过道海关就可以，现在还要被各路厘卡抽税，必然会大大增加销售成本，对外国商人来说当然是笔划不来的买卖。

所以，他们向清政府提出强烈抗议，要求除了海关课税，不在内地征收各种税。清政府正是财政紧张之时，拒绝了这个要求。但英国人并未放弃这个想法，第二次鸦片战争就是个绝好机会。他们迫使清政府签订《天津条约》，按照条约规定，洋货进口只需要在原本“值百抽五”的税率上另加2.5%，就可以免征内地所有税款；如果洋商要将中国的货物拿去出口，也可以享受这种福利。

当然，这些规定和华商并没太大关系，海关只把这种过关凭证发给外国人。不过也有别的办法获得这项权利，就是从一些贪婪的洋商那里高价购买凭证，并借着他们的身份蒙混过关。

中国的商品想走出国门是那么困难，无论是清朝官吏的勒索，还是海关的刁难，都让本土的商业发展举步维艰。有人觉得，既然外国去不了，那本国的港口总能来去自如吧？事实还真没那么简单，海路并不比陆路好走多少，尽管海上没有厘卡，但有着层出不穷的海盗和变幻莫测的海况，到港之后也免不了一顿敲诈。所以，不少商人都宁愿花钱借洋商的船运输货物，这些船跑得快装得多，很多还配备士兵和武器，安全性更有保障，因此成为沿海贸易的首选船只。

按照“一体均沾”的原则，美、法等国也迅速获得了这项权利。一时间，整个中国海岸附近就出现了一副奇特景象，到处都是悬挂外国国旗的洋船在活动，反倒是中国自己的商船没那么多。这一奇景闻所未闻，但又让人无可奈何，因为这就是主权沦丧的代价。

列强利益的调停人

19世纪，美国迎来了大发展时代，工业产值迅速增长，当然野心也伴随着实力一同增长。新兴的美国资本家急于将手中的商品换成资本，再投入到工业生产中去，地处远东的中国自然就成为他们眼中的绝好目标。只是欧洲人的殖民时代已接近尾声，世界上有价值的市场基本都被老牌帝国主义国家瓜分完毕，美国人想搭上这趟末班车，就不得不从这些饿狼口中夺食。

与此同时，不得不说李泰国为了让英国独占中国市场，所作所为实在有些过激，他不光把税务管理委员会中的美、法代表踢出，还把正副税务司全都安排为英国人，这种行为简直就是不给其他国家留后路。美国人对此选择了“硬刚”，就算冒着激怒英国这个老牌霸主的风险，也要插手海关事务，双方围绕着人手问题互不相让。所以李泰国离任之后，美国公使可以说是欣喜无比，就差没挂个条幅庆祝了。

继任的赫德虽然只是个20多岁的年轻人，但他一上任就大刀阔斧地对海关人事进行了改革。赫德希望打造一个“国际性”的海关。他深知，如果不同国家的人继续在海关内部倾轧下去，那正常工作几乎无法开展，这种时候就应放弃一些利益，从而维持各国的利益平衡。

于是，赫德希望在保证人员质量的情况下，采取公开的方式，不分国籍雇佣职员，就算有通天的背景也要经过考试才能录用。这样至少能维持表面上的公平，让各国代表无话可说。

赫德的做法很快便收到实效，虽然海关中的洋人雇员还是以英国人为主，但各国工作的重心都从争夺海关控制权转到如何培育更加优秀的年轻人挤入海关了，因此大大减少了纷争。

说到底，赫德之所以要对各国利益进行平衡，还是因为他们洋人的身份，放到中国人头上可就没有那么好的待遇了。赫德与李泰国一样，也把中国人视为“偷奸要滑的骗子和小偷”，认为指望这些人管理海关根本不靠谱。所以在总税务司署上下官员中，一个中国人的影子都看不到，他们只能做打杂之类的工作，根本没有往上升的可能。

这是一个讽刺的事实，中国的海关充斥着来自各个国家的外国人，他们能充当官吏，唯独中国人自己不行；他们能参与各种管理，唯独将中国人排除在外。

对清政府来说，海关收入的增加让他们又恨又爱。恨的自然是国家主权遭到洋人践踏，一国之门面遭洋人把持，几乎是国将不国；爱的是海关贡献的巨额税收，对于清朝这间四面漏风的房子，这笔不菲的收入是他们维持统治的重要法宝。而这些税收中的大部分都用来支持军事工业的建设，购置武器装备，或者是参与洋务运动的其他新式企业。

清政府渴望自强的心情十分迫切，他们寄希望于有朝一日拥有更强的国力和武力，将洋人手上的海关夺回来。而外国人也乐得如此，他们并不十分反对落后国家的近代化，甚至还会提供支持，因为工业建设所需要的资金、技术、机器乃至人员，在初创之时必然要请求已实现工业化的国家帮助，这正是英国等西方国家所希望的。相较于一个一穷二白、贫弱不堪的清政府，列强更希望将中国打造成一个既能够维持国内稳定，又有财力富余的地区性国家，这样才可以实现利益最大化。当然，列强不允许也不期望下一个太平天国运动的出现，因为这会损害他们的利益。

海关总税务司很期望中国能按他们预想的道路一步步前进，一个农业国与工业国对海关的依赖是截然不同的，两者能够产出的价

值也有天壤之别，但如何引导中国走上英国希望的道路却是一个问题。虽然清帝国看起来“庞大而臃肿”，统治者也很软弱，但也不是木偶，任由外国人摆布，如果强行要求反倒适得其反。

对此，赫德提出一个看似很美好的设想，那就是“培养需求”。他认为，对待中国还是应该宽严相济，把不平等条约当成鞭子，鞭策清政府，迫使其不得不开眼看世界，使其萌发出自强自立的意识；然后英国再扮演救世主的角色，给中国提供所需的设备、资金和知识。这样中国不仅能达到英国设立的目标，还会被牢牢地绑在英国的战车上，成为其在亚洲的跟班。

这一想法的突出结果就是《局外旁观论》。同治四年（1865年），赫德满怀希望地拿出了一份自己的改革计划，洋洋洒洒四千余言，他以“局外人”的身份提出了自己对中国政局的看法及改革措施。这篇《局外旁观论》名为谏书，看起来倒像檄文，文章分作“内情”与“外情”两部分。“内情”开篇就历数了清政府内部的腐败与无能，还有官僚阶层的贪婪与狡猾，称他们平日里尽说些无用的大话，遇到问题就掩饰推诿（“事不以实，而徒饰虚文”）。还有列强竞相欺压的“外情”，赫德觉得，清政府之所以饱受列强欺辱，就是因为不遵协议，不守规矩，摆着一副天朝上国的架子，对各国盛气凌人，毫无外交礼仪，这样的国家不受欺辱反倒是件怪事。正是这些问题让整个大清国深陷内忧外患之中，所以必须想方设法改变。

至于如何改变，赫德的想法与洋务派不谋而合，那就是积极学习西方先进科学技术，多多派遣使臣和留学生加强交流，放下隔阂与偏见，对外国人平等相待。这些建议不能说没有道理，大清帝国不能总是故步自封，终有一日要清醒地去看待外面的世界。这段时间英国参赞威妥玛也在公使阿礼国的授意下，上了一道《新议略

论》，内容和《局外旁观论》大同小异，足以说明这些想法是英国政府的共同意见。

这两个重量级人物给出的提议引起清朝统治者的极大重视，但恭亲王奕䜣对这个提议却颇感忧虑。他并不是一个顽固守旧的保守派，这篇谏书虽然话说得难听，但并非没有道理。奕无非是考虑到赫德的外国人背景，不相信一个英国人会真心实意地为中国服务。朝中诸臣都相信，他们一定有着某种不可告人的意图，这种怀疑即使是“颇通人情”的总税务司也不例外。有的人直接大骂赫德的说法是“悖慢之辞，殊堪发指！”有些头脑稍微清醒的督抚即使认同《局外旁观论》所提出的观点，但也对赫德太过直白的说法不能接受。

即使《局外旁观论》未获肯定，洋务派也还是按照这条路径去实现中国的富强与振兴。毕竟对于一个农业国家来说，想要成为工业国家，很大程度上是要按照这个方法去做的。

赫德给中国规划了一条看似很美好的路线，但道路的尽头却暗藏着无数的杀机。只是中国的近代化注定是个艰难的旅程，清政府的确进行了很努力地尝试，但在甲午战争遭遇耻辱性的失败之后，洋务运动的成果化作泡影，然后是八国联军打上门来，又赔出去一大笔款项。此后，海关就彻底变成列强的提款机，主要用来支付各国的赔款。

总税务司赫德的野心

颇有讽刺意味的是，负责管理海关事务的清朝衙门居然是外交部门，而不是一般人想象中的财政部门。毕竟清朝之前并未设立过专门的外交部负责与洋人打交道，外国人有什么事情只能去找两广总督（后又改为两江总督），一个地方总督就这样同时担任了外交

大臣的角色。直到第二次鸦片战争，洋人差点打到京城，清政府才不得不签订《天津条约》，承认对各位外国人在外交上的平等相待。

这也促使一个新的外交部门就此诞生，那就是“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从这个名字就能看出，虽然是外交部门，但它有权力主管外国人大小事务。而此时的海关关税不能自主，主管海关的官员也成了洋人，虽然明面上还隶属大清国，但它早已是“洋人的海关”，于是也归属总理衙门管辖。

在当时的条件下，海关不仅是收税，它还具有一些外交功能。赫德自己就紧密地参与到清政府的外交活动中。作为一条能与西方直接搭上关系的纽带，赫德在清朝政治中的角色相当重要，很多情况下，恭亲王甚至不得不通过赫德的渠道来寻找中英两国的利益平衡点。

同治六年（1867年），为了方便中国和英国方面的联系，总税务司署甚至在英国伦敦开设了一个代办处。清政府有什么对外决议就托赫德传达给英国人，清政府想要进口什么特定的物资也会走这个代办处。虽然这有悖常规，但这里就像一个暗门一样，总理衙门与英国外交大臣心照不宣地在这里交换彼此的意见。

自咸丰年间的闹剧“阿思本舰队”事件之后，不仅李泰国在中国声名狼藉，连带着整个清政府对从外国购船一事都心怀疑惧，这给了新任总税务司赫德以更大的挑战。赫德很清楚地知道，清政府被英国人狠狠宰了一刀之后，让他们重燃对英国人的信心恐怕相当困难。除非有一个契机的出现，逼得清政府不得不考虑从外国购船加强军备才行。

这个契机出现得并不算太晚。同治十三年（1874年），明治维新后的日本野心大为膨胀，盯上了中国的台湾岛。五月，日本打着“保护侨民”的旗号，派军4000余人登陆台湾。这让清朝上下大为震惊，一个东方岛国也敢侵略中国。可无奈的是，朝廷这时还真找不到那么多船驰援台湾，只能先派沈葆桢为钦差大臣，紧急前往台湾处理海防问题。

海防的缺失给清政府上了重要一课，眼下这船是不得不买。总税务司赫德不失时机地上奏表示，可以帮忙购买数艘兵舰，以解燃眉之急。总理衙门肯定了这一提议，让李鸿章和赫德去处理此事。赫德吸取了李泰国的经验教训，没在中间捅出什么娄子，第一批4艘船在光绪二年（1876年）十月抵达中国，分别名为“龙骧”“虎威”“飞霆”“策电”。清政府花了45万两银子，基本全是从各关口筹集来的。第二批也是4艘船，于3年后抵华，清政府对它们寄予厚望，分别名为“镇东”“镇西”“镇南”“镇北”。这次花了71万两银子，是各省筹集来的。另外，还购买了一大批小船，灵活机动，专门用来防守海岸。

这次舰艇军购进行得很顺利，赫德与清政府都达到了自己的目的。日后鼎鼎大名的北洋水师也在此基础上发展壮大起来。

当然，赫德不会在远东培养出一支能够与英帝国相抗衡的强大舰队，他真正的目标是这支初露峥嵘的北洋水师。在舰船到位后，赫德曾向军机处提出这样一个建议，希望专门搞一个海防总署，由他本人出任总海防司。理由是中国无论是官员能力还是水兵素质，都不足以维持这样一支庞大舰队的正常运转，一旦打起仗来，恐怕立马就会表现出与清军其他部队同样的水平，所以必须要靠自己从英国请来专人“协助”管理才行。

实际上，赫德的想法与李泰国并无太多不同之处，同样都是盯着中国海军的控制权，区别就是赫德有更多的耐心。清政府被李泰国坑过一次，当然不会再上第二次当，于是直接拒绝了这一请求。作为回应，他对购船的热情也冷却下来，以后清政府再想通过海关买船就没那么容易了。

赫德真正的立场从轰动全国的“滇案”就能看出。光绪元年（1875年），年仅4岁的光绪帝刚刚即位，帝国就遇到一场严重的外交事件，甚至差点引发战争。当时英国人想要修筑一条由缅甸仰光到云南思茅的铁路，修建过程中，英国驻华使馆的职员马嘉理与当地少数民族发生冲突，意外身亡。英国便拿此事大做文章，要让中国付出代价。英国驻华公使威妥玛还提出了一堆无理要求，甚至想把云南总督抓到北京去受审，甚至以开战相威胁。

这是赤裸裸的讹诈，但无奈敌强我弱，怎么把这事处理妥当就成了总理衙门最为头疼的问题。赫德倒是很清楚威妥玛心里的算盘，仗是打不起来的，清政府刚刚打算从英国进口一批军舰，这时候要是打起来，买卖可就黄了。这无非是一种很常见的外交讹诈，故意抬高要价给清政府施加心理压力。

而清政府可不这么想。之前被英法联军打到家门口，咸丰帝带着一众皇亲国戚被迫逃到热河避暑山庄避难的经历犹在眼前，他们无论如何也不希望同样的事情再度发生，所以求和成为最后的选择。赫德对慈禧等人的心理同样清楚，他与威妥玛一唱一和，故作安慰道：“比对目下强弱情形，处事和气大方，所有不免相让之处，不妨善让，莫要推辞。”[(5)]言辞恳切，看起来一副真心为中国担忧的样子。而且他极力渲染战争发生的可能，似乎不答应英国人的要求，下一秒就会重演第二次鸦片战争的惨剧。

总理衙门最后同意了英国人的要求，以一纸屈辱性的《烟台条约》为这场“滇案”暂时画上了一个句号。这一事件让慈禧太后和总理衙门充分感受到这位洋人总税务司真正的立场，但中国政府与他的纠葛还将继续下去。

赫德不仅仅是帮总理衙门办理外交事务，还有一项职责就是盯着其他国家。赫德看透了清政府的软弱，不怕慈禧等人突然收回总税权，就怕其他列强跑来瓜分利益。毕竟总税务司的利益还是与英国紧紧捆绑在一起的，英国人把海关视作“自留地”，不容任何人染指。

德国、俄国乃至后来居上的日本都是如此，他们迫不及待地想要复制英国人在中国的成功经验。山东、东北以及台湾都成了他们眼中的美味，这遭到英国人的强烈反对。赫德不止一次向总理衙门表示，不能总是放纵这些洋人干些出格的事，必要时应予以约束。

日本打赢甲午战争之后，赫德扼腕不已，他倒不是为躺在冰冷海底的北洋水师的船只痛惜，而是遗憾于在朝鲜的部署功亏一篑。本来赫德还想在朝鲜复制中国的成功经验，搞出一个“中朝联合海关”，由自己这个大清总税务司主导，但即使英国人在战时联系多方势力组织调停，也还是无法挽回战争失败的结果。

“卖”出去的海关税

为什么列强索要赔款，总是习惯用海关收入做抵押？因为在近代中国，在一些传统收入渐渐萎缩的同时，也有不少新兴收入逐渐发展壮大，海关是其中不可忽视的一块。这项稳步增长、规模不断扩大的收入，在西方人眼中毫无疑问是一只绩优股。况且由于海关背后强大势力的保护，几乎不受外部风波的影响，稳定性也有保障，当然也就成为偿还外债的首选。

按照记载，甲午战争前清政府借了4592万两银子，其中由关税做抵押的就有3236万两，占了总数的七成。[(6)]就连为准备甲午战争而借的外债，也有一大半来自海关抵押，这些都足以证明海关在还债这件事上的重要性。

借出这么多款项，以英国汇丰银行为首的英国银行可谓大喜过望，它们发现光是躺着吃利息就能过得相当滋润。可俄、德、法等国就不乐意了，它们岂 能眼睁睁地看着英国垄断这项特权？而且条约上也没有写清政府只能和哪个国家借款，在这场争夺借款权力的斗争中，它们与英国站到了同一条起跑线上。

双方的斗争一开始就进入了白热化。俄、法两国首先联起手来，借着干涉还辽的功绩对清政府施压，赫德也急急忙忙地通知英国政府与汇丰银行赶紧筹集款项，不要让俄、法占到便宜。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七月，俄、法赶在英国之前与清政府签订了《俄法洋款合同》（也称《四厘借款合同》），成功借出4亿法郎，约合1亿两白银，年息4厘，36年还清，仍然以海关税作担保。

英国人觉得单打独斗确实不是俄、法两国的对手，所以干脆拉上德国，承诺事成之后一同分赃。法国公使得意地表示，这次不仅要拿下赔款，还要夺去总税务司的位置以及两广和云南的权益。这是英国所不能容忍的，双方势力在总理衙门吵得天昏地暗，如果不是顾及外交礼仪，恐怕就要当场大打出手。最后，清政府觉得法国人的要价过高，还是把这笔赔款交给英、德两国。于是签订《英德洋款合同》，总额达1600万英镑，折9700多万两白银，年息5厘，由英国汇丰银行和德国德华银行一同承包，九四折交付。虽然还是以海关收入为担保，36年还清，但不同的是加上了海关总税务司必须由英国人担任的条件。

事已至此，俄国人也不甘示弱，甚至不惜以断交相威胁，说出了“若中国不借俄而借英，伊国必问罪”的强硬之辞。借款事件直接上升到政治外交层面，大有一股一言不合就开打的气势，而且都不同意折中方案。总理衙门为了安抚双方，希望双方各借一半，但遭到严词拒绝。最后在总税务司的多方斡旋下，英国人拿到了借款权，这份《英德续借款合同》仍然借款1600万英镑，由汇丰、德华两行分摊借给，八三折交付，年息4.5厘，分45年还清，而且还不允许提前或一次还清。这是要生生要抽干清政府的血。这次借款掏空了海关的家底，清政府只好拿苏州、淞沪、九江、浙东的货厘与宜昌 、鄂岸、皖岸的盐厘作担保才勉强凑够抵押。这些地方是中国最富庶的口岸，所产生的厘金收益十分丰富，如今却成了外国银行的战利品。英国人还在条约里重申了英国对海关的控制权，巩固自己在海关的地位。

光绪二十五年（1898年），在美西战争结束后，美国突然发现欧洲列强已经将各自在华势力范围划分完毕。为了自己也能分一杯羹，“门户开放”政策就应运而生了。光绪二十六年（1899年），美国和其他列强商议，希望在承认列强在华势力范围和已有特权的前提下，能够“利益均沾”，即各国货物都按现行的5%的税率进行征收，就算在列强自己的地盘上也不能搞区别对待。

现在的美国可不是往日那个贫弱的北美十三州，发达的工业赋予它强健的肌肉，也增强了它说话的分量。此议一出，各国也不得不认真地考虑这种说法的合理性，似乎这个提议也有利于各国的贸易。

大多数国家都部分或全部地肯定了“门户开放”的想法，共同从中国这条“巨龙”的身上攫取养分。同时，海关也获得了更大的收入来源，唯一利益受损的就是清政府。

此时困扰清政府的还有一个问题——《马关条约》约定的赔款，数额巨大，很难还清。这时总税务司提出一个想法：如果能代为经理邮政事务，一定能大大缓解财政压力。赫德信心十足地认为，如果能把自己管理海关的经验引入到邮政事业中，一定能为清政府财政贡献一个新的巨大增长来源。

甲午战争刚刚结束，赫德就赶紧派人跑到南京面见时任南洋大臣张之洞，成功征得其支持后，接着一纸奏文飞向总理衙门，获得“依议”的朱批。前后不过半年时间，总税务司就拿到了总理全国邮政的特权。总税务司兼总邮政司，各关税务司兼邮政司，邮政事业就这样在海关的主持下迅速在全国开展起来。

就结果而言，效果并不算理想。因为未能处理好地方邮政与全国邮政的关系，赫德的部署遭到很大挫折。但赫德也不是全无建树，英国人把利益网络更深地植入到乡村社会中，从农民身上汲取了更多养分。

当时，列强争先恐后地在中国划分地盘，英国人已经不满足于在沿海地区开展海关业务。他们发现，中国的大江大河贯通内陆，蕴藏着巨大的财富。英国人又打起内河航运的主意，他们要将触角伸至其他各国难以触及之地，便提出应当将中外轮船同等对待，专门从事内河航运。至于管理问题，自然也是由总税务司代劳。清政府对总税务司提出的意见已经有了某种惯性，又或许是不想照顾地方的利益，所以也就默认了。

张之洞上书朝廷，说这样会减少清政府的财政收入。他的说法稍微让朝廷转变了一些心意，让中外商船同等缴税，地方派员对税务司加以“协助”。但总税务司打入中国内河的意图已经实现，长江这条中国航运的大动脉在帝国主义国家的入侵中也变得越发浑浊了。

接着，著名的八国联军侵华战争发生了……

赫德时代的结束

赫德卸任后，将自己的看法汇聚在一本名为《这些从秦国来：中国问题论集》的书上。这本书以义和团运动为起点，结合赫德在中国生活的经验，总结出他对清政府的认识，以及对列强处理对华关系的看法。

这个世界上恐怕没有人比赫德更适合写这本书了。他独特的生活经历与背景赋予其别样的视角，即使以今天的视角看待这本书，也能发觉不少观点都有其合理之处。在书中，赫德一方面提出了很多有趣的观点，比如他没有像很多西方人描绘的那样，把中国比作一个愚昧落后、封建保守的国家，而是肯定了中国传统伦理道德在维持社会秩序中发挥的作用；另一方面，书中也没有按西方人眼中的形象将义和团称作一群可憎的暴民，反倒在一定程度上揭露西方各国在中国所做的恶行。这是一本持中立立场的书，完全颠覆了西方人脑海中的固有印象。书的最后，赫德甚至还提出了一些惊人的预言："2000年的中国将会大异于1900年的中国。"的确，在这场惊人的巨乱之后，一些新的东西正悄然生根发芽。

西方人对中国有着矛盾的情感，一方面鄙夷清政府的无能与中国的贫弱，另一方面又担心四亿中国人在民族主义的武装下，对西方世界展开血腥的报复。义和团运动恰恰验证了他们的恐惧，"黄祸论"也因此而蔓延开来。似乎在不久的将来，这些中国人又会像阿提拉与拔都一般，跨越整个欧亚大陆，再度摧毁他们的"文明世界"。

作为帝国主义的"代言人"，赫德认为以武力瓜分是不行的，中国不是英国殖民前的印度，有着一大堆分散的邦国。这是一个有

着统一文化、语言的国度，任何武力入侵与占领都会给殖民者制造长久的苦果，甚至会拖垮一个强国。而换上一个新的代理人也不那么靠谱。虽然清政府在八国联军侵华战争时曾“鲁莽地”向所有列强宣战，但慈禧也为她的不理智付出了代价。

所以，如果列强希望能继续维持现状，努力维持列强的在华利益，就必须找到一个合适的代理人，而且还要能左右逢源。特别是对民众而言，更要做好公关措施，以免下一个惨剧的发生。这次赫德延续了他一贯的想法，把他在中国40多年的经验总结汇聚成一本“指导手册”，完全体现了这位中国通对这块土地的认识。

赫德很清楚清政府目前面临的财政危机，庚子赔款这座大山恐怕真不是清政府能抬得起的。所以，总税务司甚至希望联军酌情减少赔款，以免自己这个中间人难以做人。后来他又听说，各国打算单独设立一个“国际管理委员会”管理清政府的财政，赫德赶忙上书劝阻，如果这个委员会真的成立，那还要总税务司干什么？

考虑到总税务司的存在，“国际管理委员会”并未成立，但赫德还是被庚子赔款的数额震惊了。本息合计9.8亿两白银！这比他原来预想的要多得多，就算把全国海关都抵押上也不够赔。这时赫德突然想到，清政府不是还有常关吗？一国之内何必设两种关口？以总税务司署多年打理海关的经验，处理常关必然绰绰有余。但赫德忘记了，常关税是由地方征收后，再上缴到中央，算是朝廷为数不多能掌握的一大税种，怎么可能交给洋人打理？

为此，张之洞直接大骂赫德是“竟欲将中国利权一网打尽，其心良险矣”[(7)]，继而还要联合其他督抚一起反对。户部告知赫德：总税务司只要对常关进行稽查即可，不需要再插手更多事务了。

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随着“新政”的推进，朝廷决定成立税务处。税务处刚刚成立一个月，总税务司署就接到一纸命令：“户部尚书铁良着派充督办税务大臣，外务部右侍郎唐绍仪着派充会办税务大臣，所有海关所用华洋人员统归节制。”[8]也就是说，海关从此日起就脱离外交管理的范畴，改为专门由税务部门统制。也就是说清政府宣布收回海关，赫德顿时成了一个光杆司令。

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赫德告假回英，中国海关的“赫德时代”结束了。

---

(1) 王铁崖编：《中外旧约章汇编》第一册，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7年版，第43—57页。

(2) 武堉干：《中国关税问题》，山西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61页。

(3) 王铁崖编：《中外旧约章汇编》第一册，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7年版，第37页。

(4) ［美］马士著，马江文等译：《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第2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0年版，第154页。

(5) ［清］王彦威、王亮辑编：《清季外交史料》第六卷，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22页。

(6) 徐义生编：《中国近代外债史统计资料》，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24页。

(7) 陈诗启：《中国近代海关》晚清部分，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450页。

(8) 海关总署本书编译委员会：《旧中国海关总税务司署通令选编》第二卷，中国海关出版社2003年版，第465页。

第六章　商战：商人的崛起

晚清是一个社会急剧变化的时代，许多传统观念不断遭受外来的挑战。在中国传统的“四民”观念，即所谓的“士农工商”中，商人排在最末一等。几千年来，大家都习惯了这种生活，士人掌握知识文化，是社会中的精英阶层；农民耕作土地，产出粮食，毕竟民以食为天；工匠制作各种器具，供民众使用。他们都可以产出知识或物质价值，而商人能够做些什么？从没有人关注过。

正因如此，中国古代一直实行重农抑商政策。但到了近代，士绅阶层竟然会和居于四民之末的商人奇妙地结合起来，诞生出一个新的强大势力，并在政治舞台上大放异彩。

是绅是商？

在中国几千年的历史里，不断出现著名大商人，有的商人甚至名垂青史。但官商之间壁垒森严，又有几人能够跨越这道不可逾越的障碍呢？可在晚清这样一个急剧变化的时代中，这种看似不可能的事竟会奇迹般地变为现实，这就是所谓的“绅商”。他们既能身着布衣，参与正常的商业经营活动；又可以穿上官袍，成为朝堂上的风云人物。他们集官商身份于一身，掌控着整个中国的经济命脉。

之所以会出现这种情况，是和清朝的基层政治传统分不开。清朝沿袭明朝，照样采取省、府、县的三级结构，县之下未再设行政机构。可偌大的乡村社会总要有人出面维持秩序，于是这个任务就交给地方士绅来处理。虽然这些人连最小的九品官都不是，但拥有治理一方的权力，而且也都是各地有名望的人士，无论是资历、经验、地位还是知识水平，都能得到众人的肯定。

这些乡村社会中的精英人士，又是怎么和商人挂上钩的呢？这就要说到“士绅”这个词的来源，这个词语可不同于英国人口中的Gentleman，而是一个具有中国特色的词汇。“绅”指的是以前士大夫束腰的长带，后来也引申为有身份有地位的人。而“士”原指治狱的官，后来引申为做官的人。

不过，有权有势者也未必当得了士绅，总要有些知识才能服众，所以绅士们往往都有功名在身。以古代的识字率来说，这些读书人可以说是珍稀物种，只是官府没那么多名额让他们一展才学，只能把他们打发到乡村，去教化山野村夫。功名就像一道护身符一样为他们带来了诸多特权，比如免除徭役，还能见官不跪等。虽然没顶着官的帽子，可士绅们在地方要管的事一点都不少，如修桥补路、兴修水利、教化村民等，村民们遇到什么纷争，也要指望士绅主持公道。

有的商人资产丰厚，远不用为生存而烦忧，自然而然就产生了更高等级的需求。明清以来的不少商人就是如此，当现实的利益无法满足他们的精神需求时，很多人就会转型成为所谓的儒商，将读书科举作为自己人生的终极追求。

著名的徽商就是其中的代表。他们平日诵读经典、教习子弟、敦睦乡里，举手投足间皆有一股深厚的文人气质，丝毫不见商侩本色。

在近代以前，士绅们安居乡野。而到了明清之际，商品经济的大潮迅猛袭来，出现了不少大商人，原本的基层结构遭到猛烈冲击。简单点说，就是大家兜里都有钱了，商人不想再受国家的歧视，想要取得更多的发言权和更高的政治地位。也就在这一时期，商人的地位达到一个非常高的程度。

但不管怎样，士绅与商人之间还是有着很大区别，士绅有知识有特权，而商人有钱。他们都羡慕对方的生活，于是出现了绅商结合的趋势。

在利益的驱动下，即使饱受流言蜚语，这种情况还是越来越多，所以商人与士绅的界限也变得不那么泾渭分明。士绅很容易做商人，而商人要想跻身士绅之中可就没那么简单了。自从有了科举以来，官府选拔官员必然要选择才学识兼优者，而商人知识水平显然不够。

商人想做官，只好走“捐纳”的路子，即花钱买官。不少商人就靠着这条偏路混了一个功名，摇身一变成为人人艳羡的士绅。近代以来，越来越多的“绅商”出现在政治舞台上，并爆发出难以想象的强大能量。

重商主义

重商主义在欧洲已有几百年的历史。从15世纪开始，新航路开辟所带来的巨额财富如同一剂强心针，点燃了欧洲人追逐财富的梦想。与此同时，封建体制逐渐瓦解的欧洲，各国商品流动前所未有地加快，他们渴求更多的财富、更多的资本，还有更为广阔的市场。

除了直接掠夺，国王们也用经济手段来增加自己的财富。提高自己国家的商品产量，并想办法在竞争中获得优势地位，最后在出口量上压倒进口量，就能获得商业上的成功，于是一大批商业城邦陆续兴起。虽然仗打不过那些强国，但商人们做生意可有一手，眼见纵横于欧洲各大战场之间，两边获利的事也不少见。普通人或许无法见证将军的荣耀，但他们一定能亲身感受到这些精明商人的存

在。正因商业活动在欧洲人的生活中如此普遍且重要，他们才会重视商业与商人的作用。

不过，清朝重商主义的产生可没有那么多的物质财富推动，它从一开始就笼罩在一片愁云惨雾之中。在这种情况下想要发展商业，困难重重，官吏、朝廷、洋人、兵灾，都是阻碍商业发展的严重问题。

就在这个最为艰难的时刻，“商战”的思维诞生了。早期维新思想家郑观应看到了这一点，相比于外国人的坚船利炮，他更担心的是看不见摸不着的经济侵略。“海禁既开，白人竞拓商场于东方大陆。懋迁之所及，即成为势力范围。不费一兵，不遗一镞，即能吸我骨血，握我利权。”[(1)]

与看不见的敌人打，当然要难于看得见的对手，而商业上的事情只能用商业解决。“商战”是一个极富远见的提议，它超脱出以往只能硬碰硬的想法，是一种决出胜负更为隐晦的方式。

维新派们敢于提出这个概念，当然是对本国的商品有信心的。很多人还记得昔日中国茶叶、丝绸远销海外的盛况，对其没落很是不甘。很多人仍然存着一个让中国商品再度走出国门的美好愿景，而要达到这一目标，一场恶战在所难免。

在这些多有工商业资本主义背景的维新思想家们看来，儒家的那套“义利观”早已过时了。世人皆爱钱财，有何不可直言呢？他们就毫不避讳地表达要赚钱的想法：“天下事事物物无不因财而动，因财而成矣。”[(2)]这个世界上做什么事都要花钱，现在国难当头，还扯儒家那些假大空的大道理，简直是误国之举。

维新派从资本主义的角度重新定义了商业，即财富是衡量人之价值的主要标准。但这个价值观让传统的士人很难接受，若天下人

都钻到钱眼儿里，那国家民族前途何在？不过，资本的力量远超他们想象，一些嗅觉灵敏的人已经察觉到，商人将会在未来有举足轻重的地位，甚至一些有功名的士人也会投身于工商业的大潮中。

状元企业家张謇

著名的实业家张謇是中国近代工商业发展绕不开的一个人，他曾创造了一个状元从商的传奇。他生于咸丰三年（1853年），是江苏南通海门人，从小就聪慧异常，16岁就考中秀才。但是，之后的张謇整整蹉跎了20年仍未有所建树，最后他通过淮军统领吴长庆的关系搭上了袁世凯这条大船。光绪八年（1882年），日本借朝鲜“壬午兵变”的机会入侵朝鲜，张謇随军入朝，写了一批诸如《条陈朝鲜事宜疏》之类的政论文章，结果受到了赏识，最终在翁同龢的推荐下步入朝堂。

张謇初入政坛，就被卷入激烈的帝后党争。他怀着一颗忠君爱国之心，痛陈慈禧乱政之举，希望为羸弱的光绪皇帝争取实权。但张謇并不喜欢炙手可热的康有为、梁启超两人，对他们的维新变法之说亦是嗤之以鼻。传统的儒家教育与忠君观念早已在张謇的内心深处牢牢扎下了根，任何想要削弱皇权的尝试在他看来都是大逆不道的。此后，张謇退出军队，开始诗书应试。最后，他终于在光绪二十年（1894年）高中状元。

在这里，我们要说的不是张謇中状元后的朝堂之事，而是对工商业的重视。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张謇在张之洞的委派下于江苏南通建立大生纱厂，开启了他“实业救国”的第一步。另一位状元陆润庠也紧跟在张謇后面，于苏州创立苏纶纱厂，江南江北两大状元几乎同时“下海”，迅速引爆了文坛舆论。时人或斥其没有风骨，或赞叹两人之胆识勇气非凡，居然罔顾天下人的目光，毅然投身商业，却没一个人想到他们只是恰好顺应时势而已。

有了这两位状元的先例，一大批士人终于可以抛弃固有成见，投身商海之中。财富汇聚的江南之地尤为突出，通过科举考试走出来的大商贾成为当地商会的主力军。

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张謇的大生纱厂建成投产。建厂之初，他立刻便遇到资金不足的问题。在他打退堂鼓之时，纱厂董事沈敬夫建议他破釜沉舟，用卖出的产品换资金，结果一举成功。投产的第二年，大生纱厂便获纯利5万两白银。此后数年，张謇在两江总督刘坤一的支持下，兴办了垦牧公司、油厂、面粉厂、冶金厂等数十家企业，实为中国近代第一实业家。

在历史的十字路口，商人与士绅间的界限从未如此模糊。当士绅们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第一次打破身份的藩篱，小心翼翼地向未知领域迈出双脚时，看到的是一个与以往截然不同的世界。“绅商”这个新概念名词产生的同时，原有的士绅阶层也迎来了天翻地覆的变化。

但变化的过程并不是一帆风顺，绅商一只脚跨入商界，另一只脚却仍然驻足于旧有的行事规则当中。步调的不一致让很多人的精神倍受煎熬，他们不知道如何向他人介绍自己的身份，也不知道怎样清楚地找到自身定位，很多人感到迷茫无措。

在这么多商人中，张謇无疑是一个优秀典范。他从小受儒家教育，有道德之追求，有士人之坚守，其中“不言商”“不慕富贵”本来是文人的基本道德准则之一，张謇却反其道而行。因为张謇清楚地认识到，实业为一国崛起之根本，不兴实业谈何与外国商人竞争？抱着这个态度，张謇毅然舍弃虚名，投身于实业救国的浪潮中，并成为一代实业家。正是他的“实业救国”思想，为近代中国经济发展打开了一条光明之路。

深入政治的商人阶层

晚清时期，人们每每高谈阔论，必言及商业。更有人大呼：“国势之强弱，系于民智；而国计之纾绌，实系乎商务。”好像不发展商业，国家就必然陷入贫弱交加之境地。商业被放置于如此重要的地位，令商人的底气也足了，信心也强了，但一份沉重的责任感与使命感也开始压在心头，为此他们决心大声呼喊出属于自己的声音。

在晚清政治生态中，尤其引人注意的是官商的崛起。绅商与官商毕竟有所不同，绅商是有绅士背景的商人，而官商自然就是有官方背景的商人，两者看似相近，差别却非同一般。官商中的典型代表就是大名鼎鼎的红顶商人。

所谓官商，尤以做官为第一要务，而做官之首在于做人，盛宣怀与胡雪岩都深谙此中道理。作为晚清名声最大的两位官商，两人的事迹被后人反复研究，试图从中找出一些成功的秘诀。“既似官又似商，由似官而为官”，在经商与做官之中，他们找到了一个最好的平衡点。

盛宣怀为李鸿章看重，进入轮船招商局后，仅担任会办一职。他并没有唐廷枢和徐润那样雄厚的财力，但他与李鸿章关系深厚，说是心腹也不为过，招商局里但凡与官字挂钩的业务，都须盛宣怀前来办理。而这，便是官商的最高境界。

兴建商会

如果问对外国经济侵略最敏感的阶层是哪个，那自然非工商业者莫属。甲午战争之前，人们还没意识到外国经济侵略的严重性，所以商贸企业尤为稀少，且资本薄弱，主要还是以官督企业和官督

商办企业为主。甲午战争之后，民间突然兴起一股“设厂自救”的浪潮，各种新设工矿企业如雨后春笋般出现，展现出前所未有的强大生命力。据统计，1895—1900年新开设的工矿企业中，有83.3%属于商办。[(3)]这一举动，一下子扭转了洋务运动以来官办企业与官督商办企业占据主导地位的局面。与之相伴的是一大批新兴民族资本家的出现，他们信心十足，不满足于传统的小作坊模式，热情地投身工业化生产，以往人们心目中的“洋火洋烟”也不再是外国企业的专属。

可是，随着外国经济侵略程度的日益加重，工商业者的利益受到了更大损害。他们发现虽然自己有同乡者组成的会馆和同业者组成的公所，可一个困于地域之限，一个受制于行业之别，都不能发挥真正作用。这么多地域不同、籍贯不同、财力也各不相同的商人为了争夺市场，大打出手的事也屡见不鲜。既然单打独斗无法与实力雄厚的西方资本抗衡，那么就只能集众人之力以求自保，所以商人们建立了自己的组织——商会。商会的宗旨是“联络群情，开通民智，提倡激励与兴利除弊，并调息各业纷争”[(4)]，希望以此平息矛盾，一致对外。

自古以来，各行各业的手工业者为了保护自身的利益，都会组成某个特定的团体，不管是公馆、会馆、会所、同业公会还是同乡公馆，其实性质都差不多。作为维护行业内部利益的组织，它们并非总是起到有利的作用，甚至由于内部操作者的僵化古板，有时还会成为工商业发展的绊脚石。

以往社会的弊端，正是商会产生的契机。从“会馆”到“商会”，别看只是一个字的变动，其实却有不小区别。会馆的产生背后是无数背井离乡的商人，他们为了谋生，不得不长途跋涉，外出经商。如果打算在一个商业繁盛的地区长久经营，还必须要与当地行业龙头搞好关系。如此烦琐倒不如建立个会馆，既方便沟通信

息，同乡、族人来了也有地方落脚休息，所以以地名或行业名为招牌的会馆就这样纷纷出现。会馆是个多功能服务场所，某一省份的人初来乍到遇到什么困难，第一反应就是找本家会馆。

而商会则与之不同。与以往的旧式商业组织比起来，它没有那么高的入会门槛，也没有严格限制地域与行业，在本地经商的商人只要交少许会费即可入会，涵盖范围要比其他行会组织更广。仅仅吸纳会员还不够，它还有严格的规章制度。但凡组织机构健全的商会，都有繁杂而细致的条款，上至总理、协理，下至庶务，均有章法可循。他们还学习西方民主模式，以选举之法层层选出各级代表，各种决议均需通过投票表决，主事者还要接受普通会员的监督。此时的清王朝连要不要立宪都没有定论，而商会已得风气之先，率先将西方政治制度移植到商会的运作之中。

相对于很多靠行政力量结合于一体的团体，这些单靠利益结合起来的组织，有时反倒更有凝聚力。因为他们可以通过合作来获得更好的收益，这是双赢的选择。

商会最重要的职责就是“联络群情”，成为商人共同维护商业发展和繁荣、保护自身利益的地方。从“利己”到“利他”，商会的社会价值逐渐变得不可或缺，也受到政府的支持，再加上维新派的推波助澜。于是营造出这样一种舆论氛围，把设立商会当作振兴商务的必要条件。商务局作为一个管理工商业的准官方机构开始悄然发挥作用，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仿照日本商会所设立的上海商业会议公所成为近代第一个商会。

盛宣怀对上海商业会议公所的成立花了很多心思，希望它能成为“痛除官场习气，随时随事集各商切实考究利弊”的存在，其主事者基本全是当地有名的绅商。随着财力越来越雄厚，商人们已经

不愿局限在同业或者同乡的圈子里，他们试图组成一个更为广泛的商业组织。

此时，美国的洛克菲勒与摩根等大财团已经成长为体积庞大的巨兽。与这些大财团相比，商会必须集合力量成为规模更大的商业体才能与之抗衡，所以跨区域的联合就成为不得已的举措。

在清朝的最后一年即1911年，各省商人开始考虑达成实质联合的可能性。三月份，四川商人在成都成立四川商会联合会。六月份，江苏商人也成立了苏属商会联合会。在省的基础上，商人们还曾谋求全国的联合，不过直到中华民国成立之后，中华全国商会联合会才在北京建立。

设立规章

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庆亲王奕劻长子载振奉命出使英国参加英王爱德华七世的加冕典礼，同时也到法、比、美、日四国考察了一圈。他亲见了强大的工业文明的真实一面，大开眼界。而究其原因，这背后都离不开发达的商业资本。

在访英之时，使团众人无意间查探到英国富强的“秘诀”，简单地说就是——“管得少”，国家只有保护之责，没有过多干涉的道理，所以商业才能繁盛。“至于自然之旨，尤为商务第一要结。盖官之于商，概任保护之责，百商税面外，凡一切贸迁生计，皆听民所自谋，无有用压力以摧折而窳庸之者。此商战之所以辄胜也。”(5)

载振感觉自己打开了新世界的大门：原来清朝之所以商业不振，贸易不盛，就是朝廷管得太多太杂。所以载振回国后，立马提出设立商部的请求，并希望以此能“恤商情、振商务、保商权”。

恰好此时的朝廷也正缺通晓商律的人才，当发现游历各国的载振恰是一个很好的选择时，清政府就委任他做新成立的商部的尚书，任伍廷芳、陈壁为左右侍郎，另外还网罗一大批绅商参与其中。虽然名为“商部”，其实农、工、商类都能管，算是中国近代第一个与国际接轨的商业管理机构。

当然，设个政府部门还不够，还要有配套的制度。那时的中国有各种的法律，唯独缺少一部商法。在过去，只有老字号的商号，才有详尽完备的内部管理体系。所以出台一部完备的商法，让商人明白能做什么、不能做什么尤为重要，于是《商律》《公司律》《商人通例》《铁路简明章程》《矿务暂行章程》《商会简明章程》等一大批工商业法律法规顺势推出。

光绪三十年（1904年），清政府正式拿出《商会简明章程》，正式承认这类商人组织的合法性质。有了合法的背景，兴办商会的热情瞬间被激发出来，各地都冒出了一大批商会。这些商会成为绅商发表自己政治意见、提高自己政治影响力的重要台阶。

即使有法律做保障，商人们还是不敢大胆投资。刚刚成立的商部面临着无人配合的窘境。清政府知道，必须立即想办法尽量调动商人的积极性。当然最直接的办法莫过于撒钱，可清政府拿不出这么多钱，只好再度祭出“封爵大法”。商部拿出一份《奖励华商公司章程》，规定每个出资商人都可以按照出资额度，获得各种荣誉称号甚至爵位，比如投资2000万两白银就能拿到一等子爵。这一举动也向外界释放出一个强烈的信号，商人地位低贱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

买办的出现

随着中国人与洋人经济联系的日益密切，一些专为外国人服务的中国人逐渐登上历史舞台，这就是我们既熟悉又陌生的“买办”。

鸦片战争前，买办只是为外商提供必要服务，相当于清政府官方聘请的工作人员。当时，清政府对这些外国人严防死守，如道光十五年（1835年）的《防范夷人章程》中就明确规定所有工作人员都需经过买办代雇，洋人不能出面。这些都要通过清政府的关系，往往要打通很多环节。

可自从洋人打开中国国门，买办的身份和地位便发生了巨大转变。西方商人很难跨越千里，在崭新的土地开拓市场，对中国本土知根知底的买办将会起到巨大作用。无论是拓展销售渠道、联络熟识客户，或是进行商品运输等都有巨大优势，所以洋商试图绕过清政府，直接雇佣买办。从中美《望厦条约》之后，买办的雇佣与使用事宜就脱离了清政府的控制，专由洋商自行决定。从此，买办不再是之前只能采买和打杂的角色，转而成为外国人在华经营的代理人。

此时的买办还没有像后来那样臭名昭著。在国外资本的浇灌下，买办阶级在中国，尤其在通商口岸迅速发展壮大起来。既称之为“买办”，自当有“买”与“办”两重任务，一方面是要为外商采买物品，另一方面则要为外商办理各项事务，想方设法把洋货推销出去。他们就相当于一个中间人，既是采买员又是推销员。

对于“买办”这个名字，当时的老百姓并不太习惯，他们按葡萄牙语“comprador”的读音起了个独具特色的中文译名，一般称作“康白度”，从此这个名字就在民间流传开来。

当时，要成为一名合格的买办，能够使用多国语言、熟识东西方民情习俗只是标配，其他如人脉广博、谈判能力高超、有良好心理素质等也是成为一个优良买办所必需的条件。可以想见，在当时的对外口岸中，能够称得上买办的人无疑都是社会中的精英，他们学贯中西，具有敏锐的商业头脑和待人接物的本事，在洋人和官府那里都有牢靠的关系，拥有成为一名优秀商业大亨所必备的条件。

萌生于买办的爱国商人

事实上，很多买办也的确在晚清复杂的商业环境中闯出一片天地，比如怡和洋行的唐廷枢和宝顺洋行的徐润。当时，不少买办同时具备商绅的身份，因为花大笔银子捐个官衔是当时的流行做法。如唐廷枢捐个了候补府同知的职位，而徐润也是如此从监生一路捐到了郎中，然后他们便顺势参与到官办的洋务企业中。中国第一家民办洋务企业轮船招商局，就是在买办的通力合作下完成的。因唐廷枢与徐润两人出力甚多，将原本20万两白银的资本扩增至100万两白银，所以得以分别担任总办与会办。

李鸿章之所以要选择唐、徐两人创办轮船招商局，与他们买办的背景是分不开的。先前请来的总办因为没和外国人打过交道，对新式洋务企业的运作模式一头雾水，以致轮船招商局半死不活。而唐、徐两位买办加盟之后，招商局“归商办理”，面貌为之一变。李鸿章对这两位买办出身的商人颇为信任，“银钱俱归调度”。靠着在洋行多年打拼的经验，他们很快召集大批同行商人入股，打开局面并拿下大量订单。唐廷枢因为在轮船招商局的成功，受李鸿章委派开始筹办开平煤矿，此后便官运亨通，一路升至道台；徐润后来成为上海滩知名的房地产大商人，声名显赫。他们的成功之路此后成为众多买办所效仿的典范。

无论戴了多么精英的光环，买办们也有始终摆脱不了的矛盾。他们为洋人的利益服务，而洋人却是以侵略者的角色到来的，为洋人服务并非其本意。即使唐廷枢做到怡和洋行华商领袖的位子，依然是英国老板随时可以开除的员工。在洋行的买办多是如此，无论取得多高的成就，拿到多高的薪水，也无非是一个高级打工者而已。他们一边要承受着邻里同乡的讥讽与嘲笑，一边又要对洋人老板违心地奉承。很多有权势的买办都急于摘掉这顶不光彩的帽子，获得正经的官僚身份。

因为在洋行中看尽了洋人的做派，许多逃离买办身份的商人开始慷慨激昂地宣传发展民族工商业的重要性。技不如人尚在其次，长期受制于人还不自知才是最为可怕的。郑观应就是这么一个人，他出身于书香门第，自小习孔孟之道，可惜应试未能及第，只好弃学从商，到上海找工作。靠着叔父的关系，郑观应顺利进入洋行做起了买办。后来，他花钱捐了个郎 中，又转入英国太古轮船公司。由于这重身份，他受到了李鸿章的器重，从而涉足洋务企业，担任上海机器织布局总办和轮船招商局帮办。徐润离开之后，他晋升为招商局总办。

在与洋务派搭线的过程中，郑观应顺利甩掉了买办的帽子。郑观应是一个忧国忧民的人，早在洋行做买办的时候，他目睹英国人在中国的所作所为，不禁“触景生时”，写下《救时揭要》，痛惜家国不幸，大骂英国人的恶行。

面对国家贫弱，无非是以笔为刀，痛述时局之黑暗。于是，《盛世危言》诞生了。这本书基本概述了维新派的各种思想主张，学科技、设议院、办企业……几乎所有措施都是围绕着发展民族工商业这条主线进行的。

对于容闳来说，救国不仅仅是一项事业，还是一份沉甸甸的责任。出身贫苦农家的容闳，是中国第一批出国留学的幼童，幸运地进入耶鲁大学。回国的容闳欲一展所长，将所学完全奉献出来，没想到国内就业市场对这位海归并不热情，并没有太多岗位能吸纳他的才华。在屡次择业受挫之后，他只好选择进入上海宝顺洋行做起买办。

同样是看到了洋行在中国的所作所为，容闳将实现中国近代化作为自己的毕生追求。为了实现理想，他换过多任老板。他曾经考虑过参加太平天国运动，却在实际考察后大失所望。之后又转投曾国藩门下，帮助其建立工厂、培育人才，但他很快又对洋务派不谈立宪的政治态度感到失望。在美国待了十几年之后，他再次将维新派视为救命稻草，急切地提出各项救国方案，可惜一腔热血再次在慈禧太后的捕杀中冷却。

容闳最后的选择是革命派，但他并未看到革命派是否真正实践了他的理想，于1912年4月21日便溘然长逝了。他并不是一个传统意义上的商人，反倒更像一个积极参与实践的社会活动家，买办的经历或许是一段不光彩的过往，却成就了一个在中国近代史上留下印记的改革者。

---

(1) ［清］时报：《论振兴商务当先兴农业工业》，《东方杂志》1905年第7期。

(2) ［清］何启、胡礼垣著，郑大华点校：《新政真诠》，辽宁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456页。

(3) 杜询诚：《民族资本主义与旧中国政府（1840—1937）》，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1年版，第33页。

(4) 《广东总商会简明章程》，《东方杂志》1905年第1期。

(5) ［清］载振：《英轺日记》第六卷，上海文明书局1903年版，第16页。

第七章　失败的改革

中国古代的财政，一般遵循“量入为出”的原则。在清代早期，支出的种类与以往的各个封建王朝并无太大区别，大体上只需“循祖宗旧例”维持帝国的正常运转即可。

在清代早期，支出中有一大项就是皇室经费。内务府作为专门负责皇帝饮食起居的大管家，有50多个机构和3000多人，其每日花费可想而知。

除了供养皇室的钱，京城一大批文武官员的俸禄也是一笔大的开支。他们的俸禄由低到高，从30两白银到180两白银不等。除此之外，还有官吏出公差及节日福利等。而且自雍正年间耗羡归公，养廉银的开支也加入其中。据统计，平均每年的俸禄开支都有700万两白银以上。

但这些支出和军费比起来还是小巫见大巫。道光年间，八旗和绿营的兵力总数已达89万人。[(1)]要维持这么一支规模庞大的部队，花费也甚为巨大。就算平时不遇战事，单驻防产生的费用就不下2000万两白银。清朝自开国以来，每逢重大战事，开支就直线上升，动辄数千万两白银，经常让朝廷不堪重负。

除了以上这些，治河也是个压力沉重的开支。中国河流众多，水网密集，平时农民指望它们灌溉农田，但它们又随时会化身为吞噬生命的凶兽。例如黄河，隔一段时期就会泛滥改道一次。为治水，清政府设立北河、东河和南河三个河道总督进行管理，每年在修筑堤坝、建立水利设施、雇佣民工等事务上要耗资400万两白银。

可以看出在这段时间里，这些支出基本都是对内的，清政府虽偶有为财政发愁的情形，但一般情况下并没有太过担心。但鸦片战

争之后，情况发生了逆转。他们遇到的第一个难题就是《南京条约》的赔款问题。

筹建海军

两次鸦片战争让清政府意识到国防要巩固，那军费一定是不能省的。当务之急是要建设一支强大的海军，不管是买也好还是租也罢，军舰必须尽快到位，才能威慑那些觊觎中国领土的列强。

光绪元年（1875年），持续数年的海防塞防之争逐渐有了一个结果，清政府决定建设北洋海军、南洋海军和福建海军。可建设海军花费巨大，资金从何而来呢？清政府设法从粤海、潮州、闽海、浙海、山海五关和台湾的沪尾、打狗两口洋税中提取四成，江海关税中提取二成，200多万两白银；再从江苏、浙江、江西、福建、湖北和广东六省厘金中提取200万两白银，筹得400万两白银，作为建设海军的常年费用。虽然账面上数额是这些，但考虑到缺乏监管等因素，实际到手的往往要打不少折扣。而建设海军的真正大头在于购置舰船和设备，清政府无力自行制造，就只能向外国购买，铁甲舰要上百万两白银，小舰也要几十万两白银，每年光买船就得花上千万两白银。

光绪十一年（1885年），三大海军基本成形。为了统筹全国海军事务，清政府还专门设立了总理海军事务衙门。结果总理海军事务衙门大臣奕譞一上任就遇到了缺钱的问题。恭亲王奕很不满地抱怨道："虽号称400万两，合之关税实数不及300万两。"[(2)]海军只能向户部要钱，户部也不堪重负，所以在1885年之后，购置舰船的速度明显放缓。到了光绪十七年，朝廷甚至希望3年内海军不要购买军械。

在日本人勒紧腰带加速购船的时候，清政府在干些什么呢？我们都知道慈禧太后挪用组建北洋海军的军费修建颐和园，而这也成为晚清政府昏聩无能的一大铁证。但事实恐怕并非如此，挪用海军军费建颐和园之事确实有，不过主事者并非慈禧，而是当时的海军事务衙门大臣醇亲王奕。他通过李鸿章借着海军经费的名义从南方筹集260万两白银，大部分存在外国银行，再拿利息去修颐和园，顺便连海防捐输也一并要来，增加修建经费。在修建颐和园的800万两白银中，有700多万两都出自海军衙门经费。

几年之后，一场出乎清政府统治者预料的战争打响了。这场战争始于朝鲜东学党起义的冲突，迅速将远东两大国卷入其中。战争之初，清政府对日本的军事实力没有充分认识，浑然不知这个昔日的小小岛国早已羽翼渐丰，实力今非昔比。明治维新之后的日本国力迅速上升，这些年一直没有停下购置新舰的脚步，至甲午战争爆发前，日本的年均财政收入已不比清政府少多少，而军费支出则远高于清政府。

等到战争开打时才想起来购置军舰的清政府，在战争前面立刻变得手忙脚乱，战争的规模远超其原本估计，脆弱的财政体系无法支撑起这么一笔规模庞大的开支，就只能按照开源节流的老办法筹措经费。光绪二十年（1894年）八月一日两国宣战，户部赶忙于八月十四日拿出“停止工程、核扣俸廉、预缴盐厘、酌提运本”的办法进行应对，总计凑了1000多万两的银子，但仍有不足，实际收到的大概有975万两[(3)]。最后，清政府又把主意打到商号头上。

这些钱对于耗资巨大的战争来说只是杯水车薪，此时英国汇丰银行再度抛来了橄榄枝。清政府面临此等危局也顾不得那么多了，光绪二十年（1894年），按照年息7%的计划借款1000万两白银。可这还是不敷用度，所以又于光绪二十一年初再度签了一份300万镑（合库平银1865.4万两）的借款合同，年息6%，还款期20年。

军费与赔款

甲午战争中，清政府保守估计花费6000万两白银，其中4000万两白银都是对外借款。[(4)]战争的失败给了清政府当头一击，巨额的战争赔款与赎辽费让本就脆弱的财政雪上加霜。因此，建设新式陆军的议题立刻被提上日程。军费是一笔巨大的开支，相较于传统军队而言，新式军队的花费更大，对于欠了一屁股债的清政府而言压力巨大。袁世凯在天津编练新军时，不仅武器装备要配最好的，待遇也很高。虽然新军只有7300人，每年花费却达44万两白银。

由于袁世凯的工作取得了不错成效，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清政府设立练兵处，计划编练新军三十六镇，特别是袁世凯的北洋六镇，实力最为强悍，花费也最为巨大，估计一镇每年的花费要达到200万两白银。[(5)]这是个相当高昂的支出，要知道此时清政府还欠着大笔的外债，只能勉强挤出一些资金努力维持，所以最后新军也只编成十四镇。新军编练未成，旧式军队又指望不上，就只能以守代攻，被动应付，再加上各项维持边防的花费，军费支出甚至快达到财政支出的三成。

在甲午战争的硝烟散尽之后，洋务派兴建的一大批军工企业也处境尴尬。想要大力新建扩建，奈何财力捉襟见肘；可就这么弃之不顾，又是资源的极大浪费，所以尽力维持现状。而民用企业的处境更加严酷，官府所拨经费仅有军事工业的1/5，大批企业遭遇前所未有的寒冬，洋务派的计划彻底失败。

仅次于军事支出的开支就是赔款支付。对于清政府每次战败所支付的对外赔款，教科书只给出一个个冰冷的数字。但如果将这些数字与清政府真实的财政情况相结合，我们就会意识到这些数字是多么沉重的负担。

诚然，在近代工业文明所注入的不竭动力作用下，清政府的财政收入有了很大提高，从鸦片战争时的4000万两白银到同治年间的6000万两白银，再到甲午战争时的8000万两白银，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时达到2亿两白银，清朝灭亡时已达3亿两白银。看起来数字庞大，但相较于清政府所欠的巨额债务而言，仍力有未逮。

尽管甲午战争赔款2亿两白银，庚子赔款4.5亿两白银，但赔出去天价的银两，利息比本金还高。本金有6.5亿两白银而利息足足有11.4亿两白银，合计共有17.9亿两白银。清政府看似庞大的体量背后，是脆弱的动员能力，哪怕是稍微重大的支出，清政府都只得选择借债度日。清政府虽曾多次下令“开源节流”，可实际上开源愈来愈多，节流却是难见。

为堵上这么大的口子，清政府曾三次大规模发行公债，分别是光绪二十年的息借商款、光绪二十四年的昭信股票和宣统三年的爱国公债，它们分别是为了筹集甲午战争军费、支付对日赔款及镇压辛亥革命。清政府试图效仿近代西方国家发行公债以筹集资金，但实际上老百姓并不买账。一次次的战败和无休止的盘剥，早已将百姓对政府的信任降至冰点。政府有时还会强行要求官民认购，等于是另一种形式的捐输，再加上没有遍及各地的基层金融机构，老百姓买了也难以兑现，种种原因使发行公债收效甚微。

发行公债不利就只能从各国银行手中大举外债。初期还是以短期小额为主，都是地方官员为镇压各地起义而举债。越往后期限越长，金额越大。据估计，自光绪二十年到清朝灭亡的18年间，清政府总共借了12.5亿两白银的外债，其中一大半都是用来以债养债。偏偏这些钱到手之后还缩水不少，还附加有各项苛刻的条件。

大举外债无异于饮鸩止渴，各地分摊款项节节攀升，使地方更加不愿上缴收入，奏销制度渐渐失去作用，原本的京饷、协饷被以

各种理由拖欠，中央与地方财权之争愈演愈烈。清末最后10年间，清政府每年要支付本息1800万两以上的白银，这为帝国主义借助经济手段控制中国提供了便利。

一些有识之士意识到其危险，大声疾呼不可大举外债。但梁启超认为，单纯抵制并无意义，抵制只是手段，对待外资“必能抵制而后能利用，抵制经也，利用权也”。他同样也清醒地意识到外债是把双刃剑：“外资之性质极为危险，可以不借则不借为妙，当然一国资本未丰时，稍藉外债以润泽之，有时亦收奇效，所视者，其用之途如何耳。若用之于不生产之业，则其害滋重。用之于生产之业，其利亦至溥。”而清政府所借外债主要是用于赔款，用于投资实业的寥寥无几，自然无益于经济。

就这样，打败清政府的是洋人，借清政府钱供其赔款的也是外国银行。勒索赔款与借款让帝国主义者与外国银行家们赚得盆满钵满，唯有中国人民生活越发困苦。

钱都用在了哪里？

清朝前期的财政收支原则是量入为出，财政缺口越来越大，清政府不得不用各种办法增加收入，财政政策变成了量出制入，即根据花多少钱制定收入计划。

以往清政府的几大税项也就是田赋、漕粮、盐课再加一些杂项，并没有太多需要仔细核算的内容。户部关心最多的是各省能不能按时按量送来银两，且不要随便克扣隐瞒漏报。但自从洋人用坚船利炮打开国门之后，海关洞开，在洋人总税务司的打理下，关税收入较以往涨了10倍以上，虽然大部分都要用作偿还外债和赔款，清政府只能拿到其中的一部分“关余”，但数量也比之前要多得多。

再然后，铁路、电讯、邮政、外贸、船政等各种新事物也一个个出现。迅速发展的工业猛烈地冲击了守旧官僚的认知，与之而来的还有一大批前所未闻的收支项目，特别是赔款、外债和外交等项。它们的规模不断增长，挤占了原有的传统项目，在这种情况下不制定新的预算方案显然是不可行的，总不能让各种支出都归到一个篮子里。

制定预算的意图早在甲午战争之前就有人提过，担任日本公使馆参赞和驻美旧金山领事馆总领事的黄遵宪曾根据其在国外生活工作情况，写了本《日本国志》，第一次介绍了国外的预算制度。书成之后，黄遵宪满怀一腔热情将其呈递于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但并没激起什么波澜，直到甲午战争结束后，才有人从故纸堆中将它翻出来。

由于此战元气大伤，清政府不得不考虑借鉴国外先进的会计经验，当时欧洲诸国也有自己的会计制度，原则是“预算以为会计之初，有决算以为会计之终”[(6)]，但不同的是，在已经立宪的国家有议会这一机构作为监督，预算通过要经过议会，决算监督也要通过议会，这样能够大大减少决策的失误。而且不管是征税进项，还是支出取用，都会在本年度向外公布，不能随便超出原有的计划，这样做自然能够取信于民。

日本作为西方预算制度的好学生，也发展出一套自己的流程，即先由中央各省厅按照预定花费制定预算表，然后经大藏省讨论和会计院审议后，最后由内阁正式决定。如有变动再上报大藏省，然后呈送太政官，检察院召开检查会议专门审定，才能正式通过。这些流程虽然烦琐，却能最大限度上实现资金的合理使用。

而此时的清政府还停留在“循祖宗旧例”上，顶多就是把各类收支情况列个表出来。至于体例是否详尽、数据是否准确就不好说

了，昭告天下更是遥遥无期，更不必说制定明年预算。现实的情况是，户部不仅搞不清楚应收之款，也弄不明白应支之钱，款项到底花到哪里是本糊涂账，至于审计检查之项更是模糊不清。这既不利于收支，也不利于查证，无形中为腐败的滋生提供了有利条件。

当时就有人说，整个大清帝国宛如一个庞大臃肿的公司。君主为大股东，百姓如小股东，集众人之力一起参股，方才构建起公司的财政基础。可这个公司的运转实在问题多，财务处（户部）每年撰写的财务报告小股东们全然不知情，大股东又无法辨清其中虚实，一旦深究起来，全是一笔烂账。[7]

到了20世纪，由于时势所迫，眼看着宪政已是不得不行之事，清政府只好筹备起预备立宪。作为议会的一项重要职能，财政预算制度也被提上日程，计划设资政院以司预算，设审计院以掌检查。不过，当时的朝廷似乎对这一制度有所误会，有不少人觉得，虽然名为泰西之法，实际上还是“周官王制遗意”。不过是收支两条线而已，中国自古有之，哪有那么麻烦？显然他们低估了现代预算制度的专业性和复杂性，以为只需列个条目告之民众即可。可现实远非如此，光是一大堆繁杂的账目就已不是寻常人等能够处理的，更别提数据的虚实也需进行细致调查。

一直以来，因为没有有效的监管措施，地方往往会单独从收入中划出一部分用于支出，而这部分实际上并不记录在案，自然也就无从查证。在清代，这种手法可以说是公开的秘密，从地方到中央人人皆知。

因为这些收入并不入内库，户部对各省故意隐匿且不报部的款项称之为“外销”。这些外销由各省自收自支，而且自道光年间之后是呈现出种类越来越多、数额越来越大的趋势。因为太平天国运动涌现出的一大批局所，让地方督抚有了更大的隐匿空间。咸丰、

同治之后，外销之款简直一发不可收拾，据户部自己的估计，隐匿的数额可能有上报的数倍之多。

一面是日趋窘迫的财政，另一面是地方的故意瞒报。如此情况，必须要有所行动，于是朝廷专门组织了几次巡查，第一次是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命协办大学士、军机大臣刚毅奉旨南巡江苏和广东，督查外销财政。

刚毅此行的主要目的就是在地方拿到更多钱以弥补财政漏洞，不管是清查也好，加捐也罢，都以达到这个目的为重点。事实上，刚毅还肩负着一重使命，那就是帮助慈禧太后筹集对抗维新派的资金。

刚毅的第一站是江苏。两江总督总管两淮盐政，在大清财政体系里占据重要一席。钦差大臣身负皇命而来，当地官员不敢懈怠，拿出账目籍册交由刚毅过目。这一查果真发现了问题，明明厘金和关税收入一直在增长，但解运至中央的数额却没有变化，显然这里存在着巨大漏洞。

不仅如此，在深入调查盐务、海关、厘卡的运作情况之后，刚毅惊讶地发现侵吞税款的情况非常严重，动辄便是数十万、数百万两白银。数十年积累下来，隐瞒之数不可估量。所以，刚毅让常关负责人、两淮盐运使等财政官员齐聚江宁，一个个仔细查证，并且使出恩威并施的手段，声称自己顶多只抽半数盈余，余者皆发还回去，若不如实禀报，将治其欺君之罪。

钦差只留给他们坦白与抗拒两个选项。朝廷威严尚在，督抚也不想公开对抗中央，权衡利弊之下，都选择了坦白。

但刚毅的意图还不止于此，他还想要清查田赋，把地方官员们的老底翻出来。正如其他王朝末期一样，晚清的土地兼并情况十分

严重，大批田产被豪门大户隐匿，田赋也收不上来。所以刚毅打算彻查此事，把那些隐匿土地全都清查出来。

刚毅想要清查田赋的举动吓坏了地方官员，他们很多人本身也是当地最大的地主，一旦彻查必然会损失惨重。偏偏刚毅人如其名，油盐不进，逼得不少人直接绕过巡查组向朝廷举报，声称刚毅在当地品行不端，于地方大肆搜刮民财，要求对其严肃处理。其中，两江总督刘坤一对刚毅在江苏的恣意妄为尤为不满。

众人的抗议终究没起到什么作用，刚毅在完成了江苏的任务后，继续南下抵达广东。由于有江苏的成功案例在前，这次广东之行开展得很顺利，两广总督及广东布政使均很配合地拿出了本省账目籍册，供刚毅过目。

这次刚毅发现了不少新问题，如大笔厘金只存在于账上而不见实物。由于毗邻香港，广东有大批的活跃外资，到处都是外国银圆，想要隐匿收入更加容易。对于这种情况，刚毅觉得厘金局既然只想着中饱私囊，不认真上报所得，那就由商人代办，于是找了72家各行业商人，议定自留与上交比例，让他们承包厘金业务。

事实证明，这个办法很有效，这些商人的确表现出了更高的积极性，成功地在短时间内实现了税额翻倍的目标。苏粤两省的事例震慑了南方诸省，浙、赣、鄂、滇等省只好拿出更高的积极性配合朝廷的清查工作，贡献出更多收入。

受此激励，光绪三十年（1904年），朝廷又命兵部左侍郎铁良巡视江苏等南方省份，督查财政事项。他先到上海的江南制造局，从结余中抽得80万两白银[8]，然后又到苏州、南京等地检查财政收支情况。

毕竟要为自家的练兵处筹钱，铁良以十分认真负责的态度投入清查工作中。在两淮盐政上，铁良更是严厉要求每一笔款项都要“造具册结，送部备查”，各环节都有专人负责，一旦出了纰漏，轻则自掏腰包补足，重则丢官卸职，拿部是问。经过这番大力清查，铁良筹得逾百万两白银，让原本500万两白银的盐税直接翻倍。

两次巡查下来，地方上隐瞒的收入被挖出不少。但清朝上下都知道，所谓清查，无非只是权宜之计，总不能年复一年、日复一日地派人到各地查账，关键还是要建立有效的制度保障，让所有隐匿收入无可遁形。

清理财政

为了摸清帝国各地的家底，把一盘散沙的财政制度统一到一条轨道上来，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清政府专门设置了财政处负责此事，庆亲王奕劻连同户部一起指导各地财政进行统一，但收效甚微。

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清政府决定力行财政改革。改革的第一步就是把户部改组为度支部。

“度支”之名颇为久远，最早能追溯到魏晋时期，也有“规划开支”之意，很明显寄托了清政府希望厘清财政的美好用意。所以把户部改组为度支部可不单单只是换个牌子，而是赋予其清理全国财政的权力。这一决定的结果，就是从此迈出了中国寻求财政统一的第一步。

一切准备就绪之后，清政府再度启动财政清理。吸取了之前的教训，这次朝廷打算先在各省收集足够的情报，然后再做打算。光

绪三十三年（1907年），宪政编查馆着手在各省设立调查局，调查内容包括但不限于各地财政民政、商业发展、风俗民情等，迈出清理财政的第一步。

正式清查的起点是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那年福建道监察御史赵炳麟上了一道《统一财权整理国政折》[(9)]，希望财政稽核这一重要任务交由新成立的度支部负责。以后，各级衙门每年想花多少钱，就专门分造概算书及预定经费要求书交由度支部统一办理。

度支部经过慎重考虑，认为此议确有道理，且时机早已成熟，于是便开始真正着手实施计划。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正式启动，度支部希望由自己设立清理财政处，各省设清理财政局，先把本年度的收支情况搞清楚，然后再准备一套《清理财政章程》为其保驾护航。这本《章程》虽然只有八章三十五条，却涵盖了组织形式、机构设置、具体职能和清理办法等诸多内容，而且因为其体例完备、可操作性强，成为清理财政的纲领，直到民国时期的财政清理仍然沿用着这套办法。

当然，清理财政不是一蹴而就的事，前期的规划准备尤其需要细致。为此，清理财政处要求各省清理财政局按季和按年报送报告册，包括预算和决算内容，最后汇总起来制定《财政说明书》总揽全局。《说明书》的重要性不言而喻，能不能交出一份像样的答卷，关系到整场清理运动的成败，度支部也是打起十分的精神，认真筹划起来。这项工程于光绪三十五年（1909年）开始，度支部要统计各省在上年度的报告，再于次年拿出最终的《财政说明书》。

此次名为清理财政，实则摸清各省底细，此次清查的重点在于各省自筹自支的“外销”款项。除此以外，很多原本不列入常例的项目现在也要进行统计，比如其他杂捐、报效等收入，还有赈灾、维护之类的支出等。

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财政收支表完成之后，朝廷终于能一览各省的真实收支情况。但他们也发现，统计结果有很多都是按他们自己的标准来的，没有换算成规定的库平银。总体来说，各省基本都是支出略高于收入，换算之后本年度亏空1225万两白银。(10)

从财政收支表上看，除直隶之外，江、浙、粤等开放港口的省份收入都远超内陆，其中关税的贡献力度最大，经济重心转向东南的趋势已很难扭转。朝廷在这次清查中所获颇丰，不仅根据实际调查情况，提升了各省上报数据的可靠性，而且还查出大批之前的隐瞒款项。

朝廷的下一个目标指向拖延了几十年的局所问题。这些设立自太平天国时期的老旧机构养了一大批闲杂人等，严重消耗了国家财政。数十年来，朝廷屡次欲解决而不得，现在正好可以借此机会永绝后患。朝廷决心以强力推动各省建立藩所作为省级统一财政机构，彻底摒弃以往繁杂臃肿的各类局所，对于这一决议，各省督抚纷纷上书表示肯定，甚至有的还拿出了实际方案。

不过真等实施起来就发现，要裁撤局所远非想象的那么容易。

由于各省水平各有高低，最后交出的答卷也是千差万别。大多连名字都没统一，有的叫“财政公所”，有的叫“藩司衙门”“度支公所”之类，上级机构光见这些名字就难以分辨，一不留神搞混也属正常。而且有的省份干脆不管这些麻烦事，把旧的机构直接换个招牌，嵌套到新设机构之中，表面看有所改变，实则里面还是原来的那一套。

可财政改革之后，必须考虑分科治事，比如吏治科、财务科等，即按照近代化的方式进行分工协作。

有的省照葫芦画瓢，看起来是那么回事，但更多的是不明就里，直接把旧式六房机构一股脑地塞到新设科室内。最多就是改换个招牌，连老属吏都没落下，造就出一个组织混乱不清的“四不像”。

度支部在这场改革中扮演的角色也不甚光彩。或许真的是被年年积攒的债务与亏空逼到无可奈何，所以度支部对各省的最大要求就是“删减靡费为第一要义”，说白了就是要省钱，所有新设机构花费必须要少于先前。但凡有所超支就会招来度支部的一通指责，比如陕西省就招到了“如但改立名目，而其所支款项并无节省，恐于整顿办法仍无实际”的评价。不过关于如何节省经费，度支部并没为大家拿出有效的方案。

有的地方打算裁撤旧吏以节省经费，比如书吏。

这种场面在湘、鄂、苏等省都有出现，足以说明度支部的想法很不切实际，至少没有充分考虑到善后的问题。而更为危险的是，整个省级财政体系的构架也如同建立在空中楼阁上，摇摇欲坠。其中，藩司虽然名义上总管一省之财政，但实际上底下的各个局所并未裁撤干净，他们继续敛财，盐税、粮税乃至关税也不是尽缴到藩司，甚至有的州县直接越过本省，到度支部去解运银两。

在度支部自己看来，各省藩司统一了财权，可以说是功不可没，可实际情况又是怎样的呢？只有一堆分不清权责的科室、一批尚待学习的新进职员、一群放任自流的各地局所。此外，还有度支部与督抚的激烈对峙，一方要借其控制省财政，另一方则竭尽全力保证其处于自己控制之下。整个藩司成为中央与地方激烈斗争的地方，这么一来，根本无从开展正常工作。

宪政编查馆也决心做出一番成绩，准备了一个“九年计划”。该计划从筹备谘议局、召开资政院，再到调查土地户籍、人口财政等，规划不可谓不细致，考虑不可谓不长远，可唯独没有想到的是短短三年之后，大清帝国就分崩离析了。

不过，这一规划也不是完全做了无用功。宣统二年（1910年）9月，立宪派苦苦期待的资政院正式成立。这个部门主要掌握议决国家财政预算的大权，以后预决算案再做增减，就要经过资政院核准才能通行。10月3日召开第一次会议时，摄政王载沣亲临现场致开幕词。民选议员代表们踌躇满志，他们多是各地有名望的士绅，计划以此为基地，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做出一番宏伟事业。

而钦定议员代表则冷眼相对，因为他们清楚地知道，所谓资政院，不过是皇室为装点门楣所精心设计出的一个“玩意”。不光资政院总裁出自钦定，就算要议决什么事项也要具奏请旨，如被否决就不可颁行，哪里有多少自主性？与其他君主立宪国家相比，这个准议会机构根本很难发挥它应有的作用。

瓦解

宣统三年（1911年），清政府拟定《预算册式及例言》，规定预算以整年为计，先列岁入，再列岁出，各分“经常”“临时”两项，下设门、类、款、项、子目。在新编制的预算案中，明确提出“必以收支为恒”的预算原则，并进一步要求“当和全国为一统系”和“暂分国家岁入、地方岁入”的要求，试图划分权责明确的中央和地方税，建立现代财政预算体系。虽然未待实施，清王朝即轰然倒塌，但也算是初步开创和奠定了中国近代之后的预算框架体系。

同样是在这一年，制定全国预算的措施终于走上正轨。在京与在外的各级衙门应按季与按月把岁入预算报告册呈递上来，度支部收集之后再编定全国岁入总预算案，其他负责花钱的各部衙门分别拿出自己的岁出预算报告册，最后汇总交由内阁会议政务处审议，由资政院议决。而地方的预算案较为简单，只要得到度支部的许可，即可由各省谘议局自行议决。

虽然仍有很多不足，但多少是有了大概的样子，各省也是比较认可这一划分方式。所以虽是自行奏报，但大家的预算表都是一个样式，先写岁入总数，再写核增核减事项，最后列具体款项和数额，为中央的预算编制提供了重要依据。

这时，对“地方税”这一概念的确定让中央的官员们犯了难。从字面意义上来看，“中央税”与“地方税”的区别很明显，一个专由朝廷筹集并使用，另一个就只用于地方建设，两者泾渭分明。可问题在于，在清政府看来，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并没有对两者做出明确的划分，各地方督抚一般都会把每年收入起运一部分到中央，再留存一部分给自己，这样地方所得仅仅是朝廷的留存，算不得真正的地方税。

这个问题集中表现在省一级的财政上。按照清政府的规矩，这些沿袭自元代的行省分别由总督和巡抚督理。

这一点与欧洲乃至世界很多国家都不相同。按照欧洲国家的形成路径，国王也如同大诸侯一般，并无多大权力。所以国王的旨意，往往还需要得到诸侯们的一致同意才能成行。

鉴于欧洲国家的这种现实情况，划分中央税与地方税就变得尤为重要。以法定的形式规定不同成员的分成比例，以尽量和平的方式（即议会制）调节内部争端，是最有利于维持动态平衡的办法。

可中国是大一统的封建王朝，财政由中央统一调拨使用是一个不争的事实。

在这种情况下，划分地方税的提议就显得尤为尴尬。府厅州县乡镇倒还好说，所需资金不算繁杂，但省一级的财政就不同了。在中国，任何一个单独的省拉出来都不亚于欧洲一个国家的体量，随便哪个省出问题都是影响国家命运的大事，朝廷可不想把身家性命都寄托在各省督抚身上。

于是，按照习惯思维，把“省”作为中央权力的延伸，省税自然也就排除出地方税以外。但这就引发出一个巨大问题，府、厅、州、县到底该把钱交给谁？总不能全都“起运”到户部，因为哪怕是增加多少人手也忙不过来。所以省财政作为沟通中央与地方的关键一级，终究是不可或缺。更重要的是，尝到自己管理钱包甜头的督抚们可不想让中央再插手进来，当然是划成地方税更符合自己利益。

因此，各省的清理财政局力主将“省”作为地方最高一级，以下各级收入都能汇总至省内，留足自己部分，再逐步向上“起运”，从此就能免除进京“乞讨”的尴尬。可这么一来，刚成立的度支部就不乐意了，这不是明摆着挖自家的墙脚吗？他们认为主要税收均应收归中央，地方有需要再予以拨付，没必要再单划省级多此一举。

度支部不愿如此，但又无法给出一个合适的条例要求。所以，双方的纠葛横贯晚清的最后几年。虽然时间的指针已经拨到了1911年，大家的激烈争执终究还是没有一个结果。

自始至终，清政府都没有动员起全部力量，真正完成变法革新。其根源就在于封建体制的落后与僵化，已不适用于现代国家的

发展。在这样的封建体制内，必然不可能作出实质性的改革。面对传统的高度集权的财政管理体制处于瓦解的同时，新的财政管理体制又未能形成所造成的窘境，清朝统治者没有意识到近代经济的发展已离不开人民信心的树立，对于已被人民抛弃的清帝国来说，任何努力都是徒劳的。

天下大势，浩浩汤汤，顺之者昌，逆之者亡。武昌一声枪响，臃肿的清王朝霎时土崩瓦解，只留给后人无限唏嘘。

---

(1) 罗尔纲：《湘军兵志》，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6页。

(2) 中国史学会编：《洋务运动》三，上海人民出版社1954年版，第53页。

(3) 李文杰：《息借商款与晚清财政》，《历史研究》2018年第1期。

(4) 萧一山：《清代通史》四，中华书局1985年版，1535页。

(5) 彭雨新：《辛亥革命前夕清王朝财政的崩溃》，《辛亥革命70周年论文集》，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1308页。

(6) 《光绪政要》第三十二卷《度支部议复御史赵秉麟奏制定预算决算表事宜》。

(7) 《光绪财政通纂》卷五十一《论财政混淆》。

(8) 中国史学会编：《洋务运动》四，上海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第162页。

(9) 《东华续录》卷二一六，公记书庄1899年版，第12页。

(10) 《清末民国财政史料辑刊》第一册，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7年版，第165—171页。